

•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 二戰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  
|  
1945

上

BLOOD  
&  
RUINS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Beyond

71

# 二戰

W

帝國黃昏與  
扭轉人類命運  
的戰爭

上

BLOOD  
&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ACRO  
POLIS

衛城

Beyond

71

# 二戰

W

帝國黃昏與  
扭轉人類命運  
的戰爭

中

BLOOD  
&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ACRO  
POLIS

衛城

Beyond

71

# 二戰

W

帝國黃昏與  
扭轉人類命運  
的戰爭

下

BLOOD  
&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ACRO  
POLIS

衛城



二戰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  
|  
1945

BLOOD & RUINS

•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 作者簡介

### 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

二戰研究第一把交椅，沃夫森歷史獎得主，學院專業與大眾書寫兼具。相信史家必須向學院外的大眾分享歷史，而不是把歷史變成專門獨享且難以親近的學科。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現為艾希特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曾在英美學界1980年代「二戰起源」的學術論戰中扮演重要角色。2007年獲英國筆會頒發二戰史寫作殊榮「赫塞爾·蒂爾特曼獎」（Hessell-Tiltman Prize），2001年亦榮獲美國軍事史協會頒發「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獎」（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以表彰其對戰史研究的傑出貢獻。

著作等身，出版或主編近三十本著作，包括《泰晤士世界史》、《牛津二戰史》、《紐約時報二戰全紀錄》、《盟軍為何勝利》、《獨裁者：希特勒的德國與史達林的俄國》、《訊問：深入納粹菁英的內心世界》、《俄國與二戰》、《戰略轟炸與二戰》、《皇家空軍的誕生》、《不列顛空戰的迷思與現實》、《納粹德國的經濟復甦1932-1938》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等。

## 審訂者簡介

### 揭仲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防軍事評論作家。參與過編輯《西洋世界軍事史》套書，譯作有《永遠的企業號》、《圖說諾曼第登陸》等。

## 譯者簡介

### 黃煜文

資深譯者，譯有《耶路撒冷三千年》、《大逃離》、《前線島嶼》、《琥珀眼睛的兔子》、《歷史的歷史》、《當帝國回到家》等多部作品。



# 目次

## ◎上冊

臺灣中文版作者序

致謝

前言

序章 鮮血與廢墟：帝國戰爭的年代

第一章 民族帝國與全球危機（1931-1940年）

- ．新帝國時代
- ．英法走向二戰的曲徑
- ．帝國之戰：西線戰場
- ．瀑布般的災難

第二章 帝國的幻夢與現實（1940-1943年）

- ．英國問題

- ． 世界島與心臟地帶
- ． 種族與空間：統治戰時帝國
- ． 一個沒有猶太人的帝國

### 第三章 民族帝國的終結（1943-1945年）

- ． 帝國的盡頭：艾拉敏、史達林格勒、瓜達康納爾
- ． 戰爭就像買彩券
- ． 代價高昂的勝利
- ． 最後行動：無條件投降

## ◎中冊

### 第四章 動員與總體戰

- ． 軍事動員
- ． 經濟動員
- ． 男性人力與女性人力
- ． 抗爭與生存

### 第五章 軍事作戰的技藝

- ． 裝甲作戰與空中作戰
- ． 兩棲作戰的興起

- ． 戰力加成：無線電與雷達
- ． 戰力加成？情報與欺敵
- ． 勝負之間：戰時的學習曲線

## 第六章 經濟戰與戰時經濟

- ． 量產武器
- ． 民主兵工廠與《租借法案》
- ． 切斷資源：封鎖與轟炸

## 第七章 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

- ． 戰爭正當化
- ． 並非如此「良善的戰爭」
- ． 人民戰爭：打造「集體道德」
- ． 反戰運動與和平主義的兩難

## ◎下冊

## 第八章 民防與敵後抵抗

- ． 民防人員
- ． 各種面貌的戰時抵抗



- ． 抵抗運動與同盟國
- ． 我們輸了，但我們必須戰鬥：猶太人的抵抗

## 第九章 戰時情緒與心理

- ． 戰爭造成的精神官能症
- ． 維持士氣
- ． 後方民眾的情緒

## 第十章 戰爭暴行與戰爭罪

- ． 違反戰爭法規與戰爭慣例
- ． 種族犯罪
- ． 戰爭與性暴力
- ． 罪與罰

## 終 章 從殖民帝國到民族國家：新全球時代的誕生

- ． 帝國的終結
- ． 用鮮血換取獨立
- ． 民族國家的世界
- ． 新帝國取代舊帝國？

## 注釋

## ◎特別收錄別冊

外國媒體與國際學界推薦

臺灣各界試讀推薦

從全球史的視角重新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楊肅  
猷）

二戰史給臺灣社會的啟示（張國城）

致力於調整二戰敘事下歐亞時差的巨著（葉浩）

戰爭與性別政治的矛盾交錯（劉文）

審訂者序（揭仲）

地圖參照

中英譯名對照表

我們迎來了古典時代最大規模的戰爭，一個民眾競相投入的科學化戰爭時代。未來的戰爭勢必前所未見。

—— 尼采，一八八一年





圖中描繪的是一九一一年義土戰爭期間，義大利陸軍抵達鄂圖曼帝國昔蘭尼加省班加西港。最終，義大利控制了昔蘭尼加省與的黎波里塔尼亞省，義大利征服者將這兩省重新命名為「利比亞」。義大利是十一個歐洲帝國的一員。圖源：*D and S Photography Archives/Alamy*

二戰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  
!  
1945  
上  
BLOOD & RUINS

•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 臺灣中文版作者序

我在撰寫本書時有一個重要企圖，我希望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為一場真正的全球衝突，這表示在東亞、歐洲與中東發生的每一場衝突，都值得我們給予同等的重視。臺灣是亞洲戰爭的一部分，身為日本的殖民地，其資源與人力遭受日本殖民強權的剝削，這種狀況與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剝削殖民地與自治領的狀況並無不同。日本帝國的擴張，侵占了中國大部分地區與東南亞，如果日本的軍事行動獲得成功，那麼臺灣將成為東京有效統治下廣大領土的一小部分。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計畫的失敗，使臺灣陷入妾身未明的狀態，擺脫了殖民統治，卻要面對中國勝利後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統治。

臺灣原本有可能在一九四五年遭美軍入侵，但美軍最後並未採納這項計畫，而是決定進攻硫磺島、沖繩，然後進攻日本本土。美國空軍從中國起飛轟炸臺灣的軍事與工業目標，但除此之外，臺灣並未像菲律賓那樣淪為戰場。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使臺灣在歷經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後，重新回歸中國。臺灣如何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個過程仍有待討論，然而無論如何，當時臺灣都不可能像日本另一個重要殖民地韓國那樣取得獨立地位。臺灣成為中國的一省，並且跟大陸一樣受到恐怖統治與貪汙腐敗的茶毒。一九四七年，民眾的抗爭引發「二二八事件」，數千名臺灣人因抗議中國統治而遭到屠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遭中國共產黨擊敗，蔣介石只好放棄大陸，退守臺灣，並把臺灣視為僅剩的中國領土，繼續維持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蔣介石在臺灣建立了威權獨裁體制。臺灣獨特的國



際地位受到西方的支持，它除了是中國與日本從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四五年長達五十年衝突的產物，也是西方與全球共產主義進行冷戰的結果。時至今日，臺灣依然是個潛在的衝突地區，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之後各種複雜因素影響遺留下來的深刻後果。

在本書中，我試圖將東亞的歷史放入漫長的帝國主義歷史架構中。日本帝國的崩潰，與一九四五年後二十年間英國、法國與荷蘭殖民帝國的瓦解，改變了整個南亞與東亞的歷史。殖民帝國的退出，為中共興起成為全球強權鋪路，也促成大陸邊緣地帶四小龍的崛起：臺灣、新加坡、南韓與香港。舊時代帝國主義的失敗，使亞洲得以邁出自己的步伐，甚至改變了全球經濟發展的均勢。這個改變的地緣政治現實，正是二戰日本及其軸心國盟邦戰敗所帶來的重要影響。

很高興看到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問世。我希望在閱讀本書之後，讀者能更瞭解上個世紀的局勢如何形塑今日的臺灣，以及臺灣所在的亞洲與世界。

李察．奧弗里，二〇二四年五月

# 致謝

這些年來，許多同事、研究學者、學生與我進行討論，給我建議，最終促成本書問世。對於其中一些人，我要個別地予以致謝，至於其他未提及姓名的人，我也要感謝他們對於這本二戰之書提供的批評與指教。我特別要感謝埃克塞特大學的同事湯瑪斯（Martin Thomas），他比任何人都要鼓勵我堅持從帝國角度探討二戰的歷史。想將二戰史中的極端暴力與帝國主義歷史連結在一起的人，埃克塞特大學歷史系是個理想的去處。

我要感謝莫德斯利（Evan Mawdsley）、希斯利普（Matthew Heaslip）、勞拉羅（Laura Rowe）、托伊（Richard Toye）、艾恩斯（Roy Irons）、哈蒙德（Richard Hammond）、維維歐卡（Olivier Wieviorka）、已故的霍華爵士（Sir Michael Howard）、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米德（Rana Mitter）、克萊門斯（Paul Clemence）、諾克斯（Lucy Noakes）、威克斯曼（Zoe Waxman）、布坎南（Andrew Buchanan）、史蒂芬李（Stephen Lee）、麥歐洛（Joe Maiolo）、施米德（Klaus Schmider）、奈采爾（Sönke Neitzel）與葛沃斯（Robert Gerwert），感謝你們在我撰寫的過程中持續給予幫助、建議與討論。

感謝所有寫下珍貴作品的作者，他們的付出對我的寫作幫助極大，我也將他們的貢獻盡可能地寫進注釋裡。非常感謝企鵝叢書主編溫德

（Simon Winder），他耐心等待這本書完成，幾乎已經超過任何出版社所能忍受的限度，而且仔細看過所有內容。我要感謝我的前任經紀人吉兒（Gill Coleridge）與現任經紀人卡拉（Cara Jones），在本書漫長的孕

育期間持續給予支持。最後我要感謝協助完成本書的團隊：杜吉德（Richard Duguid）、伊娃（Eva Hodgkin）、萊丁斯（Charlotte Ridings）、愛德華茲（Jeff Edwards）、珊德拉（Sandra Fuller）與哈金森（Matthew Hutchinson）。



## 用語說明

我在書中使用了「同盟國」（Allies）與「軸心國」（Axis）這兩個詞彙，因為這兩個詞已經成為慣用語，不使用的話會讓敘述變得很複雜。儘管如此，此處還是要指出同盟國的三個國家其實並未正式結盟，只有英國與蘇聯在一九四二年締結盟約。另一方面，軸心國也不是一致的同盟關係。「軸心國」一詞最初用在德國與義大利的關係上，而且是由墨索里尼所創。一九四〇年九月，日本簽署《三國同盟條約》與德義兩國建立同盟關係，其他已經加入對蘇作戰的國家也加入同盟——只有芬蘭是例外，芬蘭雖然跟軸心國共同對抗蘇聯，卻沒有加入軸心國的同盟。儘管日本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之前從未與歐洲軸心國建立正式關係，但此後世界輿論幾乎毫無異議地使用「軸心國」一詞並把日本也包括在內。軸心國就此出現在幾乎所有的現代史作品中。在本書中，我也採取一般的習慣用法，但我心裡清楚這個用法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也要針對本書出現的大量統計數據進行說明。眾所周知，在大大小小的戰役中，參戰人數與武器數量往往不甚精確；同樣地，傷亡人數與武器損毀數量也隨著各國定義的戰爭長度與戰爭區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已嘗試使用最新與最可靠的統計數據，但我知道還有許多估計數字跟這些數據有出入。在度量方面，我比較沒那麼精確。我統一使用「噸」這個單位來衡量運量、投彈量或生產量，我並未區別英噸、公噸與美噸。這些是不同的重量單位，但我不可能每次提到都要加以解釋，而且這些單位之間的差異不是很大，因此統一以「噸」來表示還是可接受的。美國短噸等於兩千英磅，英國長噸等於兩千兩百四十英磅，公噸

（一千公斤）相當於兩千兩百零四英磅。我通常使用公里，但英里也是全世界廣泛使用的單位。一英里大約等於一點六公里。

中國、阿拉伯與印度人名與地名的音譯問題，我一般會使用目前通行的譯名，但有些依然普遍使用的傳統譯名則會予以保留。從阿拉伯文音譯的名稱也有好幾種形式，同樣地我會採用目前學界公認的譯名。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在帝國總理府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會場宣讀聲明。該條約確認了三國在歐洲、非洲與亞洲的帝國野心，三國想藉此建立全新的地緣政治秩序。圖源：*INTERFOTO/Alamy*

# 前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前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赫爾因為病重而無法親自前往領獎。他於是寫下一段短文，呼籲在「經歷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殘酷的戰爭與可怕苦難之後」，人類必須致力尋求和平。<sup>1</sup>赫爾向來以言詞誇大著稱，但他這次的看法，不僅清楚顯示七十五年前<sup>[1]</sup>的局勢，也確切反映了人類時至今日的處境。赫爾身處的年代經歷了一場規模超乎人類想像的全球戰爭，當時發生的許多衝突，在今日統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為「二戰」。這場戰爭帶來難以形容與難以計算的苦難、剝奪與死亡。在此之前或之後，沒有任何一場戰爭能與其比擬，就連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無法望其項背。就算未來會像赫爾在一九四五年所預警，發生另一場能夠「將我們文明完全毀滅抹除」的世界大戰，但至少目前這樣的戰爭尚未發生。

這場牽連廣泛的殘酷戰爭，為歷史學家帶來各方面的挑戰。一九四〇年之後的時代變遷，使我們愈來愈難想像在這個世界上曾有超過一億名男性（與遠少於此數的女性）穿上軍服、拿著武器奔赴前線戰鬥，而這些武器的殺傷力在一戰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淬鍊，在二戰又有更驚人的表現。我們也很難想像各個大國能說服民眾同意將高達三分之二的國家產出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數億人必須承受戰爭帶來的貧困與飢餓，或在衝突永無止境的需索下，忍受自己在和平時期努力積攢下來的財富與儲蓄遭受奪取與破壞。我們同樣也難以體會轟炸、流離失所、徵用與偷竊帶來的慘重破壞、剝奪與失落。戰爭尤其對我們今日的感受構成挑

戰，使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麼會有數十萬人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殘暴行徑、恐怖主義與犯罪行為。歷史學家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提到，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他們不是虐待狂，也不是心理病態。<sup>2</sup>今日發生的內戰與暴亂雖然也充斥著殘暴行為，但二戰目睹的卻是如浪潮般的暴力壓迫、囚禁、折磨、驅逐與大規模種族屠殺，而且這些行徑都是由穿著制服的軍人、治安部隊、警察乃至於游擊隊員與民兵犯下的，這些加害者不只是男人，也包括女人。

過去，人們若要解釋二戰為何爆發，只需要歸咎於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軍方在歐洲與東亞的帝國野心，如何激起了愛好和平的國家群起抵抗。無論是標準的西方敘述或蘇聯的官方戰史，都把焦點放在同盟國與軸心國的軍事對抗。這段軍事衝突確實已有許多優秀作品做出深刻探討與詳盡記載，本書因此不會在這方面多做贅述。<sup>3</sup>軍事結果固然重要，但過度聚焦於軍事結果只會產生更多疑問，例如引發戰爭的深層危機為何？戰時為何存在各種性質迥異的衝突？戰爭背後存在著哪些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脈絡？最後，即使二戰在一九四五年正式結束，為什麼往後很長一段時間卻還是持續出現不穩定的暴力衝突？傳統觀點認為，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日本軍人就是造成危機的原因，但事實卻正好相反：這些人其實只是深層危機所引發的結果。換言之，如果我們不瞭解推動這段歷史的力量，就無法合理解釋戰爭的起源、經過與結果。正是這一力量在二十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在全球各地引發社會、政治與國際的長期動盪，最終促使軸心國採取反動的帝國領土征服計畫。唯有粉碎了帝國擴張領土的野心，世界局勢才慢慢進入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替殖民帝國的最終瓦解鋪平了道路。

我這部二戰史的新穎之處，奠基在四大重要論據之上。首先，傳統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分期已不再管用。戰爭早在一九三〇年

代初就已經在中國開打，一九四五年後過了十年才在中國、東南亞、東歐與中東結束。把戰爭限定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也許提供了二戰敘事的核心，但整起衝突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領滿洲，往下則可延續到二戰引發的最後幾場內戰，這些衝突在一九四五年時都還打得難分難解。此外，一戰與在此之前與之後發生的暴力衝突，深刻影響了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充分顯示將兩場大戰場隔開來，反而無法讓我們對這些衝突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們應該要把一戰與二戰視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前後兩個階段，<sup>[2]</sup>這是帝國危機進入最後一個階段時出現的世界體系重整。本書的結構反映了這種非傳統時間視角。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極為重要，不探討這兩個年代，就無法瞭解這場全球戰爭的性質，也無法解釋二戰何以如此進行，以及當時的人如何理解這場戰爭。

其次，應該將二戰理解為全球性的事件，而不只是一場為了擊敗軸心國的歐洲戰爭，加上太平洋戰爭做為點綴。我們還需要看到中歐、地中海、中東與東亞。這些地區的動盪不安，同樣危及了全球穩定，更解釋了戰火為什麼不只發生在幾個大國之間，還延燒到遙遠的地區，例如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島、南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與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的島嶼基地。相較於在歐洲戰場擊敗德國，亞洲的戰事及其結果對戰後世界的影響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現代中國的建立與西方殖民帝國的崩解，都是亞洲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結果。

第三，必須將這場大戰重新定義為好幾種不同戰爭的混合。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我們熟知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包括侵略戰爭與抵抗侵略的戰爭，因為唯有國家才有能力動員充足資源與維持大規模武裝衝突。但除了主要軍事衝突之外，還有內戰與「平民戰爭」（civilian wars），前者諸如中國、烏克蘭、義大利與希臘的內戰，後者則可能是反抗占領軍



（包括軸心國與同盟國占領軍）的解放戰爭，也可能是民眾為了自衛而進行的戰爭，特別是在面對轟炸威脅時。有時候，不同形式的戰爭會在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中彼此重疊或匯聚，例如俄國的游擊隊或法國的抵抗運動。儘管如此，各種游擊戰、內戰與武裝暴動仍構成與二戰平行的小型戰爭，這些小型戰爭的參與者主要是平民，參戰目的是為了保衛或解放。平民動員使二戰更具有「總體戰」的特徵，也影響了二戰的進行方式。

最後，上述三個要素，時間、空間與定義，都源自以下這第四項論點：這場漫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最後一場帝國對帝國的戰爭。過往探討二戰的通史著作，絕大多數都把重點放在「強權」衝突與意識形態，卻遺漏或忽略了「領土型帝國」（territorial empire）的重要性。領土型帝國決定了這場漫長戰爭的性質，不僅戰爭必須從一九三一年起算，戰爭的終點也不是到一九四五年為止，而是延伸到一九四五年後的混亂。這不是說，我們要以狹隘的列寧式觀點來看待這場戰爭，而是必須認知到唯有全球性的帝國秩序，才能將不同地區與不同形式的衝突連結起來。這套帝國秩序的支配者主要是英國與法國，是這兩個國家激起了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的龐大野心。德義日這三個所謂「缺乏殖民地」的國家，為了確保國家存續與彰顯國家認同，開始對外征服，擴張自己的帝國疆域。直到最近才有歷史學家主張，軸心國模仿英法舊帝國的方式來創造屬於自己的全球「連結」，最終目的是要取代這些舊帝國。<sup>4</sup>一戰前後就已出現的帝國擴張計畫與帝國危機，已大致決定二戰的爆發方式與過程。二戰的最終結果，便是長達五百年的歐洲殖民帝國的終結與民族國家的興起。<sup>5</sup>歐洲恣意擴張了數百年，最後還是免不了要退回歐洲。傳統殖民統治的殘餘，在一九四五年後的數十年間迅速崩解，促使美國與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成為新全球秩序的支配者。



本書接下來將根據這四大論點來展開，並大致區分成五個敘事性章節（序章，第一章到第三章，以及終章）與七個主題性章節（第四章到第十章）。本書序章將從長期因素著手。這些因素形成了一九三〇年代的危機，導致二戰爆發，而其根源則是十九世紀晚期的帝國競爭和一戰。二戰並非不可避免，但一九二〇年代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的崩潰，加上全球帝國體系的動搖與民粹民族主義的興起，一連串危機導致的緊張與野心很難藉由國際合作加以化解。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經濟危機與突然出現的機會，促使日本、義大利與德國追求帝國主義的「新秩序」，也為既有的帝國如英國、法國、荷蘭甚至比利時帶來巨大災難——這些舊帝國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間紛紛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敗。雖然「新秩序」國家傾向於建立自己的區域性帝國，也不願立刻與蘇聯和美國為敵，但若不打敗或摧毀這兩大強權，就無法實現自己的帝國野心。「巴巴羅薩作戰」（Operation Barbarossa）與太平洋戰爭因應而生，也因此有了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戰爭：希特勒政權指責猶太人策畫全球衝突、打擊德國的民族主張。本書第一章將會描述國際政治的動盪不安，促使新帝國想趁美國與蘇聯尚未徹底動員潛力之前取得勝利。

第二章將描述戰火如何燒遍全世界，以及這場戰爭最後如何挫敗新帝國的領土野心，代之以另一套更穩定的世界秩序。這套新世界秩序不再奠基於帝國，而是依據主權國家的原則運作，仰賴的是曾經在一九三〇年代崩潰的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這項轉變是由蘇聯與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共同促成。更重要的是，無論主張的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美蘇兩國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都是反對讓傳統殖民帝國繼續存在下去。兩大強國在反對帝國這一議題上還有一個重要盟友，那就是中國。一九四〇年代晚期與一九五〇年代，美蘇共同塑造了一個由民族國家組

成的世界，主導者是冷戰的超級大國，而非領土型帝國。即便德國與日本皆曾為了不讓民族滅絕而拼戰到最後，但隨著國內追求帝國擴張的勢力遭到擊敗，德日兩民族也獲得了重生的機會。到了第三章，此時「新秩序」國家的潰敗已擺在眼前，但這些國家卻不是一開始就注定失敗。雙方最龐大的人力犧牲與資源損失都發生在戰爭的最後兩年，此時尚且沒有人能看出誰能取得最後勝利。一九四五年後，隨著戰時殘餘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衝突在帝國餘暉及超級大國野心的背景下大致獲得解決，但暴力衝突仍持續存在，儘管規模已大幅降低。這就是本書終章的主題：傳統帝國終於解體，今日的民族國家於焉形成。

本書的框架將圍繞在「最後一場帝國對帝國的戰爭」下進行，同時也替後續的七個主題性章節提供整體脈絡。這幾章處理的是更廣義上的戰爭經驗，不僅針對數百萬前線將士，也包括後方支持總體戰爭的民間社會。<sup>6</sup>國家如何動員龐大人力與物力，這麼做會有什麼影響？投入戰爭的武裝力量如何組織與運用資源，又有哪些影響？國家、政黨或個人如何合理化他們參與的戰爭，如何讓民眾繼續投入昂貴而殘暴的戰爭，即使最後面臨的是失敗？為什麼同一時間會發展出內戰或平民戰爭，這會導致什麼樣的社會或政治後果？本書還有一章將探討戰爭對於親歷者造成的傷害，特別是對那超過一億名被動員參戰的男男女女們來說，戰爭帶來哪些情緒與心理上的衝擊。戰爭改變了人們的行為與預期，使其受到各種人類感情的驅使：一方面是恐懼、仇視、憎恨或憤怒，另一方面是勇氣、自我犧牲、焦慮與同情。這是戰時經驗的一項元素，難以透過歷史來描述，但在解釋戰爭對個人的影響時卻極為重要。在不尋常的戰時環境下，個人無論是否身處戰場，都持續承受著壓力。本書最後一個主題將探討戰爭引起的極端暴力與犯罪，如何導致數千萬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這一章將帶出了兩個核心問題：為什麼二戰軍人與

平民的死亡人數如此之多，幾乎是一戰的五倍？為什麼加害者願意且能夠放縱自己進行各式各樣的殘酷暴力，而且這種情況遍及所有戰場？這兩個問題顯然彼此相關，但卻不盡相同。死亡以各種面貌與理由出現，總是無情地伴隨戰爭而來。

※ ※ ※

要撰寫一部新二戰史，可以參考的資料實在太多，不可能公允地處理所有作品。我在四十年前第一次撰寫二戰史時，還有可能把絕大多數與這場戰爭有關的書籍全部看完。過去四十年來，全世界討論二戰各個面向與大戰前後幾年的歷史作品，數量上已經出現爆炸性成長。本書因此只關注與核心論點有關的歷史資料，而不敢妄稱如百科全書般蒐羅了全面廣博的內容，因為如今已不可能閱讀所有作品，也不可能有所謂「最終版」二戰全史，無論是一冊或多冊。最近出版的《劍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共三大冊，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說涵蓋了二戰的所有內容。我盡量採用近年來出版的資料，因為這些著作通常已經整合特定面向的可用知識，不過我也嘗試容納許多年代久遠的重要研究。我很幸運能接觸到大量與帝國史和亞洲戰史有關的新研究，這兩個領域長久以來一直是二戰史忽略的主題。我也運用了能支持相關研究的檔案。今天的歷史學家有許多個人回憶錄可以參考，這些紀錄有些已出版成書，有些則是口述檔案，內容可以跟歷史學家描述的戰時經驗交互參照，有時可以帶來啟發，有時也會彼此矛盾。雖然我也引用了一些個人紀錄，但與最近諸多二戰史著作相比算是比較少的。本書不可避免有掛一漏萬或過於簡略之處，讀者可能也會發現一些熟悉的主題被打散到不同章節裡，以不同的視角加以敘述，明顯

的例子如戰略轟炸、猶太人大屠殺與戰力分析，但我這麼做是為了清楚呈現這場戰爭的核心歷史意義。這是一本針對二戰提出大問題的歷史著作，希望藉由梳理當時的歷史脈絡，瞭解身處其中之人為什麼不得不從事各種行為。這也是一部關於死亡、恐怖、毀滅與貧困的歷史，描述著赫爾所說的「巨大苦難」。因為鮮血與廢墟，正是二戰帶來的慘痛代價。

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

[1] 編注：指原文出版的二〇二一年。

[2] 編注：第一次三十年戰爭指的是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的大規模歐洲戰爭，造成歐洲境內數百萬死傷。又稱「宗教戰爭」。

PROLOGUE

序 章

鮮血與廢墟：  
帝國戰爭的年代

「十九世紀熟知的帝國主義已不可能繼續下去，唯一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將會安詳地入土，還是會埋葬在鮮血與廢墟之中。」

—— 伍爾夫（**Leonard Woolf**），一九二八年<sup>1</sup>

本書的原文書名「鮮血與廢墟」來自這段引文，出自《帝國主義與文明》（*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作者伍爾夫是政治經濟學者，他在書中表明現代帝國主義決定了二十世紀初現代文明的樣貌。伍爾夫主張，直到一九二〇年代為止，西方世界經歷了一段不尋常的百年革命，工業、群眾政治與貴族衰微轉變了整個社會。這項轉變不僅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伴隨而來的還有帝國征服的巨大浪潮——在伍爾夫寫作之時，全世界依然受到這股浪潮的影響。伍爾夫認為這個新帝國文明是個「好戰的、狂熱擴張的、征服的、剝削的、改變他人信仰的文明」，而近年來討論帝國的歷史作品絕大多數支持這樣的看法。全球被幾個殖民帝國支配，在世界史上是相當獨特的現象。<sup>2</sup>對伍爾夫來說，帝國擴張是一股爆炸性的危險力量，很容易引發暴力衝突，特別是在帝國面臨崩潰的時候。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二十年後，又爆發了另一場更全球性與更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伍爾夫正確指出這場蔓延全球的暴力衝突的悠久根源，其禍根早在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就已種下。當時經濟與政治現代化的步伐快速踏遍整個發展中的世界，而最終爆發的大戰則在一九四〇年代與一九五〇年代才告終止。歐洲、北美與日本的大規模工業化與都市化，與各國民族意識的提升發生於同時，也助長了各國民族意識的發展。義大利與德國這兩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強權都是新的民族國家，前者剛在一八六一年建國，後者則是在十年後才成立。日本是亞洲唯一推動歐洲式現代化的國家，就實質意義來說，日本也算是「新」的民族國家。日本於一八六



八年「明治維新」時期推翻傳統的德川幕府，在明治天皇領導下，由一群經濟與軍事改革者組成的新菁英重新打造新國家。經濟現代化，連同教育的提高、快速的社會流動與中央政府體制的發展，使得民族與國家結合成一體。這些過程也創造出新的國家認同與更清晰的國家政治，即使是歷史較為悠久的國家也是如此。社會變遷催生出群眾政治組織，民眾要求自由主義改革與更多的代表權。到了一九〇〇年，除了俄羅斯帝國之外，所有進行現代化的國家都已經設立國會（但選舉權受到限制），而且對已經成為公民的民眾依法而治。對於既有的政治與經濟菁英來說，這些變遷使他們失去了傳統賦予的社會權力與政治權威。在這個快速而不可預測的變遷環境下，發展中的工業強權掀起了新一波的領土型帝國主義，試圖瓜分或支配全球既有殖民帝國網絡尚未掌握的其他地區，而唯有從這最後一波建立帝國的強大驅力中，我們才能深入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根源。

在伍爾夫眼中，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前四十年出現的「新帝國主義」，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既有帝國結構的延伸。早在「新」帝國主義出現之前，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已經在世界各地擁有各式各樣宛如大雜燴般的領土，例如殖民地、保護國、勢力範圍、貨物集散地與條約特權地區。但新一波的帝國卻不一樣。新帝國主義源自於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彼此間與日俱增的競爭意識，一部分是因為這些國家不斷在尋找新的原料與糧食來源與新的市場，另一部分是因為「帝國」已經成為定義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方式，民族國家必須成為進步的「文明化」媒介，將文明散布到世界其他地區，還有一部分則是帝國已經成為民族國家聲望的象徵。最後一個原因對於新民族國家來說尤其重要，這些新民族國家的認同感依然脆弱，國內各地區缺乏統一的效忠對象，社會也存在著衝突。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德國總理克洛德維希（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表示：「維持殖民屬地是民族國家榮譽的要求，也是民族國家聲望的指標。」<sup>3</sup>一八八五年，義大利外交大臣主張，「在這場向全世界殖民的越野障礙賽上」，義大利必須取得自己的殖民地，實現「自己身為強權的天命」。<sup>4</sup>對於領導新明治日本的改革者來說，某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可以成為新「國體」的核心象徵：一八七〇年代日本占領千島群島、琉球群島與小笠原群島，就是建立今日所謂「大日本帝國」的第一步。<sup>5</sup>半個世紀之後，也就是一九四〇年代，就是這三個想建立大帝國的國家引發了二戰。

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建立，與帝國的建立或擴大，兩者之間的連結在一九一四年之前逐漸形成普遍共識，就連東歐的傳統王朝帝國羅曼諾夫王朝與哈布斯堡王朝也認同這樣的連結，兩國對於巴爾幹半島的帝國野心，最終導致了一戰。對於想鞏固或建立海外帝國的民族國家來說，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帝國主義的關連非常明顯。我們已經無法再用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 一詞來形容這些爭奪領土的參與者，而應該稱之為「民族帝國」(nation-empire)。所謂的「帝國主義的民族化」，其核心特徵一直持續到一九三〇年代與最後一波以武力奪取領土的浪潮為止。<sup>6</sup>帝國帶有明顯的宗主國色彩，它清楚反映出公民與臣屬、文明與原始、現代與古老的明確對比，建立帝國的國家也以這種兩極化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統治的百姓與疆土，而且一直維持這樣的態度直到一九四〇年代為止。所有的帝國強權都具有這種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就建立在幾乎完全忽視占領地的既有文化與價值上。在絕大多數狀況下，這些國家都誇大了帝國能帶來的好處，無論是新消費者還是宗教改信者。德國史家昆德魯斯(Birthe Kundrus) 所謂的「帝國幻想」，在刺激國家競爭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即使實際上帝國的成本顯然遠高於帝國帶來的有限利益，也無法讓人停止這樣的幻想。<sup>7</sup>這些帝國幻想包括了在野蠻邊

疆進行墾殖，尋找黃金國度（Eldorado）取得大量財富，崇高的「文明化使命」，以及實現「昭昭天命」以振興國家。這些想法形塑了往後五十年的「帝國」想像。

這些掀起新帝國主義浪潮的帝國幻想並非憑空產生。它們先是從帝國的思想與科學研究獲得啟發，而後反過來激勵更多人投入其中，成為許多有志於帝國的國家所追求的潮流。國家競爭的觀念幾乎可以說是脫胎自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現代國家的相互競爭因此成了天經地義的道理。在達爾文思想的幾位傑出後繼者的主導下，這套論點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備受討論，其思想核心是：「健康」的民族注定要統治其他弱小的民族。英國統計學家皮爾森（Karl Pearson）在一九〇〇年的演說〈從科學觀點看民族生命〉（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中表示，英國若想維持一流的水準，「就必須透過戰爭來對付低等種族，對實力相當的種族則必須爭奪商路、原物料來源與糧食供給。如此才符合人類的自然史觀點。」<sup>8</sup>德國將領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一九一二年出版與獲得廣泛翻譯的作品《德國與下一場戰爭》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中提到，要解釋國家競爭，就必須把許多事物視為既定的道理：「想要生存，就必須為自己爭取到最有利的生存條件，在世界的自然經濟中確立自己的地位。弱者勢必遭到淘汰。」<sup>9</sup>在套用達爾文理論時，最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就是爭奪資源；正是為了爭奪資源，國家才會需要更多的帝國領土。一八九七年，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創造了一個惡名昭彰的詞彙，「生存空間」（Lebensraum），他認為現代的優越文化需要擴大領土，為增加的人口提供糧食與物質資源。而要做到這點，就只能奪取「低等」文化的領土。拉采爾撰寫《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時，希特勒還是個小學生，但這本書的結論卻在一九二〇年代獲得這名未來獨裁者的

青睞，希特勒經常與他的親密夥伴赫斯（Rudolf Hess）討論這本書。<sup>10</sup>

這種宣揚歐洲帝國主義的文化優越感也來自當時的科學理論，人們認為種族存在著自然階序，而階序的產生來自於基因的差異。雖然上述說法並無可信的科學證據，但人們認為殖民世界的原始落後或完全野蠻的狀態，意謂著當地物質資源與土地若未獲得先進國家的管理，將只會構成浪費，而先進國家的責任就是讓這些墮落的異國人民享受文明的成果。這種對比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被當成種族歧視與永久征服的理由。一九〇〇年，英國印度總督寇松勳爵（Lord Curzon）曾說：「我管理的這數百萬人口，他們的智力還不如小學生。」在德國，這種觀點甚至延伸到帝國的東歐鄰邦上。一九一四年，《萊比錫人民報》

（*Leipziger Volkszeitung*）表示，這些東歐鄰邦與「野蠻世界」無異。<sup>11</sup>更危險的是，種族優越的假定，無論在生物層面還是倫理層面，都被用來合理化極端暴力的使用，極端暴力因此成為新帝國主義浪潮下的一股暗流。

在奪取既有政治體領土時，幾乎免不了出現暴力或威脅。即使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人們對於美洲原住民或澳洲原住民的命運感到遺憾，卻依然認為這是白人征服下不可避免的結果。一八七〇年代之後，向非洲與亞洲擴張造成的大規模暴力也被以同樣的理由加以合理化：如果要對外輸出文明，讓受害者獲得利益，就必須動用暴力，而這樣的現象在當時並未引起任何道德上的不安。一九〇四年，在德屬西南非，一名醫生寫道：「原住民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就是一次性地徹底將原住民完全擊潰。」最終解決方案就跟生存空間一樣，並非國家社會主義（以下簡稱納粹主義）的發明，不過還是有歷史學者認為這兩個時代可能存在著因果關係。<sup>12</sup>此外，在一九一四年之前，這樣的用語也不是只有德文才有。「種族」與「空間」這兩個在一九三〇年代與

一九四〇年代支配帝國主義的學生概念，其實早在一戰之前，人們熱烈討論帝國的功能與必要性時就已出現。<sup>13</sup>帝國在對待本土人民與殖民地臣民時也建立起兩套對比鮮明的道德宇宙：帝國人民可以享有特權，殖民地臣民則遭受壓迫與專斷的司法審判，過的生活與宗主國中心有著天壤之別。

儘管如此，這種從現代民族國家到領土型帝國的心理認知與想像，卻很難與這些新帝國建立時的歷史現實相吻合。事實上，從帝國建立到一九四五年後帝國瓦解的整段過程，帝國做為「想像的共同體」，與民族國家透過建立民族帝國來尋求現代認同所實際花費的成本與風險之間，存在著巨大落差。就連兩個主要的帝國強權英國與法國也是如此，英法都必須投入資源來征服與捍衛愈來愈廣大的領土。一九一一年，英國支配的帝國疆域高達三千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多達四億人；法國則是一千兩百五十萬平方公里與一億人口，總領土面積比母國大上二十倍。<sup>14</sup>至於那些首次踏上帝國之路的新國家，要讓國內民眾對海外殖民地產生熱情顯然要比舊帝國更加困難，因為新國家建立的殖民地遠比舊帝國來得小，資源條件也較差，因此難以吸引國內民眾前往墾殖，也很難獲得投資。一八九五年，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失利，只取得部分索馬利亞與厄利垂亞（Eritrea）做為新帝國殖民地，國內民眾因此強烈反對繼續從事帝國冒險。當時義大利只有幾千人移居殖民地，卻有一千六百萬移民到其他國家。一九一一年，義大利與鄂圖曼帝國交戰，取得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與昔蘭尼加（Cyrenaica），兩地即今日的利比亞。開戰之前，當時還是一名激進年輕記者的墨索里尼提出警告，任何政府想以鮮血與金錢推動征服，將會面臨總罷工。他宣稱：「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將因此演變成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戰爭。」這項觀點呼應了墨索里尼日後的帝國主義，他把國家區分成「無產階級」國家與富裕的



金權政治國家，而義大利屬於前者。<sup>15</sup>一九一四年之前，德國對海外帝國的態度也同樣充滿矛盾。熱心追求海外殖民地的主要是商人、教士與教育者構成的資產階級圈子，到了一九一四年，德國殖民地協會估計已有四萬名會員，但實際到海外屬地墾殖的德國人卻只有這個數字的一半。<sup>16</sup>一九一四年之前，大眾教育與文化不斷宣傳海外殖民的異國風情與浪漫的一面，但民眾卻對想像的「東方」大陸帝國更有興趣。事實上，後者始終主導了德國人對領土擴張的態度。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與一九四〇年代，我們可以看到德國人如何積極建立歐洲帝國，這點值得詳細探究。

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德國，領土涵蓋擁有大量波蘭人口的東普魯士地區，這是過去十八世紀普魯士與俄國和奧地利共同瓜分波蘭的結果。這個地區被視為抵禦如汪洋般東方斯拉夫人威脅的重要防波堤。一八八六年，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在「皇家普魯士墾殖委員會」開幕式上致詞，表示委員會的目的在於盡可能讓波蘭人口離開東部邊疆返回俄屬波蘭，鼓勵德國殖民者定居此地，抹除所有的「原始農業」（波蘭經濟的貶義說法），提供邊疆穩定的力量來抵禦可能的威脅。這種做法被稱為「內部殖民」，並且獲得了廣泛宣傳。一八九四年，東部邊疆協會成立，旨在鼓勵殖民。「種族與空間」的觀念很快就適用於東部邊疆，而且早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帝國幻想已經促使德國帝國主義進一步往東擴展。德國將東方視為適合殖民之地，相信現代文明可以為「深陷於野蠻與貧困」的東方帶來秩序與文化。<sup>17</sup>邊疆文學此時也開始出現，也就是所謂的「東方小說」（Ostromanen），讓德國人規避海外的帝國主義，專注於殖民東部邊疆。在東方小說中，波蘭人遭到扭曲，被描述成「深色」種族，有著深色皮膚，深色眼睛，深色頭髮。這種做法強化了殖民面向，把波蘭人定義為「他者」，與有文化的德國

人形成對比。作家維比格（Clara Viebig）的《沉睡的軍隊》（*The Sleeping Army*, 1904）是最知名的一部東方小說，書中描述一名古銅色的波蘭農民哀嘆「金髮的白人入侵者」。<sup>18</sup>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前夕，內部殖民協會成立，協會刊物在比較了非洲帝國與波蘭人居住的東部邊疆之後，主張德國必須朝這兩個地區進行擴張，為健康的德國種族拓展空間。<sup>19</sup>

新帝國主義的發展有一項主要特色，那就是新帝國主義本身即帶有不穩定因子與廣泛的暴力傾向，從一八七〇年代到一九四〇年代的帝國擴張，可以明顯看出新帝國主義的這一特色。十九世紀晚期與一戰爆發前十年，許多支持帝國的論點都認為，民族帝國之間的自然競爭使國際關係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因此帝國的建立在戰略上有其必要；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壓力引發地方社群的強烈反抗，因此帝國的建立也能維護國家的勢力範圍或經濟利益。有人認為一戰前的歐洲是所謂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這種說法其實是歐洲中心論建構的觀點。事實上，歐洲早在一戰之前就不斷將暴力輸出到全球各地。現代化國家的崛起，是交通連結與現代武器急速發展的結果，再加上金錢與軍事訓練，帝國強權因此更具有軍事優勢。一八六八年後，日本迅速仿效歐洲的現代兵役組織與採行最先進的科技，但在當時的亞洲或非洲也只有日本能夠做到這一點。當時世界各地僅存的傳統社會，皆遭到帝國暴力征服，無論是南非的祖魯人或馬塔貝勒人（*Matabele*），還是荷屬東印度征服的亞齊蘇丹國，或者是法國攻占的安南與東京（今日越南）。所有帝國關係的明顯特徵就是暴力，即使到了一九四五年後帝國最終的衰微時期，也依然擺脫不了暴力的陰影。

若從帝國史的角度來看，往後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彼此勢均力敵且高度發展的敵對國家為了建立帝國而產生的衝突。一戰確實爆發於一九



一四年，但我們不該把那一年視為世界和平的終結之年。畢竟早在一戰之前，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撼動世界穩定的大規模衝突與危機時刻，這些衝突在愈來愈全球化的時代深刻影響了歐洲強權之間的關係，也左右了亞洲的未來。後者最重要的衝突當屬日本發動的戰爭，第一場是一八九四年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又譯甲午戰爭），日本開始入侵中國藩屬朝鮮。這場大規模衝突由日本新建的陸海軍獲得勝利，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而福爾摩沙（今日的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國一夜之間躋身殖民地競賽的重要玩家。日本發動的第二場戰爭是針對俄羅斯帝國。日本擊敗中國之後，俄國沙皇不僅聯合德法阻止日本併吞遼東半島，還進一步在中國滿洲建立利權。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俄國不僅派出大量陸軍，還派遣俄國艦隊徒勞地從波羅的海遠航三萬公里來到日本海，結果陸海軍均遭日本擊潰，日本因此完整取得俄國在滿洲的經濟利益。日本為了日俄戰爭動員將近兩百萬人，結果有八萬一千五百人戰死，三十八萬一千人受傷，此前日本從未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對外戰爭，而這場戰爭也改變了日本在東亞的地位。<sup>20</sup>

一八九八年到一八九九年的美西戰爭不是一場為了建立帝國而發動的戰爭，但西班牙的戰敗卻讓美國暫時取得了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與部分太平洋島嶼。建立「大美國」（Greater America）的想法因此甚囂塵上，但當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新領土不屬於美國所有時，美利堅帝國的熱潮也隨之消退。太平洋基地具有戰略用途，但從西班牙奪取的其他領土地位卻懸而未決，既不屬於正式帝國的一部分，卻又處於美國占領的狀態。<sup>21</sup>同樣在一八九九年，英國與兩個獨立的波耳南非共和國川斯瓦與奧蘭治自由邦爆發大戰。這場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的南非戰爭，是英國相隔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一場軍事衝突。英國總共動員約七十五萬人，傷亡也達到兩萬兩千人。由於這場戰爭對抗的是同屬白人的

歐洲移民，英國因此受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指責，但最終贏得這場戰爭的英國卻藉此為自己的非洲帝國擴充了廣大領土與豐富資源，同時進一步強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唯有戰爭才能贏得更多的帝國領土。<sup>22</sup>

殖民地爭議是帝國衝突的關鍵觸發點，引發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一八八〇年代，一些國家雖然快速現代化，但政治上卻動盪不安，這些國家的國力與軍力持續成長，引發其他國家的戰略焦慮，因此組成了陣營。不僅如此，帝國之間的敵對也構成了陣營的另一項焦慮來源。日俄戰爭的失敗，使俄國的關注範圍退回到了東南歐，開始重新檢視與鄂圖曼帝國的關係。而英法在帝國殖民地上的衝突，則促使兩國於一九〇四年簽訂《英法協約》，同樣的不確定感也在三年後催生了《英俄協約》——正是英俄兩國的合作影響了日後一戰的格局。各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全球利益，而不只是在歐洲的利益，因此競相擴充軍備，尤其英德的海軍競賽就是因應兩國的利益全球化而產生。事實上，德國的帝國野心源自於德國深信新民族國家必須取得帝國地位才能讓自己躋身世界強權之列，德國的思維充分表現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幾起嚴峻的國際事件上，特別是一九〇五年與一九〇八年的摩洛哥危機。德國反對英國、法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協定，質疑摩洛哥保護國的權利分配。

還有一起與摩洛哥危機一樣重要的事件，那就是一九一一年義大利總理喬利蒂（Giovanni Giolitti）在國內民族主義輿論壓力下，向鄂圖曼土耳其宣戰，並且占領鄂圖曼帝國在北非的剩餘領土。民族主義者與殖民遊說團體主張，在遭受衣索比亞（又稱阿比西尼亞）的屈辱之後，<sup>[1]</sup>新成立的民族國家義大利必須進行帝國擴張，才能建立強權地位。民族主義者倡議者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更表示，義大利要是無法成為帝國，就會淪為「無產階級國家」——一九三〇年代的墨索里尼就是使用這一說詞合理化義大利的新帝國主義。<sup>23</sup>對義大利人而言，這場戰

爭的主要目標不僅是貿易或領土，更是為了建立威望，因為這場戰爭發生的時間正值義大利建國五十週年。與德國掀起摩洛哥危機一樣，義大利擔心英法會出手干預義大利在非洲建立帝國，義大利政府因此冒了與英法這兩個主要帝國強權衝突的極大風險，不過最後英法並未阻止義大利出兵。儘管如此，結果並非如義大利高層預期的是一場短期的殖民地戰爭，反而就像一九〇四年的俄國，義大利發現自己面對的是另一個強權。<sup>24</sup>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到一九一二年十月，這場戰爭持續整整一年的時間，土耳其人最後決定割讓的黎波里塔尼亞與昔蘭尼加——這是因為獨立的巴爾幹各國利用土耳其人與義大利人交戰的機會，趁機攻擊土耳其人在歐洲的剩餘領土，顧此失彼的土耳其人只能放棄北非。義大利把新殖民地命名為「利比亞」，這是該地區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名稱。義大利很快又開始向英法施壓，希望取得東非的擴張權利。<sup>25</sup>在愛琴海，義大利占領土耳其的多德卡內斯群島（Dodecanese islands），目的是為了向土耳其索求更多權利。考慮到這些島嶼上面居住的也是歐洲人，義大利於是只在當地建立起半殖民地。就像日本擊敗中俄一樣，義大利征服利比亞也影響了往後一整個世代的觀念：就算面對實力堅強的對手，義大利人仍相信要建立起新的領土型帝國，就只能仰賴戰爭。

有個很好但很少被提出來的例證，可以說明義大利人在北非的狂妄行徑其實更有可能是引發一戰的原因。義大利占領北非後，巴爾幹各國也擊敗土耳其人，將其逐出絕大部分的歐洲領土，塞爾維亞因此擁有了主導巴爾幹半島的契機。然而，俄羅斯與奧匈這兩個與巴爾幹半島息息相關的帝國，雖然在國內面臨嚴峻的政治危機，卻不願放棄在巴爾幹半島的戰略利益。一八八二年以來，義大利一直是德國與奧國的盟友，義大利於一九一二年占領多德卡內斯群島，使俄國無法取得進入地中海的溫水港，俄國因此難以對巴爾幹半島採取積極的干預行動。一九一四年

七月底八月初爆發的歐戰，雖然一般歸因於歐洲強權在強大民族情感下掀起戰端，以及各主要參戰國在混雜了傲慢與不安的情緒下投入戰局，但實際上，真正能解釋歐洲各國明知一旦參戰將造成嚴重損失卻依然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其實就在於帝國，在於當時人抱持著民族國家唯有取得帝國地位，成為民族帝國，才有資格成為現代國家的觀念。就算塞爾維亞真的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接受了奧國的最後通牒，今日歷史學家在提到這起事件時，依然會認為這是一八九〇年代以來又一場短暫的帝國危機。<sup>26</sup>

一戰顯然是一場帝國戰爭。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參戰的國家全是帝國，這些國家要不是傳統的王朝帝國，就是擁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國。隨著這場戰爭演變成長期消耗戰，戰爭的賭注也跟著水漲船高，民族帝國進行的已不只是爭奪領土的戰鬥，而是生死存亡之爭。探討一戰歷史時，如果只把重點放在西線戰場漫長而血腥的僵局上，等於是用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待這場戰爭。事實上，這場大戰的戰場遍及全世界，而且充滿強烈的帝國野心。<sup>27</sup>俄羅斯想擊敗鄂圖曼帝國，將勢力範圍擴展到東地中海與中東；鄂圖曼帝國則是在民族主義革命威脅下，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向協約國（也就是英法俄三大帝國）宣戰，希望扭轉土耳其在中東與北非的頹勢。義大利曾於一八八二年加入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成立的三國同盟，但在一九一四年時卻選擇不加入戰爭。義大利甚至在一九一五年春於倫敦簽署一項祕密協定，約定義大利將可取得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部分帝國領土做為補償，義大利政府隨後便加入了協約國陣營。雖然義大利的主要訴求是奧匈帝國被擊敗之後，義大利可以取得義大利半島東北部的領土，但這仍不減義大利的帝國野心。在利比亞，義大利軍隊在一九一二年後面臨層出不窮的叛亂，這些叛亂都有土耳其人在背後煽風點火。而就在義大利討論是否參戰之際，利比亞的兩



場大敗仗已造成三千名義大利人死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義大利在殖民地派駐大約四萬名士兵，以防止鄂圖曼帝國在當地煽動吉哈德（jihad）。到了一九一八年，義大利已能成功固守利比亞沿海地區，但首府黎波里依然遭到叛軍圍攻。<sup>28</sup>

英法進行的戰爭，規模也是全球性的。歐洲戰事才剛開打，協約國就馬上占領德國位於非洲與太平洋的殖民地。西非的多哥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陷落，德屬西南非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失守，喀麥隆則是一九一六年二月；德屬東非雖然從未完全遭到征服，但到了一九一六年，絕大部分地區也已經落入協約國的掌握。在太平洋地區，英國與日本在一九〇二年結為同盟，一戰爆發之後，英國要求日本占領德國在三十年前向西班牙購入的北太平洋島嶼（日本人稱為南洋），以及奪取德國海外帝國擁有的中國山東半島。日本對德宣戰，在一九一四年底奪取了德國殖民地，日本帝國勢力因此更進一步深入中國，而且首次擴展了太平洋疆域。<sup>29</sup>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強行索取蒙古、福建與滿洲的利權，這些無理要求與一九一四年之前西方強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如出一轍。<sup>30</sup>日本知道列強正深陷歐戰泥淖，無力干預亞洲事務，因此趁此機會擴大勢力範圍。「二十一條要求」包括了中國不得將沿岸港灣與島嶼讓與或租借給歐洲列強，這類要求成為往後數十年日本帝國持續滲透中國的模式。

中東是一戰前期除了歐洲以外，帝國衝突最激烈的地區。以埃及為基地（埃及於一八八四年遭英國占領，一九一四年成為英國的保護國），大英帝國對鄂圖曼帝國發動了長期且複雜的戰爭，企圖奪取從東地中海到波斯（今日的伊朗）的控制權。這個地區如果落入其他強權手裡，就會對英國的全球帝國構成威脅，而這也成為英國帝國政策關注的焦點，這也是為什麼英國會在一戰期間想盡辦法，就是要控制從巴勒斯

坦到阿富汗這條延伸整個南亞與阿拉伯世界的弧形地帶。<sup>31</sup>協約國最初的計畫是一九一五年一月提出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把鄂圖曼帝國劃分成幾個勢力範圍：俄羅斯帝國取得君士坦丁堡與土耳其的核心地帶安納托利亞、法國取得範圍尚未明確的大敘利亞地區、英國則掌控巴勒斯坦到波斯的廣大地帶。但在實現這項計畫之前，首先必須擊退鄂圖曼帝國對蘇伊士運河的攻勢，因為這條運河是大英帝國的命脈。等到大英帝國擊敗土耳其人，使其退回到敘利亞與伊拉克北部時，俄羅斯已然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而退出戰爭，整個中東因此由英法兩個帝國瓜分。鄂圖曼土耳其試圖在德國盟邦的支持下穩住帝國。德國不僅提供武器裝備與軍官顧問團，也在英法帝國境內或勢力範圍內煽動宗教或民族主義叛亂，特別是在印度、阿富汗、北非與伊朗。<sup>32</sup>但德國的努力終究失敗，到了一九一八年，情勢已十分明顯，整個中東地區即將落入英法的支配，接下來或許將遭到兩國瓜分。英法一旦能掌控這個關鍵地區，兩國的帝國霸權將進一步獲得擴大與鞏固。<sup>33</sup>

對德國而言，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與本土遭受協約國海上封鎖，只是加深了德國帝國主義者建立更龐大歐洲帝國的決心，特別是在東方建立更遼闊的疆域。這點對當時的德意志帝國來說並不是幻想。因為到了一九一五年，德軍已經深入俄屬波蘭，同時占領俄屬波羅的海國家。德國在戰前為了抵禦「斯拉夫民族」，認為必須在東方建立殖民地，一戰時則持續往東推進，促使斯拉夫人的疆界東移。在東方的德國軍事占領區，當地的統治模式十分類似於歐洲治理海外殖民地的方式，特別是區分公民與臣民的不同。占領區的民眾被一套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統治，被迫向經過的德國官員行禮鞠躬，還必須強制勞動。<sup>34</sup>一九一七年，德國祖國黨成立之後，在東方建立廣大殖民地的想法逐漸受到德國民眾歡迎。在一篇為德國青年撰寫的愛國故事裡，主人翁如此直白表示：「我

看到我的祖國成為歐洲的帝國，國力達到鼎盛。」<sup>35</sup>隨著德國士兵出現在俄羅斯的帝國領土上，德國民眾的偏見也跟著強化，開始認為俄國是個原始政治體，適合德國殖民，而占領者使用的語言完全呼應了海外帝國的殖民語彙。一九一四年從東部戰線傳來的報告表示，沒有任何文字可以形容俄國邊境居民的「粗俗與野蠻」。<sup>36</sup>

德國在一戰時期的帝國野心於一九一八年三月達到巔峰。德意志帝國政府與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府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使其占領區涵蓋整個俄羅斯帝國西半部，包括白俄羅斯、波羅的海國家、俄屬波蘭、烏克蘭與黑海的高加索沿岸地區。事實上，德國在此刻獲得的領土已經超越二十五年後希特勒與納粹軍隊的成果。這項條約的可能後果將成為大英帝國的惡夢：一個牢不可破的德意志、鄂圖曼、哈布斯堡帝國陣營，將支配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與中東地區。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軍在西線戰場發動最後一場攻勢，使局勢更加惡化，協約國軍隊被迫後撤，眼看就要釀成災難性的失敗。英國政府軍事顧問亨利·威爾遜爵士（Sir Henry Wilson）警告：「我們已經接近失敗邊緣。」大英帝國殖民地總督米爾納勳爵（Lord Milner）告訴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看來同盟國即將成為「全歐洲還有北亞與中亞的主人」。陷入恐慌的英國人開始想像德國人併吞比屬剛果之後，將能建立一個從大西洋延伸到印度洋的德屬非洲帝國。<sup>37</sup>這場危機不僅顯示一戰的帝國向度與全球尺度，也說明這場戰爭拼搏的不只是國家的存亡，還有帝國的未來。

英國的帝國惡夢並未應驗。德國的三月攻勢失敗後，其他國力較弱的盟友紛紛於一九一八年潰敗。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向同盟國宣戰，而在美軍協助下，西歐的協約國終於成功將德軍趕回德國境內。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戰結束，德意志、奧匈與鄂圖曼三大帝國瓦解，



還要加上一九一七年滅亡的俄羅斯帝國。英法都將自己的勝利視為帝國的勝利。英國的海外帝國貢獻了母國需要的大量人力、金錢與資源以投入全球戰場。由白人開拓的殖民地派出一百三十萬人，印度動員一百二十萬人，非洲殖民地也提供數十萬名工人，其中估計有二十萬人死亡。<sup>38</sup>法蘭西帝國派出五十萬名士兵（絕大多數來自法屬西非與北非）與超過二十萬名徵召的工人，此外還耗費十六億法郎與五百五十萬噸的補給物資。<sup>39</sup>帝國上下一心成為戰時宣傳的主軸，英法兩大帝國都希望這場戰爭能讓民主世界存續，但矛盾的是，它們也希望這場戰爭能讓不民主的海外帝國繼續存在。這項矛盾有助我們理解一九一八年後所有帝國面臨的兩難，也解釋了何以帝國主義在二十年後再次引發重大衝突。

戰後依然存續的帝國，面臨著如何調和民族原則與帝國觀念的重大難題。這項挑戰主要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有關，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於美國國會發表的演說，後來被稱為「十四點原則」，裡面針對新國際世界秩序提出一套構想。威爾遜的演說一夜之間傳遍世界，因為他的十四點原則提出「國家無論大小，都應擁有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權利；在演說末尾，威爾遜還重申所有人民與民族「都有權利過著自由而安全的生活」。雖然威爾遜從未使用民族「自決」一詞，但他的演說模稜兩可，予人解釋的空間，威爾遜因此收到殖民地居民寄來的大量請願書，許多遊說團體與代表團也要求接見，殖民地居民錯誤解讀威爾遜的說法，以為這是他們尋求解放的機會。<sup>40</sup>事實上，從威爾遜演說產生的「自決」觀念，最早的提倡者其實是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分子，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政權被推翻後開始高喊民族自決口號。革命後建立的俄國臨時政府仍想繼續作戰，並且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宣布臨時政府主要的戰爭目標是「根據民族自決原則建立永久和平」。一年後，布爾什維克（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

激進派共產主義者）奪取了權力，推翻臨時政府。新政府主席列寧呼籲「解放所有殖民地，解放所有從屬的、受壓迫的與無主權的民族」。<sup>41</sup>俄國共產主義者很快就在一九一九年成立共產國際，他們的民族自決訴求讓帝國強權起了戒心。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各帝國派出軍隊干預，協助「白」俄的白軍對抗布爾什維克的紅軍。曾與俄國起過衝突的日本，也於一九一八年派遣七萬名士兵前往西伯利亞。日本原本還打算加派軍隊到二十五萬人，建立一個從屬於日本的西伯利亞省分，以利日本帝國北進。但布爾什維克的軍事勝利與日本的國內不安最終促使日本於一九二〇年撤軍。<sup>42</sup>

民族自決的觀念為帝國帶來迫切的危機。這場危機的第一波徵兆隨著和平到來而出現：帝國轄下的各個民族認為自己貢獻一己之力協助協約國取得勝利，預期協助宗主國作戰可以為他們換取政治權力，另一些人則期待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能為他們除去令人不快的帝國枷鎖，包括那些最近才加諸的束縛。一九一九年春，威爾遜總統率領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許多請願者藉此機會向他提出請求或是向他遞交大量請願書，這些人一方面希望取得完整主權，另一方面也要求帝國必須放棄傲慢心態，不要再認為從屬民族沒有自治能力。請願的民族包括波斯、葉門、黎巴嫩、敘利亞、突尼西亞、法屬印度支那（今日的越南、寮國與柬埔寨）、埃及與朝鮮。印度民族主義者拉伊帕雷（Lala Lajpat Rai）是美國印度自治同盟（India Home Rule League of America）的創立者之一，他發電報給威爾遜，感謝他「為世界上所有弱小、從屬、受壓迫的民族」提出自由的新憲章。拉伊帕雷堅稱，美國的介入「讓歐洲帝國強權蒙上陰影」。<sup>43</sup>這些請願並未獲得期待中的回應。在一戰結束後的幾年間，許多反抗帝國的抗爭接連出現。在朝鮮，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抗議遊行遭到當局無情鎮壓；在印度，阿姆利則（Amritsar）的暴動同樣遭當

局開槍掃射，造成三百七十九人死亡；在埃及，民族主義領袖遭到流放，八百人在反英暴動中被殺。「這難道不是最醜陋的背叛？」一名埃及代表向巴黎提出呼籲，「這難道不是徹底否認了民族自決原則？」<sup>44</sup>只有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成功抵抗了部署在當地的十一萬英軍，於一九二二年取得某種形式的獨立地位，成立了愛爾蘭自由邦。

到頭來，巴黎和會的首要目標其實是在東歐與中歐建立幾個主權國家，取代瓦解的王朝帝國：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與殘餘的奧地利。民族自決原則並未擴及到歐洲以外的地區。英國與法國代表團不僅說服威爾遜在起草《國際聯盟盟約》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將成為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組織）時將「民族自決」一詞去除，還要求威爾遜承諾維護現有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sup>45</sup>一九一九年英法的政治施壓成功限制了威爾遜及其帝國批評者提出的自由主義計畫。根據《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戰敗的德意志帝國將遭受嚴厲懲罰，除了喪失所有海外領土、亞爾薩斯—洛林、連結東普魯士的「波蘭走廊」、一部分西利西亞、割讓少部分領土給比利時與丹麥，還必須完全解除武裝，而德國做為率先開戰的元凶，還須賠償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戰爭罪的指控使德國全體社會無論黨派一致反對和平條約，同樣地，面對戰勝國指責德國殖民主義過於殘暴與剝削，因此德國人沒有資格繼續擔負「文明開化的使命」而得被剝奪所有的殖民地，這類主張對德國人而言不過是一種虛偽的說詞。

不令人意外的是，和平條約的主要受益者都是戰勝的帝國。一九一九年一月，協約國在巴黎開會，首先通過的就是由英法占領德國與鄂圖曼的帝國領土。英法並非直接併吞這些海外領土，而是以託管國的地位管理這些「沒有能力在現代世界艱苦環境下自立」的人民。一九二一

年，國際聯盟常設託管委員會成立，託管制度正式施行。委員會由瑞士學者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擔任主席，負責監督託管國，確保託管國協助託管地人民最終獲得自治。然而實際上，託管國卻把託管地視為帝國新取得的領土，如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日後所言，所謂「託管制度」其實就是用「口語」的方式在稱呼帝國殖民地。中東託管地是英法兩國激烈爭論後達成的協商結果，英法過去曾經給予阿拉伯領袖承諾以換取他們支持對土作戰，但戰後兩國卻不講信用，直接瓜分整個中東地區，法國取得黎巴嫩與敘利亞，英國取得外約旦、伊拉克與巴勒斯坦。德國的前非洲殖民地也接受託管，大部分地區仍由英法瓜分，比利時取得剛果東部盆地的盧安達與蒲隆地。<sup>46</sup>日本成為德屬北太平洋島嶼的託管國，澳洲取得德屬新幾內亞，紐西蘭取得西薩摩亞。這些地區的居民都反對這樣的安排。一九一九年十月，貝爾（Joseph Bell）在前德屬喀麥隆寫道：「法國政府逼迫我們接受他們的統治，但我們的國家不想要法國政府。」位於日內瓦的託管委員會再次收到大量請願書，但支配國際聯盟的託管國對於這些請求視若無睹。託管委員會有九名委員，絕大多數是外交官或殖民地官員，其中八名是帝國的代表，包括四個掌控託管國的帝國。<sup>47</sup>

一戰後，帝國之所以抵擋得住國際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的壓力，在於帝國願意以暴力抗拒威脅。事實上，對於所有帝國強權來說，面對當前這樣一個政治動盪與不穩定的世界，帝國反而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帝國有助於界定與鞏固民族帝國，同時壓制非洲、中東與亞洲各民族完全獨立的權利。一夕之間聲名大噪的威爾遜總統，其實從沒想過要用自己的原則來推翻帝國的世界。威爾遜認為，帝國強權既然身為託管國，就必須將文明的利益帶給當地的原始住民，使他們有能力建國，就像美國在菲律賓與其他從西班牙獲得的領土一樣。一九一九年，威爾遜在巴黎



以消極態度對待非歐洲人的請願，充分顯示了前述立場，但美國輿論卻認為威爾遜未能遏止歐洲與日本的帝國主義，完全是一種偽善。同年，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凡爾賽條約》，也拒絕加入為了維持相關條約而成立的國際聯盟。<sup>48</sup>美國的決定並未如一些人所言，使美國遠離了國際事務，但美國的決定確實讓國際聯盟完全受到大國掌控，而這些大國都是帝國的既得利益者。

在存續下來的帝國中，最強大的當屬英法兩國。一戰後，法蘭西帝國在宗主國的文化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也帶來了更龐大的經濟優勢。在取得託管地之後，法蘭西帝國擁有了有史以來最遼闊的領土，又稱為「大法蘭西」。戰時海外領土的貢獻，讓一些人產生帝國應集中與鞏固權力，才能從海外領土取得最多資源的想法，這種想法的主要倡導者是法國殖民地部長薩羅（Albert Sarraut）。一九二三年，薩羅在他的暢銷作品《法國殖民地的發展》（*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中提出帝國的廣義目標：「增加海外法國的實力與財富」將能保障「未來母國的強大與繁榮」。一名商人表示，只要擁有帝國，法國將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sup>49</sup>往後幾屆法國政府都致力於創立一個與宗主國經濟緊密連結的帝國。一九二八年後，法國頒布一套全新的法規「基爾榭關稅」（Kircher tariffs）來維繫這套帝國經濟體制，並且在整個帝國內部發行共同貨幣。到了一九三九年，法蘭西海外帝國已吸收了法國出口量的四成，供應了百分之三十七的法國進口量。同年，法國也有超過四成的海外投資是在其海外殖民地。<sup>50</sup>

當然，現實不一定與民眾的想像相符，因為在法國帝國主義歷史上，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其實是經常發生暴力衝突的時期。最激烈的衝突是當屬摩洛哥的「里夫戰爭」（Rif war）與鎮壓敘利亞叛亂的行動，這兩場衝突都發生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間，而一九三〇

年到一九三一年又發生了殘酷鎮壓印度支那共產主義暴亂的事件。根據當時的估計，在鎮壓共產主義暴亂的行動中，大約有一千名抗議民眾被射殺或炸死，一千三百座村子被摧毀，六千人被拘禁、拷問或處決。參與這場暴亂的種植園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五到十六小時，這些工人遭受武裝衛兵看守，完全不准踏出村落一步。<sup>51</sup>與英國相比，法蘭西帝國

（無論是法國中央政府還是殖民地當局）都不願向殖民地民族主義做出任何政治讓步，哪怕是表面的安撫也不願意。在法國本土，帝國殖民地吸引了大量民眾關注。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已經有超過七十種期刊與報紙討論殖民地議題。一九三一年，當全世界經濟正值最不景氣的時候，巴黎的萬塞訥卻主辦了一場盛大的殖民地展覽，在專門為此次展覽興建的殖民地展場裡，裝飾了各種充滿異國情調的壁畫與來自各個海外領土的象徵物。為期五個月的展覽時間，總共售出了三千五百五十萬張票。這場展覽雖然想呈現帝國上下一心的氣象，但展出的內容卻把殖民地的世界當成「他者」，強化了帝國實際存在的階序觀念。<sup>52</sup>

大英帝國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帝國，遙遙領先居次的法蘭西帝國。無疑地，正是因為其海外帝國的存在，才使英國能夠成為全球經濟強權。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八年，當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萎縮或封閉時，英國對海外帝國領土的出口總額反而從占總貿易量的三分之一上升到將近一半；一九三八年時，帝國海外領土也占了英國進口的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三〇年時，英國更有將近六成的海外投資是在帝國的海外領土。帝國雖然尚未形成封閉的貿易區，但帝國在進行商業往來時顯然偏重於內部貿易。與法國一樣，英國工業的相對衰退，可以透過向帝國海外領土出口溢價商品獲得補償，而英國海外投資提供的錫、橡膠、石油、銅等原物料也使英國的貿易公司與各項產業在世界市場上欣欣向榮。帝國深植於英國的大眾文化中，即便對許多英國人而言，帝國依然是個遙遠的

現實，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就像法國人一樣，這個想像共同體源自於「帝國和諧」與「家父長形象」的政治宣傳，對於帝國年復一年在海外領土持續實施的緊急狀態與壓迫行為隻字不提。「帝國日」是大英帝國行事曆上的重要節日，創立於一九〇三年，與維多利亞女王的生日同一天。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帝國日已成為英國幾乎所有學校都要慶祝的節日。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倫敦溫布利舉辦的帝國展覽會吸引了兩千七百萬名觀眾前來參觀。在這個占地兩百一十六英畝的展覽會場中，有著「常駐的各地種族」，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供人觀看。<sup>53</sup>

不是每個帝國都能享受到這種經濟利益，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等十九世紀晚期才加入帝國爭霸的新興帝國就缺乏這樣的經濟優勢。於是我們便不難想像，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全球經濟崩潰而國際主義趁勢興起之時，這三個強權便在戰前的「民族帝國」觀念下掀起新一波以武力搶奪領土的帝國主義。德義日對於一九一九年後世界秩序的看法，雖然理由各自不同，卻同樣對一戰的結果懷著強烈憎恨的態度，也憎惡西方強權支配戰後和約訂定與主導此後國際政治事務的討論。與德國不同，義大利與日本屬於協約國陣營，兩國在一九一九年時都是戰勝國，在戰後也都保留了原有的殖民地，但兩國依然感到不滿。德義日三國的民族主義者發現，一戰使英法這兩個全球帝國取得空前廣大的領土。英法在國聯與國際主義論調的支持下，一方面運用自身的全球力量壓制其他國家從事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卻充分利用自己身為「民族帝國」的地位。事實上，英法愈是大力宣揚統一帝國可以為國家帶來強大與繁榮的幻想，處於不利地位的國家就愈是認為取得更多土地是提升國家地位與保護自己人民免於經濟風險的唯一手段。這些國家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唯有透過戰爭才能取得更多領土。從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南非戰爭、日俄戰爭、對利比亞的二十年征服戰爭，到一九二〇年代在摩洛哥、敘利亞與



伊拉克發生的重大帝國衝突，近年來的歷史皆是這一不滿的有力證明。這些國家由於怨恨無力決定自身未來，因此不願接受以和平合作與民主政治為基礎的「西方」或「自由主義」價值。基於前述原因，我們便不難理解德義日這三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為什麼傾向於認為新領土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使它們擺脫永遠臣服於領土廣大與資源豐富的英法兩大帝國與美國的命運。

日本的不滿源自於日本擴張的歷史。日本在一戰結束時，已經躍升為東亞與太平洋的區域強權，但這個地位卻未得到協約國陣營的充分承認。雖然日本受邀參加巴黎和會且成為「十人委員會」的一員（由協約國主要成員組成），但關鍵問題依舊只能由西方強權協商決定。日本要求在《國際聯盟盟約》增列「種族平等」條款，卻遭到大國拒絕，因為這些大國並不打算推動這項原則。在日本眼中，國際聯盟依然是西方的產物，無法用來推動「國家救亡圖存」計畫。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日本建議另設更能反映日本利益的國際聯盟亞洲分部，結果依舊未獲採納。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表示，原本期望從戰爭獲得的收益，「在東方取得優越地位」，已逐漸化為泡影。<sup>54</sup>除此之外，西方大國很快又於戰後奪回了中國市場。一九一四年，日本取得德屬山東半島，舉國歡騰，但戰後日本被迫同意將山東半島歸還中國政府。一九一七年，美國原本在《藍辛—石井協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中承認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但一九二二年又否認這項協定。英國與日本原本於一九〇二年簽訂的英日同盟也於一九二三年廢除。參加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發現，「所謂的美利堅主義正不斷向世界傳播。」<sup>55</sup>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日本不得不在華盛頓限武會議上接受五比五比三這個對英美有利的海軍噸位比例，而同樣的屈辱在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上又重演了一次。<sup>56</sup>而對日本來說最關鍵的問題是，西方各國開始援助新成立的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九一二年大清帝國滅亡之後，中國一度陷入軍閥割據，而後逐漸由國民政府再次統一全國）。西方這一做法惹惱了日本，因為中國被視為是日本民族帝國未來發展的核心利益所在。日本確實簽署了一九二二年在華府協商的《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該公約堅持對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等同於間接反對日本在亞洲的特權。批評這套國際體制的日本評論家表示，日本應該要以「東方思想」為基礎，在亞洲建立新秩序，反對西方的和平、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模式，因為這套模式在本質上與日本的戰略與政治利益並不相容。<sup>57</sup>

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付出的「鮮血與犧牲」，若不能成就帝國，究竟有何意義？這是日本民族主義分子的核心問題，也是義大利的核心問題。一九二〇年代初，民族主義政治宣傳的重點在於「以死者之名」建立新義大利，因為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看在義大利人眼裡，形同對眾多犧牲者的嘲弄。雖然義大利在一戰中死傷一百九十萬人，但義大利在巴黎和會中卻被當成一個貢獻微薄的盟友，未能得到對等對待。一戰期間，義大利的民族主義者希望戰後義大利能夠併吞達爾馬提亞，甚至取得土耳其部分領土；義大利殖民地官員也希望建立一個從利比亞延伸到幾內亞灣的義屬非洲。<sup>58</sup>一九一九年一月，義大利殖民學會召開大會討論義大利的和平條件，一名與會代表堅持義大利「必須取得與英法對等的海外領土」。<sup>59</sup>義大利政府希望英法至少應遵守一九一五年為了說服義大利參戰而在倫敦簽訂的祕密領土協議。協議中承諾讓義大利取得達爾馬提亞與控制阿爾巴尼亞、承認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利益，同時讓義大利能從德意志帝國與鄂圖曼帝國取得「公正的補償」。<sup>60</sup>

義大利代表團的運氣不佳，與會的威爾遜總統對協約國私下訂定的《倫敦條約》極為不滿，因此拒絕接受該條約的束縛。英法原本就不願

意履行承諾，便以威爾遜不願妥協為由，拒絕向義大利讓步。義大利國內對於條約的公正性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無法整合出一致的立場要求英法履行《倫敦條約》。<sup>61</sup>四月，義大利首相奧蘭多（Vittorio Orlando）突然離開巴黎和會現場，等到五月他再度返回巴黎時，已經無法挽回局勢。除了前奧匈帝國位於義大利半島東北部的領土外，義大利無法得到任何額外的土地，甚至也拿不到託管地。這個結果在義大利創造出所謂「殘缺的勝利」（la vittoria mutilata）這一說法。奧蘭多在回憶錄中表示：「從來沒有任何一場和平留下如此強烈的憎惡與恨意，戰敗國對戰勝國是如此，戰勝國對自己的戰勝國盟友也是如此。」<sup>62</sup>正是這股憎恨導致墨索里尼與他剛創立的義大利法西斯黨能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成立激進的民族主義政府。雖然法西斯政權的產生，與墨索里尼口中義大利民眾對英法美「金權政治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深惡痛絕有密切關係，但在義大利嚴重仰賴外資與控制僅有的利比亞與東非殖民地都感到吃力的狀況下，法西斯政權能做的其實極為有限。一九二〇年代大部分的時間，義大利與日本一樣在國際上缺乏自主性，因此急切地想尋找機會在巴爾幹半島、地中海與非洲推動更積極的擴張政策。然而義大利的帝國幻想曾一度在巴黎和會受挫，面對各種風險，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sup>63</sup>

德國的狀況與義大利、日本不同。德國是個戰敗的帝國，被剝奪了所有海外殖民地，也失去了內部殖民的波蘭屬地。與義大利或日本相比，德國產生的憎恨更多來自於戰敗的恥辱，社會各階層對此也有著強烈的共鳴，因此也產生出更危險的政治與文化觀點。戰後初期，大規模的饑荒、失業、惡性通膨與政治暴力（包括與波蘭接壤的東部邊疆出現的暴力），在一整個世代的德國人心中留下傷痕。德國在一九二〇年代蒙受的艱困與屈辱，幾乎不是其他帝國強權所能比擬的。戰爭中全國軍民的共同犧牲，使德國形成一股難以化解的受害感。<sup>64</sup>德國人認為自己

的存在出現危機，全都要歸咎於戰勝的西方強權，是西方將和約強加在德國人身上。德國國內所有的政治光譜，全對德國遭受的指控感到憎恨，因為只有德國承擔了戰爭罪，必須割讓領土與解除武裝，甚至被認定是不人道與無效率的殖民者。最後一個說法出自巴黎和會，在一九二〇年代形成一套所謂的「殖民地的謊言」（Koloniallüge）：這是一個精心策畫的侮辱，用來合理化協約國接管德國殖民地，同時限制日後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一九一九年三月，當協約國提出的和約內容在威瑪德國的國民議會進行討論時，主要由社會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組成的國民議會代表以四百一十四票對七票之差，反對和約中的殖民地條款並要求「重建德國的殖民權利」。<sup>65</sup>十年後，成長迅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簡稱納粹黨）領袖希特勒，就在選舉時嚴詞抨擊：「認為德國人沒有能力管理殖民地之說完全是荒謬的謊言，是對我們民族榮譽的不合理攻擊。」一九二〇年代的德國民族主義者要求重建殖民權利的觀點，把德國受到的和約限制解釋成某種另類的殖民主義：德國的未來受制於英法等帝國強權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因此如希特勒所言成了「附庸與被剝削的殖民地」。<sup>66</sup>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沒有能力挑戰西方對權力的壟斷，只好將憎恨的矛頭轉向國內的猶太人與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是被猶太人與馬克思主義者「刀刺在背」，才讓西方得以在德國的心臟地帶殖民。

用當時的觀點來理解，重建殖民權利就是重建德國被視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權利，這一觀點主張德國與其他帝國一樣有能力擔負文明化與現代化的殖民任務，而這一觀點也在一九二〇年代成為反覆討論的話題。一九二六年，德國外交部長贊助了一部宣導影片，片名叫《世界史即殖民史》（*World History as Colonial History*），影片不僅闡述殖民地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也質疑起協約國宣稱德國沒有能力統



治從屬民族的主張。<sup>67</sup>雖然德國現在已是「後殖民」國家，但部分國內組織與政治宣傳仍持續呼籲重建德國的海外帝國，這使得德國與殖民過往仍保有藕斷絲連的關係。德國殖民地協會為許多宣傳殖民權利的小型組織提供保護傘；協會擁有三萬名會員，兩百六十個地方分會，而且贊助發行各種殖民期刊。這些刊物廣泛報導德國前殖民地與其他主要帝國的新聞。在前殖民地營運的德國公司取得了補貼與投資，這些公司的數量從一九一四年的七十三家，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八十五家。戰前設立的殖民學校仍持續運作，一九二六年更設立了殖民女校，兩所學校旨在為未來的帝國訓練行政官員與專家。一九二五年，柏林舉辦了殖民地展覽會，對於沒有殖民地的德國來說，這樣的活動有些不合時宜。外交部長史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利用這次展覽，強調西班牙、葡萄牙與丹麥等其他歐洲帝國與德國的對比，藉此說明德國是歐洲唯一「沒有空間的民族」。<sup>68</sup>

史特雷斯曼認為，德國人在一九一九年後的不滿，主要來自於德國人身為進步與有文化的強健民族，卻沒有足夠的領土來發揮所長與養育不斷增長的人口。無論在德國的民族主義圈，還是圈外討論，都認為領土擴張定義了現代民族國家，相信領土擴張可以讓現代民族國家統治其他較低等的從屬族群——這一想法成了德國人回顧德意志帝國往昔與展望未來時的標準思維。此處的關鍵字是「空間」。地理學家拉采爾過去曾提出生存空間是必需的自然條件，而這項主張在一九二〇年代在德國開始流行，特別是《凡爾賽條約》使德國失去大量領土之後。一九三一年，另一名德國地理學家表示，《凡爾賽條約》「毫無理由也毫無根據，不由分說就剝奪了我們的生存空間」。<sup>69</sup>政治學家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等學者提倡的地緣政治學在一九二〇年代深受德國民眾歡迎，但民眾會注意到這門新興學科，並不是因為該學科本身（畢竟其內

容抽象難懂），而是因為「生存空間」一詞，這個詞彙明顯呼應了當時德國的處境。前殖民者格里姆（Hans Grimm）寫的小說《沒有空間的民族》（*Volk ohne Raum*）大受歡迎，一九二六年出版以來賣出三十一萬五千冊，其暢銷的原因就在於書名，出版商故意選擇這個書名來呼應德國遭限縮的殖民權利。德文的「空間」（Raum）要比英文的「空間」（space）有著更豐富的意涵，這個詞彙代表著民族（德文Volk，英文people，前者同樣難以用後者概括描述）將自己的特殊文化內涵與生物種族屬性灌注在特定一片土地上，同時去除其他從屬民族或外來民族的影響。根據某些激進民族主義者的說法，最需要排除的就是猶太人，因為他們是四海為家的「反民族」原型。<sup>70</sup>

豪斯霍夫認為，讓種族相同且文化優越的民族統治或支配額外的領土，這是德國在歷經「流血犧牲的慘痛」戰爭後應得的補償。<sup>71</sup>豪斯霍夫的說法得到德國社會的普遍共鳴，然而問題在於，即便德國自認遭受不公平對待而應該得到補償，這一補償又要從何處取得呢？德國的殖民遊說團體雖然規模龐大且組織完善，卻也瞭解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大環境底下，要取得海外殖民地不過是癡心妄想，於是他們退而求其次，希望西方強權能在未來某個階段允許德國與各國合作，共同推動殖民計畫。德國的民族主義圈子思考「種族與空間」的問題時，絕大多數仍秉持戰前的帝國主義思路，認為唯有東擴才能讓德國取得真正合理的空間。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帝國曾短暫在烏克蘭建立殖民地，這段歷史也加強了德國民族主義者的信念。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德國法哲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進而主張，德國也許可以在中歐與東歐建立一個由德國支配的「大空間」（Grossraum），以此與其他列強保持距離。「東方」雖然從未被清楚界定，但總是伴隨著「空間」的討論出現。地緣政治學者尤其強調，德國除了目前的有限疆域，還有一片在歷史上曾經受到德國影



響的區域，無論從語言、農業模式、法律傳統乃至於房屋建築形式，都可以合理認為東方屬於「德國空間」。這種德國式的「種族與文化領土」概念，具體表現在小學課本或政治宣傳使用的各種地圖上。地理學家彭克（Albrecht Penck）與菲舍爾（Hans Fischer）繪製的德國文化與種族地區地圖，獲得當時德國人的競相仿效與廣泛傳播，這幅地圖顯示的德國空間一路延伸到烏克蘭與俄羅斯，從北部的拉多加湖一直到烏克蘭南端的赫爾松（Kherson），最終深入到「窩瓦德意志人」（Volga Germans）的居住地區：窩瓦德意志人是十八世紀移居當地的德意志人，他們的後代如今生活在蘇聯的統治之下。<sup>72</sup>一九二一年，年輕的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在聆聽了關於德國未來領土目標的演說之後，在日記裡寫道：「西方已經不可能了，東方對我們來說最為重要。我們必須在東方奮戰與殖民。」<sup>73</sup>希姆萊後來成為德國親衛隊

（Schutzstaffel, SS）領袖，在波蘭與蘇聯實施了殘暴的帝國主義。在一九二〇年代，這類觀點並非納粹黨獨有，而是德國社會普遍的想法。

就像義大利幻想著建立地中海帝國，或日本懷抱著獨占亞洲的野心一樣，德國也夢想著翻轉一戰的結果與《凡爾賽條約》。這三個國家的夢想早在一戰前數十年就已經存在，且儘管在一九二〇年代依然停留在空想層次，但並未遭到放棄。這三個國家並不是非得掀起二戰不可，事實上，這三個國家雖然因為不滿而產生了各種帝國幻想，卻不表示這種不滿情緒普遍存在於這三個國家之中。隨著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世界秩序因為美國領導的經濟復甦與帝國對非歐洲民族主義的壓制而漸趨穩定，德義日三國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可以在既有的國際體制下進行跨國的政治與經濟合作。在德國與日本，爭奪更多領土或許是民族主義者關切的重點，但絕大多數民眾對此並不感興趣。在義大利，激進民族主義分子與中間派、左派的激烈鬥爭，導致民主制度垮臺，墨索里尼上臺後

的首要政治任務就是穩固自己的統治與促使義大利經濟復甦。一九二〇年代，德義日都仰賴西方強權帶動下世界貿易與投資經濟的緩慢復甦，這三個國家對於國聯體現的國際主義精神也抱持著敷衍應付的心態。一九二五年，戰勝國與戰敗國簽署《羅加諾公約》（Locarno Pact），確保了在《凡爾賽條約》所擬定的西歐疆界。一九二六年，德國獲准加入國聯。一九二七年，德國甚至在法國與比利時強烈反對下獲准加入常設託管委員會，負責督導德國的前殖民地事務。德國推薦德國產業聯合會主席卡斯特爾（Ludwig Kastl）擔任託管委員會委員，而非選擇另一位激進的殖民遊說團體領袖。德國堅持遵守託管條款，包括致力於讓前殖民地最終獲得獨立。一九三二年，德國針對已經進行的託管過程創造了一個新詞，「去殖民化」（Dekolonisierung）。<sup>74</sup>

然而，這些和解終究是短暫的。許多人都將戰後局勢的穩定視為充滿不確定的暫時現象。史特雷斯曼推動「履行條約」的外交政策，希望以此證明德國的善意，他認為這是取消條約內容的最佳方式，但他也不排除從根本上改變條約的可能。在日本，立憲民政黨於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執政，推動限武以及與西方合作的政策，立憲民政黨認為這才是讓日本能實現目標與促進經濟發展的合理途徑。<sup>75</sup>一九二〇年代中葉，日本甚至推動睦華政策，試圖改變過去十年來中日兩國對立的狀態。在義大利，墨索里尼提出了「新義大利」的觀念，試圖挑戰西方的價值與利益，但即使如此，墨索里尼卻也認為目前仍必須「在口頭上維持和平」，而非冒著發生衝突的危險。對墨索里尼而言，義大利的新帝國野心要得到實現，就必須等待「歐洲的混亂」。<sup>76</sup>更何況，義大利還必須先應付眾多的殖民地問題，包括平定索馬利亞與厄利垂亞。當地駐軍從兩千五百人增加到一萬兩千人，這場地區暴亂足足花了十年才鎮壓成功。在利比亞花費的代價更是高昂：一九二二年在墨索里尼上臺之前，

義大利與阿拉伯部族曾為了爭奪利比亞沙漠腹地發生大戰，這場戰爭在歷經數年的野蠻鎮壓之後才在一九三一年告終。換言之，若要在現有帝國尚未站穩腳根之前就拓展新的領土，恐怕只會帶來嚴重的風險。話雖如此，義大利的殖民地戰爭經驗卻讓義大利更加相信，唯有軍事征服才能獲取帝國殖民地。<sup>77</sup>

這段短暫的和解時期，最終因為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全球經濟衰退而倏然終止，並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出現一連串災難性的結果。歷史學家普遍同意經濟危機使一九一九年後重建全球秩序的努力化為泡影，也讓國際主義的各項投入難以為繼。從各方面來看，相較於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一九年，全球經濟的崩潰是更重要的轉捩點，這場危機最終導致了一九四〇年代的二戰。<sup>78</sup>如今對這場經濟危機的前因後果已有相當清楚的探討，但此處值得一提的是這場災難的規模。經濟大恐慌重創了世界經濟，使其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短暫的貿易與投資榮景一路走弱到一九二〇年代結束為止。到了一九三二年，世界各大工業經濟體有紀錄的失業人數已高達四千萬人以上，另有數千萬人因為價格與產出暴跌而被迫縮短工時甚或遭到解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經濟大恐慌期間，世界貿易量劇減了三分之二。經貿衰退使世界上部分較貧困的地區陷入赤貧，因為其生計來源只仰賴一到兩種出口產品。資金斷鏈也造成大規模破產，就連德國也差點在一九三二年破產。這場經濟危機引發全球恐慌，因為經濟大規模衰退似乎應驗了共產黨過去在歡欣鼓舞下做的預言：資本主義即將終結。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同樣感到雀躍，他們認為經濟衰退象徵著「世界經濟的黃昏」，而支撐世界經濟且令人痛恨的西方體制也將隨之步入尾聲。<sup>79</sup>

早在經濟大恐慌之前的十年間，就不乏有作品提出西方式經濟合作與國際主義終將沒落的說法。提出這一見解的現代先知中，最知名的就

是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大作《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九三二年夏天，國際聯盟大會主席呼籲各成員國通力合作度過難關：「全世界正因一場可怕的危機而飽受折磨、信心盡失。世界最後的希望正掌握在我們的手中。」<sup>80</sup>然而國際聯盟雖然提出減輕經濟危機的方案，卻無力阻擋經濟民族主義的熱潮。隨著危機逐漸擴大，各國似乎寧可保護本國經濟，也不願與其他國家互助合作。一九三〇年六月，美國課徵《霍利—斯姆特關稅法案》（Hawley-Smoot Tariff），形同切斷了外國貨物對美國市場的進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英國也在經過長期政治辯論之後放棄了自由主義貿易，開始課徵一連串關稅，更於隔年八月實施帝國特惠制，讓大英帝國海外殖民地的進口貨物享有優惠關稅。法國同樣推出了降低殖民地貨物稅的基爾榭關稅，進而提高了其他國家貨物的關稅。<sup>81</sup>經濟危機促使各國建立特殊的貿易機制與美元、英鎊與法郎等貨幣區。世界最強大的幾個經濟體原本可以設法保護自己長久以來賴以獲利的國際經貿體系，但它們卻沒有這麼做，結果導致其他國家跟著受害。

這種經濟民族主義式的新關稅政策，嚴重衝擊了其他較為弱小的國家，使它們蒙受慘痛的政治後果。在日本，經濟衰退造成災難：出口額（尤其生絲）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三，進口額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五；日本龐大的農業產業原已在一九二〇年代陷入停滯，此時又蒙受更嚴重的衰退，農業收入減半，數百萬農民陷入貧困。<sup>82</sup>接受西方體制證明有害無益，日本國內因此激起了強烈的反西方情緒，最終導致溫和的立憲民政黨政府垮臺。民族主義掀起反對全球體制的浪潮，最終讓軍方支配了日本政府，一九二〇年代的民主實驗也告結束。<sup>83</sup>相較於其他經濟體，義大利受經濟衰退的影響較小，墨索里尼政權認為可以利用這場危機在國內再次發起法西斯革命，同時也可以趁各大國都在實施保護主義政策之



際，在國外積極推動帝國政策。在德國，民眾將經濟衰退解讀為戰勝國對德國的又一次懲罰。法國在一九三一年反對德國與奧國達成關稅協議之事，就成了戰勝國懲罰的又一例證。在經濟衰退期間，每五個德國人就有兩個人失業，工業生產減少四成，出口額減少超過一半，而德國仍必須償付戰爭賠款與支付一九二〇年代積欠的鉅額國際債務利息。過去人們哀嘆德國已經淪為殖民地，經濟大恐慌更讓德國人覺得這樣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一九三〇年，希特勒的納粹黨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納粹黨是德國最激進的民族主義政黨，對全球化經濟與西方的處處掣肘深惡痛絕。到了一九三二年，納粹黨已成為德國最大黨，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成為德國執政黨，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德國與義大利、日本一樣，曾於一九二〇年代提出「種族與空間」帝國幻想的民族主義者，此時終於可以高喊他們的路線正確。世界的天秤開始危險地朝他們的方向傾斜。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義大利，最後是希特勒的德國，這三個國家重新燃起蓄積已久的不滿，於一九三〇年代再度掀起領土型帝國的擴張浪潮。在經濟危機的驅使下，人們相信必須重新修改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已經運作數十年的國際主義已不再管用，取而代之的則是由強大宗主國支配的封閉式帝國經濟，例如英國與法國的案例。<sup>84</sup>人們比過去更加相信帝國強權是民族國家存續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必須恢復在十九世紀晚期建立的帝國典範。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表示，這是不得已的選擇：「小國沒有別的路可走，只能盡全力組織自己的經濟帝國，或者是建立強大的國家，以免自身的存續遭受危險。」<sup>85</sup>人們重新相信有必要爭奪額外的領土與確保資源，若有必要更訴諸戰爭，於是一切似乎又回到過去的帝國時代。在當時經濟發展幾乎未受到世界景氣衰退影響的蘇聯，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敏銳

察覺到，無論是貿易戰爭、貨幣戰爭、「搶奪市場的競爭」還是極端經濟民族主義，「都是在把人們推向戰爭，使戰爭成為重新劃分世界與勢力範圍的手段。」歷史學家對於史達林的判斷力一向評價不高，但這一回他的看法卻成了先見之明。<sup>86</sup>



一九二五年里夫戰爭期間，法軍以火炮轟擊摩洛哥的柏柏人叛軍。這場二十世紀規模數一數二的殖民地戰爭，當地部落民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持續反抗西班牙與法國軍隊，以維持自身獨立。圖源：*Photo 12 Collection/Alamy*

---

[1] 編注：指爆發於一八九五年的「第一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該場戰爭以義大利敗北收場。



CHAPTER 1

第一章

民族帝國與全球危機

(1931-1940年)

「.....中國士兵蠻橫炸毀北大營西北方的滿鐵鐵路並且攻擊鐵路守衛隊。我們的守衛隊立刻反擊，出動砲兵砲轟敵方軍事基地。我軍現已占領一部分北大營.....。」

——《朝日新聞》，大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sup>1</sup>

日本大報《朝日新聞》在頭版文章描述的這段中國軍隊偷襲日軍的景象，深植於日本民眾心中，認為這是日本隨後入侵與占領中國滿洲的真正原因。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時駐紮在滿洲、負責保護日本帝國經濟利益的日本關東軍派出一小隊工兵，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間在鐵路上埋設炸藥，藉此尋釁滋事，出兵入侵中國，引發了持續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從全球角度來說，這只不過是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但這起事件造成的影響卻極其深遠。這是世界面臨嚴峻經濟危機時的轉捩點，有國家率先以暴力手段創造出新的帝國與經濟秩序。北大營的槍聲，昭示著一九三〇年代新帝國時代的先聲。

日本政府將這起事件稱為「滿洲事變」，整起事件的大環境源自於全球經濟危機與日本為了解決國內不斷加劇的貧困與經濟孤立而決定放手一搏。關東軍的名稱源自於日本在中國滿洲沿海的關東州租借地，多年來，關東軍一直謀畫要將日本帝國的勢力延伸到中國大陸。經濟危機的持續惡化，加上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威脅，使得關東軍司令官決定不理會東京方面的命令，單獨採取行動。關東軍先自行炸毀日本滿鐵的一小段鐵路，然後開始猛攻駐防瀋陽的中國軍隊。日軍根據事前仔細擬定的計畫，在奪取瀋陽的同時，也從關東州大舉出兵，攻打鐵路沿線主要城市，將張學良統率的三十三萬裝備不佳的東北邊防軍趕出滿洲中部與南部地區。到了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已經完全占領滿洲。關東軍部署十五萬人，以損失約三千人的代價征服大約十分之一歐洲大小的領土。儘

管關東軍明目張膽違抗中央的命令，但兩天後，日本裕仁天皇還是追認了這次行動。日本帝國幾乎可以說在一夜之間，國土面積與財富有了驚人的提升。<sup>2</sup>

「滿洲事變」並非導致八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直接原因，但它確實開啟了新一波的帝國擴張，這次擴張不僅延續了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新帝國主義」，也承接了一戰結束後的帝國壟殖。德義日三國雖然是新帝國主義的代表，但它們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擴張計畫或藍圖，每個國家都只是在既有的利益範圍內見機行事。這三個國家彼此的行動並未協同一致，只是密切觀察彼此的成果，從彼此的成功中獲得激勵。雖然德義日的領袖在實現帝國計畫的同時，也希望避免全面戰爭，但他們各自推動計畫造成的動盪局勢，最終還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間在全球點燃戰火。

## 新帝國時代

對德義日來說，關鍵在於領土。控制領土，無論正式或非正式，乃是帝國的核心。這種「領土至上」原則導致德義日在接下來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不斷以武力進行領土擴張與迅速談和，這種模式早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前就已出現，而且一直延續到一九三〇年代之後。事實上，只有在這種長期脈絡下，我們才能理解東京、羅馬與柏林當局決定發起區域性侵略戰爭的歷史意義。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的「種族與空間」論述一直支持帝國的建立，如今這種論述還是能夠解釋一九三〇年代掌權者的想法。雖然這種帝國主義形式回顧起來似乎是一種時代錯置或甚至是妄想，但它建立的帝國典範卻讓人感到熟悉與親近。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

三年的領土重分配，或一九二九年後經濟大恐慌的後果，只是讓當時人更加堅信，奪取更多領土與資源是拯救民族國家、建立強大經濟與滿足優越文化不可或缺的手段。

儘管所有證據都顯示，民族主義野心、經濟成本高漲與政治上的動盪不安，都使得全球性的帝國計畫難以維繫，但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的領導高層依舊相信帝國時代尚未結束，而且並不是只有這三個國家如此作想。德義日領導高層無視傳統帝國逐漸衰微的事實，反而主張這個世界需要更多帝國，需要有自己的國家特殊性的帝國存在。過去分析二戰的起源時，也經常會討論到軍備競賽、外交危機與意識形態衝突等因素，但這些應該屬於新一波帝國浪潮帶來的影響，而不是產生這股浪潮的真正原因。國際聯盟中的大國也許能勉為其難地接受意識形態差異，或是向一些執意增加軍事預算的國家讓步，但這些帝國強權無法容忍新一波的帝國浪潮。因為這股浪潮毫不掩飾的領土野心，勢必與既有帝國強權產生衝突，也跟圍繞著傳統帝國觀點建立的新國際主義語言格格不入。

關鍵問題在於，既然擁有帝國會帶來許多壞處，例如安全風險急遽升高與民族主義反抗情緒的日漸高漲，為什麼德義日依然要奉行「領土至上」原則，進而在一九三〇年代冒險挑戰既有國際秩序？事實上，國際環境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已經與一九一四年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國家已不再能不受外力干預下透過南非戰爭或義土戰爭這類軍事衝突來征服領土，因為這個時期各國幾乎都是主權國家與國聯會員國，至少在理論上都受到集體安全原則保護。這一環境變化也讓德義日建立帝國的決策更加令人費解。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而且德義日三國所面臨的狀況也大不相同，儘管如此，這三個國家在擴張領土時所採取的說詞卻是極為類似。世代因素是另一個可能。在一九三〇年代成為德義日政治與軍事領袖的世代，皆成長於一個充滿帝國幻想的世界，周遭圍繞著強調現

代化與「先進」國家應肩負起文明開化使命的文化，相信應該征服那些發展落後或原始的民族，更不用說這個世代也普遍深受戰爭經驗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強烈主張的影響。義大利法西斯黨領袖博塔伊

（Giuseppe Bottai）曾於一九三六年短暫擔任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市長，他便曾表示帝國「使我產生了渴望，時時刻刻想著戰爭.....我這輩子有二十多年的時間『身處』於戰爭之中」。<sup>3</sup>

弔詭的是，要解釋德義日為什麼要建立領土型帝國，我們反而必須先從民族國家說起。對這三個國家來說，建立帝國與實現民族國家自主幾乎是同一件事，這意謂著要讓國家的發展不再受既有國際秩序的限制或掣肘，如一本日本小冊子所言，要擺脫「大國的干預與壓迫」。<sup>4</sup>日本滿鐵官員解釋，在日本民族主義者眼裡，滿洲「就是日本的生命線，如果日本想繼續存在，就絕不能撤出滿洲」。<sup>5</sup>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想像災難式民族主義」（catastrophic nationalism），這些憂心民族國家自主性可能遭到消滅的民族主義者，因此急切地主張國家應承擔起民族發展的使命。<sup>6</sup>墨索里尼不斷重申，控制地中海屬地的英國得以「圍堵與圍困義大利」，扼殺了義大利民族的發展。<sup>7</sup>要保護本國民眾，就必須維護民族與國家利益，保障民眾的經濟未來與繁榮發展，使民眾對於自身國家認同更有信心，將民族國家建立成強大的民族帝國，而非從屬的小國。一九三七年，戈林（Hermann Göring）與英國友人談到德國民族未來所遭受的阻礙時表示：「我們需要一個帝國。」<sup>8</sup>

德義日的民族主義論述都將自己描述成特殊的民族，自認注定要成為區域支配者與領導者。「在歐洲，一個民族必須主張自己有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的權威，」德國政治評論家史塔佩爾（Wilhelm Stapel）寫道：「唯有德意志民族才能成為新帝國主義的推動者。」<sup>9</sup>不僅如此，一國的民眾也必須證明自己能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一九三三年，墨索

里尼宣稱：「我們正在成為，而且也將成為一個軍事大國。」<sup>10</sup>在德國，伴隨一九三三年納粹主義革命而來的「民族覺醒」，與全國民眾必須展現自身真實力量的觀念緊密結合，德國民眾必須提防自己不要受到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觀念蠱惑與威脅——希特勒擔心這些思想會讓德國淪為「瑞士第二」。<sup>11</sup>在日本，從一九三一年起便由軍人掌控全國政治。軍人大規模宣傳，要求民眾瞭解領土擴張的必要，灌輸民眾對領土擴張的熱情，在「保衛國家」的口號下，號召民眾爭取國家榮譽與為國犧牲。對這類宣傳提出批評的人，就跟義大利與德國的異議分子一樣，會遭到祕密警察與審查人員的打壓。日本跟歐洲一樣，實現國家自主成了追求新帝國主義的藉口，並且以創造新秩序為由，將國家與人民緊密結合起來。<sup>12</sup>帝國成為民族活力與種族價值的核心象徵，為了建立帝國，任何傳統道德規範都可棄之不顧，就像十九世紀一樣。

德義日想建立領土型帝國的第二個理由更為實際，那就是與新帝國主義息息相關的經濟野心。建立帝國是為了掙脫既有全球經濟與領土結構的限制，獲取額外的「生存空間」來解決人口壓力與土地短缺，確保原料與糧食供應，建立經濟貨幣區，讓貿易與投資可以由帝國中心控制，而非掌握在各地商業社群手裡。德義日都致力於發展由國家掌控的計畫經濟，敵視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與這套模式背後的西方價值。希特勒早期曾在納粹黨大會上表示，資本主義「必須成為國家的僕人，而非成為國家的主人」，而且「人民的經濟」服務的是人民社群，而不是國際商業利益。<sup>13</sup>就算是經濟帝國主義，也必須優先滿足人民的需求。經濟利益顯然對德義日三國極具誘惑力。對義大利來說，征服利比亞與衣索比亞能為國內一百五十萬到六百五十萬農民創造新農地，國內農民因此可以前往帝國的海外領土墾殖，而不用移民到新世界。義大利



於一九三九年併吞的阿爾巴尼亞，由於人口稀少，據說可以容納兩百萬義大利人。<sup>14</sup>在義大利，「生存空間」（lo spazio vitale）一詞也跟德國一樣普遍。衣索比亞被描繪成充滿大好良機的寶地，是遍布未開採礦石的黃金國。阿爾巴尼亞的報告則指出，當地可能有尚未探勘的石油來源。<sup>15</sup>另一方面，日本對滿洲的野心，始於日本希望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時，能讓至少五百萬名日本貧困農民前往滿洲墾殖。滿洲的原料豐富，加上日本在入侵前已在當地進行投資，使得滿洲工業十分發達，隨著未來貿易發展與原料取得日漸困難，滿洲因此成了日本未來發展的核心：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的海外投資有九成位於滿洲。當時的日本人認為，如果日本無法確實掌握在滿洲的資產，就不可能讓經濟持續現代化，也不可能發展出足以捍衛帝國的力量。<sup>16</sup>

德國的狀況也是一樣。確保更多生存空間是希特勒發展德國的核心理念。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德國人普遍把國內經濟衰退歸咎於德國沒有適當資源與無法取得市場，德國需要生存空間的說法因此甚囂塵上。德國向民眾大肆宣傳其他歐洲國家的母國與帝國海外領土的懸殊對比：法國因為海外領土而使面積擴大了二十二倍，荷蘭六十倍，比利時八十倍，大英帝國的領土據估計是本土的一百零五倍以上。反觀德國於一九一九年失去部分領土及所有殖民地之後，現在的國土面積還比過去小。<sup>17</sup>因此，創建與支配一個中東歐經濟區，擁有可掌控的貿易與自給自足的資源與糧食，不僅是希特勒政權經濟政策的核心，也是德國民眾普遍的想法。一九三七年，戈林在與英國友人的對話中還指出：

「經濟空間必須等同於我們的政治空間。」<sup>18</sup>希特勒自己也有著粗略的帝國經濟觀點。一九二八年，希特勒在他未出版的《第二本書》（*The Second Book*）中回顧英國帝國主義時指出，英國表面上說是輸出文化與文明，其實骨子裡還是「需要為自己的貨物尋找市場與原料來源，因此

運用政治權謀的手段來確保這些市場」。無論如何，國家的繁榮意謂著對外征服，要從「戰爭的艱困中贏得自由的麵包」。<sup>19</sup>

促成德義日建立領土型帝國的第三個理由，則是「機會」。一九二〇年代的猶疑與挫折，到了一九三〇年代逐漸被戰後秩序的危機掩蓋，德義日覺得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自行建立新秩序，卻又不至於引發更大的危機。在解釋新一波帝國主義浪潮時，我們不能忽略德義日在這個時期做的盤算。國際社會無力解決全球經濟衰退，各國紛紛自行尋找解決危機的方案，國際合作因而瓦解，我們可以從一九三三年六月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清楚看出這一點。<sup>20</sup>全球危機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國聯的大國因經濟衰退而無力維持國際安全，因此不願採取任何有風險的行動。國聯對於日本占領滿洲僅僅做出譴責，而未採取任何實際措施，這種狀況被解讀為集體安全體系在面對國聯主要會員國時完全起不了作用。日本領導高層日後志得意滿地表示，日本是「預示國聯即將崩解的使者」，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暴露國聯的「顛頂無能」，德國與義大利就不會有機會推動各自的侵略政策。<sup>21</sup>實際上也是如此。四年後，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德國於一九三五年公開宣布重新武裝，之後又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將萊茵蘭邊境地區再軍事化，這一連串違反《凡爾賽條約》的行動都未遭到國聯的強力反對。每踏出成功的一步，就讓德義日更加相信，英法兩大帝國與國聯各成員國不會阻擋它們朝建立帝國之路邁進。一九三六年，一名義大利記者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對一名英國記者說道：「我們覺得日內瓦只是一群老太太聚集在一起開會，我們都這麼想，從以前到現在都這麼認為。」<sup>22</sup>最後這三個國家都退出國聯：日本於一九三三年三月退出，德國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義大利則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英法既無法阻止德國與義大利軍事支持

佛朗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在西班牙發動國民軍叛亂，也未能阻止一九三八年德國占領奧地利或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英法的毫無作為，鞏固了德義日的信念，最重要的是讓希特勒因此相信，一旦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將重蹈覆轍，只會不斷地「虛張聲勢」而不會採取任何軍事干預行動。<sup>23</sup>然而，對這三個國家來說，真正關鍵的是它們必須在美蘇兩國有能力或有意願參與更多世界事務之前採取行動。蘇聯在一九三〇年代透過五年計畫大力發展重工業與軍備，德日兩國都清楚意識到蘇聯將成為未來帝國擴張的潛在敵人。日本能否順利占領滿洲，除了要考量占領滿洲後與蘇聯接壤且共享漫長的國界，更重要的是日本必須建立穩固的防衛來抵禦蘇聯可能的入侵，以保障滿洲的戰略資源。<sup>24</sup>希特勒在建立獨裁統治之後，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草擬了一份重要的戰略文件，即所謂的《四年計畫備忘錄》。希特勒在備忘錄中強調，紅軍將在十五年後構成威脅，德國必須在此之前解決生存空間的問題。<sup>25</sup>相較於蘇聯，美國則是個未知數。經濟大恐慌對美國造成災難性影響，使美國退回到相對孤立的狀態，主要仰賴海軍來防衛其所處的半球。顯然，美國只會在更遙遠的未來構成威脅，但威脅畢竟還是威脅。從過去的歷史來看，美國對於各個帝國總是抱持著批判立場，不過此時的美國民眾還沒有意願透過武力干預來阻止帝國主義。<sup>26</sup>對於帝國時代來說，無論是舊帝國還是新帝國，列寧與威爾遜的陰影總是如影隨形，因此必須趕在這兩股力量成形之前建立帝國，愈快愈好。

即便當時人覺得有可能在新一波領土型帝國主義下建立新秩序，並不意謂著這是個容易的決定。儘管戰後許多人認為德義日高層擬定過一套征服全球的計畫，但從日本奪占滿洲、義大利進攻衣索比亞與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的背景脈絡來看，顯然當時三國政治領袖都對帝國野心抱持著猶豫且謹慎的態度。無論他們喜不喜歡，都需要得到國聯

大國的「默許」才能出兵。墨索里尼說服軍方與黨內同志入侵衣索比亞的關鍵，就在於他宣稱已獲英法口頭允諾不會干涉（但結果並非如此）。而在占領阿爾巴尼亞之前，墨索里尼也十分擔憂其他國家的可能反應（不過國聯只是把阿爾巴尼亞的抗議登記在案，實際上並未採取任何行動）。<sup>27</sup>我們一般都把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慕尼黑協定》

（Munich Agreement）視為希特勒霸凌外交的一大勝利，使德國兵不血刃地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區，但這位德國獨裁者本人卻對此大感惱火，因為他原本想藉由一場短暫戰爭徹底擊敗捷克人，無奈卻遭到西方強權以協定的方式攔阻。一年後，希特勒在對波蘭開戰前明確向幕僚表示，絕不會再讓第二個慕尼黑事件發生。<sup>28</sup>

無論是既有舊帝國，或是德義日等新帝國，都必須對其帝國計畫相對謹慎的另一個原因，是帝國衝突的能見度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大為增加。這主要是因為現代媒體發展的緣故，例如遍及全球的新聞報紙、愈發流行的新聞影片與廣播。國際聯盟雖然被外界認為軟弱無能，但國聯依舊提供了一個具有大眾能見度的平臺，能夠針對日本非法奪取滿洲或墨索里尼攻打衣索比亞等國家主權遭到侵害的問題進行公開辯論。<sup>29</sup>國際的辯論迫使德義日必須替自己的侵略行為提供合理的解釋，而三國也分別提出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例如入侵是為了不讓這些失敗國家損害它們的利益。國聯針對滿洲問題進行辯論時，日本代表堅稱，以「有組織的單一中央政府」做為國家標準來看，中國不過是個「虛構之物」，實際上並不存在。日本代表也宣稱，無論從任何形式來看，滿洲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是一個已經「獨立」的國家，叫做「滿洲國」，其領導人是已經遜位的滿洲皇帝溥儀。<sup>30</sup>墨索里尼為攻擊衣索比亞提出的理由是，衣索比亞不過是「一群野蠻部族的集合體」，因此實際上「不是國家」。<sup>31</sup>希特勒則解釋德國只是將原本捷克領土中的波希米亞與摩拉維



亞納入保護國，而且這不過是因為捷克這個民族國家已經無法有效運作——哪怕捷克斯洛伐克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一個現代歐洲國家而非殖民地。在希特勒的例子中再次出現了「保護國」一詞，這個詞長久以來都是歐洲帝國主義用來掩蓋實際控制的一種說法，彷彿保護國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權（實則不然）。<sup>32</sup>當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清晨對波蘭宣戰時，宣戰理由也是波蘭人並沒有建立民族國家，所以若德國不前來統治，「最糟糕的野蠻主義將會在此盛行。」這種說法無意間呼應了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對衣索比亞人的指控。<sup>33</sup>

德義日三國領袖不僅因為國際局勢而對開戰極為謹慎，他們還需要考慮到國內政治與軍事菁英的態度，要對於未來政策凝聚共識。這個問題在日本尤其明顯。日本國內政治充滿了各種衝突，有政府文官與軍方的衝突，有陸軍與海軍的衝突，甚至連陸軍內部也有派系衝突。一九三一年九月，當關東州的陸軍指揮官下令入侵滿洲時，他們的舉動其實已經違反了文人政府的命令。隨後陸軍與政治人物的僵局導致立憲民政黨內閣總辭，實際上終止了文人政府對陸軍帝國主義的箝制，但陸軍本身的派系衝突則一直持續到一九三〇年代中葉。<sup>34</sup>日本海軍與陸軍的爭論主要圍繞在北進或南進政策上：海軍認為應優先防衛太平洋，一有機會就進一步奪取歐洲在東南亞資源豐富的殖民地，這個選擇日後證明是一場災難；陸軍則關注北方蘇聯的威脅，希望先鞏固陸軍在中國北部的大陸戰略，建立強大而自給自足的工業與貿易區，進一步擴大日本的軍事力量與捍衛日本帝國。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公布的「國策基準」擱置了陸海軍的爭論，但並未徹底解決，國策基準一方面支持在亞洲大陸建立強大的帝國防衛，另一方面也要求海軍做好帝國南向擴張的準備。<sup>35</sup>

無論日本在戰略上是出於何種原因抱持謹慎態度，日本都依舊在一九三〇年代毫不猶豫地朝中國大陸擴張。日本占領滿洲之後，非但未從



滿洲撤軍，反而將滿洲當成日本進一步擴張的跳板。日本的心態之所以轉趨積極，部分是為了穩固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疆界，另一部分是為了確保更多的資源與交通樞紐，最後則是因為日本陸軍與他們在東京的政治支持者胃口愈來愈大，希望進一步擴大帝國版圖。日本接下來的領土擴張並未像入侵滿洲那樣引起國際關注（就連今日的史家也經常只將焦點放在滿洲上）。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兩萬名日軍入侵並占領了熱河省，熱河省位於滿洲南方，屬於內蒙古的一部分。這次入侵使得關東軍逼近中國舊都北平。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五月，日軍發動「長城戰役」，往南奪取更多土地，直抵長城防線甚至入侵冀東，最後中日訂定了《塘沽協定》。一九三五年，日軍再入侵內蒙古察哈爾省，六月中日訂定《秦土協定》，中國同意撤離在北平周圍的河北省駐軍。日本占領更多的內蒙古領土之後，仿照滿洲國模式在當地建立第二個「獨立」國家，名義上的領袖是內蒙古的德王，但與滿洲國一樣，實際的主導者是日軍。一九三六年一月，東京政府發布《處理華北綱要》，日軍計畫完全切斷國民政府與中國最富庶地區的連結，使其喪失主要的稅收來源。奪取滿洲後的四年間，日本持續朝遼闊的亞洲大陸擴張，過程中也連帶轉變了日本的帝國經濟性質。<sup>36</sup>

日本取得滿洲與華北其他地區之後，終於有機會挑戰亞洲既有的經濟秩序。日本的目標是減少其他貿易大國對整個亞洲的影響，並且改變亞洲資源的流向，使其轉而支持日本的產業。關鍵是利用滿洲國與華北的資源進行經濟發展。滿洲過去一直是中國的工業重鎮，供應中國百分之九十的石油、百分之七十的鐵、百分之五十五的黃金與其他重要資源。<sup>37</sup>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八年間，日本在滿洲投資了十九億日圓。日本軍方與政府堅定地推行國家經濟計畫與訓令，確保投資目標能夠實現。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公布「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最終針對個

別商品設立了二十六家企業。中國銀行要不是被接管，就是與日本銀行協調經營，建立以日圓為主的單一貨幣區，鐵路長度也增加了一倍。一九三八年，日本設立華北開發公司，依照日本計畫的經濟利益來開發華北地區，將華北併入日圓區。<sup>38</sup>有了新領土的資源，日本鋼鐵產量從一九三〇年的兩百萬噸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五百六十萬噸；同時期的煤產量也從三千一百萬噸增加到四千九百萬噸。然而，日本的經濟擴張完全被軍事需求吞噬。在一九三七年大綱中，日本帝國陸軍決定擴大軍隊規模，希望到一九四〇年代初能擁有五十五個師團的兵力。一九三四年，日本國防支出已占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十四，到了一九三八年一口氣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一。日本曾在一九三四年透過《天羽聲明》對外宣示，新經濟區是專屬於日本的特殊利益區。一九三八年，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提出警告，東亞新秩序已然確立，任何第三國都將被排除在外。根據陸軍大綱，工業成長到一九四一年時便足夠供應帝國國防所有的必要資源與「強化我們領導東亞的力量」。<sup>39</sup>

無論日本陸軍有過怎樣的規畫，日本對中國採取的整體軍事戰略卻十分模糊。日本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以及與蔣介石合作的北方軍閥接壤的疆界經常出現爭端，誘使日軍不斷侵占領土，但日本相對有限的兵力又難以控制遼闊的區域，導致日本無法在占領區內建立穩定的秩序，從而難以充分利用占領區的資源。對日本政府來說，首要之務是透過政治與軍事手段牢牢控制華北，而非向南方的國民政府發起大規模戰爭。一九三七年七月與八月爆發的中日戰爭，其實並不在日本政府的計畫之內。這場戰爭由中國方面掌握了主動權，而這也是中國唯一一次在雙方衝突中掌握先機。蔣介石的戰略原本是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先消滅中國共產黨，再對抗日本侵略，但這項戰略在一九三六年底遭遇挑戰。蔣介石到陝西省西安市巡視時，遭東北軍將領張學良扣留，他要求

蔣介石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然而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其中尤以蘇聯的史達林反對最力，蔣介石最終獲釋返回首都南京。蔣介石在南京表示，在短暫拘禁期間他曾看到異象，他相信拯救中國對抗日本是他的天命所在。<sup>40</sup>

改變策略的時機在出乎意料的狀況下出現，起因是日本與中國士兵在北平近郊發生的一起小衝突，當時這類小摩擦可說是持續不斷，但蔣介石卻利用其中一次爭端對日本長久以來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做出反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間，日本在中國駐屯軍一個小隊的士兵在盧溝橋（位於北平近郊的一座古石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當晚便發生了所謂的「盧溝橋事變」。日軍在演習時曾一度傳出槍響，之後便有一名士兵失蹤，日軍於是要求進入中國宛平縣城搜索。中國拒絕日方的要求，日軍隨後攻擊宛平縣城，造成兩百名中國士兵死亡。中日的駐地指揮官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引發戰爭，於是要求停火。<sup>41</sup>然而，危機仍持續升高，反映出中日兩國在一九三〇年代累積的深刻矛盾已難以善了。在東京，陸軍大臣杉山元一改近衛內閣的謹慎態度，決定增援三個師團以完全控制中國的平津地區。七月十六日，北平被圍；七月二十六日，日軍開始進攻北平，兩天後北平陷落，鄰近的港口城市天津也於七月三十日淪陷。至此，日本的計畫已經擴大為最終解決「華北事變」，也就是消滅蔣介石主力部隊，如果可能的話，就進一步推翻蔣介石政權。然而，這並不表示日本想進行一場大戰，但蔣介石卻反過來將這起事件擴大為「全國性事件」，因為他認為盧溝橋事變已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七月七日過後不久，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之後又說，這場危機是「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sup>42</sup>北平失守之後，八月七日，蔣介石召開「國防最高會議與黨政聯席會議」，要求國民政府所有重要政治與軍事領袖共同抗日，與會者毫無異議支持抗戰。

蔣介石向全國廣播，宣布抗戰開始：「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蔣介石也派出自己的精銳部隊前往上海，他認為這裡將是第一場重要戰役發生之地。<sup>43</sup>

日軍打算進行閃擊戰，也就是「速戰速決」，先摧毀蔣介石的重要軍事資源，然後往南占領中國直到長江下游。日本陸軍高層希望在一個月內達成這個目標，其他人則認為最多三個月就可完成。日軍「三月亡華」的計畫與日後德軍的巴巴羅薩作戰都犯了相同的錯誤，兩國都讓軍事傲慢凌駕於軍事與地理現實之上。日軍數量不如中國軍隊，但裝備、訓練與機動性較佳，儘管如此，日軍的軍事推進計畫卻未考慮到他們即將進攻的地區空間有多麼遼闊、地形有多麼複雜。日軍進攻的速度很快就慢了下來。中國軍隊敗退之後可以撤退到廣大的後方進行重整，日軍因此遲遲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日本陸軍從一九三七年夏天只有幾個師團開始，同年底不得不擴充到二十一個師團，一年後再增加至三十四個師團，到了一九四一年更達到五十一個師團。<sup>44</sup>日軍愈是深入華中地區，後勤補給就愈是困難；日軍占領的土地愈大，部隊就愈是分散。這場「抗戰」的爆發，也讓蔣介石的聲望隨之提高。日本侵略中國犯下的殘暴罪行，包括毒氣戰與細菌戰（炭疽病、鼠疫、霍亂），更使中國人同仇敵愾。蔣介石原本曾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致力營造民眾的統一意識，卻未能成功，如今日本人的入侵反而有助於這種統一意識的建立。日本預期蔣介石面臨軍事上不敵日本的現實，很快就會選擇投降，然而蔣介石反而更堅定了抗戰的決心。日本光是在一九三八年就提出了十一次停戰要求，都遭到蔣的拒絕。

然而，中國方面的抵抗其實並非鐵板一塊。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中國駐屯軍更名為華北方面軍，這批日軍在控制北平之後，遂由此地分別往西往南沿著主要鐵路線進軍，控制鐵路線對於維持軍隊的機動性與



後勤至關重要。日軍與滿洲一部分關東軍往西進攻察哈爾省與山西省，蔣介石於八月十五日派湯恩伯駐守南口，但不久這個重要的鐵路交通樞紐便遭日軍拿下。<sup>45</sup>國民政府在華北的防務必須仰賴宋哲元等地方軍閥的合作，然而宋哲元卻在七月的平津戰事中輕易撤守，蔣介石因此認為，比較好的戰略應該是在距離國民黨中央軍較近且日軍較弱的地區主動攻擊日軍。蔣介石選擇上海做為主要戰場，一方面是希望解除日本對中國主要稅收來源的威脅，二方面是藉此對日本占領北平做出適切回應，甚至獲得外國支持。但蔣介石真正的目的，如同他對軍事領袖所言，是粉碎日本三月亡華的意圖，使日軍陷入長期消耗的泥淖。當蔣介石的軍隊在上海集結時，日本的陸海軍也將上海的兵力擴增到五個師團，並且駐紮了三十二艘海軍艦艇。這場淞滬會戰開打之後，八月十四日，為數不多的中國空軍試圖空襲日本旗艦，結果卻造成災難性的結果，意外炸毀了上海的飯店與遊樂場，造成超過一千三百名平民死傷。起初中國軍隊靠著數量優勢壓制日軍，使其後撤到濱海地帶，但隨後攻擊陷入遲滯。日本投入大量增援部隊，以海軍封鎖中國沿海。八月十五日，日本海軍航空隊針對中國軍事基地、港口與城市進行長時間轟炸。

八月最後一個星期，日本在上海附近發動大膽的兩棲登陸作戰，海軍也協同進行岸轟。到了九月十三日，面對水路交錯與中國軍隊臨時布置的防線，日軍已經做好在這些困難地形作戰的準備。日軍直到十一月十二日才獲得勝利，但兩方都付出極高的傷亡代價：日軍傷亡四萬零三百人，中國軍隊傷亡十八萬七千人（包括蔣介石的年輕軍官團也損失四分之三）。<sup>46</sup>日本大本營（最高司令部）想控制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包括中國首都南京，希望藉由這個決定性戰果來結束這場戰爭。淞滬會戰獲勝的日軍，在進攻南京途中一路搶掠，除了追擊潰退的中國軍隊，也焚燒村落屠殺居民。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下令將政府遷往中國西部的



重慶，總司令部則轉移到長江中游的武漢。蔣要求南京守軍進行象徵性的抵抗，但很快就被日軍擊敗，日軍對士兵與平民進行無差別的殺戮。十二月十三日，松井石根與朝香宮鳩彥王率領日軍攻陷南京，日軍連續數日進行劫掠、強姦與屠殺。<sup>47</sup>到了一九三七年底，日本已經占領華東與華中大部分地區，但代價十分高昂，而且未能達成七月預期的速戰速決戰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布，日本將不再與蔣介石政權接觸。此舉形同正式宣戰，不過卻是遲來的宣戰。

儘管遭受重大軍事損失與武器嚴重短缺，蔣介石與他的將領，以及來自中國南方的桂系軍閥，仍為接下來可能發生的重大戰役做好準備。第一場重大戰役，也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數一數二的戰役，戰場位於南京北方的徐州，這裡是重要的鐵路交通樞紐，雙方參戰兵力超過六十萬人。日軍採取鉗形攻勢，分別從南北夾擊徐州。在淞滬會戰中獲勝的日軍此時已重新改編為華中派遣軍，與華北方面軍分道進攻，於一九三八年五月攻下徐州，但未能成功圍殲中國軍隊的四十個師。在沙塵暴與濃霧掩護下，中國軍隊分成小股順利逃出包圍圈。四月初，當日軍進逼徐州時，中國軍隊在桂系將領李宗仁與白崇禧領導下，於徐州以北的台兒莊罕見地以戰術擊敗人數處於劣勢的日軍部隊，不過還是無法扭轉戰局。徐州的陷落對中國來說是個重大挫敗，武漢與整個長江華中平原因此門戶洞開。日本希望在取得武漢與鞏固華北、華中占領區後，能夠「結束戰爭」，建立一個新的親日政府，使日本能夠「控制中國」。徐州會戰獲勝，使日本能夠騰出兵力防衛北方大敵蘇聯，而此時的蘇聯也持續供應現代武器給蔣介石的陸軍與空軍。<sup>48</sup>面對日本對武漢的威脅，蔣介石採取了無情的反制措施。他下令炸毀黃河堤防，造成廣大的黃泛區，阻止日軍南下攻擊武漢與華中地區。蔣介石的動機完全出於戰略層面，「用水來代替士兵」，但他的做法卻讓當地民眾傷亡慘重，而這也

是當時國民政府普遍採行的方式：藉由焦土政策來阻止日本運用占領區資源。在毫無預警下，五萬四千平方公里的低窪農地遭到淹沒，戰後估計有八十萬到九十萬人死亡（最近的研究認為死亡人數接近五十萬人），超過四百萬人淪為難民。<sup>49</sup>

黃河氾濫固然阻止日軍快速攫取武漢，但日本海軍也能利用黃泛區運送軍隊到內陸與提供火力掩護。一九三八年八月，日本第十一軍奉命進攻武漢。在炎熱天氣下，日本軍中開始流行瘧疾與痢疾，此外糧食與後勤也出現短缺，日本士兵只能艱難地徒步或乘船前往武漢。武漢會戰雙方投入的兵力將近兩百萬人，最終日本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占領武漢。蔣介石將權力中樞遷移至重慶，憑藉著崇山峻嶺與日本占領區相阻隔。更往南，日軍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發動兩棲登陸，成功奪取重要港口廣州，隔年二月，日本海軍攻占海南島，之後更進一步控制了東京灣與法屬印度支那。一九三八年的占領推進潮使日本取得中國最富庶的工業區，包括滿洲、北平、上海、武漢與廣州，這些地區的生產力約占整個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七。<sup>50</sup>日本此時已占領了廣大的華中與華東地區，軍隊推進的速度不可避免慢了下來。一九三九年，日本開始把矛頭轉向湖北與湖南這兩個新邊境省分。然而，在經歷兩年大戰之後，日本雖然已經取得中國的主要生產地帶，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消滅大量中國軍隊，卻遲遲無法結束這場「中國事變」，更不用說順利讓中國成為日本帝國的海外領土。

中日戰爭的特殊之處，在於沒有任何一方穩操勝券，而且隨著戰事延長，更難看出誰能獲得最終勝利。蔣介石決定以長期抗戰來耗盡日軍力量，但這種做法只有在日軍與日本政府決定放棄對中國的帝國領土野心時才有意義，但當時的日本看來並無放棄的跡象。中國軍隊存在許多劣勢：缺乏現代武器、訓練不足、缺乏有實戰經驗的軍官、殘餘空軍完

全仰賴外援，此外幾乎沒有海軍。若以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標準來衡量，日本確實擁有一支現代陸軍、可觀的陸海軍航空隊、規模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海軍，在國內還擁有龐大的軍事生產基地，軍官團也具備豐富的作戰經驗——但儘管擁有如此實力，日軍依然只能在中國取得局部勝利。中國領土之廣大與地形之複雜，日軍即使能夠占領也無法真正取勝：農村地區短期內雖然能加以控制，但只要日軍一離開，馬上就會喪失控制權。由於後勤問題始終無法解決，日軍只能仰賴占領區的糧食維生，但農村居民很快就學會將糧食藏匿在地窖裡，使日軍不僅要與中國軍隊作戰，連糧食供應也成了他們奮戰的目標。農村如果早一步在日軍抵達前得到預警，所有村民就會帶著他們的糧食躲進森林或到附近的山區藏匿，也就是所謂的「堅壁清野」，日軍在報告裡提到這點。<sup>51</sup>占領區的治安維護困難重重，許多抗日分子因此有機會在敵後建立基地，不斷騷擾日軍。這些抗日分子除了有來自中國西北的共產黨員，也有蔣介石政權滲透到日本占領區的游擊隊員。一九三九年，日本絕大多數軍事作戰都是針對占領區的抗日分子，而非與中國正規軍交戰，而且在夏季期間，日本還與蘇聯在滿洲的諾門罕高地爆發嚴重邊境衝突，兩國最後在九月協議停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蔣介石集結七十個不足額的師，出乎意料地在北方、長江流域與廣州附近發動反擊，只不過未能產生決定性的結果。到了一九四〇年，中日雙方都面臨僵局。為了創造蔣介石可以被取代的假象，日本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南京扶植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由國民黨叛黨黨員汪精衛領導。汪精衛傾向於與日本合作，不贊成繼續戰爭，但汪精衛根本無法代表中國與日本訂定和約，他的存在只是確認日本目前擁有的占領區。<sup>52</sup>日本政府先前並未預期也不想打一場長期戰爭，更不希望承受如此龐大的經濟與人力損失，但這場為了打造亞洲新秩序而產生的衝突既然已經開啟，就沒有停止的理由，

日方也不可能承認自己的戰略已經失敗。到了一九四一年，在中國的戰爭已經造成日本十八萬人死亡，三十二萬四千人受傷。中國的傷亡人數遠遠比日本更多，但很難加以精確估算。



在墨索里尼統治下，義大利的帝國野心要比日本來得節制，但領土征服依然是關鍵要素。墨索里尼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經宣稱，帝國主義是「亙古不變的生命法則」，而在他獨裁統治期間，墨索里尼從未放棄讓新義大利成為地中海與非洲帝國的核心，也就是打造現代版的古羅馬帝國。<sup>53</sup>墨索里尼最初想在歐洲擴大領土，他想取得一九一五年《倫敦條約》承諾給予義大利，卻在巴黎和會遭到拒絕的南斯拉夫領土。但義大利軍事高層在國王埃馬努埃萊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支持下反對墨索里尼的主張，因為他們擔心此舉可能引發大戰。一九三〇年代初，國際秩序陷入危機，墨索里尼與法西斯黨激進分子決定不顧反對追求積極的帝國主義。墨索里尼一度動過奪取法屬科西嘉島的歪腦筋，但最後還是把擴張目標先鎖定在東非。數年來，義大利一直試圖將勢力範圍從厄利垂亞與索馬利亞這兩個殖民地延伸到仍保有獨立地位的衣索比亞。法西斯黨的其他重要領袖、軍方與國王都認為必須謹慎行事，反對入侵衣索比亞，就連墨索里尼自己也擔心軍事作戰可能損及他的政治地位。但墨索里尼最終還是獨排眾議，他注意到日本不顧國聯的反對成功入侵滿洲，於是他下令軍方擬定計畫，準備於一九三五年秋天征服衣索比亞。義大利開始為入侵大肆準備，大量部隊與軍需進駐厄利垂亞與索馬利亞；滿載軍隊與車輛的義大利艦艇不斷穿越蘇伊士運河，引起了英國人的注意。<sup>54</sup>對墨索里尼來說，衣索比亞只是個起點。他在一九三四



年曾私下表示義大利必須征服埃及，無視當時埃及是在英國的控制之下（「如果我們能得到埃及，我們將成為偉大的國家」），然後墨索里尼又在一九三五年三月把蘇丹納入未來的征服名單。他命令巴里廣播電臺與羅馬廣播電臺開始在阿拉伯世界宣傳反英訊息，並且利用與葉門簽訂的一份長達十年的商業與友好條約來羞辱在鄰邦亞丁建立保護國的英國人。<sup>55</sup>在由英國控制的馬爾它島，當地的義大利法西斯分子開始宣傳馬爾它是被英國殖民者控制的義大利島嶼，未來必將回歸祖國懷抱；義大利海軍也擬定應變計畫，準備攫取這座島嶼。<sup>56</sup>在墨索里尼的帝國願景中，東地中海與東北非都是新羅馬帝國的踏腳石。

墨索里尼希望入侵衣索比亞能在短期內解決，也就是進行一場義大利版本的閃擊戰，但墨索里尼並未對征服之後制定計畫，也對於他想統治的衣索比亞人民一無所知。與此同時，墨索里尼開始受到英法兩國的壓力。英法提出各種方案，希望能化解戰爭危機，包括讓義大利在衣索比亞事務上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將衣索比亞部分領土交由國聯有限託管。然而，墨索里尼之所以採取打造新帝國的行動，目的就是不想在國聯大國指示下獲得補償，於是在九月二十二日，儘管義大利國王與殖民地大臣都有所保留，墨索里尼仍悍然拒絕國聯的提案。事實上，就算決定接受有限解決方案也為時已晚，因為義大利已經在非洲之角擁擠的殖民地上密密麻麻駐紮了五十六萬人與三百萬噸的軍需物資。<sup>57</sup>十月三日，義大利以衣索比亞挑釁為藉口，在博諾將軍（Emilio De Bono）指揮下，出動義大利陸軍與空軍，分別從衣索比亞的北方與南方發動進攻。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Haile Selassie）在皇宮前面擂起帝國傳統戰鼓，召喚他的人民奮起抵抗。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墨索里尼希望迅速結束戰事以避免國際情勢轉趨複雜或引起國聯干預，然而戰爭很快就陷入膠著。塞拉西皇帝知道雙方



實力懸殊，因此下令軍隊利用地形與義大利人難以辨識當地方位的優勢進行游擊戰：「藏匿、奇襲、進行游牧民族式的作戰、偷襲、狙擊與一個一個地幹掉對方。」<sup>58</sup>

這是南非戰爭之後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場殖民地戰爭。結果理論上不難預期，但在博諾指揮下的義軍進展緩慢。到了十二月，墨索里尼不得不思考只占領一部分領土的可能性。英國與法國聯合向墨索里尼施壓，希望犧牲衣索比亞部分主權來換取停戰，然而當所謂的《霍爾—拉瓦爾協定》（Hoare-Laval Pact，霍爾是英國外交大臣，拉瓦爾是法國總理，該協定是兩人的建議，故以兩人為名）曝光時，外界對於英法打算犧牲衣索比亞主權之事一片譁然，此事只能不了了之。十一月，義大利改由巴多格里奧將軍（Pietro Badoglio）接替博諾擔任總指揮官；十二月，格拉齊亞尼將軍（Rodolfo Graziani）由索馬利亞北上進攻衣索比亞，在多洛（Dolo）打了勝仗，並且在墨索里尼直接命令下首次使用毒氣。衣索比亞的將領未聽從皇帝的建議，而是選擇與義軍正面會戰，結果導致衣索比亞的五萬軍隊在騰比恩（Tembien）兩次交戰後，於阿拉達姆山（Amba Aradam）遭到義軍擊敗。義軍使用具殺傷性的炸彈與毒氣（芥子氣與光氣）來瓦解衣軍的抵抗，致使衣軍土崩瓦解，士氣完全崩潰。<sup>59</sup>墨索里尼一開始仍認為可以像日本建立滿洲國一樣，在衣索比亞建立保護國或傀儡政權，依然由塞拉西擔任皇帝，但當義軍於一九三六年五月攻陷衣索比亞首都之後，墨索里尼決定直接併吞衣索比亞。五月九日，墨索里尼在羅馬威尼斯廣場向欣喜若狂的群眾宣布：「義大利終於擁有自己的帝國。」<sup>60</sup>

墨索里尼顯然宣示得太早，因為義大利其實尚未完全征服衣索比亞。為了肅清衣國全境，艱苦的戰事又持續了一年。義大利軍隊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一萬五千人死亡，二十萬人受傷。這場戰爭動用了八十

萬名義大利陸軍與空軍，這才締造了所謂的「義屬東非」。在戰火中死亡的衣索比亞潰散軍隊與平民估計達到二十七萬五千人。<sup>61</sup>但死亡並未隨著義大利勝利而結束。墨索里尼下令處死拒絕承認或不願與新義大利政府合作的衣索比亞貴族，此外也殺害宗教領袖、巫覡與傳統上在衣索比亞社會旅行散布消息與傳言的地方「吟遊詩人」。一九三七年二月，義大利總督格拉齊亞尼遭暗殺未遂，義大利當局於是在阿迪斯阿貝巴展開大規模報復，至少造成三千名衣索比亞人死亡，婦女遭到強姦，房屋遭掠奪一空。<sup>62</sup>新政權隨即推行種族差異政策：衣索比亞人只能是臣民，無法獲得公民身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當局禁止義大利人與衣索比亞人通婚，在電影院、商店與公共交通工具都要進行種族隔離。一九三九年，義大利頒行法令，對違反種族差異原則的人嚴加懲罰，該法名稱叫《義屬非洲原住民違反種族威望制裁法》。<sup>63</sup>

墨索里尼原本希望這場戰爭能速戰速決，結果卻演變成漫長的消耗戰。他必須在衣索比亞駐紮大軍與支付龐大軍費：到了一九三九年，東非仍駐紮著二十八萬名義軍士兵。衣索比亞的反抗勢力不斷挑戰義大利的宗主權，使得傷亡人數持續上升。這三年艱苦肅清衣索比亞全境，導致九千五百五十五名義大利人死亡，十四萬名義大利人生病與受傷，受害的衣索比亞人更是不計其數。<sup>64</sup>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義大利國防開支是五十億里拉（占政府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一百三十一億里拉（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更高達兩百四十七億里拉（百分之四十五）。衣索比亞戰爭的總軍費大約五百七十億里拉，以舉債與稅金支付；之後義大利干預西班牙內戰又花了八十億里拉。<sup>65</sup>為了維護新殖民地治安而興建兩千公里的現代道路，幾乎拖垮了殖民地的預算。<sup>66</sup>

擴大的軍事支出無法藉由帝國擴張帶來的經濟利益加以彌補。與日

本的滿洲經驗不同，義大利與衣索比亞的貿易始終只有單向。義大利本土對帝國海外領土的出口，從一九三一年的二億四千八百萬里拉，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二十五億里拉，但主要都是用來滿足軍事需求。義大利希望光靠衣索比亞的糧食生產就能滿足當地義大利人的需要，甚至還有剩餘輸往義大利，然而這完全是幻想：一九三九年，由於衣索比亞農產量減少，導致義大利還必須出口十萬噸小麥到衣索比亞。到了一九四〇年，衣索比亞的糧食自給率仍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雖然義大利計畫讓數百萬名義大利人移居衣索比亞，讓當地的農業現代化，但到了一九四〇年，只有四百名農民願意前往衣索比亞，其中也只有有一百五十名膽子比較大者願意攜帶家人一同前往。<sup>67</sup>前往衣索比亞的工人比農民多，雖然在東非營運的義大利公司多達四千家，但絕大多數是軍需產業，或者是尋求快速短期利潤的投機企業，這類公司的存在無助於新非洲帝國的經濟轉型。義大利也試圖在衣索比亞探勘石油與礦藏，但一無所獲。義大利派駐衣索比亞哈拉爾省（Harrar）的總督哀嘆「掏金熱」為當地帶來腐敗與自私自利，儘管實際上在這個新殖民帝國的心臟地帶並沒有多少財富可供義大利人尋求。<sup>68</sup>征服衣索比亞無法為義大利帶來額外的糧食來源，最終義大利的糧食問題還必須仰賴在國內實施嚴格的自給自足或「封閉經濟」（autarky）政策才得以解決。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義大利的小麥進口量減少了三分之二，國內小麥生產則增加了將近三分之一。與建設和防衛新帝國有關的產業投資大量增加，但這些投資只能仰賴國內資源。與日本一樣，這些投資也愈來愈受到國家計畫產業發展的干預。<sup>69</sup>

義大利的新帝國除了掀起短暫的民族主義熱潮，並未得到任何益處。儘管如此，墨索里尼依然認為自己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新民族帝國領袖，可以堂而皇之地干預國際事務。墨索里尼挑戰西方大國的權威，

在歷時三年的西班牙內戰期間，派遣空軍與陸軍支持佛朗哥的國民軍叛亂。一九三七年八月，義大利派往西班牙的志願軍有三萬人，最後將有七萬六千名義大利士兵、飛行員與法西斯民兵加入國民軍的行列，而與之對抗的則是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義大利反法西斯流亡分子。在西班牙內戰中喪生的義大利人有三千兩百六十六名，使得一九三〇年代因戰爭而死亡的義大利人達到兩萬五千人以上。<sup>70</sup>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關係，因為義大利與德國「志願軍」在西班牙並肩作戰而拉近，不過義大利政府高層在帝國擴張上仍想維持自己的路線，不願與德國扯上任何關係。尤其墨索里尼很快就開始思索新的帝國目標。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次私人談話中，墨索里尼描繪了他想支配巴爾幹半島南部乃至於遠到伊斯坦堡的野心，他也想奪取法屬突尼西亞與科西嘉島，以及併吞英法在非洲之角的索馬利殖民地。一九三九年二月，墨索里尼甚至想像自己奪取蘇伊士運河、直布羅陀、馬爾它與賽普勒斯，將大英帝國逐出地中海地區。<sup>71</sup>墨索里尼的野心，在今日看起來也許荒誕不經，但當時的墨索里尼已在義大利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他愈來愈相信自己能夠取代「垂垂老矣」的舊帝國。若從這點來看，他的想法似乎也沒那麼荒謬。一九三八年，義大利反猶太主義分子英特蘭迪（Telesio Interlandi）如此表示，在法西斯時代，每個人都充滿著「建立帝國的意志」。<sup>72</sup>

這種建立帝國的意志也展現在義大利入侵阿爾巴尼亞上。與衣索比亞一樣，義大利併吞阿爾巴尼亞也是意料中的結果。阿爾巴尼亞曾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短暫成為義大利的保護國，但後來義大利在國際壓力下放棄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也成為國聯的會員國。一九二六年，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締結防守同盟，義大利除了實質掌控阿爾巴尼亞的國防，也逼迫阿爾巴尼亞統治者佐格國王（King Zog）與其締結緊密的經濟紐帶關係。儘管如此，佐格與他的政治盟友仍希望維持獨立地



位。一九三〇年代，義大利希望讓阿爾巴尼亞再次成為自己的保護國，但並未取得任何進展。<sup>73</sup>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晚期，隨著義大利新帝國主義逐漸確立，墨索里尼與他的外交大臣暨女婿齊亞諾（Galeazzo Ciano）開始著手把對阿爾巴尼亞的非正式影響力轉變成直接統治。這麼做可以讓義大利取得戰略利益，因為控制阿爾巴尼亞就能讓義大利同時控制亞得里亞海的兩岸。墨索里尼從一九二〇年代就希望在歐洲建立帝國，阿爾巴尼亞是個潛在據點，可以讓義大利帝國帶有一定的歐洲面向。義大利依然保有一九一二年從土耳其取得的多德卡內斯群島，這個群島被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確認為義大利屬地。多德卡內斯群島離蘇伊士運河不遠，義大利在島上加派駐軍與興建機場，而且任命一名總督全權治理。該群島使義大利朝建立一個涵蓋歐洲與黎凡特地區的帝國邁進，也為統治阿爾巴尼亞提供先例。<sup>74</sup>

在墨索里尼看來，若能把阿爾巴尼亞納入帝國的一部分，義大利就將擁有大好前景，其統治範圍將從亞得里亞海一路延伸到愛琴海。一九三八年五月，義大利開始擬定併吞阿爾巴尼亞的計畫，計畫中謊稱阿爾巴尼亞擁有豐富的石油與鉻礦，可以滿足義大利的戰時經濟。到了一九三九年初，義大利已做好準備。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占領布拉格，但西方沒有任何干預動作，齊亞諾因此認為這是動手的好時機。墨索里尼再次猶豫，因為國王與軍方都對這項計畫不感興趣，他們認為義大利在衣索比亞與西班牙已經耗費太多軍力，現在無力再進行一場戰爭。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西班牙內戰結束，義大利李托里奧師（Littorio Division）攻陷西班牙共和國最後一個據點阿利坎特（Alicante），義大利終於可以騰出兵力進攻阿爾巴尼亞。四月五日，義大利向佐格國王遞交最後通牒，要求阿爾巴尼亞成為義大利的保護國，而阿爾巴尼亞一如預期拒絕這項要求。四月七日清晨，兩萬兩千名義大利士兵，搭配四百



架飛機與三百輛小型戰車，開始進攻阿爾巴尼亞。這場軍事作戰過於倉促，並未做好完善組織。結果就是不會開車的士兵負責騎摩托車，不懂摩斯電碼的參謀人員被分配到通信單位。我們甚至可以在歷史照片中，看到義大利步兵在灘頭上騎著自行車進行戰鬥，與德軍進入布拉格的壯盛景象形成強烈對比。<sup>75</sup>

義大利對於作戰暴露的缺失隻字不提，反而大肆宣傳這是一場現代武器的勝利，但義大利的成功只是因為阿爾巴尼亞幾乎未進行任何抵抗。義大利的傷亡人數一直存在爭議，官方公布死亡十二人，但阿爾巴尼亞估計死亡人數落在兩百人到七百人之間。佐格國王逃離首都，四月十三日，義大利國王接任阿爾巴尼亞國王。雖然阿爾巴尼亞與滿洲國一樣，形式上不是殖民地而是傀儡國，但實際上卻被當成殖民地來剝削。義大利在阿爾巴尼亞設立總督，透過義大利顧問支配整個阿爾巴尼亞政府，而且阿爾巴尼亞經濟必須以義大利的利益為依歸，在公共場合還必須優先使用義大利語。阿爾巴尼亞雖然出現抵抗運動，但不久便遭到義大利鎮壓。齊亞諾本人也因為征服阿爾巴尼亞而獲得龐大利益，其中還有不少是貪汙所得，但就連他也抱怨義大利的新官員「苛待當地民眾」與「懷有殖民心態」。只不過，對於一個以粗糙手法進行領土擴張的威權國家來說，產生這樣的結果完全不令人意外。<sup>76</sup>

※ ※ ※

日本與義大利從事的帝國主義，最終讓兩國進行大規模軍事動員，並且在一九三〇年代發動一連串戰爭。也就是說，早在二戰爆發前，已經有數十萬名日本與義大利青年經歷長年戰火的洗禮。日本軍隊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義大利陸軍與空軍則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肅清

利比亞開始，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入侵阿爾巴尼亞，幾乎可以說是戰事連連。對比之下，希特勒的德國比較晚才開始推動擴張計畫，而在一九三〇年代絕大部分時間，德國一直是透過一連串兵不血刃的政變取得領土。唯有在一九三九年入侵波蘭時，德國士兵才真正為帝國打了一場規模與中國或東非戰場相當的戰爭。對於德國這個被解除武裝與陷入貧困的國家來說，要實現國家自主比義大利與日本困難得多。希特勒執政初期，主要的重點是扭轉一九二〇年代德國曾短暫實施的「履行」《凡爾賽條約》的策略。一九三三年十月，德國代表退出日內瓦限武會議，抗議各國未能達成限武協定。同年，希特勒政府停止償還主要國際債務且正式拒絕支付賠款。一九三六年，德軍進駐萊茵蘭非軍事區，撕毀一九二五年《羅加諾公約》。然而，儘管德國公然挑戰《凡爾賽條約》與《羅加諾公約》震驚世界，但德國領導高層知道德國的軍力依然不足，因此仍採取謹慎策略。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當德國重新駐軍萊茵蘭時，希特勒顯得十分焦慮，他擔心此舉可能對外展現出過多的野心。當天，年輕建築師史佩爾（Albert Speer）與希特勒一起搭火車前往慕尼黑，他日後回憶：「元首全身散發著一股緊繃的氣息。」史佩爾表示，希特勒每次回想萊茵蘭再軍事化時，都認為那是他人生中「最大膽」的決定。<sup>77</sup>

對希特勒來說，在建立帝國生存空間之前，還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首先是讓德國從經濟危機造成的災難處境中恢復，其次是讓德國再軍事化，使德國能夠重建大國地位，並且讓希特勒政權在決定未來方向時有操縱空間。一九三三年，德國祕密重新武裝，一九三四年推動五年計畫，進一步擴大武裝，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公開宣布將無視《凡爾賽條約》的限制讓德國重新武裝。德國軍費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十二億帝國馬克，暴增為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一百零二億帝國馬

克。到了這個階段，德國絕大多數軍事基礎設施都已恢復，而武器製造與徵兵訓練等長期計畫也已在進行。與日本和義大利一樣，德國提高國防支出的同時，也必須考量其他經濟產業的狀況以避免經濟危機，而且必須控制消費支出，因為德國民眾歷經數年的貧困與失業，如今在經濟復甦之後也想增加支出。德國試圖做到糧食與原料自給自足，避免仰賴可能對德國不利的世界市場，同時在中歐與東南歐建立由德國支配的貿易區，以此建立安全網來抵禦國際危機。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貿易往來，使東歐貿易餘額對德國大為有利。德國購買石油與糧食，使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羅馬尼亞對德國出口從百分之十八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七。<sup>78</sup>西班牙內戰爆發時，德國透過援助佛朗哥將軍來確保貿易利益，進一步擴展德國的「非正式」經濟帝國。德國占西班牙出口的比例，從一九三六年底的百分之十一，到了兩年後增加到將近四成，西班牙提供德國軍火產業最需要的金屬。<sup>79</sup>希特勒深信經濟封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並因此認為德國必須在歐洲貿易區控制足夠資源，就像日圓區一樣，才能讓德國在面對未來衝突時抵禦外來的經濟壓力。

一九三六年，龐大的國防支出造成的負擔與國際貿易的復甦緩慢，在德國引發了一場危機。軍方高層與曾主導德國經濟復甦計畫的經濟部長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都希望減少軍事支出及鼓勵貿易。但希特勒對於限制德國軍事力量成長的想法感到不滿，尤其是此時他終於有足夠的自信在帝國擴張上推動更積極的政策。一九三六年八月，希特勒在戰略備忘錄中表達他對經濟與軍事未來的看法。面對蘇聯日益增長的威脅，希特勒希望德國盡可能做好軍事準備，而且要加快自給自足的腳步。希特勒認為，如果無法粉碎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最終將導致「德國人的毀滅，甚至滅絕」；因此他的結論是，要找到能餵飽德國人的資源

與滿足未來鬥爭所需的原料，唯一的辦法就是「擴大德國人的生存空間，特別是原料與糧食基礎」。<sup>80</sup>備忘錄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宣布進行第二次四年計畫（第一次是再就業計畫），由納粹黨領袖與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擔任總負責人。這項計畫象徵德國政策出現劇烈的轉折：國家開始控制價格、薪資水準、進出口、外幣交易與投資。這種經濟模式稱為「統制經濟」，就像日本與義大利的國家經濟計畫一樣，目的是為了在加速重新武裝的需求與國內經濟穩定之間求取平衡。<sup>81</sup>這項計畫將對合成替代材料（石油、紡織品、化學製品、橡膠）進行大規模投資，為大規模軍事生產提供經濟基礎。到了一九三九年，產業投資已有三分之二都用來生產戰略物資，軍事支出吸收了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七（一九一四年時僅占百分之三），而且占了政府支出的一半。<sup>82</sup>其他額外的資源，未來將由發展自德國「生存空間」的新歐洲帝國來提供。

然而，對於希特勒計畫要在東方建立「生存空間」，以及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向軍方高層表示此一生存空間的長期目標乃是無情推動「日耳曼化」，這些說法的確切與具體內容為何，卻沒有人真正清楚。<sup>83</sup>儘管歷史學家努力在希特勒《我的奮鬥》（*Mein Kampf*）與其他零零碎碎的寫作中尋找他的意圖，但除了他確實表現出在歐亞大陸擴展德國未來生存空間的強烈欲望外，希特勒幾乎未留下任何具體的計畫內容。我們只知道希特勒在一九二〇年代接觸到「種族與空間」的論述且深受影響，往後他的主張基本上都遵循這條思想路線。希特勒從德國帝國主義思想中借用了征服「東方」這項隱喻，這類說法的起源至少可以往回追溯到四十年前的十九世紀末。然而令人挫折的是，希特勒除了堅定主張反共與三不五時就表示德國人的未來在「東方」之外，從一九三〇年代提出在東方建立生存空間開始，希特勒從未清楚表示他的最終目標是什



麼，也未明確定義在他心目中所謂的「東方」到底是哪裡。有人認為希特勒的最終幻想是「支配全世界」，但這完全出於臆測。希特勒清楚表示過的，只有德國擴張是為了奠定帝國基礎，使德國能與英國或法國這兩個全球霸權抗衡，甚至能與美國一較高下。<sup>84</sup>對希特勒來說，所謂「實際可行」指的是見機行事，而不是一套具體計畫。他的策略總是傾向於機會主義與短視近利，善變的他，唯一不變的就是深信德國人需要生存空間。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已可清楚看出誰是希特勒的朋友，卻很難預期誰會成為希特勒的敵人——猶太人是例外，因為在希特勒眼中，猶太人始終都是德國人努力實現民族自主的大敵。一九三六年，日本與義大利這兩個帝國侵略者開始與德國親善。該年十一月，日本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共同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義大利則於一九三七年加入。一九三八年，德國與義大利雙雙承認日本扶植的滿洲國傀儡政權。一九三六年十月，義大利與德國訂定非正式協定，這項協定後來又稱為《軸心協定》（Axis pact），因為墨索里尼主張歐洲必須繞著羅馬與柏林這條「軸心」旋轉。希特勒在會議向義大利領導人保證，地中海將是「義大利的海」，而德國的野心則「在東方與波羅的海」。<sup>85</sup>義大利無視國聯大國，出兵征服衣索比亞之事，讓德國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七年，德國國內出版了許多書籍讚揚義大利在利比亞與衣索比亞殖民成就，同時也有許多書籍批評大英帝國是「海盜國家」，「掠奪了半個世界」。作家鮑爾（Hans Bauer）在《殖民地與第三帝國》（*Colonies and the Third Reich*）中對義大利推崇備至，認為德國可以仿效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的模式，撕毀《凡爾賽條約》，取得自己的殖民生存空間。<sup>86</sup>

德國內部對於希特勒的策略走向也存在各種猜測，遊說團體每隔一



段時間就會提出海外殖民的主張，每次都能獲得眾多響應與支持。不久，隨著《凡爾賽條約》名存實亡，曾在一九二〇年代高喊海外殖民的熱心人士，此時也希望希特勒能想辦法恢復德國失去的非洲與太平洋領土，或者乾脆另尋新的殖民地。一九三四年，納粹黨設立殖民地政策辦公室，由前殖民地官員（與納粹黨領導人）埃普將軍（Franz Ritter von Epp）擔任長官。到了一九三六年，殖民地政策辦公室與既有的殖民組織「合併」為新的帝國殖民地同盟，由埃普擔任主席。殖民遊說團體原本在一九三三年只有三萬名支持者，但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帝國殖民地同盟卻已有一百萬名會員，一九四三年的會員人數更是超過兩百萬人。<sup>87</sup>殖民地的宣傳文學也快速增加，一九三〇年代初只有幾本出版品，往後十年卻增加到每年推出四十五到五十本作品。德國年輕人成為英雄殖民地探險小說與電影的受眾，例如《希特勒青年的殖民地教學手冊》就專門教導德國年輕人如何做好準備打造殖民地的未來。<sup>88</sup>在經濟部長沙赫特的鼓吹下，當時許多討論都提到德國只要取得非洲領土，就能解決稀有金屬短缺的問題，也能提供更多異國糧食。這位經濟部長在萊比錫演說時指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個工業國家必須擁有殖民地原料才能擴大本國經濟。」<sup>89</sup>儘管希特勒政權曾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試圖破壞英法關係，但德國民眾對於海外殖民地的熱潮卻無法打動德國的新領導高層，因為希特勒的領土野心其實放在歐陸，而不是傳統意義下的海外殖民地。一九三七年二月，戈林對為他傳遞消息的英國人表示，「我們想擁有在東歐自由發展的權利」，相對地也會尊重英國的海外帝國利益。<sup>90</sup>直到一九四〇年夏天舊帝國一度看似被擊敗時，建立海外非洲帝國的想法才又重新浮上檯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帝國總理府的一場會議中，希特勒首次提出明確的擴張計畫，而這項計畫也因為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Fritz

Hossbach) 留下的《霍斯巴赫備忘錄》而惡名昭彰。希特勒召集武裝部隊總司令與外交部長紐賴特伯爵 (Konstantin von Neurath)，向他們解釋自己針對德意志民族的未來所擬定的策略，可以如何解決德國的「空間問題」。希特勒認為，德意志民族的數量與種族完整性，使他們「有權利擁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因此德意志民族的未來，「完全取決於能否解決空間需求」。希特勒表示，海外殖民地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在歐洲找到更有用的原料產地，就在與我們接鄰的地方。」大英帝國已經衰弱，不可能出手干預，少了英國，法國也不會有意見。希特勒告訴與會者，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這兩個國家可以提供空間，可以多養活五百萬到六百萬德國人，如果國際環境許可，那麼合併這兩個國家的時間大概會在一九三八年。軍方與外交部長對此不表樂觀，他們擔心這麼做會危及德國迄今為止在經濟與軍事上復甦的成果。<sup>91</sup> 軍事高層與紐賴特的冷淡反應引發了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軍事高層遭到撤換，戰爭部也被廢除。希特勒親自擔任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並且創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這個特殊機構以鞏固自己的新地位。外交部長紐賴特遭到解職，職位由納粹黨外交事務發言人李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接任。經濟部長沙赫特依然認為進一步重新武裝將帶來風險，此外也不願意放棄在非洲取得殖民地的主張，最後沙赫特也遭到撤職，由黨的新聞官、對戈林唯命是從的馮克 (Walter Funk) 接任。<sup>92</sup>

儘管希特勒終於清楚說明了他的新方向，但這套策略該如何實行依然充滿不確定性。希特勒知道德國能否擴張完全取決於其他大國的態度，以及這些大國是否會因為忙於因應日本、義大利或蘇聯的威脅而無暇顧及德國。但最後希特勒還是決定在一九三八年這個時間點動手。霍斯巴赫會議結束後一個月，陸軍接獲命令，要求擬定應變計畫，準備占

領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判斷情勢對德國有利，決定採取行動。沒有人能預料得到這項行動會產生什麼後果，也就像進軍萊茵蘭一樣，希特勒在決定前也曾感到猶豫。最後，奧地利終於在戈林的帶頭脅迫下屈服，並於三月十二日允許德軍進駐。德奧合併沒有引起嚴重的國際關切，促使希特勒馬上開始下一項計畫。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召開軍事高層會議，批准了「綠色計畫」這項臨時計畫，也就是入侵與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參謀總長貝克將軍（Ludwig Beck）提到希特勒對眼前時機所做的評估：「俄國不會參與，俄國還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波蘭與羅馬尼亞擔心俄羅斯派兵支援，因此不會採取行動反對德國。英國此時正顧慮東亞，因此只會採取謹慎態度。」希特勒認定這是採取行動的大好良機：「機會稍縱即逝.....現在必須閃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中歐採取決定性的強迫行動，就像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一樣，等於是昭告世人，德國已經無視舊的國際秩序，而想單方面地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接下來發生的事眾所皆知。英法出面干預並於九月三十日訂定《慕尼黑協定》，允許德國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大部分由德國人居住的地區。雖然希特勒想打一場速戰速決的帝國戰爭，特別是要媲美日本與義大利進行的戰爭，但發生在歐洲的危機顯然要比遙遠的滿洲與衣索比亞更能引起國際關注。九月二十七日，英國首相張伯倫派赫拉斯．威爾遜爵士（Sir Horace Wilson）前往德國向希特勒解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將導致戰爭。次日，在戈林與紐賴特的勸說下，希特勒勉為其難地同意以分階段的方式併吞捷克。一些高階將領對於希特勒的冒進感到憂心，於是從一九三八年秋天開始籌畫政變，打算推翻希特勒的獨裁政權，不過這場政變一直要等到六年後、德國經歷數次重大戰役失敗之後才得以實現。最後，希特勒決定放棄發動這場小規模戰爭而接受了妥協方案。

十月一日，德軍兵不血刃進駐捷克蘇台德（Sudeten）德意志人居住區。捷克人必須承認另一半國土上的斯洛伐克人擁有實質自治權，而且必須與德國簽訂不平等的經濟協定。六個月後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捷克總統哈卡（Emil Hácha）被召喚到柏林，在被德國領導人施加了沉重而難以抵抗的壓力之後，德軍進駐了布拉格。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在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省建立保護國。斯洛伐克則淪為傀儡政權。

這類併吞帶有明顯的帝國特徵，只不過這種帝國主義與二十年前統治過相同地區的傳統帝國（奧匈帝國）的帝國主義大不相同，更類似於歐洲在海外施行的帝國主義。即便是舉行公投且幾乎無異議同意併入大日耳曼國的奧地利，仍無法逃脫被後者這種帝國主義統治的命運。奧地利人發現自己必須接受並非由自己制定的法律體制統治，而德國將奧地利改名為「東部邊疆」（Ostmark），也正好呼應了一九一四年之前德國提出的內部殖民概念，當時用來內部殖民的地區就叫做東部邊疆。奧地利的過去遭到毀滅，被德國的現在取而代之。同樣地，蘇台德區透過《慕尼黑協定》併入大日耳曼國之後，當地說德語的民族主義者想建立蘇台德自治區的梦想也化為泡影。在捷克，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保護國形同日本的滿洲國：由德國主掌捷克的外交與國防事務，設立負責警察事務、地方行政與執法的各區行政長官（Oberlandräte），一切完全聽命於柏林政府。捷克政府依然被保留下來，首長仍是前總統哈卡，其職責是維持保護國的日常政務運作，但根據三月十六日法令，捷克政府的一切活動都必須與「德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需要一致」。一萬名德國官員被派到當地，負責監督四十萬名捷克官員。<sup>93</sup>軍方進行分層監督，分別對關鍵戰略資源、民防、新聞媒體與政治宣傳、徵召捷克德意志人入伍進行管理。在所有被兼併的地區與保護國，公民身分的取得是以種族為依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人只能成為臣民，這點與衣索比亞一樣。

在奧地利與蘇台德區，德意志人可以取得公民身分，猶太人與非德意志人則被歸類為臣民；在保護國，捷克籍的德意志人可以申請德國公民身分（但有可能不被批准），捷克人依然屬於保護國的臣民身分，至於猶太人則連這種有限權利也喪失了。與捷克人結婚的德國人將喪失公民身分，這等於變相鼓勵保護國進行種族隔離。公民與臣民分別接受兩種不同的法律體制統治：公民遵守的是德國法，捷克人遵守的是總督公布的法律與命令。捷克的抵抗運動遭到像義大利在衣索比亞、日本在中國一樣無情的鎮壓。<sup>94</sup>

無論是在奧地利、蘇台德區或保護國，關鍵的經濟資源都被德國國有企業或德國銀行接收，黃金與外匯，無論是國家所有還是猶太人私人所有，都被德國中央銀行沒收充公。<sup>95</sup>關鍵機構是「戈林帝國工廠」

（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這是一家設於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國有企業，以國家力量控制德國的鐵礦供應。戈林帝國工廠強迫私人企業賣出股份，以此快速控制了奧地利重要的鐵礦產地與機械工程產業。德國在併吞蘇台德區之前，已在四年計畫中將該區重要的礦場標定出來，併吞該國後戈林帝國工廠立刻控制了褐煤供應，褐煤在當時可用來生產合成燃料油，其生產重鎮在布呂克斯（Brüx）。<sup>96</sup>保護國提供的不只是額外的礦藏資源與數量龐大的鋼鐵廠，還有歐洲重要的武器生產商斯柯達（Škoda）與捷克軍火工廠。到了一九三九年底，戈林帝國工廠已經擁有能夠控制這兩家公司的股份。在德國，早在希特勒獨裁政權成立之時，就已經立法將猶太人的商業利益「雅利安化」，因此奧地利猶太人或捷克猶太人擁有或部分持有的公司此時也無法倖免於難，紛紛被沒收充公。羅斯柴爾德（Louis Rothschild）被德國占領者脅持做為人質，被迫簽署文件，把保護國境內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龐大財產轉讓給德國之後才得以獲釋。戈林帝國工廠的資本資產最終達到五十億帝國馬克，是德



國第二大企業化學巨擘法本公司的五倍以上。德國獲取的這些資源，就像日本控制的滿洲國資源一樣，有助於維持龐大的軍事生產，而且這一切都能在封閉的經濟區內進行，這個經濟區不僅完全由柏林控制，還提供了殖民剝削的資本。<sup>97</sup>

兼併後的奧地利與捷克並不完全符合希特勒理解的「生存空間」。雖然希特勒在霍斯巴赫會議上提到要從奧地利驅逐一百萬人，從捷克斯洛伐克驅逐兩百萬人，但實際上的人口轉移主要是德國、奧地利與捷克之間的猶太人。德國占領奧地利與捷克之後，明白宣示了種族重塑計畫，猶太人紛紛外逃，總數約有五十萬人。管理新領土的德國官員經常討論接下來的政策應該是要根據種族同化原則還是種族隔離原則。二戰爆發之後，希特勒政權開始思考把所有無法被「日耳曼化」的捷克人驅逐出去，估計數量達到總人口的半數，同時把保護國視為德國人移民墾殖的地區。<sup>98</sup>當局一開始先小規模地奪取捷克農民的財產，把他們的土地交給德國人開墾，之後規模愈來愈大。到了一九四五年，總共已有一萬六千處占地共五十五萬公頃的農地遭到沒收。<sup>99</sup>

我們不清楚希特勒是在何時決定把波蘭當成下一個東方生存空間。直到一九三八年底為止，德國人仍認為波蘭人是德國領導的反蘇維埃陣營的潛在盟友，他們相信波蘭人即將歸還從《凡爾賽條約》取得的德國土地與自願成為德國的衛星國。然而波蘭政府屢次拒絕德國興建穿越波蘭走廊的域外鐵路與公路，也反對讓國聯管理的但澤自由市回歸德國，希特勒因此決定對波蘭發起他在一九三八年未能如願的小規模戰爭，以武力奪取波蘭的資源。波蘭擁有西利西亞這塊蘊含豐富煤鐵礦的前德國領土，此外也有廣大的土地供德國人墾殖，農業生產剩餘也足以養活德國人口。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在會議上把攻打波蘭的意圖告知軍事高層：「但澤不是這次行動的目標。我們真正的重點是在東方

取得足夠的生存空間，確保我們的糧食供給。」希特勒又說，糧食供給只能來自於東方，因為東方人口稀少，德國的農業技術將使東方的農業生產力增加數倍。<sup>100</sup>

然而，就像一年前的捷克危機一樣，對波蘭發動戰爭也可能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干預。如果波蘭默默接受德國的威脅，那麼希特勒應該也會同意繼捷克之後讓波蘭成為第二個保護國。然而狀況與希特勒的預期正好相反。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底，英法已公開表示要維護波蘭的主權完整。整個夏季，德國軍方審慎備戰，外交人員則試圖離間波蘭與英法，以及英國與法國之間的關係，皆未能成功。德國對內宣傳，鼓動民眾支持對波作戰，阻止波蘭對境內德意志人施加暴行，並以此做為入侵波蘭的藉口。由於英法對波蘭的支持十分堅定，希特勒試圖與蘇聯簽訂協定，確保蘇聯不會與英法共同阻礙他的小規模戰爭。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兩國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以此向周遭人士證明，西方國家絕對不敢干預這場戰爭。雖然許多人認為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尋求的是一場全面戰爭，因為重新武裝的成本對脆弱的德國經濟造成沉重的負擔，希特勒必須趕在德國經濟崩潰之前趁早對西方發動戰爭，然而幾乎所有證據都指出，希特勒想進行的是一場局部性戰爭，用來支持在東方擴展生存空間，而非與英法兩大帝國發生嚴重衝突。希特勒希望能為十年來建設帝國的行動劃下句點，而非延長戰事使其擴大成為世界大戰。<sup>101</sup>希特勒顯然具有奪取更多土地與資源的經濟動機，但這一經濟動機不等同於想在此時此刻發動世界大戰，因為一旦真的發生大戰，他獲取的額外資源也會消耗殆盡。希特勒有預想過大戰應該會發生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屆時德國已完成重整軍備計畫。<sup>102</sup>八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只授權進行有限的經濟動員，目的是進行局部與短期的衝突。他是直到英法宣戰後，才下令德國經濟總動員。<sup>103</sup>

隨著計畫入侵的日期逐漸逼近，風險也開始升高。希特勒再度猶豫。入侵原訂八月二十六日展開，卻因為傳出英國與波蘭締結軍事同盟的消息而推遲，此外義大利也表示如果德國發動的是全面性戰爭，那麼義大利將不會依照五月簽訂的《鋼鐵條約》（Pact of Steel）與德國並肩作戰。從倫敦傳來的情報顯示，這次英國將不會是虛張聲勢。<sup>104</sup>希特勒最後還是克服內心的疑慮，於八月二十八日下令進軍，戰役預計在九月一日清晨開始。希特勒長久以來一直相信英國與法國正走向衰敗，加上這兩個帝國在面對日本在東亞與義大利在東非的野心時毫無作為，更讓他堅信，一旦德軍入侵波蘭能勢如破竹，英法自然就會找個藉口放棄波蘭。希特勒的一名副官提到，希特勒清楚表示他想與波蘭交戰，但「不想與其他國家為敵」。二戰之後，戈林信誓旦旦地向審問他的人表示，希特勒相信他能與西方就波蘭問題達成協議，就像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樣。「就我們來看，」戈林說道：「他實在太堅持己見。」<sup>105</sup>希特勒不願接受任何與他觀點相反的建言，因為他不希望自己在首場帝國戰爭中顯露出他在領導統御上的瞻前顧後與過度焦慮。希特勒對他的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說道：「我最終決定不要仰賴他人的意見，這些人已經有好幾次給過我錯誤的建議，我必須仰賴自己的判斷，從過去的例子〔從萊茵蘭到布拉格〕可以證明，我的看法比那些能力超群的專家好得多。」<sup>106</sup>

希特勒獨排眾議做出這項大膽的決定，與一九三五年的墨索里尼有很多類似之處，當時許多人也曾勸告墨索里尼不要冒險入侵衣索比亞，但墨索里尼完全不理會那些膽怯的忠告。與墨索里尼的非洲冒險一樣，希特勒在戰前努力重整軍備，要他放棄戰爭並非易事。許多德國軍事將領對於入侵波蘭樂見其成，他們認為這是一戰之後（這些將領有許多人曾參與過東線戰役），德國首次重新向東方發展。部分從一戰戰場復員

的士兵曾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參加過自由軍團（Freikorps），在戰後的新德波邊界與波蘭人奮戰，這次入侵波蘭讓他們再有機會重新上戰場。波蘭被視為「只存在一季的國家」，是和平條約的私生子，是未來供德國墾殖的地區。<sup>107</sup>一九三九年春天，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Franz Halder）在軍事學院演說時表示，他「鬆了一口氣」，因為對波戰爭終於排上了時程，他又說：「我們不只要擊敗波蘭，還要愈快消滅波蘭愈好。」<sup>108</sup>一九三九年夏天，德國士兵接到訓示，他們面對的敵人「既殘忍又狡猾」。武裝部隊一份關於波蘭人的報告指出，波蘭農民「殘忍野蠻、毫無信義且滿口謊言」。哈爾德認為波蘭士兵是「歐洲最蠢的士兵」，德國軍官也輕信任何反波蘭的偏見。在入侵前夕，一名步兵師將領告訴他的士兵，波蘭阻擋德國往「古日耳曼土地」擴張，因此波蘭的毀滅是必然的，「這是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sup>109</sup>希特勒同樣不認為即將來臨的戰爭是一場傳統的強權衝突，而是一場對抗野蠻敵人的戰爭，絕不能留情。八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告訴軍事將領，這場戰爭必須「極其殘酷暴力，不能有任何憐憫之心」。同日稍晚，希特勒又表示，必須將波蘭人從土地上徹底消除，「將上面的人清理乾淨之後，就可以讓德國人去開墾。」<sup>110</sup>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希特勒下令，隔天早晨開始入侵行動。「英法不會出兵」，他如此向哈爾德保證。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在日記裡寫道：「元首不認為英國會干預。」<sup>111</sup>晚間，德軍展開代號「希姆萊」的軍事作戰，模擬波蘭攻擊德國邊界哨站：親衛隊在霍赫林登（Hochlinden）邊界哨站留下六具穿著波蘭軍服的集中營犯人屍體，同一時間會有人在格萊維茨（Gleiwitz）無線電站用波蘭語發送模糊訊息，並在無線電站留下一名死亡的波蘭犯人屍體。這些都被視為波蘭人侵犯德國領土的「證據」，因此構成德國開戰的理



由。這種手法跟一九三一年日軍破壞滿洲鐵路一樣粗糙。九月一日清晨將近五點時，第一架德軍飛機攻擊波蘭小鎮維隆（Wieluń），同一時間在但澤執行任務的德國訓練艦什列斯威．霍爾斯坦號（*Schleswig Holstein*）也向港內波蘭要塞進行砲擊。對德軍而言，接下來的戰役必須速戰速決，讓西方國家只能面對既成事實。「白色計畫」從四月開始實施，到了九月一日已經有一百五十萬德國士兵駐紮在東普魯士、德國東部與斯洛伐克，此外還有一千九百二十九架飛機與三千六百輛戰甲車支援，絕大多數戰甲車都隸屬於十個摩托化步兵師與五個新創設的裝甲師。這些高度機動的聯合作戰單位擁有數量龐大的戰車，還有轟炸機與俯衝轟炸機深入波蘭境內支援作戰，這些部隊可以做為傳統步行與騎馬部隊的箭頭，當波蘭軍隊被這些裝甲鐵拳重擊之後，再由傳統部隊尾隨其後收割戰果。

波蘭為了避免觸怒德國人，直到當天稍晚才開始對陸軍全面動員。從帳面上看來，波蘭的陸軍沒有比德國遜色多少，至少有一百三十萬人處於備戰狀態，但飛機只有九百架，而且多半是老舊機型，戰甲車只有七百五十輛。<sup>112</sup>波蘭軍方根據傳統的作戰經驗進行戰爭準備，希望陸軍能夠在邊境附近擋住德軍的攻擊，等到全面動員完成之後，再有序撤退到各個防禦據點進行固守。波蘭空軍首先遭到擊敗，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就有半數飛機被毀，剩餘一百架飛機奉命飛往鄰邦羅馬尼亞的基地，以避免全軍覆沒。<sup>113</sup>德軍前進時不斷受到各地波軍的抵抗，但在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已來到距離波蘭首都華沙六十五公里處。很多人會把這場戰爭稱為不對稱戰爭，但實際上並不完全是如此。九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德軍在進入華沙之前於布楚拉河進行了一場激烈戰鬥，德國損失的戰甲車與飛機的數量開始增加。到了九月十七日，在德國要求下，一百萬蘇聯軍隊從東面入侵波蘭，蘇軍根據德蘇祕密簽訂的互不侵犯條



約，占領了條約分配給他們的波蘭領土。波蘭陷入兩面作戰這個極端不利的情勢，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波蘭拒絕宣告華沙為不設防城市，九月二十二日，華沙開始遭到德軍的密集砲轟與空軍轟炸。五天後，華沙投降，波蘭最後一個要塞莫德林要塞（Modlin）於九月二十九日投降。零星戰鬥一直持續到十月初。波蘭軍隊大約有六十九萬四千人被德國俘虜，大約二十三萬人被蘇聯俘虜，另外還有八萬五千到十萬人逃到羅馬尼亞與匈牙利。波蘭軍隊有六萬六千三百人死亡，十三萬三千七百人受傷；德軍有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一人死亡與失蹤，三萬零三百二十二人受傷，大約與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的死傷人數相同。蘇聯紅軍由於面對的是兵力單薄、士氣低落的波蘭軍隊，因此只有九百九十六人死亡，兩千人受傷。<sup>114</sup>儘管德國空軍的數量與水準都遠高於波蘭空軍，但德國飛機仍出現可觀的損失：兩百八十五架遭擊毀，兩百七十九架遭擊傷，約占投入戰鬥飛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sup>115</sup>九月二十八日，蘇聯與德國代表簽訂第二項協定，《德蘇友好合作與邊境劃定條約》。波蘭這個現代國家經過四個星期的抵抗，最後還是無法免於滅亡的命運。

九月三日，英法信守對波蘭的承諾對德宣戰，但這項宣示並未影響德國短期結束戰爭的計畫。儘管如此，英法宣戰當天的德國街頭，與一九一四年德國宣戰全國民眾充斥的熱情完全不同，此時的德國人似乎感到擔憂而面色凝重。只不過希特勒依然自信滿滿，英法宣戰後過了幾個星期，他相信英法只是虛張聲勢，一旦波蘭被德蘇瓜分之後，英法就會找個理由脫身。事實上，西方國家並未給予波蘭軍事或物資援助，只是私底下表示等日後戰爭勝利，波蘭就能復國。

籠罩在希特勒不願見到的大規模戰爭陰影之下，已經在捷克推行的帝國計畫，此時更加無情地在波蘭展開；曾經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大量使用的殖民語言，此時也再度出現，用來定義與合理化對波蘭老百姓的征

服。雖然在西方宣戰後，衝突的性質已經改變，但德國的政策規畫者、安全部隊與經濟官員仍著手建立對波蘭的長期帝國壟殖計畫與因應戰時的各項需求。一名來自東普魯士的德國官員在入侵波蘭當天表示，我們的目標就是「全面殖民」。<sup>116</sup> 弗朗克（Hans Frank）是納粹黨律師協會主席，受命擔任波蘭殘餘領土的長官，也就是波蘭總督。弗朗克把他的轄區當成「殖民統治的實驗室」，雖然柏林當局不願把波蘭稱為殖民地，但弗朗克轄下的經濟局長埃莫里希（Walter Emmerich）卻認為德國的統治是「殖民政策中一種特別的歐洲版本」。<sup>117</sup>

如何安排被占領區的制度，引起了德國當局的熱烈討論。德國將被征服地區臨時劃分成幾個區塊：曾在一九一九年和約中被割讓給波蘭的波森省（Posen），如今改名為新的行政區「瓦爾特蘭」

（Wartheland）；位於北方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前普魯土地區則改為「但澤—西普魯士帝國大區」（Reichsgau）；剩下的領土，包括華沙在內，則併入波蘭總督府，首府位於克拉科夫。上西利西亞於一九二〇年舉行公民投票脫離德國，此時又再度併入德國。上西利西亞的工業資源由德國託管，許多都交由戈林帝國工廠管理監督。總數二十萬六千家的波蘭工業與商業公司被接管與分配給德國私人或國有企業。<sup>118</sup> 瓦爾特蘭與但澤大區是「被併吞的東方領土」，是受到特別管制的邊境地區，與德國其他地區無法自由交流，以避免波蘭人輕易進入帝國境內。以瓦爾特蘭來說，波蘭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擁有壓倒性的多數，反觀德國人只占百分之六點六，在新首府波森更是只占百分之二。<sup>119</sup> 然而，各個大區的新統治階級卻都是德國人。德意志人必須別上用來識別的標章（因為從膚色無法辨識出種族差異）。波蘭人則被當成殖民地的臣民，波蘭人在人行道或小路上看到德國人經過時必須脫帽讓路，波蘭人不許進入德國人專用的戲院與公共建築物。一些德國婦女原本在德國

北方城鎮倫茨堡（Rendsburg）的婦女殖民學校受訓，為未來的海外帝國做準備，但現在卻被派到東方工作，她們學習的技能原本是以非洲人為對象，此時卻變成了波蘭人。<sup>120</sup>波蘭人是臣民，不是公民。波蘭人由各地方的總督統治，總督管理地區政府並且充當中央與地方的連結，地方治安則由希姆萊的親衛隊手下負責。

德國帝國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摧毀倖存的波蘭民族與文化生活，重新塑造整個地區的種族組成。在入侵波蘭之前，希姆萊的副手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就已設立了五支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特別行動隊由大約四千兩百五十名警察與安全人員組成，他們的任務除了維護前線後方地區的治安，更重要的是追捕與處決波蘭的政治、文化與民族主義菁英，他們的行為與義大利軍警在衣索比亞所做的如出一轍。<sup>121</sup>剷除波蘭菁英的目的，是為了讓波蘭社會的整體知識文化水準下降，使其符合「東方」的殖民想像，同時也為了貫徹希特勒在八月時向軍事高層下達的訓令：「摧毀波蘭。」<sup>122</sup>這些特別行動隊發起「坦能堡作戰」（Operation Tannenberg），殺害數萬名波蘭人。確切男女受害人數已無法確知，但估計最多可能達到六萬人。被害者有些是猶太人，但這項政策主要針對的還是波蘭菁英。哈爾德在與海德里希開會後表示：「猶太人、知識分子、教士、貴族，空間清除。」<sup>123</sup>儘管猶太人在這個時期尚未遭到有系統地屠殺，但德國占領下的波蘭猶太人依舊遭到五花八門的方式迫害，如遭到毆打或羞辱，有時遭到殺害，財產被德國官員攫取或遭到德國士兵掠奪。到了十月，許多猶太人被成群送進最早建立的幾個大型猶太區（ghetto，又譯隔都），或者是從被兼併的領土送到波蘭總督府。<sup>124</sup>

德意志帝國的最終理想，是把無法被「日耳曼化」的猶太人與波蘭人從整個殖民地予以「清除」，以德國移民取代。但在理想實現之

前，以「文化捍衛者」自居的新帝國主人「只能」先採取種族隔離與種族打壓的政策。<sup>125</sup>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希特勒任命希姆萊為「強化德國民族性帝國專員」，要求他「用人口取代的方式組織新的殖民領土」。<sup>126</sup>希姆萊長久以來一直支持以德國移民墾殖的方式來開拓東方帝國。希姆萊新職位的頭銜是他自己取的，他在上任後馬上擬定計畫，將波蘭人逐出東方農地，把這些土地交給德國人開墾。為了辨識波蘭人，希姆萊實施了種族登記制度，結果發現波蘭人的外表特徵帶有一定的德意志人血統。希姆萊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表示，他希望建立一個「金髮國度」，不能讓「蒙古人種在新殖民的東方繼續發展」。<sup>127</sup>與一九一四年之前一樣，各種二分法的帝國詞彙，諸如文明與野蠻、熟悉與異國、有文化與沒文化，全都被用來強調差異或「他者」的角色。

### ※ ※ ※

我們該如何理解德國入侵波蘭？傳統觀點認為這是德國想開啟二戰戰端。但若從長期的視角來看，這其實是德國在一九三〇年代為了建立新領土型帝國所採取一系列缺乏協調行動的最後階段。建立新帝國秩序的野心使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的命運緊緊相連，這三個國家都想在各自所在區域建立領土型帝國。德義日三國在歷經多年的民眾不滿與民族挫折之後，逐漸形成建立帝國的民族主義共識，三國的領導高層都反映了這樣的觀點（儘管這一觀點不完全源自於高層推動）。這三個新帝國國家逐漸限縮戰略選項，透過脅迫手段讓國內敵視或批判新帝國主義的人士噤聲，進而冒險取得自己想要的領土。這些帝國主義者獲取的領土愈多，就愈有可能實現重塑全球秩序的長期目標：打造一套由新羅馬帝國、大東亞帝國與中東歐日耳曼帝國領導的新秩序。結果，這一野心卻



使三國面臨戰略困境。諷刺的是，帝國計畫原本是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最終使宗主國的民眾富足，但與絕大多數帝國主義一樣，這些計畫反而帶來更高的風險與成本。這三國的領導者認為值得冒險一搏，因為舊國際秩序似乎已在崩潰邊緣。換言之，如果當時其他大國能在一開始就對滿洲、衣索比亞與捷克遭到入侵進行干預，那麼世界局勢很有可能就會遭到改寫。

所有帝國擴張都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擴張一旦開始便難以停止。新的征服會產生難以逆轉的動態效果，就像一九一四年之前絕大多數帝國建立的過程一樣，對外征服只會引發更進一步的衝突。日本攫取滿洲，反而促使日本更進一步鞏固自己在華北的戰略利益，最終引發與蔣介石國府政權的大戰。義大利順利占領衣索比亞，刺激了墨索里尼的胃口，任何能以相對較小代價取得的殖民地都讓他躍躍欲試。希特勒尋求生存空間，但他眼中的生存空間顯然是個伸縮自如的概念，只要一有機會就會無限延伸，入侵波蘭最終使他捲入了他不想面對的國際大戰。日本與德國都對於蘇聯未來的威脅感到憂慮，然而兩國的對外擴張卻適得其反地取得與蘇聯接壤的漫長邊界。以日本來說，結果就是在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夏天與紅軍發生兩起嚴重的邊境衝突。一九三九年的衝突以日軍失敗告終，但當時歐洲的局勢動盪不安，雙方都不想引發全面性的戰爭，兩國因此於九月十五日簽訂停火協定。<sup>128</sup>希特勒藉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延緩與蘇聯的潛在衝突，但他知道德國占領波蘭之後便與蘇聯有了共同邊界，而這個邊界不可能長期維持。除此之外，位於遙遠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正注視著新帝國的擴張，其態度也難以預測。義大利、德國與日本的共同連結在於三國都不願意放棄到手的領土。對這三個國家來說，這些領土是透過征服取得的成果，這些「鮮血的犧牲」可不能像一戰後那樣遭到放棄。除非發動大規模戰爭，否則其



他國家不可能將這些新帝國主義者逐出其新領土。領土至上原則因此是一把雙面刃，帶來禍福相倚的結果。

## 英法走向二戰的曲徑

二戰的最終爆發，其實是倫敦與巴黎當局的決定，是英法決定對德宣戰，而非反過來。希特勒希望鞏固征服波蘭的成果，完成德國對中歐與東歐的支配，他不願與兩個西方帝國爆發大戰。然而事與願違，一九三九年的英法已有足夠的信心，兩國自認軍事與經濟力量長期而言可以擊敗德國，而且兩國民眾過去十年來一再面臨類似的重大國際危機，因此已逐漸相信唯有重拾一九一八年的路線再次與德國開戰，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對英法來說，一旦宣戰，後果將會比德義日三國進行的小規模侵略戰爭更加嚴重，因為英法的戰爭將會是一場全球戰爭，勢必衝擊它們分布在各大陸的帝國利益。更不用說英法面對的威脅不僅限於一個戰場，而是三個戰場。而英法之所以首先針對德國，部分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波蘭危機，但主因還是英法這兩個一戰戰勝國認為一九一九年和約留下的待解難題，使得第二回合的歐洲戰爭無可避免。兩國都希望戰後能建立更具韌性的國際秩序，使歐洲與歐洲殖民帝國的和平都能獲得永久的保障。

這是英法兩國在忍受長年動盪後做出的決定，但在一戰的慘痛經驗下，這依舊是一項極為困難的重大決定。雖然德義日的領導高層預料未來將與挑戰自己帝國野心的國家發生嚴重衝突，卻也都不希望這場衝突在一九三〇年代發生。另一方面，英法的政治家則深信，如果爆發新的大戰，那就將是一場全新的「總體戰」，更加致命，代價也更加高昂，

因為新武器殺傷力更強，戰爭對經濟穩定也將帶來更深刻的威脅。因此，只有在帝國安全與民族存續遭受嚴重且無可挽回的威脅時，英法才認為有理由開戰。英法認定軸心國的日趨好戰與軍事成長都是針對自己而來，是一九一四年強權爭霸的延續。然而，德義日三國對戰爭的看法卻與英法不同，它們對戰爭抱持著功能性的觀點，認為戰爭是帝國為了確保區域支配的必備手段。德國是軸心三國中最令英法恐懼的，不只是因為德國潛在的軍事與經濟實力，更是因為希特勒本人體現了對西方文明觀與價值觀的敵視。整個一九三〇年代，西方主要民主國家都希望自己對危機的判斷是錯誤的，也希望自己反對的那些新世代威權政治家能跟自己一樣厭惡一戰的可怕流血衝突重演，因此不會做出英國政治人物喜歡形容的「瘋狗行為」。<sup>129</sup>這些是英法的主要關切，也解釋了兩國處理一九三〇年代國際危機時何以採取謹慎態度，以及到了一九三九年終於必須面對災難時，兩國為何最終做出了宣戰的決定，無論這項決定將造成什麼後果。

英法政府不願在一個世代內裡發起第二場世界大戰，這樣的猶豫心態也反映在廣大民眾身上。在戰間期，英法兩國的輿論都對「以戰爭解決未來衝突」的心態抱持敵意，害怕戰爭可能造成的後果。民眾對戰爭的憂心遍及各年齡層，從曾經歷過壕溝戰而不想再看到任何戰爭的退伍軍人，到一九三〇年代的年輕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對他們而言，和平是一項政治承諾。就算絕對的和平主義（在法國稱為「完整和平主義」）只占反戰運動的一小部分，但絕大多數人依然反對開啟新戰端。最主要的反戰團體是英國國際聯盟聯合會，名義會員有一百萬人，該會在英國各地鼓吹和平，反對戰爭威脅。一九三六年，和平主義會議在布魯塞爾盛大召開，會中決定整合西歐的反戰團體與和平主義團體，共同推動國際和平運動；這場運動的英國代表是塞西爾勳爵（Lord

Cecil)，他是國際聯盟聯合會主席，也是體制內的重要人物。<sup>130</sup>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反戰的遊說團體持續推動和平方案。英國全國和平會議於一九三八年進行請願，要求召開「新和平會議」，他們後來還趕在英國首相張伯倫發表歷史性宣告，表示英國將保證波蘭主權完整的前幾天，蒐集了一百萬份和平連署書呈交給英國政府。<sup>131</sup>反戰運動之所以廣獲支持，主要是因為民眾普遍相信未來的衝突必將針對平民進行攻擊，包括使用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空襲、毒氣戰乃至於細菌戰。對於空襲的恐懼如此強烈，使英法部分政治人物甚至為此表示，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爆發全面性戰爭，特別是針對德國，否則結果將是脆弱城市遭到毀滅性的空襲。<sup>132</sup>從一九三八年四月開始擔任法國總理的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同樣認為轟炸是「對文明本身的攻擊」，他的外交部長邦內（Georges Bonnet）是和平主義的忠實支持者，邦內在一九三八年召開慕尼黑會議前表示，「戰爭時的空襲」將導致革命爆發。<sup>133</sup>捷克危機前夕，張伯倫告訴內閣，當他從德國飛回英國且行經倫敦上空時，他想像德國的高爆炸藥與毒氣彈像冰雹一樣落在首都時的景象：「我們絕不能忘記，今日戰爭對於全國每一位民眾的家都構成直接威脅。」<sup>134</sup>

英國與法國這兩個帝國在全球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加上戰爭可能造成龐大花費與風險，使兩國對於再度開戰興趣缺缺。我們也不能忘記，英法雖然是國聯體系的領袖，而且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為止仍是世界上軍力最強大的強權，但兩國畢竟與一九九〇年代的美國不同：英法相對而言是正走入衰退的國家，不僅在全世界都擔負義務，在國內也有不滿的選民不願輕易支持戰爭，兩國經濟才剛從經濟衰退中逐漸恢復，因此任何將資源移轉到大規模軍事支出的決定都必然導致社會需求的犧牲，難以符合國內民眾對經濟發展的期待。在這種狀況下，要維持既有

國際秩序與帝國安全，又要避免大戰，就必須採取極為複雜的平衡手段。與德義日這三個侵略國不同，英法可以從既有世界秩序獲得許多既得利益，所以即便在當時與今日都有許多人批評英法應該積極干涉，但若兩國真的早一步對這波新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反而會讓人感到驚訝。畢竟對於英法這兩個全球帝國來說，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裡貿然放棄和平發動戰爭，冒的風險實在太大。英國海軍參謀總長在一九三四年表示：「我們已經取得世界絕大部分地區，或世界上最好的地區，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守住已有的一切，阻止任何人奪走。」<sup>135</sup>一九三六年，當英國國會討論是否要將坦加尼喀（Tanganyika）託管地交還給德國時，當時的殖民地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反對，他認為「所有領土移轉都存在著巨大的道德與法律障礙」。<sup>136</sup>一九三八年的英法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眾都反對讓渡海外領土，高達百分之七十八的英國受訪者寧可戰爭也不願放棄任何英國託管的前德國殖民地。當義大利要求取得突尼西亞與科西嘉時，法國總理達拉第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公開回應：法國「寸土不讓」。<sup>137</sup>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的極端危急時刻，英法兩國才考慮放棄領土以換取義大利在法國戰役保持中立。儘管如此，當英國戰時內閣討論是否要將馬爾它交給義大利時，多數人依然反對，雖然差距只有一票。<sup>138</sup>

儘管英法在一九三〇年代不斷強調帝國統一的重要性，以及各種形式的帝國統治可以帶來的利益，帝國的海外領土依然是造成內外部麻煩的源頭。好比英法在中東的託管地與法屬北非持續爆發阿拉伯人的抗爭。英國在一九三二年同意讓伊拉克託管地自治（但英國仍擁有非正式的控制權），又在一九三六年與埃及簽訂條約，承認埃及實質獨立與兩國共管蘇伊士運河。英國還需要在巴勒斯坦維持兩個師的部隊編制，以鎮壓阿拉伯人暴動或遏止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巴勒斯坦問題

是英國戰間期面臨的最大軍事衝突，英國的強硬鎮壓導致阿拉伯人至少有五千七百人死亡與兩萬一千七百人重傷，安全部隊不經審判便囚禁民眾與恣意進行拷問。<sup>139</sup>在印度，英國也在一連串暴亂與暗殺之後實施了「戒嚴法」，更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高壓統治時期逮捕了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反對者入獄，政治犯的總數達到八萬人。面對罷工與抗爭，殖民軍警的因應方式就是開槍。一九三一年三月在孔坡（Cawnpore）有一百四十一人被殺，一九三五年三月在喀拉蚩（Karachi）有超過四十七人被殺。<sup>140</sup>印度最終於一九三五年獲得有限自治，但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獲得投票權，主張完全獨立的印度國大黨雖然獲得國會多數，但依然對現狀感到不滿。英國在非洲與加勒比的殖民地受到經濟衰退重創，頻繁爆發罷工活動與勞工抗爭，此外還有坦加尼喀、北羅德西亞、黃金海岸與千里達需要治理。在非洲銅礦帶，一九三〇年代中葉的罷工潮導致許多工人被殺；一九三七年在加勒比殖民地巴貝多也出現民眾抗議經濟艱困，結果有十四人被槍殺與遭刺刀捅死。<sup>141</sup>

帝國內部的抗爭，部分來自於一九一九年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對於民族主義者，帝國有時以讓渡有限主權的方式進行攏絡，如伊拉克或伊朗，有時則以簡易程序加以逮捕，打壓反帝國組織與出版品，如一九三九年法國針對整個帝國發布戒嚴令。除此之外，許多窮困工人與農民的抗爭都被歸咎於當地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帝國對於共產主義者的打壓一向不遺餘力，往往毫不留情地予以流放、囚禁與壓迫。<sup>142</sup>共產主義是一種國際運動，在意識形態上致力於終結殖民帝國，這也是為什麼英法對於共產主義如此焦慮。當英國空軍部於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開始計畫「理想」的遠程轟炸機時，軍方考量的依據不是德國的威脅，而是與蘇聯的可能衝突：要讓飛機能夠從大英帝國的空軍基地起飛，轟炸蘇聯的



城市與工業區。這種長距離轟炸也有助於「帝國鞏固」，對抗共產蘇聯的威脅。<sup>143</sup>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也能夠解釋英法對西班牙內戰的矛盾態度：兩國選擇了不干預政策，不對民主的共和政府伸出援手。由於民眾普遍害怕全面戰爭，加上全球帝國遼闊，難以適當地因應外來威脅與內部的政治抗爭，因此減少風險便成了一九三〇年代英法的戰略核心。

這種避免風險的策略，經常被後世定義為「綏靖主義」（appeasement）。然而，正如綏靖主義的支持者英國首相張伯倫日後所言，這是個不幸的詞。每當西方回應獨裁政權的方式遭受批判與帶有敵意的分析時，「綏靖主義」一詞往往就會成為替罪羊；只要西方未能以堅定態度回應安全威脅，也會被冠上綏靖主義。<sup>144</sup>然而，用綏靖主義形容英法一九三〇年代的戰略其實是嚴重的誤解。首先，綏靖主義意謂著英法之間有著共同利益，兩國負責戰略判斷的官員、政治人物與軍方有著共通的想法。但在實際上，當時並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綏靖主義政策。英法的政策反映出兩國的各種假定、希望與期待，回應情勢變化而隨之調整。政治決策者有各式各樣的選項，但目標都是為了維繫英法戰略的關鍵要素：帝國安全、經濟力量與國內安定。事實上，我們其實更適合用二十年後冷戰時期常見的兩個詞來描述一九三〇年代的英法戰略，那就是「圍堵」（containment）與「嚇阻」（deterrence）。<sup>145</sup>英法在一九三〇年代處理國際問題的方式並非軟弱無能或一味推卸責任，而是持續努力解決（儘管有時前後矛盾）與日俱增的國際不安與維持帝國現狀。

圍堵有多種形式，從法國在東歐維持的同盟體系，到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協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對德國海軍軍備加諸的限制，都能算是圍堵的展現。我們今日或許會把圍堵視為一種「軟實力」。經濟特許或協定也是圍堵策略的重要部分，而貿易協定或

借款通常能緩和潛在敵人的敵意或贏得友好關係。英國尤其認為，歐洲若想達成全面的和解（張伯倫稱之為「大和解」），列強就必須坐下來一起修改《凡爾賽條約》與之後的各項協定。雖然這項想法從未經過嚴格檢驗，但它顯示英國願意有彈性地修改戰後秩序，前提是各方必須在相互接受的基礎上進行協商。在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圍堵觀念反映在他的「世界新政」（New Deal for the World）之上：他認為唯有孤立侵略國後，才能以和平手段進行協商。一九三〇年代的西方試圖圍堵危機，但終告失敗，西方國家不斷嘗試要控制德義日造成的損害，反而引起這三個國家的憎恨不滿，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日趨惡化。這一切光用「綏靖主義」一詞並不足以形容箇中的複雜。<sup>146</sup>

在羅斯福主政下，美國政府也傾向於圍堵新帝國主義者，而美國的首要目標在於防止新帝國主義者入侵西半球。羅斯福出乎意料地嚴肅看待日本或德國入侵的可能，他認為這兩國可能經由中美洲與南美洲威脅美國。防衛西半球因此成為美國最重視的戰略，因為這項戰略讓美國既不用積極向海外派兵，又能滿足國內孤立主義的輿論。孤立主義政治人物在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七年在國會推動《中立法案》（Neutrality Laws），限制總統的權限，但《中立法案》並未限制美國對西半球的威脅進行圍堵，因此一九三八年的《文森法案》（Vinson Act）才得以將美國海軍規模擴充到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的上限。<sup>147</sup>美國擔心德國飛機可以從南美洲起飛轟炸巴拿馬運河，也憂慮日本人可能出兵奪取運河，於是擴充巴拿馬運河的美軍基地，最後總計設置了一百三十四處陸海空軍事設施。<sup>148</sup>美國為了反制日本與德國在西半球進行政治宣傳與獲取經濟利益，於是資助親美報紙與搶先購買侵略國需要的稀有原料。在巴西，關於德國可能併吞巴西德裔居民居住區的傳言甚囂塵上，華府於是與巴西簽訂武器協定，之後又於一九四一年保證協助巴西抵禦

任何外來威脅。<sup>149</sup>然而這些措施與協定都與干預世界衝突無關，因為美國在海外並無託管地。一九三六年，美國首次進行的實驗民調顯示，百分之九十五的受訪者希望美國遠離所有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只有百分之五的受訪者願意協助英法。<sup>150</sup>

圍堵的另一面是嚇阻。早在核子僵局出現之前，一九三〇年代已經廣泛使用嚇阻一詞。一九三九年波蘭危機前夕，張伯倫對他妹妹說的一句話就總結了嚇阻的意義：「你不需要充足的進攻兵力來贏得非凡的勝利，只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讓進攻方不可能取勝，或即便能夠取勝卻得不償失。」<sup>151</sup>整個一九三〇年代，英法兩國都從原本僅有有限的軍事支出，轉換成大規模與昂貴的軍事準備。英法的重整軍備不是因為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才突然做出的回應，這項政策至少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經開始，而且在國內遭受強烈的反對。一九三六年之後，英法重整軍備的速度開始加快。英國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已經察覺到來自各方的潛在威脅，促使他們進行大規模重整軍備。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設立的國防需求委員會於一九三六年提出建議，為了防衛帝國就必須大幅增加軍事支出，而且必須優先擴充皇家海軍與建立一支可攻可守的強大空中武力。英國推動了為期大約四年的計畫，軍事支出從一九三六年的一億八千五百萬英鎊，增加到一九三九年的七億一千九百萬英鎊。英國情報單位認為，英德至少要等到一九三〇年代末才有可能開戰，因此英國與德國國防支出的增加都呈現相同的上升軌跡：只不過英國是從一九三四年就開始提升，甚至比德國還早。<sup>152</sup>

除了本土防禦，英國也針對海外領土做準備。英國軍隊駐紮在整個中東地區，包括伊拉克、約旦、埃及、賽普勒斯與巴勒斯坦。埃及的地位尤其重要，蘇伊士運河更被視為「帝國的中心」，因為運河是聯絡英國歐亞領土的海上樞紐。一九三六年的《英埃條約》允許英國在蘇伊士

運河駐兵一萬人，並以亞歷山卓港做為海軍基地。為了防守大英帝國位於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領土（大約占了大英帝國領土的七分之五），英國國會於一九三三年批准在新加坡興建大型海軍基地，耗資六千萬英鎊，於五年後完工。<sup>153</sup>在日本大舉入侵中國下，遠東的局勢構成更大的挑戰，要在香港防禦日軍顯然是不可行，但英國持續借款與提供物資給中國軍隊，使英國得以進行所謂的「代理人戰爭」來捍衛英國與中國的利益。<sup>154</sup>儘管如此，對於在日軍威脅下逐漸陷入孤立的澳紐來說，這些防禦投資並不能緩和紐澳兩國的焦慮。但英國別無選擇，海外領土的幅員廣大，英國即使不斷加強防衛兵力，但分攤到帝國各地的結果，只是讓軍力更形單薄。

法國也在一九三〇年代大舉擴軍，法國的陸軍規模遠大於英國，海軍也相當可觀。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使法國縮減軍事支出，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在德國重新駐軍萊茵蘭的刺激下，法國新選出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結合左翼與中間偏左政黨）政府決定推動大規模重整軍備計畫，就像英國與德國一樣，法國計畫在一九四〇年達到軍力的巔峰。法國的軍事支出從一九三六年的一千五百一十萬法郎增加到一九三九年的九千三百六十萬法郎。對法國來說，首要之務是建立馬奇諾防線，並在防線上駐軍與設立軍事設施。法國相信建立馬奇諾防線是必要的，因為法國與德國的人口有一段差距。對於部署在馬奇諾防線以外的陸軍，法國總司令部根據一九一八年成功擊敗德軍的戰役發展出一套理論。這套理論以強大火力為中心，主張以強大火力協助攻擊或壓制來犯敵軍，並且由機動性有限但仍被視為「戰爭之后」的步兵逐步占領土地。火力運用是一種「有序戰爭」（methodical battle），需要高度集權與依照上級指示行事。在這種戰爭邏輯下，戰車與飛機只是輔助性武器，是戰爭的配角，而非用來進行機動戰。大砲與機關槍是作戰關



鍵，步兵只會在「彈幕」掩護下前進。<sup>155</sup>這種作戰理論是以法國本土做為預設戰場，這意謂著法國決策者有意忽略帝國海外領土，因此殖民地必須負擔自己的國防支出。阿爾及利亞人必須支付二億八千九百萬法郎，來為凱比爾港海軍基地換裝現代化設施；印度支那完全未設置任何重要的海軍基地，時任海軍總司令的達朗海軍元帥（François Darlan）否決了在金蘭灣興建潛艦基地的計畫。達朗明白表示，法國沒有能力在開戰後保護位於亞洲的海外領土。<sup>156</sup>

嚇阻政策的基本架構可以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危機期間清楚看出，一年後這樣的做法則更加明顯。圍堵與嚇阻是一體兩面，透過這兩種策略，英法不僅可以避免戰爭，還可以維持強大的武力維護自身的全球經濟與領土利益。然而必須一提的是，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之前，英法這兩個重要民主國家就曾數度與新帝國主義國家瀕臨開戰邊緣。英國在中國的華南地區與日軍維持著脆弱的停戰狀態，雙方的緊張關係隨時可能一觸即發；英國也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的衣索比亞危機做好與義大利發生衝突的準備，避免義大利威脅英國在中東與非洲的帝國利益。一九三五年八月，英國派出二十八艘軍艦與勇敢號

（*Courageous*）航空母艦前往亞歷山卓港，藉此警告義大利人不要輕舉妄動。英國也增強了位於中東的英國皇家空軍，並派出更多陸軍增援部隊。當地的英國海軍將領一度打算先發制人，但英國帝國參謀本部與法國政府都想避免戰爭，因為真正開戰反而可能損害帝國在該地區的利益。<sup>157</sup>到了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時，輪到法國有了迅速擊潰義大利艦隊的機會，但這一次是英國出面阻止，因為英國希望以謹慎的外交手段離間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關係。

這種透過達到戰爭邊緣來逼迫對方讓步的「邊緣政策」（brinkmanship），最清楚的例證就是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



機。在慕尼黑會議中，德國的威脅與英法的背叛，迫使捷克政府允許德國占領說德語的蘇台德區，這起事件經常被當成綏靖主義欺瞞與軟弱的明證。但事實上，慕尼黑會議成功阻止希特勒為了取得生存空間而發動戰爭的野心，因為當時希特勒認為與英法發生大規模衝突的風險實在太高。從當時的視角來看，希特勒確實被迫接受英法允許的領土變更，這算是圍堵政策獲得的成果，儘管最後犧牲了捷克的利益。在慕尼黑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星期，英法武裝部隊已經進入警戒狀態。皇家海軍接到動員令，倫敦的公園也迅速挖好壕溝做為臨時空襲避難所。九月二十四日，法國發布動員令，一百萬人進入戰備狀態，不過法國與英國帝國參謀本部都覺得此時透過戰爭恐怕也無法阻止德國，因為重整軍備計畫只進行了一半，而馬奇諾防線也尚未完成。<sup>158</sup>

考慮到軍事動員曾是一九一四年扣動一戰的扳機，因此英法動員一事大為出乎希特勒的意料之外。就在計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幾天，希特勒還向憂心忡忡的軍事將領們保證英法絕不會干預。英法確實擔心就算對德開戰可能也無法取勝，但英法兩國都不想讓德國輕易地入侵與征服捷克。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希特勒「因為張伯倫展現的堅定立場而退縮」，柏林當局對這位英國領導人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sup>159</sup>兩天後，當希特勒也打算跟進下達動員令時，張伯倫派了個人使節赫拉斯。威爾遜爵士向希特勒傳達訊息，威爾遜甚至向口譯員重複兩遍以確保希特勒瞭解訊息內容。威爾遜爵士表示，如果德國攻擊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將依照條約出兵攻打德國。威爾遜又說，在這件事情上「英國基於道義必須支持法國」。<sup>160</sup>希特勒憤怒地表示，若真是如此，那麼歐戰將在一個星期內爆發。話雖這麼說，這場會議卻讓希特勒喪失了信心。第二天早上，法國大使重申立場，表示法國將反對德國入侵捷克。當天稍晚時，戈林帶著一批代表團

前來會見希特勒，藉此詢問希特勒是否無論如何都將發動一場全面戰爭。希特勒回道：「你是什麼意思？什麼叫無論如何？我當然不想發動戰爭！」<sup>161</sup>在這個關鍵時刻，墨索里尼在英國慫恿下向希特勒提議召開會議解決爭端，希特勒雖然感到不悅，但還是同意了這項建議。希特勒的副官在日記裡寫道：「元首不想戰爭」與「元首最不希望的就是與英國開戰」。柏林當局明顯做了讓步。九月二十七日的另一則日記裡寫道：「元首已經讓步，而且是徹底讓步。」兩天後更補上一句：「元首做出重大讓步。」<sup>162</sup>

歐洲成功在一九三八年避免了一場戰爭，不只是因為英法政府害怕戰爭，也是因為希特勒不敢跨過戰爭的門檻。值得一提的是，當英國首相張伯倫會後搭車行經慕尼黑街頭時，受到德國群眾的熱烈歡呼，大家都因為不用開戰而鬆了一口氣。英法也感到如釋重負，認為和平獲得了保全。法國婦女縫製手套給張伯倫，讓他搭機往返英德時不會著涼，巴黎的一條街隨即改名為「九月三十日街」，還有人發明了一種名叫「張伯倫」的新舞蹈，不過發明者原意可能是為了諷刺張伯倫。<sup>163</sup>慕尼黑會議結束後的隔天，法國媒體《時報》（*Le Temps*）表示法國肩負著全球帝國的重任，對和平有著「深刻而絕對」的需要。<sup>164</sup>英法兩國是否可能在一九三八年對德宣戰？這個問題恐怕只能停留在猜測階段，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由於希特勒認為風險太大，英法因此得以免於開戰。當一年後又出現德國威脅波蘭主權的危機，此時的英法同樣接受了可能開戰的現實，但兩國仍希望希特勒能再次在嚇阻下懸崖勒馬。英法在九月一日德國入侵波蘭的前一刻仍然認為，如果兩國能清楚表明開戰的決心，希特勒應該會再次避免冒險。

從一九三八年九月到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這一年間，許多因素出現了變化，使得英法國政府更有信心對德國威脅波蘭之事採取強硬立場。捷

克危機並未導致戰爭，眾人暫時放下心中大石，但張伯倫與達拉第並未因此抱持幻想。兩人明白若希特勒繼續向東歐擴張，兩國必將動用武力加以阻止。然而英法也不排除使用外交途徑或經濟協定，這兩種做法也可能阻止德國進一步擴張，而且英法在一九三九年也確實嘗試過這兩種做法。然而，當德軍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占領捷克並在當地建立保護國時，民主國家已經明白下一步就是戰爭。張伯倫很快就從情報單位得知德國即將攻擊波蘭，於是便於三月三十日在下議院主動提出保證波蘭主權完整的聲明。幾天後，法國也呼應英國的聲明保障波蘭獨立，還另外加上羅馬尼亞與希臘兩個國家。波蘭本身對英國或法國而言並不是那麼重要，也並非英法與德國攤牌的根本原因，幾乎是在偶然之間才成為雙方衝突的觸發點。英法並不知道波蘭曾在一九三九年初拒絕向德國讓步，當時德國要求波蘭歸還但澤自由市與建立「波蘭走廊」使德國能連結前普魯士領土，而波蘭的拒絕促使希特勒於該年四月下令軍事準備，計畫在八月底出兵消滅波蘭。如果德國真的入侵波蘭，那麼英國與法國將不可避免捲入這場戰爭。從捷克危機到波蘭危機這段期間，英法兩國終於同意協調彼此的行動。法國原本在一九三〇年代並不確定英國是否會在歐洲有事時從旁協助，因此在出兵上有所顧忌。一九三九年二月，英法終於同意兩國進行參謀人員對話，並於三月擬定「戰爭計畫」，基本上遵循一九一八年的致勝策略：前三年先透過法國要塞、經濟封鎖與空中行動來壓制德國，希特勒就算不願投降，也將缺乏資源抵抗英法的後續進攻。這項計畫的結論是，只要能夠「讓英法兩大帝國傾盡全力，我們對戰爭的結果就充滿信心」。<sup>165</sup>

一旦戰爭真的在一九三九年爆發，英法兩國都必須確保海外的帝國領土都會齊心協力投入這場戰事。對英國來說，帝國的其他成員是否願意投入戰爭仍有變數，因為絕大多數自治領都曾在捷克危機時表達不支

持戰爭的立場。但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

（Mackenzie King）在國內民眾的支持下，表態支持英國進行歐戰，澳洲與紐西蘭政府也隨後跟進——部分是因為新加坡海軍基地於一九三八年落成，部分是因為大英帝國內部開始出現「團結一致」的呼聲。南非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社群強烈反對戰爭，且直到歐戰真正爆發時，南非白人對於是否參戰依然看法不一。直到新任南非總理史莫茲

（Jan Smuts）說服議會，主張宣戰可以保護南非自身的利益，避免德國新殖民主義的威脅，南非才正式加入英國參戰。而在印度，英國印度總督林里斯戈勳爵（Lord Linlithgow）直接在戰爭爆發時宣布，無論印度民眾有何看法，印度都將參戰。<sup>166</sup>法國急欲推動歐陸優先的戰略，因此法蘭西帝國的海外領土對於一九三九年歐戰的支持便顯得格外重要。這種急迫感部分反映在官方的政治宣傳口號「帝國救法國」（le salut par l'empire）之上，尤其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更是明顯。達拉第總理一方面下令加緊打壓殖民帝國的政治異議人士，另一方面卻又在官方宣傳刻意強調「擁有一億多人的法蘭西帝國絕不可能被擊敗」。政府計畫在殖民地徵集大量士兵到法國服役，或者是將駐防海外的法軍調回國內，包括西非的五個師，印度支那的一個師，北非的六個師。到了一九三九年，從海外調回本土的軍隊總數已達到五十二萬人。<sup>167</sup>雖然法國無法整合海外帝國經濟以生產更多戰爭物資，但至少有能力讓海外領土供應更多的原料與糧食來支持戰爭。相較於海外補給線隨時可能被英法海軍切斷的德國，英法的優勢之一便在於有帝國海外領土做為後盾。

最後一項變化便是民間心態的轉變。英法兩國的民眾在《慕尼黑協定》後一度如釋重負，然而隨著軍事與戰略局勢的變化，老百姓的情緒也開始出現轉變。就在《慕尼黑協定》簽訂後沒多久，民調便已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傾向於不再對德國讓步。一九三八年十月，法國的民調顯示



高達七成民眾不願讓步。一九三九年的跨國民調更顯示，高達百分之七十六的法國受訪者與百分之七十五的英國受訪者支持使用武力維護波蘭但澤自由市的地位。<sup>168</sup>更重要的是，英法國內反戰團體的態度也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英法民眾對於歐洲危機的反應不同於一九一四年的民族主義熱潮，而是植根於更深刻的信念：他們相信國際主義的崩潰與軍國主義獨裁政體的興起，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嚴重的挑戰，而他們不願坐視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是一種莫可奈何的情緒，因為民眾顯然不希望發生戰爭，但基於對民主價值的責任感，以及不願看見今日許多作家所說的黑暗時代降臨，因此不得不面對即將戰爭的現實。一九三九年，英國學者伍爾夫在《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中向自己的同胞提出警告，人們眼中視為理所當然的現代世界，其實遠比想像中還要脆弱。<sup>169</sup>

一九三九年民眾心態的轉變還不至於讓戰爭難以避免，然而一旦波蘭成為德國入侵的目標，想要避免戰爭就變得相當困難。法國政府希望能與蘇聯達成協議，藉此形成包圍德國的態勢，此外也希望從美國獲得援助。法國政府於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向美國下了大筆訂單，訂購了大量飛機與航空發動機。儘管法國保守派懷疑蘇聯的動機，但兩國還是在一九三九年夏末針對軍事協定進行磋商。由於最終無法說服波蘭政府與總司令部同意讓蘇聯駐軍波蘭，協商最後不了了之。英法軍事高層都認為紅軍不是可靠的軍事盟友，也誇大了波蘭陸軍的潛在實力，波蘭在一九二〇年擊敗紅軍的歷史更加深了他們的錯誤印象。當德蘇於八月二十四日宣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張伯倫痛罵「俄國背信棄義」，但張伯倫一向不熱衷於與蘇聯軍事合作。對英法來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並不影響兩國保護波蘭不受德國侵略的承諾。<sup>170</sup>史達林接下來是否會進一步跟德國締結軍事同盟，引起了各方揣測，但至少當時



尚未成為定局。<sup>[1]</sup>比起納粹德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實對史達林與蘇聯更為有利，也符合蘇聯在意識形態上支持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一旦雙方真的開戰，共產蘇聯就可以漁翁得利。

希特勒有沒有可能被英法迅速重整軍備及民主國家普遍興起反法西斯浪潮這兩件事給嚇阻？這樣的推測不見得完全沒有根據。畢竟希特勒也曾在一九三八年因情勢不利而打消開戰的念頭。英法情報也顯示德國內部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有出現反希特勒政變的可能。即便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入侵波蘭之後，張伯倫還是給予希特勒機會，希望他會自行撤軍，以免引發世界大戰。九月二日，義大利高層一度提出開會協商的建議，如同一九三八年九月墨索里尼出面干預那樣。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告訴義大利外交大臣齊亞諾，英國的和談條件是「德軍必須撤出波蘭」，但這卻是一個德國方面不可能接受的條件。<sup>171</sup>過去曾有歷史學家試圖證明張伯倫直到最後一刻都想要擺脫對波蘭的承諾來避免戰爭，但最終未能找到可信的證據。當時德國唯有完全接受英法的要求，從波蘭撤軍，才有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到了九月一日，這樣的可能性已經趨近於零，此時無論是圍堵還是嚇阻都已經不管用。九月三日早上十一點十五分，張伯倫宣布英國進入戰爭狀態，同一天下午五點，達拉第也宣布法國進入戰爭狀態。帝國主義菁英與民主派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暫時結盟共同促成了這場新世界大戰。英國陸軍參謀總長在日記裡記下：「我們不能輸。」<sup>172</sup>

## 帝國之戰：西線戰場

英法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對德宣戰，徹底改變了一九三〇年代的對抗

本質。希特勒自認對波蘭發動的有限戰爭是為了替德國爭取生存空間，在他的眼裡，這樣的戰爭完全站得住腳，因為在此之前存在的歐洲大型帝國也是透過戰爭取得帝國的領土。十月六日，也就是波蘭投降後的一個星期，希特勒向民主國家提出「和平要求」，他嘲弄這些國家指責他搶奪數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卻忘了自己在全世界統治四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sup>173</sup>另一方面，英法把這場衝突視為對抗新一波帝國建立浪潮，即使英法尚未對義大利與日本宣戰，但兩國已經把這場危機視為全球性的戰爭。英法只希望義大利與日本不會趁自己在歐洲對德作戰的時候繼續擴張，正如英法希望蘇聯不會利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反過來對英法遼闊的海外領土施加壓力。與此同時，英法也尋求美國的道德支持，以及帝國海外領土積極提供人力、金錢與補給。決定二戰未來樣貌的，不只是德國對東歐的野心，雖然德國入侵波蘭確實觸發了這場衝突，但真正的關鍵還是英法在九月三日對德宣戰。從德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場戰爭因此是外在力量強加在德國身上。英法宣戰的第二天，希特勒在廣播中向德國民眾發表演說，他並未指責英法該為德國面臨的戰爭負責，而是將這一切歸咎於「猶太與民主的國際敵人」，是他們在背後指使英法宣戰。<sup>174</sup>如今對希特勒來說，這場戰爭已經變成兩場戰爭：一個是對抗第三帝國的帝國敵人，另一個是對抗猶太人。

英法宣戰後的情況與一九一四年大不相同。一戰爆發時，衝突一開始就有數百萬人趕赴戰場，傷亡人數也極其巨大。但在一九三九年，英法明知德國忙於入侵波蘭而無暇分兵進攻西方，但英法卻無意派兵到波蘭協助抵抗。事實上，英法兩國已私下認定波蘭無可挽救，法軍總司令甘末林將軍（Maurice Gamelin）只向波蘭做了有限承諾，表示法軍將在動員後十五天發動攻擊。九月十日，甘末林告訴波蘭駐外武官，法國半數陸軍已經開始進攻德國西部的薩爾區（Saarland），然而這並非事

實。少數法軍部隊推進了八公里，殺死了一百九十六名德國人，然後隨即撤退。<sup>175</sup>甘末林告訴作家莫洛亞（André Maurois），他「絕不會在戰爭一開始就打一場凡爾登會戰」，讓步兵猛攻德軍要塞。他計畫依照法國陸軍的有序作戰理論，打一場「科學戰爭」。<sup>176</sup>西方國家的毫無作為（第一名英軍士兵於十二月九日陣亡，原因竟是踩到法軍地雷），使希特勒重新燃起戰前的希望，也就是同盟國宣戰「只是做做樣子」。史佩爾在回憶錄中提到，西方國家「太軟弱，太無力，太頹廢」，根本無法作戰。<sup>177</sup>波蘭戰役開始的前幾個星期，希特勒下令西線軍隊必須極度克制，他相信只要能快速征服波蘭，就能讓英法接受既成事實。

然而希特勒也認為，一旦德軍在波蘭取勝，在西線也不能只採取守勢。九月八日，希特勒首次提出秋季在西線發動攻勢的想法。九月二十六日波蘭投降前夕，希特勒召集陸軍與空軍將領開會，他強調，到了一九四〇年夏季，同盟國就會在法國集結大量軍隊，德軍必須在盟軍做好準備之前經由低地國早一步攻擊法國，確保空軍與海軍基地以攻擊英國，同時保護脆弱的魯爾工業區使其免於盟軍的攻擊與轟炸。這項計畫於十月九日公布，稱為第六號作戰訓令，又叫「黃色計畫」。但在計畫實施之前，希特勒先行採取一連串動作讓同盟國不得不接受波蘭已經不可能挽回的事實，也就是德國與蘇聯這兩個獨裁政權共同瓜分了波蘭。<sup>178</sup>希特勒十月六日的演說與和平要求在西方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反應，當時西方依然有遊說團體鼓吹接受現實與德國妥協。達拉第要張伯倫忽視希特勒的說法，「對希特勒置之不理」，但英國仍舊花了數天時間思考如何回應。當時擔任海軍大臣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希望草擬一份「留有協商空間」的聲明，而最後底定的版本雖然主張任何侵略行為都不能獲得原諒，但還是破例給予希特勒機會，只要他願意退出波蘭，就不會遭到任何懲罰。<sup>179</sup>英國的反駁使德國領導高層轉而將

英國視為主要敵人，希特勒對他的海軍總司令說道：英國想「消滅德國」。戈培爾命令德國的報章雜誌不許將張伯倫描繪成一個無助而可笑的人物，而應該將其描繪成「邪惡的老人」。<sup>180</sup>

儘管希特勒認為對西方採取速戰速決才是最安全的做法，卻受到陸軍高層的極力勸阻。波蘭戰役顯示，德軍如果要冒險進攻法國，必須做更多訓練、擁有更齊全的裝備與對戰場戰術做更周詳的思考，德軍也需要先休養與重整。陸軍參謀本部軍需處長司徒普納格（C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建議，應該要等到一九四二年再發動大規模戰爭。<sup>181</sup>希特勒依然堅持己見，把進攻日期訂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之間。結果視天氣狀況讓想延後開戰的陸軍高層如願以償。一九三九年冬天是二十世紀最寒冷的冬天，入侵時間因此延後到十一月十二日，之後又延到十二月十二日，然後又延到一月一日，最後延到春天的未定日期。與此同時，希特勒的計畫也做了變更。一九三九年十月，希特勒重新檢討是否要直接從平坦的歐洲北部發動攻擊，而他決定集中裝甲師的兵力，改從更南方的位置發動攻擊。只不過希特勒並未因此訂定新的計畫，充分顯示他的猶豫不決。陸軍A集團軍參謀總長曼斯坦上校（Erich von Manstein）也認為如果要對法國施予決定性的一擊，那麼就應該在更南方的位置集中德軍裝甲部隊，趁法軍往比利時推進時一舉從南方突破防線，包圍北方的法軍，此即所謂的「鑷割計畫」（又稱「曼斯坦計畫」）。曼斯坦的想法不被上級接受，反而因此被派往東方負責組建軍級單位，上級是想藉此讓他不再發言。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一架運送文件的德國飛機在比利時緊急迫降，黃色計畫的原始資料就此流入同盟國手中，希特勒與軍方高層對於接下來的攻擊走向因此更加茫然。就在這個時候，希特勒身旁的副官不經意地向他提起曼斯坦的想法。二月十七日，曼斯坦被召回柏林，親自向元首說明他的計畫。希特勒對於曼斯



坦的計畫深感興趣，於是下達新的訓令。到了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國已做好在西線開戰的準備，而且採行的就是曼斯坦的「鑷割計畫」。<sup>182</sup>

在同盟國這邊，唯一確定的就是戰爭已經開打，但除此之外的其他考量全都充滿了不確定性。英法原本希望波蘭能抵抗幾個月，然而最後波蘭只抵抗了幾個星期就宣布投降。不過英法起初就計畫打一場長期戰爭，希望像一九一八年一樣，透過經濟匱乏、民眾不滿與最終的軍事對決來擊潰德國，因此即使德軍在擊潰波蘭之後將兵力移轉到西方，英法仍認為不需要急著採取行動。同盟國的情報單位與一般常識都認為德國最早也要等到一九四〇年初才能發動進攻，不過當時依然有不少人擔心德軍會在一九三九年秋末就採取行動。法國總司令部推測德軍可能採取的攻勢與德軍原本的計畫大致相同：馬奇諾防線將迫使德軍進攻比利時狹窄且容易防守的前線，屆時德軍將遭到正面出擊的盟軍擊敗或遲滯。同盟國相信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因為盟軍正逐漸集結必要的軍力與經濟資源。<sup>183</sup>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樣，同盟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初由軍方與文官高層組成最高戰爭會議，讓英法的合作制度化。同盟國在思考最佳作戰方式時顯然深受一戰經驗影響。十一月同盟國表示將「充分利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經驗」，同時從通訊、彈藥、石油供應、糧食、運輸與經濟戰來對抗德國。<sup>184</sup>

英法之間的軍事合作顯然是更令當時人困擾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懸而未決之後，甘末林堅持在法國的英軍必須由法國東北前線總司令喬治將軍（Alphonse Georges）指揮。十一月，甘末林擬定作戰計畫，預定盟軍主力將在德軍發動攻勢時同步進入比利時，沿著埃斯科河

（Escaut River）或戴爾河（Dyle）一線布防。甘末林最後選擇了戴爾河計畫，因為這條防線能夠保護法國東北部的工業區，但風險是盟軍需要八天抵達戴爾河，之後才能在當地構築堅固的防線。數量不多的英國遠



征軍也將隨同法軍開赴比利時。最大問題出在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比利時在一九三六年廢除了《法比防禦條約》，堅持不與同盟國進行參謀人員對話，也不允許盟軍進入比利時境內以避免破壞自己的中立地位，這種狀況直到德軍攻入比利時境內才出現變化。<sup>185</sup>比利時堅守中立地位的結果，就是造成盟軍的戴爾河計畫勢必得在倉促下執行。<sup>[2]</sup>儘管如此，甘末林仍堅持採取這項計畫，他相信在比利時建立有序作戰的攻守戰略防線仍是法國的最佳選擇。一九四〇年一月，盟軍取得德軍原訂的計畫，但盟軍並未因此重新思考戰略布局，反而因此更加深信在比利時建立防線是正確的決定。<sup>186</sup>

今日我們稱這段同盟國相對無所作為的時期為「假戰」，而此事就連在當時也備受批評。英法兩國輿論都需要一場軍事勝利，否則難以在國內凝聚戰爭共識。法國雜誌《兩個世界的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抱怨說，「為和平而戰爭」乾脆直接代換成「為戰爭而和平」。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紐約時報》標題寫著：「三十八名戰地記者正在尋找戰爭。」<sup>187</sup>當波蘭在十月遭到擊敗且希特勒提出和平要求時，法西斯右派與和平主義左派都試圖鼓吹妥協換和平，就算他們的比例相對少數，英法國內確實也開始普遍出現對戰爭幻滅的情緒。英國蓋洛普民調在一九三九年十月與一九四〇年二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受訪者願意和談的比例已從百分之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sup>188</sup>一九三九年冬天，同盟國動員大量部隊駐紮在法國邊界，士兵們忍受嚴寒，日復一日的等待使他們感到乏味與士氣低落，也讓人喪失對戰爭的熱情。當時也在前線的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哀嘆說，他與其他士兵每天只是吃、睡與躲避寒冷：「就這樣……我們就像牲畜一樣。」一名被徵召的英國士兵在寒冷的駐地閒晃，感慨「眼前的景象已經演變成一場鬧劇」。<sup>189</sup>

儘管英法努力延續一戰共同合作的經驗，但兩國之間的互信程度仍有待加強，特別是法國政府與總司令部都懷疑英國是否真會為了防衛法國而全力投入陸戰。英國在帝國海外領土的關鍵地區保留了一定的兵力與裝備，這種做法與法國徵調大量殖民地軍隊防守法國本土背道而馳。從英法進行討論之初，就可以明顯看出英國遠征軍建軍的速度十分緩慢，有可能來不及因應德國即將在一九四〇年發動的攻擊。法國動員的部隊達到八十四個師，另外還要算上駐紮在馬奇諾防線的二十三個要塞師。法國情報單位（錯誤地）估計德國可以派出一百七十五個師，因此認為英國必須派出一定數量的兵力才能彌補雙方的數量差距。<sup>190</sup>然而英國派出的部隊在比例上明顯失衡，因為該國在一九三〇年代優先增援空軍與海軍，陸軍則相對受到忽視。宣戰後四個月，英國只派了五個師到法國，等到德軍於隔年入侵時也僅加派八個師前往法國，而且還是裝備相對不足的國土防衛軍（Territorial Army）。戰爭開打之後，英國才派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裝甲師到法國參戰。英國帝國參謀本部表示，就算到一九四一年底，英國最多也只能派出三十二個陸軍師前往法國。<sup>191</sup>英國皇家空軍對法國戰役的支援也非常有限。一九三〇年代，英國生產戰鬥機與轟炸機主要是為了保衛不列顛群島，而轟炸機則是為了報復德國的攻擊。英國皇家空軍不願放棄戰鬥機與轟炸機的戰略搭配，結果造成絕大多數英國戰機都停留在英國本土。一九四〇年五月，大約有兩百五十架可用的英國皇家空軍戰機駐紮在法國，只比比利時空軍擁有的一百八十四架戰機多一點。<sup>192</sup>

英法所做的戰爭準備主要以德國做為假想敵，但實際開戰後，沒有人能確定其他各國會出現什麼樣的反應。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明確宣布義大利為「非交戰國」（墨索里尼選擇這個詞是因為相較於宣布「中立」，「非交戰國」比較不會傷害軸心國的同盟關係），但義大利

實際的立場依然難以判斷。法國海軍其實很早就對義大利的貿易進行封鎖，但到了九月十五日，法國卻解除封鎖，並與義大利達成經濟協定，由義大利出口飛機、航空發動機與飛雅特卡車給法國武裝部隊以換取外匯與原料（不過墨索里尼拒絕提供飛機給英國）。義大利外交大臣齊亞諾告訴法國大使，「打幾場勝仗，我們就會站在你們這一邊。」<sup>193</sup>英國確實開始增兵蘇伊士運河，儲藏戰備物資準備因應可能出現的第二戰場。同盟國認為墨索里尼是個投機分子，而他之所以還沒動手，只是因為機會還不夠誘人。<sup>194</sup>日本的動向同樣也難以捉摸。一九三九年夏天，華南的日軍對英法的海外領土施壓，迫使同盟國停止對華南進行貿易，而在歐戰爆發後，日本又進一步限縮貿易。法軍與英軍撤出天津租界，皇家海軍中國艦隊也遷往新加坡。香港被日軍封鎖，定期往返中國大陸與香港的中國船隻也遭日本海軍擊沉。英國不想與日本全面開戰，而此時的同盟國之所以能保有在中國的利益，是因為中國在一九三九年冬天仍能對日軍持續進行抵抗。<sup>195</sup>

在各種不確定中，最危險的就是蘇聯的態度。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訂定互不侵犯條約，從那時起，英法就把蘇聯當成潛在敵人，把互不侵犯條約視為實質的同盟關係。我們今日已經知道，史達林當時確實希望互不侵犯條約可以形成以蘇聯與德國為軸心的新歐洲「均勢」。史達林告訴李賓特洛甫，「德蘇合作形成的力量，將使其他國家的聯合相形見绌。」<sup>196</sup>蘇聯入侵與占領波蘭東部，接著又施壓波羅的海國家使其同意蘇聯駐軍，同盟國因此開始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張伯倫與達拉第都極為敵視共產主義，他們擔心一旦開始對德作戰，可能會誘使蘇聯侵奪英法在中東或亞洲的海外領土。十月，英國駐莫斯科大使提出長篇報告，分析英國與蘇聯開戰的可能，雖然英國帝國參謀本部反對任何擴大衝突的風險，但仍將對蘇作戰列為同盟國可能必須面對的偶發事

件。<sup>197</sup>十一月三十日，在芬蘭政府拒絕將基地讓渡給蘇聯軍隊之後，蘇聯決定出兵攻打芬蘭，這起事件引發英國與法國的強烈抗議。英法都撤回駐莫斯科大使，並於十二月十四日提案將蘇聯逐出國聯。在倫敦，蘇聯大使麥斯基（Ivan Maisky）在遭受反蘇報章雜誌連日批評之後，不禁自問：「究竟誰才是英國現在的頭號大敵？是德國，還是蘇聯？」<sup>198</sup>

蘇芬戰爭意外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捲入二戰，也讓同盟國注意到這個地區的戰略地位，無論是蘇聯還是德國取得斯堪地那維亞，都將對局勢產生重大的影響。斯堪地那維亞蘊含重要的戰略原料，特別是高品質的鐵礦，挪威的沿岸地區則適合興建海空軍基地以攻擊英國。英法提供芬蘭有限的軍事援助（大約一百七十五架飛機與五百門大砲），英國還提出了兩個代號為「雅芳茅斯」（Avonmouth）與「斯特拉特福」

（Stratford）的作戰計畫，這兩項計畫都在一九四〇年二月獲得最高戰爭會議批准。雅芳茅斯作戰將派遣少量英法部隊到挪威的那維克港

（Narvik），從這裡進入瑞典境內，控制當地的鐵礦產地；斯特拉特福作戰則另外派出三個師的兵力在瑞典南部建立防線。然而挪威與瑞典都不同意英法的計畫，到了三月，儘管法國強力施壓要求軍事介入，英國戰時內閣還是否決了這兩項作戰行動。<sup>199</sup>最後，在同盟國未能實施任何作戰計畫之下，芬蘭不得不在三月十三日尋求對蘇停戰，而芬蘭的戰敗也首次讓斯堪地那維亞議題在同盟國內部引發重大政治危機（之後還會有第二次）。法國總理達拉第在一九四〇年春開始面對愈來愈激烈的政治反對聲浪，反共人士指責他未能積極對抗蘇聯，中間派與左派則認為他未能找到對付德國的策略。達拉第因此在眾人面前留下臨事不斷、猶豫不決的負面印象。三月二十日，達拉第被迫下臺，但仍擔任國防部長。總理一職由達拉第的財政部長雷諾（Paul Reynaud）接任，他的名



聲與達拉第完全相反——衝動、積極、好戰。雷諾一上任就立即寫信給張伯倫，表示為了扭轉芬蘭戰敗帶來的心理與道德衝擊，現在必須「大膽而立即地」採取行動。<sup>200</sup>

然而，雷諾想採取行動的地點卻遠離直接面對德國的前線地區，這點與達拉第原本提出的構想並無不同。雷諾希望由英國主導，在斯堪地那維亞德國運送鐵礦砂的路線上埋設地雷，他還希望英法共同在伊拉克與敘利亞部署轟炸機，轟炸蘇聯的高加索油田，這樣也能切斷德國一部分的石油供應來源。不過高加索計畫的重要性似乎遭到誇大：當時一份英國報告指出，只要派出三個轟炸機中隊就能炸毀油田與「癱瘓蘇聯的戰爭機器」，但這種說法完全缺乏證據支持。最後是因為英國戰時內閣考慮到這麼做可能會引發與蘇聯的全面戰爭，這才阻止這項轟炸計畫繼續進行。<sup>201</sup>雷諾尤其堅持必須在挪威採取行動，但英國卻傾向於把重心擺在西線威脅，英國的方案是沿著萊茵河設置水雷以遲滯德軍的部署。法國內閣拒絕了英國的提案，因為他們擔心德國為了報復也會在法國的河川設置水雷。英國政府最後選擇了折衷方案：如果法國願意在一九四〇年接下來的時間在萊茵河布雷，那麼英國就會在挪威水域布雷，這才化解了僵局。盟軍將在挪威沿岸地區布雷的行動稱為「威爾弗賴德爾作戰」（Wilfred），時間訂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sup>202</sup>

一個月後，挪威行動因張伯倫去職而終止。與達拉第一樣，張伯倫也是盟軍斯堪地那維亞戰略無能的受害者。英國與法國的情報單位未能事先察覺德國也將在四月九日清晨對丹麥與挪威發動攻擊。路透社四月八日傍晚報導，一支德國艦隊正朝向北海航行。原來德國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計畫對斯堪地那維亞採取行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德國高層下令研究在德國有限的海軍資源下，占領挪威與確保鐵礦輸入的可能性。希特勒一方面擔心挪威可能被英國占領，另一方面也關注對斯堪



地那維亞垂涎已久的蘇聯有可能出兵占領挪威北部。德國於一九四〇年一月擬定了作戰代號「威塞演習」（Weserübung），由法爾肯霍斯特將軍（Nikolaus von Falkenhorst）出任該場作戰的陸海空三軍行動總司令。<sup>203</sup>德國高層希望挪威的納粹支持者奎斯林（Vidkun Quisling）能在挪威內部引發政治動亂，讓挪威不戰而降，但他們顯然高估了奎斯林的影響力。由於同盟國對斯堪地那維亞的關注持續升溫，希特勒於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發布「威塞演習」訓令。<sup>204</sup>當時德國軍事準備的主要重心仍位於西線，要進行威塞演習作戰是一項複雜且風險極高的任務。然而希特勒卻認為盟軍有可能從北面進行側翼包圍，如此將對德國造成極大的危害。

四月二日，希特勒下令一個星期後開始行動。就在英國於四月八日著手進行布雷行動的同一時間，德國的潛艦、運輸艦與軍艦已在海上準備支援對挪威特隆赫姆（Trondheim）與那維克的登陸作戰，德國傘兵也已準備好首次行動，目標是挪威首都奧斯陸。四月九日清晨，德軍越過丹麥邊界，在短暫交火並造成十六名丹麥士兵死亡後，丹麥政府宣布投降。德國傘兵與空降部隊迅速奪取挪威南部幾座主要機場，搭載部隊與後勤補給的運輸艦則在挪威南部海岸登陸。往後兩個月，德國的海空補給總共運送了十萬七千名士兵、兩萬零三百三十九輛車輛與十萬零一千噸軍需物資支持這次入侵行動。到了五月初，已有超過七百架飛機在北歐支持德軍作戰。<sup>205</sup>雖然挪威出現意想不到的激烈抵抗，但德軍還是很快控制挪威絕大部分南部與中部地區。四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英國、法國與波蘭的聯合部隊分別在挪威海岸三個地點登陸，盟軍的兵力超過德軍並很快就控制那維克。雖然德國海軍承受的傷亡人數比例較高（三艘巡洋艦、十艘驅逐艦、四艘潛艦與十八艘運輸艦沉沒），但這場戰役還是顯示出德國三軍部隊唯一一場大規模聯合兵種作戰的強大力

量。密接空中支援、步砲協同作戰與有效通信，不僅放大了德軍火力，也讓盟軍士氣低落，絕大多數盟軍士兵從未見過崎嶇的山地地形，更不用說在這樣的地形作戰。四月二十六日，英軍棄守特隆赫姆，盟軍士兵則堅守那維克直到六月八日，之後剩餘的兩萬四千五百人全數撤回英國，但德軍早在五月初就已確立在挪威的勝局。德軍死亡與失蹤三千六百九十二人，盟軍死亡三千七百六十一人。<sup>206</sup>

挪威的失敗讓雷諾大感憤怒，身為新任總理，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賭在這場戰爭的勝利上。雷諾在四月底抱怨說，英國人「全都是不敢冒險的老人」。在英國，隨著失敗的消息傳出，民眾也轉而反對張伯倫。雖然盟軍的準備不足與執行不力主要應歸咎於海軍大臣邱吉爾，但五月初的新聞媒體都把矛頭指向首相本人。這場政治危機在五月八日達到高峰，致使下議院針對挪威問題展開辯論。根據一名目擊者的說法，張伯倫憤怒地為自己過去的作為辯護，看起來「心力交瘁」。當反對的工黨要求表決時，原本支持首相的人很多都轉而投票反對他，第二天，張伯倫決定辭職。<sup>207</sup>反對黨唯一願意合作的保守黨政治人物只剩下邱吉爾，五月十日，邱吉爾因而成為新政府領導人。短短六個星期之內，英法這兩個民主國家都為了斯堪地那維亞而各自經歷了一場重大政治危機。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斯堪地那維亞遭遇失敗，英法之間仍然存在一個團結兩國的共同信念：那就是英法都相信這場戰爭最終會由同盟國勝出，對德國的軍事圍堵也必將成功。此時的英法政府完全無法預料到兩個月後即將來臨的巨變。

就在邱吉爾就任首相的同一天，德軍在西線開戰。對於這場戰役，盟軍情報單位做的準備遠比挪威戰役充分，因為盟軍的戰略是以防禦德軍攻擊為基礎，而非發動攻勢，但情報部門對於德軍作戰的預估卻完全錯誤，這項誤差很快就讓盟軍的軍事準備陷入嚴重混亂。戰事的順利令

德軍高層大吃一驚。與盟軍將領一樣，許多德軍將領認為，一旦鑷割計畫失敗，戰事就將演變成類似一戰西線的膠著狀態。結果德軍居然只以損失兩萬七千人的代價控制了整個荷蘭、比利時與法國。這場戰爭與雙方將領在二十五年前經歷的一戰西線戰場可說有著天壤之別。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二戰結束之後，同盟國一直試圖以德國擁有壓倒性軍力做為盟軍屈辱戰敗的理由：是經過數年重整軍備的德國，對上行動遲緩而未能協調合作的西方國家。然而，這項說法受到許多歷史學家的挑戰，指出同盟國實際上擁有比德國還要多的軍事資源，而且某些方面的差距還不小。位於法國東北前線的法國、比利時、荷蘭與英國陸軍總共有一百五十一個師，德國陸軍只有一百三十五個師，其中還包括四十二個師的總預備隊；盟軍火炮有一萬四千門，德軍只有七千三百七十八門；盟軍戰車有三千八百七十四輛，德軍只有兩千四百三十九輛，而且盟軍戰車絕大多數火力與裝甲都比德軍戰車來得優越。即使在空軍戰力，人們總認為一九三〇年代末的德軍已經遠遠超前，但實際上盟軍仍具有優勢：盟軍飛機估計在四千四百架到五千四百架之間（包括數量可觀的預備隊），反觀五月十日西線戰場開打當天，德國第二與第三航空軍團可以作戰的飛機只有三千五百七十八架。<sup>208</sup>

雖然這些數字正確無誤，卻會在幾個重要方面造成誤導。首先，盟軍的陸軍與空軍數字包括了比利時與荷蘭的軍隊，但這兩國的小規模陸軍卻未能與法國協調作戰，兩國的小規模空軍也同樣未與英法合作，結果比利時與荷蘭的空軍在開戰第一天就直接在自己的空軍基地裡遭到殲滅。英國與法國的空中均勢也是統計上的幻覺。到五月十日西線開打為止，法國總司令部在直接面對德軍的前線地區只部署了八百七十九架可用飛機，英國雖然在法國部署了四百一十六架飛機，但只占英國皇家空軍一千七百零二架戰機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戰機都部署在英國本土，

用來防衛不列顛群島。剩下的法國飛機，有許多在一九四〇年已過於老舊，只能停放在法國本土遠離前線的維修工廠或基地裡，另外還有四百六十五架飛機位於北非，防範義大利的入侵。法國部署在最前線的飛機也分散到陸軍各單位，並未集中一處，與德國空軍集中統一指揮形成強烈對比，也使雙方差距進一步惡化。事實上，英法在前線部署的飛機只有約一千三百架，德國則有三千五百七十八架。

在火砲方面，雙方差距也不像數量顯示的那麼大。法國仰賴大量的一九一八年火砲，到了一九四〇年五月，法國仍缺少現代的四十七公釐戰防砲，受過訓練懂得使用這種火砲的士兵也不多，許多部隊仍在使用一戰留下來的三十七公釐戰防砲，而這種砲根本無法對抗現代戰車。法國的防空砲也相當短缺，只有三千八百門，德國則有九千三百門。<sup>209</sup>雖然英法最好的戰車火砲口徑比德國最好的戰車大，裝甲也較厚，但這類戰車只占英法戰車部隊的一小部分，部分法國戰車的速度非常緩慢且大量耗油。更重要的差異在於戰車部隊的組織方式。德軍把所有戰車編入十個裝甲師與六個摩托化師，使其力量集中，充當開路先鋒，以突破敵軍防線與瓦解敵軍組織，後面跟著以步兵與馬匹運輸為主的陸軍部隊；反觀法國即便擁有三個輕機械化師與三個裝甲師，絕大多數戰車依然用於步兵戰鬥，被用來協助阻止敵軍突破，而非自成獨立的攻擊單位。法國的兩千九百輛戰車中，只有九百六十輛屬於機械化部隊，其餘全分散到常規的步兵師。與德國陸軍不同，法國陸軍顯然從未看過或經歷過現代戰車戰。<sup>210</sup>我們因此能對雙方兵力的對比下一個重要結論：德軍在最攸關戰局的地方擁有局部優勢。

此外，這些差異也因為雙方選擇的戰略不同而被更加放大。由於法國戰敗是二戰的轉捩點，因此法國戰役值得我們詳細檢視。先前提到德國在黃色計畫上曾有過的爭論，到了一九四〇年三月已完全獲得解決。



德國武裝部隊分成三個集團軍：B集團軍有三個裝甲師，經由荷蘭與比利時進攻法國，目標是引誘英法主力部隊在比利時進行反擊；C集團軍以西牆（Westwall）防線為依托，牽制駐紮在馬奇諾防線的法軍三十六個師；關鍵是倫德斯特將軍（Gerd von Rundstedt）指揮的A集團軍，擁有七個裝甲師，面對比利時南方的阿登（Ardennes）森林與盧森堡。A集團軍必須快速穿過森林，在開戰的第三天渡過繆斯河，再往東北方進攻，直抵英吉利海峽。A集團軍在包抄盟軍部隊與消滅其反抗力量的同時，還必須防守自身暴露的左翼。這項計畫能否成功，取決於法軍主力是否受到穿越比利時北部的B集團軍的引誘，以及這項精心布局的佯攻計畫在執行時能否讓法軍誤以為B集團軍真的是德國進攻的主力。

從結果來看，德國的策略其實是多餘的，因為甘末林與法國總司令部很早就決定進軍比利時。三月，甘末林修改原本的戴爾河計畫，改而提出新的「布拉達衍生計畫」（Breda variant）。這項計畫將使盟軍承擔更大的風險，目標是希望法國精銳的第七軍團能在英國遠征軍支援下迅速穿過比利時，與荷蘭軍隊會合，共同建立一條防線。相較於戴爾河，布拉達離法國邊界更遠，但甘末林孤注一擲，他相信盟軍三十個師可以及時趕到荷蘭防線阻止德軍突破。這項計畫導致戰線北部的整體兵力對比是盟軍六十個師對德軍二十九個師，但在南部防線則反過來，盟軍十八個師對德軍四十五個師。法國多年來一直認為阿登森林對現代軍隊來說是無法穿越的，因此只交由輕裝的比利時掩護部隊與七個裝備不足的預備役師來防守。<sup>211</sup>雙方對這場戰役都冒著很大的風險，可見一戰經驗對雙方都造成深遠的影響，只不過產生的結果正好相反：甘末林獲得英國將領的支持，他想建立綿延不絕的戰線與進行有序作戰，並且相信這麼做可以拖垮德國，重現一九一八年的結果；相反地，德軍將領則擔心重演一九一八年的結局，因此大膽進行快速突破與包抄，避免一



戰西線戰場的僵持態勢。

當德軍在西線發動攻擊，摧毀敵方機場、大膽使用傘兵奪取比利時的艾本艾美爾要塞（Eben-Emael）時，甘末林表示，這「就是他在等待的機會」。<sup>212</sup> 連同英國遠征軍，法國第一與第七軍團終於獲准進入比利時境內，朝戴爾河防線與布拉達推進。法國第九與第二軍團分別位於色當南北，如果德軍從南方推進，這兩個軍團將會負責阻擋德軍。然而，甘末林的計畫並未達成任何成果。當盟軍部隊朝布拉達推進時，卻發現荷蘭軍隊早已棄守此地且將部隊往更北移動。五月十四日，荷蘭大城鹿特丹遭到轟炸，德軍持續朝城內推進；第二天，荷軍總司令在表示「這場懸殊的戰鬥必須停止」後宣布投降。與此同時，比利時在東部亞伯特運河（Albert Canal）布置的防線在德軍猛攻下迅速崩潰，比利時軍隊只得撤退到法軍推進的路線上。盟軍試圖沿著戴爾河建立防線抵禦人數居於劣勢的德軍，但建立防線的工作並不順利，因為大量難民（最終估計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名法國與比利時平民）阻塞了交通要道，使軍隊無論推進還是撤退都極為困難。<sup>213</sup> 五月十六日，法國東北前線總司令喬治將軍命令戴爾河前線守軍盡速撤回法國邊界，因為南方原本認為無法通過的阿登森林已遭德軍突破，法國整個防線陷入混亂。

盟軍往比利時推進之舉正中德軍下懷，德軍的作戰計畫也得以順利實行。希特勒將司令部設在明斯特艾費爾（Münstereifel）一座改裝的防空地下碉堡。希特勒認為法國將在六個星期內戰敗，之後他將與英國和談，他相信英國領導人不想「冒著失去帝國的風險」繼續抗戰。<sup>214</sup> 五月十日，A集團軍穿過盧森堡與阿登森林進行攻擊的各項訊息開始傳回司令部。裝甲部隊分成三個箭頭，第一個箭頭由擁護裝甲作戰的古德林中將（Heinz Guderian）指揮，負責進攻色當；第二個箭頭由雷因哈特中將（Hans Reinhardt）指揮，負責進攻色當北方的蒙提梅

（Monthermé）；第三個箭頭由霍斯將軍（Hermann Hoth）指揮，負責攻擊比利時城市第特南（Dinant），他必須保護前面兩個箭頭的側翼。然而部隊行進的速度很快就慢了下來，因為裝甲師與步兵師全擠在狹窄的道路上。四萬一千一百四十輛車輛與十四萬人造成嚴重的交通堵塞，隊伍綿延達兩百五十公里，德軍將領不得不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審慎的後勤規畫，終於一定程度緩和了這場危機。德軍沿途設立燃料站，派出三個卡車運輸大隊尾隨裝甲師運送燃料、軍火與補給品。一旦補給行動順利達成，後勤供應就能提供部隊快速的機動力。這些油料就像為口渴的馬拉松選手提供的飲料，戰車在加了油之後又可以繼續前進。215

這場戰役最關鍵的時刻發生在五月十一日到十三日之間，德軍裝甲部隊走到一半突然停滯不前，成為盟軍空軍眼中靜止不動的目標。然而幾乎沒有任何盟軍飛機前來攻擊這些裝甲部隊，一方面是德國空軍在上空提供保護傘，另一方面是盟軍飛機此時正專注於往北推進，無暇顧及南部防線。不過確實有少數法國飛行員注意到阿登出現川流不息的車潮，並且將訊息回報，然而他們的情報並未受到重視。當德軍穿過盧森堡與阿登森林南部，與比利時邊防部隊和法國騎兵師交戰時，法軍還是沒有人回報喬治或甘末林這可能是德軍的主力部隊，因為法國的作戰計畫完全鎖定在北部的法蘭德斯平原，法國軍事高層認定此處才是主要戰場。儘管穿越阿登森林成了德軍的後勤惡夢，但到了五月十三日，三個德軍裝甲箭頭都已抵達了繆斯河畔，而跨越繆斯河便成了此次戰役的重頭戲。法軍炸毀橋樑，並且在河對岸固守。德國於是出動大量飛機攻擊法軍陣地，八百五十架轟炸機與俯衝轟炸機沿著河岸進行地毯式轟炸。法軍第五十五師與攻占色當的古德林對峙，他們手裡只有一門防空砲。雖然之後發現損失比預期來得小，但持續轟炸造成的心理衝擊仍讓法國

守軍感到恐慌與士氣低落。<sup>216</sup>古德林的三個師在重砲轟炸與機關槍掃射下奮勇渡河，到了晚間十一點，古德林已在對岸建立立足點並開始搭建第一座橋樑，戰車也陸續順利渡河。在更北一點的地區，隆美爾將軍（Erwin Rommel）親自率領第七裝甲師在第特南附近的烏鎮（Houx）渡河，儘管遭遇法軍猛烈反擊，隆美爾還是在傍晚時分推進了三公里，在對岸建立橋頭堡；雷因哈特的兩個裝甲師在蒙提梅遭遇更頑強的抵抗，法軍藉著地形之便，與德軍奮戰兩天，之後雷因哈特才成功突破法軍口袋，占領繆斯河西岸。德軍成功跨越繆斯河，不僅讓實力較弱的法國預備役師感到恐慌，也終於讓法國總司令部產生警覺，他們此時才開始正視這個先前一直深信不可能發生的狀況。

五月十三日到十四日的深夜，詳細情報終於傳回喬治將軍的司令部。喬治痛哭說：「色當的防線被突破！這下完了！」<sup>217</sup>接下來發生的事完全與甘末林計畫的有序戰爭相反。洪齊格將軍（Charles Huntziger）的第二軍團預備役師陣前潰散，駐紮在更北的柯拉普將軍（André Corap）第九軍團也面臨相同的危機。由於法國總司令部從未想過進行機動作戰，因此面臨這樣突如其來的態勢，法軍完全無法組織有效反擊。通信不良，加上法軍戰車與卡車未能得到燃料補給，導致數百輛法軍車輛面對德軍裝甲師的推進完全動彈不得。法軍部隊被迫長途而快速地行軍，等到抵達戰場時早已疲憊不堪，而武器設備又普遍短缺。在比利時，法軍的倉促推進最終演變成防禦性的撤退，法軍離開時甚至捨棄了大量珍貴的軍需物資與燃料庫。當然，實際戰況並非如某些人所言是德軍輕鬆獲勝，德軍確實在零星地區遭遇極為頑強的抵抗，但這些抵抗往往缺乏組織計畫，跟法軍原先規畫的有序作戰完全相反。五月十六日，邱吉爾在倫敦表示：「有人認為一百六十輛戰車就能征服法國，這種想法實在太荒謬。」但當他第二天飛往巴黎，在法國外交部與甘末

林見面時，他發現法軍參謀人員已經開始焚燒文件。邱吉爾問甘末林，法國的預備隊在哪裡？他得到簡潔的答覆：「沒有預備隊。」<sup>218</sup>

隨著法軍將領與法國政治人物逐漸察覺前線戰況，危機的規模也開始緩慢擴大，戰場迷霧的不確定性與訊息的難以取得更是加快了崩潰的節奏。德軍跨越繆斯河之後，照理應該放慢步調，鞏固陣地，以防法軍反攻，但法軍的反擊缺乏組織且零星，於是德軍三個裝甲軍決定依照曼斯坦計畫，轉而朝英吉利海峽的港口城市加萊、布洛涅與敦克爾克快速推進。裝甲軍的決定一時間在德軍司令部引起騷動。經過一個星期的連番勝利，希特勒擔心裝甲師持續推進暴露的漫長側翼將引來法軍強力反擊。五月十七日，希特勒與幾個將領爭論是否該放慢攻擊步調。「元首非常緊張，」德國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說道：「他因為成功而感到恐懼，他不想因為冒險而失去戰果，因此寧可阻止我們繼續進攻。」<sup>219</sup>

五月十八日，C集團軍獲准攻擊馬奇諾防線，以確保三十六個法國邊防師不會離開原來的位罝。此時盟軍發動了兩次小規模的反擊，讓希特勒大感焦慮，一次是五月十八日英國遠征軍的戰車部隊從北部的阿拉斯

（Arras）進行反攻，另一次是五月十七日法國戴高樂上校（Charles de Gaulle）率領剛組成的第四裝甲師從蒙科爾內（Montcornet）進行反攻。但現實與希特勒所想的不同，德軍推進造成的震撼與盟軍反擊的雜亂無章，充分顯示德軍機動作戰的強大。雖然德軍裝甲師兩度被驚慌的希特勒下令停止前進（分別是盟軍在阿拉斯與蒙科爾內反攻時），但德軍裝甲師在過去短短一個星期已經席捲大片土地，裝甲師將領都急欲往海岸推進，收緊法蘭德斯口袋，包抄法國第七與第一軍團、英國遠征軍與比利時軍隊。但延遲決定性一擊的其實不是很多人所說的希特勒「停止命令」，而是緊張的A集團軍司令倫德斯特，是他下令裝甲師重整序列、進行整補與休息，並且將部分裝甲師調往南方進行第二階段的作戰



計畫，也就是「紅色計畫」，目標是擊敗其他地區的殘餘法軍，另外一些裝甲師則派往敦克爾克。希特勒批准倫德斯特的命令，讓他自行決定德軍繼續推進的時間。五月二十八日，比利時國王宣布投降，受困的二十一個比利時師放棄抵抗。就在兩天之前，德軍終於獲准殲滅圍困的二十五個法國師與英國師，這些軍隊僅憑薄弱的防線仍與德軍做困獸之鬥。

希特勒總部一時間的驚慌與騷動，與壓倒盟軍的龐大危機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隨著戰況逐漸明朗，法國政府必須面對他們難以相信的現實。五月十五日早上七點三十分，雷諾不抱希望地打電話給邱吉爾說：「我們失敗了，我們打輸了這場戰爭。」<sup>220</sup>五月二十日，甘末林被一向與他不和的雷諾總理解職，接任的是法國在敘利亞的指揮官魏剛將軍（Maxime Weygand），他是一戰的退役將領，也是雷諾的盟友。一九一六年領導法國打贏凡爾登會戰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此時擔任駐馬德里大使，雷諾也將他召回，任命他為副總理，希望他能提振法國民眾萎靡的士氣。魏剛與貝當返國任職短暫提升了倫敦與巴黎的信心：魏剛擬定了一份計畫（相當程度繼承了甘末林的想法），準備由北向南攻擊德國的漫長側翼，只可惜他的計畫完全與現實脫節。魏剛還有另一項比較務實的策略，他準備讓法軍撤退到索穆河與埃納河一線，要求從前線敗退的軍隊在此重整，並且跟先前一樣建立「連續不斷的防線」。<sup>221</sup>然而前線潰敗造成的損失實在過於巨大。法國只剩下四十個師來固守新防線，只有三個摩托化預備隊用來填補德軍打開的缺口。英國戰時內閣與帝國參謀本部開始得出明確結論。五月二十五日，前內閣秘書漢基（Maurice Hankey）設立的委員會針對「特定結果下的英國戰略」提出報告。漢基的結論是，這場全球戰爭不會受到法國失利的影響，最終成敗將取決於美國、英國海外領土的支持與英國海空軍的保



護，英國可以單獨繼續這場戰爭。<sup>222</sup>

五月十八日，西線戰事才爆發一個星期，英國與法國就已在考慮撤離。由於德軍暫時停止推進，使英國遠征軍司令官高特少將（John Gort）得以在法蘭德斯口袋的南北兩側建立陣地，並且由殘餘的法國第七與第一軍團負責防守。五月二十六日，加萊與布洛涅開始進行「發電機作戰」（Operation Dynamo）。參戰的士兵終於可以獲得較多從英國南部基地起飛的英國皇家空軍噴火戰鬥機與颶風戰鬥機的空中掩護。就在突破口袋的戰役在受困士兵的四周開打之際，三十三萬八千六百八十二名士兵分別搭乘八百六十一艘各式船隻撤離敦克爾克，其中英國士兵有十九萬八千人，法國與比利時士兵有十四萬人。法國方面也在同步進行海上撤離，然而英國人撰寫的敦克爾克歷史卻總是少寫這一段。法國海軍部載運四萬五千名士兵到英國，四千名士兵到利哈佛（Le Havre），此外還有十萬名士兵被運往法國北部港口瑟堡與布勒斯特，之後這些士兵又重新加入索穆河的戰鬥行列。<sup>223</sup>發電機作戰於六月四日結束，總共損失兩百七十二艘船，包括十三艘驅逐艦，盟軍遺棄了所有的重裝備，包括六萬三千輛車輛、兩萬臺摩托車、四百七十五輛戰車與裝甲車、兩千四百門大砲。<sup>224</sup>日後有人寫道，英法軍隊離開該地後留下的，「舉目所見，淨是斷垣殘壁……成堆的軍需物資散亂棄置各處」。儘管英國並未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投降，但比利時與法國的戰役必須理解為一場大敗，而非英雄式的撤離。一九四〇年六月，留守英國的軍隊只有五十四門戰防砲與五百八十三門火砲。英國正規軍此時儼然成了手無寸鐵的戰鬥隊伍。<sup>225</sup>

五月底，盟軍東北防線的抵抗持續敗退，英法兩國開始思考兩個星期前從未想過的可怕場景：投降。儘管魏剛尚未死心且充滿活力，但他還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告訴法國內閣應該考慮放棄戰鬥，雷諾則是首次說

出了「停戰」二字——但就像德國人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發現的那樣，停戰是個模稜兩可的詞彙。根據英法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協定，同盟國不可單獨與敵國議和，因此法國想要停戰必須獲得英國同意。五月二十六日，雷諾飛往倫敦，向邱吉爾解釋法國可能必須考慮放棄戰鬥。然而雷諾不知道的是，英國戰時內閣才剛在當天早上討論了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轉交的義大利駐英大使提案，內容是墨索里尼希望能召開會議。義大利的動機依然不明，因為到目前為止，墨索里尼一直都在等待宣戰的時機，他想利用法國即將被征服之際謀取利益。經過三天的辯論，英國決定拒絕義大利的請求。這場辯論經常被視為歷史的轉捩點，因為綏靖主義者差點在這場辯論中獲勝，但戰時內閣本來就應該針對全面戰敗的後果進行討論，而且就連主和派的哈利法克斯也不贊同在損害英國重要利益下進行和談。最後，主戰派的邱吉爾獲得當時還是戰時內閣成員的張伯倫支持，因此在辯論中獲勝，決定不與墨索里尼接觸。此時英國領導高層已經考慮在沒有法國的狀況下單獨進行戰爭。邱吉爾對其他同僚說：「如果法國無法保衛自己，那麼讓法國退出戰爭或許是一件好事。」<sup>226</sup>

法國又繼續抵抗了三個多星期，然而情勢急遽惡化。停戰依然是最有可能的選項，但法國政府仍不放棄其他方案。五月底，法國內部有人提出建立「布列塔尼要塞」的想法，認為法軍（或許再加上新增援的英軍）可以在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與瑟堡建立防線，法國政府於是對這項計畫的可行性進行研究。<sup>227</sup>還有一些人則寄望可以在海外的北非領土繼續抵抗，法國在此之前為了防止義大利從利比亞發動先制打擊，已經先在北非部署大批軍隊，現在法國政府也可以考慮從本土運送更多法軍前往北非。六月初，雷諾計畫將八萬名兵力運往法屬摩洛哥。而在蒙科爾內反攻獲勝後接任戰爭部長的戴高樂，也在六月十二日要求法國海

軍部在三個星期之內運送八十七萬名士兵前往非洲。然而當時只有英國海軍才有如此的運送能力，而英國海軍在協助敦克爾克大撤退後，此時正忙於撤離法國西部剩餘的英國軍隊（與一萬九千名波蘭士兵）。六月十四日，英國下令進行「天線作戰」（Operation Aerial），也就是撤離法國，這項作戰在十天後結束。這次撤離只損失六艘驅逐艦與百分之三的運輸艦，並成功運載十八萬五千人返回英國。<sup>228</sup>六月二十二日，魏剛詢問法國北非總司令諾蓋將軍（Charles Noguès），以北非現有的軍力進行抵抗有多大勝算。當時法國絕大多數海軍艦艇與大約八百五十架飛機都駐紮在法蘭西帝國的非洲領土上，但當地只有一百六十九輛現代戰車，現有的十四個師能戰鬥的也只有七個。雖然諾蓋的兵力足以守住北非，但魏剛認為僅以非洲的軍力進行抵抗，就跟堅守法國本土一樣不切實際。六月二十六日，諾蓋終於「死心地」接受法蘭西帝國停止抵抗的事實。<sup>229</sup>

然而無論法國政府做出何種選擇，法國的命運早已被德軍的全面勝利所決定。六月五日，德軍已經準備好進行第二階段的戰鬥，也就是前述的紅色計畫，目標是擊敗殘餘法軍與迫使法國政府投降。法軍匆促在索穆河、埃納河與瓦茲河（Oise）布置防線，總兵力只有四十萬，迎面而來的德軍卻有一百一十八萬。到了這個階段，德國龐大的步兵隊伍終於追上裝甲箭頭，德軍前線因此獲得大量生力軍。喬治將軍對魏剛說，他們現在還在作戰只是為了榮譽，因為勝利的機會已經十分渺茫：「沒有預備隊，沒有解圍的部隊，沒有外援.....沒有騎兵，沒有戰車。悲慘的處境.....絕望的奮戰，我們在做困獸之鬥。」<sup>230</sup>儘管與德軍實力懸殊，但相較於最初幾個星期的潰退，此時法軍組織與作戰意志都顯著提升，但依然無法改變最終的敗局。六月九日，德國A集團軍抵達盧昂（Rouen），六月十二日，德軍逼近巴黎，逼迫法軍向南北退卻。六月

十日，魏剛告訴雷諾，前線「完全崩潰」已經是遲早的事。

法國政府決定放棄首都，先是遷往羅亞爾河流域，然後遷往波爾多。六月三日，位於巴黎的空軍基地遭到轟炸，巴黎宣布為不設防城市，六月十四日，德軍凱旋進入巴黎。在六月十二日的部長會議上，魏剛表示已到了該停戰的時候；雷諾仍猶豫不決，但六月十五日喬治與法軍將領開會時，大家都同意必須停戰。<sup>231</sup>雷諾感到挫折且身心俱疲，他不得不向現實屈服，並且在隔日辭職，總理一職由主張停戰的貝當元帥接任。然而即使到了這個地步，停戰的問題仍未能底定，因為魏剛仍把停戰視為「暫時停止戰鬥」的手段，藉此為法軍爭取重整的時間。另一方面，貝當在六月十七日中午透過廣播宣布停戰，他告訴法國人民：「我們必須停止戰鬥。」魏剛則要喬治對外表示，他只是決定「暫時停止戰鬥」，並且命令所有將領仍要繼續戰鬥。<sup>232</sup>法國戰役不是在貝當宣布停戰當天就停止，這場戰役真正結束是在八天之後。雖然整場戰役明顯已經結束，無數士兵開始離開部隊返鄉，但在法國西部與中部仍有一些完好的部隊堅持戰鬥，不過這些部隊的精力與武器畢竟有限。弗雷爾將軍（Aubert Frère）率領第七軍團的十二萬名士兵據守羅亞爾河流域，隨著德軍進逼，他們試圖封鎖每一段河道。第七軍團直到六月二十五日才停止戰鬥。<sup>233</sup>

一九四〇年五月，義大利墨索里尼決定加入希特勒共同對抗民主國家，他的決定使停戰協定變得更加複雜。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曾宣布義大利為「非交戰國」，因為義大利在歷經過去十年的戰爭之後，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尚未做好與英法對抗的準備。墨索里尼對於這一狀況自然深感不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墨索里尼給予希特勒一個模稜兩可的承諾，他表示最終會履行身為軸心國的責任。一九四〇年三月，墨索里尼寫道，義大利如果整場戰爭一直保持中立，那麼義大利將



淪為「十倍大的瑞士」。<sup>234</sup>但義大利國王與軍方高層一直箝制墨索里尼，不讓他冒險介入義大利顯然無法應對的衝突。義大利總司令巴多格里奧元帥告訴墨索里尼，軍事準備工作最快要到一九四二年才能完成，而這還是最樂觀的估計。我們很難判斷墨索里尼對這項建言的重視程度，因為他顯然對於自己構築的義大利軍事潛力願景極為沉迷。墨索里尼不確定德國是否真的會攻擊西方國家，或是德國真的出兵，他也不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sup>235</sup>當希特勒要求義大利派出二十到三十個師與德國一起進攻隆河流域時，義大利陸軍司令部馬上予以回絕。墨索里尼與他的黨羽想進行的是一場「平行」戰爭，「不是『為』德國而戰，也不是『與』德國並肩作戰」，如戰爭副大臣索杜（Ubaldo Soddu）所言：「是為我們自己而戰。」<sup>236</sup>然而，當德軍告捷的消息不斷傳來，墨索里尼認為義大利不能再袖手旁觀。五月十三日，墨索里尼宣布將在一個月內宣戰，當他在五月二十八日得知比利時投降後，便決定將宣戰日設定在六月五日，以免自己錯過開戰的機會，到最後「連跟進參戰的資格也失去了」。後來，宣戰時刻再度延後到六月十日。當墨索里尼在羅馬威尼斯宮陽臺上宣布開戰之時，底下的群眾卻沒有表現出任何一絲熱情。<sup>237</sup>

雖然墨索里尼發布開戰宣言，但這並不表示義大利已經準備好參戰，反而先引來英法轟炸機的報復。兩天後，義大利北部的杜林與熱那亞遭到盟軍轟炸。真正迫使墨索里尼採取行動的是貝當要求停戰的消息。三天後，墨索里尼下令西部邊境的義大利陸軍開始進攻法國。墨索里尼接著趕往慕尼黑，與希特勒商討停戰協定。在開往德國的火車上，墨索里尼表示他要提出最大的要求，包括占領法國全境，接收法國艦隊，占領突尼西亞、法屬索馬利蘭與科西嘉島——但當他抵達慕尼黑時，他卻告訴齊亞諾自己感覺到「我不過是個二流角色」。<sup>238</sup>希特勒



希望簽訂一個比較不嚴苛的停戰協定，這樣可以讓德國不受制於未來可能簽訂的和平條約，也可以避免逼迫法國人再次加入英國陣營。根據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的說法，停戰協定也提供一個機會，讓德國可以把歐洲猶太人全部趕到法國的馬達加斯加殖民地上。<sup>239</sup>然而，希特勒不同意與義大利一起簽訂共同停戰協定。六月十九日，法國總司令部得到德國駐西班牙大使的通知，希特勒已經開始考慮停戰條件，第二天，法國代表搭車穿過前線抵達貢比涅，也就是二十三年前德國被迫簽訂停戰協定的地方。六月二十二日，在一九一八年簽訂停戰協定的火車車廂裡舉行簡單儀式之後，德法同意停戰，但協定要等到義大利也同意停止交戰狀態後才生效。<sup>240</sup>

由於義大利軍隊六月二十日才倉促開戰，因此墨索里尼不得不等待數天，等到前線軍隊獲得一定戰果後才能停戰。二十二個兵員不足與裝備不佳的義大利師進攻法國東南邊境，面對防守嚴密且決心抵抗的法國守軍，義大利毫無進展。義大利最後只占領了一座小鎮芒通

（Menton），除了死亡一千兩百五十八人與凍傷兩千一百五十一人之外，義大利三天的戰鬥可說徒勞無功。<sup>241</sup>儘管如此，義大利還是勉為其難地同意停戰，六月二十三日，法國代表抵達羅馬，在因齊薩別墅

（Villa Incisa）簽訂停戰協定。雖然法國代表知道自己毫無選擇，但停戰畢竟代表法國在軍事上敗給了義大利，對此法國人難以接受。墨索里尼信守他對希特勒的承諾，停戰協定的內容遠比他先前表露的極端野心寬容許多，然而無論是德法還是義法停戰協定，內容其實都跟當初德國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差異不大，某方面來說甚至還更為嚴苛。法國實際上喪失了主權，因為法國的北部與西部都遭到占領；法國軍隊縮減為十萬人，但殖民地仍保有一定數量的軍隊以確保英國無法輕易占領法國的海外領土；海軍基地與要塞都得非軍事化，武器全部上繳，艦隊不許

出海。義大利協商代表也堅持義大利停戰委員會對科西嘉島、法屬北非、法屬索馬利蘭與敘利亞擁有司法管轄權。<sup>242</sup>貝當統治的法國，首都位於溫泉小鎮維琪，僅擁有有限的獨立地位，領土也僅限於未被占領的法國中部與南部地區。

一九四〇年同盟國的失敗，轉變了整場戰爭的性質。義大利與日本大受激勵，在歐洲帝國面臨嚴重危機之際開始加快侵略腳步。同盟國的失敗也震撼了史達林，他原本預期這會是一場長期戰爭。一九四〇年七月，史達林對英國大使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表示，這個結果意謂著「舊均勢」已一去不復返。<sup>243</sup>秉持這樣的觀點，蘇聯開始入侵東歐領土，兼併波羅的海國家與羅馬尼亞的北布科維納（Northern Bukovina）與摩爾多瓦（Moldova）兩個省分。同盟國的失敗也加速美國的重整軍備計畫，讓美國輿論充分警覺到軸心國帶來的威脅。但對希特勒來說，最大的影響則是讓他意識到歐洲軸心國可以在整個歐洲建立「新秩序」，同樣地，日本領導高層也抓住歐洲同盟國戰敗這個從天而降的機會，準備在亞洲打造新秩序。一九三〇年代，軸心國還不存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計畫，這種想法的產生其實是英法宣戰的意外結果，也讓軸心國高層獲得了非比尋常的戰略機會。還在持續抵抗的英國，就成了軸心國新秩序的主要障礙。六月十八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開會時表示自己無意摧毀大英帝國，他仍認為大英帝國是「維持世界均勢的重要因素」。話雖如此，如果一九四〇年西方仍不願簽訂和約，那麼這場戰爭就會是「全面、絕對與無情的戰爭」。<sup>244</sup>

## 瀑布般的災難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邱吉爾在下議院起身發表演說，他簡短而令人難忘地提到英國皇家空軍戰鬥機司令部的「少數人」，並且用緩慢的聲調簡要描述一九四〇年夏天襲擊西方的這場災難。「一場如瀑布般的災難，」邱吉爾對國會議員們說道：「可信賴的荷蘭人被打倒.....比利時遭到入侵與擊潰，我們的精銳遠征軍被包圍，差點被俘.....我們的盟友法國已經退出戰爭，義大利還參戰對抗我們.....。」僅僅三個月前，「有誰會相信」最後會是這樣的狀況。<sup>245</sup>雖然邱吉爾在演說中也慷慨激昂地呼籲眾人繼續抵抗，但在下議院裡並未獲得多少熱情回應。邱吉爾的祕書柯維爾（Jock Colville）在旁聽席聆聽，他發現議場裡每一個人都無精打采。他日後甚至想不起來自己是否聽到「少數人」那句名言。<sup>246</sup>蘇聯駐倫敦大使麥斯基也在旁聽席上，雖然他覺得這場演說並不是非常精采，「邱吉爾今天並未拿出最佳表現」，但他也發現英國人即便面臨一場如瀑布般的災難，國會休息室裡卻依舊充滿著「重新找回的信心」。<sup>247</sup>幾個星期之前，邱吉爾的兒子藍道夫（Randolph）曾向麥斯基解釋，在法國崩潰之後，英國繼續作戰主要是為了維持帝國：「如果我們失去帝國，我們不是成為二流國家，而是十流國家。我們將一無所有，活活餓死。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奮戰到底。」真是虎父無犬子，麥斯基心裡大概這麼想。<sup>248</sup>

當英國對德宣戰時，完全沒想到日後會遭遇邱吉爾提到的一連串災難。邱吉爾的首相參謀長伊斯美（Hasting Esmay）日後提到，如果英國帝國參謀本部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能早一步想到有這種結果，「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警告內閣，參戰將帶來巨大災難。」只不過伊斯美又說，帝國參謀本部不僅將反對參戰，還會建議做出「屈辱的讓步」。<sup>249</sup>現在，大英帝國將獨自面對一場世界大戰。在法國戰敗與英國軍隊被趕出歐陸之後，大英帝國的命運頓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各國都不看好大

英帝國的未來，而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英國參與的法國戰役以慘敗收場，而英國在本土遭受威脅的情況下，要防守帝國的海外領土也十分困難。「說真的，我們的未來會如何呢？」英國國會議員錢農（Henry Channon）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的日記寫道：「真是一團糟……我們的統治正逐漸走向結束，而我對此深感遺憾。」<sup>250</sup>一份印度輿論的報告提到，當英國戰敗的消息傳到印度時，民眾感到「困惑」與「沮喪」，但反帝國主義者卻認為這是帝國即將崩解的前兆。「大英帝國即將崩解，」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寫道：「國王所有的騎兵與軍隊都無法使其恢復原狀。」<sup>251</sup>各國都把英國可能崩解視為理所當然。蘇聯評論者認為德國將會入侵英國，還會輕易地占領英國。美國輿論雖然同情英國，但此時也突然對英國能否存續感到懷疑。就連英國的盟邦法國也出現反英浪潮，因為法國人認為英國在法國戰役中貢獻甚微，同時也認為英國的世界秩序即將破產。維琪的新法國政府成員都對英國抱持著敵視態度，其中新總理拉瓦爾（Pierre Laval）與他的繼任者達朗海軍元帥都認為英國的帝國主張是失落年代的空洞回音。拉瓦爾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寫道：「英國的時代已經過去，無論現在發生什麼事，英國都會失去她的帝國。」<sup>252</sup>

邱吉爾的新政府也很清楚英國的處境危殆。邱吉爾雖然希望激勵英國民眾為帝國與帝國象徵的理想繼續戰鬥，但就連他本人也在私底下哀嘆：「我們不堪一擊、顛覆、無法控制局面與喪失鬥志。」<sup>253</sup>儘管如此，大英帝國很快就改用正面的態度來面對法國戰敗的事實。張伯倫認為法國「不過就是戰略負債」，英國單獨作戰還比較好；邱吉爾在主掌海軍部時也曾私下表達類似的觀點。<sup>254</sup>針對英國單獨作戰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受訪者有四分之三願意繼續抗戰，超過五成對於戰爭結果深具信心。<sup>255</sup>「單獨」作戰成為凝聚英國軍民的口號，而此時的英國也



把自己視為當代的大衛，對抗著法西斯主義的巨人歌利亞。但對邱吉爾及其政治支持者說，「單獨」指的不只是英國本土，還包括整個大英帝國。邱吉爾對於帝國有著很深的情感，史家納米爾（Lewis Namier）當時提到，邱吉爾選擇的內閣成員全是「吉卜林式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對帝國全有著情感上的羈絆。<sup>256</sup>對邱吉爾來說，帝國的存續是核心要務，他在一九三八年表示：「我只關心幾件重要的事，我想看到大英帝國的力量與榮光還能再多維持幾個世代。」<sup>257</sup>

儘管如此，在法國戰敗之後，英國已沒有多少戰略選項。當務之急是生存，這表示必須避免被德軍消滅或擊敗，而此時的德軍勢力分布於從挪威北部延伸到法國大西洋沿岸的廣大地區。一九四〇年夏天，英國仍有人主張與德國妥協以換取和平，也就是承認英國無法擊敗軸心國。支持這項觀點的人並不多，而且我們很難估計這些人實際上有多少影響力，儘管如此，這項少數觀點在政治上仍具有代表性。支持協商和平的人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在一戰期間擔任首相的勞合喬治。勞合喬治雖然不斷表示邱吉爾領導的英國至少比張伯倫擔任首相期間更能有效進行戰爭，但他在報章雜誌與國會發言時卻也都直言不諱，他傾向於支持與德國簽訂某種形式的和約。張伯倫覺得勞合喬治根本就是英國版的貝當元帥，認為他在一旁伺機而動，準備一有機會就取代破產的英國政府。一九四一年五月，邱吉爾在國會回應勞合喬治的演說時也曾針對這點加以嘲諷，而這也成為勞合喬治最後一場重要演說。<sup>258</sup>勞合喬治因為人們拿他跟貝當相比而大受刺激，但與貝當一樣，勞合喬治確實可能受到一戰造成的可怕代價影響，因此希望和平可以讓英國擺脫戰前的對抗狀態，轉而在德國監督下重新建立國家認同。無論如何，英國在一九四〇年並未接受和談。邱吉爾堅信自己在五月接任首相，並不是為了在幾個星期之後恥辱地結束戰爭。就連飽受批評的張伯倫也在六月底的全



球廣播嚴正表示，英國「寧可因戰敗而毀滅，也不願接受納粹的支配」。<sup>259</sup>

一九四〇年夏天的英國並非毫無防禦能力，不過在敦克爾克撤退後，英國陸軍暫時縮減為一個小國的規模。英國依然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不過兵力必須分散到四個戰場：本土水域、大西洋、地中海與亞洲。英國皇家空軍的防衛能力持續提升，除了增加飛機數量，也整合了管制與通信系統，使英國能以較少數量的戰鬥機有效對抗來襲敵機。英國的全球貿易、金融經濟與大量商船，意謂著英國可以運用遠方資源來維持戰時經濟，在武器生產上足以超越德國。一九四〇年八月，英國向美國下了大量訂單，雖然美國在一九三〇年代通過了《中立法案》，但美國企業依然提供英國兩萬架美國飛機與四萬兩千部航空發動機，此外也提供高辛烷值燃油，這使英國戰鬥機的性能超越了德國對手。<sup>260</sup>七月，英國根據自身能力擬定戰略，從三方面對德國與義大利進行戰爭。首先是封鎖與經濟戰，這也是一九三九年英法戰爭計畫重要的一環；其次是對軸心國占領的歐洲進行政治戰，也就是進行政治宣傳與破壞行動（邱吉爾的說法是「在歐洲放火」）；第三是對德國與義大利進行遠距離「戰略轟炸」，目標是轟炸範圍內的工業中心。

然而這三種做法在實際執行時，成功的希望都不是很大。封鎖難以產生效果，因為德國與義大利出人意表地支配了絕大部分歐陸，可以取得豐富的原料與糧食資源。法國投降之後，德國企業與軍方馬上協調將取得的原料與糧食投入戰爭。政治戰與破壞行動能有多少效果，完全要看運氣。廣播與傳單內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因為每個宣傳組織都有自己的目標，而這些目標有時會出現彼此矛盾與對立的現象。情報單位認為，雖然歐洲占領區有許多民眾適合做為宣傳對象，但要藉由這種方式掀起普遍抵抗或在各地引發叛亂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儘管如此，由經濟

戰大臣道爾頓（Hugh Dalton）負責的特別行動執行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依然組織團隊進行訓練，等待滲透機會的出現。一九四〇年夏天，英國幾乎把希望全寄託在轟炸德國上面。邱吉爾在該年七月給飛機生產大臣比弗布魯克勳爵的信上，提出一項著名說法：唯有藉由「重型轟炸機造成的巨大破壞與毀滅性攻擊」才能打倒希特勒政權。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一日到十二日深夜，英國開始轟炸德國的魯爾與萊茵蘭工業區；直到年底為止，只要情況許可，英國每晚都會進行轟炸。轟炸並未對德國造成重大破壞，不過空襲卻迫使成千上萬德國人在夏夜裡躲進防空洞，德國民眾因此廣泛要求德國空軍進行報復。英國的情報單位起初樂觀地認為轟炸破壞了德國的工廠與士氣，但這種樂觀的想法不久就破滅了。等實際消息傳回來時，才知道只有一小部分飛機找到了目標區，實際命中目標的又更少。<sup>261</sup>雖然戰後描述總是強調轟炸有激勵英國士氣的效果，但其實早期的空襲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除了前述行動，英國政府也向海外尋求援助。在美國，民眾不僅對於英國能否支持下去意見分歧，對於美國是否應該主動介入歐洲戰爭也呈現兩極看法。爭取美國支持是邱吉爾的首要目標，但他也小心翼翼不想透露太多訊息。一九四〇年夏天，面對德國入侵危機，英國開始討論把皇家海軍移往新世界的可能，邱吉爾告訴英國駐美大使洛錫安勳爵（Lord Lothian），「要讓美國打消沾沾自喜以為可以趁機撿拾大英帝國殘骸的念頭……。」<sup>262</sup>然而，動不動就把帝國掛在嘴邊，反而會讓美國的政治人物打退堂鼓。在美國，無論政治上屬於哪個黨派，都不願支持帝國。美國參議員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對哈利法克斯勳爵坦白說道：「如果你們英國人能不要再提大英帝國，我們應該可以相處得融洽一點。」<sup>263</sup>英國自認可以得到大英帝國海外領土的協助，但在一九四〇年夏天同盟國戰敗之後，帝國的角色已變得模糊起來，倫敦方

面提出的振奮之詞也因此淪為一廂情願。若要充分動員帝國的人力與工業資源，就會需要更多時間，但這些資源最後大多用來防守海外領土，而非運往英國本土。開戰後有十五個月的時間，英國自身負擔了九成的帝國軍事需求。<sup>264</sup>

帝國人力的動員因地而異。白人自治領起初毫不思索地拒絕再次派兵海外，他們不願像一戰那樣犧牲，並且認為應該把軍隊留下來保護自治領。澳洲政府最後勉為其難地同意派兵前往中東；加拿大政府的動員也獲得國會同意，但條件是法語區的加拿大人不能被徵兵也不能派駐海外。在南非，英國人與阿非利卡人也存在類似的緊張關係，準備到海外作戰的南非志願軍，軍服上會配有醒目的橘色肩章，提醒人們荷蘭與南非的深厚歷史淵源。儘管白人自治領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持續支持英國抗戰，但澳洲總理孟席斯（Robert Menzies）卻傾向於協商和平（不過他後來改變了立場），加拿大則針對英國皇家空軍在自治領設置訓練機構的條件進行激烈辯論，而且也對首批加拿大部隊在英國營區被迫接受的不良待遇提出強烈抗議。<sup>265</sup>愛爾蘭雖然在一九三七年獨立，卻仍是大英帝國的自治領，愛爾蘭總理瓦勒拉（Éamon de Valera）即使面對能夠統一全愛爾蘭的條件（他為此已奮鬥了二十年），卻仍堅持愛爾蘭應保持中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瓦勒拉在愛爾蘭議會表示，我們愛爾蘭人「知道強國以武力對付弱國是怎麼一回事」。邱吉爾對於愛爾蘭人「面臨戰爭卻逃避責任」深感不滿，但愛爾蘭政府在大戰期間一直堅決維持中立。<sup>266</sup>

大英帝國的非白人領地對於參戰有著相對不同的反應。印度的狀況尤其微妙，印度的政治人物，不管來自什麼政治背景，都心照不宣地相信只要支援英國作戰，未來將可得到政治改革做為回報，甚至有可能獲得獨立。印度軍隊被派到帝國在亞洲的邊緣地區進行支援，如伊拉克、

肯亞、亞丁、埃及與新加坡等地，此外印度也在國內籌措數量龐大的資金來協助保衛印度。即使印度各主要黨派都反對法西斯主義，他們也希望印度的參戰能讓英國人給予他們可接受的政治回報。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甘地要求印度能夠完全獨立。邱吉爾政府只同意在德里設立戰爭諮詢委員會，委員會由印度人與更廣大的執行委員會組成，但關鍵的國防、財政與內政事務仍牢牢掌握在英國人手裡。十月，印度國大黨發起公民不服從運動，於是繼五百名印度共產黨領袖之後，七百名國大黨領袖也被捕入獄。為了讓印度殖民政府能夠宣布國大黨為非法組織並且徹底擊潰國大黨，倫敦的戰時內閣打算通過《革命運動條例》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rdinance），但對於是否要真正行使該法仍感到猶豫。儘管如此，到了一九四一年春仍有七千名國大黨黨員被判有罪，四千四百人遭到監禁。就連支持參戰的印度人，英國也因為優先滿足本土防衛需求而只能給予非常有限的資源。印度最終貢獻了超過兩百萬名志願軍，但印度軍隊在開戰之初的軍事條件仍相當簡陋。戰爭爆發時，整個印度次大陸完全沒有現代戰鬥機，只有一門防空砲；將近兩年後，在日本入侵東南亞前夕，印度軍隊仍沒有現代戰鬥機、戰車或裝甲車，只有二十門防空砲與二十門戰防砲。<sup>267</sup>當印度軍隊移動到其他戰場時，幾乎完全得仰賴英國的補給。英國在亞洲的力量極其薄弱，因此當日本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要求英國關閉滇緬公路以切斷蔣介石軍隊的後勤補給線時，邱吉爾為了避免「與日本開戰的風險」而不得不照辦。<sup>268</sup>

埃及是另一個嚴重問題。雖然根據一九三六年條約，埃及名義上已經是獨立國家，但英國仍在該國擁有重要的政治與軍事影響力，而且享有駐軍蘇伊士運河以維持通往亞洲海外領土生命線的特權。一九四〇年五月與六月，英國在歐洲戰敗，埃及的馬希爾（Ali Maher）政府不僅拒



絕參戰，甚至主動要求終止英國在埃及擁有的一切特權。英國考慮像一戰一樣強制將埃及納入保護國，或者宣布戒嚴，但最終靠著鐵腕威脅就足以迫使埃及的法魯克國王（King Farouk）撤換馬希爾，另外任命親英的政治人物薩布里（Hasan Sabry）擔任首相。雖然薩布里願意提供英國的各項需求，但他也不同意埃及參戰；埃及政府最終是一直等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才對已經顯露敗象的軸心國宣戰，藉此確保在未來成立的聯合國組織中獲得席位。英國把埃及視為全球戰略的重要據點，甚至不惜違反一八八八年的《運河條約》，在蘇伊士運河兩端港口增兵與裝設重砲。<sup>269</sup>強化運河的防禦雖然能夠阻止德國與義大利船隻在戰時進入蘇伊士運河，卻與優先防衛本土的戰略需求有所矛盾，因此在往後兩年，蘇伊士運河始終處於嚴重的威脅之下。至於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帝國領土，就只能仰賴英國的軍事保護來維繫；但只要德國入侵英國的危機一天不解除，英國就無法派兵保護位於亞洲的海外領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德國情報單位從印度洋沉船取得一份祕密文件，並且將這份文件交給日本人。文件上清楚表明，如果發生最糟糕的狀況，英國將無力維持在東南亞的帝國地位。對於一九四〇年的英國而言，海外帝國能提供的資源仍然十分有限，但對海外帝國與眾多海外據點來說，英國能提供的資源也同樣不足。

這種難堪局面與同盟國其他三個殖民帝國面臨的現實形成強烈對比：荷蘭、比利時與法國這三個帝國都被德國征服。比利時與荷蘭的海外領土完全與母國斷了聯繫。德法停戰協定允許維琪政府保有對海外帝國的控制，但戰爭基本上徹底破壞了法國的帝國統治，導致海外帝國情勢脫離法國本土的掌握。一九四二年，維琪政府殖民地部長布雷里耶（Jules Brévié）終於辭職：「我的角色已經謝幕，因為我們不再擁有帝國。」<sup>270</sup>這三個國家實際上已無法管理自己的帝國。由於軸心國此時



尚不確定要在歐洲建立什麼樣的新秩序，海外領土的命運也在未定之天。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墨索里尼、希特勒與兩人的外交首長齊亞諾與李賓特洛甫，四個人開會討論瓜分西方帝國殘留的非洲領土：義大利取得北非與西非，德國取得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極具野心的計畫只能等到擊敗英國之後才能實際執行，但至少在一九四〇年夏天，德國建立非洲帝國的想法再度浮上檯面。除了有殖民地遊說團體在外交部與德國海軍部進行熱心遊說，殖民地同盟也努力想促成此事，同盟領導人埃普也在六月被任命為臨時殖民地部長。<sup>271</sup>最初在空想下產生的計畫，是要建立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海外帝國，領地包括前法國殖民地、比屬剛果、奈及利亞，甚至包括南非與羅德西亞，甚至打算讓法屬馬達加斯加島成為歐洲猶太人的半自治家園。<sup>272</sup>德國決定讓法國保有海外帝國，但這個決定也只是暫時的，德國只是想以此換取法國不與英國重建友好關係——不過最終英法兩國的親善並未實現，因為英國始終將維琪法國視為敵人。

比利時、荷蘭與法國這三個前殖民帝國並不確定英國是否會利用其戰敗的機會，將勢力範圍延伸到自己的疆域，無論英國這麼做是基於短期戰略需要，還是深思熟慮下擬定的長期計畫。一九四〇年五月，英國搶在德國之前占領丹麥統治下的冰島，而且隨即以慣用的殖民模式統治島民，逮捕與驅逐冰島少數的共產主義者與控制冰島貿易。<sup>273</sup>然而，英國的帝國作風受到美國的強烈反對。美國國內的反殖民遊說團體倡導未來殖民帝國都應該委託國際組織管理，就像一九一九年的託管制度一樣；更激進的反帝國主義者則認為歐戰是個機會，可以讓所有前殖民帝國的屬地獲得獨立。當英國在冰島的統治遭遇愈來愈激烈的反彈時，美軍便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接管冰島。兩年後，冰島宣布成為獨立共和國。一九四二年，美國國務卿赫爾要求訂定國際憲章，保證戰後在國際託管

制度下讓殖民地人民獲得獨立。<sup>274</sup>從殖民帝國的角度來看，一九四〇年確實是個關鍵轉捩點：讓全球的帝國統治陷入危機，戰敗的宗主國再也無法維繫其原本的帝國統治。

對比利時與荷蘭來說，一九四〇年的戰敗造成複雜的政治局勢。兩國都與自己的帝國斷絕聯繫，陷入前所未有的處境：本土遭到占領，從原本的統治者淪為異國的臣民。比利時國王決意留在布魯塞爾，這項決定使流亡海外的比利時流亡政府失去正當性，也讓比屬剛果的憲法地位懸而未決。由於剛果擁有豐富礦藏，包括世界最大的鈾礦，因此列強都對剛果的命運深感興趣。法德曾經對於共同取得剛果進行討論，德國當局也想施壓比利時轉移其殖民地礦產公司。一九四〇年五月，英國政府拒絕承認剛果的中立地位，因為英國同樣希望運用剛果豐富的礦藏來支援同盟國進行戰爭。為了維護比利時主權，比利時國王命令流亡海外的殖民地大臣弗雷施豪爾（Albert De Vleeschauwer）必須讓剛果與盧安達、蒲隆地等殖民地維持中立，但在英國的壓力下，弗雷施豪爾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同意讓同盟國使用剛果的資源。一年後，剛果的貨幣與貿易已完全整合到英國的經濟區。<sup>275</sup>美國也對剛果感興趣。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國已在剛果駐紮了一千兩百名士兵，包括黑人部隊——不過，美國最終還是在比利時流亡政府的堅持下撤離黑人部隊，因為流亡政府擔心殖民地人民會以美國黑人做為爭取解放的榜樣。面對英美的干預，弗雷施豪爾努力維持比利時在剛果的主權，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各種跡象皆顯示戰後美國必定會推動前殖民地走向國際，再使其獨立。<sup>276</sup>

荷蘭的處境也一樣嚴峻。荷蘭威廉明娜女王與流亡政府一同逃往倫敦，但流亡海外的荷蘭政府在維繫帝國之事完全使不上力。荷蘭位於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地古拉索（Curaçao）與蘇利南（Surinam）遭英美託

管，兩地的命運已非荷蘭所能掌控。<sup>277</sup>位於西印度群島的荷蘭殖民地政府與英國海軍共同封鎖了德國的海外殖民經濟計畫，前者監禁了在殖民地生活的兩千八百名德國人與五百名荷蘭納粹黨成員，德國政府為了報復，也在荷蘭逮捕了五百名荷蘭社會賢達，將他們送往布亨瓦德

（Buchenwald）集中營。對殖民地未來的關注，成為荷蘭民族認同的關鍵元素，而德國人最終認為這對自己的統治構成了政治威脅。荷蘭最主要的政治運動，荷蘭同盟（Nederlandse Unie），到頭來也逃不了遭當局禁止的命運。<sup>278</sup>與此同時，荷屬東印度很快也受到日本政府施壓，日本要求當地政府提高石油、橡膠、錫等原料的供應量以滿足日本的戰爭需求。日本政府威脅東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政府，若允許其他國家妨礙日本的商業利益，日本就會出兵干預。巴達維亞（今日的雅加達）殖民政府直到一九四一年為止都能拖延日本大使的要求，但日本早已認定這些東印度群島是日本亞洲新經濟秩序的一部分，最終於一九四二年初武力奪取荷蘭在東亞的整塊殖民地，形同消滅了荷蘭的海外帝國。<sup>279</sup>

法蘭西帝國的狀況又與比利時、荷蘭不同，但最終命運卻與比利時及荷蘭的經驗相近。德國人對維琪政權的態度，讓人以為法蘭西帝國有可能在宗主國被征服後仍然倖存下來。法國的非洲領土首先必須滿足德國的經濟需求，但這些需求並不如事先預想的那樣嚴苛，德國也允許法國繼續在帝國境內駐軍以維持當地秩序。<sup>280</sup>貝當元帥認為要在法國建立新秩序，海外帝國依舊不可或缺。維琪政府宣揚母國與殖民地一體的觀念，並且把貝當塑造成「帝國的拯救者」。殖民遊說團體「海上與殖民地同盟」的組織成員在戰時增加到原來的三倍，超過七十萬人。維琪法國為海外帝國的經濟發展制定了宏大的十年計畫，包括鋪設穿越撒哈拉的新鐵路，某些路段還是強徵猶太人勞動完成。維琪法國甚至推動憲政計畫，暗示未來將成立帝國議會與賦予帝國公民身分。用法國歷史學

家阿傑隆（Charles-Robert Ageron）的話來說，海外帝國成了法國彌補戰敗恥辱的神話。<sup>281</sup>然而，法蘭西帝國的現實並不容樂觀。在德國支持下，維琪法國得以拒絕義大利的領土要求，但顯然墨索里尼總有一天會再度要求法國割讓領土。在法屬印度支那，日軍向法國施壓，要求允許他們在越南北部部署軍隊與飛機，對此法國也無法拒絕。一九四〇年九月，日本駐紮六千名士兵到法屬印度支那並建立五個空軍基地，逐步控制當地。<sup>282</sup>或許最弔詭的是，一九四〇年法蘭西帝國完整性的最大威脅反而不是軸心國，而是前盟友英國。因為此時的軸心國為了維持與法國的關係，在領土要求上仍有所節制，反觀已經成為敵對陣營的英國則是毫不留情。

英國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對於盟邦法國的政策，主要仍寄望法國政府能動用帝國境內的飛機、部隊與艦艇，繼續與英國並肩作戰。六月十九日，英國殖民地大臣洛伊德勳爵（Lord Lloyd）奉命前往波爾多，希望法國承諾繼續在北非抵抗，以及讓法國地中海艦隊前往北非支援。法國起初同意，但不久便違反承諾。<sup>283</sup>德法停戰協定簽訂後，法蘭西帝國也隨之放棄抵抗。法國留給英國的只有已經被帶到英國的少數部隊與戰爭部次長戴高樂。六月十八日，戴高樂獲准在倫敦廣播，呼籲法國人繼續戰鬥；十天後，邱吉爾政府承認戴高樂是「戰鬥法國」領導人。然而，被帶到英國的法國部隊卻毫無繼續抗戰的熱忱。在一萬一千名水兵中，高達九千五百人想返回法國，只有兩千名士兵響應戴高樂的號召。雖然戴高樂僅有少數支持者，但英國決定把戴高樂視為真正的法國盟友，並且拒絕與維琪的新政權來往。維琪法國則在戴高樂缺席審判的狀況下，認定他犯了叛國罪並將他判處死刑。<sup>284</sup>

英國當局與維琪政府的對立，牽動了法國艦隊的命運。英國帝國參謀本部不希望法國艦隊落入德國人手裡，因為這會讓地中海的海軍均勢



朝德國傾斜。雖然感到兩難，但英國戰時內閣還是決定必須奪取法國艦隊，否則就應該搶先一步予以摧毀。七月三日，英國皇家海軍對法國海軍發起「投石機作戰」（Operation Catapult）。約有兩百艘停在英國港口內的法國艦艇遭到登船與奪取，而停在埃及亞歷山卓港內的法國海軍船隻也被解除武裝，在西非達卡港更有一艘法國戰鬥巡洋艦遭英軍魚雷擊沉。法國的凱比爾港海軍基地位於阿爾及利亞的奧蘭附近，該港口很快就遭到英國薩默維爾海軍中將（James Somerville）率領的英國分遣艦隊封鎖。薩默維爾向法軍指揮官瓊蘇爾海軍上將（Marcel-Bruno Gensoul）下達最後通牒，如果他不自行沉船隻或將艦隊開往英國、美國或加勒比地區的港口，就只能接受戰鬥的後果。在等待了十一個小時之後，英國軍艦終於開火，擊沉法國戰鬥艦布列塔尼號（*Bretagne*）與擊傷另外兩艘軍艦。七月六日，敦克爾克號（*Dunkerque*）戰鬥艦被一枚魚雷擊中，遭受重創。法國海軍總計死亡一千兩百九十七人，受傷三百五十一人。幾天後，維琪政權與英國斷交，派出轟炸機空襲英國位於直布羅陀的海軍基地。<sup>285</sup>

法國艦隊遭受攻擊的消息震撼了法國民眾，但這只是英國針對法蘭西帝國進行的其中一部分海軍戰略。接下來，英國的封鎖將擴大到整個法國與法國的非洲殖民地，切斷北非貿易，輸入法屬非洲殖民地的糧食與石油因此大為減少，輸入阿爾及利亞的石油陡降到戰前的百分之五。更不用說英國軍艦還會攻擊維琪法國的護航船團。這些行動使得非洲當地出現糧食危機，導致維琪政權與親維琪殖民主義者憎恨英國與反對英國干預。<sup>286</sup>凱比爾港攻擊事件之後，達朗海軍元帥曾經考慮由義大利與法國海軍聯手攻擊英國的亞歷山卓港，但這個方案被墨索里尼否決。<sup>287</sup>英國也對法國殖民地施加壓力，迫使其支持戴高樂。起初只有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島響應，但在一九四〇年稍晚，加彭、喀麥隆、



查德與大溪地也陸續跟進，法蘭西帝國因此分裂成兩個武裝陣營。<sup>288</sup>

八月，英國希望拉攏塞內加爾加入自由法國，於是英國與戴高樂共同發起第二次行動，代號「威嚇作戰」（Menace），目的是攻擊塞內加爾首都達卡。法國戰鬥艦黎希留號（*Richelieu*）當時正停泊在港內，波蘭與比利時的國家黃金儲備也存放在此處。這一次，英國皇家海軍遭遇維琪守軍的頑強抵抗，許多船隻受損嚴重，作戰完全失敗。這次軍事作戰雖然中止，卻讓各歐洲帝國看到英國的決心，顯然英國已準備好要將自己的戰時利益無情地加諸在其他國家的殖民地之上。一九四〇年秋天，謠傳法國即將單獨與德國締和，整個法蘭西帝國即將加入以英國為主要敵人的泛歐洲陣營。邱吉爾嚴厲斥責法國，他威脅一旦維琪法國加入德國，英國將會對維琪法國展開空中轟炸。<sup>289</sup>在荷蘭，當地的法西斯主義領袖繆塞特（Anton Mussert）表示，三百年來，英國帝國主義才是歐洲真正的敵人，他呼籲南非的荷蘭移民再次發動波耳戰爭。<sup>290</sup>

對歐洲軸心國來說，大英帝國是重新塑造歐陸與地中海政治秩序的絆腳石，但德義兩國卻從未致力協調彼此的戰略來擊敗英國或迫使英國投降。德國擊敗法國之後，眼前突然浮現出各種機會，但也顯示德國在此之前並未仔細規畫接下來該採行的戰略。儘管如此，羅馬與柏林當局仍對於共同規畫戰略依舊是興趣缺缺。墨索里尼堅持自己進行的是一場「平行戰爭」，而不是與希特勒並肩作戰。在德國的壓力下，義大利只能對法國提出有限的領土主張，這點令墨索里尼頗為不悅。墨索里尼也不同意德國讓維琪政權在北非保有部隊對抗英國的決定，因為這些部隊也可以用來對抗義大利。<sup>291</sup>德義對於即將來臨的新秩序顯然有著不同的看法。對墨索里尼來說，義大利必須建立一個歐洲帝國，就跟希特勒擊敗法國後在歐陸北部建立的帝國一樣，義大利不能只局限在非洲或中東建立帝國。另一方面，希特勒則樂於見到墨索里尼在地中海地區發

展，但他指示軍方絕不能向義大利人透露他的真實想法。一九四〇年六月底，墨索里尼主動提出義大利願意派出遠征軍參與希特勒對抗英國的任何戰役，卻遭到希特勒禮貌而明確地回絕。墨索里尼為此也回絕了希特勒派德國空軍轟炸蘇伊士運河的提議。「顯然，」齊亞諾在日記裡抱怨道：「相信我軍與相信我軍的可能性並不是一件過分的事！」<sup>292</sup>德義兩國曾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簽訂《鋼鐵條約》建立同盟關係，但這一關係顯然只具有宣示性的意義。在一九四一年春天之前，這兩個盟邦基本上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

希特勒與軍事高層若想在一九四〇年夏天結束西線戰爭，他們手上只剩下兩個戰略選項可以選擇：一、找到英國願意接受的政治解決方案。二、以軍事手段終結英國反抗。但這兩個選項都不容易。第一個方案難在德國並不清楚英國有哪個主和黨派具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可以簽訂和平協定，第二個方案難在無論是封鎖還是入侵，德軍手邊沒有任何一種可能的軍事選項可以保證成功。希特勒最後兩種方案都嘗試，希望其中一項能夠成功。邱吉爾於六月十八日發表演說，誓言英國將獨自作戰，在這個背景下似乎難與英國有政治解決的空間。希特勒私底下一直不瞭解英國為什麼要持續作戰，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記錄了七月十三日與希特勒的會議：「元首一直想著這個問題，英國為什麼不想和談？」<sup>293</sup>更讓希特勒困擾的是，英國內部也流出了非常模糊的訊息，暗示協議有可能達成。整個一九四〇年間，檯面下一直有居間調停者表示英國有些具影響力的人物可以協商和平條件。六月底，戈培爾在日記裡提到英國「有兩大黨，一個主戰，一個主和」，他在幾天後又寫到：「英國傳來的和談氣息愈來愈濃厚了。」<sup>294</sup>

七月初，希特勒決定再次公開呼籲英國和談。希特勒計畫在七月十九日在帝國議會演說，並在演說前幾天對幕僚解釋：他不想毀滅大英帝

國，因為德國人若為此流血，得利的將是美國人與日本人。<sup>295</sup>歷史學家理所當然會對這段描述感到懷疑，但希特勒在情感上確實跟邱吉爾一樣尊崇大英帝國的輝煌歷史。一九三〇年代乃至於在戰爭期間，希特勒不只一次表示大英帝國是德國殖民計畫的範本，其他的德國帝國主義者也如此認為。<sup>296</sup>這種對敵人的精神分裂觀點就反映在七月十九日的演說上。希特勒一開始就表示，他可以預見一個帝國的毀滅，但「他無意毀滅甚或損害」這個帝國，接著簡短地訴諸理性：「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繼續這場戰爭。」<sup>297</sup>希特勒對戈培爾說道，這個訴求只是個「簡要的提議」，沒有詳細的內容，但他「言盡於此」。<sup>298</sup>邱吉爾拒絕回應。當內閣外交顧問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問邱吉爾為什麼不回應時，邱吉爾表示他對希特勒無話可說：「跟這種人多說無益。」<sup>299</sup>幾天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正式回絕了這項提議，希特勒只能接受這是英國「最後的拒絕」。<sup>300</sup>

對希特勒來說，英國若願意停戰當然最好（儘管保留大英帝國有違義大利、日本與蘇聯等盟友的利益），但他也預料有可能會遭拒絕。事實上，早在發表演說之前，希特勒已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再次發布訓令對英國進行海空封鎖，他也授權軍方針對入侵英國南方擬定計畫。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希特勒發布入侵訓令，準備進行「海獅作戰」

（Operation Sea Lion），計畫登陸英國東南方海岸。進行這項行動的前提是壓制英國皇家空軍，使其「不足以對德國的登陸作戰進行攻擊」。<sup>301</sup>在帝國議會演說的前幾天，希特勒曾與幕僚討論，他首次提出一個更激進的軍事手段來解決英國反抗的問題。希特勒一直想找出英國堅持不和談的原因，而他慢慢開始懷疑英國也許與蘇聯達成某種協議。就在希特勒向英國提出和平呼籲的兩天後，他在各級軍事長官的會議中吐露心聲，這些心聲正逐漸化為一場可能的戰爭。「必須提防俄羅

斯，」希特勒的空軍副官記錄下這句話：「必須開始計畫對俄羅斯的攻擊行動，而且必須極機密地進行。」希特勒找來蘇芬戰爭的新聞影片，好讓自己更深入瞭解俄羅斯這個假想敵。<sup>302</sup>七月三十一日，希特勒終於確定戰略，並向軍方將領們說明：由於英國不放棄戰爭，因此必須做好準備先對蘇聯發動攻擊，讓英國進行兩線作戰的最後希望落空。此時希特勒提出的還只是暫時方針，而非擴大戰爭的明確訓令，但這個想法日後卻逐漸成為希特勒的信念。他深信要徹底擊敗大英帝國，就必須從東方下手。

希特勒的這項決定，時常被解讀為一年後德國對蘇聯發動大規模作戰的源頭，彷彿已清楚顯示希特勒的目標已不再是入侵或擊敗英國。這樣的解讀完全悖離事實。此時的德國最高統帥部依舊將目標擺在迫使英國投降，無論是透過封鎖、入侵還是政治手段。希特勒在七月二十一日與各級軍事長官開會時也提到，他不希望英國「從他手中奪走主動權」。<sup>303</sup>選擇攻擊蘇聯，最初其實是針對英國不願和談而做出的反應，而非要以蘇聯為主要攻擊目標。希特勒在一九四〇年夏天的首要目標依然是結束英國的抵抗，而不是將帝國疆域擴展到俄國。英國與蘇聯戰略是互補的，而非兩個完全不同的選項。儘管如此，希特勒對於蘇聯的野心也確實懷有疑慮。史達林利用德國與西方國家交戰的機會，於一九三九年八月推進自己的主張，兩國因此祕密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蘇聯又逐步鯨吞蠶食德國未來想在東方建立的帝國疆域。一九四〇年六月，當邱吉爾任命激進的社會主義政治人物克里普斯爵士擔任駐莫斯科大使時（邱吉爾日後表示這簡直就像「一個瘋子到一個全是瘋子的國家」），柏林當局不禁懷疑，邱吉爾此舉很可能是為了促成英蘇親善。<sup>304</sup>七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對他的軍事幕僚表示「搞不清楚英國在想什麼」。戈培爾則是在幾天後指出，需要幾記重拳「才能讓英國清醒



一點」。305

德國非常認真地擬定對英國的軍事作戰計畫，絲毫不敢大意。德軍雖然深知蘇聯是潛在威脅，卻仍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海上與空中與英國交戰，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天，甚至還對英國進行了陸戰。如果希特勒早在此時就決定把蘇聯列為頭號目標，又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在英國身上？一九四〇年夏天，德國縮減了陸上武器的生產量，將資源轉移到飛機與艦艇生產，德國最高統帥部也針對兩棲作戰擬定訓令與準備必要物資。德軍的作戰計畫十分周詳，這種規模的入侵行動不可能只是為了對英國領導高層施加壓力，而是真的打算執行侵略計畫。德軍事前沒有料想到的是，為了創造渡海攻擊的有利條件，海軍與空軍必須承擔這麼沉重的責任。在入侵英國之前，海軍從未進行過大規模兩棲作戰，而空軍也從未進行過遠距離空戰。德國海軍在先前的挪威戰役中損失慘重，此時也沒有足夠潛艦能反制英國的海上干預。因此，入侵英國的重任就落在德國空軍肩上，德國空軍必須確保進攻英國的海上航道的安全，還要壓制英國的空軍力量。此處的難題在於，雖然德國空軍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協助地面部隊攻擊波蘭、北歐與西歐時曾有過極佳表現，但德國空軍毫無遠距離獨立作戰的經驗。要重新調整空軍進行大規模海外空戰與建造合適的機場需要時間。德國空軍這次面對的是一場遠比波蘭與法國戰役更為龐大的戰鬥，他們必須摧毀敵人的空軍，在兩棲入侵之前先破壞敵軍的軍事設施，然後為入侵部隊建立保護傘以對抗敵人的海軍，同時還要對地面的軍事作戰提供戰術空軍支援。306

英德雙方都知道空優是決定一九四〇年夏日勝敗的關鍵。七月，英國帝國參謀本部表示：「此戰的核心在於空中優勢。」307到了夏末，英德雙方爆發這起戰役的第一場大規模空中衝突。英德空軍有著不同的組織方式。德國空軍編組成大型航空軍團，每個航空軍團擁有轟炸機、



戰鬥機、俯衝轟炸機與偵察機等多種戰機，英國皇家空軍則是依照功能進行編組，分成戰鬥機司令部、轟炸機司令部、海岸司令部，並未針對支援陸軍或海軍行動建立聯合作戰機隊。德國空軍將第二與第三航空軍團的大部分戰力部署於法國，總數達七十七個作戰中隊；實力較弱的第五航空軍團（六個中隊）則部署於挪威，其任務是攻擊英國的東部與東北部海岸。八月初，德國空軍在進行空襲前夕擁有八百七十八架可用的梅塞施密特Me—109單座戰鬥機、三百一十架梅塞施密特Me—110雙引擎戰鬥機、九百四十九架可用的轟炸機與兩百八十架俯衝轟炸機。同一時間的皇家空軍則擁有七百一十五架可用的戰鬥機（十九個中隊的超級馬林噴火戰鬥機與二十九個中隊的霍克颶風戰鬥機），必要時還可於一天內另外調動四百二十四架飛機。英國轟炸機司令部規模遠比德國小得多，一九四〇年七月時只有六百六十七架轟炸機，而且同年夏天英國轟炸機百分之八十五的攻擊任務都不是針對德國空軍基地、倉庫與入侵艦艇，而是德國境內的其他目標。<sup>308</sup>與德國空軍相比，皇家空軍儲備了較多的戰鬥機飛行員，生產戰鬥機的速度也較快：在不列顛空戰期間，英國工廠總計生產了兩千零九十一架戰鬥機，德國工廠只生產了九百八十八架。這場戰役的關鍵在於戰鬥機之間進行的空戰，其結果將決定英國南部戰事的勝負。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布羅克中將（Alan Brooke）對皇家空軍下達一道簡單命令：「不要讓敵軍取得空優。」<sup>309</sup>

德國並未立刻出動大規模兵力爭奪空優。六月底到七月，德國只派出少數飛機不分晝夜進行試探性攻擊，除了測試英國的防衛能力，也讓飛行員熟悉英國上空的狀況。然而這些試探無法窺破英國戰鬥機司令部的組織祕密。英國戰鬥機司令部仰賴一套複雜的通信網路，除了針對來襲敵機提出預警，也能協調各地戰鬥機做出回應。這套網路的核心是運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研發的雷達（無線電偵測與定距）：從最西部的康

瓦爾一路延伸到蘇格蘭北部，英國總共設置了三十座偵測高空飛行器與三十一座偵測低空飛行器的雷達站，此外還有三萬名地面觀測團成員分布在一千個觀測點協助監視。雷達站與觀測站以電話線和戰鬥機司令部與無數航空站聯繫，使其可以在幾分鐘內預警，讓戰鬥機緊急起飛應戰。雖然戰鬥機司令空軍上將道丁（Hugh Dowding）日後抱怨這套系統經常提供「不準確與不充分的情報」，但這些情報已足以讓一定數量的戰機升空抵抗來襲的敵機，節省了戰機例行巡邏的時間。<sup>310</sup>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與試探，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決定出動大量機群攻擊英國戰鬥機司令部各處基地，來測試皇家空軍的抵抗能力。這次作戰行動的代號是「鷹日」（Eagle Day），戈林希望四天後便能徹底擊潰英國的空防。八月一日，希特勒總部下達爭奪空優的命令，並且將鷹日作戰定於八月五日。<sup>311</sup>然而，惡劣的天候狀況使出擊時間延後超過一個星期，鷹日作戰又改成八月十三日。結果當天濃密的雲層導致出擊不利，英國戰鬥機司令部沒有任何一座基地遭到直接攻擊。德國損失四十五架飛機，皇家空軍只損失十三架。

不列顛之役的開場極為混亂，然而這種混亂局面在往後幾個星期也絲毫沒有改善。戈林根據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德軍快速獲勝的前例，認為這次只需四天就能擊潰皇家空軍，但結果證明他的承諾不可能兌現。不列顛之役開打後的前三個星期，德國空軍對皇家空軍基地發動五十三次空襲。八月的最後十天，因為天候轉好的關係，德軍加強了攻擊的力度。在空襲中，有三十二次是針對戰鬥機基地，其中三十次目標都是部署在英國東南方的皇家空軍第十一聯隊，但只導致三座基地暫時無法起降，這些基地都是接近海岸的前線機場。儘管主要機地遭到破壞，仍然有其他周邊的小型機場可供飛機起降，這些分散到各地的飛機全做了周密的掩護。雷達站在八月初曾短暫受到轟炸，但因為德國人低

估雷達站的重要性，因此雷達鏈的損害相對輕微。後世有許多人強調這場戰役中雙方戰力的懸殊比例，彷彿英國空軍是以寡擊眾，邱吉爾那句戰鬥機司令部的「少數人」名言更是渲染了這項觀點，然而在實際上，從八月中旬到九月初，戰鬥機司令部的規模並未受到太大減損，飛行員人數也從未出現不足的狀況。九月六日，戰鬥機司令部還有七百三十八架可用飛機，反觀德國戰鬥機的平均可用數量已降到五百架。<sup>312</sup>到了這個階段，容克斯Ju—87俯衝轟炸機與雙引擎Me—110幾乎都已經撤離英國戰場，因為這些戰機太過脆弱，不能冒險用來與高性能的單引擎戰鬥機對抗。雙方確實都承受了龐大損失，這是一場激烈而艱困的對抗，但英國的空防體系確實派上了用場。

就連身為敵方的德國空軍也認為英國皇家空軍只不過是「少數人」。到了八月底，德國情報單位認為英國已有十八座戰鬥機基地被毀，而戰鬥機司令部頂多只剩下三百架左右的戰機。德國在廣播中宣稱已經「支配英國空域」。<sup>313</sup>飛行員回報他們看到起火的建築物與坑坑巴巴的跑道，經常性地誇大他們擊落的飛機數量，因此當他們聽到廣播時，也認為與自己的經驗相符。這解釋了德國為什麼在八月底之後不再攻擊英國的空軍基地，轉而襲擊其他的軍事與經濟目標，希望藉此更進一步削弱英國的防衛力量，以利接下來的兩棲登陸作戰。希特勒總部接到前線傳來的消息，誤認為德國空軍已經掌握了制空權。九月三日，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日誌寫道：「英國戰鬥機的防衛力量嚴重受損，接下來的問題是英國還能不能繼續戰鬥。」<sup>314</sup>入侵前空襲計畫的最後階段是大規模轟炸倫敦，給予英國首都最大的威脅，使其陷入恐慌。九月二日，德國空軍的目標已因此改成轟炸倫敦，但希特勒等了三天才下令攻擊，他仍希望德軍掌握制空權的消息正確無誤。九月五日到六日深夜，德軍轟炸倫敦的三十個自治市，從南部的克羅伊登（Croydon）到

北部的恩菲特（Enfield），德軍鎖定了軍事、運輸與公用設施做為轟炸目標。<sup>315</sup>

後來有人認為，希特勒更改攻擊計畫及決定在九月七日轟炸倫敦，是為了報復皇家空軍在八月底轟炸柏林，而且這一計畫改變使得英國戰鬥機司令部保住一線生機。這其實是一項缺乏根據的迷思。事實上，德軍轉而攻擊倫敦與其他軍事及工業目標完全是依照原本擬定好的軍事計畫，而且轟炸倫敦早在九月七日前一個多禮拜就已經開始進行，包括九月五日到六日深夜的大規模轟炸。<sup>316</sup>希特勒是趁機利用了這一機會來安撫德國西部民眾，因為他們已經被皇家空軍轟炸了四個月。九月四日，希特勒在向全國播送的演說中承諾德國民眾，他會將英國城市夷為平地，但這些話純粹只是用來安撫人心。為了癱瘓倫敦而進行的轟炸，按理只會持續一個星期，之後就要展開兩棲入侵行動。希特勒把入侵日期定在九月十五日，屆時潮汐對於登陸較為有利，而且也可能出現好天氣。九月三日，希特勒把日期改為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戈林則不斷主張，皇家空軍已經快撐不下去。他對戈培爾說，三個星期之內就可以結束對英國的戰爭。<sup>317</sup>

過去幾個月來，英國早已針對德國入侵進行準備。英國的政軍高層在法國戰敗後也預期德國將在幾個星期內入侵英國並帶來一場災難。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布羅克在七月表示，受過訓練的人員與設備「極其缺乏」，畢竟英國陸軍在敦克爾克喪失了百分之八十八的火砲與百分之九十三的各型車輛。<sup>318</sup>一九四〇年六月到八月，英國又徵召了三十二萬四千人入伍，但來不及訓練與裝備這些士兵。英國還有三十萬支一戰時期的步槍，足以裝備二十二個陸軍師，但這些陸軍師只有一半能投入於因應德國發起的機動作戰。<sup>319</sup>情勢如此危急，就連克里普斯前往莫斯科時也銜命向蘇聯政府提出購買飛機與戰車的要求，卻遭到蘇聯當局婉



拒。<sup>320</sup>此時如果德國發動入侵，英國將毫無因應之道。雖然後世歷史學家普遍懷疑德國是否真有入侵的意圖，但當時的英國政府確實相信德國一定會發動攻擊。根據國土情報局報告的說法，英國民眾在夏初時仍懷抱希望，並不如想像中不安，他們因為空戰的捷報而受到鼓舞——當時英國的戰報就跟德國一樣，總是故意誇大敵軍損失。九月初，情報部發現民眾的情緒「異常高昂」，尤其反映在酗酒人數的減少之上。<sup>321</sup>九月初，從偵察照片與破譯德國空軍「謎式密碼」

（Enigma）<sup>[3]</sup>訊息得到的證據，顯示德軍即將入侵。九月七日，英國當局下達代碼為「克倫威爾」的訓令，所有軍事組織皆進入最高度警戒狀態以因應未來十二小時可能發生的入侵行動。然而入侵行動並未發生。下一次警報發生在下週末，也就是史稱「入侵週末」的九月十四日到十五日，因為此時的潮汐最適合德軍進攻。英軍士兵接到指示必須穿著軍服睡覺，以便在聽到警報時可以立即起身應戰。<sup>322</sup>

九月十四日恰好也是希特勒與各級司令官開會討論是否執行海獅作戰的日子。整個九月，希特勒不斷收到與入侵可行性相關的各項情報，其中好壞參半。希特勒的作戰部長約德爾（Alfred Jodl）支持希特勒在夏天提出的間接作戰路徑，也就是「繞一圈從俄羅斯前往英國」。<sup>323</sup>海軍總司令賴德爾海軍元帥（Erich Raeder）起初支持海獅作戰，但到了九月也覺得這項計畫的風險太高。戈林依然堅稱他的空軍已經依照時程達成所有要求。希特勒瞭解這次入侵必須一次就成功，因為失敗造成的政治後果將會毀了這一整年的成果。直到九月十四日這天，根據他的空軍副官所述，希特勒依然認為「成功的『海獅作戰』才是擊敗英國的最好辦法」。<sup>324</sup>關鍵還是在於空戰。入侵計畫能否成功，完全取決於能否取得制空權。儘管戈林再三保證，但到了九月中旬，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還是發現英國的空中抵抗力量並未遭到擊潰。入侵行動非常需要空



軍保護，讓部隊跨越英吉利海峽時能不受英國海軍攔截，此外還需要空軍支援，讓部隊登陸後能建立最初的橋頭堡。希特勒決定在九月十七日重新檢視海獅作戰的可能性，然而到了十七日當天，德國空軍已在兩天前日間空襲倫敦的行動中遭遇重創。在這場英國人的「不列顛日之役」（Battle of Britain Day）中，德國空軍損失將近四分之一的戰力。海獅作戰為此再度延後。十月十二日，希特勒決定直到年底之前都不考慮該項行動，預計隔年春天再重新考慮是否有必要重啟計畫。

一九四〇年，大英帝國並未崩潰也不認輸，而這一年也成為歐洲帝國主義漫長歷史的一個轉捩點。法國、比利時與荷蘭在歐洲戰敗與遭占領之事，使這些宗主國無法繼續掌控遙遠的海外領土。對大英帝國來說，這場危機也對未來帶來棘手的難題。儘管如此，英國政府一方面強調海外帝國能夠支援英國進行戰爭，另一方面又派兵鎮壓印度的政治自治運動並在埃及實施戒嚴法，這兩種做法顯然是矛盾的，而英國政府卻無意解決這個矛盾。對英國而言，首要之務還是守住本土。而當時無論德國還是英國，都無法找到一套迫使對方和談的戰略，也無法取得決定性的軍事成果。然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希特勒未將矛頭轉向東方，那麼擁有一百八十個陸軍師與已經征服歐陸大部分領土的德國，應該有機會在一九四一年結束西線的戰爭。反過來說，英國則毫無戰勝德國的可能：英國兩度被逐出歐洲，一次在挪威，另一次在法國，又在非洲遭遇危機，經濟持續下滑，必須努力維持與世界經濟的連結。在這種狀況下，英國面臨著戰略破產的窘境。英國確實在法國陷落之後持續進行了一年的戰爭：空防優先、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與較少的海外帝國衝突。這是一場英國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就開始準備的戰爭，一場由張伯倫負責準備、而邱吉爾被迫進行的戰爭。



淞滬會戰中，日軍士兵躲在沙包後面，上方剛好是可口可樂的廣告招牌。上海是中國最繁華的對外港口，因此成為日軍進攻的首要目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與中國國民革命軍激戰之後，日軍成功攻占上海。圖源：CPA Media Pte Ltd/Alamy

- 
- [1] 編注：當時西方尚不曉得德蘇之間另外訂有瓜分東歐勢力範圍的密約。
  - [2] 編注：盟軍必須先等德軍先發動西線攻勢、真正入侵比利時後，才能執行戴爾河計畫，從法國北部出發前往比利時境內構築防線。
  - [3] 又稱為「極機密」（Ultra），首次於一九四〇年五月進行破譯。

CHAPTER 2

第二章

帝國的幻夢與現實

(1940-1943年)

「德國、義大利與日本政府認為永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是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應取得其應得的空間.....三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與維持新秩序.....。」

—— 《三國同盟條約》，一九四〇年九月<sup>1</sup>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一點，在第三帝國總理府宴會廳，德國外交部長、義大利外交大臣與日本駐柏林大使坐在鑲金箔的桌子前面，身旁的人都穿上華麗軍服，眾人在此正式簽訂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在總理府外，大批學童揮舞著日本與義大利國旗，不過義大利外交大臣齊亞諾伯爵卻覺得一切「沒什麼說服力」。齊亞諾覺得宴會廳裡的氣氛比他預期的還要冷淡，但他把柏林人的煩躁與健康不佳歸咎於柏林長期遭受英國的夜間轟炸，導致柏林人每晚都必須躲進防空洞。<sup>2</sup>在日本要求下，條約以英文書寫以加速流程。待三國代表在條約上簽字，宴會廳入口便響起了三聲沉重的敲門聲。廳門開啟，希特勒以浮誇的姿態走了進來，他一語不發，逕自在桌前坐下，等待三名代表發表預先準備的演說，再向全世界發布。在地球另一端的東京也舉行了儀式，只是不像柏林那麼鋪張盛大。日本天皇批准條約僅是一個星期之前的事，這解釋了為什麼必須倉促地以英文擬定條約以避免翻譯錯誤。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在條約上簽字，他日後表示，這份條約是為了「締造而非毀滅世界和平」。<sup>3</sup>條約為期十年，規定三國若遭遇未參與當前衝突的國家攻擊時，應相互提供軍事協助——這項聲明顯然是針對美國而來。不僅如此，條約也讓三個帝國瓜分舊世界：德國取得歐陸，義大利取得地中海與非洲，日本取得東亞。三個帝國將鞏固與擴大所謂的新秩序。這份地緣政治協定充分顯示，此時的德義日三國已有信心宣布，幾個世紀來由英法支配的舊帝國秩序終於走到了尾聲。

## 英國問題

雖然德義日三國大肆宣布新政治秩序的建立，但還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那就是尚未承認戰敗的大英帝國。「英國問題」困擾的不僅是軸心國，還包括英國自己。對軸心國而言，英國雖然看起來脆弱，卻成了德義日鞏固新秩序的障礙。但對英國而言，問題就在於如何既阻止德義日野心，又避免過度耗費資源與在戰場上持續失敗，以保住整個帝國。

德國推遲海獅作戰一事，暴露了德國仍不確定要以什麼方式結束與英國的戰爭。希特勒的政治與軍事幕僚提出兩條途徑：一是建立「歐陸陣營」，讓英國瞭解除了協商和平，沒有別的政治途徑可走。二是採取邊緣戰略，以軍事手段切斷英國與地中海的連結，因為英國為了防禦本土，只留下薄弱兵力防守地中海。第一項戰略在法國投降後就已開始進行，一旦實現，柏林就將能完全支配歐洲經濟。德國的經濟學家與官員開始討論建立大經濟區，範圍不只局限於東歐，而是涵蓋整個歐洲。這個大經濟區要整合所有市場，建立以帝國馬克為基礎的共同貨幣區，推動共同貨幣清算機制，德國經濟將因此滲透到歐洲所有的產業與銀行。<sup>4</sup>此外還要重建經濟，將柏林打造成歐洲的金融與商業首都，以此來挑戰倫敦的支配地位。這是從政治層面上孤立英國的初步做法，而這種做法也反映出戰前新全球經濟區秩序的思維，日本的領導高層也接受這種觀念。想要建立歐陸陣營，不僅需要爭取維琪法國與佛朗哥的西班牙加入軸心國，還必須鞏固藉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建立的德蘇關係。到了一九四〇年秋天，在無法擊敗英國的狀況下，希特勒才有了建立「能有效對抗英國的強大同盟」的想法。<sup>5</sup>



一九四〇年十月底，希特勒進行了一次對他來說相當罕見的巡訪行程。以往歐洲政治人物必須到柏林跟希特勒見面，但這次不同，希特勒搭乘元首列車，親自到各國舉行一連串高峰會，首先是佛朗哥將軍，然後是貝當元帥，最後是他的盟友獨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想試探是否有可能建立共同對抗大英帝國的歐陸與地中海陣營。我們不清楚希特勒對於這趟巡迴訪問抱持多少期望，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參謀與空軍和海軍的總司令都認為，擊敗英國最好的做法是直接占領直布羅陀及蘇伊士運河，前者使英國無法從非洲基地運補，後者可以切斷英國與亞洲領土的連結，德國還能透過運河航路取得中東石油。德國軍方已經擬好了「菲利克斯作戰」（Operation Felix）訓令，準備攻占直布羅陀，墨索里尼也在埃及部署了大軍，但這項計畫能否實施取決於能否與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能否訂出孤立英國的政治協定，並且協調彼此的軍事行動。然而，帝國議題卻讓這項計畫注定胎死腹中。佛朗哥同意合作的代價是取得一部分法國的非洲領土與一筆可觀的補助金——且就算能取得，佛朗哥也沒有鬆口是否會對英國宣戰。十月二十三日，希特勒與佛朗哥在法西邊境的昂代伊鎮（Hendaye）會面，希特勒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從佛朗哥身上獲得任何承諾。如果要求維琪法國割讓部分非洲領土給佛朗哥，維琪法國將會與德國對立，「歐陸陣營」自然就沒有成立的可能。十月二十四日，貝當在蒙圖瓦爾（Montoire）表示法國對此一提議缺乏興趣，他還擔心西班牙與義大利對法國的海外領土造成威脅。十月二十八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佛羅倫斯會面，墨索里尼強烈反對成立一個會承認法蘭西帝國現狀的陣營，也反對向西班牙讓步。<sup>6</sup>而就在同一天，墨索里尼在未事先告知希特勒的情況下就出兵入侵希臘，顯示墨索里尼根本不願意與希特勒進行政治協調。

蘇聯是德國成立反英陣營的最後希望。同年夏初，蘇聯已經與墨索

里尼的義大利恢復關係。<sup>7</sup>十一月十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抵達柏林，想進一步延長前一年簽訂的瓜分波蘭協定。李賓特洛甫希望在過去協商成功的基礎上，順利說服蘇聯朝大英帝國的亞洲與中東領土擴大勢力範圍，特別是這兩個地區現在正承受政治壓力，可能很快就會因為蘇伊士運河被攻占而與英國本土失去聯繫。當時也有傳言史達林可能加入反英的《三國同盟條約》。然而當李賓特洛甫提起此事時，莫洛托夫卻表示除非德國做出重大讓步，否則蘇聯不可能加入。李賓特洛甫日後回憶說，希特勒聽到對方的回應後沉默不語，元首覺得再繼續討好史達林將招致「巨大的危險」。<sup>8</sup>莫洛托夫與史達林的主要目標是將蘇聯的利益延伸到東南歐與土耳其，然而這兩地卻是德國與義大利的利益範圍，因此拉攏蘇聯加入《三國同盟條約》顯然也不可行。最終，除了義大利之外，這些德國預想的潛在歐洲盟友，沒有任何國家想與大英帝國為敵。經過三天的會商，希特勒終於認定必須先攻打蘇聯，然後才能打敗英國。事實上，當德國與西班牙和法國的政治協商破局之時，希特勒就已經堅定了入侵蘇聯的想法。從蒙圖瓦爾搭火車返國途中，希特勒對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參謀說道，想打敗英國，除了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擊潰蘇聯外別無他法。希特勒在從事外交時總是不太自在，運用暴力時則有自信得多。<sup>9</sup>

到了一九四〇年秋天，德國的戰略已經陷入僵局。德國依然維持封鎖英國的訓令，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發動空戰之前，希特勒又重申該訓令，海空封鎖因此成了德國向英國直接施壓的主要手段。德國的目標是對英國的糧食與原料供給進行經濟戰，以消耗英國的戰時經濟，讓英國民眾喪失繼續作戰的意志。九月十六日，戈林下令空軍改為夜間轟炸，目標是摧毀港口設施、糧食與石油庫存、倉庫與食物加工廠等重要設施。十一月之後，德國空軍又奉命轟炸英國的航空工業，尤其是航空發

動機產業。而在海上作戰的部分，從開戰之初，德國海軍就針對英國的海上運輸進行攻擊，不過現在希特勒要求海軍必須加強打擊力度。德國的海軍與空軍未能協同作戰，因為戈林不願派出飛機進行海戰，海軍只好以少數飛機支援水面艦艇與潛艦完成作戰目標。從一九四〇年八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飛機在英國沿海地區投放了五千七百零四枚水雷。而從一九四〇年六月開始的一年間，德國的FW—200「兀鷹式」遠程轟炸機總共擊沉了一百一十九艘商船，總噸數達三十四萬五千噸。海上封鎖被寄予厚望，希望能達成比前述更好的成績。考慮到英國商船的總噸數是兩千兩百萬噸，因此德國海軍每個月平均必須擊沉七十五萬噸，才能迫使英國政府放棄戰爭。<sup>10</sup>

為了進行海上封鎖，德國不僅使用潛艦，還出動其他各式艦艇。德國的潛艦部署在法國的大西洋沿岸基地，控制了英國的大西洋航道。德國海軍知道自身的戰鬥艦不足，因此運用改裝的武裝商船（「鬼船」）與零散的軍艦進行打帶跑戰術。這種做法使英國皇家海軍在遼闊的大洋中難以追蹤德艦的蹤跡。到了一九四一年底，這些「鬼船」已經擊沉了五十萬噸的商船。而德國的其他大型水面艦艇如袖珍戰鬥艦希爾上將號（*Scheer*）、重巡洋艦希伯上將號（*Hipper*）、戰鬥巡洋艦香霍斯特號（*Scharnhorst*）與格奈森瑙號（*Gneisenau*），也擊沉了二十六萬五千噸的商船。<sup>11</sup>新戰鬥艦俾斯麥號（*Bismarck*）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水，首次出擊便擊沉了英國戰鬥巡洋艦胡德號（*Hood*），但俾斯麥號還未能締造更多戰果，就在幾天後遭到英軍擊沉。無論如何，德國潛艦依然是進行海上封鎖的關鍵利器。德國潛艦艦隊司令官鄧尼茲海軍中將（*Karl Dönitz*）擁有的潛艦數量相對較少：雖然一九四一年初潛艦數量幾乎達到兩百艘，但能在水中作戰的平均數量卻只有二十二艘，一九四一年一月甚至只剩下八艘。<sup>12</sup>一旦這些潛艦能在法國西部取得安全基地，就有

能力造成更大損害。一九四〇年秋天，鄧尼茲命令潛艦採取「狼群戰術」。由於在英國南岸航行的船隻容易受到德國的空中威脅，英國的跨洋貿易於是改為在英國西岸與西北岸的港口停靠。德國潛艦因此轉而以這條北部航線做為主要攻擊目標。九月之後，德國潛艦官兵享受了一段他們所謂的「快樂時光」。德國潛艦在一九四〇年十月擊沉三十五萬噸敵船，一九四一年四月更達到巔峰數字的六十八萬七千噸。<sup>13</sup>

英國政府早已預期德國會再度使用潛艦，卻沒有想到德國會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控制絕大部分歐洲北部的沿海地區。雖然英國打從戰爭一開始就派艦隊對商船進行護航（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開始護航沿海船運，兩天後開始護航遠洋船運），但等到一九四〇年秋天面臨德國入侵威脅時，英國不得不將許多原本用於護航的小型艦艇調來防守東南沿海地區。十月之後，德國入侵的威脅解除，護航艦隊的數量重新開始增加。更多水兵接受護航與反潛訓練，更多飛機被派去進行護航任務。整個一九四〇年冬天，海岸司令部的飛機，包括遠程的桑德蘭水上飛機，迫使德國潛艦退出內水與北部沿海地區，進一步將其驅逐到大西洋水域。新科技改進了護航艦隊與飛機的性能，包括高功率照明、米波雷達（飛機使用的稱為ASV Mk I與Mk II雷達，護航艦隊使用的稱為type 286雷達）與改良深水炸彈。<sup>14</sup>一九四一年二月之後，英國針對反潛防衛進行重組，並於利物浦為中心成立西方航線司令部，藉由加強海軍護航與空中力量來打擊德國潛艦，不過其戰略核心主要還是透過海軍情報來讓補給船團避開潛艦。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被護航的船隻遭到擊沉的數量一直維持在較低數字，航行北大西洋的八千七百二十二艘船，僅有兩百五十六艘遭到擊沉，擊沉這些船隻的有些是潛艦，有些是常規軍艦。德國潛艦主要瞄準獨自航行或落單的船隻，因為要追蹤與擊潰護航艦隊證明是一項更艱困的任務。<sup>15</sup>



話雖如此，如果把所有海域損失的船隻累積起來，也足以對英國的抗戰投入構成嚴重威脅。隨著進口商品銳減，英國開始對國內物資進行控管（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香蕉貿易曾中止一段時間）。一九四一年三月，邱吉爾把這場海戰稱為「大西洋之戰」，就像不列顛之役一樣，這場戰役在英國人的戰爭記憶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邱吉爾親自擔任大西洋之戰臨時委員會主席，授權港口加快裝卸時間，加速修復商船與進一步限制進口，同時傾全力建造更多的護航艦隊。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初，邱吉爾的決策開始出現效果，德國潛艦的活動半徑縮減，損失也開始增加。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名德國潛艦的王牌艦長在與火力強大的英國護航艦隊交戰時陣亡；五月，另一名王牌艦長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被俘，潛艦上用來解讀德國海軍謎式密碼訊息的密碼表也落入英國人手裡。於是從那年夏天開始，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便利用這份密碼表來破譯德國的海軍訊息。從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五月間，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護航船團遭德國潛艦攻擊，但這個數字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八月已降到了百分之四。<sup>16</sup>德國潛艦一年來不斷攻擊英國船團，但英國船團的損失甚微，不足以影響英國人的作戰能力與抵抗意志。

從一九四〇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空軍針對英國港口與商業中心進行轟炸，但也跟潛艦攻擊一樣效果不佳。雖然這一連串攻擊隨即被英國人稱為「閃電戰」（The Blitz，中文世界多半直接意譯成「倫敦大轟炸」），而且在人們腦海中留下了無差別恐怖轟炸的記憶——雖然希特勒曾在幕僚詢問時兩度堅稱他絕不會授權進行恐怖攻擊，只不過他也表示自己保留對英國皇家空軍轟炸進行報復的權利。由於皇家空軍在秋冬進行的轟炸非常不準確，德國因此認定皇家空軍是故意進行無差別轟炸。<sup>17</sup>在這場持續九個月的戰役中，德國空軍的主要轟炸目標是



港口城市，包括倫敦與內陸港曼徹斯特。在一百七十一一次大規模空襲中，有一百四十一一次針對港口、倉庫與加工設施，港口吸收了百分之八十六的燃燒彈與百分之八十五的高爆彈。<sup>18</sup>德國領導高層希望持續進行夜間轟炸可以瓦解英國人的士氣，引發社會與政治抗爭，讓已經忙於處理糧食與貿易問題的英國政府疲於奔命。十一月，德國空軍奉命攻擊英國的飛機工業，包括在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五日執行「月光奏鳴曲作戰」（Operation Moonlight Sonata），對考文垂實施夜間轟炸。雖然轟炸機的目標是三十座航空發動機與航空零件工廠，卻造成考文垂市中心絕大部分被夷為平地，一些工廠也受到嚴重破壞。同月稍晚，伯明罕也遭到轟炸。但從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的首要目標還是放在格拉斯哥、貝爾法斯特與布里斯托等港口與貿易中心，而這些地區也都有航空工業分布。二月六日，希特勒重申應該優先轟炸港口與軍工廠而非住宅區，再次強調攻擊軍事與經濟目標的重要性。<sup>19</sup>

德國領導高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行過許多場戰役，但這場持續九個月的封鎖戰可說是其中一項特例。在這場戰役中，德國的戰略根據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耗損率，而非透過一場決定性的會戰來決定勝負。德國並未詳細評估英國對海外供給的經濟依存度，而從轟炸後的損害報告也幾乎不可能準確推估轟炸造成的經濟影響。對於德國空軍機組與指揮人員來說，這場戰役不僅漫長，也逐漸消磨士氣，因為空軍蒙受龐大的損失，卻未得到明顯的戰略利益。與不列顛之役一樣，為了證明進行這場戰役是合理的，當局不惜誇大作戰的成果，然而這麼做並無法加快英國投降的腳步。希特勒開始覺得轟炸並不能讓他贏得戰爭，到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他甚至懷疑轟炸對於英國的工業並未產生太大影響；兩個月後，希特勒又對英國的士氣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希特勒這次的判斷是合理的。轟炸當然會對民眾造成大規模的衝擊，但這種一時的衝擊並無

法迫使政府就範。封鎖對英國的貿易與生產也頂多造成些微影響。德國空軍情報人員猜測，轟炸造成的嚴重損害，將使英國一九四一年的飛機生產量降至七千兩百架，然而實際上英國卻生產了兩萬零九十四架。<sup>20</sup>英國在一九四一年稍晚做出的估計顯示，英國的生產量仍持續成長，而且在轟炸下只有約百分之五的生產量受損。<sup>21</sup>

事實上，對英國經濟衝擊更大的，反而是英國海外金融資源的耗損。而之所以出現金融耗損，主要是英國於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間進行了規模非比尋常的經濟動員。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英國已經花掉一半以上的戰前黃金與美元儲備，剩下的儲備也將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用盡，屆時對於供給必需品的美元區來說，英國將形同破產。另一方面，英鎊區也出現大量失衡，這筆赤字最終在戰後累積到三十三億五千五百萬英鎊的天文數字，不過在戰爭期間可以暫時予以凍結。<sup>22</sup>新世界的供給對英國來說茲事體大，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邱吉爾親自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求救，希望他伸出援手避免一場經濟災難。雖然美國對於英國是否真的已經失去支付能力感到懷疑，但羅斯福總統還是在十二月底發表了「民主兵工廠」的演說，並且在隔年一月將《租借法案》送入國會並獲得通過，承諾大英帝國可以不需要立刻付款就能夠取得物資。在《租借法案》於三月十一日生效之前，由美國的重建金融公司緊急借款四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給英國以避免債務違約。邱吉爾私下表示：「沒有這筆借款，就不用指望擊敗希特勒與納粹主義。」<sup>23</sup>

德國入侵英國本土的戰役持續下去，因為此時放棄就等於承認失敗。放棄對英國的轟炸，等於給予被占領區與美國希望，而每當天氣良好就會在夜間遭受英國皇家空軍轟炸的德國西部居民也絕對無法諒解。對德軍而言，即使是不成功的攻勢也有積極的一面。持續西方的戰事可以緩解莫斯科當局的憂慮，他們擔心希特勒可能會冒著兩線作戰的風險

攻擊東方，史達林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入侵蘇聯之前都抱持著這樣的觀點。英國政府預期德國將在春季入侵，因此不得不在本土駐紮大量軍隊。二月，英國國會議員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看到肯特郡居民進行疏散，他在日記裡寫道：「大家都覺得英國遭到入侵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sup>24</sup>英國重兵防守本土造成的後果，就是無法對帝國的海外領土提供保護，如此便讓希特勒的義大利盟友有了可趁之機。墨索里尼可以在地中海與非洲發動他想要的「平行戰爭」，對付兵力相對不足的對手。

一九四〇年秋冬，義大利眼見德國可能擊敗英國，便想利用西歐衝突之際加緊擴張腳步。《三國同盟條約》使義大利領導高層重新認識義大利已是強權，有資格參與瓜分世界的行列，但義大利仍須證明自己的地位實至名歸。義大利記者維爾加尼（Orio Vergani）認為，墨索里尼「想靠義大利自己的力量贏得勝利，讓自己也坐上和平談判桌」。<sup>25</sup>擊敗法國之後，義大利對法國的領土、殖民地與軍事資源獅子大開口，卻遭到德國高層否決，這使得義大利對於德國更加敵視，而且也懷疑在未來的新歐洲秩序裡，義大利的地位將只是德國勝利下的「沾光者」或「小跟班」。<sup>26</sup>這種狀況造成了一個弔詭結果，那就是義大利明明是一九四〇年九月《三國同盟條約》中最弱的國家，卻搶先推動帝國建立計畫。

在此之前，義大利已經制定出各種不切實際或突發奇想的計畫，例如入侵馬爾它，占領法蘭西帝國，攻擊中東的亞丁、埃及或蘇伊士，進攻瑞士、法國隆河流域、南斯拉夫，或者實施G方案入侵希臘。義軍將領阿梅里尼（Quirino Armellini）在日記裡坦承，義大利政策的主要準則就是行動：「我們會先發動戰爭，再看看會發生什麼事。」<sup>27</sup>墨索里尼必須做出困難的決定，他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繼續在非洲與敵人英

國作戰，另一個選項就是搶在貌合神離的盟邦德國之前進攻南歐。歷史學家正確地指出義大利戰略規畫的特殊性，以及墨索里尼不理智地追求遠超過義大利能力的軍事野心（儘管有時也會猶豫）。這位義大利獨裁者陷入了自己製造出來的尷尬處境中：在義大利風起雲湧的新帝國主義野心之下，無所作為就跟魯莽行事一樣危險。墨索里尼也可以宣稱，自從他積極推動帝國政策以來，他總是獲得勝利，無論是利比亞的血腥鎮壓，還是在衣索比亞、西班牙與阿爾巴尼亞，甚至包括短暫而不光采地入侵法國，這些成就已足夠證明「墨索里尼正確無誤」，當時一名觀察者這麼寫道。<sup>28</sup>勝利產生的錯覺，使所有將領都沒有勇氣反對墨索里尼的決定。

義大利向大英帝國開戰後的頭幾個月，墨索里尼還勉強能維持住自己的好運。英國的保護國索馬利蘭與位於衣索比亞的新義大利非洲帝國接壤，而索馬利蘭的防衛力量相對空虛。一九四〇年八月，義大利士兵與非洲當地的阿斯卡里（askari，即士兵之意）一起進攻英國駐軍，迫使其撤退到紅海對岸的另一個英國保護國亞丁（今日的葉門）。大英帝國損失兩百零六人，義大利損失兩千零五十二人。在海上，英國皇家海軍與義大利海軍都想保存實力，因為雙方的主要目標都是為地中海船團進行護航。七月九日，英國與義大利艦隊在卡拉布里亞斯蒂洛角

（Punta Stilo）外海爆發一場影響不大的衝突。義大利偵察機未能偵察到英國艦隊的行蹤，導致之後抵達戰場的義大利轟炸機反而攻擊了己方的艦隊。雖然雙方都未遭受重大損失，但墨索里尼卻在幾天後向義大利民眾宣布，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已經有半數遭到消滅。<sup>29</sup>在北非，墨索里尼迫不及待想入侵埃及，他的最終目標是切斷大英帝國的蘇伊士運河生命線。義大利駐北非總司令格拉齊亞尼元帥認為，沙漠的狀況、受威脅的補給線與不周全的運輸實在不適合發動全面攻擊，但墨索里尼卻向他



保證，會等到第一個德軍士兵踏上英國本土時才下令攻擊埃及。隨著海獅作戰不斷推遲，墨索里尼已不願等待，他想藉由發動軍事作戰來為自己取得一場勝利。九月十三日，格拉齊亞尼終於屈服於羅馬當局的壓力，派出七個步兵師越過利比亞邊界，往埃及西部邊境推進了約八十公里，最後來到一處名叫細第巴拉尼（Sidi Barrani）的小城鎮。格拉齊亞尼在此停下，開始建構複雜的陣地。大英帝國軍隊發動小規模攻擊，造成一百二十名義大利士兵陣亡，英軍也死亡五十人，之後英軍撤退到更容易防守的位置。墨索里尼於是向義大利民眾宣布，義大利取得三百年來最大的一場勝利。這條「勝利之路」橫越沙丘，直通細第巴拉尼。<sup>30</sup>

墨索里尼意識到，光靠殖民地衝突並不足以讓義大利在協商歐洲和平上取得與德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唯有在歐陸主動採取軍事行動才能體現「平行戰爭」的理念。一九四〇年八月與九月，墨索里尼愈來愈傾向於在南斯拉夫或希臘採取軍事行動，然而當德義兩國在八月中進行會談時，墨索里尼清楚發現，無論向哪一國開戰，都會遭到德國高層的反對。墨索里尼認為，義大利入侵南斯拉夫就像德國入侵波蘭一樣，都是為了修正一九一八年之後簽訂的和約，義大利在一九一八年曾提出橫跨亞得里亞海的領土主張但遭到協約國拒絕。墨索里尼擬定計畫，準備以三十七個師入侵斯洛維尼亞，但由於不確定德國會做何反應，墨索里尼最後於九月底取消行動。<sup>31</sup>於是向希臘開戰成為墨索里尼僅存的選項：要在軸心國支配的歐洲維持義大利的潛在權力地位，就必須以犧牲希臘的獨立為代價。義大利駐阿爾巴尼亞司令普拉斯卡（Sebastiano Visconti Prasca）認為，征服希臘的時機已經成熟，一場「輕易的軍事勝利」可以提升他的軍事名聲。外交大臣齊亞諾伯爵也認為這是將他的殖民地轄區從阿爾巴尼亞擴張到希臘的大好機會。義大利愛琴海諸島總督德維齊（Cesare De Vecchi）同樣覺得，征服希臘可以建立連結阿爾巴尼亞與



愛琴海東部的陸橋，使整個帝國連成一氣。為了破壞義希關係，德維齊甚至從羅得島派出一艘潛艦，於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向老舊的希臘巡洋艦埃利號（*Helli*）發射魚雷。儘管義大利不斷挑釁，希臘的軍方與政治領導人仍致力安撫好戰的鄰國，因為此時仍無法確定墨索里尼是否會批准戰爭。<sup>32</sup>

十月十二日，德軍進入羅馬尼亞保護普洛什蒂特（*Ploesti*）油田，這項消息使猶豫不決的墨索里尼下定決心。義大利領導人一向把南歐視為義大利的「政治與經濟勢力範圍」，德國入侵南歐促使義大利做出回應。十月十五日，墨索里尼與法西斯領袖開會，他在會上宣布十一天後將對希臘開戰。惡劣的天氣迫使開戰日期延後到十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提醒普拉斯卡將軍，速度是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墨索里尼決定不事先知會希特勒：「他將從報紙得知我已成功占領希臘。」<sup>33</sup>墨索里尼的最終決定在開戰日當天很晚才宣布，導致義大利的準備陷入混亂，一名目擊者表示墨索里尼的「即興發揮簡直無可救藥」，義大利軍隊成了受害者。<sup>34</sup>在此之前義大利已經進行有限的軍隊集結，但在入侵南斯拉夫的計畫取消後，墨索里尼又下令讓義大利本土的一百一十萬軍隊半數復員。最初的進攻希臘計畫只想動用八個師的兵力入侵伊庇魯斯與愛奧尼亞群島，而當半數義大利軍隊都已在十月中復員，墨索里尼卻又決定將攻擊的兵力增加到二十個師，而且要占領希臘全境，還提到保加利亞有可能出兵協助。抵達阿爾巴尼亞的義大利軍隊缺乏裝備、人力與補給，當地的簡陋機場意謂著絕大多數參與戰鬥的義大利空軍都必須從義大利南部的基地起飛。對希臘軍事能力與軍隊部署的情報掌握不足，使作戰更加困難。義大利最初的攻勢只投入六萬名士兵、兩百七十架飛機與一百六十輛L/3輕戰車，義大利軍隊必須在嚴冬中穿越最凶險的地形進行戰鬥。<sup>35</sup>

希臘充分認識到眼前的威脅，因此啟動了「義大利及保加利亞」動員計畫，將部隊駐紮在阿爾巴尼亞邊境與色雷斯，以防止保加利亞協同義大利發動攻擊。十月，情報顯示主要威脅來自於阿爾巴尼亞的義大利軍隊，希臘於是開始挖掘壕溝布置防線，並且在山區興建火炮與機關槍掩體，使義大利難以越雷池一步。十月二十八日早晨，義大利對希臘不宣而戰，這樣墨索里尼就能來得及在希特勒抵達佛羅倫斯開高峰會時，告訴他義大利軍隊再度獲得勝利。然而，這場戰爭是一場可預見的災難。希臘軍隊雖然缺乏現代武器與飛機，後勤補給也很有限，但他們是為了保家衛國而戰，因此士氣高昂，對戰場更為熟悉。義大利軍隊立刻出現嚴重的傷亡。無線電與電話通訊不良，導致陸軍只能仰賴傳令兵奔跑傳送訊息（戰場指揮官在十二月抱怨說墨：「電話接線員完全無法發揮作用」）。義大利陸軍每天需要一萬噸補給，但阿爾巴尼亞的港口狹小容易壅塞，導致每天只能運送三千五百噸物資。<sup>36</sup>由於天氣惡劣，飛機出動的次數大為減少，加上支援地面部隊的飛機必須從義大利南部起飛，距離太遠，往往緩不濟急。義大利開戰後不到幾天，自己軍隊的防線就反遭希臘陸軍打穿。

十一月中，希臘陸軍總司令帕帕哥斯（Alexandros Papagos）發動反擊，希臘陸軍推進至阿爾巴尼亞境內八十公里。十一月二十二日，希臘攻占阿爾巴尼亞城鎮科爾察（Koritsa）。美國駐雅典記者提到，鐘聲響遍整個希臘，因為這是自戰爭開打以來，同盟國首次獲得勝利。在首都雅典的街上，希臘人歡欣鼓舞地叫道：「攻下地拉那！」<sup>37</sup>霎時間，墨索里尼的閃擊戰似乎即將為義大利的歐洲帝國畫下句點。義大利陸軍非但沒有迅速朝雅典進軍，反而被迫徵召數萬名士兵，只為了守住阿爾巴尼亞。從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義軍又陸續投入二十一個師到這場希臘戰爭中，除了徵召超過五十萬人參戰，也徵用了八萬七

千頭牲畜與一萬六千輛車輛。<sup>38</sup>一九四一年三月，交戰雙方都已經精疲力竭，義大利連續撤換了幾任指揮官，之後又發動一波大規模攻勢，然而四天後，戰局又陷入膠著。這種僵持的狀況令人諷刺地想起墨索里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過的阿爾卑斯山前線嚴酷戰鬥，當時義大利人也傷亡慘重。而在這場戰役中，義大利人傷亡高達十五萬四千一百七十二人（包括陣亡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五人），大約有四分之一裝備不良的士兵被迫在零下氣溫作戰，食物與藥品也非常缺乏。希臘陸軍傷亡人數接近六萬人，其中一萬四千人陣亡，數千人因為凍傷而截肢，這些凍傷的人往往只能在希臘山區設立的簡易野戰醫院裡截去腫脹發黑的四肢。<sup>39</sup>

希臘戰爭的慘敗對義大利其他海外領土帶來危險的後果，義大利傾全力支援阿爾巴尼亞的結果，就是讓埃及的格拉齊亞尼與衣索比亞的義大利軍隊得不到任何支援，義大利海軍也完全投入在亞得里亞海的大規模運補任務上。英國皇家海軍立刻抓住義大利無暇他顧的機會。安德魯·康寧漢海軍中將（Andrew Cunningham）率領的東地中海艦隊由於航空母艦光輝號（*Illustrious*）經由蘇伊士運河前來增援而實力大增，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東地中海艦隊進行護航任務，在從馬爾它前往亞歷山卓港途中，派出能攜帶照明彈、炸彈與魚雷的劍魚式魚雷轟炸機攻擊位於義大利達蘭多的重要軍港，並且造成義大利海軍重創。這場攻擊行動能夠成功，除了因為義大利空軍的海空偵察能力薄弱，主要還必須歸功於英國新式空投魚雷的戰術優勢。這種魚雷可以從港口的攔阻網下方通過（而當時達蘭多軍港這方面的設施仍不完善），加上裝設了新型的磁力引信，使得魚雷可以躲避偵測，在軍艦龍骨下方引爆。義大利也缺乏有效的防空火力。英國領頭的飛機投下照明彈照亮港口之後，兩波魚雷轟炸機接連進行投彈，港口頓時陷入一片火海。戰鬥艦加富爾伯

爵號（*Conte de Cavour*）被擊沉，另外兩艘戰鬥艦卡歐多利歐號（*Caio Duilio*）與李托里奧號（*Littorio*）受到嚴重損壞，但仍可修復。<sup>40</sup>儘管實際損害情況不如英國皇家海軍起初認為的那麼嚴重，但義大利艦隊仍倉皇撤退到拿坡里。幾個月後，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英國亞歷山卓艦隊在希臘馬塔潘角外海擊沉三艘義大利巡洋艦與兩艘驅逐艦，擊傷戰鬥艦維托里奧·維內托號（*Vittorio Veneto*）。這場戰鬥讓義大利海軍決定未來戰鬥艦出海都不能超過戰鬥機的保護範圍，義大利艦隊自此完全喪失了威脅性。<sup>41</sup>

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所建立的非洲帝國，至今不過五年的時間，卻在希臘海戰慘敗後短短幾個月內開始解體。雖然英國在中東與非洲的軍隊因為人力與物資調往本土而實力大不如前，但在組織與技術上仍較義大利軍隊優越。與墨索里尼一樣，邱吉爾也渴望取得一場勝利，他不斷催促英國駐開羅總司令魏菲爾將軍（Archibald Wavell）對入侵埃及的義軍進行反擊。雖然英軍在非洲的人數處於劣勢（義大利在非洲部署二十九萬八千五百名兵力，在利比亞與東非當地還有二十二萬八千四百人，反觀大英帝國軍隊總數才六萬人），但魏菲爾仍準備利用義大利利用兵希臘的機會進行反攻。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魏菲爾發起橫越沙漠的「羅盤作戰」（Operation Compass），參與的士兵有三萬人，包括第七裝甲師、一個印度師與一部分緩慢組成的澳洲師。大英帝國軍隊兵分兩路快速推進，突破固定的義大利防線之後，轉而從後方攻擊義大利軍隊。加里波底將軍（Italo Gariboldi）的義大利第十軍團前線在驚訝與恐慌下崩潰。義大利軍隊由於缺乏裝備與戰防砲，加上沒有裝甲作戰經驗，只稍作抵抗就解體。一月四日，大英帝國軍隊抵達巴爾迪亞（Bardia），四萬五千名義軍投降；一月二十三日，英軍攻占多布魯克，又有兩萬兩千名義軍淪為戰俘。第七裝甲師穿過沙漠，在貝達佛姆



（Beda Fomm）堵住撤退的義軍，戰役於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結束，英軍控制了利比亞東部大部分地區，俘虜十三萬三千名義軍、一千兩百九十門火炮、四百輛戰車與數千輛車輛。義大利軍隊只有八千五百人成功突圍逃回利比亞西部。在這兩個月的戰役中，大英帝國只陣亡五百人。魏菲爾原本可以一路推進到的黎波里，這是軸心國掌握的最後一個北非港口，一旦攻下的黎波里，義大利就不可能在沙漠中繼續抵抗。然而此時其他戰場急需魏菲爾的援助，魏菲爾只好放棄攻打的黎波里的計畫。<sup>42</sup>魏菲爾的下一個目標是義屬東非。義屬東非總督奧斯塔公爵阿梅迪奧（Amadeo of Savoy）如今面對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義屬東非的補給因為英國進行海上封鎖而中斷，加上衣索比亞民眾經常暴動，義軍又缺乏車輛、燃料與軍火（絕大多數武器都是一九一八年製，早已過時），阿梅迪奧能做的只有維持現狀。事實證明，大英帝國只需要五個師就能推翻義大利的東非帝國。兩個印度師從蘇丹發動攻擊，一個南非師與兩個大英帝國非洲師從肯亞入侵。這場戰役於一月二十一日開始，阿迪斯阿貝巴於四月六日被攻占，戰役結束。一九四一年五月，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在英國監督下復辟。短短幾個星期的時間，整個義大利的非洲帝國就幾乎完全覆滅。

非洲與希臘的失敗雖然未能讓義大利退出戰爭，卻明顯暴露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在現代戰爭機器與指揮機制上的嚴重不足，墨索里尼擁有的資源顯然無法支撐他的帝國野心。近年來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義大利軍隊在戰場上的作戰能力其實不像戰後普遍流行的形象那麼差，但這種說法仍須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證明。比較合理且擁有較多佐證的說法是，義大利士兵其實可以表現得更好：從義大利軍隊在戰爭後期的表現可以證明這點，只是這樣的改進相當緩慢。史家也多半認為義大利士兵手中雖然只有過時裝備，但在艱困環境下依然能鼓起勇氣全力戰鬥。然而，一



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被擊敗的義大利軍隊既缺乏優秀的領導，也沒有充足的資源，這些都嚴重打擊他們的士氣。主要的問題出在義大利進行戰爭的組織結構。墨索里尼把決定大權攬在自己手裡，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又行事專斷，不願接受底下將領的建議。義大利各軍種之間也缺乏合作聯繫。<sup>43</sup>一九四〇年的義大利陸軍只擁有過時的火砲（沙漠作戰時的七千九百七十門野戰砲中，只有兩百四十六門是一九三〇年後製造的），戰車全是輕型，裝甲薄弱且動力不足。簡單來說，當時義大利陸軍的裝備只能進行一場有限的殖民地戰爭，完全無法進行現代化機動作戰。<sup>44</sup>雖然墨索里尼渴望發動一場閃擊戰，但他建立的法西斯政權本身就是軍事效率的最大絆腳石。

面對戰線的全面潰敗，墨索里尼終於不得不向希特勒求援。墨索里尼於十二月十七日正式提出要求，希特勒猶豫許久，最後才點頭答應。墨索里尼缺乏規畫就貿然攻擊希臘，使得整個巴爾幹半島陷入動盪，偏偏德國在這個地區擁有重要利益，維持這個地區的原料與石油供給對德國至關重要。英國可能出兵干預（十一月二日，英國皇家海軍任務編隊抵達雅典，幾個星期之後，英國皇家空軍也進駐雅典），顯示斯堪地那維亞危機也許會再度重演。這可是德國準備出兵進攻蘇聯之際，若英軍出現在巴爾幹半島很可能危及德軍的側翼。<sup>45</sup>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義大利的慘敗嚴重打擊軸心國的氣勢，畢竟軸心國才在三個月前的《三國同盟條約》中公然表露瓜分世界的野心。德國領導人同意協助義大利人，不是因為同情他們的困境，而是基於德國自身的利益。正如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一名參謀所言，這項援助「給得不情願，也收得不情願」。<sup>46</sup>墨索里尼不知道的是，希特勒其實早在十二月十三日就已經下令德國武裝部隊做好出兵希臘的準備，代號為「瑪莉塔作戰」（Operation Marita）。在保加利亞同意下，德軍於一九四一年初進駐保加利亞與希臘邊界。三

月底，李斯特陸軍元帥（Wilhelm List）率領的第十二軍團部署完成，計畫於四月初發動進攻，第十二軍團下轄五個軍，還有第八航空軍團從旁支援。德軍的各項安排都未曾與義大利進行協調，因此直到德軍發動攻擊之前，義大利軍隊依然深陷於阿爾巴尼亞前線毫無進展。

希特勒一方面出兵穩定巴爾幹半島情勢，另一方面也派出空軍與裝甲部隊支援義大利在北非的戰事。反艦專家蓋斯勒空軍上將（Hans Geisler）指揮的第十航空軍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抵達西西里島，第十航空軍擁有三百五十架飛機，以西西里島為基地，針對威脅義大利運補的馬爾它機場與潛艦進行攻擊。一月十六日，主導達蘭多空襲的光輝號航空母艦遭德國空軍重創。雖然未能完全解除馬爾它島造成的威脅，但一九四一年春天反覆進行的空中攻擊確實壓制了英國海軍，直到夏天德國空軍離開為止，英國海軍都無法阻礙義大利向北非戰場進行運補。一九四一年一月與二月，德國第十五裝甲師與第五輕裝師前往利比亞，指揮官是法國戰役的戰車戰明星隆美爾中將。德國非洲軍的到來，為士氣低落的義大利陸軍注入一劑強心針。一九四一年二月，利比亞西部只剩下六個義大利師與一百架飛機。義大利駐北非總司令格拉齊亞尼由於神經衰弱而被解職，職務由加里波底將軍接替。更多義大利裝甲部隊連同德國非洲軍一起抵達非洲，隆美爾隨即著手試探大英帝國的戰力。希特勒司令部策畫了「向日葵作戰」（Operation Sonnenblume），希望德軍能有限推進到的黎波里以東較容易防守的戰線，但隆美爾認為敵軍幾個星期以來持續橫越沙漠進行追擊，早已勞累不堪，此時正是一舉挫敗他們的大好時機。大英帝國的軍隊分散，戰車數量也因為羅盤作戰大為減少。隆美爾於是直接穿越沙漠擊退英軍，完全不理會希特勒最高統帥部的指揮，也不受義大利駐利比亞指揮官的節制。雖然加里波底名義上是隆美爾的長官，但他也沒能堅持德軍將領必須聽從他的命令。隆美爾繼

續朝多布魯克推進，並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圍困該城。雖然隆美爾對於義大利盟友頗為輕視，而且對於義大利糟糕的裝備感到吃驚，但沙漠反攻依然是由德義兩軍聯合進行，義大利也因此首次有機會嘗到勝利果實。

北非戰局急轉直下，主要與倫敦當局認為應該派遣遠征軍協助希臘對抗軸心國的政治決定有關。一九三九年春，英國曾經保證維護波蘭的主權獨立，就在同一時間，英國也對希臘做出相同的保證。然而，英國出兵保護希臘使得原本兵力不足的北非雪上加霜，埃及與蘇伊士運河因此岌岌可危，更糟的是，英國雖然出兵希臘，卻無法保證一旦德軍真的入侵希臘，英國真能擊退德軍威脅。與墨索里尼一樣，邱吉爾也急於在歐洲取得一場勝利；邱吉爾還有一點與墨索里尼相同，那就是他的政治野心完全與軍事現實脫節。一月九日，在與帝國參謀本部及戰時內閣爭論之後，邱吉爾終於能照自己的意思進行。魏菲爾奉命從非洲前線分兵援助希臘，但他強烈反對這項做法。邱吉爾憤怒地回道：「你在北非只需要一個軍事法庭與一個行刑隊。」<sup>47</sup>邱吉爾堅持支援希臘，但希臘獨裁者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卻不願接受援助，他擔心這會立即引發德國入侵。然而，一九四一年一月梅塔克薩斯死後，新任首相柯里齊斯（Alexandros Koryzis）眼見德國的威脅日益擴大，終於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與英國簽訂正式軍事協定。由於這項協定被視為反軸心陣線的一環，因此邱吉爾特別派外交大臣艾登前往地中海地區進行協商。二月十九日，艾登抵達雅典，隨後又訪問土耳其與南斯拉夫，試圖說服兩國加入同盟國陣營，但未能成功。土耳其與南斯拉夫都不願加入，因為情勢很明顯，德國正處於勝利態勢，而大英帝國又在利比亞全面潰敗。來自紐西蘭與澳洲的士兵在弗萊堡少將（Bernard Freyberg）指揮下組成「W部隊」，於三月七日登陸希臘。這場戰役像極了挪威戰役，英軍想

挽救即將崩潰的盟國，卻還是在六個星期之後遭到擊潰，無功而返。

等到四月六日德軍對希臘發動攻擊的時候（英國情報單位已經透過「極機密」截獲情報而得知德軍的攻擊行動），整個政治局勢又再度出現變化。原本將艾登拒於門外的南斯拉夫政府於三月二十五日加入《三國同盟條約》，然而該政府隨即遭到反德軍事勢力推翻。艾登一度燃起希望，認為貝爾格勒當局有可能加入英希同盟，但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政權同樣擔心加入同盟會招致德國入侵。儘管如此，南斯拉夫政變卻惹惱了希特勒，幾天後，希臘戰役便擴大成為摧毀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德軍開始無情轟炸貝爾格勒。第二十五號訓令要求李斯特的第十二軍團也必須攻擊南斯拉夫南部，而德國也在匈牙利與奧地利集結新的部隊，從北部進攻南斯拉夫。德國從英國戰場抽調九百架飛機投入這場新的戰役。與一九四〇年十月義大利軍隊倉促而毫無計畫地進行部署形成強烈對比，德國軍方短短兩個星期就完成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軍以三十三個師發動攻勢，其中有十一個師是裝甲師。接下來就是一場典型的閃擊戰。在艱難的山區地形與陌生的地貌中，南斯拉夫與希臘的軍隊遭到擊潰。四月十七日，南斯拉夫投降，三天後希臘與一名德軍現地指揮官簽訂停戰協定，隔天希臘便向德國無條件投降。李斯特的第十二軍團守住希臘與阿爾巴尼亞邊界不讓義大利軍隊進入，墨索里尼對此表示抗議，他認為這理應是義大利的勝利，因為這是他發起的戰爭。希特勒勉為其難地允許義大利人參加四月二十三日在薩洛尼卡舉行的第二次受降儀式，希臘指揮官卓拉科古魯將軍（Georgios Tsolakoglou）被迫接受義大利的主張。然而義大利人似乎還搞不清楚現實處境。當四月底在維也納討論戰利品的分配時，義大利顯然已經淪為德國的衛星國。墨索里尼在一九四〇年制定的混亂、好戰與缺乏組織的戰略，最終在六個月後導致義大利帝國的獨立路線徹底毀滅。齊亞諾抱



怨說：「我們與德國同盟後的命運是可悲的，落入跟殖民地一樣的命運。」<sup>48</sup>

大英帝國面臨的結果也幾乎一樣悲慘。到了四月十四日，地中海顯然又要出現一次敦克爾克大撤退。幾天後，登船行動開始，包括大英帝國與希臘軍隊在內的五萬名士兵搭船撤退到克里特島或埃及。對德國而言，克里特島上的大英帝國軍隊將持續構成威脅，因此德國策畫了一次大膽行動，動用了司徒登空軍上將（Kurt Student）的精銳傘兵。五月二十日，德國傘兵空降克里特島，儘管付出慘重傷亡，還是成功攻占該島上位於馬里梅（Maleme）的重要空軍基地。接下來的十天，雙方為了爭奪克里特島展開激戰，但英國帝國參謀本部認為繼續擴大傷亡毫無意義，於是大英帝國駐軍便於五月三十一日開始撤往埃及。克里特島戰役總共造成三千七百人死亡，其中兩千人是皇家海軍士兵，這些人全在德國空軍數波攻擊與轟炸下喪生。希臘與克里特島的失敗，證明英軍已難在歐洲大陸立足，也讓兵力薄弱的埃及暴露在更嚴重的威脅之下。英國戰爭部針對「最壞情況」擬定應變計畫：放棄埃及，撤退到蘇丹，或甚至撤退到南非。四月二十四日，曾經反對英國支援希臘的魏菲爾告知倫敦戰爭部，他手上已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擁有完整的組織與裝備。魏菲爾又補充：「我們還在戰鬥，就跟戰爭剛開打的時候一樣，但我們現在毫無計畫，裝備也缺乏。」<sup>49</sup>當時英國流傳著一則笑話，英國遠征軍的縮寫BEF現在代表的意思變成了「每十四天撤退一次」（Back Every Fortnight）。情報局的報告指出，英國民眾最常問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總在陸地上輸給德國人？」<sup>50</sup>

正當希臘與克里特島發生危機之際，英軍在中東的地位也受到進一步威脅。四月一日，伊拉克民族主義者發動政變，不僅試圖排除英國在當地的影響力，還想與軸心國軍隊進行合作。早在一九四〇年，由巴格

達法學院教授暨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拉希德（Rashid Ali alKailani）當上首相之後，這場危機就已經開始醞釀。拉希德獲得一小群人稱「黃金四角」的伊拉克軍官擁護，他們想利用同盟國在歐洲戰敗的機會，一舉掃除伊拉克與英國的殘餘帝國連結。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拉希德在英國政府的壓力下辭去首相職務，但他已經與德國和義大利建立接觸管道，準備爭取軸心國支持。四月初，拉希德發動軍事政變，逼迫攝政的阿卜杜勒伊拉親王（Prince Abdulillah）逃往英國的巴勒斯坦託管地。拉希德隨即成立「國家防衛政府」，幾乎馬上就獲得德國與蘇聯的承認，而英國最擔心的就是這兩個國家對伊拉克構成威脅。<sup>51</sup>英國帝國參謀本部無法確定拉希德會不會與仍駐守在伊拉克兵力薄弱的英軍發生衝突，但另一方面也擔心德軍在進入巴爾幹半島之後可能會突然出兵伊拉克。帝國參謀本部於是策畫了「薩賓作戰」（Operation Sabine），將數千名英國與印度軍隊移往伊拉克南部港口巴斯拉（Basra），保護英國重要的石油開採與通往地中海戰場的陸路通道。拉希德政府要求英國人離開，而英國人不僅拒絕，還繼續增兵，明顯違反了《英伊防衛協定》。伊拉克陸軍於是開始備戰。與此同時，親德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sup>[1]</sup>侯賽尼（Amin al-Husayni），當時正好從英國統治的巴勒斯坦流亡到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他於是發起吉哈德，召喚穆斯林共同發起聖戰，反抗大英帝國。<sup>52</sup>四月二十五日，伊拉克與義大利簽訂條約，義大利同意供應武器，伊拉克則承諾義大利可以使用石油與港口設施，武器很快就開始經由維琪政府控制的敘利亞運抵伊拉克。英國通往地中海東岸海法的油管遭到切斷，伊拉克陸軍準備圍攻離巴格達九十里、位於幼發拉底河岸的哈巴尼亞（Habbaniya）英國空軍基地。五月一日，九千名伊拉克士兵在火炮與一些輕戰車支援下，在能俯瞰機場的低矮高地上挖掘掩體，準備發動進攻。

光從數量來看，雙方兵力十分懸殊。哈巴尼亞基地只有一千四百名空軍與陸軍人員，另外還有一千兩百五十名在伊拉克招募的當地部隊協助英國在該地的軍事部署。哈巴尼亞是皇家空軍訓練基地，有各式各樣過時的訓練機與九架格洛斯特格鬥士雙翼戰鬥機。而此刻正集中在巴斯拉的英軍，也由於伊拉克掘開河道，在通往巴格達的路上製造出氾濫區，因此無法立刻派兵支援哈巴尼亞。儘管顧慮到英國防守埃及的兵力嚴重不足，魏菲爾還是不得不拼湊出一支機動救援隊伍「哈布軍」

（Habforce），從巴勒斯坦與外約旦出發，前去解救伊拉克的英軍。不過事實上，哈巴尼亞最後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哈巴尼亞的教官與學員混合編組，一同駕駛掛載炸彈的教練機，整日不停地轟炸伊拉克陣地。伊拉克陸軍士氣低落，缺乏糧食與水，又遭到無情地轟炸與低空掃射，不久就開始四散瓦解。五月六日，伊拉克軍隊全部撤退，在退回法魯加（Fallujah）的路上試圖與前來支援的伊拉克預備隊會合。在隨後的混亂中，英國皇家空軍對這些完全缺乏掩護的人員與車輛進行了致命的密集火力攻擊。伊拉克陸軍在遭受追擊下逃往法魯加，並且在此地發生激烈戰鬥。到了五月二十日，法魯加已被英國人占領。火炮與炸彈造成的滿目瘡痍，讓一名英國士兵想起了「一戰時期法蘭德斯殘破不堪的城鎮景象」。<sup>53</sup>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哈布軍」一千四百名士兵在哈巴尼亞與巴斯拉的空軍強力支援下進軍巴格達。五月三十日，拉希德、侯賽尼與黃金四角的軍官們分別逃往伊朗與土耳其，留下巴格達市長與英軍協商停戰。英軍僅以很少的代價就擊潰了伊拉克陸軍與空軍，平定了亂事。這樣的衝突對英國人來說是司空見慣，英國人經常以當地徵召的部隊與印度軍隊來支援人數寡少的英國軍隊，而他們的敵人雖然人數眾多，卻不懂得如何作戰。哈巴尼亞基地的情報官員切爾（Somerset de Chair）寫道：「對我們來說，這只是帝國東方邊界的另一場戰役。」<sup>54</sup>

伊拉克戰役讓英國察覺到事態緊急，因為軸心國此時已經取得巴爾幹與愛琴海，接下來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支持伊拉克叛亂，讓英國在中東已經相當脆弱的地位更加動搖。拉希德期盼德國能支援伊拉克，但德國正專注於處理巴爾幹危機，而且希特勒認為伊拉克屬於義大利與維琪法國的勢力範圍。等到叛亂真的開始，英國的地位頓時變得岌岌可危，此時德國才開始援助伊拉克，但德國的援助也僅限於運送少量武器、一組軍事顧問團與兩中隊的飛機到巴格達，包括一個梅塞施密特Me—110重型戰鬥機中隊與一個已經過時的亨克爾He—111轟炸機中隊；義大利則派了一支同樣過時的飛雅特CR—42雙翼機中隊。德義的飛機獲得維琪法國當局許可，使用敘利亞阿勒坡空軍基地，之後降落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德義的飛機進行零星的空襲，但到了五月底已經損失了九成五的飛機。與義大利人一樣，德國人最感興趣的是伊拉克的石油。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國石油團隊抵達伊拉克調查當地的石油產業，針對未來英國被逐出而德國進行接管之後能產生的效益進行研判。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軸心國如果獲得勝利，對伊拉克來說也不過是一個帝國主人取代另一個帝國主人。<sup>55</sup>德國的干預來得太晚，出動的軍力太少，不足以影響結果。希特勒於五月二十三日發布第三十號作戰訓令，承諾支持拉希德的叛亂，但當時衝突已經快要結束；六月十一日，希特勒又發布第三十二號訓令，明確表示接下來即將進攻蘇聯，待蘇聯戰役結束後再採取行動將英國逐出中東。<sup>56</sup>對希特勒來說，中東只是枝節問題，不在他的戰略考量範圍之內。

在二戰接下來的幾年內，德國都致力於利用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緒，不斷教唆阿拉伯人發動武裝叛亂，然而德國人採取的策略僅限於政治作戰層面。針對阿拉伯世界進行的政治宣傳戰，是軸心國發起的政治攻勢中規模最大的。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國外交部在柏林南部策森



（Zeesen）設立阿拉伯語廣播電臺，到了一九四一年，該電臺全天候播送核心訊息，宣揚英國帝國主義與猶太人是阿拉伯世界與伊斯蘭教的主要敵人，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應該團結起來反抗他們。<sup>57</sup>除了廣播之外，德國也在中東地區持續空投傳單與小冊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總數已達到八百萬份。德國在《古蘭經》中尋找根據，說服阿拉伯人從英國這個「不公義的暴力罪犯」手中解放。德國也以劇作形式宣傳猶太人陰謀奴役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德國親衛隊發放一百萬份小冊子，裡面提到

《古蘭經》預言的猶太人國王旦札里（Dajjal）將被上帝的僕人希特勒所殺：「他將如《古蘭經》記載的殺死旦札里，摧毀他的宮殿，將他的盟友丟進地獄。」<sup>58</sup>然而，德國的政治宣傳戰幾乎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儘管阿拉伯人確實憎恨英國的帝國野心，但伊拉克叛亂卻是阿拉伯人僅有的一次暴力抗爭。廣播宣傳因為阿拉伯人缺少收音機而難以奏效，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當時全國居然只有二十六臺收音機；埃及雖然有五萬五千臺收音機，但主要擁有者卻是定居當地的歐洲人。至於德國利用《古蘭經》來滿足政治意圖的宣傳，反而引發穆斯林教士不滿。伊朗穆拉（mullah）<sup>[2]</sup>穆薩維（Ruhullah Musavi）便指責納粹主義的宣傳是「人類心靈最惡毒與最可憎的產物」，穆薩維日後以「何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之名而廣為人知。<sup>59</sup>德國與義大利自稱是反帝國主義者，但在無情鎮壓利比亞阿拉伯人與柏柏人之後，他們的主張已難以自圓其說。雖然依照德國的說法，德國人理應尊重各地區的阿拉伯民族，但根據一份報告指出，北非的德國士兵依舊認定阿拉伯人是低等種族，稱他們為「有色人種」或「黑鬼」，甚至令人困惑地稱他們是「猶太人」。<sup>60</sup>

儘管平定了伊拉克叛亂，但在持續遭受威脅下，英國仍對該區域的安全感到悲觀。巴格達投降才過兩個星期，英國帝國參謀總長迪爾將軍

（John Dill）就對他的作戰部長說道：「我猜你應該察覺到我們將會失去中東。」<sup>61</sup>維琪當局提供敘利亞基地給軸心國空軍使用，再次顯示英國無法期望法國這個前盟友能手下留情。法國在敘利亞與黎巴嫩仍留有一定數量的軍隊，至少有三萬五千名法軍與殖民地軍隊，還有九十輛戰車。魏菲爾接到命令清除這項威脅。六月八日，一支由英國、澳大利亞、印度與自由法國混合編成的部隊從伊拉克往西進攻敘利亞首府大馬士革，另一支部隊則由巴勒斯坦往北進攻黎巴嫩首府貝魯特。一場激戰之後，法軍指揮官丹茲將軍（Henri Dentz）尋求停火。英國對法國託管地實行軍管，自由法國一方面對於戰事順利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對英國的主導感到擔憂，並且希望能以自由法國的文人政府來控制這個地區。<sup>62</sup>英國的軍隊與官員現在占領了從埃及到伊朗邊境的整個中東地區，英國在當地的勢力達到了巔峰。英國為了掩飾自己對該區的軍管，於是大力宣傳英國民主的種種好處。與德國一樣，英國公關官員也引用《古蘭經》來進行宣傳。在伊拉克，一張彩色的海報上面寫著：「伊斯蘭教是民主的精神……民主是《古蘭經》的精髓……。」<sup>63</sup>然而這種政治宣傳同樣難有成效，因為英國表面上宣揚自由主義政治的好處，實際上卻以傳統帝國作風進行控制：新聞審查、恣意逮捕、流放、在各級政府安插顧問。美國駐巴格達公使回報華府時表示，英國完全掌控了當地政府與經濟事務，一切都「為大英帝國的福祉服務」。<sup>64</sup>英國最關切的就是維持當地通訊交通與石油供應安全。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底，德國入侵蘇聯再次引發中東地區的新一波威脅。考慮到德軍可能從高加索與埃及入侵中東，更糟的是，日本與德國還有可能聯手將英國與其盟邦完全逐出歐亞大陸。如果此事成真，那將會是一場地緣政治惡夢。

## 世界島與心臟地帶

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因宣揚歐亞大陸空間理論而聞名，他認為從中歐到太平洋的這一整塊大陸是全球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麥金德把這片廣大的陸塊稱為「世界島」，能夠控制這個陸塊的資源，就能支配「外圍」的海洋國家。麥金德於一九一九年寫道：「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支配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支配世界。」<sup>65</sup>麥金德首次在一九〇四的〈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提出這個概念，他警告英國的全球霸權有可能因為現代通訊交通的發展而遭到顛覆，因為通訊交通的進步使得人們可以更輕易地運用心臟地帶的龐大物質資源。一九一九年，麥金德甚至指出德國與日本很可能入侵俄國與中國以瓜分整個歐亞大陸：德國已經深入中歐與東歐，日本則掌握了「海洋門戶」的優勢。<sup>66</sup>麥金德的理論在英國沒什麼影響力，卻因為德國地理學家豪斯霍夫而在德國獲得回響。豪斯霍夫閱讀麥金德的作品，在一戰結束後立刻撰寫了關於地理樞紐的論文。豪斯霍夫使「地緣政治」成為廣泛流行的詞彙，他以此來描述地理環境與國家力量之間的緊密關係。豪斯霍夫在慕尼黑教書時的其中一位學生赫斯，後來成為希特勒的副手與納粹黨的早期黨員。赫斯介紹希特勒給豪斯霍夫認識，豪斯霍夫給這位未來的獨裁者一些關於地緣政治學的作品，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政變失敗後被囚禁在蘭茲堡監獄（Landsberg Prison），他在獄中閱讀了這些作品。<sup>67</sup>

雖然希特勒與麥金德之間的連結難以追溯，但豪斯霍夫有可能給了希特勒一些關於地緣政治樞紐的二手論述。當希特勒在獄中口授《我的奮鬥》，讓關在同一間囚室的赫斯記錄下來的時候，他清楚提到德國將在心臟地帶尋求自身天命的觀念。希特勒表示，「唯有在這塊土地上找

到大小適當的空間，才能確保民族自由的存在」，而這個空間將在想像的「東方」才能找到。<sup>68</sup>豪斯霍夫日後對於希特勒對「地緣政治的掌握」大為讚賞，他認為希特勒充分反映了他所謂的「征服空間的強權」觀念，這是豪斯霍夫過去在大英帝國旅行時得到的看法，他當時也曾讚揚大英帝國對地緣政治的掌握。豪斯霍夫希望德國能夠建立一個橫亘歐亞的陸上強權，排除並且支配海上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豪斯霍夫在早期作品中談到日本對朝鮮與滿洲的殖民，他相信日本也可能成為「具有大陸心態的世界大陸政治參與者」。<sup>69</sup>一九一三年，豪斯霍夫針對日本的世界地位與地緣政治未來發表了一篇重要研究，他認為日本將成為「大日本」。一九三〇年代，地緣政治在日本成為顯學，科學研究似乎肯定了日本在領土擴張上展現的智慧，也認為日本有能力擊敗西方霸權。一九四〇年，日本學者小牧實繁在《日本地政學宣言》中主張日本應支配整個東亞。<sup>70</sup>麥金德的「心臟地帶」一開始只是對未來全球權力結構進行抽象推測，但最後卻成為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按圖索驥的指南，試圖從中追尋稱霸歐亞大陸的黃金國。整個一九三〇年代與四〇年代，德國與日本持續追求最極端的擴張主義野心，德日兩國的領導人幻想世界的地緣政治秩序可以藉由大規模領土征服來加以逆轉。德國與日本已經取得廣大領土，但現在它們還想征服更廣大的地理範圍，為此就必須進攻世界上最強大的三個國家。然而地緣政治的想像與地緣政治的現實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要弭平這樣的差距只能仰賴高傲的種族主義與一廂情願地忽視軍事與地理現實。麥金德從未想過「心臟地帶」可以反過來由外而內地加以征服。事實上，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任何一個歐亞大陸以外的國家能夠在歐亞大陸上建立永遠的宗主權。

儘管如此，地緣政治的幻想仍不足以解釋決定征服的時間點，以德國與日本來說，兩國都面臨著迫使它們行動的經濟、戰略與意識形態等



短期因素，這些因素同樣強化了德日企圖建立歐亞大陸霸權的願景。以希特勒而言，攻打蘇聯的決定是不斷疊加發展出來的結果，是環境持續變遷下做出的回應，希特勒逐漸開始用想像的帝國野心來合理化自身想法，而這一帝國願景也說服了德國武裝部隊與廣大的德國民眾，使他們深信攻打蘇聯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最後做出這項決定的也是希特勒本人。與一九三九年準備攻打波蘭一樣，面對是否入侵蘇聯的問題，戈林與李賓特洛甫這兩位政治夥伴都試圖勸希特勒再等待幾個月，先結束對英國的戰役才是較合理的戰略安排。但希特勒一旦下定決心，就不接受旁人勸說。軍方對希特勒入侵蘇聯的決定充滿猶疑與不確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時任陸軍總司令的布勞齊區陸軍元帥（Walther von Brauchitsch）詢問希特勒的陸軍副官，元首提到入侵蘇聯的計畫是否只是虛張聲勢，而副官向他保證希特勒已經決心這麼做。一個月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仍不確定希特勒是否已經「下定決心」，他們希望再三確認入侵蘇聯的決定不會突然改變或遭受質疑。<sup>71</sup>

然而，在希特勒真正下決心之前，這項入侵蘇聯的「計畫」其實毫無計畫可言。對希特勒來說，入侵蘇聯其實包含著各種不同的動機，他一方面想擊敗大英帝國，另一方面又要面對東方「猶太布爾什維克」的威脅。遠因是他想為德國人取得真正的「生存空間」，近因是邱吉爾政府拒絕談和。一九四〇年七月底，希特勒召集武裝部隊各級長官商討接下來的戰略，希特勒表示他想在一九四一年春天一舉消滅蘇聯，目的是為了粉碎英國組織歐洲同盟的最後一線希望。從一九四〇年八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這十個月間，反英一直是希特勒的戰略主軸，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早上對全國人民的演說中宣布執行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作戰，但他依然強調反英的目標：「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必須打破猶太盎格魯撒克遜戰爭販子的陰謀，以及莫斯科中心的布爾什維克猶太勢

力。」<sup>72</sup>消滅蘇聯以迫使英國談和的想法受到陸軍高層的質疑，特別是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提到：入侵蘇聯「無法影響英國.....我們不能低估我們在西方面臨的風險」。<sup>73</sup>對希特勒來說，這項反英策略可以把赤裸裸的侵略美化成因應敵方行動而採取的先制攻擊——一種顛倒黑白的做法，就像先前入侵波蘭一樣。

事實上，入侵蘇聯不只是為了打敗英國而採取的間接手段。蘇聯本身就是這場戰爭要打倒的對象，其目的不僅要去除德國在東歐建立帝國的巨大障礙，還要建立未來以柏林為中心的歐亞帝國。一九四〇年七月初，德國軍方首次提出對抗紅軍的構想，陸軍急欲給予蘇聯嚴厲一擊，使其不敢窺伺德國的東部領土。希特勒將這個構想發展成一個龐大計畫，他在七月三十一日向軍方高層表示，必須盡快消滅蘇聯，以免為時已晚。蘇聯進占波羅的海國家與羅馬尼亞北部就是威脅的明證。德國情報單位發現蘇聯在與德國占領波蘭後接壤的新西部邊界興建要塞與駐軍，打造所謂的「莫洛托夫防線」；蘇聯的空軍基地也更靠近德蘇邊界，使柏林完全暴露在蘇聯軍機的航程範圍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莫洛托夫訪問德國之後，希特勒指示必須愈早消滅蘇聯愈好，因為史達林的胃口難以饜足。最糟的狀況就是英美同盟從西線而蘇聯從東線同時進攻，李賓特洛甫在回憶錄中表示，「元首非常擔心」德國會捲入「大規模的兩線作戰，屆時將導致巨大的人命與財產損失」。<sup>74</sup>由於難以衡量當前的戰略處境，快速擊敗蘇聯因此成了軍事上的合理觀點。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在一場面對所有軍事高層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演說中，希特勒談到即將來臨的戰爭，表示消滅蘇聯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俄國與亞洲對德國的威脅」。<sup>75</sup>德國的將領們儘管對於這場衝突的可行性感到不安，但他們都認為這場戰爭勢在必行。德國第二航空軍團司令凱賽林（Albert Kesselring）回憶說：「希特勒認為俄國人只要一逮到有利機會

就會攻擊我們，我也同意他的說法正確無誤。」他又說，最重要的是「讓共產主義遠離西歐」，這句話在十年後的冷戰高峰期依然十分管用。<sup>76</sup>

即使德國軍方高層接受德蘇戰爭在戰略上的必要性，但他們似乎未曾認真思考過一個問題，那就是征服廣大歐亞土地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希特勒認為自己是被迫發動這場戰爭，然而他論點背後的基礎卻是透過征服來建立終極的德意志帝國，其領土之廣袤，即使是海上強權也難以撼動。希特勒在審視戰略時，絕口不提奪取更多生存空間其實是一種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而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的冗長會議中提醒各級將領：「難以估計的豐富」物資與土地將會落入德國人手裡。希特勒又說，一旦第三帝國延伸到俄羅斯，德國「將擁有一切資源，可以在各大陸發動戰爭」。<sup>77</sup>一九四〇年八月，希特勒標定的征服地區，北起阿爾漢格爾斯克，南至阿斯特拉罕，希特勒認為這是德國人應得的領土，可以讓德國人在麥金德的世界島中取得一席之地。幾個月後，希特勒對親近人士透露：「位於俄羅斯的這塊空間，必須永遠由德國人支配。」<sup>78</sup>希特勒的想法充分反映了德國數十年來的「東方」帝國空間想像。

這些動機彼此影響加強，為希特勒提供了一個兩年前還無人敢設想的願景：建立一個橫跨歐亞的廣大帝國。一九四〇年七月到十二月，希特勒逐漸下定決心，德國軍方也開始擬定詳細計畫。十二月中，最終文件出爐，等待希特勒批准或修改，這份文件主要根據陸軍與希特勒司令部的兩份重要研究撰寫而成。第一份研究在八月由馬克斯少將（Erich Marcks）完成。馬克斯建議兵分兩路，北路攻打列寧格勒，南路占領烏克蘭工業區，之後北路轉而向南，南路轉而向北，兩路包抄莫斯科。馬克斯私底下對這場戰爭感到悲觀，他認為這場戰爭的戰線實在太長，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延伸到窩瓦河，而且很可能導致美國參戰，形成更大規

模的戰爭，但他的疑慮未能傳達給希特勒。<sup>79</sup>第二份研究是洛斯貝爾格中校（Bernhard von Lossberg）奉希特勒司令部指示進行。這份研究在九月中完成，洛斯貝爾格計畫分成三路進攻：北路攻占波羅的海港口以確保後勤補給；中路搭配大量裝甲師與摩托化師，目標攻占莫斯科；南路以扇形展開，攻占敖得薩與黑海沿岸，取得烏克蘭的豐富資源。三路兵力都要在一個戰役季度裡達成目標。<sup>80</sup>

十二月五日，結合這兩項計畫的最後定稿呈交給希特勒，此時希特勒也因為莫洛托夫的來訪而深信他的天命就是要消滅俄羅斯，「無論什麼時候，俄羅斯總是阻擋德國前進。」三路攻勢是較受支持的選項，但希特勒想先集中兵力奪取列寧格勒與烏克蘭資源，然後再進攻莫斯科。雖然哈爾德與陸軍高層私底下希望保留莫斯科做為主攻軸心，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參謀長約德爾最後還是依照希特勒的訓令修正了作戰計畫。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簽署第二十一號作戰訓令，命名為「巴巴羅薩」，巴巴羅薩是十二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留著紅鬍子，曾經率領第三次十字軍前往聖地。這項訓令極具野心，而且完全忽視原計畫的評估——原計畫曾對德軍是否有能力征服與占領如此廣大的領土提出質疑。一九四〇年八月，陸軍參謀部軍事地理局提出一份詳細報告，裡面提到蘇聯早已將大量的工業資源移往西伯利亞，而光是地形與氣候已足以阻礙德軍達成任務。<sup>81</sup>武裝部隊戰時經濟局局長托馬斯將軍

（Georg Thomas）認為從現在起到入侵之日，石油仍無法做到充分供應，但他同樣也無法說服希特勒。據說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這麼答覆：「當你需要一件東西卻又偏偏沒有這件東西時，你就必須靠征服去取得。」<sup>82</sup>

幾個月來，德國高層的討論與計畫完全奠基在幾項從未受到質疑的假定之上。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德軍可以輕易擊敗紅軍。馬克斯少將預



期這場戰役需要的時間比法國戰役多一點，大概八到十一個星期；洛斯貝爾格中校則認為主要階段攻抵終點線的時間需要九到十七個星期。德國高層普遍深信共產主義國家非常脆弱，紅軍上起高階將領下至基層士兵，作戰能力不足且士氣低落。然而，這樣的判斷過於草率，資訊也不正確。約德爾就曾宣稱：「俄羅斯巨人就像漲大的豬膀胱一樣，刺一下就破了。」<sup>83</sup>德軍將領同樣也不瞭解蘇聯的工業狀況與戰爭機器運作邏輯。一九四一年一月，陸軍情報單位發行了一本《蘇聯軍事力量手冊》，裡面根據的全是薄弱無力的證據，認為紅軍「不適合現代作戰，無法進行決定性抵抗」。德軍將領經常用種族歧視的語氣把紅軍稱為「蒙古人」或「亞洲人」，認為他們只是「一群部落民」而非軍隊，因此這場戰爭將會是一場殖民地戰爭。五月，布魯門提特將軍（Günther Blumentritt）甚至預測這場戰役只會持續八到十四天，因為敵人只是一群「不識字、混有亞洲血統」的士兵，指揮他們的也是毫無能力的軍官。布勞齊區元帥認為這場戰役頂多四個星期，在德蘇邊境附近可能會出現激戰，接下來則是一連串的掃蕩。<sup>84</sup>希特勒提醒他的將領，俄國人是「頑強的敵人」，但卻是一群「烏合之眾」。在巴巴羅薩作戰前夕，希特勒預測四個月後能夠獲勝，比絕大多數將領審慎得多。<sup>85</sup>

德國高層相信德軍遠比蘇聯軍隊優越，因此決定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這表示德軍在面對蘇聯時，不會像面對英國與美國一樣需要考慮資源瓶頸的問題。然而德軍的計畫並未考慮如何對散布在廣闊地理範圍的士兵進行補給，蘇聯的地形與氣候也跟德軍先前作戰的歐洲戰場完全不同。要在一個道路只有百分之五屬於硬路面的地方維持機動作戰，從一開始就顯得問題重重。德軍有許多資深將領一戰時都曾在俄國前線服役，例如哈爾德，但令人詫異的是，他們居然沒有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不僅如此，哈爾德還認為：「只有仰賴車輛才能得勝，我們需要更

多的摩托化部隊.....。」<sup>86</sup>德軍在巴巴羅薩作戰中動員了六十萬輛車輛，涵蓋兩千種以上的各式車輛類型，包括許多俘獲的卡車與貨車，這些車輛很難維修，也很難找到零組件更換。當德軍缺乏額外的機動運輸工具時，便轉而仰賴馬匹，馬匹的數量曾一度多達七十五萬匹。由於馬匹會占去鐵路運輸過多的空間，於是只能靠馬匹自己行走或藉由車輛運載到前線，然而這些馬匹在俄羅斯炎熱的夏季與嚴寒的冬季根本不堪使用。<sup>87</sup>德軍從一九三九年開始仰賴鐵路補給，可是鐵路卻難以在蘇聯戰役中提供足夠的支援，因為德國的火車頭與貨車無法在蘇聯的寬軌上行駛，必須由德國工兵在整個歐俄地區進行替換。為了緩和可能的補給瓶頸，德軍採取了應變措施：戰車搭載了兩倍的燃油與軍火，後面再拉著一輛載著兩百公升燃油的拖車，如此可以延長戰車行駛的距離。<sup>88</sup>然而，不利戰車行進的地形也會增加燃料消耗量，使原本捉襟見肘的補給雪上加霜。即便有這些挑戰，德軍仍認為這場戰役很快就會結束，因此不願正視這個潛在的後勤危機。<sup>89</sup>

從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國開始加快入侵準備工作。十一月中，希特勒下令由建築調配全權總代表托德（Fritz Todt）負責，在東普魯士拉斯敦堡（Restenburg）附近的兩百五十公頃林地上興建新軍事司令部。這座司令部外表偽裝成新化學工廠阿斯卡尼亞諾德（Askania Nord），實際上卻是由掩體、碉堡與辦公室構成的巨大網路，外圍環繞著鐵絲網、混凝土防禦工事與地雷，希特勒便是在此地指揮蘇聯戰役。希特勒把這座司令部命名為「狼穴」（Wolfsschanze）。相較於設在首都的同盟國軍事司令部，希特勒選擇遠離柏林的政府與軍事機關，在與外界隔絕的地方設立司令部。想與元首開會者都必須從德國首都搭乘火車前往新司令部。<sup>90</sup>德軍進一步擬定詳細計畫，但一切都保持絕對機密，避免史達林與紅軍察覺德國即將對他們發動滅國戰爭。

士兵與飛行員逐漸東移，但德國掩飾成這些士兵只是返回後方修整，等修整完畢還會繼續回到前線對英作戰。德國對資訊的管控極為嚴格，德國軍人甚至到了開戰前幾個小時才得知行動內容。當時甚至廣泛流傳一種說法：俄國人已經同意借道，讓德軍經由蘇聯境內進攻中東，包圍大英帝國部隊，而這一戰略將會對未來大戰的走勢產生深遠影響。<sup>91</sup>當巴巴羅薩作戰終於發生時，無論是德國還是蘇聯的軍隊都感到大吃一驚。

這場攸關「生存空間」的戰爭，就像波蘭戰役一樣，除了軍事準備，還要搭配其他手段才能將整個歐亞大陸轉變成殖民空間。希特勒再次委託希姆萊與安全機關進行「特殊任務」，從事這項任務的有四個特別行動隊，主要由將近三千名安全警察、親衛隊與保安處人員構成。他們將跟隨德軍進入蘇聯，奉命對共產黨體系進行斬首行動，負責殺害共產黨官員、知識分子、軍中的人民委員與擔任公務員的猶太人。三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對將領們發表的冗長演說中解釋，他們參與的是一場殲滅布爾什維克敵人的戰爭，可以使用最殘酷的手段，無須受到戰爭法的限制。一名出席這場演說的人回憶，兩百五十名軍官聽到希特勒鼓吹他們使用非正規與非法武力，但他們不願意大張旗鼓地這麼做。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希特勒的說法，然而贊同的人也不在少數。巴巴羅薩作戰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場與眾不同的戰爭。希姆萊組織這些謀殺隊伍的同時，也以強化德國民族性帝國專員身分為新殖民地地區規畫一套業已在波蘭推行的種族清洗模式。一九四〇年由希姆萊的副手赫特林（Konrad Meyer-Hetling）擬定的「東方總計畫」（Generalplan Ost），起初只延伸到前波蘭領土的德蘇疆界。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巴巴羅薩作戰前夕，希特勒下令制定新計畫，並且只用短短三個星期就完成。新計畫把東方總計畫的空間規畫延伸到歐亞大陸的廣大區域，預計用三十年以上的時間清除這塊「殖民區」裡的斯拉夫人與猶太人，交由德國人長期屯墾。<sup>92</sup>

希特勒也要求相關單位準備有系統地掠奪與利用蘇聯的經濟資源。二月與三月，四年計畫主持人戈林成立了「東方經濟參謀部」，這個新組織最終在三月十九日獲得希特勒批准。東方經濟參謀部人員超過六千人，是特別行動隊的兩倍，他們負責掠奪物資、石油與糧食，並且接管蘇聯的工業企業以維持德國的戰時經濟。根據計畫，德國將在預期的征服區設立四個經濟督察區，北起阿爾漢格爾斯克，往南經過莫斯科周邊地區，最後抵達南方的巴庫與伊朗邊界。<sup>93</sup>在戈林指示下，農業部部長巴克（Herbert Backe）負責推行農業利用計畫，巴克無情地估算出一個驚人的數字：為了讓糧食能供應德國與德軍的需要，占領區將面臨糧食短缺，最多可能會有三千萬人餓死。一九四一年四月，戈林的副手寇爾納（Paul Körner）簽署一項祕密命令，讓巴克能毫無顧忌地採取行動。五月二日，也就是入侵蘇聯的前一個月，部長會議在無人反對下（無論是基於道德或其他理由）通過一份聲明，這份聲明日後又被稱為「大饑荒計畫」。巴克甚至表示：「俄羅斯人忍受貧困、飢餓與儉樸已經有幾百年。他們的胃很有彈性，因此不需要假惺惺地憐憫他們。」<sup>94</sup>

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人類史上最龐大的入侵部隊已經就位。陸軍有超過三百萬名士兵、三千六百輛戰車與七千門火炮，一共分成北、中、南三個集團軍，另有兩千五百架飛機進行支援。與一年前入侵法國相比，戰車與飛機的數量並沒有太大差異，但此時德軍卻有十八個裝甲師與十三個摩托化師，數量比法國戰役增加許多，這是因為每個師分配到的戰車與車輛減少的緣故。入侵法國時，每個裝甲師大約有三百輛戰車；到了巴巴羅薩作戰時卻減少到一百五十輛左右，中央集團軍較多，平均約兩百一十輛。在所有戰車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一是性能較好的四號戰車與三號戰車，其餘則是輕戰車與俘獲的捷克或法國戰車。<sup>95</sup>七十八個步兵師主要仰賴馬與馬拉貨車，他們用步行的方式橫越毫無遮蔽的



鄉野地帶。然而，入侵部隊不是只有德軍。芬蘭、羅馬尼亞與斯洛伐克也派兵加入，不久後義大利與匈牙利也派出小規模分遣隊，使入侵部隊達到三百七十萬人，總共一百五十三個師的規模。

希特勒入侵蘇聯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德國利益，但其他國家決定參戰的背後緣由則需要另外解釋。芬蘭與羅馬尼亞想收復一九四〇年被蘇聯侵占的領土，甚至還想取得更多領土以建立「大芬蘭」與「大羅馬尼亞」。芬蘭政權對於與希特勒合作抱持審慎態度，但想擊敗蘇聯侵略者一雪前恥的強烈渴望最終還是克服了所有疑慮。芬蘭國會議長表示，為了抵抗蘇聯，「芬蘭連魔鬼都敢結盟。」<sup>96</sup>芬蘭將這場戰役視為對抗無神論共產主義的十字軍東征，四百八十名路德宗牧師隨軍出征以強化此次戰爭的基督教訊息。芬蘭將這場戰爭稱為「繼續戰爭」，充分顯示這場戰爭與一九三九年蘇芬冬季戰爭的關連。<sup>97</sup>德國讓芬蘭得知德國準備發動巴巴羅薩作戰的機密，因為德國打算將軍隊部署在芬蘭的極北位置，以保護德國在斯堪地那維亞的礦產利益。德國甚至在芬蘭境內設立一小批特別行動隊，他們得以在芬蘭境內殺害上千名猶太人與共產黨員：這就是芬蘭政府與納粹政權的合作極限。一旦芬蘭收復失地，芬蘭軍隊就不再參與圍攻列寧格勒，也不協助德軍繼續推進到莫曼斯克。芬蘭總統呂蒂（Risto Ryti）說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之後，芬蘭將打一場「屬於自己的戰爭」。<sup>98</sup>

羅馬尼亞是唯一打從一開始就參與德軍入侵蘇聯的主要盟友。由於德國已經有軍隊部署在羅馬尼亞負責保護當地油田，因此入侵蘇聯的行動幾乎不可能瞞過羅馬尼亞當局。羅馬尼亞獨裁者安東尼斯古元帥

（Ion Antonescu）雖然在羅馬尼亞將領與軍隊中的評價不高，但希特勒依然在一九四一年春讚揚他建立了穩固的「國家指導者」地位。一九四〇年八月，希特勒在「第二次維也納仲裁」（Second Vienna Award）中

裁定羅馬尼亞必須割讓部分外西凡尼亞領土給匈牙利，這起事件讓羅馬尼亞政權對於是否加入德國入侵蘇聯存有戒心。但政權內也有人認為，唯有向德國靠攏才能避免蘇聯威脅，維持國家的領土完整，也許還能因此推翻維也納仲裁的決定。與芬蘭人一樣，羅馬尼亞人也把這場戰爭視為十字軍東征，用羅馬尼亞副總統米哈伊（Mihai Antonescu）的話說，這是一場「偉大的聖戰」。<sup>99</sup>羅馬尼亞動員了安東尼斯古集團軍，包括羅馬尼亞第三軍團與第四軍團，總計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八十五人。安東尼斯古集團軍雖然名義上聽命於安東尼斯古，但實際上卻被併入德國南面集團軍，主攻敖得薩。部分羅馬尼亞政治人物希望羅馬尼亞軍隊在收復比薩拉比亞與北布科維納之後就能止步於國境，不再前進，但安東尼斯古深知，一旦投入戰事，羅馬尼亞就必須戰至蘇聯戰敗或遭受嚴厲報復為止。<sup>100</sup>

斯洛伐克與匈牙利也加入德軍入侵，只是反應較為冷淡。斯洛伐克政府在壓力下不得不出兵應戰，因為德軍的南方入侵路線有部分即是從斯洛伐克境內出發。斯洛伐克派出兩個師負責保障後方安全，還有一小群機動部隊加入南面集團軍，結果這支部隊在七月蘇聯反攻時遭到消滅。匈牙利政府與攝政霍爾蒂（Miklós Horthy）對於參戰也同樣不熱衷，但一些將領認為參戰也許可以讓匈牙利恢復過去較大的歷史疆域。六月二十六日，三架轟炸機空襲匈牙利境內的卡薩（Kassa）——據說這些飛機來自蘇聯，霍爾蒂與他的內閣才因此同意參戰。匈牙利派出一支機動軍，大約四萬五千人。但根據一名匈牙利將領的說法，士兵們「毫無熱情」，因為他們不知道為何而戰。<sup>101</sup>歐洲十字軍的說法難以打動人心，儘管德國以這項道德藉口做為政治宣傳，其美化侵略的效果卻十分有限。日後擔任東方占領地部長的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巴巴羅薩作戰開始的前兩天直截了當地對幕僚說：這場戰爭不是屠殺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十字軍，而是為了「追求德國的世界政策與捍衛德意志帝國」。<sup>102</sup>

然而，如果入侵蘇聯純粹是為德國赤裸裸的利益服務，那就難以解釋墨索里尼為何也加入。在義大利戰線已經延伸到北非與地中海，軍隊負擔已達極限的情況下，墨索里尼居然還自告奮勇地派出一個軍參戰。雖然希特勒對盟邦義大利完全保密，不讓對方知道有巴巴羅薩作戰的存在，但義大利情報單位還是得到了這場即將來臨戰役的詳細配置。五月三十日，墨索里尼再次於未告知希特勒的狀況下命令底下做好準備，一旦戰爭開打就要把三個師（兩個步兵師，一個摩托化師）送往東線戰場。<sup>103</sup>作戰開始之前兩天，希特勒終於得知墨索里尼將派兵援助的消息，他感到不悅，卻無法拒絕。希特勒曾對他的空軍副官比羅

（Nicolaus von Below）說道，義大利人的「戰鬥力根本不值得一提」。<sup>104</sup>墨索里尼主動出兵的舉動，扭轉了他在一九四〇年底攻打希臘時被迫向德國求助的屈辱局面，而且與法國戰役一樣，義大利也因此接下來可能出現的歐洲和平協定上有了發言權，即使如今的義大利只能算是德國的小跟班。<sup>105</sup>一九四一年八月，墨索里尼親自前往東線戰場，在烏克蘭與希特勒一同檢閱剛抵達的義大利分遣隊。他的德國盟友在一九四二年春將原本已十分龐大的計畫再度擴大，把領土擴張範圍延伸到烏拉山脈以外地區、波斯與裏海。「然後呢？難道我們要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因為沒有土地可以征服而哭泣嗎？」墨索里尼回道，這是唯一一次，墨索里尼被希特勒的地緣政治幻想激怒。根據口譯的說法，當時希特勒聽到後「默不作聲，但看得出來他十分生氣」。<sup>106</sup>

在德蘇邊界的另一邊，蘇聯當局始終摸不透德國的真正意圖。蘇聯高層並未忽視德國的威脅。法國投降之後，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提摩盛科元帥（Semyon Timoshenko）就曾表示，德國現在已成為「最重要與最

強大的敵人」。<sup>107</sup>史達林原本希望資本主義強權之間的消耗戰可以讓共產主義世界得利，然而法國的迅速戰敗粉碎了他的美夢，而直到德國入侵的前一天，史達林都試圖避免挑釁德國，因為蘇聯軍隊仍未做好大規模戰爭的準備。一九四一年一月，德蘇簽訂新貿易協定，在德軍發動攻擊的那個週末，蘇聯火車仍在搭載資源運往德國。蘇聯計畫一旦雙方開戰，人數不多的邊防軍要在固定的防禦地點堅守，阻擋敵人的攻擊，使國內有時間進行總動員，讓大批紅軍開赴前線將敵軍趕出國境。一九四一年夏天戰爭爆發時，這些準備都尚未就緒：新機械化軍仍在組織，新疆界防禦工事仍在興建，動員計畫仍未完成。當蘇聯參謀總長朱可夫將軍（Georgii Zhukov）得知德軍正在集結的清楚證據之後，在四月底低調進行動員，並在五月十三日下令將三十三個師調往蘇聯西部。但這些軍隊到六月時也只有少部分獲得充分裝備，至於空軍基地的偽裝也是在德國空軍轟炸的前三天才開始進行，導致德國飛機得以低空掃射一排排未隱匿的蘇聯飛機。<sup>108</sup>史達林本人就是紅軍做好進一步準備的最大絆腳石，因為他認為來自西方的情報都是蓄意挑釁以引發德蘇戰爭。空中偵察顯示德國已有準備跡象，德蘇邊境也逮捕了多達兩百三十六名德國間諜，莫斯科更收到超過八十份情報預警，包括德國攻擊的確切日期，但史達林仍不為所動。<sup>109</sup>五月中旬，有紅軍將領建議進行擾亂性攻擊以破壞德軍的準備工作，但最終並未實現。有人認為蘇聯這些部署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入侵德國計畫的一部分，然而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尤其我們知道當時的史達林極力想避免衝突。<sup>110</sup>六月十四日，朱可夫試圖說服史達林下令動員，但史達林回答「這將導致戰爭」而予以拒絕。<sup>111</sup>六月二十一日晚間，提摩盛科與朱可夫終於成功說服史達林通令全國進入高度警戒狀態，但對於還搞不清楚狀況的蘇聯守軍來說為時已晚。隔天清晨，當蘇軍還在試圖解讀史達林的電報內容時，德國的炸



彈與砲彈已經落在他們頭上。<sup>112</sup>

希特勒煩躁不安地等待他的歷史性決定獲得實現。希特勒的空軍副官回憶說：「他喋喋不休，不斷地來回踱步，似乎焦急地等待某個消息。」<sup>113</sup>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日後提到，在六月二十二日的前幾天，史達林整個人「陷入慌亂、焦慮、心情低落，甚至渾身癱軟無力」。<sup>114</sup>六月二十一日晚間，當希特勒告知墨索里尼德國即將入侵蘇聯的訊息時坦白說道：「自己這幾個月不斷地焦慮思考，做出了這輩子最艱難的決定。」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希特勒講的是真話。隔日清晨三點三十分，軸心國軍隊發動全面進攻。在德軍打響第一槍之後，只睡了三個小時而睡眠惺忪的希特勒，在帝國議會向德國民眾宣布，德國與蘇聯自此進入戰爭狀態。接著，希特勒便動身前往狼穴。希特勒這輩子從未去過俄國，對於他要征服的俄國人一無所知。他對李賓特洛甫說道，他不確定「一旦我們真的推開通往東方的大門，將遭遇什麼樣的力量」。<sup>115</sup>在莫斯科，當史達林與政治局開會時，眾人也感到不知所措。史達林想「盡快聯繫柏林」，試圖確認這起攻擊並未獲得希特勒授權。史達林派莫洛托夫詢問德國大使到底出了什麼事，卻被告知兩國已處於戰爭狀態。「我們做了什麼，讓你們這麼對我們？」這是莫洛托夫的回應。搞清楚情況之後，史達林於早上七點十五分命令蘇聯軍隊「殲滅」入侵者。晚間，他下令紅軍向德國境內反攻。<sup>116</sup>

前線狀況完全不同於史達林的想像。出其不意的襲擊與蘇聯前線混亂的準備狀態，使軸心國軍隊得以長驅直入。三大集團軍一開始就依據規畫路線發動攻勢，紅軍還沒來得及撤退到德維納河（Dvina）與聶伯河，就遭到德軍包圍殲滅。北面集團軍的目標是攻占波羅的海國家與列寧格勒，六月二十六日，北面集團軍已穿過立陶宛，深入拉脫維亞，然後在此等候步兵師跟上。七月一日，拉脫維亞首府里加陷落，德軍繼續

挺進，到了七月中旬已距離列寧格勒僅有九十六公里。中央集團軍由波克陸軍元帥（Fedor von Bock）指揮，該集團軍擁有大量裝甲部隊，迅速攻進白俄羅斯，於六月二十八日以鉗形攻勢攻陷首府明斯克，俘虜蘇軍三十二萬四千人。波克緊接著進攻斯摩稜斯克，於七月十六日攻陷該城。然而這場戰役蘇軍在提摩盛科元帥指揮下，為了抵擋德軍鋼鐵洪流而猛攻德軍延伸過長的裝甲部隊側翼，德軍因此陷入苦戰。倫德斯特陸軍元帥指揮的南面集團軍則遭遇最激烈的戰鬥，因為德國情報單位未能調查出蘇聯已經決定集中兵力於南線以保護烏克蘭的工業資源。蘇聯派出機械化軍增援基輔特別軍區，並且將國內可用的現代戰車幾乎全部署於此。蘇聯在邊境地區設下重兵防守，使德軍在進攻杜布諾（Dubno）與奧斯特洛赫（Ostrog）時耗費了一整個星期進行戰車戰。蘇然德軍因此無法快速進軍基輔，但蘇聯的裝甲部隊也因此近乎全滅。位於倫德斯特的右側翼路線上的利沃夫（Lvov，今稱利維夫 [Lviv]），最終在六月三十日陷落。到了七月二日，蘇聯第五與第六軍團已開始全面撤退。<sup>117</sup>南方的羅馬尼亞軍與德軍在七月底收復布科維納與比薩拉比亞的「失地」，八月初開始渡過聶斯特河朝敖得薩前進。惡劣的路況、大雨與蘇聯軍隊的堅強抵抗，使德軍難以依照計畫採取鉗形攻勢圍繞基輔及切斷聶伯河以西紅軍的退路。南面集團軍動彈不得，遲遲無法達成最初目標。直到七月中，倫德斯特的前鋒裝甲部隊才抵達能夠攻擊基輔的距離範圍。倫德斯特對希特勒的空軍副官說：「這是他第一次在戰爭中遭遇如此善戰的對手。」<sup>118</sup>

德軍在北方與中央戰線的快速推進，徹底破壞了蘇聯的前進防禦計畫。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在緊鄰前線與前線後方的位置部署龐大軍隊，理論上來說，蘇聯軍事裝備的數量遠超過進攻方：一百八十六個師，總共三百萬人，一萬九千八百門火炮，一萬一千輛戰車與九千五百

架戰機。<sup>119</sup>然而，蘇聯空軍在短短幾天之內就完全癱瘓，因為德軍攻擊蘇聯機場，摧毀了近兩千架飛機；到了七月初，蘇聯空軍總計損失已經達到三千九百九十架，而許多受損的飛機甚至無法在戰場進行簡易修理。許多蘇聯飛機陳舊過時，缺乏無線電，蘇聯空軍也無法做到統一的指揮調度。戰車主要是老舊型號，火力不足且裝甲薄弱，數量最多的是T—26輕戰車，火力較強的T—34中戰車與KV—1重戰車數量很少，只占戰車數量的百分之八，而且只配備給少數裝甲部隊。這些現代戰車雖然能夠擊敗當時所有的德國戰車，但由於數量太少而無法挽回頹勢。除此之外，這些戰車當時也沒有裝備無線電，因此在戰術上很容易居於劣勢。<sup>120</sup>在德國空軍全天候轟炸下，各個戰線的蘇聯軍團都出現武器彈藥耗盡與燃料不足的狀況。開戰後幾個星期，三百四十座主要彈藥庫就有兩百座遭到襲擊，軍火供給的問題因此更形惡化。蘇聯軍隊的戰場通信也非常原始，而且隨著德軍的推進而失靈中斷，導致蘇軍各級將領無法管理戰場，甚至也無從得知緊鄰部隊的狀況。在巴巴羅薩作戰開始後一個月，蘇軍投入戰場的三百一十九支部隊（包括步兵師、機械化師與騎兵師），若不是已遭殲滅就是受到重創。<sup>121</sup>蘇聯軍隊之所以會蒙受如此巨大的損失，主要是因為蘇軍承襲一戰的粗糙戰術，上級不斷命令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冒著機關槍火網前進。德軍一份來自基輔前線的報告指出，整個戰場就像是大屠殺，蘇聯士兵在槍林彈雨下連續衝鋒四次，直到德軍機關槍槍管太熱無法使用為止。報告又提到：「蘇軍攻擊之猛烈，令我軍精疲力盡、瞠目結舌……我們現在投入的將會是一場痛苦與艱困的漫長戰爭。」<sup>122</sup>一些擁有優秀將領與充足補給的蘇軍有能力組織有效防衛，甚至能進行反攻，進而造成敵軍的重大損失，但戰場整體狀況依然是德軍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到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底，蘇聯無法恢復的人員損失（死亡、失蹤或被俘）已達到驚人的兩百零六萬七千三

百零一人。<sup>123</sup>

初期的勝利讓德軍志得意滿，似乎也證實了戰前對蘇聯不堪一擊的預測，而針對整場戰役制定的龐大計畫看來也是可行。七月三日，哈爾德在他的日記裡寫下著名的結論：「俄羅斯戰役僅僅兩個星期就獲得勝利。」德國各地都洋溢著興奮的心情。七月二十七日，希特勒對晚宴嘉賓表示：「我不擔心東線戰場的情況，因為那裡發生的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在進行.....我始終認為，擁有東方的太陽是一件要緊的事。」兩個星期之後，希特勒甚至主張德國已經取得俄國的領土：「這塊土地已經是我們的囊中物。」<sup>124</sup>七月二十三日，哈爾德認為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將在一個月內攻下，陸軍在十月便能推進至窩瓦河，十二月就能抵達石油城市巴庫與巴統（Batum）。<sup>125</sup>過去兩個月來，德軍將領摧毀了蘇聯前線絕大多數可用的飛機與戰甲車輛，也看到大量的蘇軍俘虜與堆積如山的屍體，他們相信蘇聯的人力與裝備應該已所剩無幾。任何國家遭受如此大規模的損失（損失規模遠遠超出一九四〇年的法國慘敗），應該都會尋求和談，讓巴巴羅薩作戰獲得最終勝利的果實。英國與美國情報單位的估計也是一樣，他們也認為蘇聯很快就會戰敗，德軍很快就會抵達窩瓦河，戰前對蘇聯持久力的悲觀評估將會成真。雖然英美一開始源源不斷地提供軍事物資給蘇聯，但由於相信蘇聯即將戰敗，因此對於援助也開始審慎觀望起來，以免這些物資最終落入德國手中。<sup>126</sup>

然而實際上，德軍所相信的紅軍即將戰敗完全是一種錯覺。德軍快速突破蘇軍防線，顯示出專業優異的戰技，但這場戰役也凸顯出德軍的缺失或缺乏效率之處。戰前比較悲觀的預測都已預先提到這點，同時也預測到蘇聯士兵是強悍的敵人。實際上也確實有許多蘇聯軍隊面對槍林彈雨，依然奮不顧身地發動自殺式抵抗。德國採取鉗形攻勢時刻意繞過蘇聯部隊，許多蘇聯士兵因此得以潛入森林與沼澤地形伏擊德國士兵，



或者當德軍部隊在荒野搜索四散的紅軍時，蘇聯士兵也能給予德軍痛擊。蘇軍嚴酷地對待俘虜的德軍，德軍又以更嚴酷的方式進行報復，造成了惡性循環。德軍與安全部隊殺害所有可能是游擊隊與非正規部隊的嫌疑分子，燒毀所有可能藏匿這些人的村落。敵方士兵一旦遭到俘虜，通常就會遭到殺害。七月初，黑利奇將軍（Gotthard Heinrici）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描述他轄下步兵師士兵面對的殘酷現實：

之前還在我們面前的俄國人，一下子就灰飛煙滅。這場戰爭實在太過血腥。有時，我們完全不給對方活命的機會。俄國人就像野獸一樣，朝著我方受傷的士兵步步進逼。我們的士兵則是看到有人穿褐色的軍服，就開槍擊斃或活活打死。廣大的森林裡依然到處散布著士兵與亡命之徒，他們有些人手無寸鐵，有些人擁有武器，總之都是極度危險的人物。即使我們派了幾個師的軍隊穿過這些森林，數萬人仍須小心翼翼，防止自己在這個難以穿越的地形中被逮住。<sup>127</sup>

幾個星期之後，黑利奇告訴妻子，「我們全都低估了俄國人。」兩天後又寫道：「我們原本期待快速推進，現在卻寸步難行。」同一個月，他冒著信件審查的風險抱怨：「這場戰爭讓我們付出慘重代價，這一切真的有必要嗎？」<sup>128</sup>

蘇聯的地形與氣候讓這場入侵行動更添困難。步兵與車輛在泥土路上揚起了厚重而令人窒息的塵土，而突然下起的大雨又會讓道路化為一攤爛泥。無論是哪個集團軍，都只能望著濃密森林或蜿蜒沼澤興嘆；德軍愈是深入敵境，戰線正面就展開得愈大，戰場因此變得彷彿永無止境，德軍在此面對的是與波蘭或法國迥然不同的世界。長時間的強行軍、突然遭受伏擊的威脅與炎熱的天氣，都讓德軍士兵苦不堪言。一名

士兵在家書上寫著：「永無止境，綿延不絕的地貌，我們永遠走不到目的地，每天看到的都是不斷重複的景象。」<sup>129</sup>另一名士兵抱怨：「該死的俄羅斯森林！進到裡面就搞不清楚眼前是敵是友，因此我們經常對自家人開火.....。」<sup>130</sup>無數馬匹遭遇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特別是用來拖運火砲的挽馬。在路況不良的道路與炎熱的氣溫下長時間運輸，這些馬匹在幾天內就精疲力盡，但步兵師又必須努力跟上在前頭開路的裝甲師，因此這些馬匹往往被驅策到極限，有時拖行到一半就死在路上。數千輛車輛故障拋錨使德軍更加仰賴馬匹，但到了十一月時馬匹也只剩下原本的六成五，而接下來要面對寒冬，草料供應不足又將成為問題。<sup>131</sup>關於後勤補給困難的預測，幾乎從開戰之初就開始應驗。到了七月中旬，德國只順利改裝了幾百公里的鐵路，後勤補給的重任全落到馬匹與車輛身上。中央集團軍每天需要二十四列補給列車，卻只能得到半數。所有的戰線都出現燃油嚴重短缺的問題，而不良的道路狀況與泥土路使戰車的速度變慢，消耗燃油增多；加上俄國境內河流網的各式橋樑普遍品質不佳，無法支撐戰車與重型車輛，迫使戰車與車輛必須繞道而行，更加重燃油的消耗。由於用來運輸的貨車型號規格不一，造成後勤補給的危機，現在更因為道路塵土飛揚，不僅輪胎磨損嚴重，塵土也經常阻塞引擎。七月中一名士兵提到，「我們要對抗的是泥土結成的硬塊。」開戰後的第一個月，陸軍就損失了四分之一的運量，接下來幾個月都只能在不良道路與惡劣天候下運送人員物資。到了十一月，德軍只剩下百分之十五的車輛還能繼續上路行駛。<sup>132</sup>

速戰速決的戰略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上，德軍誤判了蘇聯的實力與蘇聯戰場的特性，正如四年前日本誤判了在廣大華中地區快速擊敗中國軍隊的難度一樣。各個戰線的德軍都需要休息整補，還要抵擋不願認輸的蘇軍持續不斷地反擊。不過蘇聯軍隊也遭到嚴重削弱，至少目前此時還

無法取得決定性戰果。此時，關於入侵蘇聯的戰略方針爭論再起，使得戰局的發展更加複雜。這起爭論早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就曾出現，但當時只是擱置一旁而未獲得解決。七月十九日，希特勒發布第三十三號訓令，要求中央集團軍停止向莫斯科推進。中央集團軍必須調撥部分兵力協助北面集團軍圍攻列寧格勒，此外還必須協助倫德斯特的南面集團軍包圍基輔周邊的蘇聯軍隊，之後再轉而攻擊頓內次盆地與高加索地區的油田。進攻莫斯科的行動要等到九月初補給危機改善後再重啟。陸軍高層強烈反對這項調整，他們認為擊敗莫斯科周圍的紅軍將可帶來最終的決定性結果，然而這場關於用兵順序的爭論從七月底一路持續到八月初，德軍因此喪失了戰略先機。希特勒認為烏克蘭的經濟資源才具有關鍵性，然而他的觀點只有在當地資源可以開採且可以快速使用下才具有戰略合理性，但實際上無人能保證是否能夠做到。希特勒認為，與烏克蘭相比，莫斯科是個「無關緊要」的目標。八月二十四日，第二裝甲兵團司令古德林將軍堅持他的軍隊應該直撲莫斯科而非南下烏克蘭，希特勒於是抱怨：「我的將領對於戰爭的經濟面向一無所知。」<sup>133</sup>經過一個月的爭論與毫無結果的戰鬥，希特勒感到挫折，但他的命令終於獲得執行。古德林率領部隊南下，但他擁有的戰車數量已不到一半，在惡劣天候進行苦戰之後，古德林終於在基輔東部的洛赫維察（Lokhvitsa）與倫德斯特軍隊的北翼會合，成功圍困了被史達林要求死守基輔的五個蘇聯軍團。九月十九日，基輔陷落，被圍的蘇聯軍團又奮力抵抗了六天才投降。基輔戰役俘虜的人數相當驚人，達到六十六萬五千人，這個結果彷彿顯示最終的勝利已近在眼前。

南面集團軍的兵力損耗甚大，人員也十分疲憊，但他們在攻陷基輔之後又繼續朝頓內次工業區與克里米亞推進。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央集團軍北上協助李布陸軍元帥（Ritter von Leeb）的北面集團軍，這些部

隊在八月底穿越愛沙尼亞，於九月八日抵達列寧格勒近郊。德軍奪取什利謝利堡（Shlisselburg）之後，列寧格勒最後一個通往內陸的陸路通道也被切斷。激烈戰鬥沿著無數平民建立的簡陋防線展開，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希特勒命令北上支援的部隊返回中央集團軍，戰鬥才停止。列寧格勒被圍，每天都遭受轟炸與砲擊，希特勒寧願將居民活活餓死，也不願迫使軍隊進行代價高昂的城市戰。希特勒希望這座城市就此消失：

「列寧格勒被亞洲斯拉夫人視為進入歐洲的門戶。這個門戶必須關閉。」<sup>134</sup>從十月開始，列寧格勒只能從拉多加湖不定期地取得補給，十一月中旬湖面冰凍之後，就會形成一條不太穩固的「冰上道路」。食物優先給予工人與士兵，但到了十二月，就連工人與士兵每天也只能吃到兩百二十五公克的粗麵包，其他的居民更少，只有一百四十公克。冬季月份，最多有九十萬名列寧格勒市民在極為糟糕的環境下餓死與病死。一九四二年一月，蘇聯開始經由冰上道路運送每日平均兩千公噸的物資進入列寧格勒，使城內的倖存者能繼續生存下去。這場圍城戰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三年才結束。<sup>135</sup>

由於北方與南方已有取勝的希望，希特勒終於同意讓中央集團軍重新整補，他相信紅軍只剩最後一批預備隊，因此希望在莫斯科將這批預備隊組織成西部方面軍與預備隊方面軍之前將其擊潰。九月六日，希特勒發布第三十五號訓令，要求集中兵力擊敗位於莫斯科西部由提摩盛科指揮的軍團（九月中旬之後改由柯涅夫一級上將〔Ivan Konev〕指揮），深入到莫斯科以東，同時對莫斯科採取圍而不攻的策略——雖然陸軍將領與士兵在經歷無數次戰役與穿越許多殘破廢棄的鄉野之後，都希望以攻占莫斯科作為目標。儘管如此，為了重新補充耗損的人力與裝備，新戰役又延遲了幾個星期才展開。九月，中央集團軍的戰車只剩下三分之一，而損壞的戰車必須運回德國才能修理。人力補充也是個



瓶頸。中央集團軍到了九月已經損失二十二萬人，卻只獲得十五萬人補充，而且幾乎不可能再獲得新的人力。這場新作戰有個略帶諷刺的代號「颱風」。由於後勤補給體系已經超過負荷，因此這次作戰只能獲得幾個星期的物資補充。雖然如此，進攻莫斯科的行動還是重新點燃了德軍的樂觀情緒。就連負責軍需的華格納將軍（Eduard Wagner），即便內心十分清楚德軍的後勤補給已難以應付任何一場大型作戰，也在十月五日寫道：「我們即將看到蘇聯的最後一場大敗仗.....就在莫斯科東部。之後，我想這場戰爭就可算是大致結束。」<sup>136</sup>十月二日是「颱風作戰」（Operation Typhoon）的發起日，希特勒返回柏林，一天後在柏林體育宮向德國民眾發表演說。他對聽眾表示，自己剛從「一場足以左右世界的戰鬥中」回到柏林，這項說法其實不算誇張。希特勒又說，布爾什維克主義這條「醜陋凶殘如野獸般的大敵」已遭宰殺而「永遠不能翻身」。日後看來這是一項太過一廂情願的說法。<sup>137</sup>

與過去幾次攻勢一樣，颱風作戰一開始十分順利。計畫遵循一套熟悉模式：由三個裝甲兵團包圍佛雅馬（Vyazma）與布里安斯克（Briansk），然後隨後趕來的步兵師會把包圍網收緊，不讓蘇軍逃脫，如此通往莫斯科與莫斯科以東的道路將完全不設防。蘇聯將領未能察覺一場大戰即將發生，也許他們以為被削弱的德軍已沒有能力再發動一場進攻，直到兩天後，古德林的第二裝甲兵團突然朝奧勒爾（Orel）與布里安斯克直撲而來，蘇聯將領才大夢初醒。十月二日，中央集團軍北翼進攻佛雅馬時遭遇頑強抵抗。十月三日，奧勒爾陷落，四天後，佛雅馬與布里安斯克被圍。第三裝甲兵團由於耗盡燃油，無法在一天內封住包圍圈，導致一些蘇軍順利脫逃，但最後結果看似仍有可能與基輔一樣，德軍將會殲滅或俘虜包圍網內的一百萬名蘇軍，這場勝利終將為德軍開啟通往莫斯科的坦途。然而，第三裝甲兵團的遲延造成了慘重代價，德

軍因此碰上秋天的傾盆大雨，也就是蘇聯的「泥濘道路季」降臨。為了封住包圍網的缺口，德軍必須額外花上數天時間進行消耗戰。原本近在咫尺的莫斯科逐漸消失於眼前，德軍士兵、馬匹與車輛與包圍網內持續抵抗的蘇軍爭戰，愈來愈少的補給與泥濘的道路，使德軍喪失了前進速度。在此之前，德軍的進攻已經受到各種因素阻礙，例如品質極差的道路，經常阻塞的狹窄鐵路，遭到破壞的橋樑，以及經常在僅存少數品質良好的道路上炸出三十公尺寬彈坑的蘇聯延時地雷。古德林第二裝甲軍團<sup>[3]</sup>的後勤補給固定由通往布里安斯克的道路運送，然而蘇軍卻對這條道路發動了三十三次破壞行動，多達十一座大橋被炸毀。繞道需要額外的時間與燃料，而運輸車輛也經常陷入沼澤地形與泥土路而動彈不得。<sup>138</sup>這種狀況使得燃料與軍火的運送極不穩定，德軍無法取得足夠的補給，就無法維持攻勢。隨著大雨季節降臨，原本已經艱難的局勢又變得更加嚴峻。第三裝甲兵團投入作戰才兩天就耗盡燃料，必須以空運方式解決燃油問題；兩個星期後，整支軍團彈藥耗盡，必須等待從華沙一路運往前線的補給。<sup>139</sup>受到這些條件的限制，中央集團軍的火力逐漸減弱。十一月一日，波克元帥宣布「必須暫時停止推進」。<sup>140</sup>

颱風作戰開始的那一個月，德軍攻勢就已經在蘇聯強烈抵抗下減緩，但到了十一月中地面封凍的時節，精疲力盡且耗損嚴重的德軍又奉命對莫斯科再發動一波攻勢。希特勒此時又猶豫不決，他一方面相信現在仍有可能讓德軍推進到莫斯科以東的原訂目標，但另一方面也承認可能要拖到一九四二年才能真正擊敗紅軍。十一月十九日，希特勒甚至對哈爾德坦言，最後有可能必須協商和平，因為「雙方都無法摧毀彼此」。第二天，軍備與彈藥部長托德直言不諱地向希特勒表示：「這場戰爭無法以軍事手段取勝。」<sup>141</sup>在此之前已經有許多將領要求有序地撤退到十月時的戰線以減少傷亡，但希特勒決定無論如何攻勢都必須持

續。德國各集團軍在經過四個月以上持續消耗性的戰鬥之後，實際上已完全喪失作戰能力。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地面作戰幾乎已經完全停止；十二月初，少數部隊已經推進到可以看見莫斯科的距離，但此時德軍已成強弩之末。德軍頂著嚴寒，卻沒有禦寒的冬裝，缺乏糧食補給，戰車與火炮也因為氣溫降到零度以下而無法正常運作。「所有人都厭倦俄羅斯，也厭倦這場戰爭，」一名士兵如此寫道，充分反映德軍士氣之低落。<sup>142</sup>中央集團軍的兵力已只剩原來的一半，從開戰以來已損失三十五萬人，而且武器持續損耗，卻因為運輸體系幾乎完全停擺而無法得到補充。古德林的第二裝甲軍團試圖朝莫斯科前進，最後不得不停步於土拉（Tula），此時他只剩四十輛戰車。

颱風作戰遲遲無法推進圍困莫斯科，使蘇聯獲得史達林需要的喘息機會。莫斯科一度在十月中陷入恐慌，政府機關倉皇疏散到東部的古比雪夫。十月十八日，史達林決定留守莫斯科並且動員民眾冒著雨雪在城外挖掘防線。史達林任命朱可夫擔任西部方面軍司令，負責保衛莫斯科。朱可夫最初手中只有八萬到九萬的可用之兵，但很快補充了許多倉促拼湊、缺乏軍官的部隊，朱可夫把兵力與裝備集中在「莫扎伊斯克防線」（Mozhaisk Line），當這個防線崩潰時，朱可夫撤退到離莫斯科市中心只有十六公里的防衛帶。十一月十九日，當波克元帥指揮疲憊不堪的德軍再度蹣跚發起進攻時，史達林問朱可夫，「你確定我們能守住莫斯科嗎？……像個共產黨員一樣告訴我實話。」朱可夫其實心裡並不確定，但他對史達林說：「毫無疑問，我們能守住莫斯科。」<sup>143</sup>十一月初，大量預備隊開始組織成首都防衛部隊，這些士兵很多都是從蘇聯的遠東與中亞部隊抽調來的，因為蘇聯情報單位已經得知日本即將往南進攻英國、荷蘭與美國屬地。十二月一日，布勞齊區在報告中指出，紅軍已經「沒剩下多少預備隊」。事實上，朱可夫此時擁有三十三個步兵

師、七個騎兵師、三十個步兵旅與兩個裝甲旅，總計一百萬人，此外還有七百輛戰車與一千一百架飛機。<sup>144</sup>

紅軍計畫發動一次有限作戰以擊退德軍的鉗形攻勢，並且在莫斯科西部建立堅強防線。十二月五日清晨三點，蘇軍在大雪中分成南北兩路，從莫斯科發動進攻。德國士兵與將領都感到驚訝，他們努力要進行陣地防禦，然而原本採取攻勢的德軍並未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十二月十五日，蘇軍收復莫斯科北方城市克林（Klin），在莫斯科南方，古德林的軍隊被迫從土拉後退一百三十公里來到卡盧加（Kaluga），並且在這裡與蘇軍發生激烈巷戰，最後德軍也不得不撤出卡盧加。德軍將領努力應對這場無法阻擋的撤退，當凍僵且營養不足的士兵陷入恐慌時，他們還要試圖防止中央集團軍完全崩潰。在更北邊，紅軍收復了季赫溫

（Tikhvin）；而在南邊，南面集團軍原本攻占了羅斯托夫，但作戰能力已到了極限，最終羅斯托夫得而復失。這是開戰以來德軍第一次撤軍，而且此後將持續後撤，直到來年三月，大雨迫使已經精疲力竭的雙方停下腳步為止。大約有八萬名德軍士兵陣亡，但紅軍在許多方面仍因為由無經驗的軍官率領而顯得戰術無能，總共損失超過四十四萬人。<sup>145</sup>為了避免德軍全面崩潰，希特勒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下達「停止命令」，要求士兵停留在原地，就地防守；一個星期之前，希特勒將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解職，由他本人直接指揮德國陸軍，如此他才能更直接地控制各級將領與駁回他們撤退的要求。

事實上，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前，巴巴羅薩作戰就已經露出敗象。前線德軍極度缺乏裝備與訓練有素的士兵，與蘇聯作戰能力有關的情報也不正確。德軍從一開始就認定可以在四個月以內徹底擊敗蘇聯，這使德軍冒了極高的風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名參謀本部軍官寫道：「我們因為過於傲慢、高估自身實力而付出代價。」<sup>146</sup>巴巴羅薩



作戰失敗也可以從戰略層面加以解釋，那就是入侵的主要目標不明確。一方面，德國陸軍想殲滅蘇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執著於攻占土地以運用資源，這兩種目標產生了緊張與拉鋸。這種衝突先是在七月與八月引發作戰優先次序的爭論，造成入侵的長期延宕，之後希特勒又屢次干預，不惜要求德軍分兵盡可能攻占土地。德軍規畫的三個戰場分布在過於遼闊的地域上，而這個地域有著歐洲最險惡的地形與最落後的基礎建設，但德軍卻沒有充分考量到後勤補給的問題，光是這項錯誤就足以看出德軍對於「東方」有著完全錯誤的想像。對德軍而言，波蘭與法國戰役的作戰距離相對較短，軍隊物資可以透過德國的鐵路網運輸。反觀在蘇聯戰場上，德國各集團軍之間部隊移動距離往往在四百五十公里到六百五十公里之間，而且幾乎無法仰賴鐵路運輸，道路狀況極差，更不用說還會遭受蘇軍襲擾。人們最常問的問題是，蘇聯的戰爭機器如何在德軍攻擊下依然能夠存續且不至於崩潰。但如果我們反過來看德軍必須面對的各種困難，特別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後幾個月，我們也許應該問的是，德國的戰爭機器如何能占領如此廣大的地區，而且能守住這些地區直到一九四二年。希特勒與參謀本部的期望，與前線的現實狀況存在著巨大落差，而這個落差只能仰賴德軍的堅忍不拔與專業能力來填補，德軍因此被要求在惡劣環境下做出超越作戰可行性的事。德國士兵持續不斷地戰鬥，他們只能聽天由命。一月二日，黑利奇將軍在尤赫諾夫（Yukhnov）遭到包圍，他再度寫信給妻子：「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麼事，知道一切將不可避免，內心免不了感到挫折，然而無論我說什麼都只是對牛彈琴。命運自有安排，它毫無憐憫之心，不會因為規模大小而有絲毫不同。對於這場戰爭，我不會再自欺欺人。」<sup>147</sup>

※ ※ ※

隨著德國在東方首次遭遇敗績，這場全球性的戰爭也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轉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早晨（日本時間是十二月八日），日本航空母艦派出飛機轟炸位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與此同時，日本陸軍也對位於東南亞與菲律賓的英國、荷蘭與美國屬地發動攻擊。這項行動被視為機密，就連駐德大使大島浩將軍也不知情。大島浩從一九四一年夏天就不斷催促東京加入對蘇戰爭，希望「從源頭毀滅共產主義」。假使日本真的進攻蘇聯，那將會是「麥金德時刻」，或許整個歐亞大陸都將在德日的掌握之下，但日本領導高層卻不願趁著德國節節勝利之時入侵蘇聯，即使在七月底日本外務大臣豐田貞次郎曾告知大島浩，巴巴羅薩作戰讓日本陸軍「有絕佳的機會解決北方問題」。<sup>148</sup>七月二十五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凱特爾元帥（Wilhelm Keitel）告訴波克，「元首希望日本能認知到現在正是入侵蘇聯的最好時機，然而他的希望似乎只是徒勞。」<sup>149</sup>

事實上，日本領導高層已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認定南進奪取東南亞的石油與資源才具有更大的戰略意義。此外，日本前任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已經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Neutrality Pact），這也限制了日本入侵蘇聯的可能。日本更傾向與德蘇維持和平關係，讓史達林能加入《三國同盟條約》，共同參與對抗西方海洋國家的歐亞戰役，這個結果其實也能與麥金德的地緣戰略思考一致。因此，當德國領導人要求日本加入打倒蘇聯的行列時，日本領導人的反應顯得十分冷淡，並不直接支持德國的戰爭。<sup>150</sup>日本領導高層甚至反過來希望德國在未來日本向美國開戰時能提供協助，然而根據《三國同盟條約》，當日本屬於攻擊方時德國並無義務協助。希特勒原本不願與美國開戰，一九四一年三月的訓令顯示，他「與日本合作」的首要目標是擊敗英國，因為英國仍是德國的主要敵人。但當珍珠港的消息傳來，希特勒也開始

認為日本可以讓美國無法介入歐洲事務，也可以讓美國無法分心支援英國。相較於日本不願協助德國對抗蘇聯，希特勒卻選擇聯合日本對抗美國。<sup>151</sup>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過了四天，美國仍未向歐洲軸心國宣戰，而樂見美國捲入亞洲衝突的蔣介石則是立刻對軸心國宣戰。十二月十一日，希特勒無視德軍在俄羅斯的危機，在德國國會公開宣布對美宣戰，同一天稍晚，墨索里尼也對美宣戰。為了顯示軸心國團結一致，希特勒要求李賓特洛甫與日本簽訂《德日聯合戰略協定》（German-Japanese Agreement on Combined War Strategy），不過這份協定僅具有宣示意義，因為德國幾乎未對日本的亞洲戰爭提供任何戰略或軍事援助。儘管如此，珍珠港事件與隨後日本南進得勝的消息，卻激起兩國民眾的熱情，完全無視眼前的風險。群眾聚集在東京皇居前，感謝天皇的神聖指引。<sup>152</sup>德國祕密警察的報告顯示，德國民眾同意向美國宣戰，「唯一可能的答案」，報告寫道，而且民眾還認為日本得勝將使美國的注意力轉向太平洋，減少《租借法案》對英國的援助，削弱英國與蘇聯的戰爭實力，讓戰爭早日結束。日本不斷取得勝利，與德軍在俄羅斯的慘況形成鮮明對比，戈培爾決定每次在廣播發布消息時都要宣揚日本的戰績。<sup>153</sup>德國海軍也對向美國宣戰表示歡迎，因為不這麼做的話，美國很快就會擁有世界最龐大的海軍。對美宣戰後的隔天，海軍元帥賴德爾與希特勒開會，他向希特勒保證，一旦美國全力投入太平洋戰爭，英國就會陷入困境。<sup>154</sup>

後世史家幾乎一致同意，對美宣戰可能是個要命的戰略誤判，因為德義日三國已經對中國、蘇聯與大英帝國投入了代價高昂的消耗戰，如果還要向世界最大經濟體宣戰，顯然不是個理性選擇。事實上，就連日本與德國的領導人原本也希望避免開戰。儘管如此，德國認為美國在軍

事上欠缺準備，有著長期孤立主義的傳統，因此缺乏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或意願——正是德國對美國的這種認知，才促使德國做出對美宣戰的決定。對美宣戰當天，希特勒對他的午餐嘉賓說道，美國軍官只是「穿著軍服的生意人」，不是真正的軍人，幾天後又說美國工業「被嚴重高估」。<sup>155</sup>然而，沉睡的巨人依然是巨人。或許我們不該用常理來衡量德日的宣戰決定。對日本領導人來說，這場衝突是為了對抗西方強權環伺而不得不發動的自衛戰爭，而這場戰爭也包括了對英國與荷蘭的戰爭。東條英機認為，西方圖謀將日本變成「過去的小日本」，企圖終結延續了兩千六百年的皇國光榮。日本領導人自認發動戰爭是為了去除西方的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文化，讓亞洲各民族在「父皇」領導下成為一個大家庭，也就是日本傳統的「八紘一宇」。日本仰賴的不是對於獲勝機率的理性計算，而是歷代天皇與戰歿軍人的英靈將保衛從未戰敗的日本帝國獲得勝利。因此，日本初期的勝利完全歸功於日本的「精神力量」與「皇室祖先」的庇佑，後期的戰敗則歸咎於「缺乏真正的愛國精神」。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的宣戰決定不只是冒險的地緣政治算計產物，也反映出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觀。<sup>156</sup>

對希特勒來說，對美宣戰只是將華府祕而不宣的戰爭揭露開來，因為美國早已透過《租借法案》支援英國與蘇聯對德作戰；美國不僅在海上支持戰爭，還凍結德國所有的經濟資產。希特勒早就預期新德意志帝國總有一天會跟美國起衝突。希特勒對日本大使說道，進入正式戰爭狀態之後，反而讓大西洋之戰變得單純許多，潛艦艦長不再需要「為了區別美國船與英國船而累積心理疲勞」。<sup>157</sup>德國對美宣戰後的幾個星期，德國潛艦開往西部進行「擊鼓作戰」（Operation Paukenschlag），沿著美國海岸擊沉此時尚無艦隊與飛機護航的船隻。一九四二年的前四個月，總共有兩百六十萬噸的同盟國船隻被擊沉，超過一九四一年全年



總和。<sup>158</sup>希特勒認為德國與美國進入戰爭狀態，只是促使到目前為止潛藏的衝突浮上檯面，然而這個論點後面其實隱藏著一個更具威脅性的陰謀論。希特勒有一個扭曲現實的觀點，他相信美國是因為受到全世界猶太人的教唆才敵視德國。希特勒的一名口譯記錄下他的觀點：「美國等同於各領域猶太人的總和，包括從事文學的猶太人、從政的猶太人、從事商業與實業的猶太人，最頂層還有一個完全猶太化的總統。」<sup>159</sup>

在納粹主義的世界觀裡，羅斯福是猶太人的僕人，不斷激勵倫敦與莫斯科的猶太人繼續戰鬥。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與黨內領袖開了一次祕密會議，他在會裡解釋，與美國的戰爭完全是猶太人操縱造成的，他還表示自己當年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做的預言看起來即將應驗：如果德國捲入全球戰爭，那麼猶太人將會遭到滅絕。隔天，身兼柏林大區長官的戈培爾在日記裡寫道：「世界大戰就在這裡，滅絕猶太人是必然結

果。」<sup>160</sup>雖然歷史學家無法斷定這場會議就是猶太人大屠殺的起點

（在此之前，在德國占領的東方領土已經有數十萬猶太人遭安全部隊與德軍殺害），但希特勒在會議裡把世界大戰與猶太人共謀連結起來，使對美宣戰帶有一種理性計算的味道，而不是非理性的孤注一擲。

日本領導人知道對美作戰絕不是一件好事，但至少可以結束原本不宣而戰的曖昧狀況，因為在此之前，美國早已對日本的關鍵工業資源

（包括石油）實施禁運，而且持續給予與日本交戰的中國支援與資金協助。日本決定對美宣戰，背後理由與希特勒的主張十分相似。希特勒認為只有攻打一個更龐大且潛在軍力更強大的對手才能打敗英國，而日本也認為攻打美國（與大英帝國），有助於解決與中國的衝突。以德國與日本來說，要擴大戰爭顯然必須取得更多資源才能成功，而這些資源就分別位於烏克蘭與東南亞。經過十年的帝國擴張，日本已經把東亞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就跟美國理所當然把西半球視為自己的支配地區一

樣，其他國家都必須予以尊重。日本領導人無法理解當前的局勢為什麼不能被視為既成事實，為什麼與美國進行協商時，美國不能認同日本是個具有正當性的新亞洲秩序領導者，反而認為日本的擴張違反了國際規範。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公開指責美國不願理解日本在亞洲扮演的角色，日本「採取軍事行動完全是為了避免文明遭到摧毀」並藉此建立符合公義的和平。<sup>161</sup>美國的毫不妥協被解讀成一種想扼殺與消滅日本民族存在的國際陰謀。一九四一年，日本希望與美國商討出一個彼此能夠妥協的方案，讓日本能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中國戰爭，同時又能取得維持帝國所需的戰略資源。可想而知，雙方的討論並無交集。

諷刺的是，當時羅斯福總統與軍方高層關注的重點是歐洲衝突而非太平洋。羅斯福在一九四一年發表的所有演說中，共有一百五十二次提到希特勒與德國，只有五次提到日本。<sup>162</sup>美國認為憑藉海軍力量就可以威嚇日本。一九四〇年五月，羅斯福命令太平洋艦隊在進行海上演習之後就永久駐防珍珠港。另一方面，美國也認為經濟壓力可以迫使極度仰賴美國供應金屬與石油的日本就範。早在一九三八年，羅斯福就已要求對日本進行道德禁運，項目包括石油、鋼鐵、飛機與金融，此外還搶先收購日本產業需要的物資。<sup>163</sup>一九四〇年一月，美國廢除了一九一一年簽訂的《美日通商條約》。一九四〇年夏天，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美國以《出口管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正式限制對日本輸出戰略物資，包括航空燃油、廢鐵與鋼鐵、鐵礦砂、銅與煉油設備。一年後，日本占領印度支那南部，日本資產遭美國凍結。羅斯福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下令，日本必須申請聯邦許可才能取得石油產品，但羅斯福不希望日本所有申請都遭到拒絕，以免日本走上極端。美國認為透過一連串措施引發經濟危機，就可以讓日本收手，但美國駐日大使格魯

（Joseph Grew）則向華府提出警告：「威脅日本人只會更堅定他們的決心。」<sup>164</sup>事實也確實是如此，經濟局勢陷入混亂的日本，開始尋求更極端的解決方式。

一九四一年，日本政軍高層針對如何解決中國危機展開辯論。有人主張採取外交手段，也有人認為應該向英美開戰，儘管後者始終是政府希望避免的選項。然而，與希特勒決定進攻蘇聯一樣，日本領導人逐漸認清戰爭勢在必行且難以避免。美國政治人物不瞭解已經持續四年的中日戰爭對日本造成的衝擊：當時日本社會已經進入總體戰，民眾的物品與糧食供應持續減少，財政赤字嚴重，民間也開始鼓吹犧牲與簡樸的文化。<sup>165</sup>美國並未面臨迫在眉睫的災難，因此沒有強烈的危機感，但對日本領導人來說，中國戰場的膠著與禁運造成的經濟困頓迫使他們必須採取違反理性的解決之道。一九四一年夏秋，外相松岡的去職與近衛內閣的垮臺，充分顯示日本面對這場危機時的手足無措。松岡洋右與近衛文磨這兩個日本新秩序的主要締造者改由軍事官僚東條英機接替，然而東條英機的表現也讓人清楚看出日本菁英在決定國家走向時同樣舉棋不定。一九四一年七月，擔任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首次主持會議，會中同意採取南進政策，首要目標是截斷蔣介石的外援與奪取東南亞的石油與原料。日本陸軍與海軍過去對於未來戰略一直有著不同的想法，而兩軍在這次會議之後決定暫時攜手合作。德蘇戰爭解除了蘇聯對滿洲的威脅，但日本陸軍依舊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將滿洲關東軍的兵力增為兩倍，以確保若蘇聯戰敗時可以趁機獲利。儘管如此，孤立中國的南進政策在戰略上顯然更有立竿見影的效果。<sup>166</sup>七月底，日本陸軍占領印度支那南部，切斷蔣介石主要的外援路線（估計占一九四〇年援助物資的七成）。這個結果加快了對美宣戰的腳步。隨著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使日本損失了四分之三的石油進口，陸軍的戰爭計畫便於八月九日

獲得批准，預計在十一月對美宣戰。海軍則希望將時間提前到十月。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批准了對美宣戰的方針，近衛文麿說這是一場「自衛」戰爭。<sup>167</sup>

然而，近衛文麿的首相職位在十月十六日遭東條英機取代，後者立即承諾會重新尋求外交解決途徑，使亞洲在日本的監護下獲得和平，並且如近衛所言避免「讓日本立刻捲入戰爭」。決定和平與戰爭的最後期限延到了十一月底。內閣討論了幾天，兩種方案都進行詳細檢視後，決定再對外交途徑做出最後嘗試。十一月五日的御前會議上，日本政府向天皇稟告目前預計採行的消極做法，如果最後的外交手段未能成功，那麼戰爭就不可避免。內閣與大本營都認為他們是被迫開戰，而非他們選擇戰爭。東條英機授權向華府提出兩個方案：甲案承諾日本會在兩年內從印度支那與中國撤軍（但仍保留海南島、華北與滿洲國），但希望美方能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包括恢復貿易、停止援助中國與承諾不干預中日關係；乙案則是較為保守的提案，如果美國承諾停止貿易禁運與不再援助中國，日本就承諾不再繼續侵略。<sup>168</sup>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與資深外交官來栖三郎將這兩項計畫遞交華府。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外交情勢來看，這兩項方案都不過是日本的一廂情願，但日本卻很嚴肅地看待這兩項妥協提案。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國截獲日本的外交電文（代號「魔術」），電文要求日本談判代表必須堅持十一月二十九日是達成政治協定的最後期限：「這次我們是認真的，最後期限絕對不能改變。過了這個期限，我們就會進行下一個步驟。」<sup>169</sup>十一月底，太平洋地區美軍進入警戒狀態，但日軍會從何處進攻仍不得而知。

羅斯福認為，如果日本提出的條件可以維持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合乎美國利益，那麼他並不反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但主導協商的國務卿赫爾卻堅決反對日本仍繼續侵占中國領土。赫爾不理會軍事高層的建



議與總統本人的期望，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告知日本代表，清楚表明長期協商必須以恢復到占領滿洲之前的狀況為基礎，而日本領導人顯然不可能接受這項要求。<sup>170</sup>日本政府把美國的回應視為最後通牒，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討論接下來的做法。東條英機認為「外交途徑已經失敗」，接下來只能以戰爭方式解決。日本領導高層幾乎沒有人願意主動挑起與美國和大英帝國的戰端，因此當他們做出開戰決定時，似乎認定這一切都是外力加諸在他們身上，若不願接受屈辱與羞恥就只好挺身應戰。東條英機曾在十一月五日的御前會議提到，日本若接受美國的條件就會淪為三流國家：「美國也許一時會被激怒，但最終必能瞭解我們的處境。」<sup>171</sup>一旦日本控制所需的石油與資源時，美國輿論應該會大感震撼，美日就有機會協商出一個能滿足日本國家目標的協定。日本在十一月還曾經考慮另一項做法，那就是藉由促成德蘇和解來孤立美國，但這兩個交戰國顯然毫無停戰之意。<sup>172</sup>

赫爾向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照會當天，日本海軍中將南雲忠一指揮的機動部隊奉命從千島群島海軍基地出發，前去攻擊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十二月二日，南雲收到「登新高山一二〇八」的密碼電文，授權他於日本時間十二月八日發動攻擊。與此同時，日本也從中國與印度支那調兵進攻菲律賓與馬來亞。華府得知日本發動南方作戰的消息，認為日軍的目標是占領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卻渾然不知南雲艦隊即將發起的攻擊行動。突襲珍珠港的計畫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四〇年底，當時海軍高層開始認真準備南進政策，但其實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南進就已經是日本海軍的目標。<sup>173</sup>突襲珍珠港的詳細計畫是由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那個性孤僻的參謀黑島龜人擬定，據說他總是一絲不掛地把自己關在黑暗的房間裡，連續幾天思索解決方案。<sup>174</sup>大規模艦載機攻擊在當時還是嶄新的事物，其中一個成功範例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英

國攻擊義大利的達蘭多。日本大使館官員在達蘭多遭受空襲的隔日到現場近距離查看，切身瞭解這場攻擊造成的破壞。日本也深受德國成功襲擊挪威的影響，在挪威戰役中，德國成功運用空中力量癱瘓英國的大型艦艇。一九四一年春，日本決定由一名艦隊司令同時指揮數艘航空母艦，使航空母艦的打擊火力能發揮到最大。日本對航空魚雷進行改良，使其可以在相對較淺的珍珠港水域前進，而不至於沉入海床；海軍飛行員也接受嚴格訓練，在極低高度投下魚雷與俯衝轟炸。山本五十六與其他日本高階軍官一樣，都不想與美國開戰，但他瞭解如果要讓美國太平洋艦隊無法對東南亞作戰構成威脅，攻擊珍珠港就是關鍵的第一步。唯有如此才能讓日軍達成南進的首要目標，取得東南亞的石油與資源。然而，攻擊珍珠港的計畫提交給海軍參謀本部之後卻被打回了票，海軍參謀本部認為這項計畫從亞洲戰場抽調太多海軍兵力，投入大量航空母艦也可能帶來風險。但山本五十六以辭職做為要脅，海軍只好在十月二十日批准這項計畫。南雲第一航空艦隊的任務是至少擊沉珍珠港內停泊的四艘美國戰鬥艦，以及摧毀港口設施與儲油設備。第一航空艦隊由六艘航空母艦（共搭載四百三十二架飛機）、兩艘戰鬥艦、兩艘巡洋艦與九艘驅逐艦組成。日本並未針對這場具有風險的作戰派出規模特別龐大的海軍艦艇，這是因為過去幾年日本的海軍戰略已經認定空中力量才是影響海戰的關鍵。

南雲忠一接獲指示，即使艦隊在接近夏威夷歐胡島時被美軍發現也必須進行攻擊，最終整場突襲行動在十二月七日早上就順利完成。如今我們已經知道美軍被成功突襲的諸多原因：首先是地面飛機緊密停放在一起，因為當地指揮官金默爾海軍上將（Husband Kimmel）接獲可能發生破壞行動的警告。第二，有限的雷達系統在早上七點關閉（當時雷達上曾經出現光點，卻被解讀成正在演習的B—17轟炸機群），而飛機

資訊中心（仿效英國皇家空軍的系統成立）尚未開始運作。第三，港口未設置魚雷攔阻網。第四，美軍明明在空襲前的清晨發現日本派出微型潛艦進入珍珠港，儘管擊沉其中一艘，但美軍並未啟動全面預警。最重要的是，儘管美國情報單位曾經警告日本即將發動攻擊，但他們從各種跡象判斷，都認為日軍的目標是東南亞。<sup>175</sup>事實上，山本五十六這次作戰行動可以說是運氣奇佳，他原本判斷成功的機率只有一半。

拂曉時分，三菱「零式」戰鬥機、中島製九七式艦上攻擊機與九九式艦上轟炸機分兩波從航空母艦起飛，第一波一百八十三架，第二波一百六十七架。<sup>176</sup>儘管飛行員已經受過嚴格訓練，但這場攻擊行動依然十分艱困。最成功的是幾乎摧毀了夏威夷所有的美軍飛機——一百八十架遭擊毀，一百二十九架受損。對美國軍艦的攻擊比較沒那麼成功。四十架魚雷轟炸機只有十三架命中目標，而俯衝轟炸機則難以辨識目標，八艘停泊的巡洋艦只擊傷了兩艘。當第二波攻擊抵達時，卻發現目標已經被煙霧掩蓋。除了命中率不高，日軍投擲的許多炸彈也未能引爆。戰鬥艦亞利桑那號（*Arizona*）遭到轟炸，炸彈正好打穿前方彈藥庫，亞利桑那號因此在猛烈爆炸後沉沒，大火燃燒的景象也成為這場戰爭最具代表性的畫面。返航的日軍飛行員認為他們造成了嚴重破壞，但就像英軍空襲達蘭多一樣，等到煙霧散去，才發現結果其實不如想像嚴重。空襲發生時，美國的航空母艦全都已經出港。四艘戰鬥艦被擊沉，一艘擱淺，其他三艘戰鬥艦則受到輕微損壞；另有兩艘巡洋艦與三艘驅逐艦受重創，兩艘輔助艦艇沉沒。日本海軍還派出二十七艘艦隊潛艦前往珍珠港外攔截突圍的船隻，藉此徹底封鎖夏威夷，但兩個月內只擊沉一艘油輪與擊傷一艘軍艦。<sup>177</sup>這次行動獲得的成果已經超越山本的預期，但若搭配更有經驗的飛行員與更好的戰術，這次空襲應該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

這場攻擊行動最明確的戰果就是造成大量美國人死傷：總共有兩千四百零三人死亡，一千一百七十八人受傷。羅斯福因此無須再為說服美國民眾參戰煩惱。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幾天，羅斯福對他的親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說道，他無法說服自己宣戰：「我們是民主國家，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而且我們有優良的傳統。」<sup>178</sup>日本的攻擊激怒美國的輿論，一口氣終結數年來孤立主義與干預主義的論戰。不計代價擊敗日本成為美國各界的共識。另一方面，對於可能遭受日本侵略的大英帝國來說，美國急於報復日本恐將使美國減少對歐戰的投入——除非德國與義大利也做出讓羅斯福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說服美國民眾對抗歐洲軸心國的行動。為了確保英美的戰略一致，十二月二十二日，邱吉爾率代表團前往華府，在持續三個星期代號「阿卡迪亞」

（Arcadia）的會談中，英國代表團試圖確保美國能持續支援歐洲戰事。過去英美的軍事參謀曾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進行過非正式會談，雙方當時已達成臨時協定，同意歐洲是兩國的優先目標。一九四一年八月，邱吉爾與羅斯福首次在紐芬蘭普勒森夏灣（Placentia Bay）召開會議，雙方擬定《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明確表示打倒「納粹德國」是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首要關鍵。

十二月的高峰會上，邱吉爾成功獲得羅斯福保證，儘管美國海軍表達了強烈的保留態度，但羅斯福還是同意歐洲仍是美國的首要目標。另一方面，英美也罕見地建立前所未有的合作關係，兩國成立商討戰略方針的共同論壇，也就是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同時也在運輸、軍火生產與情報上相互交流。<sup>179</sup>儘管如此，雙方還是有一些重大分歧。羅斯福與他的軍事參謀不願意完全遵循英國的計畫，總統身邊有許多厭惡英國的人士都認為歐戰是純屬英國自己的「帝國戰爭」。英美兩國的當務之急就是防止蘇聯戰敗。羅斯福對財政部長說道：「沒有任何事比俄羅斯崩



潰更糟。我寧可失去紐西蘭、澳洲，也不願看到俄羅斯崩潰。」羅斯福的說法顯然不完全合乎大英帝國的利益。<sup>180</sup>羅斯福與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都認為，必須於一九四二年在歐洲對希特勒發動正面進攻，以分攤蘇聯壓力，但英國認為此舉風險太大而堅決反對——這場爭論直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才結束，因為此時在歐洲發動攻勢顯然已不可行。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僅僅過了三個星期，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羅斯福就在阿卡迪亞會議上闡述他思考的美國全球戰略，並且以他命名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為名發表一份宣言——這裡的聯合國包括所有與軸心國作戰的國家。與《大西洋憲章》一樣，《聯合國宣言》揭櫫了民族自決與經濟自由的關鍵原則，也標誌了舊帝國秩序的價值將被美國國際主義的價值取代，而這種轉變將隨著戰事持續而更加明顯。

英美的會談持續了幾個星期，整場討論總讓人有一種不真實的奇異感受。因為就在兩國開會的同時，日本陸海軍已成功橫掃整個東南亞與西太平洋地區，替其南進政策獲得決定性的成果。但這場戰役的規模完全無法與巴巴羅薩作戰相比。由於日本在中國戰場投入大量陸軍，海軍也忙於珍珠港行動，因此在東南亞能運用的兵力十分有限：五十個可用的陸軍師團只出動十一個與七百架飛機；海軍有一千架飛機，但只能出動半數，此外也派出兩艘航空母艦、十艘戰鬥艦與十八艘重巡洋艦支援陸軍兩棲作戰。<sup>181</sup>這場戰役的風險甚至高於珍珠港，因為日本把兵力分散在四個主要的作戰行動上：奪取菲律賓、占領泰國、攻占馬來亞與新加坡海軍基地，以及征服荷屬東印度。儘管如此，這也是日本從一九三七年對中開戰以來漫長時間裡一場難得的勝利。西方的防衛薄弱，主要是因為英國必須全力應付歐洲與中東的戰爭，而美國才剛開始增援。荷蘭被德國征服之後，在荷屬東印度只能仰賴當地的殖民地軍隊防守。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軍隊絕大多數是沒有作戰經驗的印度師。當時倫敦與華府每天都會接到軍事災難的簡報，一開始是兩艘英國戰鬥艦被擊沉，而最初還是邱吉爾堅持派出這兩艘戰鬥艦去嚇阻日本人。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Prince of Wales*）與戰鬥巡洋艦卻敵號（*Repulse*）在航向南中國海時，深信自己在日本飛機的攻擊範圍之外，然而它們對日本的作戰能力卻一無所知。十二月十日，兩艘軍艦被從印度支那基地起飛的日本魚雷轟炸機擊沉。短短幾個小時，英國在東方的海軍力量就遭到殲滅。只有日本人為這場戰役命名為「馬來亞海戰」。<sup>182</sup>

兩場入侵英屬馬來亞與美屬菲律賓的主要戰役在十二月八日開打。受過遠距離跨海飛行訓練的飛行員，從日本帝國位於臺灣的基地起飛前去攻擊菲律賓。跟在歐胡島一樣，日本飛行員發現美軍飛機成排停放在克拉克空軍基地的跑道上，並且順利摧毀了半數的B—17與三分之一的

戰鬥機。十二月十日，日本對呂宋島實施兩棲作戰，接著快速朝首都馬尼拉進軍，一月三日，馬尼拉投降。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在一九四一年稍早被任命為美軍指揮官，他下令美菲混合部隊撤退到巴丹半島。沒有空中掩護，只有美國潛艦運來的一千噸物資，這支軍隊注定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三月十二日，麥克阿瑟撤退到澳大利亞，等待來日再戰。巴丹於四月九日投降，科雷機多島要塞在經過慘烈而堅忍的防守之後，倖存的美軍指揮官魏銳特將軍（Jonathan Wainwright）於五月六日放棄戰鬥。日本第十四軍俘虜了將近七萬名士兵，其中一萬人是美軍。這些被俘虜的士兵被要求沿著巴丹半島行軍前往臨時搭建的關押營地。生病、疲憊與飢餓，許多人被日本士兵毆打、殺害與羞辱，這些日本士兵自己也深受醫療物資與糧食缺乏之苦，而他們往往瞧不起投降的人。<sup>183</sup>

在馬來亞北部，山下奉文將軍的第二十五軍於十二月八日進行兩棲作戰，但由於最初難以找到充足的登陸船隻，因此只有數千人參戰。山下奉文的部隊並未遭遇有組織的抵抗，守軍不到幾天就全線崩潰，並且在混亂中往半島南方邊戰邊退。一月二十八日，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Arthur Percival）下令棄守半島南端的柔佛，大批帝國軍隊撤退到新加坡。山下奉文最後率領約三萬名士兵進攻新加坡，因為日本大本營認為新加坡是未來進攻荷屬東印度的關鍵地點。山下奉文的軍隊遠少於新加坡守軍，英國、印度與澳洲聯軍一共八萬五千人，加上增援的部隊總數達到十二萬。這支大軍擠在新加坡這座島嶼上，然而島上並未興建防禦工事，難以抵擋接下來的陸上攻擊。<sup>184</sup>二月八日，山下奉文命令兩個師團與近衛師團在夜間發動進攻。邱吉爾致電要求守軍必須戰至最後一人，然而這只是用來激勵帝國人心的場面話。幾個星期以來，英軍面對的是一群捉摸不定且極為殘暴的敵人，持續撤退早已讓軍隊士氣低落，

因此日軍的進攻隨即讓新加坡守軍陷入恐慌。就在許多人爭搶新加坡港內所剩不多的船隻之時，白思華同意向山下奉文投降。十二萬人被俘，這是大英帝國歷史上最大與最屈辱的失敗。<sup>185</sup>其餘的英軍哨站也迅速潰敗。十二月二十五日，面對勢不可擋的占領，香港在抵抗了十八天之後向日本第二十三軍投降。英屬婆羅洲守軍在撤離前破壞了油田，並於一月十九日投降。不久，英屬緬甸也開始受到日軍威脅。

日本一開始其實沒有入侵緬甸的想法。最初的入侵部隊只是想破壞鄰近的英國機場，因為這些機場可能對馬來亞戰役構成威脅。但日軍將領從馬來亞戰役中看到大英帝國部隊的不堪一擊，因此認為可以繼續深入緬甸進窺印度。日本陸軍相信進一步的擴張或許可以「迫使英國屈服，連帶地讓美國失去作戰意志」。<sup>186</sup>更直接地說，征服緬甸可以切斷印度對中國西南蔣介石軍隊的補給，使日本可以占領盛產稻米的地區與年產達四百萬桶的仁安羌油田。英國在緬甸的兵力薄弱，僅有為數一萬人的英國、印度與緬甸聯合部隊，十六架過時的布魯斯特水牛戰鬥機。<sup>187</sup>一月二十二日，飯田祥二郎將軍率領的日本第十五軍發動緬甸戰役，總計下轄四個師團，三萬五千人。緬甸守軍在混亂下撤往仰光。由於緬甸的補給路線攸關中國存亡，蔣介石因此在十二月向英國提議在緬甸部署中國軍隊以抵抗日本可能的攻擊，但已經被任命為印度總司令的魏菲爾將軍不僅斷然拒絕蔣介石的提議，也反對蔣介石在重慶設立聯合軍事會議來擬定整個亞洲戰略的構想。<sup>188</sup>英國擅自扣留《租借法案》的對華援助，並且將這些物資存放在仰光，這項舉動使中英兩國的關係急速惡化，尤其這些援助物資對英國自己戰局的影響並不大，英方的做法可謂多此一舉。三月七日，大英帝國部隊放棄仰光，倉促撤往北方。蔣介石對於英國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深惡痛絕，一名經歷整起事件的美國人認為這是一種「種族優越情結」。<sup>189</sup>十二月，蔣介石早在日



軍南侵之前就已經告訴魏菲爾，「你跟你的軍隊不知道怎麼跟日本人打仗。對抗日本人.....跟打殖民地戰爭不一樣.....在這方面，你們英國人是無法勝任的。」<sup>190</sup>

蔣介石對於已經成為盟邦的美國期望不大，但他還是需要美國援助。羅斯福總統決定派一名參謀長協助蔣介石，他的人選是前駐華武官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lwell）。然而，史迪威自視甚高，幾乎對所有人都會給予苛刻批評。史迪威私底下認為蔣介石是個「頑固無知、充滿偏見與自大的專制領袖」，但史迪威依舊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初抵達重慶，接下了這份他其實不太願意接受的職務。<sup>191</sup>史迪威第一個提案是說服蔣介石讓他指揮中國剩下兩支最好的軍隊第五軍與第六軍，他要用這兩支軍隊收復仰光，讓《租借法案》的補給線維持暢通。蔣介石提醒他，絕大多數中國師不過就是三千名步槍兵搭配少數機關槍，幾輛卡車，而且沒有大砲。<sup>192</sup>史迪威不為所動，他沒有實戰經驗，對日軍也一無所知，就這樣率軍在緬甸中部攔阻日軍，結果可想而知是一場災難。沒有空中掩護，對於底下的中國軍官又缺乏尊重，史迪威一接觸到能征善戰的日軍馬上就敗下陣來。四月二十九日，緬甸北部的臘戍被日軍攻下，到了五月，日軍幾乎已經占領緬甸全境。五月五日，史迪威對數千名中國士兵棄之不顧，逕自帶著一小群人往西逃逸。第六軍幾乎遭到殲滅。殘餘的第五軍在艱困環境下，於同年稍晚努力抵達印度邊境城鎮英帕爾，而史迪威早在五月二十日就抵達該地，並且把敗戰的責任全推到蔣介石、中國將領與英國人身上。

英軍撤退到印度的這段漫長旅程，因為途中遭遇龐大的難民潮而變得困難重重，難民潮估計達到六十萬人，絕大多數是印度人與英緬混血兒。史林少將（William Slim）的軍隊四散各地，很難維持軍隊的後勤或增援，這群衣衫襤褸、精疲力盡的殘兵抵達印度時，幾乎喪失了所有

軍事裝備。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抱怨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打仗，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厲害，結果導致這樣的慘況。」<sup>193</sup>在緬甸作戰的大英帝國部隊有兩萬五千人，其中傷亡人數達到一萬零三十六人，中國軍隊至少損失兩萬五千人，而日軍在整個緬甸戰役中只傷亡四千五百人。<sup>194</sup>許多緬甸難民沿著僅有的兩條通道逃往印度阿薩姆邦，在惡劣環境下，死亡的難民不計其數。估計約有九萬人死於飢餓、疾病與難以通過的雨季泥淖。諷刺的是，正是這波雨季造成的交通阻隔使印度免於遭受日本入侵。<sup>195</sup>史迪威返回重慶，擔任為數不多的在華美軍將領，但此時緬甸已經落入日本之手，中國的重要補給線隨之中斷。蔣介石對西方盟國喪失信心，認為中國身為盟國，卻未獲得英美的嚴肅看待。蔣介石接受史迪威回到重慶，主要因為他仍想爭取美國的援助，不過他也開始覺得兩國的盟約「不過是一紙空言」。<sup>196</sup>

新加坡失守之後，更南方的荷屬東印度陷落已是時間的問題。三月十八日，盟軍撤離東印度群島，荷屬東印度的豐富資源頓時為日軍所有。日本為了完整達成戰役目標，又繼續攻占一連串太平洋島嶼，從北部的美屬威克島與關島，到南部的英屬吉爾伯特與埃利斯群島。短短四個月時間，日軍幾乎征服了東南亞與太平洋的整個帝國疆域。日軍俘虜了二十五萬人，擊沉或擊傷一百九十六艘艦艇，幾乎摧毀了該區域所有的盟軍飛機，日軍本身則有七千人陣亡，一萬四千人受傷，另外損失了五百六十二架飛機與二十七艘小型艦艇。<sup>197</sup>這就是日本軍事高層嚮往的一九四〇年德國閃擊戰，他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用這種方式來對付盎格魯撒克遜國家。<sup>198</sup>日本的閃擊戰輕鬆獲勝，但與此同時德國對蘇聯的閃擊戰卻失敗了。日本成功的原因不難理解：德國對蘇聯的閃擊戰遭遇嚴重的後勤補給問題，但日本強大的海軍與數量龐大的商船船團卻能順利運送軍隊與裝備。日本多年來在兩棲作戰上進行的訓練與實戰早已

獲得豐碩成果，反觀西方國家對於日本武裝部隊卻少有認識，一方面因為西方國家並未努力蒐集最新情報，另一方面也因為種族歧視的心態作祟，使西方國家瞧不起日本的作戰能力。英屬馬來亞總督曾經對白思華將軍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我想你可以把那些小矮人攆走！」<sup>199</sup>相反地，日本的情報工作則做得相當徹底，他們喬裝成在東南亞生活工作的日本人，一點一滴地蒐集資料，並且利用亞洲人對殖民統治的怨恨。日軍一方面很清楚大英帝國的防守有多麼脆弱，另一方面又派出訓練精良的軍隊與飛行員，這些人早已經歷過中國戰場的嚴酷考驗，禁得起長期戰鬥。<sup>200</sup>負責抵抗日軍的東南亞軍隊則幾乎沒有經歷過戰爭，他們武器缺乏、訓練不足，認為日軍勢不可擋，因此每個人都士氣低落，無心戀戰，這樣的軍隊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香港的淪陷充分體現了這個問題。香港是大英帝國在中國的金融與貿易中心，防守這個殖民地的兵力包括兩艘老舊的驅逐艦、幾艘魚雷艇、五架過時的飛機，以及普遍患有性病等疾病的軍隊。當地僑民組成了抗日義勇軍，然而這些人的年紀多半介於五十五歲到七十歲之間。加拿大旅在香港淪陷前才剛抵達，而且幾乎沒有受過任何戰場訓練。<sup>201</sup>歐洲的帝國部隊長年以來一直負責簡單的統治工作，現在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敵對帝國，這個帝國急欲掃除白人統治，其強大的軍隊都是為了這一刻而做準備。

英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建立的帝國徹底崩潰。從印度的東北邊界，到遙遠的南太平洋吉爾伯特與埃利斯群島，全被日本征服。日本大本營沒有進攻印度的計畫，而且擱置了海軍入侵澳洲北岸與東岸的提案，因為陸軍已經沒有多餘兵力可用。<sup>202</sup>儘管如此，日軍還是於二月十九日轟炸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也進攻新幾內亞的摩斯比港（Port Moresby），此地離澳洲十分之近。但五月七日到八日的珊瑚海海戰，兩艘美國航空母艦擊沉一艘日本航空母艦，另有一艘則遭受重創，入侵

摩斯比港的日軍只好退兵。對英國來說雪上加霜的是，南雲忠一在該年四月率領航空母艦進入印度洋，轟炸英國位於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可倫坡與亨可馬里海軍基地，再擊沉三艘英國軍艦，迫使英國皇家海軍東方艦隊的殘餘船隻撤往孟買以避免更大損失。<sup>203</sup>英國帝國參謀本部非常憂心日本在印度洋的威脅，因此決定於五月五日發動「鐵甲作戰」

（Operation Ironclad）入侵維琪法國的殖民地馬達加斯加，以防止日軍利用這座島嶼做為前線基地。然而這場戰役居然花了六個月時間才迫使維琪政權的守軍投降。<sup>204</sup>

短短幾個星期的時間，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就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與英國的關係也因此產生根本性的變動。新加坡才抵抗幾天就投降，與巴丹半島美軍的英勇抵抗形成強烈對比，也讓英軍丟盡了臉面。大英帝國亞洲防線的迅速崩潰，為英國過去幾年累積的諸多敗仗再添一樁敗績，也讓美國軍方與民眾相信，絕對不要捲入一場拯救帝國的戰略之中，因為這個帝國明明有兩年的時間可以挽救自己卻毫無建樹。<sup>205</sup>羅斯福與幕僚隨即開始籌畫新的全球戰略，以頂替英國衰弱的世界角色，這個戰略將根據阿卡迪亞會議廣泛討論的方針繼續發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學家包曼（Isaiah Bowman）是促使羅斯福否定帝國的關鍵人物，他認為美國歷經數年的「躊躇、膽怯、懷疑」，現在已到了該「迅速做出轉變，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時候。一九四二年五月，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主席戴維斯（Norman Davis）表示：「曾經存在的大英帝國已經成為歷史。」又進一步說：「美國必須取代大英帝國的位子。」<sup>206</sup>一九三九年，羅斯福成立外交關係問題諮詢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認為殖民地自決、貿易自由與平等使用原物料將是未來新世界秩序的重要特色。<sup>207</sup>

日益嚴重的印度政治危機更是讓美國與英國的輿論分道揚鑣。羅斯



福曾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提到印度獨立的議題，對此邱吉爾做出了「強烈而冗長」的回應，羅斯福因此傾向於未來不會在邱吉爾面前再提這個議題（日後他也勸告史達林不要這麼做）。<sup>208</sup>儘管如此，羅斯福仍認為印度是個重要議題，尤其此時日本正準備入侵印度，一九四二年四月，羅斯福致電邱吉爾，建議他讓印度自治，以換取印度參與戰爭。當邱吉爾收到電文時，羅斯福的政治盟友霍普金斯剛好在場，他被迫整晚聆聽邱吉爾宣洩對羅斯福干預的不滿。就在一個月前，邱吉爾曾派前駐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向印度提出要制定一部複雜的聯邦憲法提案。在這部新憲法中，英國仍主掌印度的國防，印度國大黨據此認為英國只是做做樣子，目的是讓印度「巴爾幹化」，因此印度的僵局毫無緩和跡象。儘管如此，對絕大多數英國領導高層而言，大英帝國的未來應由英國自己決定，而非美國。<sup>209</sup>克里普斯鎩羽而歸，美國輿論也在一九四二年轉而強烈反對英國帝國主義。七月，甘地寫信給羅斯福總統，他希望同盟國認清，讓世界「獲得自由」對印度與大英帝國來說不過是句空話。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希望《大西洋憲章》與《聯合國宣言》能夠實現一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未竟的十四點原則。羅斯福駐印度個人代表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持續向他回報印度民眾的冷漠與敵意有多「挫折、沮喪與無助」。<sup>210</sup>

「退出印度」其實是一名美國記者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創造出來的詞彙，但當印度國大黨在八月初開會通過決議，要求立刻宣布印度獨立時，他們立刻採用這個詞做為口號。接下來就是印度總督林里斯戈勳爵說的，爆發了「一八五七年以來最嚴重的叛亂事件」。<sup>211</sup>八月九日，國大黨所有領袖全遭到逮捕，包括甘地在內，而且一直被拘禁到戰爭結束。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有六萬六千名印度人遭到拘禁，一九四三年底更高達九萬兩千人，許多人戴上手銬腳鐐，被關押在骯髒而過度擁擠的

監獄。一開始的逮捕行動在印度中部與西北部引發廣泛的暴亂與騷動。當局詳細記錄了政府機關與公共設施遭到損毀的數量：兩百零八間警局、三百三十二座火車站、七百四十九棟政府大樓與九百四十五家郵局。憤怒的抗議者主要是年輕人，發動了六百六十四起炸彈攻擊。<sup>212</sup>英國政府仰賴印度當地警察與軍隊維持秩序，並且決定放寬《武裝部隊（特殊權力）條例》中使用武力的限制，允許警察與軍隊使用槍枝與棍棒，甚至可以使用迫擊砲、催淚瓦斯與飛機掃射來驅散群眾。根據官方統計，至少發生了五百三十八起警察開火事件，造成一千零六十名印度人死亡，但幾乎可以確定實際死亡人數更多。英國政府也允許廣泛使用鞭刑來進行威嚇。一名區警官下令對二十八名犯人公開處以鞭刑，他寫道：「這麼做無疑是違法的。殘酷嗎？或許吧。但接下來整個區再也沒有麻煩事了。」<sup>213</sup>倫敦的印度事務部不想讓外界知道鞭刑與警察施暴的消息，但英美的反帝國主義遊說團體卻高調散布這則新聞。帝國當局刻意以最無情的手段打壓抗議民眾，背後得到了邱吉爾的充分支持。邱吉爾憎恨甘地，他擔心這場危機可能徹底損及英屬印度的統治。最後印度的秩序固然恢復，但印度民眾的憎恨卻在一九四五年戰爭緊急狀態結束後，重新點燃新一波的暴亂。

一九四二年夏天，羅斯福開始針對殖民帝國的未來進行研究，但他並未徵詢英國盟邦的意見，怕引起不必要的爭端。六月，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訪問華府，羅斯福趁機會試探蘇聯的態度。他向莫洛托夫談到建立託管制度以及最終協助殖民地取得獨立地位的想法。莫洛托夫同意羅斯福的觀點，畢竟反殖民主義原本就是莫斯科的官方思維。羅斯福在解釋觀點時表示：「白人國家.....不能期望再把這些地區當成殖民地。」這種情感顯示美國與英國對於未來戰後秩序為何存在根本的歧異。同年稍晚，邱吉爾在與羅斯福的親信談到在加勒比地區實行託管制

度時，表示只要他當首相一天，英國就會牢牢抓住帝國的海外領土：

「我們不會讓霍騰托人（Hottentots）<sup>[4]</sup>公投決定將白人扔進海裡。」<sup>214</sup>日本南進之後，美國在整個一九四二年的戰略規畫皆因為與英國意見不合而飽受批評。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國籍的英美聯合參謀長首長會議祕書戴克斯准將（Vivian Dykes）抱怨，說美國打算把英國變成「美國的衛星國」。<sup>215</sup>英美對於大英帝國的未來與戰後國際秩序的看法依舊南轅北轍。雖然這些歧異並不妨礙英美之間的合作，但美國如今也加入了蘇聯與中國的行列，無論是舊帝國主義還是新帝國主義，都將成為要打倒的對象。

## 種族與空間：統治戰時帝國

軸心國建立的領土型帝國，從各方面來看都是非比尋常。與耗時數十年一點一滴拼湊組成的舊帝國不同，德義日這三個新帝國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陸續建立，德國更是只有短短三年，而這三個新帝國不久就因為戰爭失利而完全毀滅。儘管投入戰爭使帝國核心承受來自各方的嚴酷需求，但即使是在戰爭期間，軸心三國依然沒有停止為自己的新帝國建立制度、政治與經濟基礎。軸心國似乎存在著一種幻覺，以為自己已經為帝國建立了萬世基業，彷彿無論這場世界大戰勝負如何，都不會影響這套帝國根基。然而隨著戰局逆轉，這種想法已難以自圓其說，尤其在蘇聯與美國成為最主要的交戰國之後。儘管如此，隨著戰爭進行，軸心國也將自身戰爭目標擴大為建立永恆帝國，於是原本在開戰時欠缺縝密思考及講求隨機應變的風格，也開始化成對帝國長遠未來的持續狂想。

軸心國在各自新帝國疆域的運作方式有一項共同特徵，那就是德義日領導人都使用「生存空間」一詞，每征服一塊土地，就會想盡辦法守住這塊土地。軸心國建立的帝國是由各種不同的行政組織與政治統治形式組合而成，並非一個連貫均質的整體，而且缺乏共同的控制結構（就像舊殖民帝國一樣）。這些新帝國疆域的政治形態必須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才會有所進展，但軸心國在行使帝國權力時往往不受傳統主權觀念與國際法約束。戰爭期間，絕大部分被征服的領土都由軍政府加以控制，這些地區的物資都必須優先滿足軍事需要。無論是軍政府還是文人政府，都必須尋求當地民眾的合作，由這些人來推動地方事務，例如組織警察與民兵，以協助軍隊維持地方治安。日本繼承了被擊敗的西方帝國遺留下來的殖民統治體系，德國與義大利則承繼被征服地區先前的國家結構，若有必要，即使是令人痛恨的蘇聯體制也能接受，以此來維持地方穩定。如果各地區的民族情感發展到足以對新秩序構成威脅或造成占領者的利益損失，那麼新帝國就會無情地予以打壓。任何敵視占領者利益的行為都會被視為犯罪。為了樹立權威，軸心國仿效舊殖民帝國引進極端的恐怖措施，但規模與殘暴猶有過之：從流放、未經審判就予以拘禁、經常性拷問、夷平村落、大量處決到對歐洲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新帝國透過這些措施，直接與間接造成超過三千五百萬人死亡。要說亞洲與歐洲軸心國的經驗有什麼根本差異，那麼主要就是種族政策對帝國結構的影響程度。雖然日本軍人與官員絕對認為日本人是較為優越的種族，而且特別仇視中國人，但帝國的意識形態仍秉持亞洲各民族都是「兄弟」的觀念，應當由日本這個老大哥來領導。但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新秩序的結構則是全然根據種族來決定，「德國人」或「義大利人」位於帝國階序的頂端，其他數百萬新臣民則被迫流離失所、飢餓與大量屠殺。



日本治理「南方」新領土時，起初避免像在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採取鎮壓與掃蕩的做法。南方過去屬於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是以解救當地民眾擺脫西方統治的解放者自居。日本在中國建立帝國，而中國人認為日本人是侵略者而不是解放者，日本因此最終只能仰賴軍隊與憲兵隊來逼迫中國人就範。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代占領的中國領土，名義上皆交由中國傀儡政權統治，這些政權分別是滿洲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王克敏的北京臨時政府、上海特別市、梁鴻志的南京維新政府（一九四〇年三月之後改為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汪精衛與日本簽訂正式協定，允許日本在一九三七年開戰後占領的華中與華南地區駐軍與派駐「顧問」（這些顧問的建議都不許違背）。<sup>216</sup>事實上，中國在這些地區都沒有真正的主權：華北其實是由華北政務委員會統治；滿洲國徒具名義，實質上是個殖民地；汪精衛政權雖然宣稱自己才是真正具正當性的國民政府，但日本大本營只是把汪政權當成向蔣介石施壓的工具，試圖迫使蔣介石與日本談和。一旦談和失敗，日本便轉而要求汪政權成立清鄉委員會，允許汪政權動員有限的軍事力量協助掃蕩共產黨。汪精衛與一九四四年的繼任者陳公博，兩人始終都受到大本營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顧問團的監視。<sup>217</sup>

在汪精衛成立「國民政府」之前，日本已經在占領區推動廣泛的「安撫」計畫，企圖恢復地方秩序，以維護日本在當地的利益。一九三八年三月，穿著白襯衫、身上別有「宣撫」字樣臂章的平民會加入宣撫班人員，並根據「宣撫工作實施要目」的指示，「從事去除反日思想的工作……讓中國人瞭解他們可以仰賴日本。」宣撫班鼓勵中國民眾親自體察「皇軍的各項善舉」——然而南京大屠殺才過幾個月，要說服中國人相信十分困難，宣撫班的年輕理想主義者既要完成宣揚和平與相互合作的任務，卻又要為日軍的殘暴開脫，這樣的工作無疑充滿了矛

盾。<sup>218</sup>日本在村落設立「治安維持會」，由當地的中國民眾組成，負責重建秩序與教育居民養成向日本士兵鞠躬的習慣（否則就有可能挨揍）。另外也仿效滿洲國的「協和會」模式，讓民眾向天皇及其代表效忠。日本也利用中國的鄰里組織來表現親日情感，把因為拒絕參與而受罰的人孤立於鄰里之外，服從指示的人則可以獲頒良民證。<sup>219</sup>對一般中國民眾來說，順從才能生存，不順從就會遭到逮捕、拷問與死亡。

日本迅速軍事占領南方之後，原本在中國用來建立秩序的各種措施也被移轉到南方。日本在一九四〇年開始制定南進計畫，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陸軍完成《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十一月，也就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兩個星期，這份文件在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上獲得通過。<sup>220</sup>實施要領提出三項要在日軍占領地區實施的核心政策：首先，建立和平與秩序；其次，取得日本陸海軍需要的資源；最後，盡可能對占領地進行組織，使其做到自給自足。南方占領地也像中國一樣被分割成各個從屬的衛星地區，使其無法決定自己的最終命運。十一月的會議也提到，「當地住民不成熟的獨立運動應予以避免。」日軍入侵南方之後，占領地依照戰略次序分別交由陸軍或海軍軍政府管轄。陸軍管理緬甸、香港、菲律賓、馬來亞、英屬北婆羅洲、蘇門答臘與爪哇；海軍則管理荷屬婆羅洲、西里伯斯（蘇拉威西）、摩鹿加群島、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與關島。馬來亞與蘇門答臘被合併成一個單一的特別防衛區，成為日本新南方占領地的核心；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南方之光」），被賦予特殊地位，擁有自己的軍政府。一九四三年四月，南方軍把司令部從印度支那的首府西貢遷移到新加坡。<sup>221</sup>

比較反常的例子是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這兩個國家都遭到日軍入侵，但這兩個國家卻不是日本的敵國。泰國接受勸說，允許日本軍隊與飛機進駐泰國與馬來亞及緬甸接壤的地區，但泰國最終還是遭到日本一

定程度的軍事占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泰國的頌堪陸軍元帥（Plaek Phibunsongkhram）政府與日本簽訂同盟條約。一月二十五日，泰國遭同盟國飛機轟炸，泰國認為自己站在勝利的一方，因此決定向同盟國宣戰。日本也承諾讓泰國收復歷史上的固有領土，也就是馬來亞部分地區。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泰國併吞馬來亞北部各州，包括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吉蘭丹（Kelantan）與丁加奴（Trengganu）。<sup>222</sup>一九四〇年夏天，維琪殖民政權統治的法屬印度支那被迫允許日軍進駐北部，一九四一年七月，日軍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全境，以西貢作為南方軍司令部所在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法共同防禦協定》確認日本有權在法國協助下從法國屬地發動作戰，芳澤謙吉被任命為日本駐法屬印度支那全權大使，負責督導日本在當地的利益。然而南方軍司令寺內壽一元帥卻認為法屬印度支那是日本的占領地。<sup>223</sup>

日本取得南方地區之後也催生了新的統治機構，以便在大東亞戰爭中繼續推動新的帝國計畫。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召開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十一月一日成立大東亞部，不過大東亞部的職權範圍並未涵蓋馬來亞與蘇門答臘特別防衛區。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宣布馬來亞、蘇門答臘與荷屬東印度其餘部分「永遠劃歸日本所有」，屬於日本殖民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224</sup>現在南方也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大東亞共榮圈是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松岡洋右接受報紙訪問時首次提出的詞彙，這個詞的概念並不明確，主要是指亞洲各國在日本帝國的領導下相互合作。大東亞共榮圈涵蓋了從西方支配下解放的東亞與太平洋各民族，這些民族將一同攜手向前，走向和平與繁榮的未來。大東亞共榮圈很快就成為東京當局對占領地進行規畫的試金石，在日本的政治與媒體論述中，大東亞共榮圈也成為正當化日本占領的概念，使占領地不再只

是日本的殖民地。這種為了因應日本帝國不斷擴大而產生的和諧與統一意識形態，也在日本國內促成相應的政治轉變。一九四〇年八月，日本所有政黨解散，共同發起新體制運動，反對自由派的議會主義，主張日本與被征服地區都要統一在天皇的領導之下。所有民眾都要支持由所有政黨共同組成的大政翼贊會。根據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的說法，日本的政治和諧是日本「在建立新世界秩序上取得領先」的先決條件。<sup>225</sup>民族與帝國在文化上與政治上都不可分離。

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用來支持新秩序的意識形態，日本從國內派往新領土的數千名官員、政治宣傳者與政策制定者，也仰賴這個意識形態來從事他們的工作。這些人內心懷抱著理想主義的觀點，相信日本可以為整個亞太地區帶來希望，而他們起初也受到占領地部分民眾的歡迎，這些民眾希望大東亞共榮圈真的能為他們帶來繁榮。然而，這些被動員來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知識分子與作家卻遭遇一個問題，那就是日本一方面主張自己終結了歐洲與美國的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卻又主張自己是這個新秩序的「核心」或「樞紐」，這兩種主張之間不免出現矛盾與緊張。跟隨軍隊抵達爪哇的宣傳隊發展出一種觀念，認為日本只是重新恢復數千年前的核心地位，當時的日本是從中東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這整個廣大地區的文化領袖。日本刊物《海原》表示：「總而言之，日本是亞洲的太陽，亞洲的起源，亞洲的終極力量。」日本占領者推動所謂的「三A運動」（A指亞洲），讓印尼人民瞭解他們的未來必須跟隨「亞洲之光，日本；亞洲之母，日本；亞洲的領袖，日本」。<sup>226</sup>說到底，大東亞共榮圈只是為了創造出一個與日本文化傳統相容的帝國統治形式，以此與西方帝國區別。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總體戰研究所的刊物提到，大東亞共榮圈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位置」，居民的「想法一致」，但共榮圈的核心永遠都是日本帝國。<sup>227</sup>



起初熱情追尋新亞洲理念的人，很快就因為軍政府與日本干預的現實而幻滅。一九四二年四月，印尼記者耶辛（H. B. Jassin）起初在藝術雜誌上撰文抱怨，民眾「學習的全是西方事物，而且詆毀所有的東方事物」，相較之下，他卻「誇讚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在學習新事物的同時還能維持住自己的傳統」。但到了戰後，耶辛卻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當初他滿懷熱情地相信合作與和諧的說詞，但得到的卻盡是苦澀的諷刺：「這些冠冕堂皇的說法不過是美麗的氣球，一個吹得比一個大，色彩更絢爛，但內容終究只是空氣。」<sup>228</sup>就連日本陸軍宣傳班的班長町田敬二日後也承認意識形態的宣傳完全是徒勞，軍事統治的現實與陸軍高層反對一切可能激起印尼民眾企圖心的嘗試，讓所有宣傳努力付諸流水：「『大東亞共榮圈』的大旗，實際上只是新的日本殖民剝削，招牌上掛著羊頭，實際上賣的卻是狗肉。」<sup>229</sup>

軍事占領者一般而言比民間意識形態宣傳者更講究實際，也更自我中心。從日本軍隊抵達占領地的那一刻起，就可以明顯看出日本統治本質上帶有的威嚇性。在荷屬東印度，軍政府成立後立即下令禁止使用印尼民族主義象徵、實施審查制度、禁止集會遊行、禁止擁有槍枝與實施宵禁。涉嫌搶劫者會被斬首示眾或者是手腳綑綁棄置在烈日下等死。爪哇人必須向日本士兵九十度鞠躬，否則就會被掌摑頭部，或者遭受更嚴重的處罰。日本軍人施虐的狀況屢見不鮮，當地華人因此把日本早期占領稱為「動手打人的時代」。<sup>230</sup>日本占領馬來亞之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處決與毆打，特別是針對那些有反日或親英嫌疑的民眾。根據軍政府的委婉說法，這麼做是為民眾「指出正確的道路，以避免可能的錯誤」。犯人被梟首示眾，以儆效尤。在新加坡，日本憲兵隊以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做為總部，擔負起「肅清」任務，而談到「肅清」一詞，相信德國的親衛隊最清楚是什麼意思。憲兵隊的主要目標是華人社群（不過

不僅限於華人），凡是可能與中國國民政府政治影響有關的人員，包括老師、律師、官員與年輕人都是目標對象。憲兵隊處決的新加坡人數說法不一，大約介於五千人到一萬人之間。馬來亞遭到肅清的人數可能多達兩萬多人。<sup>231</sup>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通過的《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三大政策，在不同的占領地產生不同的結果。日本試圖以嚴刑峻法來建立秩序，此外也把在中國推行的措施引進到南方占領地，例如在各地村落成立自治委員會，負責維持村落治安。在馬來亞，日本設立了和平委員會以恢復秩序，並且沿用英國殖民政府的大量馬來人官員。若有人抱怨或怠工，可能會被判定是反日而遭到嚴厲懲罰。最後，日本也引進在日本與華北推行的鄰里組織，招募當地警察與自願者擔任民兵與輔助的治安部隊。絕大多數占領地都成立了地方的諮詢委員會，但這些委員會並無權力，只能任由日本官員與軍隊評斷地方的意見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各占領地也成立了以日本大政翼贊會為藍本的群眾團結運動，而這成為一種社會規訓的形式。在菲律賓，各政黨在解散後成立單一的新菲律賓服務團，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服務團又被人民效忠團取代。監督這些政治團體的責任落在憲兵隊身上，日軍每支部隊都設有憲兵隊。<sup>232</sup>占領地的治安完全由憲兵隊維護，但光憑憲兵隊本身不可能完成這項工作，他們必須在當地招募眾多願意出賣自己同胞的人擔任探員與線人。軍事警察的數量本來就不多，分散到廣大的占領地上更顯稀少。在整個馬來亞，在維護治安行動的高峰期，居然只有一百九十四名憲兵執勤。<sup>233</sup>憲兵隊擁有專斷的權力，也有權整飭日本士兵的紀律，如果他們想的話，甚至連高階軍官都能加以約束。紀錄顯示憲兵提出的指控有許多完全是空穴來風：如果受害者夠幸運能熬過殘酷的拷問，那麼就有機會洗刷冤屈；如果運氣不好，就只能承認犯下自己沒犯過的罪行，然後遭到

處決。

日本統治占領地時，往往會刻意修飾統治帶有的殖民性格，然而一旦統治引發武裝（或非武裝）抗爭，日本也會格外嚴厲地鎮壓。日本控制地區的地理環境特別有利於抵抗勢力的形成，南方占領地十分遼闊，駐軍與警力往往鞭長莫及，只能集中駐守城鎮與連接城鎮的鐵路線。山岳地形、森林與叢林使游擊隊便於藏匿進行機動作戰。在占領南方之前，日軍在滿洲國與中國已有豐富的對抗中國共產黨游擊隊經驗。在滿洲國，日軍強制遷徙農村，使其集結成一個「集團部落」，藉此切斷游擊隊與散村農田的聯繫，斷絕其後勤補給。到了一九三七年，至少有五百五十萬人被迫離開家園組織成一萬個集團部落。日本在滿洲國鋪設好道路網以改善交通之後，為了徹底解決境內武裝抵抗的問題而於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發起大規模會戰，動員了六到七千名日本士兵、一萬五千到兩萬名滿洲國輔助部隊與一千名治安打擊部隊。凡是涉嫌協助反抗軍的村落都被燒光，村民無論男女老幼全部予以屠殺。安全部隊採取了日軍所謂的「逐步收網」戰略，追蹤各支已知的游擊隊，豪不留情地加以追擊直至殲滅為止。數千名藏匿的游擊隊員陸續暴露行蹤並且遭到消滅，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滿洲國境內的反抗勢力幾乎已經完全消失。<sup>234</sup>

南方占領地的抵抗勢力絕大多數是共產黨策動，日本當局尤其視其為主要威脅。這些共產黨員多半由海外華人組成，而這些人也與中國抗日戰爭有所聯繫。到了一九四一年，整個東南亞已出現了七百零二個「抗日救亡運動」組織，他們向抗日的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提供協助與道德支持。<sup>235</sup>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行動幾乎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成立同時發生，而人民抗日軍獲得了馬來亞人民抗日同盟的大力支持。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日軍的數量估計約在六千五百人到一萬人之

間，在馬來亞的八個州組織部隊，而在背後支持的抗日同盟則大約有十萬人。<sup>236</sup>與此同時，抗日軍也得到英國滲透到馬來亞的特別行動執行處的援助。從一九四二年到戰爭結束，馬來亞的抗日運動雖然帶給日軍極大的困擾，但也遭受日軍嚴重的打擊。日本鎮壓叛亂的行動，主要仰賴線人與探員的協助，而其中貢獻最大的竟是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萊特（Lai Tek）。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向日方透露游擊隊高層將在雪蘭莪（Selangor）的黑風洞（Batu Caves）召開會議，結果日軍進行埋伏而一舉殺害多名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一九四三年，日本的大規模治安作戰殲滅了大量游擊隊員，日軍也把掃蕩重點放在藏匿於濃密叢林與山區的殘餘分子。抗日運動採取化整為零的破壞行動，暗殺與日本當局合作的人士，但日本經常性地向抗日分子提供賄賂或特赦，也讓抗日陣營分崩離析。抗日同盟的成員受害尤大，因為他們不像游擊隊一樣機動。日本也集中遷徙一些偏遠村落，試圖切斷叛軍補給線，但規模無法與在滿洲國實施的集團部落相提並論，也比不上英國日後在一九五〇年代為了平定叛亂而遷徙了數百萬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宣稱他們擊斃了五千五百名日軍與兩千五百名「叛徒」，無論這個數字是否真實，抗日運動確實持續困擾著日本占領者，也讓人理解到新帝國的「和平」與「和諧」不過是相對性的修辭。<sup>237</sup>

菲律賓是馬來亞以外南方唯一持續抗日的地區，這裡的海外華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在抗日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菲律賓的華人只占菲律賓人口的百分之一，遠遠不如占了當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馬來亞華人。參與抗日的華人許多是年輕的男性移民，他們躲避日軍的「肅清作戰」，加入了一九四二年初成立的小規模華人左翼抗日運動，即菲律賓華人抗日游擊支隊與菲律賓華人抗日志願軍。城市地區則有菲律賓華人抗日與反傀儡同盟。右翼華人與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有聯



繫，他們另外組織了四個小團體，結果反而分散了華人的抗日力量。<sup>238</sup>菲律賓主要的共產黨抗日團體由菲律賓人組成，即人民抗日軍，又稱「虎克軍」（Hukbalahap），於一九四二年三月由塔魯克（Luis Taruc）創立。同月，虎克軍首次與五百名日軍交戰，指揮作戰的是一名勇猛的女性，名叫庫拉拉（Felipa Culala），又稱達揚—達揚（Dayang-Dayang），當時有許多菲律賓女性跟庫拉拉一樣加入游擊隊。一九四三年初，虎克軍的人數估計達到一萬人，但同年三月，日軍也在呂宋島部署了五千人，開始大規模鎮壓叛軍，虎克軍於是與馬來亞的抗日軍一樣，轉而將重點放在生存與持續招募新血上。<sup>239</sup>到了一九四四年，虎克軍的男女人數再次達到一萬兩千人，但現在還獲得了美軍裝備與無線電，使得他們在民答那峨島的行動漸趨有利。<sup>240</sup>虎克軍最終與美國領導的游擊隊合流，於一九四四年秋天協助美國進攻菲律賓。

日本《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的第二項政策，是為占領者與日軍提供資源，然而這件事要比一九四一年預想的更複雜許多。日本對每個占領地下達的指令清楚顯示要優先滿足日軍需求，這麼做是為了讓日軍能在駐紮地取得補給，因為要從遙遠的日本本土進行補給相對困難。但這也意謂著占領地居民「將承受沉重的壓力……甚至可能超過忍受的極限」。<sup>241</sup>就連名義上仍由維琪法國統治的印度支那也出現相同的狀況。日本之所以南進，最初的理由就是為了控制大東亞共榮圈其他地區缺少的關鍵資源，如馬來亞的鋁土與鐵礦，還有荷屬東印度的石油與鋁土。雖然西方同盟國因為馬來亞與泰國中止橡膠與錫的供應而受害，但這兩種資源其實並非日本急需的原料。稻米與其他糧食除了要提供給當地日軍，也要運回日本本土。還有其他各種物品也基於占領者需要而被徵收或強制購買，居民只能乖乖接受。一九四三年八月，馬來亞軍政府公布《重要物資與原料管制法》，讓日軍有權徵用一切需要物品。為了

解決馬來亞經濟長期各自為政的難題，日本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宣布實施五年生產計畫，六月時又宣布實施五年工業計畫。為了確保供給，日本也成立專賣機構，由中央控制物價與進行特許貿易，然而交通運輸的日益惡化與貪汙盛行，皆導致這些計畫窒礙難行。<sup>242</sup>

有些物資可以持續供應日本本土，有些物資則難以持續，但整體而言，物資供應的實情與大本營原先的樂觀預期有著不小落差。馬來亞與印尼民丹島出口的鋁土確實可以供應日本的煉鋁工業，一九四三年時出口量可以達到七十三萬三千噸，但馬來亞的錳礦生產由於受到英國破壞的影響，出口量從一九四二年的九萬零七百八十噸減少到一九四四年的一萬零四百五十噸。南方鐵礦砂的進口在一九四〇年一度達到三百二十萬噸，一九四三年減少到二十七萬一千噸，到了一九四五年更只剩兩萬七千噸。諷刺的是，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在馬來亞開採高品質鐵礦砂的日本公司，一九三九年還可以供應一百九十萬噸給日本本土，但到了戰爭時期卻只剩下零頭。為了維持鐵礦砂供應，日本只能要求華北占領區增加產出。<sup>243</sup>東南亞原本最主要的兩項出口產業，橡膠與錫，日本則任其衰弱，導致大量馬來人失業與陷入貧困。這是因為日本一年其實只需要約八萬噸的橡膠（而日本早已擄獲了十五萬噸庫存），因此到了一九四三年，東南亞橡膠生產量已不到戰前的四分之一；日本一年也只需要一萬到一萬兩千噸的錫，錫產量因此從一九四〇年的八萬三千噸掉到一九四四年的九千四百噸。<sup>244</sup>最關鍵的資源當屬石油，正是石油促使日本做出南進的決定：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與緬甸的珍貴油田每年生產的石油足以滿足日軍的需求。英國與荷蘭試圖破壞油井使其無法運作，但多半未能成功。日軍原本預期需要兩年時間才能讓油田恢復戰前水準，但有些設施反而在短短幾天後就能重新開採，最重要的是蘇門答臘的巨港油田，占蘇門答臘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左右。為了開採石油，石

油產業人員有七成來自日本，導致日本國內產業技術工人出現短缺。到了一九四三年，南方石油每日的產量達到十三萬六千桶，只不過將近四分之三都被南方戰場消耗一空，日本本土完全未享受到石油開採的成果。<sup>245</sup>一九四四年，日本進口的石油只剩下美國實施石油禁運前的七分之一，從三千七百萬桶減少到四百九十萬桶，之後又因為美國海空封鎖而更形惡化，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日本軍方高層的意料之外。<sup>246</sup>石油短缺促使戰爭開打，而戰爭又耗盡了石油。

《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的最後一項政策目標，是讓南方地區自給自足，使南方地區不需要進行貿易或從日本本土移轉資源。某種程度來說，這項政策目標確實實現，但代價卻是讓南方占領地居民陷入貧困與飢餓。對於原本是透過出口滿足世界市場需求的殖民地來說，短期內要做到自給自足是十分困難的事。殖民地原本可以透過將原料賣往西方來進口糧食與消費品，滿足國內居民的需要。隨著多邊貿易在戰爭時期瓦解，占領地只能仰賴自身生產的物資或以物易物維生。南方並未整合到中國、滿洲國與日本本土的日圓區之中。除了印度支那與泰國，殖民地銀行的崩潰也導致東南亞絕大多數地區的金融體系瓦解；而由於當地沒有債券市場，出口崩潰也直接影響了稅收，日本軍政府於是印製軍用手票做為貨幣，宣稱其具有法幣的地位。<sup>247</sup>軍政府嚴厲懲罰拒絕使用粗製濫造的軍票或依然保留舊貨幣的人，藉此迫使占領地財政自主。

「你是要嚇得發抖還是要接受軍票」，馬來亞各處張貼的海報上宣稱，只有軍票才是有效的貨幣，這種軍票在馬來亞又稱為「香蕉幣」，因為紙鈔上印著香蕉樹。違反者將會遭到拷問與處決。軍政府也採取各項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以避免惡性通貨膨脹，包括大規模的彩券販售與針對咖啡廳、遊樂場、賭場與聲色場所（所謂的「出租舞女」）進行課稅。<sup>248</sup>

儘管軍政府強力控制物價，但由於民眾爭相從日本駐屯軍手中購買糧食與貨物，導致通貨膨脹難以避免。要控制南方廣大地區的經濟十分困難，強硬管制反而造成廣泛貪汙、囤積居奇與投機，受害最深的就是都市裡的窮困民眾。交通運輸網的崩潰，使稻米很難從剩餘地區運送到匱乏地區；此外灌溉系統遭到破壞、耕牛不是死於疾病就是遭到徵用，這些因素都造成農產量驟減。<sup>249</sup>日軍的需求一旦增加，民眾的生活水準便隨之降低。馬來亞由於不適合大規模稻米種植，民眾因此只能攝取更多的根菜類與香蕉，但這些食物平均一天只能提供五百二十大卡的熱量。透過黑市可以取得額外食物，然而普通工人根本買不起黑市。戰時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指數急遽飆漲，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基準數一百漲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七百六十二，一九四五年五月竟高達一萬零九百八十。在馬來亞的吉打，一件紗籠（裹穿在腰部的長條薄布）在一九四〇年售價一點八美元，到了一九四五年初竟要價一千美元。<sup>250</sup>馬來人開始光腳及衣不蔽體地工作，沒有衣服可穿，只能拿幾塊破布遮掩。在爪哇，一九四四年每日只配給白米一百到兩百五十克，遠遠不足以維持一日所需。估計在占領時期有三百萬爪哇人餓死，就連原本糧食自足的島嶼也出現饑荒。在巴達維亞街上出現標語，上面寫著：「我們吃不飽飯，日本人非死不可！」<sup>251</sup>在印度支那，當地的法國殖民者於一九四四年同意日本對稻米課徵重稅，導致越南東京地區的農民嚴重缺糧。一九四四年冬天，估計印度支那地區也餓死了兩百五十萬到三百萬人。

除了生活危機，占領地民眾還要應付占領者強制勞動的需求，使原本已經羸弱的勞動力還要承受沉重的負擔。這種模式先前已在滿洲國施行過，日本當局命令滿洲國十六歲到六十歲的男子每年都必須為日軍強制勞動四個月（即勞務者），一個家庭若有三名以上男丁，就必須有一人為日軍服一年勞役。估計有五百萬名滿洲人為日軍服勞役，此外從一



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還有兩百三十萬人從華北被流放到滿洲國強制勞動。<sup>252</sup>在南方占領區，由於缺乏勞工修築道路、鐵路、空軍基地與防禦工事，因此必須引進大量的各種勞務者進行強制勞動，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就是為了興建曼谷到仰光的緬甸鐵路，估計有十萬名馬來人、印尼人、泰米爾印度人與緬甸人死於疾病、勞累與營養不良，死亡率高達三分之一。在爪哇，每村村長都要負擔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提供一定的勞動配額來滿足日軍需要，而且經常採取強制手段。一九四四年底，日軍僱用了兩百六十萬名勞務者修築防禦工事。根據估計，在爪哇一千兩百五十萬名可僱用勞動力中，絕大多數都有遭強制勞動的經驗。有些工人被送到海外工作，如一九四三年底有一萬兩千名爪哇人被送到婆羅洲，不僅挨餓還要遭受虐待。<sup>253</sup>這些強制勞動者被當成消耗品，他們受到的待遇充分顯示這些占領地在戰爭期間完全被日本當成殖民地。

儘管如此，日本用「解放」一詞來標誌歐洲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終結，倒是有著某種程度的真實性。日本評論家比較亞洲秩序的新概念與西方統治（特別是英國統治），認為後者「自私自利、不公義且不正當」。東條英機更宣稱日本的目的是「遵循正義的道路，將大東亞從英美桎梏中拯救出來」。<sup>254</sup>然而，日本人帶來的解放並非「威爾遜時刻」，日本無意讓東南亞各國無條件獨立，因為對日本領導人而言，威爾遜總統在一九一八年的民族自決承諾只是一種偽善。一九四二年，日本總體戰研究所的分析指出，所謂「獨立」並不是「根據自由主義與民族自決的觀念」來加以定義，而是指成為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合作成員才叫做獨立。<sup>255</sup>許多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者由於日本最初打著解放的旗號，誤以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是泛亞洲主義的產物，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泛亞洲主義主張的是亞洲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日本卻主張亞洲各民族必須團結在日本的領導之下。日本南方軍對於緬甸獨立一事做出了

誠實的評估，清楚表明了許多征服者內心對於被征服地區的真正想法：任何新成立的政權「都可以擁有獨立的表象，但實際上.....仍應執行日本的政策」。對日本政府與軍方高層來說，獨立通常（雖然並非絕對）意謂著默認日本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說，日本才是整個帝國的核心。這種把各國視為亞洲「兄弟」的想法，時常徘徊於日本領導人的心中，甚至希望能把這一想像在遙遠的印度付諸實踐，哪怕實際上從來沒有驗證過。日本早在南進之前，就已經與以曼谷為基地的印度獨立同盟有過聯繫，該同盟的領導人是比哈里．伯斯（Rash Behari Bose）。日本征服馬來亞之後，許多被俘的印度士兵願意放棄戰俘身分，換取在日本組織下成立印度國民軍。印度國民軍由錫克教徒陸軍上尉辛格（Mohan Singh）指揮，與印度獨立同盟建立合作關係。然而辛格與日軍的緊張關係最終導致辛格遭到逮捕，印度國民軍也瀕臨解散，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才再次恢復，改由前印度國大黨政治人物錢德拉．伯斯（Subhas Chandra Bose）領導。錢德拉．伯斯在東條英機同意下，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宣布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由錢德拉．伯斯身兼國家元首、總理、戰爭部長與外交部長。一九四四年，印度國民軍的一個師參與了一場日軍入侵印度東北部的行動，但遭遇敗績且傷亡慘重。在日本看管之下，自由印度從未真正實現。<sup>256</sup>

一九四二年一月，東條英機在日本帝國議會表示，緬甸與菲律賓如果能效忠日本與服務於日本利益，那麼在未來某個時點將不排除讓這兩個地區獨立。原本在日本入侵之前，緬甸與菲律賓兩地的民族主義者皆曾訪問日本，也認為日本是反殖民戰爭的潛在支持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同意成立緬甸獨立軍，起初由「德欽黨」（Thakin）三十名民族主義者組成，包括後來成為民族主義領袖的翁山（Aung San）。日軍並未給予任何承諾，因此當緬甸獨立軍快速膨脹到二十萬人時，日軍便

解散了緬甸獨立軍，並以日本人指揮訓練的緬甸防衛軍取代。一九四三年，日本終於同意讓緬甸獨立，八月一日，新國家宣布成立，由被英國流放到東非的民族主義者巴莫（Ba Maw）擔任國家元首。不過日本是口惠而實不至，緬甸並未真正取得主權，緬甸一切事務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中。一九四四年六月，翁山抱怨說：「我們擁有的只是名義上的獨立地位，這完全是日本版的緬甸自治。」<sup>257</sup>獲得東條英機承諾的菲律賓也遭遇同樣的狀況。一九四二年一月，軍政府允許菲律賓成立傀儡政權，由菲律賓政治人物瓦爾加斯（Jorge Vargas）擔任政府領袖。這個傀儡政權僅具諮詢功能，菲律賓臨時國家議會清楚表示，菲律賓願意支持日本軍政府，並且致力於加入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三年夏天，菲律賓在沒有政黨或公投的狀況下通過新憲，由勞雷爾（Jose P. Laurel）而非瓦爾加斯擔任國家元首。與緬甸不同的是，菲律賓菁英選擇與日本和平共存，只要日本軍事勢力存在一天，他們就願意接受新國家擁有的有限主權。<sup>258</sup>

至於其他的占領地，日本起初並沒有讓這些地區「獨立」的想法，反而打算直接併吞這些地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大東亞部在東京召開大東亞會議，南方地區獲得邀請的代表只有緬甸與菲律賓。隨著日本漸露敗象，這一局勢變遷促使日本願意允許更多地區「獨立」。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東條英機的繼任者小磯國昭首相宣布，印尼「再過一段時間」也許可以獲得獨立，他也同意印尼懸掛民族主義旗幟，條件是必須懸掛在日本國旗旁邊。<sup>259</sup>日本之後又進一步放寬限制，讓印尼人加入軍政府，但只能擔任副手職位，日本直到投降前幾天才給予印尼名義上的獨立地位。最後一個允許獨立的是情況特殊的法屬印度支那。一九四四年，盟軍解放法國之後，維琪政權徹底覆滅，日本逐漸對印度支那的法國官員與商人的態度感到不耐。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最高戰爭指導

會議在東京召開，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控制印度支那全境，建立一個親日的獨立政權。三月九日，日軍發動「明號作戰」，將法國殖民地軍隊解除武裝。零星的戰鬥一直持續到五月。雖然日本並未正式准許越南獨立，但越南的保大皇帝仍於三月十一日宣布越南獨立。兩天後，柬埔寨跟著宣布獨立，四月八日，輪到寮國宣布獨立。日本在這幾個國家都設有「顧問團」，這些國家必須與日軍合作，每個國家也設有日本總督與總書記，嚴格限制任何想真正獨立的念頭。<sup>260</sup>日本在南方地區做出的最後讓步，主要都是為了贏得當地民心，為接下來抵抗盟軍入侵做準備，但日本似乎也想鼓動當地民眾的獨立熱潮，讓重返此地的殖民國家難以重建權威——事後看來也確實是如此。如果日本贏得戰爭或與同盟國簽訂停戰和約，那麼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將會如何發展？關於這點只能留待想像。戰時的大東亞共榮圈是帝國的產物，因戰爭而建立，也因戰火而毀棄。



相較於日本的共榮圈，軸心國在歐洲建立的新秩序要面對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現實。雖然兩者同樣建立在戰爭之上，也同樣毀於戰火之中，但歐洲新秩序隨戰爭起落的程度卻遠遠超過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遭德國入侵與占領的國家並非殖民地，而是獨立的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政治、法律與經濟結構。這套歐洲新秩序最主要的侵略者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其次是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但由於墨索里尼逐漸傾頹的帝國需要德國來拯救，因此新秩序幾乎全是由柏林當局與德國利益來主導。無論是德國支配的「大空間」或是日本的共榮圈，兩者的核心觀念可謂大同小異：傳統的西方主權觀念被拋諸腦後，



取而代之的是由帝國核心領導一系列國家與屬地的獨特概念。一九三九年，德國法學家施密特出版了極具影響力的作品《國際法與大空間》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Grossraum*），他認為未來霸權國家將擴張成一個疆界明確的「大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將存在著國家的階序關係：不斷擴張的國家居於核心地位，四周則環繞著名義上「獨立」但實際上已經遭到征服的國家。施密特主張，以現代民族國家絕對主權為基礎的傳統國際法已經無法適用於「大空間」的新地緣政治時代。施密特又說，這個「國與國之間的過時國際法」大多是猶太人的產物。<sup>261</sup>在眾多法學家中，施密特是唯一一位以「大空間」做為新時代特徵，並以此來正當化希特勒侵略行為的理論家。就像日本的共榮圈一樣，在德國的新秩序裡，每個國家的功能與地位都將依據德國對其價值的評估來決定。

一九三九年時，包括希特勒自己在內幾乎沒有任何德國人想像得到，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德國的「大空間」將從西班牙邊界擴展到俄國中部，從希臘延伸到位於極地的挪威。這塊遼闊的區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像日本帝國一樣，由各種不同的統治形式交錯鑲嵌而成。希特勒自始至終都堅持，新秩序的地緣政治樣貌要等到戰爭勝利之後才做最終決定，儘管如此，西歐、北歐與東南歐的占領區在戰時已出現根本性的差異，而德國對整個東方地區也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東方地區在消滅既有國家與採行殖民剝削模式之後，終將成為新德意志帝國的核心，而這個過程早在德國於西線戰場獲得勝利之前，就已經在捷克與波蘭付諸實行。至於在歐洲其他地區，仍在運作的國家必須接受德國的監管，讓德國利用其既有的制度與行政體系。

德國的首要之務是建立所謂的「大日耳曼國」。除了併吞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德國也將亞爾薩斯—洛林與盧森堡視為事實上的領土，由

民政長官統治；一九一九年後割讓給丹麥與比利時的少部分領土也陸續順利收復。大日耳曼國以外的占領地被視為軍事前線，如法國北部、西部與比利時，這些地區由軍政府治理；其他名義上獨立的政府則與德國軍方共同管理，如法國的水療城市維琪與布魯塞爾。荷蘭由帝國總督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管理，挪威雖然在挪威納粹黨黨員奎斯林主政下採取與德國合作的立場，但德國還是在挪威派駐了帝國總督特博文（Josef Terboven）。<sup>262</sup>丹麥是占領區的異數。由於丹麥人並未抵抗德國入侵，德國因此在當地採取了「混合占領」的方式。混合占領是國際法的一個概念，用來表示中立國遭交戰國占領，之後又未與占領國交戰的狀況。德國允許丹麥保留自身的政治制度，直到一九四三年為止，丹麥一直保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權。丹麥國際法律師把這個狀態定義為「和平占領」，丹麥仍保有主權，但允許德國人接管行政權。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國任命親衛隊領袖貝斯特（Werner Best）擔任駐丹麥全權代表，兩國的關係才開始惡化；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丹麥政府與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X）拒絕繼續管理國家。德國於是宣布丹麥戒嚴，並且透過常設大臣會議繼續統治丹麥到一九四五年。雖然從法律上看有點模糊，但同盟國還是基於丹麥有抵抗德國的行為而認定丹麥是德國的交戰國，屬於聯合國的一員。<sup>263</sup>

東南歐的局勢較為複雜。希特勒一開始並沒有出兵東南歐的計畫，因為根據《三國同盟條約》，義大利領導人認為東南歐是義大利的「勢力範圍」，但義大利出兵希臘失敗，最後導致德國在盟邦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協助下占領希臘與南斯拉夫。希臘投降時，義大利的非洲帝國已經搖搖欲墜。厄利垂亞、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都被大英帝國部隊攻陷，利比亞也淪為戰場，義大利在利比亞的殖民地軍隊不僅要防禦同盟國部隊的進攻，也受到利比亞叛軍的騷擾，後者急欲利用這場戰爭推翻義大利

的統治。英國讓四萬名利比亞輔助部隊擔任非戰鬥任務，並且承諾流亡開羅的前利比亞國王伊德里斯（Idris），在義大利戰敗後讓利比亞自治。義大利採取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曾經實施的殘酷鎮壓叛亂手段，陸軍、軍事警察與各地屯墾居民開始針對阿拉伯人與柏柏人村落進行暴力掃蕩。每當大英帝國的部隊被擊退回埃及時，義大利就會加強在利比亞的鎮壓行動。嫌疑犯會以可怕的方式公開絞死，有些人像屠宰場的牲口一樣被掛肉鉤穿過下巴吊掛起來，活活流血而死。義大利在殖民地的最後一波暴力行徑，成為義大利非洲帝國最不堪入目的終章。<sup>264</sup>

非洲的喪失使義大利必須加快在歐洲建立帝國的腳步，但要在歐洲建立帝國又必須仰賴德軍，這使得義大利成了義大利史家羅多尼奧（Davide Rodogno）口中的「依存帝國主義」，這個矛盾的詞彙充分顯示義大利在新歐洲已淪為從屬角色。一九四一年七月，一名義大利停戰委員抱怨說，如果軸心國獲勝，「往後幾百年，歐洲都將籠罩在德國的霸權之下。」<sup>265</sup>義大利必須與德國和保加利亞平分東南歐，結果就是義大利只能控制一堆破碎的領土，而非完整的疆域。義大利從南斯拉夫取得斯洛維尼亞南部、克羅埃西亞西南部、一小段達爾馬提亞海岸線、蒙特內哥羅、一部分科索沃與馬其頓西部。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剩餘地區劃歸德國勢力範圍，殘餘的塞爾維亞成立傀儡政權，完全聽命於德國軍方。義大利取得希臘的愛奧尼亞群島，等於涵蓋了愛琴海絕大多數的島嶼，此外還取得大部分希臘本土，但馬其頓東部與色雷斯則交給了保加利亞，希臘境內的馬其頓地區則由德國取得。直到一九四三年為止，德國與義大利的軍政府在東南歐一直處於勾心鬥角的狀態。

義大利在新取得的領土施行各種不同的統治方式。義大利直接併吞斯洛維尼亞，成立盧布爾雅那省（Ljubljana）。蒙特內哥羅被設置成保護國，由一名總督與一名軍事總督統治。義大利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併吞

達爾馬提亞海岸地帶，設立總督治理。而義大利雖然形式上未能併吞希臘領土，但實際上已經進行直接統治，但德國在與希臘簽訂的停戰條約上卻拒絕承認最終的領土協定，這表示義大利的併吞僅具有事實上而非法理上的地位。除此之外，德軍也控制希臘幾處重要飛地，包括重要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克羅埃西亞在義大利占領期間一直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儘管遭到德義占領，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依然想推動克羅埃西亞獨立。墨索里尼原本考慮重建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克羅埃西亞王國，而他也找到擔任新國王的人選，並且授予他「托米斯拉夫二世」

（Tomislav II）的稱號（承襲十世紀的克羅埃西亞國王托米斯拉夫），但這名義大利貴族卻認為風險太大，因此予以婉拒。<sup>266</sup>德國希望在克羅埃西亞建立一個保護國，由克羅埃西亞農民黨主席馬切克（Vladko Maček）擔任領導人，但墨索里尼卻希望由克羅埃西亞革命運動領袖帕維里奇（Ante Pavelić）擔任領導人——帕維里奇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早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到義大利尋求庇護。雖然義大利高層想併吞一部分克羅埃西亞領土，卻忌憚於德國在當地的影響力。德國全權代表霍爾斯特瑙將軍（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坐鎮札格瑞布，而克羅埃西亞政權也完全受德國顧問團的擺布。義大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投降之後，德國完全控制了克羅埃西亞，並且在當地扶植傀儡政權，使克羅埃西亞成為德國的衛星國。<sup>267</sup>

雖然義大利在歐洲取得的新領土在形式上不屬於殖民地，但義大利卻以非洲的殖民統治模式來組織與控制自己的歐洲帝國。新領土的各項政策都由羅馬或羅馬派駐當地的代表（軍事總督、總督、副總督等）來決定，地方層級則任命與義大利合作的當地官員來治理。義大利不允許任何程度的自治，也不允許各地發展民粹的民族主義。可能的話，義大利會督導各地警察或民兵建立秩序。對義大利民政或軍事統治構成直接



威脅的人，義大利會動用軍事警察進行大規模鎮壓，其手段就像過去鎮壓利比亞與衣索比亞叛亂一樣極度殘暴。義大利官員與軍隊在管理廣大的歐洲帝國時顯得力不從心，裝備也不齊全（在克里特島，估計有四成義大利士兵沒有軍靴可穿，只能穿當地人製作的木鞋）。原本該展示帝國種族威望的義大利軍人，此時卻充滿恐懼與挫折。就跟日本駐屯在南方的士兵一樣，義大利軍隊士氣逐漸崩潰，士兵也紛紛病倒，強烈的挫折感使他們遷怒於反抗者。義大利在新領土各地設置集中營，囚犯生活在惡劣的環境，遭到忽視、飢餓與缺乏醫療。與衣索比亞一樣，義大利採取斬首策略，致力翦除可能反抗義大利統治的教師、學者、醫生、律師與大學生。有些人因為實際加入反抗行動而被捕，有些人只是有嫌疑就遭到囚禁；在斯洛維尼亞與達爾馬提亞甚至出現種族清洗的受害者。集中營與被拘禁者的數量一直沒有明確數字，但根據戰後南斯拉夫調查戰爭罪行得出的報告顯示，遭囚禁的平民確切人數是十四萬九千四百八十八人。後續研究提出的數字是十萬零九千人，然而無論哪個數字都顯示義大利帝國主義造成了眾多受害者。<sup>268</sup>一九四三年，當義大利面臨崩潰危機時，義大利外交部官員突然為一九四三年四月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高峰會製作了一份歐洲地圖，建議戰後秩序將允許新歐洲各民族自由發展。就像日本在帝國即將戰敗前決定讓南方各民族解放一樣，義大利也在帝國實驗即將失敗之際做出類似的決定，或許也是為了留下一個讓同盟國焦頭爛額的局面。<sup>269</sup>德國的談判代表堅持不做出任何承諾，義大利的歐洲帝國因此在義大利投降那年便完全瓦解，存在僅僅是曇花一現。

對德國與義大利來說，占領歐陸的關鍵理由是取得與利用物資與糧食，藉此維持占領與支持戰時經濟。而在這點上，面對德國的競爭，義大利一直處於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一年三月，一名德國將領說道：「義

大利人必須習慣他們與我們並非處於對等地位。」<sup>270</sup>巴爾幹半島資源的歸屬清楚顯示兩國地位的不平等。雖然有些地區名義上屬於義大利的勢力範圍，但德國早在一九四〇年之前就已經廣泛滲透了巴爾幹半島經濟，尤其支配了對德義兩國都很重要的羅馬尼亞油田。不過不同於日本對荷屬東印度油田的控制，德國無法全面接管盟邦羅馬尼亞的油田，羅馬尼亞依然能使用自己的石油進行工業發展與對外出口。一九四〇年之後，德國成為羅馬尼亞石油的主要用戶，義大利的使用則受到限制。德國藉由徵收敵國的石油資產來確保對羅馬尼亞石油生產的控制，特別是設於羅馬尼亞當地的荷蘭大廠皇家殼牌石油阿斯特拉；德國更於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大陸石油控股公司，透過收購羅馬尼亞石油以確保石油供應。<sup>271</sup>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德國已取得超過一半的羅馬尼亞石油產量，但數量還是遠遠不夠消耗。到了一九四三年，羅馬尼亞石油出口創下戰爭開打後的新低，德國取得羅馬尼亞石油的比例也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五，總量從一千一百三十萬噸下降到兩百四十萬噸，此時德國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國內的合成石油。<sup>272</sup>

德國也從義大利手中奪取巴爾幹半島的其他資源。在戈林推動的四年計畫下，德國當局已準備好無情地確保自身的利益。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國代表在未知會義大利的狀況下與克羅埃西亞簽訂協定，使德國可以優先取得克羅埃西亞的鐵礦砂，此外在戰爭期間若開採新的礦場，也要優先提供德國使用。一九四一年四月，儘管赫塞哥維納位於義大利占領區內，但德國協商者依然取得優先使用赫塞哥維納鋁土的權利；德國也堅持科索沃的鉛礦與鋅礦產區與德國控制的塞爾維亞相連，與義大利控制的阿爾巴尼亞無關。義大利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才設立義大利與克羅埃西亞經濟委員會，但為時已晚。克羅埃西亞領導人已經同意德國的經濟滲透，因此拒絕加入義大利的經濟提案。<sup>273</sup>相同的狀況也出現

在希臘。德國決定占領馬其頓，因為這裡出產關鍵的礦石，並且取得馬其頓四分之三的出口物資。一九四二年，儘管義大利占領了希臘絕大部分的領土，但德國依然吸收了希臘資源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義大利只取得百分之六。糟糕的交通運輸、缺乏燃料與毫無協調的計畫使義大利甚至在自己擁有的「廣大區域」裡也無法取得最低限度的資源。<sup>274</sup>

德國利益主導了整個「大空間」的西半部地區。一九四〇年夏天，四年計畫主持人戈林宣布新秩序經濟必須由德國督導與協調，因為短期內的首要目標是進行戰爭，而非整合歐洲經濟。德國民間企業可以參與計畫，但只能取得受託管理權而不能獲得所有權。戈林帝國工廠控股公司任命拉貝（Karl Raabe）擔任亞爾薩斯—洛林鐵礦廠的受託管理人，這些鐵礦場直到戰爭快結束時都還是屬於德國國家所有。洛林的工業設備也由戈林帝國工廠接管，鋼產量達到一百四十萬噸。洛林其餘公司主要交由德國的小型鋼鐵廠管理，這些鋼鐵廠規模較小，國家可以輕易加以限制。<sup>275</sup>在比利時，德國對於占領的產業較少直接介入，但比利時的煤、鐵、鋼及機械製造工業都必須支應德國的戰爭。比利時幾乎不出口煤，因為德國自身的煤已經足夠，但德軍需要比利時生產更多的鋼鐵。一九四一年冬天，比利時的鋼鐵產量減少，帝國鋼鐵同盟主席暨德國鋼鐵大亨羅希林（Hermann Röchling）負責讓比利時的鋼鐵生產合理化，使比利時為德國生產的鋼鐵比例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增加到一九四四年初的百分之七十二。<sup>276</sup>荷蘭與挪威同樣要滿足德國占領的各項需求，包括提供糧食、原料、機械設施與維修設備。在德國統治的「大空間」裡，商人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而與德國合作，但最主要的原因往往是為了維持原本的生意與防止自己僱用的工人被強徵到德國工作。德國面對西歐或北歐商人時，比較不會像在中歐與

東歐占領區那樣強取豪奪，只要不是猶太人擁有的民間企業，通常可以不受影響繼續經營。根據德國的中央政策，猶太企業必須加以「雅利安化」，包括明目張膽地沒收充公或強制收購，不過各地政權為了搶在德國之前取得猶太人的資產，也各自推出奪取猶太人財產的方案。

德意志帝國「大空間」的西半部，雖然跟日本的共榮圈一樣都屬於德國支配的範圍，但還不能算是帝國的生存空間，真正的生存空間在東方。德國於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曾占領東方部分地區，不過直到入侵蘇聯之後才真正開啟了開拓東方的遠大前景。除了實施殖民屯墾，還進行了種族清洗與無情剝削。東方是名符其實且充斥殘暴統治的帝國領土，在現實上更近似於日本統治的南方，而與德國治下的西歐經驗相去甚遠。與義大利一樣，德國從未正式使用「殖民地」一詞，但在波蘭等歐亞大陸新征服領土所使用的語彙，卻反映出一種殖民的空間想像。希特勒自己也在向東入侵開始後大量借用殖民範本來描述東方地區的未來。在發動巴巴羅薩作戰後幾個星期，希特勒在記錄下來的談話（所謂的「桌邊談話」）中反覆提到一個主題：他認為俄羅斯可以成為德國的英屬印度，德國可以靠著二十五萬名帝國官員與士兵管理俄羅斯廣大的人口。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表示：「印度之於英國，正如東方空間之於我們。」為了管理新帝國，德國必須培養「新型人才、天生的統治者……總督」。德國殖民者「應該住在風光明媚的屯墾區裡」。九月十七日，德國依然勝利在望，希特勒也繼續發想：「德國人必須追求偉大，追求開闊的空間……德國人應該提升自己，讓自己不辱帝國子民的名聲。」一個月後，當巴巴羅薩作戰陷入僵局時，希特勒依舊認為，東方「對我們來說就像沙漠……我們只有一個責任：將德國人遷徙過去，讓當地日耳曼化，把俄羅斯人當成紅番」。<sup>277</sup>北美原住民的近乎滅絕很難與英國統治印度相提並論，但希特勒卻用這兩個歷史例證做為他的



殖民典範。七月十六日，希特勒對他的親密戰友鮑曼（Martin Bormann）直言，無論用什麼方法，我們在東方的目標就是「支配、管理與利用」。<sup>278</sup>

希特勒不斷用「空間」一詞來形容東方，就連一整個世代研究東方的德國學者專家也普遍使用這個詞彙，而這麼做其實別有用意。他們想藉此表示這是一塊可供殖民的空間，而不是一塊已經有廣大都市與鄉村人口居住、有一個大國曾在此組織管理、社會與行政結構皆業已存在的空間。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羅森堡被任命為東方占領地部長，在此之前他曾在日記寫下他對俄羅斯地區的看法：「東方與西方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城市、產業、紀律都有很大的差異.....大家必須體認到，當地的荒涼程度遠超過我們的想像。」<sup>279</sup>當德國的軍隊、官員與警察開始占領蘇聯時，幾乎也都把蘇聯看成殖民空間。一名陸軍情報官記錄了自己接觸俄羅斯人的感想：「這裡的人隨意朝地板上吐痰與擤鼻涕，身體發出惡臭卻不以為意，少有人刷牙.....即使跟受過教育與地位較高的人開會，對西歐人來說也是一種考驗。」<sup>280</sup>對一般士兵而言，長期忍受俄羅斯與俄羅斯人，使他們永遠無法忘記東方的戰爭有多麼不同。當賴赫勞將軍（von Reichenau）將軍聽到他所率領的第六軍團士兵埋怨氣候嚴寒與缺乏像樣的食物時，他反而對麾下的軍官說：「士兵們必須忍受這種艱困環境，因為殖民地戰爭就是如此。」<sup>281</sup>蘇聯士兵採取的非常規戰鬥方式，例如埋伏、夜襲、殺害與肢解戰俘，似乎也都讓德國人聯想到對抗「野蠻」原住民的戰爭。希特勒就曾認為，「這場對抗游擊隊的戰爭，像極了在北美洲對抗印第安紅番的戰爭。」<sup>282</sup>奉命前往東方的德國人，發現自己宛如置身遙遠且草木皆兵的殖民地。波蘭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的女性守衛抱怨冬季的苦寒、夏季蚊蠅孳生又極度炎熱，簡陋的營房與不衛生的環境，囚犯說著她們聽不懂的語言，而

她們也隨時得提防遭到攻擊。就像殖民地一樣，德國採取的補救措施便是嚴格隔離德國人與斯拉夫人，把所有的好東西留給殖民者使用，確保殖民者擁有文明的優越感。<sup>283</sup>

與波蘭占領區一樣，蘇聯人民也被德國占領者當成殖民地臣民，無法成為公民。許多蘇聯人對於這樣的待遇感到失望。在占領後的頭幾個月，許多人以為隨著史達林政權結束，生活可以變得更好。一九四一年七月有一封信上寫著「你讓我們擺脫貧困與共產主義」，另有一個家庭想「祝福希特勒先生未來在工作上一切順利」。但過了幾個月，納粹政權奪取糧食與大規模殺戮的暴行，反而讓史達林主義看起來沒那麼邪惡。<sup>284</sup>占領者與被占領者的法律地位不同。蘇聯人看到德國人必須行禮致意，包括脫帽，違反者會遭到毆打或更嚴重的處罰。「德國人專用」的牌子區隔了占領者與被占領者。德國人一般總是認為蘇聯人頭腦簡單、懶惰、邋遢、理解力有限、「跟小孩一樣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只能用鞭子來管教——儘管羅森堡三令五申不許使用鞭刑，但還是有許多德國行政長官用鞭子做為工具。<sup>285</sup>希特勒曾為了促進雙方合作而脫口而出一句名言：「我們會提供圍巾、玻璃珠與一切殖民地人民喜歡的東西給烏克蘭人。」<sup>286</sup>德國當局確實會對被殖民者釋放某種程度的善意，例如舉辦節慶，特別是五月一日勞動節或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被諷刺地定為「解放日」）。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奧勒爾居民被集合起來，男人可以拿到兩包俄國菸，女人可以拿到首飾（總數有四千六百二十五件）；表現優秀的工人還可以額外拿到幾包鹽。<sup>287</sup>然而，一般而言，德軍對占領區民眾的壓制是嚴酷而極端的，即使是願意與德軍合作的地區也不例外。德國當局設立了地方警察與輔助部隊，他們是防止民眾違法的第一線執法人員，可以使用棍棒與鞭子，有時還可以使用槍枝。與日本在東亞採取的策略一樣，德國也非常仰賴線人與探

員，而且完全承襲過去蘇聯時代的告發手法。許多受害者是游擊隊的家人或猶太人，他們的遭遇將在後面幾章加以說明，但除此之外，德軍也經常性地進行大規模殺戮，或用希特勒的話來說，「即使只是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們」，也要加以處置。一九四二年，在烏克蘭的波塔瓦（Poltava），當地的輔助警察部隊平均每天可以射殺二到七個人。<sup>288</sup>這種例行性的處決清楚刻劃出殖民統治極端的一面。

德國雖然占領了新領土，卻未能好好思考新空間該如何治理。羅森堡在巴巴羅薩作戰前曾與希特勒等領導人進行討論，他推測高層應該是想在波羅的海到巴庫這整個區域建立幾個獨立小國，還會兼併部分土地與建立幾個保護國。但等到他被正式任命為東方占領地部長時，希特勒早已改變心意，不再堅持要在戰後建立新帝國。希特勒告訴羅森堡，「在戰爭結束前，不會有最終的政治決定。」當立陶宛民族主義者宣布要建立新政府時，馬上就遭到德國鎮壓。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宣布建立新烏克蘭政權，由班德拉自任領袖，開始行使「烏克蘭主權」，但班德拉本人卻在七月五日遭到逮捕並被送往柏林軟禁。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原本以為會在烏克蘭實施「克羅埃西亞模式」的統治方式，但他們卻被告知烏克蘭並非德國的「盟邦」。<sup>289</sup>

羅森堡並不反對在符合德國條件下讓烏克蘭建立政權，但他領導的東方占領地部就跟日本的大東亞部一樣，是個缺乏實權的部會。這位新部長在日記裡抱怨，「我並未獲得完全的權柄」，因為占領區的經濟決策完全掌握在戈林與他的東方經濟參謀部手中，而親衛隊與德國警察頭子希姆萊則堅持占領區的治安、種族遷徙與「猶太人問題」均歸他管轄，至少有五個部門必須聽令於他。<sup>290</sup>由於當時東方還是戰場，前線後方的區域仍由軍政府管理，由各級軍事將領層層節制。與日本的軍政

府一樣，德國的軍政府要負責各式各樣的事務，包括綏靖與監視居民、確保軍事物資的補給、維護地方治安、動員地方勞動力，此外還要負責猶太人事務，包括標記與登記猶太人、處分猶太人的財產。<sup>291</sup>軍政府必須從各地居民中尋找願意合作的人士，任命他們擔任市長與地方農村官員，完全依照民政機關的形式來加以組織。但即使是在民政長官治理的地區，軍方依然以自己的組織進行管理，完全凌駕於民政體系之上。如此產生的占領區管理體制疊床架屋，毫無一貫性，羅森堡的東方占領地部因此被戲稱為「Cha-ostministerium」，即「混亂部」。

隨著前線不斷往前推移，後方占領區也陸續成立名為「帝國總督轄區」的民政機關，每個轄區的帝國總督都由希特勒親自任命。起初設置了兩個帝國總督轄區，分別是東方帝國總督轄區與烏克蘭帝國總督轄區。東方帝國總督轄區包括波羅的海國家與大部分的白俄羅斯，由黨領導人洛澤（Hinrich Lohse）擔任帝國總督。烏克蘭帝國總督轄區於一九四一年成立，包括一部分白俄羅斯與大部分烏克蘭，一九四二年又有更多烏克蘭領土併入這個轄區，由東普魯士帝國大區長官柯赫（Erich Koch）擔任帝國總督。在這兩個轄區中，希特勒與希姆萊都希望東方總督轄區直到比亞維斯托克（Bialystok）的部分能併入德國，加利西亞能劃歸波蘭總督府，克里米亞則成為德國的殖民地，而且要恢復古名「戈騰高」（Gottengau），最後還要打造一個延伸到列寧格勒以東的德國人屯墾區，命名為「因格曼蘭」（Ingermanland）。德國原本還計畫新設兩個帝國總督轄區，一個位於莫斯科周邊地區，一個位於高加索地區，後者將等到德軍攻占南方地區後設置。希特勒為了讓羅馬尼亞參戰，於是同意讓羅馬尼亞取得烏克蘭西南方一塊帶狀領土，又稱聶斯特河沿岸，使其成為大羅馬尼亞的一部分。安東尼斯古元帥在這裡建立了十三個軍事總督來管理各郡，並且由原本的烏克蘭警察與官員來維持各地秩



序。<sup>292</sup>

羅森堡的東方占領地部制定了「褐色文件夾」，裡面詳細規定帝國總督轄區的組織體制。四個帝國總督轄區下設二十四個總管轄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白俄羅斯，以明斯克為首府），總管轄區下設區與鎮，這些區與鎮當中有八十個屬於都市地區，有九百個屬於鄉村地區。<sup>293</sup>但面對遼闊的東方，德國行政體制不斷延伸的結果，就是統治力量遭到嚴重稀釋。總管底下只有約一百名職員，城鎮與鄉村層級則只剩下二到三名職員，必須在當地任命警察與民兵才能補足吃緊的人力。在白俄羅斯的格盧博科耶區（Glubokoye），德國官員只有七十九名，卻要管理四十萬人口。整個占領區估計人口達到五千五百萬，卻只有三萬名德國官員，而他們還要負責從農業到礦業的所有大小事。<sup>294</sup>許多鄉村居民除非剛好撞見德國人正在追捕游擊隊及其同夥，否則根本不可能有機會看到德國人。在鄉村地區，蘇聯原有的「區」（raion）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由地方市長或村長管理。德軍於一九四一年七月發布命令，規定占領區居民頂多只能擔任村長或鎮長。權力完全掌握在德國統治階級手中，至於這些權力如何實施到一般民眾身上，則有賴廣泛的地方人士合作，這些合作者有些是積極參與，有些是消極服從，有些則是遭到強迫。希姆萊建立了一個與民政組織平行的親衛隊與警察組織，這個組織往往鬆散地依附在總督轄區之下，並且進一步往下落實到村鎮層級。雖然親衛隊與警察名義上必須服從民政長官的命令，但希姆萊卻允許他的屬下無視文職人員的指示而直接聽從他的指令，因為在他眼裡，這些文職人員不過是「一群尸位素餐的官僚」。<sup>295</sup>羅森堡憎惡希姆萊的維安體制，但正因為有了希姆萊的組織，占領區的民政長官才能殘暴進行例行性維護「殖民秩序」的工作。

對占領區民眾來說，真正要緊的還不是德國如何統治，而是蘇聯體

制消失後，當地的經濟如何提供他們糧食與工作。一九四一年夏天一名德國官員提到，「在舊俄羅斯地區，經濟生活完全停擺。」另一名德國觀察者則表示，紅軍有系統地進行破壞，不讓入侵者獲得任何有用之物，使烏克蘭陷入「一片破敗的空蕩景象」。<sup>296</sup>德軍迅速抵達的地區，還能留下些許可用物資，但數千家工廠與工人已經迅速轉移到俄國大後方，使征服地區失去能用的工業產能。德國的經濟戰略，也就是所謂的「綠色文件夾」，與日本的經濟戰略有異曲同工之妙：軍隊後勤補給仰賴占領區，占領區必須優先提供戰時經濟與軍隊需要的補給與裝備，占領區人口必須滿足德國需求之後才能獲得供應，不夠的話就只能接受「大饑荒計畫」的安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希特勒讓戈林「全權決定」占領區經濟，並且透過在入侵前成立的東方經濟參謀部來主掌所有經濟事務。<sup>297</sup>負責處理戰利品的單位會掠奪庫存物資與機械，再將其運回德國。他們擄獲可觀的金屬、原料、皮革與皮草，但要運送這些戰利品並不容易，許多物資在運送過程中丟失或損壞。在擄獲的一千八百萬噸原料中（絕大多數是鐵與煤），只有五百五十噸成功運回德國本土。<sup>298</sup>戈林一直等到九月，也就是德軍即將攻下烏克蘭南方工業區時，才准許成立國營公司接管剩下的蘇聯產業，使其能供應戰爭所需。國營的東方紡織公司針對軍隊需求協調生產，戈林帝國工廠的子公司東方礦山與冶煉公司則完全接管了重工業與礦業。戈林認為石油是「入侵蘇聯的主要經濟目標」，一旦德軍攻占高加索地區，將由大陸石油公司壟斷石油生產。戈林的副手，負責管理重工業的普萊格（Paul Pleiger）解釋說，當前的目的不是為了「經濟與殖民剝削」，而是為了短期需要，也就是贏得戰爭。<sup>299</sup>

與日本的東南亞經驗一樣，要恢復生產遠比戰前預期的更加困難。德國最成功的案例是恢復了烏克蘭境內尼科普（Nikopol）的錳礦生

產，為了生產高品質的鋼，取得錳礦是首要之務。由於恢復生產的速度過於緩慢，戈林的空軍部副部長米爾希（Erhard Milch）被賦予盡快重啟生產的重任。一九四二年六月，礦場開採量重回戰前水準，達到每個月五萬噸，到了九月時已超越了蘇聯時期的開採量。在尼科普最終被蘇軍奪回之前，總共已有一百八十萬噸的錳礦砂被運往德國。至於其他地區的生產情況，由於戰時條件不佳，因此難以恢復原狀。位於頓內次盆地的主要工業區，入侵前有兩萬六千四百臺工業馬達，入侵後只剩下兩千五百五十臺；礦場被炸毀，無法搬空的發電廠遭到破壞，各地的交通運輸變得緩慢而不可靠。在札波羅熱（Zaporizhzhia），供應蘇聯最大水力發電廠的水壩遭到炸毀，導致整個工業區缺乏電力。德國於是強徵民伕，於一九四三年重建水壩，但不久戰局失利，德軍只好在撤退前又炸毀水壩。德國也無法恢復開採擁有豐富礦藏的頓巴斯礦區：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間，德國工程師與蘇聯礦工努力開採了四百萬噸的煤，但也只達到戰前產量的百分之五；兩年內開採了三十八萬噸的鐵礦砂與七十五萬噸的褐煤，而這對於德國的需求不過是杯水車薪。<sup>300</sup>德國努力要恢復鋼鐵生產，但成效有限，即使邀請魯爾工業區的民營企業前來協助也是一樣，這些公司只能成為這些受損廠房設備的「協助者」而不能成為所有者，而這些公司光在國內生產就已經面臨極大的壓力，沒有人有興趣要到東方協助當地恢復生產。石油生產最令人感到失望。一九四二年秋天，當德軍終於抵達高加索產油城市邁科普（Maikop）時，用來重啟生產的五十臺鑽油機器還排在帝國運輸的候補名單上。德國必須將國內小型油田的工程師與設備送到東方，這使得國內技術人力與設備陷入短缺；而當工程師終於抵達邁科普時，他們卻發現蘇聯對油井的破壞十分徹底。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德軍撤離邁科普為止，工程師只開採了一千五百噸石油——然而原本在一九四〇年

時可以生產三百四十萬噸石油。<sup>301</sup>在討論到以蘇聯石油來支應德國的戰爭時，就算德國能征服高加索地區，光是要修復毀壞設施與設立油管，或是以德國的小規模油輪船團運送石油，就需要長達數年的時間。這充分顯示希特勒構思的戰略完全脫離現實。

隨著東方戰事陷入消耗僵局，德軍希望推動在東方生產武器設備以緩和後勤補給的壓力，但一直等到一九四二年，德軍才真正在此推動所謂的「伊凡計畫」（Ivan Programme）重新恢復軍火生產，計畫每個月要生產一百萬枚以上的砲彈。從機器拔除可用的零件與從損壞工廠取得原料，加上從德國運來的部分資源之後，生產工作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展開，總計需要九千三百名工人，卻只找到八百八十名。幾個月後，隨著紅軍逐漸逼近，計畫也無疾而終。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已經恢復生產的工廠總僱用人數僅有八萬六千人；許多蘇聯工人不願被強制徵召到德國工作，這些人不僅難以訓練，也有很高的比例會逃離工作崗位。<sup>302</sup>戰爭非但未能讓德國增加物資，反而減少了能用的資源。德國在東方發動戰爭的巨大代價，把從東方取得或擄獲的有限原物料完全消耗殆盡。一九四四年三月，戰時經濟研究局估計東方占領地只提供價值四十五億馬克的物資支應戰爭，但德國為了整個大空間發動的戰爭卻花費了七百七十七億馬克。這一數字對比充分顯示前蘇聯經濟有多麼貧困，又遭破壞得有多麼嚴重。在整個東方占領地擄獲的戰利品價值估計只有五千九百萬馬克，反觀在歐洲其他地區擄獲的戰利品價值卻高達二億三千七百萬馬克。即使考慮到準確估計戰時後勤補給的價值有其難度，但整體的統計數字依然顯示，納粹對於東方財富的美夢確實只是一場幻想。<sup>303</sup>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糧食供應上，特別是希特勒認定的歐洲穀倉。



東方占領地生產的糧食首先供應給德軍，剩餘的部分則運往德國本土進行糧食配給。根據農業部部長巴克的大饑荒計畫，糧食不會優先供應給蘇聯民眾，特別是在幾乎沒有經濟資源的地區。一九四一年七月，武裝部隊戰時經濟局局長托馬斯將軍表示：「不用理會遼闊土地上的民眾（就讓他們挨餓）。」綠色文件夾也明確表示，森林與城市地區將不會獲得足夠糧食。即使是在生產糧食有剩餘的烏克蘭，德軍開戰後才一個月就已經面臨難以找到糧食的狀況，德國高層因此下達訓令，「要對當地民眾施加更大壓力」，奪取所有糧食，不用管那些農民的死活。烏克蘭首府基輔也在大饑荒計畫之列，當德軍於九月占領基輔時，便馬上下令禁止農村腹地運送糧食到基輔，如此才能依照戰前計畫將糧食出口到德國。<sup>304</sup>然而這項糧食策略終究無法實行，不僅因為軍隊仍有一半的糧食需要從德國運往東方（包括數十萬匹馬需要的糧秣也有一半需要從國內運送）、東方根本沒有剩餘的糧食運回德國，也因為大饑荒計畫推行的結果使德軍無從強徵當地的勞動力。大饑荒計畫除了損害來年的糧食供給，也在占領區引發饑民暴動。

戈林不得不下令，凡是為德國占領者工作的人「『絕對』不會挨餓」，反觀不為德國占領者做事就得不到糧食。<sup>305</sup>糧食配給量幾乎無法支持長時間勞動或從事公眾生活。那些從事「有用工作」的人一天可以獲得一千兩百大卡的糧食，從事對占領者無直接好處的工作的人則能獲得八百五十大卡，十四歲以下孩童與猶太人（無論哪個年齡層）只能獲得四百二十大卡。沒有爆發大饑荒的原因是許多城市家庭逃往糧食通常較充裕的鄉村地區。儘管如此，鄉村地區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經常性的糧食徵收、高昂的實物稅與強制糧食配給，使許多村民欠缺糧食。農民為了增加食物，只好多種一點蔬菜，並且暗地裡挖掘地窖儲藏食物以規避德軍搜查，但頂多也只能滿足基本的糧食需求。<sup>306</sup>德國大

規模強制徵收導致離前線部隊一百五十公里的範圍內完全看不到任何農作物或牲畜，形成一塊「死亡區域」。剛好位於前線的俄國城市庫斯克（Kursk）與哈爾科夫（Kharkov），配給量為一天僅有一百公克麵包。<sup>307</sup>都市消費者勉強生存，主要是因為還能仰賴大型黑市以物易物換取糧食。德國的人力分散在廣大占領區，根本無力抑制通貨膨脹。根據部署於白俄羅斯某個野戰司令部的說法，一九四二年夏天一公斤麵包的官方價格是一點二盧布，但非官方價格則是一百五十盧布；一公升葵花籽油的官方價格是十四點五盧布，但黑市價格卻是兩百八十盧布。<sup>308</sup>在這種狀況下，民眾陷入飢餓就成了日常，對德國糧食政策的憎恨也使原本希望日子能比蘇聯時代過得更好的民眾轉而敵視德國。東方這塊「歐洲穀倉」從未能滿足德國期待。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間從蘇聯獲得的糧食遠遠比入侵蘇聯後來得多。從占領區取得的糧食，絕大多數都在占領區消耗掉，只有少部分剩餘運回德國。德國武裝部隊與德國民政人員每年在東方消耗掉七百萬噸的穀物，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只有兩百萬噸穀物運回德國，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兩百九十萬噸，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剩下一百七十萬噸。在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五年，運回德國的穀物約占德國國內消耗量的百分之十；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比例較高，約占百分之十九，但這是因為希特勒與戈林堅持每一粒穀物都必須運回德國，不管占領區的人民有沒有東西吃。<sup>309</sup>

德國一直無法讓東方經濟穩定下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即便在戰爭期間，德國高層依然執意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政治重組計畫。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希特勒在擊敗波蘭後的演說中指出，他想在新德意志帝國建立「新的人種秩序」。他在十天後又希姆萊表示，這場戰爭是「一場沒有法律限制的種族戰爭」。<sup>310</sup>希姆萊與一群由親衛隊帝國保安總

部、強化德國民族性帝國專員部、親衛隊種族與移居總部找來的專家學者，著手進行各項複雜任務，包括將已經占領的特定地區予以日耳曼化，清除其他殖民地區的過剩人口，以及不擇手段地將整個占領地的大量猶太人口完全滅絕。起初的三階段短期計畫未能盡如人意。到了一九四〇年底，德國只從已經併吞的波蘭領土驅逐了二十四萬九千名波蘭人與猶太人，而非一九四〇年一月東方總計畫中要求的六十萬人，也非一九四〇年四月第二階段短期計畫提出的八十萬人。由於鐵路運輸一直存在著瓶頸，導致許多波蘭人逃避流放或偷偷返回故鄉。為了解決德國長期的勞工短缺問題，大量波蘭工人被送往西方而非東方，儘管這完全與種族清洗的目標相左。為了確保送往德國的波蘭人不會污染德國的種族純淨，親衛隊種族與移居總部人員會對這些人進行調查，篩選掉他們不想要的種族成分。最後，波蘭總督弗朗克拒絕讓他的總督府轄區成為前波蘭領土的垃圾場，專門收容各地不要的波蘭人與猶太人。德國當局只能把猶太人改送到猶太區或德蘇邊界強制修築東牆（Ostwall）要塞，不過這些防禦工事很快就因為德國入侵蘇聯而失去作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制定的第三階段短期計畫原本預計驅逐七十七萬一千名波蘭人與猶太區以外的猶太人，但這一波新種族清洗行動被迫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止，因為接下來當局要以軍事運輸為第一優先。對於希姆萊與不斷受挫的種族驅逐機構來說，入侵蘇聯終於提供一個打破困境的可能，使他們可以將所有不想要的種族全送到遙遠的俄國荒地，讓當地的飢餓與寒冷「處理掉」這數百萬人的性命。

巴巴羅薩作戰雖然為納粹的種族烏托邦許下承諾，卻也為帶來新的威脅。東方占領地居住了數百萬斯拉夫人與猶太人，數量之多足以淹沒人數稀少的德國人，也足以妨礙德國人取得生存空間。第一個解決方式便是直接清除絕大部分現有人口，這個構想最早起源於農業部長巴克的

大饑荒計畫，又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東方總計畫再度確認。第二個解決方式是針對東方特定地區積極進行日耳曼化，讓德國人在當地進行墾殖，把非德國人放逐到別的地方。德軍剛占領東方後不久，就啟動了這項長期計畫。波蘭總督府、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加利西亞與克里米亞都預計將徹底日耳曼化，除了從西方遷徙德國人到這些地區定居，還包括原本就定居東方的德裔居民，以及東方人口中帶有明顯德意志人特徵或德意志人血統的居民——用種族計畫的詭異邏輯來說，這些人是因為有「再德意志化」（*Wiedereindeutschung*）的可能所以才可以在當地。親衛隊種族與移居總部在波蘭、亞爾薩斯—洛林與占領的蘇聯地區針對四百萬人進行篩選，最後將這些人分成三類：O類，適合在東方墾殖；A類，送回德國本土的再教育營，使其重新成為德國人；S類，種族上完全不適合，必須將他們回地送回，少數人則直接送進勞動營。<sup>311</sup>親衛隊種族與移居總部在蘇聯地區搜尋殘存的德意志人生物與文化蹤跡，藉此顯示過去的德意志殖民者並未完全被周遭的斯拉夫人所吞沒。羅森堡任命史圖姆普（Karl Stumpp）擔任「史圖姆普小隊」領導人，針對可能殘存「德意志人」血統與文化的烏克蘭村落進行普查，結果許多被史圖姆普認定具有德意志人血統與文化的烏克蘭人卻不被親衛隊種族官員所接受，許多烏克蘭村民也不願意被歸類為德意志人的一員。<sup>312</sup>

與此同時，德國也開始進行實際重構占領區的工作，透過對東方的長期殖民，最終目標是將整個生存空間延伸到烏拉山或烏拉山以東地區。重構工作首先是建立連通各地的「血管」，讓德國「血液」能源源不斷地送進廣大的斯拉夫身體中。具體方式就是建立「屯墾區與安全點」，也就是每一百公里左右建立一個親衛隊駐屯站與一個小型屯墾區。這些安全點可以保護德國屯墾區，也能綏靖與控制斯拉夫人腹地。



城鎮人口不超過兩萬人，城鎮周圍的農村宛如項鍊一樣環繞著城鎮，這些農村都居住著勤奮的德國農民，如此一來便能讓殖民者在新土地扎根，避免大城市的社會風險。一九四二年底，希姆萊在演說中指出，這些殖民地「就像珍珠串一樣，我們將一路延伸到頓河與窩瓦河，希望能直抵烏拉山脈」。<sup>313</sup>希特勒堅持大城市必須予以毀滅或日耳曼化：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要「夷為平地」，華沙要縮減成只有四萬名德國人居住的城市，徹底消除波蘭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sup>314</sup>

這項建設計畫交由希姆萊底下另一個單位，親衛隊經濟與行政總部的經濟專家卡姆勒（Hans Kammler）進行。儘管和平遙遙無期，卡姆勒卻擬定了「臨時和平建設計畫」，準備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施行。計畫第一階段是要設立安全點，而這甚至早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已經開始進行，當時希姆萊命令盧布林地區的親衛隊與治安首長格洛博克尼克（Odilo Globocnik）著手建立駐屯軍。然而，在缺乏勞工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大屠殺之後普遍缺乏猶太工人），整個建設計畫進度嚴重落後，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天更不得不完全放棄。<sup>315</sup>軍事任務優先，包括興建穿越波蘭與烏克蘭的主要公路，以協助解決陸軍的後勤問題。負責軍事建設的「托德組織」（得名於建築調配全權總代表托德）至少興建了兩萬四千九百九十三公里的道路，同時修復了數百座遭破壞的橋樑。長兩千一百七十五公里的四號大道計畫一路抵達克里米亞與高加索地區，這條道路的修建工程始於一九四一年的加利西亞，由當地的親衛隊領袖卡茲曼（Friedrich Katzmann）協助進行。卡茲曼讓四號大道通過地區的猶太人免於遭受屠殺，因為他要這些猶太人負責修築道路到死為止。卡茲曼表示：「我不在乎每修築一公里的道路要死一千個還是一萬個猶太人。」猶太工人幾乎沒有食物可吃，動不動就遭到毆打，如果鬆懈或倒下馬上就會遭到槍斃，這些動手的人並不是親衛隊，而是托德組織派駐

在各地的建設衛兵。直到一九四三年勞動營關閉為止，估計有兩萬五千人死亡或被殺。<sup>316</sup>

要找到願意前往新土地開拓的人並不容易。無數名來自波羅的海國家、羅馬尼亞與波蘭蘇聯占領區的德國人，最終移居到這些由德國直接併吞的領土上；根據強化德國民族性帝國專員部的報告指出，移居人口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達到五十四萬四千兩百九十六人。<sup>317</sup>但相較於移往德國直轄領土的人，要找到願意前往東線殖民地且種族成分合格的德國人卻是更加不容易。在羅森堡東方占領地部負責德國人移居事務的魏策爾（Erhard Wetzel），發現西方的德國人「拒絕移居東方……因為他們認為東方領土缺乏變化且貧困，天氣寒冷且原始」。<sup>318</sup>希姆萊下令在波蘭總督府東部的札莫希奇（Zamość）與周邊地區建立一個模範德國屯墾區，於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驅逐此地的三百座村落與五萬餘名波蘭人，將他們的農田與家園交給德國移民。然而幾個月後這項計畫卻被迫中止，因為願意移居當地的德國人只有一萬名，離計畫中的六萬人有很大的差距，更不用說這些願意移居的德國人絕大多數來自比薩拉比亞與羅馬尼亞，有些甚至是第二次移居。<sup>319</sup>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A）與親衛隊都試圖勸說自己的成員自願移居東方，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衝鋒隊只有一千三百零四人申請（當局起初還以為會有五萬人申請），且最終成行的更僅剩四百二十二名；至於親衛隊，儘管希姆萊大言不慚地想讓自己的隊員填滿所有殖民地，但到一九四二年六月為止也只有少少四千五百人申請。<sup>320</sup>為了填滿廣大的空間，波蘭農地上居然出現了過去德屬東非的移民——而根據一九四三年秋天某份報紙的描述，在東方的重建上，這些移民「仍可在各方面扮演先行者的角色」。<sup>321</sup>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就已經在向荷蘭人積極鼓吹：同樣身為「德意志民族」的一員，我們要「望向東方！」原本估計會有數

千荷蘭人參與，結果六千人當中只有數百人自願前往東方為德國人工作。這些荷蘭人很快就對德國當局高高在上的態度與不熟悉的環境感到幻滅。荷蘭人希望可以取得永久土地做為荷蘭殖民地，但這樣的要求遭到德國人拒絕。德國抱怨荷蘭人總是喝得醉醺醺且缺乏紀律，他們希望荷蘭人還不如早點離開，就連借調農民前往東歐的荷蘭委員會也抱怨絕大多數自願者只是「一群冒險者」。<sup>322</sup>

儘管缺乏可用的德國殖民者，這項烏托邦移居計畫仍繼續進行。在最極端的狀況下，這項計畫甚至想大量減少東方占領地的人口。魏策爾擬定新版本的東方總計畫，提出一項為期三十年的殖民構想：驅逐三千一百萬人，同時留下一千四百萬人為帝國工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東方總計畫的最終版本呈交給希姆萊，加上一九四二年底埃利希（*Heinrich Himmler*）擬定的「最終移居總計畫」（*General Settlement Plan*），這兩項計畫不約而同地在德國入侵蘇聯陷入嚴重危機時提出天馬行空的構想。這兩項計畫估計，在東方占領地的民族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波蘭人、百分之五十的捷克人、百分之五十的波羅的海國家民眾、百分之七十五的白俄羅斯人與百分之六十五的烏克蘭人是「可消耗的人口」，總數四千七百九十二萬五千名非德意志人將遭到驅逐或消滅，而這還不包括猶太人，因為絕大多數猶太人早就已經遭到殺害。<sup>323</sup>即使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戰事已逐漸不利之時，大幻想家希姆萊依然想像德意志帝國國祚將延續四五百年，人口可達六億，而且還「將與亞洲爭奪生存空間」。<sup>324</sup>

## 一個沒有猶太人的帝國

儘管這場戰爭進行至此已導致數百萬人死亡，數十萬人被逐出家園，但有組織地大規模驅逐或屠殺數千萬人之事，其實並未完全按照德國當局擬定的各版本東方計畫來進行。唯一的例外是東方占領地的猶太人。絕大多數的歐洲猶太人仍居住在沙皇時代設立的「柵欄區」（Pale of Settlement）：從俄羅斯帝國以來，猶太人一直被迫生活在這塊從波羅的海國家到烏克蘭西南部的區域，而也這成了猶太人悲劇的根源。雪上加霜的是，德國負責管理這個地區的安全機構，聚集了全德國最仇視猶太人的分子，這些人處心積慮想將這個地區轉變成德意志民族的樂園。根據蓋世太保猶太人事務局局長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估計，歐洲猶太人共有一千一百萬人，其中六百六十萬人居住在東方占領地，一百五十萬人居住在蘇聯其他地區。<sup>325</sup>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展開的猶太人大屠殺，絕大多數受害者因此都來自東方占領地。猶太人的命運與其他受害者不同，其他人要不是餓死就是為了讓出空間給德國人而必須流離失所，又或者被迫強制勞動至死，但猶太人卻獨獨被德國人視為種族敵人，無論如何都要加以消滅。首先是從德國境內移除，其次是東方占領地，最終則是要從德國的「大空間」完全消失。以納粹政權的種族語彙來說，這些地方將成為「沒有猶太人」（judenrein，將猶太人清洗乾淨）的地區。一九四五年後出現的英語詞彙「Holocaust」與希伯來語詞彙「Shoah」，雖然指的都是猶太人大屠殺，然而其涵蓋範圍不只局限於東方占領地，還包括居住在軸心國領土的其他猶太人。東方占領地之所以重要，在於納粹德國會將手上的猶太人送到此地，將他們在這裡有步驟地、有系統性地殺害。

這場對抗猶太人的戰爭與龐大的種族重構計畫有著密切關係，但這也只能解釋「最終解決方案」這個猶太人問題委婉說法的其中一個面向。猶太人原本不是問題，只是因為希特勒與納粹黨菁英透過想像將猶



太人建構成一個問題。追根究柢，希特勒與圍繞在他身旁的反猶太主義者對於這個世界抱持著某種二元對立的觀點，德意志民族代表了善的種族力量，與其對立的猶太人則是世上一切邪惡的根源。在希特勒奇異的末世觀點中，唯有消滅猶太人，德意志人才能生存下去。猶太人代表了「反民族」，他們反對「種族的自我保存」。<sup>326</sup>一九三六年，希特勒罕見地親筆寫下一份文件，並且只讓少數幾個親近夥伴看過。希特勒在文件中表示，如果無法消除猶太人的威脅，將會造成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最可怕的種族災難」，結果將導致德意志民族的「完全毀滅」。<sup>327</sup>希特勒預期會發生一場激烈的衝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到毀滅一詞，他在帝國議會的演說中預言，如果猶太人再次讓德國捲入世界大戰，那麼等待他們的命運就是「毀滅」（Vernichtung）。

對希特勒來說，這場戰爭與隨後邁向毀滅猶太人的歷程，兩者其實息息相關。事實上，希特勒日後提到他的預言時，他把時間定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德國開戰的第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德國終於迎來全球戰爭時，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一場決定命運的會議中，希特勒的預言成了對「大空間」猶太人進行無限制毀滅的藉口。與希特勒開會後過了幾天，希姆萊在日記裡寫道：「猶太人問題要像處理游擊隊一樣從根拔除。」<sup>328</sup>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希特勒實際上首次做出預言的三年後，希特勒終於表示，如今「時候已經到了，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世界敵人將就此終結，往後至少一千年不會看到他們的蹤影」。<sup>329</sup>兩個星期後，希特勒對戈培爾說，猶太人「將跟我們的敵人一樣遭遇被毀滅的命運」，希特勒再一次將種族滅絕與戰爭聯繫在一起。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希特勒在向帝國議會發表演說時，歷數全世界猶太人的罪行，認為他們從一戰爆發至今讓德國承受所有的苦難與危

險，並以此做為滅絕猶太人的藉口：

一九一四年，隱身於幕後默默推動英國加入一戰的就是猶太人。當時持續地削弱我們，而且在國內散布謠言說我們無法打贏這場戰爭，最終迫使我们投降的也是猶太人。猶太人煽動我們的人民發動革命，剝奪了我們繼續抵抗的機會。一九三九年之後，猶太人進一步操縱大英帝國，使其陷入史上最危險的危機。猶太人是布爾什維克病菌的傳播者，這種廣泛傳布的病症差一點就毀了歐洲。猶太人也是金權政治的戰爭販子。猶太人完全基於猶太資本家一己之私，甚至驅使美國違背自身的利益加入戰爭。<sup>330</sup>

希特勒歹毒地結合幻想的憎恨與虛構的歷史，將猶太人塑造成德國人的死敵，必去之而後快。這些想法絕非理性的產物，因為只要稍加思索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謬之處，這一切完全只是希特勒固執妄想的信仰。希特勒自己從未造訪過集中營，也從未親手殺過猶太人，但他將猶太人比喻成歷史邪惡，由此創造出德國人可以任意復仇的論述，進而造成戰爭期間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量殺戮。

猶太人大屠殺始於一九四一年，起初並非有組織的行動，而且採取的手段也各異。要理解這個現象，就必須從一九三三年以來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孤立與羞辱來理解。直到一九四〇年為止，納粹政權的意圖仍停留在奪取猶太人的財產與強迫遷徙，數十萬名猶太人因此受害。這段時期，猶太人的歷史威脅論持續在德國內外傳布，但希特勒的偏執觀點要真正落實，就必須透過政治教育灌輸給全體親衛隊、警察與安全部隊，此外還要有支持希特勒觀點的學界人士為「猶太人問題」尋求解方。在親衛隊與學術圈的協助下，希特勒隱喻的猶太人觀點得以轉化成

政策，然後開始對活生生的猶太人展開迫害與屠殺。當戰爭開打，數百萬波蘭猶太人落入德國人之手，情況開始出現變化。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親衛隊帝國保安總部部長海德里希下令，所有猶太人都要集中到波蘭總督府的猶太區或勞動營。<sup>331</sup>德國併吞波蘭後，一部分領土設立了瓦爾特蘭帝國大區（Warthegau），原本居住在這個大區的猶太人要被流放到波蘭總督府，但要遷徙這些猶太人實際上極為困難，而且要設立的猶太區也仍然位於德國的領土。以卡利什鎮（Kalisch）來說，這裡在一九四〇年秋天設立了猶太區與勞動營，但過於虛弱、年老或生病的猶太人都會被帶到鄰近的森林槍決，這就是最初的種族滅絕案例。這個時期的屠殺仍停留在地方層級。<sup>332</sup>

絕大多數猶太人被集中到波蘭總督府之後，波蘭總督弗朗克下令十八歲到六十歲的所有猶太男子都必須強制勞動，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為德國的戰爭準備工作。在盧布林，格洛博克尼克設立了七十六個勞動營，總計約五萬到七萬名猶太男子負責興建防禦工事、道路或挖掘水道，他們必須每天浸泡在及膝的水裡持續工作。此時德國人就已經開始對這些服勞役的猶太人施加致命暴力：猶太工人只要逃避工作或稍有懈怠就會遭到槍斃或絞死。而在飲食條件極差的狀況下，猶太工人要不是因為營養不良而死，就是因為無法繼續工作而被槍斃。到了一九四一年，七十萬名猶太工人絕大多數只能光著腳、衣衫襤褸地擔任奴工。<sup>333</sup>其餘的猶太人則被送進大約四百個大小不一的猶太區。當猶太區開始人滿為患時，德國當局一方面擔心疾病的威脅，另一方面也煩惱為了養活這些猶太人要付出的成本。由於流放猶太人的進度不斷拖延，導致民政機關、親衛隊帝國保安總部、警察與軍方之間持續發生爭執。有些機構需要猶太工人投入戰爭準備工作，但這麼做不僅與孤立猶太社群使其陷於貧困的想法有矛盾，也與希姆萊的安全體制試圖淨空猶太

人、任由猶太人餓死或病死產生衝突。法國戰敗曾一度讓德國當局計畫將所有的猶太人運往法國的殖民地馬達加斯加。一九四〇年五月，希姆萊向希特勒提出這項建議，並且發現元首「非常贊同他的想法」。<sup>334</sup>德國希望把馬達加斯加島變成保護國，由德國總督管理這座荒涼的殖民地，猶太人則將成為島上不幸的墾殖者。但由於英國掌控了海洋，因此這項計畫毫無實現的可能。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國為了防止日本占領，甚至搶先一步攻占了馬達加斯加島。接著，巴巴羅薩作戰的迫近使一些人產生將猶太人運往東方的念頭，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也認為這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案。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對克羅埃西亞國防部長表示：「把猶太人送到馬達加斯加還是西伯利亞，並沒有太大差別。」<sup>335</sup>然而，此時的德國人已經開始把猶太人當成種族敵人，養成了任意加以虐待、掠奪或殘殺的習慣。在這種狀況下，不難解釋德國人在一九四一年夏天面對前蘇聯領土的猶太人時，為什麼會從強迫遷徙演變成大屠殺。

猶太人大屠殺幾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後緊接著展開，美國史家勞爾（Wendy Lower）認為整個過程是由「各地方的大屠殺歷史共同鑲嵌而成」。每個地方的大屠殺都有自己的故事，把這些故事拼湊起來可以讓我們看到種族滅絕的全貌。<sup>336</sup>一開始，希特勒下令特別行動隊殺害猶太人，但主要的對象是擔任蘇聯公務員、共產黨員或蘇聯官員的猶太人。然而隨著戰爭持續，暴力洪流一發不可收拾，屠殺的對象很快擴及到一般的猶太民眾，因為他們很容易辨識，而且集中居住在德軍最初占領的村落與城鎮裡。安全部隊獲得德國國防軍的協助，不久後德軍也開始協助特別行動隊圍捕與看管猶太人，偶爾也直接參與屠殺行動。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德國入侵蘇聯前夕，德軍全體部隊直到連級單位都接到指示，要對「布爾什維克煽動者、狙擊手、



破壞者與猶太人」採取無情而積極的行動。九月，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針對「新占領蘇聯領土的猶太人」發布訓令，認為必須「特別針對猶太人」加強「無差別而積極的」作戰。<sup>337</sup>戰爭開打後，隨著德軍持續前進，各種影射猶太人暗地裡進行搶掠、縱火或槍擊的說法也成為官方的主流論述。這些指控也許不全然是空穴來風，但絕大多數純屬子虛烏有。無論如何，真相已無關緊要，因為德國官方早已一口咬定猶太人絕對有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特別行動隊A隊的報告指出，猶太人「非常積極地進行破壞與縱火」。早在當年十月底，就已經有三萬名猶太人因為這類虛假指控遭到殺害。<sup>338</sup>

軍事首長的反應往往受到自身反猶太主義傾向與敵視共產主義的影響，只要一聽說襲擊德軍側翼的「游擊隊」是猶太人便輕易相信。他們也把蘇聯的羅姆人社群當成潛在的間諜與破壞者，羅姆人因此經常與猶太人一起遭到屠殺。親衛隊成員也往往無須上級催促就自行從事屠殺任務。早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親衛隊騎兵旅就接到指示，凡是猶太男子一律予以殺害，不久命令又更改成猶太人一家大小都要殺光。八月初長達兩個星期的殺戮熱潮中，估計有兩萬五千名猶太人遇害。<sup>339</sup>消滅「猶太人」就等於消滅「游擊隊」，這種自我開脫的說詞使得軍方與安全部隊恣意殺戮，特別是在塞爾維亞占領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德國對當地的猶太男性進行大規模屠殺，理由是他們有可能是游擊隊或破壞者。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也下令，只要有一名德國士兵被游擊隊殺害，德軍就要殺害一百名猶太人做為報復，結果導致數百名猶太人被殺。貝爾格勒軍政府也下令殺死八千名猶太人，只因為沒有能力將他們運送到東方。往後幾個月，猶太婦女、孩童與羅姆人也遭到殺害，兩個月的時間用毒氣殺死了七千五百人。軍政府表面上承諾每天運送固定數量的婦女與孩童移居東方，實際上卻是將他們送上密閉的貨車，將他們鎖在裡頭用毒

氣毒死。為了安撫孩童，軍政府人員還預先發糖果給他們。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軍政府發了一條簡明的電文給柏林：「塞爾維亞的猶太人已經淨空。」<sup>340</sup>

大屠殺的主要推動者是特別行動隊A、B、C與D隊，一旦屠殺人數達到一定規模，還能得到帝國僱用的正規「秩序」警察（相當於武警）的支援，或者是動用在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與白俄羅斯僱用的輔助部隊。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這些部隊總共殺害了約七十萬人，其中有五十萬九千人來自烏克蘭的民政府與軍政府轄區（包括在聶斯特河沿岸被羅馬尼亞軍隊與安全部隊殺害的九萬六千人）。<sup>341</sup>有些地區的軍事長官會下令興建猶太區，但這些猶太區通常只是暫時性質，因為親衛隊與警察遲早會在希姆萊的命令下前來清除他們。在白俄羅斯，屠殺在十月達到高峰，十月一日到二日，莫吉廖夫（Mogilev）有兩千人遭到屠殺，十天後在維特斯克（Vitebsk）的死亡人數也達到八千人，鮑里索夫（Borisov）死亡人數也有七八千人。明斯克原本設立了大型猶太區，但到了十一月初，為了騰出空間容納來自德國的第一批流放者，於是又有一萬名猶太人遭到屠殺。九月底，德國中央集團軍各級將領在莫吉廖夫召開高層會議，特別行動隊B隊指揮官內貝（Arthur Nebe）在會上提到猶太人問題與反游擊戰，希望取得軍方合作。十月，德軍部隊分頭進入鄉村地帶清剿「盜匪」，然而實際上卻殺死了大量的猶太人。駐紮於白俄羅斯的陸軍將領毛亨海姆將軍（Gustav von Mauchenheim）下令「猶太人必須從鄉村地區消失，吉普賽人〔羅姆人〕也必須予以消滅」，他的第七〇七步兵師在明斯克周邊地區殺害了約一萬名猶太人，而這還不包括明斯克猶太區內的受害者。<sup>342</sup>

當局處理猶太人的方式往往沒有前後連貫。有些猶太人能夠活下來是因為擁有德軍需要的技能，有些猶太人躲過了初期的圍捕，還有一些

猶太人被成群趕進猶太區，至於進了猶太區能否繼續生存則要看運氣。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抵達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之後，當地發生了反猶暴亂，親衛隊於是將計就計展開了屠殺行動。在第一波屠殺之後，當地才開始興建猶太區。里加的猶太區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才建好，但已經有半數猶太人遭到殺害，而到了十二月初，猶太區的兩萬七千名猶太人也在鄰近的倫布拉（Rumbula）森林遭到處決，原因仍舊是為了騰出空間容納從德國運來的猶太人。另一方面，在烏克蘭，日托米爾

（Zytomyr）猶太區才剛設立不久，區內的三千一百四十五名猶太人就遭到殺害；雅爾達猶太區於十二月五日完成，十二天後裡面的居民也遭到殺害。<sup>343</sup>烏克蘭也發生了規模最大的一起種族屠殺行動，地點就在基輔市郊的娘子谷（Babi Yar），這場屠殺據說是為了報復「猶太人」在基輔採取恐怖主義行動。九月二十九日，數量龐大的猶太人徒步走過基輔市區，許多人希望自己被送往流放地，然而等到他們走到遇害現場時，卻成群結隊遭到毆打、脫光衣服與機關槍掃射，之後便被丟入峽谷之中，總計兩天殺害了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一人。九月，即使東方的戰事還在持續，整個基輔州依然有十三萬七千人被殺。<sup>344</sup>目擊這起事件的霍洛舒諾娃（Iryna Khoroshunova）在日記裡寫下她的感受，而這份感受至今仍能觸動所有人的內心：「我只知道一件事：發生了可怕、恐怖、超乎想像的事，令人難以理解、摸不著頭緒、無法解釋。」<sup>345</sup>

後世歷史學家時常爭論希特勒是在什麼時候「下令」屠殺猶太人，然而這種爭論忽略了種族滅絕其實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就已經開始，而且最高權威從未直接下令要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儘管如此，柏林當局也沒有任何人反對屠殺，特別是希特勒，他曾經看過特別行動隊呈交上來的報告，卻未表示任何意見。希姆萊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甚至對安全部隊施壓，要他們必須更加冷酷無情。希特勒只有在關鍵時刻才會提出

自己的看法。一九四一年八月，在英美發表《大西洋憲章》之後，希特勒直接下令要以黃色星星來標記德國猶太人。九月十八日，希特勒終於決定將德國、奧地利與捷克的猶太人全流放到東方的猶太區，並且要求從十月底開始行動。到了十月底，親衛隊帝國保安總部已經開始討論擴大希特勒流放中歐猶太人的決定，預計把德國占領的「大空間」裡所有猶太人全流放到東方。希特勒對於史達林下令將「窩瓦德意志人」流放到西伯利亞特別感到憤怒，這數千名說德語的居民居住在俄國南部，他們是十八世紀殖民者的後代，希特勒因此同意羅森堡的說法：如果蘇聯的德意志人遭到殺害，那麼「中歐的猶太人」也要遭受相同的命運。<sup>346</sup>最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與一九四二年一月，負責制定猶太人政策的決策者進一步延伸希特勒消滅中歐猶太人的說法，他們認為應該將範圍擴大到全歐的猶太人，無論是有計畫的屠殺，還是讓猶太人工作到死，都是可行的方案。波蘭總督弗朗克急欲將波蘭總督府日耳曼化，但又無力送走境內眾多的猶太人口，他於是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會議結束後向底下官員表示，他們現在終於有辦法處理掉波蘭境內超過一百萬的猶太人。希特勒並未直接下令推動如此激進的種族滅絕政策，但所有主事者都深信，不僅是蘇聯與波蘭東部的猶太人（已經有非常多人遭到殺害），只要是德國統治範圍內所有的猶太人，都應該在未來某個時點運送到東方加以屠殺。這就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召開惡名昭彰的「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做出的主要結論。海德里希在會中討論了歐洲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認為應該採取希特勒曾經同意的做法，也就是把猶太人運到東方。與希姆萊一樣，海德里希仍認為應該盡可能運用猶太人的勞動力，將他們流放得愈遠愈好，讓他們工作到死，但其他與會者則指出，無法工作的猶太人必須處死。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淨空猶太人都等同於消滅猶太人。<sup>347</sup>



萬湖會議並未擬定一個處理猶太人的核心計畫。與一九四一年一樣，一九四二年出現一波接一波的屠殺，實際上仍是地方各自為政的結果：各地區的親衛隊、軍政府與民政當局各自採取行動，當然背後也有希姆萊的驅策，而海德里希直到一九四二年遇刺身亡之前也都始終鼓吹屠殺。這些屠殺行動後來出現了一項最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從面對面的屠殺（殺死的人約占半數）轉變成透過毒氣設施進行屠殺，若不是在改裝過的密閉貨車中實施，就是在固定的毒氣室中進行。毒氣設施最早出現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與十一月，當初是為了解決猶太區空間不足以容納德國與捷克猶太人而想出來的辦法。在流放計畫失敗之後，瓦爾特蘭帝國大區長官格萊澤爾（Arthur Greiser）希望獲得准許，將仍住在猶太區的十萬名猶太人屠殺一空。格萊澤爾選擇海烏姆諾（Chelmno）附近的一座小莊園，從十一月開始使用毒氣貨車殺害猶太人。與此同時，盧布林地區的親衛隊與治安首長格洛博克尼克提議並且獲得海德里希准許，開始在盧布林附近的貝烏熱茨（Belzec）前勞動營設置毒氣室，無法工作的猶太人都會送來這裡。<sup>348</sup>之所以改採毒氣，主要與所謂的「T4計畫」（該計畫得名於位於柏林市蒂爾加滕街四號[Tiergarten 4]）常用的方法有關，該計畫使用毒氣殺害德國與奧地利的精神病患，之後也將對象擴大到波蘭占領區的精神病患。格洛博克尼克讓T4計畫派出一百二十名人員到盧布林工作，而更多的工作人員則分別前往其他地點協助屠殺。<sup>349</sup>一九四二年三月起，貝烏熱茨開始以毒氣屠殺猶太人，波蘭的索比堡（Sobibór）與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也開始興建毒氣設施。一九四二年五月，索比堡開始使用毒氣室，特雷布林卡則是七月啟用。這幾個營區成為實施「萊因哈德行動」（Aktion Reinhard）的據點，猶太人被送到這裡只是為了加以滅絕。即便能夠工作的猶太人可以活命，但在波蘭總督府進行的第一波屠殺中，還是有十六萬名猶太

人進了毒氣室。海德里希遇刺身亡後，希姆萊向親衛隊高階軍官表示：「我們在一年之內就能完成猶太人大遷徙的工作，然後就不會再看到猶太人四處遊蕩了。我們必須把猶太人清除乾淨。」<sup>350</sup>

「第二波」屠殺始於一九四二年夏天，這是種族滅絕最嚴重的時期。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波蘭總督府轄區範圍內有大約一百二十萬人遭到殺害。在烏克蘭，絕大多數屠殺仍然採取面對面殺害的方式，造成七十七萬三千人死亡，整個帝國總督轄區幾乎已經看不到猶太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份報告指出，「領土內的猶太人淨空行動已到了最後階段」，僅剩的幾千人只要再花幾個月就能解決。<sup>351</sup>而在無情的殺戮之外，德國內部正在對於猶太勞動力的使用、猶太區與勞動營是否應該繼續存在等事爭論不休。一九四二年四月，在軍方與東方民間僱主的壓力下，希姆萊不得不下令十六歲到三十五歲的猶太男性應留在工廠與建設工地。但希姆萊的態度又在一九四二年夏天之後出現轉變，他不再接受殖民地仍存在種族不純淨的孤島地區，而是要求所有僱用猶太人的計畫都要停止，猶太人不能投入戰爭工作而是應該予以殺害，但軍方與民政機構完全無視他的命令。一九四三年初波蘭勞動營仍有十二萬名猶太人，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天希姆萊堅持關閉所有勞動營為止，原本待在勞動營的猶太人也無法逃過被屠殺的命運。<sup>352</sup>在加利西亞，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屠殺了十四萬名猶太人，這些人逃過了前幾波屠殺，但最終還是無法逃出生天。在烏克蘭占領區，十五萬名倖存者在一九四三年遭到殺害。有幾個勞動營因為負責興建四號大道而得以倖存，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最後一個勞動營也遭到消滅，剩餘的猶太人全被殺光。在這段時期，奧許維茲—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與馬伊達內克興建了兩座大型勞動營與滅絕營，來自中歐、西歐與南歐超過一百萬名猶太人在此被毒氣殺害。這些受害者包括了波蘭總督府最後一批猶太工

人與羅茲（Łódź）大型猶太區裡的猶太居民，他們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紅軍逼近時被殺，此外還有半數的匈牙利猶太人，他們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天才被流放至此，不久就被殺害。在奧許維茲—比克瑙集中營，一百一十萬名猶太流放者有九十六萬五千人被殺，其中包括二十一萬六千名孩童與青少年。<sup>353</sup>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專為滅絕猶太人而設立的營區大部分都已經關閉，因為滅絕猶太人的任務已大致完成。

無論德國各單位之間如何缺乏協調或如何爭論不休，對東方的猶太人來說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無論快死還是慢死，結局都是死。然而在整個德意志帝國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情況就比較複雜：如果無法得到占領當局或盟邦當局的協助，要流放猶太人恐怕沒那麼簡單。德國的安全機關缺乏人力，對各地情況也不太瞭解，即使在占領地也無法獨立執行任務；即便是在盟邦或衛星國，德國的政策也無法理所當然地凌駕在地方利益與地方觀感之上。德國屠殺計畫的成功與否往往取決於地方警察與地方官員的態度。一九四五年後一項普遍流行的說法認為，是因為德國施壓與資源缺乏才使得種族滅絕擴大到歐洲其他地區，然而這並非故事的全貌。歐洲其實普遍存在著反猶太主義，儘管形式各異，但都對流放猶太人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絕大多數地區雖然不像羅馬尼亞與克羅埃西亞那樣自發性地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但幾乎也都不需要德國積極施壓就願意配合。從這個觀點來看，猶太人遭到迫害是整個歐洲的現象，而非完全局限於德國。希特勒的德國之所以重要，在於為其他國家提供了解決自身「猶太人問題」的機會。這些國家只要願意點個頭，就能將國內的猶太人交給德國進行獻祭。為了讓其他國家瞭解機會難得，艾希曼的蓋世太保猶太人事務局、德國外交部與親衛隊都派代表到占領地區與盟邦進行種族滅絕外交，儘管並不是每一次都能獲得對方同意。

猶太人在歐洲其他地區遭受的攻擊同樣也沒有一套標準模式，而是

依照各地狀況、政治算計與社會上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而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反猶太主義的形式也不盡相同：有些地方是基於種族偏見，或擔心猶太人有損國家認同；有些地方存在著強烈的宗教元素，好比基督徒指責猶太人是「殺害基督的凶手」；有些地方則存在著強烈的經濟動機，想剝奪猶太人的財富來滿足國家需要；有些地方則以上皆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斯洛伐克、匈牙利與羅馬尼亞。這三個軸心國成員並不需要引進德國的反猶太主義，只需要發展本國固有的偏見與歧視，就能推動對猶太人的驅逐與迫害，尤其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對猶太人的敵視已有數十年歷史。而在被占領的西歐國家裡，猶太人即將遭到流放的傳言被用來說服猶太社群與當局合作，但這種傳言反而也讓德國僱用的地方警察與官員對於參與種族滅絕興趣缺缺。無論每個地區抱持的動機與存在的狀況有何不同，許多歐洲人都同意「猶太人問題」確實存在，而他們也需要對這個問題做出回應。

一九三八年初，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King Carol）的獨裁政權通過了嚴酷的反猶太人法案，該法不僅剝奪了二十二萬五千名猶太人的公民身分，關閉猶太人報社，也解僱了猶太人公務員。之後在安東尼斯古元帥執政下，反猶太人的立法行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三年。羅馬尼亞的法西斯分子隨機對猶太人施暴與損毀猶太人的財產，但巴巴羅薩作戰的到來與羅馬尼亞收復布科維納與比薩拉比亞兩地，才是羅馬尼亞猶太人真正危機的開始。布科維納與比薩拉比亞居住著八十萬名猶太人，但根據羅馬尼亞的住居法，這些猶太人幾乎都將淪為「無國籍」之人。<sup>354</sup>軍方、當地的羅馬尼亞農民與德裔居民都指責數量龐大的猶太社群在背後支持蘇聯占領，一九四一年七月與八月掀起的一波屠殺與反猶暴亂殺死的猶太人，數量可能多達六萬人。親衛隊的特別行動隊D隊也參與這場屠殺，然而最主要的行凶者卻是羅馬尼亞人。安東尼斯古公然提倡種



族清洗政策（不僅包括猶太人，也包括羅姆人、匈牙利人與俄羅斯人），他下令流放剩餘的猶太人，把大約十四萬七千名猶太人安置在聶斯特河沿岸，這些猶太人居住在臨時搭建的骯髒營區裡，財產被剝奪，又餓又病，若逃離還要面臨死刑懲罰，於是最後都成為屠殺的受害者。在這些流放者當中總計超過十萬人死亡或被殺。由於聶斯特河沿岸是大羅馬尼亞的核心，因此蘇聯猶太人也成為被迫害的對象，他們要不是被殺，就是待在同樣的簡陋營房裡苟延殘喘，估計約有十三萬到十七萬人因此死亡。<sup>355</sup>一九四二年夏天，出於不明原因，安東尼斯古政權的流放政策出現大幅轉彎。當德國要求把羅馬尼亞其他地區的猶太人送到波蘭的滅絕營時，卻遭到安東尼斯古拒絕。事實上，羅馬尼亞先前已經與親衛隊代表里希特（Gustav Richter）達成協議，而且也擬定了流放計畫，但到了九月底這項計畫卻遭到擱置。有人認為安東尼斯古是在國際壓力下拒絕了德國，但最好的解釋應該是德國的要求侵犯了羅馬尼亞的主權。九月時，羅馬尼亞自由黨領袖在演說中指出，如果安東尼斯古向德國低頭，等於「打了羅馬尼亞一巴掌」。當安東尼斯古政權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把聶斯特河沿岸交給德軍時，卻選擇把剩下的一萬零七百名猶太人遣返回羅馬尼亞，而沒有一併滅絕（儘管當時營區裡的絕大多數猶太人早已死亡）。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即使羅馬尼亞採取的行動導致超過二十五萬名猶太人因為疏於照顧、疾病與屠殺而死亡，卻不表示德國可以無止境地要求羅馬尼亞殘殺所有猶太人。<sup>356</sup>

相較之下，斯洛伐克較為順從。一九三九年三月之後，斯洛伐克就受到德國非正式的「保護」，這個新國家雖然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口是猶太人，卻被激進的反猶太主義者把持：斯洛伐克人對於占少數的猶太人極為痛恨，因為猶太人壟斷了斯洛伐克的商業與銀行業。猶太人一向維持著自己的民族認同，加上他們說德語、匈牙利語或意第緒語，卻偏偏

不說斯洛伐克語，更是讓斯洛伐克人怒不可遏。一九三九年，斯洛伐克開始認真討論「猶太人問題」，但起初目的主要是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到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猶太公司行號關門或被非猶太人（包括德國人）接管。斯洛伐克國會在一九四〇年通過一項法令，要求在一年之內解決猶太人問題。一年後，《猶太人法規》（Jewish Codex）獲得通過，嚴格限制猶太人的生活。斯洛伐克的蒂索（Jozef Tiso）政府曾詢問親衛隊代表威斯里切尼（Dieter Wisliceny），德國是否願意帶走陷入貧困的猶太人，讓斯洛伐克免除照顧這群猶太人的成本與責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通過的斯洛伐克憲法，使流放猶太人獲得法源依據。斯洛伐克因此與德國達成協議，斯洛伐克每交付一名流放者給德國，就要支付德國五百馬克做為「安全費用」，總計有五萬八千名流放者被送上斯洛伐克火車運往監禁營，再由親衛隊將流放者從監禁營運往滅絕營。適合勞動或獲得特殊豁免的猶太人可以留在斯洛伐克，但當一九四四年八月德國占領斯洛伐克之後，又遣送了一萬三千五百名猶太人到奧許維茲—比克瑙，他們是最後一批被殺的猶太人。被流放者的財產被國家沒收，分配給斯洛伐克的學校等機構。八萬九千名斯洛伐克猶太人只有九千人倖存，他們有些被朋友藏匿起來，有些假冒成斯洛伐克人，有些逃到匈牙利，並且在匈牙利政權的敵視下撐過了戰爭的前幾年。<sup>357</sup>

相較於斯洛伐克與羅馬尼亞，匈牙利社會反猶太人的程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該國在戰間期的反猶太主義風潮甚至比德國更為狂熱。匈牙利對猶太人的憎恨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特別是猶太人在商業與專業領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初，匈牙利就已經針對猶太人從事商業與專業領域的人數進行限制。政府在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分別制定了第一次與第二次《猶太人法》，限制猶太人從事專業

領域與不准猶太人擔任公職。一九四〇年陸續制定法規，剝奪猶太人的財產並且利用其財產進行土地重分配，數千名猶太人也喪失了從事商業的權利。一九四〇年代初，反猶太主義政治人物與經濟學家開始認真討論如何強制遷徙匈牙利境內的八十三萬五千名猶太人。一九四〇年，匈牙利首相帕爾（Pál Teleki）拜會希特勒，他認為應該針對「猶太人問題」提出一個能施行於全歐洲的解決方案，然而就連當時的希特勒也不認為這個想法可行。一九四一年七月，德國占領加利西亞，大約一萬四千名失去國籍的猶太人與難民被迫跨越邊界，德國安全部隊於是在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Kamianets-Podilsky）這座城市殺光了這些猶太人，這是巴巴羅薩作戰頭幾個星期規模最大的一場屠殺。<sup>358</sup>在匈牙利，猶太人被成群趕進猶太區，能夠勞動的男性則送進勞動營。德國要求匈牙利將猶太人送進波蘭集中營，卻遭到匈牙利攝政海軍中將霍爾蒂（海軍中將的軍階是在奧匈帝國時期取得）與他的保守派圈子拒絕，直到德軍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占領匈牙利及霍爾蒂下臺後，德國才得以順利處理匈牙利猶太人。阻力消失之後，艾希曼與一同前往匈牙利的六十名德國官員驚訝地發現，匈牙利人很快就完成境內猶太人的登記工作，而且馬上就將大量猶太人送進猶太區或流放到德國集中營，由於匈牙利交出的猶太人實在太多，德國的屠殺機構差點陷入癱瘓。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德國占領匈牙利才兩個月，匈牙利就開始進行流放工作，短短八個星期就送出四十三萬人，其中四分之三隨即在奧許維茲遭到殺害。匈牙利雖然流放了近五十萬人，但該國保守派菁英仍努力保護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加上匈牙利武裝部隊也需要猶太工人，因此使匈牙利猶太人逃過全數遭到殺害的命運。大約有十二萬人在流放的威脅下倖免於難。<sup>359</sup>

軸心國陣營出現了兩個例外，分別是保加利亞與義大利（直到一九

四三年九月德國占領了三分之二的義大利半島，情勢才出現變化）。保加利亞與義大利當然都存在著反猶太主義，但與匈牙利的霍爾蒂一樣，保加利亞與義大利內部也存在著反對讓德國予取予求的聲音。在保加利亞，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制定了《國防法》這項重要的反猶太人法律，但該法其實是在保加利亞菁英針對法律正當性進行激烈辯論後才得以通過。一九四一年，保加利亞開始實施剝奪猶太人財富的措施，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與柏林的親衛隊帝國保安總部討論之後，保加利亞決定實施更激進的猶太人政策，內閣授權設立猶太人事務專員部，流放首都索非亞的猶太人，沒收猶太人財產，建立比德國更全面的「猶太人」定義。正當流放保加利亞猶太人的各項工作都已經準備就緒，保加利亞政府成員卻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表示反對，他們就像羅馬尼亞政權一樣，認為不應該由德國決定保加利亞猶太人的命運。同年三月，保加利亞開始把一九四一年占領地區（包括希臘的色雷斯與南斯拉夫的東馬其頓）的猶太人送進德國集中營，但保加利亞沙皇鮑里斯（Tsar Boris）卻不願聽命於德國，於是在當年三月批准延後保加利亞猶太人的流放工作，更在國內外壓力下於五月終止這項他自始至終都不贊同的流放計畫。在保加利亞南方，德國軍政府與親衛隊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開始流放希臘猶太人，德方人員在希臘幾乎未遭遇任何阻攔，六萬名猶太人最終都進了奧許維茲。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天，親衛隊帝國保安總部終於停止對保加利亞政府繼續施壓。儘管保加利亞曾經通過嚴峻的歧視性法律，但依然有五萬一千名猶太人倖存到了戰後。<sup>360</sup>

義大利的帝國主義者對於「猶太人問題」的態度也與這幾個國家類似。在義大利國內掀起反猶太主義浪潮的，主要是少數的法西斯主義分子，而義大利政府其實並不喜歡德國對於義大利該如何對待猶太人指手畫腳。義大利於一九三八年通過一連串猶太人法律，其背後力量主要來



自於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施壓，而非仿效德國，而這些法律的內容也與其他歐洲國家大致相同，主要是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限制猶太人從事專業領域的工作，以及建立強制勞動制度。墨索里尼雖然想設立集中營，卻無法獲得國內支持。一九四二年，墨索里尼批准在義大利六個主要城市設立「猶太人問題研究中心」，負責向民眾宣傳「猶太人問題」的急迫性，鼓吹民眾支持政府以更激進的方式對付猶太人，然而沒有獲得積極回應。直到義大利投降與德國占領義大利之後，政策才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變。<sup>361</sup>即使在義大利的占領區，地方軍事將領與義大利政府官員都反對聽從德國指示交出猶太人與猶太難民，其中一名官員評論道：「理由很明顯，不管是基於政治威望還是人道立場，我們都不可能交人。」一九四二年十月，德國外交部一名猶太人專家遺憾地表示，在最後解決方案上軸心國「無法團結一致」。<sup>362</sup>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德軍占領義大利本土及其剩餘帝國之後，局勢才起了重大變化。一九四三年十月，德國安全警察與蓋世太保開始在羅馬搜捕義大利猶太人，一個月後，搜捕的範圍往北擴大，與在法國一樣，搜捕的對象首先以剛遷徙到義大利的猶太人為目標。德國在義大利扶植了傀儡政權薩羅政府（Salò government），新任內政部長貴迪（Guido Guidi）於十一月三十日下令地方警察逮捕與監禁所有猶太人，不過絕大多數的逮捕行動仍由德國人執行。德國在佛索里（Fossoli）設立集中營，之後又在波隆那設立流放拘留中心。薩羅政權登記了三萬兩千八百零二名猶太人，但最終只有六千八百零六人被流放，三百二十二人死於義大利，九百五十人直到戰後仍下落不明。<sup>363</sup>對德國的種族滅絕機構來說，這個結果實在令人失望，但卻符合他們對義大利的看法：一個不可靠的盟友。義大利對猶太人的追蹤與逮捕取決於地方人士是否主動配合，並未有更具系統性的政策。許多猶太人逃往瑞士，也許人數多達六千人，可能成功抵達同盟國

前線；另外也許有數千人躲在天主教機構尋求庇護，還有一些人可能外表沒有明顯的猶太人特徵，因此得以混入一般民眾。義大利民眾一旦被查到窩藏猶太人，很可能要在牢裡關上幾天，但一般而言不會像東方占領地那樣遭到槍斃或絞刑。<sup>364</sup>

西歐與斯堪地那維亞占領區的猶太人，他們的命運同樣因地而異，但相較於軸心國盟邦，德國當局在這兩個地區可以更直接地進行管理與推動猶太人政策。儘管如此，要登記、辨識乃至於逮捕與流放猶太人，在很多方面仍須仰賴非德國人的合作，而各個地區的配合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比利時，當地警察逮捕的猶太人只占德國安全警察逮捕的猶太人的百分之十七，荷蘭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四，但在法國，地方警察逮捕與流放的猶太人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一——不過隨著盟軍解放的可能性日漸增加，地方警察配合的意願也愈來愈低。<sup>365</sup>各占領區之間要說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各占領區原本在一九四二年仍普遍願意與德國合作搜捕猶太人，而當時被流放的猶太人絕大多數因此都來自西方。等到德國戰事已明顯出現危機時，各占領區的配合度也普遍開始下降。在法國，「猶太人問題」早已存在，但民族主義右派的政治煽動卻進一步激化這個問題。隨著戰爭逐漸逼近，民眾開始肆無忌憚地表現出反猶太主義。一九三八年捷克危機爆發時，有些法國人喊出了這樣的口號：「和平！和平！法國人不想為猶太人打仗……。」法國從一九三九年開始限制猶太難民從事專業領域的工作，也於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間建造許多集中營，將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等被定義為無國籍的猶太難民關押進去。法國的集中營與德國的集中營差異不大，不僅同樣疏於提供飲食或適當的居住條件，被監禁者也要從事嚴酷的勞動。一九四〇年九月，糧食配給是一天三百五十公克的麵包與一百二十五公克的肉。更常見的情況是完全沒有供應食物。在居爾斯（Gurs）集中營，被

監禁者每天只能在攝取八百大卡的狀況下掙扎求生。許多人因為生病與營養不良而死。該集中營在一九四〇年春天關押有五千名猶太難民，其關押人數在一九四一年二月達到巔峰的四萬人。<sup>366</sup>這些集中營不是在德國指示下設立，幾乎是由維琪法國當局自己管理。一九四三年六月，位於巴黎市郊的德朗西（Drancy）集中營被德國人接管做為流放中心使用，這是唯一一座被德國人接管的法國集中營。

維琪法國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成立之後，推動了一波反猶太主義立法。一九四〇年七月，德國大使在與維琪法國總理拉瓦爾會談之後向柏林回報：「法國人的反猶太傾向非常強大，根本不需要我們從旁推動。」<sup>367</sup>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法國公布了一部內容十分全面的猶太人律法，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與從事其他專業領域工作，規定凡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這四人中有兩人是猶太人，就符合「猶太人」的定義，相較之下德國則是規定三人。猶太移民如果是在一九二七年後才歸化法國，其法國公民身分將遭到撤銷，而且還會遭到逮捕及送進集中營。當德國計畫以受託管理的方式接管猶太人企業時，維琪政權反而早一步制定法律，允許政府先行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到了一九四二年，已有四萬兩千兩百二十七名法國人受託管理猶太人的財產，德國人卻只有四十五名。<sup>368</sup>維琪政府曾經下令對所有的猶太人進行人口普查，等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維琪法國被德國軍事占領時，這些人口普查資料便成了蓋世太保圍捕猶太人的利器。曾有人提出一些例證，試圖證明維琪政權搶在德國人之前取得猶太人財產是為了避免更糟糕的結果，然而這些證據根本不具說服力。法國採取的許多措施其實並不是出於德國要求，而是法國自己的決定，包括一九四二年六月在猶太人身上標記黃星，在猶太人的身分證與糧票上蓋上「juif」戳記（法文的猶太人），或者是設立待遇嚴酷的監禁營，大約有三千名猶太人在法國人監管下死亡。<sup>369</sup>德國

在占領區發動的第一波逮捕行動始於一九四一年五月，當時猶太人被安置在另外四座集中營裡，其中有三座是由法國人管理。當德國開始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將猶太人流放到波蘭集中營時，艾希曼派駐法國的副手丹內克（Theodor Dannecker）堅持，最低限度必須流放那些喪失法國國籍的猶太難民與猶太人。維琪政權採取相當合作的態度，從法國南部地區送走了約一萬一千名非法國籍的猶太人，其中有四千五百人來自猶太監禁營。一九四二年，法國流放了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名猶太人，隔年是一萬七千零六十九人，一九四四年則是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三人，遠遠達不到一九四二年艾希曼與丹內克要求的十萬人。這當中有百分之六十八是外籍猶太人，百分之三十二是法國猶太人。<sup>370</sup>維琪政權並不支持猶太人大屠殺，但法國警察與官員對於猶太人的苛刻對待與搜捕，卻讓尾隨而來的德國人便於屠殺的進行。

猶太社群在比利時與荷蘭的經歷有很大的不同。在比利時，百分之九十五的猶太人沒有比利時國籍，人數大約是七萬五千人。儘管外國身分使他們不容易得到保護，但其中只有兩萬九千九百零六人被比利時政府流放，主要發生於一九四二年，其他數千人要不是被比利時民眾藏匿，就是成功逃脫逮捕。荷蘭的情況剛好相反，荷蘭有大量長久定居的猶太人口，總數大約十八萬五千人，其中超過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十四萬人，被流放到集中營，絕大多數遭到屠殺。許多猶太人被荷蘭民眾藏匿在家中，至少有一萬六千一百人存活下來，但也有一些荷蘭民眾不反對德國解決「猶太人問題」，因此有更多猶太人遭到察覺與告發，被荷蘭與德國警察帶走。一九四一年一月，帝國總督英夸特要求對所有猶太人進行人口登記，荷蘭的官員與猶太社群於是依照指示進行，當時幾乎未曾遭到任何反對，因為沒有人能預料到德國取得登記資料的用意。荷蘭警察採取相當合作的態度，因為荷蘭官方的立場是不要與德國產生



不必要的衝突，而荷蘭警察只是把猶太人交給德國警察，過程中並未採取正式逮捕的方式。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一九四三年七月的高峰期，荷蘭警察負責集合小鎮與村落所有的猶太人，再將他們送走以進行流放。荷蘭後來也跟法國一樣，由於預期德國即將戰敗與解放將至，荷蘭警察也開始採取消極合作的方式，但此時荷蘭境內的十四萬名猶太人絕大多數已經遭到屠殺。在比利時的猶太社群人數較少，在社交上也較為邊緣，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較高比例的比利時猶太人得以倖存。即使是極右派政黨，反猶太主義也不是他們的主要議題，特別是與荷蘭或法國相比時。在流放高峰期的一九四二年十月，比利時大約有兩萬名猶太人被非猶太人庇護。比利時官員進行猶太人口登記時不像荷蘭人做得那麼詳盡，比利時的大量猶太移民也善於規避法令。儘管如此，比利時官員與警察在搜查猶太人時仍盡可能與德國合作，一旦德國人開始搶奪猶太人的財物，比利時人也跟法國人或荷蘭人一樣，面無愧色地接收猶太人的土地與財產。

只有兩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幾乎保住了境內所有猶太人的性命，那就是丹麥與芬蘭。德國原本並未施壓丹麥政府交出人數不多的丹麥猶太人。但德國政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丹麥政府總辭之後出現了改變。由於丹麥社會開始出現罷工與抗議熱潮，希特勒與李賓特洛甫便認為是猶太人在背後搞鬼，於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要求駐丹麥全權代表貝斯特流放所有的丹麥猶太人。貝斯特認為流放可能會激化丹麥社會，造成更嚴重的抗爭，因此貝斯特與德國警察皆是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丹麥很快就有人展開救援行動，用船隻將猶太人送往瑞典。<sup>371</sup>芬蘭的猶太社群人數只有兩千兩百人左右，他們在國內並未受到反猶太主義的威脅，芬蘭政府也未遭受遣送猶太人的壓力，整個戰爭期間只有八名猶太難民被送回德國。一九四四年，由於擔心德國可能占領芬蘭以阻止芬

蘭退出戰爭，於是開始出現將芬蘭猶太人送到瑞典的計畫。一九四四年夏天，芬蘭已將部分猶太孩童與母親送至瑞典，但芬蘭政府不太願意讓猶太人全都離開，擔心這麼做可能讓同盟國誤以為芬蘭同意參與大規模種族滅絕。最終，德國安全與警察部隊因人數太少而無法進行干預，芬蘭猶太人才得以倖存到芬蘭軍隊向紅軍投降之時。芬蘭猶太人是相當幸運的一群，因為德國即使面臨戰敗，依然持續加緊對殘存猶太人的迫害，而芬蘭猶太人卻逃過一劫。<sup>372</sup>據說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即將自殺的希特勒仍不改初衷地表示：「納粹主義可以堂堂正正地接受民眾永遠的感謝，因為我們消滅了德國與中歐所有的猶太人。」<sup>373</sup>

※ ※ ※

這是一段淒涼與冷酷的歷史。德國想建立一個「沒有猶太人」的歐洲，而歐洲其他國家也甘願與之配合，而這一切都關乎希特勒在東方建立德意志帝國的美夢。猶太人之所以遭到屠殺，原因就在於希特勒（也包括希姆萊或艾希曼等人）無法接受有數百萬猶太人居住在自己統治的東方領土型帝國，或是更加遼闊的「大空間」德意志帝國。德國想建立一套以德國為中心的帝國秩序，而猶太人則是這套帝國秩序的障礙，是德國統治世界的大敵。當時所有打造新秩序的野心，都公開表露於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三國同盟條約》。這些野心最後均以失敗告終，但在失敗與崩潰之前，這些殘暴的帝國建立者依舊在極為短暫的時間內在整個歐亞大陸進行了大規模流放、掠奪與屠殺計畫。相較於其他人類在二戰之前建立的帝國，雖然也具有種族滅絕的面向，但其傳布往往費時數十年或數百年之久。這些新帝國在建立的過程中，顯然沒有必要殺害那麼多人命，但這一帝國幻想與帝國現實之間的永恆拉扯，卻迸發出無止境

的暴力，使帝國從想像的烏托邦淪為一場充滿挫折、懲罰與毀滅的反烏托邦惡夢。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巴巴羅薩作戰開始，一群疲倦的德軍士兵在蘇聯烏克蘭某處的道路兩旁休息。絕大多數德軍是靠步行或騎自行車穿越蘇聯的鄉野地區。圖源：World of Triss/Alamy

---

[1] 編注：伊斯蘭教遜尼派的最高神職人員，負責管理聖地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該職位最早是由英國託管當局於一戰後設立。

[2] 編注：穆斯林宗教領袖或導師之意。

[3] 編注：原本的第二裝甲兵團，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升格成裝甲軍團。

[4] 編注：這是歐洲人發明來指涉南非原住民的貶抑詞彙。



CHAPTER 3

第三章

民族帝國的終結

(1943-1945年)

「.....如果我們贏了，那麼就是東西方皆贏，如果我們輸了，那麼就是東西方皆輸。」

—— 大島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sup>1</sup>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日本駐柏林大使大島浩召開會議，他在會上對其他日本駐歐洲大使提出他對當前戰局的看法。就在他發表演說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三大戰場正進行著三場重要會戰：在俄國南部的史達林格勒，德軍與蘇軍為了爭奪這座城市打得難分難解；在英屬所羅門群島的瓜達康納爾島，人數居於劣勢的日軍為了守住日本最前沿的陣地而與美國海軍陸戰隊進行血戰；在利比亞北部，大英帝國陸軍沿著北非海岸追擊第二次艾拉敏會戰後倉皇敗退的德義聯軍。大島浩向其他大使表示，此時正是日本、義大利與德國共同協調戰略計畫的時候，他希望日本接下來能進攻印度，與德軍在中東會師。他在幾個月前就已經得出結論，認為「德國實際上不可能推翻史達林政權」，他也是少數仍希望德國與蘇聯談和的日本資深外交官。大島浩主張德蘇可以透過日本居間協調，讓德義日蘇四國簽訂涵蓋更廣泛的《四國同盟條約》，如此才能傾歐亞大陸之力對抗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日本一直存在幻想，以為有利的和平協議就可以結束侵略戰爭。一九四三年春，日本代表團抵達柏林，試圖說服希特勒放棄蘇聯戰役，轉而推動地中海戰略以消滅英美在地中海的勢力。幾個星期後，日本軍方與政府高層在東京開會，認為德蘇停戰是整場戰爭的關鍵。只要德蘇談和，西方同盟國在懼怕共產主義入侵下，必然同意歐洲的和平方案。而歐洲若停戰，中國的蔣介石政權將別無選擇，也只能接受和平條件，如此軸心國與同盟國就能達成全面而有利的和平協議。<sup>2</sup>然而，希特勒不會同意停戰（事實上，史達林也不會）。面對日本的各項建議，希特勒

堅持擊敗蘇聯是他的優先選項，也絕不會同意任何停戰條件。一九四三年七月，隨著軸心國的戰爭逐漸陷入危機，希特勒與大島浩私下談話時仍表示，德國與日本可以克服一切困難。<sup>3</sup>

唯有透過後見之明我們才能發現，即使戰爭已經在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來到轉捩點，軸心國領導人仍然是執迷不悟、自欺欺人。當大島浩正在思索軸心國未來的全球戰略時，全球各地的戰事雖然尚未清楚顯示同盟國將獲得最終勝利（勝利還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到來），卻已經能夠看出軸心國已是強弩之末，難以再繼續向前。史達林格勒、瓜達康納爾島與艾拉敏，這三個地方就是軸心國領土擴張的極限。在這三場會戰之後，軸心國雖然仍持續漫長而激烈的戰鬥，但整體情勢已轉變成且戰且退，一步步撤離新取得的領土。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是例外，因為它的崩解遠比德國與日本來得迅速。同盟國為了迫使剩餘的軸心國軍隊撤離征服地區，不惜進行長期戰鬥，這反映出當時人已寧可採取武力對抗也不願選擇政治解決——至於像大島浩這種希望透過和平協商以避免戰敗的人士，也無法說服領導階層放棄既有的對抗路線，因為不繼續作戰就只能選擇投降。這也反映出軸心國高層根本不考慮繼續作戰會對本國民眾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因為他們認為民眾理應支持戰爭直到徹底投降為止，而多數民眾也確實堅持到最後一刻。軸心國民眾明知戰敗已近在眼前，為何還要繼續作戰？又是如何撐到最後？這些問題至今仍然不容易回答。

## 帝國的盡頭：艾拉敏、史達林格勒、瓜達康納爾

一九四二年一整年，軸心國領導人依然自覺勝券在握。到了一九四

二年十一月，當義大利的軍事前景已明顯不樂觀時，墨索里尼仍大言不慚地表示：「所謂的聯合國不過是一連串的失敗與災難。」<sup>4</sup>一九四二年夏天，德國與盟邦的軍隊仍深入俄羅斯與埃及，日軍則試圖確保一九四二年取得的遼闊領土的外緣地帶，同時鞏固對中國領土的控制。這些地區正是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同盟國「失敗與災難」的明證。

對日軍高層來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遼闊的南方地區，不禁使他們做起了繼續征服的美夢。日本聯合艦隊參謀長在日記裡寫道：「接下來要打哪裡？進攻澳洲？印度？還是夏威夷？」海軍參謀人員擬定新的提案，其中包括海軍少將山口多聞的二段作戰計畫：先征服澳洲與紐西蘭，再入侵加州海岸。<sup>5</sup>但在日本做出進一步決定之前，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就發生了美國陸軍中校杜立德（James Doolittle）率領一小群轟炸機從航空母艦起飛、象徵性地空襲東京事件，這起事件迫使日本重新評估戰略。日本決定不對太平洋增派兵力，反而把軍隊調回中國。杜立德的空襲對於提振美軍士氣有絕對的幫助，但如蔣介石擔心的，這件事也促使日軍採取行動，開始對中國境內設有空軍基地的地區發起進攻，讓美國軍機無法使用這些機場。五萬名士兵從杭州與南昌出發，兵分兩路進攻浙江省與江西省，除了建立寬闊的鐵路走廊，也對空軍基地周圍進行掃蕩。這次行動很快就達成目標，日軍因此計畫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十六個師團的兵力對蔣介石的戰時首都重慶進行最後一擊，但這場戰役最終並沒有實施，因為新領土漫長的海島與海岸線也需要大量兵力防守——這是個初期徵兆，顯示在兩線作戰下，日本軍力已經捉襟見肘。<sup>6</sup>杜立德的空襲也促使日本海軍計畫奪取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島，藉此遏止美軍出擊與阻斷夏威夷與澳洲之間的海上聯繫。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擬定了一套複雜的計畫，希望引誘美國航空母艦（當時只剩下企業號、大黃蜂號與最近才修復的約克鎮號等三艘）前來防守中途島，這



樣就能一舉將其殲滅，從而確保日本對太平洋中部的支配。日本海軍除了對中途島派出進攻艦隊與輔助艦隊，還另外派出一支特遣艦隊奪取北方離阿拉斯加不遠的阿留申群島的兩座小島阿圖島與基斯卡島，以做為保護北方邊界的基地。日本出動六艘艦隊航空母艦中的四艘，分別是加賀號、赤城號、飛龍號與蒼龍號，由海軍中將南雲忠一指揮，目標是消滅中途島上的飛機與擊沉前來防守中途島的美國航空母艦。

在這場海戰中，相對弱小的美國航空母艦艦隊必須迎戰日本聯合艦隊主力。這場戰役的美軍指揮官是坐鎮夏威夷的尼米茲海軍上將

（Chester Nimitz）與統率航空母艦的史普勞恩斯海軍少將（Raymond Spruance），而他們獲得一個意想不到的優勢。日本海軍於六月三日抵達中途島附近海域，然而就在幾天前，海軍上校羅希福特（Joseph Rochefort）帶領的夏威夷海軍情報單位成功破解日本海軍電碼，美國因此確認中途島就是日軍目標，而日本航空母艦將從西北方發動攻擊，數量較少的登陸部隊則是從東方入侵。<sup>7</sup>史普勞恩斯與特遣艦隊司令佛萊契海軍少將（Frank Fletcher）把三艘航空母艦部署在南雲忠一艦隊的北方，隨時準備發動攻擊。在確定日本航空母艦的位置之後，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早上七點，美軍飛機升空迎戰。但到了上午十點左右，從航空母艦起飛的魚雷轟炸機與從中途島起飛的中型轟炸機卻一無所獲：美軍派出去的九十四架飛機幾乎全被日軍擊落，卻沒有任何一枚炸彈或魚雷擊中日本航空母艦。

美軍最後的籌碼是五十四架無畏式俯衝轟炸機。由於日本艦艇沒有雷達，因此這些轟炸機只有在向下俯衝時才會被日軍察覺，一名目擊者回憶說，這些飛機就像一道「美麗的銀色瀑布」。總共有十枚炸彈擊中三艘日本航空母艦。此時剛好是日本航空母艦最脆弱的時候，因為甲板上的勤務人員正在幫飛機加油，旁邊還放著等待裝上飛機的炸彈或魚

雷。加賀號在短短幾分鐘內就被大火吞噬，南雲忠一的旗艦赤城號被一枚炸彈擊中，引爆已經裝滿燃油與炸彈的轟炸機，整艘航艦頓時成了煉獄。幾分鐘後，蒼龍號也被擊中，同樣引發大火。雖然美軍的約克鎮號遭到重創，後續也遭日軍魚雷擊中沉沒，但船上剩餘的俯衝轟炸機仍足以在傍晚時分解決掉日本第四艘航艦飛龍號。受過嚴格訓練的日本艦載機飛行員有三分之一在這場戰鬥中喪生。<sup>8</sup>中途島海戰（日本海軍拒絕為這場戰役命名）一直被視為二戰關鍵的轉捩點，然而姑且不論當時帶給人們的巨大震撼與日軍嚴重的傷亡損失，這場戰役的影響其實沒有那麼深遠。接下來的戰爭還很漫長，日本仍擁有數量龐大的水面與水下艦艇，而美國當時只剩下兩艘航空母艦。一九四二年九月，航空母艦薩拉托加號與企業號遭到重創，大黃蜂號被擊沉，黃蜂號（*Wasp*）也於十月被擊沉，美國短暫陷入沒有航空母艦可用的窘境。<sup>9</sup>雖然日本未能攻占中途島，且在此之前又放棄了進攻新幾內亞摩斯比港的軍事行動，然而日本很快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與六月扳回一城，順利占領英屬所羅門群島，進一步往南拓展日本的海疆。日本還計畫在最南端的瓜達康納爾島興建機場，飛機可以從這裡切斷澳洲、美國西部與夏威夷之間的補給線。

正當日本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擴展領土之時，北非的軸心國軍隊也跨越了埃及邊境，來到距離英國重要軍港亞歷山卓只有九十六公里的地方，即將抵達蘇伊士運河。這已經是第三次雙方互有勝負，大英帝國部隊與義大利軍隊交戰，而後者只獲得德國非洲軍三個師的援助，兩軍在昔蘭尼加形成拉鋸與消耗戰。大英帝國曾在一九四一年夏天遭遇慘敗，但此後絕大多數衝突，大英帝國面對軸心國可用的陸空軍都擁有人數上的優勢，而且差距還不小。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為了解除多布魯克之圍，魏菲爾的繼任者奧欽列克將軍（Claude Auchinleck）發起「十字軍

作戰」(Operation Crusader)。大英帝國與德國陷入消耗戰，隆美爾與義大利軍隊最後因為後勤補給問題而放棄圍城，撤退到阿格海拉(El Agheila)，此地剛好是隆美爾這一年來最初用兵的地方，也就是說軸心國軍隊完全退回到原點。隨著後勤補給迅速改善，隆美爾因此得以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對精疲力盡的敵軍展開新的攻勢，這次輪到大英帝國的部隊敗退到加查拉防線(Ain el Gazala)，此地就位在剛解圍的多布魯克西邊。義大利參謀總長卡伐里羅將軍(Ugo Cavallero)、隆美爾與德國南方戰區總司令凱賽林空軍元帥共同擬定了「威尼斯作戰」(Operation Venezia)，目標是重新攻占多布魯克與繼續推進到埃及邊界。五月二十六日，一向把義大利將領視為下屬而非盟友的隆美爾下令進攻加查拉防線。軸心國把九萬名士兵組織成三個德國師，分別是第十五、第二十一裝甲師與第九十輕快師(唯一參與過幾乎所有北非戰役的德國部隊)與六個未滿編的義大利師，此外有六百架飛機與五百二十輛戰車支援(其中有兩百二十輛戰車屬於較差的義大利型號)。<sup>10</sup>英國第八軍團在歷經數次換將之後，現在交由里奇中將(Neil Ritchie)指揮，兵力有十萬人，擁有八百四十輛戰車與六百零四架飛機，包括從埃及基地起飛的威靈頓式中型轟炸機。英軍在加查拉防線後方進行防禦，並且在前方埋設大量地雷，防線南方還有比爾哈凱姆要塞(Bir Hacheim)，駐紮了自由法國的部隊。光從帳面數字來看，里奇的軍力對於剛結束一場奮戰的軸心國軍隊來說實在過於強大。<sup>11</sup>

軸心國在這種狀況下發動攻擊，就必須承擔極高的風險與代價。但此時的英軍就跟前幾次會戰一樣充分暴露出缺乏效率的問題——零散派出部隊，步兵缺乏裝甲部隊保護，各部隊無法有效協同作戰，這一切都讓隆美爾掌握了先機。比爾哈凱姆要塞在經過一番苦戰後陷落，隆美爾接著轉向北攻擊四散的英國裝甲部隊，這場激烈的戰車戰最後以同盟

國軍隊幾乎完全被殲滅收場。第八軍團投入一千一百四十二輛戰車，被擊毀一千零九輛。到了六月十三日，原本龐大的裝甲部隊僅剩七十輛戰車可用。<sup>12</sup>第八軍團倉皇撤退到位於埃及邊界的梅爾沙馬特魯，但這次隆美爾只花了一天的時間（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就攻進多布魯克，不僅奪取了石油與糧食等重要補給，也俘虜了三萬三千名英國、南非與印度士兵，還包括六名將領。雖然隆美爾的部隊已經精疲力盡，且戰車數量到了六月底也減少到只剩一百輛（四十輛是義大利戰車），但隆美爾仍然持續追擊第八軍團並且深入埃及境內，直到英國在鐵路小站艾拉敏與難以穿越的夸塔拉窪地之間設置的長六十五公里防線為止。六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率領大批侍從飛往利比亞，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以凱旋之姿進入開羅。邱吉爾在白宮與羅斯福開會時，突然得知多布魯克失守的消息，臉上的震驚顯而易見。英美於是開始協商解決方案，包括美國提供戰車與飛機，或甚至立刻派出第二裝甲師（但羅斯福反對），或讓美國軍力涵蓋從埃及到德黑蘭這一整塊地區（邱吉爾反對，他不希望美國勢力進入這個關鍵帝國地區）。美國駐開羅大使柯克（Alex Kirk）私下報告說，「英國的無能」源自於「戰略失誤與做事拖泥帶水」，英國的奧欽列克將軍也在向倫敦當局報告時坦承：「我們的軍人絕大多數都是業餘人士，而我們對抗的是一支專業軍隊。」<sup>13</sup>邱吉爾明確表示，多布魯克失守表示一九四二年要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七月三日，他沮喪地向蘇聯駐倫敦大使麥斯基表示：「德國人比我們會打仗.....但我們又沒有『俄羅斯人寧死不屈的精神』。」<sup>14</sup>

俄羅斯人的精神除了展現在一九四一年艱苦的冬季防禦戰，當德國於一九四二年夏秋想進一步征服蘇聯遼闊的領土時，依然再次受到俄羅斯人堅定戰鬥意志的阻撓。希特勒無法在一九四一年殲滅紅軍，於是希望一九四二年能完成這項任務。然而，曾經在前一年延宕整個戰局的戰



略爭論，此時卻捲土重來。陸軍總部依然認為奪取莫斯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希特勒則認為應該停止進攻莫斯科，將兵力調往南方攻打窩瓦河流域與高加索地區，而這個想法在現實上似乎也得到支持，那就是往南進攻可以跟即將攻打蘇伊士運河與中東油田的隆美爾會師。批評者認為這是個「過於理想的攻勢計畫」，但希特勒明確表示，專家與將領總是說「這個不可能，那個不會成功」，他決定不理會這些人的說法，因為一個健全的領導人「必須無條件地解決」問題。<sup>15</sup>希特勒在思想上堅信經濟封鎖是現代戰爭的致勝關鍵，放在德蘇戰爭來說，就是要讓紅軍完全得不到重工業與石油的補給。德國情報單位似乎是為了迎合希特勒的判斷，不僅嚴重低估紅軍的潛在實力與蘇聯的工業能力，也無視德軍實力已遭到削弱的問題。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德國陸軍的傷亡已經超過一百萬人，而損失的員額不一定能完全得到補充。除此之外，德軍也缺乏從飛機到輕兵器等大量武器，德國的戰時經濟只能填補其中一小部分。德軍在東線戰場的一百六十二個師之中，只有八個師具備完整的戰鬥能力投入即將到來的戰鬥。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希特勒發布第四十一號訓令，「消滅蘇聯人剩餘的所有防衛潛力」，切斷紅軍的重要補給，然後攻下列寧格勒。這場戰役的代號是「藍色作戰」（Operation Blue）。這是個複雜的計畫，共分成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結束後才能開展下一階段。德軍兵分三路：北路從奧勒爾地區進攻沃羅涅日（Voronezh），中路從哈爾科夫周圍地區往南進攻，南路從克里米亞進攻羅斯托夫。德軍的三個箭頭最後要在頓河的大彎處會師，南面集團軍將在此地一分為二：B集團軍防守從羅斯托夫到史達林格勒這塊地區以保護A集團軍側翼，A集團軍則進攻高加索地區以取得油田。這次作戰還是秉持相同的假定：只要短暫包圍就能困住大量紅軍，使其失去抵抗能力。在這個階段，史達林格勒還不是

首要目標。希特勒其實不想占領史達林格勒，他只是希望讓該市失去功能。切斷窩瓦河通往俄國中部的補給路線才是關鍵，城市本身並不是重點。

希特勒在訓令中要求中央集團軍採取守勢，但史達林卻做出了與希特勒完全相反的結論。與一九四一年底一樣，他認為莫斯科的前線威脅最大，而且推斷德軍在南方留下了相對較少的兵力。因此不僅是希特勒，就連史達林也擬定了過於理想的攻勢計畫。史達林想在冬季會戰的勝利基礎上，沿著一千六百公里的漫長戰線發動一連串攻勢，一舉將德軍趕出蘇聯領土。<sup>16</sup>蘇聯情報單位誤以為南方是德軍防線最弱的地方，史達林因此決定從南方發動攻勢，首先收復哈爾科夫，這裡是烏克蘭的鐵路樞紐，德軍必須藉由此地進行運輸，其次要收復克里米亞。蘇軍於五月十二日發動進攻，提摩盛科元帥以兩個方面軍的兵力朝哈爾科夫及其後方推進。此時的蘇軍無論是組織還是裝甲程度都遠較一九四一年為優，德軍防線曾一度出現鬆動，但提摩盛科的裝甲部隊前進太快，導致後面的步兵未能跟上，德國南面集團軍得以把握機會讓蘇軍掉進包圍圈。這是一場經典的包圍戰，德軍的「弗賴德爾里克斯作戰」

（Operation Fredericus）將蘇聯脆弱的後方部隊切斷，十天之後封住整個包圍圈。到了五月二十八日，紅軍已失去二十四萬名士兵、一千兩百輛戰車與兩千六百門火炮，這場勝利似乎支持了希特勒對藍色作戰的樂觀估計。<sup>17</sup>蘇聯為了收復克里米亞發動的第二波攻勢也遭到擊退，蘇聯第四十四、第四十七與第五十一軍團遭到殲滅，多達十七萬人被俘。六月，曼斯坦奉命在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第四航空軍團的支援下攻取位於黑海的塞凡堡。在德軍狂轟濫炸之後，塞凡堡於七月四日投降，蘇軍超過九萬五千人淪為戰俘，曼斯坦因為這場戰役獲得元帥權杖，不過也因此延誤了主要的作戰行動。<sup>18</sup>

六月二十八日，藍色作戰開始，不到幾天時間，德軍就取得與去年一樣的進展速度，也造成同樣的奇襲效果。即使邱吉爾事前已經告知史達林，英國透過「極機密」攔截到的德軍情報顯示出德軍可能的動向，且六月十九日還有一架德軍飛機墜毀在蘇軍防線後方，從飛機上搜出了德軍的作戰計畫，史達林依然跟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樣，對於德軍故意散布給他的假情報深信不疑。<sup>19</sup>七月九日，德軍攻占沃羅涅日，只不過接下來卻因為側翼遭到猛烈攻擊而毫無進展，北路的德軍因此必須先擊退來自側翼的攻擊，才能轉而往南追擊已經士氣渙散且毫無組織的敵軍。七月二十五日，德軍攻占羅斯托夫，卻發現這座城市以東直到史達林格勒的整個平原地帶完全不見敵人蹤影。經過一九四一年的大包圍之後，紅軍士兵極力避免掉進德軍的新陷阱中，而他們的謹慎也讓德軍無法達成「消滅」紅軍使其無法繼續作戰的目標。由中央集團軍轉任南面集團軍司令的波克元帥抱怨說：「陸軍總部想包圍一個已經不在那裡的敵人。」<sup>20</sup>德國裝甲部隊在頓河大彎處會師，但包圍的敵軍人數卻不如預期，而此時他們離史達林格勒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藍色作戰未能符合進度，也未能實現最大目標，希特勒底下的將領們雖然占領了遼闊的俄羅斯領土，卻發現這些土地大多無人防守，這讓他們感到悲觀。但希特勒卻認為這代表「俄羅斯已經走到了盡頭」，他於七月二十三日發布新訓令，準備進行「布朗許維格作戰」（Operation Braunschweig）。A集團軍由李斯特陸軍元帥指揮，負責執行代號「高山火絨草」（Edelweiss）的任務，目標是掃蕩頓河以南，然後進入高加索地區，接下來兵分三路，一路攻占黑海沿岸，直到巴庫為止，另一路控制高加索地區的隘口，最後一路則占領產油城市格羅茲尼（Grozny）。B集團軍由於希特勒再次剝奪波克的指揮權，因此改由魏克斯一級上將（Maximilian von Weichs）統率。B集團軍的任務是渡過頓河奪取史達林格勒，控制窩瓦

河下游，然後繼續攻占阿斯特拉罕，作戰代號是「蒼鷺」

（Fischreiher）。<sup>21</sup>希特勒的將領們都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矛盾：要占領的領土愈來愈多，但軍隊卻愈來愈少。

紅軍面對蜂擁而來的德軍時，往往陷入強烈恐慌，無論軍官與政委如何恐嚇，他們往往太快拋下重武器、放棄已設置好的防線。七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對軍隊發布停止命令，即第兩百二十七號命令「Ne Shagu Nazard」（一步也不許撤），堅持「蘇聯每一寸領土必須頑強地防守，直到流完最後一滴血為止」。<sup>22</sup>一九四一年出現的恐慌，促使當局成立「督戰隊」，負責揪出所有臨陣脫逃的懦夫與怠忽作戰之人，這些人要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進懲戒營，不過絕大多數還是會被送回原單位。然而這道命令並無法阻止上級授權軍隊撤退，因為史達林也不想重蹈前一年夏天蘇軍大量被俘的覆轍。所以在停止命令之外，史達林也要求各級將領必須避免遭到德軍擅長的鉗形攻勢包抄。

B集團軍朝頓河推進，其漫長的側翼由羅馬尼亞、義大利與匈牙利三個軸心國部隊保護，這幾個國家的兵力在德國施壓下持續擴增：羅馬尼亞達到五個師，匈牙利十個師，義大利五個師。德國裝甲部隊發現這裡的平坦大草原非常適合進行戰車戰，然而卻怎麼也找不著敵軍的蹤影。一名德國士兵提到，「這裡毫無疑問是我見過東方最淒涼、最荒蕪的地區。貧瘠、光禿禿、毫無生命的大草原，看不到灌木叢，連一棵樹也沒有，走了許久也遇不到任何村落。」<sup>23</sup>一旦史達林格勒被保盧斯將軍（Friedrich Paulus）的第六軍團迅速攻下，這裡就將成為德國的新領土。從地圖上看，廣大的新領土十分顯眼。大草原以南的產油城市邁科普在八月初被A集團軍占領，八月二十一日，德國山地師特遣隊在高加索山脈最高峰厄爾布魯士山山頂升起旗幟（這原本是一項值得宣揚的戰果，希特勒卻為此大發雷霆，他認為讓士兵攻頂純粹是浪費時間）。此



時的軸心國在三個戰場都短暫出現最終的勝利曙光。

※ ※ ※

一九四二年夏天是同盟國戰事最低迷的時候。盟軍必須在俄羅斯、北非與亞洲各自奮戰，彼此難以相互聯繫，唯一得到的援助只有美國的《租借法案》。然而在一九四二年時，即使有《租借法案》，幫助也十分有限，因為德國潛艦持續在大西洋進行騷擾，同盟國之間的後勤補給因此大受影響（這場戰役將在第六章討論）。美國的參戰雖然讓同盟國獲得龐大的經濟潛力，而且又在中途島擊敗日本，但短期內仍無法對同盟國的戰局產生太大影響。羅斯福總統不斷向美國民眾與軸心國敵人強調美國軍事生產規模之龐大，但美國民眾想問的是，美國在一九四二年生產的四萬七千八百二十六架飛機與兩萬四千九百九十七輛戰車都到哪裡去了。美國的炸彈直到一九四三年一月才首次落在德國的土地上；美軍地面部隊直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才前往歐陸作戰；太平洋的第一場陸戰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八月，而且只動用一個師。珍珠港事件之前，羅斯福對於美國民眾厭戰的情緒感到焦慮，但珍珠港事件之後，羅斯福擔心的卻是沒有足夠的戰爭來滿足美國民眾。

雖然美國的政軍高層需要顧及大英帝國與蘇聯的危機，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規畫美國的戰略。英國東南亞殖民地失守，結束了魏菲爾將軍短暫指揮美國、澳洲、荷蘭與大英帝國部隊的時期。在太平洋戰場，美軍設立了兩個戰區司令部：分別是由尼米茲海軍上將擔任司令的太平洋戰區司令部，以及由麥克阿瑟將軍擔任司令的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部。澳洲軍隊劃歸美軍的指揮體系，由麥克阿瑟指揮。在英國未能控制亞洲與日本隨時可能入侵的威脅下，澳洲領導人對

於這一決定表示歡迎。直到一九四三年底為止，澳洲軍隊一直是西南太平洋戰區地面部隊的主力。<sup>24</sup>太平洋戰場成為美國獨攬的事務，英國一直要到戰爭末期，也就是一九四五年，才有了參與的機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舉行的阿卡迪亞會議同意歐洲優先的戰略原則，但邱吉爾與參謀人員希望在重返歐洲本土之前，先把重點放在地中海戰場。羅斯福同意後，他們很快擬定了一個代號「體育家作戰」（Operation Gymnast）的計畫，目的是進攻法屬北非以緩和埃及的壓力，但美國軍方高層卻認為這是迂迴地幫助大英帝國，反而更傾向於早點在歐洲北部登陸以緩和蘇聯的壓力。<sup>25</sup>馬歇爾將軍的計畫主任艾森豪准將（Dwight D. Eisenhower）大聲斥責這些「業餘的戰略家」（其實就是說邱吉爾與羅斯福）。艾森豪計畫在歐洲西北部發起軍事行動「大槌作戰」

（Operation Sledgehammer），之後再於一九四三年以四十八個師的兵力發動「圍捕作戰」（Operation Roundup）。這套戰略比較符合美軍奉行的兵力集中原則，而與倫敦當局主張的邊緣戰略相左。羅斯福被告知體育家作戰不可行，邱吉爾也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得知這項意見。<sup>26</sup>

美軍想採取直接攻擊德國的戰略，除了不希望外界留下美國在幫英國打仗的印象，還存在著其他原因。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民眾普遍認為政府面對日本攻擊表現得軟弱無力，此外也對羅斯福在慷慨陳詞之後毫無作為感到失望。孤立主義領袖不再高喊孤立主義，如今普遍支持日本優先的戰略，他們對於介入歐戰仍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一九四二年最初幾個月的民調持續顯示，絕大多數民眾支持美國將心力集中在太平洋地區。<sup>27</sup>馬歇爾希望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能在德國占領的歐洲地區進行第一次登陸作戰，他相信這麼做不僅可以平息批評，也能重獲國內民眾支持。三月，羅斯福告訴邱吉爾，美國想於「今年夏天」在歐洲發動一場戰役。<sup>28</sup>美國也密切關注蘇聯的戰況，擔心德蘇可能停戰才是馬歇爾堅

持在西歐開闢戰場的主因，他希望藉此讓德國從東方調兵回防西線。這份憂慮也促使羅斯福於三月支持大槌作戰的構想。一九四二年六月，莫洛托夫訪問華府，羅斯福向他保證，史達林可以「期待今年形成第二戰場」，但即使是馬歇爾也認為這個承諾給得太早。<sup>29</sup>以羅斯福對於地緣政治現實的認識來說，他對戰略與軍事作戰的理解相對有限。他答應英國人會支持體育家作戰，就像他無條件承諾莫洛托夫會開闢第二戰場一樣，都是出於政治考量，為的是確保英國與蘇聯能繼續作戰下去，而非基於清楚的軍事構想。

馬歇爾的計畫也讓英美同盟產生嚴重的裂痕。英國在利比亞慘敗，更加強了美國反對北非軍事作戰的既有看法。馬歇爾兩度前往倫敦闡述自己的立場，英國高層也只是口頭支持大槌作戰與圍捕作戰，因為他們不希望美國將重心轉移到對日作戰上，但實際上邱吉爾與英國帝國參謀本部私下都對這兩項行動抱持全盤反對的看法。<sup>30</sup>莫洛托夫訪美之後，邱吉爾與帝國參謀總長布羅克將軍也跟著訪問華府，希望讓羅斯福回心轉意。邱吉爾主張，北非行動就是「真正的歐洲第二戰場」，不過同年稍晚他又試圖說服史達林，轟炸德國就是現在所謂的「第二戰場」。<sup>31</sup>羅斯福含糊其詞，只是表示會同時考慮大槌作戰與體育家作戰，但到了七月八日，邱吉爾返回倫敦之後卻以電報表示，英國完全不接受於一九四二年入侵歐洲本土的構想。然而美國可能因此放棄歐洲優先戰略的疑慮並未因此消失。兩天後，馬歇爾告訴羅斯福，如果英國繼續堅持，他會轉而將重心放在太平洋地區，「開始專心對付日本。」<sup>32</sup>邱吉爾私底下痛斥馬歇爾的威脅——「美國人只因為今年沒辦法在法國痛宰敵軍，就想把怒氣轉移到太平洋，在那裡發動戰爭」，但這畢竟是一項可能成真的威脅。<sup>33</sup>馬歇爾除了獲得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的支持，也得到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海軍部長諾克斯（Frank

Knox) 的贊同，他開始遊說羅斯福改變戰略優先對象以適切反映美國利益。然而，對羅斯福而言，大西洋地區的承諾更為重要。七月二十五日，為了結束這場反對英國戰略的紛爭，他終於要求馬歇爾放棄入侵西北歐洲的計畫，要他開始著手準備火炬作戰（Operation Torch，由體育家作戰進展而來），好讓美軍能在一九四二年底之前參戰——最好能夠趕在十一月國會期中選舉之前發動進攻。一九四二年七月，羅斯福唯一一次動用了他身為三軍統帥的權力，以三軍統帥的頭銜簽署命令，迫使他的軍事參謀服從。擬定大槌作戰的艾森豪就認為這個決定是「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日」。<sup>34</sup>美國軍方高層被迫在攸關英國利益的地區進行一場他們不願意進行的戰爭。

英國人認為大槌作戰是一場災難性錯誤，這項看法其實有一定的道理。艾森豪團隊擬定的計畫打算以五到十個師橫渡英吉利海峽，占領瑟堡與柯騰丁半島，並以此為灘頭堡於來年春天發起大規模入侵，然而這項構想完全脫離現實。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英加聯軍發動「銀禧作戰」（Operation Jubilee）入侵第厄普（Dieppe），除了測試當地德軍實力，也試圖分攤蘇聯壓力，然而不到幾個小時英加聯軍就被德國守軍殲滅，同盟國的這項舉動也讓德軍感到不解。但對於美國而言，美國軍方堅持推動大槌作戰，不只是為了將美國的戰略強加在頑固盟友身上（英國對於防守埃及的執念，同樣歐洲實際戰況脫節），也為了支援紅軍。蘇聯高層與馬歇爾一樣感到挫折與沮喪。莫洛托夫把羅斯福的承諾當真，史達林也相信對方的保證。蘇軍高層與美軍一樣，也認為應該採取直接戰略，英國的堅持使美蘇軍方懷疑，英國重視自身長期的帝國利益更甚於打敗德國。

※ ※ ※



「一九四二年是個分水嶺」，邱吉爾的軍事參謀長伊斯美在回憶錄裡寫道：「一開始是個可怕的災難」，但到了末尾，「命運卻完全翻轉過來。」<sup>35</sup>就在同盟國為了戰略優先順序爭論不休時，三場分別改變太平洋、俄羅斯與北非戰略態勢的會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最終反倒使同盟國取得主動權。無論在瓜達康納爾、艾拉敏，還是史達林格勒，這三場戰役都不約而同出現了轉折，值得我們詳細探討。這三場會戰在規模與範圍上有著很大的差異。瓜達康納爾戰役投入的兵力只有幾個師，但艦艇與海軍飛機的數量相當多，而雙方爭奪的不過是一座小島上的機場。若與東線戰場相比，艾拉敏會戰的規模也不大，不過與瓜達康納爾島不同的是，艾拉敏會戰進行了大規模的遠距離空戰與戰車戰。史達林格勒會戰則是範圍涵蓋整個俄羅斯南部的大會戰，參與的兵力多達數十萬，還有多個航空軍團與數千輛戰車。三場會戰的作戰環境也極為不同。瓜達康納爾是一座小島，長一百四十五公里，寬四十公里，島上大部分地區覆蓋著濃密叢林，除了敵人之外，島上還有大量的黃蜂、蠍子、蛇、大鱷魚與水蛭（會從樹上掉到人身上）帶來的危險，更不用說還盛行各種疾病，如瘧疾、登革熱與「恙蟲病」。<sup>36</sup>無論哪一邊的士兵，在瓜達康納爾島上戰鬥或多或少都曾染上疾病。艾拉敏會戰是在不毛的沙漠上進行，離補給基地有數百公里遠（以隆美爾來說，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他的部隊離主要港口的黎波里甚至超過一千四百五十公里），士兵要忍受高溫、蚊蠅的騷擾與沙塵暴。沙塵暴會在一夜之間改變地貌，令人窒息與模糊視線的沙塵使戰爭成了一場捉迷藏，士兵還要面對皮膚潰瘍、痢疾與嚴重脫水的威脅。史達林格勒會戰則發生在整場戰爭最關鍵的幾個星期，戰鬥在一座大型都市圈的廢墟中展開，戰場寬度大約六十五公里，從炎熱的夏天開打，一直持續到苦寒的冬日。痢疾、傷寒與凍傷或許對攻擊方造成較大影響，但在史達林格勒，無論哪

一方的士兵都無法逃過疾病與嚴寒的打擊。這三場會戰雖然有許多不同點，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這三場決定性會戰都不是在幾天內打完，每一場都持續了幾個月，直到戰場已經明確分出勝負才結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英軍撤離所羅門群島首府圖拉吉（Tulagi），日軍也隨之占領所羅門群島。六月，朝鮮工人、日本工程師與大約一千七百名日軍前往所羅門群島的最大島嶼瓜達康納爾，他們要在當地建立一座戰略空軍基地，計畫在八月中完成。這座基地不僅可以對同盟國的運輸補給構成威脅，也能保護位於北方新不列顛島拉布爾的日本海軍基地。日軍預計同盟國至少要到一九四三年才會進行干預，但美國海軍軍令部長金恩海軍上將（Ernest King）卻要求太平洋艦隊必須盡可能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就展開反攻。美軍深知瓜達康納爾島上的小機場可能造成的危險，因此很快就將這座島嶼視為目標，但直到七月一日，尼米茲才授權發起「瞭望臺作戰」（Operation Watchtower）與出動海軍陸戰隊第一師。<sup>37</sup>然而這場大規模兩棲作戰的準備十分匆促且不充分，美軍對當地地形所知甚少，海軍情報單位只能仰賴已經過時的《國家地理雜誌》與少數傳教士訪談稍微勾勒出這座目標島嶼的大致狀況。雖然拍攝了空照圖，但海軍陸戰隊卻是上岸後才拿到照片。<sup>38</sup>麥克阿瑟與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部長官哥姆雷海軍中將（Robert Ghormley）都認為風險太高，要求取消這次行動，但金恩堅持一定要找個地方打擊日本。這場戰役的長度將出乎他們的意料，而美軍的訓練有限，補給又不足。儘管如此，范德格里夫特少將（Alexander Vandegrift）率領的海軍陸戰隊第一師仍從紐西蘭搭乘屠納海軍少將（Richmond Turner）率領的二十一艘運輸艦，在佛萊契海軍中將的特遣艦隊（其中只有一艘可服役的航空母艦）護航下出發。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到七日晚間，七十六艘艦艇在日軍未察覺下抵

達瓜達康納爾島北岸外海，海軍陸戰隊沿著繩梯下到登陸艇，主力約兩萬三千人直接上岸，其他人數較少的分遣隊則分頭攻占圖拉吉與另外兩座小島。護航艦隊靠近島嶼時剛好碰上大雨與濃霧，美軍因此幸運完成突襲任務。但就算日軍察覺美軍登陸，面對如此龐大的兵力也無法採取任何反制措施。朝鮮工人與日本士兵來不及破壞儲備物資與裝備，只能急忙逃進叢林。圖拉吉與其他兩座小島的抵抗較為激烈，但到了八月八日戰鬥便已告一段落。海軍陸戰隊在最初交戰中，首次見識到了日軍如何戰鬥：即使繼續戰鬥已經毫無意義，日本士兵仍拒絕投降。兩座小島上的戰鬥共導致八百八十六人被殺，只有二十三人被俘，這樣的比例將在日後的太平洋戰場上不斷出現。<sup>39</sup>海軍陸戰隊在機場周圍建立了嚴密的防衛圈，並且將機場命名為韓德遜機場，以紀念在中途島陣亡的海軍陸戰隊少校。機場持續受到來自北方日本基地遠程轟炸機的攻擊，迫使佛萊契在兩天後撤離航空母艦，而屠納也跟著撤離珍貴的運輸艦，有些運輸艦又持續了幾天卸載物資的工作，但留下來的軍火彈藥僅能供部隊維持四天。八月八日到九日夜間，停泊在機場北方薩沃島周圍海峽的少數幾艘大型水面艦艇，幾乎遭日軍特遣艦隊全部擊沉。拉布爾的日軍錯估他們面臨的威脅，以為登陸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只有兩千名，然而實際上卻超過兩萬名。日軍有幾個星期的時間一直受到錯誤情報的影響，海軍陸戰隊因此再度幸運逃過一劫。八月十八日，曾經在一九三七年引發盧溝橋事變的一木清直大佐率領兩千人救援部隊在韓德遜機場附近登陸，準備奪回機場。但一木沒有等到部隊全部下船，就率領只有一半數量的士兵進攻海軍陸戰隊陣地。一木的部隊幾乎遭到全殲，身受重傷的一木為了避免被俘，最後自殺身亡。<sup>40</sup>

就在日軍進攻失敗之際，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架飛機也順利在剛完工的韓德遜機場降落。此後，除了偶爾因為日本海軍重砲轟擊導致機場

跑道無法使用或停放的飛機損毀，其他時間「仙人掌航空隊」（Cactus Air Force，仙人掌是瓜達康納爾島的代號）的增援一直給予島上駐軍重要的戰力加成。最重要的是，美軍飛機可以攻擊來往於拉布爾與瓜達康納爾島之間的日軍運輸船。日本大本營這才發現美軍在島上建立的灘頭堡是個巨大威脅，嚴重挑戰日軍在數個月內迅速征服東南亞所樹立的威望。八月二十八日，山本五十六下令進行「加號作戰」（カ號作戰），將原本要運送到中途島的五千六百名士兵改為登陸瓜達康納爾島，日本海軍動用強大的兵力護航，包括南雲忠一剩餘的航空母艦。接下來的東所羅門海戰是一場航空母艦對航空母艦的戰役，南雲在損失了三十三架珍貴的艦載機之後決定脫離戰場，少了軍艦護航的運兵艦無法應對空中攻擊，也被迫掉頭。<sup>41</sup>往後幾個月，數萬名日軍利用夜間接連登岸，十月時有兩萬人，到了戰役結束時達到四萬三千人。然而，當這些日軍面對堅強防禦工事與專業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時，他們的表現卻與當初迅速攫取南方地區的銳不可當截然不同。九月計畫由川口清健少將發動的第二次攻擊，也遭遇與一木清直相同的命運。川口兵分三路，分別從東面、西面與南面進攻機場，然而通信不良導致部隊無法協調行動，前後三天的時間，使用的戰術毫無新意。主要的戰鬥發生在九月十二日，地點在機場南方的一處低矮山脊，這裡很快就被取名為「血腥山脊」。日軍持續朝美軍防線衝鋒，直到川口的軍隊絕大多數都成了一具具堆疊起來急速腐爛的死屍為止。日本士兵因此把瓜達康納爾島稱為「死亡之島」。

九月十八日，日本大本營把瓜達康納爾島列為優先目標，並因此立刻中止進攻重慶與入侵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計畫。百武晴吉中將奉命率領第十七軍消滅美軍灘頭堡，儘管日本海軍持續有效地擊退實力較弱的美國特遣艦隊，而且不斷以艦砲轟擊機場，但日本陸軍面對在小包圍圈裡



集中了重砲與戰車的美軍，卻依然重複之前失敗的進攻模式。十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日軍連續三天的攻擊再度遭到擊退，傷亡慘重。日軍決定再派出一支兩棲部隊，以十一艘運輸艦滿載三萬人，由比叻號與霧島號戰鬥艦組成的大型特遣艦隊護航，預計於十一月十四日抵達。美軍由卡拉漢海軍少將（Daniel Callaghan）率領的小型分遣艦隊順利護送六千名士兵上岸防守韓德遜機場之後，便轉而向北，途中剛好碰上阿部弘毅海軍中將率領的戰鬥艦艦隊，海戰一觸即發。卡拉漢陣亡，阿部的旗艦比叻號受到重創，阿部本人也受傷。第二天，航速緩慢的比叻號在試圖脫離戰場時被美軍飛機擊沉。山本五十六命令近藤信竹海軍中將讓受損的霧島號繼續前進，對韓德遜機場進行砲擊，以掩護運兵艦通過，但霧島號隨即遭遇接替佛萊契的海爾賽海軍中將（William Halsey）部署的兩艘戰鬥艦，其中華盛頓號配備了最新引進的火控雷達。霧島號在首波齊射中遭受重創，並於十一月十五日沉沒。<sup>42</sup>日本運兵艦預測美國空軍兵力已經遭到消滅，因此大膽在白天前進，卻因此陷入困境。美軍轟炸機的突然出現，擊沉了海上的六艘運兵艦，剩下四艘成功抵達岸邊，卻又遭空中與地面砲火摧毀。

到了十一與十二月，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終於能放下重擔，范德格里夫特把防守的責任移交給第十四軍軍長巴區少將（Alexander Patch），巴區統率的兵力達五萬人。到了這個階段，這場戰役幾乎已經結束。剩餘的日軍仍繼續堅守，但東京已經決定放棄爭奪島嶼機場，因為日軍既無法進行可靠的運補，這場戰役損失的艦艇與飛行員數量也已經超過中途島海戰。十二月三十一日，裕仁天皇同意撤退。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日本開始「克號作戰」（ケ號作戰），把還能行走的士兵全部撤離。<sup>43</sup>在夜間護航任務中，總共有一萬零六百四十二人撤離瓜達康納爾島，只留下受傷與虛弱無力的士兵做垂死的一搏。這些撤離的

士兵幾乎沒有食物或適當的補給，每個人骨瘦如柴，幾乎全都染上疾病，許多人再也無法重新回到戰場。長達五個月的戰鬥，日本陸軍（與海軍地面部隊）總計損失了三萬兩千人，絕大多數死於因糧食補給不足而造成的飢餓與疾病；估計有一萬兩千名海軍人員死亡，超過兩千名空勤人員陣亡，包括數百名最有經驗的飛行員。<sup>44</sup>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是這場戰役的主幹，卻只陣亡一千兩百四十二人，這相當於日後整個太平洋戰場傷亡人數的零頭；美國海軍損失四千九百一十一人，海軍航空隊損失四百二十人。<sup>45</sup>對日軍來說，瓜達康納爾戰役是一場災難，為了一座遙遠的機場，竟耗費龐大的軍事資源與損失大量兵力、艦艇與飛機。這種失衡現象顯示日本對於防守新疆界有多麼偏執，而這場戰爭也跟史達林格勒會戰一樣顯示出一個政權最真實的狀況，那就是它的軍力已經達到極限，不可能再往前一步。

艾拉敏防線的長期衝突，與瓜達康納爾島的持續戰鬥發生於同時。這場沙漠戰爭攸關的意義比太平洋戰場更為重大，因為衝突發生的地點雖然是一片不毛之地，然而同盟國此役若能取勝，將使軸心國喪失征服埃及、取得蘇伊士運河與占領中東油田的可能。一九四二年八月，希特勒私下與軍需部長史佩爾討論中東時，雀躍地談起美好前景：「英國人將無助地看著他們的殖民帝國崩潰解體.....到了一九四三年底，我們將在德黑蘭、巴格達與波斯灣搭起帳篷。」<sup>46</sup>邱吉爾把這場即將來臨的衝突稱為「埃及戰役」，並且要求奧欽列克要把埃及當成英格蘭的肯特郡一樣拼死防守。然而，邱吉爾卻對結果感到悲觀。「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幫得了他們」，他對陸軍作戰部長抱怨說：「我懷疑陸軍是否還有拼戰精神。」羅斯福也對結果不抱期望，因為英國陸軍將領「把書本上提到的錯誤都犯了一遍」。<sup>47</sup>英國當局確實嚴肅考慮戰敗的可能，因此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初，埃及大使館職員已經開始焚燒祕密文件，燒焦的

紙張被風吹到了附近街道。而在倫敦，帝國參謀本部也設想了「最糟的狀況」，必要時會把埃及的英國人疏散到蘇丹的上尼羅河地區，並且在敘利亞與巴勒斯坦設置最後防線。<sup>48</sup>

軸心國在加查拉與多布魯克的勝利，使原本已經遠離補給基地的英軍更加雪上加霜。英軍只剩下一萬名精疲力盡的士兵，在這種狀況下要發動一場成功攻勢簡直是癡人說夢。六月底，隆美爾希望能一舉消滅已經遭受重創且士氣低落的英軍，然而非洲軍本身也只剩下五十五輛可用的戰車，義大利裝甲師的戰車也只剩下十五輛。義大利阿里提裝甲師（Ariete Division）只剩八輛戰車與四十門火炮，而且在新攻勢發起的第一天就損失三十六門火炮。<sup>49</sup>至於英國第八軍團方面，連續幾個月的失敗與撤退，早已讓士兵們感到幻滅。審查人員發現士兵信件裡「隨意洩露機密與發表失敗主義言論」的狀況愈來愈多。<sup>50</sup>在艾拉敏防線上，士兵們普遍預期接下來會撤退到尼羅河三角洲。為了化解這項危機，奧欽列克採取了不尋常的做法，他把位於開羅的中東司令部交給副手掌管，自己則親赴前線指揮第八軍團，中東的軍事核心因此陷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奧欽列克努力組織一連串箱型的防禦陣地，這些陣地彼此間隔一段距離，奧欽列克希望透過這些陣地來集中火力遲滯敵人攻擊。七月一日，歷史學家通稱的「第一次艾拉敏會戰」開打，這是長期衝突的第一階段，最終這場戰爭將延續到十一月初。第一次艾拉敏會戰很快就演變成一連串小規模戰鬥，隆美爾試圖突破奧欽列克的箱型陣地，希望像加查拉之役一樣繞到敵軍後方。然而戰場的能見度很差，除了打仗時經常激起的沙塵，此時又剛好颳起了沙塵暴。隆美爾缺少敵方情報，尤其德國過去仰賴從美國駐開羅武官攔截的祕密情報，然而六月之後，對方終於發現情報外洩並且做了防範。隆美爾的裝甲部隊未察覺到戴爾夏恩（Deir el Shein）有一處箱型陣地，結果遭到對方的火力壓制，德軍花

了將近一天的時間才打敗對方，並且擊退防守此地的印度旅。當義軍與德軍第九十輕快師試圖往北突破及朝海邊前進，藉此包圍與切斷英國第八軍團的箱型陣地時，猛烈而集中的砲火阻擋了他們的攻勢，甚至讓軸心國軍隊陷入短暫恐慌而無法繼續前進。德國與義大利的部隊也遭到西部沙漠空軍的無情轟炸，這些飛機密集發動攻擊，甚至一度達到每分鐘都有飛機在敵軍上空的程度。七月二日與三日，隆美爾嚴令部隊再次出擊，但高傷亡率、缺乏燃料與車輛及疲憊不堪，使這場想一路長驅直入攻下尼羅河三角洲與蘇伊士運河的作戰終告失敗。隆美爾也許真的有幸運女神相助，但從非洲軍的狀況來看，這次行動確實是一場賭博。隆美爾於是下令部隊停止攻擊，並且在艾拉敏防線的對面開始挖掘防禦工事。

在獲得增援之後，奧欽列克決定轉守為攻，嘗試主動打擊實力已經遭到削弱的敵軍。他在七月發動四次攻擊，但沒有一次能成功突破敵軍防線。隆美爾初次發動進攻後的一整個月，英國第八軍團也發起反攻，卻折損了一萬三千多人而毫無戰果。八月初，邱吉爾與布羅克將軍在前往蘇聯與史達林開會途中順道視察埃及。邱吉爾對於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憤怒，他認為奧欽列克缺乏魄力，因此將他撤職，任命亞歷山大將軍接替奧欽列克擔任中東司令部司令。八月六日，第八軍團的一名軍長戈特中將（William Gott）被任命為第八軍團司令，結果第二天戈特就在一場空難中喪生。邱吉爾最終被說服任命蒙哥馬利中將（Bernard Montgomery）做為戈特的繼任人選。八月十三日，蒙哥馬利從英國抵達第八軍團司令部。蒙哥馬利有著特殊的名聲，根據他朋友告訴紐西蘭第二師參謀長的說法，大家都覺得蒙哥馬利「是個瘋子」。蒙哥馬利的確在眾人眼中是個古怪且自我中心的傢伙，他總是插手每一道命令。德國檔案對於蒙哥馬利的描述更為貼近事實，認為他是一個「難以對付的



人物」，他會無情地實現自己的目標。<sup>51</sup>蒙哥馬利為了明確表示今後不再有任何關於撤退的討論，於是在抵達之後就告訴全體官兵：「我們將堅守此地進行戰鬥，我們絕不撤退.....如果我們不能活著守住這裡，那我們就死在這裡。」透過「極機密」破解的情報，蒙哥馬利得知軸心國很快就要重新發動攻勢，而他根本沒有時間對部隊重新部署。儘管如此，他一開始的呼籲確實對軍隊造成正面影響。不到一個星期，審查人員就發現「埃及的英國軍隊開始有了振奮人心的全新氣息」。<sup>52</sup>

到了八月底，交戰雙方都已經重整旗鼓。軸心國雖然面臨棘手的後勤問題，但北非軸心國部隊在這段時間還是源源不斷地獲得新的援軍，這點令人印象深刻。儘管如此，各項補給物資在運往北非的路上始終飽受同盟國潛艦與飛機的攔截與攻擊，因此德國與義大利的軍隊在燃料與軍火上還是嚴重缺乏。九月到十月，運往利比亞的石油與車輛大約損失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由於德國必須將空軍投入於俄羅斯前線，而義大利的商船船團數量也持續減少，因此德國沙漠戰略受到的資源限制顯然沒有改善的可能。<sup>53</sup>把燃料運往數百英里的前線，整個運輸過程居然要耗費掉運送燃料的四分之三。攻占多布魯克也無法緩解後勤危機，因為即使在未遭受轟炸的狀況下，多布魯克一個月的貨物吞吐量也只要一萬噸，而軸心國軍隊需要的卻是十萬噸。<sup>54</sup>卡伐里羅與凱賽林都承諾隆美爾會採取緊急措施提供所需的燃料與軍火，但到了隆美爾準備重啟攻勢時，他取得的燃料只足夠支撐八天。軍力的對比則沒那麼悲觀：德軍現在已經有八萬四千人，義軍有四萬四千人，大英帝國的軍隊則有十三萬五千人；德軍戰車有兩百三十四輛，義軍戰車有兩百八十一輛，英軍戰車則有六百九十三輛。<sup>55</sup>空中力量存在巨大的落差，隆美爾離能夠支援他的空軍基地非常遙遠，反觀英國的西部沙漠空軍則能輕鬆飛抵前線與攻擊軸心國的補給線。

隆美爾擬定了一個傳統的德國戰爭計畫。首先從南部雷區穿過同盟國防線，然後轉而朝東北前進，從阿蘭哈法（Alam el Halfa）的平坦山脊切斷盟軍主力，不過同盟國已經在這處山脊設置了火炮與戰防砲。蒙哥馬利主要仰賴奧欽列克的參謀過去擬定的計畫，這項計畫的關鍵在於當軸心國裝甲部隊緩慢而費力地穿過雷區之時，以空軍進行攻擊來削弱其兵力，並且在阿蘭哈法山脊上設置火炮，透過密集彈幕來阻止敵軍前進。英國在這個時候取得了可能改變戰局的新裝備：同盟國裝甲部隊如今裝備了大量的美國格蘭特戰車與雪曼戰車，這兩種戰車遠比英國戰車來得優越，因為它們可以同時使用穿甲彈與高爆彈，前者可以穿透敵方戰車裝甲，後者可以摧毀戰防砲與一般火炮。蒙哥馬利也獲得大量的重型戰防砲，至少可以用來對付現有的德國戰車。蒙哥馬利只對計畫做了一項補充：他堅持要打一場靜態的防守戰，要仰賴火炮與空中力量，避免進行第八軍團不拿手的機動戰。

這場德國與英國的計畫較勁，最後是由英國的計畫勝出。這場會戰原本可能稱為第二次艾拉敏會戰，結果卻以阿蘭哈法山脊命名，這是因為整個交戰過程都局限在阿蘭哈法山脊，而最終德軍也未能攻下山脊。八月三十日晚間，德國裝甲師開始穿越雷區，計畫在天明之後抵達開闊的沙漠地帶。然而英國空軍投下的照明彈照亮了目標，德軍過於集中的兵力與車輛完全暴露在英國空軍無情的猛烈轟炸之下。德軍進展緩慢，消耗的燃料也大量增加，到了早上，隆美爾不得不放棄繞到敵軍後方以鑷割方式截斷敵軍退路的做法，而把攻擊目標局限在阿蘭哈法山脊上。然而他的部隊已被致命的火炮彈幕與隱匿的戰防砲釘住。兩天過去後，隆美爾的部隊毫無進展，幾乎快用盡燃料，還要面對飛機與火炮轟炸，德軍與義軍的士氣都大受影響——一名受害者被連轟七小時後表示：「我這輩子從未遭遇過如此猛烈的砲擊。」<sup>56</sup>到了九月二日，隆美爾被

迫下令軍隊撤回發起線，但義大利摩托化師已經用光燃料，也無運輸車輛，只好放棄三分之二的人員與三分之一的火炮。這是補給與兵力都十分有限的德義軍隊所做的最後一擊。然而，這場攻擊卻不具決定性。隆美爾與義大利將領都知道盟軍將一天比一天強大，因此他們決定埋設四十四萬五千枚地雷，並且在這密集的地雷帶後方建立防線。<sup>57</sup>軸心國曾經期盼英國在戰場上的無能終將奉上中東的戰果，但阿蘭哈法會戰與接下來的第二次艾拉敏會戰一樣，都粉碎了軸心國的美夢。

面對最後一場會戰，蒙哥馬利終於能親自為自己指揮的軍隊擬定計畫。他選擇進行一場會戰，要在一個正面狹窄且後方有防守縱深的地區，這幾乎可以確定是唯一的選擇。蒙哥馬利知道自己部隊的局限：

「我盡可能限制作戰規模，然後投入必要的兵力來取得勝利。」<sup>58</sup>由於英軍過去已暴露出太多弱點，蒙哥馬利因此決定為即將來臨的作戰擬定一個清楚詳細且符合現實的計畫，而他也因此被批評為過於審慎。這份被稱為「輕足作戰」（Operation Lightfoot）的計畫大綱於十月六日完成，四天後，在與各級將領討論後又做了修改。蒙哥馬利雖然是團隊領導人，但他仍希望團隊每一個成員都能對這場戰爭貢獻心力。之前的幾場敗仗充分顯示，在英國將領領導下，要組織一支多民族的帝國部隊有多麼困難。<sup>59</sup>蒙哥馬利花時間彌補各國將領之間的嫌隙。他也瞭解整合陸空攻擊的重要性，因此他與亞瑟·康寧漢空軍少將（Arthur Coningham）的西部沙漠空軍建立起密切關係，讓空軍與陸軍的戰術司令部密切合作。蒙哥馬利也堅持整合裝甲與步兵部隊，他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讓兩個軍種的將領一起相處，共同討論該如何合作。未能為步兵提供適當掩護一直是雙方爭論的焦點。最後，火炮必須集中部署，藉此創造出致命的彈幕，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樣。

為了確保計畫獲得理解與聯合兵種的概念順利實施，蒙哥馬利要求

士兵進行一個月的密集訓練，包括演習時使用實彈與地雷等震撼教育。<sup>60</sup>除了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英軍也取得大量的新裝備，其中絕大多數來自美國，美國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一的戰車，還提供將近半數的飛機給西部沙漠空軍。美國陸軍航空軍在埃及建立了第十航空軍，該航空軍配備了B—24與B—17轟炸機，負責轟炸補給軸心國部隊的利比亞港口與冒險往返地中海的護航艦隊。<sup>61</sup>到了十月中，同盟國的兵力與裝備已逐漸具備壓倒性的優勢：軸心國有十二個未滿編的師共八萬人（四個德國師，八個義大利師），同盟國則有十個師共二十三萬人；軸心國有五百四十八輛戰車（包括兩百八十輛性能較差的義大利戰車，性能最好的德國戰車只有一百二十三輛），同盟國則有一千零六十輛戰車；軸心國有三百五十架飛機，同盟國則有五百三十架飛機，而同盟國在更東邊的基地還有更多可用的飛機。<sup>62</sup>火炮與重要的戰防砲數量則差異較小，但義大利師的火力嚴重不足且缺乏現代火炮。義大利的「雷電」

（Folgore）空降師雖然在最後一場會戰中表現出色，卻幾乎沒有任何重武器可用。<sup>63</sup>

盟軍擬定的艾拉敏計畫，首先以步兵攻擊軸心國北方防線的步兵，主要是義大利人；而裝甲部隊尾隨步兵，用來擊退可能出現的反擊。同盟國想藉由這種方式逐日消耗軸心國的防線使其「崩潰」。蒙哥馬利也堅持實行一項佯攻計畫，他故意擺出盟軍在南方集結大量裝甲部隊的樣子，迫使隆美爾將第二十一裝甲師與義大利阿里提裝甲師固定部署在南方，以因應這個不存在的威脅。<sup>64</sup>十月二十三日晚間，盟軍發動攻擊，此時隆美爾剛好因病返回德國療養。在步兵發起攻擊之前，盟軍先用砲兵大規模砲轟，切斷德軍的前線通信。暫代隆美爾職務的斯圖美將軍

（Georg Stumme）無法得知前線狀況，於是搭車前往前線，卻在途中遭飛機低空掃射，斯圖美心臟病發身亡。等到隆美爾於十月二十五日傍晚



抵達非洲時，大英帝國的北方攻勢已在火砲與飛機的無情轟炸下，即將大舉突破防線。蒙哥馬利的計畫雖非完美，但他的改革卻帶來成效。軸心國戰車與戰防砲阻擋了英國裝甲部隊兩天的時間，但到了十月二十六日，德國第十五裝甲師只剩下三十九輛戰車，而英國第八軍團還有七百五十四輛戰車。<sup>65</sup>軸心國部隊確實在一場不可能贏的消耗戰中「崩潰」了。

此時，隆美爾終於發現盟軍在南方防線只是佯攻，他趕緊將第二十一裝甲師與半數的阿里提裝甲師調往北方阻止盟軍突破防線。隆美爾警告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這是一場他無法獲勝的戰爭，而當蒙哥馬利於十一月一日改變計畫發起「超重作戰」（Operation Supercharge），讓步兵與裝甲部隊協同攻擊北方防線時，突破已勢不可免。隆美爾把即將撤軍的決定告知希特勒與義大利最高統帥部。十一月三日，希特勒又下達「不是勝利，就是死亡」的禁止撤退令，但軸心國防線實際上已經崩潰。到了十一月二日，隆美爾只剩下三十五輛戰車，損失了半數步兵與火砲，包括用來摧毀敵方裝甲部隊的八十八公釐防空砲也被消滅殆盡。<sup>66</sup>希特勒態度軟化，允許有限度的撤退，但義大利最高統帥部的甘丁將軍（Antonio Gandin）仍堅持守住防線。結果就是六個義大利師幾乎被完全殲滅，南方防線的義大利師則在缺乏軍火、糧食、水與車輛下遭到遺棄。盟軍俘虜了七千四百二十九名德國士兵與兩萬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義大利士兵，軸心國部隊傷亡七千人；英國第八軍團傷亡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人，其中兩千三百五十人死亡。<sup>67</sup>蒙哥馬利只擬定了有限的追擊計畫，當盟軍沿著利比亞海岸追擊隆美爾，並且在一月抵達的黎波里時，他們還是無法圍殲軸心國的殘兵敗將。儘管如此，軸心國的失敗無疑全面而徹底。義大利的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至於德國武裝部隊則為了攻取中東與油田而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事實上，若真要奪取中東，德

國投入的資源遠遠不夠，而其擬定的戰略也完全失焦。到頭來，希特勒其實是在將寶貴的軍事資產虛擲在爭奪一塊狹長的沙漠地帶上。雖然第二次艾拉敏會戰經常被描述成一場充滿驚險的戰爭，但實際上隆美爾始終未獲得希特勒的充分支持，因此對他而言，這是一場不可能勝利的戰爭。隆美爾之後撤退到法屬突尼西亞繼續戰鬥，但十一月八日，英美火炬作戰派遣六萬五千名聯軍在非洲西北部登陸，此後便從西向東擊潰軸心國的部隊。十一月十五日，當勝利的消息傳來，邱吉爾這才在開戰後首次授權全英國教堂敲鐘慶祝。<sup>68</sup>

瓜達康納爾島與艾拉敏會戰是太平洋與北非這兩個戰場的重要轉捩點，但與德國為了切斷窩瓦河流域與攻占蘇聯油田而發起的大規模會戰相比，這兩場會戰可說是相形見绌。德蘇在這場戰爭中投入了數百萬人，造成的傷亡遠超過英美在整場二戰中的死傷人數。當二十二個師在北非沙漠交戰時，德蘇卻有三百一十個師在史達林格勒及其周邊地區打得難分難解，總兵力超過兩百萬人。<sup>69</sup>與艾拉敏會戰一樣，史達林格勒會戰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發起日。蘇聯歷史認為這場戰爭始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蘇軍第六十二與第六十四軍團在離史達林格勒只有九十六公里的齊爾河（Chir River）與德軍第六軍團交戰，但希特勒一直到七月下旬才決定攻占而非圍困史達林格勒。七月到八月初，德國B集團軍一直按兵不動，等待燃料與軍火補給。另一方面，第六軍團司令保盧斯在經過幾個星期頑強戰鬥後，終於清除頓河大彎處的敵軍，在八月十日於卡拉赤（Kalach）圍困了十萬紅軍士兵，至此B集團軍終於能渡過頓河大舉進攻史達林格勒。然而保盧斯也損失了半數戰甲車，只剩下兩百輛戰車，反觀蘇軍還有一千兩百輛以上，德軍在八月也傷亡二十萬人。<sup>70</sup>對於此時的希特勒來說，史達林格勒已具有一種象徵性意義，它是「史達林的城市」。為了加快攻占史達林格勒，希特勒將霍斯將軍指

揮的第四裝甲軍團從A集團軍北調，第四裝甲軍團原本擔任征服高加索地區的核心重任，此時卻必須協助攻打史達林格勒。這項調動證明是一場災難，不僅削弱攻擊油田的兵力，也無法給予B集團軍決定性的優勢來征服史達林格勒。霍斯在穿過卡穆克大草原時遭遇蘇軍的激烈抵抗，等到他來到離史達林格勒市中心二十公里處時，第四裝甲軍團只剩下一百五十輛戰車。

優先目標更換是希特勒的決定。與一九四一年一樣，希特勒的決定時常令人困惑，明明德軍的補給線愈拉愈長且愈來愈容易受到攻擊，德軍數量也愈來愈少，但希特勒卻要求德軍攻占所有土地，表示希特勒的軍事領導能力已明顯出現問題。他愈是對底下的將領感到不耐，產生的危機就愈嚴重。九月，希特勒接管A集團軍的指揮權，往後兩個月，A集團軍必須直接聽從他的指揮，希特勒這麼做是為了確保各級將領完全依照他的命令行事。哈爾德將軍在日記裡提到，希特勒的戰略「毫無道理可言，而他自己也知道」。<sup>71</sup>九月二十四日，在經過幾個月的冷戰之後，希特勒終於撤換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改由柴茲勒中將（Kurt Zeitzler）接任。柴茲勒較為年輕也較為順從，更重要的是，與其他可能的人選相比，柴茲勒是更具熱忱的納粹黨黨員。這項人事異動顯示希特勒希望領導高層能具備強烈的意識形態，他認為這些人才能真正發自內心追隨他的戰略思想。<sup>72</sup>希特勒短暫指揮的高加索會戰，與史達林格勒會戰有著密切關係。A集團軍穿過庫班平原，沿著黑海海岸前進，其漫長的側翼理應由B集團軍保護。克萊斯特元帥（Ewald von Kleist）指揮的第一裝甲軍團現在卻必須在缺乏步兵協助下，在南方執行所有任務。第一裝甲軍團精疲力盡、後勤補給缺乏且運輸基礎設施不完善，加上必須在廣大森林與溪谷間進行戰鬥，這裡顯然不是使用戰甲車的理想地形。儘管被派到這個地區的蘇聯軍隊與將領都缺乏經驗（並非專精於山

地戰的山地部隊，也沒有配備滑雪板、冰爪、繩索與登山靴），但克萊斯特的部隊還是無法抵達與攻占格羅茲尼或巴庫。十一月，布朗許維格作戰的主力部隊在蘇軍激烈抵抗下停止前進，與此同時，北方奪取史達林格勒的行動也同樣陷入僵局。<sup>73</sup>

史達林對於德軍的進攻始終未能做出明確回應，因為他仍認為德軍真正的目標是莫斯科，即使南方的危機持續擴大，他仍堅持蘇軍要持續對位於勒熱夫（Rzhev）與佛雅馬的中央防線進行反攻。但另一方面，德軍對於蘇聯軍力的估算卻嚴重失真，從七月到九月，當史達林格勒與蘇聯油田遭受的威脅愈來愈大時，蘇聯大本營卻有充足的預備隊，使他們能派出五十個師與三十三個旅前往南方前線。一九四二年，蘇聯的戰車與飛機生產量已經遠超過德國，俄羅斯工廠生產的火砲數量更是德國的三倍——這是紅軍實力大幅提升的關鍵。當德軍逐漸逼近窩瓦河流域與史達林格勒時，史達林愈來愈擔心德國或許真的有可能打贏這場仗，而他也對於西方盟國的心口不一感到憤怒，因為英美並未順利開闢第二戰場分散德國的兵力。十月時，史達林對麥斯基說道：「從現在起，我們會知道我們結交的是什麼樣的盟友。」<sup>74</sup>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保盧斯第六軍團的裝甲部隊率先抵達史達林格勒以北窩瓦河的三天後，史達林任命朱可夫代理擔任總司令一職，這表示他默認自己能力不足，造成紅軍大量傷亡與引發戰略危機。<sup>75</sup>十月九日，史達林做了更激進的決定，他削減政委的角色，使他們無權干預軍事指揮，讓軍事將領擁有絕對的指揮權，藉此降低意識形態對戰爭的影響，反觀同一時期的希特勒卻做了完全相反的規範。這項改變並未減少史達林身為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對軍隊時常做出的直接干預，但至少讓各級將領在指揮時不用擔心自己是否逾越黨的路線，至於德軍將領則一直受到希特勒反覆無常的命令限制，無法依照自己想法作戰。



史達林格勒爭奪戰其實只是整個廣闊東線戰場的一小部分，在城市的北方與南方圍繞著廣大的農村地帶，德軍與軸心國部隊在這裡持續抵擋蘇聯的攻擊。雙方派往前線的援軍，最終都是在史達林格勒的外圍交戰，而不是在市區裡。十月十九日，羅柯索夫斯基將軍（Konstantin Rokossovskii）率領頓河方面軍大舉攻擊史達林格勒以北的德軍，卻遭遇慘敗。儘管蘇軍的攻擊未能成功突破德軍的包圍圈，卻牽制住軸心國的部隊，在會戰初期持續削減其兵力與武器數量。<sup>76</sup>九月三日，保盧斯的第六軍團終於與霍斯的第四裝甲軍團會合，然而史達林格勒周圍的戰場過於遼闊，保盧斯只能抽調一小部分的軍隊攻打史達林格勒，從未滿編的二十個師中派出八個師。在城內進行巷戰的軍隊固然死傷慘重，但城外軍隊的戰力還不一定比城內的軍隊完整。<sup>77</sup>儘管如此，艱困的城市爭奪戰最終還是成為史達林格勒會戰的核心。保盧斯對於攻占史達林格勒毫無信心，但B集團軍司令魏克斯卻在九月十一日向希特勒保證，十天之內可以攻下這座城市。<sup>78</sup>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史達林格勒遭到李希霍芬第四航空軍團的毀滅性轟炸，但這場轟炸對於戰局幾乎沒有影響，相反地，瓦礫堆反而不利裝甲部隊前進，斷垣殘壁也成了守軍絕佳的掩護。德軍占領舊城區並且推進到史達林格勒以南的窩瓦河之後，計畫在九月十三日發動一場大規模攻勢，企圖一口氣奪取整個窩瓦河西岸。與保盧斯對峙的是令人生畏的崔可夫將軍（Vasily Chuikov），他於九月十二日被任命為第六十二軍團司令，前任司令洛帕欽將軍

（Anton Lopatin）因為試圖撤往窩瓦河對岸而遭到撤職。接下來三天的時間，德軍在每個街區進行激烈巷戰，攻下了史達林格勒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區。白天，優勢的火力與空中攻擊讓保盧斯掌握主動權；夜晚，紅軍的「突擊隊」（storm groups）使用衝鋒槍、匕首與刺刀，滲透到占領區，他們讓德軍士兵心驚膽戰，逐一收復失地。<sup>79</sup>一名德國士兵在日

記裡抱怨說，「這群野蠻人，用的是黑幫的陰招，史達林格勒就跟地獄一樣。」<sup>80</sup>

史達林格勒爭奪戰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場異常艱困的試煉，士兵每天都在減少，裝備與糧食都很缺乏，而且隨時可能遭到狙擊手與突擊隊攻擊。崔可夫要求士兵盡可能靠近前線以避免德軍砲擊，至於蘇軍第六十二軍團的重砲則盡可能部署在河岸後方，蘇軍還有卡秋莎（Katyusha）多管火箭砲，一次可以齊射四噸的火箭，殺傷範圍達到十英畝。史達林格勒的守軍除了一開始有崔可夫三百架飛機的援助，之後又獲得蘇聯第八航空軍超過一千五百架飛機的支持；蘇聯戰術與無線電通信的改善，表示從巴巴羅薩作戰以來德軍習以為常的空優已愈來愈受到挑戰。十月，保盧斯接到任務，他必須攻下突堤地區，使崔可夫無法再從窩瓦河對岸取得補給，此外還要占領北方廣大的工業地帶。保盧斯統率的三十三萬四千人當中，實際能夠作戰的只有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九人。德軍進攻時總是抱著一線希望，希望這次攻擊可以讓崔可夫投降。渴望獲勝的史達林同樣鞭策守軍。十月五日，他告訴史達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顏里明科將軍（Andrei Yeremenko）：「我對你的表現很不滿意……你必須把史達林格勒的每一條街道與每一棟建築物都變成要塞。」然而現實上早已是如此。<sup>81</sup>十一月九日，保盧斯命令已經受損嚴重的七個師進行「胡貝圖斯作戰」（Operation Hubertus），試圖將蘇軍突出部推入寬五百公尺的窩瓦河中，但蘇軍的反擊與重砲使行動不得不終止。結果蘇軍第六十二軍團依然固守於窩瓦河岸，延伸達數公里。柴茲勒試圖說服希特勒放棄史達林格勒與縮短防線，希特勒卻反駁說：「我不會離開窩瓦河！」<sup>82</sup>此時保盧斯的軍隊已過於脆弱，一旦撤退便很可能釀成重大危機。第六軍團幾乎已經沒有可用的車輛，而為了避免更多折損，絕大多數馬匹都已經在十一月時撤走。<sup>83</sup>十一月十八日，崔可夫收到加密電

訊，要他等待「特別命令」。午夜時分，崔可夫收到通知，史達林格勒內外的德軍即將遭到包圍。

雖然所有人的焦點都放在史達林格勒，但最關鍵的卻是蘇聯執行的「天王星作戰」（Operation Uranus），意圖包圍史達林格勒周邊的所有德軍，切斷他們的對外聯繫。雖然朱可夫在戰後表示，自己早在九月中就已經在克里姆林宮一場戲劇性的會議中向史達林報告這項計畫，但在史達林的日誌中卻沒有這場會議的紀錄。在華西列夫斯基一級上將（Aleksandr Vasilevskii）主持下，參謀本部對於包圍的可能性進行討論，十月十三日，華西列夫斯基與朱可夫向史達林報告天王星作戰計畫。<sup>84</sup>這項計畫簡單明瞭：蘇軍將在德軍往史達林格勒延伸的漫長突出部的北側與東南側集結大量預備隊，德軍把漫長的側翼交給實力較弱的軸心國盟邦羅馬尼亞、匈牙利與義大利防守，自己則負責主要的攻擊任務。這道走廊必須夠寬（超過一百五十公里），才能防止保盧斯突破與阻止德軍反擊重新連接突出部。天王星行動只是計畫的一部分，史達林與他的參謀仍想一鼓作氣瓦解整個德軍前線。「火星作戰」（Operation Mars）的規模不下於天王星作戰，預計在進行天王星作戰的同時，擊退德國中央集團軍。如果行動成功，之後還會推出更大規模的行星行動，包括在北方進行的「土星作戰」（Operation Saturn）與在南方進行的「木星作戰」（Operation Jupiter），以消滅德國的南方與中央集團軍。

紅軍針對天王星作戰進行了嚴格保密與各項佯攻作戰，最終成功集結超過一百萬名士兵、一萬四千門重砲、九百七十九輛戰車與一千三百五十架飛機。<sup>85</sup>德國情報單位再度因為輕率低估蘇軍實力，而幾乎完全沒有察覺蘇軍的集結行動。天王星作戰的北翼於十一月十九日發動攻擊，第二天南翼也展開攻勢。德軍脆弱的側翼一如預期迅速潰敗，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蘇軍的兩翼在索維茨基（Sovetsky）會合，這個村子

就位於八月紅軍被圍的地點卡拉赤南方幾英里處。蘇軍很快就用六十個師與一千輛戰車建立起寬廣的走廊，德軍第六軍團與第四裝甲軍團（還有羅馬尼亞與克羅埃西亞的部隊）多達三十三萬人遭到包圍。天王星作戰的成功，顯示紅軍確實從過去犯的錯誤得到教訓，同時也凸顯出希特勒的軍事指揮在戰略上充滿矛盾。保盧斯曾想進行突圍，但希特勒卻在十一月二十日命令他不許離開史達林格勒。雖然承諾要空運補給物資，但冬季天候惡劣與蘇聯空軍在重整後逐漸加強攔截，使這項承諾已不可能實現。為了進行補給，德軍損失了四百八十八架運輸機與一千名機組人員。<sup>86</sup>曼斯坦被指派擔任新成立的頓河集團軍司令，他發起「冬之風暴作戰」（Operation Wintergewitter）試圖突破蘇軍包圍，卻遭到蘇聯裝甲預備隊擊退。保盧斯只能孤軍奮戰。

一月十日，蘇軍開始收縮史達林格勒口袋，代號「鐵環作戰」（Operation Kolt'so）。在此之前，蘇軍也試圖對曼斯坦的頓河集團軍進行第二次包圍，這項作戰稱為「小土星」。義大利的掩護部隊遭到殲滅，但曼斯坦順利逃過包圍。仍在高加索地區苦戰的A集團軍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命令，要求盡快撤回羅斯托夫以免後路遭到切斷。柴茲勒努力從希特勒口中取得撤退命令，一經取得便立即在希特勒私人司令部的前廳打電話通知前線，因為他認為希特勒隨時可能反悔，而實際上也確實是如此。<sup>87</sup> A集團軍好不容易從逐漸收緊的通道撤出高加索地區，之後在曼斯坦的指揮下進行重整，勉強恢復到藍色作戰開始前的狀態。鐵環作戰徹底擊敗了德軍。紅軍以為圍困了八萬人左右，結果總數竟超過二十五萬人。口袋周圍大約有二十八萬名士兵、兩百五十輛戰車、一萬門火炮與三百五十架飛機，但保盧斯實際能用來戰鬥的士兵只有兩萬五千人、九十五輛戰車與三百一十門戰防砲。<sup>88</sup>糧食與彈藥即將耗盡。儘管如此，保盧斯的軍隊在第一個星期仍頑強得讓人吃驚。外圍的農村



地區很快遭到壓縮，到了一月十七日，口袋大小只剩下一半。一月二十二日，蘇軍準備進行最後一擊，與長期防守史達林格勒的崔可夫會師。希特勒要求保盧斯不許投降，但保盧斯周圍的士兵正在挨餓，也沒有子彈可以開槍，身陷重圍的他在無線電裡表示：「我能對沒有子彈的軍隊下什麼命令？」<sup>89</sup>一月十九日，一名士兵坦承，「我再次喪失了作戰意志.....在這裡，只能看到廣闊的白色、碉堡、痛苦、沒有適合休息的地方。在這裡，人的精神一定會慢慢被消磨掉，然後崩潰。」<sup>90</sup>一月三十一日，設在百貨公司的德軍司令部被攻陷，保盧斯宣布投降，但在此之前的許多德軍士兵早已放下武器。史達林格勒北部的抵抗一直持續到二月二日。整場會戰造成雙方慘重的傷亡。史達林格勒會戰依然缺乏精確的傷亡數字，但從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十二月，整個東線戰場德軍死亡高達二十八萬人，義軍死亡與失蹤八萬四千人；在史達林格勒，軸心國部隊有十一萬人被俘，其中絕大多數死亡。在南方，蘇聯在會戰中不可回復的損失（死亡與失蹤）也達到六十一萬兩千人。<sup>91</sup>

土星作戰與木星作戰這兩項更具野心的計畫最終未能實施。為了一舉擊潰德國中央集團軍而進行的火星作戰，則由朱可夫親自指揮，史達林認為這項行動比天王星作戰更為重要。但火星作戰卻以慘敗收場，幾乎未取得任何戰果，反而使蘇軍傷亡近五十萬人，損失一千七百輛戰車——只不過這場失敗被史達林格勒會戰的勝利掩蓋。<sup>92</sup>史達林與蘇聯大本營對於南方戰場擊潰德軍卻未能帶來更大戰果感到沮喪，儘管如此，史達林格勒會戰確實是一場耀眼的勝利，與戰果相較不起眼的瓜達康納爾島與艾拉敏會戰相比，可說是非凡的成就。全世界的目光都關注著這場會戰。法國報紙《週報》（*Le Semaine*）二月四日的標題寫著：「史達林格勒，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會戰。」<sup>93</sup>對德國民眾來說，史達林格勒的勝敗代表的意義遠超過任何一場會戰。史達林格勒會戰的失敗，意

謂著德國無法使用蘇聯的資源來與西方作戰，還可能對整個帝國計畫構成致命挑戰。戰略上來說，史達林格勒會戰使蘇聯從戰爭開打十五個月以來面臨的無窮危機中解脫，但還無法完全終結德國的威脅。瓜達康納爾島、艾拉敏與史達林格勒三場會戰證明帝國過度擴張帶來的危險，這種現象在許多領土型帝國建立的過程中都曾出現過。然而，帝國為了自身安全只能繼續尋求擴張，這樣的誘惑令人難以抗拒。儘管如此，面對軸心國橫掃一切的氣勢，同盟國在這三場會戰中有著非贏不可的壓力。這三場會戰軸心國之所以失敗，不只是因為日本、德國與義大利的戰略與戰術失誤或資源較少，也因為同盟國學會如何更有效地戰鬥。正是這個結果，改變了整場戰爭的走向。

## 戰爭就像買彩券

希特勒究竟是何時察覺德國已經輸掉這場戰爭？而他的帝國計畫已然失敗？歷史學界對此尚無共識。一九四三年夏天，土耳其軍事代表團訪問德國，當代表團成員詢問希特勒是否認為這場戰爭會贏時，希特勒只是簡單地回道：「戰爭就像買彩券。」<sup>94</sup>但可以確定的是，希特勒絕對不想承認失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一年一度紀念一九二三年希特勒政變的集會上，有人聽到希特勒這麼說：「德國士兵踏上的土地，我絕不會歸還。」之後不到三個月，德軍就失去了史達林格勒與頓河大草原。希特勒既憤怒又沮喪，即使德軍不斷失去在東方征服的領土，他仍持續下達寸土不讓的命令。根據戰後的一項證詞，每次與將領開完簡報會議後，希特勒都會重申這場戰爭「德國終將贏得勝利」。希特勒不贊成先與其中一個同盟國妥協談和，而是期待同盟國內部分裂。直到一九

四四年二月，當談到德軍必須經由烏克蘭進行長途撤退時，希特勒這才首次坦承，撤退必然會導致災難。不斷地撤退，「最終將表示德國的失敗」。凡是違反命令放棄領土的將領都將予以撤職或槍斃，不過實際上絕大多數將領都未遭到處分。<sup>95</sup>對希特勒來說，這場戰爭勢必要持續下去，直到不斷地撤退造成最終的悲慘結果為止。

日本與義大利的領導人仍有機會尋求避免全面戰敗的解決方案，但他們卻深陷於樂觀的幻覺之中，不肯面對無法贏得戰爭的殘酷現實。瓜達康納爾島、艾拉敏與史達林格勒距離軸心國本土尚有數千英里遠，而同盟國在一九四二年冬天獲勝之後，依舊足足花了將近三年時間才完全打敗敵人。儘管如此，這三場會戰造成的轉折，結束了一九四〇年九月《三國同盟條約》簽訂以來持續了兩年的新帝國秩序。原本在德義日宣布的新帝國秩序之下，新帝國之間應該建立更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要透過軍事勝利將帝國疆域擴展到全球，不僅要模仿還要取代已經崩解的歐洲殖民秩序。然而實際上，三個軸心帝國並未進行廣泛合作，即便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簽訂的附約確實要求每個軸心國首都都要設立專門委員會：總體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由政治人物、官員與軍事代表組成，功能是針對戰略、軍事、科技與情報進行跨國資訊交流。委員會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才開始運作，而三國首都之間的往來卻少得可憐。日本人很快就對義大利委員會失去興趣，因為他們認為義大利不過是德國的衛星國，而義大利協商者也拒絕透露軍事技術的細節給日本代表。各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帝國利益，限制了情報合作。一九四二年春，軍事委員會遭到降級，「完全被邊緣化」，因為軍事戰略的制定原本就不在《三國同盟條約》的範圍內。<sup>96</sup>如果德軍能攻占高加索地區而義軍能攻下蘇伊士運河，兩軍同時往伊朗與伊拉克推進，那麼軸心國之間的合作很可能向前更進一步。要是英國能被逐出中

東，日本領導人也不反對將勢力拓展到印度洋。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德日簽訂協定，同意以東經七十度為界劃分兩國在印度洋的帝國利益。然而這項協定反而引發兩國在劃界時的種種爭議。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印度洋共同戰略已無實現的可能，兩國的爭端也無疾而終。<sup>97</sup>德日只有在對抗大英帝國上維持有限的合作關係，少數的德國潛艦駐紮在日本控制的馬來亞基地，負責打擊英國的補給艦隊，然而這對日本的幫助極為有限。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後，德日瞭解兩國已無合作必要，為了挽救自己的帝國，兩國各有自己的戰爭要打。<sup>98</sup>

在這個階段，同盟國建立的合作關係肯定比軸心國來得緊密，但同盟國彼此之間仍存在著足以破壞和諧的重大歧異與爭論。一九四三年一月，邱吉爾與羅斯福在摩洛哥城市卡薩布蘭加見面，這座城市原本屬於維琪法國，卻在去年十一月火炬作戰發起之初就被盟軍占領，邱吉爾與羅斯福在此商討的核心議題是如何徹底擊敗軸心國。事實上，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同盟國的戰略簡單地說就是將軸心國逐出其所新建立的帝國，如果可能的話再進一步攻進帝國核心。這對史達林與蘇聯軍隊來說確實是最直接的戰略，因為他們是在一個清楚明確的空間裡面對主要敵人，但西方盟國卻要在遙遠的戰場面對三個主要敵人。在一九四三年，要與這些敵人戰鬥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兩棲作戰。西方盟國對於用什麼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取得勝利缺乏共識，而爭論最多的就是在戰略層面上，哪種方式是可行或可取的。史達林婉拒出席卡薩布蘭加會議，因為他正全心投入史達林格勒會戰的最後階段（實際上也是如此），但他的缺席也凸顯出他對於西方盟國失信的不悅：西方盟國先是承諾在一九四二年開闢第二戰場，之後又承諾在一九四三年初，但兩次承諾都跳票。史達林的缺席讓羅斯福、邱吉爾與其軍事參謀得以暢所欲言，各自提出如何擊敗軸心國的方案，但他們也意識到必須提供仍承受德國沉重打擊



的蘇聯盟友一個喘息的機會。

卡薩布蘭加會議在盟軍內部有個恰如其分的代號，「象徵」。這場會議充分顯示羅斯福與其幕僚受英國影響的程度，他們不顧國內所有高階將領的反對，一味地支持英國的北非行動，而非選擇登陸歐洲。卡薩布蘭加會議之所以召開，主要是因為羅斯福堅持美軍必須在「歐洲」展開軍事行動（然而實際上卻是在非洲），他反對分配更多資源在對日戰爭上，當時美國派駐海外的十七個師，已有九個師用來對抗日本。<sup>99</sup>火炬作戰極為艱鉅，因為從美國東岸與蘇格蘭前往北非需要長途的遠洋航行，英美聯軍對於兩棲作戰也還沒做好充分準備，而維琪法國的軍隊究竟有多少抵抗意志也不清楚。火炬作戰的美軍總司令是艾森豪將軍，他評估勝利的機率不超過百分之五十。兩支特遣部隊，一支由美軍組成，目標是卡薩布蘭加與奧蘭，一支是英美聯軍，目標是阿爾及爾，兩軍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登陸。摩洛哥的抵抗比阿爾及利亞來得激烈，但幾天後三個港口都落入盟軍之手。十一月十三日，盟軍與前維琪總理達朗海軍元帥協議停火，達朗出現在阿爾及利亞完全是偶然，他來此地是為探望生病的兒子。在羅斯福准許下，達朗很快就被艾森豪任命為法屬北非與西非帝國高階總督，這項決定遭到英美報章雜誌的撻伐，但最終還是獲得法蘭西帝國議會同意。<sup>100</sup>為了平息眾人的反對，艾森豪堅稱這只是暫時的權宜措施，但暫時是多久則語帶模糊。邱吉爾的親信布拉肯（Brendan Bracken）提醒艾森豪，「我們必須限制這位奎斯林水手扮演的角色。」<sup>[1]</sup>但艾森豪與羅斯福都認為這場戰爭正面臨許多問題，而達朗可以提供穩定的力量。<sup>101</sup>

根據軍事計畫，將由英軍指揮官安德森中將（Kenneth Anderson）組建第一軍團，並且要趕在德義聯軍增援之前，快速向東攻占突尼斯。但盟軍的經驗不足，加上遇到大雨，行程受到延宕，最後遭受已經在希

特勒命令下迅速擴充兵力的德國守軍猛烈反擊。十二月，艾森豪決定停止前進，並且以兩個月時間改善補給線與運送重武器。英國參謀總長布羅克將軍認為，艾森豪「身為一名將領，他的表現令人絕望」，布羅克的評論首次暴露了同盟國軍事關係的緊張。蒙哥馬利直到歐洲戰事結束為止都接受艾森豪的指揮，他認為艾森豪「根本不知道如何計畫與進行一場戰爭」。<sup>102</sup>艾森豪與蒙哥馬利不同，他沒有實際作戰經驗，他的長才是軍事管理。接下來的兩年時間，每當盟軍出現重大的戰略與政治歧見時，艾森豪都能適時展現他的能力與價值。事實上，艾森豪在北非最初幾個月都忙於引導法蘭西帝國的政治走向，他清楚認識到這是個「危險的政治汪洋」。<sup>103</sup>同年耶誕夜，達朗在阿爾及爾遭一名保皇派青年刺殺身亡，任命案引發的風暴也因此平息，但他的死也留下待解的難題：盟軍要如何管理法蘭西帝國的海外領土與軍隊？十二月十一日，為了反制火炬作戰，德軍與義軍出兵占領了維琪法國，維琪法國在北非的政治權威也隨之覆滅。美國傾向於支持逃離德國監獄的吉羅將軍（Henri Giraud）擔任達朗的繼任者，但英國則希望戴高樂能扮演一定角色。羅斯福不喜歡戴高樂，因為戴高樂除了在法國本土，也在自由法國殖民地享有很高的聲望。艾森豪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才協調出折衷方案，設立一個「民族解放委員會」，由吉羅與戴高樂共同擔任主席。這引發了另一個矛盾：羅斯福藉由《大西洋憲章》在國內營造出民主的形象，但對外卻支持法國在非洲設立帝國組織，而非推動受歡迎的託管制度。艾森豪給出的解釋是基於「軍事需要」，以此來掩蓋美國政策的矛盾以及和英國之間的爭論。<sup>104</sup>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召開的卡薩布蘭加會議，成了同盟國內部爭論未來戰略走向的戰場。羅斯福心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因為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的優先問題陷入分裂，而在太平洋戰場，美軍正日復一日與

軸心國進行著真正的戰爭。馬歇爾與美國陸軍高層則希望一有可能就立刻進攻法國，跟太平洋戰場一樣與德國人進行一場真正的戰爭，但他們發現英國人對此興趣缺缺。羅斯福同意火炬作戰並因此不可避免地介入地中海戰場的戰事，其背後不僅存在著軍事動機，也有政治考量。羅斯福與大部分幕僚與將領都認為，英國關切地中海地區是基於自身的帝國利益。艾森豪曾說：「英國人總是本能地以帝國觀點來看待任何軍事問題。」美國一名外交官員解釋，對英國人而言，「帝國的復興乃至於擴張永遠是最核心的事務。」<sup>105</sup>羅斯福介入地中海地區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確保英國與法國無法像一九一九年一樣在地中海與中東重新建立起帝國的支配地位。羅斯福也認為有必要維護美國在中東的石油利益，他甚至急欲擴大美國在當地的利權。美國把軍力延伸到地中海地區，不僅可以箝制英國的帝國野心，也有利美國的全球戰略。英國協商者通常不會明白表露他們的政治動機，但邱吉爾親自與會以凸顯英國在地中海地區的角色，此舉已充分顯示地中海地區是英國廣大帝國戰略的一環。卡薩布蘭加會議後，同樣在一九四三年，羅斯福與史達林討論殖民地託管的計畫。對此邱吉爾低聲地嘀咕：「要拿走大英帝國的土地，先打一仗再說。」<sup>106</sup>

在卡薩布蘭加會議上，英國代表堅決反對一九四三年大舉進攻歐洲，也拒絕參與開闢第二戰場的計畫。英國反而希望利用即將征服的北非來進攻義大利。早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十月，英國已經擬定了至少四個可能入侵西西里島或薩丁尼亞島的計畫，英國高層相信義大利獨裁政府無法承受又一次的軍事挫敗，這種樂觀情緒影響了英國對火炬作戰後下一個階段的判斷。<sup>107</sup>英國預計兩個月內就能擊敗突尼西亞的軸心國部隊，之後英國希望美國能進攻義大利其中一座主要島嶼。英美在協商之後，美國同意發起攻占西西里島的「哈士奇作戰」

（Operation Husky），做為入侵義大利本土的跳板。美國代表在會議上獲得英國保證，未來將在某個時點進攻西北歐，英國皇家空軍與美國陸軍航空軍將攜手合作，對德國進行全天候的聯合轟炸攻勢，為盟軍的大規模登陸作戰做準備。為了維持大西洋航道暢通而進行的作戰，也被視為入侵前的重要預備工作。英國同意美國在太平洋投入兵力，但前提是不能影響歐洲優先原則。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羅斯福宣布，同盟國只接受所有軸心國無條件投降。

美國代表抵達卡薩布蘭加時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英國代表則有一艘停泊在卡薩布蘭加港口的司令船布洛洛號（*Bulolo*），上面有一群參謀充當他們的後盾。<sup>108</sup>會後，美國軍方高層都認為羅斯福做出太多讓步。五月，西方盟國再度於華府開會，即所謂的「三叉戟會議」，美方代表這次做足了功課，優勢因此朝美方傾斜。太平洋戰場將繼續做為美國的一個優先選項。馬歇爾希望地中海戰場能告一段落，這樣才有足夠的兵力針對法國北部海岸推動已經命名的「大君主作戰」（Operation Overlord）。面對美方的立場，英國最後不得不做出妥協。雙方同意限制入侵義大利的兵力，避免投入過多的盟軍資源，並且開始籌畫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在諾曼第或布列塔尼進行登陸作戰的準備工作。這項決定成為整個戰爭後期西方盟國的戰略基礎。

正如美國所擔心的，地中海戰場逐漸超出盟軍預期，戰況愈演愈烈，投入的資源也愈來愈多。原本預估突尼西亞會戰只需要兩個月，結果花了七個月才結束。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位於利比亞的德義聯軍放棄的黎波里，迅速趕到馬內斯防線（*Mareth Line*）要塞進行防守。馬內斯防線是法國人在戰前興建，目的是防止義大利人入侵突尼西亞南部。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負責進攻馬內斯防線，此外還有從阿爾及利亞趕來的英美聯軍。防守突尼西亞要塞的軸心國部隊幾乎沒有撤退的可



能，要塞一旦失守，所有守軍很可能全部淪為戰俘，但希特勒仍堅持增兵防守。防線北方由隆美爾的德軍防守，南方由梅希將軍（Giovanni Messe）的義大利第一軍團防守。盟軍兵力遠多於軸心國，三月的馬內斯防線之役，梅希只有九十四輛戰車，盟軍卻有六百二十輛，不過山岳地形對守軍有利。<sup>109</sup>隆美爾下令對從阿爾及利亞趕來的盟軍部隊進行擾亂性的襲擊，並於二月十四日在凱撒林隘口重創美國第二軍，只不過隨後被迫退回要塞。亞歷山大將軍被任命為盟軍地面部隊總司令，地位僅次於艾森豪，他認為美軍「軟弱、無經驗與缺乏訓練」，英國的偏見影響了消滅軸心國抵抗力量的計畫，美國師因此被安插在輔助角色。<sup>110</sup>軸心國部隊臨時布防的防線雖然難以突破，但盟軍的海空封鎖切斷了補給線，軸心國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三月九日，隆美爾因身體狀況不佳，把指揮權交給德國第五裝甲軍團司令阿爾寧一級上將

（HansJürgen von Arnim）。一個星期之後，馬內斯防線被突破，梅希往北撤退。兩支盟軍部隊會師之後，將敵軍驅趕到突尼斯與比塞大

（Bizerte），形成一個小包圍圈。五月七日，英軍攻陷突尼斯，美軍則占領比塞大。軸心國部隊投降之時，曾經名震一時的非洲軍只剩下兩輛戰車，彈藥完全用罄。絕大多數德軍於五月十二日投降，但梅希又多抵抗了一天。最後，軸心國部隊大約有二十七萬五千人被俘，其中絕大多數是德國人，損失已經超過史達林格勒會戰在二月的數字。盟軍傷亡也很慘重，充分反映出缺乏作戰經驗的問題。安德森的第一軍團在一場應該屬於最後階段的掃蕩戰中居然傷亡兩萬七千七百四十二人。<sup>111</sup>

與此同時，入侵西西里島的計畫也順利進行。艾森豪幾乎完全沒有介入，主其事的是擔任地面部隊總司令的亞歷山大，而協助他的也都是英國將領，如蒙哥馬利、安德魯．康寧漢海軍中將與泰德空軍上將

（Arthur Tedder）。這場入侵作戰是歐洲戰場上對兩棲作戰能力的首次

真實試煉，需要集結數量驚人的船隻，總共兩千五百零九艘運輸艦運送美國第七軍團、英國第八軍團與加拿大第一師共十六萬人、一萬四千輛車輛與六百輛戰車。<sup>112</sup>起初的計畫由美軍登陸西西里島西北海岸而英軍登陸東南海岸，但這個做法顯然過度分散兵力。蒙哥馬利認為這項計畫「簡直是一團糟」，他在五月初強行介入作戰計畫，最後改成進攻西西里島南部與東南部的三角地帶。<sup>113</sup>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的美國第七軍團登陸吉拉（Gela）附近的南部海岸，蒙哥馬利的英國第八軍團登陸阿沃拉（Avola）附近的東南海岸，加拿大第一師則登陸介於英美之間的帕基諾（Pachino）附近海岸。義大利最高統帥部不知道盟軍接下來要攻擊何處，只好把剩下的義大利戰鬥部隊分散在西西里島、薩丁尼亞島、科西嘉島與義大利本土。西西里島總司令是古佐尼將軍

（Alfredo Guzzoni），他有六個師，分別是兩個德國師（包括戈林裝甲師）與四個義大利師，其中只有一個師完成作戰準備。西西里島守軍擁有兩百四十九輛戰車與略多於一千架飛機，但盟軍在這個戰場的飛機有兩千五百一十架。西西里海岸線幾乎不設防，一名義大利海軍將領抱怨說：「我們必敗無疑。」義大利海軍只有三艘小型戰鬥艦與十艘驅逐艦依然完好，但他們拒絕離開拉斯佩齊亞（La Spezia）海軍基地前去阻止盟軍登陸。<sup>114</sup>義大利軍隊士氣低落，他們要保衛祖國卻又缺乏像樣的武器，與他們並肩作戰的德國盟友又互相不信任。然而墨索里尼卻相當樂觀，六月時，他向法西斯領袖保證，盟軍行動緩慢，沒有能力在義大利領土建立據點。就算義大利人原本不清楚盟軍的目標，那麼在盟軍對前往西西里島途中必定經過的潘特雷里亞島（Pantelleria）與蘭佩杜薩島（Lampedusa）進行海空狂轟濫炸之後，也應該可以明瞭盟軍的意圖。這兩座小島分別在六月十一日與十二日投降。艾森豪把司令部設在馬爾它島一處不太舒適的防空洞裡。幾個星期之前，艾森豪告訴馬歇

爾，「對我來說，這場戰爭的主要目標就是避免讓下次行動又是兩棲作戰。」<sup>115</sup>

盟軍護航艦隊於七月十一日抵達西西里島外海，登陸時幾乎沒有遭遇抵抗。在此之前盟軍已經對西西里島空軍基地進行轟炸，德軍飛機只剩兩百九十八架，義軍飛機則剩下一百九十八架，而後經過四天的空戰，軸心國飛機又減少到只剩一百六十一架。到了七月底，義大利空軍僅存四十一架現代戰機與八十三架轟炸機。<sup>116</sup>盟軍除了大舉出動空軍，海軍特遣艦隊在登陸首日的火力支援也有效遲滯德軍與義軍對灘頭堡的反擊。戈林裝甲師攻擊吉拉的美軍登陸部隊，期間曾一度逼近到距離灘頭三公里內，但之後德軍戰車就被海軍的砲火擊退。義大利利沃諾師（Italian Livorno Division）是僅存仍具有戰力的部隊，盟軍登陸當天，利沃諾師進攻西部，戰車排成一字縱隊前進，卻被外海兩艘驅逐艦與兩艘巡洋艦超過千次的砲轟消滅一空。<sup>117</sup>事實證明，海軍岸轟對於盟軍登陸作戰有著極其重要的貢獻。英美部隊開始朝內陸挺進，蒙哥馬利決心讓自己的部隊擔負起切斷敵軍退路與奪取東北港口墨西拿的主力，而美軍則負責保護他的左翼。巴頓早就對於英軍在突尼西亞的行為感到不滿，他也認為「這場戰爭完全是為了大英帝國的利益」。<sup>118</sup>巴頓不理會蒙哥馬利，他率軍通過幾乎毫無抵抗的西岸地區，於七月二十二日攻下巴勒摩，然後趕赴墨西拿，他決心搶在蒙哥馬利之前拿下這座城市。七月十四日，英國第八軍團未經戰鬥就占領了卡塔尼亞

（Catania），兩天後，美國第七軍團攻下阿格里真托（Agrigento）。數以千計的義大利士兵持續向盟軍投降，德國南方戰區總司令凱賽林認為西西里島敗局已定，決定放棄義大利盟友，取回德軍的指揮權。蒙哥馬利在埃特納山（Mount Etna）附近遭遇德軍的頑強抵抗，部隊難以前進，而與此同時德軍已經開始準備撤離。第八軍團只比巴頓慢一點，於

八月十六日抵達墨西拿，但英美兩軍都未能切斷敵軍退路，因為軸心國部隊出人意料地利用白天渡過墨西拿海峽逃離西西里島。德軍撤離了三萬九千五百六十九人、九千輛車輛與四十七輛戰車；義軍撤離了六萬兩千人，但車輛只有兩百二十七輛，另外還有十二頭騾子。盟軍俘虜了十二萬兩千兩百零四人，軸心國死亡或失蹤四萬九千七百人，相較之下，盟軍死亡或失蹤只有四千兩百九十九人，這樣的比例比較常見於太平洋戰場。<sup>119</sup>

到了一九四三年，墨索里尼仍以為在西西里島進行抵抗可以挽救義大利帝國疆土日漸縮水的命運，然而他的胡言亂語只是顯示他已完全失去理智。西西里島的陷落使他長達二十一年的統治戛然而止。義大利本土的情況早已耗盡民眾對法西斯政權僅剩的一丁點支持。糧食的缺乏與猛烈空襲的開始，包括七月十九日德義雙方針對盟軍問題進行討論之後，羅馬也成為轟炸的目標，都讓義大利民眾清楚意識到，至少就義大利而言，這場戰爭已經輸了。民眾的幻滅使獨裁政體無法再掌控民眾，但民眾並未因此發起革命。事實上，墨索里尼是在一場宮廷政變中失去了權力，發動者是他底下的軍事將領與其他法西斯黨成員，這些人從一開始就不支持墨索里尼發動無限制戰爭，也反對卑躬屈膝地與德國同盟。一九四三年三月，義大利陸軍參謀總長安布羅西奧將軍（Vittorio Ambrosio）向國王進言，必須撤換墨索里尼，接替的人選或許可以選擇巴多格里奧元帥。到了六月，安布羅西奧擬定了逮捕墨索里尼的計畫。七月十九日，也就是羅馬遭到轟炸當天，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在多羅米提山（Dolomite Mountains）山腳的加吉亞別墅（Villa Gaggia）開會，將領們要求墨索里尼向希特勒提出讓義大利脫離戰爭的建議，但遭到拒絕。未能得到德國援助承諾的墨索里尼返回羅馬後，立即召開從一九四〇年之後就未曾召開的法西斯黨大委員會。他希望獲得大委員會支持，



使他在危機中重新取得權威，繼續進行戰爭。

黨內反對墨索里尼最力者是前駐倫敦大使格蘭迪（Dino Grandi），他認為這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大好良機。格蘭迪草擬了一份動議，準備在大委員會提出，這份動議反對獨裁統治，要求恢復王室權力，並以內閣與國會為基礎建立共治政府。格蘭迪把自己的計畫透露給國王知道，包括終止與軸心國的同盟關係與加入同盟國陣營。七月二十四日，格蘭迪的決議終於提交大委員會，會議開了九個小時，一直持續到七月二十五日凌晨，最後終於到了表決格蘭迪臨時動議的時刻。與會者十九票贊成，七票反對。<sup>120</sup>墨索里尼離開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項決議代表的意義。同日稍晚，墨索里尼進宮向國王進行例行簡報會議，而國王則當面告訴墨索里尼，他已經被解除職務，首相將由巴多格里奧接任。當這名獨裁者離開王宮時，他立刻被警察逮捕並且被押送到警方營區。墨索里尼進宮時並未讓安全人員隨行，他以為自己可以對大委員會的投票結果置之不理。墨索里尼的妻子對希特勒的口譯表示，「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墨索里尼「完全沒想過」國王可能發動政變。<sup>121</sup>這個短暫帶領義大利走向帝國之路，最終又帶領義大利走向災難的獨裁政權，就這樣和平落幕。

與墨索里尼不同，希特勒與德國高層早已預料義大利可能發生危機。墨索里尼下臺的消息，讓希特勒對於羅馬的「猶太人與暴徒」大感憤怒。<sup>122</sup>希特勒第一個想法是下令德軍逮捕國王、巴多格里奧與其他陰謀政變者，讓墨索里尼重新上臺，但隨即又打消念頭，因為國王與新政府都堅稱將繼續與德國並肩作戰。然而此時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卻命令大批德軍進駐義大利，這項重新部署東線德軍的行動其實早在盟軍入侵西西里島時就已經開始進行。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德軍進行的「阿拉里克作戰」（Operation Alarich）已經轉移八個師進入義大利北

部，到了九月初，已有十九個德國師進駐或正前往義大利半島途中。德軍也開始進行「康斯坦丁作戰」（Operation Konstantin）加強防衛巴爾幹半島，以預防盟軍下一步的入侵。<sup>123</sup>德軍進駐義大利，部分原因是為了阻止盟軍進攻，真正的目的則是為義大利的「背叛」預做準備，因為希特勒認為巴多格里奧政府很有可能與盟軍談和。而巴多格里奧確實尋求停戰，他的停戰決定於九月八日生效，這使得義大利與進駐的德軍陷入直接對抗的局面，而德軍也在一夜之間迅速將義大利從盟邦轉變成軍事占領區。義大利士兵被解除武裝與遭到監禁，絕大多數被送到德國強制勞動。在希臘的凱法羅尼亞島（Kefalonia），當地的義大利將領拒絕解除武裝，九月十五日，義大利駐軍與德國駐軍爆發戰鬥。希特勒下令不留俘虜，於是在短暫戰鬥與之後的報復行動中，有兩千名義大利人陣亡或被殺。<sup>124</sup>

希特勒不確定要如何處置這個前盟友。軍方高層傾向於直接占領，但希特勒擔心這麼做可能對其他軸心盟邦產生不良影響。希特勒首先考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法西斯政府，無論有沒有墨索里尼都沒關係，這樣可以讓外界產生義大利並未遭到占領的印象。九月十二日，德國傘兵發動大膽奇襲，將囚禁在大薩索山（Gran Massif）的墨索里尼救出後送往慕尼黑。兩天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見面，極力對外表現兩人之間的友誼。墨索里尼很快就發現，自己雖然重新上臺，卻必須完全聽從德國盟友的指示，義大利實際上還是受德國支配。拉恩（Rudolf Rahn）隨即被任命為第三帝國駐義大利全權代表，而德國軍事長官堅持在義大利劃分行動區，組織軍政府。義大利地方行政長官被保留下來，繼續維持平日的行政工作，但他們必須接受德國「顧問」的指揮，實際上等同於聽令於德國，這種狀況其實無異於滿洲國。<sup>125</sup>墨索里尼對於自己的政府完全被「架空」深感不滿，但他也別無選擇。新政權的所在地不能設在羅

馬，而墨索里尼屬意位於義大利東北部的伯爾查諾（Bolzano）或梅拉諾（Merano）也遭到拒絕，最後德國將新政府所在地設在加爾達湖（Lake Garda）畔一個名叫薩羅的小鎮。這個新政府稱為「義大利社會共和國」，領土只涵蓋波河流域的幾座城市。<sup>126</sup>德國現在把義大利視為「占領的盟邦」，這個矛盾的詞彙讓人一望即知義大利已經徹底淪為德國的附屬國。為墨索里尼倒臺歡呼的義大利人，此時發現自己又要受到新獨裁政權的統治。

對同盟國來說，義大利的政權變動似乎意謂著邱吉爾藉由維持地中海戰場來打倒義大利的想法已經奏效。但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魁北克召開的「四分儀會議」，邱吉爾發現美國仍然決定限制地中海戰役的規模。史汀生強烈反對他所謂的「不痛不癢的戰爭」，美國代表手中都拿著戰爭部作戰處在會議前發給他們的文件，裡面詳細說明對地中海地區投入任何額外的資源都是「不經濟的」，這麼做只會讓德國在歐洲形成「戰略僵局」，文件也提出各種事例做為佐證。<sup>127</sup>雖然邱吉爾已經在思考未來在地中海東部採取可能的軍事行動與進攻義大利，但美國堅持進行大君主作戰使他不得不按捺自己的野心。雙方都同意首要目標是趁著軸心國部隊陷入混亂之際盡快攻下羅馬（艾森豪希望十月能夠達成），但他們並未考慮到德國所做的準備。德國南方戰區總司令凱賽林建議希特勒，必須在羅馬以南阻擋盟軍，隆美爾現在是義大利北部德軍的指揮官，可以讓他進行支援。

從後見之明來看，選擇義大利做為主要前線其實相當令人費解。義大利完全不適合做為戰場，只要一攤看地圖就能發現，多山地形與無數橫互的河流使具有機動性的部隊在面對善戰的敵軍時難以發揮快速移動的優勢。同盟國領袖以為不會在義大利遭遇強烈抵抗，或者說，他們沒想到德軍能在極短時間內把義大利變成充滿堅固要塞的前線。進攻義大

利也沒有任何明顯壓倒性的戰略優勢，唯一有利的地方是義大利有可能遵守停戰協定。蒙哥馬利不喜歡在進攻時「毫無清楚的想法，或對於如何作戰毫無詳細計畫.....以及未設定明確的目標。」<sup>128</sup>英國第八軍團與克勒克將軍（Mark Clark）的美國第五軍團負責進行義大利戰役，長時間的戰鬥令他們疲憊不堪，秋季天氣與崎嶇地形也讓他們一籌莫展，難以朝羅馬推進一步。除此之外，進行這場戰役的前提是不久必須從義大利戰場抽調至少七個師與大量登陸艦艇來進行大君主作戰，這項決定同樣毫無戰略意義。如果盟軍真的認真看待義大利戰場，那麼絕不能輕易減少進攻兵力。

結果一如美國分析人士預期，入侵義大利南部的行動很快演變成戰略僵局。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的「灣鎮作戰」（Operation Baytown），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在義大利半島的足尖部分登陸，然後一路通過卡拉布里亞地區，途中只遭遇了輕微抵抗。關鍵的是「雪崩作戰」

（Operation Avalanche），克勒克的第五軍團要在拿坡里以南的薩來諾灣登陸。這項計畫十分冒險，因為盟軍只動用三個師在長達五十公里的灣岸登陸，而且當中還有河川阻隔。克勒克認為不需要在登陸前進行轟炸，因為情報顯示當地的德軍數量不多，因此很有可能做到奇襲。九月九日，一個英國軍與一個美國軍在灘頭登陸，但兩軍相隔甚遠。德國第十軍團早已等候多時。凱賽林發起「軸心作戰」（Operation Achse），迅速動用德軍預備隊進攻灘頭，激烈的戰鬥隨即展開，登陸作戰一時間似乎可能失敗。<sup>129</sup>然而海軍的岸轟與盟軍的空優挽救了這場行動。一個多禮拜後，艾森豪警告聯合參謀首長會議，這次作戰「是在驚險中獲勝」。凱賽林命令被擊敗的德軍撤退到一道道龐大防線之後，這些防線位於羅馬南方，每道防線都從半島的西岸延伸到東岸，橫跨了卡西諾山，這些防線的代號分別是「古斯塔夫」、「希特勒」與「伯恩哈



德」。十月一日，在民眾群起反抗德國占領者的狀況下，盟軍順利進入拿坡里，另一方面，東部的福賈（Foggia）機場也被第八軍團占領，做為美國第十五航空軍對羅馬尼亞油田、奧地利與德國南部目標進行戰略轟炸的基地。到了十月底，艾森豪迅速攻下羅馬的願望破滅，十一月，盟軍在古斯塔夫防線前止步，雙方陷入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亞歷山大將軍為這場戰役提出辯護，他認為這場戰役可以牽制德國兵力，然而同盟國的兵力也同樣遭到牽制，而且還沒有良好的理由。

※ ※ ※

太平洋地區等其他盟軍前線也面臨類似的問題，要消滅每座島嶼基地的頑強守軍極其困難，而且就算占領這些島嶼，似乎也離擊敗日本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瓜達康納爾戰役勝利之後，麥克阿瑟與尼米茲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開會商討未來對抗日本的戰略。南方周邊海域的日本駐軍與基地數目極多，分布的範圍又很遼闊，要解決這些日軍的方法只能緩慢地推進，一個一個地消除，同時也要持續擴充同盟國（主要是美軍）的海上與空中力量，才有可能直接威脅日本本土。第一階段代號「車輪作戰」（Operation Cartwheel），由麥克阿瑟指揮，尼米茲的中太平洋司令部臨時指派擁有航空母艦與戰鬥艦的海爾賽第三艦隊前往支援。車輪作戰包括一連串兩棲作戰行動，數量達十三次，範圍涵蓋所羅門群島與新幾內亞海岸，目的是孤立與摧毀位於新不列顛島拉布爾的日本陸海軍基地。這些基地原本屬於澳洲所有，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占領澳屬新幾內亞領地後被日軍奪取。<sup>130</sup>作戰計畫由麥克阿瑟位於新幾內亞的司令部擬定，巴貝海軍少將（Daniel Barbey）全權負責兩棲登陸計畫，曾經指揮瓜達康納爾島兩棲作戰的屠納海軍少將再次擔任此次登陸

作戰的指揮官。尼米茲由於已無艦艇可用，必須等待新船到來才能執行任務。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命令尼米茲進攻吉爾伯特與埃利斯群島（今日這兩個群島已獨立成為兩個國家，分別是吉里巴斯與吐瓦魯），但馬紹爾群島的戰事卻要等到一九四四年六月才能進行，此時中太平洋戰役進行的地點依然離日本本土超過三千八百公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尼米茲準備進攻吉爾伯特群島的塔拉瓦島與馬金島，此時他已經擁有十七艘全新的航空母艦與十三艘戰鬥艦，這支龐大的水面力量已經完全凌駕日本帝國海軍。總計光是一九四三年，美國造船廠就建成了四百一十九艘新軍艦，包括四十艘新航空母艦，可以部署於全球各地。<sup>131</sup>

日本海軍的主要職責是防衛占領島嶼的周邊海域。根據一九四三年海軍發布的第兩百一十三號訓令，海軍認為防守這些島嶼的外圍區域是「維護帝國本土防衛的核心」。<sup>132</sup>「新作戰政策」要求每個防禦據點都要戰至最後一人，以消耗美國的戰爭力量，事實上等同於將每一座島嶼基地轉變成要塞以遲滯盟軍前進，日軍為此還宣示了一個充滿雄心的口號：「百年戰爭」。<sup>133</sup>一九四三年一整年，日本各島嶼的守軍枕戈待旦，但隨著美國陸海軍航空軍的擴大，日軍補給線也逐漸受到威脅。車輪作戰首先攻擊的目標是所羅門群島，由海爾賽第三艦隊發起，這次作戰的代號是有點奇怪的「腳趾甲」（Toenails）。六月三日攻擊命令下達，兩個星期之後，美軍開始對新喬治亞島進行初步攻擊，主要目標蒙達島則於七月底順利攻占。絕大多數日軍駐紮在面積較大的科隆班加拉島與布干維爾島，但美軍認為可以採取繞道、孤立與斷絕補給的方式，而不採取代價高昂的登陸作戰——這項策略在戰爭最後兩年的「跳島戰役」中廣泛施行。面積較小的維拉拉維拉島於八月十五日輕鬆攻下，美軍準備以此做為攻打布干維爾島的跳板，日軍則為了避免遭到

圍困而從科隆班加拉島撤離。布干維爾島上估計有三萬五千名日軍防守機場與灘頭，百武晴吉中將指揮的日本第十七軍總計有六萬五千人，是迄今為止美軍進攻所羅門群島最大的挑戰。美軍決定不占領整座島嶼，而是在西岸的托羅基納角附近建立灘頭陣地，這裡可以建立機場，也能設置堅固防線抵禦駐紮在北方與南方的大量日軍反擊。<sup>134</sup>盟軍持續空襲削弱日軍在島上與在拉布爾的空中力量，在發動主要攻勢之前，美軍與紐西蘭軍（後者從北非戰場返回）在幾乎未遭遇抵抗下先於十月二十七日占領特雷熱里島，以此做為登陸作戰的發起點並且在此設置先進的雷達站。攻擊布干維爾島的「長勺作戰」（Operation Dipper）於十一月一日展開，到了十二月中已有四萬四千名美軍上岸建立灘頭堡。零星的戰鬥持續到十二月十八日，美軍終於鞏固了陣地。一九四四年三月，百武晴吉的部隊遭受疾病與飢餓的嚴重打擊，但他還是下令進行一連串的正面攻擊，完全重蹈他在瓜達康納爾島的錯誤戰術。某天夜裡，日軍進行萬歲衝鋒，隔天早上統計才發現日軍死亡三千人，在火砲與機關槍的猛烈攻擊下，整個慘狀只能用「屍橫遍野」來形容。百武把部隊撤退到叢林中。<sup>135</sup>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時，百武的部隊只剩三分之一還存活。車輪作戰針對所羅門群島的攻勢順利完成。

麥克阿瑟得知腳趾甲作戰成功後，於一九四三年九月針對新幾內亞北岸發動第二起攻勢。九月四日，澳大利亞第九步兵師占領萊城（Lae）港口，除了遭遇空襲外並未遇到抵抗，九月二十二日，澳軍進攻芬什港（Finschhaen），遭遇守軍抵抗，但戰鬥並不激烈。十月二日，另一支澳洲部隊搶灘成功，攻克芬什港。兩個星期後，日軍登陸試圖奪回芬什港，但遭到殲滅。盟軍保住了初期的戰果，但直到七個月後，盟軍才再度對新幾內亞北岸殘存的日本軍隊發動進攻。由於車輪作戰的成功，日本位於拉布爾的海軍基地開始受到美國陸海軍航空軍的攻

擊。一九四四年二月，日本艦隊離開拉布爾，前往北方加羅林群島的特魯克環礁，此後直到戰爭結束，仍然駐紮在拉布爾的九萬五千名日軍完全遭到孤立。由於所羅門群島戰役即將結束，尼米茲取得麥克阿瑟同意，調回支援陸軍作戰的海軍艦艇，開始進行中太平洋的作戰計畫。尼米茲選擇吉爾伯特與埃利斯群島的兩座島嶼做為目標：塔拉瓦環礁的貝蒂奧島與馬金島。這次行動由新成立的第五艦隊司令史普勞恩斯海軍中將指揮，曾經參與瓜達康納爾戰役的屠納指揮第五十一兩棲特遣艦隊，史密斯（Holland Smith）指揮海軍陸戰隊第五兩棲軍。埃利斯群島的兩座島嶼，富納富提島與納努梅阿島於十月占領，之後美軍在上面興建機場以支援接下來的登陸作戰。<sup>136</sup>馬金島只有三百名日軍防守，此外還有兩百七十一名朝鮮工人。十一月二十一日，馬金島的日軍面臨六千名美軍進犯，其中絕大多數是毫無作戰經驗的第二十七步兵師。儘管兵力懸殊，美軍還是到了第二天下午才攻下這座島嶼，而且造成美軍五十六人陣亡與一百三十一人傷病。<sup>137</sup>

然而這個數字完全比不上同一天海軍陸戰隊第二師進攻貝蒂奧島造成的傷亡。日本記取教訓，駐守貝蒂奧島的特別陸戰隊把整座島變成了要塞，他們逐層設置防線，將碉堡與掩體隱藏起來，使美軍無從辨識砲火的來源。這座小島幾乎沒有掩蔽之處，在登陸之前，美國海軍與空軍花了數天的時間進行砲擊與轟炸，儘管日軍通信遭到破壞，防守的士兵無法協調作戰，但日軍挖掘的地下防禦工事卻足夠牢固，使他們撐過美軍的猛烈轟炸。這場登陸戰的激烈程度遠超過之前的戰役，美軍花了將近三天的時間才成功攻下這座島嶼與占領島上的大型機場。日軍奉行高層的「新作戰政策」，島上士兵幾乎戰至最後一人。大約四千名日軍陣亡，存活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被強徵的朝鮮工人。美國海軍陸戰隊有九百八十四人陣亡，兩千零七十二人受傷。<sup>138</sup>海軍陸



戰隊指揮官史密斯在巡視已經成為焦土的島嶼後表示：「看看這一重又一重的防禦工事，這些王八蛋確實是高手.....你可以攻擊其中一座堡壘，但每座堡壘都有另外兩座堡壘進行掩護。」<sup>139</sup>儘管一開始公布的數字遭到誇大，但攻占一座小島造成這麼大的傷亡還是令美國民眾感到震驚。海軍高層與兩棲作戰部隊決定共同努力，確保接下來進攻馬紹爾群島時（原本排定在一九四四年夏天進行，但現在已經攻下塔拉瓦環礁，所以決定將進攻的日期提前）能更有效率與減少美軍傷亡，但這場戰役卻差一點遭到取消。一九四四年一月，尼米茲答應麥克阿瑟把重點放在西南太平洋與打通前往菲律賓的路徑，但海軍上將金恩對於麥克阿瑟的「愚蠢」計畫感到「憤怒與沮喪」，於是他要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批准攻打馬紹爾群島的計畫，代號「燧發槍作戰」（Operation Flintlock）。<sup>140</sup>尼米茲決定繞過馬紹爾群島東端防守最嚴密的沃特傑島與馬洛埃拉普島，因為祕密情報顯示這兩座小島就像貝蒂奧島一樣有日軍增援。尼米茲選擇馬紹爾群島西邊的瓜加林島與恩尼維托克島做為目標，從這裡就可以轟炸位於特魯克的日本海軍基地。

美軍先占領瓜加林島附近的四座小島，然後在島上架設火炮，對瓜加林島守軍進行砲擊。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美軍開始進攻瓜加林島。瓜加林島守軍只倉促挖掘了壕溝與散兵坑，不像貝蒂奧島那樣挖了很深的坑道，但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四師與第七步兵師還是花了四天的時間才攻下瓜加林島。日軍大約有八千人被殺，美國海軍陸戰隊陣亡三百一十三人。尼米茲對於結果感到滿意，原本預定進攻恩尼維托克島的時間是五月一日，他決定把日期提前。這一次，美軍同樣先占領附近幾座小島，四天後，也就是二月二十一日進攻恩尼維托克島。這座島嶼的防禦較為堅固，但還是在兩天後陷落，美軍損失三百四十八人，日本人與朝鮮人死亡四千五百人，幾乎是全員戰死。馬紹爾群島的東部島嶼仍被日

軍掌握，並且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為止，然而這些日軍完全斷絕對外的海空聯繫，因此也只能困守孤島，難有作為。<sup>141</sup>尼米茲與史普勞恩斯現在終於可以把目光轉向馬里亞納群島，與日本本土的距離一口氣拉近到兩千一百五十公里。

※ ※ ※

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與地中海戰爭的規模，仍遠遠比不上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戰敗後幾個月的德蘇戰爭規模。在延伸超過一千五百公里的陸地前線，紅軍依然面對軸心國兩百個師以上的軍力。史達林與蘇聯高層希望卡薩布蘭加會議在英美即將征服北非的情況下，能夠做出英美將在一九四三年反攻法國的決定。然而卡薩布蘭加會議非但未提供任何具體方案，反而只提出入侵西西里島的可能性，如邱吉爾所擔心的，這讓史達林感到「沮喪與憤怒」。史達林告訴羅斯福，西西里島無法取代「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的重要性。<sup>142</sup>當史達林得知五月的三叉戟會議決定西方盟國要等到一九四四年春天才開闢第二戰場，在此之前仍將繼續進行地中海戰役時，同盟國的關係很可能降到了冰點。邱吉爾認為自己的地中海計畫也許能阻止德國對紅軍發動新一波攻勢，但他的說法無異是在傷口上撒鹽，因為與此同時史達林已經得知德國即將發動「衛城作戰」（Operation Zitadelle），而這場德國在一九四三年發起的主要軍事行動將成為整場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六月二十四日，史達林做出憤怒的回應，他把過去一年來西方盟國的所有承諾與保證全複述了一遍：「這已經不是令人失望的問題.....而是蘇聯政府必須努力說服自己相信西方盟國的問題.....。」<sup>143</sup>往後六個月，史達林拒絕回覆英美的信件，引發華府與倫敦當局的焦慮，他們擔心史達林可能單方面與

德國談和，這項毫無根據的說法在當時受到諸多傳聞的渲染，到了戰後還有一些歷史作品提出這樣的論點。<sup>144</sup>對於任何地中海計畫，史達林一貫認為這些行動只具有「牽制性」。即使到了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大君主作戰計畫正如火如荼展開之時，史達林依然對盟國感到懷疑。十一月底，在前往德黑蘭參加同盟國三國領袖首次高峰會途中，有人聽到史達林說道：「現在最重要的議題是他們到底要不要幫我們。」但隨著蘇聯在一九四三年節節勝利，對史達林而言，此時英美的協助似乎已變得可有可無。朱可夫記得史達林曾經說道：「我們已有足夠的力量，憑自己就能打敗希特勒的德國。」<sup>145</sup>我們無法驗證史達林的說法能不能成真，但可以確定的是，蘇聯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一直獨自承受軸心國的攻擊。史達林提醒邱吉爾，與蘇聯做出的「重大犧牲」相比，英美的損失簡直「微不足道」。<sup>146</sup>

到了一九四三年底，東線戰場的態勢開始讓史達林感到樂觀。經過一整年的苦戰，整體局勢已經轉而對紅軍有利。史達林格勒會戰結束時，東線戰場仍前途未卜，兩軍的勝負明顯取決於烏克蘭城市哈爾科夫的命運上，從二月到三月這短短一個月之內，這座城市已兩度易手。紅軍在頓河大草原上擊退德軍之後，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士兵們早已疲憊不堪，但史達林仍然堅持紅軍必須在廣大的正面繼續採取攻勢。在東線戰場的最北面，紅軍於一月十二日發起「火花作戰」（Operation Spark），不到一個星期就打通一條前往列寧格勒的狹窄走廊，有限地突破列寧格勒長期圍城的狀態。但紅軍發起的第二起包圍德國北面集團軍的行動，卻在德軍司令屈希勒陸軍元帥（Georg von Küchler）縮短與加強防線下被迫放棄。包圍與摧毀德國中央集團軍的計畫交由羅柯索夫斯基率領重組的中央方面軍來進行，但並未獲得任何成果。羅柯索夫斯基抱怨說：「我們的胃口超越了我們的實際能力。」二月初，在南方針

對庫斯克與哈爾科夫進行的「星作戰」（Operation Star）則較為成功。蘇軍於二月八日收復庫斯克，同日攻克貝爾哥羅（Belgorod），隨著德國武裝親衛隊裝甲軍於二月十六日撤離，蘇軍收復哈爾科夫，深入德軍防線形成一個巨大的突出部。<sup>147</sup>但蘇聯大本營重蹈一年前的錯誤，他們迫使疲憊不堪的部隊一次又一次地進行充滿野心的計畫，既要切斷德國南面集團軍的後路，又要占領烏克蘭南方工業區。曼斯坦說服希特勒同意讓他發動防守反擊，二月十九日，他率領加強過的部隊在哈爾科夫以西攻擊已經過度延伸的紅軍。蘇聯的先頭部隊迅速崩潰，曼斯坦於三月十五日占領哈爾科夫，幾天後又占領貝爾哥羅。曼斯坦取得貝爾哥羅之後便停止前進，使蘇軍原本已經深入德軍防線的突出部變得更加明顯。這個突出部以庫斯克為中心，寬一百八十五公里，深一百二十八公里。

庫斯克突出部成為二戰一場主要會戰的發生地。對希特勒來說，史達林格勒的失敗使他不知如何因應新的形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計畫人員建議再次嘗試奪取高加索地區油田與奪回戰略主動權，但到了二月，希特勒終於承認這只是軍事幻想。<sup>148</sup>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希特勒向各級將領明確表示：「這一年他將不會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在曼斯坦於哈爾科夫獲勝之後，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議，由中央集團軍與南面集團軍負責「掐掉」庫斯克突出部，如此不僅可以縮短德軍防線，消滅被包圍的紅軍，還能洗刷史達林格勒以來的種種恥辱。<sup>149</sup>這次作戰不是屬於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規模的攻勢作戰，而是要重創局部地區的蘇軍，以遏止蘇軍在一九四三年繼續發動攻勢。德軍計畫在哈爾科夫以南發動小規模的「隼作戰」（Operation Habicht）與「豹作戰」（Operation Panther）來支持庫斯克作戰，但到了四月中，希特勒發布第六號作戰訓令，代號「衛城作戰」，德軍將分



別從北部的奧勒爾與南部剛奪取的貝爾哥羅出兵，切斷庫斯克突出部的頸部。<sup>150</sup>蘇聯大本營早已預料庫斯克突出部將成為德軍的目標，並且判斷春季融雪期結束、地面泥濘的狀況一消失，德軍就會動手。不久，蘇軍的偵察小隊發現德軍確實開始行動。四月十二日，史達林、朱可夫與華夫列夫斯基共同商討對策。史達林對於守勢作戰的構想不太滿意，但他也同意在庫斯克周圍建立堅固的防禦可以損耗德軍兵鋒，等到德軍疲憊之時，再從後方調派預備隊進行猛烈反擊，一舉擊退德軍，讓他們往聶伯河方向撤退。命令下達給羅柯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軍與范屠亭將軍（Nikolai Vatutin）的沃羅涅日方面軍，預期德軍最遲在五月十日就會發動進攻。到了四月底，羅柯索夫斯基與范屠亭都表示已經做好防守準備。<sup>151</sup>五月初，必要的裝備與額外的兵員都已就位，在突出部裡，蘇聯動員三十萬平民協助建立八個防衛圈，挖掘三千英里的壕溝與反戰車壕，還有數千座用泥土與木材建造的砲臺，陣地四周纏繞了厚厚數層鐵絲網，並且鋪設了九十四萬兩千枚反戰車與反步兵地雷。<sup>152</sup>

德軍的作戰計畫完全依循可預測的模式，發動鉗形攻勢切斷與包圍為了防守突出部而大量湧入的敵軍。北方由莫德爾一級上將（Walter Model）的第九軍團擔任主攻，南部由霍斯的第四裝甲軍團擔任主攻，肯夫兵團（因指揮官肯夫將軍〔Werner Kempf〕而得名）擔任支援。對希特勒來說，問題在於何時發動進攻。南方與中央集團軍司令曼斯坦與克魯格陸軍元帥（Günther von Kluge）都希望趁著蘇軍還沒做好準備，愈早開戰愈好，但莫德爾認為在歷經冬季與春季的艱苦作戰之後，他的部隊需要時間補充步兵與戰甲車。五月四日，希特勒把衛城作戰延後到六月十二日，但中央集團軍所在地區的敵後活動十分活躍，嚴重影響德軍的人員與車輛補充，莫德爾不得不發動懲罰性的「吉普賽男爵作戰」（Operation Gypsy Baron）來確保部隊的補給線，而這又讓攻擊發動的

時間延後到六月十九日。此時正值突尼西亞戰役結束，希特勒擔心義大利可能要求停戰，不過墨索里尼決定繼續戰爭，衛城作戰的風險也隨之降低。儘管如此，此時的德軍似乎並非穩操勝算，裝甲部隊總監古德林將軍與德軍東線情報長官格倫（Reinhard Gehlen）都建議取消行動。<sup>153</sup>希特勒再次延後攻擊時間，但這次只是為了讓最新型的五號戰車「豹式」與六號戰車「虎式」等重型戰車及時運抵前線。雖然希特勒終於決定在七月五日早上發動進攻，但開戰之時也只有三百二十八輛新戰車抵達戰場，其中只有兩百五十一輛實際參與作戰。絕大多數戰車仍然是較弱的三號戰車（三百零九輛）與四號戰車（兩百四十五輛），而每個裝甲師平均擁有的戰車只有七十三輛，只達到預定輛數的一半。<sup>154</sup>

對蘇聯而言，這場即將來臨的會戰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這是紅軍第一次進行守勢作戰，而且違背了史達林採取「先制攻擊」的期望。<sup>155</sup>蘇軍接受的是攻勢作戰的訓練，在一般狀況下不會選擇縱深防禦作戰。由於對這項新戰術感到陌生，因此會戰開打之後便出現許多問題。蘇軍沒有想到德軍會延後開戰，雖然這讓蘇軍有機會持續增援，但也為戰局增添許多不確定性。到了六月，防守區已經聚集了四成的紅軍與百分之七十五的蘇聯裝甲部隊，蘇軍的防衛力量幾乎已經達到頂峰。史達林感到不耐，他在六月時又開始考慮先發制人，但最後還是朱可夫守勢作戰的想法勝出。紅軍持續警戒，但預期的德軍攻擊卻遲遲不出現。到了六月底，截聽到的無線電訊息與蘇聯巡邏小隊俘虜並訊問德軍士兵的結果都顯示大戰在即。從七月二日開始，紅軍進入全面警戒狀態。七月四日，一名被俘的德軍確認衛城作戰將在隔天早晨展開。午夜過後，朱可夫下令以火炮、火箭與轟炸機進行反砲擊，德軍各級將領在驚嚇之餘，反而以為自己成為被攻擊的一方。<sup>156</sup>當德軍發現蘇軍的砲擊只是一場擾亂性的襲擊之後，便在清晨四點三十分正式發起進攻。這

場戰爭雙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蘇聯陸軍與空軍總計出動一百三十三萬六千人（部分是女性）、三千四百四十四輛戰車與自走砲、一萬九千門火炮與迫擊砲，以及兩千六百五十架飛機（加上預備隊的遠程飛機則是三千七百架）；在突出部後方的是柯涅夫將軍指揮的大草原方面軍則擁有五十七萬三千人，一千五百五十一輛戰車與自走砲，七千四百零一門火炮與迫擊砲。<sup>157</sup>德國兩個集團軍總計九十萬人（不過只有六十二萬五千兩百七十一人是戰鬥部隊）、兩千六百九十九輛戰甲車、九千四百六十七門火炮與一千三百七十二架飛機。<sup>158</sup>德軍的戰車、自走砲與轟炸機性能較佳，但蘇軍的兵力與武器數量較多。

接下來的戰爭，庫斯克突出部本身的會戰只持續十天左右，最後以德軍失敗告終，這一結果十分關鍵。儘管德國地面與空中部隊展現出卓越的戰術技巧，衛城作戰依然不是曼斯坦在戰後回憶錄裡所說那令人扼腕的「失去的勝利」，反而是朱可夫計畫成功的明證。在北部戰線，莫德爾的第九軍團在前兩天推進了十一公里，抵達小鎮波里尼

（Ponyri），但隨即受到蘇軍猛烈砲火襲擊，德國步兵必須在非常艱難的狀況下攻克每個防守牢固的據點。七月七日，德軍在奧可伐特卡山脊（Olkhovatka ridge）遭遇頑抗，蘇聯第十三軍團協調空軍進行地面攻擊，成功阻擋德軍攻勢。莫德爾發動猛攻試圖突破蘇軍防線，但未能成功。七月九日，德軍攻勢完全停擺。朱可夫示意史達林，首次進行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來。七月十二日，西部方面軍、布里安斯克方面軍與中央方面軍發起「庫圖佐夫作戰」（Operation Kutuzov），迅速突破德軍戰線並且對德軍第二裝甲軍團進行包圍，不過這個軍團名字雖然有裝甲，卻沒有戰車。莫德爾讓散布在焦土上的第九軍團撤退，試圖堵住被突破的戰線，德國北翼的攻勢至此完全失敗。德國南翼的攻勢較為成功，部分是因為蘇聯情報單位誤以為北線的兵力較強，因此給予羅柯索夫斯基

較多資源。南翼的霍斯部署了九個裝甲師，兩個較弱的裝甲師編入第二十四裝甲軍擔任預備隊。兩天的戰鬥中，范屠亭的戰線不斷沿著聯繫奧波揚（Oboyan）與庫斯克的道路潰退了三十三公里，到了七月七日，德軍裝甲部隊首次遭遇由第一戰車軍團固守的防線。經過激戰之後，德國裝甲師終於成功渡過普賽爾河（Psel River），這是通往庫斯克的最後一道天然屏障。儘管如此，武裝親衛隊「骷髏」裝甲師（SS ‘Death’s Head’ Panzer Division）在建立橋頭堡之後，卻怎麼樣都無法向前推進。<sup>159</sup>霍斯於是命令武裝親衛隊第二裝甲軍進攻普羅科羅夫卡（Prokhorovka）一處小型鐵路交匯站。

多年來，在普羅科羅夫卡爆發的這場戰車戰一直被描繪成二戰規模最大的戰車戰，這場會戰摧毀了數百輛戰車，最終由蘇聯取得勝利。然而，真實戰況卻是平淡無奇。為了阻止武裝親衛隊第二裝甲軍的兩個師推進，蘇軍緊急派出預備隊。羅特米斯托夫將軍（Pavel Rotmistrov）指揮的第五親衛戰車軍團在沒有做好偵察工作或計畫之下於七月十二日倉促投入戰鬥。羅特米斯托夫誤以為自己屬於貝爾哥羅反擊作戰的一環，因此讓所有裝甲部隊傾巢而出，直撲武裝親衛隊的「希特勒近衛」師（Leibstandarte）與「帝國」師（Das Reich），蘇軍大約有五百輛戰車，而德軍有兩百零四輛戰車。羅特米斯托夫的部隊陷入隱匿的反戰車壕，遭到裝設改良戰車砲的四號戰車優越火力壓制。兩天的時間，第五親衛戰車軍團就損失了三百五十九輛戰車與自走砲（兩百零八輛全毀）；而德國兩個裝甲師在七月十二日當天只損失三輛戰車。<sup>160</sup>然而這場重大的戰術勝利卻無法如曼斯坦所希望的讓衛城作戰朝成功更進一步。蘇軍的南部防線非但沒有崩潰，反而能繼續反擊；到了七月十六日，甚至就連遭受重創的第五親衛戰車軍團也重新補充了四百一十九輛戰車與二十五輛自走砲。<sup>161</sup>蘇軍在北部戰線發起的庫圖佐夫作戰，迫



使曼斯坦派出部隊與飛機到北部協助克魯格，不過南部戰線的持續戰鬥已經讓德國的空中支援嚴重折損，步兵師也消耗過大。即使裝甲部隊節節勝利，也沒有足夠的步兵守住占領地。事實上，過度強調庫斯克會戰是一場戰車大決戰，會讓人忽略這其實是一場結合了步兵、火炮與飛機的戰爭，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末尾的幾場會戰一樣。逐漸喪失信心的霍斯，又針對普羅科羅夫卡南部發動幾次進攻，試圖突破蘇軍的抵抗。七月十四日，德軍發起「羅蘭德作戰」（Operation Roland），然而士兵已經精疲力盡，加上沒有預備隊，完全無法突破蘇軍防線。一名德國士兵提到，「那些被打死的士兵都犯了最基本的錯誤，因為他們早已累到無法專心打仗。」<sup>162</sup>到了七月二十三日，南翼的德軍已經完全停止進攻，因為蘇軍在更南方的位置朝米烏斯河（Mius）與頓內次河發動新的攻勢，迫使曼斯坦從衛城作戰分兵前去防守。<sup>163</sup>

希特勒早在七月十三日就召集克魯格與曼斯坦開會，告訴他們必須結束這場會戰。一般認為這是受到盟軍登陸西西里島的影響，然而這只是希特勒考量的諸多因素之一，真正的原因是莫德爾戰線被突破後急遽引發的危機。希特勒並不急於對義大利危機做出回應，七月十七日，他實際上只派了武裝親衛隊第二裝甲軍三個師當中的一個師（希特勒近衛師）前往地中海。衛城作戰無法達成最初的目標，於是只能草草結束。蘇軍的反攻完全出乎德軍意料之外，加倍打擊失敗的德軍。這場發生在七月與八月的消耗戰，德軍總計傷亡二十萬零三千人，幾乎喪失三分之一的兵員，飛機則損失一千零三十架。在整個東線戰場上，德軍損失一千三百三十一輛戰車與自走砲。蘇軍的損失遠比德軍慘重，光是在庫斯克戰場就有七萬人死亡或失蹤，損失一千六百輛戰車與四百架飛機。雖然損失慘重，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蘇聯的武器設備已經比德國更容易補充，因為蘇聯的工廠著重量產，而非講究品質。<sup>164</sup>蘇軍花了較長

時間圍堵德軍南翼的攻勢，直到八月三日才有能力進行「魯緬采夫作戰」（Operation Rumiantsev），在南方發動反攻，讓擔任預備隊的大草原方面軍與范屠亭的沃羅涅日方面軍朝貝爾哥羅推進。到了這個階段，在經過幾個星期的消耗戰之後，曼斯坦的集團軍只剩下一百三十七輛戰甲車與十七萬五千人，到了八月底更減少到十三萬三千人。紅軍迅速在八月五日占領貝爾哥羅，史達林下令在莫斯科首次舉行戰爭勝利慶典，除了以一百二十門大砲鳴放禮砲，晚上也施放煙火。儘管曼斯坦試圖阻擋蘇軍推進，哈爾科夫還是在八月二十三日落入蘇軍手中，德軍從此再也未能奪回這座城市。

庫斯克會戰之後，情勢已全面對蘇聯有利。七月，蘇軍試圖在哈爾科夫以南騷擾曼斯坦，使其無法全力進攻庫斯克，但收效不大。到了八月中，蘇聯大本營下令西南方面軍與南部方面軍全力收復頓巴斯西部地區，然後進一步往前收復烏克蘭工業區與突破更西邊的聶伯河。紅軍於八月三十日攻下塔干洛格（Taganrog），九月八日攻占史達林諾（今日的頓內次克），九月二十二日抵達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Dnepropetrovsk）以南的聶伯河岸。史達林要求所有戰線都必須採取攻勢戰略，讓德軍沒有休息的機會。八月七日，索科洛夫斯基將軍（Vasily Sokolovskii）率領西部方面軍發起「蘇沃洛夫作戰」（Operation Suvorov），目標是斯摩稜斯克，這裡曾在一九四一年爆發了幾場最激烈的戰鬥。德蘇雙方在長達兩百四十公里的戰線上艱苦戰鬥，到了九月二十五日，蘇軍已成功收復斯摩稜斯克。當德軍防線被攻破時，希特勒下令建立東牆（東部防線），讓德軍可以依托防線阻擋蘇軍攻勢。這條東部防線的南段代號「沃坦」（Wotan），從亞速海的梅利托普（Melitopol）延伸到札波羅熱，這道防線可以保護尼科普與克里維里赫（Krivoi Rog）的原料與工業。希特勒（誇大地）表示，這些資

源對往後戰爭的進行至關重要。東部防線的北段又稱「豹線」（Panther Line），這條防線沿聶伯河與傑斯納河（Desna）往北，一路延伸到波羅的海岸邊的納爾瓦（Narva）。光看這道防線的長度就可以知道，要在上面蓋滿能夠有效防禦的要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德軍只要抵達防線就會發現，所謂的「防線」根本只存在於地圖上，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堅固的防禦工事。德軍井然有序地撤離，避免出現潰不成軍的狀況，儘管如此，到了九月底，當曼斯坦下令南面集團軍渡過聶伯河繼續撤退時，他率領的六十個師底下平均每個師只剩下一千人，整個集團軍只剩下三百輛戰車。<sup>165</sup>在撤退途中，部隊奉命採取無情的焦土政策，盡可能炸毀一切設施，燒毀村落，裹脅村民一起撤退，充當苦役。位於最北方的德國北面集團軍派出大量兵力與武器協助南方戰場，面對蘇軍的進攻，只剩下三十六萬人與七輛戰車進行抵抗，但北面集團軍依然成功建立了防守圈，並且一直支撐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才被突破。此時接替屈希勒擔任北面集團軍司令的莫德爾下令部隊撤退到豹線，至此被圍困兩年半的列寧格勒終於重見天日。

從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四年四月，紅軍持續戰鬥，幾乎完全沒有休息，他們順利穿過烏克蘭，進入白俄羅斯東部地區。然而希特勒仍堅持德軍必須守住尼科普與克里維里赫，因此當紅軍迅速從南方與北方橫掃而過時，這兩個地區便完全陷入孤立。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為止，烏克蘭仍有一些工業區掌握在德軍手裡。一九四三年九月底，蘇軍抵達聶伯河，朱可夫為了加速奪取領土，提議派空降部隊占領河的對岸。與許多戰時的空降行動一樣，這次作戰完全失敗，但河的對岸還是建立了多達四十處小型橋頭堡，許多部隊得知第一個渡河者可以獲頒「蘇聯英雄」的榮銜，莫不奮勇爭先。最後竟有兩千四百三十八人得到獎賞，其中有四十七人日後當上將軍。<sup>166</sup>十月，德國南面集團軍的實力仍足以

圍困基輔以南的橋頭堡。但范屠亭的沃羅涅日方面軍（此時已改名為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因為負責的戰場已經轉移到烏克蘭）已經加派一個師從基輔北方的小村落柳季日（Liutezh）渡河。由於上岸後的地區完全是沼澤與濕地，因此德軍並未在此設防。第三親衛戰車軍團神不知鬼不覺地建立了橋頭堡。另一方面，惡劣的天氣阻礙德軍進行空中偵察，蘇軍在基輔南方也進行了佯攻，曼斯坦因此誤以為蘇軍準備在基輔南方大舉渡河。十一月三日，蘇聯兩個完整的軍團從沼澤地蜂擁而出，德國守軍猝不及防。

三天後，也就是十一月七日布爾什維克革命紀念日前夕，蘇軍攻下基輔。史達林在紀念演說中表示，這是「重大轉折的一年」。莫洛托夫舉辦了一個奢侈的慶祝晚宴，讓賓客無限暢飲，結果英國大使居然醉倒趴在桌子上。<sup>167</sup>與史達林格勒一樣，基輔的勝利具有象徵意義，與此同時，紅軍正橫掃烏克蘭的剩餘地區。在南方，柯涅夫的大草原方面軍（此時已改名為烏克蘭第二方面軍）已經大舉橫渡聶伯河，對尼科普構成威脅；在更南方，位於克里米亞的德國第十七軍團已經完全被切斷後路，幾乎已經沒有逃脫的可能。在經過五個月持續不斷的戰鬥之後，蘇聯的攻勢終於停止，部隊精疲力盡，不僅缺乏補給，甚至連靴子也來不及補充。但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初，蘇軍終於收復烏克蘭南部剩餘地區，二月八日攻下尼科普，兩個星期後占領克里維里赫。三月中，柯涅夫抵達聶斯特河與摩爾多瓦邊境，四月七日又從博托沙尼（Botoșani）進入羅馬尼亞境內。在北方，朱可夫與范屠亭攻占羅夫諾（Rovno，前烏克蘭總督轄區首府）與盧次克（Lutsk），後者曾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爆發大規模戰車戰。之後朱可夫與范屠亭調頭向南，抵達喀爾巴阡山脈，經由亞布盧尼齊亞隘口（Jablonica Pass）進入匈牙利。這是史達林所說的一九四四年「十大決定性攻勢」的第一項攻勢。<sup>168</sup>



蘇聯在一九四三年發動的攻勢規模十分龐大，從列寧格勒前線到南方的亞速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從七月到十二月，六百萬紅軍幾乎無休止地投入戰鬥。自從蘇聯檔案開放以來，擊敗德軍的蘇軍在各方面的缺失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軍隊各層級訓練不足、參謀不稱職、情報蒐集不夠、戰術笨拙、軍事生產品質低劣等等。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反而很難理解曾在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遭到痛擊的紅軍，為何能夠戲劇性地扭轉失敗的命運。傳統的見解認為，如俄羅斯史家索科洛夫（Boris Sokolov）所言，德軍完全是「被屍體埋葬」，紅軍用大量的人命擊敗了德軍。<sup>169</sup>然而，這其實是莫大的誤解。在經歷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的慘敗之後，到了一九四三年，紅軍其實與德軍同樣面臨兵員不足的問題。失去領土之後，蘇聯可以運用的人口基數其實沒有比軸心國大多少，大約一億兩千萬人左右。德軍必須廣泛分散在歐洲占領區，但絕大多數精銳部隊都部署在東線戰場，反觀紅軍必須在遠東保留可觀的部隊數量以防範日本可能的威脅。蘇聯的動員較為嚴酷：與德國相比，蘇聯的徵兵範圍延伸到更年輕與更年長的年齡層，此外還有數量龐大的女性，傷兵很快就會被送回作戰單位，而勤務支援部隊的人數遠比德軍來得少。然而，若不是蘇聯於一九四二年後持續從錯誤中學習、改善訓練方式與調整戰術以減少傷亡，那麼再多的兵員也是枉然。十一月，蘇聯正式設立「戰爭經驗運用局」，總結教訓並且要求紅軍與空軍做出改進，讓作戰更有效率。<sup>170</sup>與此同時，蘇聯也把武器量產列為優先事項，生產出La—5、Yak—1b與Yak—7b戰鬥機，以及ML—20與SU—152重型自走砲，希望藉由更強大的火力、空中支援與機動性來彌補軍隊訓練的不足，讓士兵使用的武器能與德軍並駕齊驅。蘇聯量產武器的計畫獲得美國《租借法案》的支持，不過直到庫斯克會戰爆發時，《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依然杯水車薪。儘管蘇聯軍隊仍存在許多缺

點，但各方面的改進已足以使其從一九四一年的笨拙無能，搖身一變成  
為龐大的戰鬥機器。此時德軍就算再怎麼具有作戰經驗與戰術技巧，也  
難以將其擊敗。

※ ※ ※

一九四三年夏天之後，邱吉爾與羅斯福不斷催促舉辦高峰會，十一月，史達林終於答應參加會議。在此之前，史達林一直以忙於巡視前線做為推託藉口（實際上在整個戰爭期間，史達林只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巡視過西部方面軍司令部一次），而且他也不願意在邱吉爾建議的斯卡帕灣開會。最後，三國領袖同意在伊朗（於一九四一年被英國與蘇聯軍隊共同占領）首都德黑蘭召開會議。在史達林與羅斯福的認知裡，這場高峰會只有一個主要目的：建立堅強共識，西方盟國終於要於一九四四年在法國發動重要戰役，以緩和蘇聯前線的壓力。十月，為了替德黑蘭會議預做準備，同盟國在莫斯科先召開了外交部長會議，美國國務卿赫爾向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詳細說明大君主作戰，以此向蘇聯保證，英美絕不會讓盟邦失望。為了展現誠意，美國從十月底在莫斯科派駐了軍事代表團，每天向蘇聯高層簡報入侵作戰的準備進度。<sup>171</sup>雖然八月邱吉爾在魁北克與羅斯福見面時被迫支持大君主作戰，但他仍對同時在義大利與法國開闢戰場存有很深的疑慮，他懷疑「兵力分散的結果，是否會讓兩條戰線都無法實現原本應達成的目標」，英國帝國參謀本部也對於以大君主作戰做為「其他地區所有軍事作戰的樞紐」感到忐忑不安。當羅斯福於十一月啟程前往德黑蘭開會時，戰爭部長史汀生提醒他，邱吉爾「想在『大君主』的背後插刀」。<sup>172</sup>羅斯福與他的親信霍普金斯健康狀況都不太好，這趟德黑蘭之行對他們的身體都是重大考驗，但選擇搭乘愛荷華號（*Iowa*）戰鬥艦經由海路前往，卻讓陪同總統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有機會達成一項絕對的共識，那就是大君主作戰將是一九四四年「英美對德國採取的首要陸空軍事行動」。至於義大利戰役將只推進到比薩到里米尼（*Rimini*）一線，之後便將義大利戰場的資源移轉到反攻法國南部的戰役上，這場戰役的代號是「鐵砧作戰」

（*Operation Anvil*）。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的工作文件也表示，不應

該接受邱吉爾的主張把兵力分散到巴爾幹半島或愛琴海。羅斯福隨後在文件上寫道：「阿門！」<sup>173</sup>

英美兩國領袖先在開羅召開「六分儀會議」，又稱「開羅會議」，他們也邀請蔣介石前來商討中國戰場的問題。蔣介石對於獲邀參與會議感到受寵若驚，特別是在十月的莫斯科會議上，蘇聯高層曾經反對讓中國成為《四強宣言》（Four Power Declaration）的簽字國。蔣介石能夠與會，使中國終於能夠與其他強大的盟邦平起平坐，同時也讓中國日後得以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國。<sup>174</sup>羅斯福希望中國能繼續對日作戰，他承諾蔣介石將在緬甸發動戰役重啟補給線，由英國在孟加拉灣進行代號「海盜作戰」（Operation Buccaneer）的兩棲登陸作戰，將日軍驅逐出去。中美領袖討論了終結殖民主義的問題，雙方也同意戰後大英帝國將不復存在。<sup>175</sup>羅斯福拒絕與邱吉爾私下進行會議，他擔心史達林會因此懷疑英美共組「陣營」對付他。英美代表團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飛往德黑蘭，史達林雖然害怕飛行，但還是從巴庫搭機抵達當地。第二天，史達林與羅斯福見面，邱吉爾並不在場。羅斯福向史達林保證一九四四年盟軍將發動大規模的入侵作戰——這場對話其實是為了先發制人，不讓邱吉爾有見縫插針破壞共識的機會。二十九日，史達林當面詢問邱吉爾是否想進行大君主作戰，邱吉爾知道自己是少數，只能點頭說是。邱吉爾雖然擔憂，但也無計可施。第二天，羅斯福宣布三國領袖已經就開闢第二戰場這項主要議題達成協議。「我對這項決定感到高興。」史達林只簡單地做了這樣的評論。<sup>176</sup>史達林也同意美國的建議，在開闢第二戰場的同時，也在法國南部發起進攻，史達林同樣認為英國想在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東部採取行動是「不具決定性」的做法，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在其他議題上，根據十月外交部長會議的基礎，羅斯福同樣獲得史達林的支持。三國暫時同意戰後國際秩序由羅斯福所



謂的「四警察」（美國、蘇聯、英國與中國）支配，而德國戰敗後將由三國共同占領與分割。史達林首度表示，一旦打敗希特勒，他將對日宣戰。達成所有協議之後，英國大使館為邱吉爾舉辦生日宴會，也藉此增進領導人之間的友好關係。微醺的史達林舉杯高呼，「我的戰友羅斯福」與「我的戰友邱吉爾」，邱吉爾則稱呼「羅斯福，總統，我的朋友」，但對另一人則稱以「強大的史達林」，其中的差異不言而喻。<sup>177</sup>

當羅斯福與邱吉爾返回開羅，繼續討論中國與地中海戰場的問題時，兩人之間的關係顯得沒那麼和睦。羅斯福對蔣介石的承諾（幾天前，蔣介石從開羅返回中國，發現有一群「年輕將領」趁他出國時密謀政變失敗），成了英國人爭執的焦點。在此之前英美已針對打通滇緬公路的問題（代號「安納基姆作戰」[Operation Anakim]）爭論了將近一整年，英國始終反對這項行動。<sup>178</sup>羅斯福決心履行在緬甸採取軍事作戰的承諾，以協助中國繼續對日抗戰，但在與英國爭論三天之後，英國對於海盜作戰的看法與之前的安納基姆作戰一致，那就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大力援助，英國絕不會執行這項軍事計畫，羅斯福只好作罷。十二月七日，蔣介石得知緬甸作戰將延後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他並不感到意外。<sup>179</sup>這段期間，偏執的邱吉爾還另外提出新的目標，並且再度引發與美國之間的分歧：他打算從德軍手中奪取前義大利殖民地羅得島（十月，不滿的布羅克在日記裡寫下「羅得島狂熱」幾個字），並且在開羅與羅斯福會談時持續提出要求。<sup>180</sup>然而美國並不想對地中海東部做出任何承諾。邱吉爾想說服土耳其政府參戰，甚至試圖打一場成功的多德卡內斯群島戰役來引誘土耳其同意，但當土耳其總統伊諾努（İsmet İnönü）抵達開羅與英美領袖會談時，伊諾努依然維持不介入的立場，不想改變土耳其的中立地位。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一樣，暴露

出英美在思考未來同盟戰略時有著很大的分歧，而邱吉爾無法讓美國更改反攻法國的堅定立場。當羅斯福回到華府時對史汀生說：「我把『大君主』完好無缺地帶了回來。」<sup>181</sup>

德黑蘭會議與開羅會議決定了未來一年的軍事方針。同盟國領袖知道，一九四三年的勝利已經除去敵對的義大利帝國，其餘兩個軸心帝國的失敗已經指日可待，即使還無法判斷那一天什麼時候到來，或者是要付出多少代價。一九四四年春夏，盟軍發起的一連串大規模的複雜戰役，已充分顯示軸心國沒有能力抵擋同盟國的攻勢。到了秋天，沒有人懷疑盟軍即將獲得勝利，但德國與日本最終的戰敗仍讓人等得心急。雖然德國與日本被迫採取守勢，但兩國運用既有的科技與有利的地形就能抵擋甚至削弱擁有龐大資源的敵人，當採取主動防禦時更是如此，有限的反擊與擾亂性的襲擊，都能一定程度放大防守方的打擊能力。守軍可以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將火炮乃至於戰車藏匿起來，在燃料不足無法進行機動作戰的狀況下，戰車不失為定點防禦的利器。這些隱匿的火炮難以定位也難以摧毀。碉堡或防守陣地相互交錯，裡面部署了機關槍與迫擊砲，就像貝蒂奧島的防衛一樣，能有效發揚火力，使進攻的敵軍步兵與戰車陷入極度危險之中。使用無煙火藥的迫擊砲特別難以定位（通常從反斜面發射）而且致命。現代迫擊砲重量輕，一名士兵就可攜帶，能夠一分鐘發射二十五到三十發砲彈，射角高，可以攻擊近距離敵人，適合對抗持續前進的敵軍。面對德軍防線的迫擊砲火，英軍攻擊受挫，一九四四年八月，英國成立了反迫擊砲委員會，希望取得對抗迫擊砲的科學建議。到了秋天，窄波雷達研發成功，並且製造出能協助定位迫擊砲的設備，但未能做到廣泛使用，因此迫擊砲的威脅還是無法完全消除。<sup>182</sup>

除了迫擊砲，還有各式各樣的戰防砲，這些戰防砲也能隱匿起來進

行伏擊。德國的手持單次射擊反戰車武器「鐵拳」(Panzerfaust) 容易使用且便於攜帶，對盟軍裝甲部隊造成重大損失。地雷與鐵絲網這類一戰以來廣泛使用的武器也起到額外的防禦作用。現代戰場防禦有多難攻破，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九四四年九月，美軍進攻帛琉島鏈的小島貝里琉。日軍把這場戰爭轉移到了地下，他們在這座珊瑚島挖掘了五百座洞穴與坑道，許多裝設了鐵門，頂部覆蓋巨石與鋼樑，幾乎都以巧妙手法進行偽裝。日軍將珊瑚炸開後，裡面放置火砲，然後再將坑洞封住，只留下一道縫隙讓火砲射擊。火砲與碉堡的設置能使入侵的敵軍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火力攻擊，最大程度利用島上的特殊地形。美軍從九月十五日開始進攻這座小島，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完全攻占。這場艱苦的戰役讓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足足休養了六個月才能再度出戰。<sup>183</sup>第二個例子發生在義大利，其防守之嚴密與貝里琉島不相上下。英國第八軍團發起「橄欖作戰」(Operation Olive)，從靠近亞得里亞海一側進攻德國的哥德防線(Gothic Line)。但在此之前，德國工兵已經建立了龐大的防守陣地，包括八千九百四十四公尺長的反戰車壕、七萬兩千五百一十七枚反戰車地雷、兩萬三千一百七十二枚反步兵地雷、十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公尺長的鐵絲網、三千六百零四座地下掩體、兩千三百七十五處機關槍陣地與四百七十九門戰防砲。<sup>184</sup>令人吃驚的不是在義大利、太平洋或諾曼第鄉間戰場上的推進有多緩慢，而是這些具有縱深且致命的防禦陣地最後究竟是如何被攻破的。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的戰役主要面對的是持續撤退與採取守勢的敵軍，為了擊敗眼前的敵人，他們必須發展出戰術與技術來抵銷防守方的優勢，以充分發揮自身擁有的強大物質力量。

在亞洲戰場，日軍為了防止發生戰略災難，曾一度放棄守勢，轉而在緬甸與中國採取攻勢作戰。在中國戰場的日本占領軍已經有一年時間

未發起大規模會戰，只是針對占領地的中國游擊隊進行懲罰性掃蕩。之後決定重新發起攻勢，主要源自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上校的倡議。這場「大陸打通作戰」試圖打通連結日本華中占領地與印度支那的鐵路走廊，以此建立連結東南亞占領地與日本本土的補給線，因為此時海上補給線已經受到美軍的嚴密封鎖。服部卓四郎希望這麼做可以穩定戰局，並且在一九四六年重新在太平洋地區發起攻勢。日軍於是開始計畫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於河南、湖北與湖南發動攻勢，目標是奪取平漢與粵漢鐵路以連通印度支那邊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東條英機批准這項代號為「一號作戰」的計畫，但他堅持計畫目標僅限於奪取作戰地區的美軍機場，也就是說，東條認為應採取守勢而非攻勢戰略。服部與派駐中國的日軍將領都希望採取攻勢作戰，於是他們違背東京方面的指示，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中開始了兩階段的戰役：首先是「京漢作戰」（コ號作戰），目標是鞏固北平到漢口的鐵路線；第二階段是「湘桂作戰」（ト號作戰），日軍往南進攻長沙與衡陽，與從印度支那北上的日軍會合。華北方面軍與中國派遣軍總數有六十二萬人，兩軍共派出五十萬人參與這次作戰，這是日本歷史上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場戰役。<sup>185</sup>與日軍正面對峙的中國軍隊長期缺乏補給，士兵訓練不足，缺少醫療設施，甚至連軍服也不夠，而他們也無法期盼蔣介石派出其他部隊支援，因為史迪威將軍為了打通從印度通往中國的補給路線已調派了大量中國軍隊。

一號作戰的兩階段戰役，儘管需要漫長的補給線才能將物資運抵前線，而且有經驗的作戰部隊都已經送到太平洋戰場，留在中國戰場的都是素質較低的士兵，但由於面對的是戰力及士氣都十分不足的中國軍隊，因此還是大獲全勝。日軍完全控制平漢鐵路之後，五月二十六日，十五萬日軍湧入湖南省，六月十八日，日軍攻克先前一直無法占領的長



沙。防守長沙的中國指揮官薛岳將軍只有一萬人，而他要對抗的圍城日軍則有三萬。第二個目標衡陽則由薛岳與方先覺將軍防守了四十七天，最終於八月八日陷落。美國第十四航空軍指揮官陳納德將軍（Claire Chennault）努力運送補給物資給衡陽守軍，但史迪威卻聲稱「不用為他們操心」。<sup>186</sup>隨著緬甸與太平洋戰役持續延長，危機也不斷加深，日本參謀本部因此才有了結束一號作戰的念頭，但服部卓四郎堅持，即使已經取得六座美軍空軍基地，還是必須繼續這次作戰。日軍從廣州的一小塊占領地與印度支那往北進攻，最終成功打通粵漢鐵路。一號作戰造成日軍兩萬三千人傷亡，但蔣介石的中國軍隊在耗盡資源的狀況下，損失竟高達七十五萬人。<sup>187</sup>

日本第十五軍司令牟田口廉也中將也計畫在緬甸對盟軍採取攻勢，與服部一樣，牟田口認為日軍占領印度東北部，不僅可以攫取阿薩姆邦的空軍基地，使盟軍無法越過山區空運《租借法案》物資給中國，也能在印度煽動反英暴動，促使同盟國與日本協商。一九四四年一月，東條批准「烏號作戰」（ウ號作戰），這是一個比較審慎的軍事行動，目標是占領「印度東北英帕爾附近的戰略地區」。然而此時英印軍隊正朝緬甸南方的阿拉干（Arakan）地區推進，二月底，阿拉干的日本守軍遭遇嚴重挫敗。三月七日到八日，日軍三個步兵師與印度國民軍兩萬名志願軍進攻英帕爾與柯希馬（Kohima），印度國民軍司令錢德拉·伯斯希望這支部隊能協助「解放」他的祖國。由於缺少運輸車輛，日軍徵用了一萬兩千匹馬與騾子，以及超過一千頭大象。英軍指揮官史林中將（原本是少將）預先得知日軍即將入侵，因此在英帕爾平原做好了防衛準備。英國守軍有十五萬五千人與龐大空軍，兵力遠超過牟田口的八萬五千人，且日軍缺乏補給，沒有戰車，幾乎沒有空中支援。這場戰鬥對雙方來說都很慘烈。史林日後回憶說：「沒有人求饒，也沒有人留

情。」<sup>188</sup>雖然柯希馬遭到圍困，空中補給卻使柯希馬與英帕爾守軍能繼續戰鬥，最後日軍因飢餓、疾病與幾個月的消耗而無以為繼，在損失七成兵力的狀況下撤退。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日軍大本營下令終止烏號作戰。<sup>189</sup>

儘管開羅會議做出延後緬甸軍事作戰的決定，但史迪威還是試圖說服蔣介石讓他再度率領在印度受訓武裝的中國駐印軍在緬北打通滇緬公路，中國遠征軍則從雲南出兵支援。蔣介石不想重蹈兩年前的災難，但羅斯福送來措詞強烈的訊息，明確表示如果蔣介石不同意，那麼「中美未來繼續合作的機會將很有限」。蔣介石悲觀地認為，中國今後也許「要獨自進行這場戰爭」，但這次他還是決定讓步。<sup>190</sup>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史迪威抵達密支那，他在這裡再次遭遇日軍頑抗。等到英國、印度與中國軍隊在八月迫使日本第三十三軍往南撤退時，史迪威的部隊已經傷亡八成。史林沿著伊洛瓦底江平原一路追擊撤退的日軍。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英軍攻占曼德勒，四月底，英軍進入已經被盟軍炸成廢墟的仰光，翁山領導的緬甸國民軍也於此時倒向同盟國。殘餘的日軍撤退到馬來亞。在緬北，中國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終於在一九四五年重新打通滇緬公路（此時已改名為「史迪威公路」，不過如此命名似乎有失公允），但中國直到幾個月後才收到第一批補給物資。<sup>191</sup>對日本來說，防守緬甸成了一場致命的戰役。三年來，日軍投入了三十萬三千五百零一人，有十八萬五千一百四十九人因戰鬥、疾病或飢餓而死亡，這個可怕的數字再次提醒我們日軍對帝國邊境仍存在著補給嚴重不足的問題。在整場戰役中，英軍陣亡四千零三十七人，擔任主要戰鬥任務的印度與西非軍隊則損失六千五百九十九人。<sup>192</sup>

無論是一號作戰還是烏號作戰，首要目標都是要掃除美國的空中力量，防止美國空軍補給蔣介石軍隊與轟炸日本本土。但對日本軍方來

說，最大的危險其實來自於太平洋，尼米茲在成功占領馬紹爾群島的基地之後，便以馬里亞納群島其中三座島嶼為下一波目標，分別是塞班島、天寧島與關島。這三座島嶼離日本夠近，可以對剩下尚未遭到攔截的日本海上航線進行封鎖，也能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史普勞恩斯的第五艦隊現在有了龐大的海軍資源可供使用。密茲契海軍少將（Marc Mitscher）指揮的第五十八特遣艦隊擁有十五艘航空母艦與七艘新戰鬥艦，負責抵禦日軍對島嶼的進攻。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下達訓令，命令尼米茲於六月十五日開始行動；西南太平洋戰場的麥克阿瑟將軍此時已經占領新幾內亞北部，準備以此為跳板進攻菲律賓南部。為了加速軍事作戰，麥克阿瑟命令下轄的兩棲部隊與航空部隊採取跳島戰術，繞過日本守軍，等之後再回頭壓制或消滅他們。在金開德海軍中將（Thomas Kinkaid）第七艦隊的護衛下，加上巴貝海軍少將指揮的美澳兩棲聯合部隊，美軍一共發動了五次兩棲登陸，首先攻占的是阿得米拉提群島，島上的席亞德勒灣（Seeadler Harbour）日後成為進攻菲律賓的前進基地。接下來的「迫害作戰」（Operation Persecution）與「魯莽作戰」（Operation Reckless），計畫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荷蘭第亞港附近登陸並且建立灘頭堡。這三次登陸作戰都未遭遇激烈抵抗，因為日軍的通信遭盟軍截聽，而且被設立於布里斯班賽馬場上的澳洲基地破譯，這些情報讓麥克阿瑟的軍隊能夠預先知道日軍的攻擊行動或他們的增援計畫。<sup>193</sup>鞏固了荷蘭第亞之後，美軍繼續進攻華克德島（Wakde Island），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在六月二十五日成功占領該島，之後也拿下五月二十七日開始進攻的比克島。然而比克島上的日本守軍實力被嚴重低估，經過一個月的苦戰之後，盟軍才取得機場，至於整座島嶼則一直要到八月份，在盟軍損失了五分之一的步兵且日本守軍幾乎全員陣亡之後才得以占領。西新幾內亞由澳洲軍隊平定，之後便

開始興建機場準備向北進攻。至此，日本帝國的東南國防圈已完全遭到突破。<sup>194</sup>

日本海軍很清楚馬里亞納群島將是美軍下一個目標，因此在六月，剛好在美軍計畫進攻之前，日本便開始增援馬里亞納群島。齋藤義次中將在塞班島上的部隊有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九人，遠比美軍情報單位估計的多，美軍以為島上只部署了一萬人。島上的防禦工事尚未完成，但足以造成嚴重傷亡。美軍三個海軍陸戰隊師與兩個陸軍師奉命進行「覓食者作戰」（Operation Forager），指揮官仍是屠納與史密斯，總兵力達到十二萬七千人。運載士兵到島上的特遣艦隊有五百三十五艘艦艇，能夠運送的補給物資達到驚人的三十二萬噸。<sup>195</sup>塞班島預定的進攻日期是六月十五日，關島曾經是美國基地所在地，進攻日期定在十八日，天寧島則是七月十五日，然而塞班島的激烈抵抗打亂了原訂時程。六月十五日，海軍陸戰隊第二師與第四師組成的進攻隊伍分別從八個不同位置登陸灘頭，但日軍的火砲從可以俯瞰灘頭的山嶺進行砲轟，導致美軍傷亡慘重。美國海軍艦砲進行岸轟仍無法摧毀隱匿的火砲陣地，海軍陸戰隊因此遭受機關槍、迫擊砲與重型火砲的無情掃射。六月十八日，小澤治三郎海軍中將率領的機動艦隊接近塞班島，密茲契命令第五十八特遣艦隊前去迎擊，以避免美軍的入侵行動受到影響。史普勞恩斯認為日軍艦隊想摧毀登陸艦，破壞美軍的兩棲作戰，但小澤其實想尋求與美國主力艦隊交戰的機會，他打算「一舉」殲滅第五十八特遣艦隊。

小澤治三郎率領了九艘航空母艦與五艘戰鬥艦，這已經是日本聯合艦隊剩餘的主力，但實力仍不足以與密茲契的艦隊相抗。密茲契的航空母艦搭載了九百架飛機，全是最現代的海軍艦載機，包括格魯曼「地獄貓」、柯蒂斯「地獄俯衝者」與格魯曼「復仇者」魚雷轟炸機，機組人員受的訓練也比這個時期的日本飛行員來得精實。密茲契擁有的飛機數



量是小澤的兩倍，而小澤也無法指望日本陸基航空部隊的支援，因為美軍飛機將近一個星期的持續轟炸與低空掃射，已經使日本陸基航空部隊的軍機數量大為減少。<sup>196</sup>這場被稱為「菲律賓海海戰」的戰役，對日本機動艦隊是一場災難。六月十九日早上，小澤對密茲契艦隊發動兩波艦載機攻勢，此時密茲契艦隊所處的位置剛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雷達情報蒐集能力。小澤派出了一百九十七架飛機，只有五十八架返航。當天早上第三波攻勢的四十七架只有二十七架返航，但第四波也是最後一波的八十二架飛機未能找到美軍艦隊，於是他們飛往關島，其中三十架被擊落，剩餘的飛機絕大多數墜毀於損壞的跑道上，只有九架平安返回航空母艦。雖然實際擊落的飛機數量無法確認，但至少有三百三十架日軍艦載機與陸上基地的飛機在這場美國飛行員戲稱的「馬里亞納射火雞大賽」中被擊落。第二天，又有六十五架日本艦載機被擊落，日本航空母艦翔鶴號與大鳳號被美軍潛艦擊沉。當日本機動艦隊返回日本時，艦上只剩下三十五架可用的艦載機。<sup>197</sup>

日本海空力量幾乎遭到消滅後，塞班島戰役便成了日復一日的消耗戰，齋藤中將下令部隊逐步從一層層的防衛圈往後撤退到塞班島北部。到了六月三十日，缺乏食物與飲水，又遭到美軍艦砲無情轟擊，日本守軍決定採取最後行動。齋藤中將自殺，底下四千多名官兵在飲盡清酒之後，便拿起現有或臨時能找到的物品充當武器，進行集體萬歲衝鋒。在第一波衝鋒之後，第二波是傷者與病患，他們綁著繃帶、拄著拐杖，選擇與同袍一同赴死。七月七日到八日晚間，剩餘的日軍大聲呼喊集體衝鋒。與日軍正面交鋒的美軍部隊，一千一百零七人當中有九百一十八人陣亡或受傷。經過數小時幾乎全是肉搏戰的激戰之後，日軍有四千三百人死亡。兩天後，美軍宣布占領塞班島，但在此之前卻有數百名平民在島嶼北岸的懸崖邊集體自殺，他們先刺死或勒死自己的子女，然後再跳

崖自盡。<sup>198</sup>日本守軍幾乎全部陣亡，但美軍也傷亡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一人，占作戰部隊的五分之一。<sup>199</sup>

七月二十一日，美軍登陸關島，在此之前美軍先對關島轟炸了十三天，創下太平洋戰爭最長的轟炸紀錄。關島的防禦更為嚴密，美軍因此花了一個星期建立大型灘頭堡，之後經過三個星期的激戰，於八月十一日占領關島，一千七百四十四名美軍陣亡。估計有三千名日本士兵躲進叢林，其中一些人甚至一直待到戰爭結束才離開叢林。七月二十四日，美軍進攻第三座島嶼天寧島，但並未遭遇塞班島或關島那樣的頑強抵抗，八月一日就順利攻占。先是新幾內亞失守，然後是馬里亞納群島陷落，日本領導高層無法原諒這樣的錯誤。七月十八日，東條英機被迫辭去首相職務，他希望在緬甸、中國與馬里亞納群島取勝，以換取與美國協商和平的機會，然而他的希望沒有一樣獲得實現。

到了這個階段，日本領導高層已經清楚認識到，德意志帝國的冒險之路已經走到盡頭。一九四四年六月初，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警告東京外交部，「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德國很難再發動戰爭。」這項觀點立即引發憂慮，接下來日本將成唯一一個對抗同盟國的軸心國國家。<sup>200</sup>大島浩向東京發出訊息後的兩個星期，歐洲的西線與東線戰場都出現了具決定性的軍事行動。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早上的大君主作戰終於讓羅斯福履行了在德黑蘭向史達林許下的承諾。兩個星期之後，六月二十三日，紅軍發起「巴格拉奇翁作戰」（Operation Bagration），將德軍逐出白俄羅斯。隨後的幾場會戰雖然還無法結束這場戰爭，但已經決定了德國的命運。

※ ※ ※

德黑蘭會議之後，在西線開闢第二戰場幾乎已成定局，但對於要冒多大風險則仍有爭議，尤其邱吉爾始終懷疑這場軍事作戰的可行性。計畫的擬定早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就已經展開，主事者是英國將領摩根中將（Frederick Morgan），但之後卻引發英美更嚴重的爭執。計畫可能的登陸地點有兩個，一個是加萊，這裡是英吉利海峽最狹窄的地方，另一個是從塞納河河口到諾曼第的柯騰丁半島；美國傾向於諾曼第，而英國則支持加萊。英美雙方在蒙巴頓勳爵（Louis Mountbatten）主掌的聯合作戰司令部爭論兩天之後，終於決定選擇諾曼第。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魁北克的四分儀會議上，摩根提出一個小規模攻擊計畫，預定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以三個師進行登陸作戰。<sup>201</sup>德黑蘭會議之後，盟軍開始認真準備計畫的細節部分，羅斯福同意必須任命一名最高司令來主掌這次行動。馬歇爾想爭取這個直接在戰場上指揮部隊的機會，但羅斯福需要他在華府定期提供建言，因此最後選擇了艾森豪。一九四四年一月，艾森豪把地中海司令部交給英國將領亨利·梅特蘭·威爾遜（Henry Maitland Wilson）。儘管與蒙哥馬利關係緊張，艾森豪仍任命蒙哥馬利擔任盟軍地面部隊總司令，負責指揮第二十一集團軍。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新指揮團隊開會討論計畫內容，認為登陸作戰只用三個師毫無成功的可能，於是改為五個師，之後又增加為六個師。瑟堡港是計畫的核心目標，而岡城（Caen）也是奪取的重點，後者可以在登陸成功之後做為盟軍的空軍據點。盟軍將在灘頭陣地集結三十七個師，之後再將德軍逐出法國。大君主作戰能否成功，還要取決兩項關鍵因素：首先是卡薩布蘭加會議同意採取的聯合轟炸攻勢，這項行動必須削弱德國的空軍力量與充分破壞德國的軍需生產，如此才能降低大君主作戰的風險；其次是必須穩定義大利戰線，讓軍隊與物資順利轉移到英國以準備入侵。

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天，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才認為集中轟炸德國有助於大君主作戰的進行。美國陸軍航空軍擬了一份清單，上面列了七十六個關鍵目標，首要目標是德國的飛機生產地區，這個目標與旨在摧毀德國空軍戰力的「零距離指令」整合之後，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交由英國轟炸機司令部與美國第八航空軍執行。英美空中部隊必須定期向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提出報告，分析轟炸攻勢的可行性，以協助參謀首長判斷何時才是適合發動進攻的時機。九月，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把支援大君主作戰列為轟炸機部隊的最優先事項。<sup>202</sup>然而轟炸的結果卻不如預期。

主掌轟炸機司令部的哈里斯空軍中將（Arthur Harris）認為，持續在夜間對工業城市進行轟炸，是打擊德國戰時經濟的最佳戰略。一九四三年七月底與八月初的「蛾摩拉作戰」（Operation Gomorrah），哈里斯對漢堡進行了多次轟炸，導致三萬四千名平民死亡，卻對軍需產業影響不大。美國第八航空軍直到一九四三年底才有能力進行有效攻擊，他們的目標是德國負責生產滾珠軸承與飛機的工廠地區，然而美軍出勤的傷亡率太高，到了十一月，日間轟炸任務幾乎完全停止，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才又恢復深入德國的轟炸任務。哈里斯在轟炸漢堡之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冬天持續轟炸柏林，但這些空襲任務雖然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卻未對德國空軍力量帶來決定性的損害。根據估計，哈里斯只用了百分之二的炸彈來轟炸德國戰鬥機裝配廠，上級於是要求他調高比例。<sup>203</sup>證據顯示，儘管持續轟炸，德國戰鬥機力量仍持續增長。美國第八航空軍司令依克將軍（Ira Eaker）與一九四四年一月接任司令的杜立德准將都被告知，若想真正削弱德國的空軍力量，「就必須將零距離指令做到最極限。」<sup>204</sup>同月，史巴茲將軍（Carl Spaatz）被任命為美國駐歐洲戰略航空軍司令，史巴茲認為，想徹底消滅德國空軍，不能只靠摧毀飛機生產中心，還要利用德國戰鬥機升空攔截美國轟炸機群的時候與德國戰鬥機



交戰來進行消耗戰。

於是，遠程戰鬥機便成為消滅德國空軍力量的關鍵。美軍轟炸機在德國境內進行日間轟炸任務時，原本旁邊都沒有戰鬥機護航，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三年的最後幾個月。軍方後來理解到，除非加派戰機護航，否則不可能降低轟炸機的傷亡，於是便緊急在P—38洛克希德

「閃電式」、P—47共和「雷霆式」與P—51北美「野馬式」這三種戰鬥機上加掛副油箱。其中尤以野馬式最為成功，其航程足以飛抵柏林或更遠的地區，最遠甚至可以到達維也納。美國第八戰鬥機司令部司令克普納少將（William Kepner）急欲使用遠程戰鬥機與德國空軍作戰，他在一九四四年初可以運用的戰鬥機超過一千兩百架，他因此允許飛行員「獨立」判斷：當敵機集結或升空準備攔截時，飛行員可自行迎擊敵機，甚至可以追擊敵機直到對方的基地，然後掃射地面敵機，目的是不讓敵軍戰機有喘息的機會。<sup>205</sup>一九四四年春，美國第八航空軍轟炸機群以德國飛機生產地區為首要攻擊目標，但在史圖姆普夫一級上將

（HansJürgen Stumpff）指揮重組的德意志帝國航空軍進行攔截下，出現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傷亡率，不過也造成德國戰鬥機難以恢復的耗損。二月，德國損失了三分之一的戰鬥機，到了四月，損失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由於有將近五分之四的戰鬥機用來防守帝國本土，大量損耗使得德國在各個戰線的戰鬥機都無法適時得到補充。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六月，德國空軍作戰損失的飛機已達六千兩百五十九架，意外墜毀的卻有三千六百二十六架，顯示德國飛行員訓練素質持續降低。<sup>206</sup>結果，在德國上空進行的空戰反而比轟炸空襲更能確保大君主作戰能獲得完全的空優。六月六日大君主作戰的發起日，法國北部的德國第三航空軍團只有五百二十架可用飛機，戰鬥機只有一百二十五架，反觀西方盟國總共有一萬兩千八百三十七架飛機，包括五千四百架戰鬥機。<sup>207</sup>一名德國

士兵在盟軍入侵的前幾天寫道：「天上的美國戰鬥轟炸機與轟炸機比鳥還多.....德國飛機一架也沒有。」<sup>208</sup>

與消滅德國空軍相比，義大利戰事顯然處於次要地位，但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仍定下目標，義大利戰役必須在發動大君主作戰之前推進到羅馬以北的「比薩—里米尼」線，以確保地中海戰場不會耗費過多的人力物力，影響接下來的大規模作戰。一九四三年底，盟軍在古斯塔夫防線陷入僵局，但這個狀況勉強可以接受，因為德軍的兵力也同樣受到牽制；凱賽林在義大利南部投入了十三個師，在北部則部署了八個師。德黑蘭會議之後，邱吉爾一直把「義大利戰事的停滯不前」視為英國的奇恥大辱，他再度要求做出最後努力，必須在反攻法國之前，甚至要在二月底之前推進到羅馬。<sup>209</sup>克勒克將軍提出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從古斯塔夫防線後方進行兩棲登陸，切斷德軍與後方的聯繫，當德軍撤退時，盟軍或許可以尾隨追擊，跨越阿爾班山直抵羅馬。艾森豪反對這個想法，但最後邱吉爾的路線勝出，他甚至想進行更具野心的行動，在台伯河河口登陸，這裡雖然遠離古斯塔夫防線，卻離羅馬更近。邱吉爾必須說服羅斯福同意讓數量足夠的登陸艦在地中海多留幾個星期，如此才能發起「鵝卵石作戰」（Operation Shingle），但亞歷山大與克勒克都堅持實施規模較小的登陸作戰，只需要兩個師的部隊在安奇奧

（Anzio）灘頭登陸——離德國防線夠近，能夠構成威脅，但也離通往羅馬的山嶺不遠。<sup>210</sup>這次行動的計畫太過匆促，並未考慮到登陸之後的事。指揮官美國第六軍司令盧卡斯少將（John Lucas）對於前景感到悲觀，他懷疑這又會是一場加里波里之役，「當初推動那場戰役的外行人.....現在還在指揮調度。」<sup>211</sup>在進行兩棲作戰演練時，盧卡斯也覺得是「一場災難」，有四十三輛兩棲登陸車輛與十九門重型火砲沉入海中。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登陸作戰展開，登陸地區只有很少的德

軍防守。第二天，盟軍已經建立了一條長四十公里的防線，但此時盧卡斯卻選擇堅守，而非大膽積極地推進到德軍後方。凱賽林發出代號「理查德」（Richard）的警報，要求德軍向海岸進攻，並且集結他在羅馬的少數部隊與從北部調派來的三個師。二月二日，盧卡斯依然按兵不動，麥肯森將軍（Eberhard von Mackensen）的第十四軍團於是圍住灘頭堡，此後直到五月，美軍都無法前進一步。<sup>212</sup>盧卡斯遭到撤換，由他底下的師長屈斯考特少將（Lucian Truscott）接任，然而屈斯考特除了稍微提振美軍士氣，還是無法在突破封鎖上更有作為。

安奇奧登陸作戰是一次戰略失敗，也讓原本對大君主作戰存有疑慮的人更加質疑這場作戰能否成功。在發起安奇奧登陸作戰的同時，盟軍也嘗試突破古斯塔夫防線，目標是與從灘頭堡挺進的部隊會師，然而在惡劣天氣下，盟軍還是無法擊敗在有利山岳地形堅守的德軍。古斯塔夫防線的樞紐位於卡西諾鎮與上方高聳的懸崖，卡西諾山頂有一座本篤會修道院。盟軍為了在半島上繼續推進，不惜摧毀這座城鎮與強攻卡西諾山，結果卻是得不償失。一九四四年二月與三月，一支紐西蘭軍，包括第四印度師，兩度進攻卡西諾鎮失敗，部分是因為攻擊前的轟炸使小鎮成為斷垣殘壁，所有街道全被瓦礫覆蓋，反而不利進攻。二月十五日，美軍誤以為德國守軍躲在修道院，於是派第十五航空軍轟炸機朝修道院投下三百五十一噸的炸彈，炸死了在裡面避難的兩百三十名義大利平民。<sup>213</sup>德國第一傘兵師隨即占領已經變成廢墟的修道院，並且一直堅守到五月。亞歷山大被迫重新檢討這場戰役。接下來的「王冠作戰」

（Operation Diadem）把位於亞得里亞海的英國第八軍團調來協助打破僵局：根據計畫，盟軍在進攻卡西諾山的同時，克勒克的美國第五軍團將沿西岸往北推進，第八軍團則負責打通里里河谷（Liri Valley），等到突破德軍防線後再反過來包圍凱賽林的部隊。盟軍總兵力超過三十萬

人，包括朱安將軍（Alphonse Juin）的法國遠征軍與安德爾斯中將（Władysław Anders）的波蘭第二軍。一般相信，這場戰役的勝利可以防止德國將駐紮在義大利的軍隊轉移到法國對抗大君主作戰。<sup>214</sup>

王冠作戰終於在五月十一日發動，此時離反攻法國只剩三個星期。一個星期之內，英國第十三軍便打通了里里河谷，而屈斯考特也終於從安奇奧灘頭堡突圍。連續數月艱苦的山地作戰令德軍精疲力竭，盟軍的奇襲因此充分發揮了效果；四名德軍將領剛好不在前線，其中兩名回國是為了接受希特勒親自授勳。最困難的戰鬥是攻克能俯瞰卡西諾鎮廢墟的高地。安德爾斯的部隊一路往上攻，面對德軍近乎不要命的抵抗，波蘭軍隊的傷亡極為慘重。五月十七日，波蘭軍隊才剛抵達修道院下方，耗損嚴重的德軍就已經開始撤退。第二天，波蘭偵察兵發現修道院裡只剩下傷兵。殘破的建築物升起了波蘭國旗，一名波蘭號兵吹奏了一首波蘭民族歌曲，《克拉科夫的黎明》（Kraków Hejnal）。波蘭人多年來一直與德國人奮戰，終於迎來最具象徵性的勝利時刻。幾個小時之後，英國軍官才表示英國國旗也應該要懸掛上去。<sup>215</sup>凱賽林知道他不可能擋得住盟軍龐大的兵力，於是下令撤退以避免遭到包圍。此時克勒克非但未要求封閉包圍圈，反而命令正從安奇奧推進的屈斯考特往北直攻羅馬，以確保義大利首都能落入美軍之手。就像在墨西拿一樣，德國第十與第十四軍團努力從盟軍包圍的夾縫中逃生，往北方的羅馬撤退。克勒克的軍隊在六月五日進入羅馬，剛好是入侵諾曼第的前一天，邱吉爾怒不可遏，因為英國到手的勝利居然被美國搶走。<sup>216</sup>義大利的德軍原本可能遭到殲滅，卻因為美軍搶占羅馬而逃過一劫。義大利戰線可以幫助大君主作戰的說法開始遭到質疑。亞歷山大擁有超過二十五個師的大軍，卻在往羅馬推進的戰役中損失了四萬兩千人。這些士兵如果參加諾曼第登陸作戰，很可能讓盟軍更早獲得勝利，而且幾乎可以確定不會造



成這麼大的傷亡。

在倫敦，盟軍高層只關心義大利戰役不會耗費太多大君主作戰需要的登陸艦，而最終艾森豪還是取得了令他滿意的登陸艦數量。一九四四年一月，盟軍決定擴大登陸規模，這表示必須花更多時間集結更多的資源與物資，因此登陸的日期不得不延後。二月，盟軍決定在五月三十一日採取行動，但有利橫渡海峽進行登陸的條件，例如適當的月光與退潮，卻集中在六月第一個星期。五月，艾森豪終於下令將D日訂在六月五日。為了確保作戰成功，必須想辦法將補給物資安全送上岸，因為占領與修復主要港口肯定需要一段時間。盟軍決定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兩座人工港，代號「桑樹」（Mulberries），在D日當天，所有零件會拖到諾曼第灘頭外，等登陸成功後便動用一萬名工人進行組裝。<sup>217</sup>另外一個重點是阻止德軍迅速增援諾曼第守軍。一月，艾森豪的英國籍副司令泰德空軍上將聘請英國政府科學家祖克曼（Solly Zuckerman）擬定計畫，針對法國鐵路網的一百個節點進行轟炸，以癱瘓德軍的運輸。艾森豪批准這項計畫，卻引發廣泛的反對。四月，邱吉爾對戰時內閣表示，轟炸法國目標與殺害法國平民很可能使法國與西方盟國產生「難以癒合的裂痕」。美國駐歐洲戰略航空軍司令史巴茲與英國轟炸機司令部司令哈里斯都認為使用重型轟炸機轟炸小型的鐵路目標「不會有效」，而且在使用轟炸機上也「很不經濟」。<sup>218</sup>兩人的反對激怒了艾森豪。艾森豪表示他寧可辭職，也不願與這兩個「妄自尊大的人」並肩作戰。史巴茲與哈里斯也拒絕釋放指揮權給艾森豪的戰術空軍司令李馬洛空軍中將（Trafford Leigh-Mallory）。在絕望下，艾森豪告訴邱吉爾，如果不照他的指示去做，那麼他將「收拾東西走人」。<sup>219</sup>於是雙方達成妥協，轟炸機部隊由艾森豪直接指揮，但也允許史巴茲在有機會時繼續轟炸德國的空軍與石油設施。羅斯福介入調解，表示不應該對轟炸有任何疑

慮。根據後來法國官方的數字，可以得知盟軍曾為了入侵法國而進行連續五個星期的轟炸，造成一月份法國北部與西部的鐵路運量只剩下原本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以及兩萬五千名以上的法國平民死亡。<sup>220</sup>到頭來，李馬洛的戰鬥轟炸機與輕型轟炸機其實要比重型轟炸機更能勝任這項任務，這些轟炸機在入侵前幾天才開始轟炸，卻能透過精確攻擊摧毀七十四座橋樑與隧道，成功孤立了整個法國西北部。<sup>221</sup>

第三項成功要素在於能否順利欺騙德軍，使其誤判盟軍登陸的方向與時間。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因為在英國南部集結的盟軍部隊數量相當龐大，最終將達到將近三百萬人。一月，盟軍批准了代號「保鏢」

（Bodyguard）的欺敵計畫，目的是讓德軍以為加萊才是盟軍入侵的真正目標。盟軍在英國東南部設立了一個完全虛構的「第一集團軍」，然後大張旗鼓地交由巴頓將軍指揮，在此之前巴頓因為掌摑了罹患戰爭心理創傷的士兵而被暫時解除指揮權。假的軍營與武器裝備，假的無線電站與雙面諜提供的虛假資訊，都使德軍誤以為盟軍在加萊的對岸集結了更為強大的兵力。一九四四年六月，德軍情報顯示，盟軍已經集結了八十個師準備入侵，儘管實際上只有三十八個師。<sup>222</sup>為了讓欺敵計畫成功，計畫內容也盡可能符合德軍的假定。希特勒與德軍高層認為，英吉利海峽最狹窄處離脆弱的魯爾與萊茵蘭工業區最近，因此是最明顯的入侵目標。隆美爾元帥被指派負責法國防務，他也相信加萊是盟軍的主要目標，但春末在英國西南部也有大量兵力集結的跡象，隆美爾因此認為諾曼第可能是盟軍佯攻或次要的登陸目標，目的是測試德國的防衛力量，之後盟軍主力才會進攻加萊。因此，駐守法國的B集團軍分成了兩支：沙爾莫斯一級上將（Hans von Salmuth）指揮第十五軍團，下轄二十個師，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摩托化師與裝甲師，防守從塞納河到荷蘭之間的地區；多爾曼一級上將（Friedrich Dollmann）指揮第七軍團，下轄

十四個師，但只有一個裝甲師，防守布列塔尼與諾曼第。由於盟軍的欺敵計畫太過成功，導致希特勒直到該年八月才授權第十五軍團離開駐地到法國西部抵擋盟軍。

希特勒很早就預期盟軍將會入侵，他認為擊敗西方盟國才是真正「決定性的一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希特勒在第五十一號訓令中表示，西線的入侵比東線更加危險，我們必須給予決定性打擊，一勞永逸地解除英美的威脅。根據隆美爾的描述，一九四四年三月，希特勒向德軍各級將領「清楚明瞭地」說明他的西線戰略：

敵軍整個登陸作戰只能持續幾個小時，頂多幾天，第厄普的慘敗就是個「理想例證」。一旦登陸失敗，敵軍便沒有下次機會。就算他們想捲土重來，也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準備。登陸失敗不僅會讓英美推遲再次入侵的計畫，登陸失敗對軍隊士氣的打擊，也會讓英美檢討發動登陸作戰的可行性。

希特勒又說，登陸失敗意謂著羅斯福將連任失敗，而邱吉爾年事已高，又病又弱的他勢必不會有心力再進行一次入侵作戰。<sup>223</sup>

隆美爾必須在一九四四年開始的幾個月就著手構築防衛陣地，因為不確定英美何時入侵，只好盡早進行防禦。德軍雖然已經興建了大西洋長城（Atlantic Wall），但這還不構成完整的防禦。托德組織的建設大隊提供隆美爾七十七萬四千名工人與三千七百六十五輛車輛，到了六月六日，預定的一萬五千座防衛哨站已完成了一萬兩千兩百四十七座，沿岸灘頭放置了五十萬個障礙物與埋設了六百五十萬枚地雷，但東北海岸的防衛依然比諾曼第來得嚴密。在東岸，德軍部署了一百三十二門岸防砲，西岸只有四十七門。<sup>224</sup>可用的德軍部隊戰力已大不如前，因此不

能光用師級部隊的數量來推斷德軍的實際戰力。許多士兵的年齡偏高，或者是剛傷癒返回部隊，這些人比較適合靜態防禦——駐守大西洋長城的六個師，平均年齡達到三十七歲。駐守法國的五十八個師當中，有二十個師是原本就駐紮在當地的衛戍部隊。這些部隊來自不同國家，也包括從俄羅斯大草原徵召的部隊。整體而言，這些衛戍部隊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實際作戰經驗。他們缺乏資源，也沒有現代裝備，甚至沒有制式武器，至於海防師更是非常缺乏燃料。<sup>225</sup>

面對敵方的兩棲作戰通常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敵軍一登陸就馬上發動反擊，第二種是等待敵軍建立灘頭堡，再派機動預備隊發動攻擊，將敵軍全部趕進海裡。隆美爾傾向於前者，他部署了海岸防衛師，並且在海岸防衛師後方一小段距離部署預備隊，使其能隨時上前支援。但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與駐法國裝甲兵司令希維本堡將軍（Geyr von Schweppenburg）卻傾向於後者，他們主張把大量機動預備隊保留在後方，等敵軍主力出現時再出擊——他們的重點在加萊地區，而且這個地區也比較適合裝甲部隊作戰。希特勒為了解決雙方歧見，做出了令人遺憾的妥協：隆美爾可以進行海岸防衛，因為他預料盟軍登陸的地點可能不只一處，而是兩處甚或三處，至於希維本堡仍控制中央機動預備隊的四個裝甲師，並且視情況進行部署。結果就是中央預備隊的實力並未強大到足以扭轉戰局，即使他們可以在持續空襲與交通路線遭到破壞下趕赴前線，至於海岸防衛也因為兵力有限而無法消滅登岸的敵軍。<sup>226</sup>

時機是致勝關鍵，但德軍無從得知盟軍入侵的時間。德軍通常只有在有明顯出現危險時才會進入高度警戒狀態。盟軍故意安排法國東北部受到猛烈轟炸，而諾曼第只受到輕微轟炸，好讓德軍以為盟軍即將入侵加萊海岸。當盟軍並未趁五月的好天氣發動進攻時，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開始懷疑盟軍是否到八月之前都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六月初，天氣突然轉



壞，讓德軍有了放鬆的機會。隆美爾回德國為妻子慶生，而在最關鍵的入侵日，許多高階指揮官也因為進行兵棋推演而不在部隊。

五月中，艾森豪與蒙哥馬利向入侵行動的各級將領詳細說明計畫內容。在西部，在柯騰丁半島的底部位置，布萊德雷將軍（Omar Bradley）的第一軍團將以兩個師進攻猶他與奧馬哈灘頭；往東接近岡城的地區，鄧普賽將軍（Miles Dempsey）的英國第二軍團將以三個師（包括加拿大與自由法國部隊）進攻黃金、朱諾與寶劍灘頭。兩支進攻部隊的側翼都有空降行動支援，英軍的側翼由第六空降師保護，美軍的側翼由第八十二與第一〇一空降師保護。超過一萬兩千架飛機進行空中支援，另外有一千兩百艘海軍艦艇為四千艘兩棲登陸艦護航。蒙哥馬利預期幾天之內就能占領岡城，然後以岡城做為東部樞紐抵抗德軍的反攻，與此同時，美軍必須先攻入布列塔尼，然後轉而攻向巴黎與塞納河；根據他的時程，盟軍可以在九十天內抵達巴黎。計畫宣布後的三個星期，所有資訊完全封鎖，好讓行動能造成奇襲的效果。軍隊不許離開營區，水兵不許下船，所有的外交聯繫、對外郵件與電報暫時中止。隨著登陸的日子愈來愈近，艾森豪也變得愈來愈不安與沉默。他的副官寫道：「他因為D日而變得神經兮兮。」從後見之明來看，不難想見手握大軍的他有多麼害怕釀成一場災難。布羅克在日記裡更加悲觀，他表示在最糟的狀況下，這次行動「很可能成為整場戰爭中最慘烈的災難」。<sup>227</sup>天氣轉壞更加重兩人的焦慮，也讓隆美爾安心返回德國。連續三天緊鑼密鼓地開會，艾森豪一直質問資深氣象學家斯戴格（John Stagg）未來的天氣狀況。原本的進攻日期定在六月五日，現在因為狂風暴雨而不得不延後，但斯戴格卻在六月四日晚間表示，到了白天天氣即會轉好，風險應該是在可以承受的範圍。艾森豪反覆思量之後，大聲喊出廣為後人所知的那句名言：「好，我們動手吧。」入侵艦隊於第二

天出發，準備在六月六日清晨發動進攻。<sup>228</sup>

奇襲的條件已完全具備。德軍將領一直相信盟軍準備在諾曼第進行佯攻，導致他們難以確定盟軍這次入侵究竟是不是以諾曼第做為主要目標。希特勒直到中午才得知盟軍入侵，聽到消息時反而有從等待的焦慮中解脫的感覺。希特勒對他的參謀說，盟軍「就在我們預期的地方登陸！」<sup>229</sup>各地的抵抗力道不一，戰況真正激烈的地方只有奧馬哈灘頭（兩棲作戰的詳細狀況將在第五章討論），而在經過一天的鏖戰之後，總共已有十三萬兩千四百五十人成功上岸，重裝備與數千噸補給物資也順利送達。當天傍晚，隆美爾下令第二十一裝甲師進行反攻，然而如同他先前所預期，希維本堡的裝甲預備隊遭到盟軍空中部隊攔阻，動彈不得。六月七日，各個灘頭堡已經連成一片，六月十一日，盟軍占領區已經集結了三十二萬六千人、五萬四千輛車輛與十萬四千噸補給物資。<sup>230</sup>巴約（Bayeux）在兩天內攻下，但蒙哥馬利快速攻占岡城的計畫，卻因為德軍出乎意料地堅守而無法實現。六月十三日發起的「棲息地作戰」（Operation Perch），目標是攻占波卡基村（Viller-Bocage）後朝岡城推進，但薄弱的德軍防線卻意外造成英軍第七裝甲師的嚴重損失，雙方因此形成僵持的局面。

在德意志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約德爾曾在盟軍入侵前不久預言，這場戰鬥將顯示雙方士氣的差異，「德國士兵會為了不讓祖國遭到毀滅而英勇作戰，至於英美士兵則到現在還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在歐洲打仗。」德國士兵作戰時確實相當英勇，但這場戰爭在許多人眼中卻撐不了多久。一名德軍裝甲擲彈兵回憶這場交戰時認為，這「就像是一場上個世紀的戰鬥，宛如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戰爭」。<sup>231</sup>前線德軍成功建立一道薄弱防線，使隆美爾有時間抽調後方預備隊前來防守。盟軍必須在有利防守的地形中進行戰鬥，樹叢、矮丘、窄巷與鄉野間縱橫交錯的高

聳灌木籬牆，德軍可以輕易在這種地形進行埋伏，狙擊手也能獲得充分掩護。盟軍擁有空優，迫使德軍在白晝只能利用多雲的時候移動，儘管如此，德軍的防守戰術依然讓盟軍難以突破。一名加拿大士兵寫道：

「真正的『納粹』德國人會戰鬥到最後，絕不投降。他們年輕、強悍而且狂熱到了極點。」<sup>232</sup>

儘管盟軍擁有許多優勢，但進展依然相當緩慢，艾森豪最高司令部開始擔心，這場戰役可能演變成一戰的壕溝戰僵局。此時最初的勝利消息傳來，布萊德雷已經進入柯騰丁半島，準備進攻瑟堡。半島上的四個德國師與其他防線失去聯繫，不久就開始潰敗。六月二十二日，美軍地面部隊在海軍岸轟協助下，開始圍困瑟堡港。希特勒下令守軍指揮官施利本中將（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不計一切代價死守，但施利本卻於二十六日投降，只剩部分守軍繼續堅守了五天。希特勒對於施利本選擇投降而非戰死感到憤怒，並且痛罵他是「可恥的豬」。希特勒此時已經完全放棄把盟軍推進海裡的想法，六月二十九日，他命令隆美爾「透過小規模的戰鬥」包圍敵軍。<sup>233</sup>希特勒也對倫德斯特在這場會戰的表現感到不滿，他撤換倫德斯特，改由前中央集團軍司令克魯格元帥接替。

在東部，蒙哥馬利的軍隊在岡城北部遭到阻擋。惡劣的天氣使隆美爾得以在不受盟軍空優影響下調來四個裝甲師加強岡城的防務，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一日，隆美爾對盟軍的岡城前線發動反攻，但被盟軍猛烈的砲火擊退。七月初，艾森豪巡視前線，當他看到蒙哥馬利過度謹慎的策略時，不得不感到挫折與憤怒，但在瑟堡戰役之後，布萊德雷軍團的進展也慢下來了，因為法國的鄉野地區非常不適合快速的機動作戰。七月八日，蒙哥馬利終於對德軍陣地發動全面攻擊，代號「查恩伍德作戰」（Operation Charnwood），但隆美爾已經把部隊撤退到預先準備的

岡城南部防守區，縱深有十六公里，背後依托布爾蓋比山脊

（Bourguébus Ridge），隆美爾在山脊部署了七十八門戰車剋星八十八公釐防空砲。七月十三日，蒙哥馬利再計畫了一次猛攻，代號「佳林作戰」（Operation Goodwood），企圖牽制與摧毀德國裝甲部隊以協助布萊德雷突破西部防線。蒙哥馬利在給布羅克的報告上寫道：「東翼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為了協助西翼的部隊。」<sup>234</sup>

佳林作戰激戰了三天，英國與加拿大部隊突破了前三道防線，卻被山脊上的戰防砲擋住。七月二十日，傾盆大雨使地面陷入泥濘，蒙哥馬利只好停止行動。儘管如此，以高昂代價耗損德國守軍的目標卻達成了。戰役結束的第二天，克魯格告訴希特勒，「這道防線耗損太大，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此時德軍已經損失兩千一百一十七輛戰甲車輛與十一萬三千人，連隆美爾也在盟軍飛機低空掃射時受傷。盟軍損失了大量戰車，但到了七月底仍有四千五百輛，反觀德軍只剩下八百五十輛。盟軍已經在灘頭堡集結超過一百五十萬人與三十三萬輛車輛。<sup>235</sup>艾森豪的失望可以理解，但蒙哥馬利確實達成了目的。七月底，在岡城南部東部軸線的德軍有六個裝甲師，總計六百四十五輛戰車，但布萊德雷率領重新命名的第十二集團軍，面對的德軍只有兩個裝甲師與一百一十輛可用的戰車。七月二十五日，布萊德雷的十五個師，在巴頓的美國第三軍團支援下，發起了「眼鏡蛇作戰」（Operation Cobra），這次進攻終於突破德軍易碎的防線，使盟軍得以繼續推進。防守的二十五個德國師在幾個星期的消耗戰之後，戰力嚴重下滑，但又未能得到任何增援，至少有十一個師已經失去作戰能力，軍隊的機動性只能仰賴馬匹——希特勒得知情況後，反而下令德軍堅守，因為在喪失機動性的狀況下，這些德軍已不可能撤退到法國東部防線。<sup>236</sup>

德國西部防線開始迅速走向全面崩潰。眼鏡蛇作戰開始的第一天早



上，在一千五百架重型轟炸機進行轟炸之後，被炸得頭昏眼花的德國守軍馬上被突破防線。原本被高聳的灌木籬牆阻擋的美軍裝甲部隊，現在使用了推土機與裝了「鋼牙」的雪曼戰車（綽號「犀牛」）來剷開橫亙的灌木叢與果樹，德國的裝甲部隊則只行駛於道路上，完全暴露在美國戰鬥轟炸機的掃射與轟炸之下。兩天後，盟軍擊敗六個疲憊不堪的德國步兵師，占領庫唐斯（Coutances），布萊德雷接著朝布列塔尼城鎮阿夫蘭士（Avranches）推進，在三十六個小時內前進了四十公里。此時巴頓的軍團也使出全力，迅速席捲整個布列塔尼，迫使六個仍位於布列塔尼的德國師撤退到希特勒宣稱的三個「要塞城市」港口，分別是布勒斯特、聖納澤爾（St Nazaire）與洛里昂（Lorient）。巴頓接著轉而向東朝巴黎與塞納河推進，一路上幾乎沒有德軍阻攔。德國將領察覺整個B集團軍有被包圍的危險，但希特勒命令克魯格組織反攻，防止美軍突破阿夫蘭士防線。克魯格只能以五個未滿編的裝甲師與四百輛戰車，從莫爾坦（Mortain）地區發起攻勢，試圖從側面切斷巴頓的推進。然而德國的情報遭「極機密」攔截破解，布萊德雷因此得到預警而得以事先部署反戰車防線。

八月七日晚間，德軍發起攻勢，卻因為遭遇美軍猛烈的空中攻擊而難以前進，不到一天時間，德軍又退回到攻擊起始線，而且兩翼開始遭到威脅。<sup>237</sup>在岡城地區，由於裝甲師被調往莫爾坦參與攻擊行動，導致德軍的防線嚴重削弱。八月八日，蒙哥馬利再度發動全面攻勢，兩天之內便接近德軍防線後方的法萊斯（Falaise）。為了包圍德軍，巴頓奉命派出一部分第三軍團往北推進，到了十一日，巴頓的部隊已經抵達阿戎頓（Argentan），距離在法萊斯附近的加拿大部隊只有三十二公里，巴頓於是在此停住。盟軍的鉗形攻勢已經形成包圍圈，希特勒決定撤換克魯格，改由從東線調回的莫德爾接任，然而德軍已難挽回頹勢。莫德

爾下令殘餘的第七軍團從「法萊斯缺口」逃離包圍圈，但過程中仍有二十一個師遭到殲滅，包括七個裝甲師與兩個傘兵師。<sup>238</sup>雖然有數萬人成功逃脫，卻不得不遺棄大量的重裝備與數千輛車輛。火炮與卡車的殘骸，連同士兵與馬匹的屍體捲曲在一起，成堆地堵塞了道路。兩天後艾森豪巡視混亂的現場，他日後寫道：「連續走了數百碼，居然沒有一塊乾淨的空地可踩，到處都是死人與腐爛的屍體。」<sup>239</sup>

德軍為了避免遭到俘虜而往東逃竄，巴頓一路穿過幾乎無人防守的鄉野地帶，最後抵達塞納河畔的芒特—加西庫爾（Mantes-Gassicourt），此地位於巴黎的西北部。巴頓第三軍團的南翼從巴黎南方渡過塞納河，到了八月二十五日，第三軍團的兵鋒離德國邊境只剩一百公里。一小隊德國士兵努力想渡過塞納河，有人臨時拼湊了木筏，有人甚至直接游到對岸。一名德國士兵在給家人的信上寫道：「我們不斷往前衝，只是朝著背對敵軍的方向。」<sup>240</sup>在塞納河對岸，莫德爾只能勉強湊足四個戰力不足的師與一百二十輛戰車，他要面對的是來勢洶洶的盟軍四十個師。此時盟軍也在法國地中海沿岸發動第二場登陸作戰，德軍負責防守的是布拉斯可維茲一級上將（Johannes Blaskowitz）指揮的G集團軍。這場登陸作戰原本的代號是鐵砧作戰，在盟軍最初的計畫中，鐵砧作戰是與諾曼第登陸的大槌作戰相對應，而且應該與大君主作戰同時發起，但由於缺乏登陸艇與盟軍在古斯塔夫防線投入太多時間而導致這次行動延後。邱吉爾強烈反對恢復鐵砧作戰，他希望攻下羅馬之後能讓亞歷山大迅速往義大利東北部進軍，甚至尋求一路攻向維也納的可能——亞歷山大也跟邱吉爾存有一樣的幻想。然而事與願違，盟軍部隊離開義大利，包括四個法國師與七成的戰術空軍，用以支援重新命名的「龍騎兵作戰」（Operation Dragoon）。這次行動的目標是登陸普羅旺斯海岸，以呼應諾曼第的軍事行動。這項決定令邱吉爾大為光火，

他對英國帝國參謀本部表示：「阿諾德、金恩、馬歇爾這三個人是我見過最愚蠢的戰略團隊。」不過邱吉爾進攻維也納的想法其實更脫離戰略現實，即使給他再多的兵力也不可能成功。<sup>241</sup>法國南部的德軍由於往北增援諾曼第而大幅削弱，與凱賽林撤退到羅馬北方的部隊相比，法國南部的德軍其實是更容易擊敗的目標。與大君主作戰一樣，德軍一直無法確定盟軍在地中海登陸的地點與時間。即使在八月十二日，德軍在薩丁尼亞島以西發現盟軍的運兵船護航艦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依然相信熱那亞灣是最有可能的登陸地點。布拉斯可維茲為了防備盟軍真的在法國南岸登陸，因此做了有限的準備工作，但到了八月中旬，許多防禦工事仍尚未完成。<sup>242</sup>

七月二日，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批准龍騎兵作戰，這項行動將於八月十五日展開，也就是盟軍在法萊斯合圍那天。龍騎兵作戰交由巴區中將的美國第七軍團執行，先鋒由曾經參與安奇奧登陸作戰的屈斯考特率領的第六軍負責。登陸的第二天，塔西尼將軍（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指揮的自由法國軍會以七個師的兵力攻占土倫海軍基地與重要港口馬賽。這次登陸作戰獲得龐大的海軍支持，包括五艘戰鬥艦、九艘航空母艦與二十四艘巡洋艦，此外還有地中海空軍四千架以上的飛機支援。邱吉爾甚至登上驅逐艦，親眼見證這場他仍認為「雖然進展順利，但無關也無助戰局的軍事行動」。<sup>243</sup>這場登陸作戰暨空降作戰的目標是土倫與坎城之間的普羅旺斯海岸，這個地點完全出乎德軍意料之外，因此只部署了一個裝甲擲彈兵團進行防衛。盟軍在所有登陸地點幾乎都只遭遇象徵性的抵抗，而後便立即朝內陸挺進。G集團軍司令部的反應遲緩，因為他們不確定這是盟軍主力登陸抑或只是一場大規模的襲擊行動。德軍第十一裝甲師位於隆河對岸，但因為所有橋樑都被盟國空軍炸斷，因此無法渡河圍堵灘頭堡。到了第一天結束時，盟軍已經有六

萬零一百五十人與六千七百三十七輛車輛上岸，灘頭堡也迅速擴大。<sup>244</sup>

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終於意識到整個法國防線有崩潰的危險，希特勒一反常態並未要求德軍死守，而是命令防守法國南岸的第十九軍團撤退。命令裡除了提到撤退，還要求第十九軍團沿隆河北上時要執行焦土政策，而且必須捉捕所有法國役齡男子做為人質，然而這項命令顯然無法執行。由於通信幾乎完全中斷，布拉斯可維茲兩天後才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往後幾個星期，布拉斯可維茲在遭受盟軍空襲下仍巧妙地讓軍隊沿著隆河撤退到瑞士邊境與亞爾薩斯之間的防守據點。法國部隊解放了土倫與馬賽，美國師則在八月二十三日抵達格勒諾布爾（Grenoble），並且改組為狄費爾斯中將（Jacob Devers）指揮的第六集團軍，而後與巴頓的第三軍團會師。八月二十日，德國安全部隊迅速將維琪政府轉移到德國南部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附近的西格馬林根（Sigmaringen）以避免被盟軍俘虜。五天後，雖然艾森豪並無解放巴黎的計畫，但在戴高樂堅持下，巴黎還是由勒克萊爾將軍（Philippe Leclerc）率領的法國軍隊占領。不到三個月的戰鬥，法國境內的德軍幾乎完全遭到驅逐，戴高樂率領的民族解放委員會返回國內建立新的法國政權。<sup>245</sup>

法國戰役對德軍來說是一場災難。大約有二十六萬五千人傷亡，三十五萬人被俘。德軍倉皇逃逸，幾乎捨棄了所有裝備。盟軍的入侵作戰原本讓艾森豪、布羅克與邱吉爾感到憂心，但戰事最後獲得成功，其原因卻也不難解釋。壓倒性的空中力量與強大的海軍使盟軍可以進行複雜的兩棲登陸作戰，地面部隊除了曾一度發生短暫的後勤危機，其他時候補給完全不虞匱乏，這些都構成了有效作戰的有利環境。儘管德國士兵仍以優秀的戰術持續捍衛難以防守的陣地，但結果終究無可挽回。如果



希特勒能早一點讓德軍撤退到德國邊境的防守據點，那麼儘管無法保住法國，至少可以避免一場全面潰敗。盟軍獲勝的代價也很高昂。到了八月底，盟軍傷亡達到二十萬六千七百零三人，其中超過半數是美國人。<sup>246</sup>諾曼第登陸與德國B集團軍的覆滅是英美在二戰取得的最大戰果。當前線敗戰的消息傳回德國，民心士氣降到了低點。一名巴伐利亞警察在報告裡寫道：「沒有人相信我們能打贏，因為每個戰場都傳來撤退的消息。在這種狀況下，一般民眾的心情有多麼低落，就不難想像了。」<sup>247</sup>



正當西方盟軍仍試圖突破德軍在諾曼第的防線時，紅軍也在東線發起了二戰規模最大且最具決定性的一場軍事作戰。史達林以對抗拿破崙的戰爭英雄，與他一樣來自喬治亞的將軍巴格拉奇翁（Pyotr Bagration）為這次作戰命名，巴格拉奇翁作戰於六月二十三日全面展開。不過這場針對白俄羅斯德軍後方地區的作戰，其實早在兩天前就已經開始。雖然史達林總是對外宣稱這次作戰是為了協助西線盟軍，當時盟軍正卡在法國鄉野高聳的灌木籬牆中動彈不得，但實際上這場對抗布西元帥（Ernst Busch）中央集團軍（蘇聯境內最後一支具有實力的德軍部隊）的作戰，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計畫妥當，是蘇聯針對整個廣大東部戰線發動一連串攻勢的一環。這些攻勢從六月十日攻擊卡內里亞地峽的芬蘭軍隊開始，到八月二十日在南方對羅馬尼亞與普洛什蒂特油田發動大規模會戰結束。這是一個規模驚人的作戰任務，顯示紅軍與日俱增的信心與資源物力。德軍方面，為了防守西線、南線與東線而必須將軍隊一分為三，因此在兵力不足的狀況下，軍方必須正確推測蘇聯夏季攻

勢的主要目標。由於紅軍剛在烏克蘭南部取得勝利，德軍因此認為紅軍應該會把重心放在南部與羅馬尼亞軸線上。東線情報長官格倫繼續重蹈之前情報工作的錯誤，認為中央集團軍可以有一個「平靜的夏天」——這是他在這場戰爭中犯下的最大一項錯誤。<sup>248</sup>東線戰場於是呈現一個南部德軍較強、中部較弱的態勢，這一狀況對蘇聯的作戰計畫正好十分有利。

除了德軍本身的誤判，紅軍也採取了欺敵作戰，不讓德軍發現他們正準備消滅中央集團軍。只有五個人知道完整的作戰計畫，他們是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與他的副手安東諾夫（Alexei Antonov），以及兩名作戰官。這五個人不許提起「巴格拉奇翁」這個名稱，無論在電話、信件或電報裡都不能。作戰發起日將等到準備工作就緒再決定，紅軍在與中央集團軍直接對峙的陣地裡明顯採取守勢，持續地挖掘壕溝與建立碉堡。在南方，紅軍用大量的假戰車、假營區與假火炮陣地構築了一個幽靈軍團，還設置了現役的防空砲加以保護，同時持續派遣戰鬥機進行巡邏，讓德軍信以為真。蘇聯調派了幾個方面軍進行增援，包括白俄羅斯第一、第二與第三方面軍，以及波羅的海第一方面軍，所有的軍隊調動完全保密。到了七月，已經有一百萬噸補給物資與三十萬噸燃料送到前線，其中一些是由《租借法案》所提供——一九四四年正值《租借法案》援蘇的高峰。<sup>249</sup>要進行巴格拉奇翁作戰，不僅要渡過數條大河，橫越不適合機動作戰的鄉野地區，還要對抗從一九四三年秋天以來數度擊退蘇軍攻擊的德國中央集團軍。紅軍能夠一一克服這些挑戰，欺敵固然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但真正的主因還是紅軍改變了作戰方式。紅軍如今採用了德軍在一九四一年使用的戰術，用強大的箭頭撕開敵軍防線，深入敵軍後方進行包圍，讓敵軍陷入混亂。布西擁有五十一個未滿編的師，總數四十八萬人，但其中只有十六萬六千人是正規作戰部隊，

希特勒命令他守住白俄羅斯幾座「要塞城市」，如莫吉廖夫、奧爾沙（Orsha）、維特斯克與波布魯斯克（Bobruisk），以此做為靜態防線，他們預期蘇軍會跟過去一樣不計死傷地進行正面強攻。布西沒有裝甲師，只有五百七十輛戰甲車，由於德軍預期紅軍將攻擊南方，因此駐守南方的莫德爾下轄的北烏克蘭集團軍被分配了八個裝甲師。中央集團軍的防線有六百五十架飛機支援，其中只有六十一架是戰鬥機，因為絕大多數戰鬥機全調去防守帝國本土或前往法國作戰。德軍的防衛極其薄弱，每一公里的防線平均只有一百人防守。<sup>250</sup>蘇聯四個方面軍總共有一百六十六個步兵師、騎兵師與裝甲師，兩百四十萬名男女士兵，三萬一千門火炮，五千兩百輛戰車與自走砲，五千三百架飛機，不過一開始攻擊時動用的兵力肯定沒有這麼多。<sup>251</sup>

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大批蘇軍發動猛攻，他們先入侵北部的突出部，往後兩天逐漸將戰線往南延伸。清晨，天還沒亮，掃雷戰車一馬當先穿越雷區，後面跟著步兵、戰車與火炮。照明彈照亮了前線，探照燈的強光讓守軍目眩；隨著德國守軍崩潰，紅軍機械化部隊穿過缺口，趁著德軍陷入混亂迅速往前突破，他們的任務不是消滅眼前的敵軍，而是製造出口袋，由後頭的步兵清除被包圍的德軍。紅軍的推進戳破了德軍的偏見，他們還以為紅軍跟過去一樣只會採取一成不變的戰術與笨拙地進行作戰。要塞城市迅速被紅軍包圍，德國最高統帥部拒絕讓城內的軍事首長撤離。維特斯克於六月二十六日陷落，一天後，奧爾沙也被攻占，再過兩天，莫吉廖夫與波布魯斯克也落入紅軍手裡。蘇聯裝甲部隊即使遭遇地形問題，依然迅速向前推進，他們不顧一切地往西衝刺，直到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的西側。明斯克於七月三日遭到占領，德國第四軍團頓時陷入巨大的包圍圈之中。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的軍事救火員莫德爾取代布西擔任中央集團軍司令，但他也認為局勢已難挽回，當前

要做的就是盡可能讓德軍井然有序地撤離。兩個星期的時間，德軍防線被鑿開一個寬四百公里、深將近一百六十公里的缺口，超過三十萬名德軍被俘。一名駐莫斯科的英國記者提到，蘇聯報紙在提到西線盟軍進展緩慢時，語氣中總是帶著「批評與鄙視」，<sup>252</sup>然而兩者的對比確實相當鮮明。在紅軍追擊下，德軍因為害怕被俘而慌亂撤退，這種狀況一直要等到一個月後才在法國出現。白俄羅斯第三方面軍進入立陶宛，七月十三日攻占維爾紐斯，八月一日占領考納斯。波羅的海方面軍的前鋒於八月初抵達里加灣，暫時切斷了德國北面集團軍與殘餘的中央集團軍的聯繫。到了八月底，紅軍的前鋒速度逐漸減慢並且停止，此時距離作戰的發起線已有四百八十公里，這是蘇聯主要會戰中戰果最輝煌的一次。

巴格拉奇翁作戰已經明顯成功，但在南方發動的攻勢還將帶來更多成果。七月八日，史達林與朱可夫計畫兵分兩路進攻波蘭，第一個攻勢於七月十三日發動進攻，由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由柯涅夫指揮）負責，目標是利沃夫與布洛帝（Brody）；第二個攻勢由羅柯索夫斯基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撥出部分兵力進攻布列斯特，然後朝流經波蘭首都華沙的維斯杜拉河挺進。柯涅夫在惡劣天氣下緩慢朝利沃夫前進，七月十六日，德國防線被突破，雷巴爾科將軍（Pavel Rybalko）在猛烈砲火下催促第三親衛戰車軍團穿過狹窄的走廊。與明斯克一樣，這次的突破相當成功，有八個德國師在羅茲地區遭到包圍。柯涅夫繼續前進，七月二十七日攻下利沃夫，在抵達維斯杜拉河後，又在桑多梅日（Sandomierz）建立重要的橋頭堡。羅柯索夫斯基也同樣節節勝利，與北方的巴格拉奇翁作戰一樣，他的進攻瓦解了德軍的防線。盧布林於七月二十四日攻占，位於蘇聯邊境的布列斯特則在四天後占領。羅柯索夫斯基迅速前進，於七月二十六日抵達維斯杜拉河，然後沿河北上，占領維斯杜拉河東岸，與華沙隔河相望。紅軍也嘗試渡過納雷夫河（Narew）與維斯杜



拉河，但德軍已經在一處狹窄而易於防守的地點設防，並且擊退了紅軍的前鋒部隊。德軍這次勝利同樣要感謝莫德爾的部署，然而不久之後他就被調往法國。蘇聯在東線戰場的最後一場攻勢是針對巴爾幹半島，這裡的德軍因為派出十二個師（包括六個裝甲師）增援北方而實力大為減弱。從八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德國南烏克蘭集團軍幾乎完全崩潰，損失將近十五萬人，在史達林格勒慘敗後重新組建的第六軍團，也於這次戰役再度遭到圍殲。<sup>253</sup>八月二十三日，安東尼斯古元帥的政府被推翻，羅馬尼亞軍方尋求停戰。從六月到八月，蘇聯的連番勝利促使德國的軸心夥伴與盟邦開始趁著時猶未晚放棄這場即將失敗的戰爭。

事實上，幾乎所有德國的戰時盟友都早已預期德國即將戰敗，有些國家甚至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已經試圖脫離軸心國陣營，以免日後遭到同盟國制裁。同盟國向芬蘭政府施壓，要求停戰，但芬蘭政府擔心芬蘭會像義大利與匈牙利一樣被德軍占領。芬蘭政府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德軍有二十萬人就駐紮在芬蘭北方的極地領土。當蘇聯巴格拉奇翁作戰獲勝已成定局，芬蘭政府終於決定冒險放棄戰爭。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芬蘭新任國家元首曼納海姆元帥（Carl Gustaf Mannerheim），宣布芬蘭軍隊放棄戰鬥。芬蘭與蘇聯（還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向芬蘭宣戰的英國）的停戰協定要求芬蘭歸還一九四〇年第一次蘇芬戰爭併吞的蘇聯領土與割讓赫爾辛基附近一處軍事基地給蘇聯，但史達林不想占領芬蘭，他只堅持芬蘭必須驅逐境內的德國人。十月以降，芬蘭依約執行驅逐德國人的政策，一開始只是隔著一段距離目送德軍撤離，直到看到德軍在拉普蘭執行焦土政策後，芬蘭才開始以武力驅逐德軍。<sup>254</sup>羅馬尼亞領導人早已與西方盟國有過祕密接觸，但直到紅軍入侵造成的震撼：在短短三天之內就突破羅馬尼亞防線，才迫使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King Michael）決定逮捕安東尼斯古元帥。到了八月三十一日，紅軍

進入首都布加勒斯特，前一天也控制了普洛什蒂特油田。儘管希特勒堅稱石油是德國進行戰爭的命脈，卻幾乎未設重兵防守油田。羅馬尼亞境內仍有德國駐軍，但羅馬尼亞軍隊轉換陣營，反而與過去的敵人蘇聯並肩作戰。到了九月中，羅馬尼亞已經將軸心國軍隊驅逐出境。

在保加利亞、匈牙利與斯洛伐克，狀況則完全不同。一九四二年，德軍在東線失利之後，斯洛伐克試圖減少對德國的軍事支持，但一直到了一九四四年，也就是巴格拉奇翁作戰之後，斯洛伐克軍事高層才決定退出與德國的同盟。八月二十九日，德軍進入斯洛伐克鎮壓民眾暴亂，最後在十月平定亂事；斯洛伐克最終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才被紅軍解放。保加利亞雖然是《三國同盟條約》的簽字國，而且也與德國一起向英美宣戰，但與斯洛伐克不同的是，保加利亞並未向蘇聯宣戰。儘管如此，史達林仍想在保加利亞駐軍，因為早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史達林就曾經想與希特勒達成協定，讓蘇聯在保加利亞取得利權。九月五日，蘇聯向保加利亞宣戰，三天後，蘇聯在羅馬尼亞的駐軍開始南進。九月九日，保加利亞共產黨「祖國陣線」（Fatherland Front）在首都索菲亞奪取權力並且下令軍方停止抵抗。一個星期之後，蘇聯陸軍與空軍抵達索菲亞，保加利亞軍隊被迫像芬蘭人與羅馬尼亞人一樣在塞爾維亞與匈牙利與德國人作戰。此時德國的情報人員也已得知匈牙利打算退出戰爭。一九四三年九月，匈牙利代表在伊斯坦堡與英國外交人員協商，但英方表示匈牙利必須無條件投降，而且必須等到盟軍抵達邊境時再向同盟國投降。同月，希特勒下令擬定作戰計畫，準備占領這個不值得信任的盟邦：希特勒認為匈牙利的原料資源對德國至關重要。一九四四年初，霍爾蒂政府仍搖擺不定，三月十九日，德軍發起「瑪格麗特作戰」（Operation Margarethe），幾乎完全沒遭到抵抗就占領了匈牙利。匈牙利政府領導人改由德梅將軍（Döme Sztójny）擔任，德國也任命費森麥

耶（Edmund Veesenmeyer）擔任駐匈牙利全權代表，不過德國仍讓霍爾蒂留任攝政一職，並保有部分影響力。到了秋天，霍爾蒂再度試圖讓匈牙利脫離戰爭，並且與史達林達成協議。<sup>255</sup>十月十一日，一名匈牙利代表在莫斯科達成初步協議，匈牙利同意放棄一九三七年以來獲得的所有領土並且轉而向德國宣戰。這一次，德國占領者決定逼迫霍爾蒂辭去攝政一職，由匈牙利法西斯主義箭十字黨領導人暨時任首相的費倫茨（Ferenc Szálasi）主持政府，費倫茨很快將自己的職位與國家元首結合在一起，並且以匈牙利元首自居。<sup>256</sup>匈牙利持續戰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戰爭結束為止，與墨索里尼奄奄一息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一樣，匈牙利最後也成為身不由己的軸心國夥伴。

## 代價高昂的勝利

一九四四年七月，當法國、俄羅斯與中國戰場仍打得難分難解之時，有兩個刺殺德國與日本戰爭領袖的陰謀正不約而同地醞釀著。隨著戰敗的陰影逐漸逼近，兩國的軍官都想避免最糟狀況發生。在日本軍方與政治菁英持續幾個月批評東條英機領導無方之後，一名參謀本部軍官津野田知重少校計畫用一枚裝滿氰化鉀的炸彈炸死東條。他和其他共謀者隸屬於「東亞聯盟」這一激進組織，該組織是由退役的石原莞爾中將所創立。他們希望東條英機下臺，改由皇族東久邇宮稔彥王領導政府，並且立刻透過蘇聯與同盟國和談。然而津野田還沒來得及實行計畫，東條就辭去了首相職位。津野田遭到告發、逮捕與監禁兩年。令人驚訝的是，包括石原莞爾在內的其他共謀者並未遭到監禁，石原甚至在幾個月後毫無忌憚地說：「人民已經厭倦軍隊與政府，他們已經不在乎戰爭的

結果。」 257

刺殺希特勒的陰謀與津野田胎死腹中的政變幾乎沒有共通點，兩者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刺殺失敗。主要的密謀者是一群德國參謀軍官，他們發現高層將領雖然對於希特勒的軍事領導感到挫折與幻滅，卻不願支持他們刺殺最高統帥。密謀刺殺的圈子很小，主要以垂斯考上校

（Henning von Tresckow）領導的中央集團軍參謀軍官為核心，但到了一九四四年，這些軍官開始與郭德勒（Carl Goerdeler）領導的民間保守抵抗運動以及前陸軍參謀總長貝克建立聯繫。一九四三年四月，史陶芬堡中校（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erg）加入他們的圈子，史陶芬堡原本是希特勒民族革命的熱情追隨者，全力支持希特勒進行戰爭，直到他看到猶太人與戰俘遭受的暴行之後，才完全改變立場。與其他反抗者一樣，史陶芬堡想阻止希特勒，以免德國遭到毀滅，民族榮譽遭到玷汙。然而史陶芬堡希望希特勒死後，西方盟國能容許德國繼續維持大國地位，並且由真正的「納粹主義者」進行威權統治。保守抵抗運動也抱持相同的想法，他們希望能與西方達成妥協，讓德軍能專注抵抗蘇聯的威脅。<sup>258</sup>往後一年多的時間，這些軍方密謀者不斷尋找刺殺希特勒的機會，但都未能成功。到了一九四四年，隨著德國面臨入侵與毀滅，這些密謀者不只想刺殺希特勒，還希望顛覆政權。他們同意在殺死希特勒之後，立即發起「女武神作戰」（Operation Valkyrie），這項作戰是原本就已經擬好的應變計畫，目的是讓陸軍平定國內可能發生的政變或革命。在六月的法國危機與蘇軍突破白俄羅斯之後，這些密謀者決定採取行動。

只有史陶芬堡有機會執行這項計畫，儘管他在突尼西亞戰役失去了右手、右眼與左手的兩根指頭，他還是自願帶著炸彈到希特勒出席的參謀會議上，伺機引爆炸彈。這項行動成功的可能性其實很低，史陶芬堡



攜帶炸彈三度參加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Obersalzberg）與狼穴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不過史陶芬堡卻沒有引爆炸彈，因為他想等到希姆萊與戈林同時出席時再下手。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史陶芬堡終於決定這次不能再拖延下去。今日，這起刺殺未遂的事件已廣為人知。這枚炸彈原本應該炸死希特勒與他兩名最親信的軍事參謀凱特爾與約德爾，但炸彈卻未能發揮最大殺傷力，因為炸彈安放在小木屋裡一張厚實的橡木桌底下，而非放在四周封閉的掩體。史陶芬堡回到柏林，以為希特勒肯定已經死去，於是就在當天稍晚發起女武神作戰。然而此時希特勒已經與柏林的戈培爾取得聯繫，告訴對方自己還活著，但爆炸的威力確實讓他感到身體不適。同一天，參與刺殺行動的陸軍參謀也在巴黎命令陸軍安全部隊逮捕所有親衛隊、保安處人員與蓋世太保。<sup>259</sup>然而幾個小時之後，當忠於元首的部隊知道希特勒還活著時，政變計畫隨即失敗。史陶芬堡與主要共犯迅速在國內軍總司令部的庭院遭到處決。在巴黎，犯人全部獲釋。往後幾個星期，親衛隊與蓋世太保根據從主要密謀者拷問出來的線索，又陸續逮捕了數百人。秋天，希姆萊發起「雷雨作戰」

（Operation Thunderstorm），把五千名社會民主黨員與共產黨員牽扯到這個恐怖網絡中，以免這些人日後圖謀不軌。這起政變反而讓希特勒相信「整個參謀本部已經遭到汙染」，更糟的是，他再也不相信德軍的專業將領。<sup>260</sup>然而，證據卻顯示武裝部隊仍然壓倒性地效忠他們的最高統帥，而絕大多數民眾則對希特勒遇刺感到震驚，唯有在聽到他平安無事之後才鬆一口氣。一名被俘的德國中尉對同樣也被俘虜的父親解釋說：「士兵在前線被殺，後方的軍官卻違背自己效忠元首的誓言，這當然讓民眾感到憤怒。」<sup>261</sup>信件與日記顯示當時的民眾擔心，一旦沒有希特勒，政治與軍事將陷入混亂，甚至很可能爆發內戰。一名父親寫信給在軍中的兒子，他說這「又是一則新的刀刺在背傳說」。<sup>262</sup>這起炸

彈事件反而在短期內鞏固了希特勒的領導權威，使民眾更堅決繼續戰爭來彌補少數人的背叛行徑。

在日本與德國，許多人都對戰敗的可能性與戰爭的可怕代價感到悲觀，但這種低落情緒未能激化成強烈的社會或政治反抗，也無法對主戰派構成明確威脅。直到現在，仍有人認為史陶芬堡的行動之所以失敗，在於密謀者未能尋求群眾支持，但以第三帝國當時的背景來說，要讓群眾起而要求停止戰爭與建立新政府無異於緣木求魚。在日本，高階軍官與知識分子可以批評戰爭的進行方式，甚至可以公開鼓吹終止戰爭，但這僅限於菁英階層。近衛文麿是日本重臣會議的元老，經常對戰爭結果發表悲觀的看法，而且極力要求天皇撤換東條英機。一九四四年初，內大臣木戶幸一已認為戰敗勢不可免，幾名海軍與陸軍將領也抱持相同看法，但他們不願公然與軍方高層為敵。一九四四年七月，小磯國昭陸軍上將接任東條的首相職位，他雖然表面上支持戰爭，私底下卻傾向於談和。然而在當時日本的政治秩序裡，首相無法駁回陸海軍高層的命令，而陸海軍高層依然決心推動最後一場大戰來拯救祖國，也就是本土決戰。<sup>263</sup>

另一方面，對於一般日本民眾來說，只要顯露出失敗主義與非法抵抗的傾向，就會遭到當局的嚴厲制裁。日本國內的反戰情緒早在一九四二年就以各種方式出現，可能是脫口而出的輕率批評，可能是匿名的塗鴉與標語，也可能是街頭巷尾流傳的戰敗傳言。這些言論都會受到特別高等警察（一般稱為「思想警察」）的調查，他們尤其注意這些反戰情緒是否可能形成對共產主義有利的革命局勢。特別高等警察甚至逮捕了政府的企畫院成員，因為他們的國家經濟計畫觀點太傾向於馬克思主義。<sup>264</sup>要找出造謠者與「在公共場所塗鴉」的人其實相當困難，諸如此類的事件雖然數量不多，但隨著戰爭持續，卻有逐漸增多的趨勢。根

據內務省的紀錄，從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平均每月有二十五起反戰與煽動事件，但從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卻增加到平均每月五十一件。<sup>265</sup>對天皇的怨恨也隨著戰爭持續而逐漸累積，這一點可以從塗鴉文字明顯看出。當局很少進行逮捕與起訴，但塗鴉者一旦被憲兵隊捉住，便很可能受到拷問，逼他們說出更多的失敗主義者名單。對地方層級的控制主要仰賴鄰里組織的監視，由鄰里領導人向上級告發社群裡的異議人士或失敗主義者。凡是被懷疑有反戰傾向的家庭，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會受到憲兵隊的監視。組織抗爭完全不被容許，違反禁令的人將受到嚴厲懲罰。<sup>266</sup>

德國人從事任何反戰行為，無論是涉嫌顛覆破壞或發表失敗主義言論，都會受到恐怖威脅。主政者內心充滿了疑懼，他們擔心國內的不安會重蹈一九一八年的危機，因此無論任何小事都會施以嚴懲。與日本一樣，德國具有反戰傾向的人其實只占人口中的極少數。專門審理戰時叛國案件的柏林人民法院，起訴的案件數量從一九四〇年的五百五十二件，增加到巔峰時期一九四四年的兩千零三件，一九四四年也是炸彈案發生的那一年。戰爭的最後幾年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被判刑的人數達到八千三百八十六人。<sup>267</sup>在獨裁體制下，表達反戰或失敗主義言論的風險極大，隨時可能遭到告發，在戰爭最後兩年更是危險，蓋世太保與憲兵往往私設刑堂任意取供，凡是涉嫌妨礙戰爭的人都可能被判處死刑。炸彈案發生的第二天，希姆萊被任命為國內軍司令（負責訓練與組織剛入伍的新兵），國內軍原本的參謀人員因為參與密謀刺殺而被逮捕。希姆萊警告各級將領，絕對不能重演一九一八年的危機。他也囑咐他在最高統帥部的代表，軍隊內部只要出現任何失敗主義傾向，都要予以嚴懲，讓招募來的軍官朝著「這些張口散布失敗主義的人」開槍。<sup>268</sup>隨著戰爭局勢惡化，恐怖手段也更加肆無忌憚，政治犯遭到任

意處死，逃逸的外籍勞工乃至於不願支持對敵人進行最後抗爭的一般平民與士兵都會遭到制裁。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前幾個月，特別警察與軍事巡邏隊巡視被轟炸的城市，他們有權任意處死可疑人士。在杜塞道夫，一名被判刑十年的年輕士兵只因為說這場戰爭毫無意義就被拉出去槍斃。一名十七歲的年輕人因為裝病而被拉下病床，接著被帶走殺害。一名老人被指控提供逃兵食物而遭到嚴刑拷問，最後被公開絞死，他的脖子上還吊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我是叛國賊。」<sup>269</sup>在鄰近的波琴（Bochum），一名男子對轟炸後正在清理瓦礫堆的人說：「這場戰爭已經輸了。」旁邊一名並非執法者的民眾聽見後，竟將他毆打致死。<sup>270</sup>

隨著戰敗的可能性愈來愈大，針對國內人口的恐怖手段也愈來愈嚴酷，民眾噤若寒蟬，不敢發表任何反對戰爭與戰爭結果的言論，想發起更廣泛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來結束戰爭更是不可能。十餘年來，日本與德國的民眾一直遭受警察的嚴密監控，他們很清楚發表異議會付出什麼代價。但是光憑恐怖手段無法合理解釋日本與德國民眾為什麼願意乃至於熱切地支持一場終將失敗的戰爭。日本與德國各自有著複雜的因素，無論是心理還是物質因素，這些因素以各種不同方式對個人產生了影響。兩國的軍人與平民投入戰爭並沒有一套標準模式。一九四四年秋天，德國治安單位提出的報告指出，雖然民眾似乎已經聽天由命、恐懼、渴望和平、冷漠與無動於衷，但他們依然願意「無條件堅持下去」。<sup>271</sup>在士氣低落的狀況下，對勝利的任何一絲期望都足以推動他們前進。希特勒在七月奇蹟般地逃過一劫，確實讓許多德國人相信勝利依然在望。日本與德國的領導人依然大談勝利，儘管說法十分空洞，但廣大民眾仍想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說服自己相信潮流即將轉變。在德國，戈培爾從一九四三年就定期宣傳國家研發了新的祕密「神奇武器」，許多人



的日記與信件也都提到這點，而民眾也相信希特勒手裡還握有讓盟軍感到吃驚的利器，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不過也有人懷疑這些報復性武器的實際效果，例如V1飛彈與V2火箭，這兩種武器在一九四四年夏天開始用來對付英國，但造成的損害不大。一九四四年，當德軍發起「秋霧作戰」（Operation Autumn Mist），對阿登的美軍防線發動猛攻時，德國民眾顯然出現了一波樂觀熱潮，他們認為德軍可以重演一九四〇年的戰役奇襲敵人，重啟勝利之路。<sup>272</sup>一九四四年秋天，日軍開始使用「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戰術，同樣也引發了民眾熱情。大家相信日本終於使出了最後手段，正如報紙上的一封讀者投書所言：「這會迫使敵軍投降。」<sup>273</sup>

日本與德國之所以要奮戰到底，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士兵們相信，即使戰敗，即使他們對民族領袖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們仍有責任作戰到最後來保護整個民族。這是一種毀滅與自我毀滅的情感。隨著死亡一天天逼近，強烈的命定論或虛無主義也進一步強化這樣的傾向。即使勝利已變得不切實際與遙不可及，日本與德國軍人仍想讓即將獲勝的敵軍付出高昂代價，殺死敵人就成了一種抗拒自身命運的行為。神風特攻隊顯然就是這種行為的表徵，四千六百人犧牲自己來破壞敵艦與殺死敵軍。日本文化強調為天皇與民族獻身的榮譽，而這份榮譽足以讓日本人克服道德上的不安，毅然決然地把人送去執行自殺任務。一九四四年十月開始進行自殺任務時，海軍報導提到「神鷹不渝的忠誠」，並且給予這些自殺飛機榮譽稱號，如純忠隊與至誠隊。<sup>274</sup>這些執行自殺任務的人必須盡可能多殺傷一點敵軍。同樣地，一九四五年開始一般士兵也接到命令，每個人都要準備一個信封，裡面放入自己的遺書與一綹頭髮，做為不可避免要在戰爭中犧牲的遺物。有些士兵認為自己的死相當值得，因為美國人也會死。一名日本軍官寫道：「我們必須從『塞

班島』與『瓜達康納爾島』學到教訓。我們必須捉住這些混蛋，殺死他們，挫骨揚灰。」他想著自己即將戰死，內心感受到莫名的「平靜」。<sup>275</sup>一般民眾也被期待用能取得的各種武器至少殺死一名入侵的敵軍。每個小學女童都應發給一支錐子，要她們將錐子刺進美國人的下腹。

德軍並未組織自殺部隊，但他們也總是盡全力造成敵軍損失，儘管處於無望境地也不改初衷。「不是勝利就是毀滅」這句話顯然無法激起每個士兵的鬥志，因為後者顯然更有可能發生，但殺死敵軍卻能給予德國士兵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相信自己獲得了勝利，儘管這個勝利全是自己想像。到了一九四四年，許多士兵的同袍都已戰死，光是一九四四年就有一百八十萬零兩千名德軍陣亡，這讓倖存士兵產生了一股為死者復仇的激憤情緒。一名士兵在自傳裡寫道，殺人或被殺都無所謂，這是「一種英雄式的虛無主義」，但也是一種被強烈復仇心玷汙的英雄主義，迫使他們向占領地的民眾與敵軍士兵復仇。<sup>276</sup>一名在義大利作戰的德國老兵解釋，戰鬥變得愈來愈野蠻，反映了「士兵對於自己年復一年投入犧牲，最終卻換來一場空感到憤怒，同時也對這場毫無意義的戰爭感到不滿」。<sup>277</sup>士兵們都知道自己面對嚴峻的現實，但在民族即將面臨一場不可避免的失敗之時，許多人仍願意投入這場充滿戲劇性與強烈情感的戰鬥。在德軍即將在西線發起最後一次反攻之前，倫德斯特元帥對他的部隊說：「你們的偉大時刻到了……不需要我多說。你們一定都有感覺：這場會戰，不是存活，就是滅亡。」<sup>278</sup>在戰爭的最後半年，有許多德國士兵認為死亡已不可避免，對自己能否存活不抱任何期待，因此不吝惜生命地投入一場又一場的自殺式抵抗，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

對民族命運的憂心，不只在戰爭最後幾個月左右了公共政策，也影

響了個人的思考。日本與德國政府持續警告國內民眾，一旦戰敗，必須預期最壞的狀況到來，因為敵人必定會將日本與德國連同所有人口一起去除。最早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德國官方就持續宣傳，一旦無法得勝，猶太人收買的非神聖同盟就將滅絕德意志民族。一九四五年二月的宣傳訓令強調，德國一旦被蘇聯占領將會面臨何等命運：「與敵人計畫加諸在德國身上的『布爾什維克和平』相比，戰爭帶來的一切苦難與危險顯得微不足道。」德國人如果不想讓布爾什維克的「子彈打在自己的後腦勺」，就必須傾全國之力抵抗到最後一刻。<sup>279</sup>在日本，人們大談西方的野蠻主義，認為日本人民必須群起抵抗，才能避免西方的野蠻主義在日本社會橫行。一些宣傳甚至表示，若讓西方人為所欲為，所有的日本婦女都會被強姦，所有的日本男子都會被閹割。這種若不反抗，婦女就會遭到性侵害的說法引發廣泛恐懼。<sup>280</sup>我們不知道日本一般民眾或武裝部隊到底存在多少這種幻想式的恐懼，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日本人確實不清楚盟軍會採取什麼樣的報復措施，在政府不斷灌輸民族將被滅絕而人民將被侵犯之下，不難想見日本軍民會做出超乎人們想像的非理性抵抗。

在戰爭的最後幾年，日本與德國的國家與政治體制在仍具有強制力的狀況下，繼續利用這種恐懼來最大限度地動員人民。日本打算將所有民眾動員起來，在最後一場戰爭中將入侵的美軍趕入海中。一九四五年三月，《公共法第五十號》動員所有沿海地區民眾興建防禦工事，包括學齡兒童，同月第二道命令又要求成立愛國民眾戰鬥軍，由十六歲到六十歲男性與十七歲到四十歲女性組成國民義勇戰鬥隊。<sup>281</sup>民眾只是名義上自願參加，事實上沒有人承擔得起拒絕參加的風險；參加訓練的男女手裡拿的是竹槍，並且藉由投擲石塊來模擬投擲手榴彈。日本計畫至少動員一千萬民眾來進行最後防守。與日本一樣，德國在七月炸彈事件

之後，盱衡整個情勢，也開始大規模動員民眾。七月二十一日，刺殺事件失敗的第二天，戈培爾被任命為總體戰總指揮，根據祕密情報顯示，這項任命獲得國人的歡迎，因為這證明當局正準備傾全力扭轉失敗的局面與驅散民眾對戰敗的恐懼。這次動員可以說是德國的最後一搏，許多更年邁與更年輕的德國人都在動員的範圍內，他們雖然不情願，但面對最後一次「為祖國奮鬥」的訴求，他們只能披掛上陣。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納粹黨開始組織本土民兵，也就是國民突擊隊

（Volkssturm），由那些不符合正常兵役條件的男子組成一支人數達六百萬的部隊，負責在最後的危機來臨時保衛帝國。希特勒在設立民兵的命令中指出，敵人的「最終目標是滅絕德意志民族」。希特勒青年團在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團員被問到是否願意早一點入伍時，居然有七成的人表示同意。幾年後，一名年輕的自願者回憶當初只是抱持著簡單的想法：「我們想保衛祖國。」<sup>282</sup>

相對於軸心國，盟軍遇到的困難是缺乏明確的口號來動員同盟國民眾為勝利進行最後的努力。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雖然盟軍已經明顯「贏得」這場戰爭，但同盟國民眾，特別是西方盟國，對於戰爭的厭倦與不確定感卻不亞於軸心國民眾。同盟國民眾已經不用像先前一樣擔心戰敗可能帶來的威脅，因此很難喚起他們的決心一勞永逸地結束這場戰爭。另一方面，一九四四年夏天的軍事勝利，使得羅馬、巴黎與布魯塞爾紛紛落入盟軍之手，但這場勝利並未如民眾原先所希望的給予軸心國致命一擊，民眾內心的挫折感一時之間難以消除。同盟國與軸心國民眾有著明顯的心理差異。對德國人與日本人來說，並不存在明確的「戰後」，只有勝利或毀滅兩種結果；同盟國民眾則希望迅速與盡可能以最少成本結束戰爭，讓軍隊早日復員與建立更美好的未來。同盟國士兵與民眾最初認為勝利就在眼前，之後發現勝利不僅難以實現，而且似乎愈



來愈遙不可及，其內心的失望可想而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當美國總統羅斯福結束德黑蘭會議返國時，發現民眾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已經贏了，我們可以鬆一口氣」，而他對此感到無法認同。<sup>283</sup>幾個星期之前，《生活》（*Life*）雜誌首次獲准刊登美軍士兵陣亡的照片，想藉此喚起民眾對戰爭的熱情。諾曼第登陸與盟軍在法國進展迅速，使後方民眾樂觀地以為德國即將失敗。然而戰爭部長史汀生卻發現，一旦戰役進展變慢，民眾不僅「喪失了迅速取勝的信心」，甚至意識到盟軍「可能陷入一場長期戰爭，必須進行艱苦的戰鬥」。<sup>284</sup>在英國，德國開始以V1飛彈與V2火箭進行復仇攻擊，澆熄了英國民眾對法國戰役的熱情，英國國土情報局的報告指出，遭受復仇武器威脅的民眾感到焦慮與「極度厭戰」，比以往都更加渴望戰爭早日結束。蒙哥馬利原本想藉由市場花園作戰來滿足民眾的期望，但到了十月，情況已相當明顯，想要結束戰爭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在我們眼前還要許多硬仗要打，」蒙哥馬利向布羅克表示：「如果進展順利，我們幾乎可以說已經打贏這場戰爭。但如果我們遭遇抵抗，難以前進，就表示戰爭很可能要繼續延長。」一九四五年二月，英國帝國參謀本部預測歐洲戰事在六月最後一個星期之前都不可能結束，甚至可能持續到十一月。<sup>285</sup>

在各個前線，陷入苦戰的士兵也反映出與國內民眾相同的情緒。法國戰役雖然起初獲得成功，但接下來的戰鬥卻變得愈來愈艱困。一九四四年九月與十月陣亡的英國士兵已經超過諾曼第登陸。「輝煌的一日似乎已成為過去，」一名英國士兵抱怨，「眼前的路將愈來愈難走。」士兵們原本認為秋天戰爭就會結束（當時預測是十月），但後來卻跟他們的父輩一樣困在法蘭德斯平原的泥濘與大雨中，持續面臨著危險，只能渴望戰爭早日結束。緩慢的推進速度與巨大的傷亡，使人產生憤世嫉俗的想法，咒罵著從手中溜走的勝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名美國戰車

兵對記者瑪莎（Martha Gellhorn）說道：「這場戰爭已經結束了。妳不知道嗎？我一個星期前從廣播聽到的.....該死，一切都結束了。我問我自己，我還在這裡做什麼。」<sup>286</sup>九月初，在已經解放的布魯塞爾，一名士官告訴一名英國軍官，廣播宣布「德國已經投降，希特勒已經逃到西班牙」，但這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幾天後，這名軍官動身前往下一個戰場，他在日記裡寫道：「要是和平的傳言是真的就好了！」<sup>287</sup>隨著和平愈來愈接近，有些士兵愈來愈不肯冒險，他們不想太快戰死。德國與日本士兵則不同，他們努力堅守，心知自己生還的機會渺茫。美軍由於超乎預期地急需士兵，因此針對十八歲以上的男子進行動員，美軍的兵員補充往往是讓有缺額的部隊一次補滿，這些新兵在沒有同伴或充分準備下倉促上陣，儘管跟老兵一同作戰，但老兵在急欲保命下往往犧牲新兵性命，導致新兵傷亡率極高。<sup>288</sup>紅軍也有類似的問題，比較年輕與比較年邁的新兵，或尚未完全傷癒的士兵，被用來補充較有經驗的部隊缺額。紅軍前線士兵的狀況非常糟糕，缺乏糧食與鞋子，醫療物資有限，竊盜與暴力橫行。一名士兵在給家人的信裡提到：「最近一段時間，我對戰爭感到非常厭倦.....當然，這麼想是沒有用的，這場戰爭到今年冬天都不會結束。」巴格拉奇翁作戰的成功讓士兵們感到振奮，許多蘇聯士兵以為德軍已經戰敗，只要打到蘇聯邊境就可以結束戰爭，結束他們的軍人工作。結果發現，他們還必須攻進德國境內。士兵身心俱疲，需要長期休養。也就是說，勝利至少還需要幾個月的苦戰才能獲得，一切都要等到一九四五年才有可能結束。<sup>289</sup>

人們渴望和平，但現實上仍有需要擊敗的致命敵人，兩者之間的拉扯造成了緊張與不安。不僅如此，早在勝利出現曙光之前，一九四三年就已經出現復員與返歸和平生產的計畫，這對英美的軍隊也構成影響。在美國，軍事生產開始遭到削減，之後又推出重啟工廠生產少量民生物

品的計畫，一些商業廣告甚至開始宣傳勝利後即將銷售的商品。恢復工業生產的計畫，使軍事官員與民政官員為此爭論了一年，前者要求生產更多的彈藥、炸彈與戰車，因為入侵法國與義大利的損耗太大，急需補充，而後者認為必須回應民眾的需求，盡早結束管制與配給。許多工人轉而投入他們認為比較安全的民生產業，導致軍事生產量萎縮了四分之一。<sup>290</sup>有些士兵已經藉由「調整兵役評分」計畫而退伍返國，這項復員計畫主要根據士兵的作戰月數、年齡、家庭狀況、負傷與勳章來進行評分。從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初就參與戰鬥的人，只要獲得八十五分就能返家與退出戰鬥行列。轟炸機機組人員在出勤三十次後就可返回美國（如果他們真能活那麼久的話），這些人被戲稱為「快樂勇士」。陸軍與航空軍士兵可以努力爭取這樣的資格，然而只要離符合資格的門檻愈來愈近，他們冒險的動機也會愈來愈低。<sup>291</sup>在英國，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了一本手冊《退伍與安置》，裡面列出了復員的資格，同樣引發類似的問題。同月，當希特勒下令成立國民突擊隊時，英國的志願民兵本土防衛隊（Home Guard）卻功成身退，因為英國已不需要這些民兵服役。在戰場上，年紀較大的人與長久在海外作戰的人可以獲得較高的復員評分，但所有服役的人都有機會提高自己的復員分數。百分之十的士兵將被歸類為擁有核心技能的工人，符合重建計畫的需要而可以首先退役，許多人因此爭相證明自己擁有別人沒有的「技能」。<sup>292</sup>雖然英美的退役政策並未阻礙兩國繼續作戰，但對軍人與民眾而言，當所有人的目光已開始望向戰後世界時，眼前的戰鬥就更令人難以忍受。一九四五年初，艾森豪的副參謀長表示：「從各種跡象來看，要讓戰爭成為優先選項，簡直比登天還難。」<sup>293</sup>

從這點來看，德國與日本領導人希望藉由延長戰爭與擴大戰爭損失來消磨敵人的戰鬥意志之事，並非毫無根據。戰略上的爭論依然困擾著

英美關係，而與蘇聯的合作，則因為一九四四年秋天史達林對東歐的野心逐漸浮上檯面而開始生變。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前線的持續推進造成後勤補給線不斷拉長與複雜化，導致盟軍的進展緩慢，使其在最需要後勤補給的地方喪失了原有的物質優勢。德軍將領嘲弄盟軍在遭遇劣勢時往往反應遲緩，德國情報單位也發現盟軍逐漸喪失快速推進的能力，而且同盟國之間也出現矛盾。八月底，希特勒對他的將領們表示：「歷史告訴我們，所有的同盟都會破裂，但你必須等待破裂的時刻到來.....我們必須持續這場鬥爭，直到腓特烈大帝所說的，『其中一個該死的敵人在絕望中放棄』」為止。」<sup>294</sup>在日本，直到一九四五年仍有許多人認為，只要一次局部性的勝利就有可能迫使厭戰的敵軍進行和談，就連裕仁天皇也相信這點。

在歐洲與亞洲的每個主要戰線都出現了僵局。日本在中國戰場的最後一次反攻使雙方精疲力竭。雖然一號作戰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初，但此後日本已無力進行更具野心的奪取重慶計畫。從越南通往朝鮮的鐵路線，證明只是一場空洞的勝利。陳納德將軍的駐華第十四航空軍仍持續從新的機場起飛，轟炸鐵路線與交通運輸。雖然一九四四年的漫長戰役幾乎致命性地削弱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但中國終究阻止了日本更進一步入侵，因此勝負仍懸而未決。馬歇爾與羅斯福長久以來都認為在亞洲大陸進行大規模會戰毫無意義，因此一直不願給予中國軍隊需要的補給物資。絕大多數送往中國的物資都是用來支援美國空軍，包括新型的波音B—29重型轟炸機。美國認為相較於在中國進行地面戰，使用B—29反而更能有效削弱日軍的抵抗力量。

在對日作戰的最後幾個月，蔣介石終於實現一件願望：他堅持美國必須把尖酸刻薄的史迪威調職，因為儘管史迪威在緬甸的表現極其糟糕，史迪威仍不斷要求羅斯福指示蔣介石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他。



當美國提出移交指揮權的要求時，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這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sup>295</sup>在蔣介石的抗議下，羅斯福勉為其難地同意撤換史迪威，十月底，兩年來處心積慮破壞中美關係的史迪威終於被迫離開中國。史迪威的位子由魏德邁將軍（Albert Wedemeyer）接任。魏德邁原是東南亞戰場總司令蒙巴頓的參謀長，蒙巴頓認為史迪威的能力連一個團都無法指揮，而他的說法幾乎沒有人反對。魏德邁上任後著手改革蔣介石的軍隊，一開始先建立三十六個美械師。他計畫進行「黑金剛石作戰」（Operation Carbonado），在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在華南地區發動戰役，奪取香港或廣州，只不過在作戰發起前日本就宣布投降。<sup>296</sup>史迪威去職後，蔣介石接受美國領導，不過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他曾祕密派繆斌前往東京，試圖協商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sup>297</sup>一九四五年夏初，日本遠征軍試圖奪取陳納德位於芷江的新機場。這是日本最後一次發動攻勢。魏德邁部署了六十七個中國師，共六十萬人，對抗日本第二十軍的五萬人。在這場中日戰爭最後一場主要會戰中，國民政府的軍隊終於擊敗了衰弱不堪的日軍。<sup>298</sup>

在東南亞與太平洋戰場，盟軍在戰略上一直爭論不休，導致盟軍在塞班島與緬甸戰役獲勝後遲遲未能有所進展。一九四四年初以來，邱吉爾一直想著要在蘇門答臘北部進行兩棲登陸以做為收復新加坡的跳板，他為這次作戰取的代號是「蛇砲作戰」（Operation Culverin）。邱吉爾想藉此恢復英國一九四二年潰敗後在亞洲帝國的名聲與重新建立殖民統治；他深信必須由英國擔任解放者的角色，而非美國。<sup>299</sup>對美國領導人來說，蘇門答臘作戰跟打敗日本一點關係也沒有，這項提案充分顯示邱吉爾把帝國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邱吉爾的參謀一直勸他專心協助美國進行太平洋戰爭，但邱吉爾依然堅持己見。英國皇家海軍參謀總長在會議上試圖說服邱吉爾放棄固執的想法，但徒勞無功，於是抱怨說：

「這個人簡直在拖累大家。」<sup>300</sup>英國駐美資訊服務處提出警告，「一般美國民眾對我們的評價愈來愈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民調顯示，百分之五十八的美國民眾認為英國阻礙盟國之間的合作，只有百分之十一的民眾認為問題出在蘇聯。<sup>301</sup>蘇門答臘計畫最後只能放棄，因為登陸艦、兩棲裝備與護航艦隊是登陸作戰的必要條件，這些條件無法滿足，計畫自然無法進行。但邱吉爾仍不滿意，他繼續提出一些無法實現的計畫，如入侵馬來亞，代號「拉鍊作戰」（Operation Zipper），與入侵新加坡，代號「鎧甲拳作戰」（Operation Mailfist），但這些計畫全都遭到放棄。

除了與英國的爭論，更大的問題還在於尼米茲與麥克阿瑟對於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略走向存在歧見。一九四四年初以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直認為可以繞過菲律賓，讓美國海軍在麥克阿瑟部隊的支援下直接攻取臺灣，然後入侵日本本土。儘管日本軍方高層認為失去菲律賓可能對日軍的作戰構成災難性損失，但金恩海軍上將仍認為菲律賓無關緊要。麥克阿瑟認為自己對於兩年前拋下的菲律賓人有道德上的義務，因此他必須解放菲律賓群島，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認為這項理由不足以說服他們放棄臺灣，畢竟臺灣是進攻日本最合適的跳板。直到美軍發現臺灣的防衛森嚴，而相較之下菲律賓較容易進攻時，金恩與尼米茲才同意由麥克阿瑟指揮入侵菲律賓，但他們反對為這次戰役設立聯合司令部。雖然麥克阿瑟話說得很好聽，表示自己可以在「三十天內」征服菲律賓，而且會避免他所謂的跳島戰役中「美國人遭到悲劇而毫無必要的屠殺」，但馬歇爾與其他將領仍認為陸軍會困在菲律賓的崎嶇地形中，使美軍盡可能接近日本的計畫遭到延後，至於海軍則擔心菲律賓戰役若曠日費時，那麼他們進攻硫磺島與沖繩島的時程就會遭到延宕。<sup>302</sup>麥克阿瑟似乎忽略了日軍堅守菲律賓的現實，也忘了一旦戰事延長，對菲律

賓人將帶來巨大的傷害。美軍顯然可以繞過菲律賓，而且可以用更低的代價消滅菲律賓的日軍。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美軍終於擬定新的戰略方針，所有的爭論到此結束，並且決定於十月二十日進行第一次登陸作戰，目標是菲律賓的雷伊泰島。一九四四年秋天，歐洲與中國戰場都陷入僵局，而接下來南太平洋似乎也將出現另一個新的僵局。

在龐大海軍艦隊護航下，六個陸軍師（兩個預備師）總數達二十萬兩千五百人登陸了雷伊泰島，島上守軍只有一個日本師團，人數兩萬人。如馬歇爾所擔心的，這次作戰幾乎從一開始就陷入困境。往後兩個月，美軍遭遇了三個颱風與將近九百公釐的雨量。士兵們在雨季的泥淖中努力卸下與保護裝備。興建機場是這次作戰的核心任務，但多雨的氣候條件使得工程進度落後，結果三座作戰用的機場直到十二月中才完工。士兵們長期穿著濕透的軍服與軍靴，導致許多人罹患壕溝足等疾病。這座防守薄弱的島嶼歷經超過兩個月的苦戰，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攻下，受困山區與叢林的日軍則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才完全消滅。戰役陷入困境令麥克阿瑟感到挫折，尼米茲警告他必須延後接下來的軍事作戰。菲律賓的最大島呂宋島必須等到一月九日才能攻打。征服菲律賓顯然不是三十天可以輕鬆取勝的事，甚至可能持續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雅爾達會議上的聯合參謀首長悲觀地預言，對日戰爭恐將持續到一九四七年。

這場會戰唯一的亮點是海軍在十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取得勝利，當時日本海軍嘗試做到他們在瓜達康納爾島與塞班島未能做到的事：企圖攻擊與消滅雷伊泰灣的登陸艦與儲存物資。日本的「捷號作戰」

（Operation Shō-Go）跟日本先前幾次大規模海軍作戰一樣，都有計畫過度複雜的問題。四支艦隊各自集結，而非集中力量進行一擊：主力艦隊擁有兩艘超級戰鬥艦、三艘老舊戰鬥艦與十艘重型巡洋艦，構成鉗形

攻勢的西路；第二分遣艦隊擁有兩艘戰鬥艦與一艘重型巡洋艦，構成鉗形攻勢的東路，這支艦隊將進入雷伊泰灣，由做為預備隊的第三分遣艦隊從旁支援。在北方，只搭載少量飛機的四艘航空母艦與兩艘老舊戰鬥艦組成的艦隊擔任誘餌，引誘支援雷伊泰作戰的海爾賽航空母艦特遣艦隊北上。海爾賽順利上鉤，在十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晚間往北航行，試圖攔截日本航空母艦，但途中接到緊急警報要求返航，因為此時日軍艦隊正分成東西兩路包圍雷伊泰灣。海爾賽把艦隊分成兩半，留下一半負責擊沉四艘日本航空母艦，但此時雷伊泰灣已經不需要他的協助。<sup>303</sup>雷伊泰灣的美軍飛機、外圍的驅逐艦與戰鬥艦艦砲先消滅了經過蘇利加海峽的東路分遣艦隊，然後回頭阻擋栗田健男海軍中將率領的主力艦隊。栗田艦隊在抵達雷伊泰灣之前穿過西邊的聖貝爾納地諾海峽，途中經歷的海戰使他損失了兩艘重型巡洋艦與超級戰鬥艦武藏號。栗田遭遇意想不到的抵抗，他在震驚之餘決定撤退，表面上說是（他日後宣稱）要追擊一支不存在的美國航空母艦部隊，然而他的艦隊沒有飛機，若真有那麼一支艦隊存在，他也不是對手。日本海軍損失三艘戰鬥艦、四艘航空母艦、六艘重型巡洋艦與十七艘軍艦。<sup>304</sup>雷伊泰灣海戰重創了已所剩無幾的日本水面艦隊，即使雷伊泰島的灘頭與登陸艦遭受嚴重損失，美國海軍幾乎一定能恢復原狀。十月二十五日，日本首次發動神風攻擊，美軍三艘護航航空母艦遇襲，其中一艘重創。這是個不祥的開端，往後一年將會陸續出現一連串的自殺攻擊。

※ ※ ※

在歐洲，法國與比利時、義大利、波蘭等三條面向德軍的主要戰線，到了秋天之後便停滯不前。除了因為德軍的頑抗，也因為盟軍從夏



天持續作戰至今，士兵們早已疲憊不堪，此外補給基地遠在後方，出現了補給上的問題。德軍從白俄羅斯與法國倉皇撤退之後，依然能持續挫敗盟軍，使盟軍深感意外。九月四日，當蒙哥馬利集團軍接近安特衛普時，艾森豪曾向各級將領表示，整個戰線的德軍都已經瀕臨崩潰：「他們在全面撤退下組織散亂，不可能出現像樣的抵抗。」<sup>305</sup>雖然艾森豪拒絕讓蒙哥馬利率領集團軍孤軍深入越過萊茵河直取柏林（「蒙哥馬利想得太簡單」，一個星期後艾森豪對馬歇爾說道），但他確實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可以取得魯爾與薩爾工業區。<sup>306</sup>在義大利，德軍從羅馬撤退到佛羅倫斯以北的哥德防線，亞歷山大認為此時的德軍剛剛遭到擊潰，許多師只剩下兩千五百人左右，既沒有裝備也沒有空中支援，他打算一口氣突破防線掃蕩義大利北部，然後再進攻維也納。<sup>307</sup>無論在法國還是義大利，盟軍都認為德軍已瀕臨崩潰，然而事實證明為時尚早。在義大利，由於撥出大量部隊支援法國南部戰役，亞歷山大缺乏攻擊所需的兵力，英國帝國參謀本部也認為面對困難地形與即將到來的惡劣天氣，必須採取審慎態度。盟軍最後決定兵分兩路：克勒克的美國第五軍團現在只剩下五個師，準備越過山區進攻波隆那，由新成立的美國第十山地師從旁支援；李斯中將（Oliver Leese）的英國第八軍團將進行橄欖作戰，從海岸平原往里米尼推進。雖然盟軍成功突破沿岸地區的哥德防線，卻造成慘重的傷亡。而在突破防線之後，前方還有幾條河流橫亙，在秋天的大雨之下，原本平靜的河川變成洶湧的急流。亞歷山大面對頑強的德軍，地形又有利敵軍防守，自己的部隊卻因為這場戰役而力不從心，泥濘的地面與低落的士氣使義大利前線成為盟軍高層眼中的死水。克勒克日後提到，他的部隊「完全無法前進，因為士兵們無法繼續打仗……我們耗盡了前進的衝力，行動既遲緩又費力」。<sup>308</sup>到了十一月底，亞歷山大修改目標，打算在十二月攻下波隆那與拉溫納

（Ravenna），然而疲倦的軍隊還是力有未逮，戰線依舊毫無進展。十二月三十日，亞歷山大決定停止更進一步攻勢，一切等來年春天再說。

在西線戰場，盟軍經過最初的瘋狂追擊後，到了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步調開始放慢，等待後方的補給物資與重砲運抵前線。艾森豪向聯合參謀首長會議表示，補給線已經「延伸到了極限」，因為裝備的運補維修必須仰賴港口，而港口位於法國西北部，離前線將近五百公里遠。<sup>309</sup>儘管如此，艾森豪還是批准了蒙哥馬利提出的一項充滿野心的計畫，由盟軍第一空降軍團攻占奈美根（Nijmegen）與安恆

（Arnhem）以控制橫渡萊茵河的渡口，由何洛克斯中將（Brian Horrocks）率領英國第三十軍經由安特衛普前方的突出部前往支援。這次行動完全不是蒙哥馬利典型的作戰方式：計畫匆促，空中支援整合不足，對德軍兵力的情報掌握不夠充分，沒有事先部署火砲支援，兩個側翼都暴露在一定數量的德軍面前。艾森豪批准「市場花園作戰」

（Operation Market-Garden）僅僅是因為他認為德軍仍處於混亂狀態，不太可能抵擋得住盟軍大膽的攻擊。此外艾森豪也希望控制萊茵河下游的渡口，如此當布萊德雷的第十二集團軍順利在南方取得渡口時，就能南北相互呼應。另一方面，蒙哥馬利認為市場花園作戰可以確保他支持的戰略獲得執行，也就是迅速攻進德國境內，直取柏林——但美軍將領並不希望由英軍獨享戰果。這次作戰的結果如今已十分清楚。從九月十七日開始作戰之後，許多潛藏的陷阱一一浮現。盟軍順利攻占奈美根的橋樑，但在安恆卻遭遇武裝親衛隊第二裝甲軍的反攻，這點完全出乎蒙哥馬利的預料之外。第三十軍卡在一條狹窄的道路上，步兵無法迅速前進，因而遭到德軍的攻擊。安恆的空降部隊在關鍵時刻得不到地面支援，造成了災難，絕大多數士兵陣亡或被俘。九月二十六日，市場花園作戰中止，盟軍一萬五千人傷亡，德軍則是三千三百人傷亡。從北部攻

入德國的計畫就此破滅。

英國第二十一集團軍必須花費數月的時間，在惡劣的天氣下，對突出部鄰近地區進行掃蕩。這裡的地勢平坦，運河交錯，許多村落在戰火下遭到嚴重破壞，一名士兵說道：「荒涼的景象令人慘不忍睹。」<sup>310</sup>艾森豪認為蒙哥馬利接下來必須專注於開啟安特衛普港，在此之前德軍第十五軍團的殘餘部隊令人意外地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從安特衛普撤退到瓦刻藍島（Walcheren），德軍因此可以從這座島嶼控制須耳德河

（Scheldt）河口，使盟軍無法從海上進行運輸。加拿大第一軍團奉命肅清安特衛普以北地區，但在此前仍須先攻占利哈佛、布洛涅、加萊與敦克爾克這幾座希特勒指定堅守的港口與要塞，因此一直到了十月，加拿大第一軍團才真正能夠往更東部的地區進行掃蕩。十一月八日，盟軍攻下瓦刻藍島，安特衛普終於可以成為盟軍海上運輸的港口。第一批自由輪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安特衛普停靠，盟軍自此有了較近的補給基地，因而有能力對德國進行更長期的軍事作戰。惡劣的天氣加上慘重的傷亡，西線戰場逐漸形成僵局。持續將近六個月的戰鬥，人力與物資都消耗巨大，蒙哥馬利集團軍底下的每個步兵師，平均損失兵力高達四成。<sup>311</sup>在當前的狀況下，無論是直搗柏林還是急襲維也納，顯然都不切實際。

秋末，美軍在南方進攻薩爾區與魯爾河水壩的攻勢也陷入停頓，德軍撤退到西牆要塞與胡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防線。美軍面對濃密的森林地帶，無法施展必勝的空中、裝甲與火炮聯合攻擊。霍奇斯將軍（Courtney Hodges）的美國第一軍團必須在最惡劣的狀況下擊退敵軍，造成美軍約有兩萬九千人傷亡，這場戰役的核心目標並非爭奪領土，而最重要的水壩最後還是掌握在德軍手裡。<sup>312</sup>巴頓將軍指揮的美國第三軍團有四個師成功渡過摩塞爾河，但也因此耗費大量的燃料與補給，最

後在未能達成艾森豪的目標下停頓下來。等到十一月美軍能夠重啟攻勢的時候，天氣已變得十分惡劣，而西線的德軍已從九月初的只有十三個步兵師與三個裝甲師能夠戰鬥，暴增到七十個師，包括十五個裝甲師。<sup>313</sup>此時布萊德雷跟先前的蒙哥馬利一樣，突然極度樂觀地認為，第十二集團軍在沿著隆河流域北上的第六集團軍支援下，將可奪取薩爾盆地，進而攻占魯爾工業區。到了十二月，美軍在德軍頑強抵抗下終於攻破西牆要塞，但還是無法渡過萊茵河。與義大利一樣，美軍的大規模攻勢必須等到來年春天才能進行。

在東線戰場，德軍的抵抗也十分頑強。東部各省的民眾全動員起來挖掘壕溝與興建新的東牆，在強制命令下，約有七十萬名德國男女與青少年，還有波蘭勞工全要接受動員。在一些地區，女性與男孩的數量甚至超過成年男性，他們每十二小時輪一次班，在幾個星期之內完成了數百公里的臨時壁壘。納粹黨與親衛隊大力主張動員民力來興建防禦工事，但軍方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當時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紅軍需要一個小時又兩分鐘突破新的東牆，一小時的時間用來嘲笑，兩分鐘用來越過東牆。然而納粹黨動員民眾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避免民眾恐慌與逃亡，並且加強民眾的決心，讓他們為祖國作戰到最後一刻。<sup>314</sup>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在遇刺後的七月二十一日任命古德林擔任陸軍參謀總長，古德林根據希特勒的訓令建立據點遲滯蘇軍推進。古德林在命令中要求從波羅的海沿岸的梅梅爾（Memel）到西利西亞的奧珀恩（Oppeln）興建二十五個要塞，構成一個要塞城市網。<sup>315</sup>然而，原本預期蘇軍將越過維斯杜拉河進行攻擊，結果蘇軍並未出現。蘇軍經歷漫長的橫越白俄羅斯與波蘭東部的戰役後已精疲力竭，軍隊需要休養、重整與建立更健全的補給線，之後才能進攻德國本土，而這一切都將延後到一九四五年一月。



北方的蘇軍試圖切斷但澤與東普魯士的德軍後路，卻因為德軍堅強抵抗與蘇軍傷亡慘重而失敗。史達林於是轉而將重點放在占領波羅的海國家上，想藉此孤立北面集團軍。而希特勒既不准北面集團軍撤退，又不准他們突圍。到了十月十日，紅軍抵達波羅的海岸邊，已經接近梅梅爾。三十三個德國師，總數將近二十五萬人，受困在拉脫維亞的庫爾蘭半島上，他們絕大多數一直遵守希特勒的命令，直到德國最終戰敗為止。<sup>316</sup>十月十日，蘇聯另一支部隊越過德國邊境進入東普魯士，幾乎攻抵重要的鐵路樞紐弓賓倫（Gumbinnen），但令蘇軍感到意外的是，德軍依然有能力擊退蘇軍，導致蘇軍必須暫時停止攻勢。此時史達林另一個關切的重點，無論是基於軍事還是政治考量，乃是迅速地將紅軍送進巴爾幹半島與中歐，使西方盟國無法介入這些地區。十月底，在蘇聯支持下，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攻占貝爾格勒，之後蘇軍試圖入侵匈牙利，想藉由匈牙利進入奧地利維也納，但德軍與匈牙利軍隊的激烈反抗使蘇軍難以推進，因為希特勒無論如何都要保住巴拉頓湖（Lake Balaton）西南部的小油田。布達佩斯成為南方的重要堡壘，由德軍與匈軍共同防守。十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命令馬利諾夫斯基將軍（Rodion Malinovskii）的烏克蘭第二方面軍在一天之內攻下布達佩斯，因為經由匈牙利進攻維也納在政治上至關重要，但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蘇軍也僅能包圍西半部的布達，而圍城也造成慘重的傷亡。<sup>317</sup>這場戰役一直到隔年二月才結束，匈牙利首都在轟炸與砲轟下幾乎完全摧毀，守軍也從十二月的七萬九千人減少到只剩一萬一千人。大約十萬名匈牙利士兵與平民死亡。<sup>318</sup>到了一九四四年底，無論是亞歷山大在義大利的盟軍部隊，還是史達林的紅軍，兩者顯然都無法打通前往維也納的道路。

德國的波蘭與東普魯士防線暫時穩定下來，這讓希特勒打算冒險嘗試他在八月時曾經考慮過的一項戰略計畫，當時他要求派出一支專門部

隊，從佛日山脈防線進攻美國第十二集團軍的後方與側翼。當時希特勒計畫成立一支G特遣部隊，下轄六個裝甲師與六個新裝甲旅，不過由於德軍持續撤退，這項反攻計畫因而取消。<sup>319</sup>到了九月中，希特勒將計畫擴大，他想發動攻勢，從美國集團軍與英國集團軍之間插入，迫使蒙哥馬利的第二十一集團軍掉進口袋，然後德軍繼續往安特衛普推進，使盟軍縮短補給線的梦想破滅。希特勒甚至希望這個軍事作戰可以引發西方盟國之間的重大政治危機。九月十六日，他對自己的親信說道：「從阿登反攻：目標安特衛普。」<sup>320</sup>德軍才剛在法國打了敗仗，而且德國邊境已經開始出現戰鬥，希特勒此時提出這樣的計畫，顯然無法得到絕大多數德軍將領的支持，包括在九月初重新回任西線總司令的倫德斯特，以及被任命為此次戰役指揮官的莫德爾。希特勒的構想只能仰賴集中少數兵力，因為整個防線仍需要兵力防守，此外成功的條件在於陸軍必須攻占對方的燃料庫與仰賴盟軍的補給繼續作戰。德軍將領很清楚在機動性不足（這次行動需要五萬匹馬）、各種補給物資缺乏與部隊訓練有限的狀況下，要發動大規模攻勢有多麼危險，但他們無法改變希特勒的想法。

希特勒堅持「守護萊茵作戰」（Operation Wacht am Rhein）必須完全保密，他不顧眾人反對，依然堅持他的直覺，認為無論發生什麼問題，這場會戰都將改變西線戰場的態勢，或許還會改變「整場戰爭」。<sup>321</sup>十一月中，希特勒接受聲帶手術，導致這場已經更名為秋霧作戰的計畫延後，直到十二月一日他再度現身，至少能夠低聲說話時作戰才開始進行。<sup>322</sup>作戰發起日持續延後，起初是十二月十日，之後為了利用惡劣天氣使盟軍飛機無法起飛，因此又延後了六天。十二月十六日早上，二十四個師共四十一萬人、一千四百輛裝甲戰鬥車輛、一千九百門火炮與超過一千架飛機出其不意地奇襲盟軍。德軍兵分三路：北路

由狄特里希（Sepp Dietrich）的武裝親衛隊第六裝甲軍團穿越阿登森林與攻占安特衛普；中路由曼陶菲爾將軍（Hasso von Manteuffel）進攻與橫渡繆斯河；南路由布蘭登貝格將軍（Erich Brandenberger）掩護行動的側翼。幾天之內，攻勢形成一個巨大的突出部，主要是由中路造成，而這個「突出部」也成為美國人為這次會戰命名的根據。十二月十一日，希特勒在簡報中對各級將領表示，他對於德軍能夠採取「成功的攻勢」，而不是「曠日費時地頑強防衛」感到很滿意，他也對戈培爾說，這次會戰對盟軍的影響是「巨大的」。<sup>323</sup>

希特勒認為這次攻勢將讓盟軍感到吃驚，而他說得沒有錯。就在德軍進攻的前一天，十二月十五日，蒙哥馬利還曾表示德軍已無力發起攻勢。即使在德軍發起攻勢的隔天，艾森豪依然認為這是「相當具有企圖心的反擊」，很快就會被擊退。然而到了十八日，情勢很明顯，德軍的大規模攻勢正逐漸切斷盟軍，而且矛頭將轉向比利時海岸。<sup>324</sup>在此之前，盟軍情報單位已經警告艾森豪的盟軍遠征部隊最高統帥部，說盟軍防線比較薄弱的阿登對面有大量德軍預備隊正在集結，但最高司令部過度自信地認為德軍已陷入危機，因此將這個警告拋諸腦後。盟軍最高司令部情報首長史壯（Kenneth Strong）認為，在這場消耗戰中，德軍每個月就耗損二十個師，因此德軍集結預備隊應該是為了防守萊茵河這最後一道防線。此時的盟軍就跟一九四〇年五月的法國總司令部一樣，認為德軍不可能穿過阿登森林發動進攻。<sup>325</sup>德軍盡可能隱藏準備工作，除了保持絕對無線電靜默，計畫也只有極少數人知道。與此同時，盟軍的空中偵察也因為惡劣天氣而無法順利進行。

德軍針對美軍防線最脆弱的部分發起攻勢，這裡有美國第一軍團的五個師，這幾個師要不是正在休整，就是補充了大量新兵，所有部隊散布在整個阿登地區。第一軍團司令霍奇斯與第十二集團軍司令布萊德雷

對於德軍一開始的攻擊並未做出強烈回應（事實上，布萊德雷一直待在位於盧森堡的司令部，靠著無線電與電話指揮調度），但現地指揮官在極為不利的狀況下，在聖維特與巴斯通這兩個關鍵道路樞紐成功抵擋了德軍。巴頓早已準備好應變計畫，以便在上級要求他率軍北上協助第一軍團時做出回應，他迅速重新部署六個師，進攻突出部的南翼。在北部的艾森波恩山脊（Elsenborn Ridge），狄特里希的武裝親衛隊第六裝甲軍團遭到堅強的反戰車防線阻擋。只有曼陶菲爾的第五裝甲軍團有所進展，他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逼近到離繆斯河只有五公里的地方，之後便遭到阻擋與擊退。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氣開始轉好，盟軍空中部隊大舉出擊。德國空軍雖然數量可觀，但實際戰力有限，除了因為燃料不足與缺乏準備充裕的前進空軍基地，數百名新手飛行員也缺乏經驗。一月一日，德軍集中一千零三十五架戰鬥機與戰鬥轟炸機進行一場大規模作戰，這場代號「底板」（Bodenplatte）的作戰試圖攻擊盟軍的戰術空軍基地，以便讓德軍攻占巴斯通。盟軍實際損失的飛機數量難以估計，但大約落在兩百三十架到兩百九十架之間，絕大多數被擊毀的都是停放在地面未偽裝的飛機，但德軍卻損失超過三百架飛機，是二戰單日最大的損失數字。<sup>326</sup>然而盟軍禁得起損失。一九四四年底，歐洲戰場的英美飛機已經多達一萬四千六百九十架。<sup>327</sup>

到了這個階段，美軍的協同作戰已經逐漸阻止突出部繼續擴大，並且開始擊退德軍攻勢，但整個過程依舊艱困、代價高昂且傷亡慘重。許多德軍將領先前都曾提出警告，由於缺乏燃料與裝備，加上許多新兵首次在冬季作戰，將會造成人員與裝備的龐大損失，而這不是德軍作戰英勇所能彌補的（或者如艾森豪所言，德軍作戰帶著「一種聽天由命或『保家衛國的熱血』情緒」）。<sup>328</sup>到了一月三日，希特勒承認作戰失敗，但他希望這場冰天雪地的苦戰能消耗掉盟軍的預備隊、削弱盟軍其



他地區的防線並且使其推遲對萊茵河的進攻。雖然德軍這次攻勢有許多缺失，但確實對盟軍造成巨大傷害。五天後，希特勒接受莫德爾與曼陶菲爾的請求，讓損失慘重的部隊撤退，以免造成更大傷亡。雙方的傷亡數字都很驚人：從十二月中到一月底，美軍損失十萬三千一百零二人，包括一萬九千兩百四十六人死亡。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則估計德軍損失八萬一千八百三十四人，其中一萬兩千六百四十二人陣亡，三萬零五百八十二人失蹤。希特勒不受失敗影響，再度下令在亞爾薩斯發動一次小規模反攻，作戰代號「北風」（North Wind），但結果也跟秋霧作戰一樣。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在一月十四日的戰爭日誌裡記錄說，主動權「已經轉移到盟軍手中」。事實上，這個時間比原先預估的提前了不少。<sup>329</sup>

希特勒不知道的是，他分化西方盟國的策略，其實比他發動的會戰本身更有成功的機會。就在德軍發起阿登攻勢期間，蒙哥馬利、英國帝國參謀本部與艾森豪之間的緊張關係曾一度惡化到瀕臨破裂。當時為了化解眼前的威脅，艾森豪要求蒙哥馬利指揮美國第一與第九軍團攻擊突出部的北翼。布萊德雷認為艾森豪的命令顯示對他的指揮缺乏信心，他感到憤怒，但最終還是接受命令。蒙哥馬利確實對於穩定突出部北面的盟軍軍心很有幫助，但他幾乎沒有派出手中的英國與加拿大部隊，因此在這場會戰中的英加部隊只損失一千四百人，其中兩百人死亡。蒙哥馬利太晚下令反擊，美國的批評者也抓住這點抨擊他的指揮能力。十二月底，蒙哥馬利再度提出先前的要求，他希望跟諾曼第登陸時一樣，由他來掌握盟軍所有地面部隊的指揮權，否則盟軍有可能在未來入侵德國時遭遇失敗。蒙哥馬利私底下也向英國參謀總長布羅克表示，他認為艾森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馬歇爾告訴艾森豪不要做出任何承諾，兩人也對英國屢次暗示艾森豪戰略錯誤的做法深表不滿。<sup>330</sup>一個

星期之後，在一月七日的記者會中，蒙哥馬利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對外的發言給人一種是英國挽救了突出部之役的印象。艾森豪警告蒙哥馬利，如果他再這樣下去，將會破壞「盟軍在共同目的下投入的善意與心血，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sup>331</sup>

一月底，盟軍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在馬爾它召開會議，同時也為雅爾達高峰會預做準備。在會議中，布羅克重新提出設立單一指揮官與從英國戰線出兵進攻德國的議題。布羅克的提案差點造成英美的公開決裂。在這場充滿火藥味的會議上，馬歇爾告訴英國各參謀首長，如果他們繼續在背後批評艾森豪對這場戰役的決策，那麼艾森豪將會辭職，到了第二天的二月一日，羅斯福總統堅持艾森豪必須留下來。英方的堅持很可能引發重大危機，但最終邱吉爾還是支持羅斯福的決定。這場爭議就這樣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在這場辯論中，雙方各有立場，但真正的關鍵因素還是美軍的規模遠比英軍來得龐大，美軍高層不可能接受英國元帥的指揮，更不可能接受獨厚英國的戰略，讓英國盟友獨占打敗德國的戰功。艾森豪對馬歇爾說道：「整個指揮體系當然不盡完美，但考量到這場戰爭牽涉到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人員，不得不說這個組織仍是最可行的……。」<sup>332</sup>英美驚險避免了公開決裂，但我們始終不清楚為什麼蒙哥馬利無法看清英美同盟的微妙政治關係。

※ ※ ※

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德日戰敗已經是時間的問題，但最後幾個月為了打垮這兩個即將崩潰的帝國，卻進行了最為血腥，代價也最為高昂的戰爭。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美軍在所有戰場的戰死者總數達到十萬零六百六十七人，占其二戰期間戰死者的三分之一以

上。從一九四五年一月到五月，蘇聯為了進攻德國領土而發動的幾場主要戰役，士兵的損失人數（死亡與失蹤）也高達三十萬零六百八十六人。這個時期也是德國與日本死傷最慘重的時期，無論是軍人或平民都是如此。在戰爭的最後四個月，德軍陣亡一百五十四萬人，有許多是為了補充德軍缺額而被徵召的青少年或超過役齡的男子，另外也至少有十萬平民在轟炸中死亡。會有這樣的結果也不令人意外。到了一九四五年初，盟軍已擁有壓倒性的空中力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的德國空軍兵力只有英美的百分之十五，而在戰車與自走砲方面，德軍與盟軍的比率是一比四，如果光以西線戰場來看則是一比六。兵力對比如此懸殊，繼續抵抗猶如自殺，而這也反映出德軍為了保衛帝國本土，最終必須付出極端的代價。一月，德國某個集團軍對全體官兵下達訓令，「為祖國每一寸土地而戰，是我們的神聖職責。」<sup>333</sup>硫磺島是第一個遭到盟軍入侵的日本領土，守軍指揮官向軍隊下達「敢鬥之誓」，其中包括一條訓令：「每個人在戰死之前必須殺死十名敵軍。」<sup>334</sup>

希特勒很清楚，自己即將面臨「最後一戰」，也就是最終的戰敗時刻。希特勒的空軍副官回憶一月時絕望的元首與他的對話：「我知道戰爭已經輸了，敵人的優勢實在太大.....但我們絕對不會投降。我們也許會倒下，但要拉著全世界一起陪葬。」<sup>335</sup>雖然希特勒想要勝利，但在他扭曲的道德世界裡，絕對的失敗並非毫無價值。這解釋了為什麼希特勒如此執著於勝利或毀滅，因為在他的眼中，德意志民族想要洗刷一九一八年可恥投降的汙名，就必須奮戰到只剩最後一口氣，而非放下武器。雪恥在德國歷史文化中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不僅深刻影響了希特勒，也對那些仍願意奮戰到底的德國人具有強烈的號召力。<sup>336</sup>絕對失敗是一種救贖式的犧牲，是一種英雄式的道德行為，能讓未來世代的德國人從中學習，重建種族的健康與活力。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希

特勒在柏林掩體裡口授了他的「政治聲明」。他在聲明中表示，德國對戰爭的投入「將名垂青史，它是民族生存鬥爭最輝煌與最英雄式的展現」，將帶來真正的「民族共同體」重生。<sup>337</sup>

歐戰的最後幾個月，盟軍空軍為希特勒幻想的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式毀滅，提供了恰如其分的末日場景，最終的懲罰式轟炸讓城市只剩下被夷平的街道與熾烈的火舌。一九四四年九月，艾森豪把重型轟炸機的指揮權交還給英國空軍與美國陸軍航空軍。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與美國第八與第十五航空軍於是聯手進行戰爭開始以來最大規模的轟炸，盟軍在短短八個月內投下的炸彈量占了整場戰爭的四分之三，而這個時期的德國空防也遭受入侵德國領空的盟軍戰鬥機嚴重消耗，每個月傷亡率高達一半。<sup>338</sup>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與英國轟炸機司令部司令哈里斯都希望轟炸機也許可以達成盟軍地面部隊到目前為止未能實現的最後一擊，但對已經反覆遭到轟炸的城市繼續進行轟炸，也反映了盟軍的憂慮：如果未能無情地進行轟炸，德國也許會找到新的方式來扭轉戰局，例如發明新武器或重新恢復工業生產。盟軍可用的空中兵力相當驚人：美國陸軍航空軍在歐洲駐紮了五千架重型轟炸機，另外有五千架戰鬥機護航，負責壓制殘餘的德國空軍；英國轟炸機司令部有大約一千五百架轟炸機，主要是蘭開斯特重型轟炸機。一九四三年時，轟炸機的高傷亡率幾乎一度使轟炸行動全面中止，但此時每次出擊的傷亡率平均只有百分之一到二。<sup>339</sup>

盟軍發起的「颶風作戰」（Operation Hurricane）派出了大量轟炸機，依照艾森豪的要求，盡可能讓德國西部的軍事與運輸目標陷入混亂，以利盟軍接下來的入侵，但盟軍並未針對「目標」做出清楚定義。為了解決目標不明確的問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盟軍遠征部隊最高統帥部公布第二號戰略訓令，要求盡全力轟炸石油與各種交通運輸設



施；當遭遇惡劣天氣時，轟炸機可以繼續對「工業中心」採取區域攻擊。<sup>340</sup>英國轟炸機司令部雖然也依照命令轟炸石油與交通運輸設施，但哈里斯對於精準轟炸目標的效果抱持懷疑。哈里斯的轟炸機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轟炸城市，包括許多尚未被轟炸過的小城市，他相信一直轟炸下去，總有一天社會與心理的損害會讓德國人無法繼續這場戰爭。美軍轟炸機透過雷達導引，儘管在雲層中投彈，還是能嚴重破壞德國的交通運輸，德國國內的石油產出也因為轟炸而比前一年同期少了三分之二。然而，儘管德國城市、工業與平民的累積損害與傷亡在一九四五年春達到史無前例的新高，包括二月十三日到十四日晚間遭到風暴性大火殺害的兩萬五千名德勒斯登市民（根據最近的估計），但光憑轟炸還是無法給予德國最後一擊。

一九四五年三月，德國軍需部長史佩爾向希特勒示警，交通運輸與關鍵工業區的崩潰，意謂著軍事生產只能再支撐六個星期。然而希特勒既然已決心奮戰到底，就表示德國已無投降可能，而最終地面部隊的入侵也無法避免。盟軍地面部隊指揮官認為轟炸有利地面戰爭的進行，可以為盟軍陸軍（包括紅軍）清出一條前進的道路。盟軍轟炸德國東部城市，主要是為了協助蘇聯推進，德勒斯登只是這項計畫的一部分。轟炸德東的決定是在二月初的雅爾達會議獲得同意，最初是由英國建議，之後蘇聯接受了這項提案，但條件是雙方必須協調劃出一條適當的轟炸線，以免誤炸紅軍。<sup>341</sup>盟軍的轟炸不太可能對蘇聯的迅速推進產生直接幫助，主要是能在逐漸縮小的作戰區域內降低德軍的機動性。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十一日，盟軍在雅爾達召開會議，會議地點在里瓦迪亞宮，宮殿周圍全是遭戰火摧殘的克里米亞城鎮。早在會議召開之前，史達林終於發動了他計畫已久的軍事作戰，蘇軍開始渡過波蘭中部的維斯杜拉河，朝德國首都進軍。這項計畫始於一九四四年十月，

但為了建立新的補給線、補充耗損的部隊與訓練在快速穿越白俄羅斯與波蘭東部時招募的大量新兵，因此計畫延宕了三個月才開始進行。史達林重新取回紅軍總司令的權力，命令原本代理總司令的朱可夫擔任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司令，這支部隊將是進攻德國的主力，柯涅夫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則從南方維斯杜拉河畔的桑多梅日橋頭堡發動進攻。與蒙哥馬利一樣，計畫一開始設定的目標十分樂觀：二月三日抵達奧得河，三月初進攻柏林與易北河，紅軍可以長驅直入德國境內。第一個目標顯然符合實際，因為蘇軍擁有壓倒性的物質優勢。朱可夫與柯涅夫指揮的軍隊總共有兩百二十萬人、三萬三千門火炮與迫擊砲、七千輛戰車與五千架飛機。而根據俄國的情報，與蘇軍對峙的德國A集團軍與中央集團軍僅有四十萬人、五千門火炮、一千兩百二十輛戰甲車與六百五十架飛機。<sup>342</sup>在北方，白俄羅斯第二與第三方面軍也同時進攻東普魯士與波美拉尼亞，這兩支軍隊總計也有一百六十七萬人與三千八百輛戰車。

這個龐大的攻勢最終決定在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之間發動。朱可夫與柯涅夫很快就突破缺乏組織的德軍防線並且快速推進。一月三十一日，紅軍抵達奧得河畔的要塞城市庫斯特寧（Küstrin），短短兩個星期就推進了三百公里，距離德國首都只剩下六十五公里。在南方，柯涅夫的部隊在一月二十四日抵達奧得河畔的布勒斯勞，到了一月底，柯涅夫順利渡河，占領了大部分西利西亞工業區。在北方，由於遭遇德軍的激烈抵抗，進展較為緩慢，但到了一月二十六日，紅軍還是抵達了波羅的海岸邊而且包圍了東普魯士。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於一九四四年被設立為要塞城市，一月二十九日，哥尼斯堡遭到圍攻，不過這座城市繼續堅守了兩個月以上的時間。在雅爾達會議召開前三個星期，紅軍已經解放了波蘭西部、攻下西利西亞與包圍東普魯士的德軍。

無論史達林是否想利用這場戰役的迅速獲勝來增加自己在雅爾達會

議上的談判籌碼，紅軍在東線突破的結果，與同時間英美盟軍在西線的缺乏進展形成強烈對比。整個一月與二月，盟軍一直停留在清除萊茵河西岸與西牆防線的德軍部隊。蒙哥馬利從西線北部發動主要攻勢，代號「真實作戰」（Operation Veritable），目標是穿越帝國森林（Reichswald）；美國第九軍團的「手榴彈作戰」（Operation Grenade）則試圖突破魯爾河防線，然而這兩個行動都設定在二月八日，也就是雅爾達會議快結束時才開始。抵達雅爾達的三位同盟國領袖主要的關切不是戰爭，而是戰後的和平問題，因為戰爭的結果已經可以預期。雅爾達會議的議程主要是為了滿足史達林的要求。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回憶說，與之前會談的狀況不同，西方代表這次看到的是一個友善而克制的獨裁者，而且「在各方面」都準備好「與西方妥協，以達成協議」。<sup>343</sup>外表是會騙人的。幾個星期之前，史達林才在莫斯科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表示：「應對資產階級政治人物時，你必須非常小心.....我們不能感情用事，而是要理性分析與計算。」除了這些，史達林或許還用上了諜報，因為蘇聯已經掌握了羅斯福與邱吉爾手中的敏感文件，而且在會議所在地里瓦迪亞宮到處都裝設了隱藏式麥克風。<sup>344</sup>羅斯福經過九千五百公里的旅程，中間還在馬爾它停留與邱吉爾見面，他看起來非常疲倦，而且明顯病得很重。艾登是邱吉爾的外交大臣，他認為羅斯福「模稜兩可、不明確與難以勝任」，但羅斯福之所以出席會議，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必須讓美國民眾留下盟國團結一致共同為戰後民主秩序努力的印象。而羅斯福也取得了其他兩國的同意，成立聯合國組織，並且在最後一天簽署《解放歐洲宣言》（Declaration on Liberated Europe）：美英蘇三國將協助各國建立以自由選舉與人民意志為基礎的政府。羅斯福也與史達林達成協議，蘇聯將在德國戰敗之後對日宣戰。美國當時認為，為了結束太平洋戰爭，達成這項協議具有戰略

上的必要性。<sup>345</sup>

這份宣言實際上只是一張壁紙，用來掩蓋盟國之間的明顯裂痕。事實上，邱吉爾在羅斯福不知情的情況下，早在前一年十月就已經在莫斯科與史達林會面，而且出賣了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的利益。邱吉爾列出一份非正式的蘇聯與西方瓜分比例清單，此即所謂的《百分比協定》

（percentage agreement），邱吉爾同意將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劃歸蘇聯的勢力範圍，相對地，英國則在希臘擁有發言權。邱吉爾極力確保英國繼續維持地中海霸權，並且允許法國也參與占領戰後德國，關於後者，史達林勉為其難地同意了。最大的絆腳石是波蘭的未來問題，而此時的波蘭已經成為蘇聯的囊中物。羅斯福與邱吉爾勉強同意蘇聯保有一九三九年占領的波蘭領土，但對於波蘭從德國東部取得多少領土做為補償則沒有定論。一九四四年，史達林已經在新波蘭成立共產黨委員會進行臨時統治，這個委員會接下來準備在波蘭成立新政府，但邱吉爾與羅斯福都無法接受這個新政權，他們希望由非共產黨的波蘭人統治波蘭。史達林表示，他希望波蘭能夠民主獨立，但這個波蘭必須符合蘇聯利益，而實際上西方盟國也難以辦法改變結果，因為蘇聯基於自身的安全考量，無論如何都不會在波蘭問題上讓步。雙方後來暫時達成妥協，史達林同意在莫斯科成立委員會，成員包括莫洛托夫與英美大使，三方開會商討成立「民主」波蘭的方案，但委員會一成立便遭遇僵局。一九三九年的歐戰始於波蘭，但等到戰爭結束，波蘭卻不得不接受共產主義統治的命運。

儘管雅爾達會議讓外界留下了盟國團結一致共同進行戰後合作的印象，從許多歷史照片中也可以看到三位領袖面帶微笑的表情，但在會議結束後到德國投降的幾個月期間，這三位領袖的關係卻急遽惡化。史達林依然擔心他的盟友有可能單獨與德國議和。三月底，史達林在莫斯科



接見捷克代表團時表示：「我們的盟友可能會試著挽救德國人，與他們簽訂協定。」羅斯福很快就發現，在雅爾達簽訂的「宣言」，對史達林來說毫無意義。三月二十四日，羅斯福再度提到史達林拒絕美國的要求，拒絕將關在波蘭戰俘營的美國人遣返回國。羅斯福用拳頭猛敲輪椅，挫折地說：「我們不能跟史達林打交道，他在雅爾達做出的承諾沒有一件有做到。」<sup>346</sup>

儘管如此，同盟國對外仍維持緊密團結的樣子，絲毫不受內部缺乏信任與相互指責的影響。往後兩個月，盟軍分別從西部、東部與南部進逼，德國的包圍圈愈來愈小。與盟軍不同，德軍面臨著不可跨越的障礙，已不可能扭轉軍事失敗的命運。德國國內的補給線與運輸線，因為運輸體系破壞得太嚴重而無法供應需求。軍事補給絕大多數必須仰賴馬匹運往前線，地面部隊能得到的空中支援已所剩無幾。德國軍隊缺乏人力，只能隨機進行補充，許多新兵來自於非役齡或完全未受過訓練的男子。國民突擊隊零散取得各式各樣的軍服、為數不多的步槍與機關槍，甚至有部隊拿到一千兩百枚沒有引信的手榴彈。<sup>347</sup>盟軍士兵提到，德軍的抵抗開始出現分歧，有些人「充滿決心，抵抗極其猛烈」，有些人則「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sup>348</sup>最重要的是，到了最後幾個星期，身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似乎連僅存的一點現實感也喪失了，他把無法堅守的高階軍官一一革職，堅持「每個街區、每間屋子、每一層樓、每一道灌木籬牆、每個彈坑，都要堅守到最後」。<sup>349</sup>希特勒不讓困在庫爾蘭半島或東普魯士的德軍在還有可能的狀況下從海路撤離，讓這兩支軍隊可以返回德國防守核心地帶。他拒絕讓德軍撤退到萊茵河防線後方，也不讓在義大利的德軍撤退到波河以北。二月與三月，希特勒仍派出急需用於德國本土防衛的部隊前往布達佩斯，試圖擊敗圍城的蘇軍，他希望德軍能重新掌控匈牙利巴拉頓湖的產油區。然而可想而知的是，這項任

務最後以慘敗收場。希特勒還在三月十九日頒布法令，一般稱為《尼祿法令》（Nerobefehl），要求對剩餘的德國領土實施焦土政策，從橋樑到糧食儲備全部予以破壞，不要讓盟軍有使用的機會。這項法令時常被人解釋成對德意志民族的棄絕，因為德意志民族未能完成他的召喚，實現帝國的榮耀，因此要讓德意志民族一無所有。但事實上，這項法令的實際文字顯然僅指破壞軍事設施、生產與運輸，希特勒的做法其實跟四年前德軍入侵蘇聯時，蘇聯當局實行的焦土政策沒有兩樣。<sup>350</sup>到了這個階段，各地的軍事指揮官與黨機關都開始各行其是，許多人不願執行這項法令，因為這麼做顯然會讓平民百姓活活餓死。至於大城市早已不需要執行希特勒的法令，因為盟軍的轟炸早已讓各地化為灰燼。

崩潰一旦開始，便猝不及防。在雅爾達，同盟國領袖討論歐戰何時結束，大家的結論是七月一日之前不會結束，比較肯定的答案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底之前。德軍脆弱的防線依然保衛著德國，然而無論部署在本土還是義大利的德軍，此時都已經完全缺乏戰略縱深。在西線，艾森豪終於在三月十日完全清除萊茵河西岸的德軍，此時盟軍估計德軍已經損失三分之一的兵力，包括被俘的二十五萬人。在萊茵河西側，盟軍集結了四百萬人共七十三個師，到了德國投降時，將達到四百五十萬人共九十一個師。<sup>351</sup>艾森豪再次面臨蒙哥馬利與布萊德雷兩方的壓力，他必須決定由誰先渡過萊茵河。艾森豪一方面支持英軍在三月二十三日發起「戰利品作戰」（Operation Plunder），並且派出空降部隊發起「大學校隊作戰」（Operation Varsity）從旁支援，但他也不反對布萊德雷第十二集團軍利用德軍在西部防線中央地帶敗退的機會發動進攻。三月七日，第九裝甲師的偵察小隊完整無缺地攻下位於雷馬根的魯登道夫橋，布萊德雷在艾森豪的允許下率軍渡過萊茵河。美軍隨後在對岸建立橋頭堡，然而只往前移動一小段距離就遭到德軍圍堵，雙方一直僵持到三月

底。巴頓認為，與其等待蒙哥馬利與英軍作戰成功，不如自己先動手。他於是率領美國第三軍團在四十八小時內急馳八十八公里，於三月七日攻下科布林茲（Koblenz），又於三月二十二日於尼爾施泰因（Nierstein）與歐本漢（Oppenheim）渡過萊茵河，比北方的英軍早了一步。

一天後，在三千五百門火炮密集砲轟後，蒙哥馬利的第二十一集團軍於威塞耳（Wesel）渡過萊茵河。德軍從萊茵河西岸敗退，而一旦盟軍渡過萊茵河，德軍在整個東岸的抵抗就變得零星而有限；有些被包圍的德軍依然頑強抵抗，但也有愈來愈多的德國士兵投降。雖然部隊渡過萊茵河需要時間，直到二十八日才完成渡河的工作，但此後盟軍的進展就跟一月時的朱可夫一樣迅速。英國第二軍團被派往易北河與漢堡，加拿大第一軍團前往荷蘭。美國第九軍團重新交由布萊德雷指揮，負責包圍魯爾與萊茵蘭工業區。布羅克元帥批評「盟友的民族主義傾向」，削弱蒙哥馬利的集團軍，讓英軍擔負掩護盟軍左翼的次要任務。<sup>352</sup>盟軍在平坦的北方平原進展迅速，城鎮一個接一個投降，然而過程中並不是沒有遭遇抵抗。四月二十日，英軍抵達不來梅，德軍在此抵抗了六天。蒙哥馬利奉命搶在紅軍之前迅速抵達丹麥與波羅的海港口呂北克，因為盟軍與史達林並未針對丹麥或荷蘭的占領達成協議。五月二日，第二軍團進入呂北克，德國北部的戰事實際上已經算是告終。

在南方，布萊德雷集團軍幾乎全數渡過萊茵河，而且很少遭遇激烈抵抗。布萊德雷命令第九軍團由北往南，第一軍團由南往北，兵分兩路包圍德軍，在形成魯爾口袋後，再將口袋一分為二。德國B集團軍總計三十一萬七千人，終於在四月十七日放下武器，他們的指揮官莫德爾元帥事前已經先解散集團軍，這樣他就沒有必要投降。四天後，莫德爾在杜伊斯堡（Duisburg）附近的樹林裡舉槍自盡。<sup>353</sup>此時艾森豪與布萊德

雷突然對美軍的戰略進行更動。雖然原本的目標是渡過萊茵河之後便進攻柏林，去年九月艾森豪就曾表示要「迅速攻取柏林」，但此時卻出現了令人困惑的情報，顯示殘餘的德軍精銳，主要是武裝親衛隊，正在南方集結建立阿爾卑斯要塞，他們在山裡儲存糧食與武器裝備，甚至設有地下飛機工廠。<sup>354</sup>經過阿登戰役的衝擊，美軍將領擔心德軍又會故技重施。布萊德雷在回憶錄裡提到，德軍明顯增援，另外也擔憂仍在義大利的大批德軍部隊很可能轉往阿爾卑斯山，「如此危險的威脅，實在不容忽視。」三月二十八日，艾森豪直接告知史達林、馬歇爾與蒙哥馬利，他已經命令第六集團軍與巴頓的第三軍團前往德國南部與東南部，不讓德軍在阿爾卑斯山建立最後據點。<sup>355</sup>艾森豪向聯合參謀首長會議表示：「柏林已經受到嚴重破壞，它的戰略價值已經大打折扣。」<sup>356</sup>其他美軍在消滅魯爾口袋之後便朝易北河前進，並且在當地等候俄軍。

從後見之明來看，所謂的「阿爾卑斯要塞」其實是情報人員的幻想，但當時德國南方確實存在一定數量的武裝親衛隊與裝甲部隊，盟軍的擔憂並非如今日認為的毫無道理。邱吉爾與英國帝國參謀本部都對改變優先目標感到失望，但艾森豪憤怒地表示，這一次他不會容許喜歡找碴的盟友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美軍迅速從萊茵河前往法蘭克尼亞

（Franconia）的陶伯河，但在施戴格森林（Steigerwald）與沿著法蘭克尼亞高地前進時，卻碰上德軍匆促完成的防線。負責防守的絕大多數是軍校學生與希特勒青年團，這場戰鬥於是成了一場慘烈的殺戮，雙方都毫不留情地拼殺。美軍花了三個星期才突破這道防線抵達多瑙河，而疲憊不堪的殘餘德國守軍已無法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抵抗。一名旁觀者看到德國士兵的模樣後寫道：「看到這群累得不成人形，全身衣服破爛，而且絕大多數都沒有武器的殘餘德軍落荒而逃的樣子，真讓人感到悲哀。」<sup>357</sup>美軍穿過奧地利，封鎖通往義大利的布倫納隘口，然後迅速



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西部與紅軍建立共同戰線。美軍的到來使德軍多了一個比起紅軍較不恐怖的投降對象，南方的德軍因此紛紛放棄戰鬥。到了四月底，德軍戰俘已高達六十萬人。

艾森豪如果瞭解義大利戰線的狀況，他也許就不會那麼在意阿爾卑斯最後據點的問題。義大利的德軍同樣以波河與亞得里亞海沿岸做為防線進行堅守，把盟軍阻擋在波河前方最後一道山脊上。德軍駐義大利指揮官凱賽林元帥於三月十日接替倫德斯特擔任西線總司令，他在義大利的指揮工作交給了魏庭霍夫一級上將（Heinrich von Vietinghoff-Scheel）。魏庭霍夫只有二十三個未滿編的師（其中有四個師來自墨索里尼殘餘的義大利軍隊），來防守從西部的利古里亞（Liguria）延伸到東部的拉溫納防線。整個義北的防務十分緊繃，魏庭霍夫面對的盟軍擁有壓倒性空優，火炮數量是德軍的兩倍，裝甲戰鬥車輛則是三倍。在冬季僵持之後，盟軍準備發動最後一場戰役。在盟軍八百二十五架重型轟炸機投擲破片彈進行可怕的空襲之後，四月九日，英國第八軍團開始發動進攻。兩天後，英軍抵達且渡過桑特諾河（Santerno River），擊敗無心戀戰的敵軍，紐西蘭部隊也迅速朝波隆那推進。<sup>358</sup>克勒克升任駐義大利第十五集團軍司令之後，由屈斯考特中將接任美國第五軍團司令，四月十四日，屈斯考特從亞平寧山脈北部進行突破，雖然遭受零星而激烈的抵抗，但最終還是在四月十九日突破成吉思汗防線。盟軍的兩路攻勢現在可以朝波隆那與波河推進，四月二十二日，盟軍抵達波河。一旦最後幾道防線遭到突破，德軍為了避免崩潰，便開始像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法國的德軍一樣迅速撤退。德軍退守波河以北，確保接下來能順利轉往義大利東北部與奧地利。此時，義大利北部主要城市已經出現游擊隊，開始攻擊德國守軍。隨著盟軍逼近，愈來愈多的士兵投降，而德國最高統帥部也開始試圖透過祕密協商，尋求全面投降的可能。幾個月

前，蒂羅爾—福拉爾貝格弗（Tirol-Vorarlberg）帝國大區長官霍佛（Franz Hofer）曾經向柏林建議建立阿爾卑斯要塞，但柏林當局認為這個建議帶有失敗主義傾向，因此興趣缺缺。到了四月底，義大利的德軍瀕臨崩潰，最後據點的構想已不可能實現。

對史達林來說，美國擔憂阿爾卑斯要塞反而讓他鬆了一口氣，因為這意謂著可以避免盟國之間出現競相進攻柏林的狀況。史達林向西方盟國表示，蘇聯也認為柏林不是個重要目標，然而攻占希特勒的首都雖然在軍事上並不重要，卻不代表在政治上不具意義。一九四五年一月，史達林宣示他要攻下敵方巢穴，活捉希特勒，蘇聯軍隊因此把「berlog」（俄文的巢穴）認定為最終的作戰目標，而非柏林。<sup>359</sup>紅軍抵達奧得河防線後，卻出乎意料地開始停滯不前。二月初，朱可夫告訴史達林，他可以在二月中「迅速襲擊」並且攻下柏林。當史達林在雅爾達開會時，朱可夫再度請求批准，讓他立刻進攻柏林。在南方，柯涅夫也急於進攻，他表示可以在二月最後幾天攻抵易北河。<sup>360</sup>史達林感到猶豫，由於西方盟國此時仍深陷於萊茵河西岸戰場，他因此決定先清除在紅軍側翼大量集中的德軍。雖然清除側翼敵軍，避免紅軍在進攻柏林時遭到攻擊是合理的戰略考量，但史達林這麼做的真正動機卻難以確知。史達林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進攻與占領德國核心地帶，他無法承擔攻擊柏林失利的風險。朱可夫奉命前往北方協助掃蕩波美拉尼亞，並且成功抵達波羅的海岸邊，他花了兩個月協助羅柯索夫斯基的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擊敗東普魯士與前波蘭走廊的殘餘德軍。三月三十日，但澤落入紅軍之手。這兩個月的戰鬥雖然消滅了北方德軍的反抗力量，但紅軍的傷亡人數卻是一月進行維斯杜拉河與奧得河作戰時的三倍。在南方，柯涅夫為了進攻西利西亞，不得不與舒奈爾將軍（Ferdinand Schörner）的中央集團軍進行幾次大規模會戰，而在多瑙河防線，狄特里希的第六裝甲軍團

進行了德軍在二戰的最後一次反攻，代號「春醒作戰」（Operation Spring Awakening），目標是收復匈牙利油田。紅軍在三月中擊退德軍，但自己也付出慘重的傷亡代價。<sup>361</sup>通往維也納與布拉格的道路已經敞開。四月十三日，紅軍圍攻並且占領維也納。五月，德國投降之後，在布拉格發生的戰鬥為這場歐戰畫下句點。

三月底，盟軍成功渡過萊茵河，顯然接下來盟軍將會迅速推進，史達林於是命令紅軍立刻準備向柏林與柏林以西地區發動攻勢，而且要推進到易北河一線。紅軍在盡快準備軍事作戰的同時，也必須把大批部隊從側翼調回最前線。史達林希望在五天內攻下德國首都，為了完成這項任務，紅軍開始集結龐大兵力：朱可夫、柯涅夫與羅柯索夫斯基的三個方面軍出動一百七十一個師與二十一個機動部隊，總計兩百五十萬人，六千兩百五十輛戰車、七千五百架飛機、四萬一千門火炮與迫擊砲；德國負責防守奧得河的第九軍團與第三裝甲軍團則僅有二十五個師與七百五十四輛戰車，負責防守柏林的則是溫克中將（Walther Wenck）的第十二軍團，該軍團是在四月份用拼湊的六個師組成，幾乎沒有任何重武器。上述德軍總計只有七十六萬六千人，其中許多人因為受傷、戰爭疲勞或年齡而缺乏作戰能力。雙方都焦急等待著這場即將終結一切的大會戰。四月十六日，攻勢從朱可夫的戰線開始，他的戰線正對著西洛高地（Seelow Heights），這是通往柏林最直接的路徑。朱可夫部署了一百四十三具探照燈，讓德國守軍看不清楚前方。但一開始龐大的火炮彈幕將戰場地面轟得到處都是彈坑，不僅不利裝甲部隊前進，砲轟造成的濃密煙幕也將探照燈的強光反射到前進的紅軍身上。<sup>362</sup>第二天結束時，進攻西洛高地的紅軍傷亡十分慘重，朱可夫向史達林報告攻勢陷入停頓，史達林於是激勵在南方進展順利的柯涅夫，要他從南部率軍北上，盡快奪取柏林。在南方，柯涅夫集團軍的目標是橫渡奈塞河

（Neisse），這是項艱難的任務，但在四月十六日，柯涅夫利用砲擊與人造煙霧掩護紅軍搭乘小艇渡河，一小時之內就在奈塞河西岸建立橋頭堡。德軍在第一天就迫後撤十三公里，之後隨著柯涅夫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繼續朝西與西北往柏林進軍，德軍的抵抗也持續遭到擊潰。四月十八日，柯涅夫的前鋒占領位於左森（Zossen）的德國陸軍司令部，並且繼續朝柏林進軍。四月二十五日，柯涅夫分兵繞過柏林，然後朝易北河前進，一路上仍持續遭遇德軍抵抗，最後終於在托爾高（Torgau）附近的村落與美軍會師。

柏林周圍最後幾道脆弱的防線被一個個地突破。當第三與第四親衛戰車軍團進入柏林郊區，朝德國政府中心與希特勒巢穴前進時，柯涅夫篤定地認為自己將會率先奪取柏林。四月二十五日，柯涅夫準備下令部隊衝入政府中心與帝國議會，但他的前鋒卻發現自己開火的對象是崔可夫將軍的第八親衛軍團——第八親衛軍團隸屬於朱可夫轄下的方面軍，他們連夜趕路，終於比柯涅夫早了幾個鐘頭抵達首都市中心。崔可夫的部隊取得攻占巢穴的榮譽。四月三十日，一支軍事小隊衝進帝國議會大樓，升起了巨幅紅旗。<sup>363</sup>在幾百公尺外，希特勒與一小群隨員躲在帝國總理府底下的掩體中。希特勒已經完全脫離現實，他幻想天命可以扭轉德國戰敗的局面。四月十二日，當希特勒得知羅斯福因腦出血去世，便開始想像命運即將扭轉：「既然命運已經為世界除去史上最大戰犯，那麼接下來戰爭的潮流也將迎來轉捩點。」<sup>364</sup>希特勒成天幻想柏林有可能解圍。四月二十四日，他下令柏林周邊的德軍「重建與柏林的聯繫，打贏柏林戰役」。<sup>365</sup>四月二十八日，當蘇聯砲轟掩體上方的建築物時，戈培爾在臨時發行的柏林報紙《裝甲熊》（*Panzerbär*）上再次發起號召，宣揚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英雄的神話：「希特勒依然在這場塑造世界歷史的自由之戰中發號施令……他在交戰最激烈的戰場上，



身旁圍繞著最優秀的戰士……。」<sup>366</sup>實際上希特勒早已走投無路。當盟軍訊問者訊問約德爾，希特勒面對災難性的失敗為什麼不乾脆早點投降，約德爾對此回答說：「在你還沒輸掉戰爭之前，你會放棄整個帝國與人民嗎？像希特勒這種人是不會的。」<sup>367</sup>

※ ※ ※

日本並未出現像德國那樣的「最後鬥爭」，因為日本本土並未遭到入侵，但軍方強硬派高層仍認為應該發動類似的救贖戰爭來挽救即將戰敗的帝國榮譽。一九四五年一月，盟軍距離日本本土還有一段距離，日本軍方因此認為透過一連串艱苦的戰役仍可實現一九四二年的目標：讓盟軍認為擊敗日本的代價太大，最後願意與日本達成妥協的和平。日本縮小了國防圈，將圈域的前緣設在臺灣、華東、朝鮮半島南部與太平洋上的小笠原群島。然而盟軍對日本貿易進行海空封鎖，導致日本戰時經濟逐漸崩潰，加上盟軍的物質優勢，這個防衛圈遭到突破也只是遲早的事。但問題出在盟軍前進的速度，到了一九四五年，盟軍推進仍比預想的更為緩慢，日本派駐帝國各地的守軍無所不用其極地誘使敵軍在他們選定的地點進行長期消耗戰。

麥克阿瑟在菲律賓投入了大量美軍，他認為菲律賓是美軍進攻日本本土的最佳中途站，然而菲律賓戰役進展緩慢，使美軍對於最後幾場戰役的規畫再度陷入緊張。金恩海軍上將認為，現在美軍已經可以從馬里亞納群島基地起飛轟炸日本本土，那麼接下來對日本進行海空封鎖，或許可以讓日本不戰而降。但尼米茲與麥克阿瑟都相信，除非進攻與占領日本本土，否則日本絕對不會投降。為了進攻日本本土，尼米茲與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都需要硫磺島與沖繩島做為海空軍的中途基地。攻下

硫磺島也可以阻止日軍繼續攻擊駐紮在馬里亞納群島的B—29重型轟炸機。<sup>368</sup>在進攻硫磺島與沖繩島之前，麥克阿瑟必須盡快占領菲律賓島鏈的最大島呂宋島。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美軍進攻呂宋島，美軍有十七萬五千名兵力，少於山下奉文中將統率的二十六萬七千名日軍。當麥克阿瑟聽到雙方兵力對比時，只是絕望地說出一句：「胡扯。」<sup>369</sup>山下奉文的目標是謹慎地採取拖延戰術，延緩美軍入侵日本的時間，他把呂宋島的日軍撤退到鄰近主要河谷的山區。結果美軍進攻的第一個星期，雙方只進行了小規模的戰鬥。麥克阿瑟命令庫魯格將軍（Walter Krueger）盡快奪取首都馬尼拉，這樣他才能宣布獲得決定性勝利，並且以勝利者的姿態回到這座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以此為家的城市。

馬尼拉的戰鬥對抗的主要是岩淵三次海軍少將率領的海軍地面部隊。隨著這場戰鬥逐漸演變成長期而殘酷的戰役，美軍將領因此變更交戰規則，允許砲兵砲轟平民區，而日軍將領也下令「戰場上的平民格殺勿論」。<sup>370</sup>日軍重演在南京的殘暴行徑，把男子成群綑綁起來放火焚燒，毫無節制地殘殺婦孺，強姦婦女與少女。美軍進攻馬尼拉的中部與南部時，必須逐一摧毀街區，殲滅所有的日本守軍。馬尼拉城區遭到摧毀，麥克阿瑟之前在馬尼拉飯店居住的頂樓套房也付之一炬。估計有十萬名菲律賓人死於砲火、轟炸與日軍的屠殺；一萬六千名日軍在防守馬尼拉時陣亡，但美軍只有一千零十人死亡，在太平洋戰爭中，這個數量算是出奇地少。<sup>371</sup>三月三日，已經成為廢墟的馬尼拉獲得解放，在這種狀況下，麥克阿瑟取消原先計畫在首都中心進行的凱旋式。雖然美軍現在可以使用呂宋島的港口與空軍基地進行下一階段的進攻，但撤退到山區的山下奉文卻依然堅守要塞，直到八月日本投降為止。往後的戰鬥讓美日都付出極大的代價，雙方的部隊在熱帶氣候中苦戰，崎嶇的地形有利守方藏匿，疾病與戰爭疲勞嚴重削弱士兵的作戰能力。菲律賓戰役

結束時，日軍傷亡達到三十八萬人，絕大多數死亡，盟軍在戰場上的損失則是四萬七千人，但有九萬三千人罹患疾病、戰爭疲勞與心理崩潰。<sup>372</sup>美軍攻占菲律賓的代價遠超過預期，山下奉文因此如願延宕與削弱了美軍入侵日本的能力。

硫磺島位於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島，沖繩島則是琉球群島的最大島，入侵這兩座島成了太平洋戰爭最慘烈的兩場戰役。入侵硫磺島的「特遣作戰」（Operation Detachment）定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展開，之後則於四月發起「冰山作戰」（Operation Iceberg），入侵沖繩島。這兩座島嶼嚴格上來說屬於日本領土，日本士兵都得到訓令，守衛日本領土是神聖的職責。硫磺島這場島嶼戰役之所以惡名遠播，在於美軍這場戰役的傷亡居然超過日軍。日本軍方預期硫磺島將成為美軍目標，硫磺島指揮官栗林忠道中將命令兩萬名日軍將整座島嶼建設成一座要塞，利用洞穴與火山岩建立起防禦網，內部以隧道連通，人員、槍砲與各種儲備都能在敵人無法察覺下進行集中。栗林忠道的司令部設在二十二公尺深的地底下，頂端有一座掩體，屋頂是厚達三公尺的鋼筋混凝土。硫磺島長十公里，寬只有三公里，但在表層的火山岩底下，日軍開鑿了長十七公里的隧道網。島上有三座機場，其中一座機場四周設置了多達八百座碉堡。<sup>373</sup>

硫磺島在徹底要塞化之後，所有的地點全覆蓋在日軍的火力範圍之內，於二月十九日登陸的三個美國海軍陸戰師七萬零六百四十七名士兵將完全暴露在日軍的攻擊之下。登陸部隊希望美國海軍能對硫磺島岸轟十天，但史普勞恩斯的第五艦隊卻只岸轟了三天，因為海軍想北上直接攻擊日本的海岸線。雖然估計島上的重砲有二分之一被毀，碉堡與砲臺有四分之一被破壞，但日本守軍依然保有強大火力。栗林忠道等待美軍完全上岸之後才發起猛烈砲轟，由此開啟了長達六個星期的硫磺島戰

役，美國海軍陸戰隊將持續承受火砲、機關槍與迫擊砲的攻擊。雖然美軍在幾天之內就攻下機場，但要攻占整座島嶼顯然是一項極其困難的挑戰。二月二十三日，美軍在硫磺島南端摺鉢山的山頂上象徵性地豎起國旗（三個小時之後，美軍重新豎起旗幟，美聯社攝影師才拍下了流傳後世的照片），但往後六天，日軍卻源源不斷地從山裡的洞穴衝出。<sup>374</sup>在北方，海軍陸戰隊在島上防守最嚴密的區域緩慢推進，用手榴彈、炸藥與火焰噴射器摧毀敵軍設施。美軍持續戰鬥一個月，士兵們都感到疲倦，反應與判斷也跟著變差，傷亡人數節節攀升。栗林忠道的掩體終於被炸藥炸開，但栗林已經在裡面壯烈自殺。三月二十七日，美軍終於占領整座島嶼，總計有六千八百二十三人陣亡，一萬九千兩百一十七人受傷或傷殘；而兩萬多名日軍只有一千零八十三人被俘。<sup>375</sup>硫磺島成為美國的空軍基地，P—51遠程戰鬥機可以從這裡起飛，為日間空襲日本城市的轟炸機護航，數百架B—29轟炸機可以在此加油或解決技術與戰鬥損害的問題。

沖繩戰役是一場比硫磺島規模更大的軍事行動。沖繩島是日本領土，東京當局想以沖繩島做為測試，瞭解盟軍入侵日本本島時可能採取什麼策略。沖繩島指揮官牛島滿中將仿效硫磺島曾經使用的「休眠戰術」，先讓美國兩棲部隊登陸，然後引誘入侵者進攻沖繩島南部日軍重兵防守的地方。日軍在這裡有大約八萬三千名作戰部隊，主要來自第三十二軍，而且同樣密密麻麻挖掘了洞穴、隧道與碉堡網。<sup>376</sup>美軍對於日本在沖繩島採取的戰略所知有限，但這一次美國海軍沒有太多選擇，他們必須連續十天岸轟這座島嶼。另一方面，一支小部隊將先攻占外圍的慶良間群島，做為水上飛機基地與海軍的中途站。美軍集結了龐大的入侵艦隊，總計超過一千兩百艘各式艦艇，但早在美軍登陸之前，宇垣纏海軍中將已經在三月五日正式編成一支由自殺飛機組成的特別攻擊



隊，讓他們進行了首次任務。而在往後近三個月的戰役裡，這些自殺飛機將持續攻擊逼近的美軍艦隊。在首次任務中，也就是沖繩戰役開始的前兩天三月三十日，一架自殺飛機成功擊中美軍艦隊司令旗艦印第安納波利斯號（*Indianapolis*），使得艦隊司令不得不轉移到新墨西哥號

（*New Mexico*）。日軍前後總共派出一千四百六十五架自殺飛機，擊沉艦艇三十六艘，擊傷三百艘，其中也包括規模較小的英國太平洋艦隊的船隻。英國太平洋艦隊此時終於接受美軍指揮，但他們只擔負比較次要的作戰任務，之後於五月返回澳洲維修。<sup>377</sup>

四月一日，十七萬三千名陸軍與海軍陸戰隊組成的七個師，在巴克勒將軍（*Simon Bolivar Buckner*）指揮下登陸沖繩島。除了自殺攻擊，美軍幾乎未遭遇任何抵抗，而且在幾天內就攻占機場地區。美軍隨後開始往南北移動，並於四月八日首次接觸日軍。牛島滿在沖繩南部山區隱匿了大批部隊，與硫磺島一樣，美軍必須費力而緩慢地擊退日軍，儘管火炮與海軍艦砲對山嶺發射了兩百三十萬發砲彈，美軍依然只能逐一地剷除日軍設置的防禦工事。<sup>378</sup>美軍在沖繩島的前進速度與硫磺島一樣緩慢，連續一百天毫不停歇的戰鬥也讓士兵承受極大的壓力，加上五月底的天氣使整個山區充滿令人無法動彈的泥沼，空氣中也瀰漫著屍體腐爛的惡臭。到了六月，美軍把殘餘的日軍逼到沖繩島西南角，缺乏彈藥、糧食與醫療物資的日軍，數量一天天減少。六月二十一日，日軍終於停止抵抗，然而就在三天之前，巴克勒將軍卻在巡視前線時被砲彈破片擊中身亡。牛島滿與栗林忠道一樣，最後選擇自殺。大約有九萬兩千名日軍與沖繩民兵陣亡，此外還有大量平民死亡，估計人數在六萬兩千人到十二萬人之間。美國海軍、陸軍與海軍陸戰隊有一萬兩千五百二十人陣亡，三萬六千六百一十三人受傷，此外還有三萬三千零九十六人深受戰鬥疲勞與疾病之苦，總計美軍的傷亡人數與日軍不相上下。<sup>379</sup>沖

繩島與硫磺島的傷亡數字在美國國內引發不滿，人們無法理解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代價去占領兩個戰略價值並不明顯的小島，而輿論的反應也讓華府深感焦慮，他們擔心進攻日本本土要耗費的人力恐怕將超過民眾願意支持的限度。

雖然日軍在預先設置好的陣地頑強抵抗，卻無法掩蓋日本在推動戰爭上已顯得力不從心。在美軍的海上封鎖，以及一九四五年三月後猛烈的空中轟炸之下，日本國內產業與國內民眾都開始出現生存危機。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美軍潛艦與飛機對日本遠洋與近海運輸的打擊達到巔峰。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的商船船團已經從五百九十萬噸減少為八十九萬噸，到了一九四五年，由於美軍潛艦與水雷的威脅，日本即使還有商船，也無法出海運輸南洋或亞洲大陸的貨物。<sup>380</sup>一九四五年，美軍在日本沿海布下大量水雷，使日本完全無法進口原料、煤與糧食等必需品。原本日本進口的大宗貨物在一九四一年還有兩千萬噸，到了一九四五年只剩下兩百七十萬噸。日本鋼鐵工業需要的鐵礦砂，一九四一年進口四百七十萬噸，到了戰爭最後六個月只剩下三十四萬一千噸。橡膠進口直接歸零，而主要從亞洲大陸進口的煤，也從一九四一年的兩千四百萬噸進口量，降低到只剩下五十四萬八千噸。<sup>381</sup>在缺乏資源的狀況下，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的軍火工業已瀕臨崩潰。

在美軍有系統地轟炸日本城市之前，美軍的海空封鎖已經對日本的軍火工業造成根本性的破壞，日本民眾的糧食也大為減少。儘管如此，美國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進行的猛烈轟炸，仍進一步加強了封鎖的效果。一九四五年一月與二月，美軍對日本飛機與造船工業進行精準轟炸，但成效不彰，因為美軍在日間使用B—29轟炸機，飛機必須在高空投彈，但日本上空強勁的噴射氣流導致轟炸失準。三月初，第二十一轟

炸機司令部新任司令李梅中將（Curtis LeMay）將原本的轟炸戰術顛倒過來，他要求美軍轟炸機在夜間進行低空轟炸（五千到八千英尺，而非原先的三萬三千英尺），並且使用大量M—69集束燃燒彈，這種燃燒彈含有由哈佛大學化學家研發的高效凝固汽油燃燒凝膠，對大部分是木造房屋的日本城市有著致命效果。<sup>382</sup>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到十日晚間，美軍首次以新戰術空襲東京，三百二十五架B—29轟炸機攜帶一千六百六十五噸燃燒彈，進行了二戰期間最致命的空襲行動，風暴性大火摧毀了東京四十平方公里的區域。根據日本警方的估計，空襲總計造成八萬三千七百九十三人死亡。<sup>383</sup>從三月到六月，李梅的轟炸機在日本最重要的都市與工業區投下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噸燃燒彈，燒毀半數都市地區；從六月到八月，B—29轟炸機轟炸較不具工業重要性的小城市，有些城市甚至有九成的區域遭到燒毀。<sup>384</sup>根據戰後的調查顯示，在這個時期，日本被轟炸地區的軍火工廠產出平均只有戰時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七，而未受轟炸的地區則平均減少一半。<sup>385</sup>李梅試圖說服馬歇爾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集中轟炸日本鐵路網可以徹底毀滅日本，美軍甚至可以不用進攻日本本土。

海軍與空軍將領都支持這項主張，他們認為海空封鎖造成的損害已足以迫使日本投降，但美軍高層仍相信唯有進攻日本本土才能確保日本投降。美日都開始準備這場看似無法避免的最後決戰。一九四五年春天，日軍開始籌備「決號作戰」（Operation Ketsu-gō）。日本設立兩個戰區司令部：第一總軍負責防衛本州中部與北部，第二總軍負責防衛本州西部、四國與九州。總計要建立六十個師團，其中三十六個師團負責反擊入侵敵軍，二十二個師團負責海岸防衛，剩下兩個師團是機動裝甲師。有必要的話，日本陸海軍也會使用自殺（特攻）戰術，包括水中特攻隊的「伏龍」（人肉魚雷）與水上特攻隊的「震洋」（裝滿炸藥的自

殺小艇）。<sup>386</sup>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御前會議制定了「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基本大綱。第二天，天皇在詔書中呼籲日本人民要「粉碎敵國野心，達成征戰目的」。就在一個星期之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已經要求提出正式的入侵計畫，麥克阿瑟被指派為此次入侵的地面部隊指揮官，他因此擬定了「沒落作戰」（Operation Downfall），該計畫又分兩部分：於十一月一日入侵九州南部，代號「奧林匹克作戰」

（Operation Olympic），之後於一九四六年春天入侵東京地區，代號「小冠冕作戰」（Operation Coronet）。奧林匹克作戰總計需要十七個師，小冠冕作戰需要二十五個師，兩個作戰都有龐大艦隊支持，包括戰鬥艦、兩棲登陸艦與二十二艘美國航空母艦。<sup>387</sup>此時英國領導人主動要求參與這次行動，希望藉由表現善意，讓英美在戰後依然能維持合作關係。大英帝國願意派出五個師（其中只有一個英國師），但馬歇爾卻認為英國這項舉動只是令人「感到為難」。<sup>388</sup>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中隊主動要求參與的提議立刻獲得受理，而接替巴克勒指揮沖繩島美軍部隊的史迪威不改酸言酸語的本性，很快抱怨起「該死的蘭開斯特轟炸機」。不過直到戰爭結束之前，整個作戰都毫無實際進展。<sup>389</sup>

六月十七日，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必須做出艱困決定。杜魯門希望透過海上封鎖與空中轟炸來對日本施壓，但他也跟陸軍參謀總長一樣，認為只要傷亡人數不要像硫磺島與沖繩島那麼慘重，那麼入侵行動就有嘗試的必要。雖然杜魯門對於五十萬到一百萬人的傷亡數字感到憂心（這個數字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名美國記者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杜魯門日後也在回憶錄提到這點），但最後他接受的還是陸軍給他的估計數字，而這個數字比較沒有那麼危言聳聽。<sup>390</sup>麥克阿瑟提供的數字顯示，在九十天的戰役中，死亡與失蹤可能達到十萬五千人；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則認為兩次行動的死亡與失蹤



人數將會是四萬三千五百人。而在與杜魯門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海（William Leahy）的會議上，馬歇爾認為傷亡總數約在三萬一千人到四萬一千人之間，不過他也表示所有數字都是猜測，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到了八月，西原貫治中將指揮的第五十七軍共十五萬人在九州進行防守，等待美軍入侵，他們認為美軍或許最早在十月就會採取行動。<sup>391</sup>杜魯門總統批准於十一月入侵九州，美軍代號「凶險作戰」

（Operation Diabolic）。六月之後，隨著沖繩島被美軍攻下，日軍在菲律賓與緬甸的抵抗實際上已經告終，美日雙方都開始等候攤牌時機。除非日本領導人放棄決戰作戰與接受無條件投降，否則最後一戰勢所難免。

## 最後行動：無條件投降

在經歷這麼一場大規模戰爭之後，一九四五年德日的投降，讓原本槍林彈雨的血戰場面突然陷入一片死寂。政府宣布投降後，只有極少數人依然堅持作戰了幾天或甚至幾個星期，對絕大多數服役的男女來說，投降使他們突然從長期的暴力折磨中解脫。不過，強迫投降是個複雜的過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或者是對戰勝國與戰敗國來說，都是如此。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布蘭加會議上宣布，同盟國只接受無條件投降，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盟邦單獨與軸心國議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確保軸心國瞭解，同盟國絕不接受協商和平，要軸心國不要再白費力氣。同盟國當然設定了一些投降條件。羅斯福表示，勝利意謂著「摧毀德國、義大利與日本基於征服與奴役其他民族而建立的一套哲學」——事實上，他指的就是德國、義大利與日本建立的帝

國。<sup>392</sup>往後兩年，同盟國又陸續增加了一些投降條件：軍事占領與軍事統治，解除武裝，審判戰犯，整肅發動戰爭的官員與政治人物，在同盟國監督下建立民主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軸心國知道，如果他們依照同盟國所言無條件投降，那麼這些就是他們可能要面對的條件，但無論是軸心國領導人還是一般民眾，都認為實際上他們會遇到更糟的狀況。同盟國提出的要求，是否反而讓戰爭拖得更久，這個問題至今仍廣受討論，然而同盟國如果願意接受妥協，卻有可能破壞同盟國之間共同目標，同時也會助長侵略國的氣焰。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都不願成為無條件投降協定的同意者與簽訂者，而最後他們也都沒有這麼做。在日本，無論是不是無條件投降，「投降」一詞本來就不是日本文化語彙的一部分；除非天皇介入，否則沒有人應該投降，也沒有人能夠投降。只有天皇的詔書才能結束戰爭狀態，但要讓裕仁天皇自願做出這項史無前例的決定，則是一個極為棘手的政治、軍事與憲政議題。同盟國面臨的狀況原已如此複雜，此時羅斯福又宣布他只接受無條件投降，更讓局面橫生變數。羅斯福日後表示，這個詞並不是他「隨便想出來的」。最早從一九四二年五月開始，美國國務院官員已經著手研擬以無條件投降做為同盟國的訴求。無條件投降與停戰不同，停戰可以協商，如德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簽訂停戰協定後試圖進行協商一樣。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在動身前往卡薩布蘭加之前，羅斯福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保證，他會對外表示，無條件投降是美國戰時立場的基礎。<sup>393</sup>邱吉爾傾向於保留可以與反墨索里尼派系領導的義大利單獨議和的可能，但英國戰時內閣推翻了他的決定，堅持義大利也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sup>394</sup>史達林對於羅斯福的主張並未做出評論，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他在演說中首次提到無條件投降。不過，相較於西方盟國希望藉由無條件投降讓史達林繼續與德國作戰，史達林自

已卻不像西方盟國那樣重視這件事。到頭來，三個軸心國首先投降的對象都是美國。<sup>395</sup>

卡薩布蘭加會議之後不到幾個月，無條件投降的概念首次受到考驗。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義大利顯然即將成為第一個崩潰的軸心國。義大利政府想進行和平協商與恢復義大利君主體制，而英美對於這兩項條件出現重大分歧：邱吉爾兩項條件都願意接受，但美國則有所疑慮。在討論時，英國使用了「停戰」一詞，但美國人卻反對使用這個詞。最後兩國同意使用「投降協定」這個比較中性的詞彙。一九四三年夏天，義大利危機已經近在眼前，英美終於同意在義大利「無條件投降」之後共組軍事政府，之後一九四五年的德國也沿用相同做法。<sup>396</sup>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政權遭到推翻，巴多格里奧元帥建立的新政權與同盟國都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巴多格里奧宣布戰爭將繼續進行，但他其實更希望結束戰爭。雙方對於接下來事態的發展都心存幻想。同盟國甚至認為義大利軍隊會在同意投降之前將德軍逐出義大利，但義大利國王埃馬努埃萊卻深信義大利士兵會繼續「抵抗與作戰」，直到與盟軍協商和平為止。同盟國開始使用「光榮投降」一詞來引誘義大利人投降，但這個詞似乎有讓義大利領導人利用及操縱的空間。英美對於義大利投降協定的內容產生歧見。八月初，艾森豪終於提出「短期停戰」，內容只涵蓋軍事投降與解除武裝，英國則提出「長期停戰」，列出比較嚴苛的政治與經濟條件。直在八月下旬的魁北克會議，邱吉爾與羅斯福才對長期停戰達成共識。巴多格里奧派代表與同盟國接觸，針對可能的軍事合作進行討論，但還沒有提出投降提案。擔任主要代表的卡斯特拉諾將軍（Giuseppe Castellano）認為義大利若能承諾給予同盟國軍事支援，同盟國應該會感到滿意，他說服巴多格里奧與義大利陸軍參謀總長盡快簽署短期停戰協定，讓義大利有機會改變陣

營。八月三十一日，卡斯特拉諾前往位於西西里島卡西比雷

（Cassibile）的盟軍司令部；九月三日，雙方簽署軍事投降協定。艾森豪希望幾天後盟軍開始進攻薩來諾時再公布此事，以免德軍搶先一步占領義大利。

巴多格里奧拒絕告訴其他政府成員投降協定之事，他雖然已經得知盟軍即將登陸薩來諾，卻沒有下令義大利軍隊做好抵抗德軍與支援盟軍的準備。九月七日到八日晚間，已經入睡的他在家中被人喚醒，只能穿著睡衣與一名憤怒的美軍空降師師長見面。這名美軍將領奉命在次日抵達羅馬支援義大利首都防務與抵抗德軍，為此他偷偷潛入羅馬，判斷義大利軍方的立場。巴多格里奧在逼問下，坦承義大利武裝部隊還沒做好準備，並且要求延後公布停戰。艾森豪此時終於發現巴多格里奧的表裡不一，盛怒的他於是在九月八日宣布義大利已經無條件投降，想藉此逼迫義大利政府配合。八日晚上，巴多格里奧透過廣播宣布義大利停戰

（卻絕口不提投降）。<sup>397</sup>九月十日，巴多格里奧與義大利國王從羅馬逃往南方。九月二十九日，兩人在馬爾它簽署正式投降協定，裡面涵蓋英國要求長期停戰的四十四項條件。但問題還是沒完全解決。蘇聯政府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被排除在投降協定之外，而且未來無法參與軍事控制義大利，畢竟紅軍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在俄羅斯前線與義大利軍隊作戰。西方盟國拒絕蘇聯的直接參與，只讓蘇聯在義大利的盟軍諮詢委員會擔任顧問。蘇聯的抗議相對節制，但史達林顯然從中得到教訓。當紅軍於一九四四年逼迫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停戰，一九四五年逼迫匈牙利停戰時，西方盟國就被排除在外。<sup>398</sup>隨後與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匈牙利的和約便完全依照蘇聯的條件簽訂。不過，史達林也允許美國主導日本的軍事占領與和約事宜。<sup>399</sup>

一九四三年的無條件投降未能結束義大利戰爭。九月八日，就在巴



多格里奧宣布投降之後，反而是德軍解除了幾乎所有義大利軍隊的武裝，實際統治了幾乎整個義大利半島。在德國保護下建立的墨索里尼新政權，不承認之前義大利政府簽訂的停戰協定。義大利境內的所有軸心國部隊，包括仍為墨索里尼作戰的義大利人，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才正式無條件投降，而且投降的處理過程依然複雜而冗長。一九四五年初，義大利防線的德軍高層軍官開始討論結束戰爭的可能性，三月，親衛隊沃爾夫將軍（Karl Wolff）透過瑞士人蓋弗尼茨（Gero von Gaervnitz）居間牽線，祕密前往伯恩與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代表杜勒斯（Allen Dulles）見面。沃爾夫回到義大利，試圖說服德軍駐義大利總司令凱賽林元帥同意投降。英美積極推動這場代號「日出作戰」

（Operation Sunrise，邱吉爾堅持稱為「填字遊戲」）的計畫，但四月二十日，杜勒斯接到指示終止接觸，因為派駐義大利的德軍指揮官魏庭霍夫希望與盟軍達成協議，讓他保全德軍的榮譽，率領德軍返回德國，而非無條件投降。幾天前，沃爾夫飛往柏林與希特勒見面，希特勒告訴他要與美方繼續聯繫以取得更好的停戰條件，沃爾夫提到希特勒的說法：「無條件投降實在荒謬。」<sup>400</sup>與希特勒見面後，沃爾夫幸運地全身而退。他返回義大利，卻接到希特勒最高統帥部的命令，要求德軍必須堅守義大利，不許撤退。

三月，英美與德國祕密協商的消息透過蘇聯間諜傳到了莫斯科，史達林再次擔心西方正尋求與德國單獨議和，而這麼做很可能讓德國抽調駐義大利的德軍抵擋正在進攻中歐的蘇聯軍隊。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立刻要求蘇聯代表也應參與協商，卻被告知英美戰線事務唯有英美才能參與——回絕的理由與一九四三年一樣。雙方接下來陷入唇槍舌戰，蘇聯指控西方盟國「隱瞞蘇聯政府」與德國議和。四月三日，史達林埋怨西方正計畫「放寬德國的停戰條件」，讓英美軍隊可以繼續往東推

進。兩天後，史達林針對羅斯福的嚴正反駁提出回應，他解釋說，投降問題開啟了一個惡例，「盟邦之間可以彼此欺瞞，為所欲為。」<sup>401</sup>這不只造成巨大的裂痕，也預示同盟國內部的嫌隙將逐步擴大成戰後的對立。為了至少在形式上能夠安撫莫斯科當局，西方盟國同意蘇聯參加所有的投降儀式，以確保德國不會獲得較寬鬆的和平條件。四月二十五日，盟軍諮詢委員會（於一九四三年設立）的蘇聯代表基斯連科少將（Aleksei Kislenko）抵達位於卡塞塔（Caserta）的盟軍司令部。<sup>402</sup>

到了這個階段，德國戰敗已近在眼前，投降只是遲早的事。但墨索里尼不想投降。四月中，墨索里尼從政府所在地薩羅前往米蘭，卻發現他的德國盟友背著他與同盟國協商投降。雖然墨索里尼抱怨自己遭到「背叛」，他的直覺卻告訴他必須逃跑，於是他喬裝成德國士兵，往瑞士邊境的方向逃亡。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與其他法西斯黨領袖被游擊隊捕獲並且遭到處決。他們的遺體像肉鋪的肉一樣，倒吊在米蘭的廣場上。格拉齊亞尼元帥指揮散布各地的義大利軍隊及法西斯民兵繼續與盟軍對抗，他要求德國人代表義大利人向同盟國投降，以避免義大利第二次無條件投降。<sup>403</sup>四月二十五日，魏庭霍夫派出兩名代表再次前往伯恩會晤杜勒斯，這一次是為了向盟軍表示願意接受無條件投降。邱吉爾得知消息之後立刻發電報通知史達林，希望取得他的同意。史達林出乎意料地同意了，四月二十七日，兩名德國軍官抵達盟軍司令部並且完成所有正式手續。此時已經有四萬名軸心國士兵同意於現地投降，到了四月底又有八萬名士兵投降。<sup>404</sup>四月二十九日，十九頁投降文件終於正式簽署，定於三天後生效，讓德軍各級將領有時間通知散布各地的德軍。<sup>405</sup>但投降還未成為定局，因為投降文件必須送到阿爾卑斯山麓戰場首府伯爾查諾的德軍司令部，由德軍總司令魏庭霍夫正式批准。為了不驚動柏林當局，這兩名代表先飛到里昂，然後開車經由瑞士返回伯爾

查諾。等到他們抵達伯爾查諾的時候，已經是四月三十日的午夜，希特勒已經從帝國大區長官霍佛口中得知投降之事，霍佛同時也是阿爾卑斯山麓戰場的最高總督。希特勒在自殺之前仍採取了最後幾項行動，其中一項就是下令逮捕魏庭霍夫，由舒爾茨少將（Paul Schultz）接任總司令，此外也命令舒爾茨必須進行撤退戰，讓德軍撤退到奧地利。只不過舒爾茨一抵達司令部就被沃爾夫的武裝親衛隊逮捕。五月一日，魏庭霍夫終於下令所有軍隊停火。五月二日，德軍西線總司令凱賽林勉為其難地接受希特勒已經死亡，繼續抵抗毫無意義，因此同意投降。盟軍最高司令部監聽德軍無線電，確認投降訊息確實已經傳達給各地德軍。五月二日晚上六點三十分，義大利第二次宣布無條件投降。<sup>406</sup>

實際的投降狀況最終證明是一團亂。有些軸心國部隊不僅拒絕投降，還企圖經由義大利北部邊境的弗留利（Friuli）谷地打回奧地利，包括在義大利北部搜捕游擊隊時，一路上燒殺強姦的德軍哥薩克騎兵師。這些部隊途中遭到游擊隊伏擊，為了報復，居然還在戰爭尾聲做出殘暴行徑，他們在阿凡齊斯（Avanzis）屠殺了五十一名村民，又在奧瓦羅屠殺了二十三名村民。當義大利北部邊境的戰鬥在五月十四日結束時，離德軍全體投降已過了一個星期。一名決心拼戰到底的法西斯領袖率領的狙擊手隊伍，則是一直到五月二十九日才被消滅。<sup>407</sup>還有一些部隊拒絕解除武裝。五月四日，當盟軍委員會驅車前往位於伯爾查諾的魏庭霍夫司令部時，經過的路障仍駐守著目露凶光的德國士兵與武裝親衛隊，他們手上還拿著武器，彷彿戰爭只是暫停而非結束。德軍將領宣稱士兵保有武器是為了防止游擊隊報復，盟軍委員會在武裝部隊支持下，花了十天的時間才讓德軍交出武器。有些部隊繼續抵抗。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一支遭到包圍的德國、俄羅斯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部隊躲藏在梅拉諾谷地附近的濃密森林與陡峭山區裡，憑藉武力搶奪糧食。這批

德軍肆無忌憚搶掠了幾個星期，才被當地的盟軍將領消滅。一名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軍官提到，當地民眾認為自己的「日子過得比在德軍占領時期還差」。<sup>408</sup>

義大利的投降危機才發生幾天，盟軍內部的矛盾馬上又浮上檯面，而最終要讓歐洲各地所有殘餘的德軍無條件投降更證明是一件困難的事。一九四五年春天，大量盟軍部隊已經湧入德國核心地帶，德國全面戰敗與遭到軍事占領已毋庸置疑。然而西方盟國一直無法與德國建立直接溝通管道。在一九四三年義大利問題之後，西方盟國不想讓外界產生西方會祕密與德國單獨協商的聯想。無條件投降的文件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已經擬好，而且獲得英美蘇三國同意，這份文件大致遵循義大利「長期停戰」協定的內容，不過義大利最初簽署的其實是「短期停戰」協定。同盟國也同意分占德國領土，每個國家各占領一個區，但這項決定並未記載在最終的投降文件上。另一方面，同盟國對於由誰代表投降，在什麼條件下投降之事也並未得出明確看法。西方情報單位曾經考量德國可能爆發民眾暴亂而導致戰爭結束，但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天，各種情況都顯示這只是一種政治幻想。聯合情報委員會呈交給邱吉爾的報告上表示，德國民眾缺乏「精力、勇氣或組織來推翻恐怖統治」。<sup>409</sup>盟軍不認為希特勒會遭到逮捕並被迫簽署投降文件，他或許會為了避免被捕遭受羞辱而選擇自殺。希特勒確實不想淪為階下囚。四月二十八日，當墨索里尼被殺的消息傳到帝國總理府的地下掩體時，希特勒大感震驚，他擔心自己的遺體也可能遭到褻瀆或被展示在憤怒的德國群眾面前。四月二十九日，希特勒決定自殺，他認為這麼做可以避免自己的歷史形象因被捕、被殺或審判而遭到汙衊。四月三十日下午，希特勒與他新婚一天的新娘伊娃（Eva Braun）一起自殺，伊娃服用氰化物自盡，希特勒則對著自己的頭部開槍自戕。希特勒的副官京舍（Otto Günsche）回憶



說，希特勒下令將他的遺體火化，以免「被帶到莫斯科，當成珍奇物品展示」。<sup>410</sup>

希特勒曾經想過這場戰爭會怎麼結束，他一直希望德國可能還有操作的空間。沃爾夫曾在四月十八日到地下掩體面見希特勒，沃爾夫後來對杜勒斯提到，希特勒向他解釋德軍可以集中到一連串的要塞堡壘中，一旦紅軍企圖越過在雅爾達會議約定的分界線時，美軍與紅軍將不可避免發生衝突，屆時德軍就有反攻的機會。希特勒期待能堅守柏林六到八個星期，然後在美蘇戰爭中選擇加入其中一方，這樣就能避免投降的命運。<sup>411</sup>希特勒的空軍副官在回憶錄裡提到，希特勒希望西方「不再堅持無條件投降」。<sup>412</sup>四月二十日，希特勒對外交部長說，如果自己因為保衛柏林而死，那麼接下來李賓特洛甫就必須與西方進行和平協商，盡可能找到雙方同意的基礎。在給最高統帥部總長凱特爾陸軍元帥的信中（這封信在最後幾天從地下掩體寄出，但最後並未送到），希特勒重申他的核心信念，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未來目標「仍是為德意志民族在東方取得領土」，儘管他已經無法完成這項任務。<sup>413</sup>即使到了最後，希特勒滿腦子仍充斥著這類幻想。希特勒將德國人民帶到災難邊緣，卻絲毫不在意德國人民的命運，因為投降意謂著他們「已經放棄他們存在的權利」。<sup>414</sup>希特勒的自殺，表示他最終還是不願負起結束戰爭的責任。由此產生的問題是，面對已經陷入崩潰的政府體系與向各地盟軍將領投降的大量武裝部隊，該如何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五月二日，義大利境內的德軍投降，兩天後，德國北部、荷蘭與丹麥的所有德軍也向蒙哥馬利投降。前述投降地區包括了一座位於德國與丹麥邊境的小鎮弗倫斯堡，重組的德國政府就是在這座小鎮重新開始運作。希特勒在最後遺言中指定了繼承人：由鄧尼茲海軍元帥擔任德國總統，宣傳部長戈培爾擔任德國總理。希特勒自殺後，戈培爾也在地下掩體內自殺，鄧尼茲因

此成為即將崩潰的德國與新成立的「弗倫斯堡政府」名義上的領袖。

弗倫斯堡政府在憲政體制上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但蒙哥馬利卻未下令占領弗倫斯堡或逮捕新政府成員，即便這些成員中的許多人甚至名列同盟國主要戰犯名單。這種現象再次引發蘇聯的強烈懷疑，猜測鄧尼茲將成為德國的巴多格里奧。五月六日，紅軍副參謀總長安東諾夫在莫斯科告訴盟軍代表，蘇聯拒絕承認新德國政府，而且堅持必須由德國最高統帥部無條件投降。否則的話，安東諾夫又表示，莫斯科當局將認為西方盟國正單方面與德國商議停戰，好讓德軍可以專心對付紅軍。<sup>415</sup>鄧尼茲知道投降不可避免，但蘇聯擔心的是，鄧尼茲有可能只向西方國家投降，然後繼續在東方進行戰鬥。鄧尼茲曾經拖延投降的時間，好讓德國的士兵與難民有時間逃離入侵蘇軍的控制。但到了五月五日，艾森豪告訴鄧尼茲，他必須要求所有軍隊無條件投降，而非只是部分軍隊。鄧尼茲只好派作戰部長約德爾一級上將前往位於法國城市蘭斯的盟軍遠征部隊最高統帥部簽訂投降協定。他依然抱著一線希望，期待投降協定的範圍僅限於西線戰場。約德爾抵達之後，終於發現一切已經沒有轉圜餘地。五月七日清晨，在未知會史達林之下，約德爾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文件。<sup>416</sup>蘇聯代表蘇斯洛帕羅夫將軍（Ivan Susloparov）也出席觀禮，但他不確定在未獲上級指示下能否在協定上簽字，但最後他還是在惴惴不安下簽下自己的大名。不難想像史達林有多麼憤怒，他堅持美國所持有的文件並非無條件投降書，而是他日後所謂的「預備議定書」。蘇聯要求必須在柏林舉行正式投降儀式。<sup>417</sup>艾森豪於是派出英國籍副司令泰德空軍上將代表他前往柏林，此外還有一名美軍高階將領與一名法軍高階將領出席。五月八日深夜，在柏林卡爾斯霍斯特（Karlshorst），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總長凱特爾陸軍元帥另外簽署一份盟軍一致認定的無條件投降書。雙方的差異在於認定的歐戰勝利紀念日不同：西方盟國是

五月八日，蘇聯則是五月九日，這個區別一直延續至今。

與義大利一樣，無條件投降書簽訂之後，並不代表戰爭就此徹底結束。捷克的戰鬥持續到五月十二日，最後一批堅持戰鬥的德軍終於遭到消滅。鄧尼茲的政府依然維持運作，英美的戰後轟炸調查團陸續前往弗倫斯堡與德國部長討論轟炸的影響，而他們發現弗倫斯堡依然到處可見武裝部隊與親衛隊。<sup>418</sup>五月十二日，蒙哥馬利司令部同意弗倫斯堡政府的請求，讓布西陸軍元帥取得什列斯威—霍爾斯坦省的指揮權，以維護當地秩序與協助提供當地民眾糧食，這項決定無異於承認新政權的權威。儘管可能遭遇政治難題，但邱吉爾仍傾向於支持鄧尼茲政府，因為新政權可以協助穩定被占領的德國。邱吉爾寫道，如果他「對我們而言是個有用的工具」，那麼他在「戰時的暴行」就可暫時略而不談。<sup>419</sup>這種立場隨即引發蘇聯新一波的抗議，蘇聯報紙宣稱西方國家正計畫給予德國新政權正當性，好讓他們共組反蘇同盟。為了火上加油，史達林允許報紙大肆宣傳希特勒其實沒有死在柏林，而是逃離了柏林，而且很可能受到西方盟國的庇護。蘇聯的奚落促使英國情報單位努力證明希特勒確實已經自殺身亡，但其實史達林早就已經從帝國總理府花園（希特勒遺體火化的地方）取得的法醫報告得知此事。<sup>420</sup>這種惡意的指控並非偶然。兩年來，史達林一直對盟邦會怎麼處理德國戰敗問題深感懷疑。鄧尼茲政權能夠繼續存在，證實了他最深的疑慮。最後，身為歐洲軍事最高司令的艾森豪決定無視邱吉爾與支吾其詞的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意見，授權占領弗倫斯堡與逮捕鄧尼茲及其閣員。五月二十三日，距離最初簽署降書已超過兩個星期，一批英國士兵逮捕了弗倫斯堡的德國領導人。<sup>421</sup>在此之後，英美蘇三國才得以共同成立盟國管制理事會，並且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正式宣布德國戰敗與無條件投降。

與逼迫日本投降的困難相比，歐洲的投降問題簡直不值一提。對日

本軍方來說，投降是不可想像的，這種心態可以從數十萬名寧可戰死也不願在無望戰爭中投降的日本官兵身上得到印證。對日本高層來說，太平洋戰爭的整體戰略完全建立在藉由初期取勝來換取與西方國家妥協的機會，以避免日後必須戰至投降。日本認為瑞士是中立國，可以為日本居間調停；或者梵蒂岡也適合擔任這個角色，日本為此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初就在梵蒂岡設立了日本外交使節團。一九四三年義大利投降，日本政府對於這件事十分關注，而且從中得出一種看法：如果巴多格里奧在無條件投降的狀況下還能保留政府與國王，那麼日本也可以尋求「巴多格里奧方案」來保留日本的天皇體制。<sup>422</sup>在連續幾個月的軍事危機之後，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四月成立新內閣，新任首相七十八歲的鈴木貫太郎在廣播中表示：「目前戰事十分嚴峻，不容樂觀。」前首相東條英機聽了廣播之後對一名記者說道：「戰爭要結束了。這個內閣將成為我們的巴多格里奧政府。」<sup>423</sup>裕仁天皇在與重臣會議討論之後決定任命鈴木貫太郎擔任首相，主要便是著眼於鈴木的主和立場。鈴木貫太郎想找到可接受的條件來結束這場戰爭，然而鈴木雖然傾向於和平，但他也與巴多格里奧一樣，必須繼續進行戰爭來安撫絕不投降的軍方強硬派。往後幾個月直到投降為止，日本政府一直處於主和派與主戰派（如果和平代價太高昂便戰鬥到底）僵持的局面。

日本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向美蘇提出協商和平的可能，不過從一九三八年以來，日本也持續向蔣介石政府提出同樣的要求，卻一直遭到拒絕。儘管如此，日本依然沒有放棄嘗試。一九四五年四月，當沃爾夫與杜勒斯進行會談時，日本開始思考是否可以利用瑞士做為協商管道。日本駐柏林海軍武官派藤村義一海軍中校前往瑞士，五月三日，藤村成功見到杜勒斯。藤村義一看到沃爾夫的協商促使駐義大利德軍順利投降，他因此希望自己也能說服杜勒斯，讓美日能夠進行和平協商，使日



本能夠保留天皇制與繼續占領密克羅尼西亞島嶼。然而這場會談很快就沒有下文，除了因為美國國務院表明只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東京當局也不信任自己未能直接掌控的談判協商。<sup>424</sup>日本之後也嘗試透過與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局進行聯繫，但未能成功（早在一九四五年初，德國就曾透過瑞典與同盟國協商，但遭遇失敗）。最後日本只剩下蘇聯這個選項，因為兩國至今尚未宣戰。

日本雖然希望蘇聯協助進行和平協商，但對於蘇聯干預東亞事務也充滿疑慮。日本認為莫斯科當局遲早會廢除一九四一年與日本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但無法確定會不會因此引發戰爭，也不知道何時將引發戰爭。如果蘇聯不願居間調停，協助日本與同盟國協商，那麼日本希望蘇聯介入亞洲事務至少可以對強大的美國產生牽制的效果，或許可以營造出比美國支配的東亞更有利保存日本民族未來的戰後形勢。與希特勒和德國領導高層一樣，日本希望這兩個戰時盟友的衝突可以讓日本獲得操作空間（最後確實是如此）。<sup>425</sup>七月，日本駐莫斯科大使探詢蘇聯居間調停的意願，卻發現蘇聯的態度十分冷淡。此時，蘇聯軍隊已經在滿洲邊境集結，但無法確定確切的入侵時間。日本想藉由蘇聯干涉來促使美國放棄提出嚴苛的和平條件，這種想法其實具有極高的政治風險，尤其日本思想警察發現到，這個時期日本與朝鮮境內的共產主義思潮都有擴大的趨勢。但日本高層為了避免無條件投降，也只能出此下策。<sup>426</sup>

到了六月，日本政府面臨僵局。日本已經找不到中立國做為協商結束戰爭的管道。陸軍堅持準備要在美國入侵本土島嶼時進行最後一戰，而根據裕仁的親信內大臣木戶幸一的說法，民眾不安的情緒愈來愈高漲。在經歷三個月的轟炸之後，城市牆壁上經常留下宣洩不滿的塗鴉文字，甚至出現了對天皇的怨恨之詞。六月八日，裕仁天皇批准了武裝部隊《戰爭指導基本大綱》，他仍認為必須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才能獲得較

好的結束戰爭條件，但到了六月二十二日，沖繩島失守，裕仁天皇終於下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盡快針對結束戰爭提出詳細計畫.....」，因為「日本內外的情勢已十分嚴峻」。<sup>427</sup>往後幾個星期，主和派與主戰派依然未能化解僵局，但無論哪一派，包括天皇在內，仍希望獲得同盟國的讓步。這些讓步包括保留殖民帝國與在中國的利益，避免遭到占領，允許日本自行解除武裝與自行懲罰戰犯，以及最重要的，保留天皇制與國體。日本認為協商仍有可能，因為從美國得到的消息顯示，美國國內的厭戰情緒與日俱增，而復員與重新部署也造成混亂，而這些確實是一九四五年夏天美國的實際狀況。在六月八日會議之前，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得到通知，鑑於美國國內的政治阻力，應推動軍事計畫，「瓦解敵人繼續作戰的意志」。<sup>428</sup>

不過日本領導人不知道的是，從一九四二年春天之後，美國內部已經針對日本與無條件投降地位的關係進行過多次討論。可以在德國實施的無條件投降，在日本卻問題叢生。支持「軟和平」的國務院官員擔心，如果同盟國堅持廢除天皇制，將埋下「暴亂與復仇的永久誘因」。<sup>429</sup>一九四五年夏天，美國領導人一方面希望戰爭盡快結束，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在日本本土進行兩棲登陸作戰，因為情報顯示，日本已經在九州島部署重兵，而這裡正是美軍計畫登陸的地方。以戰爭部長史汀生為首的保守派擔心戰爭拖得愈久，蘇聯干預的可能性就愈高，甚至可能導致蘇聯占領日本；此外，長期戰事也可能助長日本境內的激進勢力乃至於共產主義運動，而這點也呼應了東京當局的擔憂。史汀生傾向於用一段聲明來定義無條件投降，其中包括保留天皇制的「軟和平」。反對「軟和平」的人士則主張「硬和平」，為首的是剛被任命為國務卿的伯恩斯（James Byrnes）。伯恩斯認為主張「軟和平」的人都是綏靖主義者，他堅決不接受日本提出的任何條件。杜魯門總統也反對用聲明

來定義一個完全不需要解釋的詞彙，但他最終還是同意在宣言上強調日本求和的意願。七月十七日於波茨坦召開的同盟國會議，旨在協調同盟國之間對於歐洲未來的剩餘爭議，與日本投降有關的宣言草稿也在會上進行討論，但最後未能如史汀生所願，將保留天皇地位的條款列入。杜魯門視裕仁天皇為戰犯，他同意用「日本人民將可自由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這項條款來取代史汀生保留天皇制的條款，然而新條款卻留下很大的解釋空間。<sup>430</sup>美國、英國與中國簽訂的《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於七月二十六日公布，並且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如果日本不無條件投降，將立即遭到毀滅。宣言延後了一個星期才公布，因為需要時間將文件送到重慶附近的蔣介石野戰司令部進行解密與翻譯，然後獲得蔣介石的批准。<sup>431</sup>蘇聯此時尚未對日宣戰，所以沒有簽字。史達林確實同意要履行在雅爾達會議的承諾，也就是蘇聯將對日宣戰，而他也向盟邦表示，他準備在八月中發動進攻。美蘇雙方都不相信對方對亞洲的意圖，兩國實際上打的是兩場不同的戰爭。<sup>432</sup>

《波茨坦宣言》公布時，杜魯門知道宣言中威脅的「迅速而完全的毀滅」並非虛語。七月十六日，杜魯門在波茨坦接到通知，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軍基地進行的核武試驗已經獲得成功。這項代號「曼哈頓計畫」的核子武器研究開始於三年前，最初曾得到英國計畫的研究材料支持。發展核子武器的工業規模只有美國才具備。日本物理學家仁科芳雄曾經進行過一項實驗，試圖從鈾分離出同位素鈾—235，而鈾—235是製造原子彈的必要元素。仁科芳雄的木造實驗室在一場空襲中燒毀，他的研究計畫也因此中斷。在美國，曼哈頓計畫獲得大量資源，由國際各領域頂尖物理學家投入研究，而且也被列為重點發展目標。美國研發了兩種類型的原子彈，一種以濃縮鈾為基礎，另一種以鈾為基礎，鈾是源自於同位素鈾—239的人造元素。如果德國沒有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投

降，那麼依照英國人最初的想法，第一枚原子彈很可能在歐洲使用。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於該不該使用原子彈看法分歧，但最終的決定是基於政治而非軍事考量。<sup>433</sup>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只製造出兩枚原子彈，剛好一種類型各一枚。杜魯門獲得邱吉爾的同意，準備從過去尚未遭到盟軍轟炸的日本城市挑出兩個做為目標，以評估武器的效果。杜魯門在日記裡寫道：「我們發明了世界史上最恐怖的炸彈。」即使杜魯門因為道德顧慮而對於批准使用原子彈感到猶豫，此時為了加快結束戰爭，也只能將這些不安拋諸腦後。杜魯門在日記裡又寫道：「但我們可以讓這些炸彈發揮最大的用處。」<sup>434</sup>按照杜魯門的觀點，這幾年研發原子彈的目的，當然就是在原子彈完成後拿來使用。

兩天後，鈴木貫太郎拒絕了《波茨坦宣言》，並表示「日本政府將無視這份宣言」。美國於是決定使用原子彈。鈴木貫太郎的拒絕被視為日本並非真心想尋求和平的明證，但比較可能的狀況是東京當局認為《波茨坦宣言》只是同盟國再次重申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而關於這點，同盟國與日本早已理解彼此的立場，因此沒有回應的必要。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列出一張城市清單，包括廣島、小倉、新潟、長崎與京都，最後選擇了廣島。<sup>435</sup>八月六日，B—29轟炸機艾諾拉蓋號

（*Enola Gay*）從馬里亞納群島的天寧島起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美國人事不關己地把這枚原子彈命名為「小男孩」。早上八點十五分，原子彈在地面上方一千八百英尺的高度爆炸，爆炸半徑一點五公里內的所有人全部熔化，五公里內的人全被燒成灰燼。巨大的衝擊波過後，在最初爆炸閃光中存活下的人，皮膚開始掉落，內臟也開始壞死。轟炸機上的機組人員在返航時看到巨大的火球與蕈狀雲。轟炸機副駕駛路易斯（Robert Lewis）在日記裡寫道：「就算我活到一百歲，我也不會忘記那幾分鐘的景象。」<sup>436</sup>



三天後，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花了一天的時間辯論戰爭該如何結束。西方領袖普遍認為原子彈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決定性因素，一九四五年後許多研究日本投降的歷史作品也如此認為。兩者間的因果關係似乎說得通，但卻掩蓋了更複雜的日本現實。從傳統轟炸攻勢的面向來看，原子彈對廣島地面的衝擊其實與燃燒彈的破壞差別不大，而當時燃燒彈已經炸毀了日本將近六成的都市地區，殺死了超過二十六萬名平民。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開會的時候，還必須考慮蘇聯入侵滿洲的問題。八月八日，蘇聯外交部長通知日本駐莫斯科大使，日蘇兩國將在次日進入戰爭狀態。鈴木貫太郎認為蘇聯對日宣戰是個決定性因素，這表示日本無法再期望蘇聯居間協調，甚至蘇聯還有入侵朝鮮或日本本土的可能。<sup>437</sup>八月九日早上，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開會，開始了漫長的辯論。占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半數的軍方代表認為，除非同盟國放棄占領日本的計畫，允許日本自行解除武裝與自行懲處戰犯，並且允許日本保留天皇制，否則日本應該繼續戰鬥。另一半的成員則支持外務大臣東鄉茂德的主張，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要求，讓日本能保留天皇制。簡單地說，軍方主張「四個條件」，非軍方主張「一個條件」。<sup>438</sup>就在早上開會時，消息傳來，第二枚原子彈「胖子」（屬於鈾彈）落在長崎（原定目標是小倉，因為小倉上空雲層太厚才改投長崎），但出席者依然沒有人願意接受無條件投降。當天稍晚，僵局終於有化解的可能。在鈴木貫太郎與木戶幸一勸說下，裕仁天皇終於同意在晚間召開御前會議。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在會議上表示，國內局勢已經處於危機關頭：「繼續戰爭造成的國內混亂將遠遠超過結束戰爭。」裕仁天皇已在過去幾個星期得到警告，民眾反對戰爭與反對天皇的情緒因為轟炸與廣泛的糧食危機而升溫，對裕仁而言，民心向背對他造成的壓力不下於轟炸與蘇聯入侵。<sup>439</sup>到了八月十日清晨，鈴木貫太郎終於請求裕仁做出聖斷，天皇

於是宣布批准接受《波茨坦宣言》，讓天皇制能夠獲得保存。第二天，同盟國得到正式通知，日本有條件地接受他們的要求。

美國的回應顯得模稜兩可，因為杜魯門與伯恩斯在華府受到極大壓力，大多數人都希望接受日本的要求以避免繼續流血。美方的照會確認天皇與日本政府將在無條件投降之下服從於駐日盟軍最高司令的權威，但照會中並未詳細說明天皇制將會暫時擱置還是廢除。八月十四日，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裕仁天皇排除陸軍的反對，堅持必須接受美國的版本。軍方高層不敢違反聖斷，只能接受。同日，裕仁錄製了終戰詔書，準備在第二天早上播放。當天稍晚，同盟國透過瑞士得知天皇的決定。廣播也通知日本民眾，八月十五日中午有重要訊息要宣布，要民眾按時收聽。早上，民眾聚集在有收音機的地方，此前日本民眾從未聽過天皇的聲音。當「玉音」終於開始播送時，天皇的遣詞用句都讓人難以聽懂，不僅因為裕仁說的是古老而正式的日文，也因為廣播接收訊號不清所致。一名聆聽者注意到，天皇說話的「音調比較高，咬字不太清楚，斷斷續續」，但「從天皇嚴肅的聲調可以清楚知道，他是在告訴我們日本已經戰敗」，即使他說的話大家都聽不太懂。<sup>440</sup>

裕仁並未說出「投降」二字，他只表示他會接受《波茨坦宣言》，並且與民眾一起「忍所難忍」。裕仁為什麼要踏出史無前例的一步，干預政府的政治爭論，並且親自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決定，箇中原因仍有待猜測，但每一種解釋都各得其理，我們很難說有哪一種說法特別具說服力。裕仁天皇害怕轟炸（不僅是原子彈，也包括傳統炸彈），他知道日本每個戰場都在潰敗，不希望日本被蘇聯占領，也知道日本隨時可能爆發大規模社會危機。裕仁天皇自己也是日本帝國的歷史產物，但西方歷史學家由於太過討厭他而不願正視這個事實。七月，裕仁曾經表達他個人的擔憂，皇室數百年來代代相傳用來保護國體與皇族的三神器（八咫

鏡、天叢雲劍與八尺瓊勾玉），可能會輕易落入入侵的盟軍手中。在投降後的「獨白」中，裕仁再度重申，盟軍若奪走三神器，將意謂日本過去歷史的終結：「然而，即使過程中我必須做出犧牲，我仍決心締造和平。」<sup>441</sup>

接下來才是投降的開始，而非結束。八月十五日，具有過渡性質的「巴多格里奧式政府」成立，由皇族東久邇宮稔彥王出任首相。十七日，日本試圖說服美國同意，在某些特定地點只做有限占領，但遭到拒絕。與戰敗的德國不同，日本廣袤的帝國領土絕大部分仍掌握在日本手裡，日本政府必須派皇族成員到帝國的西部與南部傳達詔令，讓當地指揮官下令軍隊投降。西貢、新加坡與南京各自舉行了投降儀式。太平洋的日軍向尼米茲上將投降，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的朝鮮、菲律賓與日本的日軍向麥克阿瑟投降。新加坡的日軍向蒙巴頓的東南亞戰區司令部投降。<sup>442</sup>九月九日，在南京，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率領在中國、臺灣與越南北部的日軍向蔣介石的代表何應欽將軍投降。毛澤東無視盟軍協定，率領共產黨軍隊接受中國西北部日軍投降，並且進攻不願向他們投降的日軍，奪取他們的武器與補給。<sup>443</sup>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批美國占領軍抵達日本。兩天後，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也抵達日本。九月二日，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

（*Missouri*）戰鬥艦上簽署主要投降文件。雖然史達林希望與美國一起占領日本，並且主張由蘇聯派兵占領北海道北半部，但被杜魯門一口回絕。蘇聯對日宣戰之後，完全依照自己的步調行事。即便裕仁宣布投降之後，紅軍仍繼續朝滿洲剩餘地區推進，最終進入朝鮮。八月十九日，滿洲的日軍終於簽訂停戰協定，但庫頁島南部的戰鬥仍持續到八月二十五日，與此同時史達林也下令蘇軍占領千島群島，包括原本在《波茨坦宣言》中承諾由美國占領的千島群島南部島嶼。這些征服行動一直到九

月一日才完成，剛好是日本投降儀式前一天。在日本投降儀式舉行之後，蘇聯自己又在北方舉行停戰儀式。<sup>444</sup>

無條件投降結束了歐洲與東亞的所有戰爭，也結束了這些戰爭所開啟的帝國計畫，但無論在歐洲還是東亞，結束戰爭並不像「無條件」這個淺顯易懂的詞一樣簡單直接。在德國與日本，投降引發了自殺潮，這些自殺者可能是害怕遭到報復，或對於民族帝國的全面戰敗感到恥辱，或者是窮盡心血建立新秩序卻終告失敗，在情感與心理上都無法承受打擊，抑或是相信官方宣傳，認為自己可能遭受敵人野蠻地摧殘。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有多達數千人自殺，希特勒也是其中之一，而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個星期也有許多人尋短，其中包括弗里德堡海軍上將（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弗里德堡很不幸地這輩子經歷了三次德國投降，最後當鄧尼茲政府遭逮捕時，他決定舉槍自盡。其他的自殺者還包括八名納粹黨帝國大區長官、七名親衛隊領導高層、五十三名陸軍將領、十四名空軍將領與十一名海軍將領。五月八日，駐挪威帝國總督特博文在身上綁了五十公斤炸藥，將自己炸成碎片。<sup>445</sup>在德國投降的前後幾個月，也有大批納粹黨員與忠誠的親衛隊自殺，包括在紐倫堡被傳訊的幾個主要戰犯。弗朗克自殺未遂，萊伊（Robert Ley）與戈林則自殺成功。希姆萊被捕且被指認出來之後，為了逃避審判，便吞下氰化物自殺。

日本與帝國海外領土在投降後也出現類似的反應，許多人在日本戰敗後為了追求榮譽而集體自殺（玉碎）或切腹。在沖繩島，日本第一個被美軍征服的領土，當地民眾與守軍被下令集體自殺，以免落入敵人手裡。有些平民被分發手榴彈，還有一些民眾使用剃刀、農具或棍棒。一名沖繩年輕人日後回憶自己親手用石頭砸死自己的母親與妹妹。<sup>446</sup>日本菁英階層自殺的現象非常普遍。九名陸軍高階將領與海軍高階將領在日本投降後立即自殺，包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與前任陸軍大臣杉山元。



杉山元舉槍自盡，第二天他的妻子身穿白衣吞下氰化物以短刀刺胸自盡。東條英機嘗試切腹失敗，最後於一九四六年接受審判。<sup>447</sup>然而，無論在德國還是日本，對其他數千萬人來說，投降都意味著從總體戰的需索無度中解脫。而同盟國之間圍繞著投降與投降後的種種爭論，也預示了未來冷戰的來臨。至於歐洲、中東、非洲與亞洲帝國主義產生的眾多未解危機，往後還將引發連綿數年的暴力與政治衝突。



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橫越法國的莫爾坦戰役後，盟軍西線最高司令艾森豪將軍走過一輛翻覆的「虎式」德國六號戰車。圖源：*Pictorial Press Ltd/Alamy*

- [1] 譯注：本書第一、二章曾經提到奎斯林，他是挪威納粹黨員，在德占挪威時期擔任挪威首相。水手指達朗的海軍身分。這句話是說達朗畢竟是投靠德國的維琪政權人士，不能給他太大的權力。

二戰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  
|  
1945  
●  
BLOOD & RUINS

•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 CHAPTER 4

# 第四章

## 動員與總體戰



「一九四一年，我十六歲，個子瘦小.....我操作一臺可以生產自動步槍子彈的機器。如果我構不著機器，他們會讓我站上箱子.....工作日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就這樣持續四年。沒有任何一天休息，也沒有假日。」

—— 科切吉娜（**Elizaveta Kochergina**），車里雅賓斯克<sup>1</sup>

動員資源進行全球戰爭會造成非比尋常的需求，就像前面引述的年輕蘇聯工人所說。在蘇聯大後方的車里雅賓斯克，勞工法令要求婦女、孩子、青少年與老人必須夜以繼日地持續生產軍火。另一名年輕女子謝娜（**Vera Sheina**），她的工作是將尾翼焊接到火箭彈外殼上。有一回，灼熱的鐵塊嚴重燒傷她的雙腿，使她不得不返家休養，但監工卻跑到她家，硬是把她拉回工作崗位。她只好包紮著雙腿，繼續進行焊接工作。<sup>2</sup>蘇聯在戰爭時期壓榨人民到了極限，其要求的艱苦程度沒有任何西方工人可以忍受。無論是進入武裝部隊還是戰時的工業與農業，各交戰國的動員經驗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然而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幾乎都有一個共通的想法，那就是國家存續；而在總體戰中，國家若想存續，就必須傾全國之力運用所有人力物力，否則就有戰敗的可能。在車里雅賓斯克，生產不力會被視為叛國，必須依叛國罪來懲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普遍被視為是一場集體動員的戰爭，但這項觀點仍存在許多問題。二戰的戰爭投入規模史無前例，這種大規模動員源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一戰期間，大規模動員才逐漸成為戰略上不可避免的選項）。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四五年的二戰，主要參戰國投入共計超過九千萬名男女士兵，若以全球尺度來看，投入人力肯定超過一億兩千萬。經濟動員的規模同樣巨大：雖然主要交戰國的國民所得用來支付軍費的比例大不相同，但即使是軍費較低的國家也能看出經濟支

出的優先順序出現很大的變化。一九四四年的日本軍費占了全國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七十六，同年德國的軍費也高達七成——不尋常的高比例顯示兩國拼命想避免戰敗。在同盟國方面，軍費占比也從蘇聯的將近三分之二到英國的百分之五十五，再到美國的百分之四十五，因資源豐富程度而有所不同。法西斯義大利是個少見的例外，軍費占比不到國民生產的五分之一，顯示墨索里尼不願加諸過重的動員負擔以免導致民眾反感，也顯示義大利資源的嚴重短缺。<sup>3</sup>各國大後方的戰爭投入，意謂著絕大多數工廠工人所生產的物品，從武器、軍服、紙張到軍用飯盒，全都與戰爭有關。除了基本糧食供給，所有民間產出都被歸類為非必要，隨時可以予以停工或讓位於軍事生產。如此大規模的動員確實是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只能從動員發生時的整體時代脈絡來理解。

集體動員是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唯有具備龐大工業與商業基礎、擁有大量受過技術訓練的勞動力、具有發展健全的科學體制，以及能夠取得適當資源與資金的現代國家，才有能力發動大規模戰爭與供給維持戰爭所需的武器裝備。現代官僚國家結構是進行集體動員的必要條件，具備這樣的結構才能推動行政與統計工作，充分掌握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即使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世界各國對於整體經濟結構與規模的瞭解依然處於起步階段，但要在軍隊與戰時產業之間進行總體經濟規畫以做出恰當的人力與資源配置，就必須具備對勞動力與工業產出建立統計的能力——得益於二十世紀最初數十年的統計革命，現代國家得以具備這種能力，同時發展出複雜的通報與記錄制度，囊括所有的社會與經濟資料。武器與軍事裝備的廣泛量產是經濟動員的核心，同樣地，要做到這點也有賴二十世紀初出現的生產與管理革命，這一革命也徹底翻轉了製造與分配的本質。工業化戰爭，仰賴的是大量容易製造與相對廉價的現代武器，如此才能在戰場維持一支龐大的部隊，而且能在連續數年的戰爭中

不斷補充武器 —— 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往往已做不到這點，因為當前的武器有著極為昂貴的成本與極其複雜的科技。現代戰爭也需要具有足夠教育程度的兵員與工人，因為使用與生產的武器都變得更加複雜，戰爭也變得更加科層組織化。舉例來說，日本在一九〇〇年時，徵召的兵員有三成不識字或勉強識字，但隨著後續基礎教育的普及，到了一九二〇年時這個數字幾乎已可忽略不計。<sup>4</sup>兩次世界大戰使用的武器種類不斷擴大，包括飛機、無線電、各式車輛、高性能火炮，顯示武裝部隊與相關產業都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而唯有具備先進技術訓練與分工精細的現代社會才有可能培養出這樣的工人。完全缺乏現代性特徵的國家，例如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勢必無法在缺乏外援的狀況下維持現代戰爭，哪怕中國的國土遼闊，也無法單獨贏得勝利。事實上，如果把時間提早一個世代，那麼二戰的主要交戰國恐怕也無法維持同等規模的世界大戰。

然而，現代性特徵能夠解釋國家為什麼能進行動員，卻無法解釋為什麼要進行動員。政府願意進行近乎無限制的動員，而人民也願意接受動員，主要是受到當時現代民族主義興起與公民概念轉變的影響。現代國家是在強力動員下形成的實體，國與國的競爭，無論在經濟、帝國或軍事等各方面，都被視為民族生存競爭下不可避免的結果。達爾文在自然界建立的適者生存典範，也被廣泛應用在民族、帝國與國家間的競爭（即社會達爾文主義）。<sup>5</sup>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促使衝突持續的一股力量就是恐懼，恐懼民族遭到滅絕與帝國遭到毀滅。雖然今日看來十分不理性的，但當時人確實有這樣的恐懼。兩場大戰會爆發，就是政府與民眾都發現和平協商徒勞無功，認定除非將整個國家資源完全動員，否則注定會走向失敗。與此同時，現代國家或民族帝國的興起，也導致公民概念的轉變。身為國家的一分子，公民有責任保衛國家與服兵役，這種

概念在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開始在各國傳播開來（英美是例外），不僅建立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也為日後的大規模動員鋪路。

一戰是集體動員的發展分水嶺。雖然參戰國沒有料到這場戰爭會演變成消耗戰與民族存續的鬥爭，但為了持續作戰，各國只能大幅增加軍事人力，有組織地運用工業與農業來供應武器、糧食給軍隊，同時還要維持後方的民心士氣。戰時的經驗使人深信，要在現代工業化總體戰的戰爭中獲勝，就必須無限制地動員國家資源，而且打仗的責任也不能僅限於軍隊，必須擴及全國民眾，不分男女。這種思維在德國尤其盛行，德國的軍事領袖認為，一九一八年的失敗就是全國動員失敗造成的。在戰後回憶錄創造出「總體戰」一詞的魯登道夫將軍（Erich Ludendorff）就如此表示，未來的國家必須「在心靈、道德、身體與物質力量上做好準備，以進行戰爭」。<sup>6</sup>二十年後，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的會議中向將領們解釋，一旦大戰爆發，他們不能像一九一四年那樣期待能迅速獲勝，因為「每個國家都會傾全力堅持下去.....各國必然會無限制地投入所有資源.....想輕鬆脫身是危險的想法，因為這是不可能的」。<sup>7</sup>一個月後，由空軍總司令戈林擔任主席的帝國防衛委員會開始根據列強之間可能再次爆發全面戰爭的假定來進行規畫，委員會認為必須動員所有勞動人口，包括男女，總數約四千三百五十萬人，其中至少七百萬人進入軍隊，其餘則負責生產糧食、設備與武器以支應戰爭。<sup>8</sup>

這種想法不僅限於德國。一九一八年的戰勝國也認為，傾盡全國（與全帝國）之力是致勝的關鍵。凡爾登會戰的英雄貝當元帥敦促法國人瞭解，現代戰爭「需要動員國家所有的資源」。<sup>9</sup>英國戰略家佛爾斯（Cyril Falls）在一場題為《總體戰準則》的演說中，將總體戰這個新概念定義為「將國家的各個部分與所有活動投入於戰爭」。<sup>10</sup>在戰間期，人們普遍認為未來大國之間若發生戰爭，不可避免將具有「民主」



的特徵。軍人與後方民眾之間在一九一四年仍有清楚的界線，但此後這條界線逐漸遭到抹除。工業、農業與運輸工人，無論男女，全被視為戰爭的一部分。如果平民在未來戰爭中與軍隊一樣扮演著重要角色，那麼平民將免不了成為敵軍攻擊的對象。一九三六年，一名英國空軍將領向美國海軍參謀學院的學生解釋，「民主的力量」將使敵國人民成為正當的攻擊目標，因為「要在作戰人員與非作戰人員之間劃出界線是不可能的」。<sup>11</sup>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空軍也提出類似的戰爭觀點，「所有軍事行動的終極目標都是摧毀後方民眾的意志」，也就是「平民百姓，那些在街上的民眾」。<sup>12</sup>

如今所謂的戰爭「平民化」（civilianization），其起源就是一戰，之後又在各國內戰經驗下進一步擴大：包括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俄羅斯內戰、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內戰與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內戰。在這些內戰中，平民不僅是受害者，也是戰鬥人員。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承平社會的軍事化充分顯示了當時的主流觀點：衝突將波及整個社群，因此沒有人應該置身事外。蘇聯、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盛行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框架，皆是以社群必須保衛國家為前提。在蘇聯，人民必須與武裝部隊並肩保衛革命政權，每年蘇聯共青團不分男女都要接受基礎的準軍事訓練。在納粹德國，民族共同體也必須為國家的存續奮鬥。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代已經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並且於一九三八年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日本民眾組織數千個地方社群協會支持日本帝國主義，鞏固民眾對國家遂行戰爭的認同。<sup>13</sup>日本動員之後，中國政府也於一九四二年三月通過《國家總動員法》，「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賦予政府特別權力統制軍事、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sup>14</sup>

英國、法國與美國雖然人民動員程度較低（不過這三個國家因為曾經歷過一戰，所以依然擁有強大的軍事文化），卻也同意未來的戰爭將

會是一場總體戰。除了因為戰爭必須動用「國家的一切資源」，也是如一名英國軍事作家所言，「無限制的投入將是決定勝敗的關鍵。」<sup>15</sup>一九三〇年代初，美國開始計畫廣泛的工業戰爭動員；一九三〇年代末，英國與法國政府也計畫一旦戰爭爆發，將重新恢復一戰結束後停止的經濟與軍事集體動員。總體戰的概念成了一種自證預言，一種具感染力的陳腔濫調，就像二十一世紀的「反恐戰爭」或「網路戰」。影響所及，沒有國家或軍隊敢冒險不對全國社會、物質與心理力量進行動員，因為他們擔心不這麼做就無法在現代戰爭中取勝。美國對資源的動員不像其他交戰國那麼徹底，美國民眾也未實際面臨戰火的威脅，但美國依然使用「總體戰」來定義美國參與的這場戰爭。一九四二年七月，美國國務卿赫爾在演說中告訴聽眾，當前的戰爭是「一場生死鬥爭，我們必須全力保護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存在」。<sup>16</sup>與其他交戰國一樣，一旦美國要動員進行總體戰，就表示美國既存的現代性結構之間將會產生複雜的連動：不僅平民將被視為現代戰爭的一部分，民眾也必須願意認同自身利益與國家或帝國的存續密不可分。

## 軍事動員

二戰時，所有的交戰國首先進行的是軍人的動員，但動員除了考慮人口多寡或當前戰爭性質這類明顯因素之外，還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首先，現代戰爭需要大型的管理科層服務與訓練組織，這些組織宛如承平社會的縮影，吸納數百萬名身穿軍服的男女。在太平洋戰爭中，每派出一名士兵到前線實際作戰，就要有十八名男女士兵在後方進行支援。<sup>17</sup>其次，士兵的折損率會影響額外徵兵與進一步動員的需求。損失

可能源自於激烈戰鬥下的高傷亡率，或者是來自於被俘或逃兵。高損失率解釋了蘇聯、德國與日本極端的動員率，這三個國家總共動員了六千萬名軍人。相對較低的損失率也說明了為什麼美國與英國主要仰賴第一波徵兵，而沒有進行緊急狀態下的大量徵兵。蘇聯動員了三千四百五十萬人，相當於戰前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四（如果扣除德國占領的蘇聯西部土地，那麼將占剩餘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國動員的比例如果納入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併吞的區域，那麼其動員的一千七百二十萬人也占了將近戰前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英國（不包括自治領與海外殖民地）動員了五百三十萬人，美國則是一千六百一十萬人，分別占戰前人口的百分之十點八與十一點三。

軍事動員也受到軍隊與民間彼此競爭勞動力的限制。一戰時，第一波徵兵徵召了大量技術勞工、專業工程師與科學家，導致戰時經濟缺乏必要的專業人員。二戰時，人們已經理解到軍事需求必須與工業及農業需求達成平衡，被劃歸保留職業的人如今可以免除兵役。德國到了一九四一年約有四百八十萬名工人免役，特別是技術鐵工。英國大約有六百萬名工人免役，主要是工程、造船與化學工廠的技術工人，但也包括英國的三十萬名農夫。<sup>18</sup>美國兵役局在處理徵兵問題時面臨的困難較大，因為美國幾乎沒有對二戰做出任何準備。第一波的兵役登記有數百萬人免役，有些是基於職業因素，有些是基於家庭因素，還有一些人是因為不識字或精神有問題，甚至還有一些人是因為健康狀況不佳。聯邦當局最終擬定了一份涵蓋三千種保留職業的清單，到了一九四四年，這份清單至少讓五百萬名年輕人不用進部隊服役。<sup>19</sup>在各交戰國中，只有蘇聯幾乎不存在豁免兵役的狀況，由於蘇聯的軍事損失極高，所以國內半數成年男性勞動力最終都進了軍隊。蘇聯國內生產多半仰賴像科切吉娜這樣的年輕女性，由她們取代被徵召入伍的男性從事生產工作。<sup>20</sup>

估算必要的軍事人力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工作，除了要預測未來的戰爭走勢，還要知道軍隊是否能吸納大量入伍士兵或預備役士兵。絕大多數參戰國都認為必須要像一戰那樣集體動員，德國與法國更是在二戰一開始就動員了預備役士兵。重返軍隊的預備役士兵通常年紀較大，例如一九四〇年被俘的一百六十萬法國士兵，平均年齡是三十五歲。中日戰爭初期，日軍也徵召了一百萬名預備役士兵。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國境內的日軍將近半數介於二十九歲到三十四歲之間。日本在開戰初期不願徵召年輕人入伍，但到了戰爭的最後兩年，終於決定動員十九與二十歲男子。<sup>21</sup>蔣介石的中國政府下令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子都必須入伍當兵（除了獨子與肢體殘障），但以中國龐大的人口來說，最終估計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入伍，這是因為全國性的徵兵已經超過中國政府的能力範圍之外。戰爭剛爆發的時候，中國曾出現自願入伍的愛國熱潮，但之後逃避兵役卻成為常態。富人出錢讓自己的兒子不用當兵，有些人寧可受僱成為傭兵也不願意入伍當兵。有些省分因為未能達到每年規定的徵召兵員數量，徵兵者於是下鄉抓捕年輕農民入伍。這些年輕人被繩索綑綁在一起，被迫長途步行前往訓練營。這些被強徵的役男是被迫服從於野蠻而不講道德的當局，因此從一開始就難以成為可用之兵。據估計，中國有一百四十萬人還沒來得及抵達前線作戰，就因為疾病、飢餓與虐待而死亡。<sup>22</sup>

美國由於先前並未施行徵兵，因此不存在大量的預備役士兵。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擬定的「勝利計畫」中，美國政府認為軍方有能力徵召與訓練一支軍隊來對抗敵方的集體動員。陸軍預估美國地面部隊需要兩百一十五個師，一共九百萬人，然而如果蘇聯戰敗的惡夢成真，那麼美國陸軍恐怕要擴大到八百個師，一共兩千五百萬人。<sup>23</sup>由於蘇聯成功堅持下來，美國陸軍最終只組織了九十個加強師。後來拉丁美洲的部隊也要



求加入美軍的行列，希望藉此在戰後秩序取得一席之地。一九四二年五月，墨西哥向軸心國宣戰，巴西也在六個月後跟著宣戰。一九四五年，一群別稱「阿茲特克之鷹」的墨西哥飛行員在菲律賓上空進行了空戰。一九四四年七月，儘管英國反對，一個巴西師與一支巴西空軍分遣隊仍抵達義大利，他們在九月加入戰鬥，直到八個月後德國投降為止。<sup>24</sup>

各交戰國從動員之初就開始大幅增加武裝部隊的數量，此後戰爭規模持續擴大，損失也持續上升。戰時軍隊規模的統計數字見表4.1。

表4.1 主要參戰國的武裝部隊總數，1939-1945年（單位：千人）<sup>25</sup>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德國	4,522	5,762	7,309	8,410	9,480	9,420	7,830
義大利	1,740	2,340	3,227	3,810	3,815	-	-
日本	1,620	1,723	2,411	2,829	3,808	5,365	7,193
英國	480	2,273	3,383	4,091	4,761	4,967	5,090
蘇聯	-	5,000	7,100	11,340	11,858	12,225	12,100
美國	-	-	1,620	3,970	9,020	11,410	11,430

這些數字起初與一戰的動員規模相當，但不久便全面超越。一九四五年，歐洲與亞洲戰場已經來到了最後階段，世界各主要參戰國總共擁有四千三百萬男女士兵，以往熟悉的社會地景已不復存在。這個數字也包括波蘭武裝部隊。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波蘭軍隊已經加入同盟國陣營，到了一九四二年，波蘭戰俘也在史達林同意下參與了同盟國在

北非的軍事行動。一九四〇年五月，重組的波蘭陸軍擁有六萬七千人；為數不多的波蘭海軍仍懸掛波蘭國旗，而波蘭飛行員則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一九四四年四月，有五萬名波蘭人參與盟軍在義大利的戰鬥。<sup>26</sup>

這些概略的數字雖然傳達了集體動員的面向，卻無法顯示大規模徵兵形成的軍事社會本質。軍隊並非只是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雖然一般總認為軍人穿上軍服後就過著與平民迥然不同的生活，但實際上，軍隊反映的卻是軍人被徵召之前所處的社會縮影。軍隊是複雜的社會組織，其複雜性表現在為了進行現代戰爭而必須建立的各種軍事勞動形式。這些勞動形式有許多其實與平民生活沒什麼不同，唯一的差異只在於這群工作的男男女女身上穿著軍服。事實上，軍事勞動與平民生活的關連極為明顯，因為絕大多數軍人都來自於自願或徵召入伍的民眾。戰爭初期，正規部隊的龐大損失使軍隊更加仰賴平民，因為入伍的民眾可以將和平時期取得的技術與才能帶進軍隊之中。在軍隊裡，絕大多數勤務屬於輔助與支援性質，這些工作多半由年紀較大的男性或曾經受傷者或女性自願者來執行。真正到前線戰鬥的人只占其中一部分。軍事社會除了戰鬥人員之外，其他部分則由辦事員、倉儲人員、工人、工程師、後勤人員、信號與無線電人員、情報人員、維修人員、檔案與資料管理人員、醫生與獸醫、糧食供應與準備人員、薪餉人員等組成。這個廣大的職業社群解釋了動員為什麼如此廣泛。一九四三年，德軍有兩百萬人在前線，卻有八百萬人負責執行其他被指派的軍事任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美國陸軍徵召了七百五十萬人，卻只有兩百八十萬人被分配到作戰單位，絕大多數人負責非作戰的支援任務。一九四三年底駐紮在英國的美國第八航空軍擁有大約兩萬五千名空勤人員，卻有多達二十八萬三千人受僱從事各種非作戰的專業任務。標準的英國步兵師有一萬五千五百人，其中只有六千七百五十人是前線戰士。<sup>27</sup>作戰人力與非作戰人力的

比例在日本與蘇聯沒有這麼懸殊，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前線士兵極度短缺。然而無論在哪個國家，軍事體制都要仰賴數百萬名非戰鬥人員才能組織起有效的戰鬥部隊。

與平民社會一樣，軍隊也需要專業的技術或能力，並且透過訓練的方式將這些技能迅速傳授給士兵。軍隊一般會藉由選拔程序找出具備一定技術與教育程度較高的新兵，然後將這些新兵分配到技術門檻較高的單位。在美國，標準陸軍普通分類測驗得分最高的人有五分之二會進入美國陸軍航空軍。在加拿大，空軍使用醫學與心理專家設計的「林克訓練機」來挑選具潛力的飛行員，在六十萬名自願入伍的人當中，只挑選出九萬人。<sup>28</sup>英國一開始徵兵並未進行妥善管理，導致大量技術人員被分配到無法發揮所長的單位。一九四〇年，英國軍方開始引進心理測驗，一九四一年又進一步以和平時期的國家工業心理學研究所為藍本，設立了人員選拔處。新的制度透過能力傾向測試，確保從平民生活中習得的技能可以適當地分配到不同的軍事單位。<sup>29</sup>這個制度當然不是沒有缺點，測試往往反映出當時盛行的階級現實；分數較低的新兵，通常在校成績較差，這些人清一色被分配到步兵單位。有時，軍隊只能進行極為基本的訓練。例如在義大利，數千名來自鄉村的不識字新兵，完全分不清左邊右邊，最後只能用有色的繩子綁在他們手臂上，才能讓他們記住哪邊是哪邊。<sup>30</sup>所有新兵都要接受基本訓練，即使日後要分配到輔助單位的人也不例外。由於動員的規模龐大，訓練制度也必須配合人力需求來進行。舉例來說，英國皇家空軍依照帝國空軍訓練計畫進行訓練，這項計畫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獲得加拿大政府同意，在九十七所加拿大訓練學校培訓下，最後有十三萬一千名空勤人員結訓。<sup>31</sup>一九四二年，當美國開始大量徵兵時，一套緊急的訓練體系也在兩百四十二個地點同時建立。軍官訓練名額也從一九四一年的一萬四千人，擴增到一年後的

九萬人。就連兵役局認定的一百六十萬名文盲也必須接受訓練，除了學習讀寫，還要接受常規的軍事指令訓練。<sup>32</sup>最引人注目的訓練計畫是蘇聯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發布的蘇聯全民義務軍事訓練命令，要求所有尚未入伍的男子在工作結束後必須接受一百一十小時的訓練課程，學習如何使用步槍、迫擊砲、機關槍與手榴彈，還要學習挖掘軍用壕溝。<sup>33</sup>

第二個影響動員規模的因素是損失不斷累積造成的衝擊。在這方面，西方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具有很大的差異。英國與美國普遍想避免一戰時期因為壕溝戰陷入僵局而導致的慘重傷亡，兩國因此轉而將重點放在空軍與海軍，雖然高度訓練的人力損失可能相當巨大（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損失了百分之四十一的機組人員），但對整體人力的打擊卻較為輕微。英美直到一九四四年之後才出現大規模的地面作戰。到了一九四四年底，美國所有前線的絕對軍事損失（死亡、失蹤、被俘）雖然達到十六萬八千人，仍比東線戰場任何一場會戰都來得少。<sup>34</sup>歐洲與太平洋戰場在最後幾個月出現的高傷亡人數，使美軍作戰死亡總人數推升到二十九萬兩千人（還要加上病死與傷重死亡的十一萬四千人）。<sup>35</sup>英國在六年的衝突中，軍隊死亡人數達到二十七萬人。這個損失規模使英國戰時的徵兵人數逐年下降：一九四一年徵召三百萬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只剩下五十四萬七千人，一九四三年進一步減少到三十四萬七千人，一九四四年更是只有二十五萬四千人。<sup>36</sup>然而徵兵人數減少的結果，反而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引發人力危機，因為此時英軍的損失正值高點，各級將領都努力想降低傷亡率。<sup>37</sup>延長軍人的生存時間可以培養出更有經驗與更靈活應變的士兵與飛行員，但即使軍人能在戰場上長期存活，也會因為持續戰鬥而精疲力竭。眾所周知，新手飛行員往往被派去從事風險最高的轟炸任務，而美軍採取逐步補充地面作戰損失的做



法，也使「菜鳥」新兵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之中。儘管如此，年復一年相對輕微的損失，意謂著英美民眾不用像他們的盟邦與敵國一樣，必須面臨急迫的軍事人力需求。但反過來說，正因為英美徵召的兵員相對較少，才導致兩國必須面對兵員補充不足的窘境。

二戰的大規模消耗戰主要發生在東線戰場。如果德國在東線戰場並未出現災難性的損失，德軍兵力就不會如此捉襟見肘，民主國家在西線戰場的局勢就會更加危險。在東線戰場，蘇聯不可回復的損失達到一千一百四十萬人，包括六百九十萬人戰死、病死或意外死亡，四百五十萬人被俘或失蹤。另外還有兩千兩百萬名蘇聯軍人受傷、凍傷或生病。如果將傷者與病患加進蘇聯的傷亡人數中，那麼紅軍在開戰後的前十八個月就已經損失了一千一百八十萬人。至於在三個戰場作戰的德軍，不可回復的損失達到五百三十萬人，包括四百三十萬人戰死與失蹤，五十四萬八千人病死、傷重而死或自殺。蘇聯的損失率隨著戰事持續而下降，但依然居高不下；德國的損失則累進增加，一九四五年最後幾場會戰竟有一百二十萬人戰死。<sup>38</sup>蘇聯的傷亡人數中，只有三萬六千人不是對德戰爭造成的（主要出現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入侵滿洲）。最精確的估計顯示，德國不可回復的損失有百分之七十五出現在東線戰場。每年軍事死亡的統計數字見表4.2。

表4.2 德國與蘇聯軍事死亡的比較統計數字，1939-1945年<sup>39</sup>

	1939/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德國	102,000	357,000	572,000	812,000	1,802,000	1,540,000
蘇聯	-	802,000	1,743,000	1,945,000	1,596,000	732,000

這種規模的損失迫使德蘇徵召更年老或更年輕的人力，同時更迅速地將傷兵送回戰場。在德國，服役的士兵將近五成是一九一四以前出生，百分之七是一九二五年以後出生。<sup>40</sup>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頒布新法令之後，德國政府開始從軍隊的文職人員與後勤單位挑選「剩餘」人力，儘管原本的目標是一百萬人，最終卻只徵召到四十多萬人送往前線。<sup>41</sup>在蘇聯，年齡較大的人跟青少年或肢體殘障的人一樣，並不構成免役條件。傷兵往往尚未復原就被送回戰場，其中最極端的當屬傳奇人物羅柯索夫斯基元帥，他曾受傷四十六次，甚至躺在醫院病床上指揮史達林格勒圍城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紅軍進行反攻，但卻極度缺乏步兵，只得對德國占領區裡所有剩餘的男性進行徵召，只讓他們接受最基本的訓練，就讓他們穿上軍服上戰場。紅軍不得不無差別地徵召士兵，這種做法使士兵的能力與健康程度持續下降，然而此時蘇聯大量的武器生產掩蓋了這個弊病，並且讓蘇軍的資本與勞動比出現反轉，軍火對戰力的貢獻率開始大幅提升。這種發展是二戰期間絕大多數軍隊的常態，也就是愈來愈多高品質的武器可供新徵召的士兵使用。然而訓練與剩餘人力的不足，不可避免造成軍事勞動力的下降。從這點來看，戰爭打得愈久，集體動員反而會構成軍事表現的明顯限制。

但這畢竟是一場帝國戰爭。在交戰國也是帝國（無論是舊帝國還是新帝國）的狀況下，往往可以補足對國家人力的龐大需求。帝國可以動員控制地區的人口，這些人口絕大多數充當輔助或後勤部隊，然而隨著戰爭持續，這些人口也可能轉成作戰部隊。一九三七年，日軍開始徵召朝鮮與臺灣志願軍，一九四二年之後更開始實行徵兵。大約有二十萬名朝鮮人在日本陸軍服役，兩萬名朝鮮人在日本海軍服役。其中超過十萬名朝鮮人被編入日本陸軍的正規部隊之中，不過只有少數人能成為軍官。<sup>42</sup>義大利陸軍也僱用大量的東非殖民地軍隊（阿斯卡里）與利比亞

騎兵。德國在歐洲建立的新帝國成了廣大的徵兵來源。成千上萬的志願者加入德意志國防軍、武裝親衛隊（Waffen-SS）與安全部隊，對抗布爾什維克對歐洲的威脅，包括六萬名愛沙尼亞人、十萬名拉脫維亞人、三萬八千名比利時人、一萬四千名西班牙人、一萬兩千名挪威人與丹麥人，甚至還有一百三十五名瑞士人與三十九名瑞典人。<sup>43</sup>然而這些士兵卻不一定管用。一九四一年，法國極右派人士接受徵召組成法國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志願軍團，他們在一九四一年抵達俄國時剛好趕上進攻莫斯科的會戰，但他們的參戰證明是一場災難。在無能與腐敗的軍官領導下，他們就連最基本的裝備都極度欠缺，只受過短暫的基礎訓練，導致這個軍團在剛開始作戰沒幾天就遭受重創，再也沒能回到前線。<sup>44</sup>德國占領蘇聯的地區，也有超過二十五萬人加入德國的作戰部隊，這些人主要是從俄羅斯南部與烏克蘭的反共人士中徵召來的，此外也有多達一百萬名俄羅斯人在戰線後方以志願軍的身分為德軍工作，負責各式各樣的非作戰與安全任務。蘇聯將領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被荷蘭武裝親衛隊俘虜，他願意投降德國，還想組織一支俄羅斯解放軍與德軍並肩作戰，但弗拉索夫的部隊從未真正成為一支有用的軍隊。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終於匆促組成兩個師，並且在戰爭最後幾天參與了布拉格軍事行動，結果他的軍隊卻在布拉格調轉槍口攻擊德軍，阻止當地武裝親衛隊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繼續荼毒他們的斯拉夫同胞。<sup>45</sup>

在所有帝國中，英國無疑是最成功的帝國人力受益者。事實上，英國在二戰期間有許多戰事都是仰賴非英國人進行的，針對海外帝國的防衛更是如此，只是英國人至今在描述二戰歷史時總是輕易遺忘這一點。英國的四個自治領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南非總共動員了兩百六十萬名男女，印度則動員了兩百七十萬人。一九四五年，英國仍有四百六十萬名軍人，印度與自治領則有三百二十萬人。<sup>46</sup>在自治領當中，紐西蘭

的動員率最高，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男子有百分之六十七入伍當兵。加拿大則有超過一百萬名男性入伍當兵，相當於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男子的百分之四十一。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對德國發動的戰略空中攻勢，也有相當比例的兵力來自於自治領，其中又以加拿大人數量最多，加拿大還會派出自己的轟炸機中隊與英國空軍一起執行任務。自治領為英國戰死的人數有九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印度則有八萬七千人。戰時組成的最大一支志願軍來自印度次大陸。絕大多數印度志願軍在印度服役，負責維持國內安全與面對日軍的威脅，但也有大量印度師投入東南亞、中東與最後的義大利戰場。到了一九四三年，印度已有六個師派往海外，二十個師與十四個旅駐防國內。印度的動員起初存在裝備短缺的問題，但志願軍的兵員倒是不虞匱乏。英國當局比較希望先從所謂的「尚武種族」徵兵，這些種族主要分布於旁遮普邦（混居著穆斯林與錫克教徒）、西北邊境省與尼泊爾。在錫克教徒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符合徵召條件的男子自願加入印度陸軍。然而，隨著「尚武種族」的兵源逐漸枯竭，徵兵的範圍開始往南延伸，並在一九四二年達到巔峰，此時「尚武種族」只占印度軍隊的百分之四十六。印度陸軍有五分之四的兵員來自農村，因為英國不信任住在城市與教育程度較高的印度人，幾乎所有的印度士兵都是文盲。<sup>47</sup>

自治領與印度的貢獻有多大，可以從投入海外戰役的非英國人比例來衡量。一九四一年，北非的英國第八軍團只有四分之一是英國部隊。一九四五年，東南亞戰區司令部指揮的軍隊有五分之四是印度與非洲部隊。<sup>48</sup>殖民帝國的其餘部隊幾乎全由非洲師組成，非洲提供超過五十萬名志願兵與徵召入伍的士兵。國王東非步槍團是一九〇二年成立的部隊，最終總共提供了三十二萬三千人。一九〇〇年成立的皇家西非邊疆部隊也提供了二十四萬兩千六百人。南非總督領地貝專納（波札那）、



史瓦濟蘭與巴蘇托蘭（賴索托）則提供了三萬六千以上的兵力。到了戰爭結束時，大英帝國的非洲領地已經提供了總數達六十六萬三千名的黑人勞工與士兵給英國軍方。<sup>49</sup>這些人絕大多數並不負責作戰，但在軍隊服役的非洲師確實負起了防止帝國遭受威脅的任務——東非步槍團在衣索比亞、馬達加斯加與緬甸駐防；西非邊疆部隊先是在衣索比亞，之後駐防緬甸；貝專納人則駐防中東。加勒比殖民地估計有一萬兩千名志願兵，其中絕大多數屬於非作戰人員。加勒比團於一九四四年成立，駐紮於義大利，但直到戰爭結束都未曾參與任何戰鬥。<sup>50</sup>

英國的殖民地徵兵活動乍看之下完全仰賴民眾自願加入，而且這種做法也由來已久，但在急需殖民地兵員以組成輔助部隊的狀況下，原本講求自願的徵兵策略往往會變成一紙空文。在西非地區，英國人以當地酋長做為中間人，要求他們達成徵兵配額，這些酋長只好從自己的村落抓捕男丁充數。在法庭上遭到起訴的男子，為了避免坐牢，只好乖乖從軍。有時候，工人上了卡車以為要到某處工作，最後卻被送進當地軍營。史瓦濟蘭甚至進行強制徵兵。為了一場遠在天邊且目標不明的戰爭，居然要在殖民地進行徵兵，可想而知必然會引起反彈。黃金海岸（今日的迦納）的溫尼巴鎮（Winneba）就因為徵兵而引發暴亂，造成六名抗議者死亡。殖民地當局比較喜歡從偏遠村落徵召士兵，理由還是一樣，因為他們認為這裡居住的人是「尚武種族」。一名白人軍官表示：「他們的臉愈黑，愈能成為勇猛善戰的士兵。」殖民地當局偏愛與現代世界少有接觸的民族，結果造成超過九成的非洲新兵完全不認識字。<sup>51</sup>

黑人志願兵的數量不多，有些人早已在英國生活一段時間，希望能夠加入正規的英國武裝部隊。原本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之前，法院判決認定只有歐洲裔英國父母生下的英國臣民，才能在英國武裝部隊服役。一

九三九年秋天，黑人醫生穆迪（Harold Moody）領導在倫敦成立的有色人種聯盟推翻了這項判決。儘管如此，軍方還是持續抗拒黑人入伍，只有英國皇家空軍徵召六千名加勒比黑人擔任英國空軍基地的地勤人員，之後又允許大約三百名黑人志願擔任飛行員。<sup>52</sup>少數黑人新兵可以晉升到「應急軍官」，不過在服役過程中仍須承受來自各方的種族歧視，儘管這類歧視尚不到普遍存在的地步（一名黑人軍官日後回憶說：「軍中從來沒有人叫我黑佬。」）。戰爭結束後，英國政府想把英國所有黑人志願兵全部遣返，然而此舉再度引發民眾抗爭，最後英國政府同意讓少數挺身保衛祖國的黑人繼續留在英國。

在美國，對於以白人為主的武裝部隊來說，種族是個相當棘手的難題。美國在一戰時曾經徵召黑人新兵，但主要是充當軍事勞工與輔助部隊。戰間期，作戰部隊清一色由白人組成。一九四一年之後，美國軍隊的快速擴充很快就引發問題，那就是占美國人口一成的黑人是否可以加入作戰部隊。羅斯福堅持海軍與陸軍必須接受黑人入伍，不過政府跟軍方最後達成的共識是，入伍的黑人數量不能超過黑人的實際人口比例，且陸海軍有權進行種族隔離，無論是訓練中心、營區還是未來分配的軍事單位都必須進行隔離。<sup>53</sup>這項政策立下令人遺憾的惡例。北方各州早已廢除種族隔離，但來自北方各州的黑人入伍之後卻被迫接受種族歧視。荒誕的是，陸軍當局居然認為南方白人更適合擔任黑人部隊軍官，因為他們「更熟悉」黑人社群。這項政策也引起平日從未接受隔離的黑人新兵不滿，甚至引發激烈抗爭。<sup>54</sup>衝突還延燒到駐紮海外的部隊，因為海外部隊的白人士兵與軍官仍想維持種族隔離。一九四四年七月，英國港口布里斯托爆發美國黑人與白人士兵的嚴重衝突，造成一名黑人士兵死亡，數十人受傷。

黑人入伍計畫帶來的結果好壞參半。與英國殖民地新兵一樣，絕大

多數美國黑人並未進入作戰單位服役。六十九萬六千名被徵召入伍的黑人，絕大多數執行的都是後勤與勞動任務。然而無論後勤還是勞動，黑人占的比例遠遠未達到羅斯福同意的百分之十。<sup>55</sup>陸軍宣稱被徵召入伍的黑人在普通分類測驗的表現普遍不佳（一九四三年時大約有半數黑人未能通過），因此黑人多半只能從事低階職務。陸軍軍官團只有百分之一點九是黑人，這個比例甚至低於美國海軍，須知當時美國海軍徵召入伍的黑人只占了海軍人員的百分之六。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國海軍勉強同意讓黑人到海軍服役，條件是黑人不許搭乘艦艇出海，只能在港口與岸上設施工作。到了一九四三年春，百分之七十一的黑人士兵被分配到膳食單位，負責服務白人軍官。<sup>56</sup>美國陸軍航空軍的作戰單位幾乎看不到黑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底，陸軍航空軍有十三萬八千名黑人，卻只有百分之一有資格成為空勤人員。<sup>57</sup>可以成為飛行員的黑人新兵必須到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Tuskegee）與白人區隔的黑人基地受訓，但這些飛行員除非被選進四個戰鬥機中隊裡，也就是所謂的「塔斯基吉飛行員」，否則無法參加作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黑人飛行員被派往義大利，他們在那裡持續受到白人長官的監督，白人對黑人的偏見使他們始終對黑人飛行員吹毛求疵。一九四五年，當黑人飛行員在波士頓凱旋上岸時，黑人與白人飛行員走的居然是不同舷梯，哪怕這些人就在幾個星期之前還曾一起並肩作戰。「塔斯基吉飛行員」的遭遇充分顯示白人的偏見使美國黑人無法一展所長。<sup>58</sup>相較之下，美國陸軍對於開戰之初被總統下令監禁在集中營裡的日裔美國人態度則有所不同，他們讓日裔美國人以自願從軍的方式證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大約有兩萬兩千五百名男性與女性日裔美國人自願從軍，一萬八千人組成了與白人區隔的軍事單位並且被派往歐洲作戰，其中包括第四四二步兵團，這個步兵團成為美國陸軍獲得最多勳章的部隊。<sup>59</sup>

龐大的人力需求促使軍方開始徵召女性入伍，但各種既存的偏見並未因此消失。這種事當然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一戰後期也曾因急需人力而徵召女性入伍，等到戰爭一結束，女性入伍也隨之終止。然而總體戰並沒有性別之分，總體戰意謂著戰爭民主化，無論擔任工人或民防，或者進入軍隊服役，女性都不能置身事外。徵召女性從事戰時工作或防空任務原本就不存在任何問題，因為有許多女性都認為，在現代戰爭中，所有責任應該由全體社群共同分攤。女性也進行遊說，希望能入伍當兵，這同樣反映出二戰是「人民戰爭」的觀點，而非只是由男人發動的戰爭。男性對於徵召女性入伍存在著矛盾的看法。除了蘇聯之外，其他主要參戰國都未開放女性入伍當兵。女性在軍事組織中取代男性從事的職務，絕大多數是女性在生活中也會從事的工作，例如速記員、辦事員、郵差、廚師、話務員、圖書館員、營養師、護士。<sup>60</sup>女性能夠擔任最接近軍事行動的職務，則是雷達測定員、無線電操作員、運輸工具駕駛員或情報單位的一般人員，但除了蘇聯之外，女性在軍中從事的職務往往遠離前線。

等到轟炸機對後方進行轟炸，使後方也成了前線，女性這才直接參與戰爭。英國、德國與蘇聯的女性可以加入防空部隊，不過只有蘇聯女性能在男性不在場的狀況下親自上場開火。英國在一九四一年四月更改軍事規定，允許本土輔助部隊的女性到防空據點服役；到了一九四三年，女性在防空單位工作的人數達到高峰，總計有五萬七千人，她們擔任雷達操作員、觀測員、高度測量員與探照燈人員。儘管防空單位的男性軍人反對女性加入，但兩性一起工作已逐漸成為常態。男性往往擔任搬運與開火這類負擔較重的工作。根據一九三八年頒布的皇家令狀，女性不許攜帶武器，在防空崗哨負責站崗的女性只能攜帶斧柄與哨子。女性的戰爭參與被刻意地「女性化」——女性只能領取男性三分之二的



薪水，可以享有較多休息時間，可以住在比男性更舒適的住所，甚至還有所謂的「女性飲食」，例如較少的肉、麵包、培根及較多的牛奶、蛋、水果與蔬菜。結果這類飲食很快就因為女性無法填飽肚子而被放棄。<sup>61</sup>德國的女性空軍輔助部隊負責操作德國防空體系「卡姆胡伯防線」（Kammhuber Line）上的探照燈、無線電設備與電話網路，擔負起防守德國北方門戶的重任。到了一九四四年，德國空軍已經有超過十三萬名女性，而部分女性最後也必須協助發射防空砲。一九四五年三月，德國最高統帥部終於同意讓這些女性輔助人員使用手槍與反戰車武器「鐵拳」。<sup>62</sup>

一項流傳至今的迷思認為，德國女性沒有參與戰鬥是因為納粹意識形態主張女性的職分就是擔任母親與家庭主婦。事實上，這個意識形態並非毫無通融的空間。在納粹看來，女性，尤其是年輕或單身女性，應該與男性一樣負起延續種族的責任。德國武裝部隊徵召了大約五十萬名女性擔任國防軍婦女輔助人員（Wehrmachthelferinnen），負責在通信、文書、行政與福利單位補充男性員額的不足，此外還有無數人擔任非軍職的祕書與辦公室工作。<sup>63</sup>英國與美國的武裝部隊，也與德國徵召了差不多人數的女性入伍。二戰爆發後，英國陸海空三軍重新恢復一戰時曾經成立的女性部隊。英國皇家海軍婦女預備隊、本土輔助部隊（陸軍）與空軍婦女輔助部隊，總計從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四萬九千人，迅速擴充為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四十四萬七千人。儘管英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頒布了《國家兵役法》（National Service Act）對女性進行徵兵，但實際入伍當兵的女性有四分之三屬於自願入伍，而且超過一半不到二十二歲。<sup>64</sup>自治領也徵召女性當兵。一九四一年，加拿大設立志願役處，負責僱用女性志願兵。英國女兵依然被歸類為輔助部隊，但加拿大女兵則屬於完全的軍事人員，一九四二年，加拿大出現第一批女軍官。<sup>65</sup>但

在加拿大軍中，男性依然享有較高地位，這點與西方各國一致。女性除了不能直接參與戰鬥，女性軍官也不能對作戰人員下達命令。

美國反對女性當兵的偏見更為強烈，但由於急需勞動力，軍方因此不得不做出讓步。大約有四十萬名女性在武裝部隊各單位服役，其中有六萬三千人在陸軍婦女輔助兵團，該兵團於一九四三年後改稱陸軍婦女兵團。婦女兵團的出現源自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共和黨眾議員愛迪絲·羅傑斯（Edith Rogers）在國會推動的立法。這項立法曾在國會引發冗長的辯論，反對女性入伍的男性議員擔心，女性從軍可能導致武裝部隊的道德敗壞。<sup>66</sup>陸軍與空軍堅持，女性應該屬於「輔助」軍隊的單位而非軍隊「本身」，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國會通過了《第二羅傑斯法案》（Second Rogers Bill），女性完全進入軍隊已經勢在必行。<sup>67</sup>這項變革導致徵兵制度的簡化，志願者也源源不斷地湧入。然而，陸軍航空軍仍不允許空軍輔助兵團的女性進入美國空中預警與防空體系。<sup>68</sup>美國海軍在戰爭剛爆發的時候也不願意接受女性，但在缺乏男性組成輔助部隊的狀況下，海軍最終同意成立婦女單位，而且特別為這個單位取了一個冗長的名稱：女性緊急志願役（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簡稱WAVES，剛好與海軍呼應。這個新單位於一九四二年八月成立，但與陸軍不同的是，海軍認為這些入伍的女性應該完全成為海軍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海軍的輔助部隊），只不過該單位的女兵只能交由女性軍官團指揮。<sup>69</sup>到了戰爭結束時，大約有八萬名女性緊急志願役從海軍訓練學校畢業。至於女性黑人志願役，她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幾乎無法進入美國軍隊服役，少數進入美軍服役的也只能駐紮在美國本土，例如陸軍婦女兵團的黑人部隊第六八八八中央郵政營。這個營由一名女性黑人軍官帶領（女性黑人軍官總共也只有兩名），一直到戰爭快結束時才被派到英國處理堆積如山的未寄出郵件。<sup>70</sup>然而，

這些女性士兵負責的事務難道就不能與男性共同分攤處理？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女性被分配到的往往是救濟與照護的工作，但女性也渴望爭取其他的工作。如果民主國家認為戰爭是全民共同承擔的責任，那麼更應該允許女性承擔作戰任務，以此來促進國內團結，並且證明所有民眾，不分男女，都必須共同分攤責任。

將國內剛出廠的飛機飛到空軍基地，或者是將飛機從某個訓練中心飛到另一個訓練中心，或者是駕駛飛機進行目標訓練，這些都是女性志願役在民主國家執行的任務中最危險的幾項。一九四〇年一月，航空運輸輔助隊在英國成立，同時招募合格的男女人力加入。總共有一百六十六名女性擔任輔助飛行員，其中十五人喪生，包括英國最著名的女飛行員艾米（Amy Johnson）。<sup>71</sup> 另一名著名的女飛行員是美國人賈桂琳（Jacqueline Cochran），她自願加入英國航空運輸輔助隊，之後返回美國。儘管一開始遭到陸軍航空軍總司令阿諾德的反對，但賈桂琳還是於一九四二年九月成立女子飛行訓練分遣隊。一九四三年，在賈桂琳導下，分遣隊與婦女輔助運輸中隊合併成女性空軍飛行員部隊。在美國，女性飛行員的培訓規模遠比其他國家來得龐大，總共有兩萬五千名志願者參加訓練，不過最後只選拔出一千零七十四名合格的女性飛行員，其中有三十九名意外身亡。與英國女性飛行員一樣，美國女性飛行員無法取得完整的軍人身分，加上男性一向認為飛行員是男性專屬職業，在這種偏見下，女性要成為飛行員十分困難。在某些營區，女性只能駕駛老舊或性能不佳的飛機進行目標訓練，或甚至連基地都進不去。沒有黑人女性能夠加入女性空軍飛行員部隊，哪怕她們自願也不行。一九四四年底，女性飛行員訓練計畫遭到終止，因為受過訓練的男性飛行員已經過剩，強大的遊說團體反對女性接受飛行訓練，認為這會對男性飛行員的就業構成威脅。到了戰爭結束時，女性飛行員已經完成一萬兩千六百五

十二次運送任務，駕駛過七十八種不同機型，包括B—29超級堡壘這種連男性飛行員也不太敢駕駛的巨型轟炸機，因為這種飛機早期存在著許多技術問題。一九七七年，在經過長期爭取承認之後，美國國會終於通過立法，認定這群女性飛行員是二戰的退伍軍人。<sup>72</sup>

蘇聯對於女性入伍並不存在任何顧忌。對德作戰第一年，蘇聯損失大量的男性人力，徵召女性當兵就成了不得不的做法。二戰期間，大約有八十五萬名女性服役於蘇聯武裝部隊，其中五十五萬人在紅軍與空軍正規部隊，三十萬人在防空與後方部隊，估計另外有兩萬五千名女性士兵與游擊隊並肩作戰。<sup>73</sup>儘管戰前持續宣傳整個社會都應該起身捍衛革命，但當戰爭爆發且各地徵兵站真的擠滿了自願入伍的年輕女性時，還是讓蘇聯政權感到不知所措。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年輕女性大約有四百萬人自願入伍組成「人民軍」（opolchenie），這個民兵組織奮勇抵抗入侵的德軍，卻遭到擊潰。<sup>74</sup>雖然蘇聯男性有義務參加全國軍事訓練計畫，但女性如果能說服地方官員讓她們參加，那麼這項計畫也沒有理由排除女性。一九四一年十月，蘇聯官方首次徵召女性入伍，史達林允許三個航空作戰團動員女性加入。戰時女性參與空軍的人數大幅增加，針對德國基地的夜間轟炸任務絕大多數都由女性部隊執行，其中著名的第四十六親衛夜間轟炸機航空團執行了兩萬四千次任務，贏得了二十三枚蘇聯英雄勳章。<sup>75</sup>同樣知名的還有一九四三年五月設立的中央女子狙擊手訓練學校，這是基於前一年女性狙擊手創造了豐碩戰果而獲准設立；總共有一千八百八十五名狙擊手從這所學校畢業並且前往前線作戰，但殺死的德軍士兵數量並沒有詳細紀錄。<sup>76</sup>

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蘇聯政府終於正式承認需要徵召女性來補充前方男性的損失。與西方不同的是，西方徵召女兵之後，往往安排她們從事女性專屬的工作，但蘇聯徵召女兵從事專屬工作的比例卻非常低。



空軍動員的四萬名女兵中，只有一萬五千人擔任辦事員、圖書館員、廚師或倉儲人員，其他兩萬五千人則受訓派往前線擔任駕駛員、裝甲兵與通信兵。加入武裝部隊的五十二萬名女性中，將近十二萬人參與了地面與空中作戰，超過十一萬人在前線擔任非作戰的軍事專門人員。<sup>77</sup>女性面臨的環境與男性一樣艱困，但她們還要遭受男性毋需承受的剝奪感，除了女性軍服供應不足，女性衛生與醫療用品也同樣短缺。與西方部隊不同，蘇聯部隊不存在女性不能在前線指揮男性作戰的性別偏見，但這並不表示性別偏見完全不存在。「他們把女人硬塞到我的部隊裡，」一名師長如此抱怨，「這群伴舞團！這是戰爭，不是跳舞，這是可怕的戰爭！」<sup>78</sup>儘管如此，在戰爭期間，整個前線依然可見女性的蹤影。雖然蘇聯女性的參戰經驗是意識形態與人力短缺下必然的產物，但總體戰的極端需求確實符合蘇聯的觀點：為了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存活下來，必須對社會進行絕對動員。

交戰國的新兵被徵召入伍時，往往很少質疑動員的必要性。當國家在進行總體戰，戰鬥人員也把大規模的軍事動員視為理所當然。二戰時的軍隊譁變非常少見，逃兵或叛逃較為普遍，但也只占動員總數的一小部分。不服從命令的情況時有所聞，但軍隊生活與紀律上的違法亂紀，主要反映的是入伍者本身的社會網絡，而不應該解釋成對集體動員的不滿。就算出現類似譁變的例子，通常也是特定狀況下引發的抗爭，而非反對戰時徵召入伍。舉例來說，印度陸軍曾經數度發生短暫譁變，有些是反對被派往海外，有些是為了抗議英國堅持錫克士兵必須理髮、去掉纏頭巾與戴上鋼盔。對錫克教徒來說，纏頭巾與長髮是絕對不能妥協的傳統，因此印度與香港的錫克士兵才會發起抗爭，反對英國的政策。香港有八十三名錫克人被軍事法庭宣判犯下譁變的罪名，其中十一人被處以重刑。<sup>79</sup>在美國，武裝部隊的種族隔離政策引發黑人士兵與黑人飛行

員的強烈不滿，導致他們群起反抗。早在美國參戰之前，美軍就曾爆發嚴重的譁變事件。一九四一年，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附近發生白人軍事警察與黑人士兵的激烈槍戰，導致兩人死亡與五人受傷。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三年，至少十個不同營區發生暴動與槍戰。第三六四步兵團的北方黑人被迫接受他們從未遭受過的種族隔離規定，在心生怨恨之下，於密西西比州的范多恩營爆發重大衝突。譁變平息之後，第三六四步兵團被派往太平洋最北邊的阿留申群島以示懲罰，在整個戰爭期間都駐紮在當地。<sup>80</sup>

美國也曾爆發最嚴重的民眾反徵兵抗爭。一九四〇年秋天的《兵役登記法案》（Selective Service Bill）與一年後的兵役延長，在全美各地引發孤立主義者與反戰團體示威，他們認為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徵兵。一九四一年夏天的民調顯示，將近半數的受訪者反對兵役延長。記者到各個新兵營調查後發現，年輕士兵普遍感到幻滅與憤恨，他們在營中無事可做，除了作戰訓練不足，也幾乎碰不到武器。根據估計，有半數新兵一有機會就會逃兵；九成受訪者對於政府強迫他們入伍感到氣憤。就在《兵役登記法案》即將延長前夕，各個新兵營爆發嚴重暴動，顯示新兵對於兵役不滿的程度。《兵役登記法案》在眾議院僅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sup>81</sup>這一事件堪稱是當時任何國家在處理徵兵議題時所面臨的最嚴重政治危機。逃避兵役的現象顯然存在，但這主要是個人選擇，而非集體決定的結果。美國人最終還是接受了集體徵兵這件事。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戰爭爆發後，集體徵兵也美國成為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

## 經濟動員

所有交戰國最關切的，就是國家是否有能力供應足夠的武器、裝備與補給來維持國家徵召的龐大作戰部隊。若想維持足夠的供應能力，還會產生另外兩項根本問題：如何籌措戰爭資金，以及如何提供充分的糧食與補給給絕大多數的平民，好讓他們能夠支撐起全國動員。作戰部隊的消耗量十分驚人。戰時各個大國生產的武器數量必須足以供應動員的龐大人力使用。軍事裝備的研發、生產與分配，這部分將留待第六章討論，但戰時的生產與大規模軍事徵兵對於身為納稅人、儲戶、消費者與工人等大後方民眾確實有著非常直接的影響。後方必須出錢支持戰爭，在戰時命令下長時間工作，還要眼看著國家生產的絕大多數糧食與物品送進軍隊的食堂與倉庫。全國總動員意謂著工作變得更辛苦，報酬變得更少，而且沒有人會為此發起抗爭。

軍備其實只是軍事消耗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一般而言，武器的取得只占軍事預算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武裝部隊數量龐大到足以自成一個經濟體。軍隊不僅進口武器，也進口糧食、各種消費品、紡織品、化學品、石油產品、用來運輸或維修的專門設備，另外德國與蘇聯軍隊還需要大量牲口。數百萬名作戰與後勤人員必須要有地方住，還需要興建軍事基地、機場與補給站。即使平民的糧食短缺，也必須確保軍隊的糧食供應無虞。英國士兵每天要攝取四千五百卡的熱量，遠超過英國平民每日的配給額（也高於印度與殖民地部隊每日的糧食供給）。<sup>82</sup>戰爭初期，德國士兵配給的肉類是平民的三倍（到了後期達到四倍），麵包則是兩倍以上。咖啡、巧克力、香菸與菸草、果醬與蔬菜也優先配給到軍隊，德國平民能取得的量愈來愈少，到最後甚至完全短缺。<sup>83</sup>除了糧食之外，軍事經濟也吸收了大部分的消費品。一九四一年，德國服裝業生產量有一半是軍服；生產的家具有八成進了軍隊，牙膏與鞋油等化學消費品也有八成供軍隊使用；軍隊還消耗了六成的油漆刷、木箱與木桶，

以及百分之四十四的皮革製品等等。一九四一年，估計德國民間生產的物品有半數提供給軍事單位。甜食的供應對武裝部隊尤為重要，因此甜食產業往往能優先分配到勞工以進行生產。<sup>84</sup>

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之前，這群龐大的軍事消費者已經從根本上扭曲了交戰國的經濟。一九三〇年代重整軍備的風潮早已造成明顯的影響，當時國民生產投入在軍事支出的比例陡升到和平時期史無前例的高點：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軍事支出達到國民生產的百分之十七，蘇聯則是百分之十三。一戰前夕，德國的軍事支出僅占國民生產的百分之三，沙俄則是百分之五，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的武器沒有二戰時期複雜與昂貴。<sup>85</sup>一九三九年五月，德國工業勞動力在政府指示下有將近三分之一為武裝部隊工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德國工業投資有三分之二投入於軍事與以戰爭為核心的計畫。蘇聯於一九三八年推動的第三次五年計畫，撥款兩百一十九億盧布進行國防投資，相較之下，一九三六年的國防支出則僅有十六億盧布。<sup>86</sup>即使在和平時期，這種規模的支出計畫也會嚴重限制民間消費者的可用物品，以及經濟上非戰爭產業的可用資源。隨著亞洲與歐洲爆發戰爭，各國政府都不得不面對總體戰與全民動員的經濟現實。

從一戰經驗可以得知，在軍事需求、財政穩定與人民生活水準之間維持平衡極其重要。戰爭初期，經濟動員總是倉促進行，往往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與財政危機，而且難以及在軍事與民間需求之間合理分配資源。糧食短缺經常引發工人抗爭與社會不滿。一九一七年俄國無力支持戰事與一九一八年同盟國戰敗，主要原因都在於國內發生經濟與社會危機。人們因此認為，想要讓總體戰成功，唯一的辦法是必須避免社會與財政危機再度發生。而要避免這些危機，關鍵在於瞭解戰爭投入對國家經濟結構的影響，使軍隊在獲得足夠資源的同時，又不至於影響整套財



政體制或消費者需求。因此，動員的專業知識就顯得格外重要。傑出的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寫下極具開創性的作品《如何籌措戰費》（*How to Pay for the War*），書中談到如何實現消費、儲蓄與賦稅之間的平衡而又能避免通貨膨脹，他也因此於一九四〇年夏天被英國財政部禮聘為特別顧問。<sup>87</sup>德國經濟部長馮克於一九三九年秋天成立教授委員會，負責解決籌措戰費與控制消費的問題；德國經濟學家則建立臨時的國民所得統計來說明如何平衡賦稅、儲蓄與消費以滿足軍事需要。<sup>88</sup>日本於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國民儲蓄獎勵委員會，該會成員由社會與經濟專家出任，負責激勵儲蓄、限制消費與避免通貨膨脹。<sup>89</sup>各國經濟學家都把「總體戰」當成一個明確的經濟問題。獨裁國家與民主國家在面對總體戰的問題時，解決的方式幾乎沒什麼差異，兩者不約而同採取了某種形式的戰時「計畫經濟」。

各交戰國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支持大規模總體戰，又要同時避免失控的通貨膨脹。大規模動員不可避免將產生鉅額的財政赤字，儘管這些赤字可以透過徵稅加以降低，或者是將其經濟效果延緩到戰後，但整體而言仍對經濟造成沉重的負擔。在美國，政府為了籌措戰費而發行的長期與中期國債，使國債水準創下新高；在英國，戰時支出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二由各種國債支應。一九三九年時，英國政府預算赤字僅是溫和的四億九千萬英鎊，到了一九四三年已急遽增加到二十八億英鎊，國債金額達到原先三倍。德國國債在戰時增加了十倍，從三百億馬克增加到三千八百七十億馬克，約占戰時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五。日本在一九四五年的赤字大致與德國相同。只有中國政府採取一戰時期各國的做法，完全仰賴印鈔：一九四五年，中國政府的赤字達到百分之八十七。<sup>90</sup>這些資金一般是向現有銀行與信貸機構籌措，這些機構別無選擇，只能買下政府發行的公債。蘇聯經濟是其中的例外，蘇聯的中央計

畫與物價管制政策致力平衡收支，透過共產黨獨創的會計系統使現有的稅收與關稅收入得以支應戰時支出。蘇聯國債只有一千億盧布，蘇聯政府的戰時收入則有一兆一千一百七十億盧布，國債只占收入的百分之八點九。<sup>91</sup>

有些經濟體在戰時會採取延後支付的做法，直接從占領地或帝國殖民地進口物品，但在戰爭期間不支付價金。柏林當局從占領國進口重要戰爭物資，卻從未支付總價超過一百九十億馬克的金額，德國表示要等到打贏戰爭之後才付款；此外德國也以借款名義從歐洲占領地區取得兩百五十四億馬克，用來購買其他物品。<sup>92</sup>英國向英鎊區進口價值三十四億英鎊的物品，卻決定在戰爭結束之前暫時不交付貨款——這種做法在實務上已經構成經濟脅迫。<sup>93</sup>德國與英國都仰賴帝國占領區提供可觀資金：德國有七百一十億馬克的戰時支出來自於占領區，英國則要求印度提供戰爭資金，逼迫印度政府承受其經濟規模難以負擔的赤字，再向印度人民課徵重稅。<sup>94</sup>德國政權也向遭到迫害的猶太人榨取金錢與物品，例如從猶太人身上洗劫的黃金，或者是在滅絕營取得的金牙，都被存放在瑞士銀行裡，用來購買重要的進口物品。在德國，估計猶太人的財產價值可以達到七十到八十億馬克，從股票、貴金屬到珠寶，全被國家根據限制猶太人所有權的法律與強迫猶太人「雅利安化」的計畫為由沒收充公。在被征服的地區，猶太人擁有的一切都可以任意攫取，猶太人的財產收益全被國家奪走。貴重物品全存放在位於柏林的帝國財政部戰利品處，用來充實國家資金。<sup>95</sup>

高赤字支出很可能造成凱因斯所說的「通膨缺口」，也就是經濟體內貨幣流通的數量與一般民眾可以購買的商品數量出現落差。這種缺口曾在一戰引起嚴重通膨，因此必須想辦法彌補缺口。所有交戰國都瞭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除了中國之外，所有交戰國都採取了非常類似的

解決方法：加稅、鼓勵或堅持高儲蓄率、控制薪資與物價、限制民眾取得軍隊剩餘的消費品。但在中國，加稅是個窒礙難行的選項，因為中國最具生產力的區域遭到日本占領，使中國關稅收入減少百分之八十五，鹽稅減少百分之六十五，而這兩種稅收偏偏是中國政府傳統的收入來源。戰時危機使政府舉債困難，減少支出又會使國家蒙受戰敗的風險。儘管中國政府嘗試對所得、土地與製造業開徵新稅，但最終只能訴諸印鈔；而增加貨幣流通量的結果，便是惡性的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在一九三七年發行了十四億法幣，到了一九四五年增加到四千六百二十三億。<sup>96</sup>在其他國家，由於民眾比較願意配合政府需求，因此籌措戰費與減少消費者購買力是較為有效的做法。儘管如此，加稅、舉債與增加儲蓄畢竟是迫使民眾以個人方式直接資助戰爭，等於是讓民眾為國家做出經濟犧牲。對於長久陷於分裂與遭受戰火蹂躪的中國來說，這些選項顯然不可行。

以徵稅來解決戰時支出的問題，是各國在一戰期間逐漸發展而成，但效果不一。二戰期間，政府大幅提高稅率，使這個時期的稅收通常約占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美國，戰爭投入使民眾所得快速地全面提升，政府收入有百分之四十九來自租稅，最主要又來自於首次開徵的所得稅。一九三九年仍有百分之九十三的美國人不用繳納聯邦所得稅，而儘管在戰時針對首次納稅人建立一套複雜的財政結構極其困難，但到了一九四四年，已經有三分之二有收入的人必須繳稅。為了要讓戰時犧牲能真正符合民主精神，羅斯福堅持課徵超額利潤稅，這項稅收成為僅次於所得稅的政府收入來源。<sup>97</sup>日本也開始對受僱人口課徵所得稅，日本個人所得稅率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六提高到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十五，但仍無法填補快速增加的政府支出。與其他戰時經濟體不同，日本的租稅收入只占日本戰時支出的四分之一。<sup>98</sup>

英國與德國有較悠久的所得稅傳統，兩國在戰時都大幅提高租稅門檻與間接稅稅率。由於認為戰時犧牲必須由全民平均分攤，因此兩國政府都對收入最高的階層課以高稅率。在英國，一九三九年稅後年所得超過四千英鎊的還有一萬九千人，但三年後只剩下一千兩百五十人。所得稅總稅收也增加為原來的三倍，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四億六千萬英鎊，增加到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十三億英鎊。<sup>99</sup>德國於一九三九年針對個人所得徵收緊急附加稅，也對產業徵收超額利潤稅，使德國的直接稅稅收從一九三八年的八十一億馬克增加為一九四三年的兩百二十億馬克。德國同樣針對經濟狀況較佳的階層設定所得稅門檻。年所得一千五百到三千馬克（絕大多數半技術與技術勞工的薪資落在這個位階）的稅率提高了五分之一，而年所得三千到五千馬克的稅率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在戰爭初期，德國支出有半數來自於稅收，這點與該國在一戰時無法適當徵稅有很大的差異。儘管如此，德國政府依舊擔心民眾會因為稅率太高而進行抗爭。<sup>100</sup>

儲蓄議題也深受一戰經驗影響。一戰時，在愛國心驅使下，許多民眾認購戰爭債券，但債券價值卻因為通貨膨脹而大幅滑落，德國的戰爭債券更因為戰後貨幣崩跌而變成廢紙。英國與德國都不願重蹈一戰覆轍，不再大張旗鼓地推動資金籌募計畫。英國雖然發行了「國防債券」與「國民儲蓄憑證」讓民眾自由購買，但個人儲蓄的增加絕大多數集中在郵局、儲蓄銀行或互助會帳戶的小額存款，政府其實毋需對民眾進行說服或強制就可以動用這筆資金。<sup>101</sup>德國也採取了相同做法，德國財政部長稱之為「無聲的財政」。政府大力宣傳鼓勵民眾儲蓄，加上商店也沒有多少商品可以買，小額投資人於是將資金存入儲蓄銀行或郵局存款帳戶，存款金額從一九三九年的二十六億馬克增加為一九四一年的一百四十五億馬克。郵局存款開戶人數也從一百五十萬人增加到八百三十



萬人。<sup>102</sup>這些存款被政府用來支付戰費，存戶因此在無意間資助了戰爭。一戰經驗使德國民眾對於戰爭借款充滿了不信任，因此當一九四一年底德國政府推出讓民眾自願加入的「鐵儲金」（Iron Savings）時，民眾顯得興趣缺缺。鐵儲金是每個月直接從薪水扣款，這筆款項將進入專門的存款帳戶，並且會設定為特別凍結帳戶，直到戰爭結束後才能使用。鐵儲金的成長因此十分緩慢，反觀其他形式的個人儲金則在戰時增加為原來的四倍。<sup>103</sup>英國與德國的存戶都希望將增加的薪資儲蓄起來，為戰後困難的經濟狀況預做準備。從英德兩國的儲蓄潮可以看出，一般民眾不會為了國家而在財務上冒險，他們與資本家一樣，也想利用戰爭賺一筆。

日本與蘇聯比較少受到一戰經驗的影響，這兩個國家更傾向於用愛國主義號召民眾購買政府債券或增加個人儲蓄以投入戰爭。然而，無論是日本還是蘇聯，儲蓄在這兩國幾乎都不能算是個人的自主行為。日本與蘇聯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就致力鼓吹民眾購買債券以支持國家的現代化，兩國社會因此形成一種節儉的風氣。蘇聯以農場與工廠為中心，將購買債券組織成一種集體行動，如果有人公然反對，就有可能成為公敵與遭受批鬥。蘇聯在各地設有促進國家信貸與儲蓄委員會，負責監督民眾進行儲蓄。委員會鼓勵工人組成小組，每個小組都分配了一個固定的儲蓄額度，小組工人或農民必須平均分攤達成這個額度。由於擔心不服從可能帶來的後果，因此債券經常出現超額認購的狀況。政府還推出新形式的「樂透」債券，中獎的人可以獲得皮草大衣、珠寶、手錶或餐具，不過當時民眾急需的其實是更基本的消費品，而且曾有中獎的人抱怨這些獎品從未送到他們手中。<sup>104</sup>

在日本，除了進行公共宣傳鼓勵儲蓄與購買債券，還施行了一套社會策略，利用團體儲蓄的方式將反對的聲音降到最低。在政府施壓下，

日本各地開始成立儲蓄協會。與蘇聯一樣，每個協會都分配一定的儲蓄額度，協會每個成員必須共同分攤這筆額度。到了一九四四年，這樣的協會總計有六萬五千五百個，會員達到五千九百萬人。同年，日本民眾的可支配所得有百分之三十九點五用來儲蓄，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除了一九四一年之外，日本每年的儲蓄額都是超標。<sup>105</sup>每個工人的儲蓄額都是根據需求加以制定，然後如同繳稅一樣預先從薪資扣除。<sup>106</sup>除了個人儲蓄，國債也成了每個鄰里的目標，同樣也定出配額。鄰居聚在一起開會決定彼此分攤多少，因此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家裡要分攤多少債券。不服從大家的決定意謂著將遭受公開羞辱，還有可能遭到更嚴重的差別待遇，包括不能領取配給品。<sup>107</sup>儲蓄被視為最重要的愛國職責，但一九四四年由國家進行的意向調查卻發現，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儲蓄是因為目前用不到這筆錢；百分之三十八的受訪者則表示，這筆錢是要留給自己的子女。<sup>108</sup>

美國籌措戰費的一項重要手段，就是宣傳購買債券。雖然美國在推動民眾購買債券上不像日本與蘇聯那樣具有強制性，但施壓要求認購的狀況卻普遍且持續，導致國債最後的認購金額達到四百億美金，大大紓解了籌措戰費的壓力。與日本一樣，美國有些債券的認購是採取直接從薪資扣除的方式，不過大約一半的債券銷售是間接的。還有一些債券採取小額購買的方式，通常少於一百美元，到了戰爭結束時，小額購買的債券也銷售了九億九千七百萬美元。美國在推銷國債時把國債當成是一種商業計畫。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就曾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利用債券來販售戰爭，而非利用戰爭來販售債券」。<sup>109</sup>美國政府運用現代廣告技術，僱用電影明星來推銷債券，例如由克羅斯比（Bing Crosby）高唱《買張債券吧》；此外還有六百萬名志工挨家挨戶拜訪家庭、工廠與俱樂部。與日本的鄰里組織一樣，美國認購債券有

很多情況是出於半自願。同樣地，民意調查顯示民眾購買債券主要不是基於愛國心，有多達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購買債券只是為了協助國家購買武器供派往海外作戰的丈夫與兒子使用。戰爭期間，總計八次的國債認購活動為後方民眾與前線將士建立起直接的聯繫。<sup>110</sup>

另一種填補通膨缺口的方式，便是進行一連串的管制措施，如控制物價、薪資與消費品的生產，其中管制消費品的生產尤其必要，因為戰時商品嚴重缺乏，經常使得消費者買不到商品。控制物價與薪資息息相關，一戰時期由於未進行管制而導致物價失控，導致薪資價值急遽下跌，最後引發工人抗爭。在二戰爆發之前，德國為了負擔高昂的戰前軍事支出，已經有數年的時間對物價與薪資進行控制。德國在一九三六年任命的物價委員擁有廣泛的權力，負責維持民間各項支出的物價穩定，德國因此得以在戰時維持生活成本指數上升不到百分之十。至於平均週薪在長工時推升下，提升的幅度也僅略高於百分之十。<sup>111</sup>雖然商品品質下降，長時間工作也造成勞動力損害，但與一戰嚴重的通貨膨脹相比，德國在二戰時確實成功避免了通膨，德國的制度因此成為物價穩定的典範。與德國一樣，日本在參與二戰之前，已經因為對華戰爭而對物價與薪資進行管制。日本從一九三七年開始控制糧食與紡織品價格，一九三九年四月之後開始控制薪資。然而，由於日本的軍隊與消費者爭搶相同的產品，導致日本的物價水準並未因為管制而停止攀升。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政府頒布價格等統制令，範圍不僅涵蓋絕大多數消費品，也包括租金、費用、貨運成本與薪資，所有價格全固定在法令施行前一天的水準。到了一九四三年，物價控制的範圍已遍及七十八萬五千種物品，由相關部會與地方當局負責執行。直到一九四三年為止，新體制一直能夠穩定物價指數。然而，到了戰爭最後幾個月，當最基本的消費品也出現短缺時，通膨便開始失去控制，黑市的出現也讓物價問題更加嚴

重，當局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立的中央物價控制委員會對於這些問題完全無能為力。<sup>112</sup>儘管日本的薪資因為企業之間為了爭搶稀少的人力資源而快速上升，但到了一九四四年，實質薪資依然比戰前縮水了三分之一，隔年更是只剩戰前的一半。<sup>113</sup>與此同時，中國的通貨膨脹早已失去控制，一九四五年的平均實質薪資比戰前短少將近三分之二，許多工人不得不在最低生存線之下辛苦生活。<sup>114</sup>

二戰迫使英美放棄物價與薪資的自由市場機制。與專制政權不同，英美在進行國家管制時必須考慮企業利益與勞工組織。戰爭初期，英國對於物價與薪資完全未進行任何實質管制，通貨膨脹因此開始惡化。到了一九四〇年底，英國生活成本指數已經比前一年高出三分之一，凱因斯等經濟學家預測的危機也似乎即將發生，有人建議提高薪資以縮小薪資與物價的差距。儘管工會願意接受薪資限制與七月剛成立的國家仲裁法庭的裁決，一九四〇年還是有大約八十二萬一千名工人罷工，這是戰時罷工的巔峰。勞動部表示，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想辦法讓「全體勞工都能感到滿意」，英國戰時薪資率的上漲速度因此超過了生活成本。延長工時、加班費與紅利使英國工人平均週薪上漲將近四成，而民間家戶生活成本則上漲了三分之一。英國對物價管制採取漸進方式：一九四〇年八月，政府同意對糧食進行補貼，讓所有基本糧食成本維持穩定；在一九四一年的預算中，政府決定讓租金與燃料價格固定不動，同時鼓勵民間市場生產者集中與合理生產以降低成本。一九四一年七月，政府終於通過《商品與勞務法》（又稱《物價控制法》），讓國家有更大權限控制最高價格與最大利潤率。<sup>115</sup>企業與勞工都參與了決策，避免讓外界產生國家專斷控制的印象。凱因斯為此表示，透過集體方式來處理通膨危機，「可以讓民眾覺得這種做法符合公平正義。」<sup>116</sup>

相較於歐洲，美國企業與一般民眾更不信任國家介入經濟，這點可



以從一九三〇年代為了處理經濟大恐慌的新政所引發的衝突明顯看出。然而，面對武裝部隊消耗民間消費者所需的半數物品，羅斯福政府不得不尋求辦法來控制物價與薪資。美國從一九三九年開始重整軍備，使得物價進一步提高，但政府最初的做法是鼓勵企業自行限制價格上漲。一九四一年，軍事支出快速增加，以往針對物價所做的任何限制完全失效。儘管堅持控制鋼鐵、橡膠、石油等戰略物資價格，美國政府仍發現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一年內急升了百分之十二，批發價格甚至上漲了百分之十七。一旦開戰，美國政府瞭解有必要採取緊急行動。一九四二年四月，物價管理局對所有物品實行一般最高價格管制。這項被簡稱為「高價管制」的措施，要求企業商品價格必須固定在某個基準日上，但價格畢竟是由企業自行訂定，因此資本家在會計上還是有許多可以操作的空間。一九四二年，通貨膨脹仍沒有停止的跡象，勞工開始感到不安，因為工會已經同意限制薪資上漲，也簽訂了不罷工協議。一九四三年四月，羅斯福總統終於迫使企業與工會同意在戰時凍結所有物價與薪資，這項措施交由新設立的經濟穩定局執行。羅斯福表示，「釘緊價格」的做法執行得頗有成效，部分原因在於負責固定價格的官員仰賴六千個地方配給單位回報違法狀況，例行地施加懲罰。換句話說，商品價格是由聯邦官員決定，形同放棄了自由市場機制。在戰爭的最後三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每年只上漲百分之一點四，比所有交戰國都要低。<sup>117</sup>

這些經濟策略主要針對的是大眾，因為平民必須承受軍事消費增加與民間各項消費品大量減少的衝擊。只有美國與加拿大這兩個擁有豐富經濟資源的國家，才有能力同時增加軍備與民間消費品產量。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美國糧食消費增加百分之八，但衣服與鞋子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家庭用品（不包括耐久財）增加百分之二十六，菸草與酒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相較之下，英國糧食購買量減少百分之十一，衣服

與鞋子減少百分之三十四，家庭用品減少超過一半。<sup>118</sup>雖然美國的個人消費成長有著不同的估計數字，但與一九三九年這個經濟大恐慌後整個一九三〇年代消費最高的一年相比，美國在戰爭期間的個人消費依然出現明顯的增長。官方數字顯示，美國平均每人的實質支出（扣除海外軍隊與根據物價上漲進行調整之後）在一九三九年是五百一十二美元，到了一九四五年則是六百六十美元。<sup>119</sup>如果考慮戰時主要耐久財（尤其是汽車）生產量下降到極低的水準，上述數字就顯得更加突出。也就是說，美國人除了購買戰爭債券，還花更多的錢購買衣服、鞋子、酒與香菸。

除了美國這個例外，其他交戰國的個人消費都受到大幅削減，以便將資源轉移給軍隊。就像加稅與認購戰爭債券一樣，削減消費也被視為動員戰爭不可避免的結果，一般民眾也認為這麼做理所當然。有幾個方式可以讓民眾減少有形消費，避免花費剩餘所有：首先是配給消費品，特別是糧食與衣服，關閉不必要的民間生產或將其轉換成軍事生產。其次是透過摻假或標準化來降低消費品的品質。第三，讓消費品製造者缺乏原料與勞工來進行生產。在英國與德國，家庭用品都被製造成廉價的標準形式，如英國市場上的「實用產品」與德國市場上的「標準產品」，雖然選擇減少，卻能維持最低程度的供給。若以一九三八年為基準指數一百，則英國總合消費支出從一九三八年的一百降到一九四四年的八十六，非糧食的消費降幅更大：衣服從一百降到六十一，家庭用品從一百降到七十三，家具從一百降到二十五。<sup>120</sup>

今日仍有不少人認為，德國民眾是直到戰爭末期才開始節衣縮食，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德國人從戰爭一開始就比英國人更大幅度且更有系統地抑制消費。從一九三九年秋天起，所有物資若非進行配給，就是生產遭到限制或禁止。德國平均每人消費支出早在戰前就已經開始下降，

開戰之後更是迅速下跌。以一九三八年為基準指數一百，一九四一年價格調整後的消費指數下跌到八十二，最終在一九四四年下跌到七十；如果把大日耳曼國較為窮困的併吞地區也涵蓋進去，則指數分別是七十四點四與六十七。希特勒政權認為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戰敗的主因是社會危機，因此希特勒極力避免社會危機出現，設法讓所有民眾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戰爭期間，儘管遭受盟軍密集轟炸，德國人依然維持最低限度的刻苦生活，排除了所有非必要的糧食與家庭用品。一名美國記者在一九四一年提到，德國人過著「徹底斯巴達式」的生活，只能勉強忍受。<sup>121</sup>與英國人一樣，德國人也必須「湊合著過日子」，舊衣服、鞋子與家具都要靠自己縫補修理。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德國城市遭到猛烈轟炸，家庭用品的大量損失迫使工廠不得不重新生產消費品。然而，許多被炸毀的物品之所以能獲得替補，主要是因為倉庫裡存放了大量從被流放與殺害的猶太人家裡沒收的家具、衣服與鞋子。

日本與蘇聯的戰時消費者面臨的狀況與其他國家不同，兩國的生活水準相對較低，總體戰的需求幾乎耗盡了平民人口所需的絕大多數資源。在日本，民間供給的順位排在後頭，而且從一九三〇年中期之後就持續下降。政府宣傳要求民眾過著刻苦節儉的生活；一九四〇年，新法規限制消費生產，「奢侈是敵人」的口號成為戰時文化的官方修辭。<sup>122</sup>民間生產者只能生產糧食，其他生產都必須停止，或者是將資源用來生產軍火。一九四三年四月擬定的日常必需品計畫將重點放在糧食、家庭燃料與紡織品，但同年紡織產業卻完全被分配來進行軍事生產。政府的目標是將民間消費減少三分之一，但政府愈是堅持將資源優先投入於已經不利的戰事上，消費品的生產就下跌得更多。到了一九四四年，消費品生產已經降至戰前水準的一半，到了戰爭結束時更是只剩五分之一。<sup>123</sup>在蘇聯，民間供給也排在戰爭產業後頭，只達戰前水準

的三分之一。實質價格的零售貿易額，從一九四〇年的四千零六十億盧布，下跌到戰時一九四三年的一千四百七十億盧布；蘇聯的平均家戶消費與歐洲相比已經偏低，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依然下跌到戰前的六成。絕大多數消費者面臨的問題是政府允許不同的價格水準。配給的糧食與戰爭物資受到管制，但其他物品則任由需求壓力決定，並且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薪資的漲幅跟不上物價，絕大多數俄國消費者的生活都要比官方數字顯示的來得惡劣。<sup>124</sup>所有關於蘇聯戰時生活的描述都顯示平民生活在赤貧之中，但與二十年前推翻沙皇政府的大後方危機不同，此時的蘇聯仍有剛好足夠的糧食與燃料（與國家恐怖）來避免社會崩潰。

日本與蘇聯的狀況顯示，糧食供給在維持大眾正常運作與願意進行戰爭上有著絕對的重要性。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無不呼應著邱吉爾的堅持：「為了維持國內民眾的精力與決心，一切必需的供給絕對不能少。」<sup>125</sup>控制農業生產與維持糧食貿易是讓動員獲得普遍成功的關鍵。美國與大英帝國自治領都屬於糧食過剩地區，因此唯有美國與大英帝國自治領不用面對平民糧食短缺的急迫問題，儘管如此，高度的軍事需求與廣泛的糧食出口依然讓這些糧食過剩地區必須對糧食供給實施有限的配給與管制。在美國，絕大多數民眾就算沒有吃得比較好，至少也維持跟戰前一樣的水準。平均每日攝取熱量實際上高於一九三〇年代水準：一九三八年，每人攝取熱量三千兩百六十大卡，一九四三年更是達到戰時高峰的三千三百六十大卡。<sup>126</sup>雖然肉類、咖啡、糖與乳製品最終都必須配給，但相較於各國標準，美國的配給量可說極為慷慨。每人年肉類消費量從一百四十三磅（六十五公斤），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一百五十四磅（七十公斤），使美國人飲食的蛋白質分量達到歷史新高，不過這份官方數字低估了黑市（所謂的meateasies）的肉類消費量，因為在國家控制體系之外的農民與屠宰場也會把肉送到黑市去賣。<sup>127</sup>更



重要的是，透過《租借法案》，美國願意無償提供大量糧食給其他同盟國。對蘇聯來說，四百四十萬噸的糧食無法解決糧食問題，卻能讓飢餓的士兵與平民活下去。<sup>128</sup>

在糧食短缺地區，包括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喪失五分之三農業區與三分之二糧食供給區的蘇聯，各國政府無不想盡辦法維持適當的熱量攝取，特別是要讓工廠工人與礦工吃飽，並且透過配給確保對日漸減少的糧食進行公平分配。配給的份額無法做到完全平等，例如德國礦工與鋼鐵工人每天可攝取四千兩百大卡，「一般」消費者則只有兩千四百大卡。而隨著戰爭持續，蘇聯、日本與德國逐漸連維持配給都難以做到，但到了戰爭最後幾個月，只有日本實際陷入糧食供給崩潰的狀況。在配給減少的環境下，一旦武裝部隊能夠獲得所需的份額，就表示武裝部隊以外的民眾不可能維持戰前的糧食水準。各國政府只能選擇增加高熱量的糧食，而無法顧及蛋白質、脂肪與新鮮農產品的補充，這代表絕大多數都市消費者只能擁有充滿澱粉的單調飲食，缺乏維生素等營養。這樣的食物其實足以生存，只不過長期而言會損害健康。西北歐的主食是馬鈴薯，義大利是小麥，日本與中國則是稻米。馬鈴薯容易種植，即使在貧瘠的土地也能生長，而且富含營養。英國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的馬鈴薯產量增加超過五成，德國馬鈴薯的消費量也比戰前多了九成。<sup>129</sup>在蘇聯，一九四四年的馬鈴薯產量比戰前多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就連在集體農場裡工作的人也一樣，馬鈴薯是唯一的營養來源。一九四二年四月，蘇聯名義上的元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Mikhail Kalinin）甚至針對馬鈴薯向全國民眾提出呼籲：「如果你們想擊敗德國法西斯入侵者贏得勝利，那麼你們必須拼命種馬鈴薯，愈多愈好。」<sup>130</sup>

相較之下，馬鈴薯以外的主食往往較難滿足糧食需求。在以玉米與

小麥為主食的義大利，農業生產從戰前的水準一路下滑，更糟的是，義大利需要出口糧食以換取戰爭需要的石油與原料；到了一九四三年，糧食淨產出減少了四分之一，配給糧食的熱量減少到僅剩九百九十大卡，不過絕大多數的糧食生產與消費並未涵蓋在配給體制之內，這些糧食往往因為嚴重通膨而價格高漲。<sup>131</sup>稻米是最具挑戰性的農產品，不僅對日本消費者是如此，對於整個受亞洲戰事影響的地區也是如此。一九四一年四月之後，日本都市消費者每日的稻米配給是三百三十公克，可以提供基本的一千一百五十八大卡，其餘熱量則以小額配給的其他糧食補足。然而到了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由於美軍進行海上封鎖，大日本帝國各地稻米的供給量急速下跌，與戰前相比，稻米消費量幾乎少了四分之一。此時都市消費者每日的熱量攝取已經下降到一千六百大卡到一千九百大卡，不足以維持長時間工作所需。<sup>132</sup>

糧食短缺地區的農業面臨許多共同問題。男性勞動力被軍隊大量徵召、農業機械設備破舊損壞且許多根本無法替換、生產化學肥料的原料被拿去生產火藥、牲口與曳引機被軍方徵用。在德國，人造肥料供給在戰時減少了一半，用來生產農業設備的鐵的分配量，也從一九四一年的七十二萬八千噸，下降到一九四四年的三十三萬一千噸。戰爭初期，百分之四十五的男性勞動力遭到動員，只能由女性來進行農業生產。到了一九四五年，德國本土農業勞動力已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五是女性，另外也投入了大量外籍工人與戰俘的勞動力。<sup>133</sup>在蘇聯，機器設備已經完全從集體農場消失，肥料也無法獲得優先配給，男性勞動力減少到只剩一小部分。到了一九四四年，農村勞動力已有五分之四是女性；原本由牲口拉動的犁，現在改由一群女性一起拖拉。<sup>134</sup>英國的經驗是例外。戰前，英國有七成糧食供給來自於海外。艙位的短缺與德國的潛艦戰迫使英國政府迅速進行國內農業生產，大量投資機器、設備與肥料生產以

協助轉型。曳引機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脫粒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馬鈴薯收穫機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牲口普遍未受到徵用，因為英國陸軍幾乎已經完全摩托化。國內的穀物生產從一九三九年的四百二十萬噸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七百四十萬噸，完全彌補了穀物缺口，使英國在戰時完全不用實施麵包配給。<sup>135</sup>英國在戰前就已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有利增加民眾營養攝取的政策，使得英國人在戰時可以比其他糧食短缺地區的消費者吃得更好。

由於糧食供給十分重要，人們因此想了一些辦法來補充配給物品的供給與增加後方人口的每日熱量供給——有些辦法合法，但更多是不合法。主食的需求造成畜牧業的衰退與可耕地的增加，導致令人吃驚的結果。好比在英國，從和平時代末期到一九四四年，農產品的熱量值幾乎增加了一倍。在日本，當局堅持種植高熱量作物，於是水果、花卉與茶等五十種農產品的種植受到限制或禁止。<sup>136</sup>另外一種增加可耕地的方式相當簡單，就是鼓勵民眾自行種植農作物，特別是都市民眾。美國廣泛推廣「勝利菜園」，在戰時總共出現了兩千萬座菜園（一九四三年，番茄的收成因此創下紀錄），英國民眾則在政府勸導下發起「為勝利翻土」運動，民眾在自家草坪與空地進行翻土，開始種植蔬菜與水果。到了一九四三年，英國總共有一百五十萬處空地供應當季作物來補充戰時的單調飲食。在日本，民眾開始在鐵路邊上的土地與學校操場種植作物。<sup>137</sup>空地的使用也拯救了蘇聯的勞動力。一九四二年四月，克里姆林宮允許城市工人利用未開墾的土地，到了一九四四年，總共已有一千六百五十萬處空地生產蔬菜、水果甚至肉類。另有六十萬名武裝志工負責守衛這些空地以防止饑民偷竊。<sup>138</sup>

在糧食短缺且短缺無法填補的地區，開始出現成分摻假與代用的食品。一九四二年，英國的白麵包變成了米黃色，因為麵粉業者奉命提取

更多穀物的殘餘物；日本的白米變成棕色也是一樣的道理。日本農商省糧食替代局試圖研發一種「粉末飲食」，用乾橡實、地瓜葉或桑葉混和麵粉製成，但未能成功。在德國，雖然民眾不喜歡，但從紡織品到咖啡的代用品仍獲得廣泛使用。茶葉以野生植物與莓果來取代，咖啡則改用大麥製成。柏林人很快就為這些代用品取了難聽的綽號：代用咖啡被稱為「黑鬼汗水」，加在代用咖啡裡的摻假奶粉被稱為「屍水」。一九四一年，義大利流通著一本標題為《別浪費》的小冊子，上面介紹用麵包屑製成的「假魚」或「假肉」食譜，還有不用糖或蛋製作的「自給自足」甜點，以及沒有咖啡的咖啡。<sup>139</sup>

當各種方式都無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時，黑市便成了令人難以抵擋的誘惑。現實上，絕大多數市場並未受到糧食管制與配給體制的限制，這些市場與其說是非法，不如說處於法律地位不明的灰色狀態。在蘇聯，當局允許配給制度之外存在一定程度的糧食買賣，這些糧食主要來自於小農地，出售的價格完全不受政府管制。非配給的糧食價格上漲超過十倍，遠非絕大多數都市勞動力所能負擔。與蘇聯一樣，日本與義大利也擁有大量農村人口，當局對於民眾到鄉村尋找食物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飢餓的城市人口會想盡辦法向農村人口購買多餘的糧食。在日本，通常會叫孩子到鄉村購買糧食，不只是因為孩子比較能引發農民同情，也因為警察對孩子比較不會像對付其他作奸犯科的人那樣嚴厲。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隨著糧食愈來愈缺乏，日本黑市也跟著發展起來。一九三八年，日本設立「經濟警察」取締規避配給與操縱價格的行為，往後十五個月，經濟警察總共逮捕了兩百萬人。都市家庭為了生存，不得不從事非法交易，警察無論怎麼取締與控制，都無法產生效果。<sup>140</sup>在中國，祕密警察（軍統）也負責取締囤積居奇、走私與黑市，這些非法行為往往出現在介於中國政府、地方軍閥與日本占領者之



間的三不管地帶。同樣地，即使處以數百萬元的罰鍰，也無法打擊這些非法交易。<sup>141</sup>

在配給制度較為有效且管制較有組織的社會，非法交易通常被視為犯罪行為，而且也依刑法加以處置。德國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就頒布了經濟犯罪法令，其中涵蓋任何想規避糧食供給管制與配給的行為。最高刑度可以達到死刑，有幾件轟動一時的案子被判處反叛人民罪，犯罪者遭到處決。<sup>142</sup>然而這當中也存在著灰色地帶，少數交易可以存在於朋友或可以信賴的店鋪老闆之間，不過風險依然很高。英國實施糧食配給的範圍較小，當局防範的重點在於避免各地零售商哄抬價格，造成通膨升溫。要防止這種情況非常困難，但英國政府終究研擬出一套監督制度。然而當這項制度一上路，告發的數量便開始直線上升。在整個戰爭時期，英國糧食部起訴了至少十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八件違反市場管制與非法交易的案子，但所謂懲罰也不過是些許罰金或短暫拘留。因此在戰時的英國，黑市買賣始終十分猖獗——弔詭的是，英國卻是所有交戰國中糧食供給較為慷慨與廣泛的國家。<sup>143</sup>

官員擔心糧食供給不足可能影響戰爭的人口動員，但這種憂慮其實是杞人憂天，二戰也並未像一戰末期那樣出現革命危機。儘管如此，這不表示所有人都能擁有相同的機會取得糧食。政治與商業菁英不僅吃得好，還能大擺宴席，曾經參加克里姆林宮的晚宴或曾經與邱吉爾共進晚餐的人都見識過這些場面。德國納粹黨高層可以任意開啟上了封條的倉庫，享用裡面的菸草、咖啡與奢侈品。東京的時髦餐廳持續服務日本的有錢人，餐廳外頭的許多民眾卻骨瘦如柴。城市與鄉村通常有著明顯對比，但蘇聯是例外，蘇聯集體農場的農民只能留下少許自己種植的農作物，他們必須四處尋找額外的糧食。德國當局試圖管制農村所謂「自給自足者」保留農作物的數量，他們頒布一連串複雜法規，對每位農民可

以擁有的麵包、肉類、奶油、雞蛋與牛奶數量定下配額。在日本，稻米市場由政府管制，政府對於每個農戶規定了配額，藉此限制農村人口對農作物的消費量。<sup>144</sup>儘管如此，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當德國與日本的城市民眾為了躲避轟炸而疏散到農村時，他們看到城市裡長時間從未出現的糧食，多樣且大量。農民寧可冒險也要囤積糧食，甚至與非法的屠宰業者合作。

在最脆弱的幾個國家，都市消費者必須持續忍受極度貧乏的飲食。戰後對義大利的估計發現，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大約有七百萬到一千三百萬的都市居民糧食供給「低於最低生理需求量」；蘇聯與日本在戰爭中期的糧食配給同樣無法維持正常的身體需求。<sup>145</sup>蘇聯與日本都成功防止饑荒發生（日本差一點就爆發饑荒），但兩國工人必須在飲食不佳的狀況下努力工作，持續處於飢餓狀態，健康也持續耗損。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配給額度意謂著你有權得到多少糧食，但不表示糧食真能送到你的手上。官員有時會苛扣原本該分配給飢餓工廠工人的糧食。<sup>146</sup>蘇聯民眾沒工作就沒有權利獲得配給，戰爭期間因此餓死的民眾數量不詳。蘇聯工人如何能在粗劣飲食、寒冷且不衛生的環境下一天工作十到十四個小時，始終都是個難以解釋的問題。蘇聯與日本工人要不是死於營養不良，就是因為超時工作而在他們操作的機器旁倒下，這除了源自於嚴厲的社會壓力要求人們集體行動，也源自於國家高壓的強制手段。

隨著蘇聯逐漸奪回被德國占領的失地，蘇聯工人的處境也開始跟著好轉，但日本可就沒有那麼幸運。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都市人口已經面臨饑荒危機。日本從帝國各地進口的稻米，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兩百三十萬噸，下降到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三萬六千噸，後方的稻米產量也從一千萬噸下降到戰爭最後一年的五百八十萬

噸。<sup>147</sup>日本的進口受到美軍潛艦與空中的封鎖，日本商船船團在一九四五年已有五分之四遭到擊沉。美軍的轟炸也造成八百萬都市人口疏散到鄉間，不僅破壞了收穫週期，也影響了糧食分配。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平均每人糧食消費量已降到一千六百大卡，但這只是平均數字，實際上存在著嚴重分配不均的問題。糧食危機引發日本保守派菁英的擔憂，他們認為糧食短缺很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甚至出現像沙皇時代的共產革命。一九四五年六月，內大臣木戶幸一向裕仁天皇示警，認為糧食危機很可能表示「當前的局勢即將無可挽救」。儘管傳統轟炸與原子彈轟炸皆造成廣泛的社會混亂，但革命終究沒有爆發。裕仁天皇最終在八月十日做出投降的決定，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裕仁擔心日本帝國在被美國擊敗之前，就因為饑荒造成的社會動亂而覆滅。<sup>148</sup>

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饑荒的出現最終都要歸因於戰爭造成的破壞。雖然自然因素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最大規模的饑荒主要都是人為。在希臘占領區，德軍的給養完全仰賴當地，也就是說從一九四一年四月開始，德軍就拿走了當地所有糧食庫存，也奪取了所有馱獸來搬運這些糧食。德軍無情地徵用，完全無視希臘都市人口的需要。希臘傀儡政府實施的配給制度因此完全崩潰，因為一百三十萬名小農不願接受政府以固定價格收購糧食——他們大可囤積穀物，再販售到黑市賺取更高的利潤。<sup>149</sup>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雅典——比雷埃夫斯（Athen-Piraeus）這個主要都市地區獲得的糧食已不到需要量的四分之一。麵包只能不定期地進行配給，從每日三百公克降到一百公克；紅十字會與其他慈善團體設立的免費供餐處只能提供十五萬人飲食，而飢餓人口卻在一百萬人以上。<sup>150</sup>九月，饑荒已近在眼前，德國占領者拒絕提供協助，他們認為這是義大利征服的區域，應該由義大利人負責。義大利運送了一些糧食，但不足以解決供給與運輸的危機。在英國海軍封鎖下，

中立國的糧食也無法運進希臘。在一九四一年冬天的雅典，死亡率增加了六倍以上，最脆弱的民眾要不是餓死，就是因為缺乏抵抗力而病死。一九四二年二月，英國政府在強大民意壓力下同意放鬆封鎖，但到了六月才成立瑞典與瑞士救濟委員會負責將糧食運進封鎖線進行分配，直到七月才終於有大量糧食送進雅典。一九四二年八月，有八十八萬三千名雅典人仰賴免費供餐處維生，約占雅典人口的八成。<sup>151</sup>在占領期間，糧食短缺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但饑荒危機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獲得緩解。根據紅十字會的估計，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至少有二十五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飢餓與營養不良。

在亞洲，戰時發生的三場大饑荒奪走了超過七百萬條性命。其中有兩場還是發生在盟軍控制的地區，分別是印度東北部的孟加拉與中國的河南省；另一場則發生在日本占領的法屬印度支那東京地區。饑荒有部分原因是氣候造成，例如霜害、氣旋或旱災，但自然原因造成的糧食損失不足以引發大規模糧食短缺。在這三場饑荒中，糧食短缺主要是戰爭造成的市場扭曲與分配不均的結果。隨著緬甸稻米供給減少，孟加拉首當其衝。一九四二年，緬甸小農生產的稻米被投機者收購一空且加以囤積。米價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每孟德（maund，三十七公斤）九盧比，上漲到隔年五月的三十盧比，不僅窮困的無土地勞工無力購買，就連之前出售稻米的農夫也買不起。印度政府決定收購穀物來餵養加爾各答的勞動力，並且允許稻米在市場上自由交易，然而這些做法反而使局勢更加惡化。當孟加拉爆發饑荒時，印度政府並未立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原本應該從稻米過剩地區運送稻米的貨船，要不是為了避免日本奪取貨船而停止出航（停止出航的貨船占了可用的六萬六千五百艘貨船的三分之二），就是已被軍隊徵用。<sup>152</sup>結果就是印度其他省分雖然有過剩的稻米，卻無法運到孟加拉。當局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問題所



在。英國總督一方面對於在印度報紙上看到死者與垂死之人的照片感到難過，另一方面卻又動用宣傳來反制這類「無濟於事的恐怖故事」。一九四三年十月，當局終於採取措施，對現有的稻米進行配給與分配，然而此時估計已有兩百七十萬到三百萬名孟加拉人死亡。<sup>153</sup>

一九四二年，中國河南省稻米歉收，加上無法從緬甸與越南進口稻米，使得稻米短缺趨於嚴重。富有的地主與投機者向貧困農民收購穀物並且進行囤積，耕牛與男性勞動者的短缺更進一步降低了地方的生產力。鄰近各省拒絕釋出過剩穀物，國民政府也無法提供有效的救濟措施。從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春，大約有兩百萬到三百萬人死亡，估計占了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印度支那。一九四二年八月，日本與維琪法國地方當局簽訂協議，每年從印度支那徵收一百萬噸的上等稻米。殖民國向數百萬名小農徵收穀物，但米價上漲卻使得富商開始收購稻米囤積居奇。從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夏天，印度支那東京地區的民眾開始遭受饑荒或近乎饑荒的災害，造成大約五分之一人口死亡。<sup>154</sup>在前述四場大饑荒中，糧食缺乏都是人為造成的，原因不外乎軍事掠奪、中間商的貪婪、政府當局的無能或漠視。

## 男性人力與女性人力

除了財政與糧食，總體戰進行的集體動員還意謂著將所有四肢健全的民間勞動力全部動員起來。這個現象符合戰前對總體戰的核心定義：投入所有人力資源以達成贏得戰爭的唯一目標。這項非比尋常的主張依然與一戰的成敗經驗有關，而且這項主張並非只是說說而已。所有交戰國都為了相同目的動員所有勞動人口投入戰爭，而當所有交戰國最後都

面臨勞動資源不足的問題時，他們都開始把動員對象擴大到所有可僱用的人口，以取得新的勞動資源。工人在軍隊以外的前線作戰，但他們也被定義成類似軍人的身分。美國宣傳品要求工人把自己視為「生產的士兵」，與海外的美國大兵並肩作戰。蘇聯勞動法明文將工人定義成軍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更是規定，無故曠工等同「逃兵」，最高可判處監獄營八年徒刑。雖然德國並未正式將工人軍事化，但蓋世太保設立的「工作教育營」卻提醒民眾，「在戰爭中，每個人必須最大程度地貢獻自己的勞力」，否則後果自負。<sup>155</sup>

面對這場戰爭，國家與政府組織只能全力動員與分配所有的勞動力。勞動策略如此重要，負責勞動分配的部會因此實際掌握了龐大權力。然而在絕大多數狀況下，這些部會往往形成多頭馬車，各自採取做法控制戰時經濟，勞動配置與生產計畫的整合很少能一氣呵成。有時候，就連勞動配置這項業務也可以區分成不同部門。美國的全國戰時勞動委員會必須與戰時人力委員會進行政策協調（美國為了進行戰爭，一共設立了一百一十二個新部會，這只是其中兩個）。在德國，勞動部必須與另外兩個機構競爭，一個是萊伊領導的德國勞動陣線，另一個是招克爾（Fritz Sauckel）擔任的勞動配置總監，後者設立於一九四二年，負責增加外國勞工的徵召數量。美國與德國都因為缺乏統一的勞動計畫而難以做到生產最大化。

英國的勞動政策較為集中化。一九三九年四月頒布的《全國勞工徵召法》（National Labour Conscription Ordinance）與三個月後頒布的《人民動員法》（People's Mobilization Ordinance）很快就規定了勞動配置（不久便轉變成徵召），這兩部法令建立了全國性的勞動計畫以投入戰爭。工會領袖貝文（Ernest Bevin）加入一九四〇年的邱吉爾內閣，並且被任命為勞動大臣，之後通過的《國家兵役法》使國家可以在有需

要的時候進行勞動配置，這讓貝文取得一定程度的執行權力。他曾向其他閣員坦承，「這在英國是史無前例」。<sup>156</sup>「全國就業登記」的實施也使貝文得以掌握英國人力結構的全貌，簡化了戰時勞動資源重分配的過程。這種權力在美國不可能存在，因為美國有著反對國家控制的堅強傳統。感到挫折的羅斯福總統最終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將《國家兵役法》送進國會，試圖解決勞動短缺的問題，但這項法案依舊遭受龐大反對，於四月在參議院遭到否決。一名記者歡呼說，這項表決代表「美國不應該受獨裁制度統治」。儘管如此，美國還是推動了若干勞動配置計畫，鼓勵民眾戰時就業。美國戰時人力委員會將工人配置到至少三千五百萬個工作崗位上，但這些工人都是自願的，而非受到徵召。<sup>157</sup>

各交戰國就業結構的不同，主要表現在農業的勞力密集度上。日本、義大利與蘇聯的農業勞力密集度較高，英國則非常低，英國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與服務業。對於工業化與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經濟體來說，核心議題主要是將工業內部的勞工從民間生產轉移到戰爭相關的承包業務，而非將工業以外的勞工吸收到工業內部。在德國，直接投入戰爭生產的工業勞動力比例，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六十一，製造業則是從百分之二十八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在英國，非必要的工業產業喪失了四成的勞動力，到了一九四三年，三分之一的工業勞動力都集中在武器的直接生產。<sup>158</sup>農業產業較為龐大的國家，則會從農業徵召勞工，必要的話還會讓這些勞工投入工業。戰時日本從農業徵召了一百九十萬名工人，這些人投入於軍備生產。一九四一年，蘇聯從農村徵召了將近五十萬名年輕人，讓他們進入勞工預備學校學習戰時關鍵工業需要的技能。義大利由於缺乏工程工人，因此戰時從鄉村與手工業徵召人力接受訓練計畫。<sup>159</sup>在美國，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農場工人減少了將近一百萬人，但所謂的

「第一類產業」（包括絕大多數軍備生產）卻從一九四〇年的五百三十萬人增加到三年後的一千一百萬人，不僅吸收了農場工人，也吸收了消費或白領產業的員工。而在失業人口與未充分就業的可用人力資源方面，各經濟體的狀況也大不相同。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之前，德國已經達到充分就業。蘇聯也宣稱沒有失業人口，就連年輕女孩也必須在糟糕的環境下一天工作十小時。另一方面，英國在一九四〇年夏天仍有一百萬人失業，美國則有超過八百萬人失業，另外還有數百萬人只有短工時的工作。到了戰爭結束時，美國的失業率微乎其微，只剩六十七萬人失業，就業人口已高達六千五百萬。英國在一九四四年的失業率平均也只有百分之零點六。<sup>160</sup>

無論各國的勞動結構存在多少差異，隨著戰爭持續延長，各交戰國都出現了一個共同特徵：工人短缺。軍隊需要人力，要維持非作戰人口的最低供給也需要人力，這些都限制了與戰爭相關的軍備、設備與原料供給的可用人力。開戰初期，最缺乏的就是技術工人。雪上加霜的是，對勞工的需求增加，促使工人往薪資較高、工作條件較好的地方移動，無論政府再怎麼努力控制勞工移動，設法讓工人繼續待在原先的工作崗位上，雇主或工廠經理都會對工人照單全收，哪怕相關文件並未備齊，因為實在太過缺人。在蘇聯，儘管無故缺勤會遭到嚴懲，但戰時「擅離職守」的人居然多達一百八十八萬人，而這些人最終都會在別的地方找到新工作，為蘇聯的戰爭投入做出貢獻。<sup>161</sup>在日本，「擅離職守」相當普遍，大企業雇主總能引誘勞工在未經授權下冒險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到新的地方任職，而這些雇主也會協助這些勞工偽造必要文件。日本厚生省試圖固定薪資，並且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實施「全國工作手冊制度」，又在四個月後通過《勞工離職管制法》以控制工人流動，然而黑市薪資的出現仍舊對這類措施構成挑戰。<sup>162</sup>在美國，工人並未受到法



令或勞動營的威脅，因此難以強迫工會同意戰時政府禁止工人更換工作。大約有兩千五百萬名美國人會前往其他郡或州尋找更好的工作，其中包括一百萬名南方美國黑人，他們希望到北方的工業城市尋找機會。然而這些離鄉背井尋找工作的黑人卻飽受歧視，軍火產業的雇員只有百分之三是黑人，因為雇主認為這些黑人缺乏足夠的技能。<sup>163</sup>

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工人短缺的問題，最簡單的做法是延長工時與額外輪班。不分年齡性別，也不分日夜，所有人都要輪班十到十二小時，這是戰時許多工人的共同經驗。在日本與蘇聯，工人必須每天工作，完全沒有假日，這樣的要求使許多工人因為勞累與疾病而弄垮身體。所謂的「重新配置」，就是把工人從消費產業、手工業或服務業這些非必要的職業「梳理」出來，使軍隊能夠得到新兵，而戰時產業也能得到額外的工人。一九四一年三月實施的英國「生產集中」計畫，授權政府關閉二十九種產業，將這些產業資源重新配置在各產業最大與最有效率的公司裡。<sup>164</sup>德國在戰時持續進行「梳理」工作，但最大規模的勞動轉移其實出現在開戰的最初兩年。到了一九四二年，德國人數龐大的手工業已經有四成勞動力轉移到戰時產業，許多都是年紀較大的技術工人；到了一九四〇年夏天，消費產業的男性就業人數減少了五十萬人以上，許多人要不是進軍隊服役，就是轉移到戰時產業。<sup>165</sup>

生產「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也可以解決工人短缺的問題。更有效率的工廠空間布局，更廣泛地使用專門化的工具機，使用能容納生產線的大型廠房形成規模經濟，這些都能減少平均每個工人的勞動投入與增加勞動產出。在英國與德國，國家會派出督察員巡視每家工廠，找出績效不佳的廠商，要求這些廠商學習各產業優秀廠商的做法。效率為國防產業帶來大量收益，而效率的提升往往來自於工廠工人的建議。一九四一年，德國有三千家公司推行建議制度，一九四三年增加到了三萬

五千家。工人提出的建議如果有效，就能獲得紅利或額外的配給。<sup>166</sup>一九四二年四月，英國電氣公司生產一架哈利法克斯轟炸機需要四百八十七名工人，但一年後只需要兩百二十名工人。一九四三年，德國引進生產線來製造三號戰車，每輛戰車工時從四千小時減少到兩千小時；德國航空發動機生產合理化之後，BMW每具航空發動機的工時從一九四〇年的三千兩百六十小時降到一九四三年的一千兩百五十小時。<sup>167</sup>結果就是德國的戰時產業生產力大為提升（以每人產出來衡量）。蘇聯廣泛實施量產來滿足戰時需求，國防產業每個工人提升的價值從一九四〇年的六千零十九盧布，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盧布。戰時產業的生產力增長是所有交戰國共同的現象，但另一方面，農業與消費產業生產力則普遍陷入停滯或甚至衰退，因為這些產業原本的技術工人都遭到動員，取而代之的全是未經訓練的工人。<sup>168</sup>

由於徵召大量男性進入軍隊，加上戰時急需工業與農業勞工，動員女性因此成為首要之務。與自願入伍的女性一樣，身處後方的女性也瞭解自己是總體戰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不只是戰時男性的替代品——儘管戰時的描述卻總讓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女性身為工人、選民、黨員或服務志工，她們在戰前就跟男性一樣，都是社會組織的成員。在戰前，各國女性在勞動力上占有相當程度的比例，英國與美國較低（開戰時接近百分之二十六），德國與日本較高（分別是百分之三十七與百分之三十九），蘇聯最高，達到百分之四十。在戰時，英美這兩個民主國家的女性就業大幅擴張，其他國家則因為女性參與率原本就比較高，因此擴張有限，通常女性要不是從民間生產重新部署到戰時生產，就是在缺乏男性協助下，繼續經營店鋪、公司行號或農場。各國女性參與工業生產的規模有所差異，而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還是與農業產業有關。蘇聯、日本與德國的農村勞動力約占總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農

村勞動力大部分是女性。隨著戰爭持續，女性對男性的比例也逐漸提高。在蘇聯，一九四一年集體農場勞動力有一半是女性，到了一九四五年女性占比已高達八成。在日本，女性占比也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五十二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德國，女性占本國農村勞動力的比例也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五十四點五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五點五。<sup>169</sup>女性對戰爭投入的貢獻不可或缺。由於糧食供給在戰時有著較高的優先性，因此將女性從糧食生產重新部署到工業生產並不可行。在總體戰的背景下，女性農場工人就跟女性工業工人一樣，都屬於生產前線的一部分。

在英國與美國，一旦開始動員女性便代表勞動力將出現大量淨增加，因為將有數百萬名女性投入工作，特別是已婚女性。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美國女性勞動力增加了五百二十萬人，其中三百四十萬人是已婚女性，絕大多數人的孩子都已經長大，八十三萬兩千人則是單身。<sup>170</sup>儘管數字令人印象深刻，但這樣的增長只存在於紙面上，絕大多數美國女性依然待在家裡，許多人擔任紅十字會的志工，或者協助推銷國債，或者幫忙照顧小孩。在戰爭期間，實際上有兩百萬名女性放棄全職工作，許多女性則是衡量自身情況，有辦法的時候才去工作，只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勞動力投入製造業。絕大多數填補男性空缺的女性擔任的都是公司行號、銀行、商店與聯邦政府的工作。<sup>171</sup>美國政府拒絕任何徵召女性的想法。面對潮水般蜂擁而來想要應徵戰時工作的女性，美國各界起初的反應就像軍方一樣半推半就。然而逐漸地，隨著國防相關產業出於必要開始招募與訓練女性員工之後，一些男性管理高層也開始克服內心的偏見。

與許多男性相比，女性很快就證明她們是更為可靠的工人——認真、有條理、靈巧、有耐心。一九四二年之後，有愈來愈多女性從事戰

時工作。一名航空產業主管便對記者說：「男性員工就算了，多給我一點女性員工。」<sup>172</sup>在這個時期，加州一些大型新飛機製造廠的勞動力超過半數都由女性填補，而這些製造廠的量產流程也做了調整以配合技術較低的女性工人，同時減少工作造成的身體負荷。<sup>173</sup>英國的狀況跟美國大致相同，在戰爭第一年，女性工人只額外招募到三十二萬人，主要是因為這些戰時工廠的雇主對於訓練女性與男性一起工作感到遲疑，而許多男性員工也討厭勞動力遭到「稀釋」。女性就業人數從一九三九年的六百二十萬人，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七百七十萬人，然而與美國一樣，許多初次工作的英國婦女在取代男性的同時也希望自己從事的是白領工作。為了解決戰時需求問題，英國於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進行了有限徵召：第一次針對年輕單身女性與沒有子女的寡婦，第二次則針對沒有子女的已婚女性。絕大多數的工廠女性勞動力都來自於原本在民間產業工作的女性，由政府將其重新部署到生產軍事設備的工廠。<sup>174</sup>

德國與蘇聯也對女性勞動力重新部署，這兩個國家女性工作的比例原本就非常高。事實上，在戰爭剛爆發的時候，德蘇女性工作的比例就已經比英美女性在戰爭後期工作比例達到巔峰時還要高（見表4.3）。一九三九年，德國十五歲到六十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即就業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二，而美國在戰爭高峰期卻只有百分之三十六，英國則是百分之四十五。

表4.3 女性占本國勞動力比例，1939-1944年（百分比）

國家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英國	26.4	29.8	33.2	36.1	37.7	37.9
美國	-	25.8	26.6	28.8	34.2	35.7



蘇聯I	-	38.0	-	53.0	57.0	55.0
蘇聯II	-	-	52.0	62.0	73.0	78.0
德國	37.3	41.4	42.6	46.0	48.8	51.0
日本	-	37.8	-	42.0	-	-

蘇聯 I = 所有公部門就業。蘇聯 II = 集體農場勞工。

從國際標準來看，蘇聯女性勞動力在各個產業的高度參與是相當罕見的：例如在一九四〇年，女性占了工業勞動力的百分之四十一，一九四三年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三；戰前運輸工人有百分之二十一是女性，到了一九四三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在德國與蘇聯，絕大多數加入戰時工人行列的女性都是從民間企業轉移到國防工業，原來的工廠要不是從生產民間物資轉變成生產戰爭物資，就是因為業務不屬於戰時必需而關閉，因此德蘇的女性參與並未造成勞動力的淨增長。蘇聯女性都要接受勞動徵召，未參與的女性不是太老就是生病，要不然就是要負責照顧小孩。

德國政府曾經想過徵召所有女性人口，但最終只徵召年輕的單身女性，這些女性別無選擇，只能到工廠工作。德國政府也鼓勵已經生育的已婚婦女上半天班，大約六到七個小時。到了一九四四年，已經在工作的婦女有一千四百八十萬人，而上半天班的已婚婦女也達到三百五十萬人。數百萬名婦女自願從事民防、急難救助或加入黨的福利組織。在德國政府努力下，到了一九四四年，德國女性占本土勞動力的比例終於超過百分之五十一，然而隨後盟軍飛機的轟炸，使得數百萬德國婦女與孩

童必須疏散到鄉村地區，這些母親因此無法再繼續從事戰時工作。當日本於一九四五年遭受猛烈轟炸時，日本的國內勞動力有百分之四十二來自於女性，主要從事農業與商業。一九四一年，日本徵召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年輕女性，總共有一百萬人被動員；一九四三年九月，徵召範圍調整成十四歲至二十五歲，動員人數增加了三百萬人。女性甚至也要到礦場挖礦，戰爭時期礦場的女性工人也增加了一倍。<sup>175</sup>

即便接受徵召投入戰時工作的女性已達數百萬，然而性別歧視並未因此終止，性別平等也未因此而有所進展。女性很少擔任監督或管理職，女性也未能從事最具技術性的工作。從事白領工作的女性通常都是低薪的辦事員、祕書或服務人員。戰時美國女性工人擔任工匠、領班或技術工人的比例，只從百分之二點一提升到百分之四點四。一九四四年，即使男女從事的工作大致相同，美國女性的平均週薪依舊只有三十一美元，男性則是五十五美元。在英國，女性平均薪資率仍只有男性的一半。<sup>176</sup>婦女或女孩要在現有的工作條件待上數年通常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像科切吉娜與其他數百萬蘇聯女性在當局逼迫下持續工作，直到身體垮掉為止。原本只僱用男性的公司並未提供女性專用的廁所或醫療設施，在這種狀況下依然要求女性要連續上班十個小時。當女性因為疲憊、生病或家庭問題而出現較高的缺勤率，男性便用一貫的偏見嚴詞批評她們。許多女性面臨的壓力遠比男性來得大，除了照顧小孩與爭取配給物品，下班之後還必須整理家務，最後才能休息睡覺。為了緩和女性的雙重責任，國家開始設立日間托兒所。到了一九四四年，德國的托兒所總共可以照顧一百二十萬名嬰兒；在美國，儘管國家不認為設立日托中心是國家的責任，但依然出現了三萬間以上的日托中心，不過負責照顧的孩子卻只有十三萬人。由於一些經營不善的日托中心疏於照顧孩子而被媒體披露，因此部分職業婦女寧可把孩子留在家中，（因父母均工

作放學後只能獨自在家的)「鑰匙兒童」與遭到忽視而產生的少年犯罪浪潮也引發美國國內的熱烈討論。<sup>177</sup>

對於試圖打造「新秩序」的德義日帝國來說，還有一種人力資源可以剝削，那就是在占領區強制徵召工人來填補本國勞動力的不足。數百萬名工人在占領區為占領者工作，他們工作的地點可能是建設工地，可能是道路與鐵路鋪設地，也可能是農場與工廠。根據估計，德國大約強制徵召了兩千萬人在歐洲工作，日本在亞洲的新帝國強制徵召的人數則缺乏詳細資料。日本也強制徵召了大量中國工人在滿洲、內蒙古、朝鮮與日本本土從事戰時工作。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大約有兩百六十萬名中國人實際上淪為奴隸，在惡劣環境下工作卻拿不到任何薪水。<sup>178</sup>日本的朝鮮殖民地工人生活條件較佳，因為日本在朝鮮半島上建立工業以滿足戰時需求，當地因此需要大量的朝鮮工人。一九三三年，在工業、營造與運輸業工作的朝鮮人只有二十一萬四千人，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卻增加到了一百七十五萬人，包括製造業的四十萬人。幾乎所有朝鮮人都淪為領取最低薪資的勞工，但仍有一群朝鮮工程師與商人因為戰時生產需求而獲利。<sup>179</sup>其他朝鮮人則沒那麼幸運。強制勞動計畫也延伸到日本殖民地，到了戰爭結束時，估計有兩百四十萬名朝鮮人以惡劣的工作條件在日本工廠與礦場工作，占了工業勞動力的四分之一。<sup>180</sup>

德國的戰爭經濟規模遠比日本來得龐大，對勞工的需求也更為急迫。戰爭期間，德國愈來愈仰賴非德國勞工充當勞動力。一九四四年底，在德國與併吞區——所謂的「大日耳曼國」——工作的外國人達到八百二十萬人，本國勞動力則是兩千八百萬人。整個戰爭期間，估計德國的外國工人、戰俘與勞動營囚犯在一千三百五十萬人到一千四百六十萬人之間，他們成了德國人力資源的一部分。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們

已占民間勞動力的五分之一以上。<sup>181</sup>德國的外國勞動力由各國人民組成，希特勒政權將他們分成不同類別，分別給予不同的待遇。其中有一小群外國勞動力是自願加入。一九三九年春天，德國已經有四十三萬五千名外國工人，他們是受到德國大規模重整軍備提供的工作機會與高薪吸引而來。許多人來自德國的鄰邦，這些國家很快在一年之內就遭到德國征服占領；另外也有許多人來自德國的盟邦義大利，到了一九四一年，德國的義大利工人達到二十七萬一千人。<sup>182</sup>一九四〇年，德國征服荷蘭與法國之後，大約有十萬名荷蘭人與十八萬五千名法國人自願前往德國為德國公司工作。一九三九年被德國併吞的波蘭地區，估計也有三百萬名波蘭人為德國工作。<sup>183</sup>這些到德國工作的外國勞工，表面上看起來是自願，實際上帶了點強迫的成分。被占領國的產業衰退與失業率上升，在經濟上構成壓迫，這種壓力迫使工人前往德國尋找工作。在義大利，墨索里尼答應給予希特勒一批義大利工人，以換取德國提供必要的戰爭物資。義大利各地的法西斯官員於是開始鼓勵或者施壓義大利農業工人與工廠工人動身前往德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也簽訂戰時協議，由義大利政府補助這些工人薪資讓他們可以將錢寄回給在義大利的家人。換言之，德國經濟不僅取得了需要的勞工，也不用給予這些勞工全額的薪資。<sup>184</sup>

德國也強迫戰俘勞動。除了蘇聯與日本之外，所有交戰國都批准了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公約》，而該公約明文限制了戰俘勞動的範圍，規定不許直接將戰俘用於與戰爭相關的工作。對於英美戰俘，德國人或多或少會謹守這些禁令。德國在一九三九年俘虜了三十萬名波蘭戰俘時，最初也要求這些戰俘必須待在德國農場工作，這些都還在公約允許的範圍之內。九個月後，德軍俘虜了一百六十萬法國戰俘，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農場工人。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德國，半數以上像波蘭人一樣



必須在德國農場工作。然而，當工業勞動需求增加，德國開始想辦法規避《日內瓦公約》的限制。德國認為，波蘭既然已經滅亡，波蘭戰俘自然就獲得平民身分，因此可以從事《日內瓦公約》禁止的工作。在法國戰俘方面，為了規避國際法對戰俘使用的限制，德國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創設了一個「轉變」戰俘的特殊類別。由於法國在強制脅迫下派了不少工人來德國工作，做為回報，德國於是將自願工作的法國戰俘歸類為「民間工人」，將他們視為可以領取正常薪資的工業勞工。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大約有二十二萬名法國戰俘因為這項協議而獲利。<sup>185</sup>

東歐與南歐戰俘的命運大不相同。對於蘇聯戰俘，不存在任何法律問題，因為蘇聯並未批准《日內瓦公約》。德蘇戰爭第一年，絕大多數蘇聯戰俘不是因飢餓或疾病死去就是被殺，之後希特勒勉才為其難地同意讓蘇聯戰俘在大日耳曼國境內從事勞動。在德國境內工作的蘇聯戰俘數量不多，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只有六十三萬一千人，絕大多數蘇聯戰俘都在東方，為德國武裝部隊與占領當局工作。一九四三年九月，當義大利向盟軍投降時，被德軍擒獲的義大利士兵也無法受到《日內瓦公約》保障。德國將俘虜的六十萬名義大利士兵歸類為「軍事拘留犯」而非戰俘，因此可以要求他們從事任何種類的勞動。德國當局與民眾痛罵這些義大利拘留犯是軸心國的叛徒，他們因此得不到足夠的糧食，居住環境惡劣，經常遭到霸凌，工作時也受到騷擾。到了戰爭結束時，總共有四萬五千六百名義大利士兵在囚禁中死亡。<sup>186</sup>

德國在一九四二年出現了勞動短缺，缺口之大即使有外國人自願到德國工作或強迫戰俘勞動也無法填補。一九四二年春，德國政府開始強制德國占領區民眾到德國境內勞動。這項轉變出現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納粹黨圖林根大區長官招克爾被任命為勞動配置總監。在此之前，德國早已對波蘭人民實施強制勞動，到了一九四一年底也已有超過一百萬名

波蘭人在德國工作，絕大多數從事農業與礦業。<sup>187</sup>招克爾的職責是為不斷擴張的軍火產業尋找更多工人。東歐比西歐占領區更容易實施強制勞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國推動全面勞役，男性從十五歲到六十五歲，女性從十五歲到四十五歲，都必須強制勞動。少部分人是自願前往——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面帶微笑坐上開往德國火車的照片，被用來鼓勵民眾前往德國。然而幾乎沒有人響應，於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德國全面實施強制勞動並且派出正規部隊圍捕年輕的蘇聯男女。德國與地方人士合作，規定他們一定的工人配額，要求他們無論用什麼方法都要把符合額定數量的工人送往德國。第一年，有一百四十八萬人遭運往德國，其中三十萬人被遣送回來，因為這些人要不就是年紀太大或病得太重，要不就是懷有身孕。往後幾年圍捕行動持續進行，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已有兩百一十萬名蘇聯工人在德國工作，約略超過半數是女性。這些人全配戴臂章，臂章上繡著明顯的「O」，顯示他們是「東方工人」（Ostarbeiter）。<sup>188</sup>

德國想在西歐與南歐實施強制勞動較為困難，因為這兩個地區既有的國家尚未遭到征服與消滅。要徵召法國勞工必須先與維琪法國的貝當元帥政府協商。一九四二年六月，招克爾與法國總理拉瓦爾達成協議，法國同意提供十五萬人給德國工業。拉瓦爾仍希望德國獲勝，他同意授權法國勞動當局實施強制登記與配置，讓法國工人到德國工作兩年（法國將這項措施稱為「解救」）。<sup>[1]</sup>這項措施證明難以執行，於是維琪法國也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推行強制勞役，規定二十歲到五十歲的所有男性都必須在法國或德國為德國人服勞役。到了一九四四年，大約有四百萬名工人直接為德國占領軍工作，而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四項所謂的「招克爾行動」（「徵召」宣傳）也為德國本土增添了七十二萬八千名男女工人。<sup>189</sup>招克爾行動在荷蘭與比利時徵召了將近五十萬人。

當義大利向盟軍投降時，招克爾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前往羅馬，要求在德軍占領的義大利地區（大約義大利半島的三分之二）推動類似計畫。他的目標是徵召三百三十萬名義大利工人，但最終只徵召到微不足道的六萬六千人，此外他只能仰賴義大利的軍事拘留犯與十萬名原本就自願前去德國工作、卻因為義大利放棄戰爭而滯留在德國的義大利工人。<sup>190</sup>到了這個時候，法國與義大利民眾已經瞭解德國徵召勞工背後的意涵。兩國的年輕男女紛紛離家參與抵抗運動，或者尋找別的方式規避徵召。招克爾行動到了後期成效不彰，加上盟軍對德國本土的無情轟炸，使得德國開始改變政策。德國將徵召勞工的權力下放給占領區當局，即使徵召的人數再少，也要送到德國強制勞動。

不同類別的外國工人面對的工作條件也不同，但這些工作條件多半十分惡劣，最糟的狀況曾使得戰時的強制勞動者出現百分之十八的死亡率。<sup>191</sup>西歐工人的生活條件較佳，糧食配給與德國工人相同，這種狀況直到戰爭最後一年出現普遍的糧食短缺才有所改變。從各方面來看，西歐的工人不是奴工，甚至可以領取經常性的薪資。在扣除稅金與食物住宿成本之後，西歐工人平均週薪是三十二馬克，德國工人則是四十三馬克。西歐工人也享有同樣的疾病或意外的福利給付。西歐工人在使用各項設施與前往商店購物時必須遵守宵禁與各項管制規定，而且與德國工人一樣必須遵守嚴格的紀律與工作契約條款，如果持續違反，他們最終也會被送進集中營。

反觀東方工人的狀況則完全不同。東方工人一般都住在鄰近工作地點的簡陋營房，行動受到嚴格限制，在扣除粗劣飲食與住宿成本之後，他們每天十到十二小時的辛苦工作最多只能換得六馬克的週薪。雖然許多工人發現在德國的工作條件遠比在蘇聯來得好，紀律上的要求也差異不大，但東方工人起初的生產表現卻遠低於德國工人或西歐工人。一九

四二年針對外國工人的調查顯示，法國工人（這個時期絕大多數法國工人仍是自願前來德國工作）的生產力是德國工人的百分之八十五到八十八，俄國人是百分之六十八，波蘭人只有百分之五十五。<sup>192</sup>後來發現，改善糧食供給與提升薪資有助於提升生產表現。一九四二年，東方工人的週薪提升到平均九點八馬克，到了一九四三年，工人若能達到要求，每週就能拿到十四馬克。最成功的東方工人是女性，她們很快被大量配置，負責生產軍火與軍事設備。招克爾尤其喜歡徵召蘇聯女性，因為他認為蘇聯女性在工業勞動上展現出健康與活力。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對一群德國官員說道：「她們可以持續工作十個小時，就算是男人的工作她們也都能做。」一旦這些女性工人懷孕，那麼她們要不是被迫墮胎，就是把孩子放在日托中心，然後直接被帶回工廠上班。<sup>193</sup>到了一九四四年，蘇聯女性的生產力估計達到德國工人的百分之九十至一百，而蘇聯男性工人主要從事建設與挖礦，其生產力大約是德國工人的八成。

所有調查都顯示，要讓南歐工人有效工作非常困難，特別是希臘工人。南歐工人的生產力大約落在德國工人的三成到七成之間。如果是在建築工地工作的戰俘，那麼英國戰俘的表現是最差的，生產力還不到德國工人的一半。<sup>194</sup>許多外國工人透過怠工與違反紀律的方式來表達對強制勞動與苛刻對待外國人的不滿。儘管如此，德國依舊需要這些非德國勞工。為了從外國勞工身上榨取出更多勞動力，德國勞動陣線委託工作心理學研究所對五十萬名外國工人進行性向測驗，想瞭解他們是否被分配到最適合的工作崗位。這項計畫甚至擴大到集中營囚犯身上，這些囚犯被送進工廠工作，但身體虛弱的往往撐不到幾個星期就死去。<sup>195</sup>相較於德國工人，要讓外國工人遵守紀律其實反而容易，特別是絕大多數的女性工人。一九四四年，在科隆的福特工廠，德國工人平均每日缺



勤率在巔峰時高達百分之二十五，但外國工人平均只有百分之三。<sup>196</sup>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外國工人占了德國農村勞動力的百分之四十六，所有礦工的百分之三十四，所有工業工人的四分之一。<sup>197</sup>在軍備生產產業，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來自於外國工人，當初他們就是因為國家遭到德國侵略而不得不來德國工作，而現在他們仍被迫為德國生產軍事設備。<sup>198</sup>

一九四四年，外國工人的徵召數量逐漸減少，抵抗與規避徵召的行動愈來愈普遍，此時由集中營供給的工人數量也逐漸增加。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國集中營有十一萬五千名囚犯，但囚犯人數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已增加到五十二萬五千兩百八十六人，一九四五年一月更是增加到七十一萬四千兩百一十一人。到了這個階段，幾乎所有囚犯都是非德國人，其中包括了抵抗運動分子、政治異議人士、不聽管教的外國工人與猶太人，這裡的猶太人都是經歷流放與滅絕營大屠殺的倖存者。一九四二年春天，希姆萊的親衛隊設立了經濟與行政總部，試圖更充分地運用集中營與猶太流放者的勞動資源。被送到滅絕營的猶太人，大約有五分之一會被挑選出來強制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年輕男女。這些囚犯實際上成了奴工，要不是在親衛隊的企業裡工作，就是分批送到數百家德國企業裡做事，這些德國企業必須出錢向德國財政部購買這些工人：技術工人一天六馬克，無技術的男女工人一天四馬克。<sup>199</sup>到了戰爭結束時，德國各地分布著數千座集中營，裡面的勞工個個疲憊而憔悴，穿著破爛制服，經常遭受德國守衛毒打、霸凌或殺害，這樣的場景並不讓人感到陌生。雖然德國的目標是從這些不幸的囚犯身上盡可能榨取更多的勞動力，然而集中營裡卻處處充滿刻意的暴行，成了總體戰下一齣殘酷的諷刺劇。

如果勞動動員是一把梯子，那麼站在最底下那根橫木的受害者就是

猶太人。早在一九三八年，德國勞動機構就已經提出猶太人強制勞動的計畫。猶太男性被迫進行強制勞動登記，一九三九年夏天已有兩萬名猶太人在隔離的單位工作，地點主要是在德國的建設工地；到了一九四一年，五萬名猶太人被送進全國各地大小不一的集中營，其中一些小型集中營可能一次只收容幾名工人。這種模式也出現在波蘭占領區，大約有七十萬名猶太人被迫強制勞動，然而這些猶太人並非待在親衛隊管理的集中營裡。<sup>200</sup>此時的猶太人還不是囚犯，直到一九四一年，親衛隊從正規勞動機構手中接管了猶太人強制勞動計畫。這些隔離的猶太工作小隊被併入親衛隊的集中營系統中，連同從滅絕營中挑選出來的猶太人一起強制勞動，暫且逃過了死亡的命運。勞動短缺意謂著最晚到了一九四三年初，仍有約四十萬名猶太人在大日耳曼國與波蘭占領區強制勞動。猶太勞工的處境要比其他囚犯或強制勞動的工人來得艱苦嚴峻，然而德國面臨的經濟壓力意謂著德國不想讓這些猶太人一下子工作到死。猶太男女工人往往先遭受營養不良與疾病的折磨，最後在強制勞動下，硬是將僅剩的勞動力壓榨出來，這些被視為德國死敵的猶太人才得以斷氣。各種形式的強制與奴役勞動造成的確切死亡人數難以估計，但就親衛隊集中營的工人來說，他們在營中存活的時間往往不到一年。工人的死亡人數估計有兩百七十萬，其中有許多來自集中營，而且有非常高的比例是來自歐洲各地的猶太人。<sup>201</sup>如此高的死亡率，充分顯示總體戰非理性的局限，以及希特勒政權如何在種族優先性與戰時經濟必要性之間做出取捨。

蘇聯對囚犯勞動力的榨取也顯示出同樣的矛盾。蘇聯在全國各地設有五十九座古拉格集中營，此外還有六十九座地方集中營與強制勞動據點，這些營區早在戰爭爆發前十年就已經設立，用來進行長期的強制勞動。戰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囚犯在工業產業工作，其餘則在礦場與林場

工作，礦場與林場的工作條件對身體的傷害極大。集中營當局奉命盡可能榨取勞動力與盡可能減少「休息日」，然而戰時糧食缺乏，加上一天工作達到十六小時且醫療照顧欠缺，造成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囚犯病倒或無法繼續工作甚或死亡。<sup>202</sup>史達林會定期監督囚犯的生產績效，確保這些犯人並未規避勞動而影響戰爭投入。未能達到標準的囚犯，拿到的糧食會慢慢減少而陷入飢餓，至於績效超標的囚犯則能獲得休息時間與額外的配給做為獎賞。病得太重無法工作的囚犯會被汰除，由仍有工作能力的囚犯替補。一九四三年四月，政府頒布《懲罰德國法西斯主義惡棍、間諜、背叛祖國者及其幫凶的措施》，並且根據法令建立了特殊苦役營（katorga），囚犯必須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工作更長的時間，無論寒暑，全年無休。就像德國奴工營裡的猶太人，苦役營的囚犯實際上必須工作到死，必須為極度缺乏工人投入戰爭的蘇聯貢獻出僅剩的一點勞動力。從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一九四六年一月，蘇聯為總體戰榨取勞動力的各類監獄制度總共造成九十三萬兩千名囚犯死亡，充分證明了它的無效率。<sup>203</sup>

## 抗爭與生存

男性人力與女性人力面臨的工作條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每個國家的狀況也不盡相同。在美國與英國（不包括海外帝國），工人享有合理的戰時生活水準，薪資與儲蓄同時增加，隨著戰爭持續，生活條件也跟著改善。甚至工人若願意的話，還有權擔任工會代表。德國的勞動力（不包括囚犯與強制勞動的工人）吃得比較不好，無法獲得工會保障，當盟軍開始轟炸城市時，生活的條件也急遽惡化。蘇聯與日本的勞動力

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面臨著營養不良、長時間工作、上級嚴厲督導與生活水準急遽惡化的問題。在車里雅賓斯克，工人必須在暖氣不足的狀況下忍受嚴寒，而工廠的安全毫無保障，上級又不斷以懲罰要脅，甚至經常可以看到女孩在沒有穿上鞋子或靴子的狀況下工作，她們的腳因為寒冷與凍傷而起水泡與潰爛。

雖然存在如此迥異的經驗，但工人與消費者卻有一項經驗是相同的：他們必須忍受嚴苛的工作制度、漫長工時與持續不斷的短缺，這個過程不是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而是持續數年之久，而且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磨難何時才會結束。總體戰的動員讓一般民眾承受了無比的壓力，因為戰爭吸取了愈來愈多原本應該供應給民間經濟的資源。我們無法簡單解釋一般民眾如何忍受這段煎熬的過程，如果硬要提出一種說法來涵蓋各種不同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與經濟制度，那麼勢必會造成扭曲。對成千上萬的民眾來說，總體戰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愛國心或憎恨敵人也許可以讓工人堅持一段時間，但不足以讓他們長期忍受下去。對勝利的期盼或對失敗的擔憂顯然對民眾心理構成一定影響，不過德國人與日本人在面臨即將到來的軍事崩潰時，卻是頑固地繼續奮戰；至於英國與美國民眾在一九四四年勝利的曙光乍現之時，民心士氣反而陷入低迷。

需要先瞭解的是，絕大多數工人之所以能夠在戰爭中堅持下去，主要還是為了想賺取更多薪資，而不是受到宣傳操弄而認同這場戰爭。戰爭提供了完全就業、賺取額外薪資的機會（即使在蘇聯，能夠超越生產要求的工人也能得到額外的配給與其他特權）、儲蓄以供戰後花用的可能、學習新技術與提高薪資等級的前景，另外對女性工人來說，可以賺取比戰前更高的薪資並且讓自己取得獨立的地位。有一個例子也許可以說明工人是如何找理由讓自己堅持下去。一九四三年，一名瑞典商人訪問漢堡各個層級的碼頭工人，他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讓這群在政治上並不



支持希特勒政權的工人願意繼續為這個政府工作。受訪者一致表示，他們辛苦工作是為了讓德國勝利，因為他們不想回到經濟大恐慌的失業與艱苦。他們認為同盟國勝利可能會讓德國分裂（事實證明後來確實是如此），還會讓他們陷入貧困。而最重要的是，德國工人不想再被指控他們背叛了軍隊，「刀刺在背」。在戰爭的最後一年，英國政治宣傳試圖鼓動德國工人反抗獨裁政府，但從魯爾與萊茵蘭工業區流出的報告顯示，德國工人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重演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一份報告表示：「納粹德國不存在革命的環境，既沒有革命領袖，也沒有革命組織。」工人們等待德國戰敗，之後再重建新的德國。<sup>204</sup>

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戰時工人為什麼能堅持下去：後方民眾如果針對連年戰爭與長期承受的苦難發起抗爭，能為他們帶來什麼好處？所有交戰國政府最怕看到的應該就是後方民眾發起抗爭，但二戰時工人發起的抗爭數量，與工人實際經歷的社會與經濟待遇卻呈現負相關。美國與英國的工人待遇最好，但勞工抗爭卻還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哪怕工會早在開戰初期經達成協議，只要政府尊重工人利益，那麼工會就暫時停止罷工活動並與政府合作。在英國，未經授權的罷工活動造成平均每年一百八十萬工作日數的損失。一九四〇年，英國發生了九百四十次罷工，一九四四年增加到三千七百一十四次，不過九成的罷工持續不超過一個星期。有些罷工是為了瑣碎小事，例如「女領班的態度很跋扈」或「拒絕與愛爾蘭人一起工作」等，但這些也反映出罷工主要是為了狹義的工人利益，例如工作劃分、紀律、技能稀釋或薪資率，沒有人是為了反戰而發起罷工。<sup>205</sup>

在美國，工會嘗試遵守不發動罷工的承諾，但戰爭初期不斷升高的物價加上未能因應調整的薪資率，導致工人發起非官方的抗爭活動。美國在戰爭期間總共發生了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一「野貓」罷工，這些罷

工同樣很少持續超過一個星期，只有百分之六超過兩個星期。在美國，罷工也同樣關乎薪資與工作條件，而與戰爭無關，但美國政府的反應卻比英國來得強硬。<sup>206</sup>即使是在戰前，當負擔美國四分之一戰鬥機產量的加州北美航空工業公司工廠發生重大罷工事件時，美國政府馬上派出兩千五百名士兵進駐工廠，用槍口對著工人逼迫他們上工，這場罷工就此結束。至於戰時發生的罷工抗爭事件，往往被絕大多數美國民眾視為叛國。一九四三年，為了反制賓州無煙煤礦場發動大罷工，國會無視羅斯福的勸告，通過了《史密斯—康納利戰時勞資爭議法》（Smith-Connally War Labor Disputes Act），賦予政府控制與戰爭密切相關的公司以及對非官方罷工發起人提起刑事訴訟的權利。該法立即在同年十二月遭受考驗：一場非法的鐵路罷工事件促使聯邦政府接管整個鐵路網達三個星期之久，直到工會讓步並且接受國家提出的薪資方案為止。<sup>207</sup>即使是企業領袖也不能豁免。到了戰爭晚期，一名公司總裁拒絕接受工人加入已設有工會的工廠就自然成為工會成員的規定（這項規定在戰時使工會成員從一千萬增加到一千五百萬），結果美國司法部長親自率領一小隊穿著軍服的士兵將他趕出辦公室並且接管公司。

這類程度的工人抗爭事件不可能在專制體制內發生，無論是軸心國還是同盟國。在專制國家裡，罷工是非法的，而罷工對工業生產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人們會從政治角度而不是從維護工人利益的角度來詮釋抗爭，抗爭會被視為是對戰爭投入與政權的挑戰。在德國與蘇聯，屢次罷工最終會被送進集中營。儘管如此，日本、中國與蘇聯的惡劣勞動環境依舊很容易引發工人不滿，或迫使工人更換工作來逃避原有的環境與低薪。早在一九三九年之前，日本工會就已經受到限制，到了一九四〇年更是完全停止活動；工會原本在一九三九年有三十六萬五千名成員，到了一九四四年完全歸零。儘管如此，警方紀錄仍顯示一九四四年

出現了兩百一十六起工業抗爭，不過總數不超過六千人，只占勞動力的一小部分。有些工人因為沒有工會代表而進行怠工或粗製濫造，有時甚至進行破壞。<sup>208</sup>日本勞工受到嚴密監視，當局會觀察他們是否帶有同情共產黨的傾向，有嫌疑的人就會遭到逮捕與不當對待。安全部隊只要得到一丁點證據就會大肆渲染，對外宣傳共產黨的滲透已日趨嚴重，然而這些革命威脅完全出自他們的虛構。<sup>209</sup>在中國的國防產業中，工人受到軍法管轄與工廠的嚴苛管理，儘管如此，仍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冒險逃離工作崗位，成為一種間接抗議的方式。公司表示每年都需要補充半數的技術勞工，並且指責共產黨從中搗亂，引誘工人前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然而絕大多數工人離開只是為了尋找壓迫較少且可以領到較多錢糧的工作。逃跑的工人一旦被武裝警衛抓到，將被扣除部分薪資與配給的糧食以示懲罰。<sup>210</sup>在蘇聯，工人可以向派駐工廠的共產黨官員訴苦，然而這麼做依然有風險。工人必須在指定的工廠工作，不能自行更換，因此無故缺勤就成了一種間接抗議惡劣工作條件或嚴重不當對待的方式。照理說，這麼做的風險很大：根據一九四二年一月政府一份祕密決議顯示，國防產業的工人無故缺勤將在一日內通報軍事檢察官，而軍事檢察官將對缺勤員工處以最高五年到八年關押在勞動營的刑期。然而在實務上，這種做法完全行不通，最終絕大多數被定罪的逃亡工人都無法尋獲。有時候，當檢察官準備要起訴時，工人早已死亡或者已經入伍當兵；但有時候，檢察官也會反過來指責工廠管理不善，無法為工人提供適當的工作條件，因此將工人無罪釋放。<sup>211</sup>

德國工人的工作條件普遍優於蘇聯工人。德國工人與德國雇主都在德國勞動陣線設有代表，德國勞動陣線是希特勒掌權後於一九三三年設立的組織。雖然德國工人沒有權力罷工或抗爭，但他們可以請求勞動陣線官員督促雇主提供適當的工作設施或維持有效的防空避難場所。但除

此之外，德國的制度就與蘇聯一樣嚴苛。違反工作紀律（起初的定義十分狹義）的案子十分少見：一九四〇年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件，一九四一年則有兩千三百六十四件。一九四二年，官方對於違反工作紀律重新定義，針對更廣泛的行為進行懲罰，結果當年度違反工作紀律的案子大增到一萬四千件。有愈來愈高的比例與女性工人有關，因為女性必須同時肩負工作與家務，導致她們更容易缺勤與出現疏失。絕大多數違反工作紀律的工人會收到警告，少部分會被送進監獄，極少數人則是進了集中營。一九四一年五月，希姆萊設立新的懲罰機構「工作教育營」，只要工人被斷定行為對戰爭投入構成嚴重威脅，就會被送進該地。工作教育營由蓋世太保管理，一九四四年已有超過一百座營區，關押的不只是德國工人，還包括數千名被指控破壞生產設施或怠工的外國強制勞動者。

「工作教育」只是好聽的說法，實際上這裡的環境極其惡劣，囚犯飽受虐待，整體的狀況與集中營沒什麼兩樣。<sup>212</sup>外國工人由於工作條件普遍較差，因此有時確實會冒險發動罷工。一九四二年四月，埃森克虜伯（Krupp）廠區有六百名義大利工人為抗議糧食不足與缺乏菸草而發動罷工；同月，漢諾威的義大利工人也因為葡萄酒與起司供給不足而罷工。這些工人被派駐工廠維持秩序的工作警察壓制。從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八月，平均每月都有兩萬一千五百名工人被捕，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外國工人。抗爭的義大利工人被視為滋事分子而被遣返回義大利，然後由義大利的法西斯警察予以逮捕。在德國工人方面，違反工作紀律的行為從一九四二年之後開始減少。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參與抗爭的德國工人只有一萬兩千九百四十五名，反觀外國工人則多達十九萬三千零二十四名。證據顯示，德國工人有愈來愈支持戰爭投入的趨勢，但這項共識應該不是光憑當局的高壓手段就能達成。<sup>213</sup>

每個交戰國的工人發起的抗爭，規模都十分有限，充分顯示國家有



充足的力量讓全國民眾一致支持總體動員的戰略。儘管高壓手段無所不在，就連民主國家也不例外，然而光憑高壓手段不可能贏得所有民眾的支持。國家有充足的能力大規模動員民眾，不僅能確保糧食的固定供給，對於勞動力的必要需求也能做出有彈性的回應，而且能盡可能針對各個階層進行廣泛徵召。國家的成功使得二戰期間從未發生像一戰時期與一戰之後的革命騷亂，只有義大利是唯一的例外。墨索里尼於一九四三年七月遭到推翻，在此之前的幾個月，即將面臨的戰敗、轟炸、通貨膨脹與糧食短缺已導致義大利社會陷入動盪。大規模動員建立在國家與民眾的共同信念上，這也構成了現代戰爭的總體性格。無論在前線還是後方，全民動員進行總體戰的信念從未受到嚴重質疑。不願順從或不瞭解總體戰意義的人，會飽受各種政治宣傳的攻擊，這些宣傳不僅激勵每個人為戰爭貢獻一己之力，也將反對者貼上不愛國甚或叛國的標籤並將其孤立，就像蘇聯的工人與管理人員被指控怠忽職守與漫不經心，或是一萬八千名美國人被同胞向聯邦調查局舉報犯下破壞生產的罪行。<sup>214</sup>

無論在哪個國家，要組織總體戰都需要全民參與，但總體戰要能夠運行，也要人民發自內心地認同總體戰的意義才行。一九四五年，美國評論家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對於這場剛結束戰爭所顯示的人民與國家關係提出總結：「正因在這場戰爭中，現實的個人最為無力，他的統治者才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不僅要讓國家成為實現人民目標的工具，也要讓國家成為人民性格的延伸。」<sup>215</sup>麥克唐納其實可以在這項反思中另外添入「她的」二字。因為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年輕人或老年人、自由人或不自由人，總體戰要求所有人都必須為了共同目標全力付出，投入戰爭與工作。這個時刻史無前例，在此之前難以出現，在此之後也幾乎沒有出現的可能。



一九四一年，列寧格勒的年輕蘇聯女性排成一列前去參加民兵部隊，準備對抗入侵的德國法西斯敵人。圖源：*SPUTNIK/Alamy*

- 
- [1] 譯注：法國希望藉由提供工人給德國，讓德國同意釋放法國戰俘，因此將這項行動稱為「解救」。

CHAPTER 5

第五章

軍事作戰的技藝

「希特勒派了二十五個裝甲師穿越俄國邊界，他們接下來發生的事，將成為未來蘇聯偉大戰爭故事的核心。德國裝甲師是希特勒的劍刃，是步兵與砲兵的開路機器。裝甲師勝利，德國人就勝利，裝甲師失敗，德國人就失敗。」

—— 克爾（Walter Kerr），《俄羅斯陸軍》（*The Russian Army*），一九四四年<sup>1</sup>

克爾的判斷簡潔而吸引人，彷彿「擊敗德國裝甲師」就足以解釋德國與歐洲軸心國為什麼打輸第二次世界大戰。克爾是《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派駐莫斯科的代表，他在二戰期間都待在蘇聯。克爾訪談了紅軍將領，記錄他們的戰爭經驗，並在史達林格勒會戰後返回美國。克爾對德國裝甲部隊的觀點，很大一部分仰賴傳聞與臆測。「二十五個裝甲師」是莫斯科相當流行的誇張說法，就像當時人認為德國在巴巴羅薩作戰中總共出動一萬八千輛戰車，同樣也是一種渲染之詞。儘管這些資訊是錯的，但裝甲師是現代地面戰爭的核心卻不一定是錯誤的說法，只是論點還不夠完整。在二戰時期的所有創新發明中，結合戰車、摩托化步兵與砲兵的完整機械化部隊，是決定陸戰成敗的最重要元素，幾乎所有交戰國都爭相仿效。紅軍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經組織了四十三個戰車軍，此時終於輪到他們執行德軍在一九四一年進行的作戰。

克爾的觀察隱含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同盟國為什麼最終能在戰場上贏得勝利？一開始節節勝利的軸心國，為什麼最後反而輸掉這場戰爭？答案取決於雙方學習發展與運用作戰組織、裝備、戰術與情報等「戰力加成」（*force multipliers*）的程度。戰力加成可以大大增強陸海空三軍的打擊能力，特別是在戰爭一開始處於劣勢的時候。如果戰鬥



艦、步兵、砲兵、甚至騎兵等較為傳統的單位仍持續出現在絕大多數海戰與陸戰（其重要性確實不可低估），那麼通常決定其戰場表現的因素就是戰力加成。最常被強調的發展，就是機械化戰爭，以及伴隨而來的空對地戰術支援。裝甲部隊的組織編組及作戰序列的整合，改變了陸地作戰的方式——先是德國陸軍率先採用，然後盟軍也隨之跟進。戰術空軍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廣泛使用，但高速單翼機、地面攻擊機與高性能中型轟炸機的出現，再搭配或裝載致命武器，進一步提升了戰機在戰場上能發揮的空間。空權興起也促成了海上的兩棲作戰革命。這場革命先是出現在太平洋戰場（日軍先推進而後盟軍反攻），接著也出現在歐洲戰場（盟軍在北非、西西里島、義大利與諾曼第進行兩棲登陸）。這種複雜的聯合作戰需要陸海空三軍通力合作，才有辦法將軍隊送上敵軍嚴密防守的海岸，建立持久固守的據點。對於掌握海權的同盟國來說，唯有發動兩棲作戰才能成功登陸占領區與敵軍作戰。要成功進行兩棲作戰，盟軍就必須學習如何把軍力從海上投射到陸地上。

除了裝甲部隊、空戰與海戰的發展，我們也不可忽略電子作戰的演進與應用。無線電與雷達的出現，成了現代戰爭不可或缺且地位日趨重要的存在。現代無線電科技可以集中掌控所有空軍單位，全球海戰也需要靠無線電通信來指揮。無線電還可以讓戰場指揮官更有效地管理瞬息萬變的複雜戰場態勢，更不用說對小部隊來說是宛如命脈般的存在，因為小部隊需要無線電來尋求支援或協調現地作戰行動。無線電波的研究促成雷達的研發，雷達最初引進是針對從海上逼近的敵軍進行預警，但很快就更進一步運用在各個戰場。雷達能對戰術攻擊機進行預警，對於反潛戰爭的成功做出巨大貢獻；雷達也能為海上艦隊提供預警，或讓陸上砲兵及海上艦砲精確打擊目標。二戰期間，隨著盟軍學會生產與運用科技戰中最尖端的技術，盟軍因此得以在電子作戰上取得決定性優勢。

無線電也是戰時情報與反情報作戰的核心，包括發展複雜的欺敵作戰，而這也是本章討論的最後一種「戰力加成」。情報作戰的領域很廣，有些有助於提高戰力，有些重點則與戰力無關。作戰情報與戰術情報最能有效提升武裝部隊的作戰效率。二戰期間，盟軍大部分時間都能比敵軍享有更充分的情報與更有效的敵我評估，只不過我們很難判斷這類情報對實際作戰產生的效果有多大。同樣地，儘管欺敵作戰獲得廣泛運用，但往往效果不彰。話雖如此，欺敵作戰一旦成功，還是能夠對整場戰役帶來關鍵影響。蘇聯軍隊就是善於欺敵的大師：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天王星作戰造成軸心國軍隊慘敗，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國中央集團軍遭到殲滅，都是蘇聯欺敵作戰成功所致。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前進行的欺敵作戰，其成效令人懷疑，但確實鞏固了希特勒原先的想法，認為諾曼第只是佯攻，加萊才是盟軍主要的登陸地點。對盟軍來說，健全的情報與成功的欺敵皆有助於抵銷敵軍高超的戰鬥技巧，特別是眼前的敵軍決心固守新帝國的每一寸土地。情報作戰與欺敵作戰因此就跟裝甲作戰、空中作戰、兩棲作戰及電子作戰一樣，充分說明二戰的最終勝負完全取決於軍隊能否學會這些作戰技藝。

## 裝甲作戰與空中作戰

當德軍於一九三九年入侵波蘭時，世人親眼見證了一場軍事組織革命：德軍派遣六個裝甲師打頭陣，還有俯衝轟炸機、轟炸機與戰鬥機從旁協助，擔負起空中攻城錘的角色。但德軍成功入侵波蘭一事，也產生許多誇大不實的說法。在這場人稱「閃擊戰」的戰役中，戰車被視為致勝關鍵，此後「閃擊戰」一詞便在西方廣為流傳（儘管德軍自己從未使

用這個詞彙）。戰車贏得了近乎傳奇的名聲，同樣獲得世人注意的還有容克斯Ju-87俯衝轟炸機——當它朝著目標俯衝時會響起一陣宛如「耶利哥號角聲」般令人恐懼的尖嘯。如克爾所描述，在一般人心中，德國戰車部隊是「鋼鐵與火焰」的大軍，「在納粹號令下」掀起戰爭。<sup>2</sup>

戰車其實不是新武器，也非德軍所獨有。波蘭戰役的發起可以追溯到一九二〇年代德國陸軍對一戰晚期作戰失利所做的評估，當時協約國發動「百日攻勢」，以戰車與飛機做為矛頭，一路撕開德軍的西部前線。在《凡爾賽條約》限制下，德國陸軍無法發展或擁有戰車，這種狀況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才得以解除。除了德國之外，各國在戰間期都開始大力發展戰車，不過絕大多數都屬於輕型戰車或迷你戰車，上面只配備一挺機槍，例如日本的九四式輕型戰車就是一九三〇年代生產數量最多的戰車。<sup>3</sup>中型戰車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才出現，通常配備中等的三十七公釐主砲與一挺機槍。一九四〇年，法國陸軍率先推出第一輛重型戰車B1，配備了七十五公釐與四十七公釐主砲，以及兩挺機槍。二戰爆發之後，戰車與自走砲的火砲才陸續升級成七十五公釐或更粗的砲管。<sup>4</sup>早期戰車絕大多數用來支援步兵作戰或進行偵察任務，當時對戰車是否能獨立擔負攻勢任務的看法不一。英美認為戰車是從傳統騎兵部隊演變出來的兵種，因此傾向於將戰車當成傳統騎兵來使用，也就是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戰車都被打散分配到各個步兵師之中，負責提供額外的機動火力與保護步兵的側翼。蘇聯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曾一度把戰車當成裝甲鐵拳，用來打穿敵軍防線並且包圍敵軍，這種觀念是受到當時蘇聯參謀總長圖哈契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的影響。然而圖哈契夫斯基在一九三七年遭到官方整肅，直到二戰爆發前幾年，這一作戰觀念才獲得德國陸軍採用。

做為前線武器，戰車有優點也有缺點。與大多數火砲相比，戰車更

具機動性，可以穿越大範圍的障礙物與崎嶇地形，可以用來對抗敵軍火炮、機槍陣地或小型要塞。此外，雖然這種情況比較少見，但戰車也可以用來對付敵軍戰車。輕型戰車配備機槍，可以用來對付敵軍步兵，如對華戰爭時的日本戰車。儘管如此，戰車本身其實是一種脆弱的武器。戰車一般移動速度緩慢，二戰時期的重型戰車尤其如此。德國六號戰車「虎式」重達五十五噸，最高時速僅約三十公里，而且移動距離有限，非常需要定期維修，因此實戰中這類戰車無法像原本設想的那樣用來突破敵軍防線與擴大戰果。<sup>5</sup>戰車很容易出現機械故障，因此在戰車後方必須緊跟著維修營，否則一旦出現機械故障或小損害就可能被迫放棄整輛戰車。雖然戰車的裝甲在二戰時逐漸增加，但即使是最重型戰車也無法抵禦針對履帶、車身側面與後方進行攻擊的砲火。戰車乘員的作戰環境極度惡劣，好比輕型戰車幾乎擠不下所有人，乘員因此必須在狹小空間裡執行任務。即使是稍微寬敞一點的中型與重型戰車，乘員也動輒多達四五人，要在令人產生幽閉恐懼症的車內進行有效射擊、裝彈與無線電通信，依然對戰車兵構成嚴峻挑戰。能見度受限，引擎的巨大聲響掩蓋了外部敵軍或友軍的砲火聲，車內瀰漫著煙霧，使原本已相當炎熱的車內更加難熬，更不用說戰車隨時都有被擊中的可能。一旦車內起火或金屬碎片射進車內，狹窄的出口將令乘員難以逃生。「我們滿臉都是血，」一名蘇聯戰車車長提到自身經驗時寫道：「.....小小的鋼鐵碎片嵌進我們的臉頰與額頭。什麼都聽不見，車內瀰漫著有毒的砲彈煙霧，我們忙得精疲力盡.....。」<sup>6</sup>

更重要的是，戰車容易受到各種反戰車武器的攻擊。當戰車發出轟隆巨響，無情地朝著士兵駛來時，士兵們雖然感到恐懼，但他們還是有各種方式可以癱瘓敵軍戰車，包括使用重型火炮、戰車、戰防砲、手榴彈、火箭彈發射器、吸附雷或反戰車步槍。當戰車性能在戰爭時期陸續



升級時，反戰車武器與彈藥也同樣獲得提升。各國陸軍紛紛組織小型的「戰車獵人」步兵部隊，這種單位會巡迴戰場尋找落單或癱瘓的戰車，再使用近戰武器來摧毀戰車。例如日軍使用的「刺突爆雷」會將炸藥固定在木棍前端，由士兵手持木棍接近戰車，然後朝戰車伸出木棍，用炸藥炸毀戰車——然而這種做法通常連那名士兵也會跟著喪命，因此被美軍稱之為「白癡木棍」。德國也有所謂的「雙重炸藥包」，士兵必須冒險將炸藥包扔到敵方戰車的砲管上，幾分鐘後引爆炸藥，就能讓敵方戰車失去作戰能力。<sup>7</sup>絕大多數配置到前線進行戰鬥的戰車不是損壞就是遭到摧毀。就連以重裝甲著名的虎式與虎王戰車也是如此：總計生產了一千八百三十五輛，卻有一千五百八十輛遭到擊毀。<sup>8</sup>蘇聯T—34戰車在戰場上的預期壽命不超過二到三天，蘇聯生產了八萬六千輛這型號的戰車，其中有八萬三千五百輛損毀。換言之，除非能做到迅速修復車輛，否則要維持機械化戰爭是不可能的。<sup>9</sup>裝甲革命反而促成其勁敵反裝甲武器的演進，反裝甲能力因此變得與裝甲武器同等重要，正如為了對抗敵方的戰術空軍而必須在規模與有效性上大幅提升防空火力一樣。裝甲師普遍具有兩種能力：機動攻勢作戰的能力，以及機動防衛敵方裝甲與空軍的能力。裝甲師能否存戰場中倖存，就有賴這兩種能力的結合。

然而，光憑戰車本身很難有效發揮戰力。在戰場上，戰車如果跑在步兵前面，很可能陷入孤立，最後遭到反戰車武器擊毀。戰車與飛機一樣，無法占領領土。裝甲部隊在作戰時能取得成功，主要仰賴聯合兵種作戰的發展。戰車是裝甲部隊的核心，但必須與摩托化步兵、摩托牽引砲或自走砲、戰防砲、野戰防空砲、機動工兵營與維修部隊緊密合作。唯有透過聯合兵種作戰，而非只靠戰車本身，才能讓裝甲編隊發揮強大的打擊力。聯合兵種作戰是裝甲部隊致勝的關鍵，這種作戰很大程度仰

賴於機械化與機動性。為了成功，所有支援裝甲作戰的兵種都必須使用卡車、野戰車輛、裝甲運兵車與拖車，讓所有兵種一同前進，而不是尾隨在戰車後面。

德國的盟邦日本與義大利就是因為無法做到聯合兵種作戰，因而無法發揮裝甲單位的完整戰力。日義兩國都認知到聯合兵種組織的重要性，但兩國都因為缺乏相應的工業資源（尤其是石油）而無法讓軍隊大規模摩托化與機械化。一九三四年，日本成立第一支裝甲部隊「獨立混成第一旅團」，該旅團下轄一個戰車營、一個摩托化步兵營、一個工兵與砲兵連、一個機動偵察部隊。但日本野戰軍無法接受獨立部隊的理念，在中日戰爭開打後不久就解散了第一旅團。第一旅團解散後，原有的輕型戰車打散分配到各個步兵師團擔任支援任務。一九四二年，有鑑於德國裝甲作戰的成功，日本終於成立三個聯合兵種戰車師團，之後成立的第四個戰車師團負責防守日本本土。這些戰車師團很難部署於太平洋島嶼戰爭，這可以解釋日本為什麼沒有把戰車擺在戰爭生產的優先順位上。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只生產了九百二十五輛戰車，一九四五年更只有兩百五十六輛。日本只是逐一地將戰車師團投入支援步兵。一九四四年，一個戰車師團在菲律賓遭到殲滅；一九四五年八月，另一個戰車師團在滿洲投降，至於第三個戰車師團在華南地區行進一千三百公里之後，由於沒有適當的替補與維修，最終也面臨崩潰的命運。<sup>10</sup>

義大利於一九三六年組建了第一支聯合兵種機械化部隊「摩托化機械旅」（Brigata motomeccanizzata），該旅下轄一個戰車營、兩個步兵營與一個砲兵營。摩托化機械旅後來升級成裝甲師，而且加入更多支援兵種。但就像日本一樣，義大利在整個二戰期間只組建了三個裝甲師，而且只被當成步兵軍級單位下的一支部隊來使用。根據義大利的陸軍準則，「作戰的決定性要素」是步兵，而不是作戰車輛。<sup>11</sup>義大利裝甲部

隊起初是由飛雅特3000B輕型戰車組成，這種戰車配備了效果不佳的三十七公釐主砲，此外還有CV—33與CV—35這兩種配備無砲塔機槍的迷你戰車，這種戰車對機動裝甲作戰可說是毫無價值。一九四〇年，義大利生產了M11 / 39中型戰車，但不久就因為裝甲防護不足而停止生產；之後於一九四一年生產的M13 / 40戰車配備了改良的四十七公釐高速砲，但裝甲厚度依然不超過三十公釐，可見義大利無法生產出符合現代裝甲作戰條件的戰車。二戰期間，義大利總共也只生產出一千八百六十二輛戰車。義大利的三個裝甲師，有兩個在艾拉敏會戰遭到消滅——當會戰接近尾聲時，這兩個裝甲師已經打到連一輛戰車都不剩。無論是日本還是義大利，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發展出成熟的裝甲作戰準則。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少數幾次機動作戰中，日軍戰車直接衝向美軍戰線，形同裝甲部隊版的萬歲衝鋒，結果一下子就被美軍的反戰車武器殲滅。

德國從一九一九年後就被剝奪建立現代陸軍的權利，但也是在德國，機械化與摩托化部隊的作戰優勢首次獲得充分發揮。一九一九年戰敗之後，德國陸軍認為與「決定性會戰」失之交臂是德國在一戰的敗因，因此開始思索如何提高軍隊的速度與打擊力，使其能成功進行一場決定性會戰。德國在一九三二年進行陸軍演習時，利用模型車輛證明了機動作戰的潛力。在摩托化部隊督察官魯茲少將（Oswald Lutz）與年輕的古德林少校激勵下，往後三年，德國開始組織裝甲師，首批三個裝甲師於一九三五年成立。成立裝甲師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車不會被支援兵種有限的機動性拖累，因此得將摩托車、步兵、砲兵、偵察單位、工兵與通信單位全都摩托化，讓裝甲師擁有獨立的戰鬥力。<sup>12</sup>一些陸軍高層希望將機械化與摩托化單位盡可能部署到整個德國陸軍之中，不過德國陸軍最終沒有採取這項意見，而是決定讓戰車成為具備強大打擊力的裝甲核心。古德林於一九三七年寫道：「集中運用裝甲部隊，要比分散到

各個部隊更為有效。」<sup>13</sup>無論如何，當時德國引擎工業的規模也只能生產數量有限的車輛，加上必須加速重整軍備，德國確實無法做到陸軍全面摩托化。德國武裝部隊實際上是用了兩支陸軍開啟了二戰：一支是具備機動性的現代陸軍，另一支是移動緩慢的步兵，仍然仰賴馬匹與鐵路來進行運送。當希特勒的裝甲師一路打進蘇聯時，他們身後跟著一支動用了大約七十五萬匹馬的陸軍（包括馬夫、糧秣車與獸醫）。一九四二年，由於車輛不夠，德國又在歐洲占領區徵用了四十萬匹馬來拖運火炮與重武器。<sup>14</sup>

德國入侵波蘭使用了六個裝甲師，一九四〇年五月入侵西歐使用了十個裝甲師，這些裝甲師是步兵揮出的裝甲鐵拳。這兩場戰役的勝利讓世界各國注意到德國機動作戰帶來的激烈衝擊，也讓各國開始競相效仿。但這兩場戰役其實也凸顯出裝甲部隊快速發展的問題，以及補給裝備時遭遇的困難。在德國入侵法國與低地國使用的兩千五百七十四輛戰車中，五百二十三輛是一號戰車，上面只配備了機槍；九百五十五輛是二號戰車，配備了火力不佳的二十公釐主砲；三百三十四輛從捷克擄獲的戰車；只有六百二十七輛是擁有較大口徑主砲的三號戰車與四號戰車，然而這兩種戰車的主砲都無法輕易擊毀或癱瘓敵軍較為重型的戰車。伴隨裝甲師協同進攻的步兵與工兵，許多都是搭乘卡車，而非裝甲運兵車。法國陸軍擁有三千兩百五十四輛戰車，許多屬於較為重型的戰車而且配備較好的武器。<sup>15</sup>儘管德軍的裝甲部隊在數量與品質上都不如法軍，但德軍還是獲得勝利，部分是因為擁有空中支援，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法國陸軍把絕大多數戰車打散到步兵師裡，而非集中運用裝甲兵力，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德國裝甲師運用了機動支援兵種，擁有良好通信，可以擔負起占領土地與消滅敵方車輛的任務。法國戰役中有一場戰車對決戰車的戰鬥，發生在比利時小鎮讓布魯（Gembloux）。在這場



戰鬥中，德軍戰車車長發現，法軍戰車的行動因缺乏無線電而極為笨拙，只能分散成幾個小隊而無法大規模出擊，開砲緩慢且不精確。法國輕型戰車在這方面的問題更嚴重，因為輕型戰車的砲塔只有單人操作，車長既要負責射擊，又要負責指揮戰車前進。<sup>16</sup>這場戰鬥充分顯示聯合兵種準則的優勢與單純仰賴戰車所造成的限制。

一九四一年，為了入侵蘇聯，德國陸軍一方面增加裝甲師的數量，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降低個別裝甲師的戰力。德軍將裝甲師擴增到二十一個，組織成四個主要的裝甲兵團，結果每個裝甲師只配備了一百五十輛戰車，而非入侵波蘭時的三百二十八輛。德軍動員了三千兩百六十六輛戰車，其中一千一百四十六輛是三號與四號戰車，其餘則是戰力相對不足的捷克戰車與二號戰車。巴巴羅薩作戰開始幾個月後，紅軍戰鬥序列完全崩潰，令德國裝甲部隊大為振奮。戰事開打六個月後，蘇聯原本可用的兩萬八千輛戰車與自走砲中，損失達到了驚人的兩萬零五百輛，但德軍損失也持續增加。<sup>17</sup>一九四一年八月，德國戰車戰力已經減少一半；到了十一月，德軍投入戰場的五十萬輛各式車輛中，只剩七萬五千輛還能正常運作。在戰爭的最後幾年，德國機械化部隊的損失直線上升，巨大的損失與後方生產狀況不佳，嚴重限制了德國裝甲部隊的戰力。一九四三年，德國生產的各式戰車只有五千九百九十三輛，同年蘇聯與美國總共生產了五萬三千五百八十六輛。一九四三年七月庫斯克會戰開打時，德軍平均每個機械化師僅擁有七十三輛戰車，已經遠遠不如入侵時期擁有的數量。德軍在庫斯克的第九軍團甚至需要五萬匹馬才能正常推進，第四裝甲軍團則需要兩萬五千匹馬。<sup>18</sup>

隨著軍力平衡開始朝同盟國傾斜，德國不得不對戰車使用準則進行修正。一九四三年中之後，德國裝甲部隊從一個用來突破敵軍戰線、擴大戰果並進行包圍的兵種，開始轉變成進行守勢作戰的兵種。即使在守

勢作戰中，裝甲部隊也可以發動攻擊。在東線戰場，德軍將機械化部隊集中組成「裝甲戰鬥群」（Panzerkampfgruppen），由戰車、機械化步兵與牽引式火炮組成，專門部署在關鍵的危險地區，而且仍維持獨立的聯合兵種作戰模式。這些裝甲戰鬥群的重點此時已經轉變成消滅逼近的敵軍裝甲部隊，主要使用戰車、反戰車步兵部隊與反戰車武器，包括自走砲與配備具有穿甲能力七十五公釐主砲的突擊砲（二戰結束時突擊砲已經成為德國陸軍數量最多的裝甲戰鬥車輛）。<sup>19</sup>此外，擁有高射速七十五公釐主砲的新型五號戰車「豹式」，以及配備了八十八公釐主砲、可以擊毀所有戰車的六號戰車「虎式」，這兩種戰車都曾參與德國在東線的最後一場戰略攻勢庫斯克會戰。此後這兩種戰車便被重新部署成為執行有限之戰術反擊任務的機動預備隊，有時甚至會完全放棄機動作戰，成為固守陣地的防衛用火砲。也就是說，原本用來發動攻勢裝甲作戰的部隊，到了戰爭最後兩年卻變成了防衛反戰車作戰專業，這樣的改變確實頗為諷刺。一九四三年，德國陸軍組織了反戰車防線，根據預測的敵軍前進路線，將戰防砲部署在藏匿的防禦點，以伏擊敵軍的裝甲部隊。這種做法其實是仿效過去蘇聯的「反戰車口袋」戰術——紅軍會引誘德軍裝甲部隊進入一個周圍被自然障礙與地雷包圍的地區，再集中火力攻擊這個地區。同年，德軍推出兩種新型的反戰車武器，分別是別稱「戰車殺手」的八十八公釐反戰車火箭彈發射器，以及僅能單次射擊的反戰車武器「鐵拳」（儘管如此，鐵拳發射的彈頭可以穿透超過一百四十公釐的裝甲）。這兩種手持的輕型武器可以由受過訓練的士兵使用，能夠癱瘓各種類型的中型與重型戰車。德國生產了超過八百萬支「鐵拳」，讓撤退的德軍能以此來有效遲滯敵軍重裝甲部隊的推進，此舉完全反轉了德軍開戰之初採行的作戰策略。<sup>20</sup>

相較之下，盟軍在一九四〇年法國戰役慘敗與德軍入侵蘇聯之後，

開始密切注意德軍的做法，重新思考自身的裝甲準則與組織。英國與美國的裝甲部隊必須從零開始進行發展與組織；蘇聯戰車部隊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幾近全滅，迫使蘇聯必須深刻改變裝甲部隊的部署方式。英國與美國都享有一項優勢，那就是兩國在戰間期是所有交戰國中陸軍摩托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而且都擁有大型的引擎工業，車輛的庫存也足以讓陸軍全面現代化。美國與英國使用卡車與裝甲運兵車運送步兵，幾乎不用馬匹。不過，英美的裝甲部隊源自於他們的騎兵傳統，這種傳統使英美傾向於建立全戰車裝甲部隊而非聯合兵種——也就是把戰車當成馬匹一樣，建立清一色的戰車部隊來追擊敵軍或打穿敵軍戰線。

英國在一九二〇年代曾經嘗試過聯合兵種，但之後又改成沒有步兵或砲兵的全裝甲部隊。英國於一九三一年建立戰車旅，這是一支全戰車部隊，後來成為機動師的核心（機動師很快改名為英國裝甲師）。<sup>21</sup>一九三九年，英國決定將戰車部隊一分為二：一個是戰車旅，使用裝甲較厚的中重型戰車如「瑪蒂達」（Matilda）、「邱吉爾」與「瓦倫丁」

（Valentine）做為步兵支援武器，依附於步兵師之下；另一個是裝甲師，使用速度較快的「巡航」（Cruiser）戰車代替騎兵扮演傳統的機動角色。步兵戰車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升級更大口徑的主砲以對抗敵軍的裝甲部隊，但仍然依附在步兵師之下擔任支援任務。英國第一裝甲師在法國遭到消滅之後，英國又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秋天組建了七個裝甲師。由於這些裝甲師在缺乏其他兵種支援下顯得十分脆弱，因此英國終於在一九四二年決定重組裝甲師，一方面減少戰車數量，另一方面則增加摩托化步兵與強化反戰車與防空能力。一九四三年，第六裝甲師成立，這支裝甲師主要由曾經服役北非的南非部隊組成，擁有一個戰車旅、一個摩托化步兵旅、三個砲兵團、一個戰防砲團與一個防空砲團，最後還有一個二十五磅自走砲團，火力相當於一個標準德軍裝甲師。<sup>22</sup>

儘管如此，與德國和蘇聯對裝甲部隊的投入相比，英國的裝甲師仍遠遠不足，而一般也認為英國的戰車品質有待加強。到了戰爭結束時，英國只有五個裝甲師與八個陸軍戰車旅，每支部隊都極度仰賴美國的M4「雪曼」戰車，這是一九四二年後美國大量租借給英國的武器。<sup>23</sup>英國的戰爭投入多半集中在空軍與海軍。

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美國幾乎沒有任何裝甲部隊。與英國一樣，美國也在一九三九年建立第一支裝甲部隊第七騎兵旅，而做法只是將馬匹換成了一百一十二輛小型裝甲車做為偵察之用。一九四〇年七月，在評估德國在波蘭與法國的戰果之後，美國成立了首批共兩個裝甲師，但這兩個裝甲師完全由戰車組成。一九四一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演習中，清楚顯示只憑藉大量戰車很容易被反戰車武器消滅。美國於是迅速對這些裝甲師進行改進，加入聯合兵種以取得平衡，例如步兵、砲兵、反戰車武器、偵察營、工兵與勤務部隊。裝甲師完全摩托化與機械化，每支裝甲師有三百七十五輛戰車與七百五十九輛輪型或履帶裝甲車，目的與德國裝甲師一樣，都是為了打穿敵軍戰線。美國裝甲部隊第一位指揮官霞飛將軍（Adna Chaffee）制定的野戰手冊上寫著，「裝甲師的角色是仰賴具有強大火力與機動性的獨立部隊進行高度機動作戰，特別是攻勢作戰.....。」<sup>24</sup>然而，美國最初在突尼西亞的戰役遭遇了各項問題，因此不得不做出重大變革。原本計畫建立六十一個裝甲師改為十六個，裝甲師的角色也改為在重裝甲步兵突破敵方戰線後，由裝甲師追擊與擴大戰果。這項準則後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下旬的諾曼第突破包圍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國並未建立更多的裝甲師，而是組織了七十個戰車營，讓每個步兵師都擁有一個戰車營，如此一來所有美軍地面部隊都變成了裝甲部隊。相較於德國與蘇聯都發展了重型戰車，美國卻不急著發展，因為美



軍認為重型戰車速度過於緩慢，而機動性才是致勝的關鍵。M4雪曼中型戰車與衍生出來的各式型號，最初目的是用來支援步兵與進行追擊，但雪曼戰車也適合從事各項任務，例如在太平洋戰爭中對抗無數的日軍掩體與碉堡。雖然雪曼戰車在實戰中不是德國豹式與虎式戰車的對手，但雪曼戰車堅固耐用，有相當高的妥善率。雪曼戰車的生產數量也完全輾壓敵軍。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德軍在西線有五百輛豹式戰車，但盟軍卻有五千輛M4雪曼戰車。<sup>25</sup>美軍機動部隊也研發了各種反戰車武器，包括手持的「巴祖卡」（Bazooka）火箭彈發射器，裡面裝填了反戰車彈藥。M1巴祖卡（巴祖卡這個名字源自於一種喜劇樂器，因為外表類似而得名）在火炬作戰中首次登場，之後又出現改良版本M9A1，使用威力更強大的彈頭，並且在兩年後廣泛使用。美國總共生產超過四十七萬六千支巴祖卡火箭筒給裝甲師與步兵師使用。戰車、反戰車自走砲、戰防砲、巴祖卡與反戰車飛機的合作運用，足以挫敗敵軍的裝甲作戰，其中最著名的戰例就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在法國莫爾坦擊敗德軍的反攻。<sup>26</sup>

裝甲能力最重大的轉變發生在蘇聯。在漫長的蘇德戰線上，部署了最多的德國裝甲部隊，但也正是在這條戰線上，德國裝甲部隊最終遭到擊潰。一九四一年，蘇聯裝甲部隊的失敗暴露出眾多缺失。在德國入侵前夕，蘇聯擁有大量戰車，但有很高比例並未做好作戰準備，在全部的一萬四千兩百輛戰車中，只有三千八百輛能上戰場，而且絕大多數並不是著名的T—34，而是較小較輕型的戰車，完全無法與德軍的裝甲部隊及砲兵對抗。<sup>27</sup>一九四一年六月，駐烏克蘭機械化軍指揮官莫古諾夫少將（Rodion Morgunov）在報告裡（在烏克蘭，德軍裝甲師以五百八十六輛戰車面對蘇軍的三千四百二十七輛戰車，並且摧毀了其中的三千一百二十七輛）感嘆，蘇軍無法集中機械化部隊，情報與通信能力低落，

沒有無線電、零件與燃料，也沒有清楚的戰術計畫。<sup>28</sup>一九四二年春天之後，蘇聯對裝甲部隊進行重整，放棄一九四〇年建立的準則，不再將機械化部隊分散到各個步兵軍團。調整後的基本作戰部隊是戰車軍，裝備了一百六十八輛戰車、戰防砲與防空砲、一個卡秋莎多管火箭砲營。兩個戰車軍加上一個步兵師即組成一個戰車步兵軍團，火力相當於一個德國裝甲師。起初，紅軍由於缺乏有經驗的指揮官而表現不佳，但隨著愈來愈多戰車步兵軍團成立，裝甲部隊也開始集中運用，紅軍逐漸學會德軍的作戰方式。一九四二年九月之後，戰車軍團獲得聯合兵種機械化軍的補充，這些機械化軍裝備了兩百二十四輛戰車，擁有高比例的步兵及大量戰防砲與防空砲的支援。隨著軍事資源供給逐漸充裕，戰車軍團與機械化軍也持續升級。<sup>29</sup>一九四三年，蘇聯戰車軍的戰車數量從一百六十八輛增加到一百九十五輛，一九四四年，戰車軍開始獲得升級後的T—34 / 85中型戰車與IS—1與IS—2重型戰車，後兩種戰車分別擁有一百公釐與一百二十二公釐主砲，是當時最先進的戰車。

蘇聯總共建立了四十三個戰車軍與二十二個機械化軍，使紅軍擁有各交戰國規模最龐大與最集中的裝甲部隊。新戰車軍團用來突破敵軍較弱的戰線，然後追擊與包圍敵軍，這種做法與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德軍完全一樣。原本使用汽油引擎的蘇聯戰車，在改用柴油引擎之後，最大作戰範圍達到原來的三倍，大大提高了機動性；無線電的使用，也使指揮與通信出現革命性的變化。雖然蘇軍仍存在訓練有限與技術缺陷的問題，但戰術部署的改善顯然影響了德蘇雙方的損失比。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蘇聯裝甲部隊每損失六輛車輛才能換得德軍損失一輛；到了一九四四年損失比已達到一比一，這主要歸功於蘇聯發展出較為有效的戰防砲，如七十六公釐的Zis—3與威力強大的一百公釐BS—3。持續生產與有效的維修體系意謂著到了一九四四年底，紅軍已經擁

有超過一萬四千輛戰車與自走砲，而德軍只有四千八百輛。盟軍在西線有六千輛戰車，而德軍只有一千輛。紅軍與盟軍充分記取了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的教訓。

※ ※ ※

空軍在對地支援機種的發展上，也出現了類似裝甲部隊發展的現象。原本在一九三九年時，德國空軍無論在準則與設備上均享有領先地位。與陸軍裝甲部隊一樣，德國空軍也是在戰爭爆發前幾年才成立，然而德國飛行員所說的「作戰空戰」（operational air war）其實是吸取了一戰經驗與教訓而來。一九二〇年代，德國國防部成立四十個以上的空戰研究小組，幾乎所有小組都致力研究如何在戰線上贏得且保持空優以支援地面攻勢。<sup>30</sup>一九三六年的手冊《空戰指導》定義空軍本質上屬於攻勢行為，與陸軍和海軍聯合作戰以擊敗敵軍武裝部隊。飛機首先用來消滅敵方空軍及其組織，而後在主要戰場建立空優；一旦獲得空優，空軍就能支援地面攻勢。首先是間接支援，空軍要對距離前線兩百公里內的敵方補給、通信與預備部隊進行阻絕以孤立戰場，之後則使用中型轟炸機與地面攻擊機直接支援地面部隊。<sup>31</sup>這是戰術空軍的經典陳述。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新飛機設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容克斯Ju—87俯衝轟炸機、亨克爾He—111轟炸機、道尼爾Do—17轟炸機、容克斯Ju—88中型轟炸機、梅塞施密特Bf—109戰鬥機與Bf—110戰鬥機，這些都是「作戰空戰」觀念下的產物。直到戰爭結束，這一觀念都是德國戰術空軍的核心。然而在戰爭末期，儘管這些飛機持續升級，絕大多數都已落後於盟軍的空軍技術。空軍的組織方式反映了作戰的優先順序。在每個主要的陸軍集團軍後面，都有一個由各種航空兵種組成

的機隊，如偵察機、戰鬥機、俯衝轟炸機、轟炸機與運輸機，這些飛機都用來支援地面攻勢，而且都受到獨立指揮與中央管制，具有高機動性。到了一九三九年，德軍在空對空與空對地之間都已建立了有效的無線電通信網。

戰爭期間，德國空軍支援前線作戰的組織基本上沒什麼變化。入侵法國時，德國空軍明顯發揮極大效果，超過兩千七百架戰機集中壓制盟軍空軍，攻擊盟軍後方補給、增援與各項勤務，而且直接支援戰場，攻擊敵軍部隊與砲兵。地面部隊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呼叫到空中支援，這完全要歸功於德國地面部隊與空軍的緊密聯繫。反觀駐法國的英國皇家空軍，在陸軍尋求支援時往往需要三個小時才能做出回應。俯衝轟炸機的空襲對敵軍造成巨大的心理衝擊，儘管轟炸還無法做到非常精確。一名法軍中尉在德軍渡過繆斯河時遭遇德國飛機轟炸，他日後寫道：「所有人一動也不動，沒有人發出聲音，大家的背都弓起來，全身蜷縮在一起，嘴巴張開，避免耳膜被震破。」<sup>32</sup> 入侵蘇聯時，德國出動了兩千七百七十架飛機，幾乎沒有比入侵法國時增加多少，這是因為德國的飛機產量難以擴張的緣故。不過這些飛機依然產生了巨大效果，在幾個星期之內就消滅了蘇聯空軍，直接支援德國裝甲部隊發動大規模攻勢，長驅直入蘇聯領土。德國空軍使用炸彈、機槍與機砲空襲機場、通信中心、部隊集中結區與戰場要地。德國飛行員奉命攻擊緊鄰德軍進攻部隊的蘇聯裝甲部隊，他們都已受過訓練，有能力在空中區別出德蘇裝甲部隊的不同。一名Bf—110飛行員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的攻擊成果愈來愈豐碩，可以從大量起火燃燒的車輛及戰場上散落各處的癱瘓或被遺棄戰車看出。」<sup>33</sup> 德國空軍的集中，就跟德國裝甲部隊的集中一樣，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其打擊能力。直到史達林格勒會戰為止，面對組織鬆散、訓練不足的蘇聯空軍，德國空軍始終能維持前線空優。但就在史達林格勒



會戰之後，兩國空軍軍力的平衡開始出現輸贏互見的局面。

德國戰術空軍成功的祕訣，很多時候其實是一種常識性的後見之明。其他交戰國的空軍都無法在戰爭爆發前發展出有效的戰術空軍準則，這是由於兩個彼此衝突的壓力導致。第一種壓力來自於陸軍，陸軍希望空軍能對地面部隊提供密接支援，在部隊上方維持防衛的「空傘」。每當陸軍提出各項要求時，空軍總是得將飛機打散分配給各集團軍，並且聽從各集團軍的指示。第二種壓力剛好相反，一些空軍將領希望發展獨立的空軍戰略，利用飛機的彈性與飛行距離進行遠離戰場的作戰，甚至直接攻擊敵軍後方。一九三〇年代陸軍對空軍的看法，反映出飛機做為戰爭工具的一項明顯缺點。一九三五年，美國陸軍准將恩比克（Stanley Embick）總結飛機的「內在限制」：

飛機無法永久占領或控制陸地或海洋，飛機除非處於飛行狀態，否則一無是處，而且必須仰賴地面與海上部隊提供保護。飛機很脆弱，無法抵禦最小型的火箭彈，無法在惡劣天氣下飛行，而且造價昂貴。<sup>34</sup>

與戰車一樣，飛機也面對愈來愈強大的防空砲威脅，這些防空砲除了能打下飛機，也能迫使飛機遠離重要的攻擊目標。恩比克有充分的理由補充說，當前的科技使得飛機難以精確擊中目標，除非是降低飛行高度。有人認為飛機在二戰時期扮演著「戰車剋星」的角色，這種說法其實過於誇大。因為除非發展出更先進的地面攻擊武器與彈藥，否則一般來說要從空中攻擊地面微小的目標是極為困難的。

在日本、義大利、法國、蘇聯與美國，飛機被陸軍視為輔助性武器，最適合在陸軍控制下對地面部隊進行密接支援，而這些國家的空軍組織方式也反映了這種優先順序。唯有在英國，空軍才得以發展出自己

的戰略觀，而不是以投入地面作戰做為首要之務。英國皇家空軍在一九一八年成立，是第一個獨立的空中軍種。英國皇家空軍也長期與陸海軍抗爭，以維持自身的自主性。英國皇家空軍的首要目標，是針對未來敵軍的轟炸攻勢建立空防，並且發展空中打擊武力以向敵軍後方進行轟炸。這兩項目標充分顯示空權觀念與陸權觀念的差異，而且也符合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英國的地緣政治立場：在經歷一戰的慘重人命傷亡後，英國希望避免敵軍入侵，同時不希望再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地面衝突。這種重視空防與戰略轟炸的想法，顯然不同於「作戰空戰」觀念，後者主要出現在德國的作戰計畫中。至少在戰爭初期，「作戰空戰」的觀念證明是成功的。

一九四〇年，英國與法國空軍在法國戰役的失敗，凸顯出兩國空軍與德國空軍的差異。兩國空軍都未準備好把攻擊敵方空軍當成首要目標，也未做好支援組織，確保戰場空優。一九三七年，法國空軍部頒布的《主要空軍部隊戰術運用指示》堅持「參與地面作戰是空軍**最基本的任務**」。<sup>35</sup>陸軍希望空軍與個別的軍團與集團軍緊密合作，而且期望空軍把偵察敵軍砲兵與從空中保護地面部隊視為首要之務。結果就是一九四〇年的法國空軍完全失去彈性且兵力嚴重分散，加上法軍通信方式相當原始，更讓局勢惡化。<sup>36</sup>英國從未針對陸空聯合作戰做過任何準備。一九三八年，英國皇家空軍計畫主任斯萊塞（John Slessor）與陸軍中校奈伊（Archibald Nye）擬定了臨時手冊《野戰的空軍運用》，希望由陸軍建立一支擁有戰鬥機、轟炸機，以及與陸軍聯合作戰的空軍部隊，並且統一聽令於地面部隊指揮官。但斯萊塞與奈伊提議的提案卻遭到空軍部否決，因為空軍部認為這等於在幫陸軍大開方便之門，讓陸軍擁有一支獨立於空軍部之外的陸軍航空軍。戰爭爆發後，陸軍部與帝國陸軍參謀總長持續施壓，希望建立戰爭大臣貝里夏（Leslie Hore-Belisha）所說

的「由陸軍控制的空中單位」，空軍參謀總長依然堅決反對任何顛覆英國皇家空軍獨立性的嘗試。<sup>37</sup>

最後，陸軍只能接受前進空中打擊部隊提供的老舊輕型轟炸機，然而這些老舊飛機不久便遭到德國空軍重創。一支戰鬥機與偵察機小隊也奉命協助陸軍，不過這支小隊並非聽命於陸軍，而是聽從空軍參謀總長、轟炸機司令部與戰鬥機司令部指揮。陸軍與空軍並未建立聯合司令部，導致陸空軍種之間通信不良，陸軍與空軍也未嘗試進行統合反擊作戰。與法國空軍一樣，英國皇家空軍在面對德軍進攻時只能採取守勢，在面對敵軍戰鬥機與無數野戰防空砲時也沒有適當的裝備因應（盟軍甚至連防空砲也缺乏）。英國皇家空軍對於參與地面作戰完全抱持負面看法。斯萊塞就認為，「飛機不是地面戰場的武器」，他的說法獲得第一線空軍將領支持。斯萊塞表示，攻擊敵軍機場是「不經濟的支出」，因為敵方可以輕易藏匿或轉移空軍兵力。<sup>38</sup>一九四〇年五月中，英國皇家空軍奉命轟炸德國的工業城市，以間接削減德軍在法國的戰力。英國在運用戰術空軍上的負面經驗，反過來強化空軍將領的信念，認為未來最有效運用空軍兵力的方式，就是在敵軍後方進行「戰略轟炸」。

儘管到了一九四五年時，英國皇家空軍已具備全面的戰術能力，但英國皇家空軍其實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摸索，才從堅守戰略空軍的立場發展出新的戰術空軍能力。法國戰役失敗後，英國陸軍在巴薩洛繆中將（William Bartholomew）主持下成立委員會，檢討這起戰役何以失敗與如何改進。陸軍責怪英國皇家空軍未能為陸軍提供空傘，保護他們不受敵軍空軍攻擊，雙方會在往後三年為了控制戰場上的空軍資源而持續激辯。<sup>39</sup>英國皇家空軍的戰術能力最終是在環境驅使下被迫產生。由於當時英國地面部隊唯一能與軸心國交戰的地方是在北非，但在北非英國皇家空軍不可能遠程攻擊敵軍後方。英國皇家空軍中東司令部因此只能專

注進行「作戰空戰」，否則英軍駐中東總司令魏菲爾將軍很可能會直接掌控英國在中東的所有飛機——魏菲爾始終希望陸軍能直接控制空軍，以阻止敵軍對大英帝國部隊發動奇襲。駐防中東的英國皇家空軍從最初的隆莫爾空軍少將（Arthur Longmore）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後的泰德空軍中將，兩人開始發展出非常類似德國「作戰空戰」的模式。他們堅持只有空軍將領才能控制與指揮空中資源，而且試圖像德國那樣集中空軍兵力。德國因為這種做法而獲得成功，但要仿效德國的模式十分困難，因為陸軍將領不斷要求空軍掩護，將空中資源浪費在防衛巡邏或攻擊防守嚴密的地面目標，導致機隊損失持續擴大。泰德希望空軍與陸軍司令部的地點能夠盡量靠近，如此比較能協調作戰策略，但在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的戰鬥，兩軍司令部有時相隔超過一百三十公里遠。<sup>40</sup>戰爭前幾年，英國皇家空軍只能雜亂地取得由英國與美國製造的各式飛機，沒有專用的對地攻擊機隊，也沒有有效的中型轟炸機。英國皇家空軍最終能從這些雜亂無章的飛機中建立起「作戰空戰」的模式，可說是這場戰爭中的一項傑出成就。

一九四一年九月，泰德任命紐西蘭人亞瑟·康寧漢空軍少將擔任西部沙漠空軍司令，這是英國戰術空軍成功成立的關鍵。亞瑟·康寧漢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屢次拒絕陸軍空中密接支援的要求。艾拉敏會戰勝利之後，亞瑟·康寧漢在一本談陸空合作的小冊子上表示，空軍必須集中運用才能發揮效果，而且必須在空軍直接指揮與控制之下。亞瑟·康寧漢還寫道：「陸軍不能期盼或希望直接指揮空軍」——邱吉爾其實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就已經達成這項結論，當時他發了一封措詞嚴厲的電報給魏菲爾，要他停止主張成立陸軍航空軍。邱吉爾寫道：「地面部隊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要仰賴飛機來抵禦空中攻擊。」這在當時英國是相當罕見的政治直接介入作戰準則的情況。<sup>41</sup>陸軍與空軍的爭端解決之



後，兩軍種的聯合作戰才有了成功的契機。

亞瑟·康寧漢與泰德進一步發展原本由德國空軍擘畫的三階段作戰戰略：首先取得空優，其次孤立戰場，最後直接支援地面戰爭。最後一個階段必須清楚標記出「轟炸線」以避免誤擊友軍，誤擊這個問題在一九四二年夏天之前一直嚴重困擾著空中密接支援任務。英國也決定將空軍與陸軍司令部設在相鄰的位置，而且使用新的無線電設備、機動雷達與空中支援管制部隊系統。該系統會跟隨陸軍進入戰場，陸軍呼叫空中支援的時間因此得以從平均二到三小時縮短為三十分鐘。<sup>42</sup>英國皇家空軍現在裝備了颶風戰鬥機，該機配備了火力強大的機砲，可以密接支援打擊敵方戰車，這是英國首次生產出能有效執行空對地任務的攻擊機，此外還有向美國租借的戰鬥轟炸機P—40D，後改名為「小鷹」

（Kittyhawk）。一九四二年夏末，當隆美爾準備攻打埃及時，大英帝國空軍已經完全掌握了制空權。英國皇家空軍對敵軍造成的損害，剛好呼應了兩年前德國空軍在法國的輝煌戰果。那年八月，隆美爾對阿蘭哈法發動攻勢，卻遭到英國戰術空軍阻止。兩個月後，當蒙哥馬利反攻艾拉敏時，英國皇家空軍也同樣完全掌握制空權。隆美爾日後說道，任何部隊若被迫與擁有空優的敵人作戰，「感覺就像蠻族碰上了現代歐洲軍隊。」<sup>43</sup>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英美遠征軍發起火炬作戰，在西北非進行登陸作戰。當初在西非沙漠會戰好不容易學到的教訓，此時又要痛苦地再學習一遍。無論是英國皇家空軍的東方空軍部隊，還是杜立德空軍少將指揮的美國第十二航空軍，都對戰術空軍如何在埃及與利比亞獲得勝利一無所知。儘管邱吉爾在十月曾經再度干預，堅持陸軍與空軍必須採取「利比亞模式」，但這些人依然充耳不聞。<sup>44</sup>盟軍最初在突尼西亞與德國和義大利空軍的交手情況，簡直就是把先前在西部沙漠已經逐步改正

的錯誤又再犯了一遍：英美空軍司令部之間幾乎毫無通信，因為他們各自分派到的任務是對各自地面部隊進行密接支援。遠征軍總司令艾森豪堅持陸軍有權直接指揮空軍單位，英美並未嘗試針對敵方空軍進行協調作戰，英美的地面部隊指揮官也都堅持戰鬥機必須巡邏前線提供空傘。作戰中沒有專用的地面攻擊機，美國戰鬥機飛行員也沒有地面掃射的經驗，最初飛機上也沒有掛載外部彈架進行阻絕作戰。盟軍只取得五座全天候機場，當豪雨季節來臨時，空軍的機動性便受到嚴重限制。盟軍損失慘重，陸軍將領抱怨軍隊經驗不足：首次面對槍林彈雨的士兵普遍出現心理創傷，因此將領要求不計一切代價進行空中密接支援。<sup>45</sup>種種失敗顯示，英美兩國空軍在遠離非洲戰場的現實下，完全未從「利比亞模式」學到任何教訓。

美軍在二戰的主流意見認為，戰術空軍必須在陸軍指揮下依照陸軍要求對地面部隊實施密接支援。陸軍將領普遍反對航空軍希望取得獨立地位的主張，但一九四一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大規模陸空聯合演習顯示，陸軍顯然完全不瞭解飛行部隊的運作方式。陸軍航空軍戰術學校做成的結論與德國空軍相同，認為應該採取三階段式作戰空戰，但陸軍認為密接支援才是飛行部隊的首要任務，拒絕妥協。一九四二年四月出版的第一本戰時野戰手冊提到戰術空軍的任務時，堅持「地面部隊指揮官……有權決定所需的空中支援」。艾森豪司令部在火炬作戰前夕發布了「飛行部隊作戰單位直接支援地面部隊」的訓令，明白表示飛行部隊必須接受地面部隊指揮。<sup>46</sup>英國陸軍司令安德森中將同樣也帶著英國陸軍對空軍的偏見，他反對空軍獨立作戰，因此支持美軍的看法，認為空軍應該由地面部隊指揮。幾個星期之後，西北非的盟軍戰術空軍陷入一場災難。杜立德雖然是第十二航空軍的指揮官，卻只被賦予諮詢的權限，他於是要求盟軍「放棄我們當前糟糕透頂的組織」並正確運用飛行部

隊。<sup>47</sup>艾森豪很快就發現自己誤解了戰術空軍的性質，於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英美卡薩布蘭加會議上，對於整個組織進行徹底檢討，才有了採納西部沙漠戰術經驗的決定。指揮體系的集中是第一步。泰德被任命為地中海空軍總司令，美國空軍將領史巴茲擔任西北非空軍司令，亞瑟．康寧漢擔任英美聯合戰術空軍司令。他們立即停止提供陸軍「空傘」，推翻陸軍指揮官要求空軍支援的權利，接著對軸心國空軍採取攻勢戰術空戰。

一九四三年二月，同盟國空軍與陸軍高層在的黎波里這座利比亞港都召開高峰會。蒙哥馬利在會議中表示，空軍必須成為獨立兵種以建構空軍所想的空優，會議最後決定採用「利比亞模式」。幾個月後，美軍出版了新版野戰手冊《航空軍的指揮與運用》，手冊一開頭即用大寫字母寫著：「陸軍與航空軍彼此平等……陸軍與航空軍並非彼此的輔助單位。」手冊也提到亞瑟．康寧漢的三階段作戰觀念，這是美國航空軍軍官返回華府後協助制定的版本。<sup>48</sup>雖然在日後的戰役中，陸軍與航空軍互不信任的現象仍未化解，但北非戰役造成的組織與準則變革，卻主導了戰術空軍的運用直到戰爭結束為止。改良的通信、情報與設備，包括美國的P—51野馬戰鬥機（在改裝後稱為A—36阿帕契地面攻擊機）與英國皇家空軍可以發射火箭的霍克颱風（Hawker Typhoon）戰鬥轟炸機，這些都增強了英美戰術空軍的打擊能力。一九四四年六月，為了支援入侵法國而動員的美國第九航空軍與英國第二戰術航空軍，已經與當初競逐火炬作戰而彼此爭執的英美空中部隊大不相同。在解釋同盟國何以獲得勝利時，除了關鍵的機械化部隊，同盟國的戰術空軍也同樣扮演著關鍵角色。相較之下，德國的戰術空軍最後卻走向崩潰。為了因應盟軍的轟炸攻勢，德國空軍被迫撥出三分之二的戰鬥機與絕大多數防空砲來進行防禦。由於缺乏各種類型的戰鬥機與燃料，德國空軍不得不派出

訓練不足的飛行員應戰。<sup>49</sup>希特勒的作戰部長約德爾一級上將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被訊問時表示：「能否在整個戰場贏得完整空優，最終決定了戰爭成敗。」<sup>50</sup>

若將一九四四年底的蘇聯戰術空軍也算入西方的戰術空軍，那麼盟軍與德國空軍數量的差異將會更加懸殊。雖然德國軍事高層在戰時與戰後都極力貶抑蘇聯空軍的重要性，但面對德國空軍初期的勝利，蘇聯空軍進行的變革之大，一點也不遜色於英美空中部隊所做出的巨大改進。與機械化部隊一樣，蘇聯的空軍準則與組織也深受一九三〇年代晚期軍事改革的影響：空軍單位必須依附在陸軍軍團之下接受指揮。蘇聯的作戰準則強調空軍必須直接支援地面部隊，兩者構成聯合的陸空攻勢力量。不同於德國的「作戰空戰」或西方的「利比亞模式」，蘇聯空軍認為取得空優與密接支援地面部隊這兩者在準則上並沒有明顯區別，因為光是轟炸遙遠的機場與補給並不能打贏戰爭，想要獲勝就得在戰場上消滅敵軍的戰鬥機與轟炸機。在蘇聯於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戰鬥機作戰規定》中，將戰鬥機視為戰鬥中獲得空優的主要工具。<sup>51</sup>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曾經試圖攻擊德軍後方，然而速度緩慢的轟炸機在無人護航下遭德國戰鬥機無情擊落，使得蘇聯陸軍決定放棄遠程轟炸，將空軍的用途限制在戰場上進行戰術作戰。整個戰爭期間，蘇聯持續強調空軍的戰場密接支援角色。蘇聯的作戰準則也認為，對於緊鄰前線的區域進行有限的阻絕打擊也是一種地面支援作戰。到了戰爭晚期，蘇聯飛行員可以執行所謂的「自由獵人」（okhotniki）戰術，對於新發現的地面目標進行攻擊，條件是距離前線不能超過二十四公里。<sup>52</sup>與其他交戰國不同，蘇聯戰術空軍只局限於支援地面部隊。諷刺的是，當德國空軍兵力逐漸萎縮，而地面戰鬥愈來愈艱困與漫長時，德國空軍開始放棄過去的「作戰空戰」模式，轉而強調對陸軍進行密接支援。也就是說，蘇聯空軍並



未仿效德國空軍，反倒是德國空軍開始模仿蘇聯空軍。

一九四一年夏天，蘇聯空軍的表現極為糟糕，幾乎所有調往西部軍區的飛機都遭到摧毀。這促使蘇聯開始在不變動作戰準則的前提下，改革空軍提供戰場支援的方式。一九四二年春天，年輕的空軍將領亞歷山大．諾維科夫（Aleksandr Novikov）因擔任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防空任務表現傑出而被任命為空軍總司令，他立即著手改變蘇聯空軍的組織方式。亞歷山大．諾維科夫廢除了附屬於個別軍團與師的「陸軍航空兵」與「部隊航空兵」，也反對空軍必須聽從陸軍指揮。他另外成立了「航空軍」，由戰鬥機、轟炸機與地面攻擊機組成，類似德國空軍的航空軍團。十七個航空軍統一由空軍將領指揮，空軍將領會在司令部裡與陸軍集團軍司令一同會商如何支援地面部隊。航空軍首次採取集中方式進行作戰。為了在攻勢的關鍵點增加航空軍集中程度，蘇聯大本營組織了戰鬥機、轟炸機與地面攻擊機預備隊，以便需要時可以用上。與裝甲部隊一樣，航空軍具有高度機動性，多達四千輛車輛可以讓航空軍快速移動到前進空軍基地或迅速撤退。亞歷山大．諾維科夫與參謀還進行了其他改革來增加航空軍的作戰效率：通信與情報蒐集全面使用無線電與雷達、維修擺在最優先的位置、實施有效的偽裝與欺敵以避免發生一九四一年飛機幾乎完全遭到殲滅的慘事。最重要的是裝備改進。新型的Yak—3與La—5戰鬥機或戰鬥轟炸機已經可以趕上德軍最新型的Me—109與Fw—190戰鬥機，而且可以在改裝後掛載炸彈與火箭。蘇聯的Il—2攻擊機被德國士兵稱為「黑色死神」，是二戰生產最多的地面攻擊機，可以配備火箭、炸彈（特別是德國士兵畏懼的破片殺傷炸彈）或榴彈發射器。一九四三年，Il—2攻擊機又加裝了一門三十七公釐機砲，可以用來摧毀戰車。Il—2攻擊機生產的數量十分龐大，幾乎全數投入前線戰場，該機種除了能摧毀德軍裝甲部隊，還可以轟炸地面人員，德軍士氣因此

大受影響。

蘇聯空軍花費大量時間進行重整，以建立新的通信網與生產新型號的飛機。蘇聯空軍原本的訓練時數太少，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蘇聯飛行員可能只接受幾個小時的飛行訓練就必須上戰場，結果造成居高不下陣亡率。過於著重戰場飛行也導致蘇聯空軍在作戰時必須直接面對德軍防空砲火與步兵的地面火力，使飛行員身陷險境。蘇聯飛行員也開始學習運用無線電通信。蘇聯在戰爭期間一共興建了八千五百四十五座機場，數量十分驚人，但其中五千五百三十一座只有簡易的泥土跑道，飛機連降落都很危險。儘管如此，在史達林格勒與庫斯克會戰中，德國空軍與蘇聯空軍的實力已經開始拉近。一九四三年中期之後，蘇聯對德軍發動一連串攻勢作戰，蘇聯空軍的戰術也在這個過程中臻於成熟。蘇聯地面攻擊機支援蘇聯裝甲部隊突破德軍戰線，為前進的地面部隊開路，蘇聯戰鬥機則持續進行攻勢巡邏，讓德軍戰鬥機無法靠近。到了一九四五年，隨著德軍數量減少與作戰能力降低，蘇聯開始嘗試在德軍前線後方進行大規模阻絕作戰，但這項作戰依然被視為是對戰場的直接支援。在這個階段，蘇聯紅軍在前線已擁有一萬五千五百架飛機，是德軍的十倍。雖然日後針對蘇聯空軍與裝甲部隊的研究顯示蘇軍相對缺乏效率，但蘇聯空軍與裝甲部隊依然是盟軍勝利不可或缺的一環，正如四年前德國仰賴空軍與裝甲部隊獲勝一樣。

## 兩棲作戰的興起

一九四三年，英國海軍上將基斯勳爵（Lord Roger Keyes）在劍橋大學里斯—諾斯講座（Lees-Knowles lectures）演講時提到，「要發動與

維持一場兩棲作戰，必須掌握戰場的制海權，除了動用空軍，還要仰賴海軍的作戰能力。作戰範圍不僅是在水面與水下，還包括天上。」<sup>53</sup>如果二戰時陸戰與空戰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那麼海戰與空戰也是如此。與一戰不同，兩棲作戰在二戰取得了成功，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更是盟軍最終贏得戰爭的關鍵。

兩棲作戰是一種混合作戰，需要陸海空三軍聯合發起攻擊，並且維持與擴大占領區直到敵軍遭到擊敗為止。兩棲作戰不同於一般常見的登陸或登岸，後者多半未經抵抗。兩棲作戰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從海上打到陸上。在戰間期，絕大多數國家的海軍與陸軍都不願從事兩棲作戰，部分是因為兵種成見使他們不願進行跨兵種合作，另一部分是因為當時普遍認為飛機等現代武器的發展，已使攻下防守嚴密的海岸線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協約國在土耳其加里波里戰役的慘敗，充分顯示兩棲作戰的困難，同時也成為戰間期批評者反對兩棲作戰的負面教材。唯有隔著太平洋彼此對峙的日本與美國認真看待兩棲作戰，他們認為未來美日兩國要是發生戰爭，那麼從戰略與作戰層面來說，兩棲作戰勢屬必要。地理決定了美日兩國需要在西太平洋島鏈建立海外基地，而要攻擊與奪取這些海外基地，唯一的方式就是兩棲作戰。

美國早在一戰之前就已開始思考與日本發生衝突的可能，當時還曾擬定了「橘色戰爭計畫」。但直到一九一九年日本接管德屬島嶼（馬紹爾群島、馬里亞納群島與加羅林群島）做為國際聯盟託管地之後，美國才嚴正看待未來與日本開戰時可能要進行的兩棲作戰。一九二〇年代，日本違反國聯規定，開始祕密建造海軍設施與機場，這是往後二戰日本建立廣大太平洋國防圈的雛形。面對日本在西太平洋採取的新戰略態勢，美國海軍也著手建立因應。一九二二年，美國對橘色計畫進行修

正，其中貢獻最大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軍官埃利斯中校（Earl Ellis）的一篇論文，〈密克羅尼西亞前進基地作戰〉，這篇論文為美軍的兩棲作戰準則奠定基礎。埃利斯瞭解從海上發動攻擊與陸戰或傳統海戰有著根本差異。他對於未來對灘岸守軍發動進攻的描述，清楚預言了二十年後太平洋中部的衝突：首先需要大批訓練有素的海軍陸戰隊，還要從水雷與障礙物中清出一條通道讓登陸艇接近海岸。接著海軍必須從側翼提供火力支援，壓制敵軍砲火；海軍航空隊要支援地面部隊，砲兵營與通信營必須上岸協助海軍陸戰隊建立灘頭堡。然後必須標記與管制灘頭，加速艦隊讓人員與補給順利上岸的速度，好最大化第一波打擊力道。埃利斯在結論中表示，兩棲作戰的「成敗完全繫於灘頭」。<sup>54</sup>雖然一九二〇與一九三〇年代海軍與陸軍都對兩棲作戰興趣缺缺，但海軍陸戰隊部分人士仍接受了埃利斯的看法，於一九三四年出版了第一本《登陸作戰暫定手冊》。這本手冊成為海軍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艦隊訓練一六七：登陸作戰準則》的核心，而這項準則也在部分增補後主導了整個太平洋戰爭。只可惜埃利斯本人未能活著看到自己的想法實現。埃利斯有酒精成癮的問題，他在一九二三年前往日本控制的加羅林群島進行間諜任務時，因為不明的原因死亡。<sup>55</sup>

日本兩棲作戰能力的發展與美國非常類似。一八九〇年代，日本開始著手建立海外帝國，無論目標是亞洲大陸還是太平洋島嶼，日本陸海軍都必須學習從海上投射軍力來擊敗任何潛在敵人。一九一八年，日本陸海軍共同撰寫的手冊《兵力運用綱要》提到可能要以兩棲作戰入侵美屬菲律賓，一九二三年的版本又增列關島美軍基地為入侵目標。日本陸軍在仔細研究一戰的加里波里戰役後認為，不能只仰賴海軍來進行兩棲作戰。一九二一年，日本陸軍開始進行攻擊灘岸守軍的訓練，並於一九二四年出版第一本相關陸軍手冊《上陸作戰摘要》。一九三二年，陸海



軍共同擬定最終版本的《上陸作戰綱要》。日軍準則強調迅速的艦岸運動，海空軍提供支援保護登陸，使用專門登陸艇將部隊與補給從運輸艦運往灘頭，盡可能利用夜間使守軍難以辨識，使用發光漆浮標來指引登陸艇。但是陸軍與海軍都認為只需要部署相對較少的部隊。海軍成立了特別陸戰隊，兵力大約一個營（接近一千名官兵），用來進攻防衛較薄弱的太平洋基地；陸軍則希望登陸的兵力能達到師團以上的等級，然而一旦分散進行登陸，兵力也會變得十分有限。<sup>56</sup>

日本陸軍很早就看出兩棲作戰的關鍵，在於需要專門的登陸艇與登陸艦運送人員、車輛與補給上岸並且迅速卸載。對於軸心國與同盟國來說，兩棲作戰專用艦艇的發展將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重要因素。一九三〇年，日本陸軍擁有兩種摩托化登陸艇，大型登陸艇可以運送一百名士兵，船首有斜板可以讓人員順利搶灘；小型登陸艇可以運送三十名士兵或十名士兵與十匹馬，但船首沒有斜板。兩種登陸艇都配備了武器與裝甲來防禦敵方砲火。為了運送登陸艇，陸軍工兵建造了八千噸的登陸艦神州丸，艦上設有井圍甲板與船尾艙門。當海水湧入井圍甲板後，停放在船艙裡的登陸艇就能浮起來直接開上灘頭。一九四一年建造的更大型登陸艦秋津丸還可以搭載飛機。<sup>57</sup>中日戰爭爆發的第一年，駐華英美觀察家看到了神州丸與大型登陸艇的運作方式。其中一名年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克魯拉克（Victor Krulak）寄了一份報告給海軍陸戰隊司令霍爾科姆（Thomas Holcomb），並且附上自己設計的登陸艇模型。霍爾科姆立刻進行遊說，希望建造吃水淺且船首有斜板可以讓士兵直接上岸的登陸艇，但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讓海軍瞭解這種登陸艇對於兩棲作戰至關重要——登陸用的突擊艇在國會中特別受到孤立主義遊說團體的反對。一九四三年，美軍的車輛人員登陸艇與船塢登陸艦都正式服役，而這一切的源頭乃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的創新發明。<sup>58</sup>

對日本與美國來說，太平洋前線確實需要針對兩棲作戰進行準備，但對歐洲來說，兩棲作戰似乎是不太可能發生的戰爭場景，因此幾乎沒有國家對此做出人員與裝備上的準備。歐洲各國認為自己面對的將會是大規模地面戰爭。英國雖然擁有世界數一數二的海軍與全球帝國，但對英國而言，攻擊岸上守軍進行搶灘登陸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一九一八年後，英國曾對加里波里戰役仔細進行研究，但一九二〇年設立的跨部會聯合作戰委員會卻做成結論，認為各兵種應該維持獨立，避免針對登陸作戰進行聯合規畫。英國現有的九千多名皇家海軍陸戰隊負責守衛現有的英國海外海軍基地，而非擔任兩棲突擊部隊的核心。英軍於一九二二年首次頒布的《聯合作戰手冊》中，幾乎沒有任何兩棲作戰相關的指引。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時，英國陸軍認為他們會像一九一八年一樣與法國人一同作戰，完全沒有想過英軍會被逐出歐陸，當然也不認為需要準備大規模兩棲作戰攻擊敵人的海岸防線。不料到了一九四〇年夏天，這樣的惡夢劇本居然成真。原本在一九二〇年代，英國針對兩棲作戰所做的準備就只是在登陸艇委員會的推動下研發小型摩托化登陸艇。到了一九三八年，海軍也只取得八艘這樣的登陸艇。同年，英國海軍下令建造運送人員的兩棲突擊艇與運送戰車的登陸艦，這項偶然的決定使英國取得兩艘標準的兩棲作戰鬥艦艇，剛好用於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的兩棲作戰。<sup>59</sup>然而英國的兩棲作戰能力僅止於此，實際上英國是否能發動更大規模的兩棲作戰始終頗有疑問。

德軍的兩棲作戰能力更為有限。占領挪威的行動使德國喪失大量海軍艦艇，整個入侵過程中也未能組織完整的兩棲突襲作戰。一九四〇年夏天，德國準備進行海獅作戰，目標是登陸英國南方。這項行動實際上可以說是從零開始，雖然德國陸軍已經盡可能做好充分準備（包括騰出廣大的貨艙空間放置糧秣，因為他們也要將馬匹運到英吉利海峽對

岸），但陸軍與海軍仍缺乏專用的登陸艇或運輸船，也缺乏重型軍艦從側翼支援，更缺乏在設防灘頭卸載的經驗，有效的艦岸通信更是付之闕如。德軍計畫使用臨時調派的三千四百二十五艘汽船與拖曳駁船來運送二十二個師的部隊，這個充滿雄心的計畫能否實現，完全仰賴德國空軍能不能在英國南部建立制空權。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在作戰計畫書裡提到空優的段落旁，潦草地寫下一行字：「不可缺少的條件。」<sup>60</sup>即使擁有空優，作戰的風險也很高。這場戰役原本可能是歐洲戰場第一場大規模兩棲作戰行動，但最後不僅因為德國在不列顛空戰失利而無法執行，也因為缺乏安全準則、專門的兩棲登陸設備與受過訓練的部隊而被迫取消。當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打算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進攻馬爾它島，來一場「成果豐碩的突襲」時，也遇到相同的問題。<sup>61</sup>對軸心國來說，馬爾它島宛如芒刺在背，每當運送人員與物資越過地中海前往北非前線時，馬爾它島總是對運補船團構成威脅。義大利於是擬妥了入侵與攻占馬爾它島的計畫。這項作戰計畫（C3作戰）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就已經擬定，但到了一九四二年為了因應馬爾它島防務的強化而予以修改。希特勒對於義大利的計畫並不熱衷，他只希望義大利的行動不會影響隆美爾的沙漠作戰。當義大利海軍開始實際瞭解島上的狀況時，他們才發現這座島是「全世界防守最嚴密的地方」，因此萌生了退卻的念頭。<sup>62</sup>義大利軍隊沒有專用的登陸艇，也沒有對設防海岸進行兩棲突擊的經驗，加上整個馬爾它島有英國皇家空軍支援，外圍還有無數的英國潛艦護衛。義大利海軍顯然誇大了英國守軍的兵力，但登陸作戰失敗的風險確實很高，於是這場行動僅在計畫階段就胎死腹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是兩棲作戰與支援兩棲作戰的準則與裝備首次真正面臨考驗。日軍發動一連串登陸作戰，目標是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菲律賓及太平洋中南部幾座由英國、澳大利亞

與美國統治的島嶼。日軍在各地掌握了制海權與制空權，這是發動成功兩棲突擊的必要條件。多年來，日軍已經在中國海岸與河川三角洲進行過多次登陸作戰，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經驗。日軍雖然預期登陸時會遭遇抵抗，但實際上這些海岸並未設防。在夜色掩護下，加上日軍在攻擊前已經做了充分的情報工作，因此擴大了日軍登陸作戰的衝擊力道，讓各地人數有限的守軍猝不及防。日軍第一場登陸作戰是在馬來亞東北部哥打巴魯附近，當地的印度守軍駐守在碉堡中，防線十分薄弱。儘管損失了幾艘登陸艇與間歇地遭到鄰近機場起飛的飛機轟炸，日軍依然在幾個小時之內朝內陸挺進了數英里，並在空中部隊強力支援下，成功滲透到守軍後方。兩棲作戰的階段很快結束。這一波登陸作戰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幾個星期後由山下奉文中將率領第二十五軍進攻新加坡島的戰役，因為在這場戰役中，山下奉文擁有的火砲與士兵數量都不如新加坡守軍。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到九日晚間，日軍橫渡柔佛海峽進行登陸作戰，此役成為兩棲作戰的經典戰例。不過整場作戰過程與其說是依照準則，不如說更仰賴將領的臨場發揮。日軍的佯攻計畫成功讓英軍將領堅信，日軍的主要目標是新加坡島的東北角。事實上，防守較為薄弱的西北角才是日軍真正的登陸地點。在發動攻擊前，日軍先以重砲與空軍轟炸守軍，削弱他們的兵力，然後在深夜利用充氣艇與小型汽艇載運第一波四千名步兵渡過海峽抵達防守最薄弱之處。日軍一波接一波地登岸，滲透了守軍防線。到了早上，盟軍北部防線已經遭到突破。超過兩萬名士兵，連同補給物資與武器及兩百一十輛輕型戰車順利渡過海峽。六天後，新加坡守軍向山下奉文投降。<sup>63</sup>

日軍成功攫取整個太平洋中南部島嶼，兵鋒最遠達到所羅門群島與一部分新幾內亞島，這讓西方盟國感受到整個太平洋的局勢就跟歐洲戰場一樣棘手。想讓日本放棄這些島嶼，唯一的辦法就是實施兩棲作戰消



滅島嶼上層層設防的日軍。然而，日軍雖然是兩棲作戰的先驅，但在成功拿下這些島嶼之後，就再也沒有實施過兩棲作戰。日本只有在所羅門群島與新幾內亞發動過幾次失敗的反攻登陸，除此之外就沒有像開戰初期那樣發動大規模兩棲作戰。日本陸軍研發了一種新運輸艦（第百一號型），負責為征服地區的守軍進行補給，而非對盟軍收復的島嶼採取新一波的兩棲作戰；日本海軍新造的一等運輸艦也用來執行相同任務，這種運輸艦的速度較快，可以規避美軍的飛機與潛艦。然而，即使日軍想反攻美軍收復的島嶼，在日本生產的運輸艦數量太少的狀況下，日軍也難以對防守嚴密的美軍發動大規模兩棲作戰。

主動權現在到了美國手中。到了一九四一年末，美軍的兩棲作戰能力比起兩年前顯然已有長足的進步。一九三三年，美國海軍授權海軍陸戰隊成立艦隊陸戰隊，專門進行兩棲作戰。一九三六年，艦隊陸戰隊只有一萬七千多人，這支部隊在海軍陸戰隊最強悍的將領史密斯的指揮下，開始轉變成卓有成效的聯合兵種單位，而且獲得海軍陸戰隊航空兵的支援。艦隊陸戰隊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專門從事兩棲突擊的部隊，到了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艦隊陸戰隊的人數達到五萬五千人，一九四二年夏天達到十四萬三千人，戰爭結束時則達到三十八萬五千人。<sup>64</sup>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每年進行的艦隊演習都會演練兩棲作戰，讓艦隊陸戰隊有寶貴的機會可以從許多錯誤中學習。在一九四一年的第七次演習中，艦隊陸戰隊終於充分體會到在敵軍砲火下進行搶灘登陸的複雜程度。美國陸軍也認識到正規部隊未來也需要參與兩棲作戰，於是幾乎一字不漏地照搬海軍的《艦隊訓練一六七：登陸作戰準則》手冊做為陸軍的野戰手冊，而且開始訓練陸軍自己的兩棲作戰部隊。一九四〇年，美國海軍終於同意生產由紐奧良造船商希金斯（Andrew Higgins）設計的登陸艇，這種登陸艇有龐大空間可以載運人員與車輛，並成了美軍登陸

艇的標準配備，直到一九四三年升級成更大型的登陸艇，裝設了登陸斜板。這類人員與車輛登陸艇在整個戰爭期間總共生產了至少兩萬五千艘。第二項發明是兩棲牽引車輛，這是從發明家暨工程師羅布林

（Donald Roebling）生產的「鱷魚」履帶車發展出來的計畫。當初羅布林生產履帶車主要是用來在佛羅里達島礁群之間航行，由此發展出來的兩棲牽引車輛又被人稱為「兩棲履帶車」（Amphtracks）。這種兩棲車輛配備了武器與裝甲，可以運送人員或車輛通過許多太平洋島嶼環礁的淺水區，成為日後兩棲作戰必不可少的利器。這種履帶車在戰爭期間大約生產了一萬六千輛，後期的版本在車首加上斜板加速人員車輛的卸載。最後，海軍陸戰隊還需要運輸艦運送貨物、人員、車輛與登陸艇。在戰爭爆發前一年，美國開始徵用與改裝貨船，後來又研發出專用的戰車登陸艦，這種登陸艦在船首設置大門，可以前進到岸邊淺水區卸載人員、車輛與補給物資。這三種兩棲作戰鬥艦艇與車輛成為戰時美軍兩棲作戰的開路先鋒。<sup>65</sup>

一九四二年夏天，在羅斯福總統堅持下，美軍決定進攻所羅門群島南部的瓜達康納爾島。這是美軍首次進行大規模兩棲突擊行動，但此時的美軍幾乎都還沒有配備前述介紹的兩棲專用裝備。要將準則轉變成實踐需要一段複雜的學習過程，對於沒有兩棲作戰經驗的將領與成千上萬海陸志願兵來說更是如此。負責指揮兩棲部隊的海軍將領是以脾氣暴躁知名的屠納海軍少將，他認為在缺乏制空權與制海權的狀況下，這次任務注定失敗。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乞沙比克灣舉行的大規模兩棲作戰演習，登陸的狀況一團糟，沒有任何部隊抵達指定的灘頭。當海軍陸戰隊終於從紐西蘭臨時基地啟程前往瓜達康納爾島時，在斐濟科羅島（Koro Island）舉行的大規模演習證明是一場更大的災難——沒有任何登陸艇成功穿過珊瑚礁抵達灘頭。<sup>66</sup>計畫倉促導致船運不足，海軍陸戰隊不得

不將四分之三的車輛、半數的必要彈藥與三分之一的配給留在紐西蘭。儘管如此，八月七日早上在日本機場附近的主要登陸作戰依然遵循埃利斯當年所擘畫的模式，先由軍艦上的重砲進行岸轟與航空母艦艦載機進行轟炸，接著士兵們從運輸艦側面的外掛繩網攀爬下船，成排的登陸艇井然有序地出發。結果這場登陸作戰並未遭到抵抗，海軍陸戰隊很快就攻占機場，但狹小的灘頭堡很快就成為往後六個月日軍陸海空持續攻擊的目標，直到日軍放棄這座島嶼為止。這場戰役因此仍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兩棲作戰。

這場登陸作戰雖然最終成功，但也暴露出許多缺失。日軍未能攻擊運輸艦或炸掉堆積在灘頭上的補給物資，只能說是美軍運氣好。若非如此，這場作戰很可能演變成一場災難，使美軍不願再進行後續的兩棲登陸計畫。仔細研究這場戰役，就會發現不少需要調整的地方。最嚴重的便是指揮問題。屠納是兩棲部隊指揮官，但他無法指揮協助兩棲突擊的海軍特遣艦隊，更不用說在行動開始兩天後，佛萊契海軍中將就因為擔心日軍的魚雷轟炸機而下令航空母艦撤離，這讓灘頭上的海軍陸戰隊完全暴露在日軍的空中攻擊之下。這一狀況直到美軍飛機可以飛抵修復的機場後才獲得改善。另一方面，屠納根據《艦隊訓練一六七：登陸作戰準則》堅持自己除了指揮登陸作戰，在海軍陸戰隊上岸之後，仍有權指揮海軍陸戰隊。但海軍陸戰隊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少將卻認為海軍陸戰隊上岸之後，海軍軍官就無權指揮海軍陸戰隊，因為海軍軍官沒有地面作戰的經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海軍陸戰隊總司令部的壓力下，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獲得海軍軍令部長金恩上將的許可修改登陸準則，讓海軍有權指揮艦岸運動，但士兵一旦上岸，指揮權就必須移交給海軍陸戰隊或陸軍指揮官。儘管有許多海軍將領反對這項改革，但這項改革卻在往後的作戰中證明極為重要。特別是在西南太平洋戰場，麥克阿瑟的

陸軍司令部曾實施過二十六次登陸作戰，幾乎都沒有遭遇嚴重抵抗。

第二個有待改善的問題是後勤。在遙遠的港口裝載貨物時，沒有人遵守準則的規定讓最重要的貨物優先卸載上岸。在瓜達康納爾島，船隻只要有適當時機與地點就開始卸貨，導致大量物資堆放在岸邊，而灘勤人員也未能有效組織海岸線，結果大量軍火、汽油、糧食與醫療物資雜亂無章地堆放在一起，毫無偽裝與保護。三天後，由於屠納擔心運輸艦會遭受日軍攻擊，於是撤離了運輸艦，導致海軍陸戰隊足足有六天時間沒有得到補給。屠納日後會利用這次經驗對後勤鏈進行改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海軍改革的完整指示出爐，試圖讓艦岸卸載的速度最大化：灘頭上必須用大型告示板清楚標記、灘勤人員必須優先上岸、物資必須盡快運送到安全地點。對灘頭進行適當組織是兩棲作戰的成功關鍵，這點埃利斯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正確預言。<sup>67</sup>

歐洲戰場的第一場兩棲作戰，同樣暴露出盟軍的缺乏經驗。一九四〇年，邱吉爾堅持創設聯合作戰司令部，準備組織特種部隊襲擊歐洲海岸。聯合作戰司令部第一任司令是基斯海軍上將，一九四二年之後改由蒙巴頓海軍中將擔任。司令部不僅進行突擊作戰，也開始計畫與訓練部隊進行兩棲作戰，準備重返歐陸。為了測試英國各軍種聯合的程度，英軍計畫於一九四二年八月突擊法國北部的港口城市第厄普。之所以選擇港口為目標，是因為英軍認為未來的入侵行動無法經由灘頭進行補給。八月十九日，正當范德格里夫特的海軍陸戰隊努力固守瓜達康納爾島灘頭之際，英國也派遣了一小支由運輸艦與登陸艇組成的分遣艦隊，在僅僅四艘驅逐艦護航下開始接近法國海岸。銀禧作戰是一場混亂的災難。德軍早已做好準備部署重兵，並且對這些不幸的登陸艇與貨物進行猛烈砲擊。登陸的二十七輛戰車遭到摧毀或喪失作戰能力，三十三艘登陸艇遭到殲滅，一艘軍艦沉沒。上岸的六千零八十六名英軍與加拿大軍隊，



多達三千六百二十三名陣亡、受傷或被俘，而海空軍的傷亡人數達到六百五十九人。做為學習經驗，這場戰役的代價實在太大。英國很快就進行事後檢討，而這場災難的教訓也非常明顯：首先要提供強大海軍火力支援的必要性，還要從空中對防區進行轟炸，出動空中支援對抗敵軍戰機。此外還需要改善不良的通信，得要有專用的兩棲指揮艦協調兩棲突擊作戰（美國在瓜達康納爾戰役之後也達成同樣結論，理由也大致相同）。最後，盟軍也必須設計特殊車輛突入與清除灘頭防禦工事。這場災難之後，英國皇家海軍設立了「J特遣艦隊」，這是一支海軍突擊艦隊，負責發展兩棲作戰技術與進行兩棲作戰訓練。這支艦隊對接下來的戰爭產生不小的助益。<sup>68</sup>

第厄普使盟軍瞭解到，在歐洲進行兩棲作戰與在日本島嶼周邊進行登陸作戰完全不同。在歐洲，敵軍的優勢在於擁有漫長的內部交通線，可以迅速增援與取得大量補給；即使成功登陸，也只是表示兩棲作戰階段結束，接下來還要準備迎接大規模地面作戰。相較之下，在太平洋戰場的日本守軍與本土軍隊完全隔絕，只能隔著大海仰賴漫長而不確定的補給與增援。在這些島嶼上，光憑兩棲作戰就能決定勝敗，只是要一個接著一個島嶼持續進行。美國為了擊敗日本而投入大量資源在兩棲作戰上，原因就在這裡。瓜達康納爾戰役之後，美國海軍與海軍陸戰隊建立的作戰部隊規模遠遠超過日軍，這是為了確保在每次兩棲突擊時美軍都能牢牢掌握戰場的制海權與制空權。美軍在攻擊瓜達康納爾島時總共動用了七十六艘艦艇，但在一九四五年四月進攻沖繩島時，竟動用了一千兩百艘艦艇。這也解釋了美軍為什麼每次戰役之後都要詳細檢討，找出先前作戰的種種缺失。即使如此，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軍首次大規模攻擊吉爾伯特群島塔拉瓦環礁外防守嚴密的貝蒂奧島時，戰況依然顯示美軍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海軍陸戰隊第二師負責攻擊貝蒂奧島與島

上的日本空軍基地，這場戰役被認為至關重要，因為攻下貝蒂奧島之後，依據美軍多年來的計畫，就能以此為跳板攻擊其他南洋群島，然而這場戰役卻帶來與瓜達康納爾島迥然不同的挑戰。日軍在這座小島建立密集的防禦工事。步槍與機關槍的交叉火網覆蓋了整座小島，還有五百座強化碉堡，上面覆蓋了木頭、鋼筋、混凝土與珊瑚礁岩，從地面上幾乎看不出來，此外還有岸防砲、輕型戰車、野戰砲與迫擊砲的火力支援。日軍在灘頭設置了鐵絲網、地雷與混凝土四角錐狀障礙物，在灘頭後方還用椰子樹幹搭建了堅固的木牆。貝蒂奧島是日本島鏈防線中最堅固的一座，島上的指揮官柴崎惠次海軍中將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一百萬名美國人要一百年的時間才能打下塔拉瓦。」<sup>69</sup>

事實證明，美軍可以用高昂的代價在三天內攻下塔拉瓦，但這是美軍首次對一座防守嚴密的目標發動攻擊，各方面的問題差點就讓這場兩棲作戰功敗垂成。首先是屠納海軍少將與史密斯為了指揮權再起爭執，前者再次成為兩棲作戰部隊指揮官，後者只被允許在一旁觀看而不許指揮海軍陸戰隊作戰。十一月二十日早上，美軍發動攻擊，但擔任兩棲作戰指揮艦的馬里蘭號（*Maryland*）戰鬥艦卻因為使用重砲岸轟，導致艦上無線電通信意外中斷，指揮與管制立即受到影響。登陸前的海軍砲火支援與空中攻擊對於島上強化過的碉堡並未構成嚴重損害。當登陸艇接近岸邊時，美軍沒有派出小型艦艇提供近岸砲火支援，導致日本守軍獲得將近二十分鐘的喘息時間，也使他們能夠從轟炸中回過神來重新恢復火炮運作。登陸艇無法穿過島嶼四周的環礁，海軍陸戰隊只能仰賴數量不多的兩棲牽引車輛（儘管史密斯曾憤怒地要求更多車輛，但最後只收到了一百二十五輛）才能抵達岸上。貨船由於遭到岸上日軍的砲火襲擊，卸載貨物的作業陷入困難，而且也與岸上的海軍陸戰隊失去聯繫。補給物資再度雜亂地堆在岸上，火炮與車輛卻卡在珊瑚礁附近。雖然安

排了七百三十二輛各式車輛參與攻擊，但開戰第一天只有少數抵達岸上。灘頭上的部隊必須冒著砲火拼命清除障礙物。當希金斯登陸艇運送第二波部隊上岸時，登陸艇必須在離岸八百公尺的地方讓人員下船，海軍陸戰隊員必須在機關槍掃射下高舉武器涉水搶灘。美軍的轟炸毫無效果，唯一的成果是炸毀了日軍的電話通信線，使柴崎惠次中將無法聯絡各地守軍協調作戰。貝蒂奧島的勝利主要仰賴海軍陸戰隊的決斷與勇氣，即便他們面對的是寧死不降的敵人。海軍陸戰隊有九百九十二人陣亡，僅三天就達到瓜達康納爾戰役六個月的陣亡數字。日本海軍第七特別陸戰隊與第三特別根據地隊本隊原本有兩千六百零二名官兵，最後只有十七人被俘。島上還有兩千兩百一十七名不幸的朝鮮勞工，當這場戰役結束時只剩下一百二十九人還活著。<sup>70</sup>

美軍隨後對塔拉瓦戰役的諸多缺失進行詳細檢討，試圖找出問題所在。攻擊的第一天差點就面臨失敗。美軍往後針對日軍島鏈的作戰，幾乎每一場都遭到守軍頑強抵抗，但塔拉瓦戰役的教訓使美軍對兩棲作戰準則與實踐做出進一步改革，確保未來不會重演塔拉瓦戰役的混亂場面。預計要在盟軍反攻法國時負責指揮西部特遣艦隊的寇克海軍少將（Alan Kirk），親自前來太平洋戰場瞭解塔拉瓦戰役的問題，以避免同樣的錯誤再度發生。首先要改進的是指揮結構：塔拉瓦戰役之後，軍方堅持必須對海軍兩棲部隊指揮官與地面部隊指揮官做出區隔。其次，為了協調作戰，決定以擁有較佳通信設備的專用突擊指揮艦取代先前作戰時採用的改裝戰鬥艦。第三，塔拉瓦戰役的砲火支援雖然大量卻沒有效果，軍方決定大幅增加砲轟時間，而且改用穿甲彈來擊穿敵軍加厚的火砲掩體。當入侵部隊接近海岸時，會進行近迫砲火支援與俯衝轟炸機攻擊，持續對守軍施加壓力。第四，改善裝備，而這一改變將對往後的作戰產生關鍵影響。海軍陸戰隊需要更多兩棲牽引車輛，接下來對格洛斯

特角（Cape Gloucester）發動的大規模兩棲突擊，每個師就裝備了超過三百五十輛兩棲牽引車輛。此外，輕型戰車也被雪曼中型戰車取代，其中一些配備了火焰噴射器。美軍發現火焰噴射器是清除碉堡與掩體最有效的方式，之後部隊也開始裝備背負式火焰噴射器。貝蒂奧島危機之後，後勤問題也遭到全面檢視。補給物資必須在離岸特定轉運點進行運送，如此才能確保補給物資能抵達灘頭的正確地點。而搭載必需補給物資的登陸筏預先停放在出發線上，讓登陸艇能快速將其運送到岸上。最後是增加灘勤人員，使其能適當協助卸載補給物資；如果可能的話，將滿載的卡車也運送到岸上，並且利用專用登陸艇讓卡車能直接從船艙開上灘頭。<sup>71</sup>

美軍吸取塔拉瓦戰役的教訓，使此後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沖繩戰役為止的兩棲作戰效率有了明顯提升。沖繩島是琉球群島最大的島嶼，位於日本南方一千一百二十五公里，美軍預計在沖繩島進行登陸作戰之後，接下來將在同年稍晚對日本本土發動兩棲突擊作戰。沖繩戰役的規模已經接近盟軍在歐洲的入侵作戰：多達四百三十三艘突擊運輸艦與登陸艦分別在環太平洋十一座港口裝載人員武器。運送的距離超過數千公里，使用的幾乎都是吃水淺的船隻。當船團緩慢航向目的地時，每次的波浪起伏都會造成巨大的聲響，人員、車輛與物資因此處於極端不適或不穩定的狀態，許多暈船士兵身上沾滿了嘔吐物。攻擊部隊規模達到十八萬三千人（兩個海軍陸戰隊師與三個陸軍師），這是迄今為止太平洋戰場兩棲作戰集結的最大兵力。在沖繩島海岸外，美軍艦艇進行大規模密集岸轟，而訓練有素的海軍陸戰隊空地任務部隊，也在海軍陸戰隊登陸與建立灘頭堡時開始進行直接空中支援。另外有水下爆破大隊協助清除登陸障礙物。<sup>72</sup>突擊部隊取得大量兩棲牽引車輛、中型戰車與火焰噴射器。灘勤人員登陸的人數達到五千人，負責管制與分配武器裝備，聯



合突擊通信連負責協助灘勤人員，確保灘頭與艦岸通信能維持有效聯繫。大約有三十一萬三千噸的貨物順利卸載，根據計畫存放，然後準時運送給前線部隊。

這一次，日本陸軍司令部也從先前的作戰學到教訓。沖繩島指揮官牛島滿放棄在灘頭進行防禦，因為這種做法在先前的戰役（包括塔拉瓦戰役）從未成功過。他決定在島嶼內陸洞穴與隱藏的掩體建立防線，由超過十萬名日軍駐守。出乎美軍預料，一開始的登陸完全未遭受抵抗。接下來朝島嶼內陸挺進時，實際上已經演變成單純的地面作戰，後勤補給則仰賴海上運輸。與先前的作戰不同，美軍花了八十二天才完全清除沖繩島上的敵軍。七千三百七十四名美軍陣亡，大約十三萬一千名日軍與沖繩人被摧毀的掩體與洞穴活埋，或者是被步兵的火焰噴射器燒成灰燼。然而，當時認為太平洋戰場接下來還會出現更大規模的兩棲作戰。一九四四年九月，美軍聯合戰爭計畫委員會針對日本南部的九州制定了進攻計畫，史稱「奧林匹克作戰」，規模多達十三個師、七千兩百架陸海軍飛機與三千艘艦艇。進攻部隊將在三處灘頭登陸，奪取機場與在島上建立強大的空中支援。最後這項作戰計畫與隨後入侵日本本島的兩棲作戰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遭到取消。海軍兩棲部隊接下來的任務變成是在八月與九月運送同盟國占領軍進駐日本，以及協助中國軍隊返回日本占領的沿海地區。<sup>73</sup>

二戰規模最大的兩棲作戰依然是「海王星作戰」（Operation Neptune），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盟軍反攻法國西北部大君主作戰的兩棲作戰代號。這場兩棲突襲行動與太平洋戰場的小島和沿海登陸作戰迥然不同。海王星作戰的規模顯得異常龐大，而且行動目標是敵軍嚴密防守的海岸線。一九四四年夏天，德軍已經在此集結了三十四個師（必要的話還會召集更多部隊），而且花了兩年時間構築強大的海岸防禦工

事，也就是「大西洋長城」。負責指揮防務的隆美爾元帥也在灘頭與水中設置障礙物、地雷與交叉火網。岸上守軍內部的交通線直通德國，至少理論上可以透過這些交通線獲得增援，這是德軍擁有的關鍵優勢。最麻煩的是，加里波里的幽靈仍糾纏著這次行動，這或許解釋了邱吉爾與英國軍事高層為什麼對這次行動興趣缺缺。邱吉爾想到的不只是加里波里，還有挪威、敦克爾克、克里特島與第厄普等失敗經驗。但另一方面，儘管遭遇許多問題，美國高層卻能提出許多成功的例證，如北非、西西里島與義大利，以及在極度困難下仍攻克了瓜達康納爾島。不過，這次行動的戰略風險確實遠高於島嶼戰役或之前幾次入侵歐洲的行動。入侵貝蒂奧島失敗不會對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推進造成重大影響，但海王星作戰失敗將使西方盟國面臨一場戰略災難，不僅將損害與史達林的關係，使史達林懷疑盟軍開闢第二戰場的決心，也會對美國、英國與加拿大的民心士氣造成難以預測的傷害。美軍在兩棲作戰上已經累積許多成功經驗，使他們對於海王星行動充滿信心，但英國在海王星行動之前一年半的時間在歐洲的兩棲作戰全以慘敗收場，這使得英國對這次行動有所保留。<sup>74</sup>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火炬作戰，是盟軍在歐洲的第一場兩棲作戰。雖然做為「敵軍」的維琪法國僅在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部署了有限兵力，在北非地區的海上運補也不足，但盟軍登陸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的行動還是比第厄普突擊行動暴露出更多值得記取教訓之處。盟軍希望說服維琪法國不要抵抗這次登陸作戰，但維琪法國軍事當局還是把盟軍行動視為入侵法國領土。與入侵瓜達康納爾島的瞭望臺作戰一樣，火炬作戰準備的時間相當匆促，很多時候都必須仰賴隨機應變。搭乘登陸艦與運輸艦經由大西洋前去作戰的部隊，絕大多數都是毫無兩棲作戰經驗的新兵。日後有人回憶時提到他們沒有經驗到什麼程度：「我們從來沒看

過海，更不用說搭過船。」<sup>75</sup>在船上，這些新兵只能利用灘頭模型與登陸艇模型進行簡短訓練。與太平洋戰場的海軍陸戰隊不同，這些陸軍士兵並未準備好面對登陸時可能面臨的反擊。由於船隻不足，一些新兵甚至只能搭乘汽車行駛在起伏的地形上，用來模擬在海上遇到波浪的情形。摩洛哥的登陸作戰陷入一團混亂，太多的登陸艦艦長缺乏經驗，既沒有適當的地圖，也未有效標記出通往灘頭的接敵航道。士兵緩慢爬下船側的金屬網，在陸軍的堅持下背負四十公斤重的裝備，在海中搖搖晃晃地前進，然而這種做法早已被太平洋戰場的海軍陸戰隊揚棄。引擎失靈、船隻碰撞及登陸艇在抵達岸上時遭法國飛機襲擊而陷入混亂。一艘運輸艦在第一波攻擊中派出二十五艘登陸艇，卻有十八艘沉沒，第二波派出的九艘也有五艘沉沒。盟軍在波濤洶湧中想要將戰車運上岸，結果卻造成許多戰車陷在沙裡。行動第一天，只有百分之二的物資成功上岸。英美聯軍在阿爾及利亞的登陸作戰比較井然有序，因為使用了信號浮標清楚標記了接敵航道，但英軍仍堅持以港口做為主要目標，因此重蹈了第厄普的覆轍。結果奧蘭與阿爾及爾兩地一直要等到從灘頭登陸的部隊抵達才得以攻占。<sup>76</sup>至少，登陸部隊最後還是壓制了所有反抗力量，粉碎了兩棲作戰必定失敗的說法。然而就像從瓜達康納爾島到沖繩島一樣，從火炬作戰到海王星作戰，盟軍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一九四三年九月在義大利半島的薩來諾登陸作戰與幾個月後的安奇奧登陸作戰，都曾讓盟軍陷入危機，進而暴露出盟軍兩棲作戰的其他缺失。

要反攻法國，首先就得克服指揮權的爭議。西方盟國已經達成共識，由艾森豪將軍擔任盟軍最高統帥，但作戰本身分成指揮兩棲登陸的海軍指揮官與指揮地面作戰的陸軍指揮官，這一區分在太平洋戰場已是標準的作業流程。反攻法國的海軍與地面指揮官都由英國人擔任，前者由雷姆賽海軍上將（Bertram Ramsay）指揮海王星作戰，後者則是蒙哥

馬利元帥指揮大君主作戰的地面部隊。戰術空軍部隊是兩棲作戰的核心，統一聽命於英國皇家空軍司令李馬洛空軍中將。戰略轟炸機部隊則由艾森豪直接管轄，只在他認為適合時使用——這項決定違背了轟炸機司令的勸告。這場從海上到岸上的作戰行動，整起計畫與組織達到迄今為止無法想像的規模。九百萬噸補給物資橫渡大西洋，運送到英國支援入侵行動。三十五萬名男女軍民負責組織補給線，協助訓練與部署參與歐洲戰役的數百萬名士兵，並且研發專門武器設備讓大規模登陸作戰能順利建立灘頭堡。<sup>77</sup>當參與第一波攻擊的師級部隊數量從三個增加到五個，且預計在諾曼第的戰線必須延伸得更寬時，用來運輸的艦艇數量也隨之大增。此時由於地中海與太平洋兩個戰場競相爭取運輸艦艇與增援的資源，差點就讓反攻法國的兩棲計畫難以執行。一九四三年，在諸多反對入侵法國的理由中，船運一直是個主要因素，雖然海王星作戰是西方盟國計畫中的重要作戰，卻始終擺脫不了作戰艦艇、運輸艦與登陸艇缺乏的問題。

一九四三年擬定的海王星作戰計畫，最初總共需要兩千六百三十艘各式登陸艇與至少兩百三十艘用來運輸沉重車輛與補給物資的重要運輸艦（戰車登陸艦）。從西方盟國整體的工業產能來看，要生產這些數量的艦艇似乎不成問題。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美國建造的登陸艇總數達到驚人的六萬三千零二十艘，不過其中有兩萬三千八百七十八艘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之後建造，這是為了因應太平洋戰場的龐大需求。儘管如此，太平洋與地中海戰場的龐大損失，以及這兩個戰場對登陸艇的持續消耗（其實對這兩個戰場來說，登陸艇在戰略上並非必要。但邱吉爾不惜讓海王星作戰推遲兩個月，也要在一九四四年對羅得島發動兩棲入侵行動），造成相關需求難以協調。<sup>78</sup>參與第一波攻擊的師級部隊數量擴增，使船運壓力持續升高。到了一九四三年八月，登陸艦與登陸



艇終於被列為特別緊急事項而加速生產。但生產新登陸艇需要時間，而在塔拉瓦戰役之後，許多額外資源都已經緊急配置給太平洋戰場使用。

最後大約生產了四千艘可用的登陸艇，結果證明這樣的數量已足以在最初作戰中建立灘頭堡。最關鍵的短缺是大型戰車登陸艦，絕大多數戰車登陸艦都是在美國俄亥俄河岸邊的造船臺生產。戰車登陸艦可以直接登陸灘頭，卸載車輛與補給物資，在沒有港口的狀況下，戰車登陸艦也能適當地補給岸上部隊。艾森豪希望得到至少兩百三十艘戰車登陸艦，但到了一九四四年，仍有許多戰車登陸艦部署於地中海準備進行預定的兩棲作戰，艾森豪因此認為可用的戰車登陸艦數量不足以運輸必要的補給物資。一九四三年十月，在羅斯福與金恩的直接命令下，盟軍開始進行應急的生產計畫。從該年十一月到隔年五月總共生產了四百二十艘新戰車登陸艦，但許多登陸艦在橫渡大西洋之後仍然來不及參與入侵行動。不過這些戰車登陸艦倒是參與了日後的再補給計畫。緬甸與地中海的兩棲作戰取消之後，也多出一些額外可用的戰車登陸艦。到了D日，艾森豪終於湊足兩百三十四艘戰車登陸艦。為了執行作戰，陸軍堅持每艘戰車登陸艦都必須滿載，甚至要求超載，同時也採取緊急措施確保所有戰車登陸艦都能使用。到了六月一日，離D日還有五天，已經有兩百二十九艘戰車登陸艦可以作戰。<sup>79</sup>

海王星作戰的準備完全不同於太平洋戰場，後者在缺乏準備下，遭遇緊急狀況只能隨機應變。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數百萬官兵，則是花了好幾個月進行定期與密集的訓練。一開始是小規模演習如何下船與搶灘，最後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於英國南岸進行一連串的大規模演習，代號「法比烏斯」（Fabius），而且使用了實彈與地雷。然而，海王星作戰確實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水兵來操作運輸艦與登陸艇。許多軍官只是在美國上了短期課程就來指揮登陸艇，其他軍官則是在德文郡南岸斯萊

普頓灘頭的兩棲訓練學校受訓。英國皇家海軍設立了臨時海軍官校，初級軍官在這裡接受訓練以管理兩棲突擊艇，但並未觸及深海航行。受訓之後，這些年輕軍官就被期待要嫻熟雷姆賽司令部下達指令。這些指令數量多如牛毛，將近一千兩百頁，涵蓋兩棲突擊階段的所有面向：針對歐洲戰場的兩棲作戰，盟軍以太平洋戰場的灘勤人員為藍本，發展出專門的團隊與裝備。包括為了去除灘頭上防禦工事而設立的三十二個海軍戰鬥爆破單位，以及來自各戰術空軍部隊的飛行員，他們陸續受訓成為火炮觀測員。部分自由輪則改裝成雷達測繪單位，以協助戰鬥機進行空對空攔截；空中偵察的密集巡邏也取得了比過去兩棲作戰更完整的情報。為了讓戰車快速抵達灘頭而研發的兩棲「複合驅動戰車」（即DD戰車），這種戰車理論上可以利用自身的動力行駛上岸。此外還有「犀牛」渡輪，這是一種大型登陸筏，可以將貨物運送到灘頭。最後是兩棲運輸車（DUKW），這種六輪式的兩棲裝甲車不僅可以將貨物運上岸，也可以將貨物運送到部隊作戰的地方。五月十五日，雷姆賽告訴艾森豪，作戰已經準備就緒，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兩棲突擊行動即將展開。五月二十八日，雷姆賽向龐大的部隊下令「執行海王星行動」。<sup>80</sup>

這場諾曼第入侵行動，顯示盟軍的兩棲作戰能力已從最初的盲目摸索進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已經非常接近於一九二〇年代埃利斯和海軍陸戰隊所構想的準則。兩棲作戰的先決條件是制海與制空，而盟軍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已經完全掌握兩者。入侵行動獲得一千艘以上各型軍艦的支援，盟軍也能出動多達一萬兩千架各式飛機。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德國空軍被迫回防德國本土並遭受盟軍的沉重打擊。海王星作戰前夕，德國第三航空軍團在法國北部只能出動五百四十架各式飛機，其中戰鬥機只有一百二十五架。<sup>81</sup>盟軍對制海權的掌握也相當充分。儘管德國試圖以魚雷快艇與潛艦進行干預，但這支由七千多艘各式艦艇組成的龐大

艦隊，只有三艘貨輪與十餘艘海軍小船被擊沉。出動的四十三艘德軍潛艦中，有十二艘受損，十八艘被擊沉。<sup>82</sup>

六月六日最初的目標是猛烈攻擊與迅速登陸，拿下穩固的灘頭堡、去除海岸防禦工事、建立足夠的後勤支援與防堵敵軍發動的反攻。在諾曼第海岸寬廣的正面上，盟軍選擇了五處彼此區隔的灘頭，英加聯軍負責進攻黃金、朱諾與寶劍灘頭，美軍負責進攻猶他與奧馬哈灘頭。特殊爆破大隊清除灘頭上的障礙物之後，再由兩百輛掃雷車在雷區標記出能夠通行的走道，登陸艇滿載著量船的緊張士兵開始了前往岸上的旅程，其中一些登陸艇甚至要航行十五公里以上。德軍防線遭受盟軍海軍艦艇的岸轟與大型四發動機轟炸機的猛烈轟炸，以及改裝的登陸艇從近岸齊射火箭、俯衝轟炸機與中型轟炸機也發動戰術攻擊進行支援。轟炸無法摧毀防禦工事，但可以癱瘓守軍，使守軍無法對盟軍搶灘做出及時因應。重型轟炸機與海軍岸轟造成的損害相對輕微，但灘勤人員與飛機「觀測員」卻能引導砲火轟擊撤退到灘頭後方的德軍。原本以為由缺乏經驗的士兵組成的盟軍部隊很可能在登陸時陷入混亂，但實際上的表現卻井然有序。當登陸艇、兩棲戰車與成堆的箱子抵達岸上時，很快就從雜亂無章恢復秩序，補給物資與人員迅速湧入，鞏固最初的登陸陣地。到了中午，英軍已經完全占領負責進攻的三個灘頭，軍隊開始朝內陸移動以進一步鞏固占領地區。在美軍負責進攻的猶他灘頭，登陸部隊由於受到轟炸煙霧影響而偏離登陸地點，但剛好這個地點的德軍守備較為薄弱。到了傍晚，在猶他灘頭登陸的美軍已經朝內陸挺進了十公里。

D日的最主要戰鬥發生在由美軍攻擊的第二個灘頭：奧瑪哈。奧馬哈灘頭是歐洲戰場的塔拉瓦。儘管奧馬哈灘頭最終還是在重重困難下成功被盟軍占領，但與塔拉瓦戰役一樣，這回所有能出錯的地方通通出錯。首先是一開始海軍岸轟的時間太短，火箭齊射的距離太近，沒打中

目標，重型轟炸機投彈的位置又太遠，全落到防禦工事的後方，因此當登陸艇經過漫長的航行抵達灘頭時，德國守軍有足夠時間恢復並且在槍砲陣地就定位。當第一波美軍抵達灘頭時，德軍的迫擊砲、火砲與機關槍一齊射擊，形成了一道密集的火網，摧毀了登陸艇，也重創第一波上岸的美軍。惡劣的海象吞沒了兩棲戰車，讓戰車連同困在裡面的乘員一起沉入海底。二十九輛兩棲戰車只有兩輛上岸，反觀寶劍灘頭的三十四輛有三十一輛抵達，而加拿大進攻的朱諾灘頭，二十九輛也有二十一輛成功上陸。<sup>83</sup>率先登陸的海軍戰鬥爆破單位遭受德軍猛烈攻擊，損失了大量人員與機具，最後只在第二波與第三波步兵抵達之前清出五條狹窄的通道。在海岸線上，毀損的登陸艇與裝備阻礙了後續抵達的部隊，登陸艇無法依照計畫上岸，現場一片混亂。登陸艇卡在船隻殘骸與士兵屍體之間，只能倉皇讓部隊盡快下船，因為在灘頭上要後撤是極度危險且近乎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德軍無情地開火射擊。兩個小時後，奧馬哈灘頭的入侵行動看起來即將失敗。與塔拉瓦戰役一樣，殘存美軍的勇氣與決心使他們克服艱難。在緊急呼叫驅逐艦支援後，十幾艘艦艇脫離艦隊主力的行列，冒險進入淺水區，在離岸只有幾百公尺時全力對德軍火砲掩體開砲。近距岸轟也是太平洋戰場學到的經驗，這種做法證明比重砲岸轟更為有效。由於灘頭人員傷亡慘重，無法引導砲火射擊，驅逐艦只好自行掌握時機開砲。採取近岸火力支援雖然是應急的做法，但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使美軍得以在已經清除地雷的狹窄礫石通道中繼續推進。<sup>84</sup>到了傍晚，美軍終於避免了最糟結果，與在塔拉瓦一樣，成功建立了小灘頭堡。死傷與失蹤人數依然不明，但估計超過兩千人傷亡，與海軍陸戰隊在貝蒂奧島的傷亡差不多。

兩棲登陸作戰一旦遭遇決心堅守的敵軍，就不可能一切都按照計畫



進行。而在朝灘岸進攻的過程中，什麼樣的錯誤都有可能發生。但在第一天結束時，盟軍已經取得穩固的占領區。即使奧馬哈灘頭損失慘重，也不足以危及整場兩棲突擊行動。就算德軍沒有把兵力保留在他們原先預期的盟軍登陸地點加萊，而是全力防守諾曼第，光憑盟軍在登陸後一個星期運抵灘頭的人員、裝備與物資，就足以使德軍無法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將盟軍「推回海中」。到了六月十一日，盟軍的龐大船團已經將三十二萬六千人、五萬四千輛車輛與十萬四千噸物資運抵灘頭堡。即使是在一片狼藉的奧馬哈灘頭，到了六月十七日，也就是雷姆賽海軍上將宣布入侵行動的兩棲作戰階段已經成功完成的那天，也有五萬噸物資運抵當地。<sup>85</sup>這是歐洲最後一場大規模兩棲作戰。盟軍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經過一段漫長的學習過程，終於順利將兩棲作戰準則轉變成訓練有素的部隊、適當的裝備與戰術意識。這些都是盟軍最終獲得勝利的關鍵，如果沒有這些部隊、裝備與戰術，盟軍不可能進攻防守嚴密的海岸與建立永久的灘頭堡，也不可能把德軍逐出占領區。加里波里的幽靈如今終於可以安息。

## 戰力加成：無線電與雷達

一九四五年，美國科學資訊聯合委員會出版的刊物表示：「無線電偵測與測距，是自飛機發明以來，改變戰爭樣貌最大的一項發展。」無線電偵測與測距的首字母縮寫，就是所謂的「雷達」。<sup>86</sup>該刊物的說法雖然誇大，但裝甲作戰、戰術空軍、兩棲作戰與海空作戰在二戰期間的成熟發展，確實很大程度仰賴前線電子作戰的演進，而前線電子作戰使用的就是無線電與雷達。無線電波的技術發展，在一九三〇年代後半達

到巔峰。美國在一年之內，先是海軍研究實驗室展示了美國第一個脈衝雷達，接著是前通信部隊軍官阿姆斯壯（Edwin Armstrong）發現了調頻（FM, Frequency Modulation），最後是美國陸軍設計了能偵測飛機的脈衝雷達系統。這一年是一九三六年，而在短短五年後，當美國被迫參加二戰時，美國已經建立了從巴拿馬運河到阿留申群島的防禦雷達網。美國還有海軍雷達可以偵測水面艦艇與自動導引砲火，航空母艦艦載機上裝設了對海搜索雷達，所有戰車都裝設了調頻無線電，陸軍航空軍也設置了空中攔截雷達。相關領域的發展呈指數成長，即使到了戰時也持續不輟。

一戰期間幾乎沒有人使用無線電。靜止不動的前線仰賴有線通信與電話，或者是仰賴傳令兵、旗號與信鴿。裝甲部隊與飛機的出現，促使通信必須發展出新的形式，因為固定的電話線路已經難以發揮作用。戰間期民間無線電科技的發展，顯然可以運用到軍事上。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各國軍事研究單位都在探索將無線電運用在地面與海上戰場通信的可能，除了可以直接指揮前線，也可以讓前線的步兵、砲兵與裝甲部隊在現地通信。起初，大多數國家的陸軍仍維持有線通信，因為有線通信較為安全且聲音品質較佳，但各國空軍都需要無線電，因為飛機與飛機或飛機與地面管制中心之間只能仰賴無線電通信。水面艦艇與潛艦使用無線電，對於艦隊與指揮中心之間的作戰通信極為重要。儘管如此，無線電仍有需要克服的缺點。早期的無線電設備相當笨重，天線也非常長。調幅（AM, Amplitude Modulation）無線電成為一九三〇年代的標準配備，但這種無線電很容易被攔截，頻率會出現漂移，還會出現雜訊。戰線上的無線電距離很短，有時不超過一公里。若在移動的車輛上，就幾乎無法使用調幅無線電。若在船上，無線電則會因為發射艦砲產生的震盪效應而受到影響。無線電也無法在極端溫度、高濕度或大雨中操

作，精密的電路有可能會鏽蝕。當時的無線電通信也不安全，很容易被敵軍攔截利用（除非訊息已經譯成密碼）或被敵軍通信部隊干擾。只有當地面作戰的局勢瞬息萬變或是在空戰時，無線電才能以明碼發出，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訊息就算被攔截也不會對戰局產生影響。上述這些缺點都在二戰時期出現，因為此時對無線電的需求大增。然而，無線電的安全性與存續性問題始終未能完全解決。

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成立裝甲部隊的德國開始尋求更好的通信方式。德軍率先探索上自高層將領下至前線小部隊使用無線電管制戰場的可能性。一九三二年六月，德國舉行大規模陸軍演習，名稱就叫做「無線電演習」（Funkübung），以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德國做為假想場景來測試無線電通信。德軍透過這次演習建立了複雜的通信準則與無線電實際運作的基礎。在西班牙內戰中，被派去協助佛朗哥將軍的德軍部隊獲得了寶貴經驗，確認裝甲部隊透過無線電聯繫可以發揮最大的優勢。<sup>87</sup>到了一九三八年，德國每個裝甲部隊都配有一輛裝甲指揮車來協調部隊行動，裝甲部隊指揮官就坐在裝甲指揮車內，利用無線電設備來控制部隊或與戰術司令部聯繫。一九四〇年，德國裝甲部隊有兩百四十四輛指揮車，入侵蘇聯時，增加到三百三十輛——這項創新是德國裝甲編隊進行有效作戰的基礎。<sup>88</sup>所有的德國戰車都安裝了標準雙向無線電通信設備，這使得德軍戰車在一九四〇年入侵法國與低地國時取得決定性優勢，當時法軍有五分之四的戰車沒有使用無線電。法國軍官為了指揮戰車部隊，有時必須從一輛戰車跑到另一輛戰車，對著艙門大吼，好讓裡頭的人聽見。<sup>89</sup>相較之下，德國每個裝甲師都有一個設備完善的專門通信營，負責維持整個部隊的無線電聯繫。德軍的無線電訓練相當嚴謹，所有通信都必須使用「獅」、「鷹」、「雀鷹」等代號且必須愈簡潔愈好。他們還會使用「簡表」上的詞彙，以避免占用頻道或向敵軍暴露自

己的位置。<sup>90</sup>德國無線電通信的高標準一直是德國陸軍能夠（即使在撤退時）維持戰力的重要原因。

在裝甲車輛居於核心的戰場上，無線電成為今日所謂「指揮與管制」的基礎。若是任由每一輛戰車自行其是，或者火炮沒有中央指揮，將使整支部隊在戰術上居於劣勢。儘管如此，各國裝甲部隊要仿效德國的做法仍需要時間。即使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國陸軍野戰規定依然沒有提到無線電。儘管無線電在一九三九年迅速發展，但傳令兵與電話線依然是一九四〇年前線通信的主要工具。英國戰車最終還是使用了標準的WS 19調幅無線電，可以在戰車與戰車以及戰車與高階司令部之間雙向通信。但正如前述，要在移動車輛上使用調幅無線電相當困難。<sup>91</sup>蘇聯與日本戰車一般不會裝設無線電，只有前線戰車指揮官才有無線電設備，但就算有，品質與效能都不佳，數量也很稀少。日軍進行裝甲作戰時，通常是藉由手勢、照明彈或擁有複雜顏色與圖案的旗號系統來傳達指令。<sup>92</sup>蘇聯在一九四一年慘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級部隊普遍缺乏無線電。在英美慷慨提供二十四萬五千臺野戰無線電設備後，情況才逐漸改善。當小部隊也能取得無線電時，戰車指揮官就可以使用無線電指揮與管制戰車部隊，但蘇軍對無線電的使用程度顯然無法與德軍相比。

與英國陸軍一樣，一九三〇年代美國陸軍認為電話線與傳統傳令兵才是適當的通信方式——事實上，美國在一九一八年派往歐洲的遠征軍就是採用這種方式。但在新成立的機械化部隊（很快就改名為裝甲部隊）施壓下，陸軍通信部隊實驗室開始研發高品質的調頻無線電設備以供戰車使用，而且使用石英晶體來維持穩定頻率、良好接收效果與避免干擾與攔截。一九四〇年夏天在路易斯安那州舉行的演習顯示，調頻無線電對於管制戰場裝甲部隊有著很好效果。SCR—508於是成為標準的戰車無線電設備，可以在戰車與戰車以及戰車與戰術司令部之間進行雙



向通信，SCR—508也在一九四四年歐洲的主要裝甲作戰中充分證明其價值。<sup>93</sup>調頻石英晶體唯一的問題是容易因為老化而突然故障。美國物理學家伯頓（Virgil Bottom）受僱於通信部隊實驗室的石英晶體部，他最終發現問題所在並及時在諾曼第登陸戰之前找到了解決方法。到了一九四四年，美軍每支部隊擁有的無線電數量不僅是各交戰國中最多的，無線電設備的可靠度與性能也是最好的。<sup>94</sup>

對步兵部隊來說，特別是支援戰車推進的步兵部隊，最容易出現通信問題。早期的無線電龐大笨重，在行進間難以操作。然而絕大多數作戰都是機動作戰，因此必須找到方法讓地面部隊可以與裝甲部隊或砲兵通信，並且透過對前方步兵進行「聲音管制」來確保戰術上的有效部署。要建立一套通信網路，讓司令部與小部隊及小部隊與小部隊聯繫起來，這件事本身並不容易，主要是因為裝甲部隊、砲兵與步兵使用的無線電頻率不同。英軍直到一九四五年才引進共同頻率，而美軍直到一九四四年最後幾個月才讓步兵與裝甲部隊使用相同的無線電頻率。以美軍的作戰模式來說，步兵與戰車應該要一起前進，因此兩個兵種無線電頻率不同確實構成問題。步兵一般使用的無線電是SCR—586調幅「手提對講機」（手機的原型）與較大型需要兩個人操作的SCR—300調幅「步行對講機」，而這兩種對講機都與戰車使用的SCR—508調頻無線電不相容。為了呼叫支援或提供情報，步兵必須透過戰術指揮中心傳遞訊息，這個程序太過緩慢，無法讓人立即取得需要的回應。為了規避這個問題就需要找出變通辦法：美軍有時候會把步兵無線電放在戰車裡，但戰車的噪音與行進使步兵無線電的效能受到限制。最常見的解決方式是使用焊在戰車後方的野戰電話，這個電話可以與戰車內部對講機聯繫。步兵可以直接指示戰車乘員目標所在與可能風險，不過步兵也有可能因此成為敵方狙擊手的目標。<sup>95</sup>

雖然前線無線電對協助小部隊協調行動與呼叫支援極為重要，但實際上要建立這樣的通信網路卻十分困難。除了頻率不穩定、真空管破損或工程品質不佳等技術問題，無線電通信也很容易受到大雨、海水、河水與不適合的地形影響。山地與丘陵限制了無線電通信的距離，甚至讓無線電完全中斷，如盟軍一九四三年初在突尼西亞遭遇的狀況，或者在義大利往北推進時也經常如此——士兵必須把無線電綁在驢子上，運到山頂才能讓無線電恢復功能。無線電操作員在作戰時也顯得特別脆弱。好比當他們參與兩棲作戰時候，沉重的設備偶爾會讓他們沉入水中。而無線電的天線特別容易洩露無線電操作員的位置，敵方的狙擊手不會放過這點，並且把無線電操作員視為主要目標。儘管如此，隨著無線電設備變得愈來愈可靠輕便，無線電也開始配發給小部隊，由一到二人負責操作。德國暱稱「朵拉」的Torn Fu. d與暱稱「古斯塔夫」的Torn Fu. g無線電，都是可靠且容易攜帶的電設備，通信距離可達十公里。英國部隊配備效能較差的WS 38「步行對講機」，通信距離不到一公里，另外還有需要由兩人操作的大型設備WS 18，通信距離達到八公里。雖然一般認為WS 38不太可靠，但在戰爭期間這種可攜式的WS 38還是生產了十八萬七千臺，在整個歐洲都可看到這種無線電設備的身影。英國陸軍在整個二戰期間總計取得了五十五萬兩千臺無線電設備，充分見證了無線電在戰場上不可或缺的價值。<sup>96</sup>

前線無線電的問世有一段曲折的歷程。在太平洋戰場，美軍初期作戰無線電通信品質不佳，導致了不必要的嚴重傷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塔拉瓦戰役，指揮艦馬里蘭號就是缺乏適當的無線電設備與搶灘的海軍陸戰隊通信。當時戰鬥艦主砲的震盪效應影響了無線電的效能，而海軍陸戰隊上岸之後，他們攜帶的海軍TBX與TBY無線電又因為泡水與電池沒電而無法運作。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沖繩戰役，專用的指揮艦已

配備性能較佳的無線電，對於組織戰術戰場大有助益，降低了傷亡人數。<sup>97</sup>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英美首次在北非進行兩棲登陸，同樣也未能建立有效的無線電通信網路。調幅無線電會受到暴雨與頻率擁擠的影響。許多無線電操作員都是在艦艇行經大西洋時在船上接受簡單訓練，無線電的供給與替換也面臨不足。更糟的是，美軍與英軍的無線電系統並不相容，必須經過調整才能相互通信。由於無線電的表現不佳，英軍由奧斯汀少將（Alfred Godwin-Austen）組織了委員會，負責評估以往的經驗，讓無線電能發揮更大的效果。委員會及時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做出結論，可以在入侵諾曼第之前針對無線電的使用進行改善。<sup>98</sup>到了一九四四年，無線電終於成為英美必要的軍事裝備。此時英軍使用的無線電數量已是一九四〇年的十倍。美軍在D日擁有九萬臺無線電發射器，絕大多數是較可靠的調頻石英無線電，這些無線電使用全新的頻率以混淆德國的通信情報人員。在這個階段，美國一個月已能生產兩百萬臺石英無線電，反觀戰前一年只能生產十萬臺。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間，盟軍在法國境內長途追擊德軍，無線電發揮了很大的功效。無線電還可以與地面雷達配合，有效指揮與管制盟軍砲兵部隊的強大火力。<sup>99</sup>

二戰期間戰術空軍的演變也與無線電息息相關。空軍希望取得高效能無線電，而且也優先配置無線電。一九四〇年夏秋之際，英國參與不列顛之役的飛機都裝設了特高頻無線電，飛行員可以彼此通信，也可以與地面管制站聯繫。一旦雷達或地面觀測站發現敵軍入侵，就由地面管制站指揮飛機前往目標空域。飛機進行防衛時，必須仰賴無線電整合整個作戰空域。相較之下，攻擊方的飛機要進行組織則較為困難，不僅要仰賴前進地面管制中心對攻擊飛機進行聲音管制，在發現需要摧毀的地面目標時，也需要無線電讓飛機與陸軍（或海上艦艇）相互聯繫。德國陸軍與空軍的無線電頻率雖然不同，但德國空軍在波蘭與法國戰役中依

然成功完成任務。德國空軍在陸軍部隊派駐了聯絡官，負責整合空中與地面作戰。入侵蘇聯時，空軍在每個裝甲師都派駐了通信聯絡小隊，負責呼叫空中支援。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東線戰役，德軍戰車指揮官與支援的飛機已可以直接無線電聯繫，兩個兵種都使用相同的無線電頻率。<sup>100</sup>

在戰術空軍的無線電管制上，盟軍同樣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趕上德軍。法國戰役慘敗後，英軍由伍德爾中校（J. Woodall）組織了一個聯合陸空小組，負責協調陸軍與空軍的角色。一九四〇年九月完成的《伍德爾報告》建議成立聯合管制中心，在接收到前線通信部隊提供的詳細目標資訊之後，便能立刻派遣飛機趕往需要的地區。儘管這項提案獲得正式批准，然而在北非進行沙漠作戰時，除非有足夠的飛機與技術良好的無線電操作員，否則要對移動快速的飛機進行無線電管制極為困難。此外，陸軍對無線電存有偏見也是急需克服的問題。<sup>101</sup>一九四一年秋天，前進空中支援戰術通信網路成立，前線部隊終於可以用無線電呼叫空中打擊，但前線部隊的要求必須先送回英國皇家空軍司令部尋求批准，導致作戰時機延宕。一九四二年初，英軍終於建立更複雜的無線電通信網路，並且設立可以隨陸軍移動的前進空中指揮中心，能夠運用特高頻無線電指揮正在空中執勤的飛機從一個地面目標移動到下一個地面目標。大約有四百輛特高頻通信車輛跟隨陸軍移動，透過無線電提供敵軍陣地的詳細資訊讓飛機進行攻擊。至此，英軍的通信技術不僅仿效了德軍，甚至超越了德軍。<sup>102</sup>

蘇聯空軍也必須向德軍學習。戰爭開始的前幾年，由於缺乏無線電，偵察機有時甚至必須先降落回機場才能警告其他飛行員準備作戰，然後再起飛帶領飛行員前往目標區，用目視的方式讓他們知道目標在哪裡。在沒有無線電的狀況下，蘇聯空軍部隊必須採取跟隨領隊的編隊隊



形，使得他們很容易成為德軍攻擊的目標。德軍因為配備了無線電，因此可以更靈活地作戰。紅軍戰爭經驗分析部的報告特別提到，蘇聯空軍作戰協調管制的不足。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新任空軍總司令亞歷山大·諾維科夫在史達林格勒前線引進了中央管制的無線電導航系統，利用無線電與雷達引導飛機攻擊空中與地面目標。另外還建立了輔助地面管制站，透過無線電與空軍基地及飛機聯繫，這些管制站位於前線後方二到三公里處，管制站彼此之間相隔八到十公里。蘇軍頒布的新野戰手冊「針對空軍提出指令，要求空軍必須以無線電管制、通知與引導飛機」，此後德國飛行員幾乎很快就能看到蘇聯飛機升空進行攔截。要在整個廣闊的前線設立無線電網路需要時間，要讓蘇聯飛行員瞭解與仰賴無線電管制也不是馬上就能做到。最初，蘇聯軍隊傳遞訊息時並未譯為密碼，德軍通信情報人員可以很輕易地截聽蘇軍情報。蘇聯的無線電系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的庫斯克防衛戰役上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直到夏秋季獲得美國供應的無線電站與美國租借的四萬五千臺空用無線電，才使蘇聯得以在長期反攻中讓軍隊人數優勢發揮到最大。<sup>103</sup>

與蘇聯空軍一樣，美國陸軍與海軍航空隊都經歷了一段艱苦的學習過程。一九四一年八月的瓜達康納爾戰役，呼叫空中支援是決定成敗的關鍵，然而海軍、海軍陸戰隊與陸軍航空軍卻使用各自不同的無線電頻率。應急的做法是建立「空中前進觀測員」系統，觀測員使用裝有兩個麥克風的改良無線電進行回報，讓鄰近的海軍無線電也能收聽。<sup>104</sup>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西北非的登陸作戰中，空用無線電的效能不佳，主要是因為缺乏適當的補給與人員，難以迅速建立可靠的無線電與雷達網。陸軍航空軍司令史巴茲抱怨說美軍擁有一個「拙劣又難用的通信系統」，更不用說英國與美國的空中管制頻率也不一樣。<sup>105</sup>北非戰場的教訓，最終催生出更好用的通信系統。盟軍反攻法國時，為了進行地面

支援作戰，空中支援小組也跟隨陸軍部隊出動，如此才能立即向空中支援管制站要求空中支援。到了一九四四年夏末，空中支援小組配置了一名無線電操作員，負責在前導戰車中使用特高頻無線電，在空中巡邏的飛機也使用空軍配備的SCR—522無線電，因此操作員可以立刻呼叫飛機進行空中支援。在這個階段，戰場上已經相對較少出現德軍飛機，美軍因此可以使用小型的L—5「馬蠅」（Horsefly）聯絡機在地面部隊前方飛行，並以無線電回報可能的目標。<sup>106</sup>無線電現在已構成複雜通信網的一環，可以連結起地面管制站與飛機、飛機與飛機以及飛機與地面部隊。軸心國與同盟國的無線電通信系統都未盡完善，但無線電確實放大了飛機在戰場上的打擊能力。而隨著同盟國逐漸學會如何運用無線電，優勢也開始朝同盟國傾斜。

無論是用來進行空中戰鬥還是支援地面部隊，無線電可以有效管制飛機，其實與雷達的演進與發展密不可分。傳統上，預警來襲敵機的方式是使用大型的聲波感測器，然而這種感測器在作戰時用處不大，經常只能偵測到微弱的噪音。為了尋求更有效的預警方式，軍方開始嘗試運用無線電波來進行偵測。各國都在進行無線電波的研究，而研發雷達所需的科技實際上各國也都具備。有兩項關鍵零件分別來自於日本與德國，一項是一九二六年由日本物理學家八木秀次研發的八木天線，另一項是一九二〇年德國發明的磁控管（Barkhausen-Kurz tube），用於製造接受器與發射器。不過這兩項專利都已授權給國外，因此實際上各國都能取得這兩項零件。一九二〇年代末與一九三〇年代初，電視的商業發展同樣遍及整個工業化世界，而且對雷達的發展有著重要貢獻，其中陰極射線管可以用在雷達設備上，能將偵測到的物體顯示成容易判讀的影像。民間產業在提供引領創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也使雷達成為可能，如德國的德律風根、美國與英國的奇異公司、日本的日本電氣等等。或

許不令人意外的是，由於科學的跨國性質，與雷達相關的研究幾乎同時發生於各主要國家，而這些國家日後也都成為了交戰國。因此，我們很難說是哪個人或哪個國家「發明」了雷達。

如果雷達的發展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必然趨勢，那麼雷達最初的起源其實既是充滿遠見，也是機緣巧合。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匈牙利物理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提出的主張吸引了英國空軍部科學研究主任溫珀里斯（Henry Wimperis）。特斯拉表示，集中無線電波可以形成「死光」，擊落來犯敵機。溫珀里斯於是要求無線電研究站站長華生瓦特（Robert Watson-Watt）調查這項主張的可行性。華生瓦特回報說，這項主張在科學上並不可行，但無線電射束雖然「無法用來毀滅目標，卻可以用來偵測目標」。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華生瓦特根據他利用無線電脈衝與反射回波測量電離層的成果，在距離英國廣播公司BBC設置於達文特里（Daventry）的發射器幾英里遠的地方進行實驗。一架亨德里．佩吉．赫福德轟炸機（Handley Page Heyford）沿著無線電射束飛行，反射出清楚的信號給地面接收站。實驗結果終於提供了一個防禦敵機攻擊的有效方法，華生瓦特興奮地叫道：「英國再次成為一座島嶼！」<sup>107</sup>

英國團隊一直被視為「測距與測向」的發明者，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美國海軍工程局就已經提出「以無線電偵測目標」的專利申請。一個月後，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也證明脈衝雷達可以偵測到一點五公里以外的飛機，而美國陸軍通信部隊實驗室也在同年開啟了「無線電定位」計畫。德國物理學家庫恩霍爾德（Rudolf Kühnhold），同時也是德國海軍無線電研究單位主任，也在一九三四年利用無線電波偵測船舶，隔年五月，也就是達文特里實驗之後不到三個月，他就成功證明脈衝雷達的用途。<sup>108</sup>蘇聯的研究起步更早，一九三

三年八月，列寧格勒中央無線電實驗室獲得總砲兵局授權研究無線電偵測以協助防空。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蘇聯物理學家奧什切科夫

（Pavel Oshchepkov）在列寧格勒一棟建築物的屋頂進行實驗，顯示無線電信號可以被遙遠的物體反射。<sup>109</sup>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取得相關發現後就立刻瞭解它的軍事用途，而雷達也突然間成了各國急欲隱藏的祕密。

雖然各國同時發現了雷達，但隨後的發展卻出現歧異。相較於不採用脈衝間距而是以連續波傳輸為基礎來偵測的雷達，英國、美國與德國都是從一開始就採用脈衝雷達。這種雷達大約每微秒會發射一個脈衝，然後會在幾微秒後接收到偵測物體的回波。這個過程可以增強無線電射束與測量接收器與物體的距離（防空的關鍵要素），也能測得物體的飛行方位。高度（或方位角）的估計較為困難，但可以額外添加設備來加以解決（英國增加了測角器，可以計算飛機的方位）。連續波傳輸雷達對距離、高度與方位的指示不盡理想，甚至無法測量。蘇聯的雷達研究就是因為空軍與陸軍看法不一而陷入多頭馬車的情況：空軍堅持使用脈衝雷達，但陸軍卻以為連續波雷達已可滿足防空砲的需求。然而，事實證明陸軍的想法完全行不通，因為連續波雷達無法計算飛機的距離。更慘的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時期的政治干預，導致許多資深的無線電與雷達研究人員遭到逮捕，包括雷達先驅奧什切科夫，他被送進古拉格關了十年。<sup>110</sup>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海軍與陸軍普遍不相信雷達偵測的用途，而當日本終於在一九四一年於中國沿海與日本本島建立初步的雷達系統時，這些連續波雷達站只能指示飛機出現，卻無法偵測飛機的距離與方位。日本的雷達系統因此在作戰上毫無用處，但日本還是維持這套系統直到戰爭結束為止。日本陸軍與海軍在發展雷達上不願合作，而少數致力研究無線電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則被軍事體制邊緣化，



因為軍方並不信任民間的介入。<sup>111</sup>義大利的狀況更糟。義大利於一九四〇年參戰時，國內根本不具備發展雷達的能力，對無線電偵測的研究也擺在較低順位。軍方傾向於選擇連續波雷達，但即便如此，整個義大利海岸也未建立適當的雷達網。一九四一年，義大利終於改成在海岸與艦艇防衛上使用脈衝波雷達，代號「秧雞」（Folaga）與「貓頭鷹」（Gufo），但最終只生產了十二個，難以影響大局。義大利陸軍研發了「山貓」（Lynx）飛機偵測雷達，但直到投降前也只是少量生產。義大利的雷達網最終在一九四三年完成，然而卻是由德國人設置的，目的是保護駐紮在義大利的德國軍隊。<sup>112</sup>

陸軍與海軍起初對雷達偵測的興趣，都集中在對來襲敵機進行預警，提供足夠資料與時間來啟動防空措施，或讓戰機緊急升空攔截。一九三〇年代中期，英國開始認為雷達是降低轟炸機攻擊潛在威脅的重要手段。政治人物與民眾也對遭受空襲感到憂心，他們認為在即將到來的戰爭裡，這樣的威脅勢必會造成關鍵影響。一九三五年下半，距離達文特里實驗過後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英國首次下令在南岸與東岸建立五座「連鎖家園雷達站」。到了一九四〇年，從西南部的康瓦爾到最北邊的蘇格蘭，總共設立了三十座雷達站。為了偵測低空飛行的飛機，又設立了三十一座「連鎖家園低空雷達站」。這些雷達站的表現不盡理想，因為早期雷達只能偵測海面，無法偵測內陸飛機，因為陸地偵測會受到地面雜波的干擾。飛機的高度也很難精確測量，部分是因為許多操作員只受過簡單訓練，需要實際作戰經驗才能充分發揮雷達站的效能。<sup>113</sup>儘管如此，一旦將雷達整合到無線電及電話網中，雷達就能發揮功能及時警告英國戰鬥機，使其在一九四〇年順利攔截經常在日間入侵的德軍飛機。雷達的性能在二戰期間不斷改善，而且其對抗的敵軍戰機也逐漸減少。

一九三〇年代晚期，美國擔心日本或德國飛機可能從拉丁美洲的基地發動突襲，因此開始在沿海地區裝設防空雷達。一九三七年，美國政府授權發展遠距偵測雷達，到了一九三九年已成功研發出機動與固定雷達。一九四〇年，美國設立首座固定式雷達SCR—271以防衛巴拿馬運河；同年二月，防空司令部開始運作，建立雷達站網與空中攔截部隊連結，這套雷達站網與英國的雷達系統大致相同。由於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而且在重整軍備的大環境下，各方都競相提出需求，導致雷達站的興建時間延長。結果就是到了珍珠港事件發生時，美國東岸只設立了兩座雷達站、太平洋地區六座。這些雷達可以偵測方向與距離，卻無法偵測高度。此前許多雷達站都在戰爭部指示下設在山頂，之後便不得不拆遷到高度較低的地點才能讓雷達充分發揮效能。美國的海岸雷達在經過持續調校後才得以達到英國雷達的水準。最後，美國總共在太平洋岸建立了六十五座雷達站，在東岸建立了三十座雷達站，廣大的雷達網才告完成。到了戰爭末期，地面管制攔截雷達SCR—588已可以在同一螢幕上同時追蹤敵機與友機，而且還能提供距離、方向與方位角數據。至於SCR—516雷達則與英國連鎖家園低空雷達相同，能偵測方圓一百公里以外的低空飛機。<sup>114</sup>美國的東岸與太平洋沿岸到頭來並未遭受敵方的空中攻擊，因此由雷達、戰鬥機基地、無線電通訊與地面觀測站構成的複雜系統從未受到考驗。但對一九四〇年的英國來說，這套系統對生存卻是至關重要。美國雷達站實際處理的主要是國內空軍大量的訓練飛行。光是一九四二年七月，洛杉磯防空地區就監控了十一萬五千架次的訓練飛行，卻沒有偵測到任何敵機。<sup>115</sup>諷刺的是，這套在戰時從未受到考驗的雷達系統，唯一一次偵測到敵機就是準備攻擊珍珠港的日本軍機，結果雷達卻完全未產生預警的功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軍已經在歐胡島北岸的歐帕納山脊設立雷達站。十二月七日清晨，兩名雷達操

作員如實回報有大量機群逼近，結果上級卻告訴他們那是我方的轟炸機前來支援太平洋基地。隨著雷達螢幕逐漸充斥著背景雜音，兩名操作員遂放著雷達站不管，自行出去吃早餐。<sup>116</sup>

德國空軍在德國的西部邊界與歐洲占領區的北部海岸，設立了最精密與偵測範圍最廣的雷達防衛螢幕。從一九四〇年五月首次空襲英國，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戰爭結束，這兩個地區的空戰從未停歇。德國空中預警雷達是由兩家德國民間公司GEMA與德律風根研發，德國空軍通信長馬提尼將軍（Wolfgang Martini）將這個設備交由德國空軍使用以建立防空系統。GEMA公司發明了「弗蕾亞」（Freya）雷達，利用廣無線電波長進行偵測，偵測範圍可以達到岸外一百三十公里。一九三九年，德國進一步改良雷達，增加了目標高度測量，使戰鬥機能精確進行攔截。一九四〇年，德國繼續提升雷達性能，把八個弗蕾亞雷達連結成一座雷達，代號「水妖」（Wassermann），偵測距離達到三百公里。一九四一年，德軍再將十六個弗蕾亞雷達連結起來，新雷達代號「猛獁象」（Mammoth），偵測距離同樣也是三百公里。有了加強版的雷達，英國飛機一從英格蘭東部基地起飛，就會被德軍偵測到。德律風根無線電研究實驗室主任倫格（Wilhelm Runge）研發了火炮射向賦予雷達，代號「符茲堡」（Würzburg），使防空砲火更為精準。「猛獁象」與「符茲堡」成為德國防空系統的標準配備。到了戰爭末期，符茲堡由「大符茲堡」與「曼海姆」（Mannheim）加以補充，曼海姆是一種火控雷達，偵測距離三十公里，可以提高防空砲命中率。一九四四年，為了對付低空飛行的戰鬥轟炸機，德軍引進機動搜索雷達Fu MG407。這種雷達安裝在改裝卡車上，可以持續移動，填補弗蕾亞與符茲堡雷達之間的空隙。<sup>117</sup>

雷達與戰鬥機防衛部隊、探照燈以及防空陣地共同組成代號「天

床」(Himmelbett)的防線，不過這道防線通常稱為「卡姆胡伯防線」，防線名稱來自帝國戰鬥機防衛部隊第一任司令官卡姆胡伯將軍(Josef Kammhuber)。德軍雷達帶從瑞士邊境開始，經過法國北部與比利時，最遠抵達德國丹麥邊境。與英美一樣，德國雷達系統的運作並不完美。不僅缺乏具備技術的雷達操作員，雷達的生產也非常緩慢。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只有三分之一的防空砲裝設了符茲堡火砲射向賦予雷達系統。<sup>118</sup>後來發現，雷達很容易受到人為干擾，特別是小型的金屬箔片(英國稱為「窗戶」，而美國稱為「穀殼」)——自一九四三年夏天開始，盟軍投放了成千上萬的金屬箔片來覆蓋德軍的雷達螢幕。儘管如此，德軍的防衛帶配備了遠距雷達偵測、雷達管制火砲與雷達管制的戰鬥機攔截，不分晝夜地進行防衛工作，造成英美轟炸機的慘重損失。到了一九四三年冬天，德軍雷達幾乎完全瓦解了盟軍的轟炸機攻勢。

不讓空軍雷達專美於前，海軍雷達也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迅速跟進，開始進行預警工作。事實上，英國、美國與德國的海軍研究機構正是促使雷達從靜態海岸偵測系統往前邁進的主要推手。一般而言，研究步調的快慢可以反映出海軍是否願意承認空權已經改變了戰鬥艦與飛機在維護海權上的均勢。對海軍而言，以無線電偵測來襲飛機是避免空襲造成嚴重損害的唯一辦法，除了能及早警告航空母艦，也能啟動其他軍艦的防空系統。雷達還能協助航行，不僅可以避免船隻在戰鬥或護航時發生碰撞，也能偵測水面船隻與潛艦。有了火砲射向賦予雷達，就可以利用夜間、起霧與雲層掩蔽自身行蹤攻擊敵艦——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馬塔潘角海戰就是一個早期案例。在這場戰役中，數艘義大利軍艦遭到英軍擊沉。不過，在海上使用雷達也帶來新的困難：雷達不能接觸到水與冰，天線容易受到天氣與戰鬥影響。而且雷達需要穩定的平



臺，但船隻卻會隨著海浪而顛簸搖晃，雷達也會因為艦艇發射主砲造成的震動而無法運作。德國戰鬥艦俾斯麥號在與英國皇家海軍首次交火後雷達便無法運作，導致俾斯麥號無法偵測到劍魚式魚雷轟炸機來襲，最終遭魚雷攻擊而癱瘓。<sup>119</sup>這些問題後來都陸續找到解決辦法，使雷達成為海戰獲勝的關鍵因素，尤其英美的海軍雷達研究與發展開創了日後許多新科技的應用。

在英國，由於岸基預警系統不符合大型艦艇的需求，海軍實驗處於一九三五年開始獨力進行研究，並於該年九月成功複製達文特里的脈衝雷達實驗。一九三七年，海軍通信學校接續這項研究，一年後研發了第一個能偵測飛機與水面艦艇的海軍作戰雷達79Y型，並且實驗性地裝設在羅德尼號（*Rodney*）戰鬥艦上。往後兩年，這套雷達系統持續調整改良，使其能給予防空砲正確的射擊距離或者使艦艇主砲能瞄準遙遠的水面艦艇。79Y型後來衍生出不同的型號：281型用來偵測艦艇、282到285型發展成武器測距儀，不過這類設備需要海軍人員熟悉性能之後才能真正發揮效果。此外，為了偵測低空飛行的飛機，對海搜索雷達也在經過調整後組成了286型。<sup>120</sup>艦載機裝備了對海搜索雷達Mk. II，而正是這種雷達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讓勝利號（*Victorious*）航艦的劍魚式魚雷轟炸機在低雲層、海況惡劣與夜幕低垂下找到了俾斯麥號。德國雷達同樣也是在海軍的督促下獲得發展。德國第一座岸基與海基作戰雷達是DeTe-I，一般稱為「海上節拍」（Seetakt）。一九三八年，升級成DeTe-II的雷達成為空軍弗蕾亞雷達的發展範本。DeTe-II雷達最初裝設在命運多舛的袖珍戰鬥艦斯皮上將號（*Admiral Graf Spee*）上。德國海軍於一九三八年引進敵我識別系統，稱為「初生子」（*Erstling*），空軍之後也跟著採用。<sup>121</sup>飛行員使用預先設定的脈衝信號聯繫己方雷達，顯示他們並非敵軍，這樣操作員就不會下令開火。到了一九四〇年，所

有主要國家的空軍都已採用敵我識別系統做為標準配備，不過敵我識別系統的信號很容易被攔截而遭敵方利用，或者又以美國為例，美國許多飛行員在近岸進行訓練飛行時，往往因為沒有敵機入侵而危險地忽視敵我識別系統。義大利由於沒有發展敵我識別系統，因此義大利飛行員經常抱怨他們會無差別地遭受來自盟友德國的防空砲射擊。

美國海軍實驗室也在一九三四年開始獨立進行雷達研究計畫，到了一九三七年四月，海軍完成戰鬥艦上的雷達測試。一九三九年一月，海軍在紐約號戰鬥艦裝備第一個作戰雷達XAF。隔年，兩名海軍軍官用首字母縮寫創造了「雷達」一詞，他們原本只是為了替研究命名，但不久「雷達」這個詞彙就被整個英語世界沿用，用來表示所有形式的無線電偵測。海軍也對雷達做了各項調整以符合海軍的需求。一九四一年底，海軍引進SK雷達，這種雷達運用了平面位置指示器這項基礎發明，可以顯示戰鬥環境與周圍的地理影像。航空母艦能夠區別敵我飛機，對艦載機來說非常重要，於是從一九三七年開始，美國海軍開始發展自身的敵我識別系統。一九四一年，所有艦載機都裝設了對海搜索雷達，此外也開始發展雷達導引的轟炸瞄準器，這項設備使艦載機可以在夜間或多雲的天氣轟炸敵軍艦艇。一九四四年，駐紮在中國的美國第十四航空軍宣稱擊沉了十一萬噸的日本船隻，他們使用的就是能在夜間轟炸小型目標的雷達轟炸。到了戰爭結束時，美國總共生產了兩萬七千座標準對海搜索雷達。<sup>122</sup>美國陸軍與空軍幾乎沿用了所有海軍雷達設備，並且基於自身的需求加以調整改造。火砲射向賦予雷達不僅在海上，在陸上也是防空砲重要的附屬裝備。英國的火砲射向賦予雷達Mark II (GL-Mk II) 平均每四千一百發砲彈可以擊落一架飛機，反觀早期並未裝備雷達的Mark I需要一萬八千五百發砲彈才能擊落一架飛機。海軍使用雷達之後，各國空軍也開始使用空中攔截雷達，讓飛機在地面雷達協助下能在

夜間或惡劣天氣下接近敵機。一九四一年初，英國皇家空軍夜間戰鬥機引進地面管制攔截，德國飛機的戰損於是從百分之零點五增加到百分之七。德國在戰爭晚期發展出來的「列支敦斯登」（Lichtenstein）與SN2空中攔截雷達，同樣也成功引導德國夜間戰鬥機攻擊盟軍轟炸機群。

早期脈衝雷達使用的都是廣波長。德軍雷達使用的是分米，通常是五十公分的波長，其他雷達波長絕大多數介於一點五公尺到三公尺之間。一九三〇年代初，人們已經知道如果使用微波，不僅可以提高雷達精確度，還有更多其他功能。但由於德國與日本最初的研究結果顯示，憑藉既有的真空管無法製造出微波雷達，因此使用微波的嘗試只能暫告中止。就像首次觀測到無線電回波一樣，微波科技的關鍵突破也是一連串幸運的偶然。一九三九年，英國真空管發展協調委員會把研發高功率真空管、使其能在厘米波長下運作的任務外包給牛津、布里斯托與伯明罕三所大學。在伯明罕，澳洲物理學家奧利芬特（Marcus Oliphant）僱用了兩名年輕的博士生藍道爾（John Randall）與布特（Henry Boot）參加他的研究團隊。科學家長久以來一直對速調管或磁控管（這兩種先進真空管是過去微波研究的基礎）何者能產生厘米波長所需的必要功率有所爭論，但藍道爾與布特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他們同時使用這兩種真空管並將兩者融合起來，形成所謂的「振盪多腔磁控管」。首次實驗顯示，多腔磁控管可以產生高功率。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藍道爾與布特向奧利芬特與其他團隊成員展示多腔磁控管，顯示多腔磁控管可以產生九點八公分的波長。接下來的生產工作就交給英國奇異公司，奇異公司的實驗室取得英國皇家海軍的贊助，負責生產速調管與磁控管。五月，奇異公司生產出可運作的型號，八月，電信研究機構進行展示，顯示振盪多腔磁控管在脈衝系統下可以產生清楚的回饋，即使是微小物體的回波也能接收得到（在展示中，他們讓人在附近的懸崖頂上騎腳踏

車，腳踏車上的金屬牌子產生了明顯的回波）。多腔磁控管被定名為E1198之後，就被放入金屬盒中。同月，蒂澤德（Henry Tizard）率領的科學代表團帶著這個金屬盒子前往美國。九月十九日，這個金屬盒子祕密在華府重要科學家會議上揭露，引發劇烈的回響。從英國護送多腔磁控管前往美國的波文（Edward Bowen）回憶說，我們這時才發現，「放在桌上，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東西，也許可以挽救盟軍的命運」。<sup>123</sup>

振盪多腔磁控管轉變了英國與美國的雷達。蒂澤德代表團把多腔磁控管交給美國微波委員會，條件是對方能組織量產。量產的任務交給了貝爾電話實驗室，到了戰爭結束時，貝爾電話實驗室已經生產了超過一百萬個多腔磁控管，其中絕大多數從一九四一年的「綑綁式」多腔磁控管加以改良，強化了頻率穩定性。此時，雷達研究已經在美國武裝部隊取得重要地位。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在杜布里吉（Lee DuBridge）的領導下，把發展微波科技視為主要目標。在美國參戰的第一年，為了避免資源重複投入構成浪費，便於一九四三年夏天在英國設立輻射實驗室的分支單位。<sup>124</sup>先前在戰場上發展的雷達，此時都被擱置，準備迎接更精準且更多工的設備。最初優先生產的是微波空中攔截雷達與微波火砲射向授予雷達，使防空砲具備自動測距與射擊的功能。一九四二年夏天，空中攔截雷達SCR—520問世，之後又升級為SCR—720。由於微波雷達的性能優越，美軍決定在所有戰機上裝設微波雷達，英國空軍隨後跟進，以空中攔截雷達Mk. X取代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引進的Mk. VII。火砲射向授予雷達SCR—584是戰時最成功的雷達。利用裝在M9預測儀上的類比電腦來測量距離與高度，之後火砲便可自動精準地射擊敵機。這種雷達不僅可以用在防空砲上，也可以用於地面戰鬥，可以穿透煙霧與黑暗，追蹤彈道並且偵測敵軍迫擊砲、車輛乃至於單兵的軌跡。在D日當天，總計有三十九座雷達被運到諾曼第岸上。美



軍火砲與防空砲因此可以精確命中目標。<sup>125</sup>

起初發展的微波雷達波長是十公分，然後是三公分，到了戰爭結束時已減少為一公分。轟炸機利用三公分波長來偵測地面，藉此更精確地命中目標。英美兩國在雷達研究上因為競爭而出現摩擦，轟炸機使用的微波雷達也成為兩國爭論的焦點。英國研發了H2S設備，波士頓輻射實驗室則把自己研發的版本稱為H2X，雙方都不願建立相容的系統。英美在防空砲彈引信的微系統上取得較多的合作成果，這種引信可以利用小雷達追蹤目標，然後在正確時刻引爆。澳洲物理學家布特曼（William Butement）在英國研究雷達，他在一九四〇年首次提出新型引信，蒂澤德科學代表團將他的發明帶到美國。隔年，布特曼的概念在美國獲得充分發展。一九四三年一月，「近炸引信」首次投入太平洋戰場，用來對付敵機，並轉變了太平洋戰場的艦空作戰方式。然而，盟軍在歐洲戰場卻很少使用近炸引信，主要是擔心這項科技會落入德軍手裡。儘管如此，近炸引信卻可以在英國空域使用，而且成功運用在反制V1飛彈上，估計有五成的V1被近炸引信擊落。一九四四年底，近炸引信終於在法國與比利時戰役登場。在突出部之役中，裝了近炸引信的砲彈至少擊落了三百九十四架德軍飛機。到了一九四五年，盟軍估計已生產了兩千兩百萬枚近炸引信。<sup>126</sup>

微波雷達證明是海戰的珍貴資產。英國海軍部升級對海搜索雷達，使其能更精確地偵測德軍潛艦。一九四一年初，271型雷達準備就緒，這是第一座加入作戰的微波雷達。在使用微波的狀況下，雷達不僅可以偵測到潛艦，就連伸出海面的潛望鏡也一覽無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艘被微波雷達偵測到的潛艦在直布羅陀外海被擊沉。英國皇家海軍的艦載微波雷達擁有較佳的火砲射向賦予設備、導航設備與目標指示器。美國海軍堅持仰賴海軍研究實驗室而非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

室來研發海軍雷達，並且生產了種類多樣的厘米雷達以供艦載機、航空母艦與其他軍艦使用。大型軍艦與輕型航空母艦裝設了SM與SP雷達，這些雷達可以用三維角度偵測飛機。一九四二年底，隨著十厘米Mk. 8雷達的引進，火炮射向賦予變得更加精密，能讓海軍艦砲完全仰賴儀器射擊，還能追蹤砲彈的軌跡，或是在雷達螢幕上顯示目標。Mk. 8雷達首次使用是在瓜達康納爾戰役：夜裡，一艘毫無防備的日本艦艇在十二公里外遭到擊沉，但這項新科技對於絕大多數艦長來說實在太具挑戰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尼米茲海軍上將下令，所有大型軍艦都必須成立作戰中心，協助協調與傳布雷達資訊，讓指揮官自行運用指揮。所有艦隊都設立了「戰鬥情報中心CIC」，代號「凱迪拉克計畫」（Project Cadillac）。每個戰情中心都配置大量的無線電與雷達操作員，但最關鍵的人物是「評估員」與「協調員」，前者負責評估作戰局勢，後者負責溝通資訊，給予空中作戰、防空砲或艦艇主砲需要的情報。<sup>127</sup>一旦指揮官熟悉了這種新科技，雷達便在戰爭的最後兩年起到關鍵作用。到了一九四四年，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海戰已經轉型成電子戰，日本海軍完全不是對手。

微波雷達使英國與美國的電子作戰提升到德日難以望其項背的程度。在戰爭之初，德國的雷達研究曾經生產出使用五十公分波長的優異雷達，但一九三〇年代初的微波研究卻毫無建樹，導致德國在戰爭期間完全沒有意願恢復微波研究。戰時德國的雷達研發受到獨裁制度特有的保密文化阻礙，在這種氣氛下，任何消息外洩都會受到懲罰。一九四〇年，戈林任命普倫德爾（Hans Plendl）擔任高頻研究主任，結果此人在一九四四年遭到撤換，理由是他讓關押在達豪（Dachau）集中營的猶太科學家協助修理雷達，「將機密洩露給非德國人」。普倫德爾很幸運並未被送進集中營，但電子公司西門子的研究主任邁亞（Hans Mayer）就

沒這麼好運，他因為「談話不謹慎」而被關進達豪集中營。雷達研究還因為多頭馬車而窒礙難行，各個單位之間缺乏溝通聯繫，也未能建立清楚的優先順序。一九四三年二月，德國從墜毀的英國史特靈轟炸機上取得多腔磁控管，但即便如此，德國也沒有辦法好好利用。德國人根據飛機墜毀的地點將拾獲的磁控管命名為「鹿特丹裝置」，再將其送到德律風根實驗室，該實驗室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已經生產了幾個微波裝置，但並未使用。他們研發了十厘米火砲射向賦予雷達，代號「馬堡」

（Marburg），但部署在德軍防空砲的數量並不多；一九四五年一月，德國研發了另一種微波雷達供德軍夜間轟炸機使用，代號「柏林」，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才用於作戰，此時已無法扭轉空戰戰局。<sup>128</sup>德國並未製造出近炸引信，如果有的話，可能會在對抗盟軍轟炸機的戰役上做出巨大乃至於決定性的貢獻。

日本的雷達研發受到陸軍與海軍研究機構關係不睦的負面影響，而且日本軍方也不信任民間大學與商業研究實驗室的科學家。根據八木秀次的說法，這些科學家往往被當成「外國人」看待。從國際標準來看，日本的磁控管研究已屬先進，但軍方卻對這項研究興趣缺缺。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日本兩度派代表團前往德國，德國向他們展示了數量有限的德國雷達設備，此後日本軍方才開始重視雷達研發。一九四二年初，日軍攻占新加坡與科雷希多島，取得了英軍與美軍的雷達，這讓日本實驗室得以進行逆向工程來發展日本自己的雷達。但整個研發非常緩慢，等到運用敵方科技製造出第一部雷達投入作戰，已經是一九四四年的事。與德國一樣，日本的研究計畫也是多頭馬車且過度保密，這些都構成理性發展的障礙。日本重要的無線電研究實驗室有多達半數研究磁控管與雷達的工程師被徵召入伍，在軍中淪為一名普通步兵。缺乏物資與技術人員，導致發展的優先順序遭到扭曲。許多電子零件的品質極

差，因為這些零件都是轉發給無經驗的小工廠製造，而這些小工廠往往缺乏關鍵的金屬材料。日本既有的雷達很容易受到美國電子反制的干擾，這項電子反制計畫是由美國科學家特曼（Frederick Terman）推動，他於一九四二年擔任無線電研究實驗室主任。一九四五年，美軍對日本本土進行空中作戰時，使用了一種名為「豪豬」（Porcupine）的干擾器。這種干擾器可以產生強大的無線電噪音來干擾日軍的防空雷達。到了戰爭末期，日軍終於引進了規模有限的微波雷達，首先是艦載雷達22型，然後是夜間戰鬥機專用的空用雷達FD—3，但這種空用雷達只生產了一百部。這些雷達都沒有平面位置指示器，無法顯示作戰成像。當日軍終於有了平面位置指示器時，已是一九四五年七月。直至戰爭結束，日本都沒有發展出高功率的多腔磁控管。<sup>129</sup>奇妙的是，曾經在一九三四年促使華生瓦特調查無線電偵測的「死光」觀念，反而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研究人員當成孤注一擲的手段。日本人發現，只要集中無線電射束，就可以在十分鐘內殺死一隻位於三十公尺外的兔子。然而，幾個月後，兩枚原子彈落在廣島與長崎，每枚原子彈裝設了四個雷達引信。<sup>130</sup>

對盟軍來說，無線電與雷達對戰力提升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偶爾會聽到有人說，戰爭並不是靠科技打贏的，科技的運作也不一定擁有一致的效率，或是科技也不見得沒有技術上的問題，但科技確實讓盟國的陸海空三軍在戰爭的最後幾年取得關鍵優勢。這項優勢反映出同盟國政府、科學家、工程師與軍隊的緊密結合。無線電波研究在英美受到政府任命的委員會贊助，有大量的資金挹注，而且早在美國參戰之前，研究人員與使用者之間就已經進行高度的開放合作。美國擁有先進的電子產業，因此有能力大量生產雷達。由於需要大量的合格人員，因此訓練的規模也十分驚人。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光是太平洋艦隊雷達中



心就訓練了十二萬五千名軍官與人員。到了戰爭結束時，進行雷達與無線電研究的美國海軍與陸軍實驗室僱用的員工也超過一萬八千人。<sup>131</sup>而這樣的優勢，並未存在於軸心國陣營之中。

## 戰力加成？情報與欺敵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運輸潛艦伊五十二號載運了黃金、鎢、鉬、鴉片、奎寧、橡膠與錫，突破盟軍封鎖前往德國，卻在與德軍潛艦會合後，於前往比斯開灣途中，遭美軍復仇者轟炸機投擲的聲波導引魚雷擊沉。美國戰鬥情報處破譯了該潛艦的無線電訊號，因而能夠連續追蹤數個星期，並且在確切地點攔截潛艦。德國與日本代表在法國西岸洛里昂焦急地等待日本潛艦抵達，他們打算把日本潛艦成功突破盟軍封鎖一事當成重大成就予以公開宣揚。然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沉沒的潛艦再也未傳來任何無線電訊息，人們只好認為這艘潛艦已經遭到擊沉，再加上盟軍此時已經從諾曼第灘頭堡順利突破，慶祝活動只好匆促取消。一九四四年，二十七艘運輸潛艦有十八艘因為訊號情報而洩露行蹤，最後全數遭到擊沉。最後一艘突破封鎖的水面艦艇同樣也因為雷達情報掃描而於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擊沉。<sup>132</sup>

盟軍從無線電通信取得的戰術情報，決定了伊五十二號運輸潛艦的命運。這種戰術情報通常稱為「訊號情報」，也就是SIGINT，不過就其內容而言，更應該說是「通信情報」，也就是COMINT。無論處於哪一條戰線，只要能成功攔截與解讀訊號情報，就能取得最重要的作戰與戰術情報來源。反攻法國期間，盟軍透過無線電通信取得德國陸軍三分之二的情報訊息。德國情報單位下轄的西線外國軍情處處長曾說，訊號

情報是「所有情報人員的心上人」。<sup>133</sup>訊號情報雖非獲取情報的唯一來源，但卻是最重要的一項。除了訊號情報之外，軍事與海軍情報還可以仰賴所謂的「人類情報」，也就是從間諜或戰俘取得情報，但這些情報不一定可靠（特別是當間諜遭敵方收買而故意提供錯誤情報時）；或者是來自俘獲的文件，但要從這些文件窺探敵軍的意圖或傾向並不容易；或者是來自空拍偵察照片，這些照片如果能適當地加以解讀，往往可以得出僅次於訊號情報的重要資訊。<sup>134</sup>無線電攔截的優點在於能涵蓋敵軍作戰與戰術活動的所有面向，其牽涉的地理範圍與軍隊數量極為廣泛而龐大。美國海軍的破譯密碼部門OP—20—G在大西洋之戰期間破譯了十一萬五千則德國海軍通信；到了一九四三年初，英國政府編碼與解碼學院每月也能破譯三萬九千則德國謎式密碼機通信。從一九四三年底到戰爭結束，每月平均破譯量甚至高達九萬則。<sup>135</sup>從無線電通信取得的資訊之多，反映出二戰時無線電深入軍事與海軍作戰的程度。

每個交戰國都使用了「戰術情報」與「作戰情報」。至於涉及敵軍計畫、意圖與行為的「戰略情報」則非常難以蒐集。二戰期間，各交戰國甚至多次出現嚴重的戰略誤判事件，好比美國的政軍高層未能預見日本即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起攻擊、日本誤判美國人不敢發動全面性的戰爭、德國低估蘇聯在一九四一年的實力、史達林無視超過八十次德國即將入侵的警告而造成嚴重後果，或是盟軍頑固地預期光靠轟炸就能讓德國崩潰等等。這些誤判絕大多數都是根據情報所下的決定，然而在判斷過程中卻不乏一廂情願的思考，或者是受到孤注一擲、種族或政治偏見的影響，有些甚至是因為外交電文破解得太過輕易而對內容感到懷疑。例如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就破譯了代號「魔術」的日本外交電文，卻未能及時採取行動。戰略情報經常成為勝利氣氛瀰漫下的受害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德軍發起秋霧作戰，這場反擊作戰起初能獲得

成功，關鍵就在於盟軍深信遭到痛擊的德軍已無法進行有效反擊，即使可靠的通信情報已經提供相反的證據。同樣地，德軍也曾相信蘇聯部隊已經土崩瓦解，導致他們忽略了與此相左的情報證據。

從「戰力加成」的觀點來看，作戰與戰術情報要比戰略與政治情報來得重要。作戰情報的組織與實行，反映出特定軍事文化的建立與運作方式，以及情報在多大程度上被納入戰爭決策體制之中。沒有強權會刻意忽視作戰情報，差別僅在於如何判斷輕重緩急。日本軍事情報單位分成兩個組織：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與海軍軍令部第三部。然而，無論是參謀本部還是軍令部，兩者在組織上都輕視情報，而且不讓情報人員參與作戰計畫的擬定。聯合艦隊司令部只設有一名情報軍官，而聯合艦隊轄下各個艦隊也只設有一名情報人員。在與敵軍作戰時，海軍指揮官必須獨自做出判斷。<sup>136</sup>日本並未設立中央的機構或委員會來統合情報，參謀本部與軍令部因此各行其是。當陸軍的密碼分析破解了美軍的M—94與M—209機器密碼時，他們還故意不讓海軍知道情報內容。<sup>137</sup>

與日本一樣，德國的軍事情報組織也不想讓情報人員過於介入作戰，對於向民間擴大招募情報人員之事也存在保留。結果就是德國陸軍參謀本部的1c支部得負責情報與軍隊宣傳等其他活動。德國的空軍與海軍也設有自己的情報部門。一九三九年，空軍情報部門D5只有二十九名情報人員，戰時雖然逐步擴充，但他們對作戰指揮官依然沒有太大的影響力。與陸軍一樣，德國空軍的情報人員也要負責空勤人員的福利、新聞發布、審查與宣傳。<sup>138</sup>德國各軍種的情報參謀員額很少，但負責的工作卻很多，情報參謀雖然能提供建議，但能否獲得採納則由德國各級將領自行決定，他們可以完全不理會情報而自行下達作戰訓令。與日本一樣，德國三軍各自進行情報蒐集與分享，並未統一設立中央機構進行協調。德國各地指揮官都配置了一名低軍階的參謀，負責解讀空中偵

察照片，但德國不像英國那樣在梅德梅納姆（Medmenham）設有中央情報解讀中心，可以統一解讀情報，再將資訊發送給全體武裝部隊。<sup>139</sup>德國各軍種需要的訊號情報也未能像英國一樣整合成一個全國性的情報中心。即使德國在戰術層面做了有系統且豐富的情報蒐集，但作戰層面的情報卻無法順利整合。

情報在英國與美國扮演著較為吃重的角色，而且涉及的不僅只有武裝部隊（每個軍種同樣都設置了自己的情報部門），就連民間也廣泛投入其中。一九四〇年，英國將軍方需要的科學情報工作予以機構化，一年後美國也隨之跟進。英國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成立聯合情報委員會，負責定期為戰時內閣與武裝部隊評估各項情報，再將情報整合到戰略與戰術層次的作戰計畫。三軍需要的訊號情報全集中在編碼與解碼學院所在的布萊切利園，這裡在全盛時期曾經僱用了一萬人，絕大多數是女性平民。民間專家的參與反映出民主國家戰爭動員的性質，民主國家對於情報人員（無論是軍方還是非軍方）比較不帶有偏見，願意讓他們參與作戰的規畫與評估。受僱從事翻譯或解碼的人員許多是精通古典或現代語言的大學學者。英國皇家空軍情報部門在戰時僱用了七百人，其中只有十人是空軍軍官。<sup>140</sup>更重要的是，英美兩國簽訂了正式協定，讓彼此能分享情報評估資訊，最後還建立了一定程度（幾乎是毫無限制）的情報合作。英美也致力於將情報分享給蘇聯，但雙方的合作幾乎是單向的，西方並未因此獲得更多情報來源。蘇聯只是一味地接受情報而未做任何回饋，態度也十分蠻橫粗野。<sup>141</sup>

在所有交戰國中，美國戰前的軍事情報系統是最落後的。美國的戰鬥部隊沒有專責的情報人員，也沒有專門訓練情報人員的機構。一九四一年，美國陸軍與海軍開始擴充情報部門，陸軍成立了G2，海軍成立了海軍情報局，但就像日本一樣，當時美國的陸海軍並未做好情報整合



工作。一九四一年夏天，陸軍成立航空軍情報支部A—2，該部主要仰賴英國皇家空軍無償提供的資料以及與澳洲情報單位合作。與英國一樣，美國情報部門也廣泛招募民間專家、學院人士或符合資格的大學教授。陸軍成立軍事情報局，在團級部隊建立作戰情報小隊，小隊裡也加派具備德文或日文能力的人員，使其在現場能立即訊問戰俘或翻譯俘獲的文件。海軍情報局的工作聚焦於太平洋，到一九四一年為止，美國海軍對於這個地區可說是一無所知。在海軍介紹日本飛機的手冊上，雖然已經有不少詳細資訊，但關於三菱「零式」戰鬥機的部分居然仍是一片空白。<sup>142</sup>海軍情報局總部設在華府，但在戰場上，作戰情報小隊與照片偵察的資訊則是送往太平洋地區聯合情報委員會，再由該委員會把大量情報資料分送給太平洋戰場的各作戰部隊。<sup>143</sup>陸軍訊號情報局設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廳，相當於美國的編碼與解碼學院。海軍在華府也有自己的情報局，而隨著戰事持續，陸軍與海軍情報局也逐漸發展出緊密的合作關係。到了戰爭末期，情報已經成為美國在各層面戰爭投入的必要元素。

蘇聯軍事情報組織與其他交戰國有著根本上的差異。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情報蒐集，也就是「偵察」（razvedka），就已經是蘇聯作戰準則的核心。從總司令部到最小的戰術單位，每個蘇聯陸軍與空軍編隊必定涵蓋了情報人員。至於更廣泛的作戰情報，前線蒐集到的資料會回報給格魯烏（GRU，即紅軍情報總局）以完整掌握敵軍意圖；集團軍、軍團與師司令部也各自進行作戰與戰術情報的蒐集、分析與共享。各層級司令官都有自己的情報長官與參謀，這些情報人員必須與作戰司令官密切合作。司令官必須明確提出自己需要什麼情報、獲取情報的手段與必要的兵力。在作戰時，集團軍司令每二到三個小時進行一次情報報告，軍團司令則是每一到二個小時進行一次。這些情報實際上都是在戰

線蒐集的作戰情報，主要是對敵方前線進行空中偵察（如果可能的話）、襲擊、伏擊與火力偵察來取得。一九四二年後，間諜與滲透者在游擊隊協助下可以滲透到敵軍前線後方十五公里處。前進觀測員會冒險躲在接近敵軍前線的地方，負責回報敵軍砲兵與機槍陣地的位置。蘇軍也會派出規模五到八人的襲擊小隊，目標是攫取文件、武器與戰俘，俘獲的戰俘要接受嚴酷的訊問。人類情報構成了蘇聯絕大部分需要的資訊來源，訊號情報則是直到戰爭後期才開始頻繁使用。情報是蘇聯軍事作戰的必要成分，在這裡看不到德國或日本對情報的不信任。<sup>144</sup>從一九四二年起，蘇聯情報工作的準則與組織，連同陸軍與空軍的其他改革，都變得更加嚴格與明確。一九四三年後，情報蒐集更強調各軍種之間彼此協調與系統化，不過實際運作並不完善。一九四三年四月，史達林下達訓令，要求情報人員努力蒐集情報，偵察德軍打算在哪個方向集中兵力——儘管如此，蘇聯最後還是嚴重錯估德軍在庫斯克會戰投入的兵力。<sup>145</sup>

雖然各大國都積極投入情報運作，但情報還是存在明顯的限制。這主要與情報運作的性質有關，而這些限制也影響了軍事將領相信或懷疑情報的程度。情報形成的圖像往往拼湊而不連貫，原因可能出在無法長期持續解讀敵軍通信，或者是對間諜或敵軍叛逃者提供的資訊做了有瑕疵的評估，又或者是無法正確解讀空中偵察照片。對西方盟軍來說，最糟糕的例子就發生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當時盟軍飛行員看到德軍裝甲部隊在阿登集結並且向總部回報，結果法軍各級將領卻對此視而不見。人們在評估既有資料時，經常犯下一般人都會犯的錯誤，例如過度樂觀、想為混亂的事實找出合理的理由、機構本位主義等等。每個國家的情報工作都要求守口如瓶，即使像英國這種各階層都能參與情報活動的國家，依然禁止不同部門進行情報交流。好比在編碼與解碼學院負責破解

低階密碼的人員，就不被允許知道謎式密碼機的「極機密」破解內容，以免造成機密外洩。在英國，「極機密」訊息只能由特別聯絡小組傳送；在美國則是交由特別安全軍官傳送，而且在閱讀之後就要予以銷毀。<sup>146</sup>最重要的是，各國都會定期更換訊號情報使用的代碼與密碼，這意味著在更換之後會有長達幾個星期甚或幾個月的時間都無法破譯新的情報。從一九四二年二月到十二月，英美的密碼分析人員一直無法破譯德國海軍的謎式密碼通信。德國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再度更換新密碼，英美因此又必須重新解碼。一九四二年大部分時間到一九四三年初，德國海軍情報局破譯了英國海軍的三號密碼，結果英國海軍在一九四三年六月改用五號密碼，德國海軍因此必須重新解碼。<sup>147</sup>在D日之前，盟軍原本有能力破譯柏林與駐巴黎總司令部之間的電文，但德軍卻在六月十日這一關鍵時刻更改密碼，使盟軍完全失去對德軍動向的掌握。一直要到九月，盟軍才又重新破譯德軍密碼。<sup>148</sup>

就算訊息可以解讀，破譯的電文往往數天後才能送達，有時已經來不及用於作戰。例如德國駐法國潛艦總司令部獲得的破譯電文，絕大多數都無法及時派上用場。轉譯也是一項挑戰。從攔截通信取得情報資訊，到最後的翻譯版本，中間要經過好幾個階段。從最初在無線電接收站聽到敵軍編碼訊息，經過解碼、訊息翻譯、打字，最後送到情報單位桌上。情報人員必須擁有足夠的語言能力才能真正運用情報。英國負責翻譯德文或日文訊息的人往往只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接受日語訓練的人只上過簡短入門課程，使用的還是過時的課本與字典。出錯難免，特別是整個情報任務的規模極其龐大。戰爭期間，已經不堪負荷的編碼與解碼學院需要翻譯的俘獲文件數量呈現指數成長。一九四三年初，英國海軍情報局需要翻譯一千份文件，到了隔年夏天已暴增到一萬份。<sup>149</sup>在美國，由於非常缺乏會說流利日語的美國白人，陸軍因此於一九四一

年開始招募日裔美國人擔任日文筆譯與口譯的工作，這項計畫在一九四二年強制監禁日裔美國人之後仍繼續進行。到了一九四五年，兩千零七十八名日裔美國人從軍事情報局語言學校畢業，許多人被派到太平洋戰場與前線部隊一同作戰，冒著傷亡風險參與島嶼登陸戰，並且負責訊問被俘的日本人。<sup>150</sup>美國海軍拒絕招募日裔美國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轉而鼓勵大學生到科羅拉多州波德（Boulder）的海軍日語學校就讀。這群大學生只知道有限的日文軍事術語就被送到戰況激烈的太平洋戰場。他們時常得要說服海軍陸戰隊不要殺死所有日本人，否則將沒有人可供訊問。<sup>151</sup>

避免情報外洩最重要的辦法，就是確保無線電能安全無虞地傳遞訊息，避免遭到敵軍攔截。而對於蒐集情報的人來說，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運用各種方法及時破解敵軍為了訊息安全而設下的各種障礙。保護無線電通信的密碼機器系統日新月異，要破解電文確實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有時訊息是用普通文字寫成，情報人員便可省下許多麻煩——儘管如此，在詮釋訊息時還是有可能出錯。空勤人員往往會用一般語言通信，經常忽略無線電防護措施，這種狀況特別容易發生在美國與蘇聯飛行員身上，但正在進行作戰的地面部隊也會如此，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編碼耗時太久，另一方面則是部隊之間傳遞的只是例行性訊息。德軍在蘇德前線截獲的通信，百分之九十五並未編碼。一九四四年九月，德軍在義大利前線截獲的盟軍電文中，兩萬兩千兩百五十四則未編碼，有編碼的則有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三則。<sup>152</sup>就算是未編碼訊息，也可能會產生問題。當英國的「Y」無線電攔截站首次聽到德國空勤人員以無線電傳送未編碼訊息時，站內人員都感到開心不已——但興奮之情很快就散去，因為沒有人聽得懂德語。<sup>153</sup>然而，最重要的訊息幾乎都會編碼以防止敵軍竊聽，部分訊息的防護會更加嚴密，會有各種排列組合變化後



的密碼，讓破解變得更加困難。德國謎式密碼擁有五十二種變化，日本海軍與陸軍的密碼機總共至少有五十五種變化。<sup>154</sup>但相較於德日，英美情報局在解讀複雜密碼上顯然具有較大的優勢。

英美在破解敵軍通信上所做的努力，與他們的戰場遍及全球息息相關，而這也使他們把重點優先放在海軍與空軍上。對於英國皇家空軍與皇家海軍來說，戰爭初期為了保護英國本土免於遭受空襲，以及排除德義潛艦、軍艦與偽裝巡洋艦對航道的侵擾，攔截敵軍無線電通信便成為首要之務。而對美國海軍來說，在太平洋戰爭初期，解讀日軍密碼是避免海戰失利的必要工作。但隨著戰局轉守為攻，解碼也成為美軍發動關鍵攻勢不可或缺的工具，藉此消滅日本海軍與商船船團。英國攔截德國無線電通信的故事總是與「極機密」（Ultra）一同出現，這個字用來描述從德國恩謎式密碼機通信破解的電文。海軍原本選擇的代號是「噓」（Hush），邱吉爾則堅持使用「波尼費斯」（Boniface），直到一九四一年才確定使用「極機密」。然而，過於強調「極機密」一詞，不僅讓人忽視盟軍曾經有好幾個時期無法解讀德軍密碼，也讓人忽略「極機密」以外其他形式的訊號情報的重要性，這些情報不僅補充了「極機密」的不足，有時甚至提供了比「極機密」更為重要的訊息。謎式密碼電文的破譯起初來自於缺乏防護的德國空軍通信，第一則破解的電文出現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主要歸功於俘獲的謎式密碼機與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入侵波蘭後逃往英國的波蘭密碼學家。電文的破譯往往緩不濟急，但隨著電機「炸彈」（bombes，轉譯自波蘭文的bomb）的使用，時間差逐漸縮短。「炸彈」是一種可以加速解碼過程的機器，起初這種機器可以用來破解三轉子謎式密碼，之後到了一九四三年，美國製造的「炸彈」已經可以用來破解更複雜的四轉子謎式密碼。當德國發動不列顛之役與倫敦大空襲時，「炸彈」還非常罕見；等到盟軍在地中海發起戰事

時，「炸彈」已開始有限地使用，而這項破譯技術也適時地在阿蘭哈法戰役與艾拉敏會戰派上用場。令盟軍感到挫折的是，盟軍在大西洋之戰的高峰期曾有長達十個月的時間無法使用「炸彈」；盟軍在一九四四年後的西歐戰役期間同樣沒有使用「炸彈」的機會，因為德軍在占領區都是透過地面線路來進行通信。德軍的謎式密碼機主要用來傳遞戰場命令與後勤組織訊息，因此即使能破譯電文，依然無法從中看出德軍的戰略與作戰意圖。儘管如此，根據破譯的電文還是能一定程度窺知德軍動向，但使用這類電文仍須小心謹慎，必須避免讓德軍知道己方的密碼已遭盟軍破解。

「極機密」的實施往往必須與其他技術相互配合，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不列顛之役與大西洋之戰的情報獲取過程看出。在空戰中，英國皇家空軍的Y無線電負責攔截站截聽德國空軍使用的無線電頻率，這些訊息有時並未編碼，有時只以低階密碼與無線電臺呼號送出，而這些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加以破解。英國皇家空軍僱用會說德語的人擔任「計算者」（computors，原文如此），負責提供當前德國空軍部隊與調動資訊。此外，國土防衛部隊也運用無線電測向技術提供敵機起飛、航線與高度資訊，而且還能區別轟炸機與戰鬥機，這些都是雷達無法辦到的。Y無線電攔截站的總部位於曼徹斯特附近的奇德爾（Cheadle），在戰爭期間持續向英國皇家空軍戰鬥機基地提供重要資訊，而且每分鐘更新一次來襲敵機的最新訊息——相較之下，雷達只能每四分鐘更新一次。

「極機密」攔截的訊息雖然無法提供有用的戰術資訊，卻能協助拼湊德軍的作戰序列。英國皇家空軍戰鬥機司令部司令甚至直到十月不列顛之役結束之後才得知「極機密」的存在。<sup>155</sup>

而在大西洋之戰中，盟軍也有類似的多元情報來源。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在英國、美國與加拿大（最終擴及世界各地）設立的高頻測向

（High Frequency/Direction Finding, HF/DF）無線電站。德國海軍通信使用高頻讓訊息傳遞到必需的距離，但這類信號很容易被盟軍攔截，德軍潛艦或偽裝巡洋艦因此在戰爭期間很容易遭盟軍定位。此外，德國潛艦在發現盟軍護航艦隊時，會根據《海軍短信號簿》（Kurzsignalheft）的指示使用簡短的「Beta」信號；當盟軍截獲德軍信號時，通常護航艦隊已經與德國潛艦接觸，此時要做的不是解碼，而是採取必要的閃避動作。在「極機密」無法提供海軍恩尼格碼的解碼電文時，攔截高頻與Beta信號就顯得至關重要，透過這兩種信號提供的完整資訊網，盟軍可以進行「通信分析」，顯示德軍潛艦所在的地點與戰力。無線電攔截起初是用於防衛，讓護航艦隊避免接觸敵方潛艦，但從一九四三年春天之後，無線電攔截開始用於攻擊，協助飛機與反潛艦艇獵殺德國狼群。無線電攔截證明是消除潛艦威脅的利器。<sup>156</sup>

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訊號情報也使用「極機密」這個代號來描述攔截到的日軍高階無線電通信。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訊號情報的取得幾乎毫無進展，美軍並未投入心力對日軍主要的海軍密碼JN—25b進行解碼。美軍位於菲律賓喀斯特無線電站的無線電攔截部隊在一九四一年底解讀了一部分日軍電文（不過海軍情報單位卻沒有好好運用這項情報），但日本海軍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個星期採用了新密碼，使美軍無法瞭解訊息內容。<sup>157</sup>位於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無線電部隊在一九四二年春不眠不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終於解開新密碼，及時掌握日軍入侵中途島的計畫。此後，海軍通信情報部門OP—20—GZ幾乎可以持續地破解日軍密碼JN—25。「極機密」提供了日本護航艦隊與太平洋島嶼駐軍數量的資訊。<sup>158</sup>「極機密」甚至得知日本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前往吉爾伯特與所羅門群島巡視防務的例行航線。於是，在尼米茲海軍上將同意下，美軍派出P—38戰鬥機前去攔截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的座機

並將其擊落。即使如此，日本海軍仍未警覺到他們的海軍主要密碼已經遭到破解。一九四三年六月，美軍密碼人員又破解了日本陸軍補給各地駐軍的護航船團使用的船舶密碼。無線電情報使美國與澳洲的潛艦與飛機能夠找出大部分日本商船船團與護航艦艇的位置並予以擊沉。

一般而言，要攔截陸軍的無線電通信較為困難，部分原因在於陸軍傾向於透過地面線路來進行通信，而要攔截這類通信只能冒險深入敵後進行竊聽。只有在戰線變動劇烈的地方比較有機會使用無線電，儘管如此，要定期取得最新情報也不是容易的事。侵略偵察、照片偵察或訊問戰俘都能補充陸軍通信情報的不足。一九三九年，日本密碼分析人員破解了蘇聯陸軍密碼OKK5，然而日本卻未能在同年八月的諾門罕戰役中獲勝，此後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宣戰，日本都沒有使用這些密碼的需要。等到日本真的需要使用時，蘇聯卻已更改了密碼。<sup>159</sup>德軍入侵蘇聯時，由於情報人員有限，只能破解前線的低階密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德軍只破譯了蘇軍三分之一的電文，而且始終無法突破蘇軍總司令部的通信防護。<sup>160</sup>在北非戰場上，隆美爾無法攔截英國的陸軍通信，卻能截聽到英國皇家空軍與地面部隊的訊息內容——英軍直到一九四二年夏天更換密碼才得以防止情報外洩。德國並未像西方盟國一樣發展出類似「極機密」這種長期而持續的解碼技術，而是試圖以其他方式擷取情報，然而得到的資訊卻不太可靠。德國的空中偵察受到英國精心布置的偽裝工業與軍事目標欺騙，而德國的偵察機被擊落的數量也愈來愈多，這都使得德軍的偵察難以奏效。派出間諜也有風險，一方面可能被敵方的反間計欺騙，另一方面則是僅能取得很主觀的訊息。

盟軍採用了各種方式試圖獲取德國、義大利與日本陸軍的通信內容。太平洋戰爭初期，美軍一開始的幾場戰役對手都是日本海軍，因此



並未特別留意日本陸軍的通信內容。一九四二年夏天，美軍只配置了二十五名密碼分析人員負責破解日本陸軍的通信密碼，一年後數量就增加到兩百七十人。儘管日本陸軍的密碼要比日本海軍的JN—25難破解，但美軍在一九四四年初於新幾內亞俘獲日本二十一師團撤退時遺留的密碼簿，密碼的破解開始取得進展。此後，美軍開始有能力定期對日本陸軍的訊息進行解碼。<sup>161</sup>在地中海戰場，盟軍一直無法破解義大利的密碼。布萊切利園的分析師把義大利密碼以代號「Zog」與「Musso」加以表示。義大利密碼以隨機的方式編成，也以隨機的方式解碼。然而，一九四一年，比較簡單的義大利船運密碼被盟軍破解，盟軍因此逐漸掌握義大利對北非軸心國部隊進行補給與護航的情報。<sup>162</sup>一九四二年夏天，在沙漠作戰的德國陸軍使用的恩尼格碼密碼也遭到破解。英國在開羅設立編碼與解碼學院分部，確保訊息內容能在阿蘭哈法戰役與艾拉敏會戰爆發前迅速傳遞給盟軍部隊。只不過在沙漠長途追擊與最終在突尼西亞擊敗軸心國部隊的過程中，「極機密」的助益並不大。<sup>163</sup>

正當北非戰場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英國解碼人員發現一個比謎式密碼訊息更重要的情報來源。德國陸軍發展了無線電電傳打字機線路，使用洛倫茨（Lorenz）公司的密碼附加裝置40型（*Schlüsselzusatz 40*，之後發展成42型）。這種裝置不需要像謎式密碼機那樣使用摩斯電碼，就可以把機密訊息傳遞出去。每個電傳打字機線路都有自己的密碼；到了一九四三年，德軍已經有十個電傳打字機線路，一九四四年初更增加至二十六個。德國陸軍利用電傳打字機線路傳遞作戰與戰略訊息，而且認為這種通訊方式安全無虞。在布萊切利園，情報人員以「魚」做為代號來表示德國的電傳打字機通信（這是根據德軍自己的代號「劍魚」而來）。英國解碼人員也從一九四二年初開始試圖破解德國電傳打字機密碼，然而成效有限。英國情報人員會為每個線路冠上某種魚類名稱，好

比柏林與哥本哈根之間的線路稱為「大菱鯨」，柏林與巴黎之間的線路稱為「水母」，柏林與雅典之間的線路稱為「康吉鰻」等。<sup>164</sup>德國陸軍位於巴爾幹半島的司令部通信密碼首先遭到破解，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凱賽林元帥駐紮於義大利的陸軍通信也遭到破解。為了加速解碼，英國最終研發了歷史上第一臺作戰電腦：一九四四年初問世的「巨像電腦一號」（Colossus I）。雖然普遍用於「極機密」解碼，但這臺電腦一開始的用途其實是為了破解「魚」，而非謎式密碼。巨像電腦二號每秒可以處理兩萬五千個字母，比過去機械解碼快了一百二十五倍。<sup>165</sup>一九四四年三月，柏林與德國陸軍駐巴黎總司令的作戰通信遭到破解，此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由於德軍定期更換密碼，盟軍再度失去對德軍通信的掌握。在戰爭的最後九個月，新型謎式密碼機的出現導致「極機密」的情報價值大幅降低，但盟軍還是可以從德軍的電傳打字機通信「魚」定期獲取訊息。<sup>166</sup>除了電傳打字機通信外，盟軍還有別的情報來源。從一九四三年四月開始，Y無線電攔截站針對德國陸軍中階通信進行攔截與破譯，包括戰車通信密碼等德軍低階通信也於同年底遭到破解，這些都有助於在D日入侵前對德軍部署拼湊出較為完整的圖像。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派往法國的探員與法國抵抗運動分子提供的人類情報，也讓盟軍更加清楚德軍的動向。蒙哥馬利的情報官說道：「沒有任何軍隊像我們一樣，對於敵軍的一切瞭若指掌。」<sup>167</sup>

過去已有大量的歷史文獻努力想證明情報蒐集（特別是訊號情報）有利於作戰成功，然而實際的功效如何仍存在爭議。當然，沒有情報的作戰勢必無法獲得戰果，這也是為什麼二戰期間各交戰國都致力於蒐集敵軍部署、戰力、科技創新乃至於作戰意圖的情報。然而情報的運用取決於資訊與各層面作戰計畫的整合，以及負責判斷當前戰場情勢的指揮官對情報的信任程度。情報在一層又一層複雜的決策機制中反覆折射，

等到真正根據情報做出指示時，早已錯失寶貴的作戰時機。如此一來，即使是最好的情報也無法創造戰果。德軍入侵克里特島之前，盟軍情報人員首次從「極機密」破譯的電文中得到預警，並隨即將情報告知英軍指揮官，卻還是無法挽救英軍的失敗。一九四一年，魏菲爾將軍也曾收到緊急訊息，得知隆美爾即將於三月三日時發動進攻，但魏菲爾卻無視這項訊息，因此遭致慘敗。一九四〇年底，英國在科學情報上取得重大突破，他們發現德國空軍使用無線電導航，於是立刻採取反制措施來誤導敵機，卻還是無法扭轉往後幾個月德軍對英國的轟炸。事實上，雖然英國的反制措施使德國空軍無法精準轟炸港口與工業目標，卻造成更慘重的平民傷亡。情報在輔助作戰上最立竿見影的例子是海戰，由於海戰需要無線電信號做為通信工具，因此無論在何處，攔截與破解敵方通信永遠是海戰的核心。盟軍能夠成功攔截與破解德軍無線電通信，是盟軍能擊敗軸心國潛艦、保護護航艦隊與摧毀敵軍海上補給線的關鍵原因，而這也使得盟軍能夠更有效地進行其他戰役。在同盟國與軸心國進行的諸多漫長戰役中，情報戰明顯成為同盟國的戰力加成。情報戰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運氣的成分，因為無論是日本海軍還是德國海軍都沒有發現自己的密碼與通信遭到攔截破解。間諜與間諜活動、祕密情報與反情報的世界雖然精采刺激，但從戰爭整體來看，唯有日復一日例行性的分析與解讀，才能決定戰爭的勝敗。

除了情報之外，二戰時期的欺敵策略是否影響了戰爭？人們對此也存在類似的懷疑。欺敵屬於情報戰的一環，與情報蒐集互為表裡。欺敵的目的是讓敵軍無法得知己方的意圖與軍力部署，使己方能透過突襲讓敵軍陷入混亂，使攻擊力最大化，從而降低作戰成本。在現代戰爭中，欺敵的目標在於讓敵軍對於虛構的事物信以為真，並且讓虛構的狀態維持愈久愈好。二戰期間，欺敵範圍從最上層的主要戰略作戰，往下延伸

到一般性的偽裝計畫，包括保護軍事基地、機場與提供臨時彈藥存放地點以躲避敵方空中偵察。雖然同盟國與軸心國在所有戰場都進行了欺敵作戰，但二戰時真正制度性地進行欺敵作戰的國家其實只有兩個：英國與蘇聯。德軍確實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突襲蘇聯，日軍也確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襲珍珠港與東南亞，這幾乎就是軸心國在二戰中少數進行過的戰略欺敵攻勢，然而這兩起攻勢其實不完全算是突襲。儘管德軍已經努力隱藏行蹤，但由於蘇聯布置了周密的間諜網，因此巴巴羅薩作戰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早已人盡皆知，只是史達林拒絕面對現實，才讓這場戰役成了一場突襲。至於日本的案例，日本海軍艦隊確實在無線電靜默下偷偷逼近夏威夷，完全隱匿了珍珠港行動，但日本海軍事前並未計畫採取欺敵措施。從德日的例子來看，與其說德日進行了突襲，不如說是美蘇領導階層自欺欺人。

英國在二戰期間進行了廣泛的欺敵作戰，到了戰後，欺敵作戰也成為英國官方歷史研究的熱門主題。<sup>168</sup>開戰之初，欺敵只是小規模進行，但隨著戰事進展，欺敵逐漸擴展成龐大的戰略目標。欺敵最初主要是為了防禦，用來對抗德軍可能的轟炸與接下來在一九四〇年夏天的入侵威脅。早在一九三六年，英國帝國參謀本部已經成立了偽裝諮詢委員會，思索如何讓脆弱的重要目標免於遭受敵軍轟炸機破壞。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後，新成立的本土安全部採納了偽裝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成立了民防偽裝機構。<sup>169</sup>政府僱用了來自藝術、建築、電影與劇場界的偽裝專家，請他們投入大量時間偽裝重要的軍火工廠，或試圖將鐵路漆成綠色以融入鄉村景觀之中。英國皇家空軍也建立自己的欺敵部隊，由空軍部工程處長特納上校（John Turner）指揮，負責興建假機場，藉此引誘德軍飛機攻擊；他們總共興建超過一百座機場，上面還布置了假飛機與假機庫，這些偽裝物吸引德軍飛機攻擊的次數足足是實物的兩



倍。<sup>170</sup>電影製作人巴卡斯（Geoffrey de Barkas）曾經參與一九四〇年開設的跨兵種偽裝課程的訓練，他在一九四〇年底率領一小隊偽裝人員前往北非戰場，在魏菲爾將軍指揮下，英軍首次將欺敵視為作戰的一項重要分支。

一戰期間，魏菲爾曾在巴勒斯坦親眼目睹對土耳其人進行欺敵作戰的成效，他因此深信欺敵是一種戰力加成：「我總是盡一切可能迷惑與混淆敵軍。」<sup>171</sup>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魏菲爾說服跟他一樣肯定欺敵價值的邱吉爾授權中東司令部成立新單位「A部隊」，負責進行各項欺敵工作。魏菲爾任命閱歷豐富的克拉克中校（Dudley Clarke）擔任A部隊長官。克拉克在簡報中表示，要運用一切手段誤導敵軍以協助我軍作戰，而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間諜活動、虛假的無線電通信與巴卡斯的偽裝部隊。欺敵作戰產生的結果好壞參半，但邱吉爾依然熱心地任命前戰爭大臣史丹利（Oliver Stanley）掛名擔任倫敦本部的長官，負責協調欺敵行動。一九四二年五月，在魏菲爾呈交備忘錄，極力推崇欺敵作戰的各項優點之後，帝國參謀本部終於同意設立正式機構。新機構的名稱是倫敦控制局，原本的主管史丹利由畢文中校（John Bevan）接替，這個機構負責計畫、監督與協調英國的全球欺敵作戰。畢文的目標是使用欺敵手段，「使敵人虛擲自身的軍事資源」。美國軍方雖然對欺敵作戰抱持懷疑，但還是同意建立與英方對等聯繫的聯合安全控制局，該機構最初只有兩名軍官，負責為美國陸軍與海軍進行偽裝。<sup>172</sup>欺敵作戰最初的重點幾乎完全集中在與軸心國部隊的沙漠會戰上。荒涼的沙漠地形很難從事偽裝，但為了保護盟軍不受攻擊與混淆敵軍，欺敵工作依然加緊進行。英軍會在港口設施與跑道塗上大量的暗褐色油漆，也會把空軍基地用油漆與掩蔽偽裝成住宅區；英軍使用當地材料製作「遮陽棚架」，再將棚架安裝在戰車上，這樣敵軍從上空俯瞰就會把這些戰車當成是卡

車。反過來說，要把卡車偽裝成戰車則較具挑戰性，但使用當地的枝條還是可以解決這個難題。這些做法使英軍順利躲過德軍的空中偵察，巴卡斯於是將這些做法寫成一本訓練手冊《戰場隱蔽》，這本手冊被列為作戰需求，一共印製超過四萬冊。<sup>173</sup>

欺敵作戰的成效難以實際評估。而且盟軍不知道的是，隆美爾其實也有自己的情報來源：他截聽了美國駐開羅軍事隨員的訊息，也攔截了西部沙漠空軍與英國第八軍團之間的通信，因此他對盟軍的意圖與部署有著通盤掌握。一九四二年秋天，當盟軍開始準備第二次艾拉敏會戰時，欺敵作戰的效果開始顯現，因為此時隆美爾已經失去了前述兩種情報來源。這是地中海戰場最巧妙的一場欺敵作戰，如果沒有這場欺敵作戰，盟軍恐怕無法阻止至今連戰皆捷的隆美爾及其義大利盟邦入侵開羅與蘇伊士運河。這項欺敵計畫代號「貝特倫作戰」（Operation Bertram），一共分成六個行動，目的在於讓德軍以為盟軍主力將從戰線的南部發起進攻，但實際上盟軍準備運用裝甲部隊從北部突破。偽裝是致勝的關鍵。在戰線北部，大量的油料、糧食與軍火被巧妙地偽裝成停放的卡車；而在戰線南部，盟軍製作了大量的假補給物資，德軍飛機從空中俯瞰根本難辨真假。真實的卡車與戰車停放在南部，然後利用夜間在無線電靜默下往北部移動，卡車與戰車離開後，原本的空間便停放了假卡車與假戰車。在北部，三百六十門火炮巧妙偽裝成卡車。南部最後停放了高達八千四百輛的假交通工具、假火炮與假補給物資，讓德軍深信蒙哥馬利的戰爭計畫就是要從南部發動攻勢。克拉克也組織了二十五座幽靈無線電站，讓德國與義大利深信空中偵察得到的情報正確無誤，認定絕大多數盟軍兵力集中在南部。<sup>174</sup>與所有欺敵作戰一樣，計畫規模與複雜性一旦提高，出錯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但德軍最終還是吞下盟軍的誘餌，隆美爾渾然不覺地把裝甲部隊集中在錯誤的地方。儘管

盟軍擁有壓倒性空優與數量更多的戰車與車輛，但最後仍僅以些微之差擊敗德軍——正是欺敵作戰讓盟軍得以險勝德軍。被俘的德軍與義軍將領坦承，他們以為盟軍要從南方側翼發動主要攻勢，而且在戰役開始後數天仍如此認為。等到他們發現受騙時，局勢已無法挽救。

貝特倫作戰的成功，促使英美在戰略上更全面地使用欺敵戰術。一九四三年夏天，做為一九四四年反攻法國長期準備工作的一環，英國帝國參謀本部批准了「掩護與偽裝」計畫，又稱為「帽徽作戰」

（Operation Cockade），其目標在於促使德軍相信盟軍將於一九四三年夏末進行橫跨英吉利海峽的入侵行動，藉此讓德國把兵力抽調到西方，以利盟軍在義大利與蘇聯作戰。美軍將領對這項計畫興趣缺缺，而德軍看穿盟軍使用雙面諜發布假情報的手段，並未受到盟軍「斯塔基作戰」

（Operation Starkey）使用有限海空兵力佯裝準備進行攻擊所影響。<sup>175</sup>盟軍這幾次欺敵行動之所以失敗，主要在於欺敵想要掩護的真正攻擊行動最終並未發起，因此嚴重減損了這類掩護計畫的可信度。倫敦控制局發起的「帽徽作戰」最後完全失敗，而這次失敗差一點讓盟軍打消主意，不準備在一九四四年諾曼第登陸前採取任何欺敵策略。盟軍擬定的第二次欺敵行動，代號「雅億作戰」（Operation Jael），其目的在於讓德軍相信地中海將是英美在一九四四年採取軍事行動的主要戰場，並且認為盟軍將採取轟炸攻勢，而非實際入侵。美國陸軍將領清楚看出這項提案不可能騙過敵軍，最後雅億作戰遭到取消。<sup>176</sup>一九四三年七月，盟軍又擬定另一項計畫，代號「急流作戰」（Operation Torrent），這是針對一年後將進行的入侵作戰而採取的欺敵措施，企圖讓德軍搞不清楚盟軍的真正意圖：當盟軍主力入侵諾曼第時，還會有幾個師的兵力佯攻加萊，牽制德軍使其無法增援諾曼第。這項計畫很快也遭取消，因為計畫的佯攻規模太小，無法牽制德軍夠長的時間。<sup>177</sup>

盟軍之所以繼續保留欺敵做為入侵戰略的一部分，主要與邱吉爾有關。邱吉爾在德黑蘭會議上確認盟軍將從諾曼第登陸之後，便再度提出誤導德軍使其將兵力抽離法國北部的主張。他認為這是盟軍入侵成功的關鍵，但他的論點也反映出他對於兩棲作戰能否成功並無把握。畢文與倫敦控制局決定發起新的欺敵作戰，代號「保鏢作戰」（Operation Bodyguard），試圖讓德國人相信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的主要軍事行動目標是巴爾幹半島、義大利北部與斯堪地那維亞，相信反攻法國的行動將往後推遲，最快也要到一九四四年底才開始。然而，就跟急流作戰與帽徽作戰一樣，保鏢作戰最終也未能達成目的。到了一九四三年底，德國最高統帥部與希特勒已經知道盟軍在不列顛群島集結兵力，目標是在隔年春天或夏天進攻法國。德軍確實顧慮盟軍有可能威脅挪威或巴爾幹半島，因此在這兩個地區部署了一定數量的部隊，但德軍仍然相信這些只是盟軍的次要目標，主要目標依舊是法國。

入侵諾曼第的欺敵計畫，最後還是要仰賴曾在地中海戰場有過實際欺敵經驗的人來執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克勒克的副手懷爾德上校（Noel Wild）被轉調到倫敦，在剛被任命為最高統帥官的艾森豪將軍麾下負責欺敵任務。蒙哥馬利也調任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為入侵諾曼第做準備。艾森豪與蒙哥馬利都重視欺敵工作，兩人過去也都因為欺敵作戰而獲益。懷爾德與特別工作部隊和第二十一集團軍的欺敵人員共同組成R小組，由史特蘭吉威斯中校（David Strangeways）領導，負責為諾曼第登陸作戰擬定欺敵計畫，代號「南方堅忍作戰」（Fortitude South）。另一方面，「北方堅忍作戰」（Fortitude North）則延續了保鏢作戰的宗旨，希望對挪威與瑞典鐵礦產地進行威脅可以分散德國注意力。但與先前的各項欺敵工作一樣，北方堅忍作戰對於德軍並未構成任何影響，因為德國早已在挪威部署重兵，因此毫無增援的必要。



最重要的欺敵計畫還是南方堅忍作戰，目的在於讓德國的政軍高層相信，盟軍入侵諾曼第的行動只是一場序曲，真正的重頭戲是跨越英吉利海峽最狹窄處對加萊進行登陸作戰。與艾拉敏會戰的貝特倫作戰欺敵行動一樣，南方堅忍作戰要佯裝成準備從某個地區發動主要攻勢的樣子，但實際上卻是要掩蓋從另一個地區發動真正攻勢的規模與時間。盟軍在英格蘭東南部設立了假的美國第一集團軍，並且任命巴頓將軍擔任集團軍司令，除了設置假的軍事設施，也偽造假的無線電通信。盟軍援用在沙漠的偽裝經驗，在英格蘭東部設置了假戰車與假火炮，但假登陸艇過於脆弱，很容易就會擱淺或損毀（只是德軍有限的空中偵察能力並未察覺）。與艾拉敏會戰相同，欺敵的好處在於盟軍可以先在英格蘭東南部駐紮一部分真正的軍隊，等到開戰前夕再將部隊轉移到英格蘭西南部，至於英格蘭東南部留下的空缺則派幾個師的預備隊與徒具番號的單位進行補充。這項欺敵計畫內容鉅細靡遺，而且嚴守祕密，絕不讓任何情報外洩。

盟軍利用雙面諜，讓德軍以為自己已經取得可靠的訊號情報與空中偵察情報。到了一九四二年，英國國內安全機構軍情五處MI5幾乎已經逮捕所有藏匿在英國境內的德國間諜，而且成功策反許多人，使其轉而為盟軍工作。盟軍為了南方堅忍作戰而策反了一位前西班牙間諜加西亞（Juan Pujol García），代號「嘉寶」。嘉寶虛構了一個間諜網，提供虛假的高層情報給德軍反情報局（Abwehr）。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六月，嘉寶提供了五百則訊息，試圖讓德國當局相信盟軍在英格蘭東南部與蘇格蘭集結大量兵力。嘉寶也試圖誤導德軍相信盟軍將入侵的時間延後到一九四四年底，然而這部分的收效不大。嘉寶的故事有著更值得注意的一面：由於德國持續破獲盟軍派往歐洲占領區的間諜，因此德國祕勤局有好幾年的時間都相信自己派往英國的間諜並未遭到盟軍追蹤與清

除。盟軍在戰後發現，在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正式留存的兩百零八份有關英國局勢的報告裡，居然有一百八十八份出自雙面諜之手，更不用說那些沒進到作戰司令部裡的假間諜報告。<sup>178</sup>德國軍事情報局面臨的問題在於，隨著入侵的日子逐漸逼近，大量湧入的情報令他們無所適從。負責德國陸軍情報的西線外國軍情處完全受到誤導，他們對在英國集結的兵力情報完全錯誤。由於美國（假的）第一集團軍的欺敵作戰，使德軍將盟軍的兵力高估了百分之五十，德軍因此認為盟軍可能至少要發動兩起軍事入侵，一個在諾曼第，另一個更大規模的則是在加萊。兩起軍事入侵都有可能發生，對希特勒與他的將領來說，困難在於無法判斷哪一個是佯攻而哪一個不是。到了四月，德軍評估盟軍比較有可能登陸諾曼第或布列塔尼。但到了五月中旬，愈來愈多情報顯示英格蘭東南部的美國第一集團軍才是真正的主攻部隊，也就是盟軍雖然會先攻擊諾曼第，但只是輔助作戰。「極機密」與「魔術」的解碼電文使盟軍得以評估欺敵行動的成效，情況到了五月底已經很明顯：顯然德國從希特勒以下，全都深信加萊會是盟軍主力攻擊的目標。六月一日，日本駐柏林大使大島浩向東京發出的電文被盟軍破解，大島浩提到最近與希特勒交談，確認希特勒預料盟軍將先對諾曼第進行佯攻，然後「主力將橫渡多佛海峽開闢第二戰場」。<sup>179</sup>

入侵的時間依然成謎，德國陸軍情報局雖然收到雙面諜的訊息，提到盟軍的入侵行動將推遲到一九四四年底，但情報局認定這是盟軍「對於自身意圖刻意進行的偽裝」。<sup>180</sup>在無法確定盟軍實際登陸時間的狀況下，從四月到六月間，駐防法國北部海岸的德軍一直處於最高度警戒狀態，而這也使盟軍實際發起登陸作戰時，防守的德軍竟一度以為又是假警報而掉以輕心。六月五日，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在盟軍入侵艦隊即將抵達法國外海的前幾個小時收到簡報，但簡報仍表示：「目前敵

軍仍未有發動大規模入侵的跡象。」<sup>181</sup>以盟軍來說，南方堅忍作戰的重點在於維持假象，讓德軍以為虛構的美國集團軍會在諾曼第入侵作戰開始之後發動第二次入侵。儘管擔心盟軍將發動第二次入侵作戰，隆美爾仍迅速將裝甲師派往諾曼第，但德軍最高統帥部卻不願冒險讓法國東北部陷入無兵可守的狀態。假造的無線電通信，加上雙面諜持續提供看似可靠的情報，都使德軍各級將領深信根本不存在的美國第一集團軍確實準備發動攻擊。德軍從雙面諜以外的管道得到的大量情報也顯示，盟軍打算先登陸諾曼第、吸引大量德軍預備隊，再由美國第一集團軍發動第二次入侵作戰，登陸法國東北岸。從既有情報來看，德軍的推測並非沒有道理，而這也使德軍把二十二個師留在加萊按兵不動。到了七月，德軍將領終於認定，是諾曼第登陸的成功促使盟軍改變主意，把原本用來入侵加萊的美國第一集團軍投入到諾曼第戰場——也就是說，即使到了這個階段，德軍仍深信第一集團軍這個幽靈部隊真的存在。八月，希特勒終於下令，要加萊的部隊前往諾曼第進行戰鬥，然而為時已晚。<sup>182</sup>盟軍的欺敵戰術雖然可能被識破，但這場作戰最終還是獲得成功，這是因為盟軍的部署完全符合德軍理性的戰略估算。這場西方盟國最精心設計的欺敵作戰，不僅加強了盟軍的力量，也分散了德軍的兵力。盟軍面對這場作戰承受著輪不起的壓力，欺敵戰術的成功，大大降低了這場作戰的風險。

正當盟軍在西線執行南方堅忍作戰時，蘇軍也在東線進行另一起大規模欺敵作戰，目標是部署於白俄羅斯的德國中央集團軍。蘇軍發起的這場欺敵作戰，規模足以媲美盟軍為了大君主作戰而進行的佯攻行動，而且對於蘇聯境內的德軍前線帶來毀滅性打擊。如同盟軍為大君主作戰制定了堅忍作戰，蘇軍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發起巴格拉奇翁作戰，並且為此制定了欺敵計畫，而這次作戰可說是蘇軍長久以

來學習戰略與作戰欺敵的精采結晶。一九二〇年代，蘇聯軍事準則已經認識到「maskirovka」（欺敵或隱匿）與「vnezapnost」（奇襲）的重要性，而接續制定的《紅軍野戰規範》也強調隱密的好處：「奇襲可以對敵軍造成震懾效果。」目標是隱匿我軍企圖，不讓敵軍得知我方兵力集中，然後出其不意發動攻擊。根據日後戰時野戰規範的說法，這麼做可以「驚嚇敵軍，癱瘓敵軍意志，使其無法組織抵抗」。<sup>183</sup>然而諷刺的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反而是蘇軍在毫無戒心的狀況下遭到德軍奇襲，暫時陷入混亂的蘇軍完全無法進行有組織的抵抗。一九四一年九月，蘇聯大本營堅持必須在各層級，也就是戰略、作戰與戰術層面落實欺敵與隱匿，而蘇軍也在往後的一百四十場前線行動中幾乎都用上了欺敵作戰。偽裝是蘇聯士兵的第二天性，他們擅長進行戰術隱匿與伏擊。但大規模的欺敵作戰必須仰賴周詳的夜間軍事調動、嚴格保密、絕對的無線電靜默（起初蘇軍缺乏無線電，因此要做到並不困難）與利用意想不到的地形。一九四一年底，正當德軍對是否進攻莫斯科猶豫不決時，有三個蘇聯軍團已經在德國情報單位的意料之外加入戰局。一九四二年，蘇軍在每個作戰司令部設立一名欺敵參謀人員，負責擬定欺敵作戰計畫，希望透過隱匿來協助紅軍抵擋不斷進犯的德軍。

這些軍事改革明顯展現出成效，例如蘇軍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天王星作戰成功切斷史達林格勒的德軍後路，或是八個月後的庫斯克會戰，以及一九四四年夏天德國中央集團軍令人震驚的慘敗。天王星作戰致勝的關鍵，在於蘇軍能夠徹底隱匿自身行動。蘇軍的將領、參謀人員與部隊，在德軍毫無察覺之下，包抄了軸心國部隊過於延伸的側翼，並且發動反擊。史達林堅持只能口頭下令，不能有地圖或任何印刷資料。無線電嚴格管制，違者嚴懲；步兵以往看到敵軍臨空都會射擊，此時則奉命不許開火。<sup>184</sup>史達林格勒的德軍走廊，其南北兩側悄然部署了三



十萬名紅軍、一千輛戰車、五千門火炮與迫擊砲。走廊內駐紮著絕大多數來自匈牙利、義大利與羅馬尼亞的軸心國部隊，他們已經察覺紅軍的調動，但德國東線外國軍情處情報長官格倫將軍卻向他們保證，紅軍不可能大舉進攻。德國陸軍參謀總長柴茲勒將軍認為蘇聯嚴重缺乏預備隊，推斷紅軍沒有能力發動「大規模攻勢」。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就是紅軍發起天王星作戰的前一天，格倫仍未明確提醒軸心國部隊可能遭受的威脅。<sup>185</sup>蘇軍隨後採取的行動因此最大化奇襲的效果。等到軸心國部隊回過神來，敗局已難以挽回。史達林格勒的德軍完全斷絕外援，拯救他們的行動也胎死腹中。

蘇聯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的庫斯克會戰充分運用了欺敵與隱匿。在突出部的防守地區，蘇軍透過各種方式混淆德軍的空中偵察，他們建造大量的假砲兵陣地、假戰車基地與假指揮中心，運用複雜的偽裝技巧以假亂真，使德國裝甲部隊無法分辨蘇聯的雷區，必須等到第一輛戰車碰觸地雷爆炸後才能知道。捏造的無線電通信使德軍錯估蘇軍的兵力與部署，而嚴格的無線電紀律也讓蘇軍成功隱匿自身的實際規模與位置。蘇聯也把假機場弄得維妙維肖，在庫斯克會戰前，德國空軍曾經攻擊蘇軍機場二十五次，只有三次真正命中目標。<sup>186</sup>然而，蘇軍真正關鍵的欺敵戰術是把大量的預備隊部署在庫斯克突出部的後方，並且將其偽裝成防守兵力的一部分——實際上，這支部隊已經準備好，只要德軍在進攻蘇軍防線時出現頹勢，他們就會立即進行大規模反擊。同樣地，蘇聯也對預備隊的實際兵力做了萬全的隱匿，使德軍以為蘇聯只有有限的預備隊兵力，而且目的只是要協助突出部的守軍進行防衛。德國情報單位完全沒料到蘇軍會突然對突出部以北的奧勒爾與以南的貝爾哥羅、哈爾科夫進行反攻。蘇軍巧妙隱匿了軍隊的行蹤，使德軍完全沒察覺到蘇聯把軍隊調動到新攻勢的發起線上。與此同時，另一支蘇軍則在更南方的

位置成功發動佯攻，牽制德軍的裝甲預備隊。一九四三年八月，蘇軍發起的廣泛攻勢證明了奇襲有效，到了十一月，蘇軍已經擊退了俄羅斯境內中央前線的德軍，使其退回到聶伯河畔。

一九四四年六月，蘇軍發起巴格拉奇翁作戰，並且根據史達林格勒與庫斯克會戰的經驗採取了欺敵戰術。一九四四年的《紅軍野戰規範》明定，「針對每個行動與作戰進行支援時都必須運用」隱匿與欺敵，這是蘇聯作戰的必要元素。巴格拉奇翁行動只有朱可夫及華西列夫斯基等五個人知情，但他們被下令不許在電話、書信或電報中提到這場行動。在戰略層面，蘇軍透露給德軍的假消息則顯示，蘇軍即將對南方的巴爾幹軸心國家發起大規模攻勢，還將在北方沿著波羅的海海岸推進。德國陸軍情報單位原本就認為蘇軍夏季戰役的主要重點將擺在南方，因此對於蘇軍放出的假情報深信不疑。防守白俄羅斯的德國中央集團軍得到的情報顯示，白俄羅斯並非蘇聯的攻擊目標，然而事實剛好相反，蘇聯進行欺敵作戰，目的就是為了攻下白俄羅斯。<sup>187</sup>蘇聯必須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九個軍團與十一個軍的戰車、裝甲部隊與騎兵，以及一萬門火炮、三十萬噸的燃料與五十萬噸的口糧運到白俄羅斯前線。蘇聯在南方設置假的火炮、戰車與機場，並且部署真的防空砲進行保護，還煞有介事派出戰機巡邏。隱匿行蹤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前線必須維持表面上的「正常」，必須持續不斷地開火與維持例行的無線電通信。所有接受調動的新部隊必須保持無線電靜默，而且只能在夜間行軍，這些部隊不許從事偵察突擊，以免被敵軍俘虜，上級也不會告知他們真正的作戰計畫（以免部隊中有人叛逃走漏消息）。蘇聯工兵偷偷在普里皮特沼澤（Pripiet Marshes）以北的沼澤地搭建棧橋，就像法國戰役古德林的戰車部隊出其不意穿越阿登森林一樣，蘇聯裝甲部隊也令人意外地沿著這些棧橋蜂擁而出，殺得德國守軍措手不及。<sup>188</sup>雖然德軍前線將領曾提出

警告，蘇軍正準備發動大規模攻勢，但陸軍總部卻認為這只是佯攻，拒絕額外提供中央集團軍所需的資源。六月二十二日晚間到二十三日清晨，蘇聯發起攻勢，僅過了幾個星期，德軍就已完全被趕出白俄羅斯，紅軍一直推進到維斯杜拉河畔，華沙近在眼前。這是德軍在二戰的最大一場敗仗。

蘇聯雖然強調欺敵戰術，但欺敵不一定能保證勝利。蘇聯的每一場勝利，往往是經由持續數星期的苦戰換來的。儘管如此，在所有對抗德軍的大型會戰中，欺敵都能達成混淆敵軍的效果，使己方的地面與空中部隊能更順利地完成任務。欺敵的價值，可以從蘇聯最後一場對滿洲日本關東軍的戰役得到明證。在此之前，日軍從未遭遇大規模的欺敵作戰。美軍將領在戰略上很少考慮欺敵作戰，因為這會讓他們會聯想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人發動的那場不光彩偷襲。美國的聯合安全控制局，性質上類似於英國在歐洲進行欺敵作戰的倫敦控制局，該局試圖說服太平洋地區的美軍將領認真考慮欺敵戰術，但收效不大。一九四三年底，聯合安全控制局的軍官接到命令，要他們把欺敵作戰寫進美軍作戰計畫的附錄中，但這項舉動卻引發美軍前線將領的反彈。代號「婚姻」、「丈夫」、「小孩」、「瓦倫坦」與「藍鳥」等美軍為數不多的欺敵行動，幾乎未產生任何效果，主要是因為日本情報人員無法蒐集到美軍放出的假造作戰資訊，因此無法做出任何回應。日本在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分別強化千島群島北部與臺灣的駐軍，這其實是日軍自行評估後預先採取的做法，與美軍發起的「婚姻」（佯攻阿留申群島）與「藍鳥」（假裝要對臺灣與中國南方海岸進行登陸作戰）欺敵作戰沒什麼關係。<sup>189</sup>英國試圖利用在印度抓到的日本間諜做為雙面諜，卻難以奏效，因為日本間諜無法持續與日本情報單位保持聯繫，因此盟軍難以得知自己放出的假情報是否真的影響到日軍的作戰方針。<sup>190</sup>

對比之下，蘇軍則針對滿洲發動了一場典型的欺敵作戰：日本人已經察覺蘇聯把軍隊調往東方，但不清楚實際兵力規模。蘇聯的鐵路運輸只在夜間進行，鄰近滿洲的鐵路則用臨時的隧道加以遮掩以隱匿軍隊調動。蘇軍抵達定點之後，便立刻進行大規模偽裝與隱藏。關東軍不僅低估蘇軍兵力（蘇軍實際規模是日方估計的兩倍以上），而且也搞不清楚蘇軍的進攻方向（日軍認為有些地區裝甲部隊無法通過，但蘇軍卻成功克服地形障礙）與進攻時間。儘管蘇軍入侵的意圖已十分明顯，日軍仍認為紅軍必須等到秋末才能做好出兵準備，甚至要到一九四六春天才會進攻。當蘇軍發起攻擊時，日軍對於蘇軍部署與推進之速大感震驚，前線為之動搖。原本預估需要三十天的戰役，最後只經過十五天就結束。這支從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就開啟戰端的日本最大軍事力量，兵力達到百萬的關東軍，就在這場戰役中灰飛煙滅。<sup>191</sup>

有充分的證據顯示，詳細計畫與各方面協同合作的欺敵作戰在確保盟軍勝利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沒有欺敵作戰，戰爭很可能拖延得更久，盟軍的死傷很可能會更加慘重。無論在艾拉敏、史達林格勒與庫斯克，還是在諾曼第、白俄羅斯與滿洲，即使存在著其他致勝因素，依然無法否認欺敵作戰是一項戰力加成。在英國與蘇聯，一連串重大失敗促使兩國急欲找出確保優勢的辦法，而欺敵就是其中之一。欺敵之所以能奏效，主要是因為盟軍享有的情報優勢，以及德國與日本情報評估能力的不足。儘管如此，對歷史學家來說，情報與欺敵在決定戰局上的地位，終究是不如裝甲部隊、空中力量、無線電、雷達與兩棲攻擊。

## 勝負之間：戰時的學習曲線



「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是一個與戰時危機同時出現的詞彙，該詞首次出現於一九三六年，二戰期間用於評估美國造船工業的生產力進展。學習曲線除了可以用來衡量管理者與勞動者縮短了多少單位產出工時之外，似乎也可以用來貼切比喻戰時武裝部隊作戰能力的提升。學習曲線包括了兩種學習：組織學習與勞動學習。組織管理方面的學習十分重要，因為管理者可以創新技術，審視績效指標，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勞工則需要適應與學習善用陌生的環境與設備。<sup>192</sup>這其實也是二戰時武裝部隊在做的事情，不過意義與評估工業生產力不完全一致，執行時未必盡如人意。軍事管理階層會評估軍隊的不足之處，改善戰術，提倡科技與組織創新，陸海空基層士兵則會接受訓練，使其更嫻熟戰鬥，並且接受必要的技術支援，從而能更有效地作戰。要評估戰爭的勝負，戰時的學習與適應能力乃是關鍵。

學習曲線意謂著評估結果、釐清因果相關與訓練相關人員，這些做法都需要時間。同盟國在戰爭初期雖然遭遇慘敗，但至少還有充足的時間檢討該怎麼做才能扭轉戰局，這點對同盟國來說非常關鍵。儘管英美蘇三大主要同盟國在開戰之初不斷失利，但軸心國卻始終無法像德國於一九四〇年擊敗法國那樣盡早取得決定性戰果。德國與義大利無從入侵不列顛群島，在北非的戰事又陷入僵局，更無法一口氣擊敗領土過於遼闊的蘇聯。與此同時，日本也沒有手段入侵美國或英國。軸心國占領了廣大空間，卻無法迅速擊敗同盟國，也正因為空間遼闊，才使軸心國推進遲緩，最終在一九四二年達到極限，無法再有任何進展。雖然同盟國在一九四二年完全無法觸及日本、德國或義大利本土，但同盟國擁有時間而且掌控全球大部分地區，在開戰後的兩年間重新組織與改善自身的軍事能力。同盟國建立的軍事體制，被組織理論家霍恩（Trent Hone）稱為「複雜適應體系」，同盟國正是藉由這套體系通過了學習曲線的考

驗。 193

重要的是，同盟國不僅清楚認識到學習與改革的必要，還能發展出制度性的機制來進行學習與改革。這段檢驗與學習的過程，是蘇聯得以撐過一九四一年慘重物質損失與兵力傷亡的關鍵。一九四二年，蘇聯陸軍參謀總長徹底檢討蘇軍過去的問題並思考該如何改進，最後決定全面仿效德軍的做法。蘇軍隨即針對通信與情報蒐集進行破釜沉舟的改革，也在作戰與戰術層級重組武裝部隊、步兵師與空軍單位。<sup>194</sup>蘇軍的改革收到很大的成效，德軍將領是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後才認知到這一點。英國的陸海空三軍也在組織上進行了大幅度改革，陸軍機械化程度大為提高，也建立了有效的戰術空軍（英國原本在一九四〇年時幾乎不存在任何戰術空軍）。而在第厄普慘敗之後，英國也努力發展大規模兩棲作戰能力。為了記取教訓，英國成立了幾個委員會來進行改革，巴薩洛繆委員會研究敦克爾克戰役的影響，《伍德爾報告》探討了陸空合作，戈德溫與奧斯汀委員會（Godwin-Austen Committee）討論了通信問題，但真正刺激改革的還是開戰後一連串屈辱的慘敗，即便是首次得勝的艾拉敏會戰之後的幾場失敗也都有激勵改革的效果。<sup>195</sup>與戰爭初期相比，雖然英國地面部隊依然仰賴猛烈而精準的砲火與廣泛的空中支援，但此時英軍在戰術上已更為熟練，更少受到指揮結構的掣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蒙哥馬利寫下《高階軍官戰鬥行為簡要須知》並且在軍中發行，允許下級軍官有更多自主空間決定以何種方式完成任務。蒙哥馬利的想法與許多批評英國陸軍做法的人相左，反而與德軍著名的「任務型指揮」不謀而合。<sup>196</sup>

對美軍來說，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學習。美國陸軍與陸軍航空軍的兵力規模較小、技術落後且缺少情報，要將倉促徵集的大量武裝部隊轉變成專業的軍事組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國海軍的規模較為龐大，擁

有的資源也較多，但仍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最初在瓜達康納爾島及北非進行的戰役，暴露了美軍的諸多缺失，促使美軍對於自身需要補強的部分重新評估。美軍在突尼西亞凱撒林隘口慘敗之後，陸軍地面部隊指揮官麥克奈爾中將（Lesley McNair）要求建立「以訓練為基礎」的陸軍，也就是打造一支持續學習的部隊。在戰場上，重點在於識別與傳播和敵軍相關的戰術資訊，同時思考如何做出回應。戰鬥情報中心將會整合所有戰鬥經驗及資訊，並將摘要與建議傳送給正在接戰或即將面臨敵軍的部隊。在太平洋戰場（與歐洲戰場），由上而下的嚴謹指揮文化逐漸轉變成允許前線小部隊軍官自行裁量，以因應日軍寧死不降的戰術處境。<sup>197</sup>在歐洲，指揮與管制幾乎無法做到中心化。一九四四年，美軍指示派往義大利的第五軍團第二軍，在當地的戰場環境下，「指揮官必須負起全責，自行下令與裁決。不許推三阻四，不做任何決斷。」<sup>198</sup>美軍與英軍的戰力轉變相當全面，包括機械化陸軍的組織、有效的通信、更完善的情報、大幅改善的兩棲作戰準則與實行，以及積極的戰術空中力量，這些都是學習曲線上重要的一步。

軸心國同樣也在學習，包括挹注更多軍事投資，以及仔細觀察敵軍做法。然而，早期的勝利讓軸心國放慢改革的腳步，未能做出更全面的調整。在戰爭期間（也包括戰後），德軍將領普遍認為他們在各戰線面對的敵軍素質低劣。一九四二年，就在非洲軍差點於艾拉敏被殲滅的一個星期之前，非洲軍還提到盟軍對手「緩慢遲鈍，缺乏主動性與戰術規畫」。<sup>199</sup>在東線戰場，蘇聯初期的慘敗使德國對紅軍的戰力產生了刻板印象。一九四一年秋天，蓋爾將軍（Hermann Geyer）寫道：「每個德國士兵都有權覺得自己比俄國人優越。」<sup>200</sup>等到德國人開始改變看法時已經太遲。當德國陸軍透過裝甲與空軍聯合作戰成功進入史達林格勒時，也正是德國開始喪失聯合兵種作戰優勢的時候。戰爭爆發時，德

軍的無線電與雷達科技領先盟軍，但到了一九四三年，盟軍已迎頭趕上。德國重啟一戰的潛艦戰，但最後同樣遭致失敗。德國雖然於一九四〇年成功突襲法國，之後又發起巴巴羅薩作戰，然而此後德國再也無法重演相同的戰果。日軍也面臨類似的狀況。由於日軍原本面對的是裝備落後的中國軍隊，日軍大本營幾乎沒有進行改革的急迫感。日軍接著又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間藉由兩棲作戰取得一連串勝利，然而一旦日軍鞏固了太平洋諸島，就不再重視兩棲作戰。一九四二年初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的挫敗與投降，使日軍產生了輕敵的心態，間接造成往後日軍在面對美軍時始終採取寧可戰死而不願投降的態度。

相較之下，盟軍使用的戰力加成反映出戰爭初期盟軍軍事效能不彰與適應改進的必要。盟軍學習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不僅經常出現錯誤、虛耗甚或技術限制，但最終仍足以讓盟軍取得勝利。長久以來，人們始終認為軸心國維持著優異的軍事表現，或者以德國來說，德軍戰力顯然遠比任何同盟國部隊來得優秀，只是最終不敵同盟國龐大的軍事資源而已。<sup>201</sup>然而，資源優勢不代表一切。一九四一年的紅軍擁有比德軍更多的戰車與飛機，卻照樣被德軍橫掃。想要讓資源發揮效果，還必須搭配更好的軍事準則、組織、訓練與情報。盟軍必須在這些方面做出改善，才能讓資源優勢化成實際影響。戰鬥是真正的考驗，在太平洋、北非、義大利與法國，以及廣大的東線戰場，軸心國部隊最終還是被艱苦學習的盟軍擊敗。根據理論，工業「學習曲線」進展到最末端會變得平緩，此時管理者與勞動者對於自己所學的一切皆可以達到最適狀態。當盟軍的學習曲線在一九四五年抵達平緩末端，就是他們獲得軍事勝利的時候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盟軍發起入侵西西里島的哈士奇作戰，英國士兵努力涉水上岸。在兩棲作戰中，從運輸艦下船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士兵必須爬下繩網（可以看到登陸艦旁邊掛著繩網），然後攜帶重裝備上岸。圖源：*Shawshots/Alamy*

CHAPTER 6

第六章

經濟戰與戰時經濟

「美國工業精靈解決生產問題的能力，在世界上幾乎無人可以匹敵。他被召喚過來，帶著他擁有的資源與才能，投入到這場戰爭之中。鐘錶、農具、排字機、收銀機、汽車、縫紉機、割草機與蒸汽火車頭的製造業者，現在轉而生產引信與炸彈條板箱、望遠鏡架臺、砲彈、手槍與戰車。」

—— 羅斯福，《爐邊談話》，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sup>1</sup>

「必須讓武器裝備的生產效率取得必要的增長，首先在武器裝備生產細節上進行修正，根據現代原則進行可能的量產，藉此讓製造方法合理化。」

—— 希特勒，《效率訓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sup>2</sup>

在美國，針對武器裝備進行量產被視為是理所當然。一九四〇年五月，羅斯福總統下令美國空軍重新武裝，要求在一年內生產五萬架飛機。<sup>3</sup>羅斯福後來又介入戰車生產計畫，堅持一年生產兩萬五千輛戰車。當時人們一度懷疑這些目標是否有可能實現，但羅斯福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爐邊談話》提到的「美國工業精靈」，最終仍然滿足了美國重整軍備與戰爭的需要。到了一九四三年，美國僅憑一己之力，就能生產超過所有敵國總和的武器裝備。在此之前，軍事專家已經警告過希特勒，不要小看美國生產武器裝備的能力，但還是無法阻止他對美宣戰。就在日本攻擊珍珠港的前幾天，希特勒在最高統帥部簽署訓令，堅持德國的戰時產業必須進行簡化與標準化，使德國也能像美國一樣進行大量生產。

希特勒在戰略上雖然沒有提出過什麼特別具有創見的主張，但不難看出他從戰爭初期就已經意識到，若想打贏這場戰爭，先決條件就是必

須盡可能做到最大規模的軍事產出。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達《效率訓令》前的幾個月，希特勒已經試圖以最高統帥的身分進行介入，希望讓軍工產業與軍方共同合作，運用德國的豐富資源讓產出最大化。一九四一年五月，希特勒召開會議，與會者有軍備與彈藥部長托德，以及武裝部隊戰時經濟局局長托馬斯將軍。希特勒在會中大致描繪自己的想法，希望讓戰時經濟更有效率。他指責軍方提出複雜的技術需求造成軍工產業的沉重負擔，於是要求「更簡單耐用的建造方式」，並且「推動初步的量產」。<sup>4</sup>希特勒下達訓令，要求陸海空三軍必須減少武器的款式數量與複雜度，往後在夏秋他又發布了幾道訓令，強調武器必須符合現代生產方法。到了十二月，希特勒終於在下達的訓令中清楚說明他的期望。一九四五年，史佩爾的副手紹爾（Karl-Otto Saur）向俘虜他的盟軍表示：「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下令之後，德國才真正基於實務目的落實合理化生產，如果沒有希特勒干預，德國恐怕不會將合理化理論付諸實踐。」<sup>5</sup>然而，並不是只要這道訓令一下達，所有生產就能步入正軌。兩年後，德國航空發動機生產部門長官維爾納（William Werner）抱怨說，整道生產程序依然「充滿強烈的工匠色彩」，因此他要求「根據美國模式」建立生產裝配線。<sup>6</sup>要弭平這兩種生產文化之間的鴻溝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這也成為決定最終戰爭結果的重要因素。

## 量產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各交戰國的軍事產出不僅史無前例，其產量至今也難以望其項背。然而，軍事產出的規模雖然龐大，其中卻只有一部



分武器、車輛與艦艇是在符合「量產」的傳統定義下大量生產的。量產與「福特模式」有關，其起源是二十世紀初由美國汽車工業龍頭福特（Henry Ford）帶起的生產技術革命。福特模式的定義存在著各種詮釋：在美國，福特模式是一種將廉價標準消費品產出最大化的手段，資源與零件在合理控制下進入生產線，裝配工作則區分成無數易學且重複性高的小項目。在蘇聯，新生共產主義政權擁護福特模式，不僅將其視為蘇聯現代性的象徵，也認為合理的量產可以提供廉價商品給剛獲得權力的無產階級。只有德國以模稜兩可的眼光看待福特模式。德國在一九二〇年代曾在福特模式擁護者的支持下將量產方法引進部分產業，但一九二九年後的經濟大恐慌卻引發德國對美國生產模式的不滿，轉而強調德國既有的專門化生產與高工程品質，這兩項特色均有利於發展複雜與技術先進的武器產業。這就是二戰時期截然不同的兩種生產文化。一邊是大量生產的美國雪曼戰車與蘇聯T—34戰車，另一邊則是性能遠遠超過盟軍戰車、但產量卻極為不足的德國虎式與豹式戰車。

實際上，量產原本是戰間期用來生產標準消費耐久財的一種生產手段，而這種生產手段一旦用來生產現代武器時，就會出現明顯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大量生產軍事裝備的重要性開始提升，小型兵器、彈藥與火炮的生產紛紛引進現代工廠生產方式，以提升勞動力的生產效率與節省資源。<sup>7</sup>然而，到了二戰時，量產的範圍擴大到複雜的工程產品，從戰車與各式裝甲車輛，擴展到航空發動機與飛機機體。一架軍機通常需要十萬件以上的獨立零件，因此必須對數百個承包商生產的零件流向進行組織，確保最終的裝配能順利進行，這些都構成對量產的巨大挑戰。步槍或機關槍需要的標準零件不多，生產起來相對容易，只需要重複和平時期的生產方式就能順利製造，但飛機、戰車或潛艦則需要完全不同的生產流程。美國團結飛機公司生產的B—24「解放者」轟炸

機，就使用了三萬張生產圖紙進行組裝。福特原本試圖根據自己生產汽車與卡車的經驗來大量生產B—24轟炸機，他把生產流程分解成兩萬個獨立的工作項目，需要裝設的生產治具與夾具達到兩萬一千件，模具也要兩萬九千件。計畫擬定花了很長的時間，等到真正開始生產時，B—24轟炸機已經成為過時的武器。<sup>8</sup>福特深信，和平時期的量產模式也可以運用在武器生產上，福特因此於一九四〇年提案，表示自己可以運用標準工具機製造戰鬥機，而且一天可以生產一千架，但他的提案在經過調查之後遭到否決，因為製造廉價家用汽車的工程標準無法合乎現代航空生產的必要條件。通用汽車在生產高速戰機XP—75時也遭遇同樣的問題。通用汽車一開始想要走捷徑，公司直接購買其他飛機設計的現成零件，而不是採取整架飛機完全自行設計的做法。四年後，這項計畫宣告失敗，並於一九四五年夏天徹底廢棄——充分顯示即使是量產的巨頭也很難以和平時期的生產方式來滿足戰爭需求。但這同時也凸顯出美國即便將人力物力虛擲於徒勞無功的計畫，生產力依然強過所有國家。<sup>9</sup>

為了量產先進武器而產生的諸多問題，凸顯出民間在和平時期的生產與戰時經濟的差異，前者的生產種類與數量是由消費市場與民眾喜好決定，後者的消費者只有一個，而他開出來的條件經常是不確定、瞬息萬變與專橫獨斷的。難以預測的策略轉變，以及為了匹敵或超越敵方科技成果，這些都會定期性地破壞長期生產流程與相應的規模經濟，而軍事上堅持對既有武器進行短期的戰術調整，往往也會中斷整個生產流程。在這種狀況下，標準模式、可互換零件與輸送線生產都將難以建立。持續不斷的調整是戰時進行量產的大敵。在英國飛機生產部負責零件計畫工作的凱恩克羅斯（Alec Cairncross）表示：「人生就是一場與混亂長期搏鬥的戰爭。」<sup>10</sup>德國容克斯Ju88中型轟炸機在開始生產後的

前三年，設計修改的次數高達一萬八千次，導致生產流程完全無法穩定下來。設計更動不僅影響飛機或戰車的最後裝配，也影響數百家零件供應商，因為它們的生產必須與主要裝配廠配合。個別供應商的量產潛力也有明顯的差異，小公司面對新的要求時，調適的能力較差，而且也比较沒有能力引進較有效率的生產方式。一九四二年，美國計畫生產戰車四萬兩千輛，卻因為缺乏重要零件而短少兩萬輛。德國到了戰爭中期，開始採取措施確保接到軍隊訂單的零件承包商能採取最務實的做法。原本承包商表現最佳與最差的比例是一比五，而在對工廠生產進行合理化調整後，這個比例降到一比一點五。<sup>11</sup>

儘管更複雜與更昂貴的軍事工程可能引發各式各樣的問題，各主要交戰國（義大利與中國姑且不論），最終還是發展出了各種大量生產計畫，其中當然也包括傳統的「量產」。表6.1列出了戰時各國的軍事產量。總體統計數字掩蓋了不同政治與行政體制對於生產數量的影響，也無法呈現持續變動的戰略如何影響各國生產的優先順序。舉例而言，日本與英國著重在飛機與艦艇的生產，而這一選擇符合英日兩國身為島國的戰略性質。蘇聯與德國生產的海軍艦艇數量較少，但陸軍與空軍的產量特別多。只有美國因為坐享半個世界的資源，因而得以生產最大規模的陸海空三軍武器。統計數字也無法顯示不同產出的品質優劣。雖然軍事當局普遍想將配備升級到最新水準以對抗敵軍，但這點通常很難做到，可能是因為現有產線已經投入先前的武器版本，也可能是因為目前經濟的工程能力無法企及。在多數情況下，武器品質良窳的影響還沒有大到足以彌補數量上的差異。隨著戰時經濟逐漸成熟，軍方、商界與政府已經懂得彼此合作，把重點放在已經獲得實戰驗證且能有效率量產的武器上，而不是把資源浪費在大量無用的武器款式。

表6.1 主要交戰國的軍事產出，1934-1944年

A: 飛機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英國	7,940	15,049	20,094	23,672	26,263	26,461
美國	5,836	12,804	26,277	47,826	85,998	96,318
蘇聯	10,382	10,565	15,735	25,436	34,900	40,300
德國	8,295	10,247	11,776	15,409	24,807	39,807
日本	4,467	4,768	5,088	8,861	16,693	28,180
義大利	1,750	3,257	3,503	2,821	2,024	-
B: 海軍艦艇						
英國	57	148	236	239	224	188
美國	-	-	544	1,854	2,654	2,247
蘇聯	-	33	62	19	13	23
德國（只涵蓋潛艦）	15	40	196	244	270	189
日本	21	30	49	68	122	248
義大利	40	12	41	86	148	-
C: 戰車						
英國	969	1,379	4,837	8,622	7,217	4,000
美國	-	331	4,052	24,997	29,497	17,565



蘇聯	2,950	2,794	6,590	24,719	24,006	28,983
德國(a)	794	1,651	3,298	4,317	5,993	8,941
(b)	-	394	944	1,758	5,941	10,749
日本	559	1,023	1,216	1,271	891	371
義大利	(1940-43年) 1,862輛戰車、645門自走砲					
D: 火砲						
英國	1,400	1,900	5,300	6,600	12,200	12,400
美國	-	約 1,800	29,615	72,658	67,544	33,558
蘇聯	17,348	15,300	40,547	128,092	130,295	122,385
德國	約 2,000	5,000	7,000	12,000	27,000	41,000

海軍艦艇不包括登陸艦艇與小型輔助艦艇；德國數字（a）指戰車，（b）指自走砲與反戰車砲；蘇聯戰車數字包括自走砲；英國、美國與德國火砲只包括中口徑與大口徑，蘇聯火砲則包括所有口徑。

減少武器型號數量與更有效管理修改次數，都是武器量產的重要乘數。一旦生產更加標準化，產出後就可以統一交由最優秀與規模最大的公司進行，以此來提高產量。然而這個過程不一定平順，軍種與軍種之間總是會搶奪生產資源，影響彼此的合作關係。在日本，海軍與陸軍各行其是，雙方都不願在武器採購政策上進行協調，結果海軍生產了五十

三款飛機基本型號與一百一十二款衍生型號，陸軍則是生產了三十七款飛機基本型號與五十二款衍生型號。到了一九四二年，日本海軍擁有的引擎類型已多達五十二種。儘管戰爭最後兩年的日本在飛機與航空發動機的產量上有所增加，但生產流程卻是處處受限，備品與維修問題層出不窮。<sup>12</sup>在英國，由於科技進展快速，使得標準型號遲遲無法定案，直到戰爭中期才確定以邱吉爾與克倫威爾這兩款戰車做為設計的標準型號，後者又衍生出彗星與挑戰者兩型。轟炸機的生產則以蘭開斯特與哈利法克斯兩種型號為主，戰鬥機與戰鬥轟炸機則集中生產噴火式、霍克公司的暴風雨式（Hawker Tempest）與迪海維蘭公司的蚊式轟炸機（De Havilland Mosquito）。戰車引擎聚焦於「流星」（Meteor）的生產，航空發動機則以勞斯萊斯梅林（Rolls-Royce Merlin）發動機為生產重點項目。美國在戰爭剛開打時就已經選定標準型號進行量產，戰車的生產幾乎完全以雪曼M4及其衍生型號為主，陸軍飛機則專注生產B—17與B—24重型轟炸機，P—38、P—47與P—51戰鬥機，以及道格拉斯DC—3運輸機。美國陸軍與海軍總共只生產了十八款飛機型號。陸軍的卡車生產則只以四個測試型號為基礎，至於常見的威利斯吉普車則成為主要的小型指揮通信車輛。蘇聯在戰爭時期生產的戰車幾乎清一色是T—34及其升級型號，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才出現了IS—1重型戰車。蘇聯空軍生產最多的是Yak—9戰鬥機與伊留申Il—2攻擊機，分別生產了一萬六千七百架與三萬六千架。<sup>13</sup>德國在標準化生產上的成果有限，梅塞施密特Bf—109戰鬥機是一項重要例子，戰爭期間總共生產了三萬一千架。只要能決定主要型號，開啟長期生產線流程，自然而然就會出現規模經濟。

即使有較穩定的型號與標準化，量產還是會有其他問題。型號在生產時必須與軍方協商進行修改，因為軍方最關切的還是戰場表現，而非

不間斷的生產過程。英國採取了漸進式變更設計的政策，要求飛機型號的修改必須盡可能在既有的生產線上進行，以免嚴重妨礙生產進度。噴火式戰鬥機前後經歷二十次重大設計升級，但生產從未因此中斷，也未重新變更設計，而這幾次的升級已足以讓一九四四年的噴火式戰鬥機性能遠超過一九四〇年的型號。相較之下，美國的做法則是允許充分量產，使流水線生產能完全反映成本效益。產出後若有需要，可以再將飛機成品送到二十所改進中心的其中一所，中心會額外耗費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的工時針對每架飛機進行修改，只是這麼做也會抵消原本量產形成的成本效益。福特公司專為B—24轟炸機在密西根州威洛蘭恩

（Willow Run）設置了廣大廠房，光是生產前的修改就讓飛機設計出現大幅變動，機械、治具與夾具也都要定期變更，導致飛機在生產前就已經耗費許多時間與金錢。到了一九四四年，美國飛機產業決定改採英國模式以減少供給延宕，同時也藉此避免前線部隊提出的各項戰術需求及修改中心提出的各項意見在整合時造成的混亂。<sup>14</sup>

量產的另一項隱憂，就是有可能採取削減成本的生產方式，僱用技術水準較低的勞工，導致最終產品品質不甚理想。二戰期間，英國戰車便以裝配不佳著稱，在戰場上經常故障。一九四二年九月，英國設立作戰車輛檢查處，檢查員的數量從一九四〇年的九百人，增加到一九四三年中的一千六百五十人，機械故障事件的通報數量因此得以在一九四四年減少。英軍發現從《租借法案》取得的美國雪曼戰車也有類似問題。一九四二年，運往北非的三十八輛雪曼戰車，出現了一百四十六次故障，原因應該也出在裝配檢查時有疏失或不夠仔細。<sup>15</sup>蘇聯T—34戰車在快速大量生產的同時，品質往往也十分低劣。一九四三年夏天的庫斯克會戰時，蘇聯生產的戰車只有百分之七點七通過工廠的品管測試。<sup>16</sup>美軍工兵曾在陸軍馬里蘭州亞伯丁試驗場測試蘇聯交給他們的T—34戰

車，結果發現蘇聯戰車的工程品質低劣，完工手續也非常粗糙。在經過三百四十三公里的行駛測試之後，戰車完全拋錨且無法修復，因為T—34的空氣過濾器品質很差，導致塵土被吸進引擎中，使得引擎報廢。除此之外，該車裝甲焊接處還有裂縫，只要下雨車內就會滲水；履帶品質也不佳，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斷裂等。<sup>17</sup>雖然量產是理想，但即使是大型量產廠商也無法在大量生產的同時能兼顧產品品質。

中日戰爭與歐美的量產經驗完全不同。中國的戰時生產一方面受到工業發展狀態不成熟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因為華北與華東遭受日本占領，而這兩個地區不僅擁有豐富資源，也是中國僅有的工業區所在地，這些都使得中國的軍事生產雪上加霜。面對日軍入侵，中國把兵工廠的機器設備大量疏散到後方，遷往中國西南部與戰時首都重慶附近的工業區。從一九三〇年代晚期開始，重慶周圍聚集的十三座兵工廠至少供應了中國三分之二的戰時生產。<sup>18</sup>與其他交戰國相比，中國的戰時紀錄相當缺乏，中國的兵工廠也缺乏現代機具與充足的原料供應，往往只能仰賴手工。國民政府軍需署一年只能分配一萬兩千噸的鋼鐵給兵工廠。兵工廠人數最多也不過五萬六千五百名工人，產品主要是輕兵器、彈藥、八十五公釐迫擊砲與手榴彈。國民政府陸軍總計約有三百個師，也就是三百萬人，但一九四四年的武器產量竟只有六萬一千八百五十支步槍、三千零六十六挺重機槍、一萬零七百四十九挺輕機槍與一千兩百十五門迫擊砲。一九四一年，中國研發了三十七公釐火砲，但每年只能生產二十到三十門，而且砲彈品質不佳。<sup>19</sup>中國無法生產飛機、重砲、戰車與裝甲車輛。上述數字使人難以理解國民政府軍隊如何能持續數年抵抗強大的日軍，特別是在日軍切斷了國民政府已經十分有限的外來補給線時。戰前進口的武器仍有庫存，但數量不多且無法補充。中國軍隊時常利用地形優勢對日軍發起消耗戰，然而一旦遭遇會戰，中國軍隊稀少的



資源不可避免使他們遭遇慘敗。

日本在一九三八年頒布《國家總動員法》，但日本為了對華作戰而進行的戰時生產依然受到限制。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軍工業每年平均生產六百輛輕型與中型戰車，而為陸軍與海軍生產的飛機則由於機器與引擎的型號繁多，每年生產的數量只約略超過四千架。<sup>20</sup>日本把大部分資源投入在海軍造艦上，不過這項戰爭投入對侵華戰爭幾乎沒有任何助益。造艦與飛機產業的組織與機器設備相對現代，但陸軍與海軍的生產領域涇渭分明，加上小型承包商的數量眾多，彼此的生產效率無法統一，使得生產難以集中化，這些都導致日本的武器量產受到限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戰時生產也出現了改變。大量投資湧入海軍艦艇、商船與飛機的建造，深陷侵華戰爭泥淖的日本陸軍，機械化或摩托化程度則因此止步不前。太平洋戰爭期間，戰車生產數量從一九四二年高峰的一千兩百七十一輛，下降到一九四四年的三百七十一輛；一九四二年開始生產的戰甲車輛，在整個戰爭期間只生產了一千一百零四輛。從美國或歐洲的標準來看，日本的汽車工業相對落後，四年間只產出五千五百輛大卡車供軍事與經濟使用。<sup>21</sup>當戰場上彈藥用盡時，日本士兵只能使用武士刀或刺刀。由於美國進行海上封鎖，日本嚴重缺乏鋼鐵等金屬，這是日本戰時生產數量偏低的原因之一。此外，日本採取的戰略決定，也使原本已經有限的產業經濟限縮在特定產品上，這也造成武器量產的不足。

到了一九四三年，日本為了保衛帝國國防圈，決定把飛機生產放在最優先順位。全力生產飛機的決定，使整套戰時生產體系面臨嚴峻的壓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戰爭已接近末期，日本政府終於在此時成立軍需省，負責監督飛機生產。到了一九四四年，飛機生產已占總製造產能的百分之三十四，而軍需省計畫要量產五萬架以上的飛機。<sup>22</sup>為此，軍

需省成立了航空工業會，並且將其區分成十四個專門化協會，使其負責每一項重要的飛機子組件與大量轉包生產零件。<sup>23</sup>日本如果要在進口鋁土（用來煉鋁）供給枯竭之前，在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完成飛機量產計畫，唯一的可能就是將戰時經濟重心完全放在生產飛機。儘管如此，飛機的生產依然受到各種因素限制，例如無法充分管控零件供應商，國內生產的工具機耐久性不足、精確度也不夠，此外負責生產的工程師也缺乏大量生產經驗。日本計畫在一九四二年設立兩座量產工廠，但在高座的工廠無法依原定設計一年生產五千架飛機，最終僅僅生產了六十架戰鬥機；至於在津市的航空發動機工廠狀況更慘，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造出任何發動機。<sup>24</sup>其餘的飛機產業努力想完成計畫目標，結果生產的急迫性與引進缺乏技術的勞工，導致產品品質直線下降，到頭來飛機本身的問題反而超越空戰損失，成為日本空軍飛行員傷亡的主因。飛機軍工產業的生產力始終低迷不振。一九四四年，日本每人每日的飛機生產磅數是零點七一，美國則是二點七六。<sup>25</sup>即使日本能提高生產效率，原料短缺依然構成量產限制。在整個戰爭期間，日本經濟生產的武器數量僅能達到美國的十分之一。

二戰期間，真正能做到量產的只有蘇聯與美國。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美蘇總共生產了各型飛機四十四萬三千四百五十一架，戰車與自走砲十七萬五千六百三十五輛，火砲六十七萬六千零七十四門，這項紀錄不僅讓其他主要工業國望塵莫及，也讓今日的軍事生產相形見绌。美國生產的飛機數量遠超過其他盟國，而蘇聯則生產了較多的戰車與火砲，兩國在戰爭期間都維持了極高的生產水準。儘管如此，美蘇這兩個大量生產武器的國家卻各自面臨著迥然不同的處境。蘇聯採取威權式計畫經濟，由中央統籌一切，嚴格監督資方與勞方，不許違反國家的任何規畫；美國則採取自由進取的資本主義經濟，國家極少干預市場，

擁有大量的個別企業與自由勞動力。在德國入侵之前，蘇聯擁有豐富的原物料，但在德國入侵之後喪失了三分之二的鋼鐵與煤礦，經濟體質大受影響，僅能靠有限的工業資源維持戰爭。例如蘇聯在一九四二年的鋼鐵產量只有八百萬噸，相較於前一年的一千八百萬噸可說是大幅縮水。煤產量也從一億五千萬噸變成七千五百萬噸，鋁產量也只剩下五萬一千噸。相較之下，美國本身的天然資源遠較其他交戰國來得豐富。光是一九四二年，美國就生產了七千六百八十萬噸的鋼鐵、五億八千兩百萬噸的煤與五十二萬一千噸的鋁。最明顯的對比或許是戰前的軍事生產狀況。蘇聯從一九三〇年代初就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軍事生產，到了一九四一年理論上已經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空軍與戰車部隊。巴巴羅薩戰役雖然帶來危機，卻仍不足以影響蘇聯工程師與工人多年來大量生產武器的經驗。美國在一九四一年之前除了造艦外，毫無大量生產武器的經驗，因此美國重整軍備絕大部分都是從零開始。一九四〇年，當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工程師受邀前往巖島兵工廠參觀，瞭解生產戰車的相關事宜時，這些工程師沒有任何人親眼看過戰車。<sup>26</sup>克萊斯勒接下生產戰車的任務，但在生產之前，公司還必須先在密西根州的農地上興建新工廠。結果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工廠一天已能生產十五輛戰車，充分展現出美國體制下的企業與工程實力。

蘇聯能夠如此大量生產武器，與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息息相關。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蘇聯國防委員會成立，由史達林擔任主席，該組織掌握了經濟上的絕對權力。國防委員會管轄所有與生產及武器相關的事務，並且將生產責任交由各人民委員部執行。與和平時期的嚴格控制相比，國防委員會反而採取鼓勵的方式，希望官員與工程師能夠發揮彈性與隨機應變的精神。凡是遇到零件與原料供給的問題都必須上報國防委員會，委員會將立即採取措施，移除體制內部的障礙，許多問題有時僅

靠史達林的一通憤怒電話（或威脅電話）就能解決。<sup>27</sup>戰爭投入被放在絕對優先的位置，全力投資工廠、機器與原物料供給。這套體制才剛設立不久就遭受考驗：就在疏散委員會成立兩天後，德軍入侵蘇聯，該委員會成功將五萬家工場與工廠（包括兩千五百九十三家大工廠）、一千六百萬名工人及其家人遷往位於烏拉山脈、西伯利亞與俄羅斯南部的新的地點。<sup>28</sup>這場混亂的遷徙最終只能仰賴蘇聯工程師與工人的艱苦努力才能達成，他們在冰凍的氣溫下憑藉稀少的設施或住房重建了生產線。一九四二年，萎縮的蘇聯經濟生產的軍事裝備竟遠多於一九四一年。往後的戰爭歲月裡，蘇聯工業生產的飛機、戰車、槍砲、迫擊砲與砲彈數量均遠多於軸心國。不僅如此，這些武器仍具有堅實的戰鬥品質。挑選武器的士兵與工程師只選擇其中幾樣設計以便大量生產，尤其是那些可以與德國技術相抗衡、使敵人蒙受最大程度損害的武器。卡秋莎多管火箭就是個好例子。這種多管火箭發射器可以裝設在卡車上以利部署，並且可以對敵軍發射大量的高爆彈藥，造成大範圍殺傷。卡秋莎多管火箭容易生產且便於使用，同時結合了蘇聯武器的兩項特質：簡單與殺傷力。

蘇聯的大規模生產也仰賴蘇聯特有的生產制度。蘇聯工廠規模龐大，許多工廠依照計畫進行整合，除了生產零件與設備，也負責進行裝配完成最終產品。蘇聯使用特殊的工具機建立生產輸送帶，在裝配間裡裝配零件與子組件，有時還使用挖空的木頭充當輸送帶。工程師設計廠房，旨在減少時間或資源的浪費。烏拉山區城市車里雅賓斯克有一座曳引機工廠，這座工廠可以視為是蘇聯生產模式的例證。德國入侵後過了幾個月，蘇聯戰車工業副人民委員札爾茨曼（Isaak Zaltsman）下令曳引機工廠必須改生產戰車。從列寧格勒撤出的工具機大約有五千八百臺，這些工具機裝設在四座巨大的新裝配廠裡，這些裝配廠甚至連屋頂都還沒蓋好。但上級還是下令必須馬上進行連續生產。一九四一年十月，



KV—1重型戰車完成出廠，但缺乏引擎的啟動裝置。札爾茨曼下令將引擎運送到鄰近莫斯科的車站，再用火車將戰車運到首都莫斯科，途中會先經過引擎所在的車站，因此能在運送途中就把引擎安裝到戰車上。一九四二年八月，曳引機工廠接到命令，要把生產線改成生產T—34中型戰車。儘管遭遇到工廠建造新型號戰車的設備問題，但最終曳引機工廠還是在一個月內生產出了新戰車，到了一九四二年底，更是已經生產了超過一千輛戰車。<sup>29</sup>曳引機工廠有四萬名工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三不到二十五歲，三分之一是女性。絕大多數不適合進入工廠工作的人則必須到一九四〇年新設立的貿易與工業學校接受速成課程，然後從事相對簡單的裝配線工作。工作條件很艱困，怠忽職守則會遭到嚴懲，但是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結果，工人平均生產力確實獲得大幅提升。一九四〇年，國防產業每個工人增加的淨值（以固定價格計算）是六千零一十九盧布，到了一九四四年已達到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盧布。<sup>30</sup>儘管如此，蘇聯的體制依然不減其反覆無常的性格，即使札爾茨曼成功將車里雅賓斯克改造成「戰車之城」（Tankograd），還是逃不過史達林在戰後指控他有反革命的傾向，將他降級成一名監工。

美國企業不像蘇聯那樣有資源方面的限制，也沒有古拉格集中營的威脅。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試圖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蘇聯展現了管理能力與積極精神把車里雅賓斯克曳引機工廠改造成輸送帶式戰車裝配線，而美國克萊斯勒公司則是在短時間內迅速建成巨大的戰車工廠。兩者都在幾個月內達成一天可以生產十輛戰車的成果，而且兩者都在例行裝配線上僱用了大量技術程度較低的工人。在生產前線上，美蘇的類似之處解釋了兩國何以能成功量產，但美國採行的制度卻與蘇聯採行的制度大相逕庭。羅斯福總統希望一九三〇年代的新政經驗可以讓聯邦政府順利主導戰時生產，但美國沒有國家中央計畫的傳統，也不知道如何

管制在和平時期完全交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原料與零件流動。徵召美國企業投入戰爭的結果，使積極進取的企業精神得以臨場發揮，從而創造出量產的條件，而美國的聯邦政府在形式上並未直接參與。一九四二年一月設立的戰時生產局不得不向陸軍與海軍讓步，允許他們不需要徵得生產局同意，便可自行發包採購武器軍火，這項決定等於架空了戰時生產局監督總體武器生產的權力。生產需求計畫制定的最初宗旨，是為了對原物料進行配給以限制陸軍與海軍的獨立性，但由於缺乏必要的科層組織而無法讓這項政策落實。戰時生產局也設立了生產執行委員會，試圖控制與追蹤標準核心零件的配置情況。生產執行委員會針對八十六項重要零件訂定了一般時程順序，確保每一項零件都能準時送到最需要零件的地方，結果卻是好壞參半。因為美國為了管制戰時經濟設立了大量的機構，這些機構疊床架屋，構成的行政體制不僅造成混淆，而且機構之間往往產生對立而非相互合作。<sup>31</sup>

美國的戰時經濟缺乏像蘇聯模式的明確計畫與指令，完全仰賴美國民間企業的投機與野心。美蘇的對比尤其表現在戰時生產局最初採取的行動上，當時戰時生產局的局長是通用汽車總裁克努德森（William Knudsen）。他召集各大企業董事，宣讀一長串必須優先處理的契約，並且徵求自願者。各大公司紛紛爭搶這難得一見的機會。<sup>32</sup>第一批契約有五分之四僅由一百家大企業掌握，但供應商的需求卻讓數千家零件與新設備商受惠，許多小企業因此趕上這波生產與獲利熱潮。通用汽車與一萬九千家供應商合作，在自家公司的工廠進行最後組裝，包括一萬三千四百五十架飛機。整個飛機產業就涵蓋了大約十六萬兩千家承包商。<sup>33</sup>大約有五十萬家新企業於戰時成立，絕大多數是為了滿足大量用於戰爭的原料需求。商界人士也被徵召進入聯邦機構協助管理，美國的商界與政府機關因而形成某種連結——例如通用汽車的克努德森、西

爾斯百貨的尼爾森（Donald Nelson，克努德森的繼任者）、奇異公司的威爾森（Charles Wilson）、投資銀行的埃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等人。蘇聯體制仰賴國家的嚴密監控，美國體制則仰賴反國家干預的自願精神、充滿活力的競爭與企業家的想像。<sup>34</sup>當福特誇下海口，表示自己一天可以生產一千架戰鬥機時（儘管日後未能兌現），他也提出一條但書，要求聯邦政府不能出手干預，他才能實現承諾。雖然福特對於政府官僚與政府種種繁文縟節的做法抱有偏見，但他的公司最終還是成為主要軍武生產者，製造了大量的武器：二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六輛吉普車、九萬三千七百十八輛卡車、八千六百八十五架轟炸機、五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具航空發動機、兩千七百一十八輛戰車、一萬兩千五百輛裝甲車。整個汽車產業幾乎完全轉變成軍火產業。美國汽車產業原本在一九四一年生產了超過三百五十萬輛小客車，但到了美國參戰後的高峰期，年產量居然下降到只剩一百三十九輛。<sup>35</sup>

相較於其他交戰國，美國比較少出現管控戰時生產方面的問題，這是因為美國的經濟並未遭遇封鎖或轟炸，因此在資源與金錢上不虞匱乏（當然，美國偶爾也會出現浪費、腐敗或無能，但這是生產者與政府機構相互競爭下不可避免的現象）。相較於德國必須投入資源來防衛領空與城市，美國幾乎完全不需要。今日絕大多數史家都認為，如果美國在生產過程更為中央集權或更具強制性，很可能就可以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但就算沒有這一優勢，美國在軍武方面的生產力早已高得可怕，因為美國具有龐大的生產規模、廣泛採用的裝配線與流水線生產方式，就連在造船產業也是如此。美國在四年內生產了三十萬三千七百十三架飛機與八十萬兩千一百六十一具航空發動機，充分顯示聯邦政府與產業界臨時結盟帶來了正面效果而非負面缺點。人均工日生產的飛機磅數從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點零五增長到三年後的二點七。儘管美國投入大量資

源在陸軍武器，但海軍與商船的造船規模也不可小覷。從戰鬥艦到驅逐艦，美國海軍艦艇一共下水一千三百一十六艘，令其他海軍國家黯然失色；此外還有十萬九千七百八十六艘小型艦艇，包括八萬三千五百艘兩棲登陸艇。<sup>36</sup>商船的造船產業建造了五千七百七十七艘大型船隻，包括美國最著名的量產案例：由美國企業家凱薩（Henry Kaiser）所生產的「自由輪」（Liberty Ship）。

凱薩是白手起家的經典範例，他起初在紐約經營一家小照相館，之後成了大型建設公司老闆，負責興建胡佛水壩與海灣大橋。他喜歡接受挑戰，特別是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計畫。凱薩毫無造船經驗，但當他的建設公司於一九四〇年開始興建新造船廠時，他決定自己也試著造船——此前他從未看過船隻下水。凱薩開始在加州里奇蒙永恆金屬造船廠著手量產一萬噸的標準貨船來協助補充被德國潛艦擊沉的商船，這就是「自由輪」。自由輪的設計相當簡單，零件與裝配完全標準化，船隻沿著離海岸只有幾公里的生產線移動。所有零件與子組件都在長二十四公尺的輸送帶與巨大滑輪下裝配完成，僱用的工人只受過有限的訓練，並且接受效率專家的監督，這些工人被分配到生產線上，重複進行相同的工作。首艘貨輪在巴爾的摩下水時，總共花了三百五十五天建造，耗費一百五十萬個工時。到了一九四三年，在凱薩的加州造船廠，一艘船從進入到離開裝配線，平均只需要四十一天，僅需耗費五十萬個工時。到了戰爭結束時，凱薩的造船廠已經建造了一千零四十艘自由輪、五十艘護航航空母艦與大量的小型船隻。美國戰時使用的船隻有將近三分之一是由凱薩建造的，這是個別企業家的熱忱與對產業合理化的重視所造就出來的文化成果。<sup>37</sup>

然而，這類量產出來的武器，整體而言存在有戰鬥品質不盡理想的問題。即使是船身全新焊接的自由輪，也可能在波濤洶湧的大洋中解



體。軍方傾向於選擇已經開始生產或可以迅速調整量產的設計，但實際作戰經驗卻暴露出這種採購方式的缺點。大量生產的B—17與B—24轟炸機，在德國防空系統面前成了不堪一擊的目標，除非有較新型的戰鬥機護航，否則難以平安返航。一九四三年底，美國在極短時間內成功量產可以外掛的油箱，使這些護航戰鬥機可以順利伴隨轟炸機飛抵德國上空進行轟炸。至於當時最先進的B—29重型轟炸機，則是直到一九四四年底才投入實戰，且投入戰鬥後設計造成的問題便接踵而至。儘管一九四二年十月貝爾的XP—59A實驗機成功完成首次噴射動力飛行，但研發工作仍然過於緩慢，來不及在戰爭結束前生產出第一架可用的噴射機。<sup>38</sup>至於在路軍武器的部分，美國陸軍軍械部技術局局長巴奈斯少將（Gladeon Barnes）堅持採用標準型號的中型戰車設計，也就是M4雪曼戰車及其衍生型號，因為只有這種戰車才適合迅速進行量產。然而，這種戰車的性能卻普遍不如最新型的德國與蘇聯戰車。軍械部缺乏戰車設計的實際經驗，也不熟悉裝甲部隊的實際作戰需求。結果就是生產出來的雪曼戰車，即便經過幾次升級，依舊存在有裝甲防護力不足、車身過高、射速不夠等問題，因而在戰場上十分脆弱。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M4戰車乘員在戰鬥時必須採取從側面或後面攻擊德軍戰車的戰術，因為從正面攻擊的話M4戰車很可能沒有勝算。裝甲師的一名中士寫道：「我們的戰車用來閱兵與訓練可能不錯，用來戰鬥就可能成了棺材。」用來取代M4雪曼且可與德國豹式與虎式戰車抗衡的重型戰車M—26「潘興」，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星期才順利出廠，數量極少：歐洲戰場只分到三百一十輛，戰車部隊也只接裝了其中兩百輛。<sup>39</sup>美軍地面作戰之所以能獲得勝利，主要是因為美軍擁有大量的裝備可以彌補武器品質的不足。

德國的戰時經濟其實具有量產的潛力。相較於工業發展相對不足、

資源取得也受到嚴重限制的日本與義大利，德國擁有深厚的工業、工程與科學研發實力，有能力動員進行戰爭，更不用說到了一九四一年，德國已經掌握了歐陸絕大部分資源。蘇聯在一九四三年的總鋼鐵生產量是八百五十萬噸，德意志帝國的鋼鐵總產量則高達三千零六十萬噸。蘇聯在同年開採了九千三百萬噸的煤，德國則是高達三億四千萬噸。至於用來製造飛機等戰爭相關產品的鋁，當年蘇聯只生產了六萬兩千噸，而德國產量則是二十五萬噸。因此，我們無法說第三帝國並未取得足夠的資源或工業投資。但德國卻是一直要到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才開始對這些資源進行較有效率的運用（即便當時其主要工業大城正在遭受盟軍嚴重轟炸），其後期的資源使用效率儘管無法媲美同盟國的量產，也已相對接近。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的經濟學家曾經對這個現象感到困惑，那就是為什麼德國明明擁有軍事經濟所需的一切資源，戰爭初期卻只生產了數量相對不多的飛機、戰車與車輛？面對這個弔詭的現象，調查團在一九四五年達成結論，認為這是因為希特勒政權因為擔心觸怒國內工人，因此不願在戰爭初期全面動員經濟，直到後來隨著戰局惡化，才不得不在一九四三年進行動員。<sup>40</sup>

歷史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打從戰爭一開始，身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就希望戰時生產能盡快超過一戰末期的水準。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陸軍軍備局對一九一八年的武器生產量、當前的武器生產量，以及希特勒對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武器生產設定的「最終目標」進行了比較。一九一八年生產的火砲數量為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三門，希特勒的最終目標是一年生產十五萬五千門；一九一八年生產的機關槍數量是十九萬六千五百七十八支，希特勒希望能達到一年超過兩百萬支；一九一八年的火藥與炸藥每月產量為兩萬六千一百噸，但希特勒希望每月產量達到六萬噸。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下令，要讓德國經濟「全力」投入戰

爭，確保「武器生產盡可能達到最高的數量」。<sup>41</sup>希特勒以這些統計數據做為衡量標準，以此來抱怨當前軍事生產的無效率。史佩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被任命為軍需部長，他在戰後的訊問中提到，希特勒「知道一戰詳細的供給數據，他因此指責我們在一九四二年生產的武器數量居然比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生產的武器數量來得少」。<sup>42</sup>德國的戰時生產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開始擴張，一九四二年，德國已經有七成的製造業勞動力為武裝部隊工作（這個水準遠高於英國或美國在戰爭期間投入的勞動力比例），鋼鐵生產有四分之三完全配置在軍事經濟上，儘管如此，德國的武器生產仍遠低於可能的量產水準。<sup>43</sup>相較之下，英國與蘇聯在戰爭初期投入的原料資源與勞工都比德國少，但生產的武器數量卻比德國多。

針對這樣的差異，學界提出了各種解釋。希特勒對於戰時生產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並未像史達林（或邱吉爾）那樣設立中央國防委員會，針對戰略、工業能力與科技發展進行整合與搭配。在缺乏中央決策中心的情況下，德國的戰時生產體系呈現多頭馬車的狀態，戈林的四年計畫、經濟部、勞動部、一九四〇年春設立的軍需部、空軍部等行政機構各行其是。主要的問題出在軍方對於能生產什麼、由誰生產與生產多少數量有絕對的掌控權。德國各軍種未能彼此協調共同擬定計畫，而是抱持本位主義提出自己急需的要求，完全不管這些要求在工業上是否可行。軍方本能地對量產抱持懷疑態度，傾向於與既有的承包商合作，維持專門化、高品質與定製化的武器傳統。軍方認為，現代武器需要一定程度的科技水準與精密加工，這些都是量產難以企及的。戰爭結束時，史佩爾的一名軍需部高階官員被人挖苦說，德國就是因為無法充分動員汽車產業進行量產，才會輸掉這場戰爭，但這名官員依然故我地認為：「這種做法不適合戰時生產……我們不能只集中量產某個類型的武

器。」<sup>44</sup>德國軍事工程師與督察官堅持，軍工產業必須根據作戰經驗進行彈性回應及調整，由此產生的大量型號與實驗計畫使得標準化與長期生產線流程窒礙難行。一九四二年，希特勒認為產業界確實有理由抱怨「零星生產」的要求，「今天下單要求生產十門榴彈砲，明天又下單要求生產兩門迫擊砲等等。」<sup>45</sup>民間產業必須遵守軍方命令，民間工程師或設計師在前線若不想受到干預，首先必須先成為軍人。但即使是文官掌政軍需部（負責提供武器），也被陸軍軍備局認定是一群「無經驗的外來者」。<sup>46</sup>軍方的要求使得德國的戰時經濟漫無章法，也扼殺了量產的可能。史佩爾的副手紹爾就認為，軍方的干涉使德國的生產體系到了一九四一年依然「無法完全合理化」。<sup>47</sup>

希特勒希望打破僵局，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達了合理化的訓令，並且堅持軍方必須允許德國產業進行量產，如此才能與蘇聯的武器生產抗衡。但結果依然好壞參半。希特勒下達訓令後不久，軍需部長托德便大幅改革了戰時生產的組織方式。戰甲車輛、輕兵器、彈藥、工具機、造船等主要武器類別都設立了委員會，由工程師與實業家而非軍方人士擔任委員。然而，吸收德國戰時生產所需資源四成以上的飛機生產，卻無須聽從托德軍需部的命令，因為戈林在空軍部的副手米爾希也成立了類似的生產「集團」，由各大生產商共同組成，用來生產飛機、航空發動機與零件。然而，這多達一百七十八個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組成的生產集團與委員會，反而對量產制度帶來負面的影響。<sup>48</sup>無論是軍需部還是空軍部，兩者的目標都是要讓最有效率的公司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造船委員會主席梅爾克（Otto Merker）就表示：「由最傑出的公司來領導各家公司，這麼做為實現武器生產合理化邁進了一大步。」<sup>49</sup>一九四二年二月，托德在一場空難中喪生，希特勒於是任命托德賞識的建築師成為新任軍需部長，那就是年輕的史佩爾。史佩爾出身平民，之前



從來沒有武器生產經驗。史佩爾接續托德的工作，並在該年三月成立中央計畫局，負責管制關鍵原物料的供給，以解決原物料分配工作未考慮輕重緩急而造成大量浪費的問題。在希特勒下達訓令之後，合理化不僅成為經濟上的必要手段，也成為政治上必須服從的規範。效率專家胡普法爾（Theodor Hupfauer）接到指示，要對德國戰時產業的整體生產績效進行評估。在一九四五年的訊問中，胡普法爾提到自己的調查顯示，「德國的產業效率低落，即使是最現代的公司也不例外。」他發現不同公司的生產流程的生產次數，差距可以達到二十倍，而最終裝配次數的差異也可以達到四至五倍。胡普法爾寫道，接下來的戰爭標語成了「盡一切努力擴大基礎，提高效率」。<sup>50</sup>

軍需部採取各項措施，試圖更合理地將德國工業產能投入戰爭，卻遭到德國陸軍的反對——德國陸軍依然堅持由軍方主導採購政策。雖然合理化的措施獲得希特勒的直接支持，沒有人敢輕易挑戰這項決策，但史佩爾還是得等到一九四四年夏天才得以掌控各產業的軍事生產。其中一項重要改革，就是價格固定制度。這項制度最早原本是由托德與軍需部提議，並於一九四二年初不顧陸軍反對而推動，試圖以強制的價格固定契約來取代陸軍採行的成本加成契約。價格固定可以讓製造商摺節成本以取得適當獲利，成本加成則會讓廠商為了規避軍方對價格與成本的嚴厲控制而採取較無效率的生產方式。在價格固定下，公司如果可以生產出比規定價格低百分之十的產品，又或者公司如果能接受低於規定價格的售價，並且靠著提高效率節省成本，公司就能獲得一定數額的獎金，且公司因效率提升取得的額外獲利也不用課徵特別的戰爭利潤稅。一九四二年一月，托德與德國實業家開會時提到，「能夠以最合理的方式運作的公司，就可以獲得最高的利潤。」公司愈能提升效率，愈能賺取更高的利潤。<sup>51</sup> 武裝部隊只能勉為其難地接受自己無法繼續管控價格

的現實，納粹黨激進分子則是反對托德改革明目張膽呈現的「資本主義」色彩。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史佩爾終於接續引進了新的價格固定制度，並且警告廠商，未來如果未能通過提升生產力測試，就會從承包商名單中除名。我們很難評估生產績效的提升有多少源自於獲利誘因的影響，因為有些武器生產商屬於國家所有。但禁止軍方干涉價格，確實給予廠商空間，使其能自行決定如何生產戰時商品。<sup>52</sup>

對德國來說，更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重整混亂的軍事訂單，以及如何让生產集中在長期的標準化產品之上。史達林格勒會戰的慘重損失，使得武器生產合理化成為不得不採行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三年，史佩爾藉由獎勵有效率的公司與關閉無效率的廠商，成功集中了零件與工具機生產。原本在一九四二年有九百家公司負責生產工具機，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天只剩下三百六十九家；德國生產的稜鏡玻璃類型也從原本的三百種逐漸減少到十四種，製造稜鏡的公司也從二十三家減少到七家。<sup>53</sup>史佩爾設立軍備委員會，負責讓軍方的技術需求與工業產能更妥善搭配。經過協商之後，陸軍同意將步兵輕兵器的型號從十四種減少為五種，反戰車武器從十二種減少為一種，防空砲從十種減少為兩種，車輛從五十五種減少為十四種，戰甲車輛從十八種減少為七種。陸軍總部最後終於下令，「簡化生產方式」以促成「量產」。<sup>54</sup>飛機型號先是從四十二種減少到二十種，然後又減少到九種。一九四四年春天成立的緊急「戰鬥機任務小組」為了協助對抗盟軍的轟炸，最終又將飛機型號減少到只剩五種。<sup>55</sup>挑選出來的武器型號與零件因此可以進行長期生產，並且適合於搭配輸送帶與滑輪的機械化生產。然而，在盟軍密集轟炸導致必須分散生產下，現代工廠方法始終無法在德國各地施行。德國在傳統上傾向於使用通用性的工具機，不喜歡使用流水線生產需要的專門化工具機，這種偏好也導致工廠在聘僱人力時總是選擇技術勞工。直到一九四四

年，德國的生產方式終於轉變成量產模式，此時工廠人力多半調整成半技術導向的外籍勞工，這些人更適合在裝配線上從事生產工作。每間公司的績效表現不盡相同，例如容克斯飛機製造廠的生產力年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六十九，但亨克爾飛機製造廠卻只有百分之零點三。但整體而言，德國勞動生產力的數據顯示，德國在戰爭的最後兩年生產力出現了最大幅度的增長。<sup>56</sup>根據估計，德國國防產業的人均產出如果以一九三九年為基準將指數設定為一百，那麼到了一九四一年降到七十五點九，到了一九四四年又躍升至一百六十。另一項估計則指出，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德國國防產業人均產出呈現溫和成長，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則開始大幅成長，一九四四年後的戰時產業已經逐漸掌握量產模式，學習曲線才趨於平緩。但與此同時，德國在化學、鋼鐵與液體燃料等其他相關產業的生產力，一九四四年已明顯低於戰爭剛開始之時，這點可由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使用的德國官方數據佐證。但無論個別產業的績效好壞，戰時德國在量產上的表現都明顯比不上蘇聯或美國經驗。<sup>57</sup>

當德國終於能進行量產時，盟軍已經開始大舉轟炸德國本土並且登陸歐洲，德國因此愈來愈難取得所需資源。更糟的是，就像日本於一九四四年大舉擴大生產一樣，此時的軸心國就算能傾全力生產，也已經完全趕不上同盟國的生產速度。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德國生產的飛機與車輛數量大幅增加，然而武器耗損的數量也同樣巨大，導致量產幾乎無法對軍力提升產生實際影響。德國軍方雖然重視武器品質，但戰時經濟的混亂與未能成功研發出新武器，導致德軍武器的性能遲遲無法提升。德國空軍在新一代戰機的發展上做了錯誤判斷，使空軍最終只能升級一九三八年就已經出廠的飛機型號，如Me—109、Me—110、He—111、Do—17、Ju—52、Ju—87與Ju—88。重型轟炸機亨克爾He—177與

重型戰鬥機梅塞施密特Me—210證明是一場設計災難，德軍在這兩型飛機上投入大量資源，獲得的成果卻少的可憐。<sup>58</sup>德國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迅速研發出噴射戰鬥機Me—262，想用來取代已經老舊的活塞發動機戰鬥機。新式的噴射發動機不僅生產工時較短，使用的稀土原料也較少，但新發動機的生產品質不佳，未能通過完整測試。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德國總共生產了一千四

百三十三架噴射戰鬥機，但只有三百五十八架服役，多達數百架遭到報廢。<sup>59</sup>德國飛機的研究與發展完全孤立於前線之外，各式各樣的先進計畫幾乎對戰局毫無助益，最終導致飛機研發的失敗，包括胎死腹中的「國民戰鬥機」火箭動力戰鬥機亨克爾He—162。這款飛機與前述的噴射戰鬥機一樣，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匆促在地下工廠製造，最後才在德國投降前三個星期少量地投入戰鬥，於事無補。<sup>60</sup>

海戰方面，德國在潛艦設計上確實有了新突破，例如可以完全潛航的XXI型與XXIII型潛艦，但這些潛艦卻未能即時生產與投入戰鬥。虎式與虎王這兩種重型戰車雖然火力強大，但產量不足，而且技術過於複雜、生產過於匆促，導致戰車經常出現機械故障。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希特勒在一九四三年決定量產的「復仇武器」（Vengeance Weapons），包括V1飛彈與V2火箭。然而這類復仇武器並未帶來戰略利益，反而因為吸收了大量產能而排擠其他真正能帶來戰略利益的武器。雖然德國軍方重視武器的品質甚於數量，但到了一九四四年，先進技術的優勢已無法彌補戰場上德軍與盟軍的資源落差。德國的戰時生產徘徊於蘇聯與美國模式之間，最後落得兩頭皆空：德國一方面採取了蘇聯式的計畫經濟，卻缺乏中央管理體系，另一方面又採行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卻無法解放出民間企業家的進取精神，反而屢屢在軍方干預下遭到扼殺。這種矛盾一直拖到很後期才解決，最終難以實現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命令中



所陳述的量產願景。

## 民主兵工廠與《租借法案》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英國與美國代表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達成歷史性協議，決定提供武器裝備支援蘇聯作戰。在莫斯科進行會談時，即將接任蘇聯駐美大使的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在達成協議時起身高聲說道：「我們將贏得這場戰爭！」<sup>61</sup>過去幾個星期以來，史達林持續向西方盟國求援未果，這次協議能夠順利達成，他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就在德軍兵鋒已經接近蘇聯首都之時，史達林寫信給羅斯福，針對美國的武器供應表達「最深刻的感激」，對於可以等到戰後再償付軍費更表示「誠摯的感謝」。<sup>62</sup>同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美國總統正式下令，蘇聯將成為《租借法案》援助的受惠國。同盟國成員若想增加武器裝備，除了憑藉國內生產，唯一的辦法就是仰賴美國無償提供。這是一場遍及全球、史無前例的後勤補給計畫，與軸心國交戰的國家可以藉此重新分配資源，在莫斯科達成的協定這項計畫的其中一環。查爾斯·馬歇爾（Charles Marshall）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也是一名參與二戰的士兵，他在評價《租借法案》時表示，這是「一個在國際經濟戰略下建立的龐大體系。加入這個體系的國家，涵蓋了地球三分之二的陸地與三分之二的人口」。<sup>63</sup>早在美國參戰之前，華府的戰略選擇已經轉變了同盟國的戰時經濟潛力。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羅斯福承諾美國將成為「民主的兵工廠」。到了一九四五年，這一承諾已完全兌現，美國提供的援助計畫總價值超過五百億美元。

軸心國沒有可與同盟國匹敵的優勢，他們沒有「獨裁的兵工廠」。

雖然德國這個戰時經濟體相對於義大利與日本，就像美國這個經濟體相對於其他同盟國一樣，但德國光是維持自身的軍事需求就已經捉襟見肘，更不用說支援其他弱小夥伴的戰時經濟。德國給予其他盟邦的軍事援助只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與美國的龐大軍援相比，而且德國的軍援還不是無償給予。一九四三年，德國出口五百九十七架飛機給義大利、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與斯洛伐克，用來換取德國急需的石油、糧食與礦產，而這些飛機絕大多數還不是作戰用的飛機；反觀美國則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分配了四萬三千架飛機與四萬八千具航空發動機給其他盟邦。<sup>64</sup>另一方面，即使在後勤上做得到，義大利與日本也不太可能向德國提供軍事援助，且由於地理隔絕與英美控制海上通道，歐洲的軸心國也難以援助日本。一九四三年，七架德國飛機與一具BMW航空發動機成功運抵日本，已屬少見的成就。另一個例子發生在德國於一九四〇年占領法國與荷蘭之後。當時日本確認德國沒有進一步占領法國與荷蘭在東南亞殖民地的企圖，於是同意從自己占領的南洋地區運送原料給德國。日本的封鎖突破船（或稱柳船）最終順利將十一萬兩千噸的物資（主要是橡膠與錫）運往德國。盟軍在一九四三年開始控制海洋後，日本便無法再繼續運送物資給德國。日軍在同年試圖突破盟軍封鎖，送出一萬七千四百八十三噸的補給物資，結果只有六千兩百噸成功運抵德國，這個數量只是同盟國運送物資噸數的零頭。日本於是改用更大型的貨運潛艦將原物料運往德國，但絕大多數都在運送途中遭到擊沉。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總計送出兩千六百零六噸物資前往歐洲，只有六百一十一噸平安抵達。<sup>65</sup>德國提供義大利的物資主要是煤鐵，但柏林當局認為，義大利應該衡量自己的資源來制定相應的戰略，不應該處處仰賴德國支援。實際上，義大利只取得了一小部分要求的煤鐵。德國公司擔心透過出售或以物易物的方式將軍事裝備交給義

大利，會讓義大利公司仿製武器，並且在戰後與德國競爭市場。義大利官員收到德國當局的通知，表示義大利武器工廠需要的機器將排在清單最後，德國只會將設備優先提供給根據德國軍方命令進行生產的歐洲公司。當義大利空軍於一九四二年要求德國提供先進雷達設備時，主要供應商德律風根堅持必須由德國派人到義大利進行操作以避免商業剽竊。<sup>66</sup>在軸心國三個成員國之間，幾乎不存在直接的技術或科學援助。一九四二年，德國工程師同意運送一臺符茲堡雷達給日本，但負責運送設備的兩艘潛艦，有一艘在途中遭到擊沉。

軸心國必須從各自征服的地區擷取物資來支應國內的武器生產，也只能仰賴擄獲敵軍武器才能額外增添軍事裝備，然而這類收穫往往是偶然且不可預期的，並非長久之計。法國戰敗之後，德國擄獲法國與英國的二十萬輛車輛，這是德國武裝部隊收繳敵方武器收穫最大的一次，此外還徵用了大量法國飛機。在占領法國期間，德國持續利用法國的飛機與汽車產業。法國飛機廠商在一九四二年生產了一千三百架飛機，一九四三年則是兩千六百架，不過這些飛機絕大多數是教練機與輔助機。這些飛機在戰爭期間只占德國生產飛機總數的一小部分，而且德國還必須付費購買。<sup>67</sup>德軍確實會使用俘獲的法國戰甲車輛，但數量同樣不多。德國陸軍的一份報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表示，在各個前線上，德國使用的現役法國戰車總共六百七十輛。雖然德國陸軍總部想盡可能重新利用擄獲的蘇聯戰車，但絕大多數都已不堪使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另一份報告估計，德國陸軍或安全部隊在東線戰場俘獲了約三百輛蘇聯T—34戰車，但只有六十三輛可以用來作戰。在經歷作戰的嚴重損失後，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俘獲的戰車只剩三百一十輛能繼續作戰。反觀美國到了這個時期，已經提供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三輛戰車給盟軍使用。<sup>68</sup>

對美國來說，無償援助與軸心國交戰的國家是一項困難的決定。不

僅是因為美國在一九四〇年開始重整軍備時軍方希望優先取得軍事資源，也因為美國當時並未參戰，軍援很可能在國內引發法律與憲政爭議。無償援助的決定，起因於一九四一年初：當時英國顯然已經無法以美元支付所有軍事訂單。羅斯福於一九三九年成功修訂美國的《中立法案》後，有兩年的時間，英國簽訂的軍事裝備契約（主要是飛機與航空發動機）都是採取「現購自運」的模式。到了一九四〇年，英國在美國工廠仍有兩萬三千架飛機的訂單，但此時的英國已經耗盡了美元與黃金儲備，無法支付訂單需要的款項。如果美國堅持不提供飛機，英國將無法繼續作戰。一九四〇年夏天，美國已經出售大量步槍、機槍、火炮與彈藥，以彌補英國遠征軍在法國的龐大損失。一九四〇年九月，羅斯福批准釋出五十艘已經生鏽的一戰驅逐艦，協助護航英國船團，但前提是英國政府必須同意讓美軍使用從紐芬蘭到百慕達的英國軍事基地。這項交易遭到美國國內反對干預歐洲戰事的遊說團體大力阻撓，羅斯福因此向國會提出保證，這些軍事基地是美國用來維護西半球安全的前哨站，而非美國介入歐洲戰事的跳板。雖然羅斯福對於英國的困境深表同情，但他瞭解美國輿論絕大多數不僅反對干預，甚至帶有仇英傾向。就連羅斯福身邊的軍事顧問也不希望美國提供協助保衛大英帝國。他們最重視的是美國未來的安全，因此美國援助英國只能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在高階軍事將領中，主張干預最力的莫過於史塔克海軍上將（Harold Stark），他認為援助英國可以「確保西半球的現狀，促進我們的國家利益」。<sup>69</sup>一九四一年一月，當援英法案送進國會審議時，法案取了一個奇怪的名稱，叫做《提升美國國防與其他目的法案》，而且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弗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煽動下，該法案被給予了一個充滿愛國主義（與反英）的案號，H. R. 1776。<sup>70</sup>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第三任總統任期之後，



便前往加勒比海度假。十二月九日，當羅斯福在塔斯卡盧薩號巡洋艦（*Tuscaloosa*）上時，收到由水上飛機送來的信，這封信是邱吉爾寫的，而信的內容催生了《租借法案》。邱吉爾在信中坦承，英國終於到了無法用現金向美國購買補給與船運的時候，而沒有美國的協助，「我們將無法繼續戰鬥下去。」<sup>71</sup>早在十一月底，英國駐華府大使洛錫安勳爵在抵達紐約拉瓜地亞機場（La Guardia）時，就已經毫不掩飾地說出英國面臨的危機。他向在機場等候的記者表示：「各位好，英國破產了，我們需要你們出錢幫忙。」十二月初，羅斯福的內閣針對是否援助英國以確保美國的安全進行討論，儘管對於英國是否如其政府所宣稱的已經耗盡資產存有疑慮，美國還是決定出手援助。<sup>72</sup>問題在於要如何資助英國訂單卻又不違反《中立法案》與一九三四年的《強森法案》

（Johnson Act），後者禁止美國貸款給曾在一戰向美國借款卻拒絕償還的國家，其中也包括英國在內。羅斯福在塔斯卡盧薩號甲板上反覆閱讀邱吉爾的信，最後，羅斯福終於在十二月十一日向同在船上的親信霍普金斯表示，把貨物租借給英國應該是個好主意。「省去那些愚蠢荒謬的舊美元符號」，幾天後，羅斯福便如此在記者會上宣布。<sup>73</sup>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羅斯福希望藉著支持英國繼續對德作戰，使美國避免戰爭。至少他相信藉由「租借」（打從一開始就是使用這個詞）可以避免英國崩潰，或至少阻止英國與軸心國談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爐邊談話》，羅斯福提出了「民主兵工廠」一詞，藉此向美國人保證，美國將「免於戰爭的痛苦與災難」。<sup>74</sup>羅斯福下令將自己的決定草擬成法案，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送到國會。

邱吉爾對於結果感到欣慰，他對祕書說，美國「這麼做等同於宣戰」。<sup>75</sup>然而，絕大多數美國人其實並不希望美國參戰。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租借法案》終於在眾議院通過的那個星期，民調顯示百分之八

十三的受訪者反對美國參戰。法案使美國輿論陷入嚴重分裂：反對干預的民眾與邱吉爾的看法相同，認為《租借法案》只是名義上沒有參戰，但實際上美國已經參與戰爭。就連多年來持續遊說要求援助民主國家的團體也擔心《租借法案》過於躁進。艾倫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辭去援助盟軍保衛美國委員會主席職務以示抗議，他甚至喊出「美國佬不會來」這句口號。孤立主義運動的一個分支借用這個口號做為小冊子名稱，一口氣賣出了三十萬冊。身穿黑衣的婦女，手持「殺死一七七六法案，不要殺死我們的兒子」的標語，在國會臺階上抗議。<sup>76</sup>法案也引發民眾對於該法賦予總統大權的疑慮，因此出現了大規模抗爭。孤立主義者將這則法案戲稱為「獨裁者法案」，因為羅斯福將可不經過國會同意，自行決定租借哪些物品、租借多少數量給哪些國家。<sup>77</sup>如此龐大的行政裁量權是史無前例的，但由於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同意這項法案，羅斯福因此成功排除了反對壓力。在推動這項法案的過程中，羅斯福做出了兩項重大讓步：首先，美國會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物資，但美國不會對物資的運送進行護航。其次，《租借法案》的有效時間只有兩年。羅斯福也同意，在《租借法案》施行期間，他將在每個季度向國會提出報告，而國會將根據一系列的《國防援助補充法案》（Defense Aid Supplemental Acts），有權針對必要的基金進行表決。<sup>78</sup>

最後還有如何償還的問題，對此羅斯福語帶含糊地表示，等戰爭結束後，受惠國可以用支付「實物」的方式進行償還。當然，英國方面也必須做出重大讓步。羅斯福下令，英國想獲得租借，必須先交出一部分美元資產，同時出售剩餘的美元資產。美國國務卿赫爾也迫使倫敦當局在不情願下做出承諾：英國在戰後必須放棄帝國特惠制，重新建立一套更開放的貿易體系。這項讓步充分顯示英美兩國權力關係的倒轉與美國企圖徹底剷除大英帝國在戰前建立的經貿帝國。英國經過一番掙扎之後

才同意美國的要求。針對《租借主協議》（Master Lend-Lease Agreement）進行的協商耗時七個月，主要是因為英國官員與政治人物堅決反對第七條，該條要求英國必須在戰後進行自由貿易。然而，在羅斯福威脅若不接受條件則英國將得不到任何協助之下，兩國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簽署協定。<sup>79</sup>邱吉爾在公開場合盛讚《租借法案》是「最高貴的行動」，私底下卻擔心英國不只會被剝一層皮，甚至可能「被啃得只剩下骨頭」。英國也懷疑羅斯福是否真會履行承諾。一名英國官員在華府進行遊說卻毫無成果，他抱怨說，美國的承諾「實際上不斷縮水」。<sup>80</sup>同樣的質疑也來自中國，因為中日戰爭的持續成為羅斯福用來向國會延長對中租借的理由。羅斯福一開始就承諾透過蔣介石的妻舅宋子文，在華府成立的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進行對華援助。但由於西方國家是美國首要的援助目標，對華援助物資因此嚴重不足。美國實際給予的援助與承諾差距太大，導致蔣介石於一九四三年提出威脅，如果租借物資無法達到他的要求，他將與日本談和。<sup>81</sup>

事實上，《租借法案》實施的進度十分緩慢。法案通過後，最初由美國國會撥款的七十億美元，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卻只用了十億美元。一九四一年，絕大多數從美國運往英國的補給物資仍須以現金支付；同年，美國提供英國的兩千四百架飛機只有一百架屬於租借。美軍在這個時期正大規模重整軍備，航空訓練學校欠缺教練機，陸軍演習也急需假戰車，在這種狀況下，軍方顯然不希望政府將軍事裝備運往英國。租借計畫起初是由霍普金斯主持的臨時委員會負責推動，剛取得新行政權力的羅斯福則在後頭鼎力支持，但《租借法案》建立的體制在批准與採購補給物資上卻缺乏周詳計畫。在運送英國需要的物資時，羅斯福顯得愛莫能助，而輿論也對此漠不關心，因為進行護航必須冒著與德國潛艦發生衝突的風險。當美國派出海軍艦艇進入大西洋為英國運送租借物資的

船團進行護航時，羅斯福在公開場合依然堅稱美軍進行的是「巡邏」而非護航任務；他還要求政府對外提到租借物資時，必須說物資「將運抵當地」，而非「我們將運送物資」，藉此排除美軍進行護航任務的疑慮。<sup>82</sup>一九四一年，美國提供給英國的商船僅限於徵用停泊在美國港口的軸心國船隻以及準備航往英國的中立國船隻。<sup>83</sup>雖然有人認為羅斯福把《租借法案》當成美國干預歐戰的踏腳石，但沒有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羅斯福經常公開表示，《租借法案》是透過協助他國作戰來捍衛美國利益的一項戰略，他提出的這項說法不應該遭到忽視，因為羅斯福不僅在公開場合如此主張，就連私底下也如此認為。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寫給國會議員的信上，羅斯福引用了一篇討論美國戰略的報紙社論：「我們關心的不是大英帝國，而是我們自身的安全、我們的貿易保障與我們的大陸完整不受侵犯。」羅斯福補充說：「我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sup>84</sup>美國輿論依然堅定支持援助英國，但也堅決反對美國參與戰爭。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軸心國軍隊進攻蘇聯，援助與軸心國交戰的國家的原則因此遭受考驗。是否援助蘇聯成了一項更加困難的決定，因為「民主兵工廠」的原意顯然並不包括支援極權主義國家，美國民眾也普遍敵視蘇聯與國內的共產主義。七月，國務院官員隆恩（Samuel Breckinridge Long）在日記裡提到，「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必須壓制共產主義這個法律與秩序的敵人。我們如果與共產黨站在一起，哪怕只是稍微靠近一點，國人都將無法忍受。」<sup>85</sup>就連願意援助英國的干預主義組織也反對援助蘇聯，支持干預的「為自由而戰」運動公開表示，美國對外援助是為了「擴展民主，而不是限制民主」。<sup>86</sup>英國的反應顯然對羅斯福的決定產生很大的影響。邱吉爾於六月二十二日保證將無條件援助蘇聯，一個星期之後，蘇聯駐倫敦官員提出一份蘇聯需要的



龐大援助清單。起初英國援助的物資依然要求蘇聯出錢購買，但到了九月四日，英國政府同意採取某種形式的租借，但名稱上不使用「租借」二字，藉此來掩飾英國對蘇援助，而英國給予蘇聯的物資有許多實際上是美國租借給英國的。

德國入侵蘇聯後過了幾天，羅斯福在記者會上宣布，美國也「將盡力援助俄羅斯」，他下令將價值四千萬美元的蘇聯資產解除凍結，並且用這筆資產來支付美國的援助物資。六月二十六日，蘇聯大使烏曼斯基（Konstantin Oumansky）正式提出援助要求，幾天後，莫斯科擬了一份龐大的採購清單，不僅要求飛機、戰車與彈藥，還希望美國提供用來生產輕合金、輪胎與航空燃油的整套工廠設施。<sup>87</sup>這些要求超過了美國在一九四一年的援助能力，當時美國也不確定蘇聯能否在德國攻擊下倖存。倫敦與華府的主流觀點都認為德國幾個月內就能獲勝，而這表示一旦西方援助蘇聯，所有援助物資都將落入德國之手。七月底，霍普金斯訪問莫斯科後返國，信心滿滿地表示蘇聯不會崩潰，羅斯福這才在八月二日同意給予蘇聯「一切可行的經濟援助」。與英國的例子一樣，美國的援助並非無償給予，援助進度也十分緩慢。倫敦當局擔心美國援助蘇聯將排擠對英國的援助，軍需大臣比弗布魯克勳爵因此希望由英國來決定蘇聯能獲取的援助額度。他向美國要求由英國從援英物資中分配一部分給蘇聯，但遭到美國拒絕。<sup>88</sup>十月，英美代表在莫斯科開會，之後兩國簽署了《第一議定書》（前後總共有四個議定書），決定堅定援助蘇聯。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兩國總共提供了一百五十萬噸的物資與裝備給蘇聯。隨著美國輿論轉而支持援助蘇聯，羅斯福向國會提案並獲得通過，把援助蘇聯也視為《租借法案》的一部分，認定援蘇「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於是從十一月七日起，蘇聯也可獲得美國的無償援助，自此美國成為所有國家的兵工廠。

《租借法案》通過時，沒有人會想到往後租借的規模與性質會變得如此龐大。戰爭結束時，租借物資已經超過五百億美元，全世界有四十餘國受惠。美國對外援助達到聯邦戰時支出的百分之十六；至於英國租借給蘇聯的物資超過也二億六千九百萬英鎊，約占英國戰時支出的百分之九。<sup>89</sup>租借計畫成為英美兩國的連結點，雙方設立了聯合委員會共同監督戰時生產與原物料供應。英國派駐華府的軍事使節團與美國軍事高層商討援助的優先順序。每年援助蘇聯的物資由英美各自與莫斯科官員進行協商。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羅斯福解散霍普金斯的臨時委員會，另外成立了租借管理局，由商人史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擔任局長。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美國對外援助達到高峰，此時共有十一個機構負責物資的生產、配置與分配，機構與機構之間疊床架屋，也因此時常產生嚴重的爭論。儘管如此，當《租借法案》在一九四三年三月進行展延時，國會並未像兩年前那樣出現激烈爭辯，反而近乎無異議通過。<sup>90</sup>美援的主要受惠者是大英帝國，一共獲得三百億美元的援助，占了美國對外援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絕大多數運往英國本土，只有一小部分分配給其他自治領。美國對蘇援助達到一百零六億美元，占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三。自由法國部隊獲得百分之八，中國由於日本占領緬甸而難以獲得直接支援，僅獲得百分之三。拉丁美洲國家獲得百分之一。<sup>91</sup>

租借計畫原本的想法是讓受惠國以實物形式，償還美國慷慨提供的物品與服務，然而邱吉爾卻向羅斯福坦言，「我們無法償還租借債務。」<sup>92</sup>但等到美國參戰之後，互惠式的實物償還開始變得可能。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英美正式簽訂《相互支援協定》（Agreement on Mutual Aid）。從一九四二年開始，英國除了負擔駐紮在英國的美國陸軍與空軍所需的各項資源與服務，也向北非戰場提供石油等服務，必要

時還提供船運。太平洋戰爭期間，澳洲政府也為駐紮當地的美軍提供各項設施與服務。英國在二戰期間提供的支援額度總計達到五十六億美元，澳洲也有十億美元，總計大英帝國提供的支援達到七十五億美元，約占美國總支出的百分之十五。<sup>93</sup>若根據《援助議定書》的約定，蘇聯也曾做出類似保證，但蘇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卻只提供兩百二十萬美元做為相互援助，幾乎可以說完全沒幫上忙。根據羅斯福最初的計畫，所有租借協議規定戰後各國必須盡可能將物資返還給美國。雖然美國是以租借而非贈與的名義提供物資給各國，但在實務上，所有的武器、原物料與糧食早就被戰爭與饑民難以饜足的需求消耗殆盡，根本沒剩下多少物資可供返還。美國戰爭部估計，返還的補給物資總計達到十一億美元，主要是美軍使用的物資。返還租借物資最多的國家是中國，這是因為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囤積在印度的物資始終難以運送到中國。

過去在談到《租借法案》時，我們經常忽略加拿大對全球援助的貢獻。事實上，當大英帝國為鏖戰中的英國本土提供經濟援助時，加拿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加拿大與英國協商的援助計畫並未包括在《租借法案》的正式內容之中。與美國一樣，加拿大的援助也是在英國無力以加幣購買糧食與軍火的狀況下產生的——加拿大不希望英國因為缺乏現金而接受美國的租借計畫，如此加拿大將會失去英國的訂單。加拿大高層不想仿效《租借法案》，因為加拿大再怎麼做都不可能提供美國那樣龐大的援助計畫，但加拿大仍想成為民主兵工廠的一員。由於講法語的魁北克省反對援助英國，因此援英案在加拿大內閣引發激烈辯論，但加拿大政府最後還是提出「十億元贈與」，用來涵蓋從一九四二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的英國訂單，同時預計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再重新評估是否繼續援助英國。邱吉爾訪問渥太華時得知贈與的事，他對於

加拿大的慷慨感到震驚。邱吉爾還一度以為自己聽錯，要求複述一次數字。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向加拿大國會表示：「英國為捍衛自由貢獻良多，理應獲得這些報償。」但當加拿大政府向民眾宣布要援助英國對抗軸心國時，蓋洛普民調卻顯示，支持的民眾僅略高於反對者。結果到了一九四三年初，加拿大並未展延援助計畫，而是另外實施了相互支援計畫，該計畫就像《租借法案》一樣，加拿大將提供自身的資源來支援聯合國（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同盟國改稱為聯合國）而非只是支援英國，而這項做法也有助於維繫加拿大的自我認同。<sup>94</sup>

《租借法案》與其他相互支援計畫提供的物資種類相當多，但最核心的還是軍事裝備與彈藥。一九四三年，英國取得的租借物資中，軍事物資占了七成，創下新高；蘇聯取得的租借物資絕大多數是工業製品與糧食，雖然軍事物資數量持續增加，但軍事物資占租借物資比例仍從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三降到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一。美國提供給同盟國的軍事物資總量可以參見表6.2。非軍事物資與服務包括了石油、金屬與大量糧食。由於船運的需求十分緊迫，因此在運送糧食時必須避免占用寶貴的貨運空間。為了節省空間，人們發明了一種名叫Spam的重要食品，也就是壓縮的豬肉罐頭，蘇聯士兵戲稱為「第二戰場」。蘇聯總理赫魯雪夫在回憶錄裡提到，「沒有這些罐頭，我們的軍隊將很難吃飽。」到了戰爭結束時，總計已有將近八十萬噸的肉罐頭運到蘇聯。<sup>95</sup>新鮮食物脫水之後依然占了貨運空間的一半以上，但與牛肉相比可以節省九成空間，與蛋奶相比則節省了八成五的空間。脫水食品配水後享用雖然不怎麼可口，但這些乾燥食品卻成為英國飲食的重要補充。英國提供駐歐美軍新鮮食物，以及大量的咖啡、糖、可可與果醬，而同一時期的英國消費者僅能取得這些食物的少量配給。對於駐紮在偏遠地區的美軍士兵，政府徵用巴士做為「俱樂部車輛」，載著演藝人員



與食物（包括英國麵包店禁售的甜甜圈）開往前線，慰勞這些前線將士。<sup>96</sup>

表6.2 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軍事裝備，1941-1945年<sup>97</sup>

裝備類型	大英帝國	蘇聯	中國	其他	總計
戰車	27,751	7,172	100	2,300	37,323
裝甲車	4,361	0	0	973	5,334
裝甲運兵車	27,512	920	0	1,580	30,012
偵察車	8,065	3,340	139	499	12,043
輕型卡車	119,532	77,972	11,982	30,529	240,015
中型卡車	97,112	151,053	2,616	9,167	259,948
重型卡車	64,646	203,634	10,393	13,768	292,441
拖車	20,282	888	5,842	17,745	44,757
防空砲	4,633	5,762	208	888	11,491
機槍	157,598	8,504	34,471	17,176	217,749
衝鋒槍	651,086	137,729	63,251	28,129	880,195
步槍	1,456,134	-	305,841	126,374	1,888,350
無線電設備	117,939	32,169	5,974	7,369	163,451
野戰電話	95,508	343,416	24,757	14,739	478,420
飛機	25,870	11,450	1,378	4,323	43,021

航空發動機	39,974	4,980	551	2,883	48,388
-------	--------	-------	-----	-------	--------

英美之間除了相互提供物資與服務，也共享技術與科學創新。與《租借法案》一樣，這些創新的分享也是基於戰略需要。一旦美國參戰，為了共同對抗軸心國，兩國之間似乎就沒有不分享資訊的理由。只有在碰到一些特定例子時，例如原子彈的研發，兩國的關係才會陷入緊張。戰爭期間，西方領導人普遍認為德國的科學與工程技術遠比同盟國來得先進，而且更能與軍事體制結合，同時也能產生出乎預期與危險的科學創新。雖然今日我們已經知道西方過度誇大了德國科學軍事體制的能力，但當時西方的憂慮卻有助於促成大西洋兩岸達到史無前例的合作。更值得一提的是，英美的合作與《租借法案》一樣，都是在美國參戰前就已經開始。一九四〇年八月，英國政府派蒂澤德爵士率領英國科技代表團前往華府，向美國軍方與民間科學家提供祕密的科技資訊。代表團提供的祕密中，最重要的是伯明罕大學研發的多腔磁控管，有了多腔磁控管，就能發展出更有效的微波雷達。剛成為國防研究委員會主席的布希（Vannevar Bush），有了為美軍研發新科技的機會。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成立的輻射實驗室成為美國研究雷達最頂尖的機構。蒂澤德代表團訪美之後，英美科學家開始在核子武器以外的各項軍事研究領域密切合作，直到戰爭結束為止。<sup>98</sup>

原子或核子研究計畫所代表的尖端科技，無論從民間還是軍事層面來說都極為重要，即使是潛在的盟邦也不能輕易分享。一九四〇年四月，英國為了探索研製原子彈的可能性，決定成立莫德委員會（Maud Committee）進行研究。一九四一年七月，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研製原子彈具有可行性。儘管如此，蒂澤德與他認識的美國科學家都認為，原子彈不可能在短期內研製成功。一九四一年十月，羅斯福向邱吉爾提

議，由英美兩國合作進行核子研究，但英方擔心一旦與美方合作，自身的研究成果很可能被美方取得。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美國的核子研究超前了英國，英國科學家轉而對合作抱持積極態度。這一回輪到美方擔心自身的成果被英方取得用來進行戰後的商業用途。英國與加拿大科學家於是成立蒙特婁實驗室持續進行核子研究，他們使用美國提供的資料，但無法取得美國的技術細節。一九四三年八月，邱吉爾在魁北克召開的同盟國會議中承諾，英國絕不會利用美國的研究來達成自己的目的，美國這才允許一些英國科學家參與美國計畫，即便如此，這些英國科學家依然無法目睹完整的原子彈研發過程。在美國，人們擔心合作可能會讓其他國家也取得核子武器，如此將影響美國在戰後建立新秩序。史達林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也就是原子彈使用前不久，才得知美國已經製造了原子彈。但其實蘇聯也早在物理學家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主持下，從一九四二年就開始研發原子彈。蘇聯透過在美國布置的間諜網取得資訊，諷刺的是，其中一名間諜富赫斯（Klaus Fuchs）是英國根據《魁北克協定》派往美國的英國科學家，而他成為蘇聯取得原子彈資訊的關鍵來源。<sup>99</sup>

即使科技資訊的租借難以做到完全直接的交換，但這方面的困難度依然遠遠比不上後勤問題及物資援助計畫帶來盟國之間的摩擦。要建立一套全球的物資分配體系必須克服許多困難。《租借法案》施行後的前兩年，通往英國的大西洋航線依舊宛如戰場。商船運輸受到限制，而且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美國國會同意再次修改《中立法案》之前，美國船隻都不被許用於運送戰爭物資。但無論是德國潛艦的襲擊，還是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軍方的需求，都無法真正阻攔租借物資的流通。儘管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互爭物資的優先性，確實會影響到運抵英國港口的物資數量。英國商船船團在一九四一年的規模是美國商船船團的三倍，但其

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需要修繕的船隻噸數居高不下：從一九四一年開始，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德國潛艦的威脅降低為止，英國商船船團每個月平均需要修繕的船隻噸數達到三百一十萬噸。<sup>100</sup>根據《租借法案》，美國會提供船塢為英國商船進行修繕，但修繕的時程始終趕不上需要的貨運空間。直到一九四三年，美國建造的商船額外提供了一千兩百三十萬噸的驚人運量之後，羅斯福才得以承諾提供足夠的美國船隻為英國運送需要的軍事物資與糧食。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貨運空間已經完全可以裝得下需要運送的貨物且綽綽有餘。<sup>101</sup>

相較於英國，將物資運往蘇聯顯然更為困難。要前往蘇聯的英國與美國商船，只能選擇大西洋以外的航線：北極海航線、「波斯走廊」與阿拉斯加—西伯利亞通道，這三條主要路線構成巨大的後勤挑戰。最危險的航線是穿越北極海前往蘇聯北部港口莫曼斯克與阿爾漢格爾斯克。船隻不僅要面對惡劣的天氣與海象，船上嚴重結冰也可能讓船傾覆，也必須留意偶爾出現的流冰與冰山，還有從挪威派出的德國潛艦、飛機與水面艦艇的威脅。但在如此艱困的條件下，船隻的損失反而低於預期。從蘇格蘭與冰島港口航經北極海的四十二支船團共計八百四十八趟航次，總計僅有六十五艘船因為意外、潛艦與飛機攻擊而沉沒，回程又另外沉沒了四十艘。<sup>102</sup>損失最慘重的一次發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PQ—17船團的三十六艘運輸船為了躲避德國軍艦的攻擊而分散開來，最終導致二十四艘船沉沒。這場災難使北極海的海上運輸延宕了幾個月，蘇聯在整個一九四二年夏天都得不到補給，令蘇聯領導人大為光火。一九四三年起，盟軍加強護航，船團的損失開始減少，此後船團持續往返，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最後一支船團從蘇格蘭克萊德河（Clyde）出發為止。大約有四百萬噸補給物資經由北極海航線運往蘇聯，約占援助蘇聯物資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sup>103</sup>



還有一些援蘇航線比較少受到敵軍威脅或干預。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對安全的北太平洋航線，不過這條航線在冬季會遭到冰封，無法破冰的船隻就會擱淺在冰上。補給船團從日本北海道北方海域通過，無論是蘇聯船還是美國船，只要懸掛蘇聯旗幟，那麼根據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就不會出面干預，儘管這些船團運送的物資是用來協助蘇聯對抗日本的盟邦德國。大約有八百萬噸的補給物資，也就是援蘇物資的百分之四十七，是沿著這條航線運到蘇聯。起初是運到蘇聯港口馬加丹，之後新港口設施完成，便改成運到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Petrovsk）。物資運到之後先存放在港口，再用鐵路長途運送，越過西伯利亞，運到烏拉山地區的工業城市，或者是運到更遠的前線。從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亞的港口與鐵路設施，其建造與營運成本其實遠遠超過運送貨物的價值。<sup>104</sup>

還有將近四分之一的軍事補給，是經由已經開通的第三條路線穿過波斯（今日伊朗）運抵蘇聯。這條路線從一九四二年初開始運行。這也是一條危險的路線，因為伊朗境內道路狀況不佳，而且通往蘇聯南方亞塞拜然的鐵路也只有一條。一九四二年夏秋，德軍入侵高加索地區並且進攻窩瓦河流域的史達林格勒，這條援蘇路線一度受到威脅。英國波斯與伊拉克司令部負責建立這條援蘇路線，包括擴建伊朗與伊拉克的港口設施、鋪設鐵路與修建能讓重型卡車行駛的道路。援蘇路線必須穿過沙漠、鹽鹼地（上面有一層厚厚的黃色軟泥，又稱為kavir）與山區隘口，這些山路必須在山區來回繞行數百圈。該路線還必須通過地表最炎熱的地帶，氣溫往往達到攝氏四十九度，但到了冬天，一旦行經被冰雪封住的隘口，氣溫又會降到零下四十度。冬天時，卡車司機可能會被凍死在車內，夏天時又有可能因為中暑而喪命。<sup>105</sup>負責保衛鐵路不受盜賊侵擾的任務，落在印度軍隊的肩上。但該鐵路沿線有兩百二十座隧道，當

士兵在這些毫無照明的隧道中巡邏時，很可能會因為視線不佳而意外身亡，在隧道中緩慢行駛的蒸汽火車頭所噴出的炙熱濃煙也會造成人員窒息而亡。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蘇聯的軍隊、工程師與工人奇蹟般地獲得了補給。一九四一年，這條鐵路每日運送兩百噸物資，一九四二年，美國波斯灣司令部接管這條鐵路，每日平均運輸量提升到三千三百九十七噸。隨著戰爭接近尾聲，波斯走廊逐漸被另一條更為便捷的路線取代，也就是以海路經由黑海將物資運送到俄羅斯南部港口。<sup>106</sup>

為了取得英美物資，蘇聯運輸當局組織了「特別任務小組」，負責將存放在伊朗南部港口的英美援助物資，經由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建成的新公路運送到蘇聯境內。整條路線的距離超過兩千公里，運送車隊必須克服車禍、竊盜、沙塵暴與大風雪的重重阻撓才能成功抵達目的地。英軍與美軍在伊朗與伊拉克南部設立六座裝配廠，他們先將解體的車輛送上貨輪，經過長途的航行，繞過好望角，最後抵達伊朗與伊拉克，這些車輛會在當地重新組裝——戰時總共組裝了超過十八萬四千輛車。一九四三年八月，蘇聯成立「第一特別摩托車輛特遣隊」，將物資的運送天數從一個月以上縮短為平均十二到十四天。在這條塵土飛揚的道路上，途中甚至要越過兩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蘇軍每隔一段距離就會設立飲食與修繕車輛的站點，藉此加快運送速度。等到物資運抵蘇聯境內之後，還有第二段漫長而艱困的旅程，才能將物資交到前線部隊手裡。前述三條援蘇路線總共運送了一千六百萬噸的補給物資，其中為了從北大西洋與環太平洋西側的港口運送物資，貨輪總共來回了兩千六百趟航次。<sup>107</sup>

把租借物資運到中國同樣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中國屬於最早符合租借條件的幾個國家，但中國的優先順序卻排在英國與蘇聯之後。許多應該運往中國的物資都閒置著，一開始先堆放在仰光的碼頭與鐵路沿

線，之後由於日本入侵緬甸，這些物資於是轉移到印度東北海岸港口，等待有限的運輸網路慢慢進行運送。珍珠港事件之前，援助物資還能經由太平洋運往中國，珍珠港事件之後，只能轉而繞經大西洋與印度洋。物資運抵當地之後，還必須克服重重地理障礙才能將物資送到中國軍隊手裡。中國當地有著全世界最險惡的地形，缺乏適當的道路，也沒有有效的鐵路設施。一九四一年，為了興建從緬甸北部臘戍通往中國雲南省昆明的鐵路，必須動用大約十萬名中國與緬甸工人，這些工人在可怕的环境下工作，成千上萬人染上瘧疾與傷寒，更有約半數工人必須靠著吸食鴉片才能讓自己支撐下去。<sup>108</sup>當滇緬公路遭日軍截斷時，唯一能夠援助中國的方式就是利用飛機從印度基地起飛，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將補給物資運到昆明。這條路線俗稱「駝峰航線」，飛行的風險極大，因為飛越喜馬拉雅山脈時，飛行的高度必須達到六千公尺以上，此時氣溫降至冰點，猛烈的雷雨與強風將嚴重消耗燃油，導致飛機往往必須緊急降落，但在中國境內又僅有兩處鋪滿碎石粒的簡易跑道。在「駝峰航線」的空運期間，盟軍至少損失了七百架飛機與一千兩百名機組人員。一九四三年之前，設施、飛機與人員的缺乏導致補給物資難以運抵中國；一九四三年之後，空運量雖然擴增，但重型設備、車輛或機械依舊無法靠飛機運輸。到了一九四四年，海運的補給物資依然有半數等著運往中國。<sup>109</sup>能夠成功運抵中國的物資，絕大多數都分配給了駐華美軍，主要是陳納德的美國第十四航空軍。中國官員估計，美國人用掉了百分之九十八的補給物資，但即使是這樣超乎正常比例的數字，蔣介石的美籍參謀長史迪威將軍仍處心積慮控制租借物資的流量以符合美軍需求。<sup>110</sup>

各國無不對後勤投入了大量心力，除了因為經濟援助是盟軍戰略的重要環節，也因為各國領袖直接參與協商，並且密切注意執行成效。然

而，儘管後勤的努力有了明顯成果，盟國之間對於供應步調與援助性質依然爭論不休。英國取得大量美國戰車，但也因此產生許多怨言。英方根據實戰經驗後指出，美國的M3戰車與之後的M4雪曼戰車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一九四四年，戰車供應出現三千四百輛以上的巨大缺口，該年底，由於美軍裝甲部隊出乎意料地發生嚴重損失，原本對外租借的戰車因此全部取消。<sup>111</sup>盟軍爭論更嚴重的是飛機供應問題。一九四〇年夏天，轟炸德國成為優先的戰略目標，英國皇家空軍希望美國飛機產業在一九四三年時能每月提供五百架重型轟炸機，然而美國當時的飛機必須優先提供給美國空軍。當首批B—17與B—24轟炸機抵達英國時，英國皇家空軍對於這兩型飛機的戰鬥力大感失望，打算只讓它們擔任輔助任務。然而，對於正在擴充的美國轟炸機部隊來說，這兩型轟炸機可說是他們的得意之作，英方的批評因此引發強烈不滿。美國陸軍航空軍總司令阿諾德（Henry Arnold）拒絕承諾在一九四二年給予英國四百到五百架以上的轟炸機，最後甚至連一架都不願意給。根據英國空軍大臣辛克萊（Archibald Sinclair）的說法，美國在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提供的戰鬥機與輕型轟炸機都已經過時，「幾乎毫無價值。」<sup>112</sup>雖然美國最終提供了英國及其殖民帝國將近兩萬六千架飛機，但其中只有一百六十二架B—17，三千六百九十七架是輕型轟炸機，八千八百二十六架是教練機與運輸機。<sup>113</sup>

援助蘇聯的物資也引來蘇聯一連串抱怨。英國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首次做出的承諾一直未能兌現，往後幾個月，雖然許多裝備陸續運抵蘇聯，卻被蘇聯當局認定不符合標準。颶風戰鬥機被批評為裝甲太薄、武器太弱；英國戰車，特別是瑪蒂達戰車，被認為不適合在俄國作戰，不僅裝甲不足，在零度氣溫下也無法動彈。當時英國戰車的妥善率平均只有五成。但當美國送來雪曼戰車時，蘇聯工程師又認為這種戰車的裝



甲防護不足，車身太高容易遭受攻擊。蘇聯裝甲部隊刻薄地戲稱雪曼戰車是「七兄弟的墳墓」，因為這種戰車在敵人的反戰車武器面前顯得不堪一擊。<sup>114</sup>顯而易見的是，除非必要，否則英美絕不會送出最好的武器裝備。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英國已經汰除裝甲部隊中的瑪蒂達戰車，但英國與加拿大仍持續生產該型戰車送交蘇聯部隊；而當蘇聯要求援助B—17與B—24重型轟炸機時，卻遭到美國拒絕。<sup>115</sup>

蘇聯堅持不讓西方人員協助訓練蘇聯軍隊與負責武器修繕工作，也不聽從西方使用援助的建議，導致租借的裝備無法發揮效果。到了一九四三年，蘇聯已經累積了大量西方物資，但在蘇聯不願合作下，西方既無從得知實際狀況，也無法對援助做出限制。蘇聯的守口如瓶難以平息盟國對其戰事失利的指責，蘇聯也不願透露蘇聯在戰車與飛機方面進行的研發（儘管有過事先承諾），僅在一九四二年送了一輛T—34戰車到美國。美國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團長迪恩（John Deane）向馬歇爾將軍報告時抱怨說：「我們盡全力滿足他們的需求，但他們只願做最低限度的努力來維持雙方的關係。」<sup>116</sup>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蘇聯要求的租借物資達到巔峰，其中包括協助蘇聯進行戰後重建，華府開始產生疑慮，美國內部也出現政治壓力要求限制對蘇援助。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美國總統杜魯門未徵詢各主要受惠國便宣布立即停止運送租借物資。<sup>117</sup>

援助涉及的地理範圍與各國競相爭取援助物資，不可避免造成租借上的緊張，但最終龐大的物資（這些物資主要來自美國的生產剩餘）還是順利由盟國共同分享。《租借法案》的主持者史特蒂紐斯便曾提到，如此龐大的援助物資，是否就是盟軍取得「勝利的關鍵」？這個問題的答案遠比表面看來更為複雜。戰後蘇聯官方的口徑一致，對於《租借法案》支援蘇聯作戰的角色一概予以淡化或忽略，刻意扭曲真實的歷史。

戰爭結束不久，蘇聯就公布了「非正式」的指導方針（雖然非正式，但在史達林統治下，任何一個腦袋清楚的人都不敢不當一回事），認定《租借法案》「對於俄羅斯的勝利並未起到分毫的作用」。<sup>118</sup>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為止，蘇聯官方的說法依然堅稱，租借物資很晚才送到，而且品質粗劣，只占蘇聯自己生產武器的百分之四。然而這一官方說詞與戰爭期間的實際歷史正好相反：戰時蘇聯高層曾私下坦承，西方的各項援助十分重要。赫魯雪夫的回憶錄中有一段受訪影片，他在影片中透露史達林十分仰賴西方的援助，但這段影片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才對外公開：「有好幾次，史達林在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場時提到租借物資。他說……『如果我們必須獨力對抗德國，我們不會有任何勝算。』」攻占柏林的朱可夫元帥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延續官方對西方援助的說法，但在六年前一場被竊聽的對話中，人們聽到他私下表示如果沒有外援，蘇聯「不可能撐得下去」。<sup>119</sup>

同盟國的補給物資只占蘇聯武器生產的百分之四，這個數字雖然沒錯，卻掩蓋了《租借法案》實際帶來的成果。在戰爭初期，《租借法案》提供的戰車與飛機占了蘇聯軍事裝備更高的比例，因為蘇聯軍隊在德蘇戰爭開始的前幾個月蒙受了重大損失。隨著戰爭持續進展，蘇聯恢復生產，西方租借的軍事裝備占比才逐漸下降。直到史達林格勒會戰為止，西方租借的戰車占了蘇製戰車的百分之十九。六個月後的庫斯克會戰是二戰規模最大的一場戰車戰，蘇製戰車有三千四百九十五輛，租借戰車則有三百九十六輛，約占百分之十一。<sup>120</sup>然而，盟軍援助物資中真正具決定性的不是戰車、飛機與武器，而是改良蘇聯的通訊系統、改善已經緊繃的鐵路網以及運送大量的原物料、燃料與炸藥，少了這些東西，蘇聯的戰爭投入與軍事戰役將不足以擊敗龐大的德軍。在戰爭初期，蘇聯的空戰與戰車戰之所以缺乏效率，關鍵原因就是缺乏電子設

備，通訊不良使指揮官在遼闊戰場上難以指揮調度。根據《租借法案》，西方盟國總共提供蘇聯三萬五千臺陸軍無線電設備、三十八萬九千支野戰電話與長度超過一百五十萬公里的電話線。<sup>121</sup>到了一九四三年初，蘇聯空軍終於能夠集中控制所有的空中作戰單位，安裝在戰車上的簡易無線電也形成戰力加成。無線電還協助紅軍有效地進行欺敵與散布假情報，導致德軍無法得知紅軍的真實兵力、行蹤或意圖。

蘇聯紅軍在卡車與吉普車方面同樣仰賴西方供應。《租借法案》提供給紅軍的卡車與吉普車超過四十萬輛，蘇聯國內僅生產了二十萬五千輛。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紅軍有三分之一的車輛來自西方援助。<sup>122</sup>美國的援助更是讓蘇聯獲得各式各樣的車輛：偵察車、裝甲運兵車、半履帶車、福特兩棲吉普車與四萬八千九百五十六輛吉普車，這些車輛裝備了無線電，讓紅軍指揮官能夠有效率地指揮部隊。<sup>123</sup>蘇聯仰賴鐵路運送士兵與裝備，而美國提供的一千九百輛蒸汽火車頭（蘇聯自己只生產了九十二輛蒸汽火車頭）無疑提供了最大助力，此外美國在戰時也提供蘇聯百分之五十六的鐵軌。到了一九四二年底，蘇聯的鐵路系統每天能有十五列火車運送補給物資給防守史達林格勒的前線部隊，反觀德國平均只有十二列。<sup>124</sup>最終，盟軍提供蘇聯將近百分之五十八的航空燃油、百分之五十三的炸藥與半數的鋁、銅與合成橡膠輪胎。<sup>125</sup>盟軍援助的規模對戰局具有決定性。蘇聯的工業因此可以僅專注於量產武器，至於戰時經濟必須提供的其他物品則由盟軍的援助來填補。

《租借法案》對於英國的戰爭投入影響毋庸置疑，然而英國民眾的戰爭記憶卻很少給予《租借法案》應有的歷史地位。與蘇聯對待《租借法案》的態度一樣，英國不願承認《租借法案》的重要性，主要是因為這麼做有損國家顏面。儘管如此，英國確實仰賴《租借法案》。如果沒有美國從一九四一年開始的慷慨援助，英國根本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

當時的英國已經無力以美元購買資源，特別是石油，如果沒有美國工業生產的支持，英國的戰時經濟所能取得的糧食與原物料根本不足以支持全球戰爭，也不可能擊敗德國。英國在全球各地的戰事愈來愈仰賴美國的武器與美國的船隻運補。租借物資在一九四一年時占了英國軍事裝備的百分之十一，到了一九四三年這一比例提高到將近百分之二十七，一九四四年是英國作戰的高峰期，租借物資的占比來到百分之二十九左右。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底的第二次艾拉敏會戰時，美國已經向北非戰場提供了一千七百輛中型與輕型戰車、一千架飛機與兩萬五千輛卡車與吉普車。<sup>126</sup>美國總共向英國本土與英國其他的海外戰場運送了兩萬七千七百五十一輛戰車、兩萬七千五百一十二輛裝甲運兵車與兩萬五千八百七十架飛機。與蘇聯一樣，美國的援助物資使英國產業得以專注於製造其他武器，清出所有產能以進行生產。一九四四年，由於美國援助戰車的關係，英國的戰車生產量開始減少，反而是蒸汽火車頭的生產量開始增加，英國鐵路網的壓力因此得以舒緩。<sup>127</sup>同盟國之間達成協議，要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避免在同一個地方投入過多的資源形成浪費。從英國與蘇聯的生產紀錄都可以看出美國援助帶來的影響。對英蘇兩國來說，光是毋需孤軍奮戰這點就足以產生一種心理緩衝，而這正是軸心國所缺乏的。對美國來說，將國內產出的百分之七租借給盟國，對本國經濟影響不大，卻能為主要盟國帶來極大助益。如羅斯福在《租借法案》通過之初所言，這麼做確實可以更有效地捍衛美國的利益。

## 切斷資源：封鎖與轟炸

如果相互援助是提高戰時供給的一項經濟戰略，那麼經濟戰就是減



少敵軍武器數量與原料資源的一種手段。經濟戰的原始意義如字面所言，是純屬經濟層面的戰爭，例如凍結敵方資產、搶購、切斷與控制敵方貿易，但到了二戰，經濟戰卻成為貨真價實的由潛艦與轟炸機發動的經濟戰爭，雙方的人員與裝備都出現嚴重的損失，形成一種長期的經濟消耗戰。二戰期間雖然仍有傳統形式的經濟戰，但重要性已遠不如以軍事手段發起的經濟戰，這些手段包括阻撓物資運送或破壞國內的經濟生產。無論是軸心國還是同盟國，都奉行無限制潛艦戰與轟炸城市的經濟戰略。

在敵軍資源運抵戰場前將其摧毀，這類經濟戰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交戰國的經濟脆弱程度。隨著戰爭規模擴大，軸心國與同盟國在這方面的差異也日漸明顯。美國幾乎完全不受經濟戰的影響：地理位置使美國不用擔心遭受轟炸，而西半球龐大的資源也讓美國的戰時生產幾乎毫無限制，特別是天然橡膠，在緊急狀況下大部分都可以用合成橡膠加以取代。一九四二年一至二月，德國在美國東岸部署潛艦，擊沉了許多未護航的船隻，但持續的時間很短，幾乎未對美國的戰爭投入產生任何影響。美國貨船在橫越大西洋時很容易遭受攻擊，但最終絕大多數物資與軍事裝備還是能安抵目的地。蘇聯在一九四一年喪失了西半部地區，此後蘇聯境內的工業區就成為德國遠程轟炸的目標，但德國空軍缺乏足夠飛機執行轟炸任務，蘇聯的生產因此得以持續進行。蘇聯國內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加上租借物資源源不斷地流入（德國試圖切斷北極海航線，但未能成功），德國對蘇聯採取的經濟戰戰略因此難以產生效果。最脆弱的盟邦是英國，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三年，德國發動海空聯合攻勢破壞英國的生產與貿易，軸心國全力採取這項經濟戰戰略以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爭投入與作戰意志。然而，英國的脆弱是相對的。英國雖然極度仰賴海外的糧食、原物料與石油供應，日後也必須透過海運取得租借

的軍事裝備，但英國為了戰爭也投入了大量資源來維持航道暢通。英國仍擁有世上規模最大的商船船團，雖然商船的數量並非無窮無盡，但這也表示軸心國必須擊沉非常多的商船才能讓英國的貿易崩潰。美國協助組織的全球商船網路使同盟國得以從世界各地運送需要的物資，同時又能阻止軸心國取得這些物資。為了反制同盟國，軸心國需要實施相應的全球海上封鎖，但儘管將封鎖視為優先戰略，軸心國卻缺乏封鎖的手段。

軸心國有共同的弱點。英國與美國的海空軍力量使德義日難以突破海上封鎖。義大利與日本的戰時經濟較弱，兩國都缺少豐富的天然原物料基礎，因此非常仰賴海外的物資供應。地中海是封閉的海洋，要進行封鎖相對容易（在一九四三年之前，英國認為軸心國也有可能對地中海的英國據點進行封鎖）；日本除了仰賴從已經占領的東南亞地區長途運送物資，也需要臺灣、滿洲與朝鮮的糧食與原料。一般認為德國很容易受到傳統封鎖的影響，例如資產凍結與財政危機，一九三九年英法就是採取這種戰略，但事後看來同盟國顯然高估了封鎖對德國的影響。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德國遭受戰時封鎖的慘狀讓希特勒記憶猶新，他因此在一九三〇年代致力於讓德國能夠自給自足或建立起「封閉經濟」。到了一九三九年，德國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糧食自給率，也有能力合成石油、紡織品、橡膠與各項戰爭相關產品。為了解決缺乏黃金與外匯來購買軍事經濟必需品的問題，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德國開始廣泛掠奪歐洲資產與向歐洲的中立國施壓。<sup>128</sup>

一旦德國與西方爆發戰爭，同盟國的海上封鎖確實切斷了德國的跨洋運輸，但德國為了排除封鎖威脅，也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對外擴張領土。占領挪威可以確保瑞典的鐵礦供應，占領巴爾幹半島則能取得更多原物料以及與土耳其進行貿易。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

約，此後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為止，德國持續從蘇聯獲得大量原物料與糧食：德國在一九四〇年獲得六十一萬七千噸的石油產品，相較之下一九三九年只有五千一百噸；德國在一九四〇年進口八十二萬噸穀物，在此之前每年只有兩百噸；此外德國還獲得了銅、錫、鉑、鉻與鎳，這些金屬在一九三九年的進口量都還是零。<sup>129</sup>即使沒有蘇聯的資源，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建立的廣大經濟空間也能有效化解傳統海上封鎖對德國戰爭投入的威脅。軸心國共同缺乏的資源是石油，這是一項關鍵弱點，因為德國必須仰賴石油才能發動機械化戰爭，日本也必須仰賴石油才能出動帝國海軍。石油的強烈需求促使日本進攻東南亞，同時也讓希特勒於一九四二年嘗試奪取蘇聯的高加索地區。<sup>130</sup>同盟國控制或擁有全世界九成以上的石油產出，軸心國只控制了百分之三，此外煉油產能也只有百分之四。德國大規模生產合成燃料，一九四三年達到七百萬噸，占了德國用油量的四分之三，但還是無法滿足德國的需求。<sup>131</sup>石油因此成為西方盟國切斷資源與確保最終勝利的戰略核心要素。

軸心國專注於帝國擴張計畫，因此在對大型戰爭制定戰略計畫時從未將經濟戰這種間接手段列入考慮。在德義日三國中，只有德國對此做出修正以填補戰略漏洞，並且對英國實施海空封鎖。然而在一九三九年時，經濟戰的想法依然只是略具雛形。德國海軍只有二十五艘遠洋潛艦，每次最多只能出動六到八艘，德國空軍的主要任務則是取得空優支援地面作戰，從未計畫執行攻擊敵方海上運輸或後方工業的戰略任務。德國海軍在一九三九年宣布進行「Z計畫」（Z-plan），準備建立一支龐大的遠洋艦隊，這項計畫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完成。儘管如此，希特勒依舊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命令武裝部隊開始對英國進行經濟戰：「擊敗英國是獲得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要擊敗英國，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打

擊要害，破壞英國的經濟。」<sup>132</sup>德國空軍與海軍奉命聯手攻擊英國的貿易路線，摧毀港口設施、倉儲、油槽與糧倉，擊沉貨船與轟炸軍工產業，特別是飛機製造業。由於德國在一戰曾被協約國封鎖糧食進口，希特勒因此特別重視封鎖英國的糧食供應。入侵英國的計畫胎死腹中後不久，希特勒捲土重來，要求飛機與潛艦必須實施聯合作戰，「對這場戰爭進行具決定性的封鎖行動」，讓「英國的抵抗在可預見的未來瀕臨崩潰」。<sup>133</sup>

希特勒想發動經濟戰，但他的軍隊並未做好準備。在這種狀況下要發起經濟戰，從當時的戰略上來看可能不太合理，但希特勒的想法卻反映了他戰爭觀。對他而言，戰爭不僅是為了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也具有經濟功能。他對戰爭的看法部分源自於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德國潛艦戰，德國潛艦幾乎癱瘓了協約國的戰爭投入，當時有六千六百五十一艘船隻被潛艦與水雷擊沉，總噸數達到一千兩百五十萬噸。<sup>134</sup>這一次，德國海軍將領在希特勒樂觀心態的激勵下，也希望發動一場所謂的「史上最大規模經濟戰」。德國潛艦司令鄧尼茲海軍准將（日後升為海軍元帥）相信擊沉噸數是擊敗英國的關鍵，他因此要求數量不多的潛艦部隊把擊沉貨輪當成主要目標。<sup>135</sup>即使擁有大量新建商船的美國加入戰局，希特勒也依然將經濟戰視為切斷資源的關鍵要素。一九四二年六月，海軍總司令賴德爾海軍元帥在報告中提到，「元首深知潛艦戰最終將決定戰爭的結果。」<sup>136</sup>

在德國海空封鎖下，英國相對較難取得資源，但在戰爭初期，絕大多數資源還是能順利運抵英國。在英吉利海峽與北海，德國飛機攻擊貨船，在大西洋，德軍出動潛艦、偽裝巡洋艦與改裝的長途客機FW—200「兀鷹式」，在德國海軍情報部門破譯英國商船船團的信號通訊之下，自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間共擊沉了一千兩百零七艘



船隻。到了一九四一年，光是兀鷹式轟炸機每個月就擊沉了十五萬噸的船隻，之後英國開始調派戰鬥機獵殺與擊落這些速度緩慢的掠食者。一九四〇年，德國飛機擊沉的船隻有五十八萬噸，一九四一年增加到一百萬噸以上，總計五百艘船。在同一時期，潛艦則擊沉了八百六十九艘船，如果不是德國魚雷遭遇嚴重的技術問題，導致要到一九四二年秋天才修復投入作戰，擊沉的船隻數量還會更多。除此之外，海上事故（碰撞、船難、火災等等）也造成六百五十三艘盟軍船隻沉沒。英國進口貨物的噸數急遽下降，從一九四〇年的四千一百八十萬噸，下跌到一九四一年的三千零五十萬噸。<sup>137</sup>

除了海上封鎖，還有來自空中的封鎖。從一九四〇年夏天開始，德國針對英國南部港口與碼頭設施進行空襲，九月中旬，希特勒決定延後海獅作戰，此後德軍空襲的範圍擴大到整個不列顛群島的主要港口城市。曾經歷德軍轟炸的人會覺得這是一場為了打擊英國民心士氣的恐怖轟炸行動，然而事實上，德國空軍的任務主要是為了協助海上封鎖，針對英國幾處主要的海外貿易港口進行摧毀破壞（重點放在倫敦、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並且轟炸倉庫、筒倉、儲油槽、貨運與船隻修繕設施；德軍也轟炸分布在密德蘭的軍事經濟目標，尤其英國的航空發動機生產集中於此。從一九四〇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這九個月時間的「倫敦大轟炸」，其實就是一種經濟戰，是德軍為了破壞英國經濟而實施的空襲行動。如果封鎖奏效，可以預期英國的戰爭能力將會減低，民眾的戰鬥意志也會遭到削弱。在德軍一百七十一次的大空襲中，有一百四十一次針對港口城市，包括倫敦，尤其一九三九年時倫敦擁有最大的海外貿易量。德軍投下了三千一百一十六噸燃燒彈，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目標是港口；德軍還投下兩萬四千五百三十五噸高爆炸彈，其中針對港口的部分占了百分之八十五。<sup>138</sup>自一九四一年一月起，德國空軍奉命對

港口地區投擲更多的燃燒彈，大量易燃的商品倉儲付之一炬。英國決定將大西洋貿易轉移到西部港口，包括布里斯托、克萊德班克

（Clydebank）、斯旺西（Swansea）、卡地夫與利物浦。德國為了反制，新的訓令要求將這些港口列為優先轟炸目標。<sup>139</sup>等到德國空軍被派往東線戰場，對英國的轟炸暫且停歇之時，英國所有的主要港口城市皆已遭受重創，赫爾、普利茅斯、倫敦與南安普敦更是反覆遭到轟炸。

空中轟炸的效果顯然不如海上封鎖，德國最高統帥部也無法得知詳細的轟炸損害情報。不久，希特勒就對結果感到幻滅。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希特勒認為轟炸對於英國戰時軍工產業的影響微乎其微；兩個月後，希特勒同意賴德爾的看法，認為英國的士氣「並未」因為轟炸而動搖。他在二月六日發布訓令，要求優先使用潛艦與飛機擊沉敵方貨船，認為這才是經濟戰中較具決定性的做法。<sup>140</sup>然而德國並未因此停止轟炸英國，部分是因為德國民眾已經忍受英國皇家空軍空襲將近一年的時間，如果停止轟炸英國將很難對民眾交代，另一部分則是為了讓史達林相信，英國才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標，但實際上德國正祕密準備入侵蘇聯。希特勒的直覺是正確的。一九四一年底，德國空軍總部的估計顯示，德軍轟炸對於英國快速擴大的戰時生產只造成百分之五的損失；而遭受空襲的城市，大約只要三到八天就能恢復正常生產速率。只有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遭受大轟炸的考文垂需要較久的恢復時間，大約經過六個星期才回復到空襲前的生產速率。德國試圖破壞英國石油與糧食儲備的行動也成效不彰。英國的石油儲備只損失百分之零點五，麵粉產能損失百分之五，含油種子生產損失百分之一點六，冷藏設備損失百分之一點五。沒有任何地方停水超過二十四小時，戰時的鐵路運輸停頓也從未超過一天。<sup>141</sup>德國空軍為了進行轟炸也付出很大的代價：一九四一年一月到六月，德軍有五百七十二架轟炸機完全損失，有許多還是意外事

故造成的，此外還有四百九十六架受損。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國轟炸機部隊可以出動的飛機只剩下七百六十九架，數量遠少於一年前的法國戰役。<sup>142</sup>對英國而言，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最嚴重的損失，是轟炸造成四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名男女老幼死亡，他們是德國封鎖失敗的受害者。

希特勒不再認為轟炸英國有助於進行封鎖，因此要求德國空軍停止轟炸，他轉而希望由潛艦肩負封鎖的重任，並且下令德國空軍要協同潛艦進行海上封鎖。德國水面艦隊並非海上封鎖的主力，在整個戰爭期間，德國海軍只出動了四十七艘艦艇進行封鎖。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國最現代的戰鬥艦俾斯麥號被擊沉之後，德國的主要海軍艦艇皆全面停止遠洋作戰，將重點放在保護從斯堪地那維亞進行運補的德國船團上，以及威脅盟軍經由北極海運送物資到蘇聯的船團。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海空聯合封鎖的態勢出現變化。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不願另外撥出空軍資源來支持海上封鎖，特別是此時的德國空軍必須將心力投入於巴巴羅薩作戰。駐紮在法國西部的德國第四十轟炸機聯隊，原本要負責協助海軍進行封鎖，但部隊始終無法獲得適當補給。從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德國空軍平均每月只擊沉四艘船。<sup>143</sup>因此，真正能有效執行海上封鎖的武器只剩下潛艦。德國潛艦的數量在一九四一年大幅成長，第一季有一百零二艘，到了年底增加到兩百三十三艘，但德國修繕受損潛艦的速度緩慢，加上訓練艇的需求極大且作戰範圍過於遼闊，從大西洋北部延伸到地中海戰場，因此估計德軍在大西洋負責攻擊英國貨船的潛艦最多不會超過十七艘。義大利也派出潛艦前往大西洋協助封鎖，但義大利潛艦無法適應開放海域的風浪，最終只能重新部署到比較平靜與溫暖的地區。到了一九四二年，德國潛艦終於接近鄧尼茲認為封鎖所需的數量：七月，三百五十二艘，年底，三百八十二艘，一九四三

年全年都在四百艘以上。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三月，德國潛艦艦隊達到巔峰，可以同時出動一百一十艘進行海上作戰。<sup>144</sup>

到了這個階段，盟軍採取的反制措施也開始對潛艦戰產生明顯的制衡效果。英國海軍部在利物浦設立西方航線司令部，在反潛作戰中指揮護航艦隊保護前來英國的商船船團。西方航線司令部利用潛艦監聽室篩選各種來源得到的潛艦活動情報，包括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截聽德國海軍謎式密碼電文獲取的極機密訊息（該年二月之後，由於德軍更改密碼，因此有六個月的時間未能解讀德軍電文）。這些情報使英國的商船船團得以規避埋伏的德國潛艦。一九四一年春，英國發布

《西方航線護航指示》（*Western Approaches Convoy Instructions*），要求護航艦隊司令要以規避而非獵殺敵方潛艦做為主要目標。當歐戰爆發時，幾乎所有船團都必須要有軍艦護航，只有速度達到十五節以上的船隻才能獨自航行。一九四一年，護航艦隊的力量大幅提升，空中掩護雖然仍不完備，但已足以迫使德國潛艦長時間不敢浮出水面。護航艦隊與飛機裝備了一點七米波雷達來偵測潛艦，也裝備了先進的潛艦探測器

（ASDIC），這是在一戰最後一年發明的聲音偵測裝置。然而，在經常出現風暴、海象惡劣的大西洋，這兩種儀器都無法完全發揮功能。一九四〇年，雷達研發出現突破，多腔磁控管的引進使雷達可以利用較短的波長。一九四一年中，盟軍艦艇開始裝設二七一型厘米波雷達，之後飛機也開始裝設，這種雷達可以更精確地解讀潛艦影像，即使遭遇濃霧、低雲層或在夜間也能做出清楚判斷。改良的反潛設備雖然無法造成德國潛艦的大量損失（一九四一年只擊沉十九艘，一九四二年是三十五艘），卻能有效迫使德國潛艦離開原本的獵殺場，後撤到中大西洋「缺口」<sup>[1]</sup>或往南撤退到直布羅陀與獅子山航線。德軍再也無法重現一九四〇年以飛機與潛艦擊敗盟軍海岸護航艦隊的戰果。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



二年，盟軍在蘇格蘭與倫敦之間部署了六百零八艘護航艦艇，兩萬一千五百七十艘補給船只有六十一艘被擊沉。<sup>145</sup>一九四一年被擊沉的船隻噸數，從三月的高峰三十六萬四千噸，一路下降到十二月的五萬零六百八十二噸。

德國海上封鎖的高峰出現在一九四二年春到一九四三年春之間，此時德軍擊沉的噸數突然再次快速增加。德軍擊沉噸數的增加，有部分是出於偶然，而且掩蓋了德軍可用兵力正在減弱與面對盟軍護航完全無計可施的現實困境。長期而言，德國的潛艦戰與空戰已難有突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國宣戰，德國認為可以利用這個難得一見的機會攻擊幾乎完全不設防的大西洋西岸航線。十二月九日，由於美國已非中立國，希特勒於是宣布解除所有禁令，發動無限制潛艦戰。鄧尼茲對於美國參戰毫無準備，起初他只有六艘潛艦可用，即使到了隔年一月底也只有十艘潛艦可用。遠程IXC型潛艦被派往墨西哥灣，攻擊從千里達運送石油與鋁土的貨船；小型的VII型潛艦則開往美國東岸。德軍潛艦在美國東岸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因為華府沒有想到德國潛艦會對美國本土構成直接的威脅。濱海城市在夜間依然燈火通明，讓沿海航行的船隻一覽無遺，而美國的貨船在毫無艦艇護航下出海，船隻沒有無線電限制，也不做燈火管制。美國海軍軍令部長金恩認為沒有必要派出護航艦隊，因此在美國近海幾乎沒有任何艦艇或飛機投入反潛任務。結果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盟軍的補給船團就遭到德軍肆意攻擊，遭擊沉的船隻數量逐月創下新高——二月有七十一艘，到了六月已高達一百二十四艘，創下戰爭期間的最高紀錄。這些船隻幾乎都是在美國海域遭到擊沉，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輪，這些船隻行駛的是大西洋西北部航線，主要提供美國產業需要的原料與計畫運往英國的租借物資。<sup>146</sup>德軍每月擊沉噸數逐漸接近七十萬到八十萬噸的水準，已經達到鄧尼茲認為能決定性地破壞盟軍補

給的必要數量。德國潛艦戰此時面臨全新的緊急事態，隨著美國參戰，這場海上衝突的性質也跟著從切斷英國資源的經濟戰，轉變成阻止美國越過大洋運送兵力與裝備前往歐洲進行軍事行動的戰爭。

一九四二年還出現了其他對德國有利的因素。西北大西洋由匆促擴張的皇家加拿大海軍負責防衛。然而護航艦艇的缺乏、護航艦隊軍官的訓練不足、潛艦探測器的過時以及護航範圍擴及過於龐大的大西洋中部，使得加拿大海軍不堪負荷。一九四二年夏秋，德國潛艦前往西北大西洋，在聖羅倫斯灣發動攻擊，他們並未遭遇激烈反抗：德國五艘潛艦擊沉了十九艘船，迫使加拿大封閉聖羅倫斯灣不讓商船進出。<sup>147</sup>金恩海軍上將終於決定進行海空護航行動，美國與加勒比海域的攻擊事件這才慢慢減少。鄧尼茲讓潛艦「狼群」後撤到中大西洋「缺口」，這裡位於盟軍的巡邏範圍之外。德國海軍在重新設定謎式密碼之後又發起新一波潛艦戰，從二月到十二月，英國始終無法破譯取得極機密情報。儘管補給船團仍有可能規避德國潛艦，但難度明顯提高。雖然盟軍加強了護航艦隊的力量，也裝備了厘米波雷達，但德國潛艦部署在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範圍之外，令盟軍束手無策。皇家海軍不斷催促皇家空軍海岸司令部派出遠程的美製B—24「解放者」轟炸機來擴大巡邏範圍，然而最終填補「缺口」的最大阻礙卻來自邱吉爾。一九四二年補給船團遭受攻擊期間，邱吉爾仍堅持轟炸德國是空軍的首要之務，他認為採取攻勢的經濟戰要比保護補給船團來得重要。在轟炸機司令哈里斯空軍中將的大力支持下，邱吉爾主張轟炸潛艦生產地要比從海上攻擊潛艦更為有效，然而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證明他的觀點。直到邱吉爾得知一九四三年英國的進口物資即將下降到無法支撐的低水準時，他才回心轉意，同意給予更多空軍資源在反潛戰上，但前提是不能排擠空軍對歐陸的轟炸。一九四三年春末，補給船團的損失達到每月六十萬噸以上，邱吉爾終於同

意讓遠程飛機投入反潛任務；與此同時，羅斯福也意識到補給船團面臨極大的風險，他要求陸軍航空軍派十五架「解放者」轟炸機支援加拿大空軍填補大西洋的西部缺口。到了五月，美軍派出的四十一架極遠程飛機終於讓整個大西洋完全覆蓋在空軍的航程之內。<sup>148</sup>

德國潛艦戰在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初的成功，從許多方面來看宛如一場海市蜃樓。德國潛艦之所以能擊沉大量貨船，主要是美國海軍應對時漫不經心，加上英國空軍與美國陸軍航空軍都無法提供充足的空中支援來獵殺大西洋中部的德軍潛艦狼群。儘管商船船團蒙受重大損失，但統計數字顯示，仍有大量補給物資毫髮無傷地運抵目的地。一九四二年五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橫越大西洋的一百七十四個補給船團，有一百零五個並未被德軍發現；剩餘六十九個被德國潛艦發現的船團，有二十三個逃過攻擊，三十個遭受輕微損失，只有十個受損嚴重。大多數時候，德國潛艦擊沉的目標主要是掉隊或沒有受到護航的船隻——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在美國海域被擊沉的三百零八艘船，有兩百七十七艘屬於此類。從新斯科細亞省基地出發的補給船團，代號是HX與SC，這些船團在一九四二年的損失少於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是六十九艘，一九四一年是一百一十六艘。<sup>149</sup>隨著潛艦戰持續進行，每艘潛艦擊沉的噸數也急遽下降：一九四〇年十月，每日擊沉噸數是九百二十噸，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當德國潛艦在大西洋缺口擊沉的噸數創下新高，但每日擊沉噸數卻只剩下兩百二十噸。<sup>150</sup>一九四二年，盟軍開始展現科技與戰術上的優勢：厘米波雷達、對使用無線電的潛艦進行精確定位的新式高頻測向設備、首批護航航空母艦下水、殺傷力更強的炸藥、飛機過於靠近目標而無法有效使用雷達時可以利用萊光探照燈照射前方海面，此外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地中海東部俘獲的德國U—559潛艦上發現的新「特里頓」（Triton）密碼本，讓盟軍在十二月再次破譯德軍的謎式密

碼電文。出身潛艦部隊的賀爾頓海軍上將（Max Horton）出任西部海域司令後，改變了護航艦隊指揮官的訓練方式，要求海軍艦艇的支援部隊要採取強硬做法，搜尋與摧毀德軍的狼群部隊。雖然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兩支護航艦隊SC—121與HX—229在激烈戰鬥中遭遇重創，損失了二十一艘艦艇，但德國潛艦在所有水域的損失也驟然攀升到這場戰爭的巔峰：二月被擊沉十九艘，三月被擊沉十五艘。

在前述所有條件配合下，德軍的封鎖突然失去了威脅性。美國派出的商船船團持續增加，英國的進口物資噸數從一九四二年的兩千兩百八十萬噸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兩千六百四十萬噸。太平洋戰役與盟軍登陸北非使英國獲得的補給物資減少，構成英國的「進口危機」，邱吉爾對此深感憂慮，然而後來證明這場危機只是暫時的。德國海軍情報部門原本估計同盟國在一九四二年可以建造五百萬噸的新商船船團，但實際上同盟國建造了七百萬噸，到了一九四三年更是達到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儘管船運在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初仍持續損失，但同盟國的建造速度使德國擊沉船隻的消耗戰難以產生決定性的效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英國累積的糧食與原料存貨總數達到一千八百四十萬噸，一九四三年二月減少為一千七百三十萬噸，但到了六月又回升到一千八百三十萬噸。<sup>151</sup>一九四三年，美國造船業生產的船隻扣除遭擊沉的船隻，仍有一千一百萬噸剩餘。一九四四年，德國海軍幾乎已無力阻止美國源源不斷地把軍隊與裝備送到大西洋的對岸，準備反攻法國。

海戰方面的情勢已經完全逆轉。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移動緩慢的補給船團SC—130從新斯科細亞省開往英國，由一支特別加強的海軍艦隊護航。船團在大西洋中部遭遇狼群，此時這個地區的空域已有新型的解放者轟炸機巡邏。結果是六艘潛艦被擊沉，補給船團毫髮無傷。同月，在大西洋有三十三艘潛艦被擊沉，以所有戰場來計算則是四十一



艘。這已經相當於德國海軍可作戰潛艦的三分之一。鄧尼茲認為潛艦部隊無法承受這樣的損失，於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所有潛艦撤回基地，直到添補新裝備後再試圖改變戰局。五月三十一日，鄧尼茲將潛艦戰失利的消息上報希特勒，希特勒一如往常地不允許撤退：「潛艦戰不許停止，這點毫無商議的餘地。大西洋是我在西方的第一條防線.....。」<sup>152</sup>儘管如此，德軍的封鎖已然失敗，直到戰爭結束都無法恢復。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潛艦遭擊沉的數量已經超過商船，一九四四年，盟軍在所有戰場只損失了十七萬噸的補給船隻，是一九四二年總損失的百分之三。反潛力量的擴張與升級使德國潛艦難以達成作戰目的，甚至淪為自殺行動：一九四三年有大約兩百三十七艘潛艦被擊沉，一九四四年則有兩百四十一艘。德國計畫研發XXI型與XXIII型這兩種新型潛艦，這兩種潛艦是真正意義上的「潛艦」，能夠持續在水下活動躲避偵測，而且可以在水下發射魚雷，其作戰距離遠至開普敦。然而新型潛艦的研發速度太慢，主要受制於盟軍轟炸與資源被分散到其他更急迫的需求上。當第一批新世代潛艦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成軍、準備前往英國泰晤士河河口時，這場由德國發動的戰爭已經走到了尾聲。<sup>153</sup>

### ※ ※ ※

與軸心國不同，英美戰前規畫的經濟戰核心與地理條件有著莫大關係。既然任何國家都無法經由陸路入侵英國與美國，英美兩國因此可以自由地透過海上與空中對外投射力量。美國的對日戰爭計畫可以溯源到一戰之前。當時美國曾經計畫，若日本試圖排除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那麼美國將對日本採取經濟圍困。這就是「橘色戰爭計畫」（橘色代表日本），在首次提出後的二十五年間持續迭代，但不變的是無限制

經濟戰一直是計畫的主軸。美國以南北戰爭北軍成功經濟封鎖南軍做為計畫的參考範本。切斷所有海外資源、破壞補給、商業與金融孤立，這些都是用來「枯竭與消耗」橘色敵人的手段。<sup>154</sup>美國的經濟力量，即使面臨對日開戰的極端情況，也能確保日本經濟遭到毀滅。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美國也開始將空中力量列入考量，將轟炸與封鎖視為經濟戰的兩個互補手段。一九三六年版的橘色戰爭計畫在遠程飛機尚未研發的狀況下，已經預想未來美國將從太平洋島嶼基地對日本的工業與交通運輸目標進行遠程轟炸，這個想法直到二戰末期美國終於生產出能夠飛越太平洋中部的轟炸機後才得以實現。<sup>155</sup>當德國成為潛在的敵人時，飛機也成為計畫在歐洲戰場實施經濟戰的核心工具。在歐洲，轟炸是立即可行的手段，美軍的計畫制定者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同意，轟炸的目的是「破壞工業與經濟結構」。<sup>156</sup>

英國以一戰做為經濟戰的範本，英國認為一戰時同盟國之所以崩潰，正是因為協約國以海軍進行封鎖的緣故。由於同盟國的資源與糧食遭到封鎖切斷，才引發一九一八年的工業與社會危機。一戰快結束時，英國才把轟炸德國工業視為一種經濟戰，認為這麼做有助於經濟封鎖。英國原本計畫在一九一九年出動數百架多引擎轟炸機發動大規模轟炸，卻因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戰而作罷。但透過空中力量對敵方經濟進行圍困的想法，卻成為往後二十年空軍作戰構想的重心。一九二八年，英國皇家空軍參謀總長滕恰德（Hugh Trenchard）元帥擬定空軍的核心戰爭目標，認為空軍應攻擊敵人的工業城市與瓦解敵方民眾的戰鬥意志：「攻擊重點是敵人最難防禦與最脆弱的地方。」<sup>157</sup>這項宣示成為英國皇家空軍的核心任務，一九四〇年五月英國發動轟炸攻勢也是這種精神的延續，而此時空軍轟炸早已成為英國整體封鎖戰略的一環。在戰間期，英國一直維持從海上對敵國商業進行正式封鎖的策略，到了一九三

七年，封鎖計畫變得更為特定，因為此時英國已經把德國視為假想敵。一九三七年七月，英國成立對德施加經濟壓力委員會，委員會針對德國經濟弱點進行探討，並促使英國把對德國進行經濟戰列為大戰略的重心。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危機期間，英國臨時規畫出了經濟戰部。從部會的名稱即可看出經濟戰的概念（「經濟戰」一詞首見於一九三六年）已經擴大，從單純的海上封鎖擴展到一切可以限制德國取得物資、資金與服務的手段，甚至包括發起攻勢行動。經濟戰部的職責甚至擴大到為轟炸機司令部界定與評估經濟目標。<sup>158</sup>一九三九年九月，經濟戰部正式掛牌成立，成為英國戰爭機器的一部分。

儘管如此，西方經濟戰理論上仍受到法律限制：潛艦與飛機不能攻擊商船船團與敵國的工業。一九三六年的《倫敦潛艦條約》（London Submarine Protocol）規定合法的潛艦攻擊目標僅限於運兵船、海軍護航的商船與從事交戰行為的武裝商船，而且各大國均同意簽字訂約，包括德國與日本。無限制潛艦戰因此被視為非法。潛艦可以勒令商船停船，可以登船搜索走私物品，但必須保障商船船員的安全。對潛艦的限制也適用在飛機上。根據一九四〇年初英國空軍部發布的指示，飛機只能攻擊軍艦；如果飛機要對商船進行威脅，僅限於讓商船離開原本的航線。<sup>159</sup>在條約規定下，無論是潛艦還是飛機在實際上都無法輕易執行「截停與搜查」的程序，因此潛艦與飛機在海上進行經濟戰的效果實際上非常有限。轟炸德國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一九三九年，英國政府與帝國參謀本部發布的指示提到，如果故意以平民為轟炸目標，或無法確認轟炸的是軍事目標（這表示不能在雲層上方或在夜間投彈），或因為疏失造成平民死亡，那麼作戰行動將構成非法。<sup>160</sup>

一九四〇年，英國政府解除對潛艦與飛機的限制。一九四〇年五月中，英國認為德軍已經公然違反國際法，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已無必要

對德國遵守相關法律，因此決定開始轟炸德國的工業城市。到了十月，英國解除所有限制，一九四一年中更是明確定義工業城市的平民也是正當的轟炸目標。<sup>161</sup>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潛艦戰。當時英國認為，由於德國「顯然」已經實施無限制潛艦戰（實際上並非如此，當時德國尚未實施無限制潛艇戰），因此英國就沒有法律上的理由不對德國船運進行無限制戰爭。德國入侵挪威後，英國為艦艇與飛機劃定了有限的「無預警擊沉區」。往後一年，這個區域逐漸擴大，基本上所有軸心國貨船都會遭到無限制攻擊。對美國而言，日本攻擊珍珠港同樣讓法律問題迎刃而解。就在珍珠港遭到攻擊的六個小時後，基地司令接到電報：「對日本發動無限制空戰與潛艦戰。」<sup>162</sup>

無限制經濟戰首見於地中海戰場。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一艘義大利潛艦在義大利海軍於地中海劃定的「危險區」裡，無預警擊沉一艘挪威油輪。義大利布置水雷時，也沒有對外宣告，明顯違反了國際法。七月中，英國戰時內閣在辯論後決定對義大利貨船採取「無預警擊沉」政策。起初英國將無預警擊沉區劃定在利比亞外海，之後又將範圍擴大到離義大利領土海岸五十公里的地區。潛艦、水面艦艇與飛機可以自由擊沉義大利商船與運送軍事裝備或兵員到北非前線的義大利船隻。<sup>163</sup>不過，英國的無預警擊沉政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執行。一九四〇年，英國只有十艘潛艦在地中海執行任務，這些潛艦全屬於O級與P級潛艦：船身太大，在水淺海域下潛的速度太慢，在地中海很容易被偵測出來。英國在地中海部署的飛機數量也太少，幾乎全用來防衛埃及。一九四一年，新型的T級潛艦與較小型的S型及U型潛艦開始大量派往地中海，這些新型號潛艦更適合在地中海作戰。一九四〇年十月，英國海軍俘獲義大利潛艦密碼本，又於隔年六月破解義大利的C38m密碼，掌握義大利補給船團與航線的詳細資料。<sup>164</sup>此後英國開始擴大空中活動、進行更



廣泛的布雷與出動水面艦艇來擊沉補給船團。英國的行動導致義大利與德國船團（德國出借商船船團給義大利，條件是船團必須懸掛德國旗幟）出現難以彌補的損失，義大利商船船團也逐漸遭到消滅。

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五月，在戲劇性的最後幾個月，義大利補給船團努力想通過盟軍布置的水雷區，為被圍困在突尼西亞的軸心國部隊運送物資。然而船團卻遭到從鄰近基地起飛的英美空軍、英美水面艦艇與潛艦攻擊，幾乎沒有船團能完成任務。義大利船員把這條航線稱為「死亡之路」，義大利海軍艦艇損失慘重，頂多只能派出十艘驅逐艦進行全天候護航，到了二月更只剩下五艘。三月至四月時，百分之四十一點五的補給物資沉入海底。而在義大利於五月投降前不久，損失的補給物資量已高達百分之七十七。在這條死亡之路上，大約有兩百四十三艘補給船被擊沉，兩百四十二艘受損。<sup>165</sup>盟軍持續三年的封鎖戰，使義大利商船船團從原本的三百一十萬噸（包括義大利、德國與俘獲來的商船），減少到只剩三十萬噸；總計有一千八百二十六艘船隻與油輪被擊沉，其中被潛艦擊沉的占百分之四十二，飛機占百分之四十一，水面艦艇與水雷占百分之十七。<sup>166</sup>儘管如此，封鎖戰仍未完全切斷軸心國對北非的戰爭投入。雖然盟軍全力攻擊補給船團，但估計仍有百分之十五的補給物資運抵非洲。要命的是，北非的小港口無法容納大量物資，許多壅塞在港口的船隻與補給品就在駐防中東的英國皇家空軍無情攻擊下遭到摧毀，還有部分物資在運往前線的長途路程中耗損。<sup>167</sup>軸心國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於補給船團的損失程度，而在於缺乏船隻運送物資。大量船隻停放在義大利船塢等待修理，但在物資缺乏下始終無法修復。運往北非的物資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至六月間達到高峰，到了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每月平均運量只剩下過去的百分之六十二，但此時北非需要補給的軍隊數量卻比先前更多。<sup>168</sup>

可以確定的是，義大利商船船團遭受重創也導致義大利戰時生產衰退與石油缺乏。盟軍的封鎖不僅針對義大利運往非洲的補給物資，也針對義大利的港口貿易，而義大利必須仰賴貿易才能獲得關鍵的原料、燃料與義大利民眾所需的糧食。相較於對北非戰場的補給，義大利船運的毀滅對義大利國內的影響程度始終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也較難從統計數據上加以印證。義大利軍方估計每年需要進口八百三十萬噸石油，但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平均進口量卻只有一百一十萬噸；銅與錫的需求量是十五萬九千噸，但平均進口量只有三萬噸；鋁的需求量是三萬三千噸，但每年的進口量只剩下五千噸。<sup>169</sup>一九四二年，義大利進口的棉花與咖啡豆只有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一，羊毛只有百分之四，小麥是百分之十一，鋼鐵是百分之十三，其餘物品占比也大致相同。<sup>170</sup>進口物資的大幅衰退有多大程度與盟軍的經濟戰有關，如今依然缺乏直接證據，但一九四三年夏天，義大利的戰時貨物能力減少九成一事，顯然對義大利物資進口造成嚴重影響。

同盟國對德國發起的經濟戰規模更大。與地中海補給戰不同的是，對德經濟戰以空中力量為主，而且最初是由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執行任務。從一九四二年起，駐紮在英國的美國第八航空軍參與對德經濟戰，一九四三年底，駐紮在義大利南部的美國第十五航空軍也加入行列。對德國進行海上封鎖的成效有限，因為德國可以取得歐洲占領區與中立國的資源。戰爭期間，英國潛艦在歐洲北部海域只擊沉了八十一艘船，海岸司令部的飛機雖然擊沉了三百六十六艘船，但絕大多數都是輕型的沿岸船隻。盟軍的水雷也擊沉了六百三十八艘船，只是大多數還是小船。<sup>171</sup>前往德國的遠洋商船被英國海軍以「查緝走私」名義進行攔截，許多戰爭物資被當成貴重物品扣押，但這類商船在一九三九年秋天以後已大幅減少。此後突破封鎖的船隻少之又少，有些是德國船，有些

是日本船，但這些船有很高的比例遭到擊沉或扣押，在戰略上幾乎不構成影響。即使在戰前，人們已經想到切斷德國戰爭資源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用遠程飛機進行源頭打擊。在歐戰爆發前幾個月，英國空軍部擬定了「西部空域計畫」，一共有十六份，然而這些願望清單完全超出了轟炸機司令部的能力範圍。西部空域計畫最關鍵的是五號計畫與八號計畫。五號計畫是「攻擊德國製造業源頭計畫」，包括攻擊所有的戰時工業、魯爾區、德國石油產地等，八號計畫則是「夜間攻擊德國戰爭儲備」。這兩項計畫結合起來形成了一九四〇年五月中的作戰行動，當時邱吉爾新成立的戰時內閣已經同意進行夜間作戰，而此舉不可避免將造成平民傷亡。<sup>172</sup>這些戰爭初期的空襲行動開啟了一場為期五年轟炸德國後方與德國在歐洲占領區生產地的戰爭，而人們當時完全沒想到這場戰爭持續的時間竟如此之久、規模又是如此之大。英美空軍預期從空中發起的經濟戰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就跟海上消耗戰一樣，削弱敵方經濟證明是一段令人挫折且代價高昂的緩慢過程。

事實上，在戰爭的前兩年，轟炸機司令部幾乎未取得任何成果。雖然邱吉爾大力支持轟炸行動，認為這是唯一能讓德國民眾感受到戰爭的手段，但主張德國產業與交通運輸會因為轟炸而遭受重創的想法，顯然與實際作戰的成果有所落差，這一點可以從德國轟炸對英國工業產出的影響非常有限看出。轟炸機司令部擁有的飛機太少，沒有重型轟炸機，缺乏現代的投彈瞄準器或導航系統，攜帶小口徑的高爆炸彈，幾乎沒有燃燒彈，還要面對德國部署的防空砲火。這些防空砲火數量驚人，被設置來保護德意志帝國西部的關鍵目標空域。轟炸機司令部一名飛行員回憶說，一九四〇年轟炸德國軍事經濟目標的行動「毫無意義」，許多機組人員根本找不到自己要轟炸的城市。有很高比例的炸彈投到開闊的鄉村地區，還有許多炸彈是啞彈。<sup>173</sup>一九四一年八月，邱吉爾的科學顧

問林德邁（Frederick Lindemann）要求年輕統計學者巴特（David Bensusan-Butt），分析轟炸機司令部拍攝的六百五十張照片以分析轟炸精確度，這才讓大家瞭解轟炸行動其實並沒有產生效果。巴特發現，五架飛機只有一架進入離目標八公里以內的範圍，十架飛機只有一架飛抵魯爾與萊茵蘭工業區的上空。在沒有月光或起霧的夜間，飛抵目標區上空的飛機甚至十五架只有一架。兩個月後，轟炸機司令部剛成立的作戰研究部門發現，秋天空襲的效果更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飛機能成功進入距離目標八公里內的範圍進行投彈。<sup>174</sup>

早在巴特提出報告之前，轟炸機司令部就已經認為當前的狀況很難做到精準轟炸，並因此修改了經濟戰的戰略。英國空軍部對德國轟炸英國的影響進行分析，最後認為燃燒彈比高爆彈更具破壞力，主張應優先考慮投擲燃燒彈。其次，轟炸工人與工人所在城市，要比轟炸特定工廠更能破壞敵方的戰時生產。一九四一年四月，檢討轟炸政策後提出的結論是，「審慎計畫對德國城鎮的工人階級集中區進行持續的密集轟炸」。空軍情報部門主任表示，工人「不容易流動，閃電般的大轟炸可以對其造成最大的傷害」。<sup>175</sup>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經濟戰部也做出結論，認為以「工人的居住區與購物中心」而非個別工廠做為轟炸目標，經濟戰戰略會更成功，經濟戰部因此催促空軍部以摧毀整座城市做為作戰目標。<sup>176</sup>在英國人眼中，工人成了抽象的經濟目標。在這種定義下，一九四一年七月，轟炸機司令部接到的第一項訓令是，要將四分之三的作戰力量投入於轟炸工人階級與工業區，行有餘力再攻擊交通運輸目標。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轟炸機司令部接到的第二項訓令是，徹底放棄攻擊交通運輸目標（之前的攻擊一直未獲成效），改成把打擊敵方平民，特別是產業工人的士氣當成主要目標。轟炸機司令部對德國的工業城市進行分區，將脆弱的住宅區標示出來。「第一區：市中心，建



築物密集。第二區：密集住宅區，建築物密集」到「第四區：工業區」。轟炸機司令部決定轟炸第一區與第二區，避免浪費炸彈在較分散的工業區上。<sup>177</sup>經濟戰部擬了一份清單，上面列了五十八座城市（所謂的「轟炸機指南」），每一座城市根據擁有的關鍵工廠數量被打上不同的經濟分數。柏林的分數最高，有五百四十五分；符茲堡只有十一分，結果日後卻毀於轟炸造成的風暴性大火。這份清單不是用於精準轟炸，而是為了確保當城市區域遭到破壞時，重要廠商會因為勞動力的死亡、受傷與流離失所而受到影響。這份清單後來擴大到一百二十座城市。一九四二年二月，哈里斯被任命為轟炸機司令部司令，他隨身攜帶這份清單，只要確認有哪座城市已被夷為平地，他就將清單上的城市劃掉。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德國投降前幾天，英國終於停止轟炸德國城市，此時清單上的城市已被哈里斯劃掉七十二座。<sup>178</sup>

美國陸軍航空軍對於可能出現的經濟戰，看法與英國有很大的差異。一九四〇年，美國陸軍航空軍情報部門獲得英國空軍情報部門提供的資料，開始計畫從德國經濟體系中選擇最能破壞德國戰爭投入的目標進行打擊。一九四一年八月，在戰爭部指示下，陸軍航空軍擬定一份空襲計畫做為羅斯福「勝利計畫」的一部分，分析人員選擇電力、交通運輸、燃油與士氣（受英國影響）做為戰略空中攻勢的主要目標。與英國的計畫不同，美國的計畫AWPD—1把德國空軍與支持德國空軍的產業及基礎設施視為重要的「中間目標」，認為摧毀這些目標是有效摧毀其他目標的先決條件。<sup>179</sup>一九四二年九月，當第八航空軍飛越大西洋前往英國駐紮時，最初的計畫做了修改，成了AWPD—42。新計畫把士氣從目標清單中移除，另外增添潛艦、合成橡膠與鋁的生產做為重要目標。陸軍航空軍對這些計畫做了精確估算，一九四一年有一百五十四個目標，一九四二年增加到一百七十七個。<sup>180</sup>陸軍航空軍也估算了需要

的轟炸機數量與攻擊強度，假定美軍轟炸機使用有效的投彈瞄準器，可以在白天飛到德國境內，精確地轟炸被列為主要目標的工廠。美軍認為，一旦計畫目標遭到摧毀，「將對德國造成決定性的打擊，使其無法繼續投入戰爭。」<sup>181</sup>美國陸軍航空軍與英國皇家空軍的差異，最終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盟軍卡薩布蘭加會議通過的聯合轟炸機攻勢中得到確認。六個月後，針對聯合轟炸機攻勢頒布的「零距離指令」清楚區分兩種不同的經濟戰形式，一種是在白天攻擊特定的工業目標體系，另一種是進行夜間轟炸，摧毀德國工人持續作戰的能力與意志。這兩種戰略各自獨立但並非毫不相容，但美國陸軍航空軍高層對於英軍的攻勢仍存有疑慮，認為英軍的做法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層面都不可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美國駐歐洲戰略航空軍司令史巴茲將軍就對此表示：「在極權社會裡，只要當權者能牢牢掌握局面，老百姓的士氣高低根本不會產生任何影響。」<sup>182</sup>

參戰第一年，美國第八航空軍經歷了一場艱苦的教訓。想癱瘓清單上洋洋灑灑列出的一百七十

七處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做到。廣受吹捧的諾頓

（Norden）投彈瞄準器在飛行高度超過四千五百公尺時變得難以使用；德國工業城市往往被雲層或工業霧霾掩蓋，因此美軍有將近四分之三的炸彈是在雷達協助下「盲目」投彈，與英國的無差別轟炸沒什麼不同。此外，轟炸機在沒有戰鬥機護航下在白天進行轟炸，損失率也讓人無法忍受。一九四三年八月與十月只針對一處關鍵精確目標士文福

（Schweinfurt）的滾珠軸承工廠進行轟炸，卻造成轟炸機的巨大損失：八月損失了百分之三十一的轟炸機，這些轟炸機有的被擊落，有的遭到重創，有的被迫飛往北非基地。十月，兩百二十九架轟炸機損失了六十五架。<sup>183</sup>由於損失率實在太高，此後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美國第八

航空軍只選擇在德國北部海岸或歐洲占領區轟炸比較簡單的目標。

一九四四年二月，美軍重啟對德國工業區的日間轟炸行動，但此時的轟炸已與過去有所不同。一九四三年底，史巴茲擔任美國駐歐洲戰略航空軍司令，一九四四年一月，杜立德空軍少將負責指揮第八航空軍，兩人認為要進行經濟戰，首先必須在軍事上擊敗保衛德國工業區的德國空軍。然而，要擊敗德國空軍仍須從經濟層面入手，必須將飛機產業視為首要的工業目標。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到二十六日，駐紮在英國的美國第八航空軍與駐紮在義大利的美國第十五航空軍對德國十八座飛機裝配廠發動攻擊，史稱「重要的一週」（Big Week）。轟炸造成廣泛的破壞，但並不嚴重。真正造成破壞的是美軍戰術上的改變。與海上商船船團一樣，轟炸機也需要戰鬥機護航。從一九四三年底開始，P—38閃電式、P—47雷霆式與高性能的P—51野馬式（裝上英國授權美國生產的梅林發動機）等美軍戰鬥機開始掛上副油箱，使其可以深入德國領空。這些戰鬥機除了保護脆弱的轟炸機群，也能「自主」執行任務，它們獲准遠離轟炸機群，主動搜索敵機、空軍基地與機場設施。儘管德國在一九四四年大幅增加戰鬥機產量，但美國護航戰鬥機採取積極的戰術，使德國戰鬥機不堪消耗。二月，德國空軍損失了三分之一的戰鬥機，到了四月損失增加到了百分之四十三。<sup>184</sup>有經驗的飛行員大量損耗，為了及時補充飛行員，只好降低訓練標準。一九四四年一整年，德國在盟軍轟炸下依然能維持高水準的飛機產量，但飛行員損失太多，導致德國空軍最終還是喪失了本國領空的空優。

德國空軍的落敗使美國轟炸機得以重回經濟戰主軸，而此時盟軍的轟炸機數量也大幅擴充。美軍最初的計畫是列出大量目標進行轟炸，但之後放棄了這項計畫，轉而集中轟炸德國的石油供給。一九四四年三月，敵方目標委員會提出報告，指出石油是敵方最脆弱的目標，也最容

易對德國整體戰力產生重大影響。雖然轟炸機部隊理應分出部分兵力協助盟軍的六月反攻法國計畫，但史巴茲還是下令必須進行石油戰役。四月，盟軍對羅馬尼亞的普洛什蒂特油田，也就是德國原油的主要來源狂轟濫炸。五月與六月初，盟軍猛烈轟炸德國主要的合成燃料工廠與煉油設施。即使絕大多數炸彈都落到目標區外，但擊中石油產地的炸彈數量已足以造成嚴重破壞。<sup>185</sup>德國的航空燃油產量從三月的十八萬噸，降到六月的五萬四千噸，到了十月更只剩下兩萬一千噸。合成石油產量原本在四月是三十四萬八千噸，到了九月減少到兩萬六千噸。資本密集工廠無法輕易分散或隱匿，因此成為盟軍攻擊的主要目標，而之後盟軍又將目標擴大到用來生產軍火的基礎化學工廠。一九四四年，氮的產量減少了四分之三，甲醇減少五分之四，蘇打減少六成，硫酸減少百分之五十五。除了石油，合成橡膠也是一項關鍵的軍事資源，其產量也從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萬兩千噸減少到十一月的兩千噸。<sup>186</sup>持續轟炸使德國的關鍵資源庫存銳減，最終達到僅能持續作戰到一九四五年春天的程度。

除了轟炸德國主要的石油與化學工廠，艾森豪也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下達訓令，要求英美空軍集中轟炸交通運輸設施。哈里斯反對讓轟炸機司令部從事轟炸城市以外的任務，但他同意可以對擁有石油與鐵路目標的城市進行無差別轟炸。對指定目標進行轟炸，包括持續壓制德國空軍，這些行動最終絕大多數都由史巴茲下令完成。從經濟角度來看，一九四四年九月之後針對德國鐵路與運河系統進行攻擊，確實發揮了關鍵影響。盟軍幸運地炸斷科隆—穆爾海姆橋（Cologne-Mulheim bridge），堵塞了萊茵河水路。一九四四年的最後幾個月，連結魯爾與萊茵蘭工業區與德國中部的中德運河（Mittelland Canal）實際上也陷入癱瘓。到了十一月，德國鐵路的二十五萬節貨車車廂已有多達半數無法使用。煤與



鋼鐵無法送出魯爾區，只能堆放在鐵路末端等待運送；一九四四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一月間，鐵路貨運量減少將近一半。<sup>187</sup>德國因此分裂成幾個彼此無法連結的經濟區，軍事生產因為資源枯竭而萎縮。戰後訊問負責德國戰時生產的官員與商人時，他們表示運輸系統的崩潰是造成德國經濟危機的主因。相較之下，軍事高層則認為石油的損失才是導致軍事失敗的元凶，一如戈林所說：「沒有燃料就無法進行戰爭。」<sup>188</sup>

在戰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與規模較小的英國轟炸調查小組對經濟戰進行調查，得出的結果與訊問德國高層得到的回覆大致相同。調查團關注的是經濟戰的結局，而非政治或軍事結果。調查團並未刻意掩蓋以下事實：儘管歷經五年的轟炸，投下了一百三十萬噸的炸彈，德國的戰時生產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為止依然大幅擴張，戰鬥機產量增加為十三倍，戰車產量增加為五倍，重機槍產量增加為四倍。<sup>189</sup>換言之，德國武器生產成長最快速的那幾年，剛好也是盟軍轟炸最猛烈也最持續的時候。毋庸置疑的是，如果盟軍不進行轟炸，德國顯然可以生產更多武器，但這也顯示出轟炸只是影響戰時經濟表現的其中一項要素。美國

《總體報告》（*Overall Report*）的作者估計，盟軍的轟炸在一九四二年損害德國經濟百分之二點五的潛在產出，一九四三年是百分之九，一九四四年時美軍已能有效轟炸德國的工業目標，因此損害的程度達到百分之十七，不過這些統計數據也納入了與戰爭無關的貨物產出。與戰後訊問一樣，《總體報告》在結論中表示，轟炸石油生產設施與交通運輸網路是德國戰爭投入遭受重創的主因。然而調查團的石油報告也顯示，只有百分之三點四的炸彈實際命中石油設施與管線，百分之八十四的炸彈完全落在目標區外。<sup>190</sup>美軍調查團因此在報告上推測，英國的無差別轟炸「對於生產的影響不大」，而當英國轟炸調查小組於一年後公布報告時，也證明美方的說法大致正確。在研究二十一座工業城市後發現，

一九四二年的無差別轟炸只讓產出減少百分之零點五，一九四四年也只減少百分之一。研究更發現，與十四座未被轟炸的城市相比，被轟炸的城市產出提升的速度反而更快。<sup>191</sup>英國報告認為，美國集中轟炸交通運輸設施的戰略是正確選擇。無差別轟炸確實摧毀了德國四成的建築物密集區，導致超過三十五萬名男女老幼死亡，但即使是如此史無前例的破壞程度，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為止，盟軍仍無法阻止德國的戰時生產持續增長。

在把攻擊目標放在交通運輸與石油生產設施之前，盟軍的轟炸攻勢在經濟戰上一直未能取得重大成果，原因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釋。受徵召參與調查德國經濟工作的經濟學家卡爾多（Nicholas Kaldor）就表示，在戰時，現代工業經濟體具有一定程度的「緩衝」功能，可以吸收轟炸帶來的衝擊。在德國，這種緩衝功能部分來自於從歐洲占領區榨取資源與勞動力，部分來自於對戰時生產體系進行合理配置，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因應轟炸而將生產設施分散的作為。<sup>192</sup>另一位加入調查工作的美國經濟學家高伯瑞（J. K. Galbraith）則指出德國經濟「持續擴張且具有彈性」，而非如盟軍情報單位所言「靜態而易碎」。<sup>193</sup>一九四一年英國皇家空軍與經濟戰部曾經認為，轟炸將使德國工人士氣低落從而提高曠工率，但就連這項論點最終也未能實現。幾乎所有遭受嚴重轟炸的城市都能在三個月內恢復到空襲前產出的八成以上，六個月內即能完全恢復甚至增產。漢堡在一九四三年經歷風暴性大火之後，到了九月已有超過九成的工人返回工作崗位。<sup>194</sup>一九四四年，在盟軍轟炸最猛烈的時候，儘管在遭受重點轟炸的產業如潛艦與飛機生產的曠工率確實偏高，但空襲造成的曠工占產業工時的損失也不過僅百分之四點五。<sup>195</sup>此時德國勞動力已有三分之一是外籍的強制勞工，他們被迫在城市的斷垣殘壁與空襲中工作。德國戰時經濟的成本主要來自於空襲受害者的福

利給付與復原重建，以及為了從事民防、救難與重建工作而必須分派出去的勞動力。在盟軍開始對交通運輸系統進行空襲之前，針對工人與城市的轟炸對於德國戰時生產的提升產生多大阻礙，我們難以從統計數據上進行估算，而在一九四五年時也沒有任何單位嘗試做過這方面的調查。若從常理推斷，就算德國能把空襲後所投入的重建資源釋放出來，應該也不可能再大幅提升戰時產出。

對德國來說，損失更大的其實是軍事成本。一九四四年秋天，德國將八成的戰鬥機調往本土抵禦盟軍轟炸，轟炸機的產量也下降到只占戰鬥機數量的十分之一。戰鬥機集中部署本土的結果，導致德軍前線完全暴露在盟軍戰鬥機與轟炸機的攻擊之下。一九四四年，德國本土有五萬六千四百門防空砲，每個月可生產四千門；為了製造防空武器，必須占用二分之一的電子產業與三分之一的光學產業產能。<sup>196</sup>盟軍展開轟炸行動時，並未預期德國會移轉其他產業產能來生產防空武器，盟軍的轟炸因此在無意間減少了戰爭關鍵時期德軍前線所能取得的武器數量。



相較之下，針對日本的經濟戰主要發生在海上。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初，美國攻占馬里亞納群島，取得能讓重型轟炸機飛抵日本本土的基地。也就是說，直到太平洋戰爭的最後六個月，美國才得以採用以轟炸削弱日本戰時生產的戰略。海上封鎖是一種間接的經濟戰形式，包括切斷日本戰時產業需要的物質資源、日本陸海軍需要的石油以及日本平民需要的糧食。橘色戰爭計畫最初的構想就是進行海上封鎖，但海上封鎖背後的假定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涵蓋西太平洋。日本攻占菲律賓與美國在關島與威克島的基地之後，意謂著美國除非重新控制陸上基地與

港口，否則只能仰賴潛艦與海軍航空隊來進行海上封鎖。

日本高層深知日本極度仰賴進口，尤其需要南太平洋與東南亞這些征服地區的物資，因此日本必須有足夠的商船船團來因應未來可能的損失。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日本根據可用的船舶供給來擬定《物資動員計畫》，此後直到一九四五年，可用的船舶供給成為決定日本戰時經濟的關鍵。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頒布《戰時海運管理令》並依此成立船舶運營會，由該會負責管理日本所有船舶的徵用、移動與運作。<sup>197</sup>商船也成為戰時生產的優先項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可用的商船噸數是五百二十萬噸。透過擴建既有船塢、新建六座新的大型船塢以及將船舶的設計與建造標準化，日本得以在戰時額外建造三百五十萬噸的商船。<sup>198</sup>日本戰時經濟的主要問題在於，日本陸海軍需要徵用大量商船才能在從太平洋最北邊的阿留申群島到印度洋的緬甸這片遼闊的海域作戰。日軍要求商船必須優先運送軍隊與裝備，而軍方徵用商船的結果，就是導致戰爭期間可以用來運送糧食、原料與石油到日本本土的民間船隻竟不到兩百萬噸。一九四二年冬天，光是瓜達康納爾島這場重要戰役就動用了四十一萬噸的商船；一九四三年六月在緬甸的有限作戰，軍方也從民間產業動用了十六萬五千噸的貨物空間。<sup>199</sup>

美國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得以有效打擊日本脆弱的海外供給。一九四二年，美國投入海戰的潛艦少之又少，而且也未針對潛艦的使用制定清楚的戰略。美國的標準魚雷與德國魚雷遭遇的問題一樣，有將近兩年的時間，磁力與近炸引信始終無法正常運作。美國在戰爭期間總計發射了一萬四千七百四十八枚魚雷，擊沉了一千三百一十四艘商船與海軍艦艇，但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只有一百八十艘船被擊沉，總計七十二萬五千噸。<sup>200</sup>一九四三年，洛克伍德海軍中將（Charles Lockwood）下令擴建珍珠港與澳洲弗里曼圖（Freemantle）與布里斯班（Brisbane）的



港口基地，美國潛艦因此有能力騷擾日本帝國周邊的主要補給路線、獵殺日本的商船與油輪，行有餘力還能攻擊日本的海軍艦艇。同年，日本船隻被擊沉的總噸數來到一百八十萬噸，到了年底，日本被擊沉的船隻已經超過日本能夠補充的數量。日本進口物資噸數從一千九百五十萬噸減少到一千六百四十萬噸，處境雖然危險，但還不到關鍵的轉折點。破譯密碼取得的重要情報（又稱太平洋版的「極機密」）、雷達偵測技術的發展以及MK.XIV與MK. XVIII魚雷的研發成功（改良炸藥與更耐用的引信能更可靠地擊沉船隻），這些都讓潛艦作戰產生更大的效果。美國潛艦部隊的規模不大，但標準的美國一千五百噸潛艦航程卻高達一萬英里，攜帶的補給物資也能在海上航行六十天，這是橫越太平洋長期航程的兩項必要條件。這樣一支對日本海運造成重大損害的水下部隊，直到一九四四年初為止也不過只有七十五艘潛艦。戰爭期間，美國海軍一共只有兩百八十八艘潛艦服役，這個數字只是德國生產潛艦投入大西洋之戰的零頭。<sup>201</sup>

儘管日本可用的商船船團急遽減少（非軍事作戰用的貨船到了一九四三年底只剩一百五十萬噸），日本海軍卻不像西方同盟國那樣在大西洋投入大量護航艦隊來保護脆弱的海外貿易。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日本才研發出短波雷達，此前則因為欠缺這項技術而無法進行反潛戰。日本也遲遲未能發展出有效的深水炸彈戰術，或是無線電測向的戰術。美國潛艦最嚴重的損失，往往出現在襲擊軍事物資的補給船團的時候，因為日本會對這類船團進行最嚴密的護航。美國在一九四三年有十五艘潛艦被擊沉，一九四四年是十九艘。儘管如此，美軍並未停止對商船船團進行長期消耗戰，這是美軍在戰略上的首要目標。日本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決定對主要補給路線進行固定護航，但護航依然以海軍與陸軍的軍用補給物資為優先目標。日本設立的海上護衛隊，由第九〇一海軍航空隊

負責支援，然而日本護航的艦艇與飛機過於分散，難以達到反潛效果。日本進行反潛作戰的飛機絕大多數都在一九四四年被美國航空母艦艦載機擊落，日本四艘小型護航航空母艦也有三艘被擊沉。<sup>202</sup>一九四四年，美國派出飛機支援潛艦獵殺日本商船船團，日本無計可施，主要補給路線一條接一條遭到切斷。從長江運送鐵礦的船團被密布的水雷攔阻，日本進口的鐵礦因此減少了四分之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從南方進口的石油從每月七十萬噸減少到二十萬噸，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石油補給線更是完全中斷。<sup>203</sup>日本無論採取何種補救措施均無濟於事。即使不直接經由海路，而是先透過鐵路把物資運送到中國與朝鮮港口，這些物資最後還是要以海運方式運回日本本土，因此仍有遭受飛機與潛艦攻擊的危險。日本為了增加運輸噸數，也徵用了中國帆船與舢舨，還因為鋼鐵缺乏而建造了木造船隻。一九四四年，美國潛艦部隊已經沒有大型目標可以攻擊，於是轉而將目標放在日本用來運送軍用物資的大量小船上。<sup>204</sup>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除了美國海軍從空中與海上攻擊日本補給船團，陸軍航空軍的戰略轟炸機也於此時開始轟炸日本本土。陸軍航空軍希望直接摧毀日本本土工業來擴大封鎖效果，但初期波音B—29「超級堡壘」的空襲效果不彰，主要因為天氣條件出乎意料，日本上空有著強勁的噴射氣流，目標城市上方也總是籠罩著雲層與工業霧霾，因此幾乎不可能從空中精確投彈。此外，從歐洲使用的H2X雷達發展出來的標準雷達設備AN/APQ-13也無法提供清晰的目標地區影像。<sup>205</sup>與歐洲一樣，美軍的首要目標是摧毀飛機與航空發動機裝配廠，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沒有任何一個標定出來的目標被有效摧毀。實際的作戰狀況迫使美軍對首要目標進行調整，這點也跟一九四一年的英軍一樣。早在一九四三年，美國空軍作戰分析委員會已經建議對日本的六大工業城市進

行無差別轟炸，他們援引英國皇家空軍與英國經濟戰部的論點，認為工業工人及其所在地區是可以正當轟炸的經濟目標。一九四四年十月，這項建議再度提出並且成為美軍轟炸的重點。一九四五年春，美軍開始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其開端便是三月十日夜間東京的風暴性大火。<sup>206</sup>

只要天氣狀況許可，美軍就會對日本的飛機工廠進行精準轟炸，但由於經常遭遇不良天候，因此美軍絕大多數採取的還是無差別轟炸，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為止。與歐洲戰場不同，轟炸石油與交通運輸對日本的影響沒有那麼關鍵。從日本的經濟情報可以看出，日本的戰時生產分散在無數小工坊裡，而這些工坊全都隱藏在大城市的住宅區。美軍針對日本城市建築物的易燃特性，採取了區域式的燃燒彈攻擊，目的顯然是為了殺死或殺傷最多工人，摧毀其住房或生活設施，焚毀小工坊，希望大規模破壞能夠影響「眾多戰時工廠」的生產績效。<sup>207</sup>由於精準轟炸毫無效果，因此駐紮在馬里亞納群島的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司令李梅將軍決定解除禁令，允許美軍在夜間低空投擲燃燒彈。李梅日後為他的部隊造成的風暴性大火辯護，表示只有如此才能破解日本的工廠分散策略。李梅在回憶錄裡寫道：「你只要在轟炸過後到這些目標看看，就會發現許多小房子的廢墟，每個住家的斷垣殘壁都會露出一臺臺的鑽床。可見所有民眾都參與行動，生產飛機或軍火.....。」<sup>208</sup>李梅的說法最終無法獲得證實，作戰分析委員會與一九四五年夏天在太平洋戰場成立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日後都認為，日本的家庭工坊已經不是普遍的現象，因此不應該成為無差別轟炸的理由。<sup>209</sup>儘管如此，這種說法仍像是一種美化經濟戰的論調，使人忽略經濟戰其實就是一種針對平民與城市的致命武器。

與德國相比，要評估戰略轟炸對日本經濟的影響顯然較為困難，因

為日本的戰時生產與戰爭投入在一九四五年時就已經在海上封鎖下瀕臨崩潰，而美軍的海上封鎖早在日本投降前一年就已經達到巔峰。日本軍火生產的高峰是一九四四年九月，此後美軍開始進行轟炸，日本軍火產量便一路下滑，最後僅能靠著庫存物資與要求民眾節衣縮食來支撐戰局。儘管日本持續擴大工廠產能與增加工具機庫存，然而一旦海外進口物資枯竭，軍事生產便迅速衰退。軍火生產的指數（一九四一年是一百）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是三百三十二，到了一九四五年七月已驟降到一百五十六。<sup>210</sup>進口大宗商品在一九四四年跌到一千零十萬噸，只有一九四一年的一半，到了一九四五年更只剩下兩百七十萬噸。一九四五年第二季，日本可用商船只剩八十九萬噸，而且絕大多數都被封堵在日本海周邊港口，因為此時美國潛艦已經來到日本本土海域。美軍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負責支援海上封鎖，在日本海岸周圍布下一萬兩千枚水雷，這些水雷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八月間一共擊沉了兩百九十三艘船。總計日本失去了八百九十萬噸的商船，占了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可用商船的九成以上。<sup>211</sup>表6.3列出日本損失的商船噸數與對戰略進口的影響。

表6.3 日本海運與商品貿易，1941-1945年（單位：千公噸）<sup>212</sup>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商船 （容積總噸）	5,241	5,252	4,170	1,978	1,547
民用	1,513	2,260	1,545	896	594
建成的商船	210	260	769	1,699	503
損失的商船					



(容積總噸)	-	953	1,803	3,834	1,607
大宗進口商品	20,004	19,402	16,411	10,129	2,743
焦煤	6,459	6,388	5,181	2,635	548
鐵礦	6,309	4,700	4,298	2,153	341
鋁土礦	150	305	909	376	15
天然橡膠	67	31	42	31	18
稻米	2,232	2,269	1,135	783	151

商船噸數是每年十月到十二月噸數的平均，而1945年則是八月的數字。1945年的商品只包括一月到八月的數字。

隨著經濟戰經年累月的消耗，到了一九四五年春，日本的工業生產與糧食供給已捉襟見肘。日本經濟要仰賴剩餘的工業產出支撐到年底，幾乎成了一種奢求。

※ ※ ※

經濟戰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產生作用，而且效果還不一定顯著。一九四七年，英國官方的科學家蒂澤德爵士在評論英國的轟炸行動時直言：「你無法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sup>213</sup>事實上，現代大型工業經濟體面對攻擊時表現的彈性，遠超過戰前人們的預期。整體來說，戰前人們對於經濟戰總是有過於樂觀的評估，以為經濟戰能迅速產生決定性的效

果，特別是當人們發現主要交戰國幾乎未對經濟戰做出任何準備時，更會加深這種期待。德國的海空封鎖曾經預期只要不到一年就能瓦解英國的抵抗；而英美的空軍將領則希望轟炸可以在幾個月內破壞敵人的戰爭投入。實際上，若想让經濟戰取得最好的效果，就必須選擇最能影響戰局的特定目標，破壞這些目標才能對整體經濟產生最大的破壞。日本的商船船團，以及德國的石油與交通運輸設施均屬此類，但即便成功破壞這些設施，經濟戰造成的衝擊也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有感——當德國與日本在軍事前線面臨失敗時，幾乎沒有人直接聯想到這跟經濟資源的喪失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蘇聯並未嘗試進行經濟戰，部分原因在於地理的限制使蘇聯沒有機會進行，但最主要還是因為蘇聯的軍事準則強調要在戰場上擊敗敵人的武裝部隊。蘇聯仰賴量產與盟軍的援助來創造出致勝的經濟條件。即使是經濟戰，其過程與結果業往往由軍事衝突所決定。德國封鎖英國失敗，是因為德國潛艦被同盟國的海空軍擊敗；美國轟炸德國最終能獲得成功，是因為美國陸軍航空軍先擊敗且持續壓制了德國空軍；日本與義大利商船船團的毀滅，是軍艦、護航艦艇與潛艦數年來累積的無數小型戰鬥所造成的。經濟戰的前線，實際上也是軍事上的前線。

經濟戰讓雙方都付出了慘重代價。為了切斷敵方資源，己方也必須部署大量資源。儘管多數時候的轟炸對於敵方的經濟影響其實都相對有限甚或微不足道，但無論是德軍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轟炸英國，還是盟軍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轟炸德國，攻方都必須撥出相當比例的軍事產出進行轟炸，而轟炸也會迫使守方配置資源進行防空。英國轟炸機司令部有四萬七千兩百六十八人陣亡，美國陸軍航空軍轟炸德國也損失三萬零九十九人；英美的轟炸機部隊總共損失兩萬六千六百零六架飛機。<sup>214</sup>而為了瓦解敵國經濟與工人士氣進行的轟炸，一共奪走了

六十五萬名德日平民的性命。德國潛艦部隊在戰爭中遭到殲滅，每五名自願加入潛艦部隊的士兵就有超過四人喪命（被擊沉的潛艦達到驚人的七百八十一艘），而最終德國潛艦的封鎖行動也未能成功。商船船員雖然是平民，卻被當成軍事人員，他們的傷亡也十分慘重。兩萬九千一百八十名船員在英國的補給航線上被殺；日本商船船員死亡、失蹤與重傷總數也達到十一萬六千人。<sup>215</sup>儘管美國的潛艦戰獲得豐碩的戰果，但美國潛艦部隊的傷亡率也是各兵種中最高的：三千五百零一名官兵死亡，占了自願入伍者的百分之二十二。<sup>216</sup>這些都還沒算入殘骸散落在地面的數千架飛機，以及沉入海底的數百萬噸商船。切斷敵軍資源的戰略確實符合總體戰的構想，但最終看來，大規模量產與分享軍事資源才是更能確保勝利的經濟戰手段。



一名女性工人檢查美國波音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尾翼，美國在戰爭的最後兩年大量生產這類型的轟炸機，對日本進行遠距離轟炸。到了一九四四年，女性已占了美國飛機製造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圖源：*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

[1] 譯注：此處位於英國皇家空軍的防衛圈外。



CHAPTER 7

第七章

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

「道德與倫理問題在總體戰中毫無效力，除非其存亡能夠左右最終的勝利，否則根本沒有人在乎。在總體戰中，隨機應變取得勝利才是人類唯一的行為判準，而非道德。」

—— 惠特利（Dennis Wheatley），《總體戰》，一九四一年<sup>1</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國都認為，自己正在進行一場正當的戰爭。由於秉持著不同的道德觀，各國對戰爭都有自己的一套說法，也因此從未因參與戰爭而良心不安。將戰爭合理化，很快就演變成為正義而戰的信念。戰後文獻異口同聲地表示，侵略國主張自己為正義而戰純粹是一種虛假說詞。但如果不去承認交戰雙方其實都深信自己才是正確的那一方，我們就無法解釋侵略國的民眾為什麼要苦戰到最後。軸心國與同盟國都努力讓民眾相信，自己是基於良善理由而戰，而敵人則代表了邪惡，這類論述使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轉變成不同版本「文明」的殊死鬥爭，除非徹底分出勝負，否則鬥爭不會有結束的一天。至於那些基於倫理原則公然反對戰爭的人，永遠都是一小群遭到孤立的少數。

本章開頭引用了知名英國作家惠特利的戰時道德觀點，惠特利在一九四〇年受徵召加入英國軍事聯合計畫參謀小組，負責探討總體戰的性質及其道德意涵。在二戰衝突最激烈的時刻，所有交戰國幾乎都挪用了惠特利的觀點。惠特利寫道：「我們不僅必須清楚認識，還必須清楚表明，對每個交戰國來說，總體戰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完全勝利，就是完全毀滅。」在這種嚴酷條件下，惠特利認為，凡是能縮短戰爭與獲勝的行動，「無論『合法』與否」，在道德上都具有正當性。<sup>2</sup>二戰的絕對化傾向，在歷史上堪稱獨一無二。交戰雙方都宣示要拼戰到底，都認定這是民族存亡的關鍵。不計一切追求勝利所產生的道德凝聚力，使人們無止境地投入戰爭。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國家遭到徹底毀滅的威

脅只是一種誇飾，但毀滅的可能性依然產生了道德必要性，迫使民眾絕對服從指示投入戰爭，也讓軸心國與同盟國的極端民族狂熱得到合理化的依據。追求生存的戰爭理所當然成為了每個國家的正義之戰，完全扭曲了傳統上法律與倫理對正義之戰的描述：一場戰爭能否稱之為正義，取決於是否符合自然正義，而非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

## 戰爭正當化

當軸心國侵略者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打造帝國，在亞洲、非洲與歐洲攫取領土時，他們還沒有想到要用如此絕對化的觀點來定義總體戰。軸心國侵略者的野心是區域性的，而他們用來合理化征服的理由是，當今世界權力結構未能公平地讓軸心國分得應有的資源，特別是未能讓軸心國取得適當的領土。軸心國眼中的正義，源自於一項先驗性的假設，也就是全世界的民族都可以被分成兩類，一類適合建立帝國，因為這些民族具有種族與文化上的優越性，另一類只適合被殖民，近代歐洲擴張的歷史可以充分證明這點。軸心國認為，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秩序並不正當，因為它限制了前述主張；從一九三一年的滿洲到一九三九年的波蘭，一連串的帝國征服戰爭都是要試圖打破這種不義，使優秀的民族能夠建立帝國，更公平地取得世界的自然資源。<sup>3</sup>一九四〇年九月，軸心國簽訂《三國同盟條約》，讓軸心國成員能各自在歐洲、地中海與東亞建立新帝國秩序。軸心國宣稱，唯有當世界上每個民族（亦即每個「先進」民族）「取得其應得的空間」時，才有可能獲致永久和平。這也符合軸心國長期以來的看法，即認為新秩序必須建立在更堅實且更公正的國際基礎之上。<sup>4</sup>一名日本官員就曾經抱怨，憑什麼英國統治印度在道

德上毫無問題，日本統治中國在道德上就不可接受？

軸心國深知自己的侵略擴張政策不可能得到廣大國際社群的支持，因此其建立區域性帝國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猶豫不決與走一步算一步的狀況。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此時西方盟軍已經形成一種觀點，認為軸心國的區域性侵略是其征服世界計畫的一環。這一軸心國試圖征服全球的陰謀形象，深植同盟國的認知之中，成為戰後審判主要戰犯的基礎：戰後審判中，密謀發動侵略戰爭就成了這些戰犯的主要罪名。同盟國宣稱軸心國（特別是希特勒的德國）試圖「支配世界」，儘管這種說法從未有過清楚的定義，但同盟國卻以此為修辭工具，將侵略國帶來的威脅極大化。但無論同盟國如何定義，軸心國實際上並不存在一整套征服世界的陰謀計畫。事實上，軸心國對於世界局勢的看法與此完全相反。當軸心國建立區域性帝國的野心，終於在一九三七年的亞太與一九三九年的歐洲遭受挑戰時，軸心國便把這場戰爭的理由調整成「出於自衛」性質的總體戰，是為了對抗那些已經享有豐碩帝國成果、土地與資源的國家，對抗這些國家所展露的無情敵意與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德國把自己侵略波蘭所引發的英法對德宣戰，理解成是英法再次「圍堵」德國的嘗試，是為了壓制德國實現合法主張，亦即建立一個能與英法平起平坐的帝國。一名德國年輕人回憶說，一九三九年九月的德國人普遍認為，「我們遭到攻擊，我們必須保衛自己」，懷有陰謀的是西方國家，不是德國。<sup>5</sup>捍衛德國核心成為德國人民首要的道德義務，德國不義的侵略戰爭因此搖身一變成為維護民族存續的正義之戰。

這種道德翻轉出現在每一個軸心國國家。軸心國認為，真正心懷不軌的是同盟國，同盟國不僅限制軸心國正當的領土主張，甚至要將軸心國帝國核心的民族徹底消滅。墨索里尼一再強調，義大利被「金權國家」囚禁在地中海，這些國家彼此共謀不讓義大利有權取得文明國家應



有的「生存空間」（*lo spazio vitale*），使義大利無法建立新文明。於是為了建立帝國，就只能將戰爭正當化。<sup>6</sup>西方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把日本視為盟友，與日本合作將「不平等條約」加諸在中國身上，但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西方國家卻對日本存有強烈偏見，反對日本的亞洲野心，這使得日本對西方產生強烈的憎恨情緒。中日戰爭爆發後西方對中國的支持，使日本深信這是西方阻止日本占領滿洲後又一次陰謀否定日本建立帝國的正當主張。日本的軍事、政治與知識菁英普遍認為，所謂的「白禍」已威脅到日本「國體」的存續，使日本無法實現將所有亞洲民族置於日本帝國保護之下的神聖使命。政治人物永井柳太郎寫道，日本的道德義務就是「推翻白人對全世界的專制統治」。<sup>7</sup>雖然日本有著堅強的軍事與經濟理由來做出攻擊美國與大英帝國的決定，但這項決定背後其實還有一項更根本的動機，那就是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所說的，要維護日本傳承已久的天皇國家，反抗西方建立「小日本」與終結日本延續兩千六百年光榮帝國傳統的企圖。<sup>8</sup>珍珠港事件當天，日本政府公布《情報與宣傳政策綱要》，認定這場戰爭是西方「征服世界的自私欲望」所引發。<sup>9</sup>與德國一樣，日本民眾對總體戰的倫理責任也同樣奠基在對現實的翻轉上：日本對中國與太平洋地區的侵略就此被翻轉成反抗白人國家圍堵的自衛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詩人高村光太郎對於日本與西方的衝突成因進行歸納：

我們重視正義與生命，  
他們只看重利益，  
我們捍衛正義，  
他們為了利益而攻擊，  
他們趾高氣揚目中無人，

我們要讓大東亞成為一家。

一年後，《日本時報》提醒讀者，這場自衛戰爭「完全基於正義」。<sup>10</sup>

在德國，流行著一種最巧妙且最惡毒的陰謀論。希特勒與納粹高層相信，陰謀對德國人民發動戰爭的元凶就是「全世界的猶太人」。從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開始，希特勒就將對抗西方盟國的戰爭與對抗猶太人的戰爭結合在一起。西方盟國只是國際猶太人邪惡網路的工具，猶太人不僅陰謀破壞德國建立帝國的正當權利，還妄想消滅德意志民族。這種反猶幻想早在二戰前就已經深植人心。長久以來，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一直被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詮釋成是後方猶太失敗主義者與猶太煽動者刀刺在背導致。一九二〇年代初，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還只是小黨，但希特勒在演說中進一步擴大對猶太人的指控，他甚至預言這是「生死存亡的鬥爭」，是「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的真正戰爭。<sup>11</sup>

希特勒與其他反猶太主義者一貫地以世界層級的歷史鬥爭這樣的角度的來看待德國人與猶太人衝突。納粹對外宣傳，企圖「支配世界」的是猶太人而非德國人，想掀起世界大戰的是猶太人而非德國人。一九三六年，在二戰開始的前幾年，親衛隊領導人、日後主導猶太人大屠殺的希姆萊寫道，德國的大敵是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渴望支配世界，他們以毀滅為樂，想滅絕一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希姆萊警告親衛隊高階軍官，一旦戰爭爆發，猶太人將試圖毀滅德國，滅絕德國人，「只要會說德語，母親是德國人，就會成為猶太人滅絕的目標」。<sup>12</sup>猶太人想對德國開戰且陰謀掀起戰爭，以及猶太人計畫滅絕德意志民族或「雅利安民族」，這兩種說法充分顯示納粹黨人已經將戰爭與猶太人的罪惡相連結。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帝國議會發表總理週年演說

時提出一段惡名昭彰的預言，他表示若猶太人再度讓歐洲捲入戰爭（如傳言中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做的那樣），那麼結果將會是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歷史學家對於這句話的解讀相對謹慎，然而在往後的歲月裡，希特勒不斷老調重彈。他不只一次強調，戰爭的爆發與擴大，背後都有著「全世界猶太人」的惡意與刻意操弄。<sup>13</sup>

從二戰爆發以來，德國與他國之間的戰爭就與對抗「世界猶太人陰謀」的戰爭緊緊交織。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在對德國民眾的廣播演說中，希特勒指責「猶太民主國際敵人」是導致英法對德宣戰的元凶，認為是猶太人迫使西方國家參與這場它們原本不想參與的戰爭。<sup>14</sup>反猶太的期刊《世界新聞》（*Weltdienst*）甚至宣稱在當時德國銷售超過十五萬冊的偽書《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中，第七紀要曾經提到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書中內容已應驗在西方對德宣戰之上：「猶太人的戰爭計畫，還有什麼比這本書寫得更清楚？」<sup>15</sup>當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魏茨曼（Chaim Weizmann）於九月底公開呼籲支持英國時，《猶太人問題》（*Die Judenfrage*）期刊告訴讀者，他們在英國正面臨著「世界的頭號大敵，也就是跨國猶太人與渴望權力、充滿仇恨的世界猶太民族」。<sup>16</sup>德國人因此是在打一場二合一的自衛戰爭：對抗同盟國的戰爭與對抗隱藏猶太敵人的戰爭。英國會在法國戰敗後拒絕接受和談，也是因為邱吉爾受到猶太人的影響（總之一切都與猶太人有關）。德國攻擊蘇聯背後明明有紮實的經濟與領土動機，卻被說成是針對倫敦與莫斯科猶太陰謀而採取的先發制人，這種說法使德國政治宣傳部門得以結合資本主義金權政治與布爾什維克主義這兩種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把它們看作是同一種敵人。<sup>17</sup>

一九四一年八月公布的《大西洋憲章》開啟英美合作，同年十二月美國參戰，世界大戰的局勢終於成形，德國高層也公開表明這些發展正

是猶太人陰謀滅絕德國人的終極證據（如果他們還需要證據的話）。納粹將《德國必須滅亡》（*Germany Must Perish*）這本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傳入德國的著作視為美國高層與猶太人沆瀣一氣的鐵證，無視其作者考夫曼（Theodore Kaufman）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只是剛好在美國自費出版這本僅一百頁的英文著作。七月二十三日，納粹黨報刊登斗大的頭條：「猶太罪犯虐待狂的產物：羅斯福要讓德國人絕育！」八月十四日《大西洋憲章》公布後，納粹黨報的頭條寫著「羅斯福的目標是讓猶太人支配世界」。與此同時，希特勒下令德國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的大衛之星，這樣德國人才能看清楚隱藏在他們當中的敵人。<sup>18</sup>十二月十一日，希特勒在帝國議會演說並且向美國宣戰，反猶太的忠實追隨者理所當然認為這又是猶太人陰謀鼓動羅斯福參戰。珍珠港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德國報紙紛紛表示，亞洲的戰爭「是軍火販子與世界罪犯羅斯福掀起，羅斯福隨聲附和猶太人，數年來一直不停地與邱吉爾合力鼓吹戰爭。」<sup>19</sup>希特勒非但不認為美國參戰是日本侵略的結果，反而在帝國議會的演說中表示，這一切都是「罪大惡極的猶太人」造成。<sup>20</sup>美國的參戰促使德國政治宣傳部門定調，希特勒的新聞首長不只一次向新聞媒體下令，認定「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資本主義同樣屬於猶太世界的騙局，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sup>21</sup>

納粹當局持續用猶太世界陰謀論來解釋德國為何陷入一場自衛戰爭，絕對不是只為了鼓勵德國人把戰爭視為具正當性的生死存亡鬥爭，因為要達到這種效果其實不需要提到猶太人。在今日看來，這種反猶主張十分荒謬（對當時許多德國人來說恐怕也是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希特勒與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卻願意相信這種說法。當時有許多人真的相信，既然猶太人必須為一戰德國戰敗負責，那麼他們也應該要為二戰爆發負責。猶太人的陰謀成了一種強大的歷史隱喻，使希特勒及其黨



羽能將發起侵略戰爭的罪行推諉給猶太人。對於納粹黨的領袖與黨員來說，無論是英法宣戰、英國拒絕和談、必須與蘇聯開戰或美國參戰，這些出乎意料的事件轉折都可以用「猶太人的陰謀」來自圓其說。一九四四年秋天，納粹地方黨部發言人在流通的宣傳文件上表示：「瞭解猶太人，就可以瞭解這場戰爭的意義。」<sup>22</sup>一九四五年春天，當希特勒最後一次對鮑曼口授紀錄時，就曾表示都是因為猶太人才導致許多事情未能照他的期望發展：早在一九三三年，「猶太人就已經默默.....決定要對我們宣戰」；與英國和談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猶太人不允許，他們的僕人邱吉爾與羅斯福聯手阻止了和談」；羅斯福並不打算回應日本的攻擊，卻在「猶太人極力要求下，決定參戰消滅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最後還提到，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場衝突像如今這場戰爭一樣「充斥著猶太人，而且完全由猶太人獨力促成」。<sup>23</sup>即使戰後納粹黨人淪為階下囚，同盟國的訊問者以為他們應該已經放棄這套反猶說詞，但他們仍舊深信不疑。前德國勞動陣線領袖萊伊就認為，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反猶太指控，他希望盟軍瞭解為什麼他們特別針對猶太人：「我們納粹黨人把這場已經結束的鬥爭視為是一場只針對猶太人的戰爭。我們對抗的不是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或俄國人，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人只是猶太人的工具.....。」<sup>24</sup>

聲稱一切都是猶太人的陰謀，可以讓德國發起的戰爭看起來具有正當性。「雅利安民族」與猶太人的鬥爭是一場至死方休的鬥爭，每個德國人都負有全力投入的道德義務。這種說法也可以用來正當化一九四一年開始的種族滅絕行動。透過將猶太人描繪成與德國交戰的敵人，所有的猶太社群便在不知不覺中被軍事化成非正規的戰鬥人員，合理化納粹對他們的滅絕。藉由投射猶太人要消滅德國人這種「世界猶太人陰謀論」，各種公開宣稱要消滅、滅絕、毀滅或連根拔除猶太人的說詞似乎

就成了完全合理的回應，甚至是一種保衛種族存續的道德義舉。真實的戰爭與幻想中跟猶太人進行的戰爭，在希特勒與其黨羽的腦子裡創造出與種族滅絕的恐怖連結，使殺死猶太人的道德價值等同於殺死敵軍士兵。德國從流放與隔離猶太人轉變成集體屠殺猶太人，其中的近因仍有待討論，但希特勒等人認定戰爭是猶太人陰謀的產物，與日後希姆萊所說滅絕猶太人有著「鐵一般的理由」之間，似乎有著不證自明的關連。<sup>25</sup>無論納粹是基於什麼想法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猶太人陰謀這個解釋架構確實構成納粹政權解釋戰爭的核心前提。一九四三年五月，當絕大多數猶太人已經淪為大屠殺的受害者時，戈培爾在日記裡寫道：

「在元首所有預示未來的描述中，最真實的莫過於這句預言：如果猶太人成功掀起二戰，那麼結果將不是雅利安民族的滅絕，而是猶太人。」<sup>26</sup>

這種對世界猶太人陰謀的幻想，也影響了德國的盟友日本與義大利對「猶太人問題」的回應方式。日本沒有與猶太人社群長期接觸的經驗，因此日本高層對於猶太人問題大致上採取中立態度。海軍上校犬塚惟重與陸軍上校安江仙弘（《錫安長老會紀要》的日文譯者）這兩名熱心的反猶太主義者，在一九三〇年代奉命研究猶太人問題。儘管犬塚惟重曾經表示猶太人是「世界的癌細胞」，但他與安江仙弘並沒有發展出一套猶太人陰謀論，而且兩人對猶太人的觀點也未產生廣泛的影響。犬塚惟重與安江仙弘都希望利用兩萬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主要居住在上海）與猶太金融界建立聯繫，同時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與德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之後，日本不得不放棄利用猶太人的想法，同時官方對猶太難民的態度也變得有所保留，只是不至於像德國那麼嚴苛。日本在上海建立猶太人居住區收留猶太難民，雖然居住條件不盡理想，但遠比歐洲的猶太人居住區與集中營好得多，反猶太主義也從未成為日本戰

時宣傳的主題。<sup>27</sup>

義大利的狀況與日本不同。一九三八年，義大利在未受到任何德國壓力下自行制定了《反猶太人種族法》，為猶太人隔離區的嚴酷統治建立立法源。即使如此，義大利實際上得要等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墨索里尼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成立之後，法西斯黨的戰爭理由才明確表示反對猶太世界敵人，而其中的推手便是激進的反猶太前教士普雷齊奧西

（Giovanni Preziosi，他在一九二一年把《錫安長老會紀要》翻譯成義大利文）。一九四三年，在墨索里尼新共和國擬定的《維洛納宣言》

（Verona Manifesto）中，猶太人被特別指明為「敵對民族」。<sup>28</sup>宣傳海報也用反猶太形象將同盟國領袖描繪成世界猶太人的傀儡。法西斯報紙宣稱猶太人是「戰爭最大的支持者」，指控猶太人擔任間諜與從事恐怖主義，「追求瘋狂的支配世界計畫」。但義大利的宣傳缺乏系統，也未能像希特勒那樣將猶太人與陰謀論連結。義大利人更強調猶太人的「叛國」，以及因此導致墨索里尼在一九四三年夏天遭到推翻。對義大利人來說，猶太人與其說是某種國際威脅，不如說是國內威脅。<sup>29</sup>

同盟國不需要像德國一樣，把侵略戰爭佯裝成反抗外在威脅的自衛戰爭（無論這威脅是否來自種族）。同盟國理所當然地視自己是為正義而戰，只不過對英國與法國政府來說，要宣稱自己是基於自衛而戰本來就相對困難，畢竟是英法先對德國宣戰，而非德國對英法宣戰。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前，英法兩國並未直接受到德國侵略威脅。英法對於自衛的定義較為廣泛，宣稱兩國是為了防範第三帝國的領土野心與赤裸裸的暴力，因此要在德國擴張直接威脅到西方利益之前出面阻止。防衛波蘭並非英法的首要關切，因此直到波蘭被擊敗為止，英法都未認真考慮援助波蘭；儘管如此，英法為了波蘭對德國宣戰，已足以讓英法軍隊在前線與德國武裝部隊對抗，一旦希特勒轉守為攻，英法就可以用自衛的名

義與德國交戰。至於英法以外的同盟國，無論是主要還是次要盟國，無疑都是遭受侵略的受害者，因此確實是在進行一場自衛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史達林在紀念俄國革命的週年演說中表示：「戰爭有兩種：征服戰爭，也就是不義的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也就是正義的戰爭。」<sup>30</sup>保衛祖國不受法西斯侵略是蘇聯戰時宣傳主軸。蘇聯在戰爭期間不斷使用「偉大的衛國戰爭」一詞，這個詞是蘇聯官媒《真理報》（*Pravda*）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戰爭爆發隔天創造出來。<sup>31</sup>美國輿論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為止一直明顯區分成孤立主義與干涉主義兩大陣營，但珍珠港事件卻為美國民眾帶來極大的震撼，於是原本水火不容的政治勢力紛紛為了保衛美國不受羅斯福口中「強大狡詐企圖奴役人類的流氓」威脅而團結起來。<sup>32</sup>相較於英法，蘇聯與美國的例子確實比較合乎自衛而戰的義戰論傳統。

同盟國可以很輕易地為戰爭找到充分的道德理由。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廣播中對德宣戰，他在演說的最後清楚表明：「我們要對抗野蠻、惡意、不義、壓迫與迫害等邪惡的事物，而我相信邪不勝正。」<sup>33</sup>史達林在一九四一年的紀念演說中向聽眾表示，德國人的「道德已經淪喪」到「宛如野獸」。一九四二年，羅斯福把美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定義為是一場「將世界的積惡沉痾清除乾淨」的戰鬥。<sup>34</sup>同年，蔣介石在抗戰五週年演說中表示，中國的抗戰是「善與惡、是與非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這使得中國的「道德地位大為提高」。<sup>35</sup>在往後的衝突中，對抗道德淪喪的敵人始終是個用來支持戰爭的重要消極理由。敵人的邪惡充分表現在一九三〇年代軸心國不斷進行的武力擴張與高壓的威權主義：儘管西方國家對此鮮少採取實際行動，但依舊予以強烈譴責。當二戰爆發時，西方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大量的道德譴責也在全力動員下提供某種前後一貫的敘



事，把所有能消滅邪惡敵人的手段正當化。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旬，當英國戰時內閣針對是否轟炸德國境內可能造成平民傷亡的目標時，邱吉爾表示，由於德國惡貫滿盈，因此這場轟炸行動「完全具有正當性」。<sup>36</sup>對英國民眾來說，對德國敵人的憎恨使這場戰爭沾染上聖經般善惡鬥爭的色彩。和平主義作者米恩（A. A. Milne）在一九四〇年放棄反戰立場，因為他認為對抗希特勒就像「對抗魔鬼與敵基督一樣」。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是另一名放棄和平主義的人物，他認為歷史從未在正人君子面前呈現出「如此清晰的『邪惡』」。在<sup>37</sup>在美國，我們可以從導演卡普拉（Frank Capra）電影系列的第一部《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中看到某種半官方的敘事版本。電影開始的預告提到，這部紀錄片是影史上最驚人的流氓電影：「比你看過的恐怖片都要來得邪惡……歹毒……可怕。」<sup>38</sup>

相較於消極理由的隨手可得，同盟國參戰的積極理由就比較複雜一些。惠特利在《總體戰》提到，儘管人們相信英國的戰爭是正義的，但「可悲的是，人們普遍缺乏堅定的心態」來支持英國更積極地進行戰爭與達成和平目標。<sup>39</sup>在美國，由羅斯福總統親自任命掌管部分政府資訊的麥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sh），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希撰寫了一份備忘錄，試圖分析人們在什麼情況下能夠肯定戰爭：「一、這場戰爭被描述成一場十字軍戰爭嗎？二、如果是，十字軍是為什麼而戰？人們想得到什麼？秩序與安全嗎？世界和平嗎？或是更好的生活？三、你如何實現這一目標？」<sup>40</sup>到頭來，我們可以把支持這場衝突的積極理由概括成以下這句話：同盟國要拯救人類文明，使其免於遭受軸心國的野蠻與破壞。對於一九三九年的英國與法國來說，認為「英法是在捍衛文明價值」這項自以為是的主張，充分反映出兩國知識界與政治界菁英的憂慮，他們擔心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崩潰、政治威權與軍國主義造成的危

機，也許真的會危及西方所認知的文明。<sup>41</sup>希特勒與納粹主義成為西方焦慮的眾矢之的，因此一九三九年對德宣戰不只是為了恢復權力平衡，更是為了決定世界未來命運而進行的全面鬥爭。這些都是非常宏大的說詞。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英國國會議員尼科爾森在《英國為什麼參戰》（*Why Britain is at War*）中寫道：「我們的責任既高尚又恐怖。」因為英國不只是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還是「為了拯救人類」而戰至最後一刻。<sup>42</sup>同樣的說詞也在法國大量出現。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法國參議院說道，我們一方面要全力為法國奮戰，「另一方面也要為其他民族奮戰，特別是為了文明賴以維繫的高道德標準奮戰。」這場戰爭打從一開始就被視為一場正義之戰，如法國哲學家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在一九三九年所言，「我們是為了現實基礎而戰，一旦這個現實消失，我們的生活將無法被稱為人類生活。」<sup>43</sup>

儘管如此，英法兩國對這場文明保衛戰的表述時常顯得模糊不清。有些人批評，對於那些希望戰後生活更美好也更安定的人來說，政府的主張實在太過不切實際且過於模糊。政府很少清楚定義「文明」為何，因為西方各國往往假設大眾大概知道文明是什麼意思，不會在這方面吹毛求疵。絕大多數的官方說詞都強調要維護民主的生活方式與傳統自由的存續，但這當中也存在不同觀點，好比有些人把這場戰爭視為某種形式的十字軍，目標是挽救「基督教文明」，而另一批立場相反且較為世俗的人則認為自己是想保護現代文明。雖然邱吉爾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陷落後的著名演說中提到「基督教文明」一詞，但當他宣布「不列顛之役」即將來臨時，他也很少使用宗教詞彙來描述英國的戰爭目標。英法的基督教作家也批評挽救基督教文明的主張太過虛偽，因為基督教價值在西方民眾心中的地位早已明顯消退。<sup>44</sup>一九四五年二月，英國的限制轟炸委員會發行了《給所有基督徒的呼籲》（*Appeal Addressed to All*

Christians），表達「哀痛、廣泛與難以言喻的基督徒良知，反對為了追求勝利而採取無限制的暴力」。45

令人尷尬的是，英法這兩個同盟國（連同大英帝國的幾個白人自治領）在捍衛民主價值這一戰爭理由上出現明顯的雙重標準，因為它們實際上還控制了龐大殖民帝國，而且無論是在戰時還是戰後，兩國都無意在殖民地落實民主。在一九三九年宣戰的英法兩國，不只想捍衛民主的母國，其實也想保留廣大的殖民帝國。尼科爾森寫道，如果失去帝國，英國不僅將失去「權威、財富與屬地，還將失去獨立地位」。46邱吉爾在二戰期間始終堅信，大英帝國在戰後仍將長存。這樣的信念使得戰時英國始終處於既捍衛民主文明同時又維持帝國主義的某種緊張關係。英國一方面致力於捍衛西方民主與自身民眾的自由，另一方面卻拒絕給予殖民地臣民自由，而且還鎮壓任何爭取殖民地民主的抗爭。戰時宣傳強調帝國的團結一致，顯示殖民地與母國擁有共同的道德目標，然而這種說法卻掩蓋了不為人知的歷史現實。工黨的一份小冊子在一九四〇年批判道：「一旦同盟國勝利，就意謂著世上最龐大的帝國獲得了鞏固，這個帝國教導納粹使用集中營，這個帝國的監牢還曾關押了甘地與尼赫魯很長一段時間……。」47印度是戰時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二年秋天，甘地發起「退出印度」運動，抗議英國政府不願承諾在戰後讓印度自治，結果有數千名印度民族主義者被捕入獄，數百人在抗爭時遭軍警射殺死亡。非裔美國神學家瑟曼（Howard Thurman）認為，甘地讓英國「為自由而戰」的主張「成了道德笑話」。48

美國人起初並沒有那麼肯定這是不是一場自衛戰爭。但在羅斯福總統的觀點影響下，國際主義式的明確戰爭觀逐漸成形。根據羅斯福的看法，戰爭勝利將使世界各地的民眾能夠享有明確定義的自由。早在美國被迫參戰之前，羅斯福就已經對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抱道德熱忱。

一九四一年，羅斯福定義了他所認為的四大核心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四大自由成為美國戰時公共敘事在解釋美國為什麼參戰時的基本依據。美國藝術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畫了四幅畫來表現四大自由，而這四幅畫在戰時被大量印製。一九四三年，印製這四幅畫的小冊子總共發行了兩百五十萬冊，用來激勵民眾購買戰爭債券。<sup>49</sup>四大自由的其中兩項被寫入

《大西洋憲章》這份羅斯福在美國參戰前發表的第二份具有道德意涵的宣言。《大西洋憲章》是羅斯福與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到十二日在紐芬蘭普勒森夏灣召開第一次高峰會的成果。這份宣言的出現其實純屬意外，因為羅斯福與邱吉爾前來開會時，並沒有想到要擬定《大西洋憲章》，不過羅斯福確實希望能有這樣的文件。無論是邱吉爾還是羅斯福，都不是抱著無私的心態。對羅斯福來說，擬定宣言可以提高國內干預主義者的地位；對邱吉爾與英國政府來說，無論宣言的立場多麼含糊，至少能夠顯示美國公開支持同盟國的立場，此外也暗示美國未來很有可能參戰。<sup>50</sup>

《大西洋憲章》列出了八項宣言，這些宣言都以崇高的國際主義語言來闡述，大部分反映出羅斯福建立美好世界的期望。《大西洋憲章》的「共同原則」包括戰後裁軍、公海航行自由、戰勝國與戰敗國在經濟上都能獲得公平對待。最重要的是第三條宣言：「所有民族有權利選擇自己願意在其統治下生活的政府形式。」《大西洋憲章》並未說明在「納粹暴政」失敗後，這些宣言要如何獲得實現。<sup>51</sup>英國對於《大西洋憲章》反應冷淡，邱吉爾尤其不願意將《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適用在大英帝國。邱吉爾返國後對下議院表示，《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殖民帝國的有色種族」，只適用於歐洲的國家與民族。<sup>52</sup>史達林表示蘇聯會支持《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但這純粹是因為當時同盟國給予蘇聯不少



援助，蘇聯才做出善意回應。中國的蔣介石則認為《大西洋憲章》過於局限在歐洲，他主張應該要對「納粹暴政」做出擴大解釋，使其能將日本包括在內。一九四二年一月，蔣介石正式要求羅斯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殖民統治下的亞洲民族，卻得到令人失望的答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再度向羅斯福與邱吉爾提出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全世界的要求，但還是未能成功。<sup>53</sup>

儘管如此，羅斯福在美國參戰之後還是把《大西洋憲章》列為核心參考原則。這顯示美國期望建立一個更合乎道德的戰後秩序，不僅合乎美國利益，也能為全球帶來影響。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的《爐邊談話》中，羅斯福對美國聽眾表示，從他的觀點來看，《大西洋憲章》不僅適用於大西洋國家，也適用於全世界。他還主張把「四大自由」列為同盟國的原則，儘管其中只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與免於匱乏的自由被寫入《大西洋憲章》中。<sup>54</sup>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羅斯福終於在邱吉爾的勉強同意下，把同盟國改名為「聯合國」，並且邀請盟邦簽署宣言。《聯合國宣言》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公布，再次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即便有這項宣言，也不表示各國已經同意要在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因為羅斯福對此仍感到疑慮，畢竟過去曾有威爾遜籌建國際聯盟而美國卻拒絕加入的前車之鑑。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已經被國務院說服，認為建立一個提倡和平與人權的新國際組織最能符合美國的全球利益。<sup>55</sup>羅斯福的目標是確保同盟國能正式占據道德制高點，儘管要將同盟國內的民主國家、帝國主義國家與威權獨裁國家整合在一個共同宗旨之下確實存在著矛盾與曖昧。一九四三年一月，同盟國在卡薩布蘭加會議上提出的無條件投降要求，強化了《大西洋憲章》與《聯合國宣言》的倫理承諾，明白指出不允許跟道德淪喪的國家進行和談。早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羅斯福已經在年度國情咨文明確表達自己的信念：「善惡之

間絕對不可能成功妥協，過去不可能，未來也不可能。」這項宣示使同盟國在進行戰爭時可以更無道德顧慮。<sup>56</sup>

隨著戰況急轉直下，軸心國也開始從國際角度說明自身的戰爭理由。一九四三年後，德國的政治宣傳開始強調這場自衛戰爭是一場保護歐洲文明不受野蠻布爾什維克侵擾的戰爭。日本的政治宣傳則把日本描繪成亞洲的救世主，致力於抵禦白人壓迫者的回歸。面對即將戰敗的現實，德日的主張難以讓人信服。到了一九四五年，德日兩國仍努力拼戰到最後一刻，以避免它們眼中的民族滅絕真的發生。同盟國向公眾宣示的戰爭理由，最主要的優勢就在於採取了普世權利的說法，反觀軸心國的主張總是局限於保護特定民族或強調特定民族才有征服領土的權利。這項對比成為一九四五年在紐倫堡與一九四六年在東京設立的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爭罪的重要理由（義大利並未設立軍事法庭，因為到了一九四五年，義大利已經轉而與同盟國並肩作戰）。邱吉爾與幾位內閣大臣早已認定德國領導人是罪犯，主張只要確認犯人身分就可以就地正法。<sup>57</sup>然而美國與蘇聯政府希望有正式審判，這樣軸心國邪惡的戰時主張與同盟國的正義才能彰顯在世人面前。

在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中，起訴戰犯的主要罪名是發動侵略戰爭。由於發動戰爭在當時並不算正式違反國際法，盟軍檢察官因此援引一九二八年的《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act），該公約最終有六十二國簽署，二戰的主要參戰國全部包括在內。《非戰公約》要求簽署國放棄以戰爭做為政策工具，並且把戰爭視為「違反國際法」。<sup>58</sup>雖然《非戰公約》更像是一份道德宣言而非國際法工具，卻足以做為起訴德國與日本領導人的依據。美國檢察長傑克森（Robert Jackson）代表著未明確界定的「文明」，以故意對世人犯下惡性重大且情節嚴重的罪名起訴被告，由此揭開了紐倫堡審判的序幕。儘管勝利者的正義引發許多程

序與司法問題，但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的宗旨主要還是定義什麼是不義的戰爭與什麼是正義的戰爭。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紐倫堡審判揭櫫的原則獲得聯合國組織（前身是非正式的戰時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認可，並進一步制定了七項「紐倫堡原則」。時至二十一世紀，這些原則依然具有法律效力。<sup>59</sup>

## 並非如此「良善的戰爭」

軸心國瞭解，在絕大多數世人眼中，自己位居道德低地。儘管如此，軸心國也對同盟國自居於道德高地提出質疑。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德國戰敗前不久，希特勒曾輕蔑地批評美國自以為優越的主張極其「幼稚」，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道德大雜燴，看似高尚，其實融合了一堆荒謬原則與採用了所謂『基督科學教會』<sup>[1]</sup>的觀點」。<sup>60</sup>日本評論者在對比西方的民主說詞與殖民地壓迫及種族主義的現實之後得意地表示，英國對印度的帝國主義壓迫，與美國國內的各種私刑與種族暴動，充分顯示了英美的偽善。日本一份報紙表達出對美國「野蠻主義」的普遍看法：「如果世人知道美國人對美洲原住民、黑人與華人所做的殘暴行徑，那麼當他們看到美國人戴起文明的面具時只會大吃一驚……。」<sup>61</sup>同盟國的批評者也對於身處戰爭的非常時期，必須對同盟國道德說詞上的曖昧不明加以迴護不以為然。美國民權運動領袖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在戰後表示：「沒有歐洲基督教文明長期在世界各地迫害有色人種，就不會有納粹的暴行：集中營、大量虐殺、玷汙女性或虐童。」<sup>62</sup>同盟國堅持在戰後進行審判，將軸心國危害人類與破壞和平的罪行公諸於世，更是引發質疑：西方國家為什麼能跟野蠻壓迫的蘇聯獨

裁政權合作？畢竟蘇聯曾在一九一九年後與德國合作，對東歐的屯墾居民進行屠殺迫害。兩個資本主義強權與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同盟顯然相當突兀，而這也讓軸心國產生幻想，使軸心國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一直期望同盟國會出現分裂。

西方盟國與蘇聯的結盟固然令人意外，但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這三個大國在戰爭期間願意拋棄彼此在政治與道德上的歧見，團結一致對抗敵人。在德蘇戰爭爆發前，西方國家認為史達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德國不過是一丘之貉，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西方都把共產主義視為民主生活方式與民主價值的巨大威脅。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九月蘇聯入侵波蘭東部，十一月底蘇聯侵略芬蘭，這些都加強了德蘇兩國領袖同為獨裁者的形象。雖然英美一些進步派人士認同蘇聯的共產主義實驗，但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一個實施集體恐怖、對外侵略且與法西斯敵人合作的政權。蘇聯入侵芬蘭後，蘇聯駐倫敦大使麥斯基發現英國民眾與政界充斥著「狂熱的反蘇風潮」，他在日記裡寫道：

「到底誰是頭號敵人？是德國還是蘇聯？」<sup>63</sup>麥斯基記錄下英國國會針對芬蘭在一九四〇年三月被迫停戰進行激辯，國會議員「生氣……熱烈、激動且憤憤不平」。<sup>64</sup>芬蘭遭到入侵之事，不僅對羅斯福來說是個轉捩點，對許多親蘇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是。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九年底表示，史達林的蘇聯「跟世界其他獨裁政權一樣絕對獨裁」，他要求實施道德禁運，讓美國停止出口蘇聯需要的武器與裝備。羅斯福譴責蘇聯「對芬蘭的可怕蹂躪」。<sup>65</sup>美國再次短暫出現「紅色恐慌」，但一般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敵視主要集中在蘇聯體制與史達林個人身上。天主教華盛頓總主教表示，史達林「是人類史上最凶殘的殺人魔」。<sup>66</sup>國際社會提出道德譴責，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將蘇聯逐出國際聯盟。一九四〇年春天，倫敦與巴黎當局曾經認真考慮與蘇聯及其新結交的德國



盟友爆發戰爭的可能。羅斯福擔心德蘇若在歐洲獲勝，將會危害整個文明。<sup>67</sup>

如果西方世界認為蘇聯是道德淪喪，那麼蘇聯領導人對於境外資本主義世界的批評也同樣不留情面。蘇聯領導人身處於與西方自由價值涇渭分明的道德宇宙裡，其外表覆蓋了一層扭曲歷史現實的語言。早在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前，史達林早已在好幾年前就認定，出於歷史必然，資本主義國家未來必將試圖摧毀蘇聯的共產主義實驗。蘇聯領導人不理性地憂慮戰爭可能到來，深信資本主義才是和平的主要威脅，資產階級領袖則是造成不道德階級壓迫的推手。<sup>68</sup>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九三九年八月史達林與希特勒訂定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可以解釋自己的做法是為了破壞資產階級利用德國來侵略蘇聯的計畫，正如蘇聯向共產主義信徒所解釋的，蘇芬戰爭的成果是為了破壞英法反對德蘇同盟而挑起全球戰爭的計畫，因此是「蘇聯和平政策的勝利」。<sup>69</sup>蘇聯認為西線的戰爭是英法統治階級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莫斯科當局甚至告知英國共產黨，挑起戰爭的不是法西斯德國，而是「反蘇的英國及其龐大的殖民帝國，整個大英帝國就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對比之下，一九三九年九月「波蘭東部工人群眾的解放」則顯示蘇聯是「所有愛好和平力量的強大堡壘」。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生效期間，蘇聯一貫主張英國帝國主義是主要敵人，並且認為德國是和平的推手，只是在帝國主義國家逼迫下不得不採取防禦性攻擊。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史達林甚至考慮讓蘇聯加入軸心國在九月簽訂的《三國同盟條約》。<sup>70</sup>各地的共產黨都遵循蘇聯共產黨的路線。一九四一年一月，英國《工人日報》（*Daily Worker*）被英國政府勒令停業，而該報在前一天還發文祝賀各地群眾以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的方式「試圖擺脫帝國主義戰爭」。<sup>71</sup>

西方與蘇聯彼此的道德譴責，隨著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軸心國

入侵蘇聯而煙消雲散。在攻擊發生的數天後，麥斯基提到英國民眾對於這項變化感到困惑：「直到最近，『俄羅斯』都還被認為是德國的祕密盟友，幾乎可以說是英國的敵人。突然間，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俄羅斯成了英國的朋友。」<sup>72</sup>六月二十二日晚間，邱吉爾發表了著名的廣播演說，宣示將支持俄羅斯人民的鬥爭，不過他也警告，他不會更改長期以來他反對共產主義的一貫立場。對邱吉爾與西方絕大多數人來說，希特勒是世界最大的威脅。邱吉爾表示：「凡是反對納粹主義的人或國家，都將得到我們的支持。」羅斯福贊同邱吉爾的觀點，他認為德國是更立即且更為強大的威脅，蘇聯的侵略固然引發道德上的關切，但這份關切可以暫時放在一邊。在固定的廣播節目《爐邊談話》中，羅斯福向美國聽眾表示，美國與蘇聯之間沒有不可化解的歧異：「事實上，我們跟他〔史達林〕還有俄羅斯人民將會相處融洽。」<sup>73</sup>

在莫斯科，戰爭的爆發使蘇聯立即停止了反帝國資本主義活動。德國入侵當天，史達林告訴共產國際領袖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新路線是「擊敗法西斯主義」，國外的一切社會主義革命活動必須馬上停止。蘇聯高層希望將這場戰爭轉變成「抵禦法西斯野蠻主義的戰爭」，使蘇聯的鬥爭能獲得西方反法西斯主義浪潮的認同，從而得到西方的援助。<sup>74</sup>最終，西方與蘇聯都想利用「別西卜」

（Beelzebub）<sup>[2]</sup>來驅趕德國這個撒但。接下來的合作對雙方來說都不容易，但出於軍事必要，雙方於是握手言和，同時也期望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或許能找出共通點一起建立和平的戰後秩序。<sup>75</sup>然而，歐洲第二戰場遲遲未能開闢與《租借法案》的緩慢步調，都讓蘇聯與西方出現齟齬。西方駐蘇聯代表在許多小地方受到刁難，而且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蘇聯高層計畫在東歐引進共產國際式的「民主」，更不用說無論西方還是蘇聯都懷疑對方可能會跟希特勒和談，前述種種情況使得西方的善意

受到考驗。儘管如此，西方領導人仍舊對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侵略行徑，以及蘇聯對內對外的政治迫害，選擇性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別是在公開場合。因為此時英美蘇三國擁有一個共同的道德核心目標，那就是打敗德國。

英美民眾對蘇聯的支持，促使西方領導人將蘇聯視為夥伴與盟友。民眾的熱情有時出自官方的鼓吹，這點在西方與蘇聯皆然。英國碰到的棘手難題在於，如何為蘇聯的戰爭投入做宣傳，又要避免為蘇聯的意識形態背書。邱吉爾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演說提供了解決之道：他言必稱「俄羅斯」，絕口不提蘇聯。負責政治宣傳的英國政治作戰處奉命「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提到『俄羅斯政府』，不能提及『蘇聯政府』」，書面文字與口語說明都要強調俄羅斯的歷史、藝術與特色，避免談及俄羅斯政治。<sup>76</sup>美國戰爭情報局主要由自由派人士組成，對於蘇聯的共產主義實驗普遍抱持著正面觀感，戰爭情報局在美國民眾面前塑造對蘇聯的理想情感，此外又推出《北極星》（*The North Star*）、《反攻》（*Counter-Attack*）與《俄羅斯之歌》（*Song of Russia*）這些描述俄羅斯英雄主義的劇情片及大眾媒體來強化這種印象。一九四三年三月，《生活》雜誌告訴讀者，蘇聯人民「看起來像美國人，打扮像美國人，想事情的方式也像美國人」，並且將史達林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sup>77</sup>蘇聯也在西方進行宣傳，一方面營造對俄羅斯有利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把史達林塑造成致力於追求和平與民主的人物。由於西方民眾認識的蘇聯都是經過政治宣傳篩選過的現實，因此無論蘇聯提出什麼觀點民眾都毫不批判照單全收。當擔任英蘇團結委員會主席的切爾姆斯福德（Chelmsford）主教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倫敦召開會議時，他表示同盟國是「三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會議中另一名教士則提到「蘇聯政府的宗教成就」與蘇聯政權對「倫理生活」做出的重大貢獻。<sup>78</sup>

民眾的支持許多是自發的。對比英美只獲得有限的軍事成功，民眾對蘇聯的抵抗則是大加讚揚，就連史達林格勒的收復也被當成是西方的勝利一樣。一九四二年二月，麥斯基在日記裡寫道，人們「狂熱地推崇」紅軍，同年六月又寫下民眾「熱情地擁護蘇聯」；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後，所有人都熱烈慶祝，「全心全意」讚揚蘇聯。<sup>79</sup>一九四一年後，英國各地紛紛成立「友誼與援助」委員會；到了一九四四年，英國已經成立超過四百個類似團體，由英蘇團結委員會統一管理。據估計，這些組織代表的人數大約有三百四十五萬人，他們協助蘇聯投入戰爭，並且致力於與蘇聯親善。<sup>80</sup>在美國，蘇美友好委員會也扮演類似角色，鼓吹民眾的熱情，在全美各地募捐、巡迴展出與成立募款委員會。此時若是有人在英美反蘇，就會被視為是一種惡意行為，甚至會被認為是叛國。美國眾議院曾在眾議員戴斯（Martin Dies）的推動下，於一九三八年成立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主要任務是剷除共產黨的顛覆行動。該調查委員會在二戰期間仍持續運作，只是把目標轉移到同情法西斯主義的言論上，並且對這些言論提出帶有敵意的批評與指控。一九四一年後，反蘇在美國已不再是主流，此後直至戰結束都在政治上處於邊緣地位。<sup>81</sup>

儘管英美官方與非官方都對蘇聯及蘇聯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行動推崇備至，但談到共產主義時卻仍抱持著不信任或敵視的態度，尤其無法容忍國內出現共產主義運動。蘇聯意外成為英國的盟友之後，英國軍情五處依然密切監視英國共產黨的一舉一動。一九四三年，英國共產黨全國組織者史平浩（Douglas Springhall）被控竊取機密情報而被判刑七年。內政大臣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提醒邱吉爾，「目前民眾普遍支持」蘇聯對抗德國，因此更應該提高警覺，畢竟共產黨「沒有義務效忠『資本主義國家』」。 <sup>82</sup>其實就算莫里森不提，邱吉爾也懂得提防。一九四三年四月，麥斯基在日記裡記錄晚餐後的一段談話，邱吉爾先是讚



揚俄羅斯的奮勇作戰，接下來卻表達他對蘇聯體制的厭惡：「我討厭共產主義.....如果有人想在我國建立共產主義，我會像對付納粹一樣無情對付他。」<sup>83</sup>就連對蘇聯較為同情的工黨也出版了一本戰時小冊子《共產黨與二戰：虛偽與背叛歐洲工人全紀錄》（*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War: A Record of Hypocrisy and Treachery to the Workers of Europe*）。<sup>84</sup>在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成員很快增加到十萬人左右。而美國民眾雖然支持蘇聯，卻也擔心共產主義可能在國內造成威脅。美國共產黨希望民眾能認同他們是愛國者，於是在一九四四年宣布解散，重組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不過與英國一樣，美國國內對共產主義的支持愈來愈衰退。

到了戰爭最後一年，不管是西方還是蘇聯，原本戰前抱持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在道德上毫不相容的觀點又死灰復燃。對蘇聯高層而言，西方與蘇聯的同盟就像美國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團長迪恩所言，是一場「策略婚姻」。<sup>85</sup>莫斯科當局從不認為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在道德上有何差異，因為兩者最終都將因資本主義而墮落。隨著德國戰敗已近在咫尺，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表示，「接下來對抗資本主義就簡單多了。」雖然史達林希望戰後可以達成某種形式的和平共存，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他也開始認為擊敗法西斯國家之後，未來的衝突將會是「對抗資本主義國家」，這使得蘇聯又重回對峙的老路。<sup>86</sup>一九四六年秋天，史達林派出尼古拉·諾維科夫（Nikolai Novikov）擔任駐華府大使，負責評估美國的意圖。諾維科夫向莫斯科回報時表示，美國「正在準備未來對蘇聯的戰爭，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眼中，蘇聯是美國稱霸世界的主要障礙」。<sup>87</sup>

蘇聯不願在紅軍解放的東歐國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原本相信蘇聯有誠意推動民主和平的美國自由派與進步派人士深感不滿。左翼雜

誌《國家》（*The Nation*）的主編費歇爾（Louis Fischer）為了抗議同事把英美視為「魔鬼」，把史達林看成「天使長」，因此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憤而辭職。費歇爾為解釋自己的決定，還特別列了一份清單，上面洋洋灑灑寫下蘇聯違反《大西洋憲章》的各項原則。<sup>88</sup>雖然羅斯福曾提醒批評者，沒有任何國家簽署或批准《大西洋憲章》，但人們卻經常引用《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來抗議西方無條件與蘇聯合作。一九四四年，美國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埋怨《大西洋憲章》早已「被送進醫院截肢，國與國之間的自由早已蕩然無存」。曾經力促美蘇合作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也就是羅斯福的最後一任駐莫斯科大使，也在一九四五年時向總統提出警告，蘇聯計畫「建立極權主義，終結我們所知與尊敬的自由與民主」。幾個月後，他請求羅斯福的繼任者杜魯門能盡快採取行動，阻止蘇聯對歐洲的「野蠻入侵」。<sup>89</sup>在戰爭最後幾個月與戰後的最初幾個月，西方與蘇聯的蜜月期很快破滅，因為雙方都知道要維持這樁「策略婚姻」有多麼困難。

蘇聯違反和平與人權的事實眾所皆知，然而在建立聯合國組織以及對德國主要戰犯進行戰後審判期間，西方對此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蘇聯在這兩項事務上扮演著與其他戰時盟國同等重要的角色。蘇聯政府絕口不提戰前對波蘭與芬蘭的無端侵略，也不談對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羅馬尼亞北部省分的強制併吞。美國檢察官團隊明知德蘇祕密簽訂瓜分波蘭的條約（一九三九年，一名德國外交人員把條約內容轉交給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卻在審判期間於資料上潦草寫下「侵略」二字之後，就將其歸檔而不在法庭上使用。<sup>90</sup>蘇聯人員要求「陰謀發動侵略戰爭」的罪名只能適用於德國，而不能適用於其他國家，西方檢察官勉為其難地同意。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莫斯科派了特殊安全小組前往紐倫堡，確保審判時不會提及蘇聯犯下的國際罪行。由於蘇聯當局

對這類話題極其敏感，導致蘇聯檢察官在開審陳述時對德國侵略波蘭隻字不提，怕接下來出現難以收拾的反應。前蘇聯檢察總長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要求蘇聯律師在審判期間要大聲喝止被告，不讓他們提起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蘇聯與德國共謀攫取領土的往事。蘇芬戰爭僅僅被提到一次，就立刻引來蘇聯在場人士的噪音干擾。<sup>91</sup>

儘管蘇聯不情願，同盟國最後還是取得共識，決定以「危害人類罪」起訴德國被告，藉此告發納粹政權加諸於德國與非德國人民身上的恐怖行徑，包括流放、強制勞動與大屠殺，使其負起應有的責任。然而在審判時，西方不僅對史達林政權犯下違反人道的惡行視而不見，實際上也對於這些惡行所知甚少，因為無論在蘇聯還是蘇聯占領的東歐，無論在戰前還是戰爭結束之後，一道無法穿透的鐵幕已被拉上，凡是敵視蘇聯體制或無法與蘇聯體制相容的人，他們實際遭受的對待，外界均無從得知。除了有系統的種族滅絕，蘇聯政權幾乎犯下紐倫堡審判提到的所有危害人類罪行：大量流放進行強制勞動與大規模送進集中營，且集中營的運作紀錄充斥著虐待與死亡，其慘狀足以與德意志第三帝國最糟糕的集中營相提並論。蘇聯毫不容忍所有的宗教形式，毫無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也毫不尊重法治。<sup>92</sup>就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對於戰敗的敵人設立集中營提出嚴厲譴責時，蘇聯的安全體制卻在德國的蘇聯占領區裡，在易北河畔的穆爾貝爾格（Mühlberg）的前德國集中營設立對外隔離的設施，同時未經審判就把十二萬兩千名德國囚犯送到這裡關押，其中有四萬三千人死亡或被殺。<sup>93</sup>曾經待過德國與蘇聯集中營的巴卡尼切夫（Anatoli Bakanichev）在私人回憶錄中寫道，德國與蘇聯集中營的「差異可說是微乎其微」。<sup>94</sup>

在蘇聯的暴行中，只有一個例子是西方完全可以確認的，那就是一九四〇年四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在卡廷（Katyn）森林屠殺

波蘭軍官之事。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三年，德國政治宣傳部門就已經在這裡發現了亂葬崗。然而當時人們卻不知道，參與紐倫堡審判的蘇聯檢察長魯堅科（Roman Rudenko），就是當初被史達林派往哈爾科夫監督屠殺波蘭軍官的人之一，因為當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無法狠下心來犯下這種罪行。蘇聯當局堅稱這場屠殺是德國所為，但英國政府幾乎可以確定是自己的盟友犯下這項罪行，但英方也認為必須在政治上審慎，不宜再追問下去（事實上，直到一九九〇年蘇聯解體後，犯罪的鐵證才浮上檯面）。西方之所以對蘇聯危害人類罪或其他戰爭罪行的證據保持緘默，主要是不想讓德國被告利用這一點在戰時盟友之間挑撥離間。即使到了一九四八年，西方與蘇聯的分裂已經成形、冷戰無可避免，蘇聯高層依然恬不知恥地自稱是世上唯一具有人道精神的政治體制。一九四八年，各國在巴黎起草聯合國《人權宣言》時，前蘇聯檢察總長維辛斯基大言不慚地表示，對蘇聯而言，有沒有這份宣言並不重要，因為共產主義體制是人民解放的主要推手，在共產主義體制下，「人們早已擁有人權」。<sup>95</sup>

蘇聯在領土侵略與集體鎮壓上的無情殘酷是西方盟國無法比擬的，而其顛倒是非的能力、甚至認為自己在道德上完全站得住腳的說詞，也遠遠超越西方盟國的底線。但就算西方盟國比蘇聯更具道德正當性，軸心國依舊能找到材料來嘲諷西方盟國完全不符合自己營造的民主形象。種族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此事暴露出西方道德立場的巨大斷層，特別是美國，因為相較於英國，美國更強調要捍衛民主自由。美國主要的種族問題是長時間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與針對少數非裔美國人的暴力。未能落實民權，加上美國南方白人社群支持種族隔離，這些都是羅斯福政府在戰前十年規避的問題，尤其總統需要國會裡南方民主黨員的支持，而偏偏這些人堅決不向少數黑人讓步。二戰爆發與隨之而來的全民團結



與捍衛自由的號召，在黑人領袖眼中成了一個表達對不平等現狀的挫折感，以及期盼捍衛「民主」的戰爭能讓他們獲得自由的機會。樂觀的杜波伊斯一度宣布，二戰是一場爭取「種族平等的戰爭」。<sup>96</sup>

一九四二年一月，密蘇里州賽克斯頓市（Sikeston）發生戰時第一起私刑事件，三百名圍觀群眾看著一名黑人嫌犯被淋上五加侖的汽油，然後被活活燒死。同月，《匹茲堡信使報》（*Pittsburgh Courier*）刊登了年輕黑人湯普森（James Thompson）的一封信。湯姆森在一間食堂工作，他呼籲非裔美國人為「代表雙重勝利的雙V」而戰。他解釋說，第一個V指打敗美國的外敵，「第二個V指打敗我們在國內的敵人。」<sup>97</sup>對於許多反對非裔美國人淪為二等公民的人來說（這些人包括了白人與黑人），這場捍衛民主對抗獨裁政權的戰爭如果未能正視民主理想尚未落實到非白人少數族群的問題，那麼這場戰爭將只是一個空殼子。一九四二年九月，詩人沃克（Rhoza Walker）寫道：「我相信民主，如此之深 / 因此我希望美國每一個人 / 都能擁有一些民主 / 黑人.....他們應該擁有一些民主。」<sup>98</sup>當羅斯福政府宣示恪守「四大自由」與實現《大西洋憲章》的承諾時，黑人社運組織者很快就發現，只要將德國種族主義與美國國內黑人的遭遇並陳，就會產生相當刺眼的對比。聖路易斯市發行的一本戰時民權小冊子，題目叫做《讓我們阻止國內即將出現的希特勒，讓我們如宣傳所說實踐民主》，書中傳達的情感獲得民權運動的廣泛回響。<sup>99</sup>當非裔美國人報紙進行民調，調查非裔美國人是否認同羅斯福及其政府揭櫫的高尚情感時，高達百分之八十二的非裔美國人表示不認同。<sup>100</sup>二戰使美國官方的戰時宣傳與數百萬非裔美國人的現實生活產生強烈的道德落差，也讓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大為興盛。二戰期間，黑人辦的報紙銷售量增加了四成。由懷特（Walter White）領導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會員人數在戰時增加了十倍。倫道夫（A. Philip

Randolph) 在一九四一年發起「向華府進軍運動」，即便該運動在立場上較為激進，但依然在全國各地開枝散葉。<sup>101</sup>要求平等的呼聲早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出現，但戰爭提供了一個適當的環境，使黑人能更公開地挑戰白人的種族偏見。

黑人民權運動的成長帶來了複雜的影響。隨著黑人抗議的風潮湧現，有些白人卻更堅定其不妥協的立場。南方的國會議員認為，黑人要求的民權與經濟平等將為美國帶來災難，「找不到比這更嚴重的威脅，」一名議員說道。<sup>102</sup>在南方各州，黑人選民無法投票，農村的黑人勞動力也被綑綁在白人的農場上。在某些地區，黑人無論到哪裡都必須佩戴名牌，上面寫著雇主姓名與他們的工作時間，如果不佩戴就有可能被逮捕。這種「不工作就坐牢」的文化，正是為了壓制黑人的氣燄，使他們乖乖聽話。<sup>103</sup>對許多北方非裔美國人來說，戰時被徵召進入軍隊，或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國防產業工作，使他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嚴重的隔離與歧視。當雇主屈服於市場的勞動需求時，黑人工人無論能力高低，普遍還是只能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軍中廣泛施行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新兵被給予的生活條件較差，往往被派到食堂工作或擔任工人。在南方部分地區，黑人如果穿著軍服離營，甚至有遭到私刑的危險。一名士兵投書《匹茲堡信使報》抱怨說：「如果真有奴隸制度，那麼現在就是。」這名士兵所在的營區，黑人新兵必須睡在地板上，而且只能用水桶上廁所。<sup>104</sup>黑人士兵的差別待遇又因為管理部門的偏見而雪上加霜。另一名深感幻滅的新兵寫道，美國陸軍「跟希特勒的陸軍差不多，幹的都是納粹的事」。<sup>105</sup>一九四四年，戰爭情報局印製了一份機密手冊給白人軍官，名稱為〈黑人的某些特質〉，其部分內容如下：「喜歡社交、性格外向〔原文如此〕……脾氣暴躁……精神不集中、記性不好與健忘……不理性、仰賴本能與感情用事……敏銳的節奏感……含糊其

詞.....容易說謊、經常說謊、天生愛說謊。」<sup>106</sup>一名黑人士兵針對紐約市哈林區發生的種族暴力事件從歐洲戰場寫信回國，表示黑人士兵們時常自問：「我們究竟為何而戰？」<sup>107</sup>

戰爭暴露的矛盾，最終引發了種族暴力的浪潮。在戰爭初期，白人工人針對愈來愈多黑人獲得僱用發起所謂的「仇恨罷工」。白人種族隔離分子進行暴力對抗，以保護白人鄰里或學校。當戰時勞動力移動使上百萬黑人移往北部與西部城市時，種族之間的緊張便開始升溫，終於在一九四三年達到暴力的巔峰。一九四三年，估計全美四十七座城市發生了兩百四十二起種族對立事件。<sup>108</sup>暴亂與街頭鬥毆在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造船廠、賓夕凡尼亞州的切斯特港、密西西比州的森特維爾、洛杉磯與紐澤西州的紐華克發生。最致命的暴力衝突出現在一九四三年夏天，第一起發生於底特律，然後是紐約哈林區。底特律的暴力事件在六月二十日爆發，起因是白人工人對於黑人新勞工源源不斷地流入深感不滿，長久累積之下終於造成衝突。在秩序恢復之前，該起暴亂已導致三十七人死亡（其中二十五名是黑人）與七百人受傷。八月一日，紐約哈林區發生暴動，造成六人死亡，一千四百五十間商店被焚毀或搶劫一空。羅斯福總統接受建議不針對種族議題發表公開言論，一方面是顧慮南方白人的輿論，另一方面是擔心一旦承認美國國內確實存在種族歧視，恐怕會加劇種族緊張。政府採取的補救做法是，在潛在的危機點進行情報蒐集以預測可能的暴力事件，各地必須設法緩解社會衝突，避免暴動影響戰爭投入。<sup>109</sup>

羅斯福低調回應不斷加劇的種族緊張，反映了他對民權與種族平等這類更大議題的基本態度。國會裡南方民主黨員的支持對於他的政治地位至關重要，羅斯福因此不願冒著喪失南方民主黨員支持的危險提出迎合黑人輿論的主張。戰前，羅斯福曾在民權領袖遊說下（或者如白宮發

言人厄里〔Stephen Early〕所言，在「有色民眾不斷咆哮之後」），於一九四一年做出讓步，發布了第八八〇二號行政命令，創設公平就業措施委員會，試圖在國防產業消除種族歧視問題。戰時，黑人在國防產業的就業比例確實從一九四二年初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峰值百分之八，但黑人家戶平均所得依然只有白人家戶的四成到六成。一九四二年，新成立的公平就業措施委員會合併到戰爭人力委員會之中，限制了該委員會對抗種族不平等的權限。在南方，政府提供補助與訓練計畫來提升白人農場的生產力，但另一方面卻對戰時改革造成黑人工人遭受更嚴格的掌控之事視若無睹。<sup>110</sup>總統對外高喊自由，對內卻不試圖解決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面對這樣的矛盾，羅斯福依然選擇沉默。

羅斯福這種矛盾的種族主義觀點，也同樣出現在他對大英帝國的看法上。羅斯福私底下認為殖民帝國已經道德破產，日後必須交由國際託管或允許殖民地獨立，但對外卻謹慎表達自身的立場，以免危及戰時的同盟關係。當大英帝國於一九四二年逮捕甘地與參與「退出印度」運動的印度人時，羅斯福並未公開譴責這項決定或伴隨而來的暴力行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祕書懷特取消原定為戰爭情報局發表的演說以示抗議，還發了一封電報給羅斯福，把民權運動與全世界為了從西方帝國主義解放而進行的鬥爭連結起來：「這樣下去，即使聯合國最終獲得勝利，太平洋地區十億的棕色人種與黃色人種仍將堅信印度領導人與印度民族遭受的無情對待是白人對有色人種典型會做的事。」<sup>111</sup>

隨著戰爭持續，美國國內爭取民權的運動與全球各地尋求殖民地解放的運動也連結得愈加緊密。懷特於一九四四年造訪北非與歐洲戰場之後，寫下了回憶錄《起風》（*A Rising Wind*），書中提到：「美國黑人的鬥爭乃是印度、中國、緬甸、非洲、菲律賓、馬來亞、西印度群島與南美洲反抗帝國主義與剝削的一環。」<sup>112</sup>一九四五年五月，當各國代



表於舊金山開會同意成立聯合國組織時，黑人遊說團體試圖讓美國代表團納入一段人權陳述，不僅要支持非裔美國人的權利，還要給予「殖民地與從屬民族」權利，但遊說團體無法在種族歧視上面取得正面回應。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美國代表之一，他擔心人權會凸顯「南方的黑人問題」。<sup>113</sup>一九四八年，當聯合國於巴黎召開會議起草《人權宣言》時，人權委員會主席暨羅斯福的遺孀愛蓮娜（Eleanor）拒絕接受杜波伊斯的請願書〈向世人呼籲〉（An Appeal to the World），因為杜波伊斯把美國黑人遭受的壓迫與人權議程直接連結可能引發政治爭議。主要國家代表團試圖確保普世權利宣言不會衍生出對於明顯侵害這些權利的國家有進行干涉的權利。<sup>114</sup>儘管二戰是為了捍衛民主而戰，但到了一九四五年，美國與帝國主義國家依然沒有放棄西方觀點的種族歧視。

如果同盟國國內的種族主義與他們對外的戰爭宣傳自相矛盾，那麼他們在面對敵國的種族主義（特別是反猶太主義）時更是只能做出更加模糊的回應。今日民眾對於二戰的記憶往往與猶太人大屠殺緊密結合，這是因為我們一直認為盟軍之所以向德國及其歐洲軸心國盟邦開戰，主要是為了阻止種族滅絕與解放殘存的猶太人。然而這絕大部分都是幻想。這場戰爭其實不是為了拯救歐洲猶太人，而三個主要同盟國政府也擔心民眾會知道這一點。解放猶太人只是附帶結果，同盟國真正的戰爭目標是將軸心國趕出他們征服的國家，並且恢復所有被征服與受害國家的主權。同盟國對於猶太人的態度十分多變，有時漠不關心，有時小心審慎，有時模稜兩可，有時道德上受到質疑。

對於所謂的「猶太人問題」，同盟國的態度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牽動。首先是各國早在戰前就已經對德國反猶太主義的挑戰做出回應，其次是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與猶太建國的主張對各國的影響。蘇聯的猶太

人政策特別敵視猶太復國主義，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的主張挑戰了猶太人對蘇聯體制的忠誠。史達林深信蘇聯猶太人無法同化成新蘇聯的一部分，在他看來，猶太人總想「自成一格」的傾向令他深惡痛絕。猶太復國主義者遭到蘇聯當局迫害並且轉入地下。一九三〇年代初，蘇聯猶太人移居國外的數量開始減少，一九三四年之後更是被禁止移居國外。蘇聯猶太工人不許休假過安息日，數百座猶太會堂也遭到關閉。<sup>115</sup>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蘇聯占領波蘭東部與波羅的海國家，有兩百萬名猶太人被納入蘇聯統治，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因此遭受破壞與摧殘。在這個地區，估計有二十五萬名猶太人被流放到蘇聯內陸，數千名拉比與猶太領袖被逮捕送進集中營，猶太會堂不是遭關閉就是被挪為他用，商業全收歸國有，猶太人不許公開進行宗教與文化儀式。也就是說，早在一九四一年德國人抵達之前，蘇聯就已經將這個地區的猶太人小城鎮的傳統生活破壞殆盡。<sup>116</sup>

在英美，猶太人問題引發憂慮，人們擔心迫害造成的大量猶太移民將帶來嚴重影響，而英國則特別關切猶太移民會對英國在中東的國際聯盟託管地造成負擔，使已經不穩定的局面雪上加霜。雖然英美兩國並未公然或明顯反對猶太人，但兩國政府都擔心無限制地接納猶太人將帶來社會或政治上的負面後果，因此對於猶太移民始終有所保留。儘管如此，一九三〇年代已有大量猶太移民逃離德國，或是離開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被德國兼併的地區。總計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猶太移民已將近三十六萬人，其中有五萬七千人在美國找到避難所，五萬三千人前往英國的巴勒斯坦託管地，五萬人抵達不列顛群島。此外也包括大量歐洲猶太移民，他們原本居住的國家在一九三〇年代也開始出現嚴重的反猶太人風潮。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總數是二十一萬五千兩百三十二人，當地猶太人數量的增加了一

倍。<sup>117</sup>猶太人大量流入的結果，深刻影響了英國政府對猶太難民問題的立場。一九三六年，新一波猶太移民從歐洲抵達巴勒斯坦，引發阿拉伯人的大規模叛亂。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阿拉伯叛亂導致當地數量不多的英國陸軍左支右絀，也威脅英國在中東的戰略地位。英國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做出裁定，政府在五月公布的白皮書上表示，未來五年要將猶太移民人數限制在七萬五千人以下，額滿之後除非阿拉伯社群同意，否則不許接受猶太移民，然而這一點根本無法做到。為了懲罰大規模非法移民，英國下令最初六個月不許猶太人入境。一九三九年，合法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只有一萬六千人，但實際上偷偷入境的猶太人多達一萬一千人。英國政府公布的文件更是在猶太人的傷口上灑鹽：文件明確否定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可能，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希望因此落空。<sup>118</sup>一九三九年春天出爐的方針決定了英國的戰時政策，災難性地關閉了猶太難民最重要的逃亡路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屠殺事件發生後，德國的反猶太主義的歧視與迫害來到新的高峰，但也就在此時，英國卻削減了猶太人移民英國的名額。一些沒有父母陪伴的兒童獲准依照所謂的「難民兒童運動」來到英國，到了一九三九年七月已有七千七百名猶太兒童抵達英國，但成年的猶太難民卻難以合乎英國的移民許可標準，因此無法拿到入境需要的簽證。英國當局願意接受的是有猶太人組織支持且具有一技之長或能填補英國國內勞動缺口的猶太移民，但英國內政部更希望猶太人能夠承諾在他們順利入境英國之後能繼續移往他國居住。隨著戰爭愈來愈迫近，猶太人移民英國的機會也愈來愈少。整個西方世界都對猶太人的移民人數定下配額與限制。在美國，移民限制並非直接針對猶太人，而是針對特定國家的公民給予移民配額，但這意謂著漫長的簽證等待期，有時可以長達兩年，而且一旦特定國家的移民配額

額滿就不再發給簽證。對於歐洲猶太人面臨的危機，美國政府絲毫沒有讓步的意思。水晶之夜後，當羅斯福總統被要求放寬猶太人移民美國的門檻時，他只是評論道：「時機尚未成熟。」羅斯福一向重視民調，而偏偏民調顯示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國人認為猶太人「不受歡迎」，而百分之七十二的美國人反對讓更多的猶太人進入美國。<sup>119</sup>一九三九年一月，一項所謂的《兒童法案》（Children's Bill）提交國會審議，希望在兩年間允許兩萬名難民兒童來美國，但這項法案並未引起公眾回響或總統支持，最終在委員會階段便告流產。民調再次顯示，民眾強烈反對接受猶太移民。

英國不想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絕望難民潮，反而提出將猶太人送往英國的南美殖民地英屬蓋亞那的方案（一名外交部官員坦言，這是「為了讓英國政府在面對歐洲猶太人時，良心上能過得去」），但最後出於擔心當地人的反對而作罷。在美國，有人提議在阿拉斯加州設立猶太人居住區，但這項提案遭到羅斯福否決，因為他擔心這會形成一個國中之國。<sup>120</sup>英美兩國都不希望後方出現一個數量龐大的猶太人族群，儘管有充足的道德理由支持也不願這麼做。羅斯福的駐莫斯科大使史泰恩哈特（Laurence Steinhardt）在一九四〇年注意到難民的壓力，他總結美國政府面臨的選擇：「我認為，雖然人道主義與美國的福祉幾乎沒有發生衝突的可能，然而一旦要做選擇，後者顯然更為重要。」<sup>121</sup>

戰爭的迫近使維護本國利益的想法更加堅定。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後，英國不再允許德國或德國歐洲占領區的猶太人進入英國。英國外交部官員表示：「猶太人在德國的狀況如何，對我們與法國來說已無關緊要。」<sup>122</sup>在美國，國會的反對使得已經緊縮的移民配額完全沒有修改的可能。德國當局原本想盡可能驅逐猶太人，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希姆萊終於決定禁止猶太人離開德國，此時他已想滅絕所有猶太



人。在需要逃離德國的猶太人當中，只有極少數能幸運逃往西方。巴勒斯坦依然允許一定配額的猶太人入境，然而逃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始終未能達到額度，因為沒有人願意協助猶太人逃離歐洲。前後約三十九個月的時間，猶太人其實有機會離開德國及其新建立的帝國，但英國當局為了減少非法的猶太移民入境，竟然擱置猶太人的申請程序以示懲罰，導致足足有十五個月的時間，猶太人完全無法申請入境。一九四〇年，猶太人移居美國的人數達到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五人，但有超過數千人因為額度已滿而在歐洲苦苦等候。一九四〇年，好不容易抵達英國的猶太人卻遭到英國政府的羞辱，由於「第五縱隊」在英國國內引發恐慌，因此這些猶太難民絕大多數都被當成敵國人民而被監禁起來。雖然絕大多數難民事後都獲得釋放，但他們一開始在英國、加拿大與澳洲的臨時監禁營裡卻遭受到了苛待與侮辱。<sup>123</sup>

歐洲猶太人在遭遇滅頂危機下，即使面對西方設下的重重限制，依然不顧一切鋌而走險，就算違法也要逃往西方。而英國當局面對猶太難民表現的麻木不仁，徹底掩蓋了英國是在為正派價值而戰的口號。當三艘滿載飢餓與恐懼的中歐猶太人的船隻，從羅馬尼亞出發並抵達巴勒斯坦外海時，這些難民起初被拒絕上岸，之後被帶到岸上拘禁在環境惡劣的營區裡，而當局仍想盡辦法要讓他們離開巴勒斯坦。最後，當局決定把部分難民送到島嶼殖民地模里西斯，但遭到不當對待的難民感到既絕望又沮喪而拒絕接受這樣的安排。在被驅逐出境的那一天，猶太難民全身赤裸躺在床上以示抗議。殖民地警察用棍子毆打男人，然後將一絲不掛的猶太男女全帶上船，猶太難民的財物不是被丟進海裡，就是被沒收然後出售，出售所得就當成巴勒斯坦的政府基金。在運往模里西斯途中，超過四十名猶太難民死於傷寒或身體衰弱；抵達之後，難民被監禁在鐵絲網後方，由武裝衛兵把守。對這些猶太人來說，他們面臨的只是

另一個殘酷的政權。猶太人繼續遭到監禁，男人與自己的妻兒被隔離開來，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才得以團聚。英國殖民地代理副大臣夏克伯格爵士（Sir John Shuckburgh）居然認為，這場抗爭顯示「猶太人毫無幽默感與不知輕重」。<sup>124</sup>一九四一年春天之後，猶太難民非法入境巴勒斯坦的現象終於絕跡。

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國開始大規模種族滅絕行動，起初是在東線戰場，之後遍及整個軸心國統治下的歐洲。消息傳開之後，同盟國逐漸無法維持以往漠視猶太人命運的政策。一開始，倫敦與華府得到各種不同的情報來源，要彙整這些資訊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初，德國有系統地屠殺歐洲猶太人已有明確證據。一九四二年五月，波蘭地下運動組織送了一份報告給波蘭流亡政府，此即所謂的《邦德報告》（Bund Report），報告詳細提到波蘭猶太人遭種族滅絕的狀況。六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獲准對歐洲廣播這份報告的結論，指出已經有七十萬名猶太人被殺，但英國外交部仍認為這則消息相當可疑，擔心這會使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獲得正當性。<sup>125</sup>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世界猶太人大會駐日內瓦代表里格納（Gerhart Riegner）透過英國外交部轉交一封長電報給英國國會議員西爾弗曼（Sydney Silverman），裡面提到從德國消息來源得到的滅絕營與毒氣室細節。外交部在八月八日收到電報，儘管對於這項未被證實的情報感到懷疑，外交部還是於十七日將電報轉交給西爾弗曼，但提醒他不要太認真看待這項消息。<sup>126</sup>里格納也將電報寄給了美國國務院，希望他們轉交給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懷斯拉比（Rabbi Stephen Wise），但國務院官員認為這封電報「內容充滿想像」，決定不予轉交。不過，美國的審查機關遺漏了西爾弗曼直接寄給懷斯的第二封電報，該封電報裡頭附上了里格納的報告。而當懷斯試圖得到國務院公開資訊的許可時，國務院卻考慮了三個月才勉強答

應。<sup>127</sup>英美官員對於這項未經證實的情報抱持著審慎態度，他們也擔心猶太人遊說團體會利用這個負面消息要求政府採取行動。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已經有足夠公開可取得的資訊增加民眾對英美政府的壓力。英國蓋洛普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訪者願意接受更多的猶太難民。<sup>128</sup>為了平息民眾對同盟國毫無作為的不滿，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提議在下議院以同盟國名義發表宣言，除了強調德國屠殺猶太人，也承諾戰後要懲罰該為此事負責的人。在華府，國務院認為艾登的宣言只會讓猶太人發起更多的抗爭，反而會對「戰爭投入造成反效果」。美國官員最後默許艾登的宣言，條件是必須把「歐洲的報告已經確認種族滅絕存在」修改成「歐洲有許多報告提到種族滅絕」，但內容仍有待確認。在發表宣言的前一個星期，羅斯福與猶太人領袖開會，這是戰時他與猶太人開的唯一一次會議，會中討論了對種族滅絕的回應。開會時，有五分之四的時間都是羅斯福在說話，而羅斯福也只花了兩分鐘時間談論這場會議的真正主題，最終也並未做出任何承諾。<sup>129</sup>在莫斯科，一九四一年夏天以來，內務人民委員部安全人員已經蒐集與寫下大量有關種族滅絕的直接證據（不過並未交給西方），但蘇聯對於艾登的宣言也抱持著與美國類似的矛盾想法。他們不瞭解為什麼同盟國的宣言只提到猶太人受害者，卻忽略了蘇聯人民也是受害者。蘇聯最終還是簽署了宣言，而這也成為戰時唯一一份針對猶太人大屠殺提出的宣言。<sup>130</sup>十二月十七日，艾登在下議院宣讀宣言，國會議員自發地起立默哀兩分鐘。同盟國將猶太人大屠殺公諸於世，對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組織來說，這表示同盟國很可能放寬猶太人移民限制與積極回應歐洲猶太人的困境；然而，對於深陷軸心國羅網的猶太人來說則是憂喜參半。在華沙的猶太人區，猶太人里文（Abraham Lewin）在日記裡寫道：「我們應該對於自己的命運受到『關注』感到高興，但這真能挽救我們的命

運嗎？」 13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宣言是同盟國政府針對猶太人大屠殺做出的最重要回應，但同盟國對於一息尚存的歐洲猶太人卻幾乎未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轉變。在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一九四二年在史達林的同意下設立，但受到安全人員的監視與指導）之所以被容許成立，因為這個組織可以吸引美國資金，但委員會成立的用意並不是為了採取積極策略來解救或支援德國占領區裡的蘇聯猶太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底，這些猶太人絕大多數都已遭到滅絕。在英國，內政大臣莫里森更多猶太難民入境的請求，反而要求外交部考慮找個遙遠的地方把猶太人送去，例如馬達加斯加——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在一九四〇年時也曾一度考慮將猶太人遷到此處。面對與日俱增的批評，英國戰時內閣成立了猶太難民收容委員會，但後來為了避免獨厚某個受害族群的印象，於是把「猶太」二字去掉。一九四三年一月，難民收容委員會發現自己的任務絕大多數是消極的，例如「讓人們放棄大規模移民到英國與英國殖民地的想法」。莫里森只提出一項方案，如果猶太難民能證明自己有助於英國的戰爭投入，那麼英國才有可能再接納一千到兩千名猶太難民。 132

在美國，十二月宣言公布之後，美國政府也沒有立即採取任何實際做法。猶太人遊說團體提出的建議遭到羅斯福與國務院的推托或忽視。一九四三年一月，華府收到英國政府的提議，希望召開高峰會來討論難民問題，美國方面屢次藉故拖延，最終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在英國的加勒比地區島嶼殖民地百慕達召開會議。英美同意將難民問題的定義擴大，而非只局限於猶太人，兩國也不討論不切實際的解救難民方案。英國代表團團長表示，會議的結果「乏善可陳」。會議同意重新恢復一九三八年成立的跨政府難民委員會，但委員會往後幾年在幫助猶太人上面幾乎毫無建樹。英國、巴勒斯坦或美國依然維持現有的移民配額，並未做出



讓步收容更多的猶太難民，即使一九四四年羅斯福遭受各方壓力，最後也只同意開放紐約州安大略堡做為戰時庇護所，而且只收容一千名猶太難民。百慕達會議提出在盟軍占領的北非建立難民營，收容從西班牙逃出的猶太難民，然而這個想法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實現。而且顧慮到穆斯林的看法與法國方面的阻撓，最終難民營收容的人數並未達到原先計畫的數千人，而是只有六百三十人。<sup>133</sup>用艾登的話來說，這場會議的主要結論就是「除非贏得最後勝利」，否則什麼都不能做。巧合的是，當百慕達會議召開時，華沙猶太人區的猶太戰士也發動了一場失敗的起義。當英美代表在百慕達飯店辯論如何解決難民問題時，猶太反抗軍為了反抗壓迫者而發動了一場注定失敗的戰鬥，他們既未獲得波蘭救國軍的幫助，也未獲得盟軍支援。遭受圍攻的猶太人區傳出的最後一個訊息只是簡單一句話：「自由與正義的世界既未出聲，也未出手幫助。」<sup>134</sup>

這是個嚴厲的批評，但並非不合理。猶太人遭到迫害與滅絕，西方同盟國做出的回應完全與大屠殺的恐怖不成比例。希望逃離歐洲的猶太難民與試圖發起救援行動的猶太人組織不斷遭遇挫折或斷然拒絕，只有偶爾會獲得一點微薄的援助。戰後世代在充分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也同樣嚴厲批評同盟國的道德失敗。同盟國道德失敗的原因很多。首先，一九三〇年代為了處理猶太難民問題引發激烈的負面反應，其中英國統治的巴勒斯坦尤其嚴重，因此對繼續援助猶太人形成不利的影響。其次是可信度。當大屠殺的驚悚消息傳出時，西方民眾最初的反應是難以置信，就連猶太人社群也半信半疑。世界猶太人大會倫敦分部在給紐約總部的信上寫道：「請相信這件難以相信的事。」<sup>135</sup>在西方，由於一戰的經驗，人們會以審慎的態度看待這些殘暴的描述，因此從歐洲報導這些細節的記者，就必須如庫伯維茨基（Leon Kubowitzki）在一

九四八年世界猶太人大會說的，打破「懷疑論的堅硬外殼」。新聞界也不願重複報導相同的故事，因為猶太人受害的新聞價值遠不及戰爭報導。美國最重要的報紙《紐約時報》，在戰爭時期刊載了兩萬四千則頭版頭條，但只有四十四則報導猶太人事件。《紐約時報》發行人是猶太裔美國人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他不想讓自己的報紙過度報導猶太人的悲劇，一方面是擔心引起讀者反感，另一方面則是害怕掀起反猶太主義風潮。結果，民眾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認識往往拼湊而片段，很容易產生懷疑而非同情。庫伯維茨基在演說中提到，「猶太人面臨的死亡掙扎，不僅聽起來不可思議，而且難以理解。」<sup>136</sup>

同盟國的道德失敗或許也可以歸咎於反猶太主義，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的關係遠比一般所想的來得複雜。在同盟國三個主要國家裡，反猶太主義都以最醜惡的種族主義形式表現在公眾面前，儘管它從來不是主流，也沒有上升到官方層次。在美國，民眾的反猶太主義在一九三〇年代曾經出現增長。羅斯福於一九三〇年代進行經濟改革時，極右派人士曾經提出這樣的口號：「新政即猶政。」美國的民粹反猶太主義有幾個代表人物，首先是佩利（William Pelley）與他的一萬五千名法西斯主義「銀衫軍」；其次是溫羅德牧師（Revd Gerald Winrod），他的反猶太報紙《捍衛者》（*Defender*）有十萬名美國讀者；第三是庫格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他透過廣播傳道，而且對於《錫安長老會紀要》深信不疑。庫格林在廣播中的反猶太主義言論擁有數百萬名聽眾，直到一九四二年大主教出面干預，庫格林才停止。在戰爭期間，對猶太會堂的褻瀆與對猶太人的攻擊依然持續。<sup>137</sup>英國反猶太主義存在於極右派分子中，但極右派分子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晚期逐漸被邊緣化，一九四〇年，英國法西斯同盟的活動分子遭到監禁。儘管如此，依然可以看到西方許多政治人物與官員在面對「猶太人問題」時與一般民眾一

樣，對猶太人存有偏見或抱持著不寬容的態度。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導致了一種消極的反猶太主義，而這種消極心態使得西方從上到下都不願對猶太人遭遇的危機做出更積極的回應。英國外相艾登雖然一手推動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宣言，但就在一年前，他也曾對自己的私人祕書說道：「如果我們必須做出選擇……我寧可選擇阿拉伯人而非猶太人。」外交部與殖民地部負責處理巴勒斯坦或難民問題的官員，時常不經意地流露出種族主義的心態。一九四四年，一名官員寫道：「我認為，本部浪費了不成比例的時間在這些哭哭啼啼的猶太人身上。」<sup>138</sup>在整個戰時內閣中，邱吉爾的立場較為特殊，他毫不隱諱地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與關切深陷軸心國羅網的猶太人。但在戰爭時期，邱吉爾始終無力改變其他閣員的冷漠態度或對猶太人的敵視。相較之下，羅斯福完全不想解決猶太難民的問題，除非輿論風向改變，否則他毫無意願回應猶太人的危機。最終來說，羅斯福是把政治算計放在人道主義的考量之上。

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角度解釋反猶太主義如何影響西方的回應。即使是猶太人組織與猶太人遊說團體內部也感到憂慮，他們擔心猶太人在戰前與戰時的各項活動會引發社會對猶太人的反彈，導致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陷入更糟的境況。英美的猶太人領袖並不熱衷協助大量的中歐與東歐猶太人移民英美，因為這些猶太人很可能對當地既有的猶太人社群造成衝擊，也難以與當地猶太人同化。猶太人領袖憂慮，如果猶太人不斷攪動社會氣氛，很可能予人猶太人是不忠誠少數族群的印象，而這也是史達林對蘇聯猶太人的一貫看法。一九四三年八月，當懷斯拉比在美國猶太人大會演說時，他表示：「我們是美國人，起初是如此，未來也永遠是如此。」<sup>139</sup>非猶太人政治人物也有類似的憂慮，他們擔心在德國有意操弄下，大量猶太難民突然要求移民英美很可能激起反猶太主義。在英國，戰爭期間依然保留讓猶太人入境的可能，儘管絕大多數猶太人

在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早已死亡殆盡。在英美，把猶太人視為歐戰的主要受害者可能會造成政治問題，因為這等於獨厚猶太人而忽略歐洲占領區裡還有其他受害族群（因此才出現刪除英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設立的猶太難民收容委員會裡的『猶太』字樣的決定）。最終，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領袖都認為，對猶太人危機做出過於積極的回應，很可能正中德國人下懷，德國人就能藉此大作文章，讓人以為這場對抗德國的戰爭實際上真是一場「猶太戰爭」。

最重要的一項理由是，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回應其實受限於政治考量與軍事必要性。對西方民眾來說，影響更重大的戰爭勝負才是關注的焦點，猶太難民的議題顯然不是當務之急。即使民眾對於猶太人的危機感到同情，那也是出於對軸心國占領區裡所有受害者的關切。在對歐洲進行政治宣傳時，英國官員努力不讓人產生一種印象：不能稱為「民族」的猶太人享有的地位竟然比其他民族來得優越。在倫敦的歐洲各國流亡政府也同感關切，他們認為如果只注意猶太人而忽略歐洲占領區民眾的苦況，將會招致歐洲占領區民眾的怨恨。有人向自由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將軍進言，希望他「不要成為帶回猶太人的那個人」。法國右派人士指責猶太人要為一九四〇年的戰敗負責，同樣地，波蘭民族主義分子也指責猶太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背叛波蘭倒向俄羅斯。各國流亡政府極力避免在戰時與戰後創造出自己的「猶太人問題」，而英國的政治宣傳也尊重這些政治關切。<sup>140</sup>甚至當德國給予中立國機會，讓他們把持有中立國護照或文件的猶太人遣返回國時，這些國家竟因為顧慮國內民族主義人士的意見，而拖延讓猶太人返國。五千名持有西班牙文件的猶太人，只有六百六十七名於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抵達西班牙，條件是他們日後必須移居國外。多達數千名猶太人在與中立國官員爭論入境條件與文件是否有效時遇害。<sup>141</sup>



戰爭勝利理應成為猶太人獲得解放的契機，但即便到了戰後，各國對於猶太人災難的回應卻依然模稜兩可。一九四五年，國際軍事法庭受到於一九四一年逃往美國的猶太裔波蘭律師萊姆金（Rafael Lemkin）的啟發，在審判時引進了「種族滅絕」（genocide）一詞，用來傳訊德國的主要戰犯。萊姆金對這個詞的定義主要不是針對自己的猶太人同胞遭逢的命運，而是用來描述被征服民族在民族認同上遭遇的政治、文化與社會閹割。猶太人大屠殺直到最後一刻才被載入起訴書中，除了因為將猶太人認定為「民族」有其困難，也因為蘇聯認為不應該將猶太人單獨視為一個群體，而應該將其歸類於各國的受害者之中。<sup>142</sup>在審判過程中，「種族滅絕」一詞一直被謹慎使用，在最終審判時，這個詞甚至完全沒出現。萊姆金試圖讓聯合國將種族滅絕定義為跨國犯罪，但並未獲得大國的支持，只得到印度、巴拿馬與古巴的聲援。《種族滅絕公約》（Genocide Convention）的最終版本與《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同時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獲得採納，但過程中卻遭到英國、法國、蘇聯與美國的反對，這些國家擔心公約可能適用於殖民地人民或國內被壓迫的少數族群。在此之前史達林已經授權進行反猶太主義整肅，導致數千名蘇聯猶太人被殺或遭到監禁，其中包括曾在戰時主持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成員。在美國國內，批准公約遭遇困難，主要與擔心引發進一步的民權抗爭有關。事實上，在一九五一年，民權運動分子羅伯遜（Paul Robeson）與派特森（William Patterson）確實針對美國黑人遭受的待遇向聯合國提交請願書《我們指控種族滅絕》（We Charge Genocide）。萊姆金本人也後悔於不該拿猶太人的例子與黑人例子相比：「不平等與死亡畢竟不是同一回事。」最終，美國一直要到一九八六年才同意批准《種族滅絕公約》。<sup>143</sup>

二戰期間，同盟國針對盟邦之間的合作、國內的種族主義或者是對

歐洲猶太人的援助採取了道德上站不太住腳的權宜立場，雖然這不足以使同盟國與軸心國做出的惡行相提並論，但確實對同盟國提出的普世主張構成挑戰，使人們質疑同盟國是否有資格集體代表進步與人道價值。當二戰還在進行時，同盟國就已經開始建構「良善的戰爭」（Good War）的歷史敘事，這也成為許多人對二戰記憶的核心印象。<sup>144</sup>然而，現實不總是那麼黑白分明。戰爭時期的道德與政治決策充滿權宜妥協，同盟國出於戰略與政治必要或意識形態信仰而做出的道德選擇，最終玷汙了自己的戰爭敘事。

## 人民戰爭：打造「集體道德」

各國為了合理化戰爭目標與鼓吹民眾做出犧牲，接連提出了各種道德理由，用來說服絕大眾相信這是一場值得支持的戰爭。畢竟如果真能自由選擇，絕大多數人無論是基於實際還是道德理由，應該都不願意加入戰爭。一九四三年，英國國會和平目標團體的領導人寫道：「我們首先必須瞭解，在任何文明國家，一般民眾對於戰爭幾乎不負任何責任。他們是被統治者拖下水的，統治者用廉價的說法安撫他們，讓他們承受所有的恐怖與羞辱……。」<sup>145</sup>即使這段說法用來批評軸心國更加一針見血，但顯然無論是同盟國還是軸心國陣營，每個交戰國無不努力確保自己的民眾能夠認同這場不是由民眾自身引發的衝突，並且讓民眾抱持著道德信念，即使面臨危機或失敗，依然能奮不顧身地投入戰爭。一戰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國家將會付出什麼代價。

想讓民眾堅定地支持戰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構「集體道德」，有了集體道德，才能讓全國民眾表面上團結起來堅持作戰到底。集體道

德反映了現代戰爭就是總體戰的觀念，總體戰不僅由政府與武裝部隊發動，而是整個社會都要參與。在責任與犧牲的倫理驅策下，集體道德形成了一種有機性的戰時社群，這種狀況並非獨裁體制獨有，而是舉世皆然的現象。一九四二年初，蔣介石對中國人民的演說充分捕捉到集體道德的核心特徵：

你們一定都發現到，現代戰爭不只是幾場軍事作戰而已，而是全國上下必須投入所有的力量與資源。不僅士兵要參與，所有民眾也一樣必須投入。民眾必須把國家安危視為自身的安危，必須同意忍受一切必要的艱困，必須放棄個人的自由與舒適，接受紀律的約束與公共利益的要求.....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必須符合戰時的急迫需要，也就是說，國家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勝利是所有民眾努力的最終目標。<sup>146</sup>

從定義戰爭投入的語彙，就可以看出集體道德的意涵。在英國，二戰從一開始就被稱為「人民戰爭」，藉此區別於過去由一小群菁英發起的戰爭。「平民」團結一致反抗暴政，成了戰時敘事的核心特徵。<sup>147</sup>在德國，深具種族色彩的「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觀念在一九三〇年代成為納粹意識形態與政治宣傳的主要特徵，並且在戰時立刻轉變成「戰鬥共同體」（Kampfgemeinschaft）的概念，用來捍衛整個民族。隨著戰局漸趨不利，又成為「命運共同體」

（Schicksalsgemeinschaft），以忍受最後鬥爭的艱苦。<sup>148</sup>史達林則認為，蘇聯應該要成為一座「軍營」，發起偉大的衛國戰爭，驅逐法西斯入侵者。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星期，人民戰爭的觀念已經在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中出現，這首歌就叫做《人民戰爭》（Voina Narodnaia）。史達林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宣布，蘇聯也在打一場「人民戰爭」，每位四

肢健全的民眾，無論男女，都應該自發地參戰。<sup>149</sup>在美國，由於個人主義倫理盛行，要建立戰時的道德共同體不是那麼容易，但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的首次戰時廣播卻明確提出了這一點：「我們全都捲入了戰爭，每位男人、女人與孩子，沒有人能置身事外……。」<sup>150</sup>

中國與義大利的經驗則是例外，這兩個國家在一九三〇年代就已經進入戰爭狀態，兩國相對弱小的經濟也為此付出高昂代價。到了一九四〇年，墨索里尼終於決定冒險與其他大國開戰，但義大利的政軍高層乃至絕大多數民眾，對於擴大戰爭都感到興趣缺缺。大戰促使其他國家產生新的道德連帶感，但在義大利，一九四〇年後的衝突卻讓政權與民眾之間的隔閡愈來愈大。起初的戰事失利助長了民眾的悲觀情緒。義大利的警政機關報告顯示，民眾對勝利缺乏信心，擔心美軍入侵，而且渴望早日結束戰爭。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熱那亞一份具代表性的報告清楚顯示「民眾對於這場戰爭與戰爭的目標毫無熱情」。<sup>151</sup>這種狀況使得墨索里尼對於實施總動員感到遲疑，從而導致義大利人投入戰爭的比例遠低於英國、德國或蘇聯。在中國，蔣介石雖然知道全民投入戰爭的重要性，但民眾投入戰爭的比例始終非常有限。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痛斥國人未能響應總體戰的號召：「現在整個社會風氣就跟和平時代一樣馬虎懶散……民眾普遍缺乏愛國熱情，以私害公的習氣依然普遍……。」<sup>152</sup>當時的中國有一半的領土被日軍占領，而占領區又有許多投機的中國人與日軍合作。此外，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著潛在衝突，中國共產黨在自己占領的根據地發起的「全民抗日」運動，效果反而比國民政府來得成功。至於在農村地區，數百萬中國農民忙於應付大量湧入的難民，忙於尋找糧食或抵禦流竄的盜賊，沒有人有空願意為民族共同體而戰。但就算是在未被占領的地區，也出現貪汙盛行、商人囤積居奇、富人出錢讓自己的兒子



免服兵役等怪現狀。<sup>153</sup>蔣介石感嘆國人的不團結，他用「一盤散沙」這句成語來描述這種狀況，認為每個人都自私自利。<sup>154</sup>這類問題或許足以解釋中國為什麼缺乏足夠的集體投入。

能夠成功建立戰時集體道德的國家，往往傾向於廣納所有民眾，但那些定義上不屬於國民的人則除外。好比一九四二年被隔離與安置在美國營區的十二萬名日本居民，或者是德國的猶太人與外籍工人，抑或是蘇聯廣泛界定的「人民公敵」，這些人不被算在集體道德之內。每個國民，包括孩子與青少年，都必須承擔責任，無論這些責任多麼微小或消極，每個人都要為戰爭投入貢獻心力，做出必要犧牲。在德國、蘇聯與日本，全民參與反映了對共同體廣泛且嚴格的控制，所有民眾都必須為了共同體而積極參與全民事務。以德國、蘇聯與日本來說，建立擁有道德共識的戰時集體，只是其原有共同體投入形式的擴大與延伸。在德國，參加青年協會、納粹黨、福利團體、民防單位與勞工單位的人口，估計在一九三九年已達到六千八百萬，而德國總人口也不過八千萬。<sup>155</sup>一旦戰爭開打，這些組織就能在後方進行戰爭投入。一九四〇年，日本內務省建立了「町內會」網路，正式組織民眾進行戰爭投入。到了一九四〇年底，全日本已經有十八萬個町內會。在城市裡，每個町內會由幾百戶人家構成，在鄉村，每個村落就是一個町內會。與此同時，在町內會之下又設立超過一百萬個規模更小的鄰里組織，每個鄰里單位通常包括八到九戶人家，如此一來便能更緊密結合地方社群，使其投入戰爭，還能更輕易地將不願履行道德義務的個人孤立起來。<sup>156</sup>反觀英美兩國，對戰爭的投入與其說仰賴既有的集體意識，不如說更訴諸於個人良心。相對於日本社會的有機性，美國的戰時敘事有著較為狹義的公民概念與強調公民自動自發的精神：個人必須透過這樣的觀念與精神瞭解自己對他人負有的義務。「你今天為自由做了什麼？」一張美國

海報問道。<sup>157</sup>除了宣傳鼓吹戰爭投入，還有強大的社會壓力迫使民眾順從。不願接受犧牲或參與地方社群活動，會受到批評與舉報。在英國，儘管因為階級或地區而有明顯差異，民眾仍普遍認為戰時的短期集體性使每個有能力投入的個人皆有道德義務為勝利盡一分力。

這些戰時集體是人為建構的產物，有著特別強大的道德與情感力量。當你身處於一個戰鬥中的共同體，要冷眼旁觀或置身事外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威權體制國家，這麼做甚至會有危險。在絕大多數的交戰國，無論個人擁有多少的私人保留空間，民眾普遍認為每個人都有參戰的道德義務。逃避責任者、失敗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都會被視為是道德淪喪；在蘇聯，這些人很可能遭到處決。政治宣傳不可或缺，但建立戰時共同體也需要發展更廣泛的參與文化，媒體、青年組織、教會、婦女團體，在西方國家還包括商業廣告，這些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兒童對戰時共同體的參與，可以明顯看出戰時集體的論述是如何被建構與灌輸。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出版了一本供學校使用的初級讀本

《勝利教育》（*Education for Victory*），裡面提到老師應該鼓勵孩子瞭解當前的道德論述：「讓孩子瞭解民主的理想，使他們認識美國是為何而戰.....使他們知道美國為民主原則而戰，這是源自於人類爭取自由淵遠流長的歷史。」美國發行了五十萬冊的《兒童道德規章》（*The Children's Morality Code*），勸誡孩子要忠於家庭、學校、國家與民族，最重要的是，要「忠於人類」。當財政部長摩根索提出「節約、服役、保護」的口號，號召三千萬美國年輕人為自由而戰時，有大約兩萬八千所學校響應。學生蒐集戰爭債券郵票、挨家挨戶蒐集廢金屬、廢紙與動物油，並且參與地方的社群計畫。<sup>158</sup>

在日本，孩子在成長過程就被灌輸要對共同體負有道德義務。數十年來，學生受到文部省頒布的倫理課本薰陶，要求他們做到服從、忠誠

與勇氣。一九四一年改版的教科書充滿了民族主義的象徵與情感，例如：「日本是個優美的國家 / 一個純粹的國家。 / 日本是世界上 / 唯一的神國。」而且大肆宣揚民眾願意為天皇犧牲。課本上的模範故事鼓勵孩子從事廢物回收以支持戰爭，寫信給海外的士兵，並且要對偉大的天皇家族心存感恩。與課本搭配的教師手冊提到，新的「民族道德」囊括了社會與個人道德領域。到了一九四五年，孩子也必須在課堂上高唱戰爭歌曲，還要參與軍事訓練，準備進行日本本土的最後防衛。一名女學生在日記裡記錄一天的「精神訓練」課程，包括徒手搏擊、以球代替手榴彈進行投擲練習、劍道練習，最後是練習用竹槍刺向敵人：「很有趣，我覺得很累，但我知道即使只有一個人也能殺死很多敵人。」<sup>159</sup>

然而，戰時集體的建立有著明顯限制。廣大的民眾有著不同的觀點、年齡、利益與期待，不可能每個人都支持戰爭投入。為了確保戰時道德共同體為正義而戰的龐大敘事能夠持續，每個戰時政權都會有系統地監控輿論，透過檢查制度與選擇性的政治宣傳來辨識哪些地區存在著異議分子、懷疑者或對政府幻滅的人士，並且採取措施對其進行安撫或壓制。最常用來描述戰時民眾心境的詞彙就是「士氣」。「士氣」一詞在一戰時被廣泛使用，戰間期的人們則普遍用這個概念來描述後方民眾潛在的韌性。舉例來說，一九四〇年，耶魯學者波普（Arthur Pope）成立非官方的全國士氣委員會，負責考察戰時如何維持美國人的士氣；此後的研究也協助美國政府形成決策以維持戰爭投入。<sup>160</sup>士氣難以精確定義，要衡量更是困難。在英國，針對民眾對戰爭投入的滿意度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戰爭期間滿意度的起伏十分劇烈，從一九四二年初的低點百分之三十五，到最後一年的高點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但無論滿意度如何變動，民眾支持作戰到底的決心卻始終維持不變。<sup>161</sup>蘇聯在開戰第一年遭遇危機，全國上下充斥著失敗主義，特別是估計有二十萬

名士兵叛逃到德國。內務人民委員部採取了嚴厲的監控措施，使失敗情緒不至於在群眾中蔓延。<sup>162</sup>從所有交戰國來看，除了義大利之外，民眾對於戰事的不安感並不至於造成毀滅性的士氣瓦解。儘管如此，無論對士氣的定義有多麼寬鬆，監控士氣始終是維持集體道德的核心手段。國家在二戰時期對民眾的監控，其規模與企圖心遠超過一戰時期的經驗。

評估民眾情緒的任務，在威權體制國家明顯要容易得多，因為威權體制國家在戰前已經建立組織，負責提供政府詳細的輿論與民眾行為報告。由於缺乏自由的新聞媒體與自由的政治體制，獨裁體制只能仰賴廣大的舉報網路回報國內外民眾對政府施政的反應。德國的制度堪稱是縝密組織的典範。一九三〇年代，保安局的分支單位負責回報國內訊息。一九三九年，該單位重組成帝國保安總部轄下的第三局，由親衛隊長官奧倫朵夫（Otto Ohlendorf）領導，而且從十月九日起，該局開始編纂第一份正式的《國內政治局勢報告》。十一月，報告名稱改成《帝國內部報告》，這份報告一直以相同名稱進行編纂，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天為止——此時由於情報呈現的悲觀內容導致各方投以失敗主義的指控，最終導致報告停止編纂。奧倫朵夫的部門被分成十八個子部門（日後分成二十四個），負責蒐集所有與輿論和士氣有關的情報。估計有三萬到五萬名舉報人負責蒐集資訊，他們提出的報告得先經過地方機關的篩選，然後再送到柏林。在柏林，全面性的報告製作完成後會呈交給黨領導人與政治宣傳部。受僱的舉報人絕大多數是具有專業背景的醫生、律師、公務員或警官。根據某個地區機構的說法，這些人的任務是與家人、朋友、同事針對特定主題進行談話，並且在工作場所、巴士、店鋪、理髮院、市場或當地酒吧聆聽他人的對話。<sup>163</sup>除了這些舉報人之外，祕密警察蓋世太保也有自己的舉報人網路，他們的任務是追查失敗主義者或



異議人士可能造成的傷害，並且從源頭加以扼殺管制。

類似的制度也存在於義大利與蘇聯。從一九四〇年夏天開始，義大利祕密政治警察就利用舉報人與密探網路固定每星期上報一次輿論。舉報人的數量很快就大肆擴充，因為絕大多數民眾都明顯表現出對戰爭的悲觀與不滿。<sup>164</sup>除了祕密警察的情報，地方政府也會提出報告，所有資訊都會送到位於羅馬的內政部，最終上呈給墨索里尼。在蘇聯，地方社區不僅持續受到地方共產黨官員與黨員的監視，還受到無孔不入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舉報人網路嚴密監控。人民只要顯露出一點失敗主義跡象或對當局的些微批評，就會有人向警察機關提出告發。告發逐漸形成一種制度，也就是每個蘇聯民眾都成為潛在的舉報人。<sup>165</sup>即使蘇聯民眾因為戰時的各種要求而士氣低落，但眾所周知，抱怨帶來的風險仍足以讓蘇聯民眾維持最基本的消極士氣。但無論是哪個獨裁政體，都必須在強制與讓步之間求取平衡。民眾很少關切戰爭的實行或戰爭的道德行為等重大議題，而國家當局的及時回應或針對性打壓也能消除民眾的關切。

英美的情況完全不同。戰爭爆發時，兩國政府並沒有現成的情報蒐集網路來瞭解輿論。雖然民意調查在一九三〇年代晚期出現，但仍不足以做為理解民眾士氣的可靠工具。在白宮，羅斯福有自己一套民意調查方式：除了詳細分析白宮每天收到的數千封信件，白宮職員每天也要仔細閱讀超過四百份美國報紙。一九三九年九月，政府報告局成立，雖然機關名稱有「政府報告」四個字，這個機構實際上是用來追蹤民意變化。一九四〇年，羅斯福私下與選擇性民調的先驅坎特里爾（Hadley Cantrill）達成協議，由坎特里爾定期向他提供民意調查報告。到了一九四二年，羅斯福每兩個星期就能收到一份民調結果。<sup>166</sup>戰爭期間，美國政府設立幾個機關，一方面監控民調，另一方面提供適當資訊來教育

民眾。一九四二年六月，戰爭情報局成立，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埃爾莫·戴維斯（Elmer Davis）擔任局長。戰爭情報局下設國內情報處，負責定期報告國內的民心狀況。各地的舉報人通常是從商人、教士、編輯與勞工領袖當中物色僱用（戰爭情報局認為這些人是「較有警覺性且表達能力較佳的一群」），由他們定期回報各地輿論，並且在可能的狀況下也負起塑造輿論的工作。<sup>167</sup>一九四一年五月設立、並由紐約市長拉瓜迪亞（Fiorello La Guardia）主掌的民防局也對舉報人進行組織，使其擔負起所謂的「士氣看守者」角色，負責向戰爭情報局回報各地狀況。除了民意調查之外，戰爭情報局也推動各項計畫協助塑造輿論，例如其轄下的廣播處（聽眾達到一億人）、動畫處（每星期觀看的觀眾估計達到八千到九千萬人）與平面設計處（負責在所有公共空間張貼海報與圖畫）。美國的提振士氣計畫並非粗糙的政治宣傳，也不只是思想灌輸，而是提供清楚的資訊來教育民眾。美國也鼓勵民間商業行號透過廣告的方式來宣傳提升士氣的訊息。<sup>168</sup>

英國在戰爭爆發後的幾個月才慢慢建立起監控體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英國廣播公司製作人瑪麗（Mary Adams）被指派擔任情報部的國土情報局長官，她的職責是提供「持續而可靠的資訊」做為政府宣傳的根據，並且要「對國內士氣進行評估」。一九四〇年五月，國土情報局每日都會提出報告，從九月開始，改為每週向主要部會與戰時內閣提出報告。<sup>169</sup>由於英國政府幾乎從未對輿論進行過有系統的情報蒐集工作，瑪麗因此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僱用了民間進行的「大眾觀察計畫」來提供詳細的士氣調查與蒐集各種失敗主義的證據。大眾觀察計畫是由科學家哈里遜（Tom Harrison）與詩人麥吉（Charles Madge）在一九三七年創立，主旨是對社會行為與態度進行調查，並且使用抽樣訪談的方式來取得研究素材。這一研究方法也立即被用來評估士氣。每一份報告大

約要進行六十段訪談，主要詢問受訪者對當前新聞與事件的看法。這些報告的樣本數量很少，而且局限於幾個地區，因此可信度大打折扣。儘管如此，大眾觀察計畫「新聞配額」依然於每個星期一與星期四交出報告，而且持續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為止，成為情報部士氣報告的關鍵資料。<sup>170</sup>

除了這些報告，情報部本身也僱用了舉報人，這些舉報人同樣來自醫師、律師、公務員、教士、店鋪老闆與酒館老闆，此外還有「戰時社會調查」提供的資料。戰時社會調查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者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建立的研究計畫，其提供的詳細報告不僅包括士氣，也涵蓋更廣大的社會議題。戰時社會調查的工作人員主要由社會心理學家組成，他們對於民意的評估更為專業。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戰時社會調查已經進行了一百零一次調查，實際上門訪談的次數達到二十九萬次。<sup>171</sup>但戰時社會調查也在此時停止定期向內閣提出士氣報告，因為從一九四二年底之後，整體的戰局已對盟軍轉趨有利。一九四一年七月，邱吉爾任命好友布拉肯擔任情報大臣，情報部根據輿論情報調整了戰時宣傳。與美國一樣，英國放棄以往使用訓誡的語氣要求民眾參與戰爭的做法，改成使用淺顯直接的解釋與教育內容。英國也與所有主要國家一樣，監控士氣引發的爭議不至於影響維持整場戰爭的道德社群大敘事。民眾的批評與關切絕大多數是為了讓戰爭投入更有效或對社會的影響能夠更平等，而非為了削弱集體努力下的整體道德架構。

針對民眾戰爭態度進行的密切監視引發了一個疑問，那就是國家能多有效地讓廣大民眾接受將戰爭合理化的大敘事。即使絕大多數人都接受戰時社群進行的正義之戰，但對於常見於戰時宣傳中的某些特定道德目標卻不一定照單全收。當民眾捲入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爭時，人們對於戰爭的過程與目標的理解很可能是模糊與片面與一知半解的，而且會隨

著戰爭的持續而擺盪。今日的我們在回顧歷史時，可以用全知視角觀看這場戰爭，但當時的民眾卻只能透過自己的主觀角度來理解各種戰時事件與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民眾的所知是有限的，而且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表達意見，相關限制往往隨交戰國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各國軍方與政府都會針對新聞發布進行審查。在獨裁國家，新聞完全受到中央機構管制，由中央決定民眾能知道什麼。在民主國家，雖然出版業與媒體並非由中央控制，但他們也無法完全自由決定出版或播出的內容。以澳洲為例，政府對於民眾的批評極為敏感，特別是不願意看到有人批評盟邦美國，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澳洲政府對新聞界進行的審查竟多達兩千兩百七十二次。<sup>172</sup>各國新聞界都必須仰賴官方給予的訊息，然而官方絕不可能透露完整的真相，因此也很難完全信任。一九四一年二月，米蘭市發布的報告充分顯示米蘭市民對新聞報導的內容「深感失望」，他們認為報告的內容充滿「大話、毫無根據或過時的預測.....以及幼稚可笑的論點」。<sup>173</sup>在中國，日本入侵大部分領土之後，既有的日報發行陷入停頓，地方性的單張傳單開始大量出現。但這些傳單也只是刊登內容空洞的政府公報，而在缺乏戰時通訊記者的狀況下，傳單上的新聞也只是拼湊從各方聽來的傳聞與想像。即便是在少數能夠閱讀的人口當中，新聞媒體的可信度也很低。不識字的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是仰賴識字的人大聲朗讀報紙內容來獲得訊息，有些根本只仰賴口耳相傳，而接收到的也時常是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sup>174</sup>

對各地的民眾來說，傳言（或「假新聞」）在補充戰時官方新聞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各種傳言提供了歷史學家所謂的「祕密宇宙」，使前線或後方的普通老百姓有能力質疑現實中的戰爭，以及戰爭目標的呈現方式。<sup>175</sup>在獨裁國家，傳言可以用來挑戰在公共場合必須保持沉默的禁令，並且藉此維持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德國負責管制國內新聞的親衛



隊保安處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總計截獲了兩千七百四十則傳言。這些傳言有的只涉及非常瑣細的小事，有的則嚴重到假造希特勒已死與納粹政府已遭推翻的消息，而這些傳言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傳播到全國各地。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頒布的法令對傳言與玩笑做出區別，後者被認定具有一定的積極價值，但前者則被認定為「惡意危害國家」而應處以嚴厲刑罰。<sup>176</sup>義大利由於缺乏可靠的新聞而導致傳言橫行，各地的法西斯主義者獲得上級授意，只要抓到造謠者就可以予以毆打或逼他們喝蓖麻油。<sup>177</sup>蘇聯的做法則是追捕那些失敗主義者與「帶有煽動性的傳言散布者」。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十二月這短短六個月內，蘇聯總共就逮捕了四萬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傳言傳播者與失敗主義者。<sup>178</sup>

在英國，傳言由情報部負責調查，警察則負責起訴「惡意的造謠者」。然而，一九四〇年夏天突然實施的嚴刑峻法引發民眾的強烈抗爭，當局只好在八月停止起訴。之後當局轉而以提供較詳實的資訊來對抗傳言。<sup>179</sup>在美國，特別是在與實際戰爭關係不大的孤立社群裡，傳言的散布尤其嚴重。戰爭情報局成立傳言控制小組，由霍洛維茲

（Eugene Horowitz）主掌的公共調查處管轄，負責調查傳言來源與提供必要資訊來粉碎傳言。此外也由志工在地方民眾發現與回報傳言出現的地方建立「傳言診所」，可能的話，他們還會運用地方新聞與廣播來更正這些不實傳言。<sup>180</sup>日本的街頭巷尾充斥著傳言，部分是因為日本的新聞報導公然假造日本勝利的消息，而這些消息一般人根本不會相信。從一九三七年秋天到一九四三年春天，日本有一千六百零三則傳言違反了軍事法規而受到調查，有六百四十六人遭到起訴。一九四二年之後，當局為了不讓傳言影響民心，因此根據「和平與秩序法」對數百人進行調查。<sup>181</sup>有些不實的傳言跟戰爭期間出現的各種迷信一樣，具有驅散

恐懼的效果。美國的傳言診所就發現，聽到傳言的人對於傳言的相信程度在五分之一到五分之四之間波動。當局對於這個現象相當重視，因此花了一番工夫監控傳言的來源與傳布的過程，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傳言足以動搖主流敘事。

民眾會援用官方宣傳的說法做為支持戰爭的道德理由，但從民眾援用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們不一定真正瞭解官方支持戰爭的偉大理由。民眾與士兵會在日記與書信裡複述官方支持戰爭的說法，並且使用官方措辭來表達自己的態度與情感。然而，戰時的政治宣傳在提到戰爭的道德理由時，往往使用讓一般民眾感到抽象與空泛的語言。美國的民調發現，真正瞭解羅斯福大敘事內容的受訪者比例少得可憐：大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民眾聽過四大自由，但只有百分之五的民眾知道四大自由包括免於恐懼的自由與免於匱乏的自由。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聽過《大西洋憲章》。<sup>182</sup>一九四三年，《生活》雜誌提到：

「軍中年輕人搞不清楚戰爭的意義。」以美軍士兵到義大利作戰的理由為題舉辦的徵文比賽，冠軍得主只寫了兩句話：「我為什麼來打仗，因為我被徵召入伍。」<sup>183</sup>

更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德國，當納粹黨與納粹政府認為猶太人應該為大戰負責並且主張德國人有道德義務保護國家不受猶太人威脅時，德國民眾對於這種主張究竟相信到什麼程度？無疑地，一定有相當高比例的德國民眾知道猶太人社群遭到流放，他們透過傳言或來自東線戰場口耳相傳的消息，或是德國領導人公開威脅消滅猶太人的言論，幾乎可以得知猶太人正受到系統性的殺害。一份估計顯示，三分之一的德國人知道或懷疑政府正在進行種族滅絕，不過實際比例可能更高。但知道是一回事，德國人是否都認同這件事則是另一件值得懷疑的事。<sup>184</sup>面對無所不在的反猶太主義宣傳，德國人不可能沒察覺到這些宣傳很可能轉變成

種族滅絕。到了戰爭中期，德國人持續被官方灌輸猶太人威脅的觀念。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戈培爾下令印製黑色小傳單，傳單上除了有猶太人的大衛之星，還寫著一行字：「德國人，這就是你的死敵」，還將傳單夾在每週發放一次的配給卡上。同年冬天印製的海報則解釋，猶太人「想藉由這場戰爭來消滅德國」。<sup>185</sup>數百萬份海報與小冊子重複同樣的訊息；《猶太人問題手冊》（*Handbuch der Judenfrage*）售出了三十三萬冊。一九四一年秋天，戈培爾的宣傳部門印行了《世界金權政治的戰爭目標》（*The War Aims of World Plutocracy*），這本小冊子是根據考夫曼的《德國必須滅亡》改寫而成，一共印行了五百萬冊。<sup>186</sup>

儘管如此，對於德國民眾對於這些宣傳的相信程度，以及他們內心如何運用這些宣傳來合理化這場戰爭，我們至今仍無法得到確切的證據與答案。我們從日記與信件可以找到許多文字紀錄，顯示一部分黨員與軍方人士確實相信這場戰爭是一場對抗世界之敵猶太人的鬥爭。一九四四年，尚未加入納粹黨的高階文官馬肯森（Georg Mackensen）留下的一份打字稿顯示，德國政權與猶太人對立之下產生的文化，深深影響了德國人對戰爭的看法：「這場戰爭並非普通戰爭，不是為了王朝或爭奪土地而發動。不！它是兩個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兩個互不相融種族之間的鬥爭……我們是雅利安人，他們是猶太人。這是一場決定我們西方文明存續的戰爭……。」<sup>187</sup>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證據顯示德國民眾對於政府的猶太人政策抱持懷疑、不確定甚至憎惡的態度，德國民眾也對於政府主張這場戰爭是一場對抗世界之敵猶太人的正義之戰而非對抗真正敵人的傳統自衛戰爭感到不滿。然而，這種對納粹黨大敘事的保留態度並不影響德國民眾的反猶太人情緒。他們依然希望從流放猶太人當中獲利，也對猶太人的命運無動於衷（儘管舉目所及都能看到猶太人的慘劇），但這種保留態度確實顯示德國民眾並不認同這場戰爭是一場

「純粹猶太人」的戰爭。德國民眾抱持的這兩種立場，到了戰爭末期逐漸結合起來，政府不斷宣傳如果戰爭失敗，那麼猶太人將會進行可怕的報復行動，而隨著盟軍轟炸日趨猛烈與紅軍的步步進逼，德國民眾也逐漸相信這種事將會發生，只是德國民眾的恐懼並非來自於他們相信世界猶太人的陰謀論，而是他們很清楚或部分知曉過去數年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對歐洲猶太人進行的迫害。<sup>188</sup>

對於世界各地被戰火波及的民眾來說，道德關切遠不如主流敘事來得普遍而全面。無論是士兵還是平民，都會自行建構一套主觀的私人敘事來解釋發生在他們周遭的戰爭以及自己在當中的地位。認同國家提供的理由，可以讓家人認定親人的死是有價值的，甚至是高尚的，而不至於認為親人死得莫名其妙或毫無意義。民眾最重要的期盼就是結束戰爭，這也是為什麼各國民眾普遍願意集體地投入戰爭——儘管蘇聯絕大多數民眾都憎恨史達林與共產黨的統治，或者在日本，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對戰爭抱持保留態度且不信任國家的主張。<sup>189</sup>除了順從、自願或其他方式，民眾還必須適應戰時僅剩的私人領域。道德義務不僅延伸到家人與朋友，也延伸到同事與不在前線的戰鬥人員。對於軍人來說，道德義務擴大到鄰接的部隊，包括步兵連、轟炸機機組人員或潛艦人員。在美國，許多私人的戰時敘事重點都放在保護家人與平日的家庭生活，將抽象的義務轉變成個人的責任感。藝術家洛克威爾繪製的四大自由畫作就運用了傳統家庭意象，包括感恩節晚餐、小孩子在床上安睡、村鎮大會，試圖以可理解的方式將私人領域與更廣泛的倫理意義連結起來。<sup>190</sup>西方民眾的期盼可以接受檢視也可以自由表達，研究發現絕大多數民眾希望返回常軌，恢復以往沒有戰爭的生活。在英國，戰爭中期進行的納菲爾德學院社會重建調查顯示，民眾對於大規模戰後計畫興趣缺缺，只希望能回到以往的私人生活，不希望政府過多的干預，並且期



望經濟能更安穩一點。在美國，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希望實現更直接與更經驗性的目標，例如就業、住房與個人安全，對於擔任世界的良心則缺乏興趣。<sup>191</sup>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德國人、蘇聯人或日本人也將私人的義務領域及私人的期盼，與公共的戰爭區別開來。蘇聯民眾希望自己的犧牲能在戰後換來更好的生活，能免於共產黨的控制與擺脫經濟貧困。蘇聯當局在戰爭爆發時就已經意識到，以馬列主義理想為訴求無法打動一般民眾。因此，當局的政治宣傳適切反映了蘇聯當前的現實，也就是蘇聯士兵與工人是以私人角度而非國家角度來看待這場戰爭——目標是保衛自己的家庭、家園與家鄉。官方報紙允許刊載表達對家人情感的私人信件，而這些在一九三〇年代遭到忽視的事物，此時卻能切實反映民眾的情感。對民眾來說，為私人動機而戰，遠比為曖昧不明的共產黨國家而戰來得明確。<sup>192</sup>在德國，私人的焦慮與希望無法公開表達，但卻真實存在。一九四五年，在地中海戰場，德國戰俘之間的對話遭到竊聽。一名年輕的德國中尉表達出戰鬥職責與戰爭對於日常生活的破壞，以及這兩者之間形成的拉扯：

當我想到戰爭對我還有我這個世代的破壞，我不得不感到震驚！.....我人生中最精華的歲月全虛擲了——寶貴的六年，我應該可以拿到化學博士學位、結婚、養家，為自己還有國家做出貢獻。現在的我孑然一身，反而不如六年之前。<sup>193</sup>

如果他還在前線，他肯定無法公開表達這樣的情感。畢竟在獨裁國家，在公共的責任倫理與為戰爭投入而犧牲，以及私人對戰爭的看法（無論是批判、懷疑、不信任或冷漠），兩者之間幾乎不存在嚴重的不

一致。只有在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才在面臨即將到來的盟軍入侵與戰敗時，出現了私人不滿與集體投入產生直接衝突的情況。拒絕參戰，不願履行讓社會繼續作戰的道德義務，有機會能做出這類決定的畢竟是少數。

## 反戰運動與和平主義的兩難

一九四二年，美國紐約社區教會創始人暨甘地非暴力抗爭的追隨者史密斯牧師（Jay Holmes Smith），提出「總體和平主義」一詞來反對總體戰。<sup>194</sup>這項主張極具挑戰性，因為即使在允許民眾可以訴諸良心而拒絕服役的州，依然只有極少數人採取絕對和平主義的反戰倫理立場。參與總體戰成為一種道德的無上命令，反暴力的良心主張也無法與之相抗，就算教會與教士在戰前極力譴責美國參戰只會引發新一輪衝突，卻於事無補。儘管如此，和平主義並未因戰爭的來臨而停歇，也未因全民投入戰爭的宣傳而銷聲匿跡。反對戰爭暴力的道德異議，早在戰前就已經蓬勃發展，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依然持續不輟。

一九三九年後，採取反戰道德立場的人少之又少，這在歷史上是個相當弔詭的現象，因為在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整個西方世界其實瀰漫著強烈的反戰情緒。一九二〇年代，反戰除了是回應剛結束的一戰，也是對新一波國際理想主義的支持，這種國際理想主義體現在國際聯盟的成立上。反戰運動的組成十分多元，包括完全反對任何軍國主義的激進和平主義者、主張戰爭與基督訓示毫不相容的基督教和平主義者、把和平視為理想願望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以及形式上不是和平主義者但仍努力追求和平的保守反戰遊說團體。這些和平主義者在外觀上有

著明顯差異，但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不計一切代價避免戰爭。除了反戰，這些和平主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緊張關係。好比基督教和平主義者強調從倫理上反對暴力，激進的和平主義者則是在政治上反對掀起戰爭的體制，還有一些和平主義者雖然反戰，卻不排除發動正義之戰的可能。

最大的反戰遊說團體反而來自一九一八年的戰勝國，不過在戰敗的德國，一九二〇年代也出現立場各異的和平主義團體。這些團體共同組織成鬆散的「德國和平卡特爾」，最成功的團體「不再有戰爭運動」的德國支部，領導者是德國週報《另一個德國》（*Das andere Deutschland*）創辦人庫斯特（Fritz Küster）。與其他和平組織一樣，這個團體最後被希特勒政權解散，領導人也被逮捕入獄。<sup>195</sup>在法國、英國與美國，和平主義與反戰情緒在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達到世紀巔峰。法國和平主義擁有廣大的支持者，包括一戰的退伍軍人，也就是和平主義退伍軍人，他們反對重蹈覆轍重啟戰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至少有五十個團體提出了和平主義計畫，從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到基於道德理由反對所有形式的暴力與宣揚所謂的「完整和平主義」。當中最成功的運動是梅里克（Victor Méric）於一九三〇年創立的和平戰士國際聯盟，會員約有兩萬名。該聯盟開宗明義便表示，政治、哲學與宗教訴求都偏離了主要目標：「真正重要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和平。」<sup>196</sup>一九三六年，法國總理暨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éon Blum）在巴黎發動百萬人和平遊行。同年九月，法國和平主義者協助舉辦國際反侵略大會，整合西方民主國家的反戰運動，包括英國國際聯盟聯合會，其名義會員大約有一百萬人，是歐洲最大的反戰團體。

英國的和平運動也是在一九二〇年代便已高度發展，當時即以建立了國家和平委員會。這是一個傘狀組織，涵蓋了許多分支團體，包括「不再有戰爭運動」，但排除了較激進的「反戰國際」，後者由英國和

平主義者布朗（H. Runham Brown）在倫敦北部的家中成立。反戰國際恪守「戰爭是反人類罪」的原則，反對以任何形式參與戰爭，無論直接或間接。<sup>197</sup>英國民眾對於推動和平顯得相當踴躍，而且不分黨派。一九三四年，國際聯盟聯合會連同其他和平運動共同發起一場全國性活動，要求選民連署支持聯盟的國際主義。這場運動很快就被稱為「和平投票」，組織者成功贏得將近一千兩百萬人投票支持國際聯盟提倡和平的工作。做為英國和平主義的情感象徵，這場運動被視為一場勝利。一九三四年，聯合會會長塞西爾勳爵寫道，世界面臨選擇，「是合作與和平，還是無政府混亂與戰爭」？<sup>198</sup>同年，誓言和平聯盟成立，該團體成為人數最多的絕對和平主義遊說團體。聖公會牧師謝波德（Dick Sheppard）要求男性（之後也包括女性，不過幾乎沒人參與）簽下誓約，未來絕不參與或支持戰爭。一九三六年，當這一誓言運動正式發展成誓言和平聯盟時，其成員達到十二萬人。到了一九三九年，聯盟在英國各地的分支組織已達到一千一百五十個。一九三七年十月，謝波德在工作時去世，民眾排隊兩天瞻仰遺容。前往聖保羅大教堂的葬禮行列，兩旁擠滿大批民眾。雖然絕對和平主義在反戰人士中只占少數，但卻表達了絕大多數英國民眾的和平渴望。<sup>199</sup>

在美國，一戰的經驗使得和平運動開始制度化。美國民眾普遍相信，美國是受到歐洲人的欺騙而加入戰爭，歐洲人從新世界取得金錢與人力，卻未回報新世界。雖然美國參議院於一九二〇年否決參與國際聯盟，但追求和平依然是美國的核心價值。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世界和平基金會都成立於一九一〇年，這兩個基金會在一九一九年後成為美國追求無戰爭世界的主要機構。此外還有「全國戰爭起因與消除戰爭委員會」，成員約有六百萬名女性。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律師李文森（Solomon Levinson）又創立美國戰爭非法化委員會。婦女和平團體則



試圖讓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要求「無論基於任何目的所發動戰爭均屬違法」，只不過未能成功。<sup>200</sup>一九二八年，美國國務卿凱洛格（Frank Kellogg）與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說服五十九個國家簽署《非戰公約》，這場和平運動取得了比國際聯盟更大的成就。美國雜誌《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在參議院批准公約之後表示：「今日，國際戰爭已被逐出文明世界之外。」<sup>201</sup>

一九三〇年代，由於國際危機日漸加深與政治上傾向於孤立與中立，民眾的反戰情緒也持續高漲。主要的和平主義組織如反戰聯盟、和解團契、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等，在這十年間成員皆大幅增加。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成立於一九一五年，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成員已有五萬人，組織遍布二十五個國家。<sup>202</sup>聯盟創立者是美國社會學家珍·亞當斯（Jane Addams），她於一九三一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為了彰顯當前世代不願支持戰爭，七十五萬名大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和平，並且向反對他們的教授表示抗議。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遊說團體，製作出一面諷刺旗幟，上面寫著「未來戰爭的退伍軍人」，這一做法很快就被全美三百所大學仿效。針對兩萬一千名大學生進行的民調發現，百分之三十九的大學生是「毫不妥協的和平主義者」。<sup>203</sup>羅斯福總統不是和平主義者，但他也公開表示自己希望能避免戰爭。一九三九年四月，羅斯福在紐約萬國博覽會的開幕演說中提到，美國的未來與一顆星星息息相關，「一顆國際善意之星，更重要的是，一顆和平之星。」隨著世界陷入戰爭，博覽會的組織者也將博覽會的主題從「明日世界」改為「和平與自由」博覽會。<sup>204</sup>

儘管反戰運動在大西洋兩岸獲得數百萬人的響應，卻無法抵擋席捲全球的危機。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國國會在只有一票反對下通過對德宣戰案。投下反對票的是主張和平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麥戈文（John

McGovern），他在下議院解釋自己的立場時表示，他從宣戰中看不到任何理想，只看到「冷酷的、毫無靈魂的、令人惱火的人與人之間為了奪取利益而進行的唯物主義鬥爭」。<sup>205</sup>在美國，即便是反戰情緒甚囂塵上的一九四一年，也在珍珠港遭受攻擊後出現了只有一票反對宣戰的情況，投下反對票的是推動和平主義多年的蒙大拿州共和黨眾議員蘭金（Jeannette Rankin）。事實上，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之前，反戰運動已經呈現明顯崩潰的態勢。獨裁國家的政治文化崇尚鬥爭，要求民眾為了種族或革命的未來而戰，因此這些國家在一九三〇年代毫無和平主義或反戰情緒發展的空間。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平主義領袖不是被迫流亡海外，就是被送進監獄或集中營，因為他們的信念在政治上無法見容於正在軍國主義化的社群。一九三九年，當希特勒被問到如何處置那些基於道德理由而拒絕服兵役者時，他的答覆是：在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時，個人信仰必須屈服於「更高的倫理目的」。<sup>206</sup>史達林的蘇聯也對和平主義視若無睹，反軍國主義在蘇聯被當成資產階級的偏差思想。努力苦撐的主要和平主義組織托爾斯泰素食協會，最終仍於一九二九年遭到解散。其他以和平主義為中心原則的宗教教派，要不是被迫放棄自身的立場，就是像德國和平主義者一樣被關進蘇聯集中營。<sup>207</sup>

民主國家的和平主義並未遭受直接迫害，但日漸加劇的戰爭危機卻讓反戰運動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痕。對許多非宗教性的和平主義者來說，西班牙內戰成了分水嶺：他們發現自己很難做到既要在道德上反戰，又要痛恨法西斯主義。主要的和平主義領袖不得不放棄反戰宗旨，投入對抗暴政的正義之戰。長年推動和平運動的布羅克韋（Fenner Brockway）在回憶錄裡提到，「面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主張和平已無意義。」<sup>208</sup>一九三九年，隨著德國威脅再起，法國的和平主義瞬間化為泡影。昔日投入和平運動的布魯姆如今表示：「今日，要訴諸和平，就

必須訴諸武力。」<sup>209</sup>在美國，知名神學家與和平主義者尼布爾也放棄了和平主義，創立了民主行動聯盟，主張「充分的軍事參與」以去除法西斯主義威脅。一九四〇年成立的聯合和平主義委員會旨在反對美國的徵兵制度，但在一九四一年卻因為遭受各方指控而頓失奧援。當時的美國民眾已開始認為，和平主義要不是共產主義滲透的幌子，就是用來掩護美國極右派分子奪權。<sup>210</sup>

國聯的失敗與各國競相重整軍備，使立場較溫和的反戰團體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於是反戰團體只能矛盾地表示：為了恢復和平，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弔詭的狀況也在「和平投票」中出現，在被問到戰爭能否做為阻止侵略的最終手段時，有六百八十萬人投票表示肯定。參加反戰運動的人其實絕大多數並非和平主義者，當面臨戰爭現實時，這些人都同意必須暫緩反戰運動，並且將目光放在建立更好的戰後世界上。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人數愈來愈少，而一般民眾也開始懷疑，無論這些人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的做法都是在助長敵人的氣焰。歐戰爆發後，英國民眾對於倫敦的誓言和平聯盟發起的活動感到不安，於是要求該組織必須解散。雖然英國政府不願直接下達禁令，但絕對和平主義者仍受到祕勤單位的監控。六名誓言和平聯盟的工作人員因為散布「只要人們拒絕戰鬥，戰爭就會停止」的海報而遭到起訴。<sup>211</sup>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誓言和平聯盟祕書長莫里斯（Stuart Morris）因為違反《國防條例》第18B條而遭到逮捕，並且依照《官方機密法》被起訴。<sup>212</sup>面對戰間期和平運動的全面潰敗與民眾對戰時異議分子的敵視，絕對和平主義團體的成員愈來愈難以立足。就連其他和平主義者也對絕對和平主義團體毫不妥協的態度感到憤怒。英國和平主義者薇拉（Vera Brittain）就抱怨道：「這些無可救藥的少數人士」，其所做所為對於追求和平的道德承諾只能說是弊大於利。<sup>213</sup>

剩餘的和平主義者只能冀望能從基督教會獲得一點支持，畢竟在一九三〇年代許多教會人士也曾基於道德理由反對戰爭。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主任牧師英格（William Inge）就曾表示：「身為基督徒，我們注定是個和平主義者。」<sup>214</sup>基督教和平主義者從耶穌的教誨中得到啟示，特別是「不要抵抗惡人」。一九三六年，美國循道宗正式宣布，戰爭是「對基督理想的否定」。<sup>215</sup>一九三九年十月，為了因應戰爭爆發，美國基督教會聯邦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認為戰爭「是違背基督內心的邪惡事物」。<sup>216</sup>一九四〇年夏天，英格蘭聖公會和平主義牧師遊說大主教支持和平運動，他們認為反戰正可表現「耶穌基督的真理與明晰」。<sup>217</sup>然而，聖公會高層向來都不是和平主義者。早在一九三五年，當聖公會遭到質疑並被要求對基督徒參與戰爭是否有違基督教教義做出解釋時，坎特伯里大主教科斯莫朗（Cosmo Lang）便曾表示，若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結果將淪為無政府狀態：「我不相信基督教會逼迫我做出反戰的結論。」一年後，科斯莫朗與約克大主教坦普爾

（William Temple）向支持和平主義的牧師解釋，如今時移世異，「參與戰爭與基督教的責任不相衝突。」<sup>218</sup>就連批評現代戰爭最力的奇切斯特主教喬治·貝爾（George Bell）也在一九四〇年表示，當前的戰爭宛如「上帝的審判」，是當前「人與人以及國與國之間暴力、殘酷、自私、仇恨橫行」造成的不可避免結果，因此每個有良知的基督徒都該拿起武器挺身對抗。貝爾引用英格蘭聖公會第三十七條信綱，主張基督徒「在統治者命令下」拿起武器參與戰爭是合法的，更何況這是一場對抗「野蠻暴君」的戰爭。<sup>219</sup>只有伯明罕的巴恩斯（Ernest Barnes）這一名聖公會主教在戰時堅持和平主義立場，他抱怨說：「如今為了戰爭，連基督教都可以出賣。」<sup>220</sup>

與英格蘭聖公會一樣，各國基督教會也紛紛對國家的戰爭投入提供



道德與實際的支持，這種現象在一戰時也曾出現過。有時候，即使教會成為國家差別待遇或迫害的對象，教會也依然支持參戰。除了信守較傳統的道德承諾為受苦的信眾提供心靈安慰，並且為國家的戰爭投入進行愛國祈禱，教會其實也有著制度上的自利動機。無條件支持戰爭可以整合宗教與國家，維護教會的利益，這充分說明了教會為什麼願意支持戰爭。在德國，儘管希特勒政權在本質上反對教士階層，但教會仍普遍支持戰爭投入。一九三九年九月，當信義宗主教「為我們的元首與帝國，為我們的軍隊，以及為祖國盡責出力的人禱告」時，他們並不認為德國入侵波蘭有何不義之處。認信教會（The Confessing Church）是一九三四年由一群批判德國宗教政策的新教教士成立的分離教會，但他們卻全力支持德國的對外戰爭，而且他們還認為根據《羅馬書》第十三章聖保羅的訓示，信眾應絕對服從既有的權威。雖然教會對於這場戰爭在神學上是否真的是一場「正義之戰」抱持懷疑，但就連最激進的教士也同意信眾必須「服從上帝的命令」與服從國家。<sup>221</sup>認信教會的信眾願意加入軍隊且譴責反戰的良心犯，這種服從政權的態度使認信教會在戰時較少受到國家的打壓。天主教教士在一九三〇年代遭受希特勒政權反基督教活動的打擊遠甚於新教徒，原因就在於他們在支持戰爭的態度上較為審慎——他們雖然也禱告，但不是為了勝利而禱告，而是為了祈求「正義和平」到來。但即使如此，天主教主教依然根據「正義之戰」的傳統來看待這場戰爭，而且將自己定位成愛國者，願意支持那些履行軍人職責的人。加倫主教（Bishop Galen）因為譴責納粹對身障者「安樂死」的計畫而聞名，但他卻也讚揚在東線戰場捐軀的士兵是對抗「撒但意識形態體系」的十字軍。<sup>222</sup>十字軍形象因此被廣泛用來定義這場對抗無神論蘇聯的戰爭。在芬蘭，陸軍首位隨軍主教比約克倫德

（Johannes Björklund）在一九四一年要求芬蘭信義宗教士參與「這場全

歐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讓軍隊與教會共同投入這場「聖戰」。芬蘭隨軍牧師營造出一種由「十字軍戰士」發起的上帝之戰的形象，「士兵的旗幟上標誌著十字架」。<sup>223</sup>

在並非基督教國家的蘇聯與日本，兩國的教會也透過支持戰爭向國家輸誠，藉此避免國家的壓迫與監控。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時，俄羅斯正教會已處於極度危險的狀態：在此之前，約有七萬名教士與世俗人員在大清洗時期死亡，八千座教堂與宗教房舍遭到關閉。但就在開戰的第一天，列寧格勒都主教謝爾蓋（Metropolitan Sergei of Leningrad）便激勵民眾要保衛祖國，「將法西斯主義的敵對力量化為齏粉。」<sup>224</sup>東正教確實存在著愛國主義，秉持教會在俄羅斯陷入戰爭時支持國家的悠久傳統。戰爭一開打，教會便開始向信眾募集捐款，為傷兵提供救濟與醫療設施，為士兵與難民提供衣物，出錢購買武器，包括空軍中隊使用的炸彈「為祖國而戰」。在戰爭期間，估計教會捐贈了約三億盧布。長久以來未能擁有實質宗教自由的東正教基督徒，此時自發地請求重新開放教堂，促使史達林鬆綁反宗教運動與任命新任的東正教牧首。教會雖然在道德上支持戰爭，卻不等同於支持共產主義政權。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教會會議上，教會高層呼籲全世界基督徒牢記基督所言，「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把這場戰爭視為基督教十字軍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而非蘇聯共產主義的勝利。<sup>225</sup>即使在戰爭期間，共產黨仍未停止宗教迫害。分離的東正教約瑟夫派（Orthodox Josephite）仍然毫不妥協地反對獨裁政權，因此遭到安全警察的追捕，信徒被送進了古拉格集中營。不令人意外的是，史達林的宗教緩和政策果然在戰爭結束後兩年告終，但教會的背書卻協助了蘇聯的戰爭投入，讓東正教信眾從另一個角度將這場戰爭解讀為正義之戰。<sup>226</sup>

日本的狀況較為複雜。在昭和天皇統治期間，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被

轉變成「國家神道」，全體日本民眾都要在神社進行膜拜，向被奉為神明的天皇效忠。這種服從天皇國家的文化深植於日本社會之中。對於基督教各個教派來說，日本的國家神道對基督教信仰構成的挑戰，其實遠不如歐洲獨裁政體對國家的尊崇來得大，因為基督徒對上帝的忠誠與對天皇的忠誠並非彼此對立，而是可以同時存在。在漫長的大東亞戰爭期間，絕大多數基督教會都同意這場戰爭是一場讓亞洲擺脫歐洲控制的正義之戰或聖戰，亞洲可以藉此甩掉歐洲的包袱，建立所謂的「純粹的基督教」。戰爭與日本基督宗教形式的關連性，可以從實現教會統一協會於一九四二年十月提出的主張看出：

吾等信仰基督之人，堅信我們的重責大任在於致力建立純粹的基督教，我們必須摧毀敵人的思想意圖與情報，我們必須去除英國與美國的顏色與氣味，我們必須消滅一切仰賴英美的宗教、神學、思想與組織。<sup>227</sup>

唯有等待耶穌再臨的聖潔教會與耶和華見證人拒絕接受天皇是神的觀念，也不願支持戰爭投入，他們因為違反一九二八年的《宗教組織法》與挑戰國家的神聖性而被捕入獄。

天主教會的處境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因為教宗具有超越國界的權威，而非只是特定國家的代表。教宗與天主教會所有交戰陣營中都有著大量的追隨者。二戰期間，梵蒂岡既不願譴責侵略行為，也不願提出有違基督教價值的建議，例如鼓吹天主教徒參與戰爭。一九三九年，就在歐戰爆發前，剛當選的新任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從一開始就採取一戰時期教宗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的做法，既不表態，也不偏向任何一方。庇護十二世表示，無論天主教徒在何處戰鬥，他最關

心的是「靈魂的救贖」，而唯有悔罪與禱告才能通往救贖之路。但庇護十二世心裡也很清楚，如果他過度挑釁獨裁者，將為天主教會的存續帶來危險。梵蒂岡實際上位於法西斯主義政權的首都，而從一九四三年九月之後，這座首都又落入德軍之手。庇護十二世確實譴責不義與虐待，但他並未針對猶太人遭受迫害表明立場，只因他想避免天主教會陷入選邊站的窘境。庇護十二世在一九三九年耶誕夜做出重大干預，他向樞機團提出了五項條件做為符合榮譽與正義的和平基礎。第一項條件顯然考慮到天主教波蘭最近的遭遇：「民族無分大小強弱，必須確保各民族的生存與獨立權利。」第五項條件要求政治人物謹記基督的登山寶訓與「對正義的道德渴望」，要接受普世之愛的指引，要依據「神聖不可侵犯的上帝律法標準」來承擔責任。<sup>228</sup>這些條件隱含著對軸心國侵略的譴責，只是這項和平計畫很快就宣告失敗，而庇護十二世後續便不願意再表態反對這場戰爭。

庇護十二世私下認為希特勒已經被魔鬼附身，他曾數度暗中進行遠距的驅魔儀式，想讓希特勒脫離魔鬼的掌握。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他才公開向樞機團表示自己認為希特勒是不折不扣的撒旦崇拜者。<sup>229</sup>儘管如此，梵蒂岡的戰時立場卻因為軸心國入侵蘇聯而變得模稜兩可，因為天主教高層與教士絕大多數都希望軸心國能消滅無神論的布爾什維克。天主教的反共立場使梵蒂岡難以譴責德國與軸心國入侵者的所做所為，也導致日後梵蒂岡當局得知德國的種族滅絕計畫時，竟也未能提出批判。的里雅斯特主教與庇護十二世見面討論猶太人問題之後抱怨說：「整個世界都已經陷入火海，而梵蒂岡卻還在沉思永恆真理與熱衷禱告。」<sup>230</sup>在這件事情上，庇護十二世也深信，審慎才是更具有勇氣的表現。他對義大利軍醫院隨軍神父斯卡維齊（Father Scavizzi）說道，看到猶太人的遭遇，「他為猶太人感到難過與痛苦」，但也擔心自



己若是介入，可能會弊大於利，甚至會引發「更嚴重的迫害」。<sup>231</sup>在戰場上，天主教徒各自依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但在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上，梵蒂岡仍審慎保持中立，至於各國天主教會則是盡可能避免表現出不夠愛國的樣子。

對於把和平主義奉為神學上絕不可違反的原則的教會來說，例如新教徒與不從國教者，是否參戰成了更艱困的道德難題。貴格會、循道宗、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門諾會、公理會與浸信會都反對戰爭，但面對這場被世人定義為基督文明與黑暗力量的衝突，和平主義教會發現自己必須做出妥協。一九四一年，蘇聯的門諾會為了避免遭到迫害，不得不參與戰鬥。在德國，人數不多的貴格會於一九三五年發表了「和平證言」，重申公誼會將致力於和平主義，但這項聲明對於信眾並無拘束力，在所有服兵役的貴格會成員中，只有一人是非戰鬥人員。<sup>232</sup>在英國，幾個主要的非國教教會對於這場正義性無可非議的戰爭出現了南轅北轍的立場。浸信會花了四年時間決定信眾是否可以參與戰爭，循道宗則交由信眾自行決定，貴格會獲准維持拒絕暴力的決定，因為與此同時貴格會鼓勵自己的信眾積極參與在前線與後方的民防與醫療服務——弔詭的是，當時這類工作被稱為「前線和平主義役」。<sup>233</sup>在珍珠港事件前幾年，美國新教教會對戰爭可能性所提出的回應也同樣模稜兩可。並非所有所謂的「和平教會」都是嚴格的和平主義者，不過這些教會確實都奉行「不要抵抗惡人」的原則，拒絕使用暴力。一九四〇年，循道宗在大會上決議通過，教會「將不會正式背書、支持或參與戰爭」，但在一九四一年後，循道宗的信眾卻能自由決定是否基於上帝與教會正處於戰爭而參戰，即使他們並未正式處於戰爭狀態。在一九四四年循道宗大會上，代表們終於推翻不祝福戰爭的決定而同意信眾可以「為勝利禱告」。<sup>234</sup>長老教會大會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接受戰爭是「必要且正當

的」，然而在此之前已經有許多信眾投身軍旅。一九四二年，公理會基督徒大會以四百九十九票贊成對四十五票反對通過支持戰爭，因為「軸心國的侵略極其殘酷與無情，他們的意識形態將會毀滅我們珍視的自由.....」。235門諾會與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堅守不抵抗原則，但兩派的信眾仍以別的方式投入戰爭。英美的宗教和平主義並未採取當面拒絕參與戰爭的做法，而是透過間接的方式來支持戰爭的道德目標。

無論在同盟國還是軸心國陣營，只有一個教會自始至終堅決反對參戰，那就是聖經研究協會，另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稱是「耶和華見證人」（自一九三一年在紐約建立總部時採用了這個名稱）。耶和華見證人不僅無條件反對戰爭與服兵役，也不理會國家的要求。這場運動其實也不全然是絕對和平主義，因為耶和華見證人等待的其實是一場末日戰爭，也就是撒但與上帝的最後一戰。他們只願意加入「上帝的軍隊」，而不願接受徵召加入無神的國家，因此他們始終毫不妥協地反對戰爭。236在每個地方，耶和華見證人都因為基於良心拒服兵役而受到懲罰，特別是他們堅持戰爭是黑暗力量的展現，即使在英美這兩個在和平時期願意容忍他們的國家，也無法允許他們在戰時拒絕國家的徵召。在德國，耶和華見證人於一九三三年遭到禁止，他們因此必須祕密集會與組織。在兩萬三千名耶和華見證人當中，有一萬名遭到監禁或送往集中營，其中包括婦女，孩童則交由國家監護。唯有願意撤回主張的人才能獲得釋放，但幾乎沒有人這麼做。一九三九年之前，拒絕服兵役者必須坐牢一年，但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布的新兵役法令中，拒絕服兵役可以判處死刑。被送到帝國軍事法庭審判的人當中，耶和華見證人占了很高的比例，因「顛覆國家軍事力量」而被起訴的耶和華見證人有四百零八名，其中有兩百五十八名遭到處決。由巴斯蒂安海軍上將

（Max Bastian）領導的帝國軍事法庭，理論上可以在耶和華見證人願意

撤回主張的前提下減輕刑罰，但德國與普魯士軍法傳統卻總是鼓勵法官處以嚴刑峻法。<sup>237</sup>在日本，耶和華見證人拒絕將天皇奉為神明，還認為這是魔鬼的產物，他們也因為拒絕服兵役而遭受懲罰（但也只有五人）。<sup>238</sup>在英美，在所有和平主義與反戰團體中，耶和華見證人特別被挑出來接受嚴懲。以美國為例，因拒絕服兵役而被監禁的人當中三分之二是耶和華見證人。不僅如此，耶和華見證人也被指責為缺乏愛國心而遭受群眾暴力，好比在亞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就出現群眾圍住一名耶和華見證人並對他咆哮的場面：「納粹的間諜！吊死他！砍掉他的頭！」<sup>239</sup>在英國，耶和華見證人主張一萬四千名信眾全部都是教會的傳道者，每個人都有勸人皈依的任務。然而，耶和華見證人的主張受到忽視，組織也遭到否定且不被承認是宗教教派。最後，耶和華見證人的集會遭英國當局依照《國防條例》第39E條予以禁止。<sup>240</sup>耶和華見證人區別非上帝與上帝的戰爭，充分顯示他們並非反對戰爭本身（儘管最終的反基督之戰在現實中似乎不太可能發生），因此他們無權主張自己是基於良心而反對當前的戰爭。<sup>241</sup>

到頭來，只有那些基於個人良心而反對服兵役的男性（與少數女性），會主張基於道德理由反對參與戰爭。要提出這樣的主張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他們不僅要面對民眾強烈的不滿，還要承受戰時國家的壓迫。我們無法得知有多少人在接受訓練或奉命殺人時感到道德上的歉疚，但這些人的數量肯定不少。許多人擔心背負懦夫的汙名與害怕受到懲罰，因而不得不拋開內心的忐忑不安。在戰時保衛自己的國家與社群，這項義務也被視為是一種良知的表現；拒絕擔負保衛家國重任的人，會因此被視為違反更崇高的道德義務。當時主要也只有英美兩國才有可能讓人以良心為由拒服兵役，而且條件十分嚴苛。在獨裁國家，良心拒服兵役的正當性在戰爭爆發時遭到徹底抹除。在蘇聯，一九一九年

的自由派法令允許良心拒服兵役，但國家對於和平主義者愈來愈敵視，到了一九三〇年已幾近於完全取消良心拒服兵役的權利。拒服兵役者會被逮捕入獄或送往古拉格，刑期最高可以達到五年。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大清洗期間，無人申請良心拒服兵役，這項權利到了一九三九年被徹底刪除。<sup>242</sup>在德意志第三帝國，一九三五年通過的徵兵法並未規定良心拒服兵役的權利，因此不願服兵役的人會被當成逃兵而遭到監禁。納粹政權凌駕於軍事司法之上，堅持要將拒服兵役者送進集中營，絕大多數是耶和華見證人。一九三九年九月，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首次處決了拒服兵役者，而整個二戰時期估計有三百多人被因此處死。在一個以處決壓制道德拒服兵役的政權裡，拒服兵役需要堅定的信仰與特殊的勇氣。<sup>243</sup>

在英國、美國與大英帝國自治領，當局做出了允許民眾基於良心拒服兵役的決定，這種做法不僅反映政府對於在一戰期間拒服兵役者受到的待遇表達關切，同時也顯示在自由民主國家進行徵兵時，必須面對少數和平主義者毫不退縮地反對挑戰。相較於軸心國的嚴密監控，民主國家的民眾享有良心自由，這使得民主國家無法否認民眾有良心拒服兵役的自由。貝佛里奇（William Beveridge）曾在戰時針對戰後福利國家擬定計畫，他表示，國家允許民眾拒服兵役乃是「英式自由的極端例證」。<sup>244</sup>然而，貝佛里奇的觀點與拒服兵役者實際受到的待遇並不一致。英國與美國一樣，基於非宗教因素而拒服兵役的人，其道德立場很少為一般人所接受。地方法庭必須針對拒服兵役者的信念是否真誠進行審理，一名庭長要求法官同仁謹記，「有些人相信戰爭是恐怖的、徒勞的或毫無必要的，這種想法確實使他們深信戰爭是錯誤的」，但有些法官仍對世俗的和平主義感到懷疑。一名法官說道，堅持在政治上拒服兵役的人，很有可能是法西斯主義者。<sup>245</sup>申請拒服兵役的人，絕大多數



必須在法官面前證明自己確實擁有真誠的宗教信仰，因為唯有宗教才是可用來拒服兵役的道德理由。

英國有六萬名良心拒服兵役者，其中只有極少數能無條件免於從事任何形式的戰時活動。法庭會對拒服兵役者進行交互詰問，以確認他們的道德觀點是否無懈可擊。有拒服兵役者不斷地主張「只有愛，而非暴力，才是宇宙的終極力量」，但這樣的觀點並不被法官採納。是否長期加入某個和平主義教會與得到牧師的支持，乃是取得免疫或改服農業役及民防役等其他役別的關鍵因素，前者只有百分之四點七的人申請成功，後者約有百分之三十八。此外還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被分派到軍中擔任非戰鬥人員，而剩餘的百分之三十則因為無法提出適當的理由說服法庭，因而不被承認是良心拒服兵役者。在堅持拒服兵役的人當中，有五千五百名被送進監獄，包括五百名女性，有一千名由軍事法庭審判後被送進軍事監獄。由於民間勞動力也必須接受徵召，因此有六百一十名男性與三百三十三名女性因為拒絕在戰爭產業工作而遭到定罪。<sup>246</sup>有些人獲准拒服兵役，條件是他們必須從事社區工作，和平主義者設立了幾個小型的農村社區供拒服兵役者在此工作，中央良心拒服兵役委員會人員日後稱這類社區為「戰爭汪洋中的反戰島嶼」。<sup>247</sup>戰前成立的基督教和平主義林業與土地管理單位提供拒服兵役者一個環境，讓他們能擺脫在別處遭受的敵視。誓言和平聯盟經營一處面積三百英畝的農場，拒服兵役者在這裡接受社區土地訓練協會的培訓，使他們能適應農村工作。<sup>248</sup>被派去從事民防的拒服兵役者還要克服其他的障礙，因為民防本身就帶有準軍事的性質。大約有兩千八百名拒服兵役者拒絕接受民防體檢，因為這類體檢複製了軍隊的體檢程序，而他們在此之前已經拒絕接受軍隊的體檢；有些拒服兵役者自願加入消防役，卻發現自己可能需要使用槍枝來保衛消防單位。<sup>249</sup>成立於一九三九年的中央良心拒服兵

役委員會向內政大臣莫里森（他曾在一戰時因良心拒服兵役）施壓，要求保證和平主義者不會被要求做出任何破壞他們拒服兵役的事。到了一九四三年底，莫里森終於同意不許要求拒服兵役者做出「有損他們良心」的事，並且承認他們的道德立場應該獲得尊重。

在美國，良心拒服兵役帶有更濃厚的政治色彩。一九四〇年的《義務徵兵法案》在和平主義者與教會的壓力下做了修訂，允許民眾有權基於宗教理由拒服兵役，至於宗教以外的理由則屬違法。<sup>250</sup>幾個主要的和平主義教會設立了全國宗教拒服兵役者委員會，政府也將該委員會視為已登記的拒服兵役者的代表。雖然拒服兵役在法律上獲得允許，但在民間卻引發反彈，而且也得不到政治領袖的支持。羅斯福不想「讓拒服兵役者如此輕鬆地逃避義務」，而是希望將這些人送進軍中操練一下。羅斯福的繼任者杜魯門則表示，他實際接觸過的拒服兵役者「都是一群懦夫與開小差的傢伙」。<sup>251</sup>負責徵兵計畫的赫希將軍（Lewis Hershey）則認為，為了這些人好，拒服兵役者「最好別讓別人知道他們拒服兵役」。<sup>252</sup>徵兵局同樣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那些自稱基於道德而拒服兵役的人。一名官員表示：「良心深藏於人的內心與靈魂之中，是一種看不見且無法描述的東西。」由於一般認為只有宗教拒服兵役才具有道德根據，因此非基於宗教拒服兵役的人幾乎無法取得合法免役的地位。基於政治理由要求拒服兵役的例子，普遍出現在抗議種族歧視的黑人身上。曾有負責審理的法官引用希特勒《我的奮鬥》裡的段落來說明這名獨裁者對黑人的態度。這名法官說道：「你們怎麼能悠哉地坐在那裡說，『我懶得動一根指頭來反抗這個把我的種族當成半人類的傢伙？』」然而這名法官卻得到令人難堪的回答：「很多美國人也同意希特勒的看法。」<sup>253</sup>政治抗議者如果持續拒絕服役，最終將會被判刑入獄，不過被監禁的拒絕服役者當中，只有百分之六是世俗的拒絕服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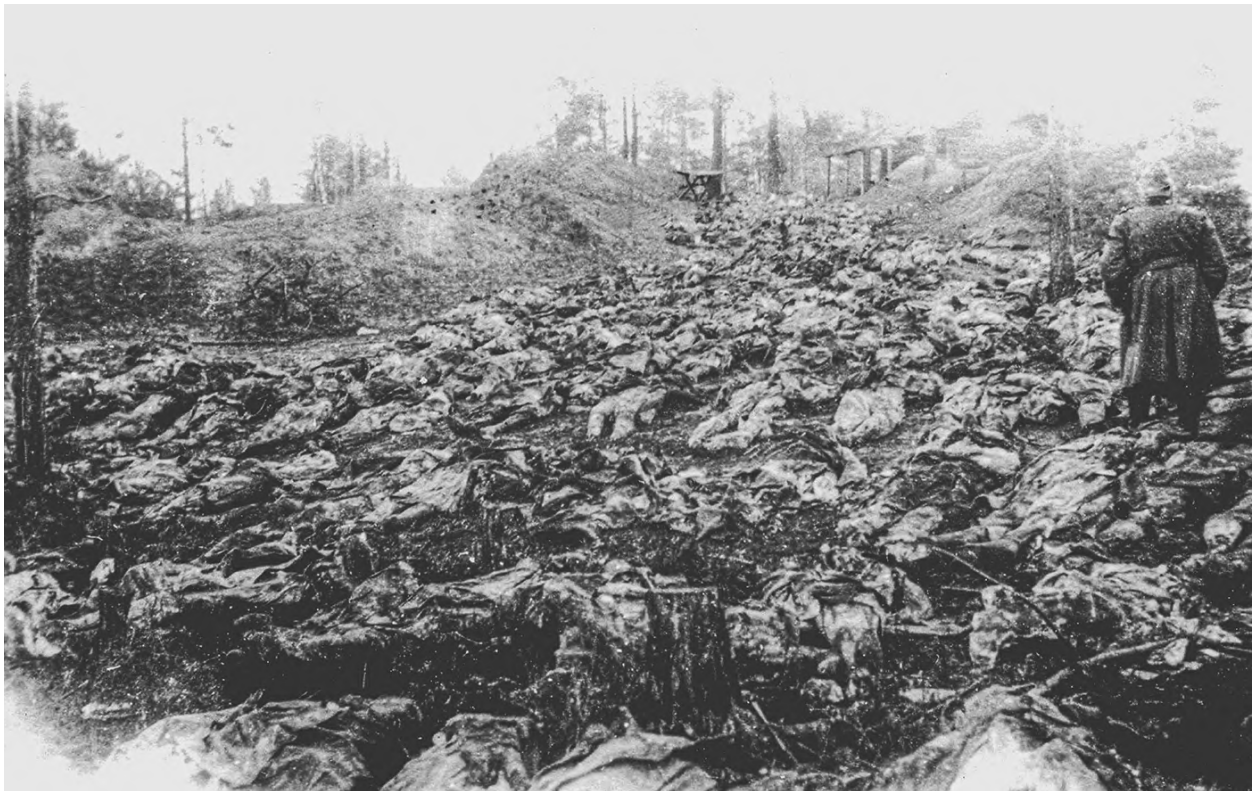
者。<sup>254</sup>

美國總共動員了一千兩百萬人，其中只有四萬三千人拒服兵役。英國沒有無條件拒服兵役這個類別。被歸類為I—A—O類的拒服兵役者，負責在軍中擔任非戰鬥人員；被歸類為IV—E類的拒服兵役者，負責從事「具有國家重要性」的工作。無論是哪一種，陸軍認為這兩類的拒服兵役者都屬於被徵召入伍的士兵，不管他們樂不樂意。<sup>255</sup>絕對拒服兵役的人當中，有六千名被判處較長的刑期。剩下的兩萬五千名獲准在軍中擔任非戰鬥人員，此外也創設了「社會役」這個新制度，社會役可以吸收一萬兩千名拒服兵役者從事對社會有益的工作，但這些工作不會與戰爭投入直接相關。社會役計畫由和平教會透過全國宗教拒服兵役者委員會進行經營，不過整體的控制權仍掌握在軍事當局手中。最終社會役計畫設立了一百五十一座營區，拒服兵役者每月要支付三十五美元做為生活費。<sup>256</sup>這些營地刻意對外隔絕，生活條件十分貧困，在土地或森林裡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幾乎不具有任何國家重要性。一九四二年，拒服兵役者認為自己遭受強制勞動或被當成奴工（男性均未支薪），因而發起抗爭，他們同時也反對軍方對整套制度的控制。<sup>257</sup>這些抗議者最終跟絕對和平主義者與耶和華見證人一起被關進監獄。在獄中，拒服兵役者持續進行絕食與非暴力抗爭，其中有部分是為了挑戰獄中的種族隔離政策。一九四二年，芝加哥的黑人和平主義者法瑪爾（James Farmer）受到抗議激勵而成立種族平等會議，運用甘地非暴力抗爭的方式反對種族歧視。<sup>258</sup>因此，基於道德理由拒絕在戰時服役，開始與美國參戰的道德主張這類更廣泛的議題結合在一起。一九四五年，杜魯門總統拒絕特赦仍在獄中的六千名拒服兵役者，引發特赦委員會發起一連串抗爭。一九四五年十月，抗議民眾在白宮外舉牌抗議，上面寫著「聯邦監獄 —— 美國集中營」。杜魯門仍拒絕全面性的赦免，但在他任內



許多人最終獲釋出獄。羅登科（Igal Roodenko）是其中一名拒服兵役者，曾經進行漫長的絕食抗議，他日後提到，「要輸出自由與民主，前提是我們必須在國內實現自由與民主。」<sup>259</sup>良心拒服兵役者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仍盡其所能地捍衛自己的原則。即使在總體戰的時代，他們還是敢於違抗社群加諸在他們身上的道德命令，並且繼續堅持個人的道德選擇。

二戰期間，和平主義者見證了他們眼中戰爭的徒勞與道德淪喪，而他們也為此付出龐大的代價。無論是否出於自願，無論是抱持沉默或願意合作，態度熱情或冷漠，交戰國的絕大多數民眾都支持國家的道德主張。發源於戰前的反戰運動雖然力有未逮，但和平主義依然迫使國家採取消制、監視或激勵士氣的策略，來確保自己的戰爭投入看起來合法正當（儘管從許多方面來看並非如此）。



一名德國士兵站在波蘭軍官與波蘭知識分子已經腐爛的屍骸之中，這些人是在一九



四〇年四五月期間在卡廷森林附近遭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祕密警察屠殺。一九四三年四月，德國占領軍發現了這處亂葬崗並且挖掘出屍體。直到一九九〇年為止，蘇聯政權一直堅稱這是德軍的暴行。圖源：*World History Archive/Alamy*

- 
- [1] 編注：這是美國基督教的一個新教派，主張包括依靠宗教信仰而不用藥物即可治癒疾病。
- [2] 編注：中文又常譯成「鬼王」，在西方基督教教義中，別西卜可以是惡魔撒但的另一個化身。不過在新約聖經中，提到了耶穌基督曾以別西卜來驅趕撒但、以鬼趕鬼的故事。

二戰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  
|  
1945  
下  
BLOOD & RUINS

•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RICHARD OVERY

李察·奧弗里 —— 著 黃煜文 —— 譯 揭仲 —— 審定

## CHAPTER 8

# 第八章

## 民防與敵後抵抗

「今日的戰爭不只是在戰場上廝殺或取勝，也不只是由雙方派出大軍交戰來決定。今日參與戰爭的人包括了宣傳部門、忠誠的公務員、在工廠裡工作的男女低技術勞工、文職人員與官員、白天在田裡辛苦耕作的農民.....還有卑微的家庭主婦，她們在結束白天的工作之後，晚上還要出門巡邏燈火管制的街道.....今日的戰爭，所有階層的人都參與其中，每個人都要擔負單調乏味的任務。」

—— 丹尼爾（Raymond Daniell），一九四一年<sup>1</sup>

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平民的死亡人數比軍人多了數百萬，這種狀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形成明顯的對比。美國記者丹尼爾在倫敦報導德軍大轟炸時發現，每死亡一名英國士兵，就有將近十名英國民眾喪生。在遭受轟炸的倫敦流傳著一則笑話：一名女孩送了一根白色羽毛給正要參軍的男友。<sup>[1]</sup>軍事人員從前線返回遭受空襲的後方城市時，他們表現得比周遭市民更為慌張。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一戰，各國民眾很少不受影響，特別是在敵軍占領區或因為爆發武裝革命而結束戰爭的國家，但至少此時民眾直接涉入戰爭的狀況依然有限。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俄羅斯內戰與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內戰，可說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平民化」的先聲。到了二戰時期，已有大批民眾挺身而出為守護家園與捍衛信仰而戰，甚至犧牲性命。

我們對於戰爭時期的平民有一種既定印象，認為在戰爭暴力橫掃下，他們只是被動的受害者，然而實際上卻有相當比例的民眾起而自我防衛或爭取自身解放，他們並非只是戰爭的見證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這是二戰的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民眾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願意挺身對抗空襲、入侵與占領，或者，在猶太人大屠殺的極端例子裡，民眾甚至憤而抵抗滅絕的惡行。與軍人不同，民眾在反抗時必須冒著額外風



險，因為他們缺乏法律或其他方面的保障。民防人員每天晚上都要蒙受空襲造成突發傷亡的風險。敵後的反抗軍，無論是正規游擊隊還是非正規叛軍，都知道自己一旦被俘，將無法獲得戰爭法的保障，敵人將可任意處決他們。占領軍會對占領區民眾進行種族或意識形態的挑撥分化，使民眾不僅要抵抗占領軍，還要與自己的同胞進行血腥內戰。因此，與服役的軍人相比，平民抵抗的戰線顯得更加混亂與危險。猛烈的轟炸使民防人員必須面對前所未見的肉體傷亡，但敵後抵抗與內戰帶來的暴力卻比絕大多數軍事作戰更能造成內心創傷與震撼。平民戰爭雖然是整場二戰衝突的一部分，但平民戰爭卻有著自己的獨特性。

一般民眾能否成為戰士，主要取決於環境、機會與性格。絕大多數民眾並未選擇成為民防人員、反抗分子或游擊隊員，而是尋求其他方法，讓自己的私人世界與圍繞在身邊的戰爭共存。在英國與德國，約有百分之一到二的民眾願意加入正式民防單位；另有一些估計顯示，法國只有百分之一到三的民眾積極進行某種形式的抵抗，不過這些數據都無法證實。<sup>2</sup>這群願意肩負戰鬥任務的民眾，普遍抱持著一個信念，那就是戰火並不會止於戰場上，而是會延燒到大後方，無論是抵禦敵軍轟炸、政治顛覆或游擊戰。民眾參與的各種反抗行動，也包括由戰敗士兵組建或領導的游擊隊，這些人不認為軍事失利或投降等同於戰爭結束，也不接受停戰或軍事占領之後交戰就必須停止的軍事慣例。「總體戰」是一種涵蓋全社會的衝突，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民眾會把自己的抗爭視為更大軍事衝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例外。這種現象與其說是戰爭的平民化，不如說是平民的軍事化。

鼓起勇氣積極參與作戰的民眾，往往基於各種不同的個人動機，我們不可能以單一原因概括解釋。愛國心、意識形態信仰、追求新的戰後秩序、痛恨敵人、絕望、渴望復仇，甚至於自利，這些都可能是參與者

選擇行動的原因。有時候，民眾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迫參與。協助民防工作通常屬於強制性而非自由選擇。支持武裝抵抗可能是出於自願，但也有可能是受到當局逼迫。蘇聯游擊隊定期從各地村落捕捉男丁充當游擊隊員，因為若不這麼做就根本沒有人願意加入。游擊隊在烏克蘭村莊季亞基夫卡（Diakivka）張貼的徵兵令，上面明白表示，拒絕服從的人「將被槍斃，住家將被燒毀」。<sup>3</sup>還有一些人是為了逃避占領者的強制勞動或流放而加入抵抗行列，因此成為平民戰士也不是完全出於自願。當平民暴力轉變成內戰時，彼此交戰的民眾時常驚訝地發現，無論是否出於本意，自己都已經是戰鬥人員。一名參與希臘內戰的女性游擊隊員日後表示，環境迫使人們投入自己不願投入的戰鬥：「生活逼迫你成為英雄，但沒有人想成為英雄。」<sup>4</sup>民眾面對出乎意料的要求，發現自己不得不做出艱難的道德抉擇，包括是否參與行動，是否要選邊站，以及自己要接受什麼樣的條件。

## 民防人員

使平民無法置身事外而必須直接參與戰爭的最直接因素，就是戰時的民防投入。無論是為了摧毀城市內的軍事經濟目標，或是為了瓦解敵方的民心士氣，對城市進行遠距離轟炸的做法，抹除了原本區隔平民與前線戰鬥部隊的界線。一戰期間，對敵國後方的轟炸還僅止於小規模：德國使用飛船與飛機轟炸英國的濱海城市與倫敦、英國轟炸德國西部城鎮、奧國與義大利偶爾會轟炸更遙遠的城市目標。雖然早期的轟炸帶有實驗性質，規模也十分有限，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轟炸，卻影響了戰間期人們對未來戰爭的想像。人們開始認為轟炸城市也許可以迅

速引發社會與政治動盪，最終能迅速結束戰爭。關於這方面的預測，最著名的主張出自義大利將領杜黑（Giulio Douhet）於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制空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又譯《空權論》）。書中認為唯有藉由空中力量無情地打擊敵方城市、基礎設施與人口，把敵人大後方的居民當成主要戰略目標，讓敵軍保護人民的目的落空，才能迅速贏得未來的戰爭。<sup>5</sup>「平民在未來戰爭中將蒙受可怕的傷亡」，這種想法開始普遍流行。但至少在一九三九年之前，傳統空軍的能力仍與這類預測有著很大的差距。這些關於未來的災難性想像，並未將重點放在實際相對有限的軍事能力與科技上，而是強調現代都市人口由於缺乏牢固的社群意識，因此在遭遇空襲時特別容易產生恐慌與絕望。<sup>6</sup>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J. F. C. Fuller）認為，空襲倫敦將使倫敦變成「一座巨大而喧鬧的瘋人院.....交通將會癱瘓，無家可歸的人將會尖叫求救，整座城市將會陷入混亂。」<sup>7</sup>英國另一名擔心災難可能發生的學者是劍橋大學的哲學家狄更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他針對敵機可能在三小時內對倫敦居民造成重大傷亡做出評論，認為空戰擴大了毀滅的範圍，「不僅士兵受害，民眾與文明也將受害。」<sup>8</sup>

各大國民眾都對都市社會遭受轟炸的可怕後果普遍感到擔憂，然而這種擔憂卻與未來戰爭可能是一場總體戰的預言產生矛盾：如果都市社會真的會因為幾天轟炸而土崩瓦解，那麼針對全國資源進行總體動員就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很可能動員來的資源都還沒充分利用，戰爭就已經結束。一九三〇年代，為了因應大戰即將到來，各國開始建立民防措施——民防的出現，使上述彼此矛盾的未來戰爭觀有了相互結合的可能。雖然早在一戰期間，遠程轟炸（不久便改稱為「戰略轟炸」）的初體驗已促使各國建立小規模的民防措施，但全國性民防組織的建立得要等到二戰爆發前十年才出現。民防是獨特的全新經驗，其背後推動的因素源

自於轟炸帶來的威脅，以及人們普遍相信，所有民眾都將捲入下一場戰爭的戰火之中。民防將民眾與衝突的現實緊密連結，使民眾取得一戰時期缺乏的參與感與重要性。民防的目的是動員民眾保護自己的社區，以避免可能的災難造成的危機。民防反映了前所未有的企圖心。之所以必須大規模動員民眾來保護現代社會，主要是由兩個因素造成，首先是轟炸機的出現，其次是總體戰的邏輯。民防也成為國家定期監控民眾是否認真投入總體戰的一項工具，例如民眾是否服從燈火管制的命令，是否進行防空演練，是否輪班防範火災發生。為了將前線作戰人員與後方民眾結合起來，民防人員必須轉變成準軍事人員，必須學習軍事風格的紀律、穿上制服與接受軍事訓練。義大利從一九四〇年八月起將民防人員定義為「被動員的民眾」，不僅賦予他們較為正式的軍事地位，也不許他們擅離職守。<sup>9</sup>戰爭結束時，英國內政大臣莫里森回顧過去數百萬民眾投身的民防工作，形容他們是由「一群戰士」組成的「平民大軍」，其中包括了男性與女性。<sup>10</sup>

民防措施最終傳布到全球各地，就連實際上不可能遭受轟炸的地區也組建民防。要估計民防人員的總數並不容易，因為要進行估計就必須先區分從事全職或兼職民防工作的民眾，以及數百萬居民或年輕人。前者從事像空襲警報員、輔助消防員、防空洞管理員、急救實習人員與救難人員的工作，後者則負責協助空襲訓練與防空勤務，卻不是穿上正式制服的民防人員。第二類人員包括了廣大的都市（有時也包括農村）民眾，數量可達數千萬人。根據德國當局的說法，這些民眾應該要在正式民防組織的督導下「自行保衛」家園與工作場所。民防部隊與數量龐大負責輔助他們的人員，通常肩負著保護鄰里的任務，很少被派到遠離自己居住地或城鎮的地方，這說明了為什麼這些民防人員能夠長時間忍受艱苦也要保護自己的熟悉之地。民防囊括了所有社會階層，沒有性別限



制，女性在社區防衛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與正規軍女性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別。由於各地社區缺乏年輕男子，大量女性紛紛自願加入民防部隊。在德國，民防組織大約有二十萬名全職人員是女性。在英國，到了一九四〇年，民防工作人員有十五萬一千名全職與兼職女性，包括輔助消防隊員，此外還有十五萬八千名女性支援緊急救護工作。<sup>11</sup>在美國，華府的防衛義勇隊將近三分之二是女性，底特律則將近一半。<sup>12</sup>男女學生也要接受徵召從事特定任務：英國的童子軍義勇隊英勇地在各空襲哨所之間傳達緊急訊息、蘇聯從共青團徵召青年加入救護隊或留意屋頂是否著火；而在德國遭受轟炸的最後幾個月，希特勒青年團成員被派去擔任防空輔助員，負責操作防空砲，以彌補正規空軍部隊的不足。

規模最大的民防組織出現在日本、德國與蘇聯。在這三個國家，減少轟炸造成的損失已成為各地鄰里每一個居民都應該遵守的義務。日本的民防準備始於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大城市所有的居民都必須參與燈火管制與防空演習的操練。一九三七年四月，日本制定《防空法》，規定全國各地方長官與市町村長防空委員會要確保所有民眾都能成為潛在的民防人員。兩年後，政府在各地鄰里招募民眾成立消防與治安單位，協助應對空襲。日本的民防建立在集體主義傳統之上，因此幾乎沒有異議空間。蘇聯與德國建立的大型民防組織也帶有威權與集體主義傾向，兩者都反映出獨裁政權動員民眾投入各項活動的企圖，希望藉此統合民間力量，為民族共同體的生存而努力。一九二七年，蘇聯成立「支援國防協會」（Osoviakhim），到了一九三三年，成員至少已經達到一千五百萬人，其中包括三百萬名女性，而此時轟炸的威脅還未真正浮現。這些人接受了因應空襲、毒氣戰與轟炸後緊急救難的基本訓練。一九四一年七月，蘇聯頒布法令，「強制全民必須」針對空襲進行應對準備，所有民眾在一夕之間成為民防人員。到了一九四四年，據說有多達七千一百

萬名涵蓋各年齡層的蘇聯民眾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民防訓練。在容易遭受轟炸的城市，蘇聯當局設立了都市「自衛」單位，負責協助救火救難，到了戰爭結束時這些單位已有兩百九十萬名成員。被徵召的民眾必須讓社區做好準備以因應轟炸與轟炸過後的各項災害。除了將民眾組成民防部隊，蘇聯也於一九三二年成立地方防空總局，負責訓練民防人員、在住宅區大樓建立防空洞網路，以及在空襲後救火救難。地方防空總局由具有準軍事人員性質的民防部隊構成，在戰爭高峰期，總局人數達到七十四萬七千人。<sup>13</sup>

德國的帝國防空聯盟於一九三三年由新成立的德國空軍總部設立，很快就擴展為教育與訓練民眾針對空襲採取預防措施的主要機構。一九三七年五月，《自衛法》通過，規定所有住戶都必須對自己的房屋與建築物進行防護以抵抗空襲，此外還要協助公共建築物與官署做好抵禦空襲的防護措施，以及參與工廠的「工作防護」。<sup>14</sup>跟蘇聯及日本一樣，納粹政權堅持每個社區都有義務做好自我防衛，因此一九三七年已有一千一百萬人加入帝國防空聯盟，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一千三百萬人，一九四三年達到兩千兩百萬人，相當於德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一九四二年，帝國防空聯盟有一百五十萬名職員，開設了三千四百所「空襲學校」提供基本訓練。<sup>15</sup>此外還有防衛空襲的正式組織，如防空警察、消防警察與各地的德國空軍地區司令部，但這些組織的工作非常仰賴帝國防空聯盟成員的自願協助，包括組織與監督各地社區的空襲準備，確保民眾能確實做好「自衛」，提供民防需要的男女人力。

相較之下，西方國家的民防制度更仰賴民眾的自願參與，政府只能藉由呼籲希望民眾能在戰時承擔起公民責任。在英國，民防人員的徵召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晚期才開始。英國不像德國或蘇聯那樣擁有龐大的防空組織，然而一旦空襲在一九四〇年秋天開始，英國政府便改弦易轍，

從鼓勵民眾自願參與民防，轉變成讓民防成為全民義務。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擔心戰爭即將爆發的英國政府通過《防空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建立民防體制與任命防空官員（通常由地方政府長官擔任），一旦遭受轟炸，便立即組織緊急或戰爭執行委員會。一九三九年，地區專員網路成立，負責協調地方決策與充當中央政府與地區之間的溝通橋樑。<sup>16</sup>整個組織架構從性質上來說完全屬於文官體制，陸軍與空軍只負責槍砲與戰鬥機這類主動的防空措施。為了強調文官性質，當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時，所有民防人員全都交由屬於文官體系的國土安全大臣指揮。一九四〇年夏天，民防人員有六十二萬六千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全職，遭遇緊急狀況時，還可以再動員三十五萬四千名兼職民防人員。消防工作也從一九三七年的五千名正規消防員，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八萬五千名全職消防員與十三萬九千名輔助消防員。這些消防員有男有女，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成立的婦女防空義勇隊在戰爭的高峰期曾多達一百萬名成員。<sup>17</sup>一九四〇年下半，工廠與公共建築物也必須依照規定強制派員瞭望火警，此後兼職的民防人員數量又增加了四百萬人，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sup>18</sup>即使政府並未強制規定，但民眾仍須組織起來沿街巡守社區，與德國一樣，每個住戶都要負責保衛自己的住處。

法國與義大利在一九三〇年代晚期已經預料未來很可能遭到轟炸，然而兩國的民防組織規模並不大。一九三五年，法國政府堅持設立「被動防衛體系」，要求所有地方社區跟英國一樣建立防空措施，並且訓練地方民眾擔負民防責任。直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投降之前，這套體系始終未受到適當檢驗。在維琪政權時期，民防體系完全廢弛，直到英國空軍與之後的美國空軍開始轟炸法國境內目標，法國才重新恢復民防。貝當政府不願在國內明顯未捲入戰爭的狀況下動員民眾，也不願負擔啟動民防體系的龐大成本。然而在德國的壓力下，地方與鄉鎮首長不得不

再度負起被動防衛的責任，但他們手上卻極度缺乏資金與人力。<sup>19</sup>義大利於一九三四年三月頒布法令，要求各省首長建立地方分權的地區民防系統，但各省防空檢查廳卻依然無法優先取得資源。<sup>20</sup>義大利民防仰賴國家防空聯盟成員的自願加入，國家防空聯盟是義大利戰爭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成立的組織，目的是為了建立民防隊伍。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義大利民防人員仍只有十五萬人，更有數千人在一九四〇年義大利對英法宣戰時退出了民防組織。民防官員往往優先選擇法西斯黨員出任，在主要城市地區，動員與組織民眾的工作缺乏協調，民眾訓練不足，難以產生「自衛」效果。<sup>21</sup>

在遠離歐洲與東亞戰場的地方，民防不僅仍具有戰略必要性，更成為動員與訓練民眾履行公民義務的有效手段。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馬歇爾將軍在美國廣播節目上表示：「我認為，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時刻，所有民眾都必須投入戰爭……。」<sup>22</sup>一九四一年五月，總統下令成立民防辦公室號召志願者加入，不僅為了因應未來日本或德國可能轟炸美國的西岸或東岸，也為了鼓勵民眾參與其他戰時的社會計畫。民防辦公室起初由紐約市長拉瓜迪亞主持，一九四二年二月後改由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蘭迪斯（James Landis）接替。蘭迪斯徵召數百萬美國人加入民防隊伍，負責擔任空襲警報員、輔助消防員、急救志願隊與救難人員。總計有七八百萬名民眾自願加入，此外還有數百萬人（包括學生）也在工作場所與學校接受基本民防演練。<sup>23</sup>民防報刊《平民前線》（*Civilian Front*）明白表示民眾直接參與美國的總體戰。一九四三年，蘭迪斯寫道，民防「是一項軍事任務，就像武裝部隊奉命攻占敵軍據點一樣明確」。<sup>24</sup>雖然美國本土並未真的遭到轟炸，而德國空軍始終無法建造出「用來轟炸美國的理想轟炸機」，但美國民防人員直到戰爭結束之前都持續接受訓練，空襲警報員也努力不懈地在美國濱海城市街道持續巡



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大英帝國的邊陲地區也同樣遭受空襲威脅，其中香港、新加坡與澳洲北部更是確實遭到了轟炸。紐西蘭與美國一樣從未遭到轟炸，一九四二年三月，紐西蘭仿照英國的民防體系建立了緊急預防勤務，包括空襲警報員（每五百名民眾設立一人）、急救人員、救助與救難人員。在紐西蘭，民防的存在使紐西蘭民眾每天都能意識到，現代戰爭不光只是靠軍隊而已，也需要所有民眾參與。徵兵標語寫著，「帝國的子民要做好準備，戰爭也可能在這裡發生。」<sup>25</sup>

民防人員在保護鄰里上投入的努力，往往因時空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歐洲或亞洲，許多地方只被轟炸過一次，有些地方則完全沒遇過空襲。在空襲較多的地方，每次空襲的間隔也有數月或數年的差異。有些德國城市，如漢堡、科隆、埃森，被轟炸超過兩百次，算是相當罕見的例子。在亞洲戰場，只有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間被轟炸了兩百一十八次，足以與德國經驗相提並論。<sup>26</sup>載彈量不同也會造成巨大差異：六百架蘭開斯特重型轟炸機可以投下數量驚人的高爆彈與燃燒彈，足以燒毀一座城市的市中心，反觀五十架中型轟炸機投放數量相對較少的炸彈，只會嚴重損害城市局部地區，卻無法造成大規模破壞。對絕大多數民防人員來說，空襲往往是突發而短暫的；許多民防人員幾乎沒有遭遇過空襲，或者是數年才遭遇一次。日本民防體系持續準備了四五年之久，直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才首次遭遇空襲，一些接受徵召的民眾因為長時間戒備而變得冷漠與不滿。直到太平洋戰爭的最後六個月，日本城市才逐漸進入美軍的轟炸範圍，此時日本的民防體系才終於受到考驗。在還沒遭到美軍轟炸之前，日本民防人員一直持續執行著民防規定，各地的民防命令都成了一種有效的工具，時刻提醒民眾拉下窗簾執行燈火管制，準備消防用水與滅火用的沙土，以防範轟炸

造成的火災，這些都讓民眾產生身處前線的真切感受。一九四三年，一名東京女性寫道：「每次進行防空操練時，我們都要排成一行接受點名，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有人抱怨說，哪一戶人家沒有派人出來參加演練……。」<sup>27</sup>凡是違反燈火管制規定的人都會受到處罰。在戰爭時期，國家的干預直接深入每位民眾的日常。

空軍針對平民採取的戰略性質不同，也會導致經驗差異。二戰期間，幾乎所有的轟炸都是不精確的，甚至誤差很大，而當時轟炸的目標通常都是遠方的軍事與經濟目標，藉此削弱敵軍的軍事能力。各國空軍刻意針對平民居住區進行戰略打擊以殺傷大量平民的例子只有三個：一是日軍轟炸重慶。二是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後對德國城市採取無差別轟炸的戰略。三是美國第二十一轟炸機指揮部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對東京投擲燃燒彈，此後便開始對日本各大城市進行轟炸，最終還投下了兩顆原子彈。英國皇家空軍希望透過轟炸都市地區來打擊敵方士氣，這種戰略起源於一九三〇年代的轟炸戰略討論。當時的人認為，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在現代戰爭中將不再有任何區別。平民被當成目標是因為平民會對敵人的戰爭提供物質支持，反過來說，就連民眾自己也相信，持續支持戰爭終將使自己成為未來戰爭的攻擊目標。一九四四年，負責英國皇家空軍對外宣傳的佩克空軍少將（Richard Peck），是這麼為無差別攻擊都市平民居住區辯護：

勞工是工業軍隊，他們身上穿的工作服就是他們的軍服，每名男性工人都是陸軍的預備隊；每名女性工人負責填補男性工人留下的空缺，這些工人往往駐紮在城市周圍，他們居住的房屋等同於士兵居住的營地或壕溝。<sup>28</sup>

針對德國工業城市的轟炸行動，主要是要對工人階級的居住區與設施造成最大破壞，乃至於殺死勞工。要用最簡單的手段實現這個目的，就要盡可能集中燃燒彈來轟炸市中心的住宅區。<sup>29</sup>這是一場對抗民防的戰爭。少量的高爆彈混和了燃燒彈，可以炸開窗戶與屋頂，威懾民防人員。更讓民防人員恐懼的是，這些炸藥會搭配一定比例的燃燒彈（約十分之一），設置了不同的時間引信。一九四二年，飛機開始掛載人員殺傷炸彈，目的是為了殺死或致殘那些運氣不佳剛好位於附近的民防人員。<sup>30</sup>

美國陸軍航空軍也針對日本採取類似政策來癱瘓其民防體系。眾所周知，木造的日式建築很容易起火燃燒。馬歇爾將軍在珍珠港遭受攻擊前不久的一場祕密記者會上表示，如果戰爭爆發，日本的「紙城市」將會被燒得一乾二淨，「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轟炸平民，不會心慈手軟。」<sup>31</sup>然而一直要等到一九四五年，美國轟炸機才真正對日本城市進行猛烈的燃燒彈空襲，其目的明顯是為了破壞城市環境、殺死或致殘日本勞工及瓦解日本民心士氣。一九四五年，美國陸軍航空軍副司令依克將軍表示：「燒毀整個區域，殺死那些技術勞工，這項做法十分合理。」<sup>32</sup>與英國皇家空軍一樣，美國陸軍航空軍也仔細研究最佳的作戰條件，好讓日本的消防與緊急救難人員無計可施。早在空襲前數年，美軍已經針對如何最大程度燒毀日本房屋進行研究，英國也以自身經驗提供協助，針對燃燒彈的破壞性進行了科學估算，並且將成果分享給其他盟國。與英國皇家空軍轟炸德國一樣，美國陸軍航空軍大規模毀滅平民區與都市平民人口的計畫，使消滅平民成了轟炸的主要目標，民防人員因此成為盟軍空軍的直接攻擊對象。

這些以平民為目標的戰爭為民防人員帶來最嚴苛的考驗。民防人員必須面對的艱困現實是，一旦敵機來襲，絕大多數的轟炸機總是能突破

防線，將所有炸彈全部傾瀉到底下的平民居住區。即使是最密不透風的防空系統也難以抵擋轟炸機的攻勢。直到一九四四年為止，全世界最嚴密的防空系統就是德國由雷達、防空砲、戰鬥機與夜間戰鬥機構成的防空防線，也就是所謂的「卡姆胡伯防線」（以設計此防線的卡姆胡伯將軍命名），然而絕大多數盟軍轟炸機依然可以在機隊大量耗損下逼近到投彈地點進行轟炸。在防衛較弱或根本不設防的地區，轟炸機甚至不用擔心敵機與有效防空砲火的威脅，而能長驅直入進行轟炸。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軍曾在完全未遭受反擊的狀況下對中共首都延安進行空襲，之後中共在幾座明代塔樓上安裝了防空砲，這才稍稍壓制了日軍的氣焰。在重慶，中國弱小的空軍遭日軍橫掃，防空砲火也極其有限，日本轟炸機因此能游刃有餘地任意進行轟炸。<sup>33</sup>即使在英國，在倫敦大轟炸初期的一九四〇年九月，英國戰鬥機雖然有能力在白天重創來襲的德國轟炸機，但到了夜間，英國城市就只能仰賴防空砲（防空砲可以擊落一些德國轟炸機，迫使他們提高飛行高度，降低投彈的精準度）與不太管用的夜間戰鬥機——直到一九四一年春天引進雷達之後，夜間戰鬥機才得以進行有效攔截。<sup>34</sup>無論民防人員願不願意，他們都成了轟炸機與被轟炸者之間的前線，這是個獨特的前線，因為民防人員從來未能看清楚造成威脅的敵人長什麼樣子。

從一九四〇年冬天到一九四一年春天，德軍對英國城市足足轟炸了九個月，英國民防人員因此有機會證明有組織的民防力量能產生什麼效果。起初的經驗凸顯了一些問題，顯示當時的人對於恐慌來源與如何消除恐慌幾乎一無所知。一九四〇年，資深精神分析學家格洛弗（Edward Glover）在談到對轟炸的恐懼時，也只能提出一些老掉牙的說法：他建議膽子比較大的民眾應該隨身攜帶一瓶白蘭地或一包餅乾，用來安撫其他飽受驚嚇的同胞。<sup>35</sup>經常有許多民眾在空襲後陷入恐慌或逃出城外，



不過當局很快就提供了防空洞與救助措施以免釀成更嚴重的社會危機。

「逃離城市」的現象在普利茅斯、南安普敦與赫爾這幾座經常被轟炸的港口城市最為嚴重。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南安普敦遭到猛烈轟炸，民防體系一度停擺，地區專員說道：「面臨這場大規模的災難，人們一籌莫展。」一名糧食部官員發現，空襲後的隔天，民眾「茫然、迷惑、失去工作、不知如何是好」。<sup>36</sup>交通中斷，加上中央防空管制中心停止運轉，民防人員無所適從。城市居民紛紛逃往郊外的樹林與村莊，儘管實際上兩次空襲只造成了兩百四十四人死亡。相較於日後盟軍對德國的轟炸，傷亡的程度還算輕微。

初期的失敗經驗迫使英國民防體系迅速進行改革，更加重視有效的通訊與資訊流通，設置數量更多與儲存量更大的救助中心與緊急廚房，更重要的是迅速推動容易修繕的房屋重建計畫。對於空襲警報員來說，他們的任務就是在空襲警報響起時通知所有居民避難，他們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維持防空洞的紀律，而這是他們明顯能減少傷亡的方式。在德國與蘇聯，躲防空洞是一項強制性措施，警察會以強硬手段支援各地空襲警報員維持防空洞的「紀律」（德國還會將猶太人與強制勞動的外籍勞工趕出防空洞，讓「雅利安」德國人優先進入防空洞）。與此相反，英國的空襲警報員不具法律地位，因此躲防空洞成了一種個人決定，而非法律義務。英國政府也傾向於由個人自行決定在地下室與地窖設置防空洞，或者就在自家花園裡挖掘「安德森防空洞」（Anderson shelters）。根據統計，遭受轟炸威脅的英國人，只有半數使用指定的防空洞，儘管事實上是幾乎所有防空洞都沒有做好防爆設施。日後針對戰時防空洞進行的研究顯示，家中沒有防空洞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九使用了公共防空洞。<sup>37</sup>公共防空洞很快就出現建造不牢固與不衛生的問題，而且幾乎所有的公共防空洞都沒有供人睡眠的設施。即使政府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積極推動計畫，在防空洞設置床鋪、補給品與適當的衛生設施，民眾對公共防空洞的信心依然低落。無數人選擇違抗民防體系，躲在自家床底下、樓梯底下或桌子底下，這也是為什麼英國並未像日後德國與日本一樣遭受飽和轟炸，卻依然出現大量傷亡的原因之一。在英國，都市地區只有百分之三被摧毀，德國卻有百分之三十九，日本更高達百分之五十。<sup>38</sup>

飽和轟炸旨在破壞敵軍的民防組織與引發可能的無限制破壞，後者通常需要大火來完成。一旦出現大規模的風暴性大火，如一九四三年七月的漢堡、三個月後的卡塞爾（Kassel）與一九四五年二月的德勒斯登，民防體系實際上就毫無用武之地。漢堡發生風暴性大火期間，當局出動了三萬四千名消防員、士兵與緊急救難人員，但他們也只能限制大火蔓延，不讓災情擴散到漢堡市郊。漢堡警察局長針對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晚間的風暴性大火提出報告，坦承民防人員對風暴性大火無能為力——他試圖描述當晚發生的事，卻發現自己「無法用言語形容」。最後他建議民防人員對火災威脅必須做出重大改變，必須檢查所有住家的防空洞或「防爆室」，確保這些防空洞設有緊急出口，以免躲在裡面的人像漢堡一樣因為大火燒光氧氣而窒息；同時還要在市中心設置逃生路徑並公告周知，讓市民在風暴性大火吞噬他們之前及時逃出。<sup>39</sup>民防人員要訓練所有住戶在遭遇燃燒彈轟炸時必須防止小火延燒成大火，但這等於是要求市民得像正規民防人員一樣直接面對火災帶來的危險。到了一九四四年，德國已有一百七十萬名消防員，絕大多數是由志願民眾組成，包括二十七萬五千名婦女與女孩。大約有十萬名志願者組成七百個緊急救難小隊，他們必須四處移動進行救火任務。一九四三年八月，德國成立特殊「自衛小組」，依法要求所有民眾主動參與自己住家以外的所有民防任務。<sup>40</sup>漢堡特別針對被轟炸地區進行糧食供

應、興建緊急避難所與給予醫療支持，同時也跟柏林一樣，提供有效資訊、糧食與救助，以及推動疏散或迅速重建計畫（部分由集中營勞工來完成）。事實顯示，一旦民防與救難人員能夠被適當地加以組織，就有可能防止被轟炸的城市出現社會性崩潰。漢堡估計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住房遭到破壞或摧毀，然而幾個月之後，依然留在城內的居民中（原本有五十萬戶，現在只剩下約三十萬戶）已有九成住進了修繕完成或以預製構件建成的新屋。<sup>41</sup>

日本城市遭到燃燒彈轟炸，也使日本民防在極度壓力下崩潰。日本政府原本預期美國空軍會像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的第一波轟炸一樣，對經濟與軍事目標進行精準轟炸，而當時美軍的轟炸並不成功。結果美軍卻是在三月九日到十日晚間對東京進行大規模燃燒彈轟炸，引發的大火完全失控。日本的民防人員過去接受的訓練是因應有限空襲，但當大火迅速延燒到整座都市時，一般民眾平日接受的空襲演練已派不上用場。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名日本母親寫信給已經疏散到郊區的女兒，「如果發生空襲，就當房子已經燒掉，逃命第一。」<sup>42</sup>日本防空洞的空間僅能容納百分之二的城市人口。日本城市由於建築物多半是木造與紙門，因此特別容易在燃燒彈轟炸下引發大火。東京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建物是用可燃物建造，主要都市區域的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嚇人。<sup>43</sup>

日本海軍航空隊曾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轟炸中國首都重慶，當時就已充分顯示這類城市在遭受轟炸時有多脆弱。狹窄擁擠的街道，兩旁的建築物主要是木造與竹造房舍，即使只是被少量燃燒彈轟炸，也很容易引發大火延燒。當時日本只派出為數不多的轟炸機進行幾番轟炸，重慶的商業中心便有五分之四被大火燒毀。<sup>44</sup>日本民防當局為了避免類似災難在日本本土發生，於是下令拆除三十四萬六千六百二十九棟

建築物，藉此在都市地區建立防火線。然而，美軍卻派出B—29大型轟炸機在低空對都市地區進行飽和轟炸，在極為狹小的地區投擲了數千噸燃燒彈——美軍在日本投下了十六萬噸炸彈，其中有九萬八千噸是燃燒彈。<sup>45</sup>在東京大空襲中，民防、救助與急救體系完全崩潰，八百五十七座急救站有四百四十九座被毀，兩百七十五家醫院有一百三十二家被毀，此外還有數百間預先建立的救助站被毀。日本把維持士氣避免恐慌的單位，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思想隊」，列為第一優先，反而使得救難與消防員缺乏足夠人力、重機具或專門的救難設備。結果造成東京出現嚴重傷亡，估計有八萬七千人死於三月九日到十日發生的風暴性大火。經過五個月的轟炸，官方統計遭到轟炸的城市地區有二十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七人死亡、十萬九千八百七十一人重傷與十九萬五千五百一十七人輕傷。<sup>46</sup>

凡是遭到猛烈轟炸的地區，都出現了龐大的平民死傷數字，就連在轟炸較不猛烈的地區，民防體系也無法避免平民傷亡與大規模破壞。在德國，今日估計約有三十五萬三千人到四十二萬人在轟炸中喪失生命（一九五六年的官方數字是六十二萬五千人）。在英國，炸彈、火箭與飛彈造成六萬零五百九十五名民眾死亡。針對歐洲德國占領區進行的轟炸，雖然已經刻意避免對都市地區使用燃燒彈飽和攻擊以減少傷亡人數，但在法國還是造成五萬三千名到七萬名平民死亡，比利時估計有一萬八千人，荷蘭則是一萬人。在義大利，從成為軸心國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投降為止，以及遭受德國占領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為止，戰後官方統計數字顯示空襲死亡人數達到五萬九千七百九十六人。德國轟炸蘇聯的規模較小，但也造成五萬一千五百二十六人死亡。中國死於轟炸的人數，最可信的估計達到九萬五千五百二十二。<sup>47</sup>另外空襲也造成許多人重傷，在大多數狀況下，重傷人數與死亡人數相當。總計大約有一百



萬人在二戰的空襲中喪生，重傷者也接近此數。從這裡或許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各國在民防上的投入最後還是以失敗收場。這條戰線顯然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轟炸機裝備了各種令人生畏的武器，與之對抗的民防人員卻毫無武裝，而且絕大多數還只是兼職的平民志願者。然而，儘管實力懸殊，民防人員與許多支援自衛行動的平民，即使身處於被燃燒彈轟炸的城市裡，依然堅持對抗敵軍的空中力量，試圖避免戰前小說與軍事未來學所預言的不可控制的社會崩潰真正發生。

毋庸置疑的是，少了民防人員，傷亡人數與都市社會崩解的程度只會更糟，轟炸的衝擊也只會更接近杜黑當年的預測。一旦民防崩潰，特別是在遭遇風暴性大火之時，受害地區就只能仰賴外界援助，將物資迅速送往被轟炸的城市，以避免危機往外蔓延。在英國，民眾習慣性地遷出被轟炸的港口城市，不過並沒有因此引發永久性的社會危機。救助服務在市郊建立了讓家庭可以居住的緊急「緩衝帶」，到城鎮工作的工人依然可以每天通勤。在被轟炸地區引進正式與非正式的大規模疏散計畫，讓更多人得以倖免於難。一九四五年初，德國有將近九百萬人離開城市。日本在戰爭結束時，也有將近八百萬人離開城市。空襲發生時，民防人員努力指示民眾有序地前往防空洞避難，挽救了不少生命。此時如果突然出現恐慌，很可能釀成一場大禍。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日本對重慶進行的一場漫長空襲就是例證。當中國民眾準備離開隧道防空洞時，另一批民眾因為聽說日軍又折回來投擲毒氣彈，因此拼了命想擠進隧道，兩批人因此衝撞在一起。警方紀錄顯示，多達一千五百二十七人皆因窒息與踩踏而死。<sup>48</sup>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倫敦貝斯納爾格林

（Bethnal Green）地鐵站因為空襲警報引發恐慌，人們在潮濕陰暗的階梯上發生推擠，導致一百七十三人同樣因窒息及踩踏而死。<sup>49</sup>

上述例子屬於少見的例外。在一般狀況下，空襲警報員總能英勇地

控制住驚恐的鄰里，確保民眾井然有序地進入公共防空洞或監督民眾使用自家防空洞。消防與急救人員也會在轟炸期間冒險執勤。在重慶，當局在山坡臨時挖掘了超過一千個隧道充當防空洞，空襲警報員總能在空襲警報響起時成功讓民眾躲進防空洞避難。一九三七年，重慶的防空洞只能容納七千人，而重慶有將近五十萬人口，但到了一九四一年，重慶的防空洞已經能容納三十七萬人。<sup>50</sup>一九三九年，在重慶每落下兩枚炸彈就會造成十一人死亡，但到了一九四一年，每落下三點五枚炸彈僅造成一人死亡。<sup>51</sup>倫敦大轟炸死亡人數的高峰介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到十一月之間，此時英國的民防系統正在不斷地學習調整。各地民防人員都努力降低轟炸造成的直接與間接損害。當時對空襲的描述總是包含了許多民眾英勇救人的故事。在德國，民防人員因公殉職會比照陣亡士兵，在報紙列出死亡名單時，會在他們的姓名後面附上鐵十字；活下來的英雄則會獲頒軍方的鐵十字勳章。英國遭受大轟炸期間，英王喬治六世設立喬治勳章以表彰在轟炸中表現英勇的一般民眾。第一批受勳者包括兩名消防員與一名來自多佛的輔助消防員，他們在敵軍轟炸時解救了一艘滿載炸藥的船隻。另外還有薩福克（Suffolk）的兩名女性救護車司機，她們在空襲中解救了一名重傷男子。

民防人員與數百萬民眾通力合作，阻止轟炸瓦解民心士氣，也減緩空襲帶來的創傷。這些人的角色如同國家公務員，他們成為地方民眾管理的一個層級，一方面將遭受破壞的鄰里與努力維持士氣的國家連結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協助避免轟炸造成的損害繼續擴大。當然，這個過程不可能完全順遂，但一般來說，民防確實有助於維持地方鄰里的團結，而這一點光靠中央政府是做不到的。轟炸使民眾更仰賴國家，但要讓民眾真正感受到國家的協助則有賴民防、救助與救難人員的投入，民眾才能在周而復始的空襲之下繼續維持鄰里生活。對抗轟炸的平民戰爭也讓

地方鄰里與戰爭現實更加緊密地連結起來，服從民防的指示，數百萬民眾接受訓練，這些正規化的紀律使後方成為另一道前線。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邱吉爾對民防人員演說時使用了軍事用語：「訓練平民軍隊，為防火戰爭準備彈藥，動員、操練與裝備對抗燃燒彈的打火大軍……。」<sup>52</sup>當然，平民志願者不是軍人，就算穿上軍服也不是，平民志願者是非武裝的民眾，他們接受訓練為的是從事獨特形式的戰鬥。在轟炸的衝擊下，民眾發現自己是在打一場不平等的戰爭，不僅遭受龐大的死傷，而且往往要持續數年之久。沒有任何事物比民防戰爭更能清楚顯示戰爭平民化的現象。

## 各種面貌的戰時抵抗

平民抵抗構成的前線，與民防構成的前線迥然不同。平民抵抗不是為了團結鄰里對抗共同威脅，而是要讓敵人占領下的社會變得動盪不安。平民抵抗的對象是已經擊敗國家或帝國軍隊而以征服者姿態控制平民居住區的敵人。民防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定義，至於平民抵抗則是從過去到現在都始終難以清楚定義。抵抗可以有許多形式，可能是暗中進行，也可能是公然反對。不服從或異議這類輕微抵抗相當常見，但戰時的抵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九四〇年八月，法國記者特西耶（Jean Texcier）匿名發表《給占領區民眾的三十三條建言》（33 *Conseils à l'occupé*），但他只列舉了幾個方式，要求法國人應該避免接觸德國人、避免同情德國人或甚至不應該與德國人交談。<sup>53</sup>這種消極面對占領者的態度是最常見的抵抗行為。絕大多數民眾只是等著被解放，法國反抗軍不屑地形容這種態度是*attentisme*，而義大利游擊隊則說這是

attendismo，也就是「等待觀望」的意思。<sup>54</sup>在占領區，民眾心存這種渴望是可理解的，因為這樣既不會引人注目，也不會招來風險，因此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這種心態可說相當普遍。戰後出現了一種觀點，認為占領區社會呈現出兩極的立場，好比法國民眾不是抵抗者就是通敵者，中國的日本占領區民眾若非抗日分子就是通敵者，然而這種觀點從歷史上來看並不合理。<sup>55</sup>事實上，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存在著數百萬並未積極抵抗的人，這些人有時迫於時勢，必須在兩種極端中做出選擇，然而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只是小心翼翼地維護自己的私人領域，避免讓占領者或占領者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侵犯。抵抗者與通敵者，無論是否出於自願，通常都只是占領區裡的極少數人。

積極抵抗其實不是一種均質現象。從抵抗的起源來看，幾乎所有重要的抵抗運動都想尋求民族解放，這點從抵抗運動選擇的名稱就可看出：義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法國的民族抵抗委員會、希臘民族解放陣線與希臘民族人民解放軍，以及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等。然而，這些民族解放運動掩蓋了抵抗運動可能的展現形式，甚至讓人忽略了一些規模較小的地方運動，這些地方運動往往基於意識形態、政治或戰術上的考量，不必然對整體的民族解放運動表示認同。用最簡要的方式來說，抵抗可以解釋成對占領當局採取的任何積極對抗，從輕微的違反占領規則，到嚴重挑戰占領者的政治與軍事存在。有時，抵抗也指顛覆性的政治活動，如出版報紙、小冊子，或者在牆上張貼海報，違法集會或建立組織網路，但這些活動不一定會升級成組織游擊隊或發動恐怖攻擊。流傳最廣的法國抵抗報紙《保衛法蘭西》（*Défense de la France*）就是在索邦大學的地下室印製，目的是從文化層面對抗占領政權，該報的發行者並未積極採取暴力對抗的行為。<sup>56</sup>在中國，以傳統秧歌為基礎的流行農村戲曲成了占領區裡一種文化抵抗形式，這類以抵抗為主題的短篇劇



作「加入游擊隊」、「抓住叛國賊」，就連農村觀眾都能輕易瞭解。<sup>57</sup>然而，絕大多數抵抗運動或多或少牽涉以暴力抵抗占領者，即使最初主張採取政治途徑與避免恐怖主義的組織或團體也從未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到了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歷經德國的多年殘酷鎮壓之後，《保衛法蘭西》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為〈殺人的責任〉：「我們的責任很清楚：我們必須殺人。殺死德國人，將我們的領土清掃乾淨。殺死德國人，因為他殺死我們的人民。殺死德國人，讓我們重獲自由。」<sup>58</sup>

武裝抵抗有許多類型，包括個人自發性採取恐怖行動、反抗軍組成廣大網路以團體行動進行破壞與暗殺、在敵後組織游擊隊負責騷擾敵軍或讓敵軍心生恐懼。武裝抵抗也因為人數多寡或抵抗方式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有些抵抗團體只有數百人，以地下組織的方式運作，盡可能讓自己保持隱密；有些游擊隊人數龐大，採取的積極抵抗行動已經與實際戰爭無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到了一九四五年已多達九十萬人；希臘民族解放軍在一九四四年有八萬人，預備隊也有五萬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派出八個師重新征服了塞爾維亞，另外還派了六萬五千名游擊隊支援紅軍攻下貝爾格勒。<sup>59</sup>武裝抵抗的形式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地理條件使然，另一部分則是時機問題。在歐洲進行游擊戰，可以利用義大利廣大的山區與濃密的森林，南斯拉夫、馬其頓與希臘也有崎嶇的山嶺，波蘭東部與蘇聯西部則有遼闊的森林與沼澤地帶。如果游擊隊是在西歐城市地區，或烏克蘭與俄羅斯遼闊的大草原進行抵抗，恐將成為容易捕殺的獵物。一九四三年之後，法國反抗軍終於選擇法國中央高地或法國阿爾卑斯山區做為聚集地，他們以科西嘉方言的 *maquis*（灌木叢）來為自己命名，充分反映這一地理特徵。在亞洲，菲律賓或緬甸的叢林地區，華北與華中遼闊的山地、高原與河谷地形，使敵軍的兵力分散，也讓反抗軍有機會累積力量。

時機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抵抗運動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早期的抵抗運動通常是敵人入侵下產生的自發性反應，這種反抗注定不會產生太大效果。之後的抵抗者必須根據戰爭實際的發展，來決定如何與何時行動。即使戰局長期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態，抵抗也仍須持續，但武裝行動還是要盡可能保存人力與裝備，以等待盟軍勝利漸露曙光的那一刻。波蘭救國軍在占領區各地建立了預備軍網路，他們平時絕不輕舉妄動，只等待解放的時機到來，才會傾巢而出發動最終起義。一九四三年春天，救國軍總司令羅維茨基（Stefan Rowecki）表示，我們的策略是「手持武器，耐心等待，絕不貿然出擊，導致流血失敗」。<sup>60</sup>毛澤東在華北與日軍進行會戰失敗後，轉而堅持中共的武裝抵抗應局限於小規模游擊，即使長時間不發動攻擊也無妨，目的是為了保存中共的實力以支持到戰爭結束，並且為即將到來的內戰做準備：「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sup>61</sup>有些抵抗運動則認為對占領者採取消耗戰的策略是較合理的做法，他們不考慮時機的問題，也不在意這麼做是否徒勞或影響士氣。一九四一年九月，希臘民族解放陣線針對抵抗運動的目標發表宣言：「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是在市場、咖啡館、工廠、街道、莊園與所有工作上，都要持續鬥爭。」<sup>62</sup>

抵抗運動與軍隊一樣，組成分子來自各個階層，而且隨著時間而變遷。早期抵抗運動十分仰賴一小群知識分子、專業人士與學生，這些人協助形塑抵抗運動的目標，撰寫與發行抵抗文學，建立抵抗網路。在前線打敗仗的軍官如果能順利逃脫不被關進戰俘營，也有可能鼓動民眾起事或成為抵抗運動的領袖。最初在法國南部非占領區成立的幾個法國抵抗團體，反映了初期活躍人士的社會性格：一九四一年夏天，觀點特別激進的陸軍上尉弗雷奈（Henri Frenay）成立了「戰鬥」組織，另一名左翼記者達斯提耶（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則成立了「南部

解放」組織。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法國北部的德軍占領區，一名法國前情報部官員與幾名工會幹部成立了「北部解放」組織。<sup>63</sup>隨著戰爭持續，抵抗運動變成了群眾運動，抵抗運動的社會組成也出現變化。許多初期的領袖與活躍人士或被捕入獄或遭到處決，取而代之的是較年輕的運動人士。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成千上萬名法國年輕男性為了避免被送到德國強制勞動，因而選擇加入游擊隊。當義大利在一九四三年投降後，也有無數義大利年輕男性為了不被殘餘的法西斯國家徵召入伍或被德國人強制勞動，於是紛紛加入游擊隊。<sup>64</sup>

歐洲抵抗運動的組成變化，與歐洲共產黨願意加入有很大的關係。隨著軸心國入侵蘇聯，歐洲共產黨就不再受制於《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義大利的共產黨員就構成了義大利游擊隊的主幹，義共的「加里波底旅」大概占了游擊隊兵力的一半。<sup>65</sup>法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二年成立了自由射手與法國游擊隊，這個組織到了一九四四年已成為法國規模數一數二的抵抗組織，一共有六萬名法國共產黨員加入。<sup>66</sup>在希臘、南斯拉夫與蘇聯，游擊隊成員主要來自共產黨組織動員的大量農民，而共產黨幹部與成員則多半具有城市或工人階級背景。雖然共產黨游擊隊身上穿著類似軍隊的制服，但其中很高比例只是平民志願者或被徵召來，仍需要調適才能在艱困的準軍事戰鬥與規定下存活。中共軍隊徵召的平民僅受過一個月的訓練，而且這些訓練幾乎有一半是政治與歷史教育，並非戰鬥準備。除了軍隊之外，中共也將各地民兵組織成人民自衛軍，成員完全由農村民眾組成，包括徵召十八歲到二十四歲年輕人組成的「抗日先鋒」與由年紀較大者組成的「模範部隊」。到了一九四五年，各地徵召的平民士兵已將近三百萬人，任務是保衛自己的鄉土。<sup>67</sup>

抵抗運動有相當比例由女性構成。女性的參與充分顯示抵抗戰爭就像民防一樣，民眾的參與往往跨越性別。女性在各個階段參與了各種類

型的抵抗，包括武裝或非武裝。雖然在抵抗敘事中，女性經常以輔助者的角色出現，例如為游擊隊提供補給、傳遞消息與警戒守望，也為逃亡者提供安全屋或照顧傷者，但這些行為全都被敵人當成反抗行為，而敵人對這種行為的懲罰，就跟處罰武裝游擊隊員一樣嚴厲。儘管如此，女性仍有屬於自己的特殊關切。女性通常會針對食物配給的不足提出抗爭，也會針對自己接替男性工作，但工作條件與福利欠佳表達不滿。當時的女性無論是否參與抵抗運動，保護家庭永遠是最優先的關切事項。在法國，估計女性針對與家庭有關的事項至少發起了兩百三十九次抗爭。<sup>68</sup>對部分女性來說，政治抵抗是一種附加手段，可以用來挑戰男性的支配與為女性的解放鋪路，使女性可以同時追求兩種形式的解放。女性的這些關切不一定非得要以積極抵抗的方式來表現不可，但為家庭而抗爭的女性與積極從事抵抗的女性，兩者之間也並非截然二分。許多從事抵抗運動的法國男性認為女性為他們提供食物、避難所與醫療只是家庭工作的延伸，而非真正從事抵抗運動，儘管當時法國確實沒有多少女性真正拿起武器戰鬥。<sup>69</sup>在南斯拉夫，估計大約有一百萬名農村婦女非法提供某種形式的支援給一小群積極抵抗的女性戰士。許多女性參與了反法西斯女性陣線，該陣線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經有兩百萬以上的成員，在各地設有委員會與發行自己的報紙。<sup>70</sup>在義大利，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立的婦女保衛團體提供救濟與支援給家庭、職業婦女與因轟炸而無家可歸者，她們也製作與流通非法報紙與傳單，並且也以更直接的方式支持游擊隊。婦女保衛團體的成立章程強調她們的抵抗色彩：「野蠻人偷竊破壞，四處劫掠與殺人。我們不能退讓。我們必須為解放而戰。」<sup>71</sup>

許多女性確實與男性並肩作戰，她們擔負起過去只有男性才擔負的任務。當占領里昂的德國當局在法庭上要求解釋為何拿起武器時，南部



解放組織的地方領導人瑪格麗特（Marguerite Gonnet）回應道：「因為男人放下了武器。」<sup>72</sup>年輕女性持槍的形象雖然引人注目，但絕不只是宣傳而已。在義大利，估計有三萬五千名女性加入了潛伏在森林與山區의游擊隊；大約有九千到一萬名女性被殺、受傷、被捕、被流放或遭到處死，這種傷亡程度已經超過任何正規部隊所能夠承受的程度。<sup>73</sup>在希臘，女性加入民族解放軍與軸心國進行游擊戰，之後由共產黨領導的希臘民主軍也有二到三成由女性構成，她們不僅只是輔助，更參與直接作戰。<sup>74</sup>一九四二年二月，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決定，讓女性除了擔負原本的照護與輔助角色之外也拿起武器作戰，此後便有十萬名女性加入民族解放軍。女性游擊隊約占南斯拉夫所有游擊隊的百分之十五，與男性並肩作戰，並且遭受嚴重的傷亡，估計陣亡人數高達四分之一。這些女性的訓練普遍不足，對於自己使用的裝備也不熟悉，男性隊員對於突然湧入的大批年輕女性往往抱持著敵視心態而不願給予協助。資深女性隊員回憶，男人會要求她們在戰鬥之外，還要負責營區的雜務與照護工作。懷孕的女性被迫遺棄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出生後就殺死孩子，這種現象也出現在蘇聯游擊隊中。<sup>75</sup>

男性與女性共同參與的游擊戰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戰爭形式，與正規軍的戰鬥截然不同。游擊隊往往對外孤立，因此要得知其他游擊隊採取什麼行動或者在哪裡發動攻擊並不容易。戰鬥一旦發生，結果都是殘忍的：殺人或是被殺。戰鬥也是目無法紀的，不僅因為抵抗者不在戰爭法保障範圍之內，一旦被抓，占領者就可以任意對其進行處置，也因為抵抗者的行為在和平時期是嚴重的罪行。事實上，一九四五年後，義大利司法體系起訴了許多前游擊隊隊員，因為他們殺害法西斯官員與法西斯民兵的行為違反了現行法律，必須加以懲罰。抵抗運動的確擁有自己的一套倫理法則，而這套倫理法則是在抵抗者所處的極端危險環境中產

生。參與抵抗運動者跟祕密會社一樣必須歃血為盟，如果有人背叛或開小差就是死路一條。任何有背叛嫌疑或因魯莽而造成他人傷亡的抵抗者，都將受到簡陋粗糙的審理，如年輕的法國共產黨員瑪蒂爾德

（Mathilde Dardant），她被處決後屍體被赤裸棄置在巴黎的布洛涅森林，成為共產黨粗糙司法體系的受害者。<sup>76</sup>真正的背叛者一旦被發現，就會當場遭到殺害，或者遭到追殺與暗殺。抵抗者轉變成背叛者，其間只有一線之隔，不管是賄賂、威脅還是幻滅，都有可能讓一個人越過這條線。游擊隊也應該尊重當地居民，否則將承擔後果，因為犯罪將使游擊隊疏遠當地民眾，使游擊隊得不到當地民眾的幫助，然而許多游擊隊員還是無法達到要求。希臘民族解放運動在他們控制的村子裡設立地方「人民」法院，而游擊隊員會因為偷竊、宰殺牲畜或強姦而遭處決。<sup>77</sup>游擊隊對於顛覆或刺探有著近乎偏執的恐懼。希臘一份抵抗運動報紙表示：「我們最大的責任就是保持警戒。」<sup>78</sup>

游擊隊對於自己招募的成員施以嚴刑峻法，充分反映出抵抗者總是身處於危險狀態之中。游擊隊不同於正規軍，游擊隊員知道自己只要被捉，就會遭到拷問，被特別法庭審問而且沒有上訴機會，而最後結果通常是被處決。許多時候，游擊隊都是當場被槍斃或吊死，在這種狀況下，游擊隊也會還以顏色：如果敵軍士兵或民兵不幸落入他們手中，游擊隊也會用相同的方式對待。白俄羅斯一名兒童游擊隊員曾親眼目睹七名德國戰俘遭到處決，過程完全仿照德軍處決游擊隊員的方式：被迫脫光衣服，然後排成一行槍斃。<sup>79</sup>無論哪個陣營，也無論在何處，游擊戰都是冷酷無情的。占領軍與通敵者對游擊隊的恐懼，源自於游擊隊發動不可預測的恐怖攻擊或突襲。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發表了《論持久戰》，此後便成為抗日游擊戰的主要倡議者。他堅持只有在出現小股孤立的日軍時才能發動進攻，而且要利用埋伏、夜襲、突襲等戰術，戰鬥

結束後要迅速退回鄉間地帶。<sup>80</sup>在城市裡，破壞與殺戮仰賴完全保密、攻擊速度與少量的參與者。游擊隊必須避免與城市地區的敵軍交戰，因為城市地區的正規軍訓練較佳，武器較精良，城市地區也比較難以脫逃。打帶跑戰術可以彌補游擊隊在軍事上的大量劣勢。

游擊隊與裝備精良組織嚴密的正規軍進行的是一場不對稱戰爭，更糟糕的是，游擊隊不僅難以取得武器裝備，就連軍服也十分缺乏。一般熟知的游擊隊形象，無論男女身上都穿著各種衣物，有些是軍服，有些不是，絕大多數都沒有頭盔——與正規軍的整齊劃一形成強烈對比。當戴高樂將軍在解放土魯斯（Toulouse）後檢閱法國游擊隊時，他看到眼前非正規軍的模樣，感到十分吃驚，因為他們身上穿的都是游擊戰中臨時湊起來的衣服。英國駐希臘游擊隊的代表回憶游擊隊簡陋的外觀時也表示：「他們穿的衣服難以形容，幾乎可以說是破布，許多人在雪地裡光著腳。他們的槍枝老舊，大約有六十年了……。」<sup>81</sup>武器缺乏，但維持戰鬥所需的彈藥更為缺乏。重武器是稀有物，只有東線戰場或南斯拉夫的游擊隊才可能持有重武器，這兩個地區的游擊隊普遍裝備較佳。然而，就連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無產階級第一師的八千五百名士兵，也只能為其半數兵力提供步槍。<sup>82</sup>波蘭救國軍花了好幾年儲備武器，等待出擊的時機到來，他們的資源遠比絕大多數抵抗運動來的充裕，然而當一九四四年一月第二十七師終於要採取行動時，七千五百名士兵仍只有四千五百枝步槍與一百四十挺衝鋒槍。經過兩個月的戰鬥後，第二十七師基本上全軍覆沒。<sup>83</sup>華北的中共軍隊雖然到了一九四〇年時宣稱擁有龐大軍力，但實際上招募來的士兵有半數以上沒有武器可用，或是即使擁有槍砲，也缺乏彈藥。<sup>84</sup>當英軍開始向歐洲抵抗運動空投補給物資時，他們運送了大量的塑膠炸藥與引信，因為敵後破壞是英軍的戰略優先目標，但游擊隊其他急需的戰場武器卻是少之又少。與正

規軍不同，游擊隊的後勤補給往往不定期、缺乏體制且通常不是他們想要的。

抵抗者戰鬥的對象不限於占領者。抵抗者對敵人冷酷無情，但對通敵者也毫不寬貸，必要時也不會對其他抵抗運動客氣。敵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定義。通敵者是特殊目標，更容易打擊，不一定有武裝，殺死通敵者可以對占領區民眾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使他們不敢與敵人合作。在中國，通敵的行為十分普遍，因為地方菁英或各地軍閥都希望在日本占領區裡維持自己的利益。華北某個中共機關保存的統計數據顯示，一九四二年有五千七百六十四名通敵者被殺，卻只有一千六百四十七名日本士兵被殺；一九四三年差距變得更加明顯，有三萬三千三百零九名通敵者被殺，日本士兵卻只死亡一千零六十人。<sup>85</sup>毛澤東日後宣稱，中國共產黨採取的策略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在菲律賓，相較於日本占領軍，民眾更害怕菲共領導的虎克軍，在虎克軍殺害的兩萬五千人當中，有很高比例是被懷疑為間諜與通敵者的民眾。<sup>86</sup>希臘民族解放運動的游擊隊在控制地區對於可能與傀儡政權合作的人士進行報復，這場充滿威嚇與殺戮的野蠻行動甚至也針對可能的親英派人士，凡是被懷疑鼓吹英國干涉希臘的人都遭到殺害。<sup>87</sup>

東線戰場上的游擊戰，只要被懷疑通敵，全家大小都會被殺光。在與德國人及烏克蘭民族軍的混戰中，蘇聯游擊隊的無情表現到了極致。費多羅夫（Oleksii Fedorov）指揮的一支游擊隊將里亞霍維奇（Liakhovychi）滅村，因為他們認為這裡的村民與叛軍串通。一名目擊者回憶這場無差別的攻擊：

他們見人就殺。第一個被殺的是馬丘克（**Stepan Marchyk**）與他的鄰居瑪崔娜以及她的八歲女兒，還有赫維塞克（**Mykola Khvesyk**）



夫婦與他們的十歲女兒.....他們殺了赫維斯克（**Ivan Khvesk**）一家（妻子、兒子、兒媳與男嬰），將他們棄置在著火的房子裡.....五十名無辜居民喪生。<sup>88</sup>

雖然游擊隊向莫斯科當局回報時，宣稱他們殺死的德國人與通敵者比例是十比一，但根據一些德國紀錄顯示，實際比例應該更接近一比一點五，部分游擊隊員的回憶錄甚至透露出更高的通敵者死亡比例。通敵者通常都會遭到拷問，甚至還會遭到剝皮或活埋。<sup>89</sup>在西歐與南歐，游擊隊的重點同樣是暗殺或恐嚇通敵者，或是破壞設備與為德軍生產戰爭物資的工廠。

即使彼此有著共同的軸心國敵人，游擊隊派系之間依然毫不留情地自相殘殺。在希臘，勢力最大的民族解放陣線實際上由希臘共產黨掌控，該民族解放陣線試圖以武力合併其他較小的非共產黨抵抗團體。一九四四年四月，民族解放陣線的游擊隊攻擊並消滅了對手希臘民族與社會解放運動，處決了該運動領袖普薩羅斯上校（**Demetrios Psarros**）。另一個抵抗組織希臘民主民族聯盟雖然不斷出現武裝衝突，卻因為聯盟領袖澤爾瓦斯將軍（**Napoleon Zervas**）獲得英國人的鼎力支持，因而得以倖存至戰後。希臘共產黨追捕與暗殺托洛斯基派人士，法國共產黨也是如此。<sup>90</sup>意識形態與政治主張的差異，強化了游擊隊派系互鬥的局面。在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軍與米哈伊洛維奇上校

（**Draža Mihailović**）率領的切特尼克（**Chetnik**）叛軍，兩者的武裝衝突主要源於兩派對於戰後南斯拉夫國家有著不同的願景：一個希望建立共產主義國家，另一個則是君主制國家。一九四二年春，共產黨領袖決定對抵抗運動對手採取階級恐怖的策略，並於同年四月殺害了五百名切特尼克領導人士，由此開啟了漫長內戰。<sup>91</sup>在中國，雖然蔣介石的國民政

府與中共已經同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雙方在敵後組織的游擊隊卻持續發生衝突。國民政府高層私下把日本人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都視為敵人。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的新四軍違抗命令經由江蘇省往北移往日軍後方，結果被國民黨軍隊圍殲，一萬人陣亡。此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存實亡。<sup>92</sup>政治野心與個人恩怨分化了各地的抵抗運動，使得游擊隊肆無忌憚地自相殘殺，就像他們無情殺害通敵者與占領者一樣。

每個抵抗運動內部多少都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內戰，無論其對抗的是通敵者還是抵抗運動的其他對手，但在中國、南斯拉夫與希臘，抵抗運動卻與內戰密不可分。這些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在與外敵對抗的同時，仍不忘利用戰時危機在自己控制的地區改變當地的社會與政治地貌。這些戰爭關乎民族的政治未來，而這些戰爭的參與者深信軸心國的新秩序必將傾倒。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控制廣大地區的一億人口，逼迫區內地主全面減少廣大農民的地租與利息。一九三七年，中共政治局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要求社會平等與擴大地方民主。中共不顧地方菁英或地主的反對推動改革，賦予農民從未有過的權利，使他們能夠參與地方政治。<sup>93</sup>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已經做好發動更激進階級鬥爭的準備，他們以武力對抗舊菁英與國民黨政權，並且隨即演變成公開內戰。

在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及其武裝側翼也以類似的方式改變地方農村生活。據說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年輕的希臘共產黨員維魯希奧蒂斯（Aris Velouchiotis）帶著十五名武裝人員、一面旗幟與一個軍號，來到距雅典三百公里的山村多姆尼斯塔（Domnista），他高舉「反叛旗幟」，不僅要對抗敵人，還要對抗舊階級體系。<sup>94</sup>無論是否真有此事，在游擊隊支配的農村地區，各地村民都根據首次在克萊斯托斯（Kleistos）村頒布的「自治與人民正義」規約來建立民主制度。每座

村子都要設立游擊隊轄區與地方的「專責轄區」來組織村落生活，但農民跟中國一樣可以投票選出地方委員會為他們服務。<sup>95</sup>每座村子設有「人民法庭」，每週日開庭審理當地案件。民族解放運動強調「人民統治」，這個說詞無須清楚定義就能讓絕大多數不識字的鄉村民眾瞭解。<sup>96</sup>反抗新秩序或質疑其正當性的人，可能一聲令下就遭到處決。然而順從的人也不一定能平靜度日，除了要上繳收成，繳稅支持游擊隊，還要定期為捲入游擊隊衝突的敵對家族解決紛爭。<sup>97</sup>幾年後，約安尼迪斯（Yiannis Ioannidis）為游擊隊普遍的暴力手段辯護：「打內戰不能沉溺在多愁善感的情緒中.....要消滅敵人就要不擇手段。」<sup>98</sup>游擊隊在農村推動的轉變，旨在為基礎的社會革命與階級戰爭創造條件。一九四四年秋天，當德軍終於放棄希臘時，游擊隊解放的地區，抵抗運動將其稱為「自由希臘」，成為希臘共產黨奪取國家權力的基地，德軍占領時期在檯面下進行的內戰此時終於演變成公開的戰後衝突。共產黨叛軍與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重建的希臘民族軍，雙方為了掌握希臘而交戰，導致十五萬八千人死亡，其中有四萬九千人是平民。幸運活下來的人，還需要忍受數年的騷亂與流離失所。<sup>99</sup>

在南斯拉夫，公開的內戰與戰時的游擊戰同時進行。這場內戰混雜了種族、宗教與政治衝突，平民深陷在這個極端暴力的網絡中，不是成為受害者，就是成為加害者。最接近真實的估計顯示，戰時死亡的南斯拉夫人約略超過一百萬人，但絕大多數不是死於敵軍之手，而是同胞的自相殘殺。抵抗運動在南斯拉夫具有雙重含義：抵抗占領者與抵抗內部敵人。一九四一年四月，德國的入侵摧毀了脆弱的南斯拉夫政府，另外建立了占領政權，導致此後南斯拉夫內爭不斷。名義上擁有獨立地位的天主教國家克羅埃西亞，領導人是法西斯主義者帕維里奇，國內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如波士尼亞穆斯林與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義大利控

制斯洛維尼亞與蒙特內哥羅，德國則控制殘餘的塞爾維亞，扶植內迪奇（Milan Nedić）的親德傀儡政府，地位猶如塞爾維亞的貝當。新成立的克羅埃西亞政權想維持自身的獨立地位與建立一個種族純淨的國家；塞爾維亞的切特尼克想建立大塞爾維亞與恢復君主制，排除所有的穆斯林；弱小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想建立對抗法西斯敵人的統一戰線，不計一切代價對抗不願意與共產主義合作的其他抵抗運動。<sup>100</sup>

內戰一觸即發。克羅埃西亞人殺害或驅逐塞爾維亞人；塞爾維亞切特尼克殺害波士尼亞穆斯林與摧毀他們的村子，並且將受害者割喉；共產黨游擊隊無情地對抗塞爾維亞君主派與克羅埃西亞法西斯主義者。<sup>101</sup>數千名志願者組成非正規軍來保護自己的家園與持續抵抗運動。切特尼克南斯拉夫祖國軍恣意殺害波士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與共產黨員。狄托（Josip Broz Tito）率領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對抗德軍，但也積極反對切特尼克、克羅埃西亞烏斯塔沙民兵與準法西斯主義的塞爾維亞志願軍。各地都有民眾自發地組織自衛團體來抵抗各種威脅，例如穆斯林綠色幹部、潘札（Muhamed Pandža）領導的穆斯林解放運動、反共的斯洛維尼亞聯盟。<sup>102</sup>暴力持續且愈來愈野蠻。共產黨員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戰爭回憶錄中寫道：「死亡成為稀鬆平常之事。生命已經失去意義，只剩下活著。」<sup>103</sup>德國與義大利占領軍對各個勢力進行分化，或者是與各方達成暫時和解以對抗共產黨這個共同敵人。到了一九四四年，狄托的解放運動開始取得廣泛支持，甚至連前君主派人士也願意妥協，因為狄托承諾未來將建立一個聯邦制民族國家，願意尊重宗教與種族歧異，讓各方和平共存。與希臘和中國一樣，南斯拉夫共產黨游擊隊在控制的鄉村與小鎮地區推動社會與政治改革。<sup>104</sup>一九四四年秋天，最後一場解放塞爾維亞的戰役（塞爾維亞是狄托的解放運動進展最少的地方）成了純粹的南斯拉夫人內戰。德國僅能動員少數警察



與親衛隊，必須仰賴數千名切特尼克、塞爾維亞志願軍及俄羅斯反共志願軍的協助。一九四四年秋天，塞爾維亞戰爭結束，意謂著南斯拉夫內戰至此告終。<sup>105</sup>

意識形態與政治分裂導致了內戰，然而抵抗運動在戰時除了面臨這兩項因素，還遭遇其他許多障礙。由於占領區內絕大多數民眾並未積極抵抗，因此民眾對於抵抗者往往態度曖昧，有時甚至表現出敵視。在出現游擊隊的地方，村民往往被剝奪資源與糧食。農民有時會與游擊隊合作，但中國或烏克蘭的農民時常認為游擊隊並沒有比占領者好到哪裡去，因為游擊隊不僅會搶奪有限的糧食，甚至會殺死反抗者。在蘇聯的敵後地區，一些掉隊或逃跑士兵為了生存會公然進行搶掠，甚至不再以抵抗者自居。在德軍後方，地方民眾有時會臨時起意，為了生存而搶掠附近村落。基輔附近一名蘇聯游擊隊指揮官指責一些「家庭游擊隊」獨立行動：「他們喝得醉醺醺，搶奪民眾財產……無法無天。」<sup>106</sup>班德拉率領的烏克蘭民族軍又稱「班德拉軍」（banderivtsy），被各地村民稱為「土匪」（bandity）。他們偷竊牲口，凡是不支持班德拉運動的人，無論是不是烏克蘭人，都格殺勿論，還會掠奪他們理應解放的村落。<sup>107</sup>在華北地區，早在日本入侵之前就已經盜賊橫行，各地的小股土匪趁著國家缺乏有效治理能力時四處搶掠。抗日戰爭時，這類盜匪頭子會藉口保護村民對抗日本人，實際上卻是搶奪與勒索村民。例如一名盜匪頭子胡金秀以抗日為名糾集五千人，非但不保護民眾，反而打家劫舍，直到日軍將其殲滅為止。<sup>108</sup>對中國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度日，即使這意謂著要支持日本人對抗當地的游擊隊與盜賊。中共新四軍驚訝地發現，當他們進入某座小鎮時，居民竟熱情地對他們揮舞日本國旗。<sup>109</sup>面對這種混亂而暴力的局面，一切彷彿回復到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

在占領者眼中，抵抗行動是一種恐怖主義罪行，而地方民眾則成為占領者報復抵抗行動的受害者。民眾擔心自己無辜受害，於是起而反對抵抗運動。在東歐的東南部地區，德國當局下令，只要有一名德國士兵被殺，就要處決一百名無辜的平民來抵命；在法國，占領軍的暴行較為克制，宣稱每有一名德軍士兵被殺，只要五名平民的性命做為抵償。<sup>110</sup>民眾感到不安，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讓抵抗運動不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法國開始出現暗殺潮，此舉受到民眾與倫敦自由法國當局的譴責，因為德國因此殺害了大量民眾做為報復。當荷蘭抵抗委員會於一九四三年春天成立時，荷蘭流亡政府基於相同理由拒絕批准該委員會對德國人採取暴力行動。<sup>111</sup>抵抗分子必須面對道德兩難，因為他們的行動只能對占領者造成可忽略的輕微傷害，卻會讓大批無辜同胞喪失生命。占領者的鎮壓從一開始就是無差別的，因為占領者的目標是威嚇其他民眾，使其乖乖順從。到了一九四一年，各地日軍指揮官對於共產黨游擊隊的襲擊無計可施，於是下令在游擊隊出沒的地區採取惡名昭彰的「三光政策」——儘管早在此之前，日軍的反游擊部隊就已經零星採取過這種沿路「殺光、燒光、搶光」的策略。<sup>112</sup>在歐洲，占領者的反應也大致相同。在城市裡，抵抗分子遭到審判、流放或處決，而為了報復，充當人質的民眾則被公開槍斃。在鄉村地區，只要村民被懷疑窩藏游擊隊或「自由射手」，整座村子就會被燒毀，村民也會被殺害。一九四二年，親衛隊帝國保安總部部長海德里希遇刺，導致捷克的利迪策村（Lidice）被摧毀。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國武裝親衛隊「帝國」師的一個團毀滅了法國村落格拉訥河畔奧拉杜爾（Oradour-sur-Glane），殺害包括婦女小孩在內的所有村民，而這些只是針對個人抵抗行動進行殘酷集體懲罰的冰山一角。在烏克蘭，在親衛隊將領熱勒維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alewski）領導下，德國安全

部隊與軍隊共計焚燒了三百三十五座村子。而根據德軍內部精確但令人毛骨悚然的統計數據，德軍還另外殺害了四萬九千兩百九十四名男女幼童，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一九四三年游擊隊活動的高峰期。在希臘，有七萬零六百人在報復行動中被處決或殺害。<sup>113</sup>

占領者也組織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來剷除游擊隊，重創抵抗運動。在南斯拉夫，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三月的「白色作戰」與同年五月到六月的藍色作戰未能消滅民族解放軍，但確實造成民族解放軍的重大損失。在烏克蘭，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七月的「塞德利茨作戰」（Operation Seidlitz）導致五千名游擊隊死亡。一九四四年冬天於義大利北部進行的反游擊戰役，重創了抵抗運動，估計有七萬五千名男女死亡。在法國與低地國，蓋世太保持續進行刺探工作，在當地警察協助下，於一九四四年春破壞了當地游擊隊在早期建立的網路與活動。有些被徵召來從事反游擊行動的人原本就以劫掠為生，如烏克蘭民兵、武裝親衛隊彎刀師（SS Handžar Division）的波士尼亞穆斯林、義大利的哥薩克師，許多人提到這些人生性殘忍，樂於從事這些野蠻任務。在占領者強力壓迫下，抵抗運動能做的十分有限。盟軍擊退軸心國需要的時間愈長，抵抗運動的前景就愈渺茫。解放之日持續延後，造成游擊隊士氣低落，甚至使游擊隊轉而反對同盟國陣營。即使游擊隊依然存在，但在缺乏重武器與有效軍事組織的狀況下，抵抗運動幾乎不可能仰賴自己的力量獲得解放。這帶來一個難解的矛盾：一方面想更有效地從同盟國手中取得實際援助與裝備，但另一方面，取得援助就意味著難以完全仰賴自己的力量解放民族，也無法完全仰賴自己的力量形塑民族的未來。「戰鬥」組織的領導人弗雷奈寫道：「事實上，我們成立的游擊隊，與其說是為了對抗入侵者而戰，不如說是為了尋求自身的解放而戰……。」<sup>114</sup>

## 抵抗運動與同盟國

支持解放運動並非同盟國的首要目標。抵抗運動對同盟國之所以重要，主要因為抵抗運動有助於擊敗敵人。同盟國願意援助抵抗運動，前提在於武器裝備必須用在符合同盟國戰略目標的地方。英國的歐洲特別行動參謀長回憶說：「我們必須從非常實際的觀點來考量每則提案與每個團體是否有助於我們打贏這場戰爭。」<sup>115</sup>同盟國在思考戰後政治局勢時，也會考慮眼前各抵抗團體的政治重要性，但戰時政策的擬定，軍事考量還是居於首位，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四三年英國政府改變了援助政策，從原本援助君主派人士米哈伊洛維奇，改成援助共產黨員狄托，只因為狄托的民族解放軍更有能力對抗德國人。（有趣的是，史達林並不反對支持米哈伊洛維奇的切特尼克，因為他擔心狄托的共產主義野心最終會影響到自己與西方盟國的關係。）但在另一方面，對抵抗運動來說，擊敗敵人只是手段，而非最終目的。在中國、義大利、法國與巴爾幹半島，解放指的是在勝利後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這個社會要比先前因為外國入侵而被推翻或挑戰的社會更為民主、更為平等與更為兼容並蓄。「灌木叢」領導人布魯特（Michel Brut）比較了抵抗運動與同盟國之間的差異：「不起來反抗，就不可能獲得解放……沒有人質疑同盟國帶來的立即戰略價值，但重點是，我們必須訓練自己的戰士才能進行反抗。」<sup>116</sup>

同盟國彼此之間對於如何利用抵抗運動也有不同的看法。好比在蘇聯境內進行的游擊戰，就必須與蘇聯在前線的戰爭投入密切整合。蘇聯在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逐步取得勝利，解放的期望也跟著水漲船高。與英美不同的是，紅軍與支持紅軍推進的游擊隊，兩者解放的是自



己的領土與自己的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蘇聯還沒收復原有領土之前，蘇聯游擊隊的抵抗已經減緩，游擊隊甚至開始逐步併入正規部隊。直到這個時期，蘇聯才開始介入廣大東歐的抵抗戰爭，而其結果顯然不如在蘇聯境內順利。儘管如此，蘇聯游擊隊在需要外援時，也遭遇了與歐洲其他地區游擊隊相同的困境。當紅軍於一九四一年撤退時，蘇聯當局組織了留守部隊進行游擊戰，但這些部隊缺乏資源而難以為繼，而此時的史達林也不像日後那樣重視游擊隊的潛力。留在烏克蘭的兩百一十六支游擊隊，到了一九四三年只剩下十二支，計兩百四十一人。當局原想用空降的方式增援，卻因為容易被德軍掌握行蹤而作罷。早期從民眾徵召的游擊隊員訓練不足，無法滿足游擊戰的要求，往往容易叛變或逃跑。<sup>117</sup>此外，地方民眾表面上願意協助游擊隊加速解放與恢復蘇聯勢力，但實際上游擊隊奪取民眾的糧食與資源，讓村落暴露在德軍報復的風險之中，加上游擊隊未能兌現保護民眾的諾言，未來還有可能恢復嚴苛的共產黨統治，這些都讓地方民眾對於游擊隊的態度充滿曖昧。

這個狀況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出現變化：波諾馬連科（Panteleimon Ponomarenko）出任白俄羅斯共產黨第一書記，於莫斯科主持中央游擊隊參謀部。儘管如此，蘇聯當局還是無法與所有游擊隊建立無線電聯繫，也無法提供適當的彈藥與炸藥。直到史達林格勒會戰勝利後，民眾對游擊隊的態度才變得沒那麼負面，而紅軍裝備與紅軍專業人士也成功運送與滲透到德國戰線後方，使得游擊隊的武力逐漸正規軍事化。一九四三年，游擊隊逐漸能進行有效攻擊，兵力也逐漸增加；到了七月，官方統計游擊隊人數已達到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三人，不過兵力損耗仍相當高。一九四三年，滲透到德國戰線後方的游擊隊員鮮少能夠存活，而徵召未經訓練的農民擔任游擊隊更讓傷亡率居高不下。<sup>118</sup>然而，游擊隊活動最終還是為蘇聯大本營帶來戰略利益。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游

擊隊控制了白俄羅斯大約九成的森林地區與三分之二的穀物與肉類產區，使德軍無法再利用這些資源。<sup>119</sup>對德軍交通網絡的攻擊也達到高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游擊隊一共進行了超過九千次攻擊——光是一九四三年八月，當德軍因庫斯克會戰慘敗而倉皇撤退時，德國紀錄顯示有超過三千公里的鐵軌遭到炸毀，將近六百輛火車頭遭到破壞無法使用。蘇聯的統計數據（也許有點失真）則顯示，游擊隊在活動高峰期一共摧毀了一萬兩千座橋樑與六萬五千輛載具。<sup>120</sup>至於每一名游擊隊員是否能夠達到每個月「至少殺死五名法西斯主義者與叛國者」的標準，這點從統治數據無法得到證實。一九四四年一月，中央游擊隊參謀部解散，解放地區的游擊隊也隨之併入紅軍。

到了一九四四年，蘇聯軍隊已經橫越烏克蘭，來到昔日的蘇聯邊界。史達林此時在東歐與東南歐面臨一個全新的抵抗環境：在這兩個地區，共產黨抵抗運動與非共產黨抵抗運動相互競爭，後者不希望蘇聯的勝利帶來共產主義式的解放，就連當地的共產黨武裝抵抗運動（主要是在南斯拉夫與希臘）也不必然遵循或瞭解莫斯科的方針。蘇聯對抵抗運動的看法，有可能提供支持，卻也可能抹煞當地抵抗運動的貢獻。一名蘇聯軍官認為希臘民族解放軍「只是一群烏合之眾，不值得支持」，另一名紅軍將領則認為狄托的游擊隊是「很厲害的業餘人士」，再怎麼厲害也只是業餘。<sup>121</sup>最悲劇的例子是波蘭。波蘭的主要抵抗組織波蘭救國軍堅決反共與反蘇聯，但他們卻得面對同盟國陣營中只有蘇聯直接介入波蘭解放的困境。此外，波蘭救國軍雖然是最大的抵抗組織，卻不是唯一的抵抗組織。戰前提出激進反資本主義政綱的農民黨也成立了農民營，基於保護農民利益的立場而與救國軍代表的保守社會力量對抗。波蘭共產黨有自己的抵抗運動，也就是人民軍。人民軍拒絕與其他抵抗運動合作，到了一九四四年，人民軍開始取得即將到來的紅軍補給，就像

先前蘇聯游擊隊在德國的蘇聯占領區取得補給一樣。波蘭共產黨的兵力不多，一九四三年全國只有大約一千五百名，一九四四年在華沙也只有四百名。然而波蘭共產黨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將德軍逐出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是蘇聯共產黨的軍隊。<sup>122</sup>

到一九四四年為止，波蘭的抵抗運動一直十分有限，主要是因為救國軍認為叛亂時機還未成熟。到了一九四四年，徵召的四十萬名潛在戰士中，絕大多數都已經受過軍事訓練，他們只是名義上是平民，其中還包括數千名波蘭女性。波蘭救國軍依照一般正規部隊的番號加以區分，儲備的武器與糧食分散在全國各地，只等時機一到便要揭竿起義。判斷時機相當困難，因為一切都取決於盟軍與德軍之間的戰事變化。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深知抵抗運動面臨的矛盾。一九四三年，波蘭救國軍與蘇聯的政治關係急速惡化，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史達林轉而支持由波蘭共產黨組成的民族解放委員會，也就是所謂的「盧布林委員會」

（Lublin Committee）。救國軍司令部一直努力要與逐漸逼近的蘇聯大本營聯繫，蘇聯方面卻置之不理，救國軍因此無法得知蘇聯的真正意圖。救國軍總司令科莫羅夫斯基將軍（Tadeusz Bór-Komorowski）得到倫敦方面的指示，要他採取行動，「無須考慮俄羅斯人的軍事或政治態度。」<sup>123</sup>然而，同盟國並無援助波蘭起義的計畫。從一九四一年初到一九四四年六月，西方國家補給的裝備與武器不過三百零五噸。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數百名來自西方的波蘭志願軍空降到波蘭，但首要任務是進行破壞以協助同盟國的軍事投入。一九四四年夏天，史達林告訴邱吉爾，波蘭的非共產黨抵抗運動「持續不了多久且缺乏影響力」。昔日負責防守史達林格勒的崔可夫將軍，他的軍隊於一九四四年六七月展開夏季攻勢巴格拉奇翁作戰，推進到了波蘭領土。崔可夫當時認為，波蘭救國軍「絕不會向德國人開戰」。<sup>124</sup>

事實證明崔可夫的判斷錯誤。一九四四年，科莫羅夫斯基自行下令救國軍與農民營就戰鬥位置，準備對抗從蘇聯撤退的德軍。他們將武器從藏匿處搬出，儲備好糧食，並且開始製作汽油彈。軍隊裝備不足，士兵穿著簡陋軍服，上面別著以波蘭國旗紅白兩色製成的臂章。一九四四年一月，抵抗運動針對波蘭東部的德軍發動「暴風雨作戰」（Operation Burza），希望波蘭戰士能趕在紅軍抵達之前解放波蘭城鎮。波蘭不願仰賴蘇聯軍隊，想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民族解放，然而這場戰役充分顯示波蘭的想法只是一廂情願。此外，抵抗運動不知道的是，史達林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就已下令紅軍指揮官要解除波蘭救國軍的武裝，如有不從格殺勿論。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十月，有兩萬一千名波蘭反抗軍遭到蘇聯逮捕，其軍官被流放到蘇聯，士兵則被關進剛淨空的德國集中營，包括紅軍在同年七月解放的馬伊達內克勞動營與滅絕營。<sup>125</sup>科莫羅夫斯基與華沙地區指揮官赫魯希切爾將軍（Antoni Chruściel）對於蘇聯鎮壓民族抵抗運動之事其實早有耳聞。紅軍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往西前進的同時，也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祭出同樣嚴厲的懲罰：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流放與殺害當地的民族主義者。與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波蘭一樣，一九四四年夏天的波蘭救國軍發現自己再次被蘇聯紅軍與納粹德軍包夾，而且兩方都想置他們於死地。

理解這項嚴峻的現實，我們才能瞭解科莫羅夫斯基與他麾下的將領為什麼最終決定在八月一日發動華沙大起義。在軍事局勢不完全明朗的情況下，只知道紅軍距離分隔華沙市區的維斯杜拉河東岸只有幾公里遠，而位於華沙與華沙周邊的德國軍政當局似乎正準備撤離這座城市。七月底，莫斯科播送的廣播呼籲華沙人民起義反抗壓迫者，不過這項訴求主要是說給人數較少的共產黨人民軍聽，而這很可能讓其他抵抗運動警覺到蘇聯占領的危險。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抱持審慎態度，因為他們



不確定西方盟國是否會提供支援。赫魯希切爾本人也認為武器太少，反抗軍數量無法掌握，不應該冒險發難。但考慮到抵抗運動想在蘇聯軍隊抵達前解放華沙，藉此顯示波蘭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恢復波蘭國家主權，不需要仰賴盟軍協助，這一大原則使赫魯希切爾改變了決定。波蘭救國軍司令部估計他們只需四到五天驅逐德國人，然後就可以歡迎俄國人以盟友而非解放者的身分進城。科莫羅夫斯基日後寫道，在這些條件下，全國性的大起義「似乎真實可行」。<sup>126</sup>七月三十一日，抵抗運動領袖聚集開會，討論該如何進行。然而各方仍缺乏共識，此時有消息傳來（實際上是假消息），說蘇軍戰車正進入華沙東部郊區。這項消息促使各方達成協議，認為眼下就是起義的最後機會。隔日發布起義命令之後，情報才顯示紅軍並無任何動靜，但科莫羅夫斯基拒絕撤回命令。<sup>127</sup>

事實上，這場起義注定失敗，恢復波蘭國家主權在當時也是一個無法實現的願望。但對抵抗運動來說，這卻是個復仇的崇高時刻。卡茲克（Kazik）是一名猶太倖存者，但他以波蘭人自居，他回憶說：「我們似乎勝券在握……到處瀰漫著民眾反抗的氣氛……大家都興高采烈。」<sup>128</sup>八月一日下午五點，救國軍在華沙各處起事，令德軍大吃一驚。根據估計，救國軍徵召超過五萬人，大約有四萬人參與這次起義。武器缺乏，僅足夠裝備八千五百名戰士，部分是女性。另有數千名兒童被編入「灰色隊伍」，這是波蘭童子軍協會的一個準軍事側翼組織——只有超過十六歲的孩子才能參與戰鬥，其中有五分之四被殺。<sup>129</sup>抵擋波蘭反抗軍的是已經部署好的德國國防軍與武裝親衛隊，他們在此之前被匆促派來增援維斯杜拉河防線以抵禦來襲的紅軍。當希特勒得知起義之事時，他下令將華沙從地圖上抹除，將城市居民全部殺光，這是他針對抵抗運動所下達的最病態命令。兩支素來惡名昭彰的旅被派往華沙貫

徹希特勒的指示，一支是迪勒萬格（Oskar Dirlewanger）指揮的親衛隊，另一支是俄國變節者卡明斯基（Bronislav Kaminsky）的部隊。在救國軍無法控制的地區，德軍恣意殺戮破壞，迫使反抗軍退守城市的幾塊零星區域。數量不詳的民眾冒險加入起義，但也有數千人袖手旁觀。估計有十五萬人死於轟炸、砲擊與大屠殺，這是二戰中數一數二大的一場軍事暴行。親衛隊的熱勒維斯基將軍曾是進行殘酷反游擊戰的資深將領，現在則負責鎮壓這場起義。他在抵達華沙之後，停止了對居民的屠殺，改採將倖存民眾大量流放的政策。

同盟國對華沙起義的支持微乎其微。最理想的預期是，一旦起義軍驅逐了德國人，紅軍將緊接著抵達華沙。但幾乎就在起事的同時，這樣的預期已注定不可能實現。八月一日，蘇聯在歷經四十天持續辛苦追擊德軍之後，攻勢終於停頓下來。抵達維斯杜拉河時，蘇軍已經精疲力盡，沒有繼續推進奪取華沙的計畫；即使蘇聯大本營下達命令，羅柯索夫斯基元帥的部隊也無法渡河發動進一步攻擊，因為此時德軍已在河對岸迅速增援，準備發動大規模反攻。事實上，要擊退德軍還需要六個星期的戰鬥，因此在九月中旬前支援起義是不可能的。此外，紅軍在白俄羅斯擊潰德國中央集團軍後，史達林希望兵分兩路，一路沿北部軸線朝波羅的海國家推進，另一路沿敵軍較少的南部軸線朝巴爾幹半島與中歐推進，以確保蘇聯對該地區的支配。<sup>130</sup>史達林對於援助波蘭民族主義者毫無興趣，他根本不把這場起義放在心上：「他們能算得上是軍隊嗎？沒有大砲，沒有戰車，沒有戰機？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手持武器。在現代戰爭中，他們什麼都不是……。」八月中，史達林發給邱吉爾的訊息提到，這場起義不過是一場「魯莽而可怕的賭博」。<sup>131</sup>直到波蘭反抗軍跌破眾人眼鏡，不僅支持了四五天，還支持了幾個星期，史達林才在與紅軍並肩作戰的波蘭部隊及西方盟邦共同施壓下做出政治表態。

從九月十三日到十四日的晚間開始，蘇聯在往後兩個星期持續對華沙空投物資，但蘇聯飛機必須低空飛行才能辨識反抗軍身處的口袋地區，結果降落傘還來不及打開，許多裝備與糧食就直接摔落到地面。英國也派遣軍機從義大利起飛進行空投，美軍軍機也從英國起飛如法炮製，但絕大多數物資都落入德國人手裡。美國第三航空師空投了一千三百噸物資，只有三百八十八噸成功交給了反抗軍。英國與波蘭機組人員發現要飛抵華沙十分困難，而且傷亡率很高。一百九十九架飛機只有三十架成功飛抵華沙進行空投，而波蘭反抗軍真正能拿到的物資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sup>132</sup>

失敗勢不可免，同盟國援助只是延緩結果的發生。到了十月二日，殘餘的反抗軍已潰不成軍，在絕望下不得不接受戰爭結束的現實。科莫羅夫斯基與一萬六千三百名反抗軍（包括三千名女性）淪為俘虜——他們被當成戰俘，這對非正規軍來說是少見的優厚待遇。反抗軍的損失有各種估計數字，但保守認為可能達到一萬七千人。熱勒維斯基在戰後提出難以置信的數字，他表示自己的部隊陣亡多達一萬人，失蹤七千人，但他在戰爭期間一開始提出的報告卻只有一千四百五十三人死亡，八千一百八十三人受傷。無論如何，這些數字見證了這場戰爭的艱困，就像史達林格勒會戰一樣，這是一場逐門逐戶推進的巷弄戰。灰色隊伍的年輕倖存者被送進勞改營。歷史最大的諷刺是，後來盟軍轟炸機居然誤炸布洛克維茨（Brockwitz）集中營，導致許多在華沙起義中生還的波蘭年輕人被炸死。

起義失敗終止了波蘭人有組織的反抗。一九四五年一月，紅軍發動大規模攻勢橫渡維斯杜拉河，然而整個波蘭社會早在此前四個月就因為起義的重大傷亡而噤若寒蟬。大約有三十五萬名華沙居民遭到驅逐，成為居無定所的難民，還有無數民眾被帶往德國強制勞動。十月九日，希

特勒重申華沙必須徹底抹除。於是德軍先是掠奪這座城市，再有系統地破壞這座城市，超過五成建築物被毀。大約有兩萬三千五百節貨車車廂裝滿了戰利品運往德國。<sup>133</sup>起義的失敗也對其他抵抗運動造成完全負面的影響。據傳科莫羅夫斯基曾經表示：「協助俄羅斯就是背叛祖國.....現在已到了反抗蘇聯人的時候。」當蘇聯當局得知此事之後，便在紅軍占領地區加強鎮壓救國軍。<sup>134</sup>在德國占領的地區，農民營與救國軍紛紛解散。面對華沙的恐怖下場，民眾的反應與其說是憎恨加害者，不如說更憎恨抵抗運動。波蘭地下政府十一月提出的報告表示，民眾「感到無力」，而且普遍反對繼續抵抗：「經過漫長時間的抵抗，犧牲者這麼多，成果卻這麼少.....。」<sup>135</sup>

在整場二戰期間，蘇聯對抵抗運動的態度始終不明確，即使對共產黨自身的抵抗運動也一樣。史達林甚至對參與過一九四四年抵抗運動的波蘭共產黨感到不信任，因為波蘭共產黨不聽命於他支持的「莫斯科波蘭人」。莫斯科當局發給各地共產黨員的訊息相當審慎，一方面避免對立，一方面也留下與非共產黨合作的空間。史達林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提防中國共產黨，因為後者經常不理會莫斯科的訓令獨立行事。毛澤東日後曾向蘇聯大使抱怨史達林「不太信任我們，他認為我們會成為第二個狄托，認為我們是落後國家。」史達林希望毛澤東能避免內戰，同時與蔣介石合作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等到二戰結束後，史達林依然不太願意提供軍事裝備給毛澤東，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統治全中國的野心感到不滿。<sup>136</sup>當蘇聯遭到德國入侵時，與非共產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是蘇聯共產黨的官方政策。在希臘與南斯拉夫，即使主要的抵抗運動是由共產黨領導，史達林卻不希望這兩個地區爆發革命，因為對英國人來說，希臘與南斯拉夫具有明顯的戰略優先性，如果史達林鼓勵當地共產黨奪取政權，將會影響他與西方盟國的關係。蘇聯政權不重視希臘革



命。<sup>137</sup>史達林希望希臘共產黨避免使用革命語言或制定叛亂計畫，並且盡可能專注於自衛。蘇聯幾乎從未支援過希臘民族解放軍。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史達林勸告希臘共產黨加入英國支持的聯合政府，同時拒絕支持他們發動內戰。<sup>138</sup>

在南斯拉夫，第三國際試圖說服狄托不要大張旗鼓地發起共產主義戰爭，並且希望他與其他反法西斯主義的抵抗運動合作，但南斯拉夫內戰已箭在弦上，不是史達林所能阻止。結果就是直到一九四四年為止，史達林仍持續支持流亡的南斯拉夫國王與他的政府，而且鼓勵狄托支持所有反希特勒人士，包括君主派的切特尼克。等到大勢底定，史達林確定西方盟國不會反對之後，他才於一九四四年六月承認狄托臨時政府。<sup>139</sup>正當蘇聯軍隊可能支援南斯拉夫游擊隊時，史達林的最高軍事委員會卻在同年九月對紅軍下達訓令，明白表示：「不要進入南斯拉夫，以免分散兵力。」<sup>140</sup>同月稍晚，狄托與史達林會面，史達林終於同意讓正在進攻匈牙利的紅軍撥出部分兵力協助狄托攻下貝爾格勒，但條件是軍事行動結束後紅軍就會立即離開。史達林無法確定南斯拉夫的政治局勢，因此他除了允許紅軍協助狄托的游擊隊，也讓紅軍與切特尼克合作。<sup>141</sup>一九四四年十月，狄托攻下貝爾格勒之後，紅軍果然立即離去，讓狄托的游擊隊獨力完成解放南斯拉夫的任務。英國對於共產黨即將掌控南斯拉夫感到不安，最終促使狄托與此前一直提供補給物資與空中打擊的西方盟國決裂。狄托對英國代表團表示：「我身為總統與最高統帥，我的行動無須向我國以外的人負責。」<sup>142</sup>一九四五年三月，狄托組織政府，二十九名閣員中有二十三名共產黨員，同盟國別無選擇，只能承認狄托政府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權。南斯拉夫沿著薩瓦河對德軍防線進行最後一輪血腥猛攻，這場戰鬥一直持續到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過了一個星期才結束。南斯拉夫在沒有盟軍

直接介入下獨自贏得民族解放，在戰時抵抗運動盛衰起伏的歷史中，無疑是個獨特的例證。

相較於蘇聯在一九四五年二戰勝利後仍持續壓迫波蘭人與東歐各民族的抵抗運動，在西歐的同盟國並未孤立或壓迫抵抗運動。儘管如此，西方盟國的首要目標仍是擊敗德國，他們對待抵抗運動的態度往往受到這項目標的影響。西方盟國對抵抗運動也存有戒心。西方盟國想在解放西歐後解除所有游擊隊的武裝，而且希望限制抵抗運動的權力，減少他們對解放區政治重建的影響。就這點來說，西方盟國與蘇聯的想法有志一同，差別只在於前者想限制共產主義的傳布，後者則是鼓勵共產主義的傳布。西方首次支持抵抗運動是英國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做成的決定，當時同盟國想不出其他戰略，只能尋求間接消耗德國的戰爭投入。一項做法是海上封鎖，另一項做法是轟炸德國工業區，最後第三項做法就是支持抵抗運動，讓抵抗運動為占領者帶來破壞與恐怖，或者用邱吉爾的名言來說，就是「在歐洲放火」。這項策略是現代戰爭的嶄新發明。過去不是沒有人主張平民在等待解放時也應從事暴動，但這種想法最初在一九四〇年幾乎不可行，而且實際上英國原本也不熱衷於支持抵抗運動。這種狀況直到英國有機會重返歐陸時才有所改變。

英國做出決定後，在敵後推動抵抗運動的策略很快便開始付諸實行。擔任經濟戰大臣的工黨政治人物道爾頓負責發展祕密組織，把人員、金錢與補給送進歐洲占領區。前首相張伯倫受邀為新部會草擬成立文件，並且將其命名為「特別行動執行處」。<sup>143</sup>道爾頓推測歐洲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可能會發起革命，他因此認為「從歐洲內部發起抵抗占領者的行動」機會相當大。<sup>144</sup>除了成立特別行動執行處外，英國政府也批准對歐洲占領區進行宣傳，鼓勵歐洲民眾進行各種形式的抵抗，包括由英國廣播公司進行廣播及空投傳單。在戰爭的巔峰期，英國廣播公司

每天以二十三種語言播送十六萬字，讓歐洲各地不願聆聽軸心國廣播的民眾能夠得到更可靠的新聞來源。盟軍軍機與氣球在二戰期間空投了將近十五億份傳單、單張新聞與雜誌。即使擁有一張盟軍的宣傳品就有可能被判死刑，占領區民眾還是渴望得到這些物品。<sup>145</sup>

英國成立的第二個組織是政治作戰處。該組織在前外交官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指示下成立，負責進行宣傳戰，總部設在倫敦市中心的英國廣播公司布希大樓。政治作戰處的目的是維持占領區的民心士氣與鼓勵抵抗運動採取祕密行動「傷害或削弱」敵人。<sup>146</sup>政治作戰處最終的目標是在正確時機動員各方抵抗運動來協助盟軍作戰。洛克哈特與同事擬定了各種計畫來鼓動占領區的反抗勢力。例如針對歐洲農民發起的「農民起義」行動，利用清晨廣播（「拂曉農民」）號召農民拒絕提供德國人糧食。這場戰役就像其他許多宣傳一樣，完全是基於臆測與幻想。一份報告樂觀地表示：「就算農民不合作，納粹獨裁者的戰爭機器總有一天會停止運作。」<sup>147</sup>第二場行動代號「特洛伊木馬」，目標是被強徵到德國勞動的歐洲工人。一九四四年擬定的戰略文件表示，這些被強徵的勞動力構成「獨一無二的革命力量」，一旦盟軍開始反攻，他們就會揭竿響應。儘管缺乏可信的證據，對強制勞動的實際狀況也不瞭解，政治作戰處仍成功說服艾森豪最高統帥部將「特洛伊木馬」行動列為政策。<sup>148</sup>捷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做了比較務實的評估，並且提醒洛克哈特，英國政治作戰處與歐洲現實差了「十萬八千里」。二戰結束時，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班廷克（Victor Cavendish Bentinck）表示，政治作戰處是否成功「讓戰爭早一個小時結束」，我想大家都感到懷疑。<sup>149</sup>

美國參戰之後，於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戰略情報局，由唐納文將軍（William Donovan）擔任局長。戰略情報局下設特別行動處及士氣

處，分別相當於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處及政治作戰處（後者日後真的更名為政治作戰處）。<sup>150</sup>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處與美國的特別行動處都組織與訓練了特殊人員滲透到敵對占領區，與當地抵抗運動建立聯繫，以進行破壞或蒐集情報。盟軍擔心如果不派人到敵後協助，這些業餘的平民反抗軍恐怕無法成功執行任務。這兩個組織將特務派往世界各地，但彼此各有專屬的地理範圍，避免造成指令重複，使祕密戰爭陷入混亂。亞洲主要由美國的特別行動處負責，但在緬甸則由英美兩國共同執行任務。歐洲主要由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處負責，一九四四年一月開始，英美兩國開始在歐洲共同執行任務，但通常是美國人加入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的部隊。特別行動執行處的男女人員最終達到一萬三千兩百人，大約有半數是前線作戰，傷亡率極高。就像各地反抗軍一樣，這些傷亡往往是有人背叛或行蹤暴露造成。美國戰略情報局到戰爭結束時總共有兩萬六千人，分屬於特別行動處與祕密情報處。<sup>151</sup>

有些特別行動人員會從英國的難民或美國的移民社群中招募，因為這些人能說占領區的語言，但特別行動人員的來源也不僅限於這些難民或移民。特別行動人員在空降到敵人占領區之後，便要過著危險的日子。在戰時擔任特別行動執行處處長的古賓斯少將（Colin Gubbins）提到，這些敵後人員「時時刻刻活在驚恐不安之中」。<sup>152</sup>他們的處境之所以危險，不僅是因為被敵人視為恐怖分子，也因為他們與地方反抗軍的關係並不穩定。反抗軍之所以願意跟盟軍合作，主要是因為盟軍願意提供金錢、武器與炸藥，少了這些東西，抵抗運動根本無法進行。事實上，盟軍與反抗軍之間存在緊張關係，一方面，盟軍希望反抗軍採取符合盟軍戰略與戰術利益的行動，另一方面，反抗軍之所以反抗往往是為了民族解放，但盟軍對此卻興趣缺缺。威爾金森（Peter Wilkinson）是首位與狄托面對面聯繫的特別行動人員，他向總部回報時表示，與反抗



德國人相比，這些游擊隊似乎對打內戰更有興趣。他在報告中又說：

「事實上，從事破壞行動的機會很多，但沒有人，我再重複一次，沒有人會去搞破壞。」<sup>153</sup>空降到希臘的情報人員將當地村落游擊隊的作戰能力批評得一無是處，偏偏這些人正是他們要協助的對象——邱吉爾曾隨口說這些人是一群「可悲的土匪」。<sup>154</sup>西方援助是有條件的：各種破壞行動與武器支援都是為了實現打敗軸心國這個核心目標，而不是用來打內戰。一九四四年秋天，希臘在解放後隨即爆發內戰，同年十二月，英軍介入，不讓裝備盟軍武器的共產黨民族解放軍接管雅典。也就是說，此時盟軍作戰的對象竟是自己曾經支援對抗軸心國的抵抗運動組織。<sup>155</sup>

盟軍堅持援助抵抗運動必須符合西方國家的首要戰略目標，這點可以從盟軍空投資源與人員的統計數字看出。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英國皇家空軍從英國基地起飛，向法國反抗軍空投了八千四百五十五噸補給物資，比利時四百八十四噸，荷蘭五百五十四噸，波蘭三十七噸，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噸——要到捷克斯洛伐克進行空投，機組人員與機隊都要冒著極大風險。南斯拉夫游擊隊抵擋了至少六個德國師的攻勢，盟軍於是向他們空投了一萬六千五百噸物資。義大利游擊隊的軍事價值深受盟軍懷疑，因此從一九四四年六月到十月，即使義大利防線此時正值勝敗的關鍵時期，盟軍依然只向他們空投了九百一十八噸物資。<sup>156</sup>援助時機也取決於盟軍的軍事計畫。盟軍直到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才開始援助法國反抗軍，因為盟軍希望法國的抵抗運動能在敵後進行破壞以協助盟軍登陸諾曼第。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底，盟軍只對法國空投了六百零二噸補給物資，但英美空軍卻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九月間對法國空投了九千八百七十五噸補給物資，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六月諾曼第登陸之後。人員的空降數量也與補給物資一致，都是為了協助

盟軍入侵：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有四百一十五人空降到法國，這個數字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九月間卻增加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人，其中九百九十五人是在D日之後才進入法國。<sup>157</sup>即使抵抗運動分布於各地，但盟軍的援助物資卻集中在接近前線的位置。舉例來說，位於義大利最東北部的游擊隊就完全遭到盟軍忽視。一名憤怒的特別行動人員從弗留利發訊息回總部，「英國皇家空軍還存在嗎.....？如果司令部根本沒有興趣，那就不應該承諾物資與武器.....讓游擊隊產生錯誤期待.....。」<sup>158</sup>在法國，布列塔尼的反抗軍接近盟軍的登陸地點，在D日後得到了兩萬九千件武器，但在遙遠法國東部邊境的亞爾薩斯—阿登—摩塞爾地區，卻只得到兩千件武器。<sup>159</sup>對盟軍來說，補給的先後順序雖然完全符合軍事行動的合理性，卻讓遠離前線的游擊隊感到挫折，他們認為自己完全被排除於軍事作戰之外。

在戰爭後期，面對義大利與法國的敵後游擊隊，盟軍的回應顯得模稜兩可。盟軍希望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直接控制義大利與法國的游擊隊，甚至希望直接對他們下達命令。在義大利，要做到這點較為困難，因為義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傾向於訴諸群眾暴動，不願正式向盟軍戰區統帥部效忠，也不願接受正規的軍事計畫。義大利最重要的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分別是義大利共產黨、行動黨與社會黨，而他們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響應民族起義的共同號召。往後兩年，這個抵抗運動始終堅持平民解放戰爭的路線。一九四三年九月，義大利投降，盟軍開始入侵義大利本土。之後義大利便出現第一起暴動，反抗軍在盟軍未提供援助之下趕走了德國人，解放拿坡里。這場暴動是對糧食缺乏的自發性反應，民眾反對德國占領軍的橫徵暴斂（在義大利投降後幾個小時，德軍就將義大利人當成敵國民眾），也拒絕德軍將所有能工作的男人送往德國。九月二十八日，一開始只是德軍與一群武裝民眾和逃兵零星交火，但局勢突然間愈

演愈烈。第二天，德國一份報告指出，「游擊隊的活動已經擴大成全體市民的暴動」。<sup>160</sup>短短四天內，這起臨時起意的戰鬥居然就將德國人趕出城外。與此同時，駐紮在拿坡里灣卡布里島（Capri）與伊斯基亞島（Ischia）的英軍卻只是冷眼旁觀，拒絕叛軍的支援請求，不願提供兵力與彈藥。這場暴動估計造成六百六十三名義大利人死亡，其中五分之一是女性，城市也遭到廣泛破壞，但民眾卻獲得了最終勝利。抵抗運動領袖隆戈（Luigi Longo）寫道，拿坡里起義是一個「指導典範」，使民眾相信我們號召義大利其他地區民眾反抗占領者是「合理而有價值的」。<sup>161</sup>

義大利的游擊隊是德國占領義大利之後才開始發展的，拿坡里的勝利激勵了游擊隊迅速成長。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義大利游擊隊人數已成長到八萬至十二萬名男女。<sup>162</sup>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三年九月，與義大利南方盟軍占領區的民族解放委員會不相隸屬，義大利的游擊隊往往透過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協調來採取行動。雖然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處與美國的特別行動處都曾派人與游擊隊接觸，但義大利游擊隊基本上仍不受盟軍控制，他們憑藉自己的力量，在義大利半島其餘地區驅逐德國人。戰略情報局駐義大利占領區長官柯爾沃（Max Corvo）日後提到，要說服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控制游擊隊的活動，使其符合盟軍的軍事計畫」是十分困難的事。<sup>163</sup>盟軍最高司令部關注抵抗運動的政治野心，特別是在共產黨煽動下引發社會革命的可能。英國想在被解放的城市扶植當地貴族成立臨時政府，卻遭到地方解放委員會與憤恨民眾阻撓。一號特別行動小組是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在義大利設立的總部，該小組在報告中提出警告，「共產黨正準備奪權。」援助游擊隊時，要考量如何在軍事上獲得最大效益及在政治上產生最小的威脅。<sup>164</sup>在這種思維下，盟軍接觸抵抗運動完全只是為了利

用對方。一旦抵抗運動失去用處或效果令人懷疑，盟軍最高司令部的態度就會變得冷淡，甚至敵視。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當佛羅倫斯爆發武裝起義，數千名民眾與游擊隊加入，聞訊前來的盟軍部隊卻不願出手相助，等到德軍撤退後，盟軍派出戰車包圍游擊隊營地，逼迫他們繳械投降。一九四四年十月，當盟軍的攻勢終於被德軍的哥德防線阻擋時，北部的反抗軍實際上等於遭到盟軍遺棄。一九四四年十月，北部反抗軍取得的空投物資只有一百一十噸，而原先承諾的卻是六百噸。<sup>165</sup>更糟的是，盟軍前線在冬季封閉，這等於給了德軍與法西斯軍隊一個信號：他們可以不用擔心盟軍介入，能肆無忌憚地進行殘酷的反游擊戰爭。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盟軍駐義大利陸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在抵抗運動電臺「義大利戰鬥」廣播，他明白表示，盟軍將在冬季停止攻勢，他建議游擊隊也停止攻擊，保存自己的武器，靜待春季時的指示。<sup>166</sup>結果對游擊隊就是一場災難，因為德軍發現他們可以暫時不理會盟軍，能集中兵力攻擊游擊隊。德軍、法西斯主義「黑衫旅」與哥薩克志願師其實早在十月就已經利用前線入冬封凍的機會，開始對游擊隊發起大規模清剿。在亞歷山大廣播之後，德軍更是加強了反游擊戰的強度。德軍也設立特殊的「反游擊隊」法庭，不僅針對武裝反抗軍，也起訴涉嫌援助或支持游擊隊的民眾。山區的躲藏地遭到攻擊，數千名游擊隊被殺，另外還有數千人脫離游擊隊或下山來到波河平原，然而在平原地區也容易成為被舉報與追捕的目標。到了一九四四年底，游擊隊的數量減少到大約兩萬到三萬名武裝部隊。<sup>167</sup>少了盟軍支援，義北的游擊隊陷入重大危機，甚至連基本衣物、靴子與糧食都缺乏。夏天時還支持游擊隊的各地村落，由於遭受反游擊部隊的殘忍迫害，此時也不願意繼續幫助游擊隊。特別行動執行處的官方報告日後坦承，游擊隊陷入「混亂與絕望」。盟軍很快發現亞歷山大的說法不當，卻未對此做出任



何補救。有人認為，亞歷山大是故意犧牲游擊隊，藉此消除共產黨掌權的可能，這種說法無從證實，但有一定的道理。不過，亞歷山大的廣播確實反映出盟軍最高司令部不瞭解非正規作戰的真正性質，游擊隊也不可能完全依照盟軍的意圖採取或停止行動。柯爾沃在回憶錄裡提到這場危機時說道：「游擊戰沒有暫停這種事，既不可能停止，也沒有稍作喘息的機會。」<sup>168</sup>

十二月，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前往羅馬，要求盟軍提供實際援助與承認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及其非正規軍，是義大利位於德國防線以北地區的政治權力機構。盟軍同意了第二項要求，但仍有所保留，因為盟軍不希望未來即將解放的地區走向政治激進主義；盟軍也同意增加援助，這是因為盟軍準備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對波河流域的德軍發動最後攻擊，他們此時需要游擊隊繼續破壞德軍的通信運輸與補給物資。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與盟軍達成的協議稱為《羅馬議定書》

（Rome Protocols），它緩和了亞歷山大失言帶來的災難。儘管冬季危機造成了嚴重損失，但人們相信義大利人很快就會在盟軍重新發動攻勢之前解放所有的北方城市，這使得許多人願意加入游擊隊繼續奮戰；盟軍的補給物資也大量湧入，使得數個月來缺乏資源的游擊隊能夠再度武裝。到了初春，盟軍每個月可以運送超過一千噸補給物資給游擊隊，到了三月，游擊隊人數已增加到八萬人，四月更高達十五萬人。<sup>169</sup>盟軍與羅馬政府當局希望游擊隊的攻擊對象僅限於德國人。三月，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同意，「只會將軍事力量用於戰爭」。然而，即便游擊隊增加了對德國通信交通的破壞，但他們（游擊隊與一般民眾）卻更希望發起最後一波攻勢來推翻德國占領者及其法西斯盟友。<sup>170</sup>當盟軍於四月十日發起攻勢時，美軍克勒克將軍命令游擊隊「未經盟軍最高司令部授權」不許出動。但游擊隊完全無視這道命令。<sup>171</sup>

當盟軍迅速突破德軍防線，開始穿過波河流域時，義大利解放運動（無論武裝還是非武裝）便開始計畫在盟軍抵達前早一步將德國人逐出各大城市。如果計畫成功，他們希望控制地方司法系統，來整肅（必要時使用暴力）曾經支持法西斯傀儡政權的義大利人。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宣布，凡是被認定為戰犯或叛國者的人將被迅速處決。這套粗糙司法體制的受害者，也包括了墨索里尼與他的情婦克拉拉（Clara Petacci），他們在試圖逃往瑞士邊界時被抓，於四月二十八日被槍斃。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最後兩個星期，武裝反抗軍在各地民眾志願者與罷工運動支持下，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四月二十日解放波隆那，四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解放米蘭與熱那亞（一萬八千名德軍向人數較少的游擊隊投降），四月二十八日解放杜林。義大利北部許多小城因為民眾起義或德軍撤離而獲得自由，總數達到驚人的一百二十五座。<sup>172</sup>幾天後，盟軍抵達並且急著建立行政與司法機構，避免被激進革命運動搶占先機。游擊隊不願交出武器，數千人躲藏起來，交出的多半是損壞或過時的武器。盟軍無法阻止民眾以暴力報復法西斯主義者與通敵者，整個義大利北部因此掀起一波殺戮潮。根據比較準確的估計，這場報復行動大概造成一萬兩千到一萬五千人死亡。<sup>173</sup>無論游擊戰對盟軍的軍事目標提供什麼樣的支持，義大利游擊隊主要關切的是除去法西斯主義。與波蘭人一樣，義大利游擊隊希望在盟軍抵達與戰爭結束之前實現民族解放。義大利慶祝勝利的日子不是五月二日德軍正式向盟軍投降那天，而是四月二十五日。義大利人認為，軍事戰役正式結束，與一個星期前起義成功獲得解放不是同一件事，因此必須加以區別。

盟軍在法國的經驗，因此與在義大利時有很大的不同。法國是被占領的盟邦，義大利則是先前的敵人。英國將法國解放運動交由戴高樂將軍領導，但在義大利並沒有來自境外的解放運動。法國抵抗運動的軍事

指揮權最終掌握在位於倫敦的戴高樂自由法國手裡，而法國抵抗運動的行動也在一九四四年盡可能與盟軍的軍事行動進行整合。至於義大利的抵抗運動，就其運作的方式來看，主要還是聽命於民族解放運動。一九四四年，法國仍有完整的軍隊與西方盟國並肩作戰，使法國能夠主張自己有權再度成為一個強權，而義大利在解放後提供的主要是輔助性軍隊，戰鬥部隊並不多。最後，義大利游擊隊在一九四五年抓住時機憑藉自己的力量解放義大利北部城市，而法國絕大多數城市是由盟軍解放，其中也包括重新恢復編制的法國軍隊。

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權要收歸中央並沒有那麼容易。與義大利一樣，這種做法引發地方抵抗運動的不滿與反彈，這是因為每天冒險戰鬥的游擊隊，與安全待在倫敦對游擊隊指手畫腳的自由法國，兩者之間不可避免存在著緊張關係。戴高樂指揮了一場漫長的戰役，不僅讓法國民眾承認他的權威，也讓他的盟友英國與美國接受這個事實。一九四二年十月，法國主要的抵抗運動團體，如戰鬥、解放、自由射手與法國游擊隊，在自由法國指示下將彼此的資源整合起來，並且取了一個共同的名稱「祕密軍」，由已經退役的德勒斯特朗將軍（Charles Delestraint）指揮。一九四三年一月，抵抗團體正式合併為聯合抵抗運動。祕密軍宣稱的人數往往出於臆測。一九四三年三月，祕密軍應該有十二萬六千人，但擁有武器的或許只有一萬人；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隨著盟軍的援助物資增加，武裝人數達到四萬人。一九四三年，戴高樂派駐法國的代表尚穆蘭（Jean Moulin）成立了全國抵抗會議，負責協調抵抗運動的所有政治與軍事勢力。然而一九四三年六月，穆蘭遭到逮捕與殺害，蓋世太保進而發現祕密軍與聯合抵抗運動的檔案，導致許多重要領導人物遇害，法國抵抗運動因此再次分崩離析。全國抵抗會議獲得盟軍庇護，最終建立起政府的雛形，並且在收復阿爾及爾之後在當地重整旗鼓。當法

國抵抗運動重新恢復之後，盟軍也試圖更直接地讓抵抗運動與計畫中的反攻法國行動整合起來。

為了協調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前後的計畫，許多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就已經開始進行，其中特別行動執行處與抵抗運動的情報與行動局共同組成了聯合計畫委員會。委員會擬定了「綠色」、「紫色」、「海龜」與「藍色」計畫，內容包括破壞德軍的鐵路、電信、部隊增援與電力供應。雖然同盟國不信任戴高樂的政治野心，也對法國抵抗運動的軍事實力抱持懷疑，但同盟國還是同意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成立法國國內軍，由自由法國的柯尼希將軍（Marie-Pierre Koenig）指揮——儘管實際上法國國內軍完全聽命於戴高樂一人。艾森豪堅持法國國內軍必須整合到他的最高統帥部之下，他要求柯尼希除了指揮法國反抗軍，也負責盟軍的特種部隊。法國國防委員會隨後成立，代表西方盟國控制法國反抗軍在戰線上與戰線後方的行動。

法國抵抗運動不滿意這項安排，但這麼做卻符合同盟國與戴高樂自由法國的利益。除了敵後破壞對反攻法國的行動至關重要，要求抵抗運動聽命於中央指揮體系，也能讓軍事行動不受解放運動內部黨派傾軋的干擾。抵抗運動通常是由未受過訓練的平民來執行，但為了確保軍事行動順利，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與美國特別行動處都特地派人，在特別行動執行處F小組的協助下滲透到法國境內，組織當地的抵抗運動以從事破壞行動，包括訓練他們使用炸藥。到了D日當天，估計有五十個抵抗運動網路加入軍事行動。D日後，特別行動人員每三人一組被派往占領區，代號「傑德堡」（Jedburgh，以蘇格蘭一座村落命名）。有九十二組從英國，有二十五組從地中海滲透到法國境內。<sup>174</sup>法國境內的敵後破壞事件因此大幅增加。從一九四四年四月到六月，總共發生了一千七百一十三起法國鐵路破壞事件。同年的上半年，反抗軍也摧毀或破壞了



一千六百零五輛火車頭與七萬節貨車車廂。盟軍的空襲也破壞了兩千五百三十六輛火車頭與五萬節貨車車廂。<sup>175</sup>「海龜」計畫試圖阻止德軍增援諾曼第前線，這項計畫的實行主要仰賴特別行動執行處與反抗軍從地面破壞橋樑與阻塞道路。這些破壞行動造成嚴重影響：德軍武裝親衛隊第九與第十裝甲師在六月十六日已經抵達洛林，卻花了九天才抵達法國西部。德軍第二十七步兵師更是花上十七天才往前推進一百八十公里。<sup>176</sup>

同盟國試圖動員與直接命令法國反抗軍，這種狀況就像蘇聯武裝部隊與安全體系試圖控制蘇聯游擊隊一樣。盟軍在法國北部推進時解放的地區，以及在八月之後在南部推進時解放的地區，所到之處都有許多適齡的民眾自願加入法國國內軍。這些人都被整合到法國陸軍之中，成為正規軍士兵，這種狀況也如同蘇聯游擊隊被整合成為紅軍。絕大多數法國城鎮都等待盟軍前來解放他們。針對兩百一十二座城鎮所做的研究顯示，有一百七十九座城市因為盟軍抵達或德軍撤退而解放，只有二十八座城鎮進行了有限暴動以協助即將到來的解放者。<sup>177</sup>在這個階段，一旦發起武裝抗爭，反而會招致德國占領者（親衛隊蓋世太保與德國國防軍）的野蠻鎮壓，因此等待觀望反而是實際而合理的做法。<sup>178</sup>儘管如此，在諾曼第登陸之前，動員民眾抵抗的革命熱情並未完全消退，還有一些共產黨員仍持續號召群眾發動「武裝起義」。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由共產黨抵抗勢力支配的巴黎解放委員會號召民眾起事，要求民眾殺死占領者與他們的維琪盟友：「巴黎的民眾，無分男女，大家站出來，殺掉德國佬，殺掉維琪民兵，殺掉叛國賊！」六天後，總部設在巴黎且拒絕聽命於盟軍的抵抗軍事委員會呼籲法國國內軍與「人民群眾」合作，做為邁向「全國起義」的一步。<sup>179</sup>

在里耳（Lille）、馬賽、利摩日（Limoges）、蒂耶爾（Thiers）、

土魯斯、卡斯特爾（Castres）與布里夫（Brive），以及其他一些小城鎮，抵抗運動確實成功在盟軍抵達之前解放城鎮，但並未發生全面性暴動。在土魯斯，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法國國內軍在解放城市後控制了當地，但在得知法國陸軍即將徵調一個師前來恢復臨時政府的權威時，共產黨領導人便屈服了。<sup>180</sup>最重要的起義發生在巴黎，民眾與法國國內軍臨時發難，柯尼希與阿爾及爾民族解放委員會命令他們不要在毫無指揮的狀況下與大量德國駐軍發生衝突，但他們不願等待盟軍到來，照樣違抗命令起事。八月，盟軍突破諾曼第橋頭堡，攻勢開始拓展到整個法國北部，起義的風潮也在此時達到巔峰。艾森豪並不打算解放巴黎，他計畫兵分兩路從巴黎的北部與南部渡過塞納河，將巴黎的德國守軍團團圍住。但德軍在法國西北部戰敗的消息使反抗軍決定將首都起義的時間提早。八月十七日，反抗軍領袖開會討論起事的可能性。眾人意見分歧，比較審慎的看法除了提到戴高樂不希望民眾發起武裝抗爭，也提到華沙抵抗運動遭遇的危機。最後主戰派勝出，會議紀錄上寫著：「不能坐等盟軍進城，我們必須發起抗爭。」<sup>181</sup>

八月十八日，巴黎反抗軍的共產黨領袖坦吉（Henri Rol-Tanguy）在巴黎各處張貼告示，號召民眾參加第二天的起義行動——儘管坦吉知道自己能動員的兩萬名男女中只有六百件武器。接下來爆發的只是零星戰鬥，並未出現像華沙那樣可怕的戰況，也未出現具決定性的結果。之後雙方曾短暫停火，但國內軍戰士急欲有所表現，又違反了停火協議。街壘，巴黎悠久的革命傳統象徵，很快在工人階級為主的市區堆砌起來。作家尚格諾（Jean Guéhenno）在日記裡寫道：「自由回來了。我們不知道它在哪裡，只知道夜裡它就在我們周圍。」<sup>182</sup>在前途未卜的狀況下，坦吉在二十日派人向盟軍最高司令部求援。第二天，戴高樂說服艾森豪另外派出一個法國裝甲師交由勒克萊爾將軍指揮，前去確保解

放成果並避免巴黎被共產黨接管。二十四日，法國裝甲師抵達巴黎，但在此之前反抗軍其實已經達成目標，擊敗了喪失作戰意志的德國守軍。德軍駐巴黎司令柯提茨將軍（Dietrich von Choltitz）無視希特勒要求巴黎要戰至最後一人且要讓巴黎化為灰燼的命令，於二十五日向勒克萊爾與坦吉投降。<sup>183</sup>就在此時，戴高樂也抵達巴黎，而他的到來也奪走了人民起義的成果。巴黎反抗軍必須接受柯尼希的指揮，讓國內軍編入盟軍部隊，並且承認戴高樂組織的法國政府——英美原本是想在解放的法國領土上成立軍政府，但此時也只能勉為其難地支持戴高樂。最後，法國國內軍三十五個團級與營級單位被併入法國第一軍團，總數至少有五萬七千人。有數千人寧願返鄉也不願加入正規軍，有些人重拾本業，有些人疲憊不堪而不願再拿起武器作戰，有些人珍惜身為祕密反抗軍曾經經歷的光榮與危險，對於正規軍嚴謹的軍旅生活不屑一顧。<sup>184</sup>

與蘇聯一樣，對西方盟國來說，抵抗運動的價值在於能削弱或阻礙敵軍的軍事行動與減少敵軍的資源。盟軍只有在自己的重要軍事行動需要反抗軍支援時，才會運送與滲透大量裝備與人力給反抗軍。一九五八年，在抵抗運動史第一次會議上，曾任特別行動執行處參謀長的巴里准將（Richard Barry）向聽眾表示，沒有盟軍的援助，「就算反抗軍起事，也無法得到任何成果」，抵抗運動人士顯然無法接受這種說法。<sup>185</sup>歐亞各地持續出現抵抗運動，而這些抵抗運動完全未得到同盟國支援。抵抗運動的時間與目的，完全取決於每個地方的狀況與可能性，而不會以同盟國的需求為優先考量。一些具有非凡膽識且勇於抵抗的民眾，以退伍軍人或從敵軍戰俘營脫逃的軍人為核心，開始擔負起敵後任務。這些人想向占領者證明，他們不會任由權威為所欲為，他們也相信，鄉里與民族的解放是由內而外，而非仰賴外援。民眾抗暴是一種政治與道德表述，而不只是為了軍事勝利。這正是為什麼華沙、米蘭或

巴黎的民眾寧可選擇抗爭，也不願坐等盟軍來解放他們。民眾挺身反抗，多年來持續鬥爭，起義顯然是他們的宿願。義大利北部布雷西亞一名年輕女游擊隊在日記裡，回憶起游擊隊趕在美軍前面解放城市的往事：「我們的隊員昂首闊步地走過城市，手裡高舉機關槍，眼裡閃耀著勝利的喜悅。他們已經贏得這座城市，並且牢牢地將其握在手中……這座城市自由了。」<sup>186</sup>

## 我們輸了，但我們必須戰鬥：猶太人的抵抗

歐洲猶太人的抵抗，與其他形式的抵抗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其他抵抗是為了解放自己的國家，因此當反抗軍對國家戰後發展抱持不同願景時，抵抗運動往往陷入自相殘殺。歐洲猶太人則不同，他們面對的是對猶太人發動民族滅絕戰爭的政權。在這種狀況下，猶太人的抵抗，一方面是透過反擊來限制或挑戰敵人的種族滅絕計畫，另一方面則是盡可能藏匿或逃亡，想辦法擺脫不可避免的命運。猶太人的抵抗不是為了解放猶太人的國家或實現猶太人的政治未來。猶太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進行抵抗，雖然他們知道自己終將失敗，但寧可自己選擇死亡，也不願接受德國加害者及其幫凶為他們準備的命運。一九四二年，猶太游擊隊領袖阿特拉斯醫生（Icheskel Atlas）說道：「我們輸了，但我們必須戰鬥。」同年，他在波蘭東部進行游擊戰時陣亡。<sup>187</sup>

儘管如此，猶太人抵抗運動也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首先，一些猶太反抗軍認為自己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分子，認為自己不是專為猶太人發聲。在猶太人與當地民族同化相對徹底的地方，例如法國，該地猶太人的立場通常都是如此，他們認同的是更廣義的愛國戰爭，不想被



指控自己只為猶太人的利益服務。猶太反抗軍戰士尼桑（Léon Nisand）在回憶錄裡寫道：「我是法國人，我的家族是法國人，因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幸與不幸我們都參與過了。」<sup>188</sup>法國猶太人在法國早期非猶太人的抵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一九四〇年人類博物館圈子的創始成員裡就有猶太人，一九四一年七月的「解放」組織裡有半數是猶太人。而在巴黎的抵抗運動中，從一九四二年七月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估計有三分之二的攻擊事件有猶太團體參與。<sup>189</sup>歐洲的猶太共產黨員也大致區分成兩派，一派想援助受害的猶太社群，另一派則需要維持對政治階級鬥爭的忠誠以對抗法西斯主義。一九四一年後，蘇聯被德國占領的地區，有些猶太人逃進森林參加或組織游擊隊。他們發現，要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融入非猶太部隊，與對方一同奮戰重建蘇聯勢力，並且對俄羅斯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年輕猶太人如果沒有因為被懷疑是德國走狗而逃過被槍斃的命運，那麼他應該趕快取個俄國假名以避免遭受反猶太暴行。這個結論相當矛盾，你必須看起來不像是猶太人，才能加入戰鬥對抗猶太人的敵人。<sup>190</sup>

第二個問題是，在猶太人種族滅絕的脈絡下，要如何更精確地定義「抵抗」。政治抵抗十分有限，畢竟猶太人面對的迫害早已不僅是政治壓迫。有人主張，猶太人的抵抗只有一種定義，那就是武裝鬥爭。不過，考慮到德國的種族滅絕目標是要殺死每一個猶太人，留下少數人不殺也只是為了榨取僅存勞動力，因此我認為抵抗應該也包括藏匿猶太人、幫助猶太人逃亡或提供猶太人假身分——這些行動同樣需要許多非猶太人協助。上述的策略都是為了挑戰納粹政權的核心目標，不讓加害者有機會殺害他們想殺害的受害者。光是活下去本身，就是猶太人在軸心國占領區面對種族滅絕命令時的一種抵抗方式。猶太人除了逃入東歐與俄羅斯的森林與沼澤，躲避種族滅絕也需要仰賴有勇氣違抗加害者

命令的非猶太人協助。在西歐，解救猶太人十分常見，因為西歐猶太人與當地人同化程度較高，而西歐人也更傾向於拒絕德國人的要求——法國當地猶太人有百分之七十五逃過種族滅絕，義大利則是百分之八十。<sup>191</sup>對比之下，在東歐的軸心國占領區，當地許多民眾是發自內心地討厭猶太人，因此不容易找到非猶太人願意冒險解救猶太人。儘管如此，在華沙仍有兩萬八千名猶太人被藏匿在猶太區以外的地方，而且大約有五分之二的人撐過整場戰爭。有些白俄羅斯與烏克蘭民眾會藏匿猶太人，但通常不會太久，因為東歐猶太人逃亡時通常會盡可能逃入森林，畢竟森林相對安全，一些小型猶太社群會藏匿在裡面。<sup>192</sup>

藏匿做為一種抵抗形式，同樣必須承受政治與軍事對立下的種種危險：住家搜索，警察訊問，鄰居（至少在東歐是如此）急於檢舉告發，因為每抓到一個猶太人就可以拿到一袋糖或鹽做為報酬。任何家庭或機構如果被發現藏匿猶太人，罪名將等同於反抗軍，可能會被處死或送進集中營。根據估計，大約有兩千三百名到兩千五百名波蘭人因為幫助猶太人而被處決，然而實際數字應該更高，因為許多人都是在未經法律程序下被迅速處決。在救援網路存在的地方，這些救援者會被當局視為政治反抗者，會遭到拷問，被迫說出其他人姓名與安全屋的位置。蓋世太保往往把搜索重點放在小孩身上，因為小孩比較容易藏匿，也比較容易找到收養人家。波蘭大約有兩千五百名猶太兒童在猶太人救助委員會「熱戈塔」（Żegota）的冒險協助下獲救或被藏匿，這些孩子要不是被送進家庭或孤兒院，就是交由天主教會照顧。一旦被發現，這些猶太兒童（絕大多數是孤兒或被遺棄的孩子）將會跟藏匿他們的非猶太人一樣被送進滅絕營，或是當場遭到處決。當蓋世太保發現華沙西利西亞兄弟會的僧侶藏匿猶太兒童時，這些僧侶與他們照顧的孩子全被吊死在高處的陽臺上，供底下熙來攘往的人群觀看，而他們的屍體就吊在原處任其

腐爛，以儆效尤。熱戈塔的解救者努力讓這些只會說意第緒語的孩子學習用波蘭語進行天主教禱告，讓他們能蒙混過關，但一名六歲女孩巴西亞（Basia Cukier）無法在蓋世太保官員面前背誦祈禱文，結果就被帶走處死。<sup>193</sup>在這種狀況下，各種方式的藏匿都會被視為犯罪，而且懲罰十分嚴酷，被藏匿者與藏匿者都會被視為抵抗者。

與藏匿或解救猶太人一樣，猶太人在對抗軸心國占領當局時也與其他抵抗運動有很大的不同。隨著德國與軸心國迫害猶太人的方式改變，猶太人武裝抵抗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猶太人抵抗的時機不是由二戰戰局來決定，而是與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戰爭息息相關。在歐亞大陸的絕大多數地區，抵抗運動是到了二戰最後十八個月才達到高峰，因為此時大局底定，侵略國遲早要面臨戰敗的命運。相反地，猶太人的抵抗則集中在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因為德國此時開始大規模流放居住在東歐猶太區與西歐各地的猶太人口。法國的猶太人武裝抵抗集中在二戰中期，而其他抵抗團體在這個時期多半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猶太人在波蘭採取的行動與波蘭救國軍產生直接的利益衝突，因為波蘭救國軍認為德軍尚未露出敗象，不應該在此時與占領當局發生衝突。猶太人在抵抗時從未考慮自己的行動是否有助於盟軍的戰爭投入，雖然有時確實會產生些微的效益。反過來說，盟軍會支援其他游擊隊，卻從未援助武器或金錢給猶太團體。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不情願地訓練了兩百四十名巴勒斯坦猶太志願軍，卻只有三十二名於一九四四年空降歐洲，早已錯過援助猶太社群的時機。<sup>194</sup>猶太戰士主要由平民組成，絕大多數只有有限的軍事經驗，或根本毫無經驗，而且裝備匱乏，根本無法抵擋裝備精良的德國安全部隊，也無法對抗立陶宛、拉脫維亞、俄羅斯、烏克蘭或波蘭等其他非德國人組成的輔助部隊。猶太人只是在用一種有限的方式來反抗無情的種族滅絕，而且絕大多數猶太抵抗者也知道自己的對抗注定

失敗。一名猶太戰士說道，對抗德國人的戰爭是「史上最絕望的宣戰」。<sup>195</sup>

猶太人的積極抵抗有兩種對比鮮明的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至少拯救一部分受威脅的猶太人，使他們不會遭到流放；如果地理環境允許，就協助他們成立自衛團體或游擊隊來保護遭到流放的猶太社群。第二種方式就是發動叛亂，雖然注定失敗，但可以向德國加害者顯示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會乖乖接受自己的命運。猶太復國主義的年輕領袖貝林斯基

（Hirsch Belinski）就曾言，猶太人會「死得有尊嚴，而不是像頭待宰牲畜」。<sup>196</sup>但無論是哪種方式，猶太人的命運都不會有太大變化。華沙猶太區的編年史家林格布魯姆（Emanuel Ringelblum）表示：「每個猶太人身上都背著死刑。」<sup>197</sup>積極反抗的危險性，加上只有少許武器，說明了為什麼注定毀滅的猶太人只有極少數願意挺身而出參與戰鬥。一九四三年春，華沙猶太區剩餘的居民，估計只有百分之五實際參與起義。一九四三年三月，大維爾紐斯猶太區（Vilna Ghetto）的抵抗運動只有三百名戰士。<sup>198</sup>從猶太區與集中營逃離並且參與武裝團體的人，只占猶太區與集中營人口的一小部分。成功逃到相對安全的森林地區的人也很少，因為民兵與警察總是不遺餘力地追捕這些人。

成功的機會當然很渺茫，但還有許多限制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大部分猶太人不願意抵抗。各地猶太社群對於自己即將面臨的下場所知有限，他們確實不太可能相信會有種族滅絕這種事。華沙猶太區的一名日記作家就不相信那些「可怕的傳言……誇大想像的說法」。<sup>199</sup>實際上，猶太人確實擔心武裝抵抗會讓事情更加惡化，加速德國人的流放與殺戮，或者激起德國人的野蠻報復。想抵抗的人因此面臨艱難的道德選擇：該保護自己的家人與同伴，還是不管他們死活而拿起武器。保護家人，特別是保護孩子，是猶太區社群不採取暴力抵抗的重要動機。<sup>200</sup>在猶太



社群內部，政治與宗教也分裂得很嚴重，特別是保守的猶太人與猶太共產主義團體之間的隔閡，使得合作變得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達成。許多正統派猶太人認為人沒有權利阻礙上帝安排的命運，他們只是召集信眾，讓大家堅定面對壓迫。<sup>201</sup>尤其是有些人還抱持著些許希望，相信與德國當局合作，就有機會讓部分猶太區居民（特別是在德國工廠工作的人）撐到德國戰敗與解放的那一天。維爾紐斯猶太區抵抗運動的失敗，原因出在猶太人普遍支持猶太領袖根斯（Jacob Gens）的看法，根斯認為順從比不可能成功的叛亂更能保住猶太人的性命。<sup>202</sup>一名猶太區警察認為，「只要人們存有一線希望，覺得自己可以活下去」，那麼就不會有人做出英雄式的抵抗。克魯克（Herman Kruk）在維爾紐斯猶太區的日記裡寫道：「猶太區裡最糟糕的一種疾病」，就是「希望」。<sup>203</sup>

根據估計，在歐洲的德國占領區，成功逃離圍捕或擺脫猶太區與集中營生活的人數，大約介於四萬人到八萬人之間，但這些人幾乎完全集中於東歐，因為東歐的地理條件有利於逃亡。一九四二年，波蘭總督府大約有三百萬猶太人，其中估計有五萬人逃到盧布林與拉當（Radom）附近的森林裡，不過這個數字未經證實。<sup>204</sup>一旦逃到森林，逃亡者就面臨嚴峻的選擇。有些人組成獨立的猶太游擊隊，人數從數人到數百人不等，很多人（或許應該說是絕大多數人）都是為了復仇而加入。<sup>205</sup>他們使用偷來或者偶爾買來的武器，目標是直接對抗敵人，而非讓自己活下去。他們會採取小規模騷擾攻擊，之後便退回到森林或沼澤地。除了游擊隊之外，有些人組成所謂的「家庭單位」，在森林裡建立猶太社群，主要目的是確保至少有人能夠撐過這場戰爭。在蘇聯境內的德國占領區裡，大約有六千到九千五百人生活在這些家庭單位裡。<sup>206</sup>這些單位缺乏武裝，總是盡可能避免直接戰鬥，只使用有限的軍事裝備來保衛

社群。舉例來說，佐林（Shalom Zorin）領導的單位，就曾藉由擔任後勤部隊，為非猶太游擊隊尋找食物與提供醫療與工匠服務，來規避蘇聯游擊隊要求他們參戰的壓力。著名的別爾斯基旅「新耶路撒冷」，人數曾一度達到一千兩百名難民，別爾斯基旅定期改變藏匿的地點以規避戰鬥。據信別爾斯基（Tuvia Bielski）曾說：「別急著打仗或死掉，我們的人已經所剩不多，必須保住性命。」<sup>207</sup>

在森林與沼澤地生活，無論是藏匿還是作戰都十分艱苦。絕大多數逃亡者來自城鎮，不熟悉荒野生活的需求。糧食難以取得，要說服農民交出農產品也有很大的風險，因為農民要不是已經被德軍需索過，就是已經被蘇聯或波蘭游擊隊掠奪過。植物、堅果、水果等森林食物皆有季節性，不足的部分就只能靠偷竊或偶爾以物易物換取。猶太逃亡者因此有了掠奪者與罪犯的壞名聲，就連其他非猶太反抗軍也這麼看待他們。一名猶太倖存者日後回憶，逃亡者介於英雄與強盜之間：「我們必須活下去，必須搶奪農民所剩不多的東西。」<sup>208</sup>發現食物時，猶太逃亡者有什麼就吃什麼，管不得猶太教潔淨食物的規定或食用豬肉的禁忌。一名女性倖存者回憶有人給她豬嘴肉吃，使她陷入兩難。煮飯也導致額外風險，因為火會洩露藏身地點。地方農民教導猶太人如何使用打火石與苔蘚生火，以及哪種木頭比較不會產生濃煙洩露行蹤。衣物只能將就，包括用橡樹皮或樺樹皮製作鞋子。<sup>209</sup>醫療只有最初步的程度，疾病、飢餓與衰弱橫行。到了冬天，活不活得下去完全是機率問題。

然而，與暴露行蹤和暴露後必然面臨的死亡相比，這些困難根本沒什麼。逃亡者遭到德國警察及與德國人勾結的波蘭「藍色警察」追捕，而所謂的「東方軍團」（Ostlegion）這種蘇聯的輔助部隊也在一九四二年之後加入追捕行列，後者對猶太俘虜尤為殘酷。<sup>210</sup>猶太逃亡者也遭受其他游擊隊團體的迫害，波蘭、烏克蘭與蘇聯游擊隊的反猶太主義十

分盛行，包括波蘭國家武裝部隊，波蘭救國軍一些部隊也是如此。波蘭游擊隊裡的一名猶太倖存者曾在獄中學習過基督教儀式，因此假裝自己是天主教徒。他回憶說：「我不能說自己是猶太人，他們會殺了我。」根據估計，猶太逃亡者的死亡人數有四分之一是非猶太游擊隊造成的。<sup>211</sup>蘇聯游擊隊被告知猶太人不可信，認為他們可能是德國人派來的間諜，這也讓猶太人蒙受更嚴重的暴行。曾經有一群猶太女性逃亡者被游擊隊抓住，她們被脫光衣服與強姦，最後被帶刺鐵絲網綁在一起放火燒死。<sup>212</sup>對於藏匿的猶太人來說，要區別敵友並不容易，而他們也幾乎沒有朋友。根據估計，逃離德國人迫害的猶太人，最終有八到九成會死於暴力、疾病、寒冷或飢餓。

積極的武裝抵抗也好不到哪裡去。參與者至少有五分之四在游擊戰中死亡，還有無數人在交火中喪生或成為無差別報復的受害者。德國高層把猶太人的武裝行動看成是猶太敵人極其危險的鐵證，而不是猶太人為了反抗種族滅絕而拼死一搏。一九四三年五月的華沙猶太區起義期間，戈培爾在日記裡寫道：「當猶太人拿到武器時，大家都知道猶太人想幹什麼。」<sup>213</sup>在法國，一些猶太抵抗組織試圖為猶太人發聲。一九四〇年，一個主要由猶太移民組成的團體在土魯斯成立了「強壯之手」（La main forte），與維琪政權的反猶太政策對抗。一年後的一九四一年八月，「強壯之手」轉變成「猶太軍」，之後又轉變成「猶太戰鬥組織」。該組織回應的不是法國抵抗運動，而是總部設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哈加拿運動」（Haganah movement）。<sup>214</sup>猶太軍不僅為救援法國境內的猶太人，也針對德國與維琪政權發動武裝攻擊，包括暗殺那些將猶太人交給蓋世太保的法國人。猶太軍面臨很大的風險，也為此付出遭到告發、逮捕與處決的代價。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前，猶太軍就曾在一九四三年因為三次大規模逮捕行動而瓦解。猶太軍曾在一九四四年

重組，但又遭遇相同命運。<sup>215</sup>

在東歐，要在森林藏身處以外的地方進行武裝抵抗，通常會是以「暴動」的形式進行，而這些暴動往往是由幾種不同狀況所引發，包括強制遷徙時、勞動營與集中營的生活狀況太差時，或是有機會暫時破壞滅絕機器，例如在滅絕營裡負責焚燒被毒死者屍體的工作隊

（Sonderkommando）。這類暴動其實相當廣泛。總計有七個大猶太區與四十五個小猶太區曾經發生過暴動，估計有四分之一的猶太區曾經發生過抵抗運動。集中營曾經發生過五起暴動，強制勞動營則有十八起。<sup>216</sup>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索比堡滅絕營發生了一場暴動，導致十一名親衛隊與滅絕營指揮官死亡，三百名犯人逃進森林。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叛軍殺害守衛，縱火焚燒營區，導致六百名犯人逃脫，但之後絕大多數犯人都被槍斃或捕獲。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奧許維茲—比克瑙集中營的工作隊發起暴動，六百六十三名犯人有四百五十人死亡，日後又有兩百人被處決。<sup>217</sup>暴動固然能帶來逃走的机会，但對絕大多數參與暴動的人來說，他們奔赴自由的神態也成了絕響。希姆萊面對層出不窮的暴動，決定消滅所有猶太工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馬伊達內克勞動營總計有一萬八千四百名男女猶太人被殺。<sup>218</sup>

規模最大的武裝暴動是華沙猶太區起義，這場起義凸顯出猶太人面臨的各種問題。猶太人認為反擊是一種深刻的道德聲明，無論這項聲明有多麼短暫，他們都想藉此恢復自主性，證明自我價值，以反對那些將他們非人化的敵人。這場華沙猶太區起義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爆發，主要是為了回應一九四二年夏天以來納粹對猶太區進行的大規模流放。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暴動並不完全出於自發。一九四二年秋天，左翼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了一個由阿涅萊維奇（Mordechai Anielewicz）



領導的「猶太戰鬥組織」。由於懷疑猶太戰鬥組織支持共產主義，支持猶太復國的修正主義者另外成立了「猶太軍事同盟」。主張社會主義的「猶太聯盟」拒絕加入，但同意合作。在這些主要的叛軍組織之外，還有許多「自主性」的小團體。到了起義之時，猶太戰鬥組織擁有大約二十二個戰鬥團體，猶太軍事同盟則有十個，分散在猶太區不同的區塊。一九四三年一月，當親衛隊的弗朗肯內格上校（Ferdinand von Sammern-Frankenegg）突然下令進行新一波流放時，猝不及防的起義者只發起了短短四天的戰鬥，然而這已足以提醒德國人，下一階段的流放很可能引發更大抗爭。希姆萊下令盡快對整個華沙猶太區進行大清洗。大批武裝親衛隊、警察與烏克蘭輔助部隊，連同支援的重武器，都準備要執行下一階段的大流放。在最後一刻，弗朗肯內格遭到撤換，改由親衛隊史特魯普少將（Jürgen Stroop）擔任指揮，一般認為他無情果斷，可以迅速平定任何抵抗勢力。<sup>219</sup>

猶太抵抗運動預先得到警告，得知德軍計畫進行下一階段的大流放，兩大戰鬥組織終於同意合作，建立抵抗據點與盡可能蒐集有限的武器。到了起義時刻，猶太戰鬥組織只蒐集到一挺機槍、少許步槍與若干手槍、手榴彈與汽油彈。波蘭救國軍為這群缺乏戰鬥經驗的平民提供有限的訓練與少許武器，但他們不肯多給，因為他們想留著武器在未來自己發動一場大起義。<sup>220</sup>當德軍率領各路人馬總計約兩千人進入猶太區時，卻遭遇七百五十名到一千名駐守關鍵據點的起義軍攻擊。隨後的戰鬥徹底打亂德國人的流放計畫。一名生還者記得自己看到德軍士兵突然遭遇地雷與狙擊手，嚇得「驚慌逃竄的樣子」，內心有多雀躍。<sup>221</sup>雖然起義軍只有很少的資源，但他們謹慎使用，加上一開始突襲的效果，使這場起義得以持續到五月第一個星期。德軍於是改變戰術，開始仰賴砲兵、空中轟炸與縱火焚燒，逐街逐巷地摧毀猶太區。猶太區有許多脆

弱的掩體供戰士躲避，阿涅萊維奇為了不被俘虜，選擇在其中一個掩體結束自己的生命。零星的游擊戰持續整個夏天，最後，猶太區被燒毀成廢墟，再被夷為平地，最後一批猶太人則被送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估計有七千人死於戰鬥，包括絕大多數猶太戰鬥組織與猶太軍事同盟的戰鬥人員，或許還有五六千人在大火中身亡。絕大多數死者是藏匿起來的猶太人，他們若不是被火焰噴射器與毒氣彈趕出來，就是在攻擊者縱火造成的大火中活活燒死。史特魯普宣稱己方只損失十六名士兵，但就衝突持續的時間來看，這個數字相當不合理，但我們也只能推測死亡數字應該更多。[222](#)

這場起義頂多只延緩流放幾個星期，不過確實有猶太人利用這場衝突逃出了猶太區。儘管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行動，但這場起義卻清楚提醒世人，猶太人面對的是什麼處境。對德國人來說，這場起義只是稍微中斷了一九四三年持續進行的流放計畫，就在這一年，華沙猶太區的最後一批居民也被清除。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抵抗運動不同，猶太人的抵抗存在於獨特的種族屠殺脈絡裡，而非存在於二戰的廣大脈絡中。若我們將猶太人的命運擺在後者，只會把猶太人邊緣化——因為猶太人只有加入更大的非猶太人抵抗運動與游擊隊，人們才會認同他們為解放鬥爭帶來貢獻。從這一角度來看，猶太人面臨的其實是雙重危險，一個是身為抵抗者的危險，另一個是被德國人視為種族敵人的危險（德國人認為絕大多數的武裝抵抗都是猶太人所引發）。猶太人獨自對納粹的種族滅絕宣戰，不僅規模有限，也無異於以卵擊石。他們只是一群無武裝或武裝薄弱的平民，卻要對抗資源充沛的國家安全體制。從各種意義來看，這都是一場超出猶太民眾預期的戰爭，也是他們未能做好準備的戰爭。猶太人對大屠殺的抵抗，堪稱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眾多平民戰爭中，雙方實力最不平等、犧牲也最慘重的一個。



一九四四年的波蘭救國軍佐斯卡營（The Battalion Zoska），該營與其他部隊共同參與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到十月的華沙起義，但最終遭德軍與安全部隊殘酷鎮壓。圖源：UtCon Collection/Alamy

- 
- [1] 編注：在當時，白色羽毛被視為是和平主義或怯弱的象徵，顯示待在被空襲的都市比上前線更危險。

CHAPTER 9

第九章

戰時情緒與心理



「我一連哭了幾個晚上，連我自己都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我看到另一名士兵也在哭泣，但他的理由跟我不一樣。他因為損失了戰車而哭泣，他一向以他的戰車為傲.....過去三個晚上，我一直為我殺掉的那名俄羅斯戰車駕駛哭泣.....我晚上哭得抽抽噎噎，像孩子一樣。」

—— 來自史達林格勒的最後一封信，一九四三年一月<sup>1</sup>

史達林格勒的德國士兵寄出的最後一批信件，他們的家人與朋友始終沒有收到。德國陸軍奉命沒收從史達林格勒空運出來的最後七袋信件，讓人評估這些士兵在難以扭轉戰局下的士氣狀態。結果與當局期待的有所出入。信件分析顯示，只有百分之二點一的士兵贊同戰爭，百分之三十七點四的士兵似乎感到懷疑或無所謂，高達百分之六十點五的士兵則是質疑、否定或明確反對這場戰爭。當有人計畫用這些信件來寫一本宣傳窩瓦河畔英勇戰鬥的專書時，戈培爾一口反對：「所有信件看來就像一首送葬進行曲！」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所有信件都遭到銷毀。但有三十九封信被原本負責寫書的宣傳官員複製下來，並且在戰後出版。<sup>2</sup>與本章開頭的哭泣士兵一樣，這些信件呈現的德軍士兵的外表與行為，與英勇奮戰讓歐洲擺脫布爾什維克威脅的英雄種族形象並不相符。一名倖存的士兵寫道：「我們躺在死人堆裡，有些屍體沒有手臂、沒有腿或沒有眼睛，有些屍體肚破腸流。應該要有人拍一下這個畫面，足以徹底破除最高貴死亡形式的這種說法。死亡是骯髒惡臭的.....。」<sup>3</sup>

德軍士兵在史達林格勒的情緒反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屢見不鮮。這種反應源自於他們心知自己身處恐怖戰場，難有生還機會。在最極端的狀況下，這些反應可能導致嚴重的精神疾病或身心失調，讓數十萬名士兵暫時或永久失能。曾經面臨各類戰鬥的人，包括經歷空襲或大

砲轟擊的平民，都會產生一種共通的情緒，而我們通常將這種情緒定義為「恐懼」。恐懼其實是許多情緒狀態的一種通稱，是針對長期焦慮、驚駭、歇斯底里、恐慌、重度憂鬱、甚至是侵略情緒的一種描述與概括。恐懼也會引發各式各樣的神經精神症狀、精神疾病或身心失調。極度恐懼引發的反應，在今日更常見的說法是「創傷壓力」，雖然常見於二戰時的戰鬥，但不必然會讓曾經經歷戰鬥的人失能。經歷過戰陣的士兵經常會面臨各種情緒混亂。一名在緬甸作戰的士兵「被嚇得全身僵硬，但尚未到失神」的程度，他形容自己彷彿雜亂地混和各種情緒：

「憤怒、恐怖、亢奮、解脫與驚異。」<sup>4</sup>一名待在前線部隊的蘇聯女性回憶說，當攻擊開始，「你會不由自主地發抖及顫慄。但這都是聽見第一聲槍響前的事.....一旦你聽到號令，你腦中就不會有其他事情，只會跟每個人一樣起身然後往前奔跑。你完全不會想到害怕。」這名女性又說，戰爭會揭露每個參與戰鬥者「獸性的一面」。<sup>5</sup>對軍事將領或戰時政府來說，戰時暴力引發的情緒狀態只有在可能造成軍隊失能、減損戰力、引發民眾恐慌或導致後方民心士氣低落時，才會構成問題。管理士兵與民眾在面對戰爭真實狀態時產生的情緒反應，就成為每個交戰國的重要課題。另一方面，對於成千上萬捲入總體戰的一般民眾來說，戰爭創傷也是個嚴酷的現實。二戰後的戰爭敘事往往不去處理甚或忽視創傷造成的精神疾病。

## 戰爭造成的精神官能症

我們必須從二戰的特定脈絡來瞭解軍隊裡普遍存在的情緒危機。二戰的軍隊數量異常龐大，幾乎完全仰賴徵兵（其中少部分人曾短暫服過

兵役），這些役男的期望與價值完全是在民間環境中所形塑。在戰時，軍隊成為社會各階層廣泛混雜的場所，這些人來自不同的社會階級、受過不同的教育，有著迥異的人格與個性。儘管軍事機構努力規範入伍的男男女女，但實際上並不存在所謂的「標準軍人性格」。年輕民眾要面對最極端的壓力形式：被殺的危險與殺人的要求。<sup>6</sup>因此在現代戰場上，服役的士兵必然會呈現出各式各樣的身體與精神反應。由於武器日益先進，大幅增加了參戰者精神創傷的可能。戰機對地面部隊進行攻擊，以及長程轟炸機對平民的空襲，往往都讓人特別恐懼。而轟炸目標的不可預測性與被轟炸者的無能為力，更是加強了這層恐怖感。地面作戰時，現代各型火砲的威力與戰車輾壓無防禦工事步兵據點的威脅，即便對最勇敢的戰士來說都是一大考驗。一名戰時精神科醫生寫道：「持續的爆炸，轟然巨響，機關槍噠噠直響，砲彈呼嘯而過，迫擊砲咻地發射，飛機引擎的嗡嗡聲，都在不斷消磨掉抵抗的力量。」<sup>7</sup>一般士兵

（與被轟炸的平民）必須忍受隨處映入眼簾的死者與殘缺不全的屍體，戰場或街道上散落著屍塊，這些都是原本民間生活完全看不到的可怕景象。別的不說，光就軍事環境本身，無論是出於紀律嚴謹、反個人主義或對壓抑個性的緣故，往往就足以讓士兵在還未抵達戰場之前就出現澳洲精神科醫生所說的「精神受創」。<sup>8</sup>一九四一年，屯駐在後方的英國陸軍光是一個月就出現一千三百例精神創傷。駐守在遙遠北方阿留申群島的美軍士兵，明明沒實際投入戰場，卻被診斷出患有「戰鬥疲勞症」。精神科醫生在對從新幾內亞返國的澳洲士兵進行診斷後發現，多達三分之二的士兵分明沒有經歷戰鬥，卻出現了精神官能症。從這裡就可以明白看出，除了戰鬥本身，還有其他因素可能引發精神官能症。<sup>9</sup>

在這些狀況下，精神創傷的規模有可能十分巨大，實際上也證明確是如此。美國曾基於精神方面的理由拒絕讓兩百萬人左右入伍，但即便

如此，戰爭期間仍舊有一百三十萬人被診斷為精神創傷，其中有五十萬零四千人因此退伍。在歐洲戰場，受傷的美軍士兵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三被診斷患有精神官能症。根據估計，從諾曼第會戰中生還的步兵高達百分之九十八曾經有過精神創傷。<sup>10</sup>同樣是諾曼第會戰，英國陸軍的受傷士兵也有一到兩成被診斷精神創傷，加拿大陸軍則是百分之二十五。英國與美國陸軍因醫療因素而退伍的士兵，有三分之一是精神病患者。<sup>11</sup>美國海軍的精神創傷比例較低，部分是因為戰場環境不同：海軍士兵不用面對面殺戮，激烈戰鬥的時間也比較短促。海軍退伍士兵只有百分之三患有精神官能症。<sup>12</sup>德國與蘇聯陸軍的數字比較難以判斷，因為精神官能症在這兩個國家遭到忽視，或者是被診斷成器質性傷害而被當成內科來處理。根據估計，大約有一百萬名紅軍士兵患有精神創傷，比較不合理的說法則認為只有十萬名。<sup>13</sup>在巴巴羅薩作戰初期，德國陸軍精神官能症的病例急速增加，成為最大宗的傷患來源。一九四四年一月，統計顯示每個月都有兩萬到三萬名精神創傷患者；到了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之交時，每月可能多達十萬人。直到一九四三年為止，退伍軍人當中有百分之十九點二患有精神官能症，但這個數字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顯然有所提升，因為戰況更加艱苦，死傷可能性大增，而受徵召士兵的年齡也開始向下與向上延伸。<sup>14</sup>義大利缺乏完整的統計數據，但地方證據顯示，義大利士兵就跟其他國家的陸軍一樣，有著嚴重的精神疾病問題。<sup>15</sup>

避免作戰或逃避作戰威脅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非得罹患精神官能症不可。然而透過自殘、逃兵或投降來避免作戰，其實也有很高的比例會對恐懼、創傷經驗或令人窒息的軍旅生活產生精神疾病反應。自殘的風險不小，有時還可能致命。常見的自殘是用槍射穿手掌或腳掌。紀錄顯示，絕大多數的軍隊都有發生過這類自殘情事，但缺乏詳細統計數字。



在西北歐戰場，大約有一千一百名美軍士兵選擇自殘以避免上戰場。一九四四年西北歐戰場的加拿大陸軍，也有兩百三十二個案例。紅軍士兵自殘的話，反而會被迅速處決，因為紅軍總是把自殘逃避上戰場的人視為恥辱。美國軍醫院收治的自殘患者會被隔離，病床上會掛一個「自殘者」的牌子，患者雖然不會被懲罰，卻會受到醫院人員的鄙視。<sup>16</sup>

逃兵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紅軍的逃兵（包括叛逃到敵方的士兵）數量十分驚人，竟多達四百三十八萬人。在蘇聯，被定義屬於逃兵或逃避兵役的人有兩百八十萬人，其中有二十一萬兩千四百人始終未能抓到（很可能已經死亡）。許多人嚴格來說不是逃兵，而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大撤退中與原部隊失聯，或者是在德軍的包圍戰中成功逃出德軍防線，後者通常最後都能回到原部隊。<sup>17</sup>叛逃到德軍的人也被歸類為逃兵，這些人可能是對蘇聯體制幻滅，也可能是因為生活條件惡劣與領導階層顛覆，或者只是希望（儘管十分渺茫）有比較高的生還機會。根據估計，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至少有十一萬六千人叛逃，一九四一年或許多達二十萬人，不過這兩個數字誤差範圍都很大。<sup>18</sup>美國陸軍在世界各地的逃兵總計是四萬人，在歐洲則是一萬九千人。二戰期間，英國陸軍的逃兵總計是十一萬零三百五十人，高峰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這段軍事行動相對較少的時期，可能是因為無所事事而感到挫折，也可能是因為距離故鄉太近，反而與戰爭經驗沒什麼關係。德國陸軍的逃兵數字僅限於因為逃兵而被捕或被判死刑的人，但光是這樣數字就達到三萬五千人之多。亞洲戰場的相關描述則說明了，日本或中國軍隊的逃兵通常會被槍斃，但亞洲戰場太混亂，難以得出精確統計數字。日本陸軍在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的官方逃兵數字分別是一千零二十三人與一千零八十五人，此外還有六十名叛逃者，但在這個時期已經有許多士兵為了躲避敵軍而逃到叢林或山區，統計數字並沒有列入

這些人。<sup>19</sup>士兵逃跑的原因很多，有些人是基於情緒因素，有些人是因為戰爭引發了精神官能症，有些人是因為犯罪，有些人則是為了政治與良知上的抗爭。但無論什麼理由，這些人都被認為是逃避戰鬥。逃兵的規模使軍事體系面臨極大壓力，軍方因此絞盡腦汁避免讓士兵產生恐慌。雖然絕大多數逃兵不會被槍斃，但還是要遭受懲罰與汙名化，以避免其他士兵仿效。<sup>20</sup>

決定放棄戰鬥或陷入精神崩潰的危機，顯然不是舉世皆然的現象。這些現象的出現，絕大多數源自於士兵面對的特殊環境，而非士兵自身的性格。在傷亡慘重的戰場上，士兵們陷入毫無希望的困境，親密戰友突然死亡，炸彈或砲彈差點擊中自己，都有可能引發壓力反應。一九四二年的北非戰役，大英帝國部隊士氣低落，因為他們面對武器更為精良與將領更為優秀的敵軍，導致有愈來愈多士兵選擇投降而不願繼續戰鬥，或者是無故擅離崗位。一九四二年三月到七月，第八軍團有一千七百人陣亡，卻有五萬七千人「失蹤」，這些失蹤者絕大多數應該是投降去了。<sup>21</sup>補充兵員時，如果把新兵打散分配到陌生部隊裡（如美軍就是採取這種做法），那麼這些士兵有很高的機率陣亡或精神崩潰。有些戰場地地形對於人類耐受力有著更嚴苛的要求，例如中國的水鄉澤國與崎嶇山地，東南亞的叢林戰，俄國前線的冬季戰爭，或者是義大利防線的多山艱苦環境，其他諸如霜雪、泥濘與疾病，都會造成戰力大量折損。盟軍在義大利南部的第一場冬季戰役，使士兵的精神創傷率急遽攀升。緬甸戰役中，熱帶雨林的可怕環境，加上容易引發壓力反應的各種疾病，也讓士兵的精神創傷率居高不下，而且難以得到確切診斷。<sup>22</sup>

我們可以從前線經驗得到一個共通結論，那就是面對最極端的狀況，沒有人能免於崩潰。一九四三年，美國精神科醫生格林克（Roy Grinker）與史匹格（John Spiegel）寫道：「戰爭精神官能症是戰爭造

成的。」<sup>23</sup>負責監控軍隊社會與心理狀態的美國研究局於一九四一年十月設立，而該局在戰時做出的結論是，沒有人能不受作戰造成的心理扭曲影響。軍陣精神科醫生阿佩爾（John Appel）曾在義大利進行過六個星期的實地考察並且撰寫報告，美軍醫務總監科克（Norman Kirk）則根據這份報告提出了官方觀點，並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通知陸軍各指揮部：「精神創傷與槍傷和彈片傷一樣不可避免。」<sup>24</sup>就連一向認為正常人不會在砲火下崩潰的德國陸軍司令部，也於一九四二年公布了治療精神官能症的指導原則，承認「有效率的傑出士兵」其實就跟一般人一樣，也會受到情緒壓力的影響。<sup>25</sup>直到一九四四年為止，軍陣精神科醫生仍在爭論一般士兵能夠忍受多少天的作戰。英國的估計是大約四百天，但中間必須要固定給予短期休息。美國醫生則認為八十到兩百天之間都有可能是極限。一九四五年五月，美國陸軍下令把極限定在一百二十天。對於轟炸德國的機組人員來說，出勤十五到二十次是極限，但實際上機組人員固定出勤三十次，而且有些人在出勤第一輪任務之後，還會接著繼續出勤第二輪。由於經歷兩輪轟炸任務的機組人員生還率只有百分之十六，因此絕大多數機組人員可能還沒診斷出精神創傷就已經殉職。根據現代最新的研究，在經歷六十天的戰鬥之後，士兵已無法有效作戰。<sup>26</sup>

對於二戰時期的軍事機構來說，建立能夠解決情緒創傷的制度有其必要，如此才能避免原本未受到影響的士兵也受到情緒「汙染」，並且盡可能讓更多士兵重回前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首次出現了戰爭疲勞的經驗，一般稱為「彈震症」（shell-shock），之後軍方也預期未來的衝突也有可能出現相同的經驗。然而，許多一戰時期的教訓要不是被遺忘，就是被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的新發展所取代。<sup>27</sup>其中最重要的發展當屬戰間期的佛洛伊德革命，佛洛伊德的學說讓愈來愈多人相信，某些人

格比較容易受到童年經驗帶來的潛意識心理衝突影響。雖然精神科醫生不信任佛洛伊德與其追隨者提出的心理學主張，但從智力缺陷遺傳發展出來的遺傳觀點，卻加強了體質傾向的觀念，導致一些精神科醫生開始認為，體質傾向也許透過某種方式決定了精神疾病反應。<sup>28</sup>神經醫學則提出與精神醫學和心理學不同的說法，神經科醫生認為，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有器質性根源，可能是大腦運作出問題，也可能是神經系統有毛病。神經科醫生也反對心理學「疾病」的觀念。各個觀點背後都有支持的科學家，他們的主張對於戰時軍陣精神醫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問題在於，科學家對於什麼才是妥當的治療方式，往往只留下大量待解的論點與疑問。更糟的是，儘管科學家認為精神官能症是一種需要被醫治的傷病，但此說並不為軍事高層所接受。曾有一名心理學家被徵召去愛達荷州的一處徵兵站評估役男，結果負責軍官很坦白地對他說不需要他的幫助：「我知道怎麼對付這些沒用的人。」<sup>29</sup>

為了探討情緒壓力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與科學觀點，間接說明了二戰期間軍陣精神醫學的運用為什麼會出現很大的歧異。在美國，軍陣精神醫學與戰爭投入充分整合，反映了美國民眾對心理學發展的濃厚興趣。在德國、蘇聯與日本，軍事體制則對軍陣精神醫學興趣缺缺。<sup>30</sup>美國陸軍與海軍將神經精神醫學部門設在最高層級。二戰前，全美有三千名執業的精神科醫生，但陸軍醫療兵團只有三十七名。<sup>31</sup>情勢在戰爭爆發後有了變化，美國軍方徵召兩千五百名精神科醫生到軍中服衛生醫療役。到了一九四三年，每個陸軍師都配置了一名精神科醫生。海軍則是在一九四〇年設立神經精神醫學處，並且在部隊裡設立精神醫學單位，每個單位配置一名精神科醫生、一名心理學家與一名神經科醫生，這麼做或許是為了緩解三個學科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sup>32</sup>在英國，軍方與精神醫學的整合比較緩慢。英國軍方起初只徵召極少數的精神科醫生



入伍，直到一九四〇年四月才決定在每個陸軍指揮部設置一名諮詢精神科醫生。一九四二年一月，英國終於成立治療與處理精神病例的正式體系，該年四月才成立陸軍精神醫學處。這或許反映了邱吉爾的偏見，因為他認為精神病「很容易假裝」。到了一九四三年，整個英國陸軍依然只有兩百二十七名精神科醫生，其中只有九十七名派駐海外。<sup>33</sup>英國皇家空軍最早面臨激烈作戰，因此在一九四〇年就設立了神經精神醫學處，由一名神經科醫生領導，負責處理作戰飛行的壓力問題。神經精神醫學處設立了特別中心，最終數量達到十二個，負責評估機組人員的情緒創傷，並且將這類創傷歸類為「待確診的精神官能症」。分派到英國皇家空軍的醫生，絕大多數是精神科醫生或神經科醫生。<sup>34</sup>

在德國與蘇聯，軍方總是對精神科醫生敬而遠之。蘇聯與德國獨裁體制不信任心理科學，可能是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在他們眼中，民眾的集體健康比滿足個人需求更為重要。德蘇的獨裁體制也認為，服役的男性士兵（在蘇聯還包括女兵）只要仰賴意識形態激勵就可以克服情緒危機。蘇聯軍陣醫學院精神醫學部部長在一九三四年寫道：「紅軍士兵的政治士氣與堅忍的階級意識，可以讓他們輕易克服精神疾病。」<sup>35</sup>另一名德國精神科醫生寫道，德軍士兵在面對危險情況時得要「藉由服膺崇高價值與理想來克服與壓抑」自我保護的本能。<sup>36</sup>德軍確實徵召精神科醫生與心理學家協助選拔役男，戰時則擔任各集團軍諮詢顧問，最後也設立了武裝部隊衛生處並配置了六十名精神科醫生，負責對陸軍與空軍的士氣與醫療提出建議——但第一線的治療依舊由部隊裡的醫官負責。德國空軍的醫療勤務比較完整整合了心理學家與精神科醫生。一九三九年，德國空軍設立了心理治療部門，最終設立了十一家精神科醫院，專門治療出現神經衰落與壓力症狀的機組人員。但到了一九四二年，正當民主國家大力擴大精神治療設施的時候，希特勒卻下令

停止軍中的心理治療。德國空軍於五月停止相關治療，陸軍也在兩個月後停止。在德軍前線，精神醫學的地位始終不穩固，軍方一直認為精神崩潰的人需要的是灌輸軍人價值，而非更多治療。<sup>37</sup>

在蘇聯，精神醫學更不受重視，除了缺乏受過精神醫學訓練的醫生，蘇聯醫界也深信精神疾病的來源是器質性的，因此可以交由一般醫療人員來治療。一九四一年九月，軍事衛生總署的精神科醫生最終還是被要求成立精神科醫院，但這些醫院只收治最棘手的病人。軍醫院只安排三十張病床給精神科病人。一九四二年，幾名精神科醫生被分配到主要的陸軍防線，部分精神科醫生則分配到個別的陸軍師。絕大多數的情緒崩潰病例都留在前線由缺乏經驗或同情心的醫生加以診治。<sup>38</sup>日本陸軍想當然耳地也認為徵召來的士兵必須忍耐一切直到戰死為止，因此幾乎從未考慮提供精神醫學診療。精神崩潰的士兵往往被視為罪犯或軟弱之人，必須送進陸軍「教化隊」——而他們在教化隊裡會被當成智能障礙患者。分派到陸軍的精神科醫生數量極少，而他們在軍中的主要任務並非維持其他無精神疾病者的心理衛生，而是負責解釋為什麼有些士兵會表現出變態的犯罪本能（包括殺害軍官）。<sup>39</sup>

在部隊裡，精神醫學與心理學有兩種非常不同的運用方式，反映出這兩種學科的緊張關係。精神醫學認為，決定一個人是否容易情緒崩潰的原因在於「體質」；心理學則認為精神創傷是戰鬥對個人心理與生理壓力過大所導致的結果。一戰經驗使人們普遍相信，想要讓役男選拔程序更有效，就必須預先剔除那些從背景與人格特質來看容易情緒崩潰的人。當時人們也普遍相信，一旦戰鬥開打，那些看起來情緒脆弱的人應該也是比較容易情緒崩潰的人，或者如一名澳洲軍官所言，「比較脆弱的船，比較容易沉沒。」<sup>40</sup>只有美軍堅持負責選拔役男的小組一定要有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參與。但透過訪談進行精神醫學側寫的過程往往

只有三到十五分鐘，要在這麼短的時間看出對方是否焦慮或者心理異常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訪談者被要求留意是否有人顯露出二十二種可能狀況的任何一種，例如「寂寞感」、「陰陽怪氣」或「同性戀傾向」。這種獨斷且任意的篩選過程，導致超過兩百萬名役男被拒絕入伍。美國的精神科醫生普遍同意家庭背景與人格特質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也就是說，「戰爭精神官能症是『美國社會的產物』」，而他們也認為可以透過簡單的測試來辨識這些因素。<sup>41</sup>澳洲與美國軍隊的精神科醫生設計出公式化的問題來剔除潛在的情緒創傷者。「你很擔心嗎？」或「你很容易沮喪嗎？」這些都是典型問題，但這些問題也幾乎不可能得到誠實坦白或有用的回答。<sup>42</sup>為了協助通過選拔的役男，美國陸軍會發給他們一本名為《戰爭的恐懼》（*Fear in Battle*）的手冊，書中解釋人一定會感到恐懼，但可以透過情緒「調適」來加以克服。<sup>43</sup>

英軍很晚才設計出以精神醫學為基礎的役男選拔制度。在英國，明顯患有精神疾病而被淘汰的役男只有百分之一點四，相較之下美國則有百分七點三。英國的選拔人員更關切役男的天賦是否適合從軍，不過他們也確實試著剔除「個性明顯膽怯且容易焦慮」的人。<sup>44</sup>在德國，被派到役男選拔中心的心理學家則是必須基於種族與軍事考量，剔除所有被定義為「反社會」或人格明顯有缺陷的人，這種做法與納粹政權試圖將這些人從德意志民族排除如出一轍。納粹黨想藉由軍事篩選程序來打造一個「充滿男子氣概」的軍人世代，同時排除可能的歇斯底里患者，而這麼做也助長了對一戰中罹患「戰爭精神官能症」的退伍軍人的偏見。德國陸軍不希望重演壕溝戰，導致再次出現大量的彈震症恐慌，而且也不願處理可能的逃兵與「撫恤金申請」的問題。<sup>45</sup>伍特（Otto Wuth）是陸軍衛生檢查處的精神醫學顧問，他會把士兵分成「願意」與「不願意」兩種，而精神科醫生負責將第二種士兵，也就是內心軟弱與麻煩製

造者汰除。二戰的最初兩年，德軍的精神創傷人數偏低，加上迅速取得勝利與未重蹈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艱苦壕溝戰，這些似乎都證明篩選程序確實剔除了容易罹患戰爭精神官能症的人。留下紀錄的病例絕大多數將戰爭精神官能症歸因於體質。例如一名精神科醫生在一九四〇年寫道：「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精神價值。這裡指的不是醫學意義上實際的染病，而是這些人的精神價值比較低。」<sup>46</sup>

然而，認為軍人是因為體質才導致內心脆弱的觀點逐漸受到質疑，因為許多證據顯示，軍中各類型士兵都可能出現精神崩潰的狀況。儘管如此，體質觀點依然無法被完全否定，因為在這麼多士兵當中，確實有人會有比較嚴重的精神疾病。某些人生來比較膽怯或容易逃避的觀念，也與當時軍中既有的偏見相呼應。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西西里島小鎮尼科夏（Nicosia）的美軍野戰醫院。當時美軍進攻西西里島的指揮官巴頓將軍掌摑了一名明顯出現精神創傷的士兵，因為巴頓認定該名士兵裝病（當時這名士兵被誤診為罹患瘧疾）。巴頓隨後表示：「這種人簡直是懦夫。」<sup>47</sup>巴頓因為這起事件而被暫時調離指揮崗位，但軍隊對於精神創傷的不寬容始終出於本能。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就曾痛罵那些在戰鬥壓力下崩潰的人是「軟弱而意志不堅」，而這種偏見也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影響了英國皇家空軍對機組人員的治療方式。當時各指揮部都收到了一封「給動搖者的信」，建議他們只要發現一丁點情緒崩潰，也就是出現可能被定義為「缺乏道德品格」的跡象時，就要立即處理。「缺乏道德品格」成為所有因裝病或懦弱而被軍隊汰除者的標準描述，雖然絕大多數精神創傷患者都獲得戰地精神科醫生較多同情，但這些精神創傷者仍須背負向長官解釋自己並非懦夫的義務。<sup>48</sup>英國皇家空軍認為診斷的目標是要讓健康的機組人員被影響之前，辨識與移除情緒病例：「心理學家的重要任務不是修補劣質材料，而是將其移除以



免產生問題。」<sup>49</sup>澳洲軍隊的精神科醫生在二戰期間始終主張體質的影響最大。針對派駐新幾內亞的澳洲士兵進行的研究顯示，精神創傷的病例有百分之五十一原本就帶有脆弱的心理傾向。精神科醫生於是在役男選拔時調查役男的背景，瞭解哪些人在孤兒院長大，或有精神官能症的家族病史，或父母都有酒癮，目的是為了不讓「廢物與變態」入伍。<sup>50</sup>

儘管如此，隨著戰事持續，逐漸可以明顯看出體質或性格缺陷或所謂的「不良種族特質」都無法解釋層出不窮的精神創傷現象，特別是美軍與德軍，因為這兩個國家在役男選拔時就已經根據所謂「心理調適的能力」來選取役男。戰地精神科醫生發現，士兵的反應顯然來自於極端狀況或持久戰鬥下所產生的壓力。有些士兵的反應單純是身心俱疲的結果，有些士兵則會出現創傷休克反應，進而引發嚴重的精神症狀。許多症狀十分類似一戰所經歷過的情形。一名美軍士兵回憶同袍時表示：

「眼神陰鬱空洞，看起來十分茫然，整個人魂不守舍，穿著大一號的衣服，菸一根接著一根抽，手不斷地顫抖，時不時就緊張抽搐。」<sup>51</sup>這些人會不由自主地顫抖或哭泣，或喪失基本的行動技能，或大小便失禁，或像胎兒一樣蜷縮身體，或對外界毫無反應，對一切漠不關心。許多人已經出現身心失調的症狀，包括失去聽覺、失語、結巴、抽搐、消化性潰瘍（德國陸軍尤其常見）。在二戰前，一些神經科醫生已經知道如何從生理機制解釋極端恐懼對身體機能造成的影響，但並未將這層思考應用在精神創傷上。根據調查，有四分之一的美軍士兵曾有過大小便失禁的經驗，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懦弱的表現，但這其實是交感神經系統引發的正常生理反應。軍事高層逐漸瞭解到，絕大多數戰鬥人員並非懦弱，也不是在逃避責任，而是長期危險引發的壓力受害者。解決之道應是找出適當的治療方式而非汙名化已經士氣低落的士兵。<sup>52</sup>

蘇聯與德國比民主國家更清楚戰鬥對士兵的影響，因為兩國軍方更

傾向於把精神疾病反應視為一種器質性現象，而且傾向認為只有極少數精神病患真的罹患精神官能症。一九三〇年代，德軍列出了四種前線需要治療的精神症狀：前兩種分別是神經衰弱與暫時心因性（與經驗有關）反應，這些症狀要在前線或前線附近進行治療。另外兩種則是強烈的歇斯底里反應與精神病症狀，這些症狀要後送到醫院或後方治療。一九四一年秋天，德軍東線戰場開始出現大量傷亡，心理因素引發的功能性障礙首先會在前線醫療站或休養中心進行治療——這裡會提供傷兵食物、睡眠、麻醉治療、諮詢與陪伴，目的是為了讓傷兵盡快復原回到前線。德國空軍在遠離前線的地方設立休養中心，讓飽受「飛行壓力」的機組人員能好好休息。一九四〇年，德國空軍在巴黎、布魯塞爾與科隆設立休養中心，一九四三年又設立了另外八所休養中心。<sup>53</sup>紅軍也採用相同的前進醫療中心體系，充足的休息、像樣的食物與衛生，可以讓精疲力竭的士兵重新恢復健康重返前線。民主國家的軍方花了較長時間才瞭解這個問題，然後才提供了所謂的「前進精神醫療」。一九四二年，紐西蘭陸軍首次在北非設立野戰休養中心；不久，發動突尼西亞戰役的英美也開始仿效紐西蘭的做法。美國陸軍神經精神醫學處處長哈洛倫（Roy Halloran）批准設立前線單位提供精神醫學照顧，因為人們很快就發現，把需要治療的士兵後送到遠離前線的地方，反而會讓士兵發現自己被當成精神病患，導致狀況更加惡化。一九四三年三月，美國陸軍在突尼西亞實驗性地設立第一家前進診療所。前進診療所隨即獲得成效，此後美軍便開始普及前進治療的做法。<sup>54</sup>英國陸軍也建立類似的制度，一開始是前進救護隊，專門照顧精神病患，之後在一九四三年設立了前進移送部隊與部隊休養中心。到了戰爭結束時，許多戰鬥疲勞的受害者就在前線或離前線不遠處接受治療。<sup>55</sup>

即使實施了前進治療，但各方對於壓力反應的看法依舊不同，對於

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也存在不同見解，導致學說之間形成了緊張關係，屢屢出現摩擦，甚至是誤診（雖然很少有人會像緬甸前線的精神創傷者一樣受到羞辱，當地初步的醫療紀錄只會寫著「瘋子」二字）。<sup>56</sup>專業上的對立影響了對建構療法的態度。好比德國的軍陣精神科醫生就反對空軍醫院流行的長期療法，因為這種療法主要受到精神分析療法的影響。德國軍陣精神科醫生認為，許多飛行員根本是「醫療技術失敗」的幸運受益人，而且違反了「軍隊的陽剛紀律」。<sup>57</sup>德國的軍陣精神科醫生很快就對任何看起來像是精神創傷者之間的模仿或裝病行為進行懲罰——懲罰性治療帶來的威脅已足以鼓勵士兵自願返回前線。紅軍的主流軍事文化完全不給逃避責任者或愛發牢騷者任何空間，因此只要知道這兩種人會有什麼下場，幾乎可以確定能讓人加速恢復，無論這個恢復是透過同袍情誼還是透過睡眠來達成。<sup>58</sup>

用來描述精神創傷的語言，反映出當時精神醫學治療的混亂，也反映出軍事高層對於什麼能算是可接受狀況的疑慮。在太平洋瓜達康納爾島發生的第一場大戰役後，亞美利加師（正式番號為第二十三步兵師）唯一一位隨軍精神科醫生因為擔心人們對精神崩潰的態度，因此他在診斷士兵時使用了「爆炸震盪」這個聽起來像是軍隊用語的詞彙；蘇聯軍醫也是基於同樣理由而將士兵診斷為「挫傷」。<sup>59</sup>在英國，「彈震症」這個詞彙在二戰之前就已廢棄不用，主要是為了避免士兵以為只要遭受砲火攻擊就可以說自己精神崩潰，但新的詞彙如「努力症候群」、「疲勞症候群」等同樣也遭到濫用，直到諾曼第會戰時，才引進了「戰爭疲勞」（battle exhaustion）一詞。<sup>60</sup>美國軍方認為絕大多數病例是戰鬥狀況引起的，因此一般診斷時都認為陸軍士兵是「戰鬥疲勞」（combat exhaustion），而空軍機組人員是「作戰疲勞」（operational fatigue）。精神科醫生自己把在前進醫療站裡無法復原的病人區分成各種不同的醫

療類別，這些區別除了反映人們在戰間期對精神損害的性質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也鼓勵不想回到前線的士兵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符合特定條件的傷殘人士。

戰時精神醫學所進行的各種測試，到頭來主要是想瞭解出現疲勞症候群或更嚴重精神病與身心失調的軍人，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重返軍隊服役。精神科醫生與心理學家承受著巨大壓力，必須證明自己在軍事醫療結構中的價值；這種職業焦慮幾乎可以確定這些醫生會把士兵送回前線或讓他們擔任非戰鬥人員——這些士兵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能說已經「痊癒」，不過他們也不像先前那樣完全失去行動能力。醫生可以使用各式各樣的療法來協助士兵克服疲勞與恐懼，包括麻醉藥物、暗示療法與注射胰島素（刺激體重增加）。醫生也會對一些病人使用藥物，使其進入某種狀態，病人可以在醫生的刺激下重新經歷特定創傷，將壓抑的恐懼釋放出來。<sup>61</sup>各神經精神醫學單位宣稱的人員重返軍隊比例往往存在很大差異，而重返軍隊的士兵絕大多數都會被分配到前線或離前線不遠處擔任非戰鬥人員。義大利是一個有趣的例子，該國前線精神科醫院讓士兵重回軍隊的比例只有大約百分之十六，絕大多數精神創傷的士兵都會被送回義大利。<sup>62</sup>一九四三年三月，位於突尼西亞前線的美國軍陣精神科醫生宣稱，只需要三十小時的休息與治療，多達三成的士兵就可以重新回到崗位，四十八小時後更能提高至七成。但其他來源的估計則顯示，重返崗位的士兵只有百分之二能夠擔任戰鬥人員。<sup>63</sup>一九四三年，英軍患者整體而言重新回到軍隊的比例，一個星期之內約介於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但絕大多數重新返回崗位的士兵都是改任非戰鬥人員。英國空軍機組人員即使沒有被貼上「缺乏道德品格」的標籤，通常也不會返回飛行崗位。一旦士兵重返崗位，就幾乎沒有人繼續調查他們的復發率。一份戰時研究指出只有少數人病情復發，但針對個別部隊



的其他研究則顯示，其實很少人能夠長久繼續待在崗位上。另一份研究顯示，一九四三年從精神創傷中復原並重新回到作戰崗位的三百四十六名，在三個月後只有七十五人留了下來。<sup>64</sup>在諾曼第歷經數星期的艱苦作戰後被送往休養中心的士兵，也只有百分之十五能夠返回原部隊，高達半數會被送回英國。<sup>65</sup>重回前線者，絕大多數都是乍看之下可以勝任原職，實際上卻無法恢復效率的軍人。結果往往是為了補充那些無法繼續作戰的士兵而招募新兵，但這些訓練不足的新兵又一下子被丟進前線的混亂戰場，因此有很高的機率跟他們填補的人一樣出現精神創傷。

在前進精神科醫療站無法獲得協助的人，當他們被送到後方醫院與精神科診所治療時，往往面臨憂喜參半的命運。有些人會被認定為精力耗盡，無法繼續服役。在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的義大利戰役中，許多戰功彪炳的軍士官會在歷經數個月前線戰鬥之後精神崩潰，盟軍將這種現象稱為「老中士症候群」（Old Sergeant Syndrome），英國陸軍又稱之為「衛兵的歇斯底里」（Guardsman's hysteria）。這些人被認定為無法治療，只能光榮退役。<sup>66</sup>在英國，已經被診斷出有精神病症狀的人，會被要求返回後方接受治療，如果狀況無法改善，就只能退役，如果還能擔任一點勞力工作，就讓他們在基地與倉儲服務，將其他適合的人替換到前線去。<sup>67</sup>但在獨裁國家，人們往往認為情緒崩潰者可能會假裝或誇大自己的症狀，好比德國精神科醫生就認為這是一種「逃避戰爭」的方式。紅軍則會將被指控逃避兵役或裝病的人送進懲罰營，這些人很快就會在營裡被除掉。在德國，被送回後方診所的人要接受痛苦的電擊療法——電擊引發心臟病或造成骨折的事時有所聞。如果士兵不願接受治療，或拒絕返回軍隊，他們就會被送到後方負責懲罰的「特別部門」，環境類似集中營。一九四二年四月之後，這類士兵更會直接被送到前線的懲罰營。一九四三年，德國陸軍決定把因為身心失調而染上

胃病或聽力出問題的人送進所謂的「病患營」，替換正規軍負起駐防與守衛要塞的責任。有一小群人更是因為「反社會」性格而被判定沒有好轉的可能，最終被送進「安樂死」設施處死。<sup>68</sup>

高比例的精神創傷、很少患者能夠重返戰鬥崗位，加上替補新兵對前線的嚴酷毫無準備，這些現象都證明了，只要暴露在戰場的時間不斷延長，所有武裝部隊的戰力都將持續下降。雖然生產大量軍事裝備、提升作戰或戰術能力能夠彌補人力衰減，但只要在困難的條件中長期作戰，任何部隊都將難以充分運用物質優勢。尤其是歷經重大戰損的地面部隊，往往會變得步履蹣跚，就像挨了幾記重拳而頭昏腦脹的拳擊手。隨著戰事不斷延長，這些地面部隊會愈來愈難出拳一次擊倒敵人。戰場上不乏小部隊在戰線上突然陷入恐慌的例子。例如前線戰場多變混亂的中日戰爭，就有一名中國軍官提到，他曾看到士兵「像老鼠一樣驚慌失措」，四處逃竄。<sup>69</sup>儘管如此，真正集體恐慌或紀律完全崩潰的例子非常少見。少數案例包括一九四〇年從挪威倉皇撤退的英軍、一九四二年初紀律崩潰的新加坡英軍，或是在多布魯克面對六千名沒有彈藥而改採刺刀衝鋒的波蘭軍隊時居然驚恐投降的義大利軍隊。大規模投降（二戰最後幾天的大規模投降不算在內）一般出現在大戰初期，如一九四〇年的法國與比利時，一九四一年的東非與蘇聯，或是發生在史達林格勒等軍隊無法繼續戰鬥的時候。即使軍隊暫時崩潰，例如一九四〇年的法國陸軍、一九四二年夏天頓河大草原上的紅軍，或是一九四四年失去組織且橫越整個法國撤退的德軍，但這些驚慌失措的士兵往往最終都能被安撫下來，拋開恐懼、重新整頓並建立起新的防線。與上一場世界大戰一樣，儘管現代戰鬥對心理造成很大壓力，精神創傷也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但多數軍人終究能堅持下來，繼續作戰。

## 維持士氣

如果戰時的情緒壓力令成千上萬名男女軍人難以承受，那麼那些不願向精神疾病（無論短期還是長期）屈服的大多數人，又是如何克服這一切繼續作戰下去呢？這個問題的另一種問法，就是軍隊該如何維持士氣？「士氣」是個模糊的詞彙，不僅涵蓋人為什麼要從事戰鬥的各種解釋，還囊括各類人所做出的各種反應——這些人的智力、社會背景、心理狀態或個人條件都大不相同，因此無法用單一的道德或情緒狀態概括解釋。二戰期間的軍事組織普遍認為，只要靠有效的軍事訓練與啟迪人心的軍事教育，就可以把役男改造成整齊劃一的軍人。英軍行政官亞當（Ronald Adam）在一九四三年寫道：「既然我們可以訓練那麼多人對抗德國人，當然也可以訓練同樣多人對抗恐懼。」<sup>70</sup>就連精神科醫生也傾向於把正常人想像成可以適應現代戰爭與軍隊生活，不像「毫不顯眼、羞怯扭捏、優柔寡斷」且無法適應軍隊生活的少數人（套用某位英國精神科醫生的話）。<sup>71</sup>當時人們相信，絕大多數男人只要接到命令，就能克服自己的恐懼。英國陸軍顧問精神科醫生里斯（J. R. Rees）寫道：「這個想法的根據是，勇氣與懦弱是兩種可以自由選擇的能力，每個男人都可以克服情緒壓力，從中做出選擇……如果他告訴自己必須做到，他就會有勇氣做到。」<sup>72</sup>

認為所有男人都可以做好戰鬥準備、只有極少數男人會被情緒控制，這種說法其實完全忽略各交戰國的軍事環境存在極大文化與社會差異，也沒考慮到戰鬥情境的不同。戰時敘事不遺餘力地強調健全領導的重要，提到勝券在握所引發的道德熱情，然而這兩項論點的解釋力就跟「男人只要接受訓練就能產生更多勇氣」差不多。以德軍與日軍為例，

兩軍面對即將來臨的戰敗，卻依然抱持必死決心繼續作戰。相較之下，盟軍反而隨著勝利愈來愈近而變得更加小心，不願意冒死前進。美國陸軍的士氣處是在戰爭最後一年的一九四四年才由參謀長馬歇爾將軍成立，而當時美軍明顯已勝券在握。<sup>73</sup>對蘇聯而言，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戰爭局勢的轉變，對於蘇軍士氣狀態的影響也沒有原先預期的那麼大。一九四四年，一名紅軍士兵表示：「經過三年的戰鬥，蘇聯士兵已經身心俱疲。」<sup>74</sup>糟糕的指揮體系與作戰判斷失誤，同樣也沒有讓美軍停止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於義大利南部的安奇奧灘頭堡奮戰，以及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在胡特根森林進行一場災難性戰役——美軍與德軍在該役中都為了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付出了慘重傷亡。任何討論士氣的論點，都無法解釋為何會有軍隊願意在最令人士氣低落的环境下作戰。

另一個極為明顯但不那麼受歡迎的解釋，就是軍隊中的壓迫。軍事組織本質上就是壓迫性的，但壓迫不一定等同於懲罰。二戰時的軍事組織試圖徵召公民社會的各階層民眾，逼迫他們接受軍事結構、軍事紀律與軍事生活的日常要求。為了因應兵員增加引發的問題，軍法制度也跟著擴充。然而軍法制度關切的問題與民間司法制度不同，幾乎是限制了軍人所有的自由選擇，限縮他們從訓練場到戰場所有可接受的行為。軍事組織針對軍人日常進行的規訓是侵入性的，充滿限制而且無所不在，貶低個體性、強調集體的力量。壓迫存在於軍事活動的每個層面、每個戰場與每個兵種上，目的就是維持組織與兵員的戰鬥力。當然，一支軍隊除了要建立紀律，還需要訓練（訓練的嚴苛與否取決於各國軍事文化）、政治與意識形態教育、適當的戰役以激勵士氣，以及（對少數人來說）晉升與獎賞的前景。對於在陌生的現代作戰環境中生活與工作的人來說，上述因素確實有很大的影響，但軍隊之所以能夠徵召、訓練與



規訓成千上萬的民眾投入戰爭，威脅施加壓迫與懲罰才是真正的關鍵。

儘管如此，壓迫的程度仍會因為軍事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威權體制的軍隊一般而言要比民主國家的軍隊更重視懲罰。德國與日本的軍事文化建立在榮譽與服從的傳統之上，日本士兵甚至會為此犧牲生命。日本士兵如果顯露出一點怯懦或不服從的樣子，就會被公開處以鞭刑，甚至會因為怠忽職守而遭到同袍毆打。<sup>75</sup>德日兩國存在著心理壓迫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下，即使身處最艱困的環境，軍人仍被期許要做到絕對服從與盡忠職守，即便不一定能做到，這仍舊被視為軍隊的最高價值。<sup>76</sup>軍法制度與軍隊紀律在蘇聯與德國獨裁制度下最為極端，兩國對於逃兵或精神崩潰的忍耐度也最低。兩國的軍事懲罰制度其實是兩國獨裁恐怖統治的延伸，凡是違反政權的意識形態目標都會遭到嚴懲。無法或不願為德國的未來而戰或保衛蘇聯祖國，等於在政治動機上犯了不可饒恕的過錯，也違反了軍隊的行為準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觀點大致相同。義大利曾有一百三十名逃兵遭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雖然實際上只有少數人被抓，但判決主要是想立下「教育」典範，鼓勵其他人能盡忠職守。<sup>77</sup>

在蘇聯，莫斯科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向所有方面軍黨委下達命令，處決所有開小差與臨陣脫逃者，命令依序下達到軍團與軍級部隊。為了阻止大量逃兵或後撤，紅軍在一九四一年九月設立所謂的「督戰隊」（內務人民委員部安全部隊）。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阻止害怕與脫隊的士兵後撤，並且將他們送回原部隊。德國入侵的最初幾個月，督戰隊捕獲六十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人，絕大多數都送回前線，「只有」一萬零兩百零一人因為情節重大而遭到處決。一九四二年七月，史達林發布第兩百二十七號命令，「一步也不許撤」，明確表示任何士兵棄守崗位都會遭到嚴懲。蘇聯在二戰期間估計有十五萬八千人因為臨陣脫逃、犯罪或政治

偏差而被處決，此外還有四十三萬六千人被送進古拉格，數量之多相當於六十個蘇聯師。<sup>78</sup>一九四三年以降，紅軍的任何問題都交由名為「反間諜部」（Smersh）的新安全組織進行調查；反間諜部除了追查叛國行為，也接管了處理逃兵、臨陣脫逃與自殘者的工作。反間諜部的職責是灌輸懲罰的恐懼，使人們害怕懲罰更甚於害怕敵人。<sup>79</sup>由於蘇聯政權也威脅懲罰逃兵或降兵的家人，蘇聯士兵因此承受了額外壓力——無論遭遇何種情緒壓力，都必須克服並且繼續戰鬥。

德軍則認為，放棄戰鬥者都屬於次等種族，無論是身體逃離軍隊還是心不在軍陣，應該受到懲罰，因為他們放棄確保德國未來的鬥爭。當人力缺乏迫使軍方必須徵召能力或適應力較差的士兵到前線作戰時，軍隊也更常威脅使用懲罰來逼迫士兵順從——納粹政權稱之為「特別處置」。德國軍事司法依照軍事刑法第五十一條對「臨陣脫逃」或違反軍隊紀律者判刑；案子經常需要精神科醫生提出報告，確認被告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才能予以懲罰。<sup>80</sup>與蘇聯軍隊一樣，德軍中許多案例的懲罰是處決——讓士兵害怕怠忽職守的後果，才能讓士兵繼續打仗。<sup>81</sup>雖然德軍的人力不像紅軍那麼充裕，但處決人數仍足以讓一戰德軍的處決案例相形見绌。德軍在一戰共處決了四十八名士兵，而二戰德軍則大約有三萬五千名士兵被判死刑，兩萬兩千七百五十名被實際處死，其中大約一萬五千名是逃兵。<sup>82</sup>總處決人數幾乎可以確定高於這些數字。因為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逃兵只要是在第三帝國境內被捕，若不是吊死在路燈上以儆效尤，就是當場被憲兵槍斃，而這些幾乎都不在統計數據上。輕罪的數量更多，處置方式主要是送進軍事監獄。德軍士兵在二戰期間被判監禁的案例大約有三百萬件，其中大約有三十七萬件是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兩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件是長期的苦役刑。<sup>83</sup>蘇軍與德軍統計數據的矛盾在於，士兵雖然害怕懲罰，這些懲罰卻無法完全嚇阻他們。東

線戰場的戰鬥特別漫長、艱苦與血腥。德蘇兩軍都實施了嚴厲的紀律，確保所有士兵都知道擅離職守的代價，但對於極度害怕戰鬥或對於戰局不抱幻想的士兵來說，這些懲罰仍不足以阻止他們逃亡。

在民主國家的軍隊裡，壓迫是一種組織與日常現實，只不過沒有極具懲罰性的軍法威脅。美國的逃兵與犯罪確實會受到懲罰，但二戰時只有一名美國士兵因為逃兵而被槍斃。英國駐北非陸軍總司令奧欽列克將軍強烈要求對臨陣脫逃的士兵恢復死刑，但沒有任何英國士兵真正因此被處決。<sup>84</sup>民主國家的軍隊更強調以羞辱的方式來處置沒有充分健康理由而臨陣脫逃的士兵，例如羞辱式除役或在正式公開場合進行降階。英國空軍機組人員在接受「缺乏道德品格」調查時，即便精神或身體狀態的正式醫學判定尚未公布，他們軍服上的徽章與階級標識就會先被拔除，還要在當地街上行軍以供民眾觀看。<sup>85</sup>對於逃兵事證確鑿者來說，他們還會受到其他懲罰，但不會比之前的羞辱更加危險。在戰爭最後一年，有八千四百二十五名英國士兵被判逃兵罪。<sup>86</sup>二戰期間被軍事法庭定罪的英國士兵共計有三萬零兩百九十九人，其中將近兩萬七千人士因為逃兵或擅離職守，兩百六十五人是因為自殘，只有一百四十三人臨陣脫逃。<sup>87</sup>美國陸軍軍事法庭審理了一百七十萬件案子，絕大多數是戰場微罪，監禁的逃兵總數是兩萬一千人。

除了壓迫之外，軍隊還必須採取正面獎勵來維持士氣，以精心安排的激勵措施來加深士兵的參與感。這些激勵士兵的做法包括提供常態性的政治教育或提振士氣的講話。在這一層面上，獨裁國家同樣表現得比民主國家更為積極。蘇聯軍隊在一九三九年改革之後，在每支部隊都設置了一名軍事政委，負責提升士兵的政治意識、糾正政治偏差與懲罰政治反常行為。莫斯科當局會決定軍中討論與宣傳的議題，士兵們必須參與討論。即使政委的戰場角色在陸軍高層的堅持下於一九四二年遭到降

低，但政治教育依然繼續維持。蘇聯陸軍發行的單張報紙《紅星》

（*Red Star*），裡頭既有戰爭報導，又有當前意識形態課程。這份報紙在當時發行了數百萬份，所有部隊都會收到。蘇聯的戰時文化充斥著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然而這些故事很少完全真實——渲染這些故事是為了在個別士兵與理想典範之間建立一種情感連結，鼓勵士兵做出無私的英勇行為。數百萬名立下戰功的男女士兵，可以迅速取得共產黨員身分。<sup>88</sup>德軍也重視政治教育與提振士氣，透過這兩項工作鼓勵士兵認同德國的生存鬥爭、支持對猶太人的戰爭，以及擁護納粹黨的「民族共同體」價值。一九三九年四月，德軍成立政治宣傳部，負責組織宣傳連，提升軍心士氣與提供前線將士閱讀材料。一九四〇年，德國陸軍根據四項基本原則公布了教育方針：「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帝國」、「德國生存空間」與「國家社會主義為基礎」。<sup>89</sup>一九四三年十月，當蘇聯軍隊開始降低政治教育的比重時，希特勒反而設立了國家社會主義督導處，負責在軍中安插政治軍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德軍總共有一千零四十七名的全職政治軍官，四萬七千名兼負正規軍事需求與士氣提振任務的兼職政治軍官。<sup>90</sup>

我們很難判斷這種提供教育與提振士氣的做法是否真有助於協助士兵認同戰爭目標與維持紀律。某方面來說，所有士兵都瞭解對抗敵人與求勝的必要性，但光靠這些不足以讓軍隊撐過日復一日的漫長等待或危險。蘇聯士兵時常因戰鬥而精疲力竭，此時就算情感上支持戰爭也無濟於事，哪怕士兵都曉得失敗主義言論或政治異議將會受到懲罰。一名紅軍士兵表示：「你變得無動於衷，甚至覺得活著沒什麼意義。」<sup>91</sup>到了一九四四年，即便是當初懷抱理想且確實胸懷熱忱的德國士兵，此時也感到幻滅與絕望。一九四四年七月，一名年輕德軍戰車兵在日記裡寫道，他與戰友「之所以還繼續作戰，只是因為他們被灌輸了責任



感。」<sup>92</sup>光憑理想顯然無法支撐在史達林格勒戰場上的士兵。一名士兵在最後幾封信上寫道：「從來沒有人提過，我的戰友們死前是否嘴邊還掛著『德國』或『希特勒萬歲』這樣的詞彙。」<sup>93</sup>只有美國陸軍對士兵是否瞭解自己為何而戰進行調查。在接受調查的人當中，太平洋戰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士兵表示自己根本不關心為何而戰，歐洲戰場則是百分之四十。當蓋洛普民調請士兵說出羅斯福總統誓言以戰爭捍衛的四大自由是哪四大時，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士兵能答對至少一個。<sup>94</sup>一名退伍士兵告訴陸軍研究局，他剛加入軍隊時「愛國心溢於言表」，但戰爭改變了他：「你是為了活命而戰.....戰場上根本沒有愛國主義可言。」<sup>95</sup>英國陸軍教育服務部門發現，軍人只有在戰勝之後會比較願意討論這個世界，但與士兵們討論戰爭目標或為了戰勝而奮鬥只會引發負面反應。政治教育與提振士氣也許要比紀律壓迫更能讓士兵願意作戰，但正向鼓吹是否能夠動員士兵，使他們克服眼前的恐懼、絕望或危險，依然是個很大的疑問。

對敵人訴諸於集體仇恨的效果也是如此。我們想當然耳地假設，仇恨是戰爭最具代表性的特徵，因為有許多證據都顯示，仇恨在某些時刻（或者更適當地說，是突然產生的憤怒）會激勵人們為同袍之死復仇，或讓人有勇氣面對無情的狙擊手或機關槍，或對敵人的戰爭罪行進行報復。中日戰爭的日記經常記錄著各種油然而生的仇恨，寫日記的人以此來自我激勵，讓自己能夠面對危險與隱藏在暗處的敵人<sup>96</sup>。然而，同時也有許多證據顯示，對部隊灌輸仇恨雖然可能提升戰力，但也存在缺點。一九四〇年，英國一名著名心理學家表示，仇恨「斷斷續續且反覆無常」，這種情緒很難長時間維持。<sup>97</sup>一九四二年，英國陸軍決定設立戰爭學校，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說法，這些學校將進行仇恨訓練，「教導士兵.....仇恨敵人與善用仇恨」。然而當仇恨訓練涉及到參觀屠宰

場，而役男還要被鮮血噴濺全身時，開始有民眾對此表示不滿。這種做法在時任英國本土東南區司令的蒙哥馬利反對下叫停，他認為以仇恨來動員戰爭情感完全是徒勞無功。<sup>98</sup>一九四三年，社會人類學家多拉德（John Dollard）針對戰爭的恐懼進行研究，他發現在九種激勵士氣的方式中，「仇恨敵人」排行第八，只比「保持忙碌」高了幾個百分點。<sup>99</sup>美國陸軍的士氣調查顯示，四成駐歐士兵認為仇恨完全沒有激勵作用，而這個數字在太平洋戰場則是三成——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受到的仇日宣傳特別多。<sup>100</sup>仇恨的情緒是相互的。日本士兵持續受到對抗「野蠻」美國人的仇恨宣傳。戰後美國對日本士氣的調查顯示，四成日本士兵表示對美軍極端仇恨、憤怒與輕視，只有十分之一沒有仇恨情緒。<sup>101</sup>

如果想理解軍人如何面對戰爭的情緒需求且在壓力下不至於情緒崩潰，比較實際的做法就是觀察軍人們最基本的日常經驗。武裝部隊顯然不是完全同質性的群體，而是由數千個小型軍事社群組成的混合體，例如步兵連、潛艦官兵、砲兵單位或轟炸機機組人員。許多討論戰時士氣的研究，都強調前線接戰部隊的重要性，將其視為忠誠、投入戰鬥與情緒支持的重點。絕大多數的前線士兵，甚至包括軍官在內，根本不知道前線以外的部隊如何戰鬥，也不知道自己在整個大戰略裡扮演什麼角色。各種資訊都經過篩選，前線士兵只會知道與自己特定軍事行動有關的資訊。對於駐守在遙遠太平洋島嶼、新幾內亞或緬甸叢林裡的日軍士兵來說，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己方是否正在贏得這場戰爭，而且官方說法（如果他們接收得到的話）總是樂觀。只有歷史學家才有綜觀全局及評估成果的特權。從日常例行經驗來說，絕大多數士兵的首要之務，就是支持自己所屬的小團體，因為這樣才能提高生存機會。作戰人員關心的都是相當日常的事務，例如德國的戰車兵會因為損失戰車而哭泣。每

個小團體構成了社會心理學家所說的「義務的宇宙」，各成員的生存仰賴成員彼此之間的相互幫助。<sup>102</sup>你共享基本道德與情感的對象，是那些與你一起分攤相同危險的人，而非更廣大的社群或義務。雖然經常有人主張士氣的形成是由上而下，但在實際上，士氣往往源自於底層的自我激勵。

在小團體的脈絡底下，往往有著一套截然不同的情緒反應。士兵能夠堅守崗位，往往是因為對自己所屬的團體投入了情感與忠誠，也擔心自己未能盡忠職守或精神崩潰，可能讓自己蒙羞與產生愧疚感。二戰這場數百萬人參與的真實勇氣測試，顯示堅守崗位並非某種隨機的英雄主義行為，而是一種克服無所不在的恐懼與為了周遭人堅持下去的能力。一名美軍退伍士兵寫道：「害怕與懦弱的差別僅在於是否被人發現。」<sup>103</sup>即使是傷兵也不願讓人發現他流淚，因為在陽剛的軍事文化中，眼淚會讓他被貼上軟弱的標籤。<sup>104</sup>精神科醫生發現，身體與精神受創的人，通常會對自己的忍耐力不足感到羞愧，急欲在同袍面前再次證明自己的能力。針對美軍士兵的調查也發現，歐洲與太平洋兩大戰場的士兵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七認為，不讓身旁戰友失望才是最重要的事。一名退伍士兵說道，無論戰爭的宗旨有多崇高，「都遠不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sup>105</sup>針對蘇聯與德國軍隊所做的社會學研究顯示，小團體的凝聚力極其重要，雖然嚴重死傷可能讓團體迅速瓦解，但團體往往也能在必要時藉由新兵加入而起死回生。就算過去損失慘重，團體依然能找回自己的認同。<sup>106</sup>評論者正確地指出，這種情感紐帶關係也有可能存在於更大的團級甚或師級部隊之中，藉由信仰主流意識形態或價值體系而激勵出來。儘管如此，對於那些直接參與戰爭的基層部隊來說，這些都是外在因素。無論部隊成員來自什麼階層、個性或外貌有何差異，對部隊凝聚力的影響都比不上內部成員的情感投入。<sup>107</sup>好比盟軍

的轟炸機機組人員在轟炸德國時蒙受了嚴重損失，但新兵們只要上了同一架飛機，即使機組人員之間沒有時間建立紐帶關係，機內的封閉環境也會讓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為了生存而緊密合作。因此，無論心理學家如何解釋，機組人員都必須在作戰前盡快改善彼此的薄弱連結，避免影響其他機組人員。<sup>108</sup>每個小部隊都是獨特的，不可能完全相同。他們會出現任何團體常見的情緒緊張，也會因為心理崩潰或軍事災難而瓦解。儘管如此，戰場環境卻能讓這些臨時組建的小部隊凝聚起來，而大規模的武裝部隊正是在這些小部隊組成下才能進行作戰。

在這類小型連帶關係中，左右日常生活品質的往往都是很簡單的事物。例如所有單位都會關注的糧食與資源（即使物資缺乏，人們通常也不會因此停止戰鬥）。為此，掠奪資源就是一件隨時可能發生的事，特別是掠奪糧食。每支軍隊都會掠奪，德軍在二戰時期的第一次掠奪就發生在一九三九年入侵波蘭的時候。<sup>109</sup>少量的物資補充，無論再怎麼微薄，都能對每支小部隊的士氣產生重要的影響。即使是最偏遠的前線，英國陸軍也會費盡心力將茶運送過去，讓當地士兵能夠泡茶飲用——當美軍與大英帝國自治領的部隊發現英軍士兵即使作戰也要喝茶時，不難想像他們有多麼吃驚。蘇聯當局則認為，向部隊大量分發免費的口琴，可以讓疲倦而沮喪的軍隊提振士氣。<sup>110</sup>部隊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會竊取酒類與藥物來麻痺自身的恐懼。許多蘇聯士兵飲用甲醇或防凍劑，結果死於後遺症。派往義大利的盟軍士兵則持續仰賴中東港口輸入的麻醉藥物。日本士兵則選擇飲用軍方發放的大量酒類，藉此麻痺掉戰場的恐怖。<sup>111</sup>對於遠離故鄉的男性來說，另一個大問題就是性生活的缺乏與剝奪。各國軍方於是對士兵買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是自行設立軍妓院，分發避孕用品給士兵以避免性病傳播。日軍無情地在中國與東南亞設立性奴役場所，那些所謂的「慰安婦」形同關進牢裡的犯



人，定期遭受日本士兵強姦，而蘇聯紅軍四處掠奪與強姦的惡名更是眾所皆知（日本與蘇聯的此類惡行將在下一章深入探討）。<sup>112</sup>不是只有單身漢才有滿足性欲的問題，已婚男子也有，但已婚男子面臨的情緒問題更加多樣。公認對軍中士氣最不利的因素之一，就是想念遠在家鄉的妻子與家人，卻沒有機會返鄉。美國婦女因此承受了廣大的公眾壓力，認為她們必須對派往海外的丈夫保持忠誠，但這卻帶來好壞參半的影響。例如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美國紅十字會就曾公開譴責那些寄信給前線士兵抨擊其妻子不忠的民眾，認為此舉將傷害美軍士氣。各國都做出龐大努力，以維繫後方與前線的信件往返。德國建立了特別快遞服務，讓前線將士知道後方家人在盟軍轟炸下仍平安無事。無法收到故鄉的信件，不知道家人的安危，對士氣的影響遠大於即將到來的戰鬥。<sup>113</sup>

軍中的日常生活必然有許多小小的愉快與焦慮，而軍中的男性與女性也發展出一套應對之道。舉例而言，軍中就很常見到迷信與護身符。美國潛艦官兵會隨時攜帶一尊小佛像，在戰鬥之前會撫摸佛像的圓肚皮祈求好運。士兵有時也會相信護身符會保護他們不受傷害。雖然精神科醫生認為這種依賴是一種危險跡象，顯示士兵可能正面臨精神疾病的危機，就像其他傷亡的士兵在面對死亡時產生了宿命論，對自身的生死麻木不仁。儘管如此，迷信顯然可以讓一些士兵克服面臨的壓力。<sup>114</sup>對一些人來說（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軍隊裡的宗教確實可以幫助士兵面對作戰帶來的恐懼，宗教的重要性也因此與日俱增。日本士兵知道戰死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但這是否能讓日本士兵更能面對死亡仍有待討論。蘇聯軍中原本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關係而排除宗教，但史達林在戰爭期間放鬆了對宗教儀式的攻擊，重新開放教堂，無神論者也放緩了對宗教主張的猛烈攻擊。儘管如此，上帝卻不一定是蘇聯士兵訴求的首要對象。在德國，納粹政權對宗教的敵視反映在陸軍總部為了讓

牧師能夠進入軍隊而進行的長期抗爭。納粹高層最後僅同意大約一千名牧師為六百萬名陸軍士兵服務，而這些牧師在前往前線時也充滿各種限制。<sup>115</sup>宗教對德國士兵的影響可以從史達林格勒殘存的信件看出：士兵一方面祈求上帝拯救，另一方面戰時經驗也粉碎了他們的信仰。

相較之下，美軍與大英帝國部隊有較多的隨軍牧師進駐，也對宗教儀式比較不抱持偏見。美軍有八千名來自各個教派的隨軍牧師，英軍則有三千名，數量較少的加拿大陸軍也有九百名。英國牧師會在「牧師時間」固定討論特定主題，例如「我們能相信永生嗎？」到了一九四一年，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臺牧師節目已擁有七百萬名聽眾。美軍隨軍牧師收到大量請求，希望他們能給予安慰與支持，有些隨軍牧師一天訪談的士兵多達五十名。艾森豪將軍堅持「宗教開導」也要寫進軍隊的醫療紀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對美軍士兵進行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九的受訪者表示，戰爭使他們更相信上帝。對駐歐美軍進行的調查也發現，高達百分之九十四的士兵認為，禱告對於排解戰鬥壓力很有幫助。<sup>116</sup>對於來自宗教氣息濃厚國家的士兵來說，「散兵坑宗教」的強烈吸引力，<sup>[1]</sup>引發了士兵在遭遇危機時是否真能進行隨軍牧師所說的「真實禱告」的爭論。然而對士兵來說，真正重要的不在於他們的信仰有多虔誠，而在於禱告可以暫時舒緩戰鬥帶來的長期恐懼。戰爭結束後進行的研究顯示，禱告確實有減緩壓力的效果。<sup>117</sup>對於在戰場前線倖存而且還能繼續戰鬥的士兵而言，禱告確實使他們從衰弱無力的心理影響中恢復過來。

## 後方民眾的情緒

身為徵召兵源的交戰民眾同樣承受情緒壓力，但歷史學家向來只注重軍隊士氣的心理面向，很少關注後方民眾的情緒問題。恐懼與不確定感同樣揮之不去，差別只在於民眾以不同的方式感受這些情緒，而且鮮少以持續的情緒狀態呈現。分離焦慮、擔心聽到家人死亡或受傷的消息、對敵人感到憤怒、對未來感到絕望，而這一切又與日復一日國內生活的現實情緒混合在一起。後方民眾感受危險或剝奪的程度，因國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好比美國社會從未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不過美國精神醫學學會還是於一九三九年開始協助美國人面對戰爭帶來的「不安全感與恐懼」，更在一九四〇年成立了全國士氣委員會以協助建立「緊密而持久的情緒共同體」。<sup>118</sup>另一方面，蘇聯社會則深陷於漫長工時的生存掙扎，稀少的糧食供給，以及前線吸收了絕大多數的蘇聯男性。其他國家往往介於美蘇這兩大極端之間，其民眾飽受轟炸之苦，前線的戰爭經驗因此被帶到了大後方。在戰時，英國、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的城市居民長期受到敵軍的猛烈轟炸（累積死亡的平民人數達到七十五萬人）。而在法國與歐洲其他被軸心國控制的地區，雖然工業與戰術目標才是盟軍轟炸的重點，但此等大規模轟炸同樣不可避免地造成民眾的慘重傷亡。整個二戰期間，將近一百萬名平民在轟炸中喪生，重傷的平民人數也同樣在一百萬左右，其中的原因已經在第八章做了充分討論。<sup>119</sup>唯有集中營與強制流放帶來的心理創傷，能夠跟反覆轟炸產生的情緒經驗相比。

早在二戰於一九三九年爆發之前，就已有許多人提到民眾士氣很可能在未來戰爭中成為打擊目標，而且敵軍不僅會丟下正規炸彈，還會使用毒氣彈與生化炸彈，迫使驚恐的民眾要求政府談和。許多二戰前的流行作品在提到未來戰爭時，總是強調平民的心理脆弱性——除了缺乏軍人一般的訓練，也無力反擊空襲，因此很容易陷入大規模恐慌與情緒

崩潰。政府開始察覺，如果民眾遭到轟炸，特別是工廠工人在驚慌之下「擅離職守」，進而影響戰時經濟，將對未來的戰爭投入形成潛在的負面影響。各地於是陸續建立民防與防空設施，可能遭到轟炸的社區也準備救難物資與防空洞，醫療設施也做好準備以因應轟炸後可能出現的精神創傷病患。英國與德國的精神科醫生同樣認為，轟炸過後除了身體創傷，也會出現精神崩潰的現象。不少精神科醫院因此開始淨空病人，準備收容戰時傷患。<sup>120</sup>

當遠程戰略轟炸開始在一九四〇年固定出現時，被空襲民眾的情緒狀況似乎沒有原先預期的那麼嚴重。城市居民並未陷入大規模恐慌，精神科醫院也未擠滿嚴重情緒創傷的病患。德國轟炸英國期間，心理學家與精神科醫生開始研究為什麼很少出現慢性或持續性精神障礙的病例。<sup>121</sup>針對一千一百名固定躲在同一處防空洞的倫敦市民所進行的研究顯示，只有百分之一點四出現長期心理問題。英國精神衛生緊急委員會的一名官員巡視在一九四〇年九月遭到猛烈轟炸的倫敦東區，發現「沒有明顯的情緒創傷病例」。<sup>122</sup>一九四一年，英國國土安全部對遭到猛烈轟炸的港口城市赫爾的精神衛生進行調查，結果精神科醫生在報告中指出，他們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歇斯底里」的病例（先前預期最可能出現的狀況），因此認定赫爾市的民眾精神狀況穩定。<sup>123</sup>絕大多數英國精神科醫生都因此認為，少數精神崩潰的民眾可能就像一些徵召入伍的士兵一樣，是出於先天體質的原因。一項針對「空襲恐懼症」的研究證實，少數被送到醫院的精神創傷病患全都有精神官能症病史。<sup>124</sup>奇特的是，部分精神病患反而因為空襲壓力而出現病情好轉的跡象，有人因此認為這就像被虐狂享受身體被虐的狀況一樣。<sup>125</sup>其他國家被轟炸居民的反應也與英國相去不遠。一九四五年，美國轟炸調查團訪談德國精神科醫生的結果顯示，德國診所很少看到「器質性的神經病症或精



神病症」。即使在日本，研究人員也發現，在廣島與長崎被投下兩枚原子彈之後，儘管民眾對於未來依舊有著長期擔憂的情形，但並未出現憂鬱症病例大增的現象。與英國和德國經驗一樣，日本人在空襲期間接受精神病治療的病例並未明顯增多。<sup>126</sup>

慢性精神疾病的病例與收容治療的病例數量極少，這種現象其實掩蓋了殘酷的現實：空襲所導致的精神創傷人數，其實被負責計算的專業醫生給低估了。部分原因在於許多精神科醫生被徵召入伍，導致只剩為數不多的精神科醫生負責照顧人數龐大的民眾。儘管戰時軍陣精神科醫生的數量大增，但為一般民眾看診的精神科醫生卻未能進行補充。各國政府也不鼓勵民眾到精神科看診，以免造成醫院過度負荷。部分資深的英國精神科醫生抱怨，民眾總是誇大自己的症狀，明明只需要一杯茶與制式對談就能打發病人離開。<sup>127</sup>前述因素加總的結果，就是短期精神創傷、嚴重身心失調反應者或甚至是出現慢性精神障礙的民眾，絕大多數都只能靠自己解決情緒危機。與士兵一樣，許多民眾的休克反應都被官方認定為器質性而非心理性的，因此病患若就醫就會被歸類為內科而非精神科傷患。英國針對布里斯托遭到空襲的兩條道路上的一百名民眾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除了大量民眾出現可以透過藥物治療的身體受傷反應之外，那些有明顯精神症狀反應的民眾卻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的狀況。<sup>128</sup>

這類精神受創的民眾在英國被歸類為「短期創傷精神官能症」，在德國則被歸類為「短期反應症狀」。這些民眾的人數無法確切估計（一名英國心理學家認為，實際人數至少比確診病例多上五倍），但從既有證據可以看出，空襲造成的情緒反應導致了廣泛的精神創傷（儘管通常是短期創傷）。與士兵一樣，精神科醫生發現最有可能出現精神創傷的病例，其實不一定與體質有關，反而與差點遭到活埋、房子被毀或家人

被殺等所謂「跡近錯失」（near miss）的戰時經驗有關。促使情緒反應加劇的關鍵因素，在於這些經歷是否切身，這一因素也獲得戰後德國精神科醫生的訪談確認。<sup>129</sup>某方面來說，這些病患的症狀與遭受猛烈轟炸或砲擊的士兵類似：嚴重顫抖、小便失禁、感官與行動出現障礙、木僵狀態、明顯憂鬱，婦女則出現閉經。身心失調的反應很常見，包括短暫性失語、喪失聽覺、手腳麻痺，或者在德國常見的例子是消化性潰瘍。<sup>130</sup>針對英國赫爾市進行的調查顯示，儘管精神科醫生做出了相對樂觀的結論，但其他證據卻呈現出廣泛的情緒障礙病例。一些女性受害者表示，她們只要一聽到空襲警報就會昏厥、小便失禁或嘔吐；男性受害者則坦承出現明顯的消化不良、失眠、憂鬱、酗酒與易怒。絕大多數民眾拒絕看醫生，男性則在數天或數星期後回到工作崗位，儘管仍舊處於焦慮狀態。<sup>131</sup>赫爾市的狀況就跟其他被轟炸的城市一樣，空襲造成的精神疾病被當成私人危機來處理。美國作家史特恩（James Stern）是美國士氣團隊成員，他接受徵召前去訪談德國境內的空襲受害者，而他把前述的現象稱為「隱藏的傷害」（hidden damage）。<sup>132</sup>戰後部分研究顯示，劇烈創傷的經驗對民眾的影響是長久持續的，例如史特恩在德國訪談女性受害者時發現，這些婦女只要一聽到突如其來的聲響就會顫抖哭泣。一九四八年，在列寧格勒工作的醫生發現圍城倖存者出現了「列寧格勒緊張症候群」。這點或許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飢餓、砲轟與空襲皆有可能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sup>133</sup>

政府最擔心的，仍舊是空襲可能引發群眾恐慌與士氣崩潰。然而，即使是最糟糕的狀況下，社會也沒有在轟炸之下癱瘓。遭受轟炸的可能，與轟炸後的殘破景象，確實讓民眾感到恐懼，也因此引發短暫恐慌。但與無法離開駐地的軍隊不同，民眾的恐懼會驅使他們離開受轟炸的地區。於是，民眾紛紛在遭受猛烈轟炸之後離開城市，疏散到鄰近的

鄉村與村落。這是理智的決定，而非恐慌的行為。一些英國城市遭到德國猛烈轟炸，導致居民出逃，特別是南安普敦、赫爾、普利茅斯或克萊德班克等比較小型的都市圈。部分德國城市也是如此，在遭到轟炸後出現了德國當局不樂見的民眾逃離城市的景象（儘管就短期而言，這種離開城市的現象實在難以避免）。一九四五年的日本城市也是如此，在燃燒彈襲擊下，民眾開始逃往鄉村地帶。每個被轟炸的國家都會提出官方疏散計畫，以防止逃離城市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在英國，大約有一百萬名女性與兒童被疏散；在義大利則是大約兩百二十萬人。相較之下，德國在戰爭結束前疏散的總人口數達到將近九百萬人，日本也有八百萬人。政府原先擔心人口大規模轉移可能會破壞戰時經濟，然而這種說法毫無根據。英國的勞動力研究顯示，在空襲後的幾天，所有工人都回到工作崗位，即使他們必須在工作地點與鄉村之間長途跋涉。在德國，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猛烈而持續的轟炸並未造成嚴重缺勤，也只有百分之二點五的工時損失與轟炸直接相關。到了一九四四年三月至十月，德國戰時經濟產業的總工時實際上反而是增加的，只不過這也必須考慮到該年有許多新勞工是外籍工人或來自於集中營的囚犯，而這些人即使遭遇空襲也必須待在工廠繼續工作。<sup>134</sup>

有許多理由可以解釋被轟炸的城市為什麼沒有出現士氣崩潰。原因之一來自於政府當局在建立「情緒規範」上扮演的角色。情緒規範鼓勵民眾接受犧牲，避免流露情緒而影響民心士氣。各國的情緒規範不盡相同，而這些規範多少反映了各交戰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在日本，死亡與犧牲的文化深深影響日本政府的政策，使其將民眾情緒與符合軍隊的戰爭投入結合成一體。<sup>135</sup>英國在遭受德國轟炸期間，當時流行的宣傳語「英國承受得住」，巧妙運用了英國人面對危機時冷靜而有決心的刻板印象。從英國遭到轟炸的城市圖像可以看出，早晨，民眾依然在瓦礫堆

之間步行上班，或婦女心情愉快地拿著圓形馬克杯喝茶。<sup>136</sup>在德國，獨裁政權強調民眾與士兵結合成「命運共同體」，在面對攸關民族的生存鬥爭時，個人的焦慮必須放在一邊。政治宣傳的影像顯示，人民在面對集體的共同犧牲時顯露出來的肅穆決心，以及人民病態地執迷於英雄式的死亡。德國陸軍拒絕讓有精神病的士兵退役返回德國，因為這麼做可能會影響到國內民眾，使前線非英雄式的崩潰現實暴露在民眾面前。蘇聯政權也強調集體犧牲與英雄事蹟，只不過做法不像德國那麼病態。<sup>137</sup>

對於遭受轟炸的平民與士兵家屬來說，死亡是個揮之不去的現實。然而，當經過安排的葬禮傳達的是公眾決心而非集體悲傷時，死亡與民眾的實際情緒之間便隔出了一段距離。在日本，整個鄉里會用精心安排的儀式來讚頌逝去的「英靈」。在英國，死去民眾的圖像要接受審查，而民眾在轟炸期間的詳細傷亡數字也會被有意隱瞞或限制，以避免民眾恐慌。<sup>138</sup>公開流露歇斯底里的情緒是不被允許的，當這種事發生在防空洞時，民防人員會把違反者帶走。「情緒規範」成為民眾的模範，民眾可以藉此鍛鍊自己消極忍受與穩定情緒的能力。個人如何調整自己的情緒狀態以順應現實的戰時規範，其程度往往因人而異，規範架構只是提供了建立正面士氣所需的框架。有了規範架構，民心士氣就不至於偏離太遠。公共形象與私人行為在社會壓力與官方要求下不得不盡量一致，有些人無法承受相應而生的壓力，因而出現了情緒障礙。這些人必須像前線戰鬥的士兵一樣，接受協助或規訓。

物資援助對處理空襲所衍生的問題至關緊要。赫爾市的精神科醫生就認為，「赫爾居民的精神能否穩定，取決於他們是否能攝取充分營養。」國家努力提供糧食、救助、補償與重建計畫，最終避免了更大範圍的社會抗爭或示威。政府在休養中心與急救站成立了「前進精神醫



療」，試圖直接協助受害的民眾。與前線戰場一樣（不過這完全是巧合），休養中心與急救站可以提供糧食及睡眠，民眾可以在此交談，分享最近的糟糕經驗，儘管此處無法提供正式的精神治療。英國的精神科醫生對於受害民眾採取的往往仍是陳舊呆板的治療法，包括使用老掉牙的「精神急救」——嘴裡講著堅定的話語，用手拍拍病人的背來打氣。對官方來說，隱藏恐懼不讓他人知道被視為最重要的事；官方也同樣宣稱，只要靠著一包餅乾糖果或喝一點白蘭地，就可以讓激動的人冷靜下來。<sup>139</sup>醫界也把社區防空洞視為小型的自助團體，認為人們可以在地下社區生活組織的合作下，坦誠說出自己內心的恐懼。在德國，即使是遭受最嚴重轟炸的地區，防空洞也被精神科醫生認定是「精神治療」的適當場所，認為人們可以在此控制情緒，協助崩潰的人克服恐懼與休克。<sup>140</sup>精神科醫生指出，定期遭受轟炸的平民，會逐漸對空襲養成習慣——這點與在前線戰鬥的士兵不同，士兵不可能習慣持續暴露在槍林彈雨之中，因為這反而會對戰力產生反效果。戰後在德國進行的調查顯示，高達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訪者表示，只要被轟炸過一次，就不會對接下來的轟炸感到那麼害怕。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因此感到更加恐懼。<sup>141</sup>針對倫敦大轟炸期間英國民眾的兩次民意調查都顯示，民眾最害怕的其實是糧食供應受到威脅。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民意調查中，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民眾認為轟炸本身是他們最害怕的事，四個月後只剩下百分之八。<sup>142</sup>

與前線士兵一樣，許多民眾也仰賴各種方式來克服恐懼，包括迷信、護身符，或是抱持宿命論及對生死無動於衷的態度。日本民眾以為把洋蔥放在頭上就可以避開炸彈，英國商店裡擺滿了「招好運」護身符及幸運咒語。一九四一年，英國大眾觀察組織針對迷信進行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四的女性受訪者與百分之五十的男性受訪者承認他們受迷信

影響。<sup>143</sup>有一則盛行於德國與義大利的迷信是這樣子的：兩國民眾相信自己是因為兩國政府犯的罪而遭受懲罰，因此唯有「善行」才能讓轟炸機無法靠近他們。義大利還有一個強大的迷信，據說有一架不知從哪裡來的飛機被人們稱之為「皮波」（Pippo），這架飛機會飛過義大利半島上的城市，尋找要懲罰的壞人；有些說法更宣稱「皮波」會向民眾警告即將有敵機來襲。<sup>144</sup>遭受轟炸的民眾也會用宿命論的方式來面對內心的恐懼，包括相信炸彈上「寫著自己的名字」因此怎麼樣都躲不掉，或是內心產生一種特殊的應對機制——有位精神科醫生把這種機制稱為「無敵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民眾，會做出非理性的冒險舉動，因為他們已經把個人生死完全交託給超自然力量。<sup>145</sup>

有些民眾也跟士兵一樣，會在面對如雨點般落下的炸彈時仰賴宗教的保護與安慰。許多地方都能看到有愈來愈多人上教堂，或者民眾愈來愈依賴禱告。但轟炸也限制了宗教儀式的進行，因為教堂也會被炸彈炸毀，信眾們也因此四散。希特勒曾經下令，要求德國教會儀式不可以影響民防工作與空襲後的重建工作。一九四三年，萊茵蘭主教向希特勒請願，希望鬆綁禁令，讓民眾可以透過教會紓解空襲造成的「巨大心理與神經壓力」，結果遭到希特勒拒絕。<sup>146</sup>相較之下，一九四〇年代的英國已經是一個相當世俗的國家，因此宗教在英國無法跟其他國家一樣扮演撫慰人心的角色。雖然英國曾經舉行「危機祈禱」，每年九月也訂定國家祈禱日，但願意上教堂的人數仍從一九四二年之後不斷減少。<sup>147</sup>宗教對天主教社群往往能發揮比較大的影響與安慰，因為天主教有透過禱告尋求安慰的文化，可以向上帝懇求幫助，聖人的介入也很容易融入當前空襲的環境。在遭受空襲威脅的義大利城市，家家戶戶都立起了小小的聖母像或地方聖人祭壇，希望藉此避開炸彈帶來的危險。民眾也為空戰禱告，懇求聖母馬利亞能讓盟軍的轟炸機掉頭轉向。如果在廢墟中發

現完好的聖母雕像，信眾會認為這是獲得拯救的奇蹟。在義大利北部城市弗利（Forlì），四萬名民眾排隊朝拜在轟炸後毫髮無損的火焰聖母像。馬利亞崇拜逐漸在德國與義大利掀起熱潮。當一名農村少女在義大利城市貝加莫（Bergamo）附近宣稱看到十三個聖母異象時，數萬名義大利人蜂擁而至尋求保護或安慰，或祈求戰爭早日結束。官方表示異象與奇蹟都無可佐證，但對許多義大利天主教徒來說，教會已經逐漸取代國家，成為在轟炸之下提供實際幫助與心理寬慰的主要來源。<sup>148</sup>



在平民受害光譜的另一端，有數百萬人捲入流放、種族滅絕、大屠殺與廣大德蘇戰場的漩渦之中。這裡不存在「前進精神醫療」，沒有人試圖閃躲最極端的創傷壓力，也沒有人關切情緒規範或刻意的病態行為。在缺糧、持續受到轟炸的列寧格勒，一名倖存者寫道：「死亡統治了一切。死亡舉目可及，人們已經習慣了，對此無動於衷……憐憫消失殆盡，沒有人在乎。」<sup>149</sup>從殘存的回憶錄、口述證詞或當時的日記與信件，我們可以設法蒐集到數百萬名受害者的情緒或心理狀態，然而這些訊息完全沒有提到加害者，死去的數百萬人也未對此留下任何紀錄。歷史學家只能從片段零星的紀錄，追溯人們在毫無節制的暴力（不同於戰場上有節制的暴力）與最原始暴行下的創傷反應。那位列寧格勒的日記作家寫道：「我們回到了史前時代。」<sup>150</sup>

當蘇聯紅軍解放了被德軍占領兩年多的蘇聯西部地區時，蘇聯精神科醫生突然有了捕捉情緒創傷程度有多嚴重的機會。他們發現數千名因占領軍暴力而深受創傷的兒童，他們因此將焦點放在這些兒童的心理狀態。占領軍的恐怖統治不僅針對成年人口，而是連他們的孩子也不放

過。德國占領者把孩子當成游擊隊嫌疑犯或潛在的強制勞動者（有些孩童甚至只有九到十歲），以殺害孩子為樂，如果是女孩，就將她們送進野戰妓院。許多孩童淪為孤兒，被迫在街頭乞討甚至偷竊為生，這也使他們成為占領者無情虐待的對象。<sup>151</sup>對於數百萬在戰火中求生存的人來說，這就是占領區的日常生活。在解放區，蘇聯醫生找到最極端的精神崩潰病人進行治療，並且發現有孩子曾經目睹父母或鄰居被殺，有孩子見證所有村民全被關在建築物裡活活燒死，有孩子看到折磨與肢解的場面。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進行的大規模研究顯示，「持續生活在恐懼與焦慮中」的孩子，要不是表現出昏厥、夢遊、尿床、頭痛、極度易怒等傳統焦慮症狀，就是展現出麻痺、神經性抽搐、口吃、失語或木僵狀態等身體反應。報告指出，這些兒童病患在安全平靜的環境下會做出合理的回應，但反應症候群仍持續存在。只要出現巨大的聲響或爆炸聲，就會讓這些孩子出現噁心感、大小便失禁、顫抖與嚴重出汗等反應，非常類似有些人在空襲後出現的症狀，那些因為作戰而精神受創的士兵也會如此。<sup>152</sup>即使危險狀態已經消失很長一段時間，極端恐懼產生的心因性反應還是會繼續顯現。由於蘇聯的精神醫學單位缺乏人力及物力，因此只能針對少數受害的孩童進行治療。

被解救的蘇聯兒童中，有少部分是逃過種族滅絕的猶太人。遭遇過猶太大屠殺的受害者之中，只有極小部分到了一九四五年時仍然倖存，人稱「倖存的殘餘者」（She'arit Hapleta）。當時的蘇聯當局幾乎沒有對這些倖存者的情緒狀態進行治療或研究，部分是因為絕大多數倖存者顯然更迫切需要身體醫療而非心理治療，另一個原因則是出於蘇聯的「解放」文化。解放予人一種幻覺，彷彿創傷的經驗就此完結——即便對這些快要餓死且腦袋昏昏沉沉的集中營囚犯來說，「解放」兩字根本沒有任何意義。<sup>153</sup>在歐戰結束後三個星期舉行的「解放音樂會」



上，曾在一間滿是猶太病患的醫院工作的格林伯格（Zalman Grinberg）如此寫下經歷這場苦難之人的情緒狀態：

我們屬於在集中營裡被毒死、被絞死、被折磨、被餓死、被強迫工作與被凌虐致死的那群人.....我們並未活著，我們依然是死人.....今日的世人並不瞭解我們在這段時間遭遇與經歷了什麼，未來也不會瞭解。我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笑，也不知道該怎麼哭。我們不瞭解自由是什麼，這或許是因為我們依然置身於我們死去的同胞之中。<sup>154</sup>

對於絕大多數同胞都已遇害的倖存者來說，自己依然活著的事實往往使他們產生愧疚或羞恥的情緒。不僅如此，他們還得面對親友們確實已經逝去的痛苦（往往是在事件許久之後才真正有感）。在收容流離失所者的營區裡，猶太倖存者的精神往往十分低落，一名觀察者表示，這些人「一直感到恐懼、焦慮與不安」。管理營區的官員發現，這些倖存者會出現搗亂、神經質與不合作的行為，包括尿床、心智年齡退化、輕微竊盜與衛生習慣不佳，這些都明顯反映出嚴重創傷與持續處於不確定狀態下的精神疾病反應。<sup>155</sup>但相較於這些負面情緒，更令人驚訝的或許是這些營區裡的猶太倖存者對於重建猶太文化社群的高度興致。官員們一度擔心集中營造成的精神創傷很可能導致猶太人陽痿或永久不孕，但到了一九四八年，猶太倖存者卻已經有著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率，達到戰後德國人的七倍之多。<sup>156</sup>

直到二戰結束的一年後，心理學家才獲准造訪位於德國的流離失所者營區，這些營區收容了絕大多數倖存的猶太人。當時的西方把更多興趣放在瞭解加害者的情緒狀態上，例如辨識與描述所謂的「納粹的心靈」，而非試圖認識加害行為對於受害者的情緒層面究竟有何影

響。<sup>157</sup>一九四六年四月，波蘭心理學家格里吉（Tadeusz Grygier）急欲研究「壓迫對人類心靈的影響」，他獲准找了一群前集中營囚犯與強制勞動者做為研究對象，結果猶太流離失所者卻拒絕他的研究請求，格里吉於是把對方的拒絕歸因為「極端壓迫的影響」。<sup>158</sup>一九四六年七月，原名邁克爾森（Aron Mendel Michelson）的俄裔美國生理心理學家伯德爾（David Boder）也獲准到流離失所者營區進行訪談計畫。伯德爾想研究「遭受史無前例壓力下的人格」，他認為這些猶太倖存者是非常合適的研究對象。由於伯德爾自己也是猶太人，所以並未碰上格里吉遭遇的問題。他研究了各種倖存者，包括從集中營倖存的猶太人與外國強制勞動者，後者曾經在戰時德國生活，生活條件遠比猶太人好得多。<sup>159</sup>

伯德爾一開始使用了標準的「主題統覺測驗」，也就是選擇一些圖片給受訪者看，而受訪者理應要根據圖片來做出回應。伯德爾不久就發現，他無法從這些測驗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因為他的受訪者經常做出不置可否的回應，或是懷疑是否真有可能瞭解受害者的情緒世界。十八歲的蒙布魯姆（Abe Mohnblum）就問他，「心理學家真有那麼厲害？心理學家真的瞭解人性嗎？」伯德爾猶豫了一下，表示心理學還處於開拓階段。結果他的受訪者立刻反駁，說心理學家「絕對無法評價實際上會發生的事」。<sup>160</sup>伯德爾感到顏面盡失，發現他身為心理學家想達成的目標，與這些倖存者所面臨難以想像的現實之間（倖存者詳細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根本無法連結。一九四九年，伯德爾選擇將部分訪談紀錄出版，書名叫《我沒有訪談過死者》（*I Did Not Interview the Dead*）。他在書中建立所謂的「創傷索引」（後來的版本改成「創傷目錄」），總共有十二類，而他便利用這十二類「從心理學上定義了這些人的遭遇」。創傷索引涵蓋了這些人所有的經驗領域，而這些經驗剝奪

了他們「文化現在」（cultured present）的情緒與物質世界，而代之以「原始過去」（primitive past）。創傷目錄的第七項寫道：「讓身體與心靈的忍受力持續處於超載狀態。」<sup>161</sup>雖然伯德爾對「創傷」一詞的使用方式與今天的主流用法不太一樣（今日通常把「創傷」視為對壓力的一種壓抑反應），但伯德爾確實試圖描述受害經驗在這些倖存者身上不斷累積的心理創傷。伯德爾最後還試圖用「災難量表」來量化這些倖存者的苦難，結果不令人意外地，伯德爾發現營區倖存者承受的創傷，至少超過外籍工人的三倍以上。<sup>162</sup>



有數百萬人在戰時遭受了情緒危機，卻未能倖存下來。他們有的死於前線，有的死於空襲，有的則是殘酷暴行、飢餓與種族滅絕的受害者。到了戰爭結束時，德國、蘇聯與日本的武裝部隊總計已有約一千八百萬人死亡，相較之下，西方的武裝部隊則有約一百萬人死亡。這表示民主國家的軍隊有數百萬人得以返鄉、重新加入公民社會。就像集中營倖存者一樣，回歸社會並不是一個簡單或直截了當的過程。參戰的男女官兵已經習慣一套價值觀完全不同的世界，身上背負著從遙遠戰場帶回來的情緒與精神包袱，試圖在未來重建符合民間規範的行為與恢復傳統的情感紐帶關係。只有美國將精神醫學的調整視為當務之急。一九四五年出版了許多精神醫學指引，包括《給退伍軍人的家人與朋友的精神醫學指南》（*Psychiatric Primer for the Veteran's Family and Friends*），書中解釋返鄉軍人可能會「感到不安、具侵略性與忿忿不平」。<sup>163</sup>由於民眾普遍擔心返鄉軍人可能會引發犯罪潮，或返鄉軍人的精神障礙可能會影響和平時期社區的繁榮與復甦，美國陸軍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出資拍

攝了兩部宣傳片，一部談「戰鬥疲勞症」，另一部則有著不大恰當的片名，叫做《返鄉的精神官能症患者》（*The Returning Psychoneurotics*）。第二部電影由休斯頓（John Huston）執導，片中探討紐約精神病院為了讓重度精神障礙病者恢復正常生活而使用的療法。結果陸軍認為片中影像對美國民眾來說可能太過病態，因為民眾還不瞭解戰爭會對一個人的情緒造成多大傷害，因此他們恐怕無法明瞭劇本想要傳達的「人性救贖」意涵。雖然這部電影後來改名為《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但陸軍還是決定禁止該片上映，直到一九八一年為止。<sup>164</sup>

戰後針對軍人進行的調查少之又少，顯示這場衝突留下的情緒傷疤將會持續到和平時代。在美國，百分之四十一的退伍軍人因為精神障礙領取了傷殘補償。一九四六年戰爭部（三年後改名為國防部）公布的另一份調查顯示，曾在戰時接受醫療的士兵，有四到五成罹患了戰鬥疲勞症。<sup>165</sup>英國進行了小規模調查以追蹤戰時退伍返回社區的精神疾病案例。調查發現，許多人很難維持工作或恢復自尊。雖然並未有針對德國、蘇聯或日本退伍軍人回歸平民生活的系統性研究，但三國退伍軍人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十分艱辛。以德國與日本的例子來說，英國、法國與蘇聯決定讓德國或日本俘虜從事與戰後重建相關的勞務，卻在《日內瓦公約》簽訂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願意放人，耽誤了德日退伍軍人回歸社會的時機。<sup>166</sup>當日本俘虜終於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從蘇聯返回日本時，日本國內民眾普遍對這些人感到擔憂，認為這些士兵不僅當初恥辱地被俘，現在返回國內時所展現的態度，充分證明他們原本就是一群愛搗亂與「好爭辯」的頑劣分子。<sup>167</sup>

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後還有一項獨特的安排，那就是希望將所有戰死海外的士兵遺骸運回故土，重新安葬。一般同盟國與軸心國的男女官



兵，只要是在海外服役時陣亡，通常就葬在他們陣亡的戰場上。但美國民眾最大的願望，就是讓遠渡重洋戰死海外的子弟兵能夠歸葬美國故土。此舉形同擱置了美國在戰時的情緒規範（美國官方當初就是根據這套規範隱匿了戰死者的實際人數），並且允許所有民眾為陣亡將士哀悼。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批總計六千兩百具靈柩從歐洲運抵美國。一個不知名的士兵被隨機選中，他的靈柩被神聖隊伍簇擁著，沿著紐約第五大道行進，夾道致敬的民眾多達五十萬人，在中央公園舉行的儀式更是多達十五萬人觀禮。<sup>168</sup>有些人哭泣，有些人無法直視，這個時刻捕捉到了戰時歲月被壓抑的情緒。「永別了，我的孩子。」群眾中一名婦女哭泣說道。四年來，數百萬美軍男女官兵都必須在個人恐懼與焦慮，以及軍隊要求的紀律與自我犧牲之間不斷拉扯。世界各地的民眾同樣活在類似的矛盾之中，既要對外表現出堅忍卓絕的模樣，也要承受個人的悲傷與失落。



一九四三年七月庫斯克會戰的兩名蘇聯年輕士兵，其中一人手持十字架等待戰鬥。每個地方的士兵都仰賴小紀念物或護身符來驅散對戰鬥的恐懼。圖源：Albatross/Alamy

---

[1] 編注：指在面對生死交關的戰場環境時，任何宗教或超自然的力量都被士兵拿來崇拜。精神上類似於二戰時出現的一句格言「散兵坑中沒有無神論者」。

CHAPTER 10

第十章

戰爭暴行與戰爭罪

「當猶太人從自家公寓被拖出去槍斃時，擔任教師的麗莎（Liza Lozinskaya）正藏匿在某處。第二天，在槍決了一大批人之後，殺人不眨眼的蓋世太保抓到了她。這群惡棍把她拽到市場廣場，把她綁在電報柱上，然後開始將鋒利的匕首往她身上丟。這些禽獸在她脖子上掛了個牌子，上面寫著，『我妨礙德國軍官執法。』』

—— 記錄的證詞，《莫濟里的德國人》（The Germans in Mozyr）<sup>1</sup>

「一旦德國士兵被抓而且被帶到〔游擊隊〕基地時。他們甚至不想拷問他。他們只是想把他撕成碎片。他們會扯掉他的頭髮，那是個恐怖的景象。女人，老人，每個人都在喊著，『這是為我的兒子，這是為我的丈夫』等等。」

—— 訪談奧肯（Leonid Okon）<sup>2</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殘暴的衝突。從戰爭爆發到戰爭結束，犯罪與暴行反覆不斷地在士兵、安全人員與平民中出現，其規模之大，力量之無情，遠遠超出前人所能預期。暴行引來報復，一報還一報，惡性循環之下，滋養出更多暴行。回憶麗莎遭遇的村民還記得有一名蘇聯女游擊隊員被抓，而且以相同的方式被懲罰，罪名也是「妨礙」德國警察與地方輔助部隊工作。這些人的任務是驅趕鄰近白俄羅斯猶太人到村子外面的坑洞，然後槍斃他們，一次一層。

年輕的奧肯是明斯克猶太區的逃亡者，他加入游擊隊只有一個念頭：「我一直想戰鬥。我想報仇。」<sup>3</sup>德國人與其在地協力者深怕遭到報復而活在恐懼之中，而這份焦慮助長了他們以殘酷暴力來遏止這個威脅。這只是眾多戰時暴行敘事中的一個。暴行並非局限在某個戰場，也



無法以單一原因來加以解釋。二戰的陰暗面是由許多部分所組成。有些暴行是正規戰犯下的罪行，這些暴行的出現嘲弄了既有的法律與戰爭慣例。有些暴行則是深刻種族仇恨或偏見的產物。另一些暴行則是長期以來男性對女性施加暴力的結果，而且這種暴行很容易被掩蓋。

※ ※ ※

對二戰時期的人來說，「戰爭罪」的概念通常被理解為違反了兩項公約內容，分別是一九〇七年的《海牙第四公約》（又稱《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及其附件章程，以及最初在一八六四年針對國際紅十字會達成協議的《日內瓦公約》。根據這項定義，武裝部隊犯下戰爭罪的受害對象，一方面是戰場上與被俘虜的敵國武裝部隊，另一方面則是理應受到「已開化民族」制定之「人道法律」保護的敵國平民。<sup>4</sup>公約不適用於殖民地民眾，因為殖民地民眾被定義為「半開化」或「未開化」。當時對戰爭罪的性質沒有精確定義，也沒有明確規定要如何調查與懲罰，這是因為尚未設立國際法院來執行這些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交戰雙方都違反了戰爭常規與慣例，不過大多僅限於非系統性的違反，因為在漫長的四年裡，戰場始終局限在壕溝戰，比較沒有游擊戰或以平民為目標的情事發生。儘管如此，一戰依然促使各國開始對其他被認定違反《海牙公約》的「犯罪」進行分類。一戰結束後，戰勝國擬定了三十二項犯罪目錄做為犯罪行為清單，包括「謀殺與屠殺」（特別針對土耳其人屠殺亞美尼亞人）、「有系統的恐怖主義」、「拷打平民」，以及對非戰鬥人員進行流放或強制勞動。<sup>5</sup>一九一九年二月，協約國成立戰爭與戰爭行為責任委員會，委員會下設違反戰爭法規小組委員會，負責報告已知敵國戰犯的起訴情況。然而，美國否決設立國際法

庭來審判德國與土耳其戰爭罪的提議，德國與土耳其政府最後是在協約國的鼓勵下才進行了幾次樣板審判。至於法國與比利時，兩國則對仍由他們拘禁的一千兩百名囚犯進行審判與定罪。在山的另一邊，德國調查局也曾編纂五千份關於協約國戰爭罪的卷宗，但一九一九年的正義顯然站在戰勝國而非戰敗國這一邊。<sup>6</sup>

雖然歐洲各國無法在一九一九年成功定義戰爭罪或制定出戰爭罪的審理程序，但各國在接下來十年間仍試圖以更明確的國際協議來規範出可接受的戰時行為。協約國和同盟國都曾在戰爭期間轟炸平民，無視「空中轟炸」早在一九〇七年公約中已明文禁止的事實，因為沒有特定的國際法機構來管理這類行徑。一九二三年，根據前一年華盛頓海軍會議的決定，在海牙召開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制定了《海牙空戰規則》

（Hague Rules for Air Warfare）。雖然《海牙空戰規則》並未獲得任何政府批准，卻被視為具有國際法效力，特別條文規定了禁止攻擊平民生命財產與只能攻擊可識別的軍事目標。<sup>7</sup>一九二五年，各國在日內瓦達成協議制定公約，宣布毒氣戰與細菌戰等生化武器的使用為非法（「持有」並不在此限）。四年後，各國又締結一份戰俘待遇公約，將《海牙公約》的保護範圍擴大。新的海戰規則於一九三六年制定，將一戰進行的無限制潛艦戰列為非法行徑，同時規範海軍艦艇在有必要攔停與搜索可能資敵的商船時，必須維護船員安全，不能一看到船隻就立即擊沉。

對於這些追加的保護條款，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就已經有國家帶頭違反部分內容。義大利與日本在入侵衣索比亞與中國時使用了毒氣、日軍飛機在中國轟炸平民、義大利與德國飛機也在西班牙內戰時轟炸平民，或是中國戰俘當場遭日本軍人違法處決。二戰期間的交戰國違反了上述每一項國際協議，許多時候侵害的規模之大，恐怕締約者當時怎麼想也想像不到。隨著規模超乎想像的暴行證據浮上檯面，二十世紀的戰爭罪

概念也逐漸被擴大與延伸。到了二戰結束時，為了處理如此殘暴衝突的後果，新的概念因此誕生。唯有新的概念出現，才能對大規模流放、剝削與屠殺平民的暴行進行懲罰。如今這類暴行全都歸類在「反人類罪」這個名稱底下。<sup>8</sup>一九四五年，勝利的同盟國陣營再次定義戰時犯罪的性質，區分出所謂的「甲級戰犯」（被控策畫發動侵略戰爭）、「乙級戰犯」（被控違反戰爭常規與慣例）與「丙級戰犯」（被控犯下反人類罪）。

## 違反戰爭法規與戰爭慣例

狹義的戰爭罪，也就是敵對武裝部隊之間或武裝部隊與平民之間的非法暴力，早已被歷史證明不可能光靠書面協議予以約束。戰場上的戰爭罪多如牛毛，其原因相當明顯。與一戰的壕溝戰不同，二戰的交戰雙方經常在開闊地帶以運動戰的方式進行會戰。在這類戰場環境下，有時射殺降兵或傷兵要比分散兵力將這些人運送到後方簡單得多。在步兵戰鬥中，那些才剛殺敵後不久便投降的士兵，幾乎當場就會被殺害；狙擊手一旦被俘，通常都會被處決，因為他們被視為特別致命的殺手。在德蘇戰場與亞洲戰場中，倒臥的傷兵無一例外會直接遭到殺害。在戰況白熱化的階段，前線士兵腦中根本不會想到《日內瓦公約》，軍官也不會刻意阻止底下士兵，有時甚至會主動鼓勵與慫恿士兵犯下戰爭罪。海上的戰場非常不同，但依然可能出現違反公約的狀況，例如任由水手與敵兵在水中掙扎，或故意燒毀救生艇，或用機關槍掃射生還者。只有在空戰時，雙方才比較能夠謹守交戰規則，但有時還是會出現用機關槍掃射跳傘者的情況。另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是空對地戰鬥，主要是因為投彈

不精確的緣故，無論是轟炸或掃射地面敵軍都帶有隨機性質。引發最多倫理爭議的，無疑是遠程「戰略轟炸」，因為轟炸行動大量殺傷平民，有時甚至是以平民為目標刻意為之，此外也無差別地摧毀醫院、學校、教堂與文化遺產。

絕大多數乙級戰爭罪都在地面戰鬥時發生，這是因為士兵必須面對面廝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名參與太平洋戰爭的美軍工兵在日記裡寫道：「這裡只有一項規則：殺、殺、殺。」<sup>9</sup>雖然激戰時違反交戰規則之事時常發生，但戰時各戰場武裝部隊的暴行規模與性質，仍須取決於地理、意識形態與政治宣傳、軍隊文化、約束有無等各種因素。然而，當士兵正在犯下暴行時，心裡幾乎不可能考慮到其他因素。一旦無人約束，或軍事高層有意藐視規則，士兵就會為所欲為，在戰場上順著本能施加暴力。舉例來說，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希特勒告訴正在蘇聯打仗的德國陸軍，說這場戰爭與「軍人的騎士精神無關，也與《日內瓦公約》無關」，他期待軍隊自己判斷背後的用意。但在西線戰場上，希特勒卻希望他的軍隊盡可能遵守交戰規則——當一九四四年末武裝親衛隊在馬耳美地（Malmédy）屠殺美軍的消息傳到希特勒耳中，他便向陸軍重申遵守交戰規則的必要。<sup>10</sup>儘管違反交戰規則之事在西方軍隊較為少見，但有時還是會出現規則遭到刻意擱置的狀況。一九四四年，在美軍入侵關島前夕，士氣振奮的海軍陸戰隊將士被告知不用留下俘虜。<sup>11</sup>

各場戰役的脈絡與背景，其實也能解釋戰場暴行何以在規模與野蠻程度上存在差異。在西歐與地中海戰場，交戰各方一般而言都會遵守國際協議的公約——但盟軍對上納粹的武裝親衛隊時卻是例外，因為一般認為武裝親衛隊總是自行其是，死忠於希特勒，且毫不在乎行為是否合乎道德。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義大利與德國邊界的艱苦戰役



中，被俘的武裝親衛隊有時會被就地處決。當關於武裝親衛隊暴行的消息傳到盟軍時，盟軍軍隊自行做出了決定。在突出部之役，武裝親衛隊幾乎沒有人能活著進入戰俘營。一名美軍退伍軍人日後回憶說：「戰爭的本質就是如此，人的本性也不會改變。人很常在憤怒下完全失去理智，被情緒牽著走。」<sup>12</sup>英軍偶爾也會做出違反交戰規則的事，成立於一九四一年的空降特勤隊（Special Air Service, SAS）就很少留下戰俘。德軍在北非、義大利與西歐戰場犯下的戰爭罪，如果與在蘇聯與中國戰場發生的暴行規模相比，可以說都是些零星個案。在北非、義大利與西歐戰場的受害者數量約數十名到數百名，但在俄羅斯與亞洲的受害者卻多達數十萬人。在海戰方面，交戰各方都採取了無限制潛艦戰，違反了一九三〇年簽訂的《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但一般而言，雙方都節制不去殺害棄船的人。英國皇家海軍除了少數情況，基本上也都會救起落水者。<sup>13</sup>

東歐與亞洲戰場有著完全不同的樣貌。在這兩個地區，防守方很快就發現進攻方採取殘忍的戰鬥方式，於是也以相同的方式加以還擊。結果就是暴行不斷升級，每一次殘忍報復都換來對方更加低劣的行徑。在德軍與日軍的案例中，這就是刻意為之的「戰爭的野蠻化」，這個詞彙是由歷史學家白德甫（Omer Bartov）所提出，旨在描述德軍在俄羅斯發動的野蠻戰爭。然而德日兩國會這麼做，有一部分也是受到各種環境壓力的影響，使得原本不會做出這種暴行的人紛紛成了邪惡的殺手。<sup>14</sup>地理與地形的影響尤其重要。士兵們發現自己身陷在最險惡的環境裡，遠離故鄉，幾乎沒有生還的機會。當軍隊在緬甸叢林或遙遠的南太平洋島嶼，或在華中面對層巒疊嶂與河川交錯的地形，或在廣袤的俄羅斯大草原，夏日灼熱塵土飛揚，冬日則天寒地凍，勢必得陷入艱苦的戰鬥。在這些偏遠地帶，舉目所及盡是戰鬥、疾病或受傷造成的大量死亡，這

使得軍隊產生相當病態的文化，對於敵人的死亡無動於衷。德軍士兵無法理解紅軍宛如自殺般的衝鋒戰術，結果就是把對方當成砲灰處理。在日軍的軍事制度下，日本士兵只會戰至死亡為止，因為「玉碎」的原則早已深植在每個士兵心中。<sup>15</sup>日軍對攻守皆時常採取自殺式衝鋒，使美國、澳洲與英國士兵開始冷眼看待日本士兵的死亡。日軍的屍體暴露街頭，來來往往的盟軍車輛很快就讓這些屍體變成扁平而乾癟的殘影。

打從一開始，日本在中國的戰爭就幾乎完全不遵守現代戰爭公約。日軍推進時，投降的中國士兵通常會當場遭到槍斃或斬首，傷兵則往往被日本步兵愛用的刺刀或軍刀了結性命。雖然日本空投傳單鼓勵中國士兵投降，並且承諾日軍「不會傷害戰俘」，但從日本士兵的日記中即可看出，這項承諾不過是一種詭計。一名日本士兵在進攻河北省時，記錄了他曾愉快地用石頭毆打一名中國傷兵，還用軍刀將一名戰俘開腸剖肚。當他的部隊追擊撤退的中國軍隊進入山西省時，他還提到殺死逃亡的敵軍士兵這件事樂趣無窮：「玩弄這些傷兵，讓他們自相殘殺，實在很有趣。」<sup>16</sup>與此同時，這些日記也顯示出進攻的日軍感到深刻不安與恐懼，因為他們經常遭到中國士兵的埋伏與偷襲——此時的中國士兵已化整为零消失在戰場上，改採非正規游擊戰術。日軍推進時傷亡慘重，於是士兵也刻意用虐殺的方式來報復敵人。

日軍攻下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是日軍在中國暴行的高點，估計有兩萬名中國士兵與無數平民遭到屠殺。雖然日本駐華司令部希望士兵有所節制，但長達數個月在永無止境的大地上艱苦戰鬥，激起日軍強烈的報復欲望。當時有兩名日本軍官比賽看誰先砍下一百顆中國人的頭顱，消息刊登在報紙上後頓時使兩人成為名人。這場「百人斬比賽」一直持續到一九三八年。該年三月時，其中一名少尉已經斬首三百七十四人。當時的詩文、歌曲，甚至童書都讚揚這場「愛國的百人斬」。<sup>17</sup>各地的中國

士兵都遭到追捕與屠殺，而且日軍各種殘酷的處決方式都用上了——戰俘被割掉舌頭絞死、活埋、活活燒死、充當刺槍術的練習目標、在冬日結凍的河面鑿洞再將赤裸的中國士兵丟進去「釣魚」等。<sup>18</sup>在南京，一名日本士兵走過兩千具被肢解的中國人屍體，這些人當初都是舉起白旗的投降者。這名士兵提到，這些人「被用各種方法殺死」再棄置於路邊任其腐爛。<sup>19</sup>這種無限制的暴力源自於日本軍方把中國士兵定義為盜匪，一旦中國士兵被俘，日本士兵便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顧忌，可以任意殺害中國戰俘。《日內瓦公約》關於戰俘的規定並未獲得日本政府批准，但就算批准，日軍指揮官顯然也完全無視《日內瓦公約》強調的國際法限制。<sup>20</sup>殘酷的戰鬥讓日本士兵愈來愈冷酷，殺害傷兵與俘虜的習慣也成為日軍士兵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名在南京的目擊者在日記裡寫道：「我踩在中國士兵的屍體上，絲毫不以為意，因為我的內心已變得瘋狂與失常。」<sup>21</sup>

當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舉攻擊美國、英國與荷蘭在東南亞與南太平洋的屬地時，絕大多數參與任務的日本士兵都有在中國打仗的經驗——這點與對抗日軍的盟軍士兵剛好相反，後者幾乎沒有任何作戰經驗。日本士兵於是把過去四年的作戰習慣也用在對抗殖民地強權的戰爭上。即便西方軍隊早已聽聞日軍野蠻的名聲，日軍還是帶給西方軍隊巨大的震撼，不僅是因為西方軍隊低估了日軍的戰術技巧，也因為西方軍隊以為日軍在與白人軍隊作戰時會遵守公約，不會出現無限制的暴力。一九四一年耶誕節當天，英國香港總督向日軍投降，但日軍仍四處燒殺擄掠，殺害戰俘，用刺刀刺死醫院裡的傷兵，強姦與殺害護士（但就在幾天前，英國軍警也用機關槍殺害了中國搶劫者，還讓七十名疑似第五縱隊者排成一列，用麻袋套頭後再一口氣將所有人槍決）。<sup>22</sup>在入侵馬來亞時，日本士兵沿著半島南下，沿途殺害俘虜與屠殺傷兵，這種

作戰模式在往後的太平洋戰爭中還會如法炮製。在新幾內亞戰役中，盟軍發現被俘的澳洲士兵會被脫光衣服綁在樹上當成刺槍術的練習目標，或者被刀子砍成碎片，有些甚至被宰了充當飢餓日軍的食物（當時日軍經常陷入缺糧與沒有軍火補給的狀況）。<sup>23</sup>美軍除了發現死去的戰友遭到肢解與拷打，也在陣亡日軍口袋裡發現從美軍屍體割下來的戰利品。在海上，日本海軍一看到盟軍船隻就予以擊沉，若非任由生還者溺死，就是用機關槍掃射他們。當日軍進攻東印度群島（今日印尼）時，海軍士兵在安汶島屠殺了數百名被俘的澳洲與荷蘭士兵，上級甚至下達了詳細的處決命令：要不是砍下盟軍士兵的頭顱，就是用刺刀刺向他們的胸部。<sup>24</sup>美國海軍在戰爭爆發後也採取了無限制潛艦戰。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海軍已經沒剩幾艘艦艇可以擊沉，美軍潛艦於是轉而將目標對準日本漁船與近岸舢舨——此舉同樣違反了交戰規則。在海中掙扎求生或努力爬上救生艇的日本人最終是遭到遺棄還是被殺，完全要仰賴個別盟軍指揮官的良知，法律完全無用武之地。<sup>25</sup>

對日本入侵者來說，對盟軍施加暴行完全是有害無益。由於日本人完全沒有遵守戰爭公約的意思，因此盟軍在戰場上遇到日軍時也會以相同方式加以報復。不是每個盟軍或日軍士兵都犯下違反戰爭法規的行為，但在太平洋戰場上，這類的違規情事可說是稀鬆平常，沒有人會期望陸軍士兵與海軍陸戰隊會謹守紀律不做出違反交戰規則的事。美軍的態度深受珍珠港事件引發的憤怒影響，好比海軍軍令部長史塔克海軍上將就在戰爭爆發後幾個小時內宣布，美軍可以「對日本採取無限制空戰與潛艦戰」，在戰鬥真正開始之前便推翻了美國的國際承諾。羅斯福的個人顧問李海也清楚表示，與「日本野蠻人」戰鬥，「必須放棄」既有的戰爭規則。海爾賽海軍中將則向他的航空母艦艦隊人員表明：「殺死日本鬼子，殺死日本鬼子，殺死更多日本鬼子！」<sup>26</sup>在這種情況下，美



國士兵幾乎不可能受到法律約束，更不用說當他們親眼目睹日本人的戰爭暴行後就更不可能收手了。美國士兵在軍中閱讀的所有作品，基調永遠都是「殺死這幫混蛋」。在美軍的理解中，日本守軍不遵守任何交戰規則，甚至違背常理。他們會使用停戰旗幟來偷襲靠近的敵軍，會在開火前靜靜地躺著佯裝已經死去，會在投降時把已經拉掉引信的手榴彈綁在手臂上，一口氣炸死自己與俘虜他的人。比較不常見的狀況是，日本士兵會舉起軍刀，朝著敵軍的機關槍陣地衝鋒。<sup>27</sup>

美國海軍陸戰隊與陸軍步兵對於日軍普遍抱持著憎恨與輕視，加上部分戰時宣傳把日本人描繪成非人的禽獸，將他們視為文化奇特難解的產物，凡此種種皆加深了美國士兵對日軍的厭惡。戰場上「最好的日本鬼子」就是「死日本鬼子」，因此幾乎不留戰俘。遇到傷兵，只要在他们喉嚨上劃一刀就可以解決問題。還有人會從屍體身上取下一部分當成戰利品，可能是死者的頭皮，也可能是死者嘴裡的金牙，全部收藏在一個小袋裡。肢解屍體的行為相當普遍，導致美國戰爭部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下令所有部隊指揮官嚴禁士兵蒐集這類可怕的紀念品，然而成效不彰。當戰後日本要把馬里亞納群島上的日軍遺骨運回故土時，居然發現百分之六十少了頭骨。甚至有人將一把用日本人骨頭雕刻的拆信刀送給羅斯福總統，雖然羅斯福堅持必須把它歸還給日本。<sup>28</sup>有些日本戰俘無法接受自己未能戰死沙場，為此瘋狂掙扎，最後俘虜他們的人只好完成他們的心願。在瓜達康納爾戰役中，美軍發現自己極難找到一名生還的日本士兵來拷問，上級長官不得不為此承諾，若亞美利加師能找到生還的日本兵，就可以獲得威士忌與額外啤酒做為獎賞。<sup>29</sup>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歷經三年戰鬥之後，盟軍依然只俘虜了六百零四名日軍。在整個太平洋戰場，最終只有四萬一千名日本士兵與水手被俘，幾乎全部集中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日軍也得知美軍與澳軍通常不會留下俘

虜，這更強化了日本《戰陣訓》對士兵的要求：必須戰死，不可忍辱偷生。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緬甸戰場，英國、西非與印度軍隊在目睹日軍的暴行之後，同樣採取殺死戰俘與傷兵的策略，而這也讓日軍更沒有意願投降。印度士兵曾經活活燒死一百二十名日本傷兵，同時活埋二十餘名日本傷兵。一般來說，日本傷兵不是被刺刀刺死就是被槍斃，即使已死也還是會再用刺刀刺過，好確認真的死亡。一名旅參謀長說道：「他們是畜生，就用對待畜生的方式對待他們。」<sup>30</sup>

許多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德蘇東線戰場。德國陸軍早在一九三九年波蘭戰役時便已展現殘暴的一面，當時德軍為了報復波蘭反抗，遂槍斃了大約一萬六千名波軍戰俘。早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前，德軍士兵已經開始閱讀一本小冊子《你瞭解敵人嗎？》，以瞭解蘇聯軍隊打仗的「不可預測、詭計多端與冷酷無情」。德軍對蘇軍的偏見有部分來自於對俄羅斯陸軍在一戰時期的表現。<sup>31</sup>在種族偏見與敵視「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德國陸軍將領同意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提出的主張，即俄羅斯戰役是一場「滅絕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德國人不需要「體恤軍人情誼」。負責進攻的第十八軍團指揮官屈希勒將軍告訴底下軍官，他們要對抗的是「與我們不同種族的軍人」，在戰場上「不值得我們留情」。<sup>32</sup>米勒少將（Eugen Müller）形容德軍士兵在俄羅斯進行的戰爭，彷彿回到了《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制定交戰規則之前「更早期的戰爭形式」。<sup>33</sup>就在德國入侵蘇聯前不久的五月與六月，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接連發布三道訓令，協助德軍定義了何謂「更早期的戰爭形式」。首先是「入俄部隊行為指導方針」，要求徹底無情地除去所有形式的抵抗。第二是「政治委員令」，指示將所有俘虜的蘇聯政委直接交給親衛隊處決，因為政委被視為「亞洲式戰爭」的化身。第三道訓令是「軍事管轄權的縮減」，也就是不追究士兵犯下的戰

爭罪行。雖然少數德國將領擔心這些訓令會助長目無法紀的「胡亂射擊」（來自賴赫勞元帥的評論），但絕大多數將領似乎都同意這些做法，而且日後也以無情手段遂行這場戰爭。<sup>34</sup>

一九四一年六月爆發的戰爭，證明德國對於蘇聯打仗方式的看法並不完全是偏見。進擊的德軍很快就發現有德國士兵的屍體遭到肢解，有些人舌頭被釘在桌上，有些人被掛在肉鉤上，還有些人被石頭活活砸死。蘇聯暴行的故事，無論真假，很快就在德軍裡傳開，因此在開戰後數星期內投降的成群紅軍，最後幾乎都被槍斃。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國陸軍總部把所有位於德軍戰線後方的蘇軍都定義為游擊隊，只要發現就立即處決。<sup>35</sup>與日軍一樣，蘇聯士兵經常在絕望處境下戰至最後一人，或是躲藏起來從後方偷襲德軍，或是假死再突然開火，或即使身受重傷仍繼續奮戰。與日軍一樣，蘇聯當局要求士兵不能淪為戰俘，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一九四一年八月，蘇聯當局甚至發布了第兩百七十號命令，指責投降或被俘者是「祖國的叛徒」，其家人將會遭受連坐懲罰。<sup>36</sup>在絕望的戰役初期，紅軍很少俘虜德國士兵；但到了戰爭後期，推進迅速的紅軍也把敵軍俘虜視為累贅。一九四四年末，一名年輕德國士兵在森林裡迷路，卻得以逃過自己原部隊遭遇的命運——當他再次發現自己的部隊時，發現所有人成排倒臥在原野上，每個人頭破血流，被刺刀開腸剖肚。<sup>37</sup>

蘇聯士兵沒有遵守交戰規則的義務。他們不擇手段進行戰鬥，因為他們信奉的核心道德理念是拯救蘇聯祖國不受法西斯主義者的侵略。德國暴行的故事同樣在蘇聯部隊裡流傳，堅定了蘇聯士兵絕不對敵人留情的信念。<sup>38</sup>他們的任務就是殺死德國人。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流行的文學作品一樣，紅軍的報刊也經常發表仇恨言論，鼓吹士兵殺敵。詩人愛倫堡（Ilya Ehrenberg）在《紅星》發表的文章寫道：「沒有任何事

比德國人的屍體更讓人高興。」蘇聯士兵被鼓勵盡量一天殺死一名德國人。一九四一年在撤退時脫隊的蘇聯士兵組織了游擊隊，持續騷擾德軍補給線，拷問與殺害俘虜的德軍士兵。蘇軍拼命想扭轉戰局，擊敗意料之外的侵略者，在這種情況下，遵守抽象的戰爭法規對蘇聯軍隊來說毫無意義。數百萬蘇軍在一九四一年的大型包圍戰中被俘，消息很快傳回蘇聯後方，說無數戰俘被德軍有系統地殺害。德軍顯然完全按照最高統帥部的三道訓令行事，從戰俘中找出政治委員、共產黨員與猶太人加以殺害。根據估計，德軍戰時殺害的蘇軍戰俘人數多達六十萬人。反過來說，德軍同樣發現己方戰俘被「以毫無人性和難以形容的方式虐殺與折磨」——如德國外交部向莫斯科抗議時所說。<sup>39</sup>德蘇兩國的軍事組織都沒有約束暴力的意思，因為兩國的高層都認同這種做法。戰俘被殺的數字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間有所減少，但這僅是因為德蘇兩國都希望利用戰俘的勞動力來支撐各自的戰時經濟。即便如此，當時被俘的德國士兵已有半數死亡，而德國手裡的蘇聯戰俘也已折損了三分之二。

我們能從遠離前線的戰俘與他們的命運，看出前線不遵守交戰規則的現象。最顯著的差異就是存活率。大英帝國與美國在西線戰場俘虜的士兵並未遭受嚴厲懲罰或拷打，也未受到飢餓之苦——不過在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有大量敵軍淪為戰俘，意外造成嚴重的住居與飲食問題，也導致臨時設立的營區出現遠高於預期的死亡率。在英軍與美軍俘虜的五十四萬五千名義大利士兵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死亡。<sup>40</sup>德國或義大利俘虜的盟軍士兵也受到符合《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待遇，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名戰俘中有九千三百名死亡，絕大多數是因傷或因病死亡（死亡率百分之二點七）。反觀日本俘虜的盟軍士兵有十三萬兩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六人死亡或被殺（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七）。太平洋戰場的美國與澳洲戰俘過得最慘：四萬三千名戰俘中



有三分之一死亡。<sup>41</sup>在二戰結束前，日軍士兵被俘虜的人數相對稀少，因為絕大多數都在前線死亡或被殺。在緬甸有十八萬五千名日軍戰死，只有一千七百人被俘，被俘者當中只有四百名身體健康，而且這些人還試圖切腹自殺。<sup>42</sup>由於德蘇戰爭投入的兵力規模太大，因此儘管殺害的降兵數量眾多，戰時的俘虜數量依然多得令人吃驚。蘇聯士兵有五百二十萬人被俘，估計被俘期間死亡的人數在兩百五十萬到三百萬之間（死亡率百分之四十三到六十三）。德軍有兩百八十八萬人被蘇聯俘虜，其中三十五萬六千人死亡（死亡率百分之十四）。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與奧地利（與德國分開計算）的軸心國士兵則有一百一十萬人被俘，其中十六萬兩千人死亡（死亡率百分之十四點七）。一九四五年八月，滿洲有六十萬名日軍被蘇軍俘虜，其中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五人死亡（死亡率百分之十點三）。<sup>43</sup>蘇聯俘虜的敵軍中，死亡率特別高的是一九四一年墨索里尼派去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義大利軍隊：四萬八千九百四十七人被俘，兩萬七千六百八十三人死亡（死亡率百分之五十六點五）。<sup>44</sup>

德國俘虜的蘇聯士兵與日本俘虜的盟軍士兵有著不尋常的高死亡率，這是因為德日兩國刻意虐待、忽視或殺害這些從死傷慘重的戰場倖存下來的士兵。一九三〇年代正值崇尚為天皇犧牲與鄙視投降的意識形態鼎盛期，因此日本軍方始終用特別負面的眼光看待戰俘。所有日本士兵都被灌輸了被俘虜就是道德失敗的觀念。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給每位士兵一本小冊子，書名叫《戰陣訓》，書中再次提醒眾人，「不要活著蒙受被俘虜的恥辱。」<sup>45</sup>而這也使得日軍把敵軍戰俘視為可恥之人。中國戰俘會被當成「盜匪」殺死，一名日本軍官說道，這些中國戰俘不是人，而是「豬」。<sup>46</sup>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新加坡戰役與三個月後的科羅希多島戰役結束時，都有大量盟軍士兵向日本投

降，而日軍對於有這麼多士兵投降感到不可思議，既瞧不起這些人，也持續虐待這些戰俘。日本政府已經在一九二九年《日內瓦（戰俘）公約》上簽字，但並未獲得國內批准，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才表示願意遵守公約，前提是同盟國也必須遵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提議排除了公約中禁止使用戰俘勞動力投入戰爭的條款。時任首相的東條英機下令，應將戰俘當成一種資源，讓他們為日本軍隊興建道路、機場與鐵路。事實上，日本從未提供盟軍戰俘任何《日內瓦公約》規定的保障，負責管理與守衛戰俘營的人員從未得到指示要執行《日內瓦公約》的規定。日本的戰俘情報局長官上村幹男中將特別喜歡虐待戰俘，他想藉此向被征服殖民地的民眾展現「日本民族的優越」與高加索人種的衰落。<sup>47</sup>

日本戰俘營隨即開始出現高額死亡率，原因有幾個。第一，絕大多數戰俘營的守衛都是從朝鮮與臺灣徵召，他們奉命將這些戰俘視為牲畜，也獲得任意處置戰俘的權限。朝鮮人與臺灣人自己也遭受日本士兵與軍官的野蠻對待，而且時常缺乏糧食與醫療供給，因此會把挫折感宣洩在這些戰俘身上。當時有許多日本軍人都認為，既然日軍的生活條件已經十分艱困，那麼戰俘理應只配獲得更糟的對待。戰俘營的軍官與士兵皆把完成上級交辦事項當成首要任務，保護戰俘不受虐待則不在他們的工作範圍內。由於得不到適當的食物或醫療照護，幾乎所有戰俘都罹患了熱帶疾病或當地流行的痢疾。戰俘隨意遭到粗暴對待，被棍子與鞭子毆打，被認定在偷懶就會遭到拷打，只是犯一點小錯就會被長時間關進懲罰小屋：一旦被關進去就會有三天沒有水喝，七天沒有東西吃。如果戰俘試圖逃跑，就會遭到槍決。如果負責政治偵防的憲兵隊懷疑戰俘祕密策畫抵抗行動，就會拷問戰俘直到他們吐實為止。憲兵隊用盡各種方法逼供，包括極不人道的「米拷問」。受害者被迫吞下大量生米，再

灌入大量的水；隨著米在胃裡吸水膨脹，受害者會持續數日胃部劇痛。為了讓毆打更讓人難以承受，拷問者會用濕沙子摩擦受害者的皮膚，讓被毆打部位變得血肉模糊。<sup>48</sup>被拷問的人要不是被訊問至死，就是坦承策畫了不合常理的陰謀。一旦他們坦承犯案，私設法庭要不是宣布將他們處決，就是判處他們長期徒刑。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就這樣強加在已經因為長期飢餓與疾病而衰弱無力的戰俘身上。戰俘能夠活下來就像中了彩券，或因為遇到日本軍官一念之仁，或因為運氣不錯，被關押的地方疾病較不猖獗或守衛較不粗暴野蠻。

軸心國與蘇聯的戰俘之所以有較高的死亡率，主要因素在於意識形態。由於德國武裝部隊奉命不去理會《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因此德軍自覺沒有義務妥善對待被俘的蘇軍士兵。一九四一年九月，蘇聯已經有數百萬名士兵被德軍俘虜，帝國保安總部部長海德里希於是發布訓令：由於蘇聯戰俘與罪犯無異，因此沒有資格「享受榮譽軍人應有的待遇」，只能得到罪犯的待遇。<sup>49</sup>面對數量龐大的戰俘，德軍幾乎沒準備好糧食供應。蘇聯軍隊被成群趕進臨時戰俘營，途中可能被迫行走數百英里才能抵達目的地。德軍所謂的「戰俘營」不過是一片荒野，四周圍起鐵絲網與架起機關槍。營區幾乎沒有飲水，糧食不足且品質低劣，除非被俘的蘇軍中有醫療人員，否則不可能獲得醫療照顧。軍服與軍靴都被德國守衛偷走，想逃走的人會被槍斃。營區裡被槍決的對象不僅包括被安全部隊追捕的猶太人與共產黨員，也包括違反營區規則的士兵（即便規則非常模糊粗略），例如曾有兩名戰俘因為不願像其他戰俘一樣活活餓死而吃人肉，結果就因此遭到槍斃。<sup>50</sup>身體還算健康的戰俘必須工作，但寒冷、飢餓乃至於當地流行的斑疹傷寒很快就會讓這些戰俘倒下。能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這段期間存活下來的蘇聯戰俘，往往是因為他們同意為德國陸軍擔任志願軍，至於絕大多數戰俘通常在

監禁數星期後就喪失了工作能力，最後只能等死。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已經有兩百萬名蘇聯戰俘死亡，德軍也根本沒有要讓他們活下去的意思。<sup>51</sup>

與日本一樣，蘇聯並未批准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公約》，而且認定沙皇政權簽訂的所有協定，包括兩個《海牙公約》，都屬無效。一九四一年六月底，蘇聯政府試圖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與德國達成協議，希望雙方共同遵守《戰俘公約》，但遭到德國政府拒絕。在這個階段，德蘇雙方實際上都未遵守《戰俘公約》的規定。由於德蘇戰爭來得太過突然，蘇聯武裝部隊並未做好收容戰俘的準備。到了一九四一年底，蘇聯只完成三座戰俘營，只能收容八千四百二十七名從前線生還的德國士兵；到了一九四三年，戰俘營的數量增加到三十一座，已能夠收容二十萬人。依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頒布的「戰俘勞動力利用法令」，所有戰俘都必須工作。戰俘的待遇比照古拉格集中營的蘇聯囚犯辦理，領取相同的配給。與蘇聯囚犯一樣，這些戰俘只要工作夠努力就能分得更多食物，然而帳篷與簡陋營舍的生活條件太過艱困，加上糧食供應愈來愈少，導致許多戰俘日漸虛弱，最終無法工作。某種程度上，蘇聯並非刻意要讓德國戰俘挨餓，而是比照國內囚犯來對待德國戰俘。一九四二年冬天，蘇聯國內糧食供應崩潰，結果就是不僅德國戰俘，連蘇聯古拉格也有成千上萬的犯人餓死。軸心國戰俘的死亡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二，十一萬九千人死於嚴重營養不良。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名戰俘當中有十七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死於疾病、寒冷與醫療匱乏。<sup>52</sup>

在蘇聯國防委員會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命令下，戰俘營的惡劣狀況自一九四三年春天起逐漸改善，戰俘死亡率到戰爭結束時已經下降到百分之四。蘇聯當局也從這個時期開始嘗試對德國戰俘進行再教育，使他



們從法西斯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存活的戰俘有五分之一登記加入了由共產黨發起的「自由德國」運動。<sup>53</sup>義大利戰俘大量死亡同樣不是蘇聯刻意推動的政策，而是忽視、飢餓與寒冷的結果。蘇聯在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後設立的第一批戰俘營，有著高得嚇人的死亡率。戰俘抵達營區時，早已因為缺乏食物與適當禦寒衣物而虛弱不堪。一九四三年一月底，在切雷諾沃（Chrenovoe）戰俘營原本有兩萬六千八百零五名戰俘，但兩個月後只剩兩百九十八人還倖存。切雷諾沃戰俘營長官於是遭到當局逮捕，罪名是忽視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戰俘待遇指令——戰俘勞動力對蘇聯的戰爭投入至關重要。義大利戰俘並未做好承受這場考驗的準備，而關押他們的集中營偏偏又是最糟糕的一批。一九四三年一月到六月間，三萬一千兩百三十名義大利戰俘死亡，有些死在前往集中營的路上，有些死在最初的關押所，絕大多數則是因為飢餓、體溫過低與斑疹傷寒而死於集中營。許多被德國關押的蘇聯戰俘也是如此。<sup>54</sup>

各國無法遵守協議制定的交戰規則，也無法尊重戰俘的地位，這一切都顯示國際協議的本質極為脆弱，限制戰爭罪的可能性也相當渺茫。

《海牙公約》最初的主要關切，就是確保各國達成避免在戰爭中傷害平民的協議，但正如二戰的戰場環境助長軍人之間的犯罪行為，軍隊對平民的傷害也同樣難以遏止。總體戰的需求使平民注定受到戰爭波及，不只是因為平民就此成為敵國戰爭投入的一環，也因為平民時常選擇以暴力反抗占領軍。當數百萬大軍穿越領土時，無論該地區是敵對還是友善，光是軍隊的規模本身就足以讓沿途不幸的民眾受害。一九〇七年

《海牙公約》的制定者恐怕想像不到，所有簽署該公約的國家日後都將使平民捲入窮凶極惡的戰禍。

武裝部隊最常出現的違反公約行為是掠奪，但若從二戰的戰場環境來看，真正的罪魁禍首還是國家本身。海牙《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第

四十六條與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私有財產不得沒收」與「應正式禁止搶劫」。<sup>55</sup>但問題在於什麼行為構成掠奪，定義卻不明確。根據國際法，征服國有權使用被征服國的公共資產，包括黃金與貨幣儲備，但征服國也必須充分滿足占領區民眾的經濟與社會需求。也就是說，國家可以獲得大量敵國資產，但士兵卻必須尊重民眾的私有財產，不能橫加掠奪。<sup>56</sup>這一規定極富理想主義色彩，即使是在擬定公約的當時看來都是如此。等到二戰爆發後，這類法律約束證明幾乎不可能行使，或即使執行禁令的軍官與憲兵有執法意願，也沒有執法的手段。就算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將軍下令美軍不許掠奪，士兵卻還是進行了大規模打劫，甚至對解放區的民眾也不放過。<sup>57</sup>入侵蘇聯的最初幾個星期，德軍將領也曾下令部隊在取得物資時必須付錢給農民，不許進行掠奪。結果幾個星期之後，軍方還是允許了前線士兵進行掠奪，一方面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則是難以控制。<sup>58</sup>掠奪或搶劫的程度與性質會隨著環境與機會而有所不同。從偷竊少量物品、食物與酒，到徵用民眾住房做為兵舍，再到徹底的洗劫與破壞。掠奪在某些情況也涉及對平民婦女的強姦，形同性的戰利品。在東線戰場上，德軍士兵與民兵搶光猶太人的所有財產，為日後的猶太人大屠殺揭開序幕。這裡面同時出現了好幾種暴行，這些暴行構成了本章接下來數節討論的主題。

進行征服的國家把掠奪視為理所當然。德國在一九三九年入侵波蘭的頭幾天，士兵就已開始恣意掠奪波蘭財產。波蘭醫生克魯科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在日記裡提到日復一日的掠奪：「大肆破壞與掠奪商店」，「德國人……搜刮美食、美酒、菸草、香菸與銀器」，「今天就連德國軍官也開始搜索猶太人住家，拿走所有現金與珠寶」。他看到德國士兵偷走當地天主教堂的珍寶，也看到德國憲兵只是冷眼旁觀。<sup>59</sup>征服西歐之後，德軍的掠奪較為節制，但還是有火車將一車車的

食材、酒類與家具運回去給在德國的家人。征服巴爾幹半島之後，德軍重複了對波蘭的掠奪經驗。在希臘，德軍軍官與士兵搶劫了每一座城市的博物館，連一般民宅也無法倖免。雅典一名旁觀者感到震驚，疑惑為什麼德國人「全變成了賊」。他寫道：「德國人只要看到房子就衝，把東西全部搶個精光.....如果是窮人的房子，他們就拿走床單與毛毯.....就連門上的金屬球形把手也不放過。」<sup>60</sup>

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後，德軍開始針對蘇聯的城市與鄉村進行全面掠奪。與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採取的策略一樣，德軍盡可能仰賴蘇聯當地的資源進行補給。在俄國與中國的遼闊領土上，德日軍隊所到之處皆被搶得精光，無論貧富，完全不給當地民眾活路。這些地區的生活水準原本就差，因此取得的戰利品也乏善可陳。儘管如此，德日的軍隊依然如蝗蟲過境，什麼也沒留下。日軍在一九四〇年接獲指示，為了應對中國軍隊的游擊戰，決定採取恐怖手段對付各地民眾，如中國受害者描述的，日軍採取「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sup>61</sup>戰事蔓延整個華中與華南省分，鄉村地區遭受摧殘，牲畜被偷，村落燒毀，城市也因為轟炸而成為瓦礫堆。在俄國，德軍一邊推進一邊就地取得補給，德軍士兵直接搶奪俄國人的衣物來度過寒冬。德軍的掠奪是有系統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德軍攻勢。一名朝列寧格勒推進的德國士兵發現，軍隊「別無選擇，只能掠奪農田.....可憐的民眾賴以維生的物資全被後勤單位搶走。跟在我們後面的其他組織，也用同樣的手法繼續搶掠.....」另一名軍官看到軍隊搶走了貧農的糧草與牲畜，發現這個地方能夠拿走的物資少得可憐，「當我們離開時，這裡什麼都沒剩下。」<sup>62</sup>

盟軍進行大規模掠奪的動機要比德日複雜得多——就在德國最終戰敗與遭到占領之前的幾個月，盟軍開始進行掠奪。一九四四年下半

年，當英美部隊橫越法國時，他們開始未經授權進行掠奪。英軍早在一九四〇年就發生過失控掠奪的狀況，當時英國遠征軍因為經常偷竊而遭到法國民眾憎恨，但一九四〇年掠奪的規模遠遠比不上一九四四年。英國政府最終為英國士兵的偷竊行為支付了六萬英鎊賠償金。美國士兵則拿走食物與酒，也拿走禦寒衣物或毛毯以度過一九四四年的寒冬，民眾避難留下的空屋，也成為掠奪者垂涎的對象。然而，隨著盟軍進入德國領土，掠奪不再被軍方視為偷竊，而是勝利者「解放德國人」應得的戰利品。只有直接被憲兵逮個正著的人才有可能受到懲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名美國中士在信裡寫道：「我們破壞一切，所到之處不留任何東西——相機、手槍、手錶、珠寶全都帶走，連處女也不放過。」<sup>63</sup>德國人在法國掠奪的大量美酒，此時轉而被解放者奪取。在科布林茲，最後的戰鬥還在進行，一名年輕士兵發現一座放滿香檳的酒窖。他的部隊在澡盆裡倒滿香檳，每個人輪流泡澡，「就像光著身子的電影明星」，他們一邊泡一邊希望德軍不要挑在這時發動反擊。<sup>64</sup>

進入德國領土的蘇聯士兵，只要一看到酒就搶，而這種行為也帶來不良的影響。有人發現士兵死在酒窖，因為酒窖裡的酒桶被子彈射穿，漏出來的酒居然把士兵淹死。蘇聯士兵甚至跑進醫院尋找任何喝起來像酒的東西，並且大肆破壞醫院。然而蘇軍大規模掠奪也有其他動機。在經過多年苦戰之後，蘇聯士兵認為戰利品是他們理所應得的補償。他們搶劫與恣意破壞行經的農家與農場。讓紅軍士兵憤怒的是，蘇聯人的生活與德國人相對繁榮的日子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他們無法理解德國人已經如此富足，為什麼還要掠奪貧困的蘇聯人。六年前，當蘇聯占領波蘭東部與波羅的海國家時，蘇聯人也帶著同樣的感受進行掠奪；如今德蘇富裕程度的懸殊差異也讓紅軍上自軍官下至士兵，每個人都參與了這場掠奪的狂歡。<sup>65</sup>這種竊盜行為獲得官方認可，蘇聯當局允許士兵每個



月寄五公斤的包裹回俄國，軍官則是十四點五公斤。軍事郵政系統因為大量寄回蘇聯的包裹而忙得不可開交，這些都是前線官兵寄給蘇聯家人的物品，而後方民眾已有數年未能吃到像樣的食物與使用像樣的消費品。<sup>66</sup>

掠奪只是眾多傷害平民罪行中的冰山一角。從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到一九四〇年代晚期，有數百萬平民被殺或餓死，我們至今仍無法確定究竟有多少比例死於發動戰爭侵入他國領土的武裝部隊與安全單位之手。與武裝部隊彼此間犯下的罪行一樣，平民的死亡是各種動機與條件的共同結果。然而，要在今日重建遭殺害的平民死亡人數與瞭解暴行的動機並不容易，因為當時並未留下精確的死亡人數紀錄，而各種破壞的記載也付之闕如。唯一的例外是義大利的暴行模式，整座義大利半島的受害者數量與受暴細節都被詳細記錄下來。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德軍與義大利法西斯民兵（墨索里尼建立的傀儡政權義大利社會共和國動員的部隊）犯下了五千五百六十六起暴力案件，造成兩萬三千四百七十九人死亡。這些人在當局針對義大利游擊隊進行報復時遇害，而這是一種針對民眾叛亂而進行的集體懲罰，另外也有一些村民因為不服從前線地區禁止移動的命令而遭到殺害。死者當中有一分之二是手無寸鐵遭到圍捕的男女游擊隊員，他們未能受到戰爭法規的保護。在一些惡名昭彰的案例中，婦女與小孩也成為受害者，但義大利的死亡人數有百分之八十七是男性，且絕大多數是役齡男子。<sup>67</sup>在一些特別凶殘的懲罰性屠殺中，死者往往包括婦女與小孩，尤其是在波隆那附近發生的太陽山

（Monte Sole）暴行，造成七百七十人死亡，這是西歐地區死亡人數最多的單一暴行。<sup>68</sup>法國發生的最殘暴暴行是德軍武裝親衛隊第二裝甲師（又稱帝國師）在格拉訥河畔奧拉杜爾進行的屠殺與破壞，導致六百四十二名村民死亡，其中兩百四十七人是女性，兩百零五人是小孩。德軍

這麼做是為了報復當地的抵抗行動。此前當局對這類暴行相對有所節制，但隨著法國游擊隊於盟軍登陸諾曼第期間升級了抵抗行動，德軍便開始對法國平民痛下殺手。一九四四年六月，法國平民有七千九百人被殺，其中四千人是「帝國師」下的毒手。<sup>69</sup>

在東歐、東南歐或亞洲戰場上被殺害、餓死或拷打的平民人數，足以令西歐戰場的暴行相形見绌。軸心國與蘇聯的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估計達到一千六百萬（其中一百五十萬人是蘇聯猶太人）；波蘭的死亡人數達到六百萬人，其中半數是猶太人。中國民眾的死亡數字沒有確切紀錄，但估計在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人之間。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占領區的平民死亡達數十萬人，其中日本占領的菲律賓到了戰爭最後階段高達十五萬人死亡。日本沖繩島的殘酷防衛戰造成約十萬名沖繩人（沖繩人是日本公民）死亡，殺害他們的不僅是美國人，也包括日本人。沖繩人深陷殘酷的前線，遭到空襲與砲擊，交戰雙方都不給他們食物，被迫離開藏身處的他們在機關槍掃射下成排倒下，而如果他們嘗試投降，就會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或炸死。<sup>70</sup>在游擊戰中，平民如果被懷疑通敵，或者在搜尋食物的游擊隊面前故意不交出食物，往往就會成為游擊隊暴力的受害者。在緬甸北部，中國游擊隊（半游擊隊半土匪）掠奪當地民眾，將村落夷為平地，又殺害拒絕交出糧食的農民。在烏克蘭，俄羅斯游擊隊無情對待他們要解放的民眾，公開絞死可能的通敵者。<sup>71</sup>蘇聯與中國政府對於資敵的社群毫不留情，民眾也因此受害。戰爭期間有數百萬人被流放到蘇聯邊區，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蘇聯占領下成千上萬的波蘭人與波羅的海國家平民。一九四一年，窩瓦德意志人（十八世紀就移居俄羅斯）的後裔被指控擔任第五縱隊，婦女與小孩都被送到位於中亞的臨時集中營，男人則遣送強制勞動營，無數人死於飢餓與虐待。一九四四年，輪到克里米亞與高加索地區的非俄

羅斯人受害，他們被迫離開家園，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每位蘇聯民眾都有可能因為一丁點違法或怠忽職守而被控顛覆破壞或主張失敗主義，最後被送進古拉格集中營，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大約有九十七萬四千人死於古拉格。

儘管如此，歐洲與亞洲會出現大量的平民死亡，仍舊是德國與日本武裝部隊對外征服的結果。全面占領歐亞大陸的困難顯而易見。日軍發現自己占領領土的人口高達一億六千萬，日本陸軍與軍政府顯然不可能控制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德國與軸心國部隊占領的蘇聯領土有六千萬人口，為了控制這些民眾而動員的軍警人數也達到數十萬人。日軍與德軍高層的首要目標便是「綏靖」，但這項任務的規模令人望之生畏，再加上抵抗行動散布的區域極為廣大且難以預測。俄國與中國有著彷彿無窮的領土空間，潛藏著無止境的危險。入侵者對於當地民眾既恐懼又輕視。他們認為這些地區適合殖民，對待當地民眾的苛刻方式也反映出長期以來的暴力殖民擴張歷史。反抗殖民者的民眾無法得到國際法的保護。德國對待東方民眾的方式，與對待西歐人與北歐人有著根本上的不同。<sup>72</sup>義大利在戰前面對衣索比亞民眾的抵抗與戰時利比亞民眾的暴亂，其採取的殘暴行徑同樣帶有典型的殖民性格。義大利在這兩地都動用了軍隊與無情的義大利非洲警察，大力鎮壓阿拉伯人與柏柏人叛軍。義大利當局使用了各種殖民地常見的無情做法：集體處決、公開執行絞刑與鞭刑。當地殖民者對叛軍公報私仇，有些叛亂分子被手榴彈炸死、被活活燒死或被用來練靶。<sup>73</sup>義大利殖民地警察與德國安全部隊合作，為德國在東方殖民地的治安工作提供建議與訓練。類似的維持治安手法也拓展到義大利統治的希臘與南斯拉夫，義大利在當地焚燒村落與處決民眾，完全複製了非洲經驗。<sup>74</sup>

會在俄羅斯與中國實施綏靖策略，主要是為了建立一個安全的大後

方，讓規模龐大的陸軍能夠在遙遠的前線作戰。在俄羅斯與中國，入侵者很快就發現自己面臨的不只是敵方的正規軍，還有非正規的抵抗行動，包括脫隊士兵、民兵或努力破壞殖民計畫的一般民眾。在中國，正規軍脫下軍服，或混入民眾之中，或加入游擊隊及盜匪集團，在日軍後方進行騷擾。在蘇聯，要維持各個社區的治安極為困難，因為抵抗分子就像一般工人一樣可以隨意進出，例如刺殺白魯塞尼亞區總督庫貝

（Wilhelm Kube）的年輕女僕，她在沒人注意之下輕易混入明斯克總部。在中國與俄羅斯，日軍與德軍都把非正規的叛軍視為軍隊安全與福祉的重大威脅，認為必須堅決與嚴酷地加以處理。日本陸軍獲准在對抗叛軍時進行「嚴重處分」，或者在戰場上進行「現地處分」。地方指揮官經常要面臨埋伏、暗殺與狙擊，他們大權在握，容許部隊任意殘殺平民、燒毀村落與處決人質。德軍在開戰之初，就已經允許使用一切手段壓制所有叛亂行為。一九四一年七月，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總部要求所有將領必須盡速平定被征服的地區，「只要是看起來有問題的都抓起來槍斃。」七月二十五日，陸軍總部下達訓令，「必須無情鎮壓」游擊隊反抗德軍的一切攻擊與暴力行為，如果找不到元凶，就採取「集體暴力措施」。這些指示使得德蘇在開戰之初就針對所有可疑的威脅施以極端暴力。平民游擊隊被公開絞死以儆效尤，村落被夷為平地。德國入侵蘇聯才幾個星期，德軍就已經處決了數千名人質。同月，帝國保安總部部長海德里希下令允許就地處決所有「激進分子」（顛覆破壞者、宣傳者、狙擊手、暗殺者、煽動者等），毫無節制的暴力就此展開。<sup>75</sup>

當德軍與日軍在俄羅斯與中國戰場陷入僵局時，入侵者對待平民與游擊隊的方式也轉趨激烈。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估計中國戰場已有四十六萬七千名游擊隊，有些游擊隊與土匪無異，專門在日軍後方的三不管地帶進行騷擾。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有些是來自西南的國民政府敵



後人員，這些人對日軍補給線構成嚴重的威脅。<sup>76</sup> 愈來愈感到不安與恐懼的日本士兵，開始把矛頭轉向不幸的平民，因為游擊隊經常混在民眾之中。日軍對中國民眾採取的懲罰十分嚴酷。雖然日後許多證詞顯然渲染了日本占領軍的暴虐，但實在有太多的描述提到平民遭到活埋、活活燒死、斬首、溺斃、嬰兒被丟入滾水中，或婦女被固定在地上的木樁刺穿陰道.....，因此也無法認為所有說法都是謠傳或虛構。日本士兵不僅將自己的挫折感、接受苛刻訓練與長期焦慮都宣洩在進攻途中遭遇的平民身上，更有計畫地對平民施加充滿虐待性質的詭異暴行。有時候是軍隊推進時突發性的暴力行為，例如勝利狂喜與報復心態的可怕混合造成了南京大屠殺。有時候只是一種因為可怕景象而引發的變態快感，例如壓制新幾內亞美國傳教站裡面的年輕女孩，在她的尖叫聲中將其斬首，或是強迫荷蘭小孩爬上棕櫚樹，直到他們體力不支一路滑到底下的刺刀尖上。有時候，這些暴行又像是某種古怪計畫的產物，最怪的莫過於南太平洋新愛爾蘭島上三十名被監禁平民的死亡事件。受害者中包括了七名德國教士，也就是說，這七個人是日本盟邦的國民。日本軍官並未直接將他們槍斃，而是想出一套匪夷所思的謀殺過程。被監禁者被要求收拾行囊，準備到碼頭搭船到另一個目的地。日軍每次只引領一個人前去，不讓其他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日軍讓這個人坐在碼頭邊上，為此戴人戴上頭套，再讓旁人用絞索套住他的脖子迅速拉緊。結束沉默的絞刑之後，就將屍體用鐵絲纏繞在大塊混凝土上，將屍體連同混凝土運出海，最後丟進海裡。<sup>77</sup>

德國的平叛行動也隨著游擊隊抵抗的威脅日增而愈演愈烈。與日本一樣，德國也採取嚴厲的集體懲罰來警告民眾不要違背德軍指示或不要援助游擊隊。德軍兵分兩路，一方面由正規軍與警察負責維持前線後方的秩序並與游擊隊作戰，另一方面則由保安警察與保安處負責圍捕嫌

犯，進行訊問與拷問，最終幾乎都會處決犯人。<sup>78</sup>德國當局認為自己正在進行一場「反恐戰爭」的早期版本，主張自己在法律上有權使用恐怖手段來嚇阻恐怖主義繼續發生。從一九四一年開始，德國占領區各地的叛亂分子都被德軍稱為「盜匪」或「幫派」，德軍這麼做是為了避免這些叛亂分子被捕之後取得作戰人員的地位，同時也強調這些人的罪犯身分。從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到地方各級指揮部，訓令中無處不充斥著反恐怖主義式的語言與修辭。一九四二年八月，希特勒譴責恐怖攻擊已經發展到「令人無法容忍的規模」，於是下令實施「滅絕」政策。這項命令留下了任人解釋的模糊空間，足以讓部隊能夠毫無限制地進行屠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希特勒終於批准使用「最殘酷的手段.....對象包括婦女與小孩」，不過德軍部隊與安全人員早就已經在掃蕩游擊隊的行動中無情屠殺過婦孺。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發布了「與恐怖分子和顛覆破壞者進行鬥爭」的訓令，清楚表明必要時可以完全不需要顧慮平民。<sup>79</sup>地方層級的指揮官各自詮釋中央的訓令。一九四三年，德軍在克羅埃西亞發動的平叛行動中，一名德軍將領發布指示：「『凡是』能確保部隊安全的措施.....都具有正當性.....沒有人需要為過當的行為負責。」從烏克蘭司令部調到法國司令部的基辛格將軍（Karl Kitzinger）就認為，「更嚴酷的做法」通常就是「正確的做法」。<sup>80</sup>研究顯示，不是每支部隊都會如此嚴厲鎮壓，但軍官們依舊承受巨大壓力，要求他們不要怯於殺害平民。駐法空軍副司令史培萊空軍元帥（Hugo Sperrle）就曾警告各級將領，如果行動「軟弱或不堅定」就將受到懲罰，但「採取的措施太過嚴厲」反而會受到寬容。士兵被告知要放心不安的良心，因為那將會「犯下反對德意志民族與反對前線將士的罪名」。<sup>81</sup>

反恐政策激進化的結果，就是導致反恐對象納入整個社區，男女老

幼全部涵蓋在內。然而，這種現象並非憑空產生。叛亂分子確實使用恐怖主義戰術來對付占領軍，他們的做法可說是一九四五年後在全球發展的不對稱戰爭先河。占領軍感受的深刻恐懼與不安，特別是在前線後方的地區，源自於敵人行為的不可預測，而這些敵人要不是隱藏在偏遠山區與森林，就是隱身在都市群眾。叛軍知道自己一旦被捕，將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護，因此他們對敵人也毫不寬貸。在蘇聯，被游擊隊俘虜的德國士兵通常會遭到處決。一名年輕蘇聯游擊隊員日後回憶說，當他們抓到兩名德國士兵時，就連「孩子也想拿著棍子上前痛打他們」。相較於其他俄羅斯游擊隊員的描述，這樣的報復算是相當輕微。其他人則提到會活剝犯人的皮、挖出眼睛、割下耳朵與舌頭、斬首或溺斃等等。<sup>82</sup>義大利游擊隊員佩西（Giovanni Pesce）在戰後描述一場雙方傾盡全力拼搏的衝突：「我們以恐怖回應敵人的恐怖，以報復回應敵人的報復，以伏擊回應敵人的圍捕，以奇襲回應敵人的逮捕。」<sup>83</sup>佩西的游擊隊在米蘭激戰了數星期，戰果充分顯示這場戰役的恐怖主義本質：

七月十四日（一九四四年），兩名愛國行動團體激進分子（**Gappisti**）襲擊法西斯間諜貝托洛蒂（**Odilla Bertolotti**），導致他身受重傷。同一天傍晚，同一個團體又有兩名激進分子破壞突尼西亞大道上一輛德軍大卡車。一名德國軍官試圖阻止而遭殺害。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八日，八輛大卡車與兩輛德國人員專車被毀。三輛大卡車遭汽油彈攻擊而著火。萊奧帕爾迪路（**Via Leopardi**）有一輛德軍戰車著火。兩名軍官被殺。<sup>84</sup>

佩西與其他人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代價，往往是由當地民眾承擔。根據德國軍方接到的指示，「盜匪共犯」的村落將會遭到摧毀，村民也

會被正規軍屠殺。軸心國為了壓制數千名騷擾他們的恐怖分子而發動的反恐戰爭，最終導致數百萬平民死亡。

相較之下，盟軍地面部隊並沒有殺害路過民眾的慣例，因為盟軍是以解放者之姿前來，也預期民眾會把他們當成解放者。紅軍的確會對與軸心國占領者合作的蘇聯人進行報復，但通常會以預先安排好的公審與公開處決來呈現。第一支抵達德國東普魯士領土的紅軍部隊，對於首次看到的德國城鎮與村落施加了突發而極端的暴力，這是因為他們一路走來已先看到蘇聯鄉村的殘破景象，心中充滿怒氣。一名士兵在家書裡寫道：「當你經過火光沖天的德國城鎮，內心只會充滿喜悅。我們要報復一切，報復是正義的。以火攻火，以血洗血，以死換死。」<sup>85</sup>但在最初幾天的暴力之後，蘇聯各級指揮官開始嚴令阻止部隊破壞財產與殺害民眾（卻對眾多的強姦受害者視而不見）。如今我們已無從得知究竟有多少平民在最初這波復仇浪潮中死亡。那些曾為希特勒獨裁政權工作的德國民眾，後來也陸續遭到蘇聯圍捕並且被監禁在先前的集中營裡。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這些被監禁的民眾有超過四萬三千人死亡，主要原因是營養不良與疾病。

儘管盟軍地面部隊較少蓄意屠殺平民，但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等盟軍空軍卻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以轟炸攻勢殺死了將近九十萬名平民，其中超過十四萬名受害者是解放區民眾。這一事實使我們更難對「避免平民受戰爭波及」這一原則進行法律判斷或倫理判斷。殺害敵國平民到什麼程度才構成戰爭罪，一直頗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空中轟炸會造成可怕的殺戮與破壞，因為轟炸可以讓整座城市陷入火海，成千上萬民眾在高爆炸彈、窒息或嚴重燒傷的影響下死去。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晚間，盟軍對德國漢堡市轟炸了一整晚，導致超過一萬八千名德國民眾化為灰燼。在風暴性大火下，街道散布著碳化的屍體，掩



體中的民眾也因為空氣中的氧氣被消耗殆盡而緩緩窒息。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的東京大空襲，也造成八萬七千名民眾死亡，同年八月廣島與長崎被投擲原子彈，總共造成二十萬人死亡，創下二戰時任何戰鬥人員在單一軍事行動中殺死平民人數的紀錄。

每個實施遠程戰略轟炸的國家，都知道這麼做會遭到既有法律觀點的譴責，因為戰略轟炸會讓平民與民間設施成為故意或「過失」轟炸的受害者。《海牙交戰規則》把保護平民不受空中攻擊列為首要任務，並且嚴格限制正當的攻擊目標。雖然《海牙交戰規則》並未獲得各國正式批准，但一般認為該規則具有國際法效力。西方各國普遍認為一九三〇年代日本轟炸中國城市，或義大利與德國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轟炸行為是一種恐怖攻擊，不僅藐視《海牙交戰規則》，也違反各國默認的國際戰爭法規。英國對於合法性的立場相當明確。一九三九年秋天歐戰爆發，英國空軍部與參謀首長會議旋即宣布，轟炸位於都市平民區的軍事目標，或在無法辨識目標的夜間進行轟炸，或故意轟炸平民與民間設施，全都違反了通行的戰爭法規。<sup>86</sup>一九四〇年，隨著德軍逐漸被妖魔化成為野蠻人，加諸於英國空軍機組人員的法律限制也逐漸解除，夜間轟炸更是愈發成為常態。反觀美國在評估何謂可接受的空中轟炸時，幾乎從未考慮這類法律限制。<sup>87</sup>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美國第八航空軍司令依克將軍表示：「我不覺得陸軍航空軍高層有什麼道德顧慮。軍人接受訓練，對於這種事本該習以為常……。」<sup>88</sup>無論是否出於故意，轟炸勢必會造成民眾的大量傷亡，而採取遠程戰略轟炸的各國，最後也逐漸接受這樣的軍事行動。各國空軍開始將轟炸大量殺傷民眾與嚴重破壞民間設施的法律責任拋諸腦後，轉而重視現實考量：如何最有效地轟炸敵人的後方。

時人普遍認為，軸心國以平亂之名面對面屠殺民眾，與空中轟炸造

成民眾死亡，兩者之間在法律立場上有著明顯差異。首先，被轟炸的城市幾乎都有戰鬥機與防空砲保護（不過中國城市缺乏有效的防空設施），機組人員進行轟炸時認為自己是在與正規軍交戰，而非單純或單方面地屠殺平民。此外，實施轟炸的人與地面的人無論在物理距離或心理距離上都十分遙遠，而這種距離感會讓人產生一種幻覺，以為轟炸與個人無關。理論上，民眾可以自由離開可能遭受轟炸的區域，而遭到當局鎮壓報復的受害者卻無法脫身。現實上，被轟炸地區的民眾只有有限的自由，因為不可能做到完全疏散（但光是擁有有限的自由，就足以影響外界對民眾是否為受害者的判斷）。最後，絕大多數轟炸行動針對的都是最廣義的軍事目標，包括戰爭產出有關的工業與運輸目標，比較少刻意以平民做為轟炸對象。執行轟炸行動顯然會造成民眾死傷，而且數量可能相當龐大，這也當然違反一九二三年的《海牙交戰規則》，但轟炸行動的目標是破壞工業設施而非殺傷民眾——這依舊是個細微的法律區別。然而，對於遭到轟炸的民眾來說，這樣的區別並無意義。

話雖如此，我們還是能看到刻意針對民眾的轟炸行動，那就是英國對德國的轟炸攻勢，以及一九四五年美國轟炸日本城市。在戰爭初期，英國一度認定即使是轟炸時的「過失」導致平民傷亡也屬違法。但英國皇家空軍後來仍舊在政府允許下，把軍事目標的定義擴大到包括整座城市與城市的人口——軍方的理由是這些都是敵人投入戰爭的資源。一九四一年七月與一九四二年二月，英國政府開始下令要求轟炸機轟炸德國的工人階級與民間設施，以打擊工人階級的士氣。英國官方使用了一套說詞來美化這項戰略轉變，也就是將殺害工人與「除去工人住家」定義為一種「經濟戰」，因此不算刻意轟炸平民。然而，空軍部的祕密訓令（更不用說邱吉爾鏗而不捨地要求轟炸「匈奴人的巢穴」）卻表明殺害平民與燒毀住宅區才是轟炸行動的真正目標。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空

軍參謀總長波特爾空軍中將（Charles Portal）向其他參謀長解釋，他打算在未來一年殺死九十萬名德國人，讓另外一百萬名德國人變成殘廢。<sup>89</sup>一九四三年秋天，轟炸機司令部的一名科學家遺憾地表示，最近的空襲未能將德國城市「一口氣燒成灰燼」。<sup>90</sup>英國轟炸戰略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後的激進化，完美體現在轟炸機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身上。他毫無顧忌地表示，空軍轟炸的目標就是大範圍地毀滅整座城市與殺死所有市民。當戰爭接近尾聲時，曾有人問他為什麼還要繼續轟炸幾乎已經摧毀殆盡的城市，哈里斯潦草地在信件邊緣寫道，他這麼做只是「要殺光德國佬」。<sup>91</sup>相較於炸死德國人，炸死法國、荷蘭、比利時與義大利平民具有比較大的倫理爭議。英國與美國最高司令部都以「軍事必要性」來解釋，表示這些民眾並不是轟炸的目標，因此他們是為了解放同胞而犧牲。反觀炸死德國平民則是當局故意的行為，而且為了殺死更多人，還投入大量的科學與技術研發。這項策略明顯違反了英國政軍高層自己在一九三九年提出的節制主張，也違反了一九一四年以前《海牙公約》規定不能以平民做為攻擊目標的精神。

上述的法律與道德約束原本可能阻止美國使用大規模燃燒彈來轟炸日本城市。當時美國陸軍航空軍計畫用燃燒彈殺死與致殘日本工人，同時將這些工人工作的地點（無論是住宅區還是工業區）予以摧毀。<sup>92</sup>美國駐歐洲戰略航空軍總司令史巴茲對於要用燃燒彈空襲日本感到震驚，他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記裡寫道：「我從來不贊成以殺光居民的方式來毀滅城市。」<sup>93</sup>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後來曾對轟炸一事向杜魯門總統抱怨，表示他不希望「美國背上比希特勒還糟糕的惡名」。<sup>94</sup>但從開戰那一刻起，也就是馬歇爾將軍下令對日本採取無限制空戰與海戰時，所有的法律或道德顧慮全被拋諸腦後。當時認定日本城市特別容易遭到空襲損壞，因為到處都是櫛比鱗次的房屋，更要命的是房屋大多是木造。

一九四四年二月，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建議羅斯福總統點起「難以控制的大火」，燒毀日本城市與散布在城市間的軍事工業區。就像德國工人一樣，日本工人也被當做敵方戰爭投入的一部分，是具有正當性的攻擊目標。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日本政府宣布動員所有人民投入戰爭之後，一名陸軍航空軍情報軍官寫道：「日本已沒有所謂平民。」<sup>95</sup>當美國陸軍航空軍在日本上空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平民時並不覺得自己正在犯罪，反而認定自己是在讓戰爭盡快結束，讓這個已經被妖魔化為野蠻偏執與惡貫滿盈的敵人盡快投降。太平洋戰場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司令李梅將軍寫道：「我知道當我們轟炸那座城市〔東京〕時，會殺死許多婦女與孩子。但該做的事還是必須做。」<sup>96</sup>現實上，這類空襲不僅違反了傳統戰爭法規，也違反了一九三九年九月羅斯福總統呼籲交戰國避免轟炸敵方城市的精神。這類攻擊行動也與美軍在歐洲戰場的策略完全相反——美軍反對英國轟炸德國城市的平民，認為這麼做缺乏軍事效率。但對於日本，美國卻以迫切的軍事必要為由，無視傳統上殺戮平民引發的道德顧慮。或許不令人意外地，當戰後英美審判戰犯時，都不願以轟炸城市做為起訴理由。一九四五年夏天，當有人想在倫敦發起對轟炸的相關起訴時，英國外交部堅持撤回起訴。因為不這麼做的話，西方盟國也將成為主要戰犯。<sup>97</sup>

## 種族犯罪

針對平民社群犯下的暴行有很多，其中一種便是以「種族」為出發點的極端暴力。各國在一戰前擬定的國際法條條約，完全未能預見種族差異將會導致特定種類的戰爭罪。一九一九年，戰勝的協約國一度考慮



起訴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暴行——當初這項研議如果通過，種族暴行很可能就會提早寫進國際法。然而，當時並沒有「種族滅絕」的概念，這個詞彙是二戰結束後才創造出來的，而且當時也不認為種族滅絕必須透過國際法程序來處理。由於沒有一套共同認可的法律，也未成立能夠進行審理的國際法院，最後土耳其的案子便因為過於複雜而無法審理。要宣判種族暴力有罪是困難的，因為在這個由帝國支配的世界裡，種族差異就是最顯著的特點，種族暴力乃至於種族屠殺也相當常見。一九一九年，當日本代表團在凡爾賽要求將種族條款寫入國際聯盟成立條約，以保障亞洲民族不會遭受種族歧視時，其他協約國居然拒絕日本的要求。種族分化早已深植在由歐洲白人支配的帝國世界觀裡。現代生物學也被動員來為優等種族與劣等種族的區別背書，即便種族歧視主要仍以既有的文化差異為基礎。出身帝國主義國家的歐洲人，認為世界其他地區都只是半開化甚或未開化種族，即使由歐洲人統治依然無法與歐洲人平起平坐。<sup>98</sup>這一種族化世界觀助長了對其他種族的深刻偏見，不僅在帝國內部如此，在東歐與中歐的族群熔爐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條約》逼迫中歐與東歐各族群接受主導民族的統治，至於前沙俄時代的猶太人柵欄區（歐洲猶太人絕大多數居住於此）則被嶄新而陌生的民族疆界給分割裂解。

在一個重視種族差異與種族階序的世界，當一九三〇年代有一方想建立新帝國而另一方想捍衛舊帝國的狀況下，種族必然成為爭議焦點。一旦戰爭引發嚴重動盪，那麼種族仇恨勢必將成為助長暴行與犯罪的關鍵因素。希特勒政權便是利用這種種族化的觀點看待敵人，以種族為藉口來施加極端暴力。然而，採取這套做法的政權並不只有納粹德國。一九三〇年代與一九四〇年代，日本與義大利打造新帝國的過程同樣以種族為基礎，兩國都吸收過去歐洲帝國主義的觀點，把新臣服的屬民視為

先天上比殖民者劣等的種族，因此可以像對待被殖民者那樣以暴力與輕蔑來對待。在太平洋戰爭中，雙方的野蠻行徑反映出兩種相互競爭的種族意識形態：日本人敵視白種人，而盟軍則對日本人帶有種族蔑視。在絕大多數狀況下，種族主義不是用來解釋暴力的唯一理由，但種族主義可以給出一個讓一般士兵都能瞭解的藉口，使他們正當化軍事暴力，忽視自己的加害行為明顯是一種犯罪行為。

在亞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以種族觀點看待敵人之事充斥著各個層級的戰鬥，進而影響了對民眾的嚴苛態度。日軍對占領區中國人的態度，源自於他們深信日本人是特殊的種族，日本人的歷史宿命就是必須支配占領的帝國領域，統治領域內的種族。在日本人眼裡，中國人就跟牲畜一樣，如果反對日本人的帝國就會遭到嚴厲對待。在東南亞的占領區，日本人總會單獨挑出中國人來施加暴行。在新加坡，英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投降之後，日本陸軍與祕密警察故意進行了「華僑肅清作戰」，以殘暴手段屠殺一萬名中國居民。在與歐洲國家及美國對抗的時候，日本一改原先對「白人聯合陣線」扼殺日本種族未來的擔憂態度，轉變成對白種人的輕視，進而無視戰場的交戰規則。日本媒體把美國描繪成一個野蠻國家，其野蠻充分體現在報紙刊登的一張照片上：只見羅斯福總統手裡拿著用日本人前臂骨雕刻的拆信刀。<sup>99</sup>日本對白人的種族敵視是數十年的憎恨累積而成，日本人不僅痛恨西方強權干涉東亞事務，也厭惡西方不斷藉由種族化世界觀來貶損日本人。只要日本征服東南亞，就可以反轉「白禍」威脅。<sup>100</sup>香港陷落後，日本人要求渾身髒汙的白人殖民者排成縱隊在街上行走，藉此向世界展示，白人自以為優越的主張根本毫無根據。

美國與澳洲對日本人的看法也源自於數十年來的偏見，但美國與澳洲參與太平洋戰爭的種族基礎，其實是由日本人發動入侵戰爭與日本人

作戰時展現的殘忍暴行所點燃的。美澳的態度有部分源自於滅絕美洲或澳洲原住民的暴力遺產。美國歷史學家內文斯（Allan Nevins）就認為，或許「沒有任何敵人像日本人一樣招人討厭.....與印第安戰爭的野蠻情緒曾經長久被遺忘，如今又再次遭到覺醒.....。」<sup>101</sup>美國民眾與軍隊都希望滅絕日本人。對太平洋戰場美軍退伍軍人進行的民調顯示，百分之四十二希望徹底消滅日本人。同盟國媒體同樣營造出對日本人的極端種族偏見，這種偏見也被軍隊吸收，促成太平洋戰場上的無節制暴力。一名美國中尉寫道，日本士兵「活得像老鼠，說話的聲音像豬，動作像猴子」。美國陸軍一本談「日本鬼子」的訓練手冊提到，日本士兵身上帶有一股「動物的野味」。<sup>102</sup>美軍士兵於是把日本人看成獵物，可以用來打獵消遣。「開放狩獵日本鬼子」成了流行的汽車貼紙，此外還有無數的打獵比喻，強化美國既有的邊疆遺產與太平洋新邊疆之間的連結。<sup>103</sup>澳洲軍隊也對「醜陋的黃種人」或「骯髒的黃色雜種」帶有類似的種族化敵意，一名士兵說道：日本人的行為就像「帶有某種人類特質的聰明動物」。一九四三年，布萊米將軍（Thomas Blamey）在對澳洲部隊演說時提到，日本人是個「奇怪的種族，是人類與猿猴的混種」。<sup>104</sup>既然都能用充滿貶意的種族詞彙來形容敵人，那麼對這個敵人使用極端暴力似乎也不意外。這也是過去數十年來亞洲人與西方人接觸經驗的重演。

歐洲戰場的種族暴力經驗與太平洋戰場不同。西歐戰場確實有著強烈的敵意，但大部分是對敵人帶有粗糙刻板印象的結果，與種族本身並無直接關係。美國民調顯示，只有十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德國人應該予以滅絕或絕育。儘管如此，種族暴力在西歐戰場依舊存在，那就是德國人在一九四〇年法國戰役中對法國人僱用黑人軍隊的反應。德國人基於種族因素，會對黑人部隊施加暴行，不過這些暴行仍停留在各部隊自發

進行的程度，尚未上升到系統性採取行動的層次。德軍對法國僱用黑人殖民地士兵的敵視，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戰與一九二三年法國占領魯爾工業區時期，當時黑人士兵被用來執行法國對德國的賠償請求。當德軍在一九四〇年遭遇來自西非的塞內加爾步槍兵時，他們幾乎不留活口，並在該年五至六月的一連串暴行中殺害了一千五百名黑人。黑人士兵頑強抵抗，有時俯臥低下身子，從側面與後方攻擊德軍。德國軍官認為黑人是野蠻人，因為黑人據說會使用傳統大砍刀來肢解德軍戰俘。雖然不是每支德軍部隊都會殺害黑人士兵，但與白人士兵相比，淪為戰俘的黑人士兵生活條件較差，較容易成為種族歧視的目標。陣亡的塞內加爾步槍兵無法獲得埋葬，即使被埋葬，墓地也不會被標記出來。<sup>105</sup>

至於德國在東方的戰爭，從波蘭戰役到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戰役，則是打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種族色彩。這裡出現的暴行，並不只是戰場環境影響的結果，更是德國政軍高層刻意制定的政策得到施行的結果。德國第三帝國特別重視種族清洗與野蠻殖民，關於這點我們已在第二章做過介紹。儘管如此，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由軍人、警察與安全部隊對蘇聯猶太人所犯下的屠殺，卻屬於一種獨特的種族暴行，反映出納粹政權把種族問題視為首要之務。德軍在鎮壓叛亂與綏靖時對非猶太人的殺戮雖然也帶有種族考量，但整體而言仍屬於無差別式的野蠻治安行動的一環，種族並非主要原因。歐洲的羅姆人與辛提人（Sinti）估計有二十一萬兩千人遭到殺害，這反映了對游牧民族的偏見，認為他們容易成為間諜、罪犯或破壞者，而這些人遭到迫害顯然也是種族偏見所造成。在東歐的羅姆人與辛提人會被當成游擊隊或游擊隊的共犯，這表示他們會「被當成猶太人」，整個家庭會遭到殺害，通常與猶太受害者一起遭到屠殺。<sup>106</sup>對於進行屠殺的人來說，即使是殺害蘇聯猶太人（屠殺範圍很快擴大到所有男女老幼），也不完全是基於種



族考量。有人認為蘇聯猶太人等同於布爾什維克病毒的攜帶者，這種說法是為了替猶太人種族滅絕計畫披上一層虛假的政治外衣。還有人虛構猶太人是騷擾德軍的主要叛亂分子，這也是一開始用來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藉口。一九四一年九月，親衛隊將領熱勒維斯基宣稱，「有游擊隊的地方就有猶太人，有猶太人的地方就有游擊隊。」<sup>107</sup>這種粗略的三段論掩蓋了一九四一年夏秋發生的事實：猶太人無分年齡或性別，只因他們是猶太人就遭到屠殺。

德國在入侵蘇聯的最初幾天，就以猶太人阻礙德軍前進這個微不足道的藉口展開對猶太人的暴行。實際理由依然不清楚，但德軍總是會誇大民眾的潛在威脅。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下達的「犯罪命令」明確提到消除蘇聯共產黨或蘇聯公務員內部的猶太男性，但命令沒有提到要動用軍隊與安全部隊無差別地屠殺猶太人。不久，所有猶太役齡男子也被加入受害者清單中。就在希特勒與希姆萊批准殺害選定的猶太目標後，德國高層一度關切德國民眾與東線戰場的德軍士兵是否會對大屠殺的證據產生反感。不用多久，德國高層就發現這份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從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後，安全部隊、警察與軍隊，連同派駐東線戰場的四支特別行動隊，開始合作辨識與清除猶太人，而這也成為德國在整個占領區實施種族清洗計畫的一部分。<sup>108</sup>

到了這個階段，猶太人大屠殺其實已經展開。六月二十三日，保安處在立陶宛城鎮加爾格日代（Gargždai）逮捕兩百零一名猶太人（包括一名婦女與一名小孩），罪名是反抗德軍，這些人在隔天即遭當地警察處決。六月二十七日，在比亞維斯托克，這裡在一九三九年蘇聯入侵前原是波蘭東部領土，陸軍第兩百二十一警備師命令秩序警察殺害兩千名猶太人，多達五百名男人、女人與小孩活活燒死在猶太會堂裡。在此之前，德軍高層從未下達殺害婦孺的指示，但到了七月底，或許是在希姆

萊的堅持下，殺害婦孺成了標準程序。同月，特別行動隊C隊指揮官耶克爾恩（Friedrich Jeckeln）下令親衛隊第一旅在日托米爾附近實施清洗行動，總共殺害一千六百五十八名猶太男女。七月三十日，特別行動隊第九分遣隊在維伊列卡（Vileyka）槍斃了三百五十名猶太男女，此前該隊隊長曾被訓斥未能依照新指示行事。八月之後，婦孺也被納入屠殺的固定清單。<sup>109</sup>

屠殺猶太人的規模急遽擴大，其實也和所謂「自我清洗」的背景有關。波羅的海國家、波蘭與羅馬尼亞的非德國人皆利用蘇聯勢力突然崩潰的機會，對當地猶太人進行野蠻報復。他們指控猶太人諸多罪名，其中一項是與蘇聯占領者串通。這些暴行有些是自發性的，有些則來自德國的壓力。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蘇聯對波蘭東北部的統治十分嚴酷，因此在蘇聯撤退與德國建立新秩序的這段空窗期，當地民眾至少在二十座城鎮屠殺猶太人。當德軍往東推進時，波蘭人組織了維安團體來報復猶太人。六月二十三日，在科爾諾（Kolno），德國士兵看到當地波蘭人殺光了猶太人家庭。在格拉耶沃（Grajewo），根據戰後證詞，有數百名猶太人被關在猶太會堂裡遭受可怕的拷打：手被鐵絲綁起來，有些人的舌頭與指甲被拔掉，所有人每天早上都要被鞭打一百下。在拉齊洛夫（Radziłów），波蘭人殺害與強姦猶太鄰人，逼迫倖存者進入穀倉後再縱火燒掉穀倉；當更多藏匿的猶太人被發現時，這些猶太人被迫爬上梯子，然後跳進火中。曾有波蘭地方官員詢問德國人，在發動反猶騷亂之前是否可以殺害猶太人，結果德國軍官回答：猶太人「沒有任何權利」，波蘭人可以任意處置猶太人。<sup>110</sup>柏林當局密切注意事態發展，但無意阻止暴力事件發生。一九四一年六月，海德里希通知特別行動隊，「不應該阻礙『自我淨化』……反而應該從旁加以煽動。當然這種事必須暗中進行，加以協助，使其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sup>111</sup>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羅馬尼亞加入入侵蘇聯的行列。羅馬尼亞陸軍與警察單位也隨後對猶太人展開野蠻暴力。當紅軍迅速撤離他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占領的羅馬尼亞比薩拉比亞省與北布科維納省時，當地社群就開始對猶太鄰人展開一連串的反猶騷亂，因為當地猶太人被指控曾經協助蘇聯「猶太布爾什維克」入侵者。當羅馬尼亞軍隊在幾天後抵達時，大屠殺早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估計死亡人數約在四萬三千五百人到六萬人之間。羅馬尼亞軍隊與憲兵的抵達升級了暴力。七月四日，在北布科維納省的斯托羅日內茨（Storoginet），士兵槍斃了兩百名男人、女人與孩子，受害者的住家則遭到鄰居劫掠，北布科維納的烏克蘭農民採取了更加凶殘的報復行動，用農具殺死他們的猶太鄰人：一名負責處理符合猶太教潔食規定的屠夫，居然活活被自己的工具鋸成數段。<sup>112</sup>德國特別行動隊D隊從旁協助羅馬尼亞人，但暴力已超過親衛隊挑釁煽動的程度。就連德國的觀察者也對於羅馬尼亞軍隊與當地共犯表現出來的殘暴與無紀律感到吃驚。直到羅馬尼亞與德國的軍隊攻下敖得薩為止，這場暴力一直沒有降溫的跡象。

波蘭與羅馬尼亞的暴力，是戰前反猶太主義文化與對於猶太人涉嫌協助蘇聯占領而產生的憎恨，兩者相輔相成的結果。德國當局迅速採取行動，結束這一場無休止的暴力與對猶太人財產的大規模掠奪。儘管如此，龐大東歐地區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九月所顯露的反猶情緒，替德國當局掃除了殘存的疑慮，決定升級日後對猶太人的暴力。事實上，確實有德國安全部隊在看到猶太人社群的無限制屠殺後，開始採取更具種族滅絕色彩的暴力行徑。除此之外，一旦德國沒有足夠人力擴大殺戮規模，那麼從波羅的海國家的警察與民兵，或是從曾被蘇聯占領的比薩拉比亞與烏克蘭找到熱情的反猶太志願者，大概也不是什麼難事。為了辨識、圍捕與看守猶太人，並且在之後將他們押送到處決地，納粹德國還

需要建立一支輔助部隊。到了一九四一年末，已經有三萬三千名輔助警察（Schutzmannen），一九四二年夏天達到十六萬五千人，一九四三年來到巔峰的三十萬人。白俄羅斯人偶爾也會主動屠殺當地的猶太人，例如一九四一年十月掠奪鮑里索夫猶太區與屠殺六千五百名到七千名居民。<sup>113</sup>舉報藏匿的猶太人或揭發試圖隱匿猶太人身分的人十分普遍，因此德國當局設立了正式的舉報單位來鼓勵檢舉。一旦舉報資訊正確，就會給予一百盧布做為報酬，有時還會承諾給予猶太人的住房。<sup>114</sup>

最早對蘇聯猶太人展開大屠殺的，幾乎清一色是德國人。一九四一年七月，希姆萊與秩序警察首長達呂格（Kurt Daluege）大幅擴充實施屠殺的部隊數量。除了最初的三千名特別行動隊，又從後備警察營中抽調了大約六千名秩序警察，此外還有一萬名武裝親衛隊。人員會定期輪替補充，但在往後一年的屠殺中，負責採取行動的人員幾乎都維持在兩萬人左右。有必要的話，保安處與安全警察也會協助，另外軍方也會派出戰地祕密警察與戰地憲兵進行支援。雖然比較不常見，但國防軍有時也會被要求提供武器彈藥與補給物資——對此國防軍不僅願意提供，有時還會派出士兵進行屠殺。雖然國防軍將領對於無差別殺害猶太人興趣缺缺，但第六軍團司令賴赫勞元帥的觀點也獲得不少人贊同，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對部屬表示：「必須讓次等的猶太人嚴厲而公正地贖罪。」<sup>115</sup>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在逮捕了兩名據說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的猶太人之後，賴赫勞的部隊與特別行動隊C隊下轄的特遣隊4a小隊合作，在日托米爾圍捕四百零二名猶太人，主要都是年老的男性，之後便將這些人處決。受害者會站在預先挖好的坑洞前面，然後由行刑隊將其槍斃。然而，這種在地方墓地進行的屠殺凸顯出一些早已存在的問題：根據觀察，當這些受害者掉入洞中之後，大約還有四分之一的人其實還活著，畢竟要對受害者的頭部精準射擊有其難度，因為受害者的



腦漿與鮮血會噴濺到處決者身上。最後行刑者索性不管那些半死不活的人，而是任由下一批屍體壓上去，再鋪上一層土。處決結束後，親衛隊與國防軍軍官還會討論如何更有效地進行殺戮與減少處決者的心理壓力。<sup>116</sup>

往後幾個月，親衛隊、警察與軍隊逐漸發展出一套井然有序且可以適用在任何地方的屠殺程序。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地方國防軍指揮官的催促下，各單位在德軍占領的蘇聯城市莫吉廖夫開會，討論如何建立一套處置猶太人與游擊隊的流程。處決步驟最後終於在實際處決三十二名猶太男女之後確定了下來，而這種透過實際操作而建立的步驟也開始廣泛推行。有些人可能對婦孺下不了手，於是同意讓婦女抱著孩子，處決者先處理孩子，再送孩子的父母上路。當特別行動隊接到殺害婦孺的命令時，特遣隊11b小隊隊長親自向隊員示範如何執行槍決：先射殺嬰兒，然後再射殺母親。<sup>117</sup>秩序警察一般先由警官向警員示範如何射擊受害者的後腦勺，再讓警員跟著照做一遍。一九四一年春初，第二波屠殺開始，軍警單位吸收前一年的經驗，採取了讓處決者較無心理壓力的屠殺方式，試圖讓屠殺的效率最大化。屠殺需要精確分工，有當日輪值的「射手」，有人負責押送受害者到坑洞前，有人負責開卡車，有人負責將坑洞裡的屍體堆放整齊以利後續堆疊。一名在塔爾諾波爾

（Tarnopol）被殺的猶太人，死後留下一封未投遞的信，信中描述了整個殺戮過程：「他們首先要整理墓坑中被處決的人，讓空間能夠充分使用且看起來整齊劃一。整個過程不需要太長時間。」<sup>118</sup>處決時出錯是不被允許的（雖然不一定會受懲罰），處決者必須維持超然而無動於衷的心態，彷彿是在進行一場困難的外科手術而非令人髮指的暴行。表現過於殘暴的親衛隊隊員（這樣的人非常多）偶爾會有破壞紀律的風險，畢竟做出與親衛隊不相稱的行為將有損組織精神。儘管如此，當慕尼黑

親衛隊法庭評斷一九四三年某個親衛隊軍官的行為時，法庭認為無論他的行為如何失格，「猶太人都必須滅絕，因此無論對猶太人做出何等失格之事，這一結局都不會改變。」<sup>119</sup>

戰場上針對蘇聯猶太人的暴行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二年。同年初，德國開始設立滅絕營，準備對全歐洲的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滅絕營是由親衛隊高層設立，部分原因是想減輕在俄羅斯從事屠殺的親衛隊隊員的心理壓力。前線的殺戮依然沒有終止跡象，這是因為德軍在一九四二年仍持續推進，許多在前一年逃離占領區的猶太難民又再度落入種族滅絕的羅網。一九四二年九月，第四裝甲軍團的通信小隊在通往史達林格勒路上的一處偏遠村落佩列格魯茲內（Peregruznoe），以取得遙遠蘇聯前線情報為藉口，抓捕了所有的猶太居民與難民，包括了男人、女人、小孩與嬰兒。這一逮捕行動並未獲得上級授權或指示，但身為一名忠實的納粹黨員與反猶太主義者，隊長費雪中尉（Fritz Fischer）很可能是想為種族滅絕計畫做出一己貢獻。他選擇下令將猶太人連夜送上卡車，由一小群士兵載到草原地帶，這些士兵可能是自告奮勇，也可能是無法拒絕費雪的命令。第一輛卡車停了下來，猶太人被允許下車。當他們有些人試圖逃跑，有些人還待在原地猶豫時，士兵們開槍將他們全數擊斃。等到運送下一群猶太人時，為了不想在原先處決的屍體堆中執行任務，卡車沿著道路繼續往前多開了兩百公尺，另外找一處乾淨的殺戮地點。最後，士兵們順利完成任務，趕在早餐前回到了營區。<sup>120</sup>

在佩列格魯茲內發生的殺戮事件，只是數千起屠殺中的其中一件，但這起事件引發的問題，卻可以適用在德國人面對面處決猶太人的所有案例上。這些殺戮不同於波蘭、羅馬尼亞或波羅的海國家爆發的反猶騷亂，這三個地區的社群屠殺的是與他們混居的猶太人，種族仇恨激發的極端暴力與掠奪頂多只持續數天。但德國人的殺戮卻是有系統且持續性

的。秩序警察執行了絕大多數的殺戮任務，他們不只負責一場屠殺，而是一場接著一場。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首次執行任務，屠殺了約瑟夫烏猶太區（Józefów Ghetto）大約一千五百名猶太人，九個月後，該營參與的屠殺累積量已超過八萬名猶太男女與幼童。<sup>121</sup>與反猶騷亂的煽動者不同，德國的加害者不認識受害者（他們仰賴當地民眾告密來找出猶太人），而且也沒有理由憎恨受害者。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屠殺是不帶情感的，這點與二十世紀其他種族滅絕暴力完全相反，同時也與本章描述的其他類型犯罪不同。德國的加害者如何能不帶情感地進行無差別殺戮，而且鏗而不捨地追捕每一個猶太人？如果要從歷史學與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這種現象，確實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

我們通常認為，納粹政權的反猶意識形態已經深入人心，因此前線的加害者往往是藉助這種意識形態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與擺脫內心的疑慮不安。所有參與屠殺的人，顯然都知道自己服務的是一個反猶政權，對於這個政權來說，核心說詞就是把猶太人妖魔化，使其成為德國人的大敵。宣傳機器不斷向前線士兵灌輸，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份刊物所言，我們當年的戰爭核心目標就是建立「一個沒有猶太人的歐洲」。<sup>122</sup>我們確實不大確定一般士兵與警察是如何將猶太人是德國的「世界敵人」（Weltfeind）這一觀念，與他們所屠殺的那群恐懼茫然且貧困蜷縮在一起的猶太人連結起來。過往談到東線戰場上的屠殺部隊時，絕大多數都會強調煽動者的重要性，也就是安全部隊與警察部隊裡的中下層軍警官。這些人接受了額外的政治訓練，包括一些以「猶太世界陰謀的邪惡本質」為核心的正規課程。對於猶太威脅的幻想，充分展現在安全部隊、親衛隊與陸軍的對話與書信中。我們可以從這些文字描述中看出，納粹政權的偏執很容易就能掀起一場大規模屠殺。一九四四

年，一名德國步兵在思考戰敗可能性時提到，「猶太人會攻擊我們，滅絕一切與德國有關的事物，還會有一場殘酷而恐怖的屠殺。」<sup>123</sup>有些部隊的軍官與士官，有很高比例是納粹黨員或親衛隊員，這些人彼此之間會產生一種競爭意識，希望更有效率地執行屠殺任務。<sup>124</sup>至於警察或陸軍部隊中負責屠殺的一般士兵，則無法輕易歸納出單一特質。他們代表了德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有些人對於政權追求的目標忠實執行，有些人則不是如此。但無論是抱持懷疑、熱情還是冷漠的態度，當這些被徵召上前線的士兵必須扮演屠夫這個出乎意料的角色時，幾乎沒有人拒絕參與。

研究加害行為的社會心理學家表示，在奉命執行侵害他人的任務時，加害者會以各種方式來應對他們奉命執行的任務，而不光是單純地服從命令。<sup>125</sup>進行屠殺的人來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種類的人格，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來適應殺戮。一旦制定了標準程序，分工合作可以讓部隊的一些人不用實際從事殺戮工作，例如他們可以自願當卡車司機、守衛或文書人員。拒絕參與是可能的，但拒絕參與的人總有一天還是會接受這項任務，因為若自己不做，其他夥伴就必須承擔他的工作，久而久之自己會感到羞愧。有些人在嘗到流血快感之後，便會表現出積極的熱情，積極到有時必須加以約束。有些人偶爾會發展出對受害者的仇恨，認為是受害者的命運迫使他們在不情願的狀況下淪為殺人者，並且將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歸咎於猶太人而非自己。無數士兵與警察拍下受害者被折磨的照片，使得無端殘酷虐待的證據與令人瞠目結舌的影像四處流傳。圍觀者的數量驚動了蓋世太保長官穆勒（Heinrich Müller），他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下令特別行動隊「禁止在大規模處決時有人在旁邊圍觀」。<sup>126</sup>在希姆萊的堅持下，處決者在進行屠殺之前與屠殺期間可以獲得大量的酒類供應。烏克蘭的輔助部隊以酒後的殘酷行徑而惡名



昭彰，據說他們會把小孩拋到空中，然後像打鳥一樣射殺他們。在恣意屠殺之後，參與者連續幾晚飲酒狂歡。在基輔附近的娘子谷大規模處決了三萬三千名猶太人與蘇聯戰俘後，處決者享受了一頓宴席以紀念這場非比尋常的任務。親衛隊長官安排了連續幾晚的餘興節目，目的是為了減輕處決帶來的心理衝擊，避免對處決者的「心靈與性格」造成傷害。希姆萊希望處決者能團結起來，在從事艱難工作時依然能像個體面的德國人，避免養成嗜血性格與陷入「憂鬱」。<sup>127</sup>有些處決者確實受不了持續屠殺帶來的壓力而神經崩潰，他們將被送回德國，成為工作艱困而造成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有些人認為，加害者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加害行為的受害者，因此加害者也需要撫慰與修復。我們都聽過不少這類道德翻案的觀點，但正是這種觀點使德國的殺戮成為可能。關心加害者的福祉，而對真正的受害者置之不理或視而不見，這就是加害者與他們的指揮官所居住的扭曲道德宇宙。猶太人社群被擺放在屠殺者的道德宇宙之外，屠殺者只對部隊其他人負有義務，只對自己的任務負有責任。現代神經醫學把這種心理過程稱為「他者化」，而這種過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猶太受害者淪為這場殘忍抹除儀式的物件。從負責屠殺的部隊留下的敘述與證詞中可以發現，幾乎沒有任何加害者對受害者顯露出一絲同情，因為這麼做等於重新接納了受害者，使受害者與他們身處於同一個道德宇宙。這些加害者把罪惡感擺在一旁，極力表現出焦慮的樣子，好讓自己不會流露出任何軟弱或同情。當你與所屬團體共同犯下相同罪行時，你就不會再把這些行為視為傳統意義上的犯罪。

## 戰爭與性暴力

二戰期間針對女性犯下的罪行，究竟是違反了狹義的戰爭罪或反人類罪，至今看法仍舊莫衷一是。敵軍對待女性受害者的方式顯然是反人類的，而且例子不勝枚舉。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入侵拉脫維亞，符騰堡—巴登擲彈兵團的一隊士兵抓住里加大學兩名女學生。在脫光她們的衣服之後，士兵將兩人綁在椅子上，把椅墊拿掉換成兩片錫板，再把兩個火爐放在椅子下面烤。就在受害者扭曲慘叫的同時，這群德軍居然圍成一圈繞著她們跳起舞來。當德軍於一年後再次奪回克里米亞城鎮時，他們發現當地紅十字會護士的屍體。這些護士遭蘇聯士兵脫光衣服、強姦與折磨，有些人胸部被割下，有些人陰部插著掃帚柄。亞洲戰場上針對女性的暴行更是家常便飯。在華北的北票地區，日軍會當著家人面前強姦女性。一名孕婦被迫脫光並綁在桌上，遭強姦後再被刺刀刺入腹部，取出胎兒。士兵還對這些可怕的景象拍照留念。<sup>128</sup>

這些悲慘故事透露出毫無限制的虐待傾向。相關記載的共通之處，都是男性殘忍地剝削女性以尋求快樂，這也是這類暴行最獨特之處。雖然此處只是茲舉幾例，但這些例子可以不斷複製，同時在許多不同脈絡下發生。對於戰時婦女遭受性虐待一事，國際法規往往缺乏明文規定，這多少是出於這類犯罪與受害者的性質影響。在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約》中，對「家庭名譽與權利」的保護是屬於平民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當時所謂的「名譽」就是指女性在戰時不可遭受侵害。一九二九年《日內瓦公約》明確規定女性戰俘的「待遇應充分顧及其性別」。然而，一直要到一九四九年《日內瓦第四公約》針對性犯罪明確定義之後，「強姦、強迫為娼或任何形式的非禮之侵犯」才終於被規定為非法。<sup>129</sup>而在國際法之外，強姦在絕大多數軍事司法體系都被認為是一種犯罪。正如士兵不許掠奪敵國或盟邦，性掠奪也被視為一種讓軍隊蒙羞與破壞軍

紀的犯罪。儘管如此，性犯罪依舊與掠奪一樣普遍，但嚴重程度卻更難衡量。性犯罪或其他可以定義為「性騷擾」形式的女性受害者，她們對於自己遭受的痛苦往往難以啟齒，或無法找到願意認真看待她們遭遇的管道。<sup>130</sup>當時社會並不鼓勵人們公開談論性犯罪，加上男性可以採取矢口否認的策略，更加強了這種羞恥文化。

「性」顯然是重大的戰時問題。數千萬名男性被迫離開家鄉好幾年，待在幾乎全是男性的組織裡，能夠返鄉與家人或伴侶團聚的機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愈來愈少。許多人長期承受巨大壓力與過高的敵對情緒，這些都增強了他們的性衝動與性挫折。軍方瞭解這些問題存在，但也深知若不管制性交的機會，或給予士兵適量的預防用品，很可能會有引發性病流行的危險。日本陸軍省認為開設軍中妓院對於士兵的心理衛生與戰鬥精神「特別有益」。陸軍省下達的訓令表示，提供性撫慰可以「提升士氣、維持紀律、防止犯罪與性病」。日軍在戰爭期間發放了超過三千兩百萬個保險套給士兵以防止疾病傳播，然而保險套的發放不定期，導致士兵必須洗淨再反覆使用。<sup>131</sup>希姆萊認為定期上妓院不僅可以提升德國士兵的效率，也能提振強制勞工與集中營囚犯的工作精神。德國在集中營設立了十座妓院營區，分別位於德國、奧地利與波蘭，專供擁有特權的囚犯使用。<sup>132</sup>希姆萊還認為此舉可以控制性病的傳布。為了確保士兵與親衛隊不會輕信虛假的預防偏方，希姆萊禁止其他坊間預防方式，只提供保險套供士兵免費使用。<sup>133</sup>德軍也針對性行為頒布指導方針，要求士兵「需自我約束與尊重女性」。另一方面，武裝部隊與親衛隊也設立負責治療性病的衛生所，這些設施的重點不在於指責士兵缺乏自制，而是要讓他們早日回到前線作戰。<sup>134</sup>

英國陸軍並未設立妓院，不過軍方也不禁止士兵上妓院，唯有開羅的紅燈區「貝爾卡」（Berka）除外，因為這裡性病盛行。英國陸軍醫

療單位的態度是希望英國士兵能行為端正，不要上妓院，也不要進行任何性行為。軍官應該重視自己的榮譽，不應該尋芳問柳，如果這麼做就可能會被革職。中東司令部醫療長官科威爾少將（E. M. Cowell）表示，性自制「是對自己、對家人與對同袍的責任」。若要發洩精力可以透過劇烈運動，但對於無法抵抗誘惑的「愚蠢好色之徒」（引自一名資深性病醫生的說法），軍方也會提供預防措施（肥皂、脫脂棉、抗菌乳霜）。如果士兵感染性病後痊癒，他們還必須配戴紅色領帶做為一種羞辱標記；如果士兵感染性病卻不通報，則會被扣薪或降級。在中東戰場，感染性病的比例隨時間而不同：一九四〇年每千人有三十四人感染性病，到了一九四二年下降到二十五人，但在戰爭結束時的義大利戰場，比例則提高到七十一人。這些比例相對偏低，顯示英國軍方要求士兵自制與選擇以運動來發洩精力的方式並非毫無效果。<sup>135</sup>

對於德軍與日軍來說，妓院構成了兩國戰時軍隊文化的核心特徵。早在一九三六年，德國軍事當局已經認定軍中妓院有「急迫的必要性」。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德國內政部下令興建妓院營區，讓娼妓可以集中服務軍隊。這些娼妓必須定期接受身體檢查，而士兵前來買春的次數也限制在一個月平均五到六次。軍中妓院大部分分布在東線戰場，因為西歐的德軍士兵可以利用既有的紅燈區。被抓去服務軍隊的妓女實際遭到了監禁，拒絕到軍隊賣淫可能會被送進集中營，而一九三〇年代確實有妓女被以「反社會」的罪名送進集中營。為了達到一定的妓女員額，警察會把一些傳聞中生活不檢點與性生活淫亂的婦女與女孩列為強制賣淫的對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軍中妓院開始出現大量來自東方占領區的女性，包括辛提人、羅姆人乃至於猶太女性，而後者似乎完全不受一九三五年《紐倫堡法案》禁止與猶太人發生性關係的規定影響。由於當時蘇聯社會賣淫並不常見，因此要找到蘇聯妓女並不容易，但這也



表示許多「自願」進入妓院的蘇聯婦女完全是迫於飢餓與貧窮才出此下策。一名跟隨義大利軍隊前往蘇聯的義大利警察描述自己在妓院看到的悲慘景象。他去的那間妓院，妓女幾乎全是當地婦女：「骨瘦如柴，營養不良，笨拙不靈活的身體，身上只披著破布般的衣服，眼神充滿了恐懼，坐在冰冷汙穢的凹室。」有很高比例的年輕女孩被生活所逼，想到軍中妓院賣淫，這些女孩很多都還是處女，但通常會遭到軍方拒絕。德國的妓院組織者開始僱用波蘭女性，而義大利妓院的管理者則是從羅馬尼亞進口女孩。<sup>136</sup>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當德軍從原本占領的蘇聯領土撤退時，他們把焦土政策延伸到被迫賣淫的婦女身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德軍撤離基輔，臨走前殺死了上百名妓女，並且將她們的屍體丟入娘子谷。<sup>137</sup>

二戰時規模最大且最具壓迫性的軍中妓院是由日軍設立的。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在滿洲與華北爆發衝突開始，一直到二戰結束為止，日軍建立了廣大的妓院網：包括常設的軍中妓院，隨著前線移動而臨時設立的性交易所，以及規模較小且通常未經授權的留置所，女性在留置所會遭到監禁與強姦。即便到了戰爭結束之際，日軍仍舊因為戰敗的恥辱而對強制賣淫的娼妓施加極度暴力，造成數千人死亡。這些妓院有些是由中國的通敵者經營，他們利用中國當地的娼妓或綁架婦女與女孩來滿足日本人的需求。這些妓院種類各自不同，但都用一個諷刺的名稱來概括，那就是「慰安所」，在裡面接客的就是所謂的「慰安婦」。

「慰安」一詞暗示男性才是戰爭的受害者，遭到強制賣淫或性奴役的女性反而不是。日本的軍中妓院體系規模非常龐大。根據軍方估計，每七十萬名日本士兵大約需要兩萬名女性。平均一名女性每日「應該服務」的男性數量在三十到三十五名之間。<sup>138</sup>有些女性是日本警察從日本大量的娼妓人口中招募的；朝鮮娼妓無論願不願意，都會被徵召到軍中賣

淫，另外還有數量不明的朝鮮女性被綁架或欺騙到軍中賣淫。根據估計，軍中娼妓的總數大約在八萬名到二十萬名之間，其中五分之四來自朝鮮。<sup>139</sup>日本娼妓獲得的條件最好，她們簽訂契約，可以收到小費；許多人進入專門服務軍官的慰安所，獲得的待遇也較佳。但她們不能自由離去，而且奇怪的是，跟軍隊一樣，她們如果擅離職守會遭到懲罰。

對於成千上萬被禁錮在非正式慰安所廣大網路裡的婦女及女孩來說，她們賣淫完全是出於被迫。在整個中國占領區，日後擴大到馬來亞、緬甸、荷屬東印度群島與菲律賓，許多女性遭到綁架，或被虛假的工作機會欺騙，或被自己的家人賣掉以滿足日軍與日俱增的性需求。有些被俘的歐洲婦女也被迫賣淫，如果不從就會被處死。這些女性受害者實際上淪為性玩物，日軍後勤單位甚至把她們歸類為「軍事補給物資」。在中國，大概有多達二十萬名婦女在慰安所遭受虐待，她們被當成囚犯，如果想逃跑，就會遭到嚴懲。在一些逃跑的例子中，有一名婦女的家人遭到斬首，除了做為對她的懲罰，也用來警告其他婦女。個別部隊在前線設立的慰安所幾乎不存在任何管理。有些留置所，或者有時被稱為「遊郭」，裡面拘留了一些婦女，這些婦女會遭到士兵的反覆強姦。一些倖存的中國女性提到自己每天都會遭到毒打，加上粗劣的食物，身體很快就吃不消。在日軍占領的海南島，有超過六十間慰安所為人數不多的占領軍服務。原本島上有三百名中國婦女遭受性奴役，等到戰爭結束時已經有兩百名婦女死亡。軍方幾乎不曾禁止士兵虐待婦女，因為就算這些婦女死了，也能再綁架一批來補充。婦女要是懷孕或染病，通常就會被殺害。在華中的一處「慰安所」，婦女因為被多次強姦而懷孕，最後她被脫光綁在木樁上，被先前虐待她的士兵拿來練習刺刀術。<sup>140</sup>無論如何能言善道或在語言上投機取巧，都無法掩蓋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造成婦女大量死亡的事實。這些女性遭到大量士兵強姦：任

何被強迫賣淫的婦女，如果她在受虐一百天後依然能夠存活，那麼就表示她最多可能被強姦了三千次。

日本的「慰安」制度有許多令人感到殘酷的諷刺之處，其中一項就是軍方最初其實是希望「慰安」制度可以減少不受控制的強姦風險與防止疾病蔓延，同時可以向地方民眾確保日軍的綏靖不會造成無限制的性犯罪。結果實際上恰恰相反，日軍設立的「慰安所」，反而造成日軍隨機且普遍地強姦占領區的女性。強姦是戰時最讓女性感到痛苦的暴力形式，但除了強姦外，還有更多無須動用武力的性騷擾方式。女性囚犯經常被要求脫光衣服接受訊問，因此深感焦慮與屈辱。由男性進行貼身搜索也是在侵害女性身體的完整性，對女性的拷問也往往涉及對外陰部用刑或威脅進行強姦。<sup>141</sup>然而，無論一般男性如何看待對方對於性事的意願，強姦的定義始終相當明確：強姦就是在未取得女性同意下對其進行性侵害。儘管如此，二戰時期的司法單位在衡量強姦罪的輕重時卻存在有許多模糊空間，進而影響了許多男性主導的軍事體制對強姦的看法。小說家暨二戰退伍軍人沃頓（William Wharton）日後回憶說，俄國士兵就像「獵捕鹿群或兔子一樣地」追捕女性，美國大兵則用香菸與食物來引誘走投無路的婦女，而這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美國大兵的行為「其實幾乎無異於強姦，只是沒有採取嚴重的暴力」。<sup>142</sup>當成千上萬名女性想藉由短期賣淫來度過艱困與飢餓的生活，這類情事不斷考驗著所謂「合意性交」的極限。

在男性主導的體制裡，強姦通常很難獲得通報，更難獲得適當的糾正。在蘇聯的德國軍事司法當局堅持，只有當婦女提出正式控訴且可以指認加害者時，才會對強姦進行調查。這項決定意謂著實際上絕大多數強姦案件都未曾通報也未經調查。<sup>143</sup>羞恥感或家人的反對也限制了受害者出面揭露暴行的意願，使得戰時在各戰場發生的強姦案件總數變得

難以統計。據估計，德國婦女在一九四五年被蘇聯士兵強姦的數量大約在二十萬人到兩百萬人之間。目前的一項估計指出，駐歐美軍犯下的強姦案件大約是一萬八千件，然而這項數據是根據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犯罪調查，顯示出只有百分之五的強姦案件會獲得通報，進而根據這一比例往回推算的結果，因此這一數字無法獲得驗證。<sup>144</sup>比較近期的估計是根據德國的非婚生子女數量紀錄，可以推算出在占領期間發生了十九萬起美軍強姦案。不過這些估計完全是統計上的推測。<sup>145</sup>實際上受到調查的美軍強姦案件只有九百零四件，顯然有更多並未登記在案。一九四六年，中國共產黨對其控制的四個省分進行法庭調查，發現日本占領軍犯下的強姦案件計有三十六萬三千件。更不用說成千上萬名遭到姦殺的女性，因而未能在戰後留下證據。<sup>146</sup>

即使強姦本身的定義很明確，但在戰爭時強姦卻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出現，犯罪者也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動機。在有歷史紀錄的眾多強姦案件中，輪姦（或「結夥強姦」）相當普遍，有時只涉及二到三人，有時更多，他們通常會反覆虐待受害者。在新幾內亞戰役中，澳洲士兵發現一具巴布亞女性的屍體，她四肢攤開被綑綁在走廊上，旁邊還丟棄了七十個已經用過的保險套。<sup>147</sup>在中國戰場，日軍士兵普遍會進行輪姦，他們會在受害者的家裡連續數天強姦受害者。蘇聯士兵入侵德國後的前幾個星期，就在大馬路旁圍著德國婦女與女孩，將她們壓在地上強姦，每個人都急切地等著輪到自己。<sup>148</sup>有些強姦是一人犯案，這種人會找機會下手，就像和平時期的強姦犯一樣，但輪姦的目的不只是為了滿足性欲，也為了加強團體的向心力，重新鞏固被戰爭恐懼與危險削弱的男子氣概。如果有士兵不願加入同袍的行列，他可能會受到同儕壓力，使他寧可選擇參與而不願被人質疑男子氣概，或讓人覺得他譴責這類行為。戰後一名蘇聯軍官回憶自己是否要從一群受害者中挑出一名德國女孩



時，內心感到十分焦慮，因為不這麼做的話就會被認為是性無能或者是懦夫。<sup>149</sup>輪姦通常會使用酒類助興，因為酒精會讓人卸下最後一點心防，而且往往造成可怕的虐待景象。整個過程不僅參與者樂在其中，就連旁觀者也獲得滿足。例如一九四四年華沙起義期間，紅十字會護士遭到變態的迪勒萬格旅強姦與殺害。在輪姦之後，他們將赤裸的護士倒吊在希特勒廣場，射擊她們的腹部，在她們四周還圍了一群德國士兵、俄羅斯掠奪者與希特勒青年團目不轉睛地觀看。<sup>150</sup>

強姦長期在衝突中被當成一種用來展示男性權力的策略，可以用來支配或威脅敵人社群。要查明二戰期間發生的集體及系統性強姦背後的動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種動機是所謂「補償性的強姦」，也就是充滿挫折感與情緒緊繃的士兵把「性」看作可以搶奪的戰利品，將其視為男性在戰爭中獲得的補償。<sup>151</sup>另一種動機就是把強姦當成對付敵人的策略，利用強姦來表現對敵方的完全支配。在中國的日軍與在德國的蘇軍普遍會在受害者家人面前遂行強姦，將企圖阻止的男性槍斃或斬首，藉此凸顯敵方男性的無能與加害者的權力。一名受害者寫道，一九四五年在柏林發生的大規模強姦代表著「男性的挫敗」。這樣的支配顯然是一種無差別的欲望，因為無論什麼年齡或什麼狀況的女性都會慘遭毒手。<sup>152</sup>其他大規模強姦的例子，往往與連續數月的艱苦戰鬥後獲得解放及突然感受到勝利在望有關。法軍，特別是來自法國北非殖民地的軍隊，在義大利中部強姦義大利婦女，就是一種對德國防線崩潰產生的反應，彷彿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可以掠奪與侵犯當地民眾的機會。部分殖民地軍隊認為這麼做是理所當然，因為他們在殖民地承受的暴力經驗就是如此。一九四五年，美軍在德國犯下的強姦案件突然急遽增加，同年稍晚在日本也發生同樣現象，這些都源自於勝利產生的欲望。在德國，據報美軍犯下五百五十二件強姦案，在法國與比利時則犯下一百八

十一件。美軍征服沖繩後，據估計有一萬名女性被強姦、綁架，有些甚至被殺。<sup>153</sup>當日本本土被占領時，美軍與英軍也犯下不少輪姦案件，這些士兵認為日軍的性暴行早已罄竹難書，因此自己的行為只不過是以牙還牙。根據日本某個縣的紀錄，在盟軍占領後的最初十天便發生了一千三百三十六件強姦案。為了保護日本婦女不受侵害，日本當局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授權設立「慰安所」，另外取了個委婉的名稱，「特殊慰安施設協會」，提供兩萬名日本娼妓代替日本一般女性供盟軍士兵強姦。<sup>154</sup>在某個港口城市，娼妓們被告知她們必須滿足美國士兵的欲望來拯救大和民族：「這是來自神的旨意……妳們必須肩負起日本女性的命運。」<sup>155</sup>

強姦是犯罪，各國的軍事司法單位無疑都承認這一點。但強姦的非法地位，與各國軍隊是否認真看待這項罪名，兩者之間則存在著巨大落差。在歐洲戰場，總計有九百零四名美軍士兵被指控強姦，但最後只有四百六十一名被定罪。雖然性犯罪只占了美國軍事法庭案件的百分之三點二，但這些被定罪的人都受到了相對嚴苛的懲罰。為了產生嚇阻作用，被定罪的人當中有七十名遭到處決。而在遭定罪的人當中，有許多是非洲裔或西班牙裔士兵（占百分之七十二），顯示當局對性犯罪的懲治帶有濃厚的種族色彩。<sup>156</sup>在義大利，法國軍事當局為了壓制強姦潮而對北非部隊做出嚴懲，義大利當地社群普遍也指責這些「摩洛哥人」，儘管實際上法國白人士兵也涉入其中，有時還會跟北非同胞一同「結夥強姦」。這波性暴力浪潮主要興起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到七月，地點集中在拉吉歐（Lazio）與托斯卡尼（Tuscany）兩個大區。根據義大利當局統計，從盟軍突破德軍古斯塔夫防線、攻陷羅馬與往佛羅倫斯推進，前後三個月的時間裡共發生了一千一百一十七件強姦或強姦未遂案。為了重建軍紀，當局起訴了這些士兵，結果只有一百五十六名被定

罪（遠低於強姦案的數量），而且其中有一百四十四名士兵是來自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與馬達加斯加的殖民地軍隊。義大利當局的報告顯示，同一個時間的美國士兵「只」犯下三十五件強姦案，大英帝國的部隊則是十八件，而且在這些案子中有四十件的加害人是黑人或印度人。相較於白人士兵，有色人種遭定罪的數量再次不成比例。<sup>157</sup>

德國軍方同樣也會把犯了強姦罪的士兵判刑，但德軍對性犯罪的關注並不是考慮到受害者，而是擔心這類案件影響軍隊榮譽感與破壞德軍的地方治理。德國軍方特別關切西線戰場發生的強姦事件，因為這一議題在西方更加引人關注，也更有可能引發地方民眾的抗爭——話雖如此，一名德國軍官曾對負責調查強姦案的法國官員說道：「我們是勝利者！你們被打敗了！.....我們的士兵有權利找樂子。」<sup>158</sup>在法國，只有十六件強姦案被送上法庭審理，最終只有六人被判處勞役刑；在義大利，強姦成案的數量寥寥無幾，因為德軍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強占義大利，不希望有案子引發民眾暴亂。<sup>159</sup>強姦在東線戰場較為普遍，因為這裡對前線士兵的監督較為困難，對蘇聯與波蘭婦女的態度也深受殖民野心的影響。德國士兵知道法律上有禁止種族汙染的規定，理應懂得節制，但事實上士兵們根本無視法律禁令。在種族汙染管制較為嚴格的德國本土，波蘭與俄羅斯戰俘或強制勞工如果被發現與德國人有性行為，將會被絞死或送進集中營。一九四三年一月，德國司法部頒布指導方針，警告德國婦女若與敵國戰俘發生性關係，就是「背叛前線將士，嚴重傷害國家榮譽」。德國婦女如果被發現違反禁令，將會失去公民權與面臨入獄的懲罰。<sup>160</sup>

然而，德國在東方占領的領土十分遼闊，士兵有更多機會進行性犯罪，輪姦也很少留下證據。德軍士兵與安全人員以搜索游擊隊為藉口，對逮捕與盤查的女性進行性騷擾，甚至肆無忌憚地進行性拷問。德國士

兵尤其痛恨蘇聯的女狙擊手，也就是所謂的「霰彈槍妻子」

（Flintenweiber）。這些女性一旦被抓，就會面臨性拷問、割去生殖器與強姦。有時候，她們的屍體會被擺放在大街上，身上只蓋了件生前穿的軍服外套，用來警告其他婦女不要在男人的世界裡挑戰男人。<sup>161</sup>德國軍事司法單位確實會針對一些強姦案件進行調查與懲罰，特別是涉及無端暴力或強姦殺人，有些案子的確會判處重刑。但絕大多數性犯罪的懲罰只有兩個月到兩年，而且絕大多數時間都待在懲戒營裡，如果表現良好還可以提前獲釋。畢竟對德軍來說，讓士兵回到前線比什麼都重要。強姦並未被當成「重大罪行」，德國人對蘇聯女性也普遍缺乏同情。德國人根據他們對俄羅斯社會的刻板印象，認為蘇聯女性在「性上面並不矜持」。從現存的案例紀錄可以看出，這些被定罪的人不只是因為強姦而被判刑，而是因為怠忽職守或反社會行為對軍隊造成不良的影響，進而不利於德軍對廣大東部地區的統治。這些「反社會」的士兵會被求處較重的刑責。<sup>162</sup>就跟所有戰場一樣，性犯罪遭到德國定罪的主要原因，仍舊在於它破壞了男性軍人在占領區的名聲，而不是加害者的道德敗壞或受害者遭受的恐怖對待。

我們可以從接下來的兩個例子，看出軍事當局對性暴力的容忍究竟有多麼普遍，因此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予以禁止。首先是日本。強姦雖然違反了日本軍事法規，但它卻被歸類在行為規範的次要類別。在整個二戰期間，日本軍事法庭只對二十八名犯下強姦罪的士兵判刑，而日本國內的刑事法院也只判刑了四百九十五名士兵。<sup>163</sup>前線士兵在占領區對無力反抗的女性為所欲為。儘管數字尚未證實，但估計光是在南京就有兩萬名婦女遭到侵犯、肢解或殺害。當有人向日本軍官控訴南京的護士遭到集體強姦時，該名軍官居然強詞奪理地回覆，「被日本皇軍軍官強姦，她們應該感到榮耀」，他這麼說顯然不是在諷刺。<sup>164</sup>強姦在漫



長的大東亞戰爭中成為日本軍事文化的顯著特徵，而日本大本營的觀點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大本營認為，就算是失控的暴行，性也有助於提振男性的戰鬥精神。日本武裝部隊明明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軍中妓院體系，卻還是持續在正規「慰安所」制度之外進行大規模強姦，顯示出當時的日本男性對於女性（特別是敵國女性）具有一種更深層的心態：他們並未把對方當成人類，只是用來滿足殘酷欲望的物件。對當時的日軍而言，強姦普遍到幾乎不被當成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犯罪。日本士兵被灌輸了一套封閉的道德宇宙，在這個宇宙中，他們集體向天皇效忠，至於在封閉道德秩序以外的人類則完全沒有理由予以尊重。

第二個例子是蘇聯。不同於日本經驗，蘇軍的大規模強姦與極端性暴力大部分集中在戰爭的最後一年，也就是紅軍挾著即將戰勝的威勢深入東歐與德國境內之時。雖然蘇聯軍事法規明令禁止強姦，但蘇聯當局幾乎很少用這項罪名起訴犯罪的士兵。蘇聯獨裁政權對於性犯罪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九四五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高層吉拉斯向史達林控訴紅軍士兵強姦南斯拉夫婦女，結果史達林的說法是，紅軍士兵在經歷這麼多可怕之事後，「找個女人樂一下有什麼大不了的。」<sup>165</sup>俄羅斯軍官科別列夫（Lev Kopelev）試圖阻止士兵強姦，結果卻被指控有「資產階級人文主義」傾向與「憐憫敵人」，最後被判處在勞動營服役十年。這裡也存在著一個封閉的道德宇宙，對敵人無情會受到讚揚，加害者可以免除罪責。就算軍事當局禁止強姦，也不是因為強姦是一種暴行，而是因為強姦可能造成軍紀敗壞或引發民眾敵對。<sup>166</sup>紅軍的政治宣傳也為即將到來的侵犯鋪路。詩人愛倫堡大聲疾呼，「粉碎德意志女人的種族傲慢！她們是合法的戰利品！」<sup>167</sup>事實上，紅軍士兵根本不需要這類激勵提醒。紅軍早在離開蘇聯邊境之前，就已在一路上強姦通敵者或非俄羅斯人。紅軍在一九四四年占領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一九四五年初占領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士兵們一邊搜刮酒類，一邊又在酒精助興下對這些城市施加性暴行。估計有五萬名匈牙利受害者遭到強姦，結果匈牙利共黨政權卻在戰爭結束的幾年後堅稱紅軍是模範解放者，所有的性行為都是你情我願。<sup>168</sup>紅軍經過東普魯士前往柏林途中，無論什麼年齡的女性都予以輪姦，如果有人抵抗就會遭到肢解與殺害。紅軍偶爾也會純粹為了玩樂而拷打及肢解受害者。一名退伍軍人回憶說：「女人已不夠，我們找到年紀很小的，大概十二三歲……她哭叫我們就打她，拿東西塞住她的嘴。對她來說很痛苦，我們卻過足了癮。」<sup>169</sup>藉由強姦，紅軍士兵不只把女人當成洩欲對象，而是在這些昔日侵略蘇聯的民族女性留下征服的印記。強姦可以粉碎德國虛假的種族優越主張。這類性暴力不僅難以控制，而且受害對象的範圍十分廣泛，就連女性難民也無法倖免，這些人因為遠離故鄉社群而更加脆弱。集中營的女囚也遭到毒手，一些猶太女性好不容易躲藏了數年逃過大屠殺，卻在重見天日後遭解放者強姦。

對猶太女性來說，戰爭使她們暴露在雙重危險之下，既是種族迫害的受害者也是性虐待的受害者。德國最初制定種族汙染法是為了禁止德國人與猶太人發生性關係，但實際上違反這項法律的士兵、親衛隊或警察卻很少遭到懲罰。華沙猶太社群領袖索斯基斯（Henryk Szoszkies）曾遇到德國軍官向他提出要求，表示要徵召年輕猶太女孩進軍中妓院：

「不用管什麼種族法。戰爭就是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理論是行不通的。」<sup>170</sup>由於性虐待猶太女性被視為違法，因此絕大多數證據都未能留下。東線的戰場環境更容易隱匿虐待的證據：既然猶太人最終都要送進滅絕營，許多婦女便可能先遭到侵犯後才遭到殺害。例如在基輔附近的娘子谷，就有人目睹兩名猶太女孩被七名士兵輪姦後殺害。<sup>171</sup>有時候，親衛隊軍官會留下幾個猶太婦女當小妾，之後這些婦女不是被殺就

是被送進集中營。也有紀錄提到親衛隊與陸軍士兵會在猶太區四處尋找能夠施暴的猶太女孩，有些猶太女性會被送進軍中妓院強制賣淫，軍方則會故意隱匿她們的種族身分。即便是藏匿的猶太女性，也面臨著男性保護者的威脅。<sup>172</sup>

猶太人雖然受害，卻被界定在司法規範之外，即使遭到強姦與虐待，也沒有權利尋求賠償與救濟。猶太人的孤立與遭害處境，也使他們成為非德國人攻擊的目標，例如在猶太大屠殺期間，為德國人工作的烏克蘭民兵與守衛，又或者是波羅的海「解放區」的反猶太主義者，都曾對猶太人加害。羅馬尼亞重新占領比薩拉比亞與北布科維納之後，便對當地猶太社群展開大規模的性暴力，並且將羅馬尼亞猶太人流放到聶斯特河沿岸。羅馬尼亞士兵到猶太區的街上與市集閒逛，看到年輕女性就予以綁架帶回軍事基地。一九四二年夏天，一群女孩從別爾沙季猶太區（Bershad Ghetto）被抓走，被送進軍營讓「每個士兵」強姦，據說這些女孩最後遭強姦致死。<sup>173</sup>戰後許多關於猶太女性遭強姦的證詞都提到了集中營，孤立無援的猶太女性在此淪為隨機的性暴力受害者。在這個以種族做為性犯罪對象的昏暗世界裡，猶太女性往往只能被迫忍受自己的雙重受害者身分。

## 罪與罰

犯下戰爭罪的人，絕大多數都未遭受懲罰，罪行也未留下紀錄。即使有目擊者提供證詞，也是少數中的少數。當然，不是所有的軍事人員都犯下戰爭罪。根據粗略估計，太平洋戰場的美軍士兵犯下戰爭罪的比例頂多占百分之五。另一項戰時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美國士兵

承認親眼目睹戰爭罪行，百分之四十五則曾經聽說有人犯下戰爭罪。<sup>174</sup>但如果我們考慮當時全世界武裝部隊的總和有多麼龐大，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犯過戰爭罪，也足以犯下大約五百萬起案件，包括非正規的戰場暴力、掠奪、強姦、大規模處決與謀殺。派駐到俄羅斯與亞洲戰場的警察與安全部隊，皆曾出現過定期犯下暴行的狀況，特別是這些人身負「瘋狂屠殺」俄羅斯與東歐猶太人的任務之餘，還要從事殘忍的鎮壓叛亂行動。無論他們殺戮的是猶太人還是游擊隊，都絕不會認為自己正在從事犯罪。

一般士兵對犯罪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有些人強烈反對，有些人則憤世嫉俗地認為總體戰就是不可能避免犯罪，還有人拒絕接受過去所為要被定義為犯罪。許多回憶錄在提到戰時極端殘酷的暴行時，普遍都會把一切歸咎於戰時狀況扭曲了人性。小說家沃頓寫道：「當你鬆開約束人性的韁繩時，就會看到人類可以墮落到什麼程度。」<sup>175</sup>許多加害者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認為自己是受到抽象外在力量強迫，且任何人在這種情境下都無法做出合乎道德的選擇。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東史郎後來出版了日記，提到有七千名中國戰俘被殺，他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不人道或恐怖」。東史郎又說：「在戰場上，生命的價值不過是一杯白米。我們的生命被扔進一個名叫戰爭的大垃圾桶裡.....。」<sup>176</sup>

德軍在謀殺東歐猶太人時，往往會在每個面對面屠殺猶太人的地點強調，必須讓所有環節井井有條，好讓殺戮維持協調一致。德軍甚至發布指示，要求各地的壕溝必須大小相同，好讓受害者能被順利掩埋，猶太人在等候處決時也必須依序排隊站好。<sup>177</sup>一名警察押送排成一列的里加猶太人前往處決地，被問到為什麼一路上要槍殺老人或體弱多病的人時，這位警察回道：「我們必須完全依照指示行事，必須嚴格遵守排



程，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把犯人運送到指定地點，所以必須除掉可能拖累隊伍的人。」<sup>178</sup>秩序與命令使加害者產生了義務感，也讓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尊重受害者的人格。當有人問為什麼要這麼做時，東線戰場一名警官回答說：「這種事總要有人做，命令就是命令。」<sup>179</sup>這種個人責任錯置的現象，也明顯出現在戰略轟炸的機組員身上。無論是德國、英國還是美國的轟炸機組員，都不認為自己是大規模殺戮平民的凶手（哪怕他們的行為確實造成這個結果），而是自認身為軍人的職責就是服從命令，把炸彈從基地帶到目標區，躲避防空砲火的威脅與敵機的攔截，最後投下炸彈再返回基地，如此而已。轟炸機機組人員的回憶錄，幾乎從未提到他們因為違反不能傷害平民的規定而感到愧疚，反而是表現出對其他機組人員的強烈道德承諾，把彼此從砲火下生還視為最重要的事。

無論犯行輕重，犯下這類行為的數百萬人大都不是虐待狂或心理病態，而是正常人。他們在自己家鄉生活時，從沒想過要去偷竊、強姦或殺人。然而，這些人又不完全是史家布朗寧筆下的「普通人」——這個詞出自他對東歐種族滅絕犯罪所寫的劃時代作品。因為這些人其實是士兵與安全人員，經過選拔與訓練，有能力殺敵或無情鎮壓叛軍，或服從命令滅絕一切可能對種族構成威脅的敵人。即便軍事組織通常會嘗試淘汰明顯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數百萬名軍警人員中，總會有些人帶有心理病態的傾向，而且這一傾向並不會隨著回歸平民生活而消失。然而，即便是「正常人」也會在極端狀況下出現變化。他們發現原本在國內可以當做行為準則參考的道德指南，在戰場上往往並不適用。亞洲、太平洋或東歐的戰鬥宛如一片道德沙漠，加害者逐漸習慣極端暴力的扭曲世界。在這些地方，以往對於虐待或殺戮行為的正常道德限制遭到徹底翻轉，讓這類行為成為被肯定的目標，而從事這類行為的人甚至可以

從某位史家所說的「處決觀光」中獲得快樂。<sup>180</sup>在異國環境裡，野蠻殘暴是個逐漸累積的過程，每一次未受懲罰的暴行都會不斷推升可允許行為的門檻。一名德國警察在結束東線戰場的殺人事業後寫信給妻子說：「他現在已經可以一邊吃三明治，一邊射殺猶太人。」

缺乏明確的道德指南，意謂著幾乎不會有加害者在犯罪當下或事後會表達悔意。許多暴行都是集體行為，因此責任可以分散給群體的每一個人，使個人免除平常狀況下會有的罪惡感。而在缺乏監督機制的戰場上，許多犯罪便會假正義之名出現。一名美軍潛艦艦長在戰後表示，當有人問他會否對自己任由敵人在海上載浮載沉而不伸手救援感到良心不安時，他回道：「完全不會，事實上，我認為殺死這些混蛋是我能享有的偉大特權。」<sup>181</sup>一九六〇年代，德國法庭蒐集了許多曾在東線殺害猶太人的安全警察證詞，這些人雖然在道德上感到不安，卻不是因為受害者而不安，而是對於自己讓同胞失望或自己未能履行職責而不安。<sup>182</sup>一九九〇年代，針對生還的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機組員廣泛蒐集的口頭證詞顯示，受訪者當中只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覺得自己對平民投擲炸彈的行為「就像恐怖分子」。<sup>183</sup>在這些對戰後反思的例子裡，幾乎沒有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犯罪。在戰爭時期，受害者群體反而背負了犯罪的惡名，成了受人憎恨的對象：叛亂被視為非法，因此嚴厲懲罰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猶太人在納粹黨世界觀裡是企圖毀滅德意志民族的陰謀者，其罪行證明德國人的極端回應具有合理性；就連性犯罪也可以說成是女性應得的懲罰，而非男性無端施加的暴力。

犯罪與暴行的施加並沒有一種舉世皆然的模式。在西歐與北歐，犯罪與暴行的規模與強度較小，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國家結構與司法體系在納粹占領時期依然維持運作，犯罪也比較容易發現與舉報。二戰最殘暴的暴行幾乎都發生在東歐與亞洲戰場，這些地區的戰場犯罪、種族犯罪

與性犯罪往往大量交疊，當地國家結構要不是軟弱無力，就是因為入侵與占領而遭到推翻。這些地方也出現大規模的平民流離失所，舉目所及全是難民或流放者，司法規範要不是難以維持，就是完全付之闕如。在這種非比尋常的狀況下，各地鄰里社群便很容易遭到蜂擁而至的敵軍侵害。而戰役規模的龐大，也使得憲兵與司法權威無法杜絕所有的犯罪事件。然而，真正導致亞洲與東歐戰場的軍隊與安全部隊犯下暴行的關鍵因素，其實並不是缺乏約束（這只是原因之一），而是政軍高層對暴力的積極指示、批准或縱容。德國的「犯罪命令」，日本的「三光政策」，史達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指示紅軍效仿德國的「滅絕戰爭」來報復德軍暴力，這些都加速了當代戰爭慣例與戰爭法規的崩壞。一方的野蠻行徑，往往引發另一方的野蠻反制，而前線指揮官對於這些殘暴行徑通常不加干涉。美軍亞美利加師一名參加瓜達康納爾戰役的退伍軍人回憶說：「我不把敵軍士兵當人看，因為他們拷打.....戰俘，肢解我軍的死者與傷者。我們認為他們是最低等的生物。」<sup>184</sup>在這幾個充滿暴行的戰場，受害者實際上已經遭到非人化。東史郎曾經形容中國戰俘就像「一群野獸」，實在「沒有辦法」把他們當人看。<sup>185</sup>海爾賽海軍上將認為日本人「就像動物一樣.....逃進叢林，彷彿他們原本就在那裡成長。他們也像野獸，你唯一看到他們的時候，就是他們變成一具死屍的時候。」<sup>186</sup>就連戰略轟炸也會用委婉的修辭來描述人類目標。美國基督教會聯邦委員會總書記就曾問杜魯門總統，有什麼理由可以證明投下原子彈是正當的，而杜魯門做了一則著名回應：「當你必須對付一頭野獸時，你就把他當成野獸來對付。」<sup>187</sup>

當犯罪與暴行的加害者從戰爭中生還之後，絕大多數都能逃過懲罰。一九四五年盟軍勝利，任何對盟軍不利的指控都無法成立，只有少數士兵被捕、被判定犯下重罪並受到監禁。在蘇聯，司法單位對犯下戰

爭罪的人不聞不問，反而起訴那些批評蘇聯罪行的人，或起訴從國外獲釋的蘇軍戰俘怯戰或通敵。對軸心國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的人，許多未能活到戰爭結束，這使得追查與起訴已知犯罪人的任務無以為繼。絕大多數在戰爭中生還的加害者，最後都重新融入公民社會，再次回到傳統的司法規範與道德約束的框架，把過去的掠奪、強姦或殺人記憶全拋諸腦後。聯邦德國司法單位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開始逮捕與起訴數百名後備警察，這些人曾在波蘭與俄羅斯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但這些人最終被判處的短期刑期，卻與他們協助殺害無數男女老幼的事實不成比例。在日本，雖然當地警察單位必須協助盟軍追捕已經被戰勝國視為戰犯的日本士兵，但實際上這些士兵或水手卻很少因為他們在戰時犯下的罪行被起訴。一九四五年後，日本社會依然認為軍方是為了實現帝國理想，因此不能視其為犯罪。戰後一名軍官反對西方把他曾經參與過的屠殺稱為「暴行」，他宣稱道：「這些行為在和平時期確實是完全不可想像且毫無人性，但在戰場的奇特環境下這樣的事卻屢見不鮮。」<sup>188</sup>

戰勝的同盟國也想利用勝利來凸顯前敵國的邪惡。同盟國不去追究數百萬參與犯罪的士兵，而是將重點放在中高層將領上，要求他們對自己指揮的部隊在戰場上犯下的罪行負責。當時根據國際法起訴的不是抽象的國家或機構，而是有名有姓的個人，這是一種引人注目的創新做法。儘管如此，要構成戰爭罪與反人類罪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約》並未明確定義犯罪行為的具體內容，只是規定有哪些戰時行為是簽署國必須共同避免。公約對戰俘待遇與掠奪設下的限制（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與第二十八條）是討論戰爭犯罪的起點，但為了審判德日主要戰犯而設立的國際軍事法庭還是得想辦法定義這些人的行為是犯罪。同盟國的法律學者認為，對於違反戰爭法規的行為已經存在普遍與習慣性的理解，因此傳統的軍事法庭不需要援引公約就能直



接判定這些戰犯的行為是犯罪。<sup>189</sup>一九四四年由同盟國主要成員協議的《倫敦憲章》（London Charter）溯及既往地重新定義了公約第六條b項的戰爭罪，使國際軍事法庭有了起訴被告的依據。一般性的定義依然是「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只是這項定義如今涵蓋了（但不限於）

「殺害、奴役、虐待或流放」占領區民眾，殺害或虐待戰俘或「海上人員」，殺害人質，掠奪私人與公共財產，恣意破壞城市、鄉鎮或村落，以及其他非出於軍事必要而進行的破壞。這對同盟國而言是一項大膽的決定，因為蘇聯政府與蘇聯軍隊在戰場上的行為完全符合清單上列出的犯罪事項，而美國投擲原子彈一事更是遠遠超出法律規定的軍事必要。一九四六年，同盟國公布《遠東軍事法庭憲章》，為了規避複雜的定義問題，於是在第五條b項只規定了一般性原則：「傳統戰爭犯罪指違反戰爭法規與戰爭慣例之犯罪行為。」在這個階段，「反人類罪」這項概念涵蓋了所有種族迫害與政治迫害，以及「殺人、種族滅絕、奴役、流放」。無論是在歐洲法庭還是東京法庭，最終起訴書中都把反人類罪與傳統戰爭罪區分開來，以確保司法單位能對暴行的每個面向加以定罪。<sup>19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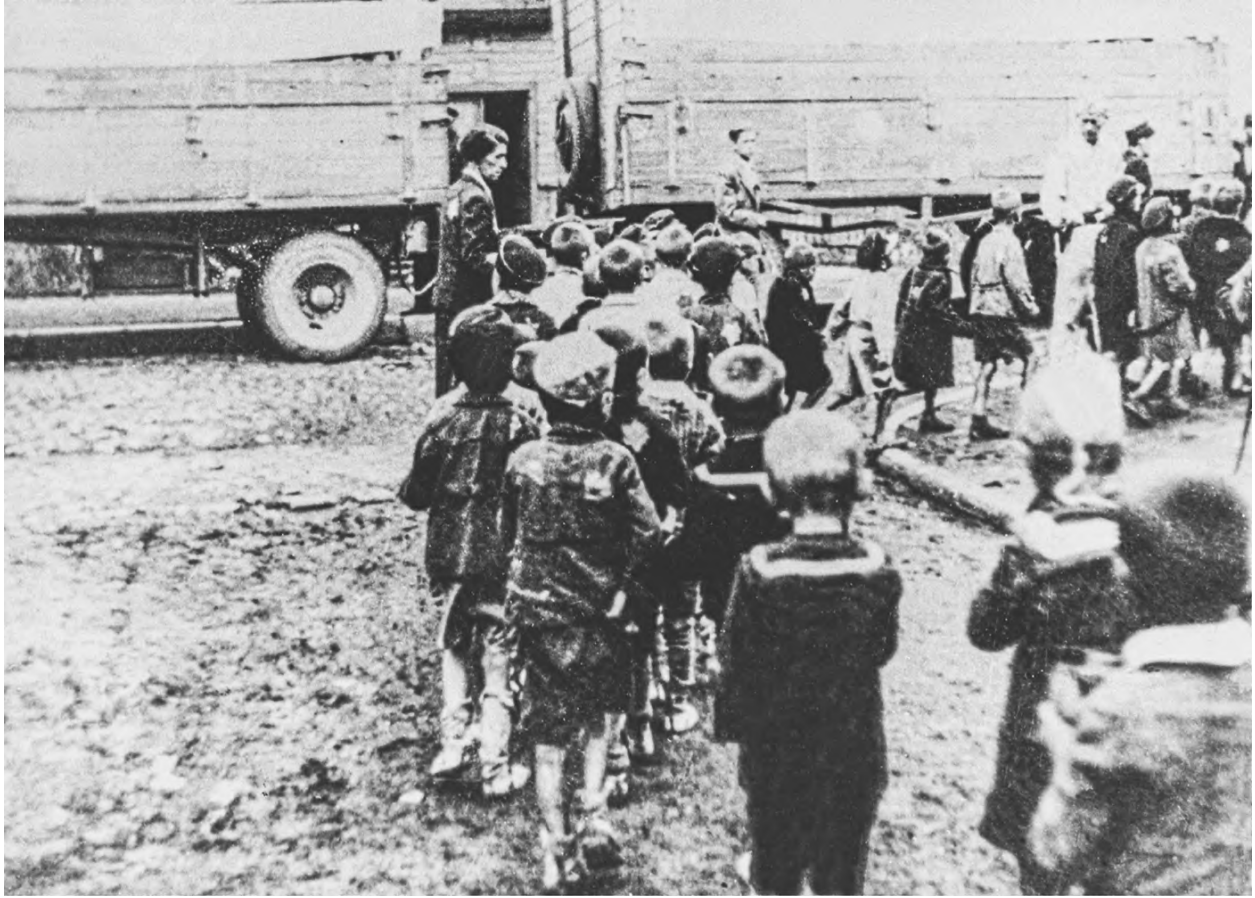
此後的亞洲與歐洲審判都陸續沿用這些定義，以起訴那些已知戰犯，包括曾經下令或組織犯下戰爭罪行的軍事將領、安全人員與警察。在亞洲，地方法庭在橫濱、馬尼拉、呂宋、南京、廣州等城市接連成立，總計起訴了五千六百人，其中四千四百人被定罪，九百二十人被處決。法國政府在西貢設立了常設軍事法庭，起訴在戰爭結束前六個月殺害法國軍人與平民的日本士兵，但法庭只受理法國國民被殺的案子，至於印度支那非白人人口長期遭受的普遍暴行則不在關注之列。經過四年時間，法國起訴了兩百三十名被告，其中六十三名被判死刑，但有三十七名缺席審判，顯示要追查與引渡被告有多麼困難。到了一九四〇年代

晚期，法國政府對於追究戰爭罪已經失去興趣，反而徵召那些知名犯罪者來協助法國對抗越南獨立同盟會。<sup>191</sup>在歐洲起訴的戰犯人數與亞洲相當，同樣也在追查已知被告時碰上困難：有些人已經逃到歐洲以外，有些人則處在蘇聯占領的歐洲地區，後者的命運與行蹤往往不得而知。日後由美國的起訴委員會主持、在德國成立的國際軍事法庭，一共起訴了一百七十七名被告，其中一百四十二名被定罪，二十五名遭處決。其他歐洲國家也開設自己的軍事法庭，起訴對軍人或平民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英國軍事法庭判決七百人有罪，處決兩百三十人；法國軍事法庭起訴兩千一百人，判決一千七百人有罪，處決一百零四人。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間，所有起訴後被定罪的戰犯共有五千零二十五人，其中十分之一被判死刑。<sup>192</sup>在這個時期，死刑通常會減輕為有期徒刑，部分犯下重罪的人也能找到辦法逃避起訴或讓法庭從輕發落。下令屠殺佩列格魯茲內村民的費雪中尉最終在一九六四年被捕受審，但法院卻無視所有證據，認定費雪的殺人行為不符合聯邦德國刑法典所定義的謀殺，因為他的行為並非刻意殘酷，不屬於卑劣動機下的產物。法院表示，費雪並未顯露出「應受指責的特質，因此不能判定他是故意非法殺戮……。」<sup>193</sup>

相較之下，同盟國致力在國際法上定義戰爭罪，並且將其落實在《聯合國憲章》第六條。在條文中，所謂的「紐倫堡原則」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定義了何謂反和平罪、戰爭罪與反人類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紐倫堡原則獲得聯合國大會支持。同月，聯合國大會第九十六之一號決議，將種族滅絕定義為國際法上的犯罪行為，並在兩年後通過《種族滅絕公約》。一九四九年，新版《日內瓦公約》獲得通過，其中包括《第三公約》「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與《第四公約》「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一九七七年，通過附加議定書，這是首

次針對未來轟炸的可能受害者做出更明確保護。根據一九四九年《第四公約》，婦女地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侮辱「婦女的名譽」終於被認定為非法；但即便該條款包括了強姦，實質上仍歸類為道德侵犯，並未認定為極端的身體與心理暴力。直到一九七七年，《日內瓦公約》的第一與第二附加議定書才以「侵害個人尊嚴」取代「名譽」，包括強姦、強制賣淫與任何其他形式的非禮攻擊。<sup>194</sup>往後各國日漸重視婦女遭受暴力的問題，最終在一九九三年催生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然而這份聯合國宣言卻不具法律約束力。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性虐待才在審理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的特別法院中首次以戰爭罪的名義起訴。

我們確實有理由懷疑，如果當初二戰前的各國能更堅定支持戰爭法規，或者對國際人道法律有更多的共識，是否就能減少二戰時期的犯罪與暴行。答案應該是不太可能，畢竟就連二戰後通過的這一系列國際法規，也未能真正阻止這類戰爭暴行的持續發生。就算二戰各國都知道既有的《日內瓦公約》或《海牙公約》的內容，這些公約本身仍不具法律強制力。當一名受傷的日本士兵在沖繩被俘虜時，他告知俘虜他的人，根據《日內瓦公約》，他有權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去你的，蠢貨。」對方這麼回答後將他當場槍斃。<sup>195</sup>二戰隨處可見犯罪行為，反映出戰爭的規模之大、殺戮之殘暴與雙方拼戰到底的決心有多麼強烈。更重要的是，二戰反映出不同形式的衝突與暴力的多樣性，從野蠻的戰場遭遇戰到反游擊戰、內戰、殖民地叛亂、種族滅絕與性犯罪，每一種衝突形式都產生了特定的暴行。而無論是哪一種，都會有不幸的受害者出現。



猶太兒童被運往波蘭的海烏姆諾滅絕營，最後被關在毒氣貨車裡遭一氧化碳毒死。大屠殺的組織者想殺光猶太兒童，使猶太人無法繁衍後代構成德意志帝國的威脅。  
圖源：*Prisma/Schultz Reinhard/Alamy*



EPILOGUE

## 終 章

從殖民帝國到民族國家：  
新全球時代的誕生

「舊秩序正在崩潰，新秩序正取而代之。舊社會的基礎即將粉碎，過去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的人已無法再任意妄為。全世界被踐踏的民族將從悲慘與墮落中奮起反擊.....帝國主義不會自己憑空消失。」

—— 奧卡福（**Amanke Okafor**），《奈及利亞：為什麼我們要為自由而戰》（**Nigeria: Why We Fight for Freedom, 1949**）<sup>1</sup>

戰爭結束四年後，遭受英國安全局嚴密監控的奈及利亞法律系學生暨共產黨員奧卡福在倫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呼籲非洲人應該在戰後擺脫歐洲人的殖民統治及爭取獨立。<sup>2</sup>美國民權運動人士暨歌手羅伯遜為奧卡福的小冊子寫序，支持非洲發起獨立運動，「掙脫殖民主義的枷鎖」。一九四五年，義大利帝國、大日本帝國與德意志第三帝國的戰敗與崩解，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浪潮，此時身為戰勝國的英國與法國及被解放的比利時與荷蘭的殖民帝國便成了眾矢之的。儘管戰勝國仍決心維持海外帝國，並且如戰後工黨大臣勞倫斯勳爵（Lord Pethwick-Lawrence）所言，繼續統治仍生活在「原始文明狀態的臣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後果，就是戰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全歐洲的殖民帝國毫無例外地崩潰，取而代之的是由民族國家所建立的世界。一九六〇年，英國剩下的最大殖民地奈及利亞獲准獨立，奧卡福說：「非洲人從此恢復尊嚴。」<sup>3</sup>

緊接而來的戰後歷史，籠罩在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下，這場危機不僅起因於二戰，也源自於戰後由西方支配的新全球經濟與國家合作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更重要的是受到昔日並肩作戰的盟邦因對立而引發的冷戰影響。長久以來，帝國主義的終結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但正是因為帝國的崩潰（無論新帝國還是舊帝國），才引發了人道主義危機、新國際主義與冷戰的興起。軸心帝國戰敗消失之後，原本軸心國想取代

的舊帝國很快也陷入垂死掙扎的局面。亞洲、中東與非洲的地緣政治結構因為歐洲強權與日本的退出而出現劇烈變化，原有的局勢被新的政治地理樣貌取代，延續至今。

## 帝國的終結

一九四五年，德國與日本戰敗投降，義大利則是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已投降。從一九三一年入侵滿洲至軸心國投降，這段長達十四年以暴力打造帝國的嘗試就此劃下句點。德義日三國內原本支持新帝國主義的人士，在戰敗後便徹底斷念，未再嘗試重起爐灶，連原先用來推動新帝國主義的激進民族主義理念也一併放棄。三個軸心帝國的毀滅，暴露出帝國主義造成的巨大人命傷亡，德日義三國在其短暫擁有的殖民地或帝國領土上損失了大量人口，付出了慘重代價。一九四二年一月後，摧毀新帝國就成了「聯合國」的核心目標。聯合國這個名稱是羅斯福總統在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訪問華府時想出來的，不久就成為同盟國全體成員的代稱。<sup>4</sup>在討論軸心國投降問題時，同盟國主張德國（及其歐洲盟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必須放棄所有占領領土，義大利必須放棄非洲殖民地與在歐洲取得的領土，日本則必須放棄所有的殖民地、託管地以及在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保護國。德義日三國必須限縮在由戰勝國劃定的民族疆界裡，成為「民族國家」而非「民族帝國」。

德國重建民族國家的過程最為激進。同盟國不僅決心將德國限縮在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劃定的領土之內，而且在雅爾達會議與史達林協商之後，決定由蘇聯保留一九三九年九月併吞的波蘭東部領土，波蘭則割取德國東部的廣大領土做為補償。美國、英國與蘇聯也達成協

議，將剩餘的德國領土由三國分區占領與成立軍政府，這使得新德意志民族國家陷入前途未卜的局面。在一九四四年法國臨時政府的抗議下，法國也分得德國南部的一小塊領土。倫敦當局甚至建議，德國可以暫時成為英國的自治領，讓德國能夠學習民主過程。<sup>5</sup>最終，占領國對於德國未來的統一方式無法達成共識，於是在一九四九年將德國一分為二：分別是蘇聯占領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以及美英法占領區合併而成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日本的情況較為單純。日本只由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率軍占領。朝鮮、臺灣、滿洲與戰前國聯的託管島嶼都不再是日本領土。琉球群島的最大島嶼沖繩交由美軍管理到一九七二年。美蘇達成協議，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將朝鮮一分為二，這也是一九〇四年日本與俄國首次劃分勢力範圍的界線。蘇軍占領朝鮮半島北部，美軍占領朝鮮半島南部。臺灣與滿洲交由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管理，但蘇聯在滿洲仍享有利權，太平洋島嶼則成為聯合國託管領土並且交由美國管理。

義大利的處置較為棘手，因為從一九四三年九月之後，義大利就轉而與盟軍並肩作戰。一九四五年五月，義大利再度統一，但疆域退回到一九一九年的疆界。二戰結束時，英軍與狄托的南斯拉夫游擊隊一度為了亞得里亞海港口的里雅斯特的歸屬問題發生軍事對峙，但最終該港還是再次劃歸義大利所有。第二次軍事對峙發生在阿爾卑斯山西部的瓦萊達奧斯塔（Val d'Aosta），義軍成功阻止法軍併吞義大利領土。<sup>6</sup>義大利的前殖民地全在英軍的掌握之下，其中衣索比亞已經在一九四一年復國，皇帝塞拉西順利復辟。當時在羅馬有一群民族主義遊說團體，希望能拿回部分甚或全部的義大利前殖民地，藉此在嶄新的帝國世界裡維持威望。然而，一九四五年的局勢已經與一九一九年大不相同。戰後的反殖民浪潮意謂著國際間不可能再有任何國家支持義大利拿回殖民地。一



九四七年二月義大利簽署和約，約中第二十三條已明確排除義大利重建帝國的可能。但這仍無法化解前戰時盟邦的歧見，因為各國對於義大利的前殖民地依然抱持不同的看法。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會議上，蘇聯政府要求至少要託管一部分義大利領土。英國與美國則不希望蘇聯在非洲取得據點，因此堅拒蘇聯介入，英美的態度使得雙方在戰後合作的可能性變得更加渺茫。另一方面，美國也不希望英國鞏固在非洲的帝國，因此拒絕英國的提案，不讓英國取得非洲之角與未來的利比亞，如此英國便無法維繫在當地的勢力。<sup>7</sup>最終，由於未能達成可接受的妥協方案，同盟國只好把這項議題提交聯合國解決。一九四九年五月，聯合國大會拒絕義大利外交人員推翻和約規定，也拒絕讓英國依照自身利益重組前義大利的殖民地。利比亞獲得獨立，厄利垂亞最終與衣索比亞共組聯邦。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聯合國終於同意將索馬利亞交由義大利託管，然而索馬利亞卻是義大利最貧窮與面積最小的前殖民地。義大利為了經營託管領土而辛苦籌資與招募人員，又要面對有組織的索馬利亞民族主義，最後義大利官員決定讓這塊託管地獨立。義大利帝國主義僅剩的最後一點餘燼，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熄滅。<sup>8</sup>

軸心帝國的滅亡，導致大批仍居住在前帝國境內的義大利人、德國人與日本人離境，有些是出於自願，但絕大多數是被迫離開。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最近才到當地，而是很久之前就已經定居殖民地，許多可以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的武力擴張之前（有些德國人更是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但此時他們卻成為帝國野心的代罪羔羊，遭受無情的懲罰。<sup>9</sup>許多義大利移民早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已經返回義大利，包括在衣索比亞的五萬人、在義屬索馬利蘭的四千餘人、在厄利垂亞的三萬七千人，以及在利比亞東部的四萬五千人左右，因此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晚期，總計返回義大利的移民已經超過二十萬。另外還有二十五萬人逃離或被逐

出義大利在伊斯特里亞（Istria）與達爾馬提亞短暫建立的歐洲帝國領土。這些殖民者很難重新融入義大利社會，許多只能居住在難民營裡，而這些難民營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才逐漸搬空。<sup>10</sup>儘管如此，義大利移民的數量與動輒數百萬人的日本與德國移民相比只能說是小規模，而且德日移民往往是被完全驅離移居的家園，孑然一身地返回祖國。當戰爭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結束時，在中國、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仍散布著約六百九十萬名日本軍民。盟軍計畫遣返軍人，卻沒有針對平民訂定明確政策。美國率先主張遣返日本民眾，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平民不受暴力傷害，另一方面也為了顯示日本帝國已經徹底滅亡。<sup>11</sup>許多民眾已經在殖民地安家立業，一旦被下令必須離去，意謂著將失去所有財產。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最近才剛移民滿洲與華北的民眾，或者是過去負責管理帝國的官員與商人。

每個被遣返或驅逐出境的人，都有著大不相同的經驗。在滿洲，絕大多數是婦女與小孩，他們幾乎得不到任何幫助，還要遭受蘇軍騷擾或侵犯，既沒有交通工具，也缺乏食物。他們的處境最為艱困，被遺棄九個多月，身處於充滿敵意的人群與占領軍中。當紅軍抵達時，二十二萬三千名屯墾的農民開始往東逃亡，但許多人，或許應該說是絕大多數人，身上的財物與糧食都被偷走，導致有無數民眾淪為乞丐或小偷。只有十四萬人平安返回日本，七萬八千五百人死於暴力、疾病或飢餓。<sup>12</sup>至於留在滿洲的日本民眾，得要等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才獲得有組織的遣返。超過一百萬名平民被運回日本，暫時棲身在收容營。在美軍與中國軍隊控制的地區，由於美軍提供了運輸船隻，因此相較於滿洲，遣返計畫開始得比較早，也比較沒那麼艱困。儘管如此，強制移民還是免不了家園與財物的損失。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後不久，美軍便宣布強制遣返朝鮮半島南部的日軍與日本民眾，同月美軍運輸船

便開始駛往日本。但因為有許多日本民眾選擇留下，於是美軍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再次下令所有日本人必須在四月開始遣返，違者將受到懲罰。美國軍政府規定每個民眾只能攜帶少量的金錢與財物。在臺灣的國民政府也下達類似的命令，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宣布將進行強制遣返，預定在四月底完成所有遣返工作。短短幾個星期內，四十四萬七千名日本人放棄自己在殖民地的一切，被運回日本。他們必須花上一段時間在日本本土的遣返中心進行調適，才能重新返回民間生活。本土的日本人在自己與被遣返者之間立起一道無形的牆，因為只要一看到遣返者，就立即想到失敗的帝國計畫與為此付出的慘重代價。<sup>13</sup>

在中國大陸，日本民眾的遣返工作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主要是利用美國的運輸船載運，絕大多數都在隔年夏天完成；相較之下，大量的日本軍隊則在中國政府要求下留在中國，負責在上海與北京維持公共秩序，甚至與叛亂的中國共產黨交戰。遣返工作最緩慢的是蒙巴頓勳爵的東南亞戰區司令部，該部故意讓日本軍民生活在惡劣環境。英國當局把戰俘重新定義為「投降的軍事人員」，藉此規避《日內瓦公約》的規定。日軍戰俘被當成強制勞工，甚至在一九四六年夏天，當大量日本軍隊終於要被遣返回國時（同樣還是藉助於美軍的運輸船），英國依然在當地留下了十萬名日軍，讓他們繼續擔任勞工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此舉顯然違反了公約規定。<sup>14</sup>日本民眾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許多人被送進管理不善的營區，必須辛苦地勞動。日本一名派駐印尼的官員回憶在英國囚犯營裡每天都過得精疲力竭，半裸的犯人必須在大太陽底下拿著鋼刷清掃空軍基地跑道，但只能得到少許的水與食物。之後他被轉移到新加坡附近的加朗島，島上有個孤立的營區，幾乎沒有遮蔭，飲用水缺乏，每日只配給不到半杯的白米。直到紅十字會前來檢查，狀況才稍微改善。<sup>15</sup>

新帝國中規模最大的遣返者與難民遷徙，來自於德意志第三帝國。隨著新帝國的疆域逐漸擴張到中歐、東歐與東南歐，原本不住在德國境內的德裔人口發現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新帝國的子民，有些德裔人口居住的地區因為《凡爾賽條約》而割讓給外國，但德國在一九三九年後又重新奪回這些地區，直到一九四五年又再度失去。被占領的德國領土上，流離失所的民眾數量估計在一千兩百萬到一千四百萬人之間（歷史紀錄無法得出更精確數字）；這些民眾主要來自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這些「收復的領土」原本位於德國東部，但現在又轉移給了波蘭。不少人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與匈牙利被逐出回到德國，此外還有數量不明的蘇聯窩瓦德意志人，他們設法跟著撤退的德軍往西逃亡。蘇軍流放了羅馬尼亞與匈牙利的十四萬名德國人，但方向不是往西，而是往東運送到蘇聯內陸的集中營。<sup>16</sup>被驅逐的人絕大多數是老弱婦孺，身體健壯的男人則被當局留下來擔任工人，協助當地的經濟重建。儘管同盟國在波茨坦會議上表示驅逐行動必須「有序而人道」，但德國戰敗之後，報復浪潮隨即無差別地降臨在各地居於少數的德裔人口身上，不僅毫無秩序，而且缺乏人道精神。被驅逐者的估計死亡數量差別很大，少則五十萬人，多則兩百萬人，但毫無疑問的是，有數十萬人因為飢餓、寒冷、疾病與故意殺害而死。<sup>17</sup>戰爭結束後的六個月是所謂的「瘋狂驅逐期」，德裔社群被迫徒步越過邊界回到已經被盟軍分占的德國，或者是擠在不衛生的火車車廂，在缺乏食物或衣物的狀況下，忍受漫長而令人衰弱的返德旅程。在首波報復潮中，軍警紛紛以過去德國人將猶太人流放到東方的方式來對付德國人。一九四五年六月發生的暴行，便是捷克士兵在上莫斯泰尼采（Horní Moštěnice）逼迫兩百六十五名蘇台德區德國人下火車。這群人包括一百二十名婦女與七十四名孩童，他們被迫在火車站後面挖掘巨大墓穴，然後每個人都被從後方開了一槍，屍體被推



入坑裡。<sup>18</sup>很多時候，被驅逐者只有幾小時時間可以收拾行李，有時甚至只有幾分鐘，他們幾乎無法帶走任何東西。運貨車廂被擠得滿滿的，被驅逐者只能彼此緊挨站立。火車上既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每到一座車站，死者就會被抬出去。有些人起初會被關在臨時營區，男人必須強制勞動，營區條件就跟集中營一樣——食物匱乏，滿是蝨子、斑疹傷寒與粗暴對待。

對同盟國來說，戰後隨即出現的驅逐潮造成相當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在分區占領下，既有的德國人口已經出現糧食與住房不足的問題。負責收容的單位有時還會拒絕民眾入境。美國官員擔心，驅逐遣返是否助長了「可怕而不人道之事」。英國官員向倫敦回報每天目擊的暴行，但外交部不願譴責捷克人或波蘭人，以免被譏笑為「對德國人軟弱」。<sup>19</sup>同盟國最終同意維護後續驅逐的秩序。一九四五年十月，同盟國設立了聯合遣返執行處，負責將被驅逐者送回德國及將「流離失所者」送回原國的後勤，總計遣送人數達到六百萬人以上。十一月，盟國管制理事會宣布達成協議，把被驅逐者分配到各盟國占領區（蘇區兩百七十五萬人，美區兩百二十五萬人，英區一百五十萬人，法區十五萬人），同盟國也將在未來一年內督導整個驅逐過程。儘管同盟國針對遭驅逐之德裔人口的待遇與轉移建立了各項規定，但整體情況依然惡劣，而且這些德裔人口回到德國之後，狀況也不見得好轉。同盟國沒有料到會有大量德裔人口從東歐與中歐返回德國，只好將這些人安置在臨時營區甚或原本的集中營：糧食有限，缺乏照料，就業前景也十分黯淡。到了一九四五年年底，蘇聯占領區已有六百二十五座營區，西方占領區則有數千座營區。與日本一樣，被驅逐者要重新融入德國社會需要一段漫長而辛苦的過程，許多德國本土居民不信任這些新來者，也反對花錢收容他們。<sup>20</sup>

當被驅逐的德裔人口從原本的新帝國疆域返回德國時，還有數百萬

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男女老幼（可能是難民、孤兒、強制勞工或囚犯）正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這些人要不是從德國返回自己的故鄉，就是到海外尋找新家園。這些人是新帝國建立下的受害者，數量達到數千萬人，被迫流離失所的規模可說是史無前例。東亞最大規模的流離失所發生在中國。根據國民政府的估計，到了戰爭結束時已有四千兩百萬人「遠走他鄉」（依照官方說法）。戰後對於中國難民人口的估計（也包括那些遷徙超過一次的人），顯示有九千五百萬人（占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曾在戰爭時期流離失所。在中國北部與東部被日軍占領的省分，有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四的人口離開家鄉。戰後絕大多數人盡一切努力返鄉，但通常需要花費數月的時間，而且只有不到兩百萬名民眾獲得政府幫助。有些人放棄，永遠不再返鄉。成功返鄉的難民發現家族已經離散，家園與財物也被留在故鄉的人侵占，這個結果往往讓離鄉者對於當初未逃離日本入侵的鄰里鄉親產生怨恨，於是私底下認為這些人其實是通敵者。<sup>21</sup>英美占領當局的責任之一，就是協助強制勞工、被動員來協助日軍的殖民地部隊，以及無數被迫賣淫的「慰安婦」，協助這些人返鄉。英美也確實於一九四五年透過遣返計畫，對這些人的國籍進行粗略分類之後，將他們運送回國。

在歐洲戰場，戰時同盟國早在戰爭結束前就已經發現，新德意志帝國剝削奴工、進行種族流放與實施各種恐怖行動，可能引發非常嚴重的流離失所問題。從這點來看，流離失所者並非為了逃離德國新秩序而淪為難民，他們絕大多數是被德國政府強行帶離故鄉去服務德國戰爭機器，或者用來填補集中營的空缺。有些人來自被占領的東方地區，他們自動自發地支援德國戰爭機器，卻在德國戰敗後受困於異鄉而無法返家。一九四三年，也就是聯合國正式成立的前兩年，正在籌建階段的聯合國成立了善後救濟總署，試圖預先針對德國及其盟邦戰敗後造成的問

題提出解決方案。羅斯福總統表示，善後救濟總署的宗旨是協助「德國與日本野蠻主義下的受害者」。<sup>22</sup>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善後救濟總署在亞洲與歐洲十六個國家發放糧食，總支出達一百億美元。在西歐，總署派出小組進行協助，每個小組有十三人，分別負責醫療、福利、宗教與組織工作，小組中超過半數來自歐陸，以協助解決可能發生的語言問題。在蘇聯占領區，總署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地方當局合作，但貨物必須送到港口或邊界，再由當地政府而非總署來進行發放。<sup>23</sup>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已有三百二十二個總署小組在德國的西方占領區設立兩百二十七個中心，在奧地利則有二十五個。到了一九四七年，義大利、奧地利與德國總計已有七百六十二個中心，負責處理流離失所的問題。<sup>24</sup>

流離失所的非德裔人口總數約有一千四百萬人，但要得到精確的數字同樣不可能。紅軍占領區的數字無法確定，因為善後救濟總署在蘇區無法直接從事救濟工作。戰爭結束後的數個星期，數百萬人在美軍動用卡車與火車幫助下動身返鄉。德國境內有著一百二十萬名法國流放者與囚犯，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只剩下四萬零五百五十人還留在德國。到了七月，已經有三百二十萬名流離失所者返歸故鄉，剩下一百八十萬人留在善後救濟總署開設的中心。最初的狀況可能比較混亂，因為流離失所者吃住都只能在臨時搭建的營房。儘管糧食優先分配給流離失所者，但整體來說糧食依然缺乏，到了一九四七年，收容營區仍住著超過五十萬名流離失所者，每人每天攝取的熱量不到一千六百大卡，遠低於維持健康所需的量。<sup>25</sup>

西方盟國原本以為，所有的流離失所者在經歷過戰爭的苦難之後都會想返回家鄉。但實際上，遣返問題並不總是那麼單純。流離失所的猶太人被給予了「聯合國國民」這一特殊身分，藉此保護他們不被送回曾

遭受迫害的地方。<sup>26</sup>最大的問題在於東歐，多達數百萬東歐人不願意回到共產黨統治的地區生活。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已有大約兩百萬名蘇聯公民被從歐洲各地遣返回國。然而，西方盟國並不瞭解遣返對這些人究竟意謂著什麼。蘇聯當局認為這些人曾經接觸過法西斯主義，懷疑他們受到汙染。內務人民委員部或軍方的反間諜部皆針對返國民眾進行篩檢，有些人獲准返家，有些人被流放到蘇聯的偏遠地區，還有無數人被直接送進蘇聯的集中營與勞動營。戰後被遣返回蘇聯的軍民總計有五百五十萬名，其中三百萬人遭到蘇聯懲罰，大約兩百四十萬人獲允許返家，結果這批人中又有六十三萬八千人遭到事後逮捕。<sup>27</sup>蘇聯官員與軍官會到西方的流離失所者營區巡視，試圖找出他們認為該遣返的蘇聯公民。西方單位起初與蘇聯合作，強行將不願返國的流放者送回蘇聯（唯一例外是波羅的海國家的公民，因為這些國家的獨立地位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因為蘇聯侵占而遭到破壞）。數千名曾經與狄托游擊隊作戰或支持保皇派的南斯拉夫人，就此遭英軍強制遣返，這些人回國之後隨即遭到當局屠殺或監禁。<sup>28</sup>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已經有足夠證據顯示許多流離失所者返回蘇聯之後遭到有系統的虐待。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因此正式下令，來自共產黨統治地區的流離失所者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返回家園。此舉引發蘇聯當局的嚴正抗議，但這項決議依舊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於聯合國大會通過。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抱怨說：「你們所謂的寬容，歷史上正好有個知名詞彙可以形容，那就是慕尼黑！」<sup>29</sup>儘管有這項決議，往後兩年，善後救濟總署與接續的國際難民組織仍致力說服俄羅斯人、波蘭人與南斯拉夫人返鄉。不過最終仍有四十五萬名蘇聯軍民堅決不要返國。西方國家考慮到戰後勞工短缺，於是允許這些流離失所者移民。在英國，在西方打仗的十一萬五千名波蘭退伍軍人獲准留下。一九五一年底，加拿大



收留了十五萬七千人，澳洲也收留了十八萬兩千人。在跨黨派遊說團體「流離失所者公民委員會」施壓下，杜魯門總統允諾於一九四八年六月與一九五〇年六月授權兩項法案，允許四十萬名流離失所者移民美國。到了一九五二年，只剩下十五萬兩千名無法獨力謀生的流離失所者尚未找到去處，其中絕大多數是老人、肢體殘障者或罹患慢性肺結核病的患者。一九五七年，聯邦德國政府關閉了最後幾間流離失所者中心。<sup>30</sup>

## 用鮮血換取獨立

聯合國最初在處理軸心帝國遺留下來的問題時，就已經預示了「尊重民族自決原則」這項承諾，該承諾後來也成為《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的一部分，並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獲得通過。聯合國的這一立場其實不僅針對曾經消滅許多民族國家的軸心帝國，也是在暗示其他老牌殖民帝國必須認識到德義日殖民帝國的毀滅，只是在為接下來更龐大的全球計畫揭開序幕：終結所有的領土型帝國。羅斯福總統的共和黨對手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在一九四二年巡迴世界時表示：「殖民時代已經過去……這場戰爭必將終結民族帝國對抗民族帝國的時代。」當時幾乎沒有美國人反對他的說法。<sup>31</sup>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國信使》（*American Mercury*）雜誌社論提到，「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無論新舊。為了維持舊暴政而必須日常動用暴力，這就跟新的侵略行為一樣不可饒恕。」<sup>32</sup>

當二戰於一九四五年結束時，民族國家與帝國之間的關係已經與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了根本上的不同。一九一九年時，民眾大聲疾呼要求民族自決，結果卻在帝國強權的抵抗下無疾而終。一九

四五年，四大戰勝國中有三個（美國、蘇聯與中國）反對殖民帝國繼續存在。英國與法國自認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又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兩國因此相信這個新國際組織能夠協助自己延續帝國，讓帝國在歷經多年戰爭危機後重獲生機。然而英法很快就發現自己錯了，二戰成了歐洲帝國的分水嶺。反殖民主義者表示，這場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不僅是為了解放歐洲國家，更是為了確保各民族的政治獨立。奈及利亞民族主義者阿齊基韋（Nnamdi Azikiwe，後來成為奈及利亞獨立後第一任總統）援引一九四一年《大西洋憲章》與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原則，於一九四三年起草了《自由憲章》，內容包括生命權、言論與結社自由，還有自決權。阿齊基韋表示，《大西洋憲章》與十四點原則都肯定「所有民族有權選擇自己願意在其統治下生活的政府形式」。<sup>33</sup>伊拉克首相賽義德（Nuri al-Sa'id）寫信給邱吉爾，信中提到希望「《大西洋憲章》的起草者能想辦法讓聯合國支持阿拉伯人〔獨立〕……。」<sup>34</sup>結果聯合國直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才定義民族「自決」是實質權利，而且要等到一九六〇年才在壓倒性多數下通過一五一四號決議「關於准許殖民地民族與國家獨立之宣言」，此後民族自決權才具有法律拘束力。英國殖民地部很快就發現，這項決議將會成為「聯合國的神聖文本」。<sup>35</sup>

這不是歐洲帝國想要的結果。它們以為一九四五年會與一九一九年非常類似，也就是民族自決可以用在歐洲重建、解放那些遭軸心新帝國吞併的國家（儘管民族自決在蘇聯支配的東歐地區以相當不同的面貌出現），但絕不會適用在既有的舊帝國領土。二戰結束後，舊帝國的當務之急就是重建和平時期的經濟，同時利用帝國來重振戰爭時喪失的政治信任度與道德權威。美國戰略情報局在給華府的一份報告中警告，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取代戰時聯合政府的英國工黨政府，「就跟邱吉爾領導的上一屆保守黨政府一樣抱持帝國心態。」<sup>36</sup>新任英國首相艾德禮

（Clement Attlee）認為，「輕易交出」殖民地是一件「既不可取，又不實際」的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與十二月，擔任大英帝國參謀總長的蒙哥馬利前往非洲訪問，他在向政府報告時提到非洲人仍然「完全未開化」。他也支持藉由海外帝國來「讓英國存續」。<sup>37</sup>一九四四年，戴高樂將軍在法屬剛果的布拉柴維爾會議上，呼籲法屬殖民地與法國擴大整合，但戴高樂排除了「任何自治的想法，也反對殖民地脫離法蘭西帝國自行發展」。<sup>38</sup>荷蘭政府重返低地後，便立刻著手重建以帝國為基礎的新荷蘭聯邦（荷蘭人曾在德國占領的東方領土進行殖民屯墾，但隨著德國戰敗，藉由依附德國來發展殖民帝國的方案也化為泡影）。<sup>39</sup>英國、法國、荷蘭與比利時等國都瞭解，想要在戰後新秩序獲得尊重，就必須一方面致力於帝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這些帝國在戰間期也曾做過相同的嘗試），另一方面避免做出獨立的承諾。

對英國及法國而言，二戰後的權力平衡變化實在難以忍受。二戰爆發前，英法兩國靠著海外帝國而穩坐全球兩大強權，因此兩國也期盼戰後能藉由帝國來恢復以往的大國地位。在創建聯合國的「聯合國組織會議」上，英國代表甚至宣稱，由於大英帝國是「捍衛自由的龐大組織」，因此應當於戰後維繫下去。<sup>40</sup>英法政府擔心，美國可能會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的聯合國組織會議上堅持所有殖民地都應成為託管領土，接受國際監督。在這場於舊金山召開的會議中，英法成功在《聯合國憲章》增列第二條第七項，也就是確認殖民統治是不受外力干涉的國內事務，這讓英法得以再次發展帝國、保持既有的全球地位。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是堅定的帝國捍衛者，他希望藉由帝國在美蘇之間建立「第三勢力」，並且採納英國外交部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提出的「三方體系」概念，確保歐洲戰勝國能與美蘇平起平坐。<sup>41</sup>貝文反對印度獨立，希望將大英帝國擴展到利比亞，而且厭惡聯合國的託管制度。英國迫切希望能

拓展「國協」（Commonwealth）的理念，也就是一群獨立國家的鬆散結合（定義也相對鬆散），在英國帶領下成為全球第三勢力。（一九四九年，原本加在國協前面的「大英」二字被取消，以避免被指控為新殖民主義。）<sup>42</sup>貝文還採納了英國外交部的另一項概念，也就是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帝國應該共組一個橫跨歐洲與非洲的陣營。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向英國內閣表示，這個計畫能讓英國「在面對西半球〔指美國〕與蘇聯陣營時立於不敗之地」。<sup>43</sup>英國財政大臣道爾頓認為，只要憑藉非洲的資源，「就可以讓美國仰賴我們」。<sup>44</sup>然而這項計畫並未如願推動，因為法國政府對此興趣缺缺。法國想為自己的帝國制定一套新的憲政架構，例如讓殖民地臣民成為法國公民，給予有限的地方自治，藉此讓殖民地與宗主國有著更緊密的連結。一九四六年公民投票之後，法蘭西聯邦成立，但人們很快就發現聯邦成立的目的其實是要確保殖民關係的長久存續，殖民地臣民無法享有與法國公民一樣的投票權、公民權、福利制度或經濟機會。法蘭西聯邦無意讓殖民地獲得民族獨立，只想把帝國綁得更緊密。<sup>45</sup>

重振帝國的計畫，絕大多數只是一廂情願。英國、法國與低地國面臨嚴峻的經濟復甦問題。戰爭幾乎讓英國陷入破產，法國經濟則因為多年的占領而一蹶不振。依靠美國的經濟援助已不可避免，而仰賴帝國來重振經濟的願望也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堅持訂定《布列敦森林協定》

（Bretton Woods agreement）下破滅。帝國貿易體系就此終止，貨幣區域也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一九四七年提出的歐洲復興計畫，一般稱為「馬歇爾計畫」，使歐洲帝國更加仰賴美國。當英國反對美國無限制開採牙買加的鋁礬土時，美國便於一九四九年限制馬歇爾計畫貸款以迫使英國屈服。<sup>46</sup>由此可見帝國雖然是市場與原料的來源，但其代價也十分高昂。為了避免殖民色彩過於濃厚，英國與法國各



自都提出了經濟發展計畫：英國在一九四五年推出《英國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法國則於隔年提出「經濟與社會發展基金」——雖然法國將大部分資金用來推動海外帝國的經濟發展計畫，但主要用意還是提升本土民眾的生活水準，而非幫助殖民地臣民。英國政府使用的發展資金其實來自於戰爭期間凍結在倫敦的殖民地存款，因此才得以不動用本土納稅人的錢。

此時歐洲帝國尚未發現帝國存續將成為聯合國爭論的焦點，更將使戰時的盟邦陷入冷戰。一九四六年後，蘇聯決定重啟從德蘇戰爭爆發後便暫時擱置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一九四七年，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在對歐洲共產黨組織代表（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演說時表示，蘇聯認為當前世界分成「兩大陣營」：反民主的帝國主義陣營及民主的反帝國主義陣營。蘇聯的目標是對抗「新的戰爭與帝國擴張」。<sup>47</sup>英國殖民地部為此開始監控蘇聯「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活動，一九四八年，貝文下令要所有外交人員「反制蘇聯對殖民主義的攻擊」。<sup>48</sup>一九四七年四月，一名法國內政部官員警告美國大使，蘇聯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分化現有的殖民屬地」，使殖民國家衰弱，最終讓殖民國家淪為「共產主義可以輕易支配」的獵物。<sup>49</sup>聯合國的蘇聯代表強力批判殖民主義並要求民族自決，一九六〇年更是大力宣傳蘇聯總理赫魯雪夫提出的一五一四號決議。但在蘇聯影響力之外，聯合國大會的整體氣氛原本就已對帝國的存續抱持敵意，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人權宣言》就是例證，日後的反殖民戰爭經常援引《人權宣言》做為反抗理由。一名英國官員在一九四七年觀察到，自從兩年前聯合國成立之後，「世人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殖民議題。」十年後，英國一份討論聯合國工作的報告才正確地指出，「相較於國際聯盟，聯合國對於西歐的利益可謂毫無助益……。」<sup>50</sup>

然而，真正造成舊帝國崩潰的主因，還是源自於二戰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情感。即使沒有二戰，自治與獨立的呼聲也將與一九一九年一樣挑戰帝國體制，但這些舊帝國之所以會在一九四五年後如此快速地終結，則有賴於二戰時全世界對傳統帝國的敵視及戰時動員建立的反帝國網路。這一變化具體表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於曼徹斯特成立的泛非洲會議，來自六十個國家與反殖民主義運動的代表齊聚一堂，催生出擺脫殖民統治與終結種族歧視的要求。殖民地民眾在二戰時期組織工會或勞動隊，這些團體構成了日後殖民地進行組織抗議的基礎，而這些抗爭又經常與馬克思主義運動有所連結。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經濟權利的角度來看待對抗帝國的鬥爭，出身自千里達的帕德莫爾（George Padmore）就是其中之一。<sup>51</sup>牙買加人民民族黨創立者曼利（Norman Manley），與在紐約市哈林區創立的牙買加進步同盟合作，呼籲非裔美國工人不僅要為自己的權利鬥爭，還要為「全世界少數族群與殖民地群體」奮鬥。<sup>52</sup>這類組織網路甚至延伸到帝國最偏遠的角落。一九四五年，來自所羅門群島勞動隊中士菲菲伊（Jonathan Fifi'i）在與美國黑人士兵並肩作戰之後，決定在戰時曾成為激烈戰場的瓜達康納爾島發起一場民族政治運動。他日後回憶說：「我們感到憤怒，因為英國人把我們當成垃圾看待。」菲菲伊以《聯合國憲章》為依據，與其他人共同發起了「兄弟手足規則」（Maasina Ruru）運動，希望建立另一種部族權威體制，拒絕納稅，並且杯葛英國的「原住民議會」。英國當局對所羅門群島發動「除蝨作戰」（Operation De-Louse）進行鎮壓，數千人以煽動叛亂的罪名被捕入獄，一直被關押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sup>53</sup>

然而，反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浪潮顯然已不可逆轉，而舊帝國的回應則是矛盾與前後不一：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先是慌張地做出妥協，回過神來後又施以極度的暴力。帝國危機的來臨並非如地震般不可預測，

但其效應卻像震波一樣向外擴散。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的短短八年間，歐洲強權的亞洲帝國倏然崩潰，數百年帝國基業就此煙消雲散。對英國來說，位於亞洲的帝國疆域至關重要。從印度經緬甸直到馬來亞與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最廣大也最富庶的區域，也是英國維持亞洲勢力與全球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曾因為一九四二年的「退出印度運動」而出現危機。雖然運動遭到鎮壓，但二戰本身卻已讓廣大印度民眾認為，在負擔了戰爭義務與犧牲之後，印度理應獲得「自由」（azadi）與「自治」（swaraj）。一名印度士兵在一九四六年表示：「我們之所以忍受戰爭的苦難.....是因為我們可能獲得自由。」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超過一百萬名印度士兵在復員後返回飽受戰爭紛擾的村落與城鎮。<sup>54</sup>原本在一九三〇年代只有少數政治菁英支持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到了戰後卻獲得了民眾的大規模支持。全印穆斯林聯盟在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只擁有不過一千名成員，到了一九四六年卻成長為擁有兩百萬名成員的大黨。一九四〇年，全印穆斯林聯盟通過了《拉合爾決議》（Lahore Resolution），公開表示將建立一個穆斯林主權國家「巴基斯坦」。<sup>55</sup>在印度，印度國大黨在戰爭結束時成功整合印度的民族主義力量，同時得到了廣大農村與城市人口的支持。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印度國大黨領袖終於獲釋出獄，繼續投入終結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他們也發現運動的性質出現了變化。獲釋的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警告新任工黨政府貿易局主席克里普斯，印度獨立已不可避免，因為「民眾愈來愈急切.....你們不能再搪塞下去。」<sup>56</sup>

艾德禮政府的態度仍不明確，唯一確定的是他們即將面臨一場極其嚴重的危機。糧食短缺，勞工抗爭蜂起，加上一九四六年春天駐紮在孟買的印度水兵發起大規模譁變，這一切都被大眾媒體與印度當地政治人物連結上廣泛的印度爭取獨立議題。印度殖民政府以印度國民軍在二戰

時與日本軍隊合作為由，將國民軍的部分成員送上法庭。結果這項弄巧成拙的決定引發全印度輿論譁然，激起了暴力抗爭。印度次大陸掀起了敵視殖民政府的熱潮，而英國在當地的兵力早已不足以穩定局勢。一九四六年，英國在整個印度大概只有九萬七千名兵力，當地的大批軍警全由印度人擔任。一九四六年春天舉行的印度大選，印度民眾壓倒性地投下希望改變的一票。真納（Muhammad Jinnah）的穆斯林聯盟在所有穆斯林占多數的省分獲勝，其餘省分則由國大黨奪下。印度人就此統治了所有省分，英國駐印度總督魏菲爾元帥語帶悲觀地向倫敦回報這一政治變局。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天，印度幾乎已經快完全脫離英國控制。倫敦當局無法完全掌握印度局勢的危險程度，最終決定由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勳爵率領內閣代表團前往印度，試圖進行憲政協商，將印度改革成一個由英國王室領導的獨立印度自治領。一九四六年六月，代表團終於提出一個複雜的聯邦構想，設立一個負責國防與外交政策的中央全印政府，各省（有些省穆斯林占多數，有些省印度教徒占多數）則組成聯邦政府，負責大部分國內事務。制憲議會由選舉產生，並且成立印度臨時政府。這項提案很快就遭到否決：印度國大黨擔心英國要讓印度「巴爾幹化」，全印穆斯林聯盟則堅決從印度分裂出去，另行成立巴基斯坦國。英國發現自己已無力控制印度境內與日俱增的暴力事件，只能盡速由印度人接管地方政府。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真納在加爾各答發起「直接行動日」（Direct Action Day），藉由大規模暴動來回應英國的提案，進而引發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嚴重衝突。這場暴力事件重演了一年多前在印度北部旁遮普與孟加拉發生的宗教衝突，差別只在於它的規模更大，傷亡也更慘重。敵對雙方都把加爾各答當成戰場，拿起現成的武器互相殘殺，綁架與強姦婦女，燒毀店鋪與房屋，連建築物裡的居民也一同葬身



火海。直到六天後，英國駐印總督才下令調集英國人、印度人與廓爾喀人的部隊平定亂事。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介於四千人到一萬五千人之間，超過十萬人受傷。隨後成立的加爾各答暴亂調查委員會並未得出任何結論，而英國在兵力有限的狀況下，也無力阻止更進一步的暴力發生。<sup>57</sup>一九四六年冬天，殺戮持續升級，部分是因為英國在內閣代表團提案失敗後毫無作為引發的不確定感，部分則是因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都擔心未來國土一旦分裂，自己會在新國家裡淪為少數。這起事件凸顯英國政府已無能解決發生在印度的危機。

一九四七年三月，蒙巴頓勳爵接替魏菲爾擔任印度總督，倫敦當局給予他的任務就是找出一切可行辦法讓英國能從印度脫身。蒙巴頓勳爵認為英屬印度分裂已成定局，於是在英國內閣接受這個現實之後，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在廣播中宣布，印度次大陸將分割成兩個具有主權的英國自治領：印度與巴基斯坦，一個印度教國家與一個穆斯林國家。這項決議也匆促施行。獨立日定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而在宣布之後，英國軍隊與官員便立刻收拾行囊準備離開。由於疆域劃分也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決定，因此數百萬名穆斯林、印度教徒與少數族群錫克教徒（錫克教徒的意見完全遭英國忽略）很快就發現自己實際上已經捲入一場內戰之中。這場內戰的死亡數字無法精確估算，但一般認為介於五十萬到兩百萬人之間，另有三百萬名難民越過宗教疆界線。未來兩國得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化解英國突然放棄印度造成的慘重後果。一九四九年，印度與巴基斯坦改制為共和國，雙雙拒絕在英國王室領導下維持自治領地位。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獨立，毫無疑問象徵著大英帝國的終結。一九四八年，錫蘭（斯里蘭卡）成為第一個獲准獨立的英國皇家殖民地。當印度陷入獨立的動盪時期，緬甸民族主義者也藉由過去在日本統治下獲得

的短暫「獨立」經驗，發起了驅逐英國人運動。二戰時，緬甸國民軍在翁山將軍（緬甸人以「波」尊稱）的帶領下，從支持日軍轉變為與盟軍並肩作戰。國民軍預期英國人在戰後終將放棄在緬甸的糟糕統治。翁山領導緬甸的主要民族主義政黨，政黨名稱別具一格，叫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該政黨支持下，帶有準軍事性質的人民志願組織隨之成立，除了高喊民族主義口號動員鄉村民眾，也大量囤積戰時英軍與日軍留下來的武器。印度發生的事件激勵了緬甸的民族主義者。到了一九四六年，緬甸廣大的鄉村地區也跟印度一樣幾乎完全脫離英國的控制。同年秋天的罷工潮也差點癱瘓了整個緬甸，全國性的武裝暴動迫在眉睫。蒙哥馬利告訴參謀首長會議，英國沒有足夠的人力控制緬甸，因為英國已經無法調動印度軍隊鎮壓反英暴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艾德禮在國會宣布將「加快緬甸獨立的進程」，但他仍希望緬甸繼續待在國協裡，與英國維持緊密的貿易與國防關係。<sup>58</sup>一九四七年一月，翁山將軍訪問倫敦並與英國達成協議，確定緬甸將於一九四八年一月獨立。一九四七年七月，翁山遭腐敗的右翼政治人物吳蘇派遣的武裝民兵刺殺身亡。吳蘇希望與英國維持緊密的關係，但他也因為暗殺事件而被判有罪而處以絞刑。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緬甸成為獨立共和國，並未加入國協。緬甸獨立之後，原本不穩定的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與分離主義三方關係，開始陷入長期的武裝對峙。與印度一樣，英國也在衝突爆發前撤離緬甸，避免英軍捲入這場暴力衝突。<sup>59</sup>

東南亞的狀況不同於印度與緬甸。英屬馬來亞、法屬印度支那與荷屬東印度都曾在戰時被日軍占領，戰後又再度受到帝國殖民暴力的壓迫。與印度與緬甸的例子相反，英國、法國與荷蘭在一九四五年後都派出大量軍隊重新占領了東南亞的殖民地，防止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終結殖民統治。對於英國、法國與荷蘭這三個歐洲帝國來說，東南亞的經濟

資源極其重要，特別是這些資源可以產生國內急需的美元收益。此外，對於共產主義蔓延的恐懼（共產主義在軸心國倒臺後成為新的全球敵人），或多或少能解釋這些帝國為什麼最終採取如此暴力的鎮壓手段。最重要的是，叛亂團體對於重新歸來的殖民者施展的暴力攻擊，刺激了殖民者發動殘暴戰爭以重建對當地的控制。這些戰爭在各方面都像極了軸心國在歐洲與亞洲戰場發動的平叛戰爭。在印尼，日本在投降前夕開始大力支持當地的獨立運動，甚至允許民族主義領袖蘇卡諾

（Sukarno）與哈達（Muhammad Hatta）獨立。印尼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獨立。與緬甸和印度一樣，印尼在戰時出現了廣泛的民粹主義運動，這些運動致力於「自由獨立」（merdeka）的理想，希望爭取自由，擺脫殖民者的壓迫。「青年誓言運動」（pemuda）創造出支持激進起義的爪哇年輕世代，他們訴諸暴力反對荷蘭殖民者回歸。充滿領袖魅力的青年誓言領袖邦托莫（Bung Tomo）在廣播中表示：「我們極端主義者寧可讓印尼被鮮血淹沒沉入海底，也不願再次遭到殖民！」<sup>60</sup>儘管如此，同盟國仍認為必須讓荷蘭恢復一定程度的統治。一九四五年九月，大英帝國部隊抵達爪哇島與蘇門答臘島，隔年春天，第一批荷蘭部隊也跟著抵達。英國指揮官發現，返回印尼的荷蘭官員堅持恢復對印尼的控制。這些荷蘭官員在戰爭期間置身事外地待在澳洲的哥倫比亞營，坐等重回舊殖民地進行統治，完全未能察覺當地的民心變化。一九四五年十月，當短視的副總督范莫克（Hubertus van Mook）抵達印尼任職時，看到了一些告示，上面寫著他看不懂的文字。他的副官臉色凝重地告訴他，上面寫的是「殺死范莫克」。<sup>61</sup>

英軍在印尼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並且捲入了荷蘭軍警與印尼叛軍之間的紛爭。荷蘭不接受印尼共和政府，荷蘭軍警於是對印尼民眾毫不客氣地施以暴力。印尼叛軍雖然缺乏組織，卻持續造成荷蘭人傷

亡。然而這一切都無法阻止「青年誓言」認定英國人也是印尼人追求獨立的障礙。大英帝國部隊在撤離印尼之前，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與印尼民族主義部隊在港口城市泗水交戰。青年誓言的民兵從即將離去的日軍手中奪得重武器，不僅攻下泗水，還殺害英軍指揮官，並且對困守城中的荷蘭與歐亞混血兒進行血腥屠殺，割下他們頭顱、四肢與生殖器。<sup>62</sup>儘管如此，英軍的反擊也完全超出合理範圍。在皇家海軍輪番砲轟之後，兩萬四千名大軍、二十四輛戰車與二十架飛機發動報復攻擊，將泗水夷為平地，估計殺死了約一萬五千名印尼人，絕大多數是在雙方交火時喪生，此外英軍也有六百人陣亡。這場毀滅行動並未取得預期效果——雖然荷蘭與叛亂分子協商停火，並且提議給予印尼共和國半獨立的地位，但協商依舊在一九四七年夏天破裂。

荷蘭強硬派堅持做出軍事回應。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荷蘭總共派出十六萬名軍隊與三萬名武裝警察前往印尼，此外也派出由威斯特林（Raymond Westerling）率領的「突擊部隊」對民族主義反抗軍施加恐怖手段。<sup>63</sup>荷蘭人在二戰時對軸心國的武裝反抗，似乎未能連結上他們對印尼人的野蠻鎮壓，那些支持鎮壓的政治人物似乎忘了自己當初也曾是反抗者。<sup>64</sup>當時荷蘭流行一句話，「丟了東印度，國家無活路」，這句話使得荷蘭民眾支持一場違反傳統交戰規則的戰爭。為了避免被指控犯下戰爭罪，荷蘭軍隊把這場戰役稱為「治安行動」。未經審判的拘禁，訊問時進行刑求，恣意殺戮，這些作為構成了這場反暴亂行動。一名荷蘭士兵寫道：「你必須心如鐵石，不能被苦難與悲慘影響。」從荷蘭抵達當地的士兵必須謹記的一句話是：「在你中槍前先開槍，不要相信深色皮膚的人！」<sup>65</sup>在持續四年的衝突中，估計有十萬到十五萬名印尼人被殺，有些人是在交火時喪生，有些人則是族群暴力下的受害者。這場戰爭到最後犧牲了太多生命與耗費了太多物資，使得荷



蘭政府難以向日漸不滿的民眾解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荷蘭與印尼簽訂協定，約定兩國成為一個新「國協」的對等夥伴國，荷蘭女王朱麗安娜（Queen Juliana）便正式將權力移交給印尼總統蘇卡諾。<sup>66</sup>然而這份協定很快就被撕毀，因為荷蘭堅持保有剩餘的殖民地西新幾內亞，好對國內失望的殖民遊說團體有所交代。荷蘭計畫讓西新幾內亞成為模範殖民地，卻未能實現，而印尼政府對西新幾內亞的主權主張，幾乎讓兩國陷入戰爭。最後荷蘭決定放棄這塊領土，將其交給聯合國處理。聯合國最終於一九六三年將西新幾內亞移交給印尼。<sup>67</sup>

在越南，蒙巴頓勳爵的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也成了衝突的第一線，當時大英帝國部隊占領北緯十六度以南的越南地區，以北則由中國國民政府占領。越南與印尼的狀況一樣，日本投降後由共產黨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及越南民族主義者利用這個機會盡速尋求獨立。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於八月底抵達河內，他在九月二日，也就是日本正式投降當天，引用了聯合國的民族自決與平等原則，向情緒激動的群眾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sup>68</sup>胡志明在越南全境仍遭殖民當局占領之下，成立了臨時政府。幾天後，英國格雷西將軍（Douglas Gracey）接下了越南南部的指揮權，後來又將指揮權交給率領遠征軍前來的法國將軍勒克萊爾。勒克萊爾直白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要重建「白種人在亞洲的未來」。<sup>69</sup>這群剛從納粹統治下解放的法軍士兵，抵達越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絞死「人民委員會」成員（那是越盟在西貢的代表組織）。隨著缺乏武裝的越盟開始朝西貢進軍，英軍也祭出猛烈手段，不僅宣布戒嚴，還下令軍隊對任何「武裝的安南人」格殺勿論。<sup>70</sup>但英軍鎮壓的殘暴程度，還遠遠比不上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達尚禮海軍上將

（Georges-Thierry d'Argenlieu）率領的法國殖民地部隊。達尚禮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曾經擔任過修士，希望越南人接受基督教文明。達尚禮

違背巴黎方面的指示，自行建立一個分離的「交趾支那共和國」（日後南越的核心），並且在越南南方以高壓手段樹立法國權威。一九四六年十月，越盟在越南北部的河內召開國民大會，選舉胡志明擔任國家主席。當法國顯然要越南成為法蘭西聯邦的一部分而非獨立國家時，越盟與法國的戰爭就此爆發。儘管雙方曾斷斷續續試圖協商，但這場戰爭最終還是持續了八年之久。

在美國的增援下，法國與越盟游擊隊進行了一場曠日費時的戰爭。一九四九年，法國當局決定讓已經退位的保大皇帝阮福暉（日本人曾於一九四五年短暫扶植他）擔任國家元首，並且讓越南加入法蘭西聯邦，希望能藉由這些舉措展示法方願意協商的態度。由保大皇帝領導的越南臨時中央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正式成立，儘管越南的實質掌控權仍在法國手中。然而，保大皇帝成為國家元首一事對於這場戰爭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因為越盟並不接受越南不完整的獨立地位。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越南已有十五萬名法軍與殖民地部隊，其中新招募的越南新兵大約十萬，由法軍訓練及指揮，以便投入這場他們眼中的內戰。<sup>71</sup>駐紮在越南中部與北部地區的法軍經常受到游擊隊騷擾，因為以共產黨為核心的越盟控制了廣大鄉村地區。越盟獲得已經在內戰中擊敗蔣介石的毛澤東政權援助，與此同時蘇聯也開始支持越盟（史達林原本在一九五〇年之前都拒絕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戰事發展至此，冷戰的對抗格局已然形成。<sup>72</sup>越南由兩個政權分治，一個以南方的西貢為中心，另一個則是胡志明支配的越南中部與北部。一九五四年初，法軍指揮官納瓦爾將軍（Henri Navarre）計畫與越盟軍隊決戰。他想引誘北越軍隊前往鄰近越南北部與寮國邊境的小村落奠邊府，在此地一舉殲滅敵軍。法軍於是將奠邊府周遭地區改建成大型堡壘，還另外空降一萬三千兩百名士兵以強化當地兵力。納瓦爾希望吸引越盟從防禦工事的正面發動猛

攻，藉此消耗北越軍力。

納瓦爾預料這場戰爭將決定法國在越南的未來，事後證明他的觀點完全正確。在中共提供重武器的支援下，越盟指揮官武元甲率領十萬名士兵與輔助部隊駐紮在奠邊府周邊的山岳地帶。一九五四年三月，武元甲決定採取包圍而非正面進攻法軍基地的策略。越盟用重砲摧毀法軍的臨時跑道，使法軍無法得到空運補給，接著越盟開始各個擊破法軍主要堡壘外圍的小型火砲陣地。隨著越盟持續砲擊，缺乏食物、軍火與醫療物資的法國守軍士氣愈發消沉。五月六日到七日晚間，法軍投降。法國戰敗使法國的殖民地美夢破滅。第二天，英國與蘇聯在日內瓦召開高峰會進行協商，試圖解決越南危機。該峰會協議將越南一分為二：法國放棄印度支那，北越、南越、寮國與柬埔寨則成為四個主權獨立的新國家。法國與越盟的戰爭帶來了慘重傷亡，不過雙方的傷亡數字卻相當懸殊。這場獨立戰爭中奪走約五十萬條越南人命，而法國與殖民地部隊則有四萬六千人死亡——幾乎相當於法國在一九四〇年戰敗的死亡人數。<sup>73</sup>

當法國在越南發動全面戰爭之際，英國也在馬來亞與新加坡重新加強殖民統治。馬來亞並未像印尼與越南那樣發生大規模亂事，而人們經常將此歸功於英國致力於贏得「民心」，而非發動殘酷而失敗的平叛戰役。但實際上，馬來亞境內的小規模暴動反而引發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代晚期的長年血腥戰爭，而這也是亞洲最後一場殖民戰爭。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反對殖民統治的條件逐漸成熟。馬來半島擁有大量的華裔人口，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這些華裔人口加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與馬來亞共產黨，成為反對日本占領的重要力量。抗日軍在戰爭結束後解散，但戰時的激進主義並未因此消失，反而因為日本占領時期在資源上的錯置引發戰後缺糧與失業問題，進一步助長了激進思想。戰

爭結束後的兩年間，英國軍政府與之後重建的殖民文官政權始終未能改善馬來亞的生活狀況，民眾因此不斷發動罷工與抗爭。二戰也讓殖民政權的回歸面臨合法性危機，民眾也對英國重建殖民政權後仍繼續在商業上剝削馬來半島感到憤怒。馬來亞共產黨、馬來國民黨，以及參考印尼「青年誓言」建立的覺醒青年團，都以「用鮮血換取獨立」（merdeka dengan darah）為口號，要求終結帝國統治。一九四七年，英國當局就以「用鮮血換取獨立」這句口號為由，將覺醒青年團的領袖博斯達曼（Ahmad Boestamam）定罪。<sup>74</sup>英國當局在馬來亞從事政治與族群分化，使民眾無法團結一致進行暴動。一九四七年，英國創立馬來亞聯邦，這一體制對於占多數的馬來人有利。然而，此時馬來半島部分地區的秩序已明顯崩壞。一九四八年，殖民政權對新聞自由與政黨結社自由的限制愈來愈多，導致衝突的規模愈來愈大。一九四八年六月，馬來亞總督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是根據一九三九年英國在二戰剛開始時通過的《緊急權力法》（Emergency Powers Act）採取的法律措施，該法允許馬來亞（與之後的肯亞、賽普勒斯與阿曼）殖民政府可以未經審判逕行逮捕、將嫌疑犯關進拘禁營、在訊問時進行刑求、實施宵禁、將「煽動文學」入罪，甚至當場殺死通緝的嫌疑犯。一九四八年七月，武裝警察突襲一間獨棟小屋，造成數人死亡，這是警方加強查緝力道以來首次造成的傷亡案件。其中一名死者是前抗日游擊隊隊長，就在三年前，他還曾率領馬來亞游擊隊前往倫敦參加勝利遊行。<sup>75</sup>

緊急狀態維持了十年，這段期間，英國與馬來亞安全部隊使用了一切手段鎮壓反抗勢力。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採取積極暴動的策略，其人數從未超過七八千人，但他們獲得如何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馬來亞民族解放軍雖然並非全數都是華人，但與過去對抗日軍時一樣，絕大多數戰士都由華人組成。馬來亞民族解放軍也並非全是共產黨員，但英國當局



卻深信解放軍完全由共產黨員組成，因此解放軍的叛亂也被連結到冷戰格局，顯示出帝國對共產主義的憂慮。與印尼的狀況一樣，殖民政權對叛軍的反擊完全超出了合理範圍。儘管上級三令五申只能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而野戰手冊也提到只能使用最小且必要的武力，但所有命令與規定都可以擴大詮釋。英國戰爭大臣在國會報告時提到，必要的武力「就是相當龐大的武力」，<sup>76</sup>包括使用正規軍的海軍艦砲朝陸地上可能的游擊隊營地進行岸轟。一九五五年的「拿騷作戰」（Operation Nassau）進行了八個月，海軍幾乎每晚都會進行岸轟。<sup>77</sup>一九五二年，英國的軍事行動達到巔峰，一共派出了四萬名英軍、六萬七千名警察與二十五萬名武裝馬來亞國土防衛隊，其中國土防衛隊絕大多數出自敵視華人與共產主義的馬來人族群，這些部隊都是用來實施緊急狀態的各項措施。在一個人口只有六百萬的殖民地，這樣的維安層級實在高得離譜。<sup>78</sup>

當局對待叛軍完全不考慮合法性問題。為了讓鎮壓合乎正當性，英國殖民地部用「土匪」一詞取代「叛軍」，就像二戰時德國人在歐洲鎮壓游擊隊使用的伎倆一樣。一九四九年，當時擔任馬來亞總督的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私下坦承，「警察與陸軍每天都在違法。」<sup>79</sup>直到一九五二年，殖民地部才終於禁止反游擊行動時為了確認而將敵人頭顱割下帶回的行為，同年也停止使用「土匪」一詞，改成冷戰時期常用的「CT」（communist terrorist的縮寫，即共產黨恐怖分子）。緊急狀態下的法規賦予「合理武力」法律依據，讓軍警單位在所謂的「自由射擊區」可以任意射殺嫌犯而不會被究責，還可以未經審判直接將嫌犯關進拘禁營。緊急法規第十七條C項授權政府流放民眾，當局因此獲准將兩萬名華人流放到中國大陸。<sup>80</sup>為了防止各地居民支援叛軍，英國最後授權執行強制移居計畫。大約有五十萬名華人從森林邊緣被搬遷到「新

村」，新村的四周圍上鐵絲網，設置槍塔，出入口有衛兵把守。村民必須交代游擊隊的去處，不願坦承將會遭受懲罰，例如減少糧食配給、強制商店歇業與宵禁。到了一九五四年，殖民政府已經設置了四百八十座新村，此外還移居了六十萬名勞工以便監視控制。三年後，超過三分之二的叛軍死亡，共產主義的威脅也被認定完全終結。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獲准獨立，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在一九五五年首次全國大選中獲得馬來人壓倒性的支持成為馬來亞首相。

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又經歷了十年的戰時暴力與壓迫，最終導致帝國終結。帝國面對戰時失去的領土，不確定該如何重新進行殖民。此後殖民地風起雲湧的獨立浪潮，雖然有帝國默許的因素，但更多是各民族努力爭取的結果。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各地的崩潰，最終被視為值得慶賀的歷史里程碑。最能體現這點的，就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在印尼城市萬隆舉辦的亞非國家會議。包括中共在內，出席的二十九個國家總共代表了十五億人，超過當時全球人口的半數。萬隆會議的結論是，透過一連串獨立運動，已可清楚看出整個世界正走向拒絕「西方主義」的道路。最後，會議公報呼籲終結所有既存的殖民主義與停止一切建立新殖民主義的嘗試。籌辦者認為這場會議象徵戰後秩序正在不斷變遷。會議的組織者印尼總統蘇卡諾讚揚「世界的歷史展開了新頁」，亞洲與非洲國家終於能在擁有「自由、主權與獨立」的前提下一起開會商討。

相較之下，非洲的殖民地、保護國與託管領土的自由仍有待爭取。在第一波去殖民化的浪潮之後，非洲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個帝國強權仍穩固遂行殖民統治的地區。這些帝國相信非洲情勢相對穩定，尤其是等戰爭的破壞過去之後。相較於難以對付的亞洲民族主義，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則發展落後。法國、英國與比利時雖然口頭上表示會發展非洲領

土，使其成為「自由主義式帝國」的模範，但許多歐洲人仍舊認為，對於這些還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民族來說，民族自決依然是個遙遠的目標。一九五四年，英國殖民地大臣霍普金森（Henry Hopkinson）表示，有些領地「無法期望能獲得完全獨立」。<sup>81</sup>英國史家沃森（Hugh Seton-Watson）感嘆，讓非洲人獲得民主，只會讓「文明悲劇性地衰頹」並且「倒退回到野蠻時代」，歐洲人將被「山羊、猴子與叢林取代」。<sup>82</sup>儘管如此，人們仍期盼帝國強權能尊重《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承擔義務……確保依賴的民族能取得進步」，包括朝自治邁進。一旦亞洲殖民地獲得獨立，那麼拒絕讓非洲殖民地與保護國自決，在政治上將變得難以自圓其說。聯合國的「託管領土」更是如此，其中絕大多數都位於非洲。受託管理這些領土的國家，過去也曾受託管理相同的地區，只是當時是受國聯託管。這一回，這些管理國必須接受聯合國非自治領土資訊特別委員會與託管理事會的監督。託管理事會由八個負責管理託管領土的成員國組成，此外還從聯合國大會挑選八個成員國加入。特別委員會成為殖民者與批評者之間的戰場，因為許多成員國來自剛獨立的託管領土。英國與法國拒絕在年度託管報告提供政治與憲政議題的資訊，因為兩國認為這些資訊屬於內政，外國不得干涉。直到一九五一年，聯合國才通過決議要求負責管理託管領土的國家必須針對人權問題提供額外資訊。此時歐洲帝國終於發現自己對待非洲民族的方式將會受到外界檢視，這項現實最終導致了各個帝國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與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先後放棄了殖民地。<sup>83</sup>

即使受到外界檢視，託管領土依然免不了遭受政治壓迫。在法屬喀麥隆，喀麥隆人民聯盟（一九四八年成立的獨立運動組織，主張民族自決是明文規定的人權）遭到法國殖民政府的無情取締。一九五五年，該聯盟被認定為共產組織而遭到禁止，成為託管領土第一個被禁止的政

黨。人民聯盟主席逃往鄰近的英屬喀麥隆託管領土，但依然遭到法國緝捕與刺殺。繼法國之後，英國也對喀麥隆人民聯盟發布禁令，並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將其餘聯盟領導人流放到蘇丹。根據紐約的人權監督組織國際人權聯盟估計，法國與英國至少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的五項主要條文。光是一九五六年，喀麥隆就有四萬五千份關於人權侵害的請願書送到聯合國。<sup>84</sup>

少了託管理事會的監督，殖民統治很可能像東南亞一樣嚴酷。在肯亞，基庫尤人（Kikuyu）因為遭到白人移民社群搶奪土地與剝削而發起暴動，肯亞當局於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些暴動組織者被稱為「茅茅」（Mau Mau，根據傳統部族權威，該詞意指「貪婪的食客」），而他們隨後組織了土地自由軍，部分領導人還曾在緬甸與英軍一起對抗日本人。土地自由軍的一名領導人說道：「我們無法接受歐洲人比非洲人優越的說法。」<sup>85</sup>他們成群攜帶各式各樣新舊不一的武器，隨機殺害白人農民家庭。<sup>86</sup>當局對於這場暴亂的反應，也是歷年來英國鎮壓暴亂最極端的一次。即使有部分基庫尤人在各地負責鎮壓暴亂的國土防衛隊服務（讓茅茅運動演變成一場殖民地內戰），效忠於殖民政權，但當局仍認為「全體基庫尤人」都必須為這場暴亂付出代價。<sup>87</sup>與馬來亞一樣，英國也在肯亞實施「新村制度」並且逼迫一百萬名基庫尤人移居新村。英國也把監禁中心設在偏遠地區，巔峰期曾經關押了七萬名犯人，這些犯人必須從事艱苦勞役與不斷遭受暴力對待，而虐待他們的主要是為殖民當局服務的肯亞人。<sup>88</sup>超過一千名茅茅領袖被絞死，一萬一千零五十三人（官方數字）在自由射擊區與安全掃蕩區被殺。當局會篩選出一些被拘禁者，讓他們從那些發過誓的茅茅成員套出口供，但所謂的「篩選」其實是刑求、毆打與威脅閹割，以及綁著手臂吊著或倒吊。當局默認虐囚的存在，直到以虐囚聞名的霍拉營終於在一九五九



年傳出有十一名犯人被毆打致死的消息，當局才改變態度。<sup>89</sup>經過數年鎮壓，基庫尤叛軍逐漸臣服，甘耶達（Jomo Kenyatta）領導的溫和民族主義人士與政府進行協商，承諾將尊重白人移民的權利以換取獨立，最終肯亞於一九六三年獲得獨立。此時英國與法國政府也瞭解到獨立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間，一共有二十三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

然而，在這股看似和平的獨立風潮下，卻上演了一齣最暴力的帝國終結戲碼。一九五〇年代，法國政府已經放棄建立法蘭西聯邦的想法，轉而希望與前殖民地共組法蘭西共同體：這些前殖民地將以名義上獨立的國家身分與法國合作，建立緊密關係。根據這套架構，法國的前殖民地將舉行公民投票，於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幾乎所有的法屬非洲殖民地都獲得獨立。唯一的例外是北非的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不是殖民地，而是法國直屬的一部分，但當地阿拉伯人與柏柏人受到的差別待遇卻又讓人覺得這裡就是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被劃分成幾個省分，居住在當地的法國移民擁有選舉權。二戰期間，阿爾及利亞效忠於維琪政權，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被盟軍占領為止，才有數千名阿爾及利亞人加入自由法國軍隊。一九四五年，在歐洲慶祝勝利日當天，塞提夫省（Sétif）的法國移民（又稱「黑腳」，這個稱呼源自於歐洲人穿的鞋子）與阿拉伯示威者發生了暴力衝突，後續鎮壓造成約三千名阿爾及利亞暴動者死亡。這起事件開啟了漫長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持續到一九六二年才結束。<sup>90</sup>

即使實際上阿爾及利亞的原住民社會與宗主國根本少有往來，但由於阿爾及利亞被巴黎政界視為法國的一部分，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因此被視為法國國內的重大威脅。一九五五年一月，阿爾及利亞總督蘇斯特爾（Jacques Soustelle）宣示，阿爾及利亞與法國不可分離：「法國不會

離開阿爾及利亞，就像法國不會離開普羅旺斯與布列塔尼一樣。」<sup>91</sup>就在幾個月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該組織領導分子有些曾參加過塞提夫暴動，而且在牢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開始發起零星的恐怖主義攻擊，攻擊對象包括政府、法國移民與阿爾及利亞「通敵者」。與肯亞一樣，大批法國移民社群希望獲得有效的保護，法國為此再次進行暴力鎮壓。熟悉的反暴亂景象隨後出現：任意拘禁、自由射擊區、殺害手無寸鐵的嫌犯，拷問游擊隊員與可能的共犯。這類做法缺乏實質效果，結果就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人數與戰力不減反增。解放陣線強迫地方社群提供協助，或將這些人擺在交火的前線位置充當砲灰。到了一九五六年，阿爾及利亞已經駐紮四十五萬名法國軍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徵召兵。在這場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法國服役的士兵曾一度達到兩百五十萬人，由此可以看出法國為了鎮壓這場暴亂所動員的兵力規模。法軍戰死的人數有一萬八千人，阿爾及利亞人的死亡人數則估計達到五十萬，死因包括戰死、復仇殺戮、饑荒與疾病。<sup>92</sup>

法國決定仿效東南亞的遷村移居計畫，結果對阿爾及利亞社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地方行政長官帕彭（Maurice Papon）推動了「重新遷徙計畫」，要讓叛軍無法得到鄉村人口的支援（帕彭最著名的事蹟之一就是曾在二戰時期協助納粹將法國猶太人送進集中營）。帕彭逼迫阿爾及利亞民眾遷徙到簡陋的現代村落居住，徹底破壞阿爾及利亞的傳統村落或游牧生活。法軍對這些傳統村落實施焦土政策，同時也設置自由射擊區，凡是踏進這塊區域者都格殺勿論。到了一九六一年，法國政府已經在阿爾及利亞設立了兩千三百八十個重新遷徙中心。官方數字顯示有一百九十萬人移居，但最近的一項估計則認為實際高達兩百三十萬人，占鄉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大約四十萬名居住在撒哈拉沙漠邊緣的牧民遭強行遷徙，並因此失去了九成的牲

口。這場大規模的強迫遷徙破壞了阿爾及利亞的農業。於是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小麥與大麥的產量減少了四分之三，成千上萬的民眾面臨饑荒威脅。阿爾及利亞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森林地帶被凝固汽油彈摧毀。<sup>93</sup>法國採取孤立與大量部署兵力的策略，最終削弱了民族解放陣線的軍事基礎。民族解放陣線原本在一九五八年擁有大約五萬名兵力，而在法軍、六萬名親法阿爾及利亞民兵與屯墾居民自衛隊的追擊下，到了一九五九年只剩下原有兵力的一半。<sup>94</sup>然而到了這個時期，平叛行動的棘手程度與高昂代價已經導致法國第四共和倒臺，戰時領袖戴高樂重新接掌政權。戴高樂知道法國民眾已經受夠了這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更遑論這場無意義的戰爭完全牴觸了當前去殖民化的世界潮流。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戴高樂宣布他將尋求停火、授權大赦、舉辦阿爾及利亞大選與開啟自決程序。堅持反對停火的移民社群發動了一波暴力行動，而支持祕密軍事組織進行殘暴反游擊戰的法軍將領們也於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發動了一場失敗政變。一九六二年七月，阿爾及利亞獨立，民族解放陣線領袖貝拉（Ahmed Ben Bella）成為阿爾及利亞總理。值得一提的是，貝拉當年在二戰時曾經加入自由法國並投入義大利戰場，還曾因為卡西諾山戰役而獲頒勳章。

與軸心帝國的終結一樣，舊帝國緩慢的崩潰過程也引發了新一波的移民潮，英國、法國、荷蘭與比利時的殖民者、官員與警察開始尋找新的家園。「黑腳」離開阿爾及利亞，一百三十八萬人移居法國，五萬人移居西班牙。三十萬名荷蘭人離開印尼。當比屬剛果終於在一九六〇年獨立時，也有九萬名比利時人放棄原本的家園。根據估計，經歷二戰與二戰後漫長的殖民地暴力騷亂之後，大約有五百四十萬到六百八十萬人從前帝國領土返回歐洲。對於被殖民者來說，歐洲帝國的最後一搏為所有暴亂地區帶來慘重傷亡，或因為戰爭，或因為族群與宗教衝突，或因

為飢餓與疾病，結果就是從印尼到阿爾及利亞有多達一百萬人口死亡（雖然絕大多數的統計僅止於推測）。此外，強制勞動、未經審判予以監禁、強制移居、流放與驅逐，這些都讓各地社群流離失所，也動輒出現嚴重的權力濫用。這就是西方國家首次進行的「反恐戰爭」，違反的不只是聯合國《人權宣言》，連紐倫堡審判德國戰犯後定下的重要原則也被破壞殆盡。濫用權力者普遍未受懲處，也未公諸於世。「二戰結束後的殖民地戰爭」為新領土型帝國主義譜下一段混亂而暴力的終曲。這類型的帝國主義開始於一八七〇年代，於一九四〇年代達到巔峰，最後在一九六〇年代徹底崩潰瓦解。

## 民族國家的世界

亞洲與非洲帝國的終結，使聯合國的性質出現變化。當聯合國的概念在一九四二年出現時，羅斯福與邱吉爾都已經把「民族國家」視為該組織的關鍵字，即便當時英國與法國仍是帝國。羅斯福與邱吉爾當時考慮的只有歐洲、美洲與紐澳的國家，但隨著往後二十年的去殖民化運動，亞洲、非洲與中東所謂「第三世界」的獨立國家已經在聯合國裡形成壓倒性的多數。歐洲帝國最初在劃定疆界時鮮少考慮文化或族群差異，這導致一九四五年後殖民地只能被迫在殖民強權劃定的疆界裡尋求獨立。雖然有些人試圖超越民族的束縛，提出聯邦或共同體的概念，特別是在法語非洲，但這類想法最終不敵民族認同的強大誘惑力。<sup>95</sup>在一九四五年的聯合國組織會議上，已經有五十一個國家出席。想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必須對軸心國宣戰，宣戰時間不得晚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但出席組織會議的國家，有不少也在同盟國內部造成爭論，例如烏克蘭



與白俄羅斯嚴格來說不算國家，印度則尚未獨立，波蘭雖然是第一個與軸心國作戰的國家，但波蘭加入聯合國一事卻成為冷戰的爭論焦點。到了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召開時，已經有七十六個國家加入聯合國，包括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與義大利等前軸心國。到了阿爾及利亞與肯亞分別於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獨立時，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一十二個成員國，除了葡屬安哥拉與莫三比克尚未獨立之外，所有主要前殖民地都加入了聯合國（兩國最終也分別於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六年獨立）。日本於一九五六年獲准加入聯合國，西德與東德則一直要到一九七三年才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組織雖然經常被質疑是否有能力確保和平與提倡人權，但不可否認的是，聯合國清楚見證了從全球帝國到民族國家的世界轉變。

一九四五年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組織會議中，也出現了埃及、伊拉克、伊朗、敘利亞與黎巴嫩等中東主權國家的身影。這些國家的出席掩蓋了一項現實，即它們在一九四五年時依然在大英帝國部隊與官員的占領之下。這項二戰遺緒持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主權。根據一九四一年秋天達成的協議，伊朗仍有一半國土被蘇聯占領。由於保住中東在二戰期間的英國大戰略裡占據核心地位，這五國名義上的獨立地位也遭到英軍的嚴重破壞。巴勒斯坦與外約旦此時仍屬於國聯的託管領土，一度與已經成立的聯合國短暫共存。儘管中東在二戰前屬於英法的勢力範圍，但情勢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相當明顯，那就是英法不可能維持對中東的支配。一九四一年，英軍擊敗維琪政權在中東的勢力，敘利亞與黎巴嫩於是趁機宣布獨立，而兩國的獨立地位在一九四四年獲得蘇聯與美國承認。二戰結束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一度想恢復法國對敘利亞的支配，法國在敘利亞的駐軍便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報復當地反殖民遊行為由對大馬士革市中心進行砲轟。英軍指揮官出面干預，宣布戒嚴，要求法軍

不許離開軍營。英國與美國都不希望看到法國在中東重新立足，因此兩國都願意支持敘利亞與黎巴嫩獨立。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敘利亞與黎巴嫩政府共同主張法國無權管理託管地，兩國的獨立地位因此獲得確立。一九四六年夏天，最後一支盟軍部隊離開敘利亞。<sup>96</sup>英國在外約旦的國聯託管地也在與阿布杜拉國王（King Abdullah）達成協議後迅速結束託管，根據協議，英國可以繼續在當地駐軍，甚至可能支持國王的個人野心，併吞鄰近領土建立「大敘利亞」，然而美國國務院公開反對約旦擴張，因此這項計畫只能作罷。一九四六年三月，外約旦成為獨立國家，考慮到外約旦依然與英國利益密切相關，美國與蘇聯並未立即承認這個新國家，直到約旦在一九四九年取代外約旦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後，美蘇才正式承認約旦的獨立地位。<sup>97</sup>

法國被逐出中東之後，英國對中東的主要關切依然承襲了二戰時期的重點：阻止蘇聯滲透中東，維護英國在伊拉克與伊朗的石油利益，在戰略上繼續控制蘇伊士運河以維持與帝國東方領土的連結。伊朗的局勢最為危險，英國十分憂心蘇聯勢力會入侵伊朗與威脅伊朗石油供給。英國在戰時曾與蘇聯達成協議，雙方約定在戰爭結束的六個月後必須將軍隊撤出伊朗。一九四六年三月，英軍撤離，但蘇軍卻文風不動。蘇聯政府試圖施壓民族主義分子蓋瓦姆（Ahmad Qavam）領導的伊朗政府，要求取得伊朗北部的石油利權，並且讓居住在伊朗北部的亞塞拜然人建立自治區。一九四六年五月，蓋瓦姆答應蘇聯的要求簽訂條約，蘇聯於是撤軍，但不久伊朗政府就在英美的強大壓力下拒絕履行條約。史達林再次讓步，因為此時他正專注於東歐的政治重建，不希望在伊朗與英美發生衝突。<sup>98</sup>儘管如此，共產黨的威脅並未解除，不僅伊朗人民黨開始崛起，伊朗國內還掀起了罷工與人民抗爭熱潮。英國外交部與英伊石油公司派駐伊朗的人員進行了反共宣傳戰，賄賂伊朗官員與報紙編輯。一九

四六年七月，伊朗人民黨發動大罷工，阿巴丹油田陷入癱瘓，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派軍進駐英國位於伊朗巴斯拉的基地進行威嚇。儘管罷工失敗，但蓋瓦姆政府的態度卻在八月間轉趨強硬，拒絕英國干預伊朗事務。<sup>99</sup>三年後的一九五一年三月，伊朗新任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q）在伊朗國會支持下將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繼任已故貝文而成為英國新任外交大臣的莫里森，想要派遣七萬名部隊前往伊朗保護英國的石油利益，但美國卻要求英國謹慎行事。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批評英國的舉動「簡直是瘋了」。英國於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被逐出伊朗。埃及一份報紙表示：「英國在中東已經完全失去威望。」<sup>100</sup>但這項說法言之過早。一九五三年，英國軍情六處與美國中情局密切合作，在德黑蘭發動政變，推翻摩薩台政權。石油於是持續流入設在伊朗的英美公司，直到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為止。<sup>101</sup>

伊拉克也成為英國用來圍堵蘇聯威脅的前線。英國在伊拉克擁有空軍基地，隨時可以對蘇聯發起軍事行動。伊拉克雖然名義上已經獨立，但從一九四一年發動叛亂遭到鎮壓後直到二戰結束為止，一直形同英國的託管地。二戰結束後，伊拉克雖然恢復了名義上的獨立地位，但受到英國恩庇的伊拉克政治人物卻依然接受英國對伊拉克的支配。英國外交大臣貝文一直想透過簽訂條約的方式在中東建立帝國，而伊拉克就是個典型案例。雖然英國行政官員與絕大多數大英帝國部隊已於一九四七年撤出伊拉克，但用來取代一九三〇年獨立條約的新約卻在樸茨茅斯港的英國戰鬥艦勝利號（*Victory*）上簽訂，這是一個充滿象徵性的帝國主義場景。《樸茨茅斯條約》（與一九〇六年為了結束日俄戰爭而於美國緬因州樸茨茅斯簽訂的同名條約不同）於一九四八年一月簽訂，英國因此得以維持在伊拉克的軍事特權。但就跟在其他地區一樣，英國低估了伊拉克國內的反帝國主義情緒。在爆發大規模的反英暴亂之後，伊拉克攝

政阿布杜勒（Abd al-Ilah）拒絕履行《樸茨茅斯條約》，英國在伊拉克的利益因此嚴重受損。一九四八年，伊拉克脫離英鎊區，四年後又與英國協商取得英國石油利權的一半收益。一九五五年，伊拉克將兩座英國空軍基地收歸國有（也就是英國原本打算在蘇聯威脅伊拉克時用來轟炸蘇聯的基地）。一九五八年，一場軍事政變徹底結束了伊拉克與英國的殘餘連結。<sup>102</sup>

英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中，沒有比蘇伊士運河更重要的存在。該運河是英國人的命脈，英國早在二戰初期就已嚴密防守此地。英國參謀首長會議認為蘇伊士運河是連接英國與亞洲帝國領的交通要道，即使在印度與巴基斯坦獨立之後，蘇伊士運河仍可充當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基地，英軍可以從這裡投射空軍與陸軍，因應蘇聯可能的威脅。英國對於蘇伊士運河的軍事價值極其重視，因此首要之務就是排解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多年衝突以維持巴勒斯坦託管地的穩定局面，以及與埃及政府訂定協議。英國與埃及國王與埃及政府的關係早在二戰時期就已不太順利，等到盟軍勝利之後，雙方關係更是迅速惡化，因為此時美國已取代英國成為埃及的主要投資與商業援助來源。<sup>103</sup>埃及國王法魯克希望終止一九三六年的《共同防禦條約》，因為根據這份條約，大英帝國部隊在戰爭期間可以在埃及境內作戰。一九四五年，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區是全世界最大的軍事基地，有十座機場與駐紮二十萬大軍的三十四座軍營。<sup>104</sup>隨著戰後復員，英國駐軍數量開始明顯減少，到了一九四六年，大英帝國部隊從埃及各地撤離，只剩下運河區仍控制在英國手中。但埃及政府堅持英軍必須全數撤離，並且單方面廢除了一九三六年的《共同防禦條約》，此舉反而讓英國將運河區的駐軍增加到八萬四千人。運河區難以防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等非正規軍的持續攻擊，而英軍的猛烈反擊也遭到美國政府的譴責。



一九五二年，法魯克國王在一場軍事政變中遭到推翻，英國仍持續與後續的埃及政府協商，希望能維持當地駐軍，避免發生邱吉爾所說的「在世人面前遭受長期羞辱的失敗」（他此時二度擔任首相）。<sup>105</sup>儘管如此，邱吉爾最終還是同意於兩年後關閉運河區的軍事基地。一九五五年十月，英軍全數撤離。然而事情還沒完。一九五六年七月，納瑟上校（Gamal Abdel Nasser）領導的埃及政府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引發英法帝國在中東的最後一搏。英法與以色列政府合作奪取運河區，但這項決定卻證明是一場災難。戰爭於十月二十四日爆發，但到了十一月六日，英法卻不得不在國內輿論與聯合國譴責等各方壓力下同意停火與撤兵。<sup>106</sup>前自治領紛紛譴責英國的行動，大英國協頓時面臨崩潰的危機。加拿大總理如此抱怨：「那種感覺就像是發現自己叔叔因為犯下強姦罪而被逮捕一樣。」<sup>107</sup>蘇伊士運河危機讓英國徹底斷絕了繼續涉入中東事務的念頭，同時也成為舊帝國最後一次軟弱無力的抵抗。

由於占領埃及引發的各項問題，英國政府從一九四五年開始便嘗試以巴勒斯坦託管地做為替代的戰略基地。與埃及不同的是，英國可以直接控制這個地區而不用仰賴條約。但若從現實層面來看，這項戰略只能說是一種幻想。二戰結束後，巴勒斯坦逐漸成為長期軍事危機的焦點，不僅阿拉伯人重提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的主張，猶太人也希望在猶太故土建立屬於猶太民族的國家。如何處置巴勒斯坦的問題早在戰爭結束前就已經浮現，只是一直遭到擱置延宕。英國傾向於避免做出可能令阿拉伯人不悅的決定，因為英國希望維持在中東的影響力，而這點必須仰賴阿拉伯人支持，因此英國不可能答應猶太人建國的要求。英國的政策依然受到一九三九年白皮書的影響，也就是限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名額，否認猶太人的自治權。儘管如此，二戰期間，猶太事務局做為居住在巴勒斯坦託管地近六十五萬名猶太人的代表機構，依然持續為成立國

家的可能性進行準備。猶太事務局局長古里昂（David Ben-Gurion）表示：「猶太人必須表現出他們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樣子，而且必須維持這個樣子直到巴勒斯坦真的出現猶太國為止。」<sup>108</sup>猶太事務局有一個猶太「議會」，一個行政機構與非法的準軍事單位「哈加拿」

（Haganah），該單位至少有能力動員四萬名戰士。一九四二年五月，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紐約一間飯店起草《巴爾的摩宣言》，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並由猶太人來控制移民人數。美國的支持不僅來自於無數猶太裔美國人慷慨提供資金給猶太事務局，也來自於美國的領導階層。一九四四年十月，羅斯福總統呼籲「全面開放巴勒斯坦，讓猶太人可以無限制移民當地」，這項政策不僅在當時遭受英國的大力反對，即使到了戰後，英國也堅持反對立場。<sup>109</sup>猶太民族主義運動的激進分子認為相較於德國人，英國人才是猶太人建國的真正敵人。二戰期間，有兩個組織開始對英國採取恐怖攻擊，一個是以色列民族軍事組織（Irgun Zvai Leumi），日後的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是其中一名領導者；另一個是以色列自由戰士（Lohamei Herut Israel），更常見的名稱是根據其領導人斯特恩（Abraham Stern）命名的斯特恩幫（Stern gang）。哈加拿表面上反對暴力行動，私底下卻支持恐怖分子的目標。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英國代理中東大臣莫因勳爵（Lord Moyne）在埃及被以色列自由戰士行刺身亡，就連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邱吉爾也深感震驚，甚至因此重新考慮是否對猶太人「維持一貫的支持」。<sup>110</sup>

英國人一般來說比較同情阿拉伯人。一九四五年三月，埃及、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與沙烏地阿拉伯成立了「阿拉伯國家聯盟」，聯盟的優先目標之一就是為所有阿拉伯國家爭取主權，包括未來的巴勒斯坦。<sup>111</sup>英國再次允許巴勒斯坦託管地組織政黨之後，有六個阿拉伯政黨組織隨後成立。巴勒斯坦阿拉伯黨也是其中之一，其領導人胡塞尼

（Jamal al-Husayni）提出的要求便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二戰結束後的幾個月，在英國准許下，幾個阿拉伯民兵團體「拿迦達」（al-Najjda，字面意思是「隨時援助」）偽裝成運動俱樂部人員出現在巴勒斯坦。他們其實是在當地從事準軍事訓練，為即將發生的危機做準備。一九四六年二月，阿拉伯國家聯盟鼓勵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團結起來，聽從高級委員會的指揮，而高級委員會當時是由大穆夫侯賽尼率領的阿拉伯高級執行機構主導。聖戰軍與以敘利亞為根據地的解救軍等準軍事組織開始出現，後者主要由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與敘利亞志願者組成。聖戰軍與解救軍都致力於用暴力消除猶太國帶來的威脅，但這兩個組織訓練不足、武器不夠精良，難以掀起大規模的衝突。<sup>112</sup>面對即將爆發的內戰，英國政府的反應是在巴勒斯坦駐紮十萬名士兵，還有兩萬名武裝警察從旁輔助。由於情勢變得十分凶險，英國勤務人員開始減少在街上露面的機會，躲藏在被戲稱為「貝文格勒」的英軍武裝基地（得名於派英軍前來此地的外交大臣貝文）。

猶太人發動的恐怖攻擊規模愈來愈大。光是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某個晚上，猶太人就對當地的鐵路網發動一百五十起攻擊。一九四六年六月，英國總督被授予裁量權以因應猶太人暴力造成的緊急狀態。帝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一度失言，表示猶太人「必須被徹底擊敗，完全粉碎他們的非法組織」。<sup>113</sup>一九四六年夏天，英國探員已經查出猶太事務局與恐怖行動直接相關。英國占領軍於是在六月二十九日發起「阿加莎作戰」（Operation Agatha），突襲猶太事務局總部，逮捕兩千七百名嫌犯。進行突襲的英國士兵對於恐怖主義感到挫敗，高喊「我們需要毒氣室」，並且在突襲的建築物牆上潦草地寫上「猶太人去死」。為了反擊，比金下令用炸彈襲擊位於耶路撒冷大衛王酒店的英軍總部，七月二十二日發生的這起爆炸事件，導致困在酒店內的九十一人死亡，其中有

二十八人是英國人。爆炸案是個轉捩點，導致英國民眾把占領的代價與犧牲拋諸腦後，只期望駐紮在巴勒斯坦的英軍能在公眾的充分監督下毫不留情地進行鎮壓掃蕩。幾個月後，巴勒斯坦宣布戒嚴，但兩個星期後又因為政治風險過高而暫停實施。

儘管如此，英國當局並未鬆懈，依然針對想規避嚴格禁令偷渡到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進行嚴厲盤查。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慷慨解囊包下班赫克特號（*Ben Hecht*）等幾艘船載運猶太人偷渡到巴勒斯坦，這幾艘船卻在巴勒斯坦領海遭英軍攔截，船員遭囚，難民則送到賽普勒斯營區。貝文的祕密指令取了一個恰如其分的代號叫「阻礙作戰」（*Operation Embarrass*），英國特工奉命破壞在歐洲港口停靠的猶太難民船隻，手段包括污染食物或飲水，以及使用吸附水雷。最著名的事件便是出埃及一九四七號（*Exodus 1947*），該船載運的都是身體比較虛弱的老人、懷孕婦女與兒童。這艘船在滿載民眾的狀況下，遭英軍兩艘驅逐艦碰撞而受毀（由於該船未成功碰觸水雷，因此驅逐艦不得不上前截停）。出埃及一九四七號被拖到巴勒斯坦港口，乘客被迫下船，隨即又被送上三艘遣返船將他們載運到漢堡，最後在手持軟管、催淚瓦斯與警棍的英國軍警逼迫下，這群精疲力盡而衰弱的猶太人只能下船，最後被送回德國營區。<sup>114</sup>出埃及一九四七號事件引發了公關災難。一名殖民地部官員表示：「我們不願面對的現實是，在這起緊急拘留事件中，我們的所作所為跟納粹沒什麼兩樣……。」<sup>115</sup>

猶太移民爭議最終促使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託管地的統治。美國因為猶太移民爭議而不願支持英國對巴勒斯坦危機的處置方式，英國的國際聲譽也因為難民船事件而一落千丈。一九四五年夏天，德國西部與奧地利原本只有兩萬七千名流離失所的猶太人，但不久波蘭與蘇聯政府又從東歐送來大量「無法遣返」的猶太人，表面上是基於人道理由，實際



上卻是因為在戰後反猶太主義的氣候下，將這些猶太人留在國內不利於整合與同化。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天，估計已經有二十五萬名流離失所的猶太人，其中絕大多數居住在對猶太人較為同情的美國營區裡。這些被營區收容的猶太人，絕大多數都想前往英國的巴勒斯坦託管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曾對一萬九千名流離失所的猶太人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一萬八千七百人表示他們屬意的新家園是巴勒斯坦。一名年邁的猶太人在一九四五年解釋說：「我們在別人的土地上工作與掙扎求生，這樣的日子實在太久太苦。我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土地。」<sup>116</sup>美國總統杜魯門派跨政府難民委員會代表哈里森（Earl Harrison）前去歐洲調查猶太人的困境。哈里森的報告揭露了猶太人令人震驚的實際情況，報告也明確支持猶太人有遷徙到巴勒斯坦的權利。杜魯門總統於是要求艾德禮接納十萬名猶太難民，但英國政府卻藉故推託。外交大臣貝文想提出一個剛好能「安撫猶太人情緒」的難民人數，但讓大量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將會加劇危機且讓英國與阿拉伯人漸行漸遠。<sup>117</sup>杜魯門總統的提議是政治上的一著險棋，一方面藉此討好美國為數甚多的猶太選民，同時又能避免讓美國自己來收容大量的猶太難民。儘管如此，美國輿論確實普遍對於英國的立場感到不滿，期望英國政府能對猶太人的遷徙意願給予更充分與更人道的回應。歐洲難民組織起初把流離失所的猶太人定義為無國家之人，之後則改為「非領土型民族」，實際上給予了猶太人民族地位。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杜魯門要求建立一個「可行的猶太國」以滿足猶太人建國的需求。對英國政府來說，巴勒斯坦的棘手衝突就跟印度危機一樣，不可能只從單方面加以解決。一九四七年二月，貝文提出巴勒斯坦兩國分治方案，希望英國以受託管理者的身分至少再統治當地五年。然而，這項方案遭到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雙重反對，英國只得將這個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貝文最後冷冷地留下一句：「巴勒斯坦遲

早是要分治的。」<sup>118</sup>

結果，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調查委員會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認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猶太國家與阿拉伯國家分治。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獲得美國與蘇聯的強力支持，並且在美國施壓拉丁美洲與西歐的狀況下，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聯合國大會上戲劇性地投票通過。英國在投票時棄權，同時拒絕實施特別委員會起草的分治條款，更宣布將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單方面從巴勒斯坦託管地撤離。英國依然在巴勒斯坦駐軍，只是活動範圍限制在營區之內。當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開始爭奪特別委員會在分治地圖上為雙方劃定的區域時，內戰隨之爆發。解救軍從敘利亞基地滲透到巴勒斯坦境內，追隨解救軍的還有來自波士尼亞、德國、英國與土耳其的反猶志願軍。約旦國王阿布杜拉的阿拉伯軍團接受英國軍官訓練，此時也跨越約旦河進入西岸，防守耶路撒冷抵抗猶太人的攻擊。猶太事務局命令哈加拿採取攻勢，此時的哈加拿約有三萬五千名到四萬名武裝部隊，包括五千名二戰時期猶太旅的退伍軍人。經過一連串小規模但血腥的戰鬥之後，哈加拿控制了分治地區而且開始攻擊阿拉伯人的定居地帶，藉此取得更多領土。<sup>119</sup>與對手阿拉伯人相比，猶太人的武器裝備較精良、紀律較嚴明而且領導統御素質較高。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也就是英國撤離的前一天，當猶太事務局局長古里昂宣布以色列建國時，這個分治的國家已做好充足準備，隨時可以發起軍事行動。阿拉伯國家聯盟接著對以色列宣戰，想除掉這個新來者，但阿拉伯軍隊裝備不佳且無法協同作戰。聯合國數度要求短暫停火均遭到忽視。到了一九四九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已經達到六十五萬人，超過當地阿拉伯人口的一半。分治的阿拉伯國家就此胎死腹中。約旦接管了絕大多數巴勒斯坦難民所在的約旦河西岸，埃及則接管了加薩走廊。在聯合國斡旋下，各方終於在一九四九

年達成一系列停火協議。同年五月十一日，以色列加入聯合國。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總計有三十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四名歐洲猶太人移居以色列。<sup>120</sup>

聯合國成立的最初數十年，有一個大國一直未能加入，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率領人民解放軍打贏內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蔣介石與殘餘的國民黨軍民逃到臺灣，此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一直由臺灣方面代表。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在一九四五年後形塑戰後全球新秩序的所有動盪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過於中國共產黨將抗日戰爭以來衝突不斷且四分五裂的中國打造成一個民族國家。抗日戰爭結束時，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認為自己可以利用戰時的混亂與失序來重建新秩序。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毛澤東與周恩來前往重慶與蔣介石進行會談。在長達六個星期的協商中，雙方對於合作建立新中國交換意見，然而這場會談反而暴露出雙方對中國未來的願景存在著巨大差異。毛澤東拒絕裁減共產黨軍隊，而共產黨軍隊不久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毛澤東也反對讓共軍聽從蔣介石的指揮。中共不願放棄對華北五省的控制，這是他們在戰爭最後一年取得的勢力範圍。<sup>121</sup>雖然史達林已經警告毛澤東要避免內戰，以免造成中國分裂，但毛澤東不願放棄人數超過百萬的大軍指揮權，內戰因此勢不可免。就在重慶會談進行的同時，國民黨與共產黨軍隊已經在長江流域與華北各省爆發戰鬥，共產黨軍隊也在占領滿洲的紅軍注視下進駐滿洲。

隨著蘇軍在二戰後占領滿洲，以及美國軍事顧問與武器裝備進駐中國南方，中國的未來走向引發國際關注。蔣介石的戰時西方盟邦，對於中國在新世界秩序裡居於何種地位一事意見分歧。羅斯福堅持中國要成為維護戰後安全的「四警察」，而中國也於一九四六年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sup>122</sup>但對邱吉爾來說，中國的強權地位不過是「裝模作

樣」。儘管一九四三年英國在蔣介石的堅持下勉為其難地放棄在中國的特權，中國也因此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與取消西方在中國主要貿易口岸的治外法權，但戰後英國官員依然不改對中國的態度，以為英國仍有機會重建在中國的「非正式帝國」。<sup>123</sup>英國內閣遠東委員會建議「盡可能恢復先前對中國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利權。英國的意圖充分表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皇家海軍重新占領香港的行動上：英國此舉違反了與蔣介石政府的協議，未優先禮讓中國軍隊收復香港。美國反對這項既成事實並且盡一切努力確保英國不會嘗試恢復過去的地位。一九四四年末，羅斯福派特使赫爾利將軍（Patrick Hurley）前往中國，明確指示他「留意歐洲帝國主義」。<sup>124</sup>美國龐大的軍事與商業實力使英國不敢輕舉妄動，不過對英國而言，真正的障礙還是蔣介石。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堅持立場，因為對他而言，歐洲與日本過去建立的舊秩序早已不復存在。

一九四五年後，英國希望中國陷入衰弱分裂，這樣英國就可以延續過去的做法榨取中國各地方的利權。美國政府的立場剛好相反。馬歇爾將軍繼赫爾利之後擔任特使，他的說法完全反映了美方的態度，那就是希望建立一個「強大、民主、統一」的中國。<sup>125</sup>英國對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減弱且不受歡迎，反觀美國則對戰後的中國廣泛介入。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美國對華援助達到八億美元，超過戰時對華援助的總額。美國軍事顧問為國民政府訓練十六個師，之後又對二十個師進行基本訓練，蔣介石的軍事裝備也有八成來自美援。<sup>126</sup>美國政策的援助對象是蔣介石而非共產黨，但美國的援助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領導人必須盡快讓中國走向美國式民主——這項要求顯示美國對自己結盟四年的盟友中國依然一無所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杜魯門派馬歇爾到重慶調停，希望國民黨與共產黨能「透過和平與民主的方式」進行合



作。<sup>127</sup>馬歇爾成立了「三人小組」，由馬歇爾、周恩來與張群組成，三人共同商討試圖達成第二次停戰協議。一九四六年一月，三人小組就國共停火、共組聯合政府與整軍計畫達成協議。蔣介石著手進行民主化工作，毛澤東則寫下了「中國民主必須遵循美國路線」這樣令人期待的紀錄。<sup>128</sup>馬歇爾對結果感到欣慰：「了不起的成就，我們居然能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在我們抵達之後，事情終於有轉圜的機會。」馬歇爾顯然過於樂觀。一九四六年一月底，蔣介石在日記裡提到馬歇爾不瞭解中國的政治，他寫道：「美國民族天真而易信人.....遂為共黨所乘。」事實上，毛澤東真正的看法是，與帝國主義者訂定的一切協議全是廢紙。毛澤東曾對軍隊將領說道：「所有的勝負都要在戰場上解決。」<sup>129</sup>

正當馬歇爾以為自己促成了穩固的協議時，國共內戰卻在華北與滿洲爆發，一月中生效的停火協議頃刻間成了廢紙。重慶會談並未討論滿洲問題，但滿洲卻成了國共內戰的主戰場。對蔣介石來說，控制滿洲是最優先的事項，特別是做為抗戰開端的九一八事變就是於一九一八年在此地爆發，而國民政府當初的舉措失當才導致滿洲淪陷。一九四五年八月，蔣介石與史達林達成協議，蘇聯同意把紅軍占領的滿洲歸還中國。八月十四日，中蘇訂定友好同盟條約，約定由蘇聯控制滿洲的大連、旅順兩座港口，但蘇聯必須給予蔣介石「士氣、軍事與各項有形援助」以協助其統一中國及建立無可質疑的統治地位。<sup>130</sup>中國共產黨並未受邀參與這場協商，也無法確定史達林的真正意圖。日本投降後的幾個月內，超過五十萬名中共部隊在林彪帶領下進入滿洲，在農村施行土地改革與培養黨員幹部。中共想進入滿洲城市卻被紅軍拒於門外，因為史達林已經承諾將滿洲交給蔣介石政府。從一九四五年底開始，美國海軍協助運送二十二萬八千名國軍部隊與裝備到滿洲，包括蔣介石的精銳部隊

新一軍與新六軍。往後幾個月，蔣介石的軍隊有七成抵達滿洲。<sup>131</sup>一九四六年三月與四月，蘇聯軍隊開始撤出滿洲，此時國共衝突也逐步擴大。共軍在三月被逐出瀋陽，卻在四月殲滅了長春的國軍守軍。國共停火協議如毛澤東與蔣介石預期的失敗。往後幾個月，感到幻滅的馬歇爾將軍終於說服杜魯門總統對蔣介石的軍隊實施武器禁運，導致國軍使用的美械軍火缺乏彈藥與零件。國共內戰自此完全成為中國人自身的戰爭，無論美國或蘇聯都作壁上觀。

這場攸關中國未來的內戰，起初的發展讓人無法預料到最終結果。停火破裂後的十八個月間，國軍奪回了共產黨在長城以南占領的城市、村鎮與農村地區。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共產黨已經失去一百六十五座城市與十七萬四千平方公里的領土。一九四七年三月，國軍將領胡宗南大舉進攻陝西，攻下中共首都延安。由於潛伏在胡宗南司令部的中共間諜預先提出警告，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高層得以在胡宗南大軍抵達前撤出延安，往延安北部與東部躲避。毛澤東留下一小支部隊象徵性地防守延安，但很快就遭到消滅。然而，胡宗南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國民政府高層與新聞媒體都把攻占延安宣傳成歷史性大捷，甚至認為這是國共內戰最大的戰果。<sup>132</sup>然而，這場勝利只是假象，儘管中國共產黨在這十八個月內遭受了重大損失，但華北與滿洲的農村地區依然在中共掌握之下。與對抗日軍時一樣，共產黨的策略是建立與保護根據地，並且採取朱德提出的「麻雀戰」，化整為零對落單的敵軍進行猝不及防的突襲，再迅速退回周邊地區。共產黨高喊「農村包圍城市」的口號，透過在農村掀起社會革命，最終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打下基礎。<sup>133</sup>

與國民黨提出的各項主張相比，共產黨提出的未來願景對戰後的中國民眾更具吸引力。戰爭造成巨大的破壞，整個中國社會顛沛流離，百姓陷入赤貧；家庭的離散使維繫家庭生活與上下尊卑關係的傳統儒家價

值崩壞，日本占領與國民政府的作戰不力，也讓民眾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信心。秩序蕩然無存對於年輕人的影響特別大，年輕人因此尋求從傳統的社會關係中解放。這也是為什麼共產黨招募的黨員與人民解放軍超過半數在二十歲以下。對於中國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國共內戰是一場糟糕的經驗。在湖南省，有兩百萬到三百萬人死於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饑荒；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居然又餓死了四百萬人。中國各地的村落莫不受到地主、黑市商人與土匪的剝削與蹂躪。在共產黨支配的地區，農民至少會受到保護，而且施行土地改革。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發布《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要求沒收地主土地來分配給農民。抗戰時期暫時擱置的階級鬥爭，此時成為共產黨的核心訴求。在華北地區，中共推動所謂的「訴苦挖根」運動，讓農民與工人大聲說出壓迫者的名字。這場運動的目標是要讓農村窮人覺醒，讓他們瞭解自己陷入貧困的原因，並且將矛頭對準階級敵人。中共派出受過訓練的「苦根」到農村裡，偽裝出悲傷的神情，言語中流露出千篇一律的憤怒。<sup>134</sup>對剝削者的報復相當嚴厲，通常最終都會予以處決，與日本通敵者或國民黨員則會遭受任意的暴力懲罰。共產黨利用民眾對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敵視，指責他們讓中國陷入戰亂，無法帶領中國走出新的未來。

對蔣介石與國民黨而言，戰後局勢讓抗戰時期已經出現的財政與社會危機更加惡化。國共內戰加劇了原已嚴重的通貨膨脹，軍費竟然耗費了將近三分之二的國家開支。中國法幣與美元的兌換率，從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美元兌換兩千六百五十五法幣，到一年後貶值為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六法幣，一九四八年一月更重貶到十八萬法幣。惡性通貨膨脹影響了國民黨轄下城市地區的消費者與儲蓄者，但對於共產黨轄下自給自足的農村地區則影響較少。當蔣介石堅持日本占領區發行的通貨必須以一比兩百的比率兌換成法幣時，數千名曾為日本占領者工作或因為黑市交

易致富的民眾其財富一夜蒸發。<sup>135</sup>通敵者或被判定為通敵者的人，被迫搬出自己的家，財產也被國民黨官員沒收，許多舊商業與官僚菁英頓時一無所有，而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則一躍成為新的菁英。抗日戰爭時期，層出不窮的腐敗與犯罪損害了戰爭投入，而這些現象到了戰後依然持續，民眾爭相取得各種利益，或者僅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中國的分支機構發現中國貪汙腐敗盛行，救濟物資被掠奪或倒賣給私人企業，而非提供給急需的貧困難民。<sup>136</sup>儘管打贏了抗日戰爭，但持續多年的戰爭卻讓民心疲弊，蔣介石政權也因此喪失人民的支持。一九四八年二月，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民心動搖已極。」<sup>137</sup>

蔣介石面臨的最大難題在於，他必須徹底消滅共產黨的反抗勢力，才能鞏固在華北與滿洲的戰果。對蔣介石而言，滿洲是戰略首選，因為以滿洲為戰場可以確保史達林遵守中國對滿洲擁有主權的承諾，還可以仰賴美國訓練的美械軍隊來殲滅共產黨軍隊。然而，滿洲的後勤補給僅靠一條鐵路支持，而單一補給線很容易被敵人切斷。另一方面，美國的武器禁運也對這項策略影響甚鉅，因為一旦缺乏彈藥，美械將完全失去優勢。馬歇爾將軍對自己最後僅淪為「傳達訊息」的角色感到沮喪，最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結束特使工作，返回美國擔任國務卿。<sup>138</sup>美國政府開始對直接支援蔣介石政府抱持保守態度，因為這項軍事援助很可能變成無底洞。一九四八年九月，美國再次支援軍事物資，但為時已晚。<sup>139</sup>

由於廣大的農村地區遍布共產黨軍隊，國民黨軍隊只能集中在主要城市，無法順利返回南方。時間一長，北方的嚴寒氣候與嚴酷的生活條件便開始影響軍隊士氣，原本掌握的勝局也一點一滴流失。在一九四六年與一九四七年遭國軍擊敗後，中共便進行重新整頓，招募更多貧困與



失望的城市青年，並且在蘇聯援助下重建人民解放軍。共軍在一九四六年撤退到滿洲與蘇聯邊境，蘇聯便經由邊界將武器源源不斷地交給共軍。到了一九四七年秋天，滿洲的人民解放軍再度擴充到一百萬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零下三十五度的低溫下，四十萬名共軍開始進攻滿洲的城市地區，他們越過冰凍的松花江面，圍困大城市瀋陽。長達十個月的圍城，二十萬名國軍與四百萬名城市居民逐漸缺乏糧食與燃料。共軍切斷主要的鐵路補給線，使滿洲斷絕所有可能的支援而完全陷入孤立。為了彌補空中力量的不足，共軍使用了四倍於國軍的火砲，而蘇聯的技術顧問也協助將共軍的游擊隊改造成懂得進行大規模會戰的現代陸軍。<sup>140</sup>一九四八年五月，林彪圍困瀋陽北方的大城長春。當國軍將領拒絕投降時，林彪便下令部隊要讓長春變成一座「死城」。<sup>141</sup>從五月到十月，共軍持續圍困長春，並且在城市周邊圍起了一圈由鐵絲網、碉堡與壕溝構成的防禦工事。有些城市居民耐不住飢餓出城逃生，卻卡在城市與共軍防線之間的無人地帶，既不能通過共軍防線，國軍又不准他們回城。在夏日高溫下，堆積如山的屍體開始膨脹發臭，估計城裡城外總共有十六萬人死亡。當蔣介石命令國軍將領鄭洞國率軍突圍時，他底下的部隊竟有半數譁變。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長春開城投降。<sup>142</sup>

長春陷落之後，錦州很快也被攻下，然後是瀋陽。十一月一日，瀋陽在進入艱困的白刃戰後宣布投降。在一連串城市戰之後，蔣介石的精銳部隊喪失大半，估計損失達到一百五十萬人。共軍每贏得一場戰役，就會引發敵方陣營大量倒戈，許多中國菁英（所謂的「風派」）為了想從共產黨秩序中獲得更多好處而投共。國軍在滿洲的失敗不可避免地引發骨牌效應，使其他地區的戰事也跟著急轉直下。往後共軍的推進路徑像極了十年前日軍推進的模式。北京被圍困了四十天，最終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投降，繳械的二十四萬名國軍部隊被編入人民解放軍。

倉促完成的毛澤東肖像懸掛在天安門廣場，取代原有的蔣介石肖像。北京陷落，加上各地戰事失利，蔣介石因此於一月二十一日下野，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負起幾乎不可能成功的結束內戰協商工作。該年四月，毛澤東要求無條件投降，遭李宗仁拒絕。蔣介石在日記上抱怨，國共內戰的失敗源自於國民黨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的「制度與組織」，軍隊也未能有效改革。<sup>143</sup>此時，共軍開始在華北地區朝四面八方擴張。國共內戰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便發生在徐州這個鐵路樞紐城市。將近兩百萬大軍爭搶這座通往南方的門戶，但國軍再度失利。四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之後是武漢，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失守。雖然五月初蔣介石曾在共軍抵達前來到上海，宣稱上海將成為中國的史達林格勒，但實際上這座城市只做了零星抵抗。英國駐華公使藍來訥（Lionel Lamb）向倫敦回報時表示，南方民眾認為「中央政府垮臺已是必然結果」。<sup>144</sup>一百萬共軍加上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降軍此時位於長江北岸，隨時準備渡江南下。

史達林曾經在幾個月前再次介入，他要求毛澤東不要渡江，等待蘇聯調停。史達林希望一個南北分裂的中國，就像朝鮮一樣。他可能擔心一個統一的共產中國很可能對蘇聯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也可能因為侵犯了與美國協議的勢力範圍而惹惱美國。中國歷史上不乏南北分裂的局面，而英美政府也在思考，如果蔣介石有能力鞏固南方，那麼兩個中國也並非不可接受。<sup>145</sup>雖然共軍經過數個月的艱苦作戰已經疲憊不堪，而南方民眾是否支持共產黨也猶屬未知，毛澤東最後還是拒絕史達林的建議，下令共軍渡江。到了十月，共軍已拿下南方主要港口城市廣州。蔣介石再次逃往重慶，然而與當年對日抗戰的經驗不同，人民解放軍最終攻占了這座前陪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蔣介石飛往臺灣。戰鬥一直持續到一九五〇年，因為還有少數地區的國軍仍拒絕投降，但一個

統一的新中國已經成為現實。九月，毛澤東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該組織原是蔣介石創立來回應馬歇爾建立美國式民主的要求）以勝利的姿態表示，美國帝國主義所援助的國民黨政府已經終結：「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sup>146</sup>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抵達北京的毛澤東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熱情群眾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年輕的醫生李志綏後來成為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他在回憶錄裡提到，那天他的「內心充滿了希望，一想到中國人所受的剝削和痛苦以及外國的侵略都將從此結束，我就感到非常高興」。<sup>147</sup>國共內戰已經接近尾聲，但建立共產社會的任務卻持續為那些無法通過共產黨「好階級」測試者帶來苦難，這些人將被歸類為「中產階級」或「壞階級」。諷刺的是，違逆美國意願最早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就是英國這個中國超過百年的帝國主義仇敵。此時的英國依然汲汲營營於尋求在中國貿易的機會。聯合國還要再等二十年才會承認中國的新現狀。一九七一年七月，阿爾巴尼亞提案，聯合國大會於是在同年十月十五日投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代表主張，國民政府對贏得二戰做出的貢獻已足夠做為中華民國擁有會員國資格的合法依據。然而這一理由遭到大會否決，中華民國代表也遭大會驅逐。十一月，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的席位。

## 新帝國取代舊帝國？

二戰創造出兩個超級強權，美國與蘇聯。兩國都捲入了帝國終結後

全球秩序的重建，成為這場冷戰的兩大競爭對手——在很大程度上，冷戰正是帝國終結的產物。一九四五年後不久，就有人開始思考美蘇這兩大超級強權是否可能接續已經終結的帝國秩序，成為新的「帝國」。往後數十年間，這兩個聯邦制國家就在冷戰的背景下主導著全球秩序，而「蘇維埃帝國」與「美利堅帝國」確實也成為描述這兩個霸權的常見詞彙。一九五五年，在萬隆舉辦的亞非國家會議上，許多國家擔心舊殖民主義的結束可能導致新帝國形式的出現。伊拉克代表阿卜杜赫

（Djalal Abdoh）警告出席的各國領袖，當心共產主義侵略者「用新的形式將殖民主義改頭換面」，最終顛覆我們得來不易的「人民主權與自由」。<sup>148</sup>另一方面，支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則認為，一九四五年後美國崛起成為全球強權，其實就是換了一張臉的帝國。蘇聯指控美國的所作所為證明它是一個宰制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而這種說法也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的核心論述，一路持續到一九九〇年蘇聯崩潰為止。美國的自由派人士批判帝國，他們也同樣以「帝國」一詞來形容美國長期介入越南的後殖民戰爭。一九九〇年後，隨著蘇聯垮臺，「帝國」一詞也愈來愈常用來形容美國的單極霸權。<sup>149</sup>

蘇聯與美國在戰後成為全球霸權，其基礎無疑源自於兩國在二戰時期建立的強大軍事力，以及兩國都擁有政治野心，想將自身影響力投射到全球各地。但與此同時，美國與蘇聯也都是反殖民國家，不僅在戰時如此，到了戰後也依然堅持反殖民立場。史達林譴責殖民主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德黑蘭會議上同意羅斯福的觀點，認為戰後所有殖民地都應該交由國際託管。冷戰開始之後，蘇聯領導人認為殖民地託管還不夠，還應該讓所有殖民地自決。從一九四〇年代末以降，「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兩極對抗就成為蘇聯戰略計畫與思維的核心支柱。<sup>150</sup>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陷入爭吵。蘇聯代表瓦列里安



（Valerian Zorin）抨擊殖民主義是「人類生活最可恥的現象」，他要求讓所有殖民地人民在一年內獲得獨立。英國代表指責蘇聯代表不斷重複「煩人的列寧主義口號」，強調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根本連民族自決的地位都沒有。儘管如此，蘇聯依然認真對待反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採取務實的策略，好在機會來臨時介入殖民地的解放鬥爭。<sup>151</sup>

美國的戰時領袖反對殖民主義，不只是基於羅斯福主張的自由派理想主義，也基於務實的想法。美國希望破除戰前帝國主義經濟產生的特殊貿易優惠，以此來建立自由開放的全球經濟。一九四三年，羅斯福派往中東的特使赫爾利將軍抱怨英國拿美國的援助「不是為了根據《大西洋憲章》與四大自由來建立一個美麗新世界，而是為了大英帝國的征服、帝國主義統治與貿易壟斷」。<sup>152</sup>一九四四年布列敦森林經濟高峰會之後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以及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都是美國為了打破一九四五年以前帝國體制在貿易和貨幣方面的封閉限制而推動的重要計畫。美國的經濟野心也與去殖民化緊密交織。美國在一九四二年成立了國務院屬地委員會，探討殖民屬地在戰後脫離殖民母國封閉統治的可能性。同年十一月，委員會提出了「國際託管制度」的概念，日後成為聯合國託管理事會遵行的制度。<sup>153</sup>羅斯福始終大力提倡終結傳統的殖民主義，認為所有屬地都應該接受託管，且在盟邦英國的反對下依舊盤算著如何在未來終結傳統的帝國制度。到了二戰結束時，華府已經為屬地構思了某種託管形式，一方面鼓勵屬地自決，另一方面也給予屬地國際經濟援助。

英法的強力反對，導致普世託管制度在聯合國組織會議上遭到揚棄，但羅斯福的繼任者杜魯門同樣對於恢復舊帝國毫無興趣。這點可以從英國想在中國與伊朗建立非正式帝國，而杜魯門政府對此表現出敵視

的態度看出。不過，美國對於歐洲盟邦恢復殖民地之事，態度就顯得比較模稜兩可。由於擔憂蘇聯的共產主義，美國領導人不再繼續堅持普世託管制度是走向獨立的捷徑。在加勒比地區，儘管一九四八年成立的「美洲國家組織」大力遊說，希望終結新世界的殖民主義，美國卻擔心若過度逼迫英國去殖民化，可能會威脅到自己的南側，因此美國只能支持英國防範共產主義者煽動獨立造成的「敵人滲透」。<sup>154</sup>在印度支那，羅斯福雖然極不願意讓當地再度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但在一九四五年後，由於擔心少了美國的支持越南將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美國於是只能接受法國的殖民地主張。至於比較不用擔心共產主義威脅的印尼，杜魯門總統就有了比較充分的操作空間。他於是鼓勵荷蘭提供當地人民自治的機會並且停止鎮壓暴動，否則就要對荷蘭進行制裁。

美國政策對於反殖民的重視，也反映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屬地去殖民化的過程，這些屬地在二戰期間遭受戰爭破壞與陷入貧困，使當地人民強烈反抗美國統治，同時也憎恨與美國合作的人。一九四六年，美國依照戰前（一九三四年）承諾允許菲律賓獨立，但菲律賓社會的內部衝突引發了內戰。菲律賓內戰最終於一九五四年結束，由民族主義勝出掌權。坎波斯（Pedro Albizu Campos）領導的波多黎各民族主義運動發起了暴力抗爭，包括開槍射擊美國眾議院與計畫行刺杜魯門總統。<sup>155</sup>一九五二年，波多黎各成為美國的「自治領」，此後由美國提供發展資金以滿足波多黎各民眾的各項激進要求。一九五四年，民主黨贏得夏威夷屬地選舉，夏威夷群島在一九五九年從保護國升格為美國聯邦的一個州。古巴是美國於一八九八年擊敗西班牙後取得的屬地，名義上是獨立國家，但實際上緊密依附於美國。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使卡斯楚（Fidel Castro）掌權，導致兩國超過五十年的時間無法建立正常關係。由於深信這是共產黨「敵人」對加勒比地區的「滲透」，艾森豪政府採

取了孤立或去除卡斯楚政權的政策。古巴就此與莫斯科當局建立了短暫但卻緊密合作的關係，此前兩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密切的連結。<sup>156</sup>

把蘇聯與美國稱為「帝國」，其中的意義顯然不像字面表示的那樣簡單。帝國這個詞彙的運用十分彈性，從古典時代到二十一世紀，各式各樣的歷史案例都可以使用帝國一詞來加以描述。然而，帝國的定義在一九四五年確實出現了改變，那就是「領土型帝國的終結」。領土型帝國原本是帝國諸多定義中較為明確的一種，這種帝國會直接征服領土並使原住民人口喪失主權地位，變成殖民地、保護國、託管領土、特殊居留地或共管領土。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的戰時帝國，就跟英法等舊帝國一樣具有領土型帝國的性質，部分舊帝國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確實建立了霸權，但其地位並非以這種領土型帝國為基礎。一九四五年後，領土型帝國的正當性被徹底終結，再也未能恢復。前帝國強權未能恢復過去的領土型帝國，只能轉而推行新殖民主義。結果就是前帝國殖民地在獨立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依然與前殖民母國維持著文化、經濟與國防上的利益關係。

認為蘇聯是帝國的說法，主要建立在蘇聯與中東歐地區的權力關係上，而這兩個地區都是蘇聯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從德意志帝國解放出來的國家。蘇聯軍隊與安全部隊長期鎮壓烏克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波羅的海國家的民族運動，這些國家的民眾並不想接受共產黨的統治。早在一九四四年蘇聯軍隊收復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領土時，蘇聯就已經開始鎮壓這些地方的民族主義反抗。等到蘇聯正式兼併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時，反抗與鎮壓也延燒到這些波羅的海國家。隨著蘇聯占領波蘭，波蘭救國軍的民族主義者也起而反抗共產黨統治。紅軍與內政人民委員部安全部隊的反應，顯示出與過去殖民國家在鎮壓殖民地暴動時相同的態度：他們不在乎自己進行的反游擊戰是否具有正當性。

叛軍開始採取野蠻的暴力行動，威脅當地民眾提供消極或積極的支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甚至宣稱，他們一點也不關心自己要解放的民眾死活。該組織的主戰派領袖表示：「不是威嚇，而是毀滅，我們不應該在乎民眾咒罵我們採取殘酷的做法。」<sup>157</sup>烏克蘭西部（原本屬於波蘭領土，後來被併入蘇聯）的解放戰爭讓雙方都付出慘重代價。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烏克蘭游擊隊的反抗導致兩萬六千名蘇聯警察、士兵、官員與平民死亡。與此同時，大約有十萬名叛亂分子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遭到殺害，這在烏克蘭西部地區是很高的傷亡比例。叛亂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最後一批游擊隊被追捕殲滅後才結束。而在立陶宛，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間有兩萬名立陶宛游擊隊被殺，到了最後一年只剩下一百八十八人仍繼續抵抗。<sup>158</sup>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在鎮壓叛亂時只有一項主要差異，那就是蘇聯採取了大規模流放叛亂分子及其家人到偏遠地區的策略。這種大規模流放不僅可以清除當地的民族主義反抗者，也能藉由「去除階級敵人」的名義對東歐進行社會重建（這些「階級敵人」包括富農、地主、教士、民族主義政治人物與可能的德國通敵者）。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間，立陶宛有十萬零八千三百六十二人被流放，烏克蘭西部則有二十萬零三千六百六十二名「土匪共犯」與富農被流放到蘇聯的「特殊居留地」。<sup>159</sup>拉脫維亞也有四萬三千名民族主義者、被俘的游擊隊員、富農及其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被大規模流放到西伯利亞，此外還有十五萬人因「政治犯罪」（當然是根據蘇聯占領者的定義）而遭受懲罰。<sup>160</sup>

除了流放階級敵人與「土匪」（蘇聯普遍用這個詞來稱呼那些爭取解放的游擊隊），蘇聯當局也在被征服地區採取了大規模族群重建計畫，試圖降低戰後因族群衝突產生抵抗分子的可能性（族群衝突也是一九一九年後東歐新國家屢次出現衝突的原因）。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



月，蘇聯已將一百萬名波蘭人從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遣送至新波蘭，五十一萬八千名白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則從波蘭遣送至蘇聯。烏克蘭從捷克斯洛伐克取得外喀爾巴阡地區之後，蘇聯與捷克訂定協議，將該區的三萬五千名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遣返回捷克斯洛伐克。<sup>161</sup>這些族群與社會重建計畫，目的是為了在蘇聯軍隊解放的東歐與東南歐地區實施人民民主制度。史達林最初的想法不是為了實施共產主義的統治，而是為了進行更廣泛的聯盟，讓東歐社會與經濟能朝向社會主義路線進行改革，自然而然地支持共產主義。一九四六年七月，史達林對捷克共產黨領袖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說：「二戰擊敗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之後.....摧毀了這些地方的統治階級.....群眾意識因而抬頭。」<sup>162</sup>然而，多重的社會主義路線實際上難以實現，也與史達林建立親蘇國家來屏障蘇聯，使蘇聯安全不受先前敵人威脅的想法相衝突。<sup>163</sup>共產黨逐漸主導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與匈牙利的新政權。一九四七年，冷戰形成，蘇聯高層愈來愈擔心西方干預的可能，而這種擔憂也體現在史達林對馬歇爾計畫的疑慮上，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曾急欲參加這項計畫。共產陣營拒絕加入這項計畫，認為該計畫是在「鞏固帝國主義，準備進行新一場帝國主義戰爭」。<sup>164</sup>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聯合政府的貝奈斯總統（President Beneš）遭到推翻，強硬派共黨政權成立。一九四九年，當德國蘇占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所有的東歐國家都已成為親蘇聯的衛星國，而且都由當地共產黨領導。

這是否表示蘇聯已經建立了一個帝國？有幾項論點可以清楚地反駁這種說法。首先，波羅的海國家是以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而非殖民地的身分被強制併入蘇聯。東歐國家過去在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屬於德國殖民計畫的一部分，此時卻恢復成為主權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都被當成主權國家的公民而非殖民地臣民，不過他們仍缺乏傳統的公民權利。根

據一九四六年二月史達林在演說中的說法，他的目標是「恢復民主自由」（當然共產黨對這些詞有自己的一套定義）。在東歐國家推行的「人民民主」有部分確實要由地方共產黨員推動，也就是承認地方民眾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sup>165</sup>在萬隆會議上，印度總理尼赫魯雖然討厭共產主義，卻為共產主義陣營辯護：「如果我們已經承認對方的主權，那麼這就不是殖民主義。」儘管共產東歐施行的政治制度並不是採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且經常侵犯人權，但這種政治制度依然不能與總督統治的臣民同日而語。此外，雖然共產主義經濟發展數字經常令人感到懷疑，但不可否認東歐的新國家確實經歷了一段產業與都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而且也引進了社會福利政策。

除此之外，蘇聯的野心也並非毫無限制。一九四五年，史達林拒絕協助希臘共產黨。一九四八年三月，狄托的南斯拉夫與史達林決裂，並於六月被逐出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共產國際的繼承者）。一九六一年，阿爾巴尼亞指控蘇聯偏離了反帝國主義路線，也被逐出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史達林尊重芬蘭的獨立地位，並且堅持義大利與法國的大型共產主義政黨應該進行合作以恢復傳統的西方民主制度。史達林對歐洲以外地區興趣缺缺，也不願捲入當地的去殖民化戰爭。史達林同意將蘇聯占領的滿洲歸還給蔣介石而非毛澤東。史達林在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五年後才給予承認，而且幾乎未曾給予胡志明任何援助，這點與毛澤東的中國不同。史達林在伊朗避免與英國對立。史達林在一九五〇年曾鼓動北韓測試美國的決心，但不願直接介入隨後的韓戰，反倒是共產中國加入了這場衝突。在南亞、中東與非洲，儘管西方一直擔心蘇聯介入，但實際上蘇聯幾乎未曾幫助過當地的民族主義與解放運動。蘇聯的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直到一九六〇年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開設分支機構，而當時的去殖民化與獨立風潮也已經走

到了尾聲。<sup>166</sup>

認為美國是帝國的說法也同樣問題重重。美國新建立的權力是透過政治壓力、經濟威脅、全球情報蒐集與派駐全球的軍力來展現，但美國並非領土型帝國。在被美軍占領的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美國設立的軍政府主要是協助恢復政府公務，提供資本進行重建計畫，讓過去的敵國建立民主議會制度，再使其重新獲得完整的主權地位。美國確實持續在這些國家派駐空軍與地面部隊，但美國同樣也有在英國設立基地與派駐軍隊，除非我們進行粗糙類比，否則也很難以此做為帝國主義的證據。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時常被描述成「基地帝國」。到了二十一世紀，美國至少在三十八個國家擁有七百二十五座基地，而且駐紮在全球各分區的軍隊都設有司令官。<sup>167</sup>美國派駐各地的軍力使美國可以將力量投射到全球各個角落，但美國的做法與英法身為殖民強權投射軍力又有不同。當羅斯福總統考慮是否應該接管英國在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屬地，以便防衛一九四〇年與英國訂定《驅逐艦換基地協議》後新取得的軍事設施時，他最後還是拒絕了這項違反美國反殖民主義精神的做法。與史達林一樣，美國領導人最關切的還是國家安全問題，特別是在面臨共產主義威脅時，而他們從未以任何具有歷史意義的帝國角度來進行思考。美國往往更致力於簽訂區域性的安全公約，其中規模最大也持續最久的就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正是在處理後殖民衝突上，美國碰到了最大的挑戰。一九四五年，當美蘇雙方同意以北緯三十八度線將朝鮮一分為二時，美軍頓時需要接手管理一個失去宗主的前殖民地。霍吉將軍（John Hodge）指揮的美國陸軍第二十四軍駐紮南韓，這對他們來說是件令人卻步的任務。二十四軍幾乎沒有任何軍官會說韓語，對於朝鮮半島也沒有清楚認識，對於這個國家近期的歷史更是一竅不通。朝鮮人不斷向美軍提出要求，最後終

於獲准組織政黨，但政黨數量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已經出現了五十四個，一九四七年更是達到三百個。<sup>168</sup>美國很快就在朝鮮設立軍政府，由阿奇博德少將（Archibald Arnold）擔任軍政府長官，然而早期組織非常仰賴前日本官員的協助。這些日本官員在被遣返回日本前，提供了三百五十份詳細的備忘錄給美國軍政府。朝鮮人要求民族自決與經濟改革，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各地便出現廣泛的罷工事件與農村抗議活動。一九四六年一月的一份民調顯示，將近半數受訪者喜歡日本統治更勝於美國。<sup>169</sup>在朝鮮半島北部，蘇聯軍隊指派金日成擔任地方共黨領袖。金日成是前抗日游擊隊員，曾在西伯利亞度過戰時歲月。美軍擔心共產黨滲透到朝鮮半島南部農村的人民委員會，因此未能積極回應這些前日本臣民的自治要求。

一九四五年九月，朝鮮半島南部的民族主義者宣布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但霍吉將軍認為這個政府組織太偏向共產主義，於是在三個月後下令禁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聯、英國、中國與美國在莫斯科會議上同意共同託管朝鮮，為期至少四年。朝鮮民族主義分子對於國家還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能獨立深感不滿，因此導致了僵局。在朝鮮半島北部，金日成等共產黨員在蘇聯指導下推動全面改革，特別是土地重分配，這項措施完全投合了朝鮮農民的想法。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金日成成立民主主義民族統一戰線，未來的共產國家開始成形。在朝鮮半島南部，美國軍政府禁止組織工會與進行罷工，並於一九四六年九月暴力鎮壓大邱市的暴動。美國與蘇聯進行協商，討論是否可能建立一個統一且獨立的朝鮮國家，結果協商破裂。九月，美國急欲擺脫昂貴而困難的占領工作，於是要求聯合國接替管理朝鮮半島的任務。聯合國朝鮮（韓國）問題臨時委員會提議舉行全國大選以產生新的立法機構，但蘇聯拒絕承認委員會的權威。選舉於是在朝鮮半島南部舉行，選舉產生的



國會只代表一部分朝鮮人口，但國會最終通過憲法，選舉資深民族主義者李承晚（他曾在一九一九年向美國總統威爾遜請願，希望推動朝鮮獨立）擔任大韓民國第一任總統。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大韓民國（今南韓）正式成立。朝鮮半島北部也舉辦「全國」大選，選舉產生了最高人民會議，會議成員包括來自朝鮮半島南部的共產黨員，並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今北韓）。朝鮮的分立剛好對應了一年後的兩德。兩國都宣稱自己代表了朝鮮全境，但只有大韓民國被聯合國認定是合法政府。<sup>170</sup>一九五〇年，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成立，但隨著韓戰爆發與後續長期影響，該委員會已無成功的可能。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才同時加入聯合國。<sup>171</sup>

一九四九年，美軍撤離大韓民國，結果僅一年後又再度重返。朝鮮半島的北部與南部都追求國家統一，但南方不接受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的北方也不想與李承晚的民族主義與反共政權統一。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人民軍進攻南方，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朝鮮。大韓民國有限的部隊被逼退到半島南端釜山港周圍的狹小地區。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蘇聯臨時缺席下，通過決議派遣軍隊協助大韓民國。入侵者被擊敗，退回到北方，此時李承晚希望利用共產黨抵抗力量減弱的機會統一整個朝鮮半島。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國介入韓戰，迫使聯合國軍隊再度南撤。到了一九五一年四月，前線已經趨於穩定，而且幾乎回到戰爭剛開始的地方，雙方終於開始進行協商以結束這場衝突。一九五三年七月，雙方終於簽訂停戰協議。光是在雙方商議的這段期間之內，美國戰略空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投下的炸彈數量就已經超過二戰時期對德國投下炸彈量的總和。朝鮮半島北部主要城市大約有七成五到九成遭到摧毀。韓戰的損失遠遠超出其他殖民戰爭與後殖民戰爭：估計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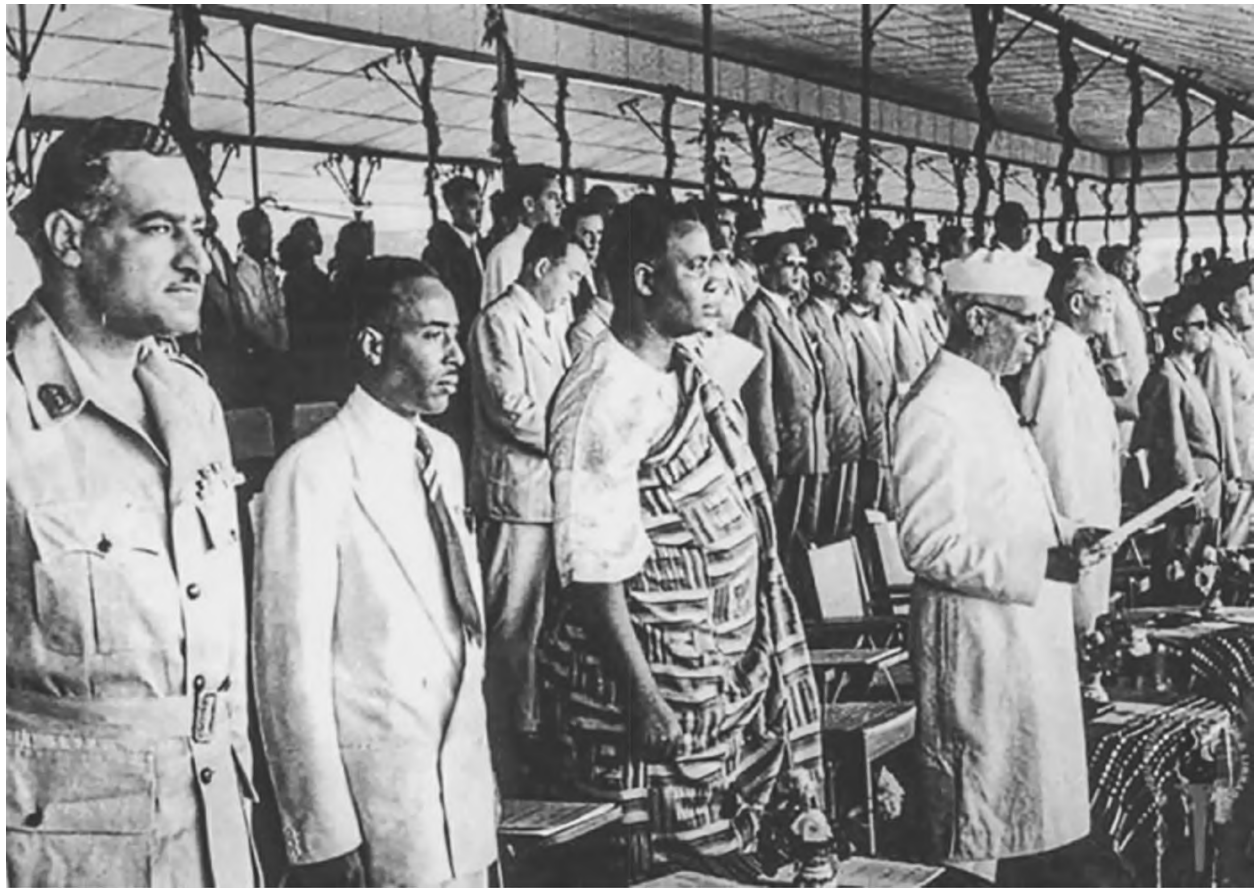
十五萬名士兵死亡，平民的死亡人數則介於八十萬人到兩百萬人之間。<sup>172</sup>

從韓戰的案例可以看出，冷戰對峙往往深受去殖民化危機的影響，日後的越戰也是如此。然而，韓戰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場戰爭的本質：與其說這是蘇維埃「帝國」與美利堅「帝國」的衝突，不如說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對峙。這麼說不只是語義上的差異而已。歷經三十年殖民統治的朝鮮半島，最終分裂成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後雖然打了一場持續四年的韓戰，但南北韓終究維持了各自獨立的地位。蘇聯與美國這兩個霸權確實左右了韓戰的結果與後續發展，新成立的共產中國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無論如何，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的終結並未使朝鮮再次淪為被殖民的對象。

### ※ ※ ※

從一九三〇年代一直持續到戰後的暴力年代，這場漫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終結了領土型帝國，也讓歷史久遠的「帝國」一詞從此不再受到人們憧憬。一九六一年，牛津大學非洲學專家佩勒姆（Margery Perham）在英國廣播公司主辦的里斯講座中提到，在所有戰後遭到指責的「舊權威」中，「被罵得最慘的就是帝國主義」。佩勒姆相信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轉變。她表示：「從人類有歷史紀錄以來的這六千年間，帝國主義，也就是某個國家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凌駕於另一個國家之上……被視為理所當然，人們認為這就是既有秩序的一部分。」然而，歷經二戰之後的人們則普遍相信，唯一的權威必須「源自於他們自身的意志，或至少要看起來像是源自於他們自身的意志」。<sup>173</sup>就在各國競相爭取民族國家地位的狀況下，聯合國成員國的總數於二〇一九年來

了一百九十三個。新的民族國家，無論是以國際組織的席次來展現，還是以區域公約的簽署國來表示，顯然還是無法終止衝突，但當前時代畢竟已不同於上一場帝國大戰爆發之前的時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遠遠超過美國獨立戰爭、拿破崙戰爭或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全球的地緣政治秩序。如同伍爾夫在一九二八年推測的，領土型帝國的最後階段並未「安詳地入土」，而是跟著盈滿過量的「鮮血與廢墟」一起被埋葬。



一九五五年四月，印尼總理尼赫魯在印尼舉辦的亞非萬隆會議上向代表們致詞。萬隆會議是首次以亞非國家為主體的大型國際會議，與會國家要不是剛從歐洲與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獨立，就是即將擺脫殖民母國獲得自由。在尼赫魯身旁的分別是迦納（黃金海岸）代表克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坦加尼喀代表尼耶雷雷（Julius Nyerere）與獨立埃及的領導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圖源：UtCon Collection/Alamy

# 插圖說明

卷首：圖中描繪的是一九一一年義土戰爭期間，義大利陸軍抵達鄂圖曼帝國昔蘭尼加省班加西港。最終，義大利控制了昔蘭尼加省與的黎波里塔尼亞省，義大利征服者將這兩省重新命名為「利比亞」。義大利是十一個歐洲帝國的一員。圖源：*D and S Photography Archives/Alamy*

前言：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在帝國總理府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會場宣讀聲明。該條約確認了三國在歐洲、非洲與亞洲的帝國野心，三國想藉此建立全新的地緣政治秩序。圖源：*INTERFOTO/Alamy*

序章：一九二五年里夫戰爭期間，法軍以火炮轟擊摩洛哥的柏柏人叛軍。這場二十世紀規模數一數二的殖民地戰爭，當地部落民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持續反抗西班牙與法國軍隊，以維持自身獨立。圖源：*Photo 12 Collection/Alamy*

第一章：淞滬會戰中，日軍士兵躲在沙包後面，上方剛好是可口可樂的廣告招牌。上海是中國最繁華的對外港口，因此成為日軍進攻的首要目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與中國國民革命軍激戰之後，日軍成功攻占上海。圖源：*CPA Media Pte Ltd/Alamy*

第二章：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巴巴羅薩作戰開始，一群疲倦的德軍士兵在蘇聯烏克蘭某處的道路兩旁休息。絕大多數德軍是靠步行或騎自行車穿越蘇聯的鄉野地區。圖源：*World of Triss/Alamy*



第三章：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橫越法國的莫爾坦戰役後，盟軍西線最高司令艾森豪將軍走過一輛翻覆的德國六號「虎式」戰車。圖源：*Pictorial Press Ltd/Alamy*

第四章：一九四一年，列寧格勒的年輕蘇聯女性排成一行前去參加民兵部隊，準備對抗入侵的德國法西斯敵人。圖源：*SPUTNIK/Alamy*

第五章：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盟軍發起入侵西西里島的哈士奇作戰，英國士兵努力涉水上岸。在兩棲作戰中，從運輸艦下船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士兵必須爬下繩網（可以看到登陸艦旁邊掛著繩網），然後攜帶重裝備上岸。圖源：*Shawshots/Alamy*

第六章：一名女性工人檢查美國波音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尾翼，美國在戰爭的最後兩年大量生產這類型的轟炸機，對日本進行遠距離轟炸。到了一九四四年，女性占了美國飛機製造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圖源：*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第七章：一名德國士兵站在波蘭軍官與波蘭知識分子已經腐爛的屍骸之中，這些人是在一九四〇年四五月期間在卡廷森林附近遭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祕密警察屠殺。一九四三年四月，德國占領軍發現了這處亂葬崗並且挖掘出屍體。直到一九九〇年為止，蘇聯政權一直堅稱這是德軍的暴行。圖源：*World History Archive/Alamy*

第八章：一九四四年的波蘭救國軍佐斯卡營（The Battalion Zoska），該營與其他部隊共同參與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到十月的華沙起義，但最終遭德軍與安全部隊殘酷鎮壓。圖源：*UtCon Collection/Alamy*

第九章：一九四三年七月庫斯克會戰的兩名蘇聯年輕士兵，其中一人手持十字架等待戰鬥。每個地方的士兵都仰賴小紀念物或護身符來驅散對戰鬥的恐懼。圖源：*Albatross/Alamy*

第十章：猶太兒童被運往波蘭的海烏姆諾滅絕營，最後被關在毒氣貨車裡遭一氧化碳毒死。大屠殺的組織者想殺光猶太兒童，使猶太人無法繁衍後代構成德意志帝國的威脅。圖源：*Prisma/Schultz Reinhard/Alamy*

終章：一九五五年四月，印尼總理尼赫魯在印尼舉辦的亞非萬隆會議上向代表們致詞，萬隆會議是首次以亞非國家為主體的大型國際會議，與會國家要不是剛從歐洲與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獨立，就是即將擺脫殖民母國獲得自由。在尼赫魯身旁的分別是迦納（黃金海岸）代表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坦加尼喀代表尼耶雷雷（Julius Nyerere）與獨立埃及的領導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圖源：*UtCon Collection/Alamy*

卷末：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聯合國大會在紐約召開，一百三十二國代表起立為大會開幕進行一分鐘的默禱。圖源：*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聯合國大會在紐約召開，一百三十二國代表起立為大會開幕進行一分鐘的默禱。圖源：*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 注釋

AHB	Air Historical Branch, Northolt, Middlesex
BAB	Bundesarchiv-Berlin
BA-MA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CCAC	Churchill College Archive Centre, Cambridge
IWM	Imperial War Museum, Lambeth, London
LC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NARA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D
TNA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TsAMO	Central Archive of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ce, Podolsk
UEA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SMC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USSBS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 前言

- 1 Frederick Haberman (ed.), *Nobel Lectures: Peace, 1926-1950* (Amsterdam, 1972), 3 18.
- 2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



olution in Poland (London, 1992). 也可見Richard Overy, “‘Ordinary me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istorian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0 (2014), 515-30.

- 3 見近期的 Gordon Corri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 2010),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3), Max Hastings, *All Hell Let Loose: The World at War 1939-1945* (London, 2011) and Andrew Roberts, *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9). 比較不那麼聚焦於軍事的優秀作品有Gerhard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Evan Mawdsley, *World War Two: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2012)與Gordon Wright的經典研究, *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 (New York, 1968); 更近期的作品有Andrew Buchanan, *World War II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Short History* (Hoboken, NJ, 2019) and Victor Hanson, *The Second World Wars: How the First Great Global Conflict was Fought and Won* (New York, 2019). 關於軍事結果的辯論, 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看法是Phillips O'Brien, *How the War was Won* (Cambridge, 2015).
- 4 Reto Hofmann and Daniel Hedinger, ‘Axis Empires: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fascist imperialism’,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2017), 161-5. 也可見Daniel Hedinger, ‘The imperial nexus: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Axis in global perspective’, *ibid.*, 185-205.
- 5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對帝國的影響, 見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The Great War as a global war’, *Diplomatic History*, 38 (2014), 786-800;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after 1919: old, new, transform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95 (2019), 81-100.
- 6 關於「軍事」史的局限, 見Stig Förster激勵人心的演說, ‘The Battlefield: Towards a Modern History of Wa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2007 Annual Lecture, and Jeremy Black, *Rethinking World War Two: The Conflict and its Legacy* (London, 2015).

## 序章 鮮血與廢墟：帝國戰爭的年代

- 1 Leonard Woolf,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28), 17.
- 2 *Ibid.*, 9-12.
- 3 Birthe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 (Cologne, 2003), 28. 也可見Helmut Bley, ‘Der Traum vom Reich? Rechtsradikalismus

- us als Antwort auf gescheiterte Illusion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900-1938', in Birthe Kundrus (ed.), *Phantasiereiche: zur Kultu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olon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2003), 56-67.
- 4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 2002), 57.
  - 5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1998), 12-13, 22-3; Frederick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in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911-1923* (Oxford, 2014), 198-200.
  - 6 「民族帝國」的觀念受到廣泛討論。特別見Gary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4 (2000), 198-202 and Heather Jones, 'The German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56-7.
  - 7 Birthe Kundrus, 'Die Kolonien - "Kinder des Gefühls und der Phantasie"', in *idem* (ed.), *Phantasiereiche*, 7-18.
  - 8 Paul Crook,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94), 88-9. 也可見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Cambridge, 1997), 203-15.
  - 9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London, 1914), 18.
  - 10 Benjamin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how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incubated ideas and methods adop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Nazis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 (2005), 432-4; Guntram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Nationalism and Propaganda 1918-1945* (London, 1997), 50-51.
  - 11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2014), 8; Troy Paddock, 'Creating an oriental "Feindbild"',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9 (2006), 230.
  - 12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440.
  - 13 關於帝國的概念觀點，有用的討論見Pascal Grosse, 'What does German colonialism have to do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Lincoln, Nebr., 2005), 118-29.
  - 14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Imperi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Manchester, 2005), 1;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205; Parsons, *Second British Empire*, 5, 83-4.

- 15 Giuseppe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 empire and the Italian state’s pursuit of legitimacy, 1871-1945”, in John 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Popular Responses to Imperialism in France, Britain,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and Italy* (Manchester, 2011), 214.
- 16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32-7; Bernhard Gissib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cultures and geographies of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48-1918’, in 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175-7.
- 17 Kristin Kopp, ‘Constructing racial difference in colonial Poland’, in Ames, Klotz and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77-80; Bley, ‘Der Traum von Reich?’, 57-8; Kristin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Volker Langbehn and Mohamma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ace, the Holocaust and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2011), 148-51; ‘deepest barbarism’ in Matthew Fitzpatrick, *Purging the Empire: Mass Expulsions in Germany, 1871-1914* (Oxford, 2015), 103.
- 18 Kopp, ‘Constructing racial difference’, 85-9; Gissib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162-3, 169-77.
- 19 Robert Nelson, ‘The Archive for Inner Colonization, the German East and World War I’, in *idem*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o the East* (New York, 2009), 65-75. 也可見Edward Dickinson, ‘The German Empire: an empi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6 (2008), 132-5.
- 20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89-90.
- 21 Daniel Immerwahr,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 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0 (2016), 377-81.
- 22 數字出自Parsons, *Second British Empire*, 32.
- 23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 214; 也可見Lorenzo Veracini, ‘Italian colonialism through a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lens’, *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19 (2018), 2 提到義大利人對比了他們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與「貴族」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
- 24 Labanca, *Oltremare*, 104-17.
- 25 Richard Bosworth and Giuseppe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35;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 210-11; Labanca, *Oltremare*, 123-4.
- 26 近年來，分析一九一四年的最佳作品是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13).

- 27 相關討論見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The Great War as a global war', *Diplomatic History*, 38 (2014), 786-800.
- 28 William Mulligan, *The Great War for Peace* (New Haven, Conn., 2014), 91-2, 104-6; Bosworth and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40-43; Labanca, *Oltremare*, 117-27.
- 29 詳見Jones 'German Empire', 63-4.
- 30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199-201;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 24-6.
- 31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315-18;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 2006), 47-51.
- 32 Jones, 'German Empire', 62; 德國在敵對帝國內部策動叛亂的計畫，詳見Jennifer Jenkins, 'Fritz Fischer's "Programme for R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a global history of German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399-403; David Olusoga, *The World's War* (London, 2014), 204-7, 224-8.
- 33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57-60.
- 34 Vejas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63-72.
- 35 出自Jones, 'The German Empire', 59, 轉引自Andrew Donson, 'Models for young nationalists and militarists: German youth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 Studies Review*, 27 (2004), 588.
- 36 Paddock, 'Creating an oriental "Feindbild"', 230; Vejas Liulevicius, 'The language of occupation: 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 in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122-30.
- 37 引自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313. 關於非洲，見Jones, 'The German Empire', 69-70.
- 38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Empires at War*, 8-9; Philip Murphy, 'Britain as a global power', in Andrew Thompson (ed.), *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2012), 39-40.
- 39 Richard Fogarty, 'The French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09, 120-21. Berny Sèbe, 'Exalting imperial grandeur: the French Empire and its metropolitan public', in 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34提出更多的數字，徵召的士兵有六十萬七千人。
- 40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



- 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2007), 23-4, 43-4; Trygve Throntveit, 'The failur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35 (2011), 446-9, 454-5.
- 41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37; Marcia Klotz, 'The Weimar Republic: a postcolonial state in a still colonial world', in Ames, Klotz and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139-40.
- 42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Kansas, 2009), 142-5. 關於歐洲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見Robert Gerwarth and John Horne, 'Bolshevism as fantasy: fear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violence, 1917-1923', in *idem* (eds.), *War in Peace: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 (Oxford, 2012), 40-51.
- 43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59-65, 89-90.
- 44 引自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149.
- 45 *Ibid.*, 60-61.
- 46 詳見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 (Oxford, 2015), 1-4, 29-32.
- 47 *Ibid.*, 2-3, 77-83.
- 48 *Ibid.*, 24-6.
- 49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204-5;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4.
- 50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94-8, 103.
- 51 Henri Cartier, *Comment la France 'civilise' ses colonies* (Paris, 1932), 5-6, 24.
- 52 Sèbe, 'Exalting imperial grandeur', 36-8;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199-202.
- 53 Brad Beaven, *Visions of Empire: Patriotism,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ity, 1870-1939* (Manchester, 2012), 150-51, 164; Matthew Stanard, 'Interwar pro-Empire propaganda and European colonial culture: toward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4 (2009), 35.
- 54 William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 (Chapel Hill, NC, 1982), 31-2;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203-4;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 2007), 396-8; Hosoya Chihir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9-1937', in Ian Nish (ed.), *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

*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2), 4-6.

- 55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6.
- 56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5-16; Jonathan Clements, *Prince Saionji: Japan. The Peace Conferences of 1919-23 and their Aftermath* (London, 2008), 131-6.
- 57 Fletcher, *Search for a New Order*, 29-33, 4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5-7; Paine, *Wars for Asia*, 21-2;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35-8.
- 58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114-15.
- 59 Bosworth and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41.
- 60 Spencer Di Scala, *Vittorio Orlando: Italy: The Peace Conferences of 1919-23 and their Aftermath* (London, 2010), 140-41, 170-71.
- 61 Claudia Baldoli, *Bissolati immaginario: Le origini del fascismo cremonese* (Cremona, 2002), 50-53; Mulligan, *The Great War for Peace*, 269, 275-7, 281.
- 62 Di Scala, *Vittorio Orlando*, 156-7, 173.
- 63 見John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The Armed Forces and Fascist Foreign Policy, 1922-1940* (Cambridge, 2007), 62-8.
- 64 Greg Eghigian, 'Injury, fate, resentment, and sacrifice in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1914-1939', in G. Eghigian and M. Berg (eds.), *Sacrifi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College Station, Tex., 2002), 91-4.
- 65 Dirk van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05), 107; 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2011), 154-5.
- 66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1945* (New Haven, Conn., 1964), 18-19.
- 67 Christian Rogowski, "'Heraus mit unseren Kolonien!' Der Kolonialrevisionism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Hamburger Kolonialwoche' von 1926", in Kundrus (ed.), *Phantasiereiche*, 247-9.
- 68 Uta Poiger,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History and Memory*, 17 (2005), 122-3;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09-10;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2-3, 44-5; Andrew Crozier, 'Imperial decline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in Anglo-German relations 1919-193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1 (1981), 209-10, 214-1

7.

- 69 David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Weimar Germany, 1918-1933* (Kent, Ohio, 1997), 16-17; Woodruff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218-20.
- 70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26-30; Smith, *Ideological Origins*, 218-24;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16-19.
- 71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77.
- 72 Ibid., 52-7, 108-10.
- 73 Vejas Liulevicius, *The German Myth of the East: 1800 to the Present* (Oxford, 2009), 156.
- 74 Pedersen, *The Guardians*, 199-202; 關於去殖民化，見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20. 這個詞的創設者是經濟學家伯恩（Moritz Julius Bonn）。
- 75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40-41; Hosoya Chihir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5-6, 7-10.
- 76 Knox, *Common Destiny*, 121-2, 126-8.
- 77 Labanca, *Oltremare*, 138-9, 149-52, 173-5; A.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Fascism and its imperial and racist phas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 (2004), 128-32;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123-6.
- 78 近期對這場危機的最佳說明提出了這個觀點，見Robert Boyce, *The Great Interwar Crisi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ization* (Basingstoke, 2012), esp. 425-8.
- 79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27-8.
- 80 Boyce, *Great Interwar Crisis*, 299.
- 81 Jim Tomlinson, 'The Empire/Commonwealth in British economic thinking and policy', in Thompson (ed.), *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219-20;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93-8.
- 82 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55* (Oxford, 1999), 33-7.
- 83 Paine, *Wars for Asia*, 22-3; Fletcher, *Search for a New Order*, 40-42.
- 84 關於德國的例證，見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 in *idem* (ed.),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s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9-13.
- 85 Joyce Lebra,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Oxford, 1975), 74-5.

- 86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Seven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SU, 26 January 1934’, in Joseph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1947), 460.

## 第一章 民族帝國與全球危機（1931-1940年）

- 1 引自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1998), 57-8.
- 2 Ibid., 39-41;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3-15;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Kans., 2009), 167-9.
- 3 A.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fascism and its imperial and racist phas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 (2004), 137.
- 4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146-7.
- 5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 28.
- 6 見Michael Geyer, “‘There is a land where everything is pure: its name is land of death’: some observations on catastrophic nationalism”, in Greg Eghigian and Matthew Berg (eds.), *Sacrifi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College Station, Tex., 2002), 120-41.
- 7 Steven Morewood, *The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935-1940: Conflict and Crisi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2005), 25-6.
- 8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4,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by Malcolm Christie (former British air attaché, Berlin): ‘Wir wollen ein Reich’ [Christie’s emphasis].
- 9 Aurel Kolnai,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London, 1938), 609.
- 10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6;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 44-6.
- 11 Gerhard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New York, 2003), 174.
- 12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101-6, 116-32.
- 13 Rainer Zitelmann, *Hitler: The Politic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206-7; 關於反西方主義，見Heinrich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A History of the West, 1914-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909-12.
- 14 Patrick Bernhard, ‘Borrowing from Mussolini: Nazi Germany’s colonial aspirations i



- n the shadow of Italian expansionism',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1 (2013), 617-18; Ray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 (New Haven, Conn., 1999), 52.
- 15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 2002), 328-9;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3-4. 到了一九三五年，義大利帝國的海外領土提供的貨物只占義大利本土進口的百分之四點八。關於阿爾巴尼亞，見Bernd Fischer, *Albania at War, 1939-1945* (London, 1999), 5-6.
  - 16 Ramon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apa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1932-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Princeton, NJ, 1996), 148; Paine, *Wars for Asia*, 13-15, 2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7-8.
  - 17 Karsten Linne, *Deutschland jenseits des Äquators? Die NS-Kolonialplanungen für Afrika* (Berlin, 2008), 39.
  - 18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5, 'Note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3 Feb. 1937, p. 51.
  - 19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16-18, 162. 關於德國經濟思想的變遷，見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 in Kahrs et al.,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s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9-10, 12-14; E. Teichert, *Autarkie und Grossraum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30-1939* (Munich, 1984), 261-8. 關於希特勒的經濟思想，見Rainer Zitelmann, *Hitler: Selbstverständnis eines Revolutionärs* (Hamburg, 1989), 195-215.
  - 20 關於這點，見Patricia Clavin,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1-1936* (London, 1996), chs. 6-7.
  - 21 Otto Tolischus, *Tokyo Record* (London, 1943), 32.
  - 22 George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1936), 401.
  - 23 Malcolm Muggeridge (ed.),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London, 1948), 301-2.
  - 24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82-6.
  - 25 Wilhelm Treue, 'Denkschrift Hitlers über die Aufgaben eines Vierjahresplan',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4), 204-6.
  - 26 Kathleen Burke, 'The linea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New World Order", 1919-1939',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6 (1992), 377-91.
  - 27 G. Bruce Strang, 'Imperial dreams: the Mussolini-Laval Accords of January 1935',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 (2001), 807-9.

- 28 Richard Overl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a mutilated victory?', *Diplomacy & Statecraft*, 10 (1999), 208-11.
- 29 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 (Oxford, 2015), 289-90, 291-2.
- 30 Paine, *Wars for Asia*, 25.
- 31 Benito Mussolini, 'Politica di vita' [*Il popolo d'Italia*, 11 Oct. 1935] in *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 vol. XXVII (Florence, 1959), 163-4.
- 32 Chad Bryant,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2007), 41-4.
- 33 Kristin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Volker Langbehn and Mohamma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ace, the Holocaust and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2011), 150-51; David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the Nazi occupation of Pol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6 (2004), 541-51.
- 34 James Crowley, 'Japanese arm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30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2), 309-26.
- 35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83-6;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40-43.
- 36 詳見Paine, *Wars for Asia*, 34-40; Takafusa Nakamura, 'The yen bloc, 1931-1941', in Duus, Myers and Peattie (eds.),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789.
- 37 Paine, *Wars for Asia*, 15.
- 38 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45* (Oxford, 1999), 49-51; Paine, *Wars for Asia*, 24-30;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160.
- 39 Yoshiro Miwa, *Japan's Economic Planning and Mobilization in Wartime, 1930s-1940s* (Cambridge, 2015), 62-4;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47-51; Akira Hari,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283-7.
- 40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58-64.
- 41 Ibid., 66-70; Paine, *Wars for Asia*, 128-9.
- 42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2013), 73-4.
- 43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68-76;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

- 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2012), 256-7.
- 44 Paine, *Wars for Asia*, 128-9.
  - 45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2003), 194-5.
  - 46 Paine, *Wars for Asia*, 181-2.
  - 47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28-35; 關於南京大屠殺，見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7), chs. 3-4.
  - 48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221-6.
  - 49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60-62;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58-61.
  - 50 Paine, *Wars for Asia*, 134-5, 140-42;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2011), 34-5.
  - 51 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Copenhagen, 2007), 415-17.
  - 52 Paine, *Wars for Asia*, 165-7.
  - 53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69.
  - 54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32-45; Labanca, *Oltremare*, 184-8.
  - 55 Alberto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Fascism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London, 1985), 13-14;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25-7.
  - 56 Claudia Baldoli, 'The "northern dominator" and the Mare Nostrum: Fascist Italy's "cultural war" in Malta', *Modern Italy*, 13 (2008), 7-12; Deborah Paci, *Corsica fatal, Malta baluardo di romanità: irredentismo fascista nel mare nostrum (1922-1942)* (Milan, 2015), 16-19, 159-67.
  - 57 Matteo Dominion, *Lo sfascio dell'impero: gli italiani in Etiopia 1936-1941* (Rome, 2008), 9-10;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15-18.
  - 58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135-6, 139;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16-18.
  - 59 Angelo Del Boca, *I gas di Mussolini* (Rome, 1996), 76-7, 139-41, 148. 一百零三次攻擊中，使用了兩百八十一枚芥子氣炸彈與三百二十五枚光氣炸彈。
  - 60 關於這場戰爭，見Labanca, *Oltremare*, 189-92;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Turin, 2005), 48-74;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25-8.

- 61 死亡人數出自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33.
- 62 Labanca, *Oltremare*, 200-202;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36-7.
- 63 Giulia Barrera,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and state-settler relations in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8 (2003), 429-30; Fabrizio De Donno, "'La Razza Ario-Mediterranea': Ideas of race and citizenship in colonial and Fascist Italy, 1885-1941',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8 (2006), 404-5.
- 64 John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The Armed Forces and Fascist Foreign Policy, 1922-1940* (Cambridge, 2007), 253.
- 65 Vera Zamagni, 'Italy: How to win the war and lose the pea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98;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39. 衣索比亞戰爭軍費有不同的估計數字，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列入戰爭費用與戰後平定地方費用的支出也隨之不同，這裡的金額差異介於五百七十億里拉到七百五十三億里拉之間。
- 66 Haile Larebo, *The Building of an Empire: Italian Lan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Ethiopia* (Trenton, NJ, 2006), 59-60.
- 67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98-100;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3; Haile Larebo, 'Empire building and its limitations. Ethiopia (1935-1941)', in Ruth Ben-Ghiat and Mia Fuller (eds.), *Italian Colonialism* (Basingstoke, 2005), 88-90.
- 68 Barrera,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432-4. 6
- 69 Alexander Nützenadel, *Landwirtschaft, Staat und Autarkie: Agrarpolitik im faschistischen Italien (1922-1943)* (Tübingen, 1997), 144, 317, 394.
- 70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17-21.
- 71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28-9;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46-7.
- 72 De Donno, 'La Razza Ario-Mediterranea', 409.
- 73 Fischer, *Albania at War*, 5-7;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51-2.
- 74 Nicholas Doumanis, *Myth and Memor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membering Fascism's Empire* (London, 1997), 41-4.
- 75 Fischer, *Albania at War*, 17-20.
- 76 Ibid., 20, 35, 37-40, 90-91;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53-5;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59-60.
- 77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0), 72.
- 78 Christian Leitz, 'Arms as levers: matériel and raw materials in Germany's trade with



- Romania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 (1997), 317, 322-3.
- 79 Pierpaolo Barbieri, *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Cambridge, Mass., 2015), 180-82, 260.
- 80 Treue, 'Denkschrift Hitlers', 204-5, 206.
- 81 BAB, R261/18, 'Ergebnisse der Vierjahresplan-Arbeit, Stand Frühjahr 1942', 對一九三六年之後的計畫活動做了摘要介紹。
- 82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20-21.
- 83 Manfred Weissbecker, "'Wenn hier Deutsche wohnten': Beharrung und Veränderung im Russlandbild Hitlers und der NSDAP', in Hans-Erich Volkmann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4), 9.
- 84 Milan Hauner, '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15-32.
- 85 'Colloquio del ministro degli esteri, Ciano, con il cancelliere del Reich, Hitler', 24 October 1936, in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 8 serie, vol v, 1 settembre-31 dicembre 1936* (Rome, 1994), 317.
- 86 Bernhard, 'Borrowing from Mussolini', 623-5.
- 87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1945* (New Haven, Conn., 1964), 21-2, 30-32; Willeke Sandler, *Empire in the Heimat: Colonialism and Public Culture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18), 3, 177-83.
- 88 Robert Gordon and Dennis Mahoney, 'Marching in step: German youth and colonial cinema', in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 (Lincoln, Nebr., 2005), 115-34.
- 89 Linne, *Deutschland jenseits des Äquators?*, 39.
- 90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3 Feb. 1937, p. 53-4.
- 91 Colonel Hossbach,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in the Reich Chancellery, November 5 1937',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 D, vol. I, (London, 1954), 29-39.
- 92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41-8.
- 93 Bryant, *Prague in Black*, 29-45; Alice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ohemia and Moravia',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 (Berlin, 1997), 84-8. 也可見 Winkler, *Age of Catastrophe*, 658-60.

- 94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50-58.
- 95 詳細內容見Ralf Banken, *Edelmetallmangel und Grossraubwirtschaft: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Edelmetallsektors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Berlin, 2009), 287-91, 399-401.
- 96 Overy, *War and Economy*, 147-51.
- 97 Ibid., 319-21;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89-92.
- 98 Bryant, *Prague in Black*, 121-8.
- 99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103-4.
- 100 Roman Ilnytskyi, *Deutschland und die Ukraine 1934-1945*, 2 vols. (Munich, 1958), i., 21-2.
- 101 抱持這個觀點最力的是Gerhard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 Ill., 1980), and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6), 332-5, 662-5. 不同的觀點見Overy, *War and Economy*, 221-6.
- 102 Overy, *War and Economy*, 238-9.
- 103 IWM, Mi 14/328 (d), OKW minutes of meeting of War Economy Inspectors, 21 Aug. 1939; OKW, Wehrmachtteile Besprechung, 3 Sept. 1939.
- 104 Richard Overy, *1939: Countdown to War* (London, 2009), 31-40.
- 105 Hildegard von Kotze (ed.),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5: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Stuttgart, 1974), 60, entry for 29 August; IWM, FO 645, Box 156, testimony of Hermann Göring taken at Nuremberg, 8 Sept. 1945, pp. 2, 5.
- 106 引自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1976), 571.
- 107 Vejas Liulevicius, 'The language of occupation: 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 in Robert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East* (New York, 2009), 130-31.
- 108 Alexander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 (Lawrence, Kans, 2003), 6-7.
- 109 Ibid., 7, 24-5, 27.
- 110 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9 (1971), 303.
- 111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Band 7: Juli 1939-März 1940* (Munich, 1998), 87, entry for 1 Sept. 1939; Christian Hartmann, *Halder: Generalstabschef Hitlers 1938-1942* (Paderborn, 1991), 139.

- 112 關於軍事平衡，見Klaus Maier, Horst Rohde, Bernd Stegmann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 1979), 102-3, 111.
- 113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84-5.
- 114 Ibid., 84;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133. 蘇聯數字見Alexander Hill, 'Voroshilov's "lightning" war - the Soviet invasion of Poland, September 1939',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 (2014), 409.
- 115 關於空軍，見Caius Bekker, *The Luftwaffe War Diaries* (London, 1972), 27-78, 466.
- 116 Jürgen Zimmerer, 'The birth of the *Ostland* out of the spirit of colonialis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 the Nazi policy of conquest and extermination', *Patterns of Prejudice*, 39 (2005), 197-8.
- 117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552, 570. 關於殖民典範，見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2011), 237-9.
- 118 M. Riedel, *Eisen und Kohle für das Dritte Reich* (Göttingen, 1973), 275-6, 301-2;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100.
- 119 Catherine Epstein, *Model Nazi: Arthur Greiser and the Occupation of Western Poland* (Oxford, 2010), 135-7, 140.
- 120 Lora Wildenthal, *German Women for Empire, 1884-1945* (Durham, NC, 2001), 197-8.
- 121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0-13; Edward Westermann, *Hitler's Police Battalions: Enforcing Racial War in the East* (Lawrence, Kans, 2005), 124-8.
- 122 Jürgen Matthäus, Jochen Böhrer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War, Pacification, and Mass Murder 1939: The Einsatzgruppen in Poland* (Lanham, Md, 2014), 2-7.
- 123 Ibid., 20.
- 124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London, 2010), 126-8.
- 125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562-3; Robert van Pelt, 'Bearers of culture, harbingers of destruction: the *mythos* of the Germans in the East', in Richard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Ill., 2002), 100-102, 127-9;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Langbehn and Salama (eds.), *Ger*

*man Colonialism*, 146-8, 155-7.

- 126 Christian Ingrao, *The Promise of the East: Nazi Hopes and Genocide 1939-43* (Cambridge, 2019), 5.
- 127 Isabel Heinemann, “‘Another type of perpetrator’: the SS racial experts and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regio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391-2; Michael Burleigh,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159-60, 162-3; Baranowski, *Nazi Empire*, 243-52.
- 128 近期關於諾門罕戰役的描述，見Alistair Horne, *Hubris: The Tragedy of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5), 133-56.
- 129 Keith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Cambridge, 2005), 328-9.
- 130 *Ibid.*, 257-61.
- 131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rchive, National Peace Council papers, 2/5, 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13 Mar., 17 Apr. 1939.
- 132 Josef Konvitz, ‘Représentations urbaines et bombardements stratégiques, 1914-1945’, *Annales*, 44 (1989), 823-47.
- 133 Daniel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spect of war in 1938-39: “pacifism” or “war anxiety”?’’, *French History*, 21 (2007), 439, 441.
- 134 Gerald Lee, “‘I see dead people’: air-raid phobia and Britain’s behaviour in the Munich Crisis’, *Security Studies*, 13 (2003), 263.
- 135 Lawrence Pratt,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1975), 3.
- 136 *Ibid.*, 239-40.
- 137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442-4; Donald Watt, ‘British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war’, in Comité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Les relations franco-britanniques de 1935 à 1939* (Paris, 1975), 257-8; Charles-Robert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in JeanPierre Azéma and François Bédarida (eds.),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Paris, 1992), 122.
- 138 Donald Low, *Eclipse of Empire* (Cambridge, 1991), 11, 29.
- 139 Matthew Hughes, *Britain’s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e: The British Army, the Colonial State and the Arab Revolt, 1936-1939* (Cambridge, 2019), 377-84.
- 140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Empire’, July 1935, 4-5.



- 141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Imperi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Manchester, 2005), 226-32;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2014), 86-96.
- 142 Claude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Paris, 2010), 206-7.
- 143 TNA, AIR 9/8, Air Staff memorandum, 15 Jan. 1936; Air Ministry (Plans) to Deputy Chief of Air Staff, 24 Sept. 1936.
- 144 綏靖主義的歷史研究，見Brian McKerch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mperial defence: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nd appeasement 1930-1939', *Diplomacy & Statecraft*, 19 (2008), 391-42; Sidney Aster, 'Appeasement: before and after revisionism', *ibid.*, 443-80.
- 145 例見Martin Thomas, 'Appeasement in the late Third Republic', *Diplomacy & Statecraft*, 19 (2008), 567-89.
- 146 例見Pierre Guillen,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in flux, 1918-1940', in Robert Boyce (ed.),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1918-194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 Great Power* (London, 1998), 149-61; Greg Kennedy, '1935: a snapshot of British imperial defence in the Far East', in Greg Kennedy and Keith Neilson (eds.), *Far-Flung Lines: Essays on Imperial Defence in Honour of Donald Mackenzie Schurman* (London, 1996), 190-210; Thomas, 'Appeasement', 578-91.
- 147 Sidney Paish, '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i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42-3, 45.
- 148 Orlando Pérez, 'Panama: nat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to canal security', in Thomas Leonard and John Bratzel (eds.),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6), 65-6.
- 149 Neill Lochery, *Brazil: The Fortunes of War* (New York, 2014), 39-40, 61-2, 70.
- 150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23.
- 151 Chamberlain Paper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NC 18/1/1108,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Ida, 23 July 1939.
- 152 George Peden, 'Sir Warren Fisher and British rearmament against German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4 (1979), 43-5; Robert Shay, *British Rearmament in the Thirties* (Princeton, NJ, 1977), 159, 223; Joe Maiolo, *Cry Havoc: The Arms Rac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1-1941* (London, 2010), 99-101.

- 153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 95-6, 180-86.
- 154 Franco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 (Lawrence, Kans, 2012), 119-20, 154-7; Ashley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6), 17-19.
- 155 Eugenia Kiesling,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Frenc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War in History*, 3 (1996), 215-18; Robert Doughty, *The Seeds of Dis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rmy Doctrine, 1919-39* (Mechanicsburg, Pa, 1985), 95-105, 108-10.
- 156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2-13, 323-5, 333-4.
- 157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37-48.
- 158 Peter Jackson, *France and the Nazi Menace: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Making 1933-1939* (Oxford, 2000), 289-96.
- 159 Hans Groscurth, *Tagebuch eines Abwehroffiziers* (Stuttgart, 1970), 124. 對於慕尼黑會議的這個觀點，見Over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193-210.
- 160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Series D, vol. 2, 772,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Hitler and Horace Wilson, 27 Sept. 1938; Waclaw Jedrzejewicz (ed.),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apers and Memoirs of Józef Lipski* (New York, 1968), 425, letter from Lipski to Josef Beck.
- 161 H. Michaelis and E. Schraepler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bis 1945. Vol. 12: Das sudetendeutsche Problem* (Berlin, 1976), 438-440, Fritz Wiedemann über seine Eindrücke am 28 Sept. 1938.
- 162 Groscurth, *Tagebuch*, 128, entries for 28, 30 Sept. 1938.
- 163 André Maurois, *Why France Fell* (London, 1941), 21-2.
- 164 Jean Levy and Simon Pietri, *De la République à l'État français 1930-1940: Le chemin de Vichy* (Paris, 1996), 160-61.
- 165 TNA, AIR 9/105, chiefs of staff, 'British Strategical Memorandum, March 20 1939', pp. 6-7. 關於共同作戰計畫，見William Philpott and Martin Alexander, 'The Entente Cordiale and the next war: AngloFrench views on future military cooperation, 1928-193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3 (1998), 68-76.
- 166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75-1970* (Cambridge, 2009), 494-7; Christopher Waters, 'Australia,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 Society*, 19 (2001), 93-4.
- 167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4-25; Martin Thomas, 'Economic con

- ditions and the limits to mobilization in the French Empire 1936-1939', *Historical Journal*, 48 (2005), 482-90.
- 168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442, 446; George Gallup (ed.), *The Gallup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olls: Great Britain, 1937-1975* (New York, 1976), 10, 16, 21.
- 169 Richard Overy, *The Morbid Ag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2009), 21-2.
- 170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314-15.
- 171 TNA, PREM 1/331a, note on Italian proposals, 2 Sept. 1939.
- 172 Brian Bond (ed.), *Chief of Staff: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Pownall: Volume One* (London, 1972), 221.
- 173 TNA, PREM 1/395, translation of Hitler speech of 6 Oct. 1939 for the prime minister, p. 18.
- 174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670-71.
- 175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16-17.
- 176 Maurois, *Why France Fell*, 73.
- 177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163.
- 178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76;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40-41.
- 179 TNA, PREM 1/395, Lord Halifax, draft response to Hitler, 8 Oct. 1939; Churchill to Chamberlain, 9 Oct. 1939; minute for Chamberlain from Alexander Cadogan (Foreign Office), 8 Oct. 1939.
- 180 Willi Boelcke (ed.), *The Secret Conferences of Dr. Goebbels 1939-1943* (London, 1967), 6, directive of 16 Dec. 1939;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60, Conference of Department Heads, 25 Nov. 1939.
- 181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76.
- 182 Karl-Heinz Frieser,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 (Annapolis, Md, 2012), 63-8; Mungo Melvin, *Manstein: Hitler's Greatest General* (London, 2010), 136-7, 142, 149-51, 154-5;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40-41.
- 183 Martin Alexander, 'The fall of France, 1940',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3 (1990), 13-21; 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Oxford, 2003), 75-6.
- 184 TNA, PREM 1/437, press communiqué on meeting of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15 Nov. 1939.

- 185 Brian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1939-1940* (London, 1990), 40-41, 49-51, 58-9.
- 186 Martin Alexander, “‘Fighting to the last Frenchman?’ Reflections on the BEF deployment to France and the strains in the Franco-British alliance, 1939-1940’, in Joel Blat t (ed.), *The French Defeat of 1940: Reassessments* (Providence, RI, 1998), 323-6;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76-7.
- 187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37; Robert Desmond, *Tides of War: World News Reporting 1931-1945* (Iowa City, Iowa, 1984), 93.
- 188 Gallup (ed.),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s*, 22, 30.
- 189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46; Alan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Minded: The British Soldier Goes to War 1939-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44.
- 190 Talbot Imlay, ‘France and the Phoney War 1939-1940’, in Boyce (ed.),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265-6.
- 191 TNA, WO 193/144, War Office Memorandum for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15 Dec . 1939; 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s report,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for Land Offensive’, 12 Apr. 1940.
- 192 Richard Overy, ‘Air Power, Armies, and the War in the West, 1940’, 32nd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U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1989, 1-2.
- 193 Guillen,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in flux’, 160-61.
- 194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39-47.
- 195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195-201, 214-15.
- 196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1939-1945’,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 *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34-6; Martin Kahn, *Measuring Stalin’s Strength during Total War* (Gothenburg, 2004), 87-9.
- 197 TNA, WO 193/144, War Office memorandum ‘Assistance to Finland’, 16 Dec. 1939 (‘we cannot recommend that we should declare war on Russia’); Kahn, *Measuring Stalin’s Strength*, 90-92.
- 198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at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245, entry for 12 Dec. 1939.
- 199 Patrick Salmon, ‘Great Bri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Finland’, in John Hiden and Thomas Lane (eds.), *The Baltic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91), 116-17; Thomas Munch-Petersen, ‘Britai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Winter War’, in Robert Bohn et al. (eds.), *Neutralität und totalitäre Aggression: Nordeuropa u*



- nd die Grossmächte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91), 87-9;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London, 1957), 47-8.
- 200 TNA, PREM 1/437, Reynaud to Chamberlain and Lord Halifax, 25 Mar. 1940.
- 201 TNA, PREM 1/437, memorandum for the prime minister, 'Possibilities of Allied Action against the Caucasus', March 1940, p. 3. 行動的詳細內容，見C. O. Richardson, 'French plans for Allied attacks on the Caucasus oil fields January-April 1940',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8 (1973), notes to pp. 88-103 889130-53.
- 202 Edward 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London, 1954), 102-6; Jackson, *Fall of France*, 82-4.
- 203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London, 1964), 66-72.
- 204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63-7, 80-84.
- 205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212-17; British Air Minis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London, 1983), 60-63.
- 206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224.
- 207 Robert Rhodes James (ed.),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London, 1993), 244-50, entries for 7, 8, 9 May 1940.
- 208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36-48. 空中兵力的統計數據依照特定天數與預備分類上可服役的程度而有所差異。Patrick Facon, *L'Armée de l'Air dans la tourmente: La Bataille de France 1939-1940* (Paris, 1997), 151-69, 得出了相當不同的數字：盟軍有五千五百二十四架飛機，德軍有三千九百五十九架飛機。也可見Ernest May, *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 (New York, 2000), 479, 提到雙方轟炸機與戰鬥機的數量：德軍有兩千七百七十九架，盟軍有五千一百三十三架。
- 209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45; Facon, *L'Armée de l'Air*, 169, 205; Jackson, *Fall of France*, 15-17.
- 210 Jackson, *Fall of France*, 21-5. 關於德軍因為利用馬匹拖運輜重而產生的大排長龍的現象，見Richard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or Military Anachronism? Horses and the German Army of WWII* (Mechanicsburg, Pa, 2008), 24-6.
- 211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46.
- 212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93.
- 213 Henri Wailly, 'La situation intérieure', in Philippe Ricalens and Jacques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Faute ou nécessité?* (Paris, 2011), 48-9.
- 214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57.

- 215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107-12.
- 216 Ibid., 161.
- 217 Jackson, *Fall of France*, 45-7.
- 218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 (London, 1971), 284, entry for 16 May; 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150.
- 219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85.
- 220 Hugh Sebag-Montefiore, *Dunkirk: Fight to the Last Man* (London, 2006), 3.
- 221 Max Schiaron, 'La Bataille de France, vue par le haut commandement français',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3-5.
- 222 Stephen Roskill, *Hankey: Man of Secrets, Volume III 1931-1963* (London, 1974), 47-8.
- 223 Claude Huan, 'Les capacités de transport maritime',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37-8.
- 224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301-2.
- 225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Minded*, 55-6.
- 226 Sebag-Montefiore, *Dunkirk*, 250-53.
- 227 Paul Gaujac, 'L'armée de terre française en France et en Afrique du Nord',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15-16.
- 228 Huan, 'Les capacités de transport maritime', 38-9. 關於波蘭士兵，見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212-16.
- 229 Jacques Belle, 'La volonté et la capacité de défendre l'Afrique du Nord',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150-57; Gaujac, 'L'armée de terre française', 20-22.
- 230 Schiaron, 'La Bataille de France', 7-8.
- 231 Ibid., 9-11; Elisabeth du Réau, 'Le débat de l'armistice',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65-9.
- 232 Schiaron, 'La Bataille de France', 11-12; Jackson, *Fall of France*, 143.
- 233 Gilles Ragache, 'La bataille continue!',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142-5.
- 234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a*, 239.
- 235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494-8, 508-11; Robert Mallett, *Mussolin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3-1940* (Basingstoke, 2003), 214-17.

- 236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510.
- 237 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7-1943*, ed. Renzo di Felice (Milan, 1998), 429, 435, 442, entries for 13 May, 28 May, 10 June 1940.
- 238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5-6. Ciano, *Diario*, 444,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 239 Ciano, *Diario*, 443,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 240 Ragache, 'La bataille continue!', 143-4.
- 241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48-50.
- 242 Karine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Vichy, Italy and collaboration', in Ludivine Broch and Alison Carroll (eds.), *France in an Era of Global War, 1914-1945: Occupation Politics, Empire and Entanglements* (Basingstoke, 2014), 153-5;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6-7. 關於德國的條件，見Thomas Laub, *After the Fall: German Policy in Occupied France 1940-1944* (Oxford, 2010), 36-9.
- 243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236-7.
- 244 Ciano, *Diario*, 443,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 245 Randolph Churchill (ed.), *Into Battle: Speeches by the Right Hon. Winston S. Churchill* (London, 1941), 255-6, 259.
- 246 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Volume 1 1939-October 1941* (London, 1985), 267, entry for 20 Aug. 1940.
- 247 Gorodetsky, *Maisky Diaries*, 304, entry for 20 Aug. 1940.
- 248 Ibid., 287, entry for 17 June 1940.
- 249 Hastings Ismay, *Memoirs* (London, 1960), 153.
- 250 James (ed.),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261-2.
- 251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1939-1945* (London, 2016), 47-8.
- 252 關於蘇聯的觀點，見Sergei Kudryashov, 'The Soviet perspective', in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 (London, 2000), 71-2. 關於法國的觀點，見Robert Tombs and Isabelle Tombs, *That Sweet Enemy: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2007), 10, 571-3.
- 253 Colville, *Fringes of Power*, 176, entry for 6 June 1940.
- 254 Robert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A Biography* (Aldershot, 2006), 434; 關於邱吉爾的引文，見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70, 他提到邱吉爾曾說，「光靠我

們自己就能打敗德國人」。

- 255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Home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Britain's Finest Hour May-September 1940* (London, 2011), 80, 123, 126, entries for 5 June, 17 June and 18 June 1940. 也可見Richard Toye, *The Roar of the Lion: The Untold Story of Churchill's World War II Speeches* (Oxford, 2013), 51-9.
- 256 John Charmley, *Lord Lloyd and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87), 251.
- 257 John Ferris and Evan Mawdsley, 'The war in the West', in *idem*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 Fighting the War* (Cambridge, 2015), 350.
- 258 Richard Toye, *Lloyd George and Churchill: Rivals for Greatness* (London, 2007), 342, 363-9, 380; Antony Lentin, *Lloyd George and the Lost Peace: From Versailles to Hitler, 1919-1940* (Basingstoke, 2001), 121-7.
- 259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433.
- 260 Richard Hallion,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Addison and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83-4.
- 261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52-4.
- 262 Toye, *Roar of the Lion*, 54.
- 263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03-4.
- 264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1-3.
- 265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08-9; K. Fedorowich, 'Sir Gerald Campbell and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wartime Ottawa, 1938-40', *War in History*, 19 (2012), 357-85; Toye, *Churchill's Empire*, 209; Jonathan Vance, *Maple Leaf Empire: Canada, Britain, and Two World Wars* (Oxford, 2012), 149-50, 179;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495-7.
- 266 Clair Wills, *The Neutral Island: A History of Irel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7), 41-8; Toye, *Churchill's Empire*, 196-7, 207.
- 267 Raghavan, *India's War*, 13-16, 38-9, 52-60, 69-70.
- 268 Dilks (ed.),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311, entry for 5 July 1940;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54-5.
- 269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74-7, 193-8.
- 270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122.



- 271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144-54.
- 272 Gerhard Schreiber, Bernd Stegemann and Detlef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Oxford, 1995), 282-8;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140-44.
- 273 Donald Nuechterlein, *Iceland: Reluctant Ally* (Ithaca, NY, 1961), 23-36.
- 274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Oxford, 1977), 158, 175-7; Neil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lif., 2003), 353-5.
- 275 Guy Vanthemsche, *Belgium and the Congo 1885-1980* (Cambridge, 2012), 122-6, 130.
- 276 Jonathan Helmreich,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Belgium and the Congo, 1940-1960* (Newark, NJ, 1998), 25-40.
- 277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 2012), 3-5.
- 278 Ibid., 50-51, 54, 109-15.
- 279 Ibid., 50-5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66-8.
- 280 Marcel Boldorf, 'Grenzen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ugriffs auf Frankreichs Kolonialimporte (1940-1942)',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Wirtschafts-Sozialgeschichte*, 97 (2010), 148-50.
- 281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123-4, 128-9; Frederick Quinn, *The French Overseas Empire* (Westport, Conn., 2000), 219-20.
- 28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53-4;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at War 1940-45* (Manchester, 1998), 45-6.
- 283 Charmley, *Lord Lloyd*, 246-7.
- 284 Tombs and Tombs, *That Sweet Enemy*, 561, 572-3.
- 285 Ibid., 562-3; Christopher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Oxford, 2013), 197-9; Raymond Dannreuther, *Somerville's Force H: The Royal Navy's Gibraltar-based Fleet, June 1940 to March 1942* (London, 2005), 28-34.
- 286 Martin Thomas, 'Resource war, civil war, rights war: factoring empire into French North Africa's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18 (2011), 225-48.
- 287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155-6.
- 288 Quinn, *French Overseas Empire*, 221-2; Thomas, *French Empire at War*, 52-8.

- 289 Robert Frank, 'Vichy et les Britanniques 1940-41: double jeu ou double langage?', in Azéma and Bédarida (eds.),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144-8. 關於達卡, 見Thomas, *French Empire at War*, 75-6;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209.
- 290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93, 103.
- 291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155-8.
- 292 Ciano, *Diario*, 449, 452, entries for 2 July, 16 July 1940.
- 293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3 vols. *Volume II, Untergang* (Munich, 1965), 1538.
- 294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4 vols. (Munich: K. G. Saur, 1987), iv, 221, 227, entries for 28 June, 4 July 1940. 關於「居間調停人」, 見Karina Urbach,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2015).
- 295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37-8, Halder's notes of meeting at the Berghof, 13 July 1940;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67-8.
- 296 Gerwin Strobl, *The Germanic Isle: Nazi Perceptions of Britain* (Cambridge, 2000), 84, 92-4.
- 297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57-8.
- 298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v, 246-7, entry for 20 July 1940.
- 299 Colville, *Fringes of Power*, 234, entry for 24 July 1940.
- 300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v, 250, entry for 24 July 1940.
- 301 Walt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2), 71-2, Directive No. 16.
- 302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68-9, entry for 21 July 1940.
- 303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61, 哈爾德將軍與元首開會的報告, 1940年7月21日。
- 304 Toye, *Lloyd George and Churchill*, 376.
- 305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61;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v, 249.
- 306 BA-MA, I Fliegerkorps, 'Gedanken über die Führung des Luftkrieges gegen England', 24 July 1940. 關於德國的準備, 見Horst Boog, 'The Luftwaffe's assault', in Addison and Crang, *Burning Blue*, 40-41.
- 307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199.
- 308 Overy, *The Bombing War*, 251-2.

- 309 TNA, AIR 16/212, No. 11 Group Operational Orders, 'Measures to Counter an Attempted German Invasion, Summer 1940', 8 July 1940, p. 2.
- 310 AHB, 'Battle of Britain: Despatch by Sir Hugh Dowding', 20 Aug. 1940, 569.
- 311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75-6; AHB, German Translations, vol. 1, VII/21, OKW directive 'Operation Sea Lion', 1 Aug. 1940.
- 312 TNA, PREM 3/29 (3), Fighter Command Order of Battle, 6 Sept. 1940.
- 313 TNA, AIR 22/72, report on German propaganda, Aug. 1940.
- 314 Percy Schramm (ed.), *Kriegstagebuch/OKW: Band 1, Teilband 1* (Augsburg, 2007), 59-60, entry for 3 Sept. 1940.
- 315 TNA, AIR 16/432, Home Security intelligence summary, 'Operations during the Night of 5/6 September'.
- 316 Ibid., reports for 24/25, 25/26 and 28/29 Aug. 1940. 第一晚，倫敦有三個自治市被轟炸，第二晚五個，第三晚十一個。
- 317 Overy, *The Bombing War*, 83-4;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 v, 309.
- 318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 Minded*, 68.
- 319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185, 189-90; Alex Danchev and Daniel Todman (eds.), *War Diaries: Lord Alanbrooke, 1939-1945* (London, 2001), 108, entry for 15 Sept. 1940.
- 320 TNA, AIR 8/372, minute by chief of the air staff, 22 May 1940; Cripps to War Cabinet, 26 June 1940; Foreign Office minute for Churchill, 3 July 1940.
- 321 TNA, INF 1/264, Home Intelligence, Summary of daily reports, 4 Sept. 1940.
- 322 Virginia Cowles, *Looking for Trouble* (London, 1941), 448-9, 452.
- 323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14.
- 324 Ibid., 115-7;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72

## 第二章 帝國的幻夢與現實（1940-1943年）

- 1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Oxford, 1954), 469. 這段文字譯自《三國同盟條約》德文版。原文是用英文寫成，寫的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適當的地方」而非德文的「每個民族都應取得其應得的空間」。德文版使用「空間」一詞，使得新秩序明顯具有領土的性質。

- 2 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7-1943*, ed. Renzo de Felice (Milan, 1998), 466-7; William Shirer,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London, 1941), 417-20, entry for 27 Sept. 1940.
- 3 關於英文版本，見 *Akten de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Band XI:I* (Göttingen, 1964), 153-4, von Mackens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24 Sept. 892 notes to pp. 124-135 1940, and 140-41, von Ribbentrop to von Mackensen, 24 Sept. 1944; Otto Tolischus, *Tokyo Record* (London, 1943), 30 (speech of 27 Jan. 1941).
- 4 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 in Kahrs et al.,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s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17-22; Gustavo Corni, *Il sogno del 'grande spazio': Le politiche d'occupazione nell'europa nazista* (Rome, 2005), 61-8; Paolo Fonzi, *La moneta nel grande spazio: Il progetto nazionalsocialista di integrazione monetaria europea 1939-1945* (Milan, 2011), 116-17, 121, 167-9.
- 5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90-91;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72-3.
- 6 關於這些協商，最佳的說明見 Norman Goda, *Tomorrow the World: Hitler, Northwest Africa, and the Path toward America* (College Station, Tex., 1998). 也可見 H. James Burgwyn, *Mussolini Warlord: Failed Dreams of Empire 1940-1943* (New York, 2012), 22-9.
- 7 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 Conn., 1999), 17-18.
- 8 Joachim von Ribbentrop,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 1954), 149-52.
- 9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74-5.
- 10 Sönke Neitzel, *Der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über dem Atlantik und der Nordsee 1939-1945* (Bonn, 1995), 55-6, 68.
- 11 Christopher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Oxford, 2013), 215.
- 12 W. J. R. Gardner, *Decoding History: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and Ultra* (Basingstoke, 1999), 177; Marc Milner,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Stroud, 2005), 40, 46.
- 13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40-41;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216, 224.
- 14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43-4.
- 15 估計數字出自 Arnold Hague, *The Allied Convoy System 1939-1945: Its Organization, Defence and Operations* (London, 2000), 23-5, 107-8.



- 16 Ralph Erskine, 'Naval Enigma: a missing lin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3 (1989), 497-9.
- 17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84-5; Percy Schramm (ed.), *Kriegstagebuch/OKW: Band 1, Teilband 1* (Augsburg, 2007), 76, entry for 14 Sept. 1940.
- 18 BA-MA, RL2 IV/27, 'Grossangriffe bei Nacht gegen Lebenszentren Englands, 12.8.1940-26.6.41'.
- 19 TsAMO, f.500, o. 725168, d. 110, Luftwaffe Operations Staff report on British targets and air strength, 14 Jan. 1941;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179,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against British War Economy'.
- 20 Michael Postan, *British War Production* (London, 1957), 484-5; Klaus Maier, Horst Rohde, Bernd Stegmann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 1979), 402-4.
- 21 C. B. A. Behrens, *Merchant Shipping and the Demands of War* (London, 1955), 325. 一九四一年，英國擁有將近一千七百萬噸糧食與進口原料庫存。
- 22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510-11.
- 23 Warren Kimball, "'Beggar my neighbor": America and the British interim finance crisis 1940-4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9 (1969), 758-72; *idem* (ed.), *Churchill &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3 vols. (London, 1984), i, 139, Churchill memorandum, 1 Mar. 1941.
- 24 Nigel Nicolson (ed.),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939-45* (London, 1967), 144-5, letter to W. B. Jarvis.
- 25 Orio Vergani, *Ciano: una lunga confessione* (Milan, 1974), 97.
- 26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 38, diary entry by General Bongiovanni.
- 27 Mario Cervi, *Storia della Guerra di Grecia, ottobre 1940-aprile 1941* (Milan, 1986), 51.
- 28 Vergani, *Ciano*, 88.
- 29 Marco Bragadin, *The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57), 28-9; Simon Ball, *The Bitter Sea* (London, 2009), 52-3.

- 30 Lucio Ceva, 'Italia e Grecia 1940-1941. Una guerra a parte', in Bruna Micheletti and Paolo Poggio (eds.), *L'Italia in guerra 1940-43* (Brescia, 1991), 190; Burgwyn, *Mussolini Warlord*, 38-9.
- 31 Ceva, 'Italia e Grecia', 191-2.
- 32 Cervi, *Storia della Guerra di Grecia*, 40, 51-2; Ball, *Bitter Sea*, 50-52;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Dall'impero d'Etiopia alla disfatta* (Turin, 2005), 261.
- 33 Ceva, 'Italia e Grecia', 192;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9-30.
- 34 Mario Luciolli, *Mussolini e l'Europa: la politica estera fascista* (Florence, 2009), 220 (first published in 1945).
- 35 Ceva, 'Italia e Grecia', 193-201;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62-3, 274.
- 36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41-2; Gerhard Schreiber, Bernd Stegmann and Detlef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The Mediterranean, South-ea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1939-1941* (Oxford, 1995), 426-9.
- 37 Leland Stowe, *No Other Road to Freedom* (London, 1942), 182-3.
- 38 Ceva, 'Italia e Grecia', 201-2;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42, 79.
- 39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79-80. Ceva, 'Italia e Grecia', 提出的義大利死亡人數較多，有四萬人，其中有數千人因為凍傷與疾病而在撤退到後方後死去。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死亡人數的統計有這麼大的差異。
- 40 Jack Greene and Alessandro Massignani, *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1998), 103-7;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44-6.
- 41 Bragadin,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90-95.
- 42 關於未能攻占的黎波里，見Klaus Schmider, 'The Mediterranean in 1940-1941: crossroads of lost opportunities?', *War & Society*, 15 (1997), 27-8.
- 43 Schreiber, Stegmann and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92-5. 關於行動指揮，見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68-77.
- 44 Richard Carr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ighting power of the Italian Army in North Africa, 1940-1943', *War in History*, 22 (2015), 508-14.
- 45 Schreiber, Stegmann and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454-6.
- 46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London, 1964), 128.
- 47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The War Narratives of Major-General Sir John Kennedy* (London, 1957), 72-5.

- 48 Vergani, *Ciano*, 100.
- 49 Kennedy, *Business of War*, 101-3.
- 50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61, entry for 4 Apr. 1941; Daniel Todman, *Britain's War: Into Battle 1937-1941* (London, 2016), 565.
- 51 Ashley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Iran and Iraq* (New Haven, Conn., 2018), 56-7.
- 52 Jeffrey Herf, *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New Haven, Conn., 2009), 60-61.
- 53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88.
- 54 Ibid., 99.
- 55 Ibid., 94-104; Herf, *Nazi Propaganda*, 57-8, 61.
- 56 Walth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Munich, 1965), 139-41, 'Weisung Nr. 30: Mittlerer Orient'; 151-5, 'Weisung Nr. 32: Vorbereitungen für die Zeit nach Barbarossa'.
- 57 Herf, *Nazi Propaganda*, 36-9.
- 58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Cambridge, Mass., 2014), 84-9.
- 59 Ibid., 107-9.
- 60 Ibid., 111-12, 130. 關於義大利人如何對待利比亞人，見Patrick Bernhard, 'Behind the battle lines: Italian atrocitie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Arabs, Berbers, and Jews in North Af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6 (2012), 425-46.
- 61 Nicholas Tamkin, 'Brita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orthern Front" 1941-1942', *War in History*, 15 (2008), 316.
- 62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 2006), 325-6.
- 63 Stefanie Wichhart, 'Selling democracy during the second British occupation of Iraq, 194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515.
- 64 Ibid., 523.
- 65 Gerry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Oxford, 2009), 155.
- 66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Oxford, 1982), 150-58; Geoffrey Sloan,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in Co

- lin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1999), 154-5.
- 67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London, 1988), 31-6;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15-17.
- 68 Benjamin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how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incubated ideas and methods adop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Nazis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 (2005), 432-4.
- 69 Andrew Gyorgy, *Geopolitics: The New German Science* (Berkeley, Calif., 1944), 207-8, 221.
- 70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20; L. H. Gann, 'Reflections on the German and Japanese empires of World War II',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Princeton, NJ, 1996), 338.
- 71 Volker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1939-45* (London, 2020), 145;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40.
- 72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3 vols., *Volume II, Untergang* (Munich, 1965), 1731, Hitler's Proclamation to the German People, 22 June 1941.
- 73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39.
- 74 Von Ribbentrop, *Memoirs*, 153.
- 75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145.
- 76 Albert Kesselring, *The Memoirs of Kesselring* (London, 1953), 87.
- 77 Michael Bloch, *Ribbentrop* (London, 1992), 317.
- 78 Hugh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London, 1973), 15, entry for 27 July 1941.
- 79 Stephen Fritz, *The First Soldier: Hitler as Military Leader* (New Haven, Conn., 2018), 132-8.
- 80 David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Germany's Defeat in the East* (Cambridge, 2009), 47-53.
- 81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14-15.
- 82 Fritz, *First Soldier*, 151-2.
- 83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40.
- 84 Jürgen Förster, 'Hitler turns East: German war policy in 1940 and 1941', in Bernd W



- 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Germany, Soviet Russia and the World, 1939-1941* (Oxford, 1997), 129; Andreas Hillgruber, 'The German military leaders' view of Russia prior to the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171-2, 180. 關於種族歧視的詞語，見Andrei Grinev, 'The evaluation of the military qualities of the Red Army in 1941-1945 by German memoirs and analytic material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 (2016), 228-9.
- 85 Fritz, *First Soldier*, 124-5;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 Sämtliche Fragmente: Band 4* (Munich, 1987), 695, entry for 16 June 1941.
- 86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74.
- 87 R. L.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or Military Anachronism? Horses and the German Army of WWII* (New York, 1991), 36-9.
- 88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78, 132-3.
- 89 Klaus Schüler, 'The eastern campaign as a transportation and supply problem',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207-10.
- 90 F. Seidler and D. Zeigert, *Die Führerhauptquartiere: Anlagen und Planungen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2000), 193-6;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62.
- 91 Johannes Kaufmann, *An Eagle's Odyssey: My Decade as a Pilot in Hitler's Luftwaffe* (Barnsley, 2019), 97.
- 92 Christian Ingrao, *The Promise of the East: Nazi Hopes and Genocide 1939-43* (Cambridge, 2019), 21-2, 99-101.
- 93 Horst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4: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Stuttgart, 1983), 129-35.
- 94 Stephen Fritz,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Ky, 2011), 61-2; Alex Kay, '"The purpose of the Russian campaign is the decimation of the Slavic population by thirty million": the radicalization of German food policy in early 1941', in Alex Kay, Jeff Rutherford and Davi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Total War, Genocide, and Radicalization* (Rochester, NY, 2012), 107-8.
- 95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114-16.
- 96 Oula Silvennoinen, 'Janus of the North? Finland 1940-44: Finland's road into alliance with Hitler', in John Gilmour and Jill Stephenson (eds.), *Hitler's Scandinavian Legacy* (London, 2013), 135-6.

- 97 Joumi Tilli, “‘Deus Vult!’: the idea of crusading in Finnish clerical rhetoric 1941-1944”, *War in History*, 24 (2017), 364-5, 372-6.
- 98 Silvennoinen, ‘Janus of the North?’, 139-40.
- 99 Dennis Deletant, ‘Romania’, in David Stahel (ed.), *Joining Hitler’s Crusade: Europe an N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 (Cambridge, 2018), 66-9.
- 100 Ibid., 9, 69-70.
- 101 Jan Rychlík, ‘Slovakia’, in Stahel (ed.), *Joining Hitler’s Crusade*, 123-4; Ignác Ramsics, ‘Hungary’, *ibid.*, 88-9, 92-5, 100-101.
- 102 Jürgen Förster, ‘Freiwillige für den “Kreuzzug Europas” gegen den Bolschewismus’, in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4*, 908-9.
- 103 Thomas Schlemmer, *Invasori, non Vittime: La campagna italiana di Russia 1941-1943* (Rome, 2019), 9-12.
- 104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111.
- 105 Alessandro Massignani, ‘Die italienischen Streitkräfte unde der Krieg der “Achse”’, in Lutz Klinkhammer, Amadeo Guerrazzi and Thomas Schlemmer (eds.), *Die ‘Achse’ im Krieg: Politik, Ideologie und Kriegfü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2010), 123-6, 135-7.
- 106 Eugen Dollmann, *With Hitler and Mussolini: Memoirs of a Nazi Interpreter* (New York, 2017), 192-3. Dollmann利用他當時寫下的文章記錄這些事件。
- 107 K. Arlt, ‘Die Wehrmacht im Kalkul Stalins’, in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 107-9.
- 108 Davi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 Kans, 1998), 95-6, 103-4; R. E. Tarleton,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the Stalin Lin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6 (1993), 50; C. Roberts, ‘Planning for war: the Red Army and the catastrophe of 1941’, *Europe-Asia Studies*, 47 (1995), 1319.
- 109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239-43; Christopher Andrew and O.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London, 1990), 209-13; David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Novato, Calif., 1990), 15-19.
- 110 這是個歷史悠久的論戰，見Klaus Schmider, ‘No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Suworov debate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0 (1997), 181-94; V. Suworov, ‘Who was planning to attack whom in June 1941, Hitler or Stalin?’, *Military Affairs*, 69 (1989).
- 111 R. H. McNeal, *Stalin: Man and Ruler* (New York, 1988), 238.

- 112 Georgii Zhukov,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Volume I* (Moscow, 1985), 217-29; Alexander Hill, *The Red Arm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7), 205-7.
- 113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103.
- 114 J. Schecter and V. Luchkov (eds.),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New York, 1990), 56.
- 115 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London, 2005), 73; von Ribbentrop, *Memoirs*, 153.
- 116 W. J. Spahr, *Zhukov: 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 Calif., 1993), 43; A. G. Chor'kov,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417-18.
- 117 Victor Kamenir, *The Bloody Triangle: The Defeat of Soviet Armor in the Ukraine, June 1941* (Minneapolis, Minn., 2008), 247-54.
- 118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107.
- 119 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London, 2005), 19.
- 120 Kamenir, *The Bloody Triangle*, 21-5.
- 121 Roberts, 'Planning for War', 1307; Chor'kov, 'Red Army', 416; R. Stolfi, *Hitler's Panzers East: World War II Reinterpreted* (Norman, Okla, 1991), 88-9.
- 122 James Lucas,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German Soldier in Russia 1941-1945* (London, 1979), 31-3.
- 123 G. F.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7), 96-7, 101.
- 124 Trevor 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7, 24, entries for 27 July, 8/9 Aug. 1941.
- 125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32-3.
- 126 Martin Kahn, 'From assured defeat to "the riddle of Soviet military success": Anglo-American government assessments of Soviet war potential 1941-194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6 (2013), 465-7.
- 127 Johannes Hürter (ed.), *A German General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Gotthard Heinrici 1941-1942* (Barnsley, 2015), 68, letter of 6 July 1941.
- 128 Ibid., 73-4, letters of 1 and 3 Aug.; 78, letter of 28 Aug. 1941.
- 129 Hans Schröder, 'German soldier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Russian campaign',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War*, 313.

- 130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182.
- 131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45-9;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183-5.
- 132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53; Stahel, *Operation Barbarossa*, 234.
- 133 Fritz, *Ostkrieg*, 129-32.
- 134 Peter Longerich, *Hitler: A Biography* (Oxford, 2019), 753.
- 135 Dmitri Pavlov, *Leningrad 1941-1942: The Blockade* (Chicago, Ill., 1965), 75, 79, 84, 88; N. Kislitsyn and V. Zubakov, *Leningrad Does Not Surrender* (Moscow, 1989), 16-18. 一九四一年冬季期間圍城的死亡人數是一個估計值，但一般認為這個數字是根據目前可得的證據所能得出最接近的數字。見Richard Bidlack and Nikita Lomagin, *The Leningrad Blockade 1941-1944* (New Haven, Conn., 2012), 270-73.
- 136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35.
- 137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758-67.
- 138 Jack Radey and Charles Sharp, 'Was it the mud?',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663-5.
- 139 Ibid., 667-70.
- 140 Fritz, *Ostkrieg*, 161.
- 141 Klaus Reinhardt 'Moscow 1941: the turning point', in John Erickson and David Dilks (eds.), *Barbarossa: 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 1994), 218-19; Fritz, *Ostkrieg*, 189-90.
- 142 Fritz, *Ostkrieg*, 187-9.
- 143 Spahr, *Zhukov*, 74-5.
- 144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5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1-3), i, 1120; statistics from Fritz, *Ostkrieg*, 192.
- 145 關於蘇軍的缺點，見Hill, *Red Army*, 302-3.
- 146 Christian Hartmann, *Operation Barbarossa: Nazi Germany's War in the East 1941-1945* (Oxford, 2015), 54-5.
- 147 Hürter (ed.), *A German General on the Eastern Front*, 126, letter of 2 Jan. 1942.
- 148 Carl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Ōshima Hiroshi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s, 1993), 27-30.
- 149 Klaus Reinhardt, *Moscow-The Turning Point: The Failure of Hitler's Strategy in the Winter of 1941-42* (Oxford, 1992), 58.
- 150 Gerhard Krebs, 'Japan and the German-Soviet War', in Wegner (ed.), *From Peace to*



- War, 548-50, 554-5; John Chapma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north-south dilemma', in Erickson and Dilks (eds.), *Barbarossa*, 168-9, 177-9.
- 151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207-9.
- 152 Eri Hotta,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New York, 2013), 6-7.
- 153 Hans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1938-1945* (Herrsching, 1984), viii, 3073, report for 11 Dec. 1941; ix, 3101-2, report for 19 Dec. 1941; Will Boelcke (ed.), *The Secret Conferences of Dr. Goebbels 1939-1941* (London, 1967), 194, conference of 18 Dec. 1941.
- 154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245, Report by the C-in-C Navy to the Fuehrer, 12 Dec. 1941.
- 155 Eberle and Uhl, *The Hitler Book*, 79.
- 156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34-6, 142-5;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Japan's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 127-8.
- 157 Friedrich Ruge, *Der Seekrieg: The German Navy's Story 1939-1945* (Annapolis, Md, 1957), 252-5.
- 158 Friedrich Ruge, *Der Seekrieg: The German Navy's Story 1939-1945* (Annapolis, Md, 1957), 252-5.
- 159 Dollmann, *With Hitler and Mussolini*, 204. 這個論點出自Tobias Jersak, 'Die Interaktion von Kriegsverlauf und Judenvernichtung: ein Blick auf Hitlers Strategie im Spätsommer 1941', *Historisches Zeitschrift*, 268 (1999), 345-60.
- 160 Christian Gerlach, 'The Wannsee Conference, the fate of the German Jews, and Hitler's decision in principle to exterminate all European Jew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 (1998), 784-5. 關於十二月十二日的會議，見Martin Moll, 'Steuerungsinstrument im "Ämterchaos"? Die Tagungen der Reichs und Gauleiter der NSDAP',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9 (2001), 240-43.
- 161 Tolischus, Tokyo Record, 30, citing speech to the Diet, 20 Jan. 1941.
- 162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39.
- 163 Jonathan Marshall, *To Have and Have Not: Southeast Asian Raw Material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Berkeley, Calif., 1995), 36-41; Sidney Pash, '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

- 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43-4.
- 164 Pash, 'Containment, rollback', 46-51;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75-8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71-3. Grew quotation in Joseph Grew, *Ten Years in Japan* (London, 1944), 257.
- 165 Hotta, *Japan 1941*, 4-7.
- 166 Krebs, 'Japan and the German-Soviet War', 550-51.
- 167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73-4; Sarah Paine, *The Japanese Empire: Grand Strategy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the Pacific War* (Cambridge, 2017), 147-8, 153.
- 168 Pash, 'Containment, rollback', 53-5, 57-8; Marshall, *To Have and Have Not*, 147-50.
- 169 Marshall, *To Have and Have Not*, 163.
- 170 Hotta, *Japan 1941*, 265-8.
- 171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77.
- 172 Krebs, 'Japan and the German-Soviet War', 558-9.
- 173 Alan Zimm, *Attack on Pearl Harbor: Strategy, Combat, Myths, Deceptions* (Philadelphia, Pa, 2011), 15.
- 174 Hotta, *Japan 1941*, 234-5; Chapman,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66.
- 175 Richard Hallio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in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 (London, 2000), 101-2.
- 176 Zimm, *Attack on Pearl Harbor*, 151-4; Paine, *Wars for Asia*, 187-8.
- 177 Zimm, *Attack on Pearl Harbor*, 223-4, 228-9.
- 178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Oxford, 2015), 158.
- 179 Andrew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4), 23-4, 31-2; Mark Stoler, *Allies in War: Britain and America against the Axis Powers* (London, 2005), 42-5.
- 180 Debi Unger and Irwin Unger, *George Marshall: A Biography* (New York, 2014), 148-9.
- 181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81-2.
- 182 Evan Mawdsley, *December 1941: Twelve Days that Began a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1), 230-34.
- 18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91-2;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 War II: Freedom from Fear* (New York, 1999), 102-5.
- 184 Alan Warren, *Singapore 1942: Britain's Greatest Defeat* (London, 2002), 46, 301-2;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4), 146.
- 185 Warren, *Singapore 1942*, 272-4, 290-92;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17-18.
- 186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156.
- 187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162-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95-6.
- 188 William Grieve,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1941-1942* (Jefferson, NC, 2014), 188-90.
- 189 Ibid., 108-16, 191.
- 190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11), 190.
- 191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164; Griev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196-7, 202.
- 192 Taylor, *Generalissimo*, 197-200.
- 193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1939-1945* (London, 2016), 209.
- 194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2013), 256-61;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98-100; Francis Pike, *Hirohito's War: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London, 2016), 303.
- 195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169, 177-8, 196-7; Pike, *Hirohito's War*, 299-300.
- 196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260.
- 197 Paine, *Wars for Asia*, 128.
- 198 Daniel Hedinger, 'Fascist warfare and the Axis alliance: from Blitzkrieg to total war', in Miguel Alonso, Alan Kramer and Javier Rodrigo (eds.), *Fascist Warfare 1922-1945: Aggression, Occupation, Annihilation* (Cham, Switzerland, 2019), 205-8.
- 199 Warren, *Singapore 1942*, 60; Ken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Oxford, 2009), 111-13.
- 200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5-7;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116-17.
- 201 Gerald Horne, *Race War: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Japanese Attack on the British E*

- mpire (New York, 2004), 72-4;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British Occupation* (New Haven, Conn., 2003), 66-72.
- 202 David Horner, 'Australia in 1942: a pivotal year', in Peter Dean (ed.), *Australia 1942 : In the Shadow of War* (Cambridge, 2013), 18-19.
- 203 Craig Symonds, *World War Two at Sea: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2018), 235-7.
- 204 Arthur Marder, M. Jacobsen and J. Horsfield, *Old Friends, New Enemies: The Roy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42-1945* (Oxford, 1990), 155-9; James Brown, *Eagles Strike: South African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 IV* (Cape Town, 1974), 388-400.
- 205 Horne, *Race War*, 217-18.
- 206 Neil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lif., 2004), 349-50;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Oxford, 1977), 173-6.
- 207 Simon Rofe, 'Pre-war postwar planning: the phoney war,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ase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cy & Statecraft*, 23 (2012), 254-5, 258-9.
- 208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49.
- 209 Roll, *The Hopkins Touch*, 188-9; M. Subrahmanyam, *Why Cripps Failed* (New Delhi, 1942), 5-11, 25.
- 210 Horne, *Race War*, 215-17.
- 211 Yasmin Khan, *The Raj at War: A People's History of India's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191; Kaushik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939-45* (New Delhi, 2016), 176.
- 212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177-8; Raghavan, *India's War*, 272-4.
- 213 Khan, *The Raj at War*, 191.
- 214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56-7, 181.
- 215 Matthew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942-44* (London, 1996), 223.
- 216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216-19; Timothy Brook, 'The Great Way government of Shanghai', in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 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2004), 67-8.
- 217 David Barrett,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1940-19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 with Nationalist China', in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Calif., 2001), 104-12.
- 218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5), 35-8.
- 219 Ibid., 41-7.
- 220 Mark Peattie, 'Nanshin: the "Southward Advance" 1931-1941, as a prelude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Duus, Myers and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236-7.
- 221 Takuma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Die japanische Besatzung Malaya und Singapur (1942-1945)* (Frankfurt am Main, 2017), 186-9; Paul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5* (London, 1998), 52-4.
- 22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84-5;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85-7.
- 223 Kiyoko Nitz, 'Japanese military policy towards French Indo-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road to *Meigo Sakusen*',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14 (1983), 331-3.
- 224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189;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27, 133-4.
- 225 Peter Duus,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iplomacy & Statecraft*, 7 (1996), 58-9, 62, 68-9.
- 226 Ethan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8), 116-19, 163.
- 227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27-8.
- 228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1, 129-30.
- 229 Ibid., 232.
- 230 Ibid., 107-8.
- 231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325-33;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94-7.
- 23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67-8.
- 233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289.
- 234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Berkeley, Calif., 1983), 271, 291-4.

- 235 Li Yuk-wai, 'The Chi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23 (1992), 308-9.
- 236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520.
- 237 Ibid., 521.
- 238 Li, 'The Chi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312-15.
- 239 Ben Hillier, 'The Huk rebellion and the Philippines' radical tradition: a people's war without a people's victory', in Donny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325-33.
- 240 Melber, *Zwischen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545, 549-53.
- 241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52.
- 242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223-44.
- 243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46), 121, 190; Nicholas White, J. M. Barwise and Shakila Yacob,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strategic dilemma in colonial development: Britain, Japan and Malaya's iron ore, 1920s to 1950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2 (2020), 426-33.
- 244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223, 241.
- 245 Robert Goralski and Russell Freeburg, *Oil and War: How the Deadly Struggle for Fuel in WWII Meant Victory or Defeat* (New York, 1987), 150-52;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1991), 355-66.
- 246 USSBS,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135 (figures for fiscal years 1940/41 and 1944/5).
- 247 Gregg Huff and Sinobu Majima, 'The challenge of finance in South East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2 (2015), 192-7.
- 248 Ibid.; Paul Kratoska, "'Banana money": consequences of demonetization of wartime Japanese currency in British Malaya',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23 (1992), 322-6.
- 249 Paul Kratoska (ed.), *Food Supplie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London, 1998), 4-6.
- 250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83-200.
- 251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263-5.
- 252 Ju Zhifen, 'Labor conscription in North China 1941-1945', in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45* (Stanford, Calif., 2007), 217-19.

- 25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30, 238;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259-65.
- 254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44-5; Joyce Lebra,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Kuala Lumpur, 1975), 92.
- 255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28.
- 256 Raghavan, *India's War*, 284-94;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04-8.
- 257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55-7; Joyce Lebra, 'Postwar Perspectives o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34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U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1991, 5-6.
- 258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167-72.
- 259 Mark, *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271-2.
- 260 Nitz, 'Japanese military policy', 337-46.
- 261 Trevor Barnes and Claudio Minca, 'Nazi spatial theory: the dark geographies of Carl Schmitt and Walter Christall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3 (2013), 676-7; Timothy Snyder, *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 (London, 2015), 144-5.
- 262 Wolfgang Benz, 'Typologie der Herrschaftsformen in den Gebieten unter deutschen Einfluss', in Wolfgang Benz, Johannes ten Cate and Gerhard Otto (eds.), *Die Bürokratie der Okkupation: Strukturen der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im besetzten Europa* (Berlin, 1998), 15-19.
- 263 Karen GramSkjoldager, 'The law of the jungle? Denmark's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 (2011), 238-46.
- 264 Nicola Labanca, David Reynolds and Olivier Wieviora, *La Guerre du désert 1940-1943* (Paris, 2019), 188-9, 193-7.
- 265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36-8.
- 266 關於併吞的相關細節，見ibid., 9-10, 73-102.
- 267 Srdjan Trifković, 'Rivalry between Germany and Italy in Croatia, 1942-1943', *Historical Journal*, 31 (1995), 880-82, 904.
- 268 Alessandra Kersevan, *Lager italiani: Pulizia etnica e campi di concentramento fascisti per civili jugoslavi 1941-1943* (Rome, 2008), 100-103.
- 269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168-71, 177-8, 357-9.
- 270 Jürgen Förster, 'Die Wehrmacht und die Probleme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in Kl inkhammer et al. (eds.), *Die 'Achse' im Krieg*, 113.

- 271 M. Pearton, *Oil and the Romanian State* (Oxford, 1971), 231; Anand Toprani, 'Germany's answer to Standard Oil: the Continental Oil company and Nazi grand strategy 1940-1942',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7 (2014), 956-9.
- 272 Dieter Eichholtz, *Deutsche Öl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Weltkriege: Studien und Dokumente* (Leipzig, 2010), 345-9.
- 273 Trifković, 'Rivalry between Germany and Italy', 884-7.
- 274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32-40.
- 275 Nuremberg Trials, Case XI, Prosecution Document Book 113, pp. 1-3。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戈林下令對洛林與盧森堡的煉鐵廠進行分配。
- 276 Patrick Nefors, *La collaboration industrielle en Belgique 1940-1945* (Brussels, 2006), 180-82, 223-5, 236-7.
- 277 Henry Picker (ed.),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Wiesbaden, 1984), 62, 69, entries for 1 Aug. and 8/9 Aug. 1941;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5, 33, 35, 68-8, entries for 27 July, 17 Sept. and 17 Oct. 1941.
- 278 Brendan Simms, *Hitler: Only the World was Enough* (London, 2019), 422-3.
- 279 Jürgen Matthäus and Frank Bajohr (eds.), *The Political Diary of Alfred Rosenberg and the Onset of the Holocaust* (Lanham, Md, 2015), 239, entry for 11 Apr. 1941.
- 280 Karel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ss., 2004), 50.
- 281 Klaus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durch die Wehrmacht im September 1941: zur Radikalisierung der Besatzungspolitik',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8 (1999), 35.
- 282 Ben Kiernan, *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 (New Haven, Conn., 2007), 422.
- 283 Elissa Mailänder Koslov, '"Going East":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of violence among female and male Majdanek camp guards (1941-44)',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0 (2008), 567-70.
- 284 Johannes Enstad, *Soviet Russians under Nazi Occupation: Fragile Loyalt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8), 51-3, 66-8.
- 285 Jonathan Steinberg, 'The Third Reich reflected: German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occupied Soviet Union, 1941-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0 (1995), 628.
- 286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34, entry for 17 Sept. 1941.
- 287 Nicholas Terry, 'How Soviet was Russian society under Nazi occupation?', in Claus-



- Christian Szejnmann (ed.), *Rethinking History, Dictatorship and War* (London, 2009), 134-6.
- 288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48-9.
- 289 Grzegorz Rossoliński-Liebe, 'The "Ukrainian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41: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a fascist movement', *Kritika*, 12 (2011), 83, 93-106.
- 290 Matthäus and Bajohr (eds.), *Political Diary of Rosenberg*, 253-7.
- 291 Theo Schulte, *Th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in Occupied Russia* (Oxford, 1989), 65-8.
- 292 Roland Clark, 'Fascists and soldiers: ambivalent loyalties and genocidal violence in wartime Roman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1 (2017), 411.
- 293 Steinberg, 'Third Reich reflected', 615.
- 294 Theo Schulte,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civilian economy in Belorussia',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Berlin, 1997), 176; Steinberg, 'Third Reich reflected', 635.
- 295 Wendy Lower, 'The reibungslose Holocaust? The German military and civili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Ukraine, 1941-1944', in Gerald Feldman and Wolfgang Seibel (eds.), *Networks of Nazi Persecution: Bureaucracy, Busines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5), 246-7.
- 296 Terry, 'How Soviet was Russian society?', 131; Kim Priemel, 'Occupying Ukraine: great expectations, failed opportunities, and the spoils of war, 1941-1943',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8 (2015), 39.
- 297 Richard Overy, *Goering: The Iron Man*, 3rd edn (London, 2020), 131-2.
- 298 Kim Priemel, 'Scorched earth, plunder, and massive mobilizatio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Ukraine and the Soviet war economy', in Jonas Scherner and Eugene White (eds.), *Paying for Hitler's War: The Consequences of Nazi Hegemony for Europe* (Cambridge, 2016), 406-7.
- 299 Overy, *Goering*, 132-3.
- 300 Priemel, 'Occupying Ukraine', 37-9, 48, 50-52.
- 301 Eichholtz, *Deutsche Ölpolitik*, 450-60.
- 302 Priemel, 'Occupying Ukraine', 42-8.
- 303 Christoph Buchheim, 'Die besetzten Länder im Diens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4 (1986)

- ), 123, 143-5.
- 304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36.
- 305 Ibid., 39.
- 306 Sergei Kudryashov, 'Labour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4', in Overy, Otto and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165-6; Schulte,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civilian economy', 179-80.
- 307 Priemel, 'Scorched earth, plunder', 405-6.
- 308 Schult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96-7.
- 309 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553-4, 574.
- 310 Stephan Lehnstaedt, *Imperiale Polenpolitik in den Weltkriegen* (Osnabrück, 2017), 433.
- 311 Isabel Heinemann, "'Ethnic resettlement" and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in the 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 in Feldman and Seibel (eds.), *Networks of Nazi Persecution*, 217-22; idem, "'Another type of perpetrator": the SS racial experts and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regio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391-2.
- 312 Dietrich Beyrau and Mark Keck-Szajbel, 'Eastern Europe as "sub-Germanic space": scholarship on Eastern Europ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Kritika*, 13 (2012), 694-5.
- 313 Barnes and Minca, 'Nazi spatial theory', 670-74;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99-100, 144-8.
- 314 Lehnstaedt, *Imperiale Polenpolitik*, 447; on Moscow and Leningrad 'den Erdboden gleichzumachen', Arnold, 'Die Eroberung und Behandlung der Stadt Kiew', 27.
- 315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101.
- 316 Gerhard Wolf, 'The Wannsee Conference in 1942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living space dystopia',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7 (2015), 166; Andrej Angrick, 'Annihilation and labor: Jews and Thoroughfare IV in Central Ukraine', in Ray Brandon and Wendy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History, Testimony, Memorialization* (Bloomington, Ind., 2008), 208-11.
- 317 Markus Lenig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arbeit' und Umsiedlungspolitik 1933-1945* (Berlin, 2011), 89.
- 318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108-9.
- 319 Heiko Suhr, *Der Generalplan Os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läne zur Kolonisation Ost*

- mitteleuropas* (Munich, 2008), 18-20; Lehnstaedt, *Imperiale Polenpolitik*, 450.
- 320 Daniel Siemens, ‘“Sword and plough”: settling Nazi Stormtroopers in Eastern Europe, 1936-43’,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00-204.
- 321 Kiernan, *Blood and Soil*, 452.
- 322 Geraldien von Frijtag Drabbe Künzel, ‘“Germanje”: Dutch empire-building in Nazi occupied Europ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41, 248-51; Siemens, ‘“Sword and plough”’, 204.
- 323 Ingrao, *Promise of the East*, 108-14;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663-5, 669-70.
- 324 <http://www.holocaustresearchproject.org>, Speech of the Reichsführer-SS at the SS Group Leader Meeting in Posen, 4 Oct. 1943, p. 16.
- 325 <http://prorev.com/wannsee.htm>, Wannsee Protocol, 20 Jan. 1941, p. 5.
- 326 Snyder, *Black Earth*, 5-8.
- 327 Wilhelm Treue,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204-5.
- 328 Peter Longerich, *The Unwritten Order: Hitler’s Role in the Final Solution* (Stroud, 2001), 155.
- 329 Alon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The Nazi Imagination from Persecution to Genocide* (New Haven, Conn., 2014), 195.
- 330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866-7, speech of 26 Apr. 1942. (英文部分是作者自己的翻譯。)
- 331 Gustavo Corni, *Hitler’s Ghettos: Voices from a Beleaguered Society 1939-1944* (London, 2002), 23-5.
- 332 Leni Yahil, *The Holocaust: 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1932-1945* (New York, 1990), 164.
- 333 Wolf Gruner, *Jewish Forced Labour under the Nazis: Economic Needs and Racial Aims, 1938-1944* (Cambridge, 2006), 232-52.
- 334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251-3.
- 335 Ibid., 267.
- 336 Lower, ‘The *reibungslose* Holocaust?’, 250.
- 337 Waitman Beorn, ‘A calculus of complicity: the Wehrmacht, the antipartisan war, and

- the Final Solution in White Russia 1941-42',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4 (2011), 3 11-13.
- 338 Christian Ingrao, *Believe and Destroy: Intellectuals in the SS War Machine* (Cambridge, 2013), 148-50.
- 339 Leonid Rein, 'The radicalization of anti-Jewish policies in Nazi-occupied Belarus', in Kay, Rutherford an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228.
- 340 Walter Manoschek, 'Serbien ist judenfrei': *Militäri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Judenvernichtung in Serbien 1941/42* (Munich, 1993), 102-8.
- 341 Alexander Kruglov, 'Jewish losses in Ukraine, 1941-1944', in Brandon and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278-9.
- 342 Stephen Lehnstaedt, 'The Minsk experience: German occupiers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capital of Belarus', in Kay, Rutherford an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244-5.
- 343 Corni, *Hitler's Ghettos*, 34-6.
- 344 Kruglov, 'Jewish losses in Ukraine', 275.
- 345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75.
- 346 Matthäus and Bajohr (eds.), *Political Diary of Alfred Rosenberg*, 263-4.
- 347 Christian Gerlach,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ambridge, 2016), 84-8 ; Wolf, 'Wannsee Conference', 165-6, 167-8.
- 348 Bertrand Perz,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the SS and police leader Odilo Globocnik and his staff in the Lublin distric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9 (2015), 400.
- 349 Bertrand Perz,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the SS and police leader Odilo Globocnik and his staff in the Lublin distric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9 (2015), 400.
- 350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90.
- 351 Dieter Pohl, 'The murder of Ukraine's Jews under Germ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in the Reich Commissariat Ukraine', in Brandon and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50-52.
- 352 Gruner, *Jewish Forced Labour*, 258-62, 270.
- 353 Frediano Sessi, *Auschwitz: Storia e memorie* (Venice, 2020), 279-80.
- 354 William Brustein and Amy Ronnkvist, 'The roots of anti-Semitism in Romania before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4 (2002), 212-19.
- 355 Dennis Deletant, 'Transnistria and the Romanian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 i



- n Brandon and Lower (eds.), *The Shoah in Ukraine*, 157-8; Clark, 'Fascists and soldiers', 409-10, 417-21; Waitman Beorn, *The Holocaust in Eastern Europe: At the Epicentre of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2018), 185-7.
- 356 Deletant, 'Transnistria', 172-9.
- 357 Eduard Nižňanský, 'Expropriation and deportation of Jews in Slovakia', in Beate Kosmola and Feliks Tych (eds.), *Facing the Nazi Genocide: Non-Jews and Jews in Europe* (Berlin, 2004), 210-23, 230.
- 358 Krisztian Ungváry, 'Robbing the dead: the Hungarian contribution to the Holocaust', in Kosmola and Tych (eds.), *Facing the Nazi Genocide*, 233-44; Pohl, 'The murder of Ukraine's Jews', 29-31.
- 359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114-15.
- 360 Frederick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40-1944* (Pittsburgh, Pa, 1972), 35-8, 41-4, 54-5, 58-9, 184-7; Beorn, *Holocaust in Eastern Europe*, 195-9.
- 361 Peter Staubenmaier, 'Preparation for genocide: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Jewish Problem" in Trieste, 1942-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Research*, 31 (2017), 2-4.
- 362 Jonathan Steinberg,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43* (London, 1991), 54-61.
- 363 Liliana Picciotto, 'The Shoah in Italy: its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in Joshua Zimmerman (ed.), *Jews in Italy under Fascist and Nazi Rule, 1922-1945* (Cambridge, 2005), 211-19.
- 364 Liliana Picciotto, 'Italian Jews who survived the Shoah: Jewish self help and Italian rescuers 1943-1945',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0 (2016), 20-28; Simon Levi and Sullam, 'The Italian executioners: revisiting the role of Italians in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1-7.
- 365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75-6.
- 366 Anne Grynberg, *Les camps de la honte: les internés juifs des camps français 1939-1944* (Paris, 1991), 151-3.
- 367 Michael Meyer, 'The French Jewish Statute of October 5 1940: a reevaluation of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of French anti-Semitis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3 (2019), 13.
- 368 Ibid., 6-7, 15.
- 369 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Oxford, 2001), 354-9.
- 370 Ibid., 362;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95-6.

- 371 Orna Keren-Carmel, 'Another piece in the puzzle: Denmark, Nazi Germany, and 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Holocaust Studies*, 24 (2018), 172-82; Gerlach,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01-3.
- 372 Simo Muir, 'The plan to rescue Finnish Jews in 19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0 (2016), 81-90.
- 373 Hugh Trevor-Roper (ed.),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London, 1959), 105, notes of 25 Apr. 1945

### 第三章 民族帝國的終結（1943-1945年）

- 1 Carl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Ōshima Hiroshi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s, 1993), 72.
- 2 Gerhard Krebs, 'Gibraltar oder Bosporus? Japans Empfehlungen für eine deutsche Mittelmeerstrategie im Jahre 194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8 (1999), 66-77.
- 3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94.
- 4 John Gooch, *Mussolini's War: Fascist Italy from Triumph to Collapse 1935-1943* (London, 2020), 325.
- 5 Ikuhiko Hata, 'Admiral Yamamoto's surprise attack and the Japanese war strategy', in Saki Dockrill (ed.), *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41-45* (London, 1994), 66.
- 6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92;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162;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2011), 38-43.
- 7 Ronald Lewin, *The Other Ultra: Codes, Ciphers, and the Defeat of Japan* (London, 1982), 85-106.
- 8 Craig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2018), 283-92; J. Tach, 'A beautiful silver waterfall', in E. T.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1993), 58.
- 9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332-3, 345-6.

- 10 Lucio Ceva, *Storia delle Forze Armate in Italia* (Turin, 1999), 315-17.
- 11 Niall Barr, *Pendulum of War: The Three Battles of El Alamein* (London, 2004), 12-13.
- 12 Ibid., 16-21.
- 13 Andrew Buchanan, 'A friend indeed? From Tobruk to El Alamein: the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victory in the desert', *Diplomacy & Statecraft*, 15 (2004), 279-89.
- 14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442, entry for 3 July 1942.
- 15 Bernd Wegner, 'Vom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Deutschlands Kriegführung zwischen Moskau und Stalingrad', in Jürgen Förster (ed.), *Stalingrad: Ereignis, Wirkung, Symbol* (Munich, 1992), 20-21.
- 16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 Conn., 2006), 123-4.
- 17 Robert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Lawrence, Kans, 2007), 102-8.
- 18 Wegner, 'Von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23-4;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108-14.
- 19 David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World War 2* (Novato, Calif., 1990), 49-51.
- 20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66.
- 21 Walther Hubatsch,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Munich, 1965), 227-30.
- 22 Mikhail Heller and Aleksandr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82), 391; David Glantz and Jonathan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Kans, 1995), 121.
- 23 Joachim Wieder, *Stalingrad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r Soldaten* (Munich, 1962), 45.
- 24 David Horner, 'Australia in 1942: a pivotal year', in Peter Dean (ed.), *Australia 1942: In the Shadow of War* (Cambridge, 2013), 18-20, 25.
- 25 Debi Unger and Irwin Unger, *George Marshall: A Biography* (New York, 2014), 173-6.
- 26 Mark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

- 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 2000), 76-8.
- 27 Maury Klein, *A Call to Arms: Mobilizing America for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13), 302-3; John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Chicago, Ill., 1996), 153-5;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48-50. 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二年三月的民調顯示，平均有百分之六十二的民眾支持專注對付日本，百分之二十一則是德國。
  - 28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83-4.
  - 29 Ibid., 197-8.
  - 30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9), 148-50.
  - 31 Matthew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942-44* (London, 1996), 19.
  - 32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150-55, 171-2; Roll, *The Hopkins Touch*, 204-8.
  - 33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88.
  - 34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153-4;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79-85;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172-7; Roll, *The Hopkins Touch*, 214-21; Andrew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4), 48-9.
  - 35 Hastings Ismay, *The Memoirs of Lord Ismay* (London, 1960), 279-80.
  - 36 這段描述來自於官方歷史：Frank Hough, *The Isl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the Pacific* (Philadelphia, Pa, 1947), 41, 61, 84-5.
  - 37 John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U.S.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95), 43-4; Richard Frank, *Guadalcanal* (New York, 1990), 33-44.
  - 38 David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Thomas Holcomb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arine Corps, 1936-1943* (Annapolis, Md, 2011), 130-32.
  - 39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46-50; Hough, *Island War*, 45-8.
  - 40 Meirion Harries and Susie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London, 1991), 339-40.
  - 41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328-9.
  - 42 Ibid., 366-71; Trent Hone, “‘Give them hell’: the US Navy’s night combat doctrine and the campaign for Guadalcanal”, *War in History*, 13 (2006), 188-95.
  - 43 Frank, *Guadalcanal*, 559-61, 588-95.



- 44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341-2; Hough, *Island War*, 79-85; Frank, *Guadalcanal*, 611-13; Francis Pike, *Hirohito's War: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London, 2016), 574-5. Frank提出的日軍死亡人數略微偏少，有三萬零三百四十三人。
- 45 Frank, *Guadalcanal*, 618-19
- 46 Ashley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Iran and Iraq* (New Haven, Conn., 2018), 254.
- 47 Glyn Harper, ““No model campaign”: the Second New Zealand Division and the Battle of El Alamein, October-December 1942’, in Jill Edwards (ed.), *El Alamein and the Struggle for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iro, 2012), 88.
- 48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The War Narrative of Major-General Sir John Kennedy* (London, 1957), 251.
- 49 Gooch, *Mussolini's War*, 312-13.
- 50 Jonathan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The British and Commonwealth Armi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9), 179-80.
- 51 Nigel Hamilton, *Monty: Master of the Battlefield 1942-1944* (London, 1983), 9; Harper, ““No model campaign””, 75.
- 52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268-9.
- 53 Richard Hammond, *Strangling the Axis: The Fight for Control of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20), 141-3.
- 54 Barr, *Pendulum of War*, 218-19.
- 55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268;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13-14.
- 56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256.
- 57 Horst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Der globale Krieg* (Stuttgart, 1990), 694.
- 58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243.
- 59 Peter Stanley, ““The part we played in this show”: Australians and El Alamein’, in Edwards (ed.), *El Alamein*, 60-66談澳洲的經驗。 ““No model campaign””, 73-5, 86-8, 談紐西蘭師。
- 60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246-54;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276-8, 283-90.

- 61 Buchanan, 'A friend indeed?', 289-91.
- 62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301; Ceva, *Storia delle Forze Armate in Italia*, 3 19-20;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694, 提到英國皇家空軍在中東戰場擁有超過一千五百架飛機。
- 63 Barr, *Pendulum of War*, 276-7; Richard Carr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ighting power of the Italian Army in North Africa, 1940-1943', *War in History*, 22 (2015), 508-9, 516; Domenico Petracarro, 'The Italian Army in Africa 1940-1943: an attempt at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r & Society*, 9 (1991), 115-16.
- 64 Rick Stroud, *The Phantom Army of Alamein: The Men Who Hoodwinked Rommel* (London, 2012), 183-209. 這個佯攻計畫在第五章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 65 Simon Ball, *Alamein* (Oxford, 2016), 16-22.
- 66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308-12; Ball, *Alamein*, 37-41; Barr, *Pendulum of War*, 398-401.
- 67 Barr, *Pendulum of War*, 404; Ceva, *Storia delle Forze Armate in Italia*, 320; Ball, *Alamein*, 47; Gooch, *Mussolini's War*, 322.
- 68 Barr, *Pendulum of War*, 406-7.
- 69 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Kans, 2005), 37.
- 70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965-6;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54.
- 71 Citino, *Death of the Wehrmacht*, 257.
- 72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181-7.
- 73 Alexander Statiev, *At War's Summit: The Red Army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Caucasus Mountain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8), 130-31, 264.
- 74 Roberts, *Stalin's Wars*, 142.
- 75 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London, 2005), 205-7.
- 76 Alexander Hill, *The Red Arm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7), 392-3.
- 77 Stephen Fritz,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Ky, 2011), 291-2.
- 78 Wegner, 'Vom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32.
- 79 Vasily Chuikov, *The Beginning of the Road: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 (L

- ondon, 1963), 14-27, 93-102.
- 80 Fritz, *Ostkrieg*, 295.
  - 81 Roberts, *Stalin's Wars*, 145-7.
  - 82 Kurt Zeitzler, 'Stalingrad', in William Richardson and Seymour Frieden (eds.), *The Fatal Decisions* (London, 1956), 138.
  - 83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6*, 995-7.
  - 84 Hill, *Red Army*, 395-7; Roberts, *Stalin's Wars*, 151.
  - 85 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London, 1975), 447-53; Glantz and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133-4.
  - 86 Williamson Murray, *Luftwaffe: Strategy for Defeat* (London, 1985), 141-4.
  - 87 Fritz, *Ostkrieg*, 316.
  - 88 Ibid., 319-20.
  - 89 Ibid., 318-19.
  - 90 Thomas Kohut and Jürgen Reulecke, "'Sterben wie eine Ratte, die der Bauer ertappt': Letzte Briefe aus Stalingrad", in Förster (ed.), *Stalingrad*, 464.
  - 91 蘇聯損失的估計數字出自G.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7), 124-8; 德國損失的估計數字出自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2004), 279; 義大利損失的估計數字出自Gooch, *Mussolini's War*, 296.
  - 92 David Glantz, 'Counterpoint to Stalingrad: Operation "Mars" (November-December 1942):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defeat', *Journal of Slavic Strategic Studies*, 10 (1997), 105-10, 117-18, 133
  - 93 *La Semaine*, 4 Feb. 1943, p. 6.
  - 94 TNA, WO 193/856, Military attaché Ankara to the War Office, 23 July 1943.
  - 95 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London, 2005), 91, 130, 133.
  - 96 Fabio De Ninno, 'The Italian Navy and Japan: the Indian Ocean, failed cooperation, and tripartite relations', *War in History*, 27 (2020), 231-40, 245.
  - 97 Bernd Martin, 'The German-Japanese alli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Dockrill (ed.),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158-9.
  - 98 Rotem Kowner, 'When economics, strategy, and racial ideology meet: inter-Axis connections in the wartim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2017), 237-42;

Bernd Martin, 'Japan und Stalingrad: Umorientierung vom Bündnis mit Deutschland auf "Grossostasien"', in Förster, *Stalingrad*, 242-6.

- 99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38-9.
- 100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72-4; Martin Thomas and Richard Toye, *Arguing about Empire: Imperial Rhetoric in Britain and France, 1882-1956* (Oxford, 2017), 184-6.
- 101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75-6.
- 102 Ibid., 33.
- 103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70.
- 104 Ibid., 76-80.
- 105 Ibid., 21;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17;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45-6.
- 106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68.
- 107 Marco Aterrano, 'Prelude to Casablanca: British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metropolitan Ital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llied invasion of Sicily, 1940-1941', *War in History*, 26 (2019), 498-507.
- 108 Steve Weiss, *Allies in Conflict: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 1938-1944* (London, 1996), 70-71.
- 109 Gooch, *Mussolini's War*, 342-5;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Dall'impero d'Etiopia alla disfatta* (Turin, 2005), 358.
- 110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50-52.
- 111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317-18;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94. 俘虜的人數存在著不同的估計數字，從二十二萬人到二十七萬五千人，但目前看來較高的數字較為可信。
- 112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23-4.
- 113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57-9; David Jablonsky, *War by Land, Sea and Air: Dwight Eisenhower and the Concept of Unified Command* (New Haven, Conn., 2010), 95-6.
- 114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24-5.
- 115 Alfred Chandler (ed.), *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The War Years: IV* (Baltimore, Va, 1970), 1129, Eisenhower to Marshall, 13 May 1943.
- 116 Gooch, *Mussolini's War*, 378-80.



- 117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38-9;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18.
- 118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62.
- 119 Gooch, *Mussolini's War*, 383.
- 120 Philip Morgan, *The Fall of Mussolini* (Oxford, 2007), 11-17, 23-6.
- 121 Eugen Dollmann, *With Hitler and Mussolini: Memoirs of a Nazi Interpreter* (New York, 2017), 219.
- 122 Helmut Heiber and David Glantz (eds.),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Military Conferences 1942-45* (London, 2002), 252, 255, Meeting of the Führer with von Kluge, 26 July 1943.
- 123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98; Gooch, *Mussolini's War*, 389, 404.
- 124 Elena Rossi, *Cefalonia: La resistenza, l'eccidio, il mito* (Bologna, 2016), 53-60, 113-15.
- 125 Lutz Klinkhammer, *L'occupazione tedesca in Italia, 1943-1945* (Turin, 1996), 48-54; Frederick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2 vols. (Turin, 1963), ii, 740-48.
- 126 Deakin,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Salò*, ii, 766, 776-8, 817.
- 127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46-8.
- 128 Ibid., 150, Montgomery diary entry for 26 Sept. 1943.
- 129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54-8; Carlo D'Este, *Eisenhower: Allied Supreme Commander* (London, 2002), 452-3.
- 130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94-6.
- 131 Ibid., 163-4;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88-9.
- 132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94-5, 98-9.
- 133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475.
- 134 Pike, *Hirohito's War*, 671-2, 695;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56-61.
- 135 Pike, *Hirohito's War*, 680-91, 695.
- 136 Hough, *Island War*, 126.
- 137 Ibid., 146.
- 138 Ibid., 145.
- 139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17.
- 140 Ibid., 193-4.
- 141 Ibid., 193-204.

- 142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162.
- 143 David Reynolds and Vladimir Pechatnov (eds.), *The Kremlin Letters: Stalin's Wartime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New Haven, Conn., 2018), 263-9, Churchill to Stalin, 20 June 1943; Stalin to Churchill, 24 June 1943.
- 144 Roberts, *Stalin's Wars*, 165-6.
- 145 Reynolds and Pechatnov, *Kremlin Letters*, 354; Roberts, *Stalin's Wars*, 180.
- 146 Reynolds and Pechatnov, *Kremlin Letters*, 269.
- 147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252-6.
- 148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93-4.
- 149 Fritz, *Ostkrieg*, 336-8.
- 150 Roman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 Die Schlacht bei Kursk', *Militärgeschichtliche Zeitschrift*, 61 (2002), 373-4.
- 151 Valeriy Zamulin, 'Could Germany have won the Battle of Kursk if it had started in late May or the beginning of June 194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 (2014), 608-9; Lloyd Clark, *Kursk: The Greatest Battle* (London, 2011), 188-90.
- 152 Georgii Zhukov,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Volume II* (Moscow, 1985), 168-79; Konstantin Rokossovskii, *A Soldier's Duty* (Moscow, 1970), 184-90; Clark, *Kursk*, 211.
- 153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76-8; Fritz, *Ostkrieg*, 339-40.
- 154 Clark, *Kursk*, 199; Fritz, *Ostkrieg*, 343. 其中兩百輛是豹式，一百二十八輛是虎式。
- 155 William Spahr, *Zhukov: 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 Calif., 1993), 119-21.
- 156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100-103; Zhukov, *Reminiscences*, 180-83.
- 157 Hill, *Red Army*, 439-40; Von Hardesty and Ilya Grinberg, *Red Phoenix Rising: The Soviet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2), 226 關於空軍的數字; Alexander Vasilevskii,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Battle of Kursk', in *The Battle of Kursk* (Moscow, 1974), 73. 略微不同的數字見 Clark, *Kursk*, 204.
- 158 Fritz, *Ostkrieg*, 343.
- 159 Charles Sydnor, *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SS Death's Head Division 1933-1945* (Princeton, NJ, 1977), 233-8.
- 160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81-5; Hill, *Red Army*, 450-52; Fritz, *Ostkrieg*, 349-50.

- 161 Valeriy Zamulin, 'Soviet troop losses in the Battle of Prochorovka, 10-16 July 194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2019), 119-21.
- 162 Clark, *Kursk*, 402.
- 163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89-92; Clark, *Kursk*, 399-402.
- 164 Hill, *Red Army*, 454; Fritz, *Ostkrieg*, 367; Töppel, 'Legendenbildung', 396-9.
- 165 Fritz, *Ostkrieg*, 378.
- 166 Hill, *Red Army*, 466.
- 167 Alexander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 (London, 1964), 752-4.
- 168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273-5.
- 169 Boris Sokolov, *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Eastern Front: Reassess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Barnsley, 2019), x.
- 170 Glantz, *Colossus Reborn*, 60-62.
- 171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165-6; Theodore Wilson, 'Coalition: structure, strategy and statecraft',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98.
- 172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2017), 533;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53.
- 173 Buchan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159.
- 174 Sally Burt, 'High and low tid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summit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9 (2018), 175-8.
- 175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9), 247-8.
- 176 Valentin Berezhkov, *History in the Making: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Diplomacy* (Moscow, 1983), 282.
- 177 Ibid., 287; Keith Eubank, *Summit at Teheran* (New York, 1985), 350-51.
- 178 Wenzhao Tao, 'The China theatre and the Pacific war', in Dockrill (ed.),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137-41.
- 179 Taylor, *Generalissimo*, 256-61.
- 180 Alex Danchev and Daniel Todman (eds.), *War Diaries 1939-1945: Lord Alanbrooke* (London, 2001), 458, 490, entries for 7 Oct., 3 Dec. 1943.
- 181 Keith Sainsbury, *The Turning Point: Roosevelt, Stalin, Churchill, Chiang Kai-Shek*,

- 1943 (Oxford, 1986), 288-96.
- 182 John Buckley, *Monty's Men: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Liberation of Europe* (New Haven, Conn., 2013), 253-4.
- 183 Hough, *Island War*, 298-300; Waldo Heinrichs and Marc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War in the Pacific 1944-1945* (New York, 2017), 160-63.
- 184 Douglas Delaney, 'The Eighth Army at the Gothic Line, August-September 1944: a study of staff compatibility and coalition command', *War in History*, 27 (2020), 288-90.
- 185 Wang Qisheng, '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Ichigō', in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Battle for China*, 404-10; Hara Takeshi, 'The Ichigō Offensive', *ibid.*, 392-5.
- 186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2013), 327-9.
- 187 Hara, 'Ichigō Offensive', 399-401; Wang, 'Battle of Hunan', 410-12.
- 188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4), 381-2, 388.
- 189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London, 2016), 427-8.
- 190 Taylor, *Generalissimo*, 280-86.
- 191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334-5;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Battle for China*, 46.
- 192 Louis Allen and David Steeds,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45', in Dockrill (ed.),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114.
- 193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08-9.
- 194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62-7.
- 195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34-5.
- 196 Richard Muller, 'Air war in the Pacific, 1941-1945', in John Olsen (ed.), *A History of Air Warfare* (Washington, DC, 2010), 69-70.
- 197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103-8.
- 198 Hough, *Island War*, 245-6.
- 199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115-23;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43-7.



- 200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157.
- 201 Frederick Morgan, *Overture to Overlord* (London, 1950), 134-6, 142-4; John Ehrman, *Grand Strategy: Volume V: August 1943 to September 1944* (London, 1946), 54-6.
- 202 TNA, AIR 8/1103, CCS meeting minutes, 4 June 1943; Charles Webster and Noble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Volume IV* (London, 1961), 160, Directive to Harris, 3 Sept. 1943.
- 203 TNA, AIR 14/783, Portal to Harris encl. 'Extent to which the Eighth U.S.A.A.F and Bomber Command have been able to implement the G.A.F. Plan', p. 1.
- 204 TNA, AIR 14/739A, 'Conduct of the Strategic Bomber Offensive before Preparatory Stage of "Overlord"', 17 Jan. 1944; LC, Spaatz Papers, Box 143, Arnold to Spaatz, 24 Apr. 1944.
- 205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Maxwell, Ala, Disc A1722, 'Army Air Force's Evaluation Board, Eighth Air Force "Tactical Development August 1942-May 1945"', pp. 50-55; Stephen McFarland and Wesley Newton, *To Command the Sky: The Battle for Air Superiority over Germany, 1942-44* (Washington, DC, 1991), 141, 164-6.
- 206 Horst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7: Das Deutsche Reich in der Defensive* (Stuttgart, 2001), 11; Richard Davis, *Carl A. Spaatz and the Air War in Europe* (Washington, DC, 1993), 322-6, 370-79; Murray, *Luftwaffe*, 215.
- 207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7*, 293. 一百九十八架可用的轟炸機。
- 208 Günter Bischof and Rolf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in Günter Bischof and Wolfgang Krieger (eds.), *Die Invasion in der Normandie 1944* (Innsbruck, 2001), 68.
- 209 Ian Gooderson, *A Hard Way to Make a War: The Italian Campaig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8), 260;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54-6.
- 210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87-8.
- 211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57.
- 212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88-90;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68-71.
- 213 James Parton, 'Air Force Spoken Here': *General Ira Eaker and the Command of the Air* (Bethesda, Md, 1986), 363-5.

- 214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71-8; Peter Caddick-Adams, *Monte Cassino: Ten Armies in Hell* (London, 2012), 211-12.
- 215 Caddick-Adams, *Monte Cassino*, 225-7;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473-5.
- 216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63-5;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78-9.
- 217 Stephen Roskill, *The War at Sea: Volume IV* (London, 1961), 25-8.
- 218 TNA, AIR 37/752, Harris memorandum, 'The Employment of the Night Bomber For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Continent', 13 Jan. 1944; LC, Spaatz Papers, Box 143, Spaatz to Eisenhower [n.d. but April 1944].
- 219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Soldier and President* (New York, 1991), 126; Davis, *Carl A. Spaatz*, 336-8.
- 220 Andrew Knapp and Claudia Baldoli, *Forgotten Blitzes: France and Italy under Allied Air Attack, 1940-1945* (London, 2012), 29; 死亡數字出自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574.
- 221 Wesley Craven and James Cate,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III* (Chicago, Ill., 1983), 158. 關於橋樑的轟炸，見Stephen Bourque, *Beyond the Beach: The Allied War against France* (Annapolis, Md, 2018), ch. 9.
- 222 Detlef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auf eine alliierte Invasion im Westen', in Bischof and Krieger (eds.), *Die Invasion in der Normandie*, 52.
- 223 Bischof and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56.
- 224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45; Olivier Wieviorka, *Histoire du Débarquement en Normandie: Des origines à la libération de Paris 1941-1944* (Paris, 2007), 191-3.
- 225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46-8.
- 226 Gordon Harrison, *Cross Channel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51), 154-5, 249-52; Friedrich Ruge, *Rommel und die Invasion: Erinnerungen von Friedrich Ruge* (Stuttgart, 1959), 174-5.
- 227 Danchev and Todman (eds.), *War Diaries*, 554, entry for 5 June 1944.
- 228 D'Este, *Eisenhower*, 518-22.
- 229 Eberle and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149.
- 230 *Report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on the Operations in Europe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London, 1946), 32
- 231 Vogel, 'Deutsche Vorbereitungen', 50-51; Bischof and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66.

232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534.

233 Volker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1939-45* (London, 2020), 427-9.

234 Alistair Horne and David Montgomery, *The Lonely Leader: Monty, 1944-1945* (London, 1994), 207; L. Ellis, *Victory in the West: Volume I: The Battle for Normandy* (London, 1962), 329-30.

235 Percy Schramm (ed.),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4 vols. (Munich, 1963), iv, 326; Eddy Bauer, *Der Panzerkrieg*, 2 vols. (Bonn, 1965), ii, 104-5, 125-6; John English, *The Canadian Army and the Normandy Campaign* (New York, 1991), 227-31.

236 Joachim Ludewig, *Rückzug: The German Retreat from France, 1944* (Lexington, Ky, 2012), 34-5, 40.

237 Ralph Bennett, *Ultra in the West: The Normandy Campaign of 1944 to 1945* (London, 1979), 112-16; Martin Blumenson, *Breakout and Pursuit: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notes to pp. 309-323 907DC, 1961), 457-65.

238 KlausJürgen Müller, 'Die Zusammenbruch des deutschen Westheeres: Die operative Entwicklung im Bereich der Heeresgruppe B Juli bis Ende August', in Michael Salewski and Guntram SchulzeWegener (eds.), *Kriegsjahr 1944: im Grossen und im Kleinen* (Stuttgart, 1995), 31-2.

239 D'Este, *Eisenhower*, 572.

240 Milton Shulman, *Defeat in the West* (London, 1947), 175.

241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83.

242 Ludewig, *Rückzug*, 58-62.

243 D'Este, *Eisenhower*, 567.

244 Ludewig, *Rückzug*, 73.

245 關於戴高樂與戰鬥法國的角色，見Wieviorka, *Histoire du Débarquement*, 402-8.

246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565.

247 Bischof and Steininger, 'Die Invasion aus der Sicht von Zeitzeugen', 65.

248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78), 440-41.

249 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London, 1983), 253; David Glantz, 'The red mask: the nature and legacy of Soviet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 d World War', in Michael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7), 213-17; S. L. Sokolov and John Erickson, *Main Front: Soviet Leaders Look Back o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87), 177-8, 192.
- 250 Stephen Fritz, *The First Soldier: Hitler as Military Leader* (New Haven, Conn., 2018), 320-21; Gerd Niepold, 'Die Führung der Heeresgruppe Mitte von Juni bis August', in Salewski and Schulze-Wegener (eds.), *Kriegsjahr 1944*, 61-3; Rolf Hinze, 'Der Zusammenbruch der Heeresgruppe Mitte', *ibid.*, 97.
- 251 Fritz, *First Soldier*, 296; 蘇聯的資料提出的數字較少，見Hinze, 'Der Zusammenbruch der Heeresgruppe Mitte', 79-80.
- 252 Paul Winterton, *Report on Russia* (London, 1945), 23.
- 253 Karl-Heinz Fries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8: Die Ostfront 1943/44* (Munich, 2007), 814-15.
- 254 Oula Silvennoinen, 'Janus of the North? Finland 1940-44', in John Gilmour and Jill Stephenson (eds.), *Hitler's Scandinavian Legacy* (London, 2013), 141-2; Juhana Aunessuoma, 'Two shadows over Finland: Hitler, Stalin and the Finns fac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history 1944-2010', *ibid.*, 205-7.
- 255 Deborah Cornelius, *Hungary in World War II: Caught in the Cauldron* (New York, 2011), 256-9, 271-80.
- 256 Peter Sipos, 'The fascist Arrow Cross government in Hungary (October 1944-April 1945)', in Wolfgang Benz,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and Gerhard Otto (eds.), *Die Bürokratie der Okkupation: Strukturen der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im besetzten Europa* (Berlin, 1998), 50, 53-5.
- 257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62-3.
- 258 Theodore Hamerow, *On the Road to the Wolf's Lair: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 1997), 320-21; 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Oxford, 1992), 432-3.
- 259 Randall Hansen, *Disobeying Hitler: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Last Year of WWII* (London, 2014), 38-44.
- 260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475-7.
- 261 Sönke Neitzel, *Tapping Hitler's Generals: Transcripts of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2-45* (Barnsley, 2007), 263, 記錄了一段父子的對話。Gen. Heinz Eberbach and Lt Heinz Eugen Eberbach, 20/21 Sept. 1944.
- 262 Nick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 (London, 2016), 4



- 52-3; Ian Kershaw, *The End: Hitler's Germany 1944-45* (London, 2011), 31-3.
- 263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51-2, 59-60, 71-4.
- 264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Essays on History, Race and Culture* (London, 1993), 102-7.
- 265 Ibid., 129.
- 266 Frank Gibney (ed.), *Sensō: The Japanese Remember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2007), 169-78;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Kans, 2015), 163-72.
- 267 Alfons Kenkmann, 'Zwischen Nonkonformität und Widerstand', in Dietmar Süß and Winfried Süß (eds.), *Das 'Dritte Reich': Eine Einführung* (Munich, 2008), 150-52.
- 268 Kershaw, *The End*, 36-7.
- 269 Hansen, *Disobeying Hitler*, 209-10.
- 270 Ralf Bank, *Bitter Ends: Die letzten Mona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m Ruhrgebiet, 1944/45* (Essen, 2015), 232.
- 271 Michael Sellmann, 'Propaganda und SD -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in Salewski and SchulzeWegener (eds.), *Kriegsjahr 1944*, 207-8.
- 272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477-80.
- 273 Benjamin Uchigama, *Japan's Carnival War: Mass Culture on the Home Front 1937-1945* (Cambridge, 2019), 241.
- 274 Ibid., 242-3.
- 275 Aaron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2013), 237-8.
- 276 Thomas Kühn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radeship: Hitler's Soldiers, Male Bonding and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2017), 160, 171.
- 277 Thomas Brooks, *The War North of Rome: June 1944-May 1945* (New York, 1996), 363.
- 278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476.
- 279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2006), 257-61.
- 280 Robert Kramm, 'Haunted by defeat: imperial sexualities, prostit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8 (2017), 588-91.
- 281 Richard Frank, *Downfall: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Empire* (New York, 1999)

- 9), 188-90.
- 282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456-7; Stephen Fritz, *Endkamp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the Death of the Third Reich* (Lexington, Ky, 2004), 91.
- 283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358.
- 284 Klein, *A Call to Arms*, 681-6.
- 285 Daniel Todman, *Britain's War: A New World 1943-1947* (London, 2020), 582, 591, 654.
- 286 Martha Gellhorn, *The Face of War from Spain to Vietnam* (London, 1967), 142.
- 287 Geoffrey Picot, *Accidental Warrior: In the Front Line from Normandy till Victory* (London, 1993), 196-7, 201.
- 288 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II* (London, 2003), 93-9.
- 289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45* (London, 2005), 230-32, 242-3.
- 290 Klein, *A Call to Arms*, 676-83, 717-19.
- 291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424-6.
- 292 Todman, *Britain's War*, 655-6.
- 293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422.
- 294 Fritz, *First Soldier*, 336-7.
- 295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342.
- 296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196-7.
- 297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76.
- 298 Tohmatsu Haruo,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in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Battle for China*, 438-9.
- 299 Christopher Baxter, 'In pursuit of a Pacific strategy: British planning for the defeat of Japan, 1943-45', *Diplomacy & Statecraft*, 15 (2004), 254-7; Nicholas Sarantakes, 'The Royal Air Force on Okinawa: the diplomacy of a coalition on the verge of victory', *Diplomatic History*, 27 (2003), 481-3.
- 300 Mark Jacobsen, 'Winston Churchill and a Third Fro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4 (1991), 349-56.
- 301 Todman, *Britain's War*, 673; Sarantakes, 'Royal Air Force on Okinawa,' 486.
- 302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150-54.

- 303 Ibid., 180-90.
- 304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585-7.
- 305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115, Eisenhower to all commanders, 4 Sept. 1944.
- 306 Ibid., 2143-4, Eisenhower to Marshall, 14 Sept. 1944; Eisenhower to Montgomery, 15 Sept. 1944.
- 307 Gooderson, *Hard Way to Make a War*, 281-4.
- 308 Brooks, *The War North of Rome*, 254-8, 304.
- 309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125-7, Eisenhower to the CCS, 9 Sept. 1944.
- 310 Buckley, *Monty's Men*, 240.
- 311 Fennell,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582.
- 312 D'Este, *Eisenhower*, 626-7.
- 313 Ludewig, *Rückzug*, 206-7.
- 314 Alistair Noble, *Nazi Rule and the Soviet Offensive in Eastern Germany 1944-1945* (Eastbourne, 2009), 102-17.
- 315 Bastiann Willems, 'Defiant breakwaters or desperate blunders? A revision of the German latewar fortress strategy',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353-8.
- 316 Fritz, *Ostkrieg*, 432-4;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303-5. 蘇聯表示，一九四五年五月庫爾蘭德軍投降時，總共被俘虜了二十七萬四千人。
- 317 Krisztián Ungváry, *Battle for Budapest: 100 Days in World War II* (London, 2019), 4-6, 49-56.
- 318 Ibid., 330-31.
- 319 Ludewig, *Rückzug*, 204-5.
- 320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507.
- 321 Ibid., 508.
- 322 Ibid., 509.
- 323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London, 1964), 486; Ullrich, *Hitler: Downfall*, 514.
- 324 Buckley, *Monty's Men*, 259; Chandler,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355, Eisenhower to Brehon Somervell, 17 Dec. 1944.
- 325 D'Este, *Eisenhower*, 635-6.

- 326 Charles MacDonald,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London, 1984), 608; British Air Minis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1933-1945* (London, 1986), 376-80.
- 327 Richard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London, 1980), 77.
- 328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407, Eisenhower to the CCS.
- 329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487-9.
- 330 Jablonsky, *War by Land, Sea and Air*, 129-30.
- 331 D'Este, *Eisenhower*, 658; Harry Butcher, *Three Years with Eisenhower: The Personal Diary of Captain Harry C. Butcher, 1942-1945* (London, 1946), 626-8.
- 332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419, Eisenhower to Marshall, 10 Jan. 1945.
- 333 Heinrich Schwendemann, 'Strategie der Selbstvernichtung: Die Wehrmachtführung im "Endkampf" um das "Dritte Reich"', in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 228.
- 334 Hough, *Island War*, 732-3.
- 335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223.
- 336 Michael Geyer, 'Endkampf 1918 and 1945: German nationalism, annihilation, and selfdestruction', in Alf Lüdtke and Bernd Weisbrod (eds.), *No Man's Land of Violence: Extreme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Göttingen, 2006), 45-51.
- 337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Letters and Notes* (New York, 1974), 346-50.
- 338 Boog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7*, 105.
- 339 Davis, *Carl A. Spaatz*, Appdx. 8; Henry Probert, *Bomber Harris: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2006), 305-6.
- 340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174-6, Directive from Bottomley to Harris, 13 Oct. 1944; pp. 177-9, '1st November 1944: Directive No. 2 for the Strategic Air Forces in Europe'.
- 341 Overy, *The Bombing War*, 391-4.
- 342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325.
- 343 S. M. Plokhy,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2010), 330.
- 344 Roberts, *Stalin's Wars*, 235; Plokhy, *Yalta*, xxv.
- 345 Fraser Harbutt, *Yalta 1945: Europe and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 2010), 305, 313-17.



- 346 Plokhy, *Yalta*, 331-4, 343-4.
- 347 Richard Bessel, *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 (New York, 2009), 21-2.
- 348 Brooks, *War North of Rome*, 371; L. P. Devine, *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 in North west Europe, 1944-5* (London, 2016), 163-7.
- 349 Bessel, *Germany 1945*, 17-18.
- 350 Martin Moll (ed.), *FührerErlasse: 1939-1945* (Stuttgart, 1997), 486-7, 'Zerstörungs massnahmen im Reichsgebiet', 19 Mar. 1945.
- 351 Buckley, *Monty's Men*, 278; D'Este, *Eisenhower*, 681.
- 352 Buckley, *Monty's Men*, 286.
- 353 Kershaw, *The End*, 304-5.
- 354 D'Este, *Eisenhower*, 683, 696-7.
- 355 Fritz, *Endkampf*, 15-19.
- 356 Chandler (ed.),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2569, Eisenhower to the CCS, 31 Mar. 1945.
- 357 Fritz, *Endkampf*, 40-41.
- 358 Brooks, *The War North of Rome*, 363-6.
- 359 Merridale, *Ivan's War*, 243.
- 360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355-6.
- 361 Hill, *Red Army*, 523-31.
- 362 Zhukov, *Reminiscences*, 353-5.
- 363 Ivan Konev, *Year of Victory* (Moscow, 1969), 171-2;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 8 09-11.
- 364 Eberle and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219.
- 365 Moll (ed.), *FührerErlasse*, 495-6, Directive, 24 Apr. 1945.
- 366 Ibid., 241, footnote 2.
- 367 Geyer, 'Endkampf 1918 and 1945', 51.
- 368 Alvin Coox, 'Strategic bombing in the Pacific 1942-1945', in R. Cargill Hall (ed.), *Case Studies in Strategic Bombardment* (Washington, DC, 1998), 296-7. 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日本轟炸機持續攻擊B-29機場。
- 369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231-3.
- 370 Ibid., 248-55.

- 371 Ibid., 255-6.
- 372 Ibid., 358-9.
- 373 Ibid., 265-6.
- 374 Hough, *Island War*, 342-3.
- 375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281-3;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606.
- 376 Frank, *Downfall*, 69-70.
- 377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619-26.
- 378 Frank, *Downfall*, 70.
- 379 Ibid., 271;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400-401.
- 380 Theodore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49), 523.
- 381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46), 180-81; Akira Hari,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245;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453.
- 382 Barrett Tillman, *Whirlwind: The Air War against Japan 1942-1945* (New York, 2010), 139-45.
- 383 Coox, 'Strategic bombing in the Pacific', 317-21.
- 384 Ibid., 340-48.
- 385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 'Summary Report', Washington, DC, 1 July 1946, p. 19.
- 386 Frank, *Downfall*, 84-5, 182-4.
- 387 Ibid., 96-8.
- 388 Thomas Hall, "'Mere drops in the ocean": the politics and planning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o the final defeat of Japan, 1944-45', *Diplomacy & Statecraft*, 16 (2005), 101-4, 109.
- 389 Sarantakes, 'Royal Air Force on Okinawa', 479.
- 390 Barton Bernstein, 'Truman and the Abomb: targeting non-combatants, using the bomb, and his defending his "decision"',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2 (1998), 551-4.
- 391 Frank, *Downfall*, 134-45.
- 392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15.

- 393 Elena Agarossi, *A Nation Collapses: The Italian Surrender of September 1943* (Cambridge, 2000), 14-22.
- 394 David Ellwood, *Italy 1943-1945* (Leicester, 1985), 22-3.
- 395 Agarossi, *A Nation Collapses*, 14-26.
- 396 Ibid., 28-32.
- 397 Ibid., 64-72, 80-87; Morgan, *Fall of Mussolini*, 91-3; D'Este, *Eisenhower*, 449-52.
- 398 Ellwood, *Italy*, 41-6.
- 399 Marc Trachtenbe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 1945: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0 (2008), 106, 124-31.
- 400 Allen Dulles, *The Secret Surrender* (London, 1967), 97-100, 177-8.
- 401 Reyonolds and Pechatnov (eds.), *The Kremlin Letters*, 570-71, 578-9, Stalin to Roosevelt 3 Apr. 1945; Stalin to Roosevelt, 7 Apr. 1945.
- 402 TNA, WO 106/3974, Military Mission Moscow to AGWAR, 24 Apr. 1945; Moscow Mission to SHAEF, 25 Apr. 1945.
- 403 Giorgio Bocca, *Storia dell'Italia partigiana, settembre 1943-maggio 1945* (Milan, 1995), 506, 519-20; Max Corvo, *OSS Italy 1942-1945: A Personal Memoir of the Fight for Freedom* (New York, 2005), 267-9.
- 404 J. Lee Ready, *Forgotten Allies: Volume 1, European Theater* (Jefferson, NC, 1985), 426-7.
- 405 TNA, CAB 106/761, Instrument of Local Surrender of German and Other Forces, 29 Apr. 1945; PREM 3/198/3, Churchill cable to Stalin, 29 Apr. 1945.
- 406 TNA, PREM 3/198/3, Alexander to Eisenhower, 2 May 1945; Richard Lamb, *War in Italy 1943-1945: A Brutal Story* (London, 1993), 293-5; Bocca, *Storia dell'Italia partigiana*, 523.
- 407 David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SOE and Italy 1943-1945* (London, 2011), 325; Bocca, *Storia dell'Italia partigiana*, 521-2; Lamb, *War in Italy*, 262-5.
- 408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318-19.
- 409 TNA, PREM 3/193/6°, JIC report 'German strategy and capacity to resist', 16 Oct. 1944, p. 2.
- 410 Eberle and Uhl (eds.), *The Hitler Book*, 269.
- 411 Dulles, *Secret Surrender*, 176-8.
- 412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239.

- 413 Brendan Simms, *Hitler: Only the World was Enough* (London, 2019), 516; TNA, FO 1005/1701, CCG (British Element), Bulletin of the Intelligence Bureau, 28 Feb. 1946, interrogation of von Below (Hitler's air adjutant).
- 414 Dulles, *Secret Surrender*, 178.
- 415 TNA, PREM 3/197/4, telegram from John Deane to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7 May 1945.
- 416 Kershaw, *The End*, 367-70.
- 417 TNA, WO 106/4449, Moscow embassy to Foreign Office, 12 May 1945; Eisenhower to the CCS, 7 May 1945.
- 418 John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London, 1981), 221-2;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0), 498-9.
- 419 TNA, PREM 3/197/4, minute from Churchill to Orme Sargent, Foreign Office, 14 May 1945; Foreign Office minute on General Busch, 12 May 1945.
- 420 Richard Overy, "The chap with the closest tabs": Trevor-Roper and the hunt for Hitler', in Blair Worden (ed.), *Hugh Trevor-Roper: The Historian* (London, 2016), 192-206.
- 421 TNA, WO 219/2086, SHAEF G-3 Report, 'Arrest of members of Acting German Government', 23 May 1945.
- 422 Gerhard Krebs, 'Operation Super-Sunrise? Japanese-United States peace feelers in Switzerland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9 (2005), 1081, 1087, 1115-17.
- 423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77-8, 81.
- 424 Krebs, 'Operation Super-Sunrise?', 1087-96.
- 425 關於這個想法,更完整的說明見Yukiko Koshiro, 'Eurasian eclipse: Japan's end game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 (2004), 417-26, 434-7.
- 426 Jeremy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5 (2013), 209-10, 213-14.
- 427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85;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14.
- 428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23-6.
- 429 Eric Fowler, 'Willtofight: Japan's imperial instit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 end World War II', *War & Society*, 34 (2015), 47-8.
- 430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12-13, 541; Andrew Rotter, *Hiroshima: The World's Bomb* (Oxford, 2008), 162-4.



- 431 Michael Neiberg, *Potsda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Remaking of Europe* (New York, 2015), 244-5.
- 432 David Holloway, 'Jockeying for posi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Soviet entry into the war with Japan in August 1945', in Tsuyoshi Hasegawa (ed.),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Reappraisals* (Stanford, Calif., 2007), 172-5.
- 433 Phillips O'Brie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atom bomb,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2 (2019), 975-85.
- 434 Heinrichs and Gallicchio, *Implacable Foes*, 552
- 435 LC, Arnold Papers, Reel 199, note 'Atomic Bomb Cities' [n.d.].
- 436 Rotter, *Hiroshima*, 191-3.
- 437 Sumio Hatano, 'The atomic bomb and Soviet entry into the war', in Hasegawa (ed.), *End of the Pacific War*, 98-9.
- 438 Ibid., 99-101.
- 439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16-17.
- 440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73-9; Gibney (ed.), *Sensō*, 215.
- 441 引自 the Japanese in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19.
- 442 Ronald Spector, 'After Hiroshima: Allied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fate of Japan's empir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9 (2005), 1122-3;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89.
- 443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203-5, 209-13.
- 444 Sarah Paine, *The Japanese Empire: Grand Strategy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the Pacific War* (Cambridge, 2017), 167-70.
- 445 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9), 149-52.
- 446 Haruko Cook and Theodore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1992), 364-5.
- 447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88.

## 第四章 動員與總體戰

- 1 引自Lennart Samuelson,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1950s* (Basingstoke, 2011), 230.
- 2 Ibid., 229, 231.
- 3 國民所得數字出自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21.
- 4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Kans, 2009), 160.
- 5 Thomas Hippler, *Governing from the Skies: A Global History of Aerial Bombing* (London, 2017), 15-16, 112-13.
- 6 Erich Ludendorff, *The Nation at War* (London, 1935), 22-3.
- 7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Ser. D, vol. vi (Göttingen, 1956), 481,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元首與將領們的會議。
- 8 Rudolf Absolon, *Die Wehrmacht im Dritten Reich: Band IV, 5 February 1938 bis 31 August 1939* (Boppard-am-Rhein, 1979), 9-11.
- 9 Roxanne Panchasi, *Future Tense: The Culture of Anticipation i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thaca, NY, 2009), 81, 84.
- 10 Cyril Falls, *The Nature of Modern Warfare* (London, 1941), 7.
- 11 TNA, AIR 9/39, Air Vice-Marshal Arthur Barrett, 'Air Policy and Strategy', 23 Mar. 1936, pp. 5-6.
- 12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McDonald Papers, ser. V, Box 8, 'Development of the U.S. Air Forces Philosophy of Air Warfare', pp. 13-15.
- 13 關於日本，見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Kans, 2015), 11-14; 關於德國與蘇聯，見Richard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London, 2004), 459-67.
- 14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2003), 279-81.
- 15 Stephen King-Hall, *Total Victory* (London, 1941).
- 16 *Total War and Total Peace: Four Addresses by American Leaders* (Oxford, 1942), 29, 引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演說。
- 17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 'Summary Report', Washington, DC, 1 July 1946, pp. 10-11.

- 18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S368, Schmelter interrogation, Appendix 1, 'The call-up of workers from indu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pp. 7-8; Alan Bullo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Volume II. Minister of Labour 1940-1945* (London, 1967), 55.
- 19 Maury Klein, *A Call to Arms: Mobilizing America for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13), 340-41, 691-4.
- 20 Anna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A History of Violence on the Eastern Front* (Cambridge, 2010), 146-51; John Erickson, 'Soviet women at war', in John Garrard and Carol Garrard (eds.), *World War 2 and the Soviet People* (London, 1993), 50-76.
- 21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98-9, 234. 一九三八年五月，只有百分之十一是正規軍，百分之二十二點六是第一預備隊（二十四歲到二十八歲），百分之四十五點二是第二預備隊（二十九歲到三十四歲）。
- 22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160-61;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255-8, 269-71; Joshua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 1937-1953* (Stanford, Calif., 2004), 171-2.
- 23 Mark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 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 2000), 48-9, 54-5.
- 24 Stephen Schwab, 'The role of the Mexican Expeditionary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late, limited, but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 (2002), 11 31-3; Neill Lochery, *Brazil: The Fortunes of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azil* (New York, 2014), 230-34.
- 25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4, 253.
- 26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209-10, 467.
- 27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186; Ulysses Lee, *The Employment of Negro Troops* (Washington, DC, 1994), 406.
- 28 Wesley Craven and James Cate,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VI: Men and Planes* (Chicago, Ill., 1955), 429-30; Allan English, *The Cream of the Crop: Canadian Aircrew, 1939-1945* (Montreal, 1996), 19.
- 29 Emma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War, the Body and British Army Recruits 1939-1945* (Manchester, 2014), 31-2; Jeremy Crang,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People's War 1939-1945* (Manchester, 2000), 7-11, 14-15.

- 30 Domenico Petracarro, 'The Italian Army in Africa 1940-1943: an attempt a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r & Society*, 9 (1991), 104-5.
- 31 Parliamentary Archives, London, Balfour Papers, BAL/4,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ir Training Plan, 1939-1945', Ottawa, 1949, pp. 3-8.
- 32 Klein, *A Call to Arms*, 340-41; Steve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86.
- 33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114.
- 34 Klein, *A Call to Arms*, 694.
- 35 Hugh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War and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to the Persian Gulf War* (Cambridge, 2012), 160.
- 36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London, 1951), 11.
- 37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244-6.
- 38 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2004), 261-6; G. F. Krivosheev (ed.),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7), 85, 87; 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1941-1943* (Lawrence, Kans, 2005), 135-9.
- 39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66;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96-7.
- 40 Bernhard Kroener, 'Menschenbewirtschaftung. Bevölkerungsverteilung und personelle Rüstung in der zweiten Kriegshälfte', in Bernhard Kroener,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5/2: 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 (Stuttgart, 1999), 853-9;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44.
- 41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 202.
- 42 Carter Eckert, 'Total war,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colonial Korea',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Princeton, NJ, 1996), 28-30.
- 43 Rolf-Dieter Müller, *The Unknown Eastern Front: The Wehrmacht and Hitler's Foreign Soldiers* (London, 2012), 169, 176, 212, 223-4; David Stahel (ed.), *Joining Hitler's Crusade: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 (Cambridge, 2018), 6-7.
- 44 Oleg Beyda, "'La Grande Armée in field gray": the legion of French volunteers again



- st Bolshevism, 1941',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 (2016), 502-17.
- 45 Joachim Hoffmann, *Die Geschichte der WlassowArmee* (Freiburg, 1984), 205-6; Müller, *Unknown Eastern Front*, 235.
  - 46 F. W. Perry, *The Commonwealth Armies: Manpower and Organisation in Two World Wars* (Manchester, 1988), 227.
  - 47 Kaushik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939-1945* (New Delhi, 2016), 12, 16-17, 28, 35, 37, 53, 80; Tarak Barkawi, *Soldiers of Empire: Indian and British Arm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7), 51-4.
  - 48 Ashley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6), 1-2.
  - 49 David Killingray, *Fighting for Britain: African Soldi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Woodbridge, 2010), 44.
  - 50 Stephen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Britain's Black Servicemen and Women 1939-1945* (Stroud, 2012), 10-12.
  - 51 Killingray, *Fighting for Britain*, 35-40, 42, 47-50, 75.
  - 52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11, 23-4.
  - 53 Morris MacGregor, *Integr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1940-1965* (Washington, DC, 1985), 17-24.
  - 54 Sherie Merson and Steven Schlossman, *Foxholes and Color Lines: Desegregating the U. S. Armed Forces* (Baltimore, Md, 1998), 67, 77-8, 82-3; Chris Dixon,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Cambridge, 2018), 59-60.
  - 55 Dixon, *African Americans*, 53, 63-5
  - 56 Lee, *Employment of Negro Troops*, 411-16; MacGregor, *Integr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24; Mershon and Schlossman, *Foxholes and Color Lines*, 64-5.
  - 57 Mershon and Schlossman, *Foxholes and Color Lines*, 63.
  - 58 Lee, *Employment of Negro Troops*, 286; MacGregor, *Integr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28-30. 關於塔斯基吉飛行員，見J. Todd Moyer, *Freedom Flyers: The Tuskegee Armymen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10); William Percy, 'Jim Crow and Uncle Sam: the Tuskegee flying units and the U. S. Army Air Force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7 (2003), 775, 786-7, 809-10; Stanley Sandler, *Segregated Skies: All-Black Combat Squadrons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2), ch. 5.
  - 59 Robert Asahima, *Just Americans: How Japanese Americans Won a War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2006), 6-7; Brenda Moore, *Serving Our Country: Japanese A*

- merican Women in th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NJ, 2003), xi-xii, 19.
- 60 標準職務清單，例見Rosamond Greer, *The Girls of the King's Navy* (Victoria, BC, 1983), 14-15, 144.
  - 61 Gerard DeGroot, 'Whose finger on the trigger? Mixed anti-aircraft batteries and the female combat taboo', *War in History*, 4 (1997), 434-7.
  - 62 Birthe Kundrus, 'Nur die halbe Geschichte: Frauen im Umfeld der Wehrmacht', in 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 720-21.
  - 63 Franz Siedler, *Blitzmädchen: Die Geschichte der Helferinne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Bonn, 1996), 169.
  - 64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9, 11; Jeremy Crang, *Sisters in Arms: Women in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20), 2-3, 30, 36, 310.
  - 65 Greer, *Girls of the King's Navy*, 14-16.
  - 66 Klein, *A Call to Arms*, 352-3.
  - 67 Jeanne Holm, *In Defense of a Nation: Servicewomen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8), 1, 41, 75.
  - 68 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Volume VI*, 102-4.
  - 69 Holm, *In Defense of a Nation*, 48-9, 57-9.
  - 70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121.
  - 71 Helena Schrader, *Sisters in Arms: The Women who Flew in World War II* (Barnsley, 2006), 8-16.
  - 72 Kathleen Cornelsen, '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 of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7 (2005), 111-12, 115-16; Bourne, *The Motherland Calls*, 120-21; Schrader, *Sisters in Arms*, 138-45.
  - 73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3; Erickson, 'Soviet women at war', 52, 62-9.
  - 74 Roger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The Red Army'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1), 104-5, 114.
  - 75 Reina Pennington, *Wings, Women and War: Soviet Airwomen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01), 1-2.
  - 76 Krylova, *Soviet Women in Combat*, 158-63.

- 77 Ibid., 151-2, 168-9.
- 78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London, 2017), 8。根據Maria Morozova的證詞。
- 79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96-9.
- 80 Sandler, *Segregated Skies*, 68-72.
- 81 Lynne Olson, *Those Angry Days: Roosevelt, Lindbergh, and America's Fight over World War II, 1939-1941* (New York, 2013), 351-2.
- 82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57;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128-30.
- 83 USSBS, Special Paper 4, 'Food and Agriculture', exhibits G. J. M; BAB, R26 iv/51, Four Year Plan meeting, Geschäftsgruppe Ernährung, 11 Mar. 1942.
- 84 IWM, FD 5444/45, Protokoll über die Inspekturbesprechung, 22 Feb. 1942, 'Ersatzlage der Wehrmacht'; IWM, EDS A1/1571, Wirtschaft und Rüstungsamt, Niederschrift einer Besprechung, 9 Jan. 1941.
- 85 Overy, *The Dictators*, 452-3.
- 86 IWM, FD 3056/49, 'Statistical Material on the German Manpower Position', 31 July 1945, Table 7; 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London, 2000), 191-5; N. S. Simonov, 'Mobpodgotovka: mobilization planning in interwar industry', in John Barber and Mark Harrison (eds.), *The Soviet Defence Industry Complex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London, 2000), 216-17.
- 87 Richard Toye, 'Keynes,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How to Pay for the War"',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0 (1999), 256-8, 272-8.
- 88 BAB, R7 xvi/7, Report from the 'Professoren-Ausschuss' to Economics Minister Funk, 16 Dec. 1939.
- 89 Sheldon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mobilizing savings and popularizing thrift in wartime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6 (2000), 51-2.
- 90 Jingping Wu, 'Revenue, finance and the command economy und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7 (2013), 52-3.
- 91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66-7; Stephen Broadberry and Peter Howlett, 'The United Kingdom: victory at all costs',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50-51; *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195; Willi Boelcke, 'Kriegsfinanzierung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Friedrich Forstmeier and Hans-Erich Volk

- mann (eds.),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1939-1945* (Düsseldorf, 1977), 40-41; Akira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56-7; Mark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the defeated victor', in *idem*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75-6.
- 92 Jonas Scherner, 'The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of financing German exploitation: principles, conflicts and results', in Jonas Scherner and Eugene White (eds.), *Paying for Hitler's War: The Consequences of Nazi Hegemony for Europe* (Cambridge, 2016), 62-3.
- 93 Hein Klemann and Sergei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azi-Occupied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2), 210-11; Broadberry and Howlett, 'United Kingdom', 52-3. 英鎊債務中，包括積欠印度的十三億兩千一百萬英鎊，這是英國積欠的最大一筆債款。
- 94 Karl Brandt, Otto Schiller and Franz Ahlgrimm (ed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 the German Occupied and Other Areas of Fortress Europe*, 2 vols. (Stanford, Calif., 1953), ii, 616-17;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London, 2016), 342-7.
- 95 Sidney Zabłudoff, 'Estimating Jewish wealth', in Avi Beker (ed.), *The Plunder of Jewish Property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1), 48-64; H. McQueen, 'The conversion of looted Jewish assets to run the German war machin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8 (2004), 29-30.
- 96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36, 157; Jingping Wu, 'Revenue, finance and the command economy', 49-50.
- 97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66-7; James Sparrow, *Warfare State: World War II America and the Age of Big Government* (Oxford, 2011), 123-5.
- 98 Bruce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in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lif., 1953), 167; Bernd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1941-1945', in Forstmeier and Volkmann (eds.),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280;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55.
- 99 'National finances in 1944', *The Banker*, 74 (1945), 66; Sidney Poll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14-1967* (London, 1969), 308; R. Sayers, *Financial Policy* (London, 1956), 516.
- 100 BAB, R7 xvi/8,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report, 'Zur Frage der Erhöhung des Einkommens- und Vermögenssteuer', 3 Feb. 1943; NARA, microfilm collection T178, Roll 15, frames 3671912-7, Reich Finance Ministry, 'Statistische Übersichten zu den Reichshaushaltsrechnungen 1938 bis 1943', Nov. 1944.



- 101 Pollard,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328; H. Durant and J. Goldmann,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ingclass savings', in University of 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Studies in War Economics* (Oxford, 1947), 111-23.
- 102 BAB, R7 xvi/22, memorandum 'Die Grenzen der Staatsverschuldung', 1942, p. 4; R 28/98, German Reichsbank, 'Die deutsche Finanz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Kriege', 8 June 1943, pp. 11-12. 關於「無聲的財政」，見Willi Boelcke, *Die Kosten von Hitlers Krieg* (Paderborn, 1985), 103-4.
- 103 Wolfgang Werner, 'Bleib übrig': *Deutsche Arbeiter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riegswirtschaft* (Düsseldorf, 1983), 220-21.
- 104 Kristy Ironside, 'Rubles for victory: the social dynamics of state fundraising 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Kritika*, 15 (2014), 801-20.
- 105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42-6, 56-7.
- 106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80; Takafusa Nakamura and Ko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45: A Dual Structure* (Oxford, 1999), 82.
- 107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30-32.
- 108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61.
- 109 Sparrow, *Warfare State*, 127-9.
- 110 Ibid., 129, 134-46; Theodore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Leviathan',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182.
- 111 BAB, RD-51/21-3, Deutsche Reichsbank, 'Deutsche Wirtschaftszahlen', Mar. 1944, p. 2.
- 112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70-73.
- 113 Richard Rice, 'Japanese labor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38 (1990), 38-9; Benjamin Uchiyama, 'The munitions worker as trickster in wartime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 (2017), 658-60, 666-7.
- 114 Howard, *Workers at War*, 138-9.
- 115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Rationing, Controls and Consumption 1939-1945* (Oxford, 2000), 46-7.
- 116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XXII (Cambridge, 2012), 223, 'Notes on the Budget', 28 Sept. 1940.
- 117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74-8;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178-80.

- 118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54.
- 119 Hugh Rockof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ploughshares to swords',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90-91.
- 120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53-4.
- 121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278-85. 'Spartan throughout' from Lothrop Stoddard, *Into the Darkness: Nazi Germany Today* (London, 1941), 80.
- 122 Garon, 'Luxury is the enemy', 41-2.
- 123 Akira Hara, 'Wartime controls',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271-2, 282;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79.
- 124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277-9, 290-91.
- 125 C. B. Behrens, *Merchant Shipping and the Demands of War* (London, 1955), 198.
- 126 Rockoff, 'The United States', 93.
- 127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179;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179.
- 128 Mark Harrison, *Soviet Planning in War and Peace, 1938-1945* (Cambridge, 1985), 258-9; William Moskoff, *The Bread of Affliction: The Food Supply in the USSR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0), 121-2.
- 129 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478-9;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37.
- 130 Moskoff, *Bread of Affliction*, 222-4.
- 131 Alberto De Bernardi, 'Alimentazione di guerra', in Luca Alessandrini and Matteo Pasetti (eds.), *1943: Guerra e società* (Rome, 2015), 129-30; Vera Zamagni, 'Italy: how to lose the war and win the pea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91.
- 132 Takafusa Nakamura, 'The age of turbulence: 1937-54',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71-3;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61-4;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38-9.
- 133 Corni and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424-38; Freda Wunderlich, *Farm Labor in Germany 1810-1945* (Princeton, NJ, 1961), 297-9.
- 134 Alec Nove, 'The peasantry in World War II', in Susan Linz (ed.),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 (Totowa, NJ, 1985), 79-84.
- 135 Broadberry and Howlett, 'The United Kingdom', 59, 61-3.

- 136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16-18.
- 137 關於英國與美國, Lizzie Collingham, *The Taste of War: World War Two and the Battle for Food* (London, 2011), 390, 418; 關於日本,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55.
- 138 Moskoff, *Bread of Affliction*, 108-9, 175.
- 139 Collingham, *Taste of War*, 388-9; De Bernardi, 'Alimentazione di guerra', 131; William D. Bayles, *Postmarked Berlin* (London, 1942), 18-20, 24;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202.
- 140 Owen Griffiths, 'Need, greed, and protest: Japan's black market 1938-1949',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5 (2002), 827-30.
- 141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285-6.
- 142 Corni and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414-15.
- 143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54.
- 144 Corni and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494-7;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69-70.
- 145 De Bernardi, 'Alimentazione di guerra', 131 (根據人口學家Luzzatto Fegiz在戰後的里雅斯特所做的研究)。
- 146 Wendy Goldman, 'The hidden world of Soviet wartime food provisioning: hunger,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in Hartmut Berghoff, Jan Logemann and Felix Römer (eds.), *The Consumer on the Home Front: Second World War Civilian Consump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2017), 57-65.
- 147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136;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37.
- 148 Jeremy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5 (2013), 213-17.
- 149 Klemann and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281-2.
- 150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1944* (New Haven, Conn., 1993), 27-30.
- 151 Violetta Hionidou, 'Relief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Greece, 194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762-6.
- 152 Roy, *India and World War II*, 129-30; Sugato Bose, 'Starvation among plenty: the making of famine in Bengal, Honan and Tonkin, 1942-45',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1990), 715-17.

- 153 Yasmin Khan, *The Raj at War: A People's History of India's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208.
- 154 Bose, 'Starvation among plenty', 718-21.
- 155 Sparrow, *Warfare State*, 161-2; Martin Kragh, 'Soviet labour law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18 (2011), 535; Werner, 'Bleib übrig', 178.
- 156 TNA, LAB 8/106, memorandum by the minister of labour for the War Cabinet, 'Labour Supply Policy since May 1940', 17 July 1941; Bullock,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ii, 55.
- 157 Sparrow, *Warfare State*, 163; Klein, *A Call to Arms*, 626-88, 748-50.
- 158 IWM, FD 3056/49, 'Statistical Material on the German Manpower Position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9-1943', FIAT report EF/LM/1, July 1945, table 7; G. Ince, 'The mobilisation of manpower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4 (1946), 17-52; William Hancock and Margaret Gowing, *British War Economy* (London, 1949), 453.
- 159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95, 99.
- 160 一九四四年，英國的失業人口只有五萬四千人。見Henry Parker, *Manpower: A Study of Wartim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57), 481.
- 161 Kragh, 'Soviet labour law', 540.
- 162 Rice, 'Japanese labor', 31-2; Uchiyama, 'The munitions worker as trickster', 658-60.
- 163 Sparrow, *Warfare State*, 113-14.
- 164 G. C. All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policy', in Norman Chester (ed.), *Lessons of the British War Economy* (Cambridge, 1951), 166-77.
- 165 IWM, EDS/AL 1571, 'Arbeitseinsatz und Einziehungen in der nicht zum engeren Rüstungsbereichgehörenden Wirtschaft', OKW report, 9 Jan. 1941, p. 3; Rolf Wagenfüh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im Kriege* (Berlin, 1963), 47-8.
- 166 Lutz Budrass, Jonas Scherner and Jochen Streb, 'Fixed-price contracts, learning, and outsourcing: explaining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output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 (2010), 131.
- 167 英國數字出自TNA, AVIA 10/289, 飛機生產部備忘錄〈勞力提供與未來航空產業的計畫〉，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德國數字出自IWM, Box 368, Report 65, 對主要委員會主席Ernst Blaicher的審問, p. 12; IWM, 4969/45, BMW report, 'Ablauf der Lieferungen seit Kriegsbeginn', n.d., p. 25.



- 168 德國數字出自Rüdiger Hachtmann, *Industriearbei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89), 229-30; 蘇聯數字出自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285-6.
- 169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284-5; Wunderlich, *Farm Labor in Germany*, 297-9;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244.
- 170 Rockoff, 'The United States', 101-3.
- 171 John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Chicago, Ill., 1996), 95-6, 102;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9), 351-3.
- 172 Klein, *A Call to Arms*, 354.
- 173 Gerald Nash, *World War II and the West: Reshaping the Economy* (Lincoln, Nebr., 1990), 77-8.
- 174 Geoffrey Field, *Blood, Sweat and Toil: Remaking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939-1945* (Oxford, 2011), 129-30, 145.
- 175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6;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81; Johnston, *Japanese Food Management*, 244.
- 176 Parker, *Manpower*, 435-6;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96.
- 177 Leila Rupp,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Princeton, NJ, 1978), 185;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90-91; Klein, *A Call to Arms*, 710.
- 178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161.
- 179 Eckert, 'Total war in late colonial Korea', 17-21, 24-5.
- 180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246; Michael Seth,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Volume 2* (Lanham, Md, 2016), 83.
- 181 Mark Spoerer, *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 (Stuttgart, 2001), 221-3; Johann Custodis, 'Employing the enemy: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POW and foreign labor from occupied territories by Nazi Germany', in Scherner and White (eds.), *Paying for Hitler's War*, 79.
- 182 Ulrich Herbert,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 'Ausländer-Ein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Bonn, 1985), 56-8; Gustavo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in besetzten Italien, 1943-1945',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Berlin, 1997), 137-41.
- 183 Spoerer, *Zwangsarbeit*, 50, 59-60, 66; Bernd Zielinsk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in Frankreich 1940-1944', in Overy, Otto and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 Europas*', 119.
- 184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38-9.
- 185 Spoerer, *Zwangsarbeit*, 45-7, 62-5; Zielinsk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1-12.
- 186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43-9.
- 187 Herbert, *Fremdarbeiter*, 83-90, 99.
- 188 Spoerer, *Zwangsarbeit*, 73-80; Herbert, *Fremdarbeiter*, 157-60, 271.
- 189 Zielinsk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21-3, 131; Spoerer, *Zwangsarbeit*, 64-5. Zielinski 提出的數字是八十五萬人到九十二萬人，其中包括了四項「招克爾行動」未涵蓋的人員。
- 190 Corni, 'Die deutsche Arbeitseinsatzpolitik', 150-60.
- 191 Custodis, 'Employing the enemy', 95.
- 192 Cesare Bermani, Sergio Bologna and Brunello Mantelli, *Proletarier der 'Achse': Sozial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Fremdarbeiter in NS-Deutschland 1937 bis 1943* (Berlin, 1997), 222.
- 193 Elizabeth Harvey, 'Last resort or key resource? Women workers from the Nazi-occupied Soviet territories, the Reich labou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erman war effor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6 (2016), 163.
- 194 Spoerer, *Zwangsarbeit*, 186. 這些數字出自德國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進行的四次調查。
- 195 Rüdiger Hachtmann, 'Fordism and unfree labour: aspects of work deployment of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in German industry between 1942 and 194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5 (2010), 496.
- 196 IWM, Speer Collection, FD 4369/45, British Bombing Survey Unit, 'Manuscript Notes on Ford, Cologne'.
- 197 Spoerer, *Zwangsarbeit*, 226; Herbert, *Fremdarbeiter*, 270-71.
- 198 Custodis, 'Employing the enemy', 72.
- 199 Hachtmann, 'Fordism and unfree labour', 505-6. 關於「奴隸」一詞是否適當的討論，見Marc Buggeln, 'Were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slav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3 (2008), 106-25.
- 200 Wolf Gruner, *Jewish Forced Labor under the Nazis: Economic Needs and Racial Aims, 1938-1944* (New York, 2006), 63-75, 282.

- 201 Spoerer, *Zwangsarbeit*, 228-9.
- 202 Golfo Alexopoulos, *Illness and Inhumanity in Stalin's Gulag* (New Haven, Conn., 2017), 160-61, 208-9, 216.
- 203 Ibid., 197-8; Wilson Bell, *Stalin's Gulag at War: Forced Labour, Mass Death, and Soviet Vict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oronto, 2019), 8-9, 157-8.
- 204 TNA, FO 371/46747, Col. Thornley to G. Harrison (Foreign Office), enclosing the 'Jupp Report', 26 Feb. 1945.
- 205 TNA, LAB 10/132, Trade Stoppages: weekly returns to the Ministry of Labour 1940-1944; Field, *Blood, Sweat, and Toil*, 102-3.
- 206 James Atleson, *Labor and the Wartime State: Labor Relations and Law during World War II* (Urbana, Ill., 1998), 142; Richard Polenberg, *War and Society: The United States 1941-1945* (Philadelphia, Pa, 1972), 159-72.
- 207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213-19; Klein, *A Call to Arms*, 624-6.
- 208 Rice, 'Japanese labor in World War II', 34-5, 38.
- 209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282; Yellen,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207-11.
- 210 Howard, *Workers at War*, 172-5.
- 211 Kragh, 'Soviet labour law', 537-40.
- 212 Werner, 'Bleib übrig', 172-89.
- 213 Bermani, Bologna and Mantelli, *Proletarier der 'Achse'*, 210-11, 220-22; Werner, 'Bleib übrig', 189-92.
- 214 Sparrow, *Warfare State*, 82-3.
- 215 Robert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Forging American Obligations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2004), 11.

## 第五章 軍事作戰的技藝

- 1 Walter Kerr, *The Russian Army* (London, 1944). 69.
- 2 Ibid., 69-70.
- 3 Steven Zaloga, *Japanese Tanks 1939-1945* (Oxford, 2007), 7-10.
- 4 Peter Chamberlain and Chris Ellis, *Tanks of the World 1915-1945* (London, 2002), 39.

- 5 Christopher Wilbeck, *Sledgehammers: Strengths and Flaws of Tiger Tank Battalions in World War II* (Bedford, Pa, 2004), 182-9.
- 6 Victor Kamenir, *The Bloody Triangle: The Defeat of Soviet Armor in the Ukraine, June 1941* (Minneapolis, Minn., 2008), 187.
- 7 Gordon Rottman, *World War II Infantry Anti-Tank Tactics* (Oxford, 2005), 19-20, 57.
- 8 Wilbeck, *Sledgehammers*, 186; Markus Pöhlmann, *Der Panzer und die Mechanisierung des Krieges: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 1890 bis 1945* (Paderborn, 2016), 527.
- 9 Gary Dickson, 'Tank repair and the Red Army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5 (2012), 382-5.
- 10 Gordon Rottman and Akira Takizawa, *World War II Japanese Tank Tactics* (Oxford, 2008), 3-6.
- 11 MacGregor Knox, 'The Italian armed forces, 1940-3', in Allan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Volume III: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8), 151.
- 12 Pöhlmann, *Der Panzer*, 190-91, 207-12; Richard Ogorkiewicz, *Tanks: 100 Years of Evolution* (Oxford, 2015), 129-30; Robert Citino, *The Path to Blitzkrieg: Doctrine and Training the German Army, 1920-39* (Mechanicsburg, Pa, 2008), 224-31.
- 13 Heinz Guderian, *Achtung-Panzer!* (London, 1992), 170。譯自一九三七年的德文版。
- 14 R. L.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or Military Anachronism? Horses and the German Army of WWII* (Mechanicsburg, Pa, 2008), 39, 55-7.
- 15 Karl-Heinz Frieser,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 (Annapolis, Md, 2005), 36-42.
- 16 Jeffrey Gunsburg, 'The battle of the Belgian Plain, 12-14 May 1940: the first great tank battl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6 (1992), 241-4.
- 17 G. F.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7), 252.
- 18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67; Richard Ogorkiewicz, *Armoured Forces: A History of Armoured Forces & Their Vehicles* (London, 1970), 78-9; Matthew Cooper, *The German Army 1933-1945* (London, 1978), 74-9。關於庫斯克會戰的戰車數量，見Lloyd Clark, *Kursk: The Greatest Battle* (London, 2011), 197-9.
- 19 Ogorkiewicz, *Tanks*, 1523; Pöhlmann, *Der Panzer*, 432-4.



- 20 Rottman, *World War II Infantry AntiTank Tactics*, 46-7, 49-52.
- 21 Giffard Le Q. Martel, *Our Armoured Forces* (London, 1945), 40-43, 48-9.
- 22 Willem Steenkamp, *The Black Beret: Th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s Armoured Forces: Volume 2, The Italian Campaign 1943-45 and Post-War South Africa 1946-61* (Solihull, 2017), 35-9.
- 23 Ogorkiewicz, *Tanks*, 120-23; Wilbeck, *Sledgehammers*, 203-4.
- 24 Steven Zaloga, *Armored Thunderbolt: The U.S. Army Sherman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2008), 16-17.
- 25 Ibid., 24, 329-30.
- 26 Rottman, *World War II Infantry Anti-Tank Tactics*, 29-32.
- 27 Krivosheev, *Soviet Casualties*, 241. Alexander Hill, *The Red Arm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7), 691頁提到蘇聯擁有可用戰車一萬兩千七百八十二輛，其中只有兩千一百五十七輛是新出廠毋須進行維修。
- 28 Kamenir, *Bloody Triangle*, 255-6, 280-81.
- 29 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Kans, 2005), 225-34.
- 30 James Corum, 'From biplanes to Blitzkrieg: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air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War in History*, 3 (1996), 87-9.
- 31 KarlHeinz Völker, *Dokumente und Dokumentarfotos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Stuttgart, 1968), 469, doc. 200 'Luftkriegführung'; Michel Forge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bei den französischen und deutschen Luftstreitkräfte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Horst Boog (ed.), *Luftkriegfüh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Herford, 1993), 489-91.
- 32 Ernest May, *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 (New York, 2000), 429.
- 33 Johannes Kaufmann, *An Eagle's Odyssey: My Decade as a Pilot in Hitler's Luftwaffe* (Barnsley, 2019), 117.
- 34 NARA, RG 165/888.96, Embick memorandum, 'Aviation Versus Coastal Fortifications', 6 Dec. 1935.
- 35 Forget, 'Zusammenarbeit', 486 (粗體字原文所加)。
- 36 P. Le Goyet, 'Evolution de la doctrine d'emploi de l'aviation française entre 1919 et 1939', *Revue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19 (1969), 22-34; R. Doughty, 'The French armed forces 1918-1940', in Alan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Volume II: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 1988), 58.

- 37 David Hall, *Strategy for Victor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Tactical Air Power, 1919-1945* (Westport, Conn., 2007), 30-42.
- 38 斯萊塞的評論見Peter Smith, *Impact: The Dive Bomber Pilots Speak* (London, 1981), 34; TNA, AIR 9/99, 'Appreciation of the Employment of the British Air Striking Force against the German Air Striking Force', 26 Aug. 1939, p. 5; TNA 9/98, 'Report on Trial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Air Attack Against Aircraft Dispersed about an Aerodrome Site', July 1938.
- 39 Matthew Powell, 'Reply to: The Battle of France, Bartholomew and Barratt: the creation of Army Cooperation Command', *Air Power Review*, 20 (2017), 93-5.
- 40 David Smathers, "'We never talk about that now': air-land integration in the Western Desert 1940-42", *Air Power Review*, 20 (2017), 36-8.
- 41 Richard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The History of Battlefield Air Attack, 1911-1945* (Washington, DC, 1989), 131-3, 182.
- 42 Smathers, "'We never talk about that now'", 40-43; Robert Ehlers, 'Learning together, winning together: air-ground cooperation in the Western Desert', *Air Power Review*, 21 (2018), 213-16; Vincent Orange, 'World War II: air support for surface forces', in Alan Stephens (ed.), *The War in the Air 1914-1994* (Maxwell, Ala, 2001), 87-9, 95-7.
- 43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59-61.
- 44 David Syrett, 'The Tunisian campaign, 1942-43', in Benjamin Cooling (ed.), *Cas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 Air Support* (Washington, DC, 1990), 159-60.
- 45 B. Michael Bechthold, 'A question of success: tactical air doctrine and practice in North Africa',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8 (2004), 832-8.
- 46 Ibid., 830-34.
- 47 Syrett, 'The Tunisian campaign', 167.
- 48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71-3; Syrett, 'The Tunisian campaign', 184-5.
- 49 Richard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3rd edn, Dulles, Va, 2005), 77. 戰機數量分別是美國四萬六千兩百四十四架，英國八千三百九十五架，德國六千兩百九十七架。
- 50 NARA,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Interview 62, Col. Gen. Jodl, 29 June 1945.
- 51 Kenneth Whiting, 'Soviet air-ground coordination', in Cooling (ed.), *Case Studies in Close Air Support*, 117-18.

- 52 Von Hardesty and Ilya Grinberg, *Red Phoenix Rising: The Soviet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2), 204-5, 261-2.
- 53 Lord Keyes, *Amphibious Warfare and Combined Operations* (Cambridge, 1943), 7.
- 54 Edward Miller,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d, 1991), 115-19; John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U.S.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95), 10-11.
- 55 Allan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 the American, British, and Japanese experiences', in Allan Millett and William Murray (eds.),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 1996), 71-4;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3-14; Miller, *War Plan Orange*, 174. 關於埃利斯的命運，見John Reber, 'Pete Ellis: Amphibious warfare prophet', in Merrill Bartlett (ed.), *Assault from the Sea: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mphibious Warfare* (Annapolis, Md, 1983), 157-8.
- 56 Hans von Lehmann, 'Japanese landing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in Bartlett (ed.), *Assault from the Sea*, 197-8;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65-9.
- 57 Lehmann, 'Japanese landing operations', 198;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81-2.
- 58 David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Thomas Holcomb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arine Corps, 1936-1943* (Annapolis, Md, 2011), 95, 187-8.
- 59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59-60, 78-9.
- 60 TsAMO, Sonderarchiv, f.500, o. 957972, d. 1419, Army commander-in-chief, von Brauchitsch, 'Anweisung für die Vorbereitung des Unternehmens "Seelöwe"', 30 Aug. 1940, pp. 2-5, Anlage 1; OKH, general staff memorandum 'Seelöwe', 30 July 1940, p. 4. 也可見Frank Davis, 'Sea Lion: the German plan to invade Britain, 1940', in Bartlett (ed.), *Assault from the Sea*, 228-35.
- 61 Renzo de Felice (ed.), *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7-1943* (Milan, 1990), 661, entry for 26 May 1942.
- 62 IWM, Italian Series, Box 22, E2568, 'Esigenza "C.3" per l'occupazione dell'isola di Malta', pp. 25-7; 也可見Mariano Gabriele, 'L'operazione "C.3" (1942)', in Romain Rainero and Antonello Biagini (eds.), *Italia in guerra: Il terzo anno, 1942* (Rome, 1993), 409 ff.
- 63 Alan Warren, *Singapore: Britain's Greatest Defeat* (London, 2002), 60-64, 221-32.
- 64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xiii, 123; Robert Heinl, 'The U.S. Marine Corps: author of modern amphibious warfare', in Bartlett (ed.), *Assault from the Sea*, 187-90.

- 65 Craig Symonds, *Operation Neptune: The DDay Landings and the Allied Invasion of Europe* (New York, 2014), 149-52;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61-2, 84; Frank Hough, *The Isl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the Pacific* (Philadelphia, Pa, 1947), 212-15.
- 66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38, 49; Hough, *The Island War*, 36.
- 67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53-6;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130-32, 138-9.
- 68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58-9; Symonds, *Operation Neptune*, 75-6.
- 69 USMC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paper, 'Tarawa to Okinawa: The Evolution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9.
- 70 Ibid., 9-11, 17-20;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62-76; Hough, *The Island War*, 132-8.
- 71 USMC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Tarawa to Okinawa', 14-25;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78-81.
- 72 Hough, *The Island War*, 215-16; USMC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Tarawa to Okinawa', 11-12.
- 73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307-13.
- 74 Frederick Morgan, *Overture to Overlord* (London, 1950), 146-8.
- 75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63.
- 76 Ibid., 71-9; Symonds, *Operation Neptune*, 88-91.
- 77 Robert Coakley and Richard Leighton, *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Volume 2, 1943-1945* (Washington, DC, 1968), appendix D3, 836, appendix D-5, 838; Dwight D. Eisenhower, *Report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London, 1946), 16.
- 78 Coakley and Leighton, *Global Logistics*, 805-7, 829; Symonds, *Operation Neptune*, 163-4.
- 79 Coakley and Leighton, *Global Logistics*, 309-11, 348-50, 829;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15-16, 222.
- 80 Symonds, *Operation Neptune*, 196-210, 220-21;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215-22.
- 81 British Air Ministry,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1919-1945* (Poole, 1983; orig. publ. 1947), 323-5, 327-32.
- 82 Friedrich Ruge. 'The invasion of Normandy', in Hans-Adolf Jacobsen and Jürgen Rohwer (eds.),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 The German View* (London, 1965), 336, 342-3; Royal Navy Historical Branch, Battle Summary No. 39, *Operation Neptune*



- (London, 1994), 132; British Air Ministry,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329.
- 83 Symonds, *Operation Neptune*, 256-7.
- 84 Ibid., 291-9.
- 85 Eisenhower, *Report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32. Hitler's directive in Hugh Trevor-Roper (ed.), *Hitler's War Directives 1939-1945* (London, 1964), 220, Directive 51, 3 Nov. 1943.
- 86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adar: A Report on Science at War* (Washington, DC, 1945), 1.
- 87 Citino, *The Path to Blitzkrieg*, 208-11; Pöhlmann, *Der Panzer*, 269.
- 88 Riccardo Niccoli, *Befehlspanzer: German Command, Control and Observation Armored Combat Vehicles in World War Two* (Novara, 2014), 2-6, 88.
- 89 Karl Larew, 'From pigeons to crystals: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communications in U.S. Army tanks in World War II', *The Historian*, 67 (2005), 665-6; Gunsburg, 'The battle of the Belgian Plain', 242-3.
- 90 Wolfgang Schneider, *Panzer Tactics: German Small-Unit Armor Tactics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2000), 186-91.
- 91 Richard Thompson, *Crystal Clear: The Struggle for Reliabl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World War II* (Hoboken, NJ, 2012), 5-6; Simon Godfrey, *British Army Communicatio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3), 6-12.
- 92 Rottman and Takizawa, *World War II Japanese Tank Tactics*, 27-8.
- 93 Thompson, *Crystal Clear*, 13-14, 20-22
- 94 Ibid., pp. 145-57.
- 95 Zaloga, *Armored Thunderbolt*, 151-3.
- 96 Godfrey, *British Army Communications*, 233; Gordon Rottman, *World War II Battlefield Communications* (Oxford, 2010), 29-30, 35-6; Anthony Davies, 'British Army battlefield radios of the 1940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lectronics*, 2009, 2-4.
- 97 USMC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Tarawa to Okinawa', 14-15.
- 98 Godfrey, *British Army Communications*, 12-13, 144; Thompson, *Crystal Clear*, 51-2.
- 99 Thompson, *Crystal Clear*, 163-7; Larew, 'From pigeons to crystals', 675-7.
- 100 Williamson Murray, 'The Luftwaffe experience, 1939-1941', in Cooling (ed.), *Case*

- Studies in Close Air Support*, 79, 83, 98; Hermann Plocher, *The German Air Force Versus Russia, 1943* (New York, 1967), 263-4.
- 101 Smathers, “‘We never talk about that now’”, 33-6, 42-3.
- 102 Robert Ehlers, *The Mediterranean Air War: Air Power and Alli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5), 103, 186;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54.
- 103 Hardesty and Grinberg, *Red Phoenix Rising*, 121, 129-31, 147-9, 257-8; Whiting, ‘Soviet air-ground coordination’, 130-34, 139-40;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241-2, 183.
- 104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65.
- 105 Thompson, *Crystal Clear*, 49-52.
- 106 Bechthold, ‘A question of success’, 831-2; W. Jacobs, ‘The battle for France, 1944’, in Cooling (ed.), *Case Studies in Close Air Support*, 254-6, 265, 271-2;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81, 199.
- 107 Raymond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History of Its Evolution in 13 Nations through World War II* (Bloomington, Ind., 2009), 43-6.
- 108 Ibid., 115-25, 233-41; H. Kummritz, ‘German radar development up to 1945’, in Russell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 to 1945* (London, 1988), 209-12.
- 109 John Erickson, ‘The air defence problem and the Soviet radar programme 1934/5-1945’, *ibid.*, 229-31;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80-87.
- 110 Louis Brown, *A Radar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Technical and Military Imperatives* (London, 1999), 87-9.
- 111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319-20; Shigeru Nakajima,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radar development to 1945’, in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 243-58.
- 112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342-5; M. Calamia and R. Palandri, ‘The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adio detector telemetro’, in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 97-105.
- 113 Colin Dobinson, *Building Radar: Forging Britain’s Early Warning Chain, 1935-1945* (London, 2010), 302-5, 318.
- 114 Wesley Craven and James Cate,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6, Men and Planes* (Chicago, Ill., 1955), 82-5, 89, 96-8.
- 115 Ibid., 103-4.
- 116 Takuma Melber, *Pearl Harbor: Japans Angriff und der Kriegseintritt der USA* (Munich, 2016), 129-30.
- 117 G. Muller and H. Bosse, ‘German primary radar for airborne and ground-based surveillance’

- illance', in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 200-208;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36-41; Kummritz, 'German radar development', 211-17.
- 118 Alfred Price, *Instruments of Darkness: The History of Electronic Warfare, 1939-1945* (London, 2005), 55-9.
- 119 Alan Cook, 'Shipborne radar in World War II: some recollection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58 (2004), 295-7.
- 120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73-85.
- 121 Ibid., 236-8; Kummritz, 'German radar development', 211, 219-22.
- 122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115-29;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adar*, 19-22, 26-7.
- 123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142-7, 157-8; Russell Burns, 'The backgrou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vity magnetron', in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 268-79.
- 124 Chris Eldridge, 'Electronic eyes for the Allies: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on radar develop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History & Technology*, 17 (2000), 11-13.
- 125 Brown, *A Radar History*, 398-402;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10-12; Eldridge, 'Electronic eyes for the Allies', 16.
- 126 Edward Bowen, 'The Tizard Mission to the USA and Canada', in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 306; Brown, *A Radar History*, 402-5; Guy Hartcup, *The Effect of Science on the Second World War* (Basingstoke, 2000), 39-43.
- 127 Trent Hone, *Learning War: 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Doctrine in the U.S. Navy, 1898-1945* (Annapolis, Md, 2018), 206-14;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167-9, 185-6, 208-10;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adar*, 20-21, 40-41; Brown, *A Radar History*, 368-70.
- 128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50-60; Kummritz, 'German radar development', 222-6.
- 129 Nakajima, 'History of Japanese radar development', 244-52, 255-6.
- 130 Brown, *A Radar History*, 424-5.
- 131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adar*, 44;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23.
- 132 Carl Boyd, 'U.S. Navy radio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inking of the Japanese submarine I52',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3 (1999), 340-54.
- 133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k, 1978), 210.

- 134 關於照片偵察的重要性，相關討論見Taylor Downing, *Spies in the Sky: The Secret Battle for Aerial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London, 2011), 327-34.
- 135 Jeffrey Bray (ed.), *Ultra in the Atlantic: Volume 1: Allied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Laguna Hills, Calif., 1994), 19; F. H. Hinsley, 'An introduction to FISH', in F. H. Hinsley and Alan Stripp (eds.), *Code Breakers: The Inside Story of Bletchley Park* (Oxford, 1993), 144.
- 136 John Chapman, 'Japanese intelligence 1919-1945: 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in Christopher Andrew and Jeremy Noakes (ed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00-1945* (Exeter, 1987), 147, 155-6.
- 137 Ken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Oxford, 2009), 122, 140, 161-2.
- 138 Samir Puri,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deciding the Battle of Britai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1 (2006), 420-21.
- 139 Downing, *Spies in the Sky*, 337-9.
- 140 Sebastian Cox,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F and Luftwaffe intelligence in the Battle of Britain, 1940',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5 (1990), 426.
- 141 關於這種任由蘇聯予取予求的關係的完整描述，見Bradley Smith, *Sharing Secrets with Stalin: How the Allies Traded Intelligence 1941-1945*(Lawrence, Kans, 1996).
- 142 Douglas Ford, 'Informing airmen? The US Army Air Forces' intelligence on Japanese fighter tactics in the Pacific theatre, 1941-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4 (2012), 726-9.
- 143 Wilfred J.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U.S. Naval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War During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79), 150-53; Karl Abt, *A Few Who Made a Difference: The World War II Team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New York, 2004), 3-4.
- 144 David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Novato, Calif., 1990), 109-12, 219-20.
- 145 Valerii Zamulin, 'On the role of Soviet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Red Army for the summer campaign of 194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2019), 246, 253.
- 146 Alan Stripp, *Codebreaker in the Far East* (Oxford, 1989), 117-18.
- 147 W. Jock Gardner, *Decoding History: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and Ultra* (London, 1999), 137-9.



- 148 Hinsley, 'Introduction to FISH', 146-7.
- 149 Hilary Footitt, 'Another missing dimens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World War II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5 (2010), 272-82.
- 150 James McNaughton, *Nisei Linguists: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during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2006), 18-23, 328-9, 331.
- 151 Roger Dingman, 'Language at war: U.S. Marine Corps Japanese language officers in the Pacific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8 (2004), 854-69.
- 152 Kahn, *Hitler's Spies*, 203-4.
- 153 Footitt, 'Another missing dimension?', 272.
- 154 Stripp, *Codebreaker*, 65-6.
- 155 Arthur Bonsall, 'Bletchley Park and the RAF "Y" Service: some recollection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3 (2008), 828-32; Puri,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deciding the Battle of Britain', 430-32; Cox,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F and Luft waffe intelligence', 432.
- 156 Ralph Erskine, 'Naval Enigma: a missing lin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3 (1989), 494-504; Gardner, *Decoding History*, 126-31; Bray (ed.), *Ultra in the Atlantic*, xiv-xx, 19-24.
- 157 Brian Villa and Timothy Wilford,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Pearl Harbor: 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1 (2006), 521-2, 547-8.
- 158 Edward Van Der Rhoer, *Deadly Magic: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ndon, 1978), 11-13, 49, 138-46; Stephen Budiansky, *Battle of Wits: The Complete Story of Codebreaking in World War II* (London, 2000), 320-23.
- 159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122.
- 160 Kahn, *Hitler's Spies*, 204-6.
- 161 Budiansky, *Battle of Wits*, 319-22.
- 162 Patrick Wilkinson, 'Italian naval decrypts', in Hinsley and Stripp (eds.), *Code Breakers*, 61-4.
- 163 F. H. Hinsley, 'The Influence of Ultra', in Hinsley and Stripp (eds.), *Code Breakers*, 4-5.
- 164 Jack Copeland, 'The German tunny machine', in *idem* (ed.), *Colossus: The Secrets of Bletchley Park's Codebreaking Computers* (Oxford, 2006), 39-42.
- 165 Thomas Flowers, 'D-Day at Bletchley Park', in Copeland (ed.), *Colossus*, 80-81.

- 166 Hinsley, 'Introduction to FISH', 141-7.
- 167 F. H. Hinsley et al.,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3, Part 2* (London, 1988), 778-80; David Kenyon, *Bletchley Park and DDay* (New Haven, Conn., 2019), 246.
- 168 Michael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0).
- 169 Rick Stroud, *The Phantom Army of Alamein* (London, 2012), 23-8.
- 170 Charles Cruickshank, *Deception in World War II* (Oxford, 1981), 4-5.
- 171 Michael Handel, 'Introduction: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idem*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7), 15-19.
- 172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23-8.
- 173 Stroud, *Phantom Army*, 80-86; Cruickshank, *Deception*, 20-21.
- 174 Niall Barr, *Pendulum of War: The Three Battles of El Alamein* (London, 2004), 299-301; Cruickshank, *Deception*, 26-33; Stroud, *Phantom Army*, 193-7, 212-18.
- 175 John Campbell, 'Operation Starkey 1943: "a piece of harmless playacting"?', 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92-7.
- 176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104-5.
- 177 Campbell, 'Operation Starkey', 106-7.
- 178 Handel, 'Introduction', 60.
- 179 Thaddeus Holt, *The Deceivers: Allied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565-6.
- 180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122.
- 181 *Ibid.*, 122, 132.
- 182 *Ibid.* 186-93; T. L. Cubbage, 'The German misapprehensions regarding Overlord: understanding failure in estimative process', 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115-18.
- 183 David Glantz, 'The Red mask: the nature and legacy of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175-81, 189.
- 184 Hill, *The Red Army*, 399-400; Glantz, 'Red mask', 204-5.
- 185 Glantz, 'Red mask', 206-9; Kahn, *Hitler's Spies*, 437-9.
- 186 David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9), 1

- 52-3; Hill, *The Red Army*, 444-5.
- 187 Kahn, *Hitler's Spies*, 440-41.
- 188 Jonathan House and David Glantz,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Kans, 1995), 205-6.
- 189 Katherine Herbig, 'American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Pacific', 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260-75; Holt, *The Deceivers*, 730-43.
- 190 Cruickshank, *Deception*, 214-15; Handel, 'Introduction', 50-52.
- 191 Glantz, 'Red mask', 192, 233-8.
- 192 Louis Yelle, 'The learning curve: historical review and comprehensive survey', *Decision Sciences*, 10 (1979), 302-12.
- 193 Hone, *Learning War*, 3.
- 194 Glantz, *Colossus Reborn*, 123-41.
- 195 見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212-35對英國沙漠戰役缺乏效率的描述。
- 196 Patrick Rose, 'Allies at war: British and US Army command culture in the Italian campaign, 1943-194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6 (2013), 47-54. 也可見 L. P. Devine, *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 in Northwest Europe, 1944-5* (London, 2016), 178-82.
- 197 Douglas Ford, 'US assessments of Japanese ground warfare tactics and the army's campaigns in the Pacific theatres, 1943-1945: lessons learned and methods applied', *War in History*, 16 (2009), 330-34, 341-8.
- 198 Rose, 'Allies at war', 65.
- 199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5.
- 200 Andrei Grinev, 'The evaluation of the military qualities of the Red Army in 1941-1945 by German memoirs and analytic material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 (2016), 228-32.
- 201 John Cushma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t the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levels, 1914-45', in Millett and Murray (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iii, 328-31; Richard Carr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ighting power of the Italian Army', *War in History*, 22 (2015), 193-210;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4-10.

## 第六章 經濟戰與戰時經濟

- 1 Russell Buhite and Davi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Norman, Okla, 1992), 172.
- 2 IWM, EDS Mi 14/433 (file 2), Der Führer, 'Vereinfachung und Leistungssteigerung unserer Rüstungsproduktion', 3 Dec. 1941, p. 1.
- 3 Jeffery Underwood, *Wings of Democracy: The Influence of Air Power on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1933-1941* (College Station, Tex., 1991), 155. 羅斯福還希望陸軍與海軍的航空兵力達到五萬架。
- 4 IWM, EDS Mi 14/463 (file 3), OKW 'Aktenvermerk über die Besprechung bei Chef OKW, Reichskanzler, 19 Mai 1941', pp. 2-3.
- 5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901, 'The Rationalisation of the German Armaments Industry', p. 8.
- 6 Rüdiger Hachtmann, 'Fordism and unfree labour: aspects of the work deployment of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in German industry between 1941 and 194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5 (2010), 501. 關於這個問題的通論性討論，見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ch. 11.
- 7 Charles Maier, 'Between Taylorism and technocracy: European ideologies and the vis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 (1970), 33-5, 45-6.
- 8 Jonathan Zeitlin, '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at war: aircraft manufacturers i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1939-1945',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6 (1995), 57.
- 9 Irving B. Holley, 'A Detroit dream of massproduced fighter aircraft: the XP75 fiasco',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8 (1987), 580-82, 585-91.
- 10 Alec Cairncross, *Planning in Wartime: Aircraft Production in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SA* (London, 1991), xv.
- 11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90 IV, 'Rationalization of the Munitions Industry', p. 4.
- 12 Yoshiro Miwa, *Japan's Economic Planning and Mobilization in Wartime: The Competence of the State* (New York, 2016), 413-15.
- 13 John Guilmartin, 'The Aircraft that Decided World War II: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nd Grand Strategy', 44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2001, pp. 17, 22.
- 14 Zeitlin, '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53-5, 59-61; John Rae, *Climb to Greatness*



- : *The American Aircraft Industry 1920-1960* (Cambridge, Mass., 1968), 147-9; Wesley Craven and James Cate,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VI, Men and Planes* (Chicago, Ill., 1955), 217-20, 335-6.
- 15 Benjamin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and the War Economy 1934-1945* (London, 2013), 91-3, 102.
  - 16 Steven Zaloga, *Soviet Lend-Lease Tanks of World War II* (Oxford, 2017), 31-2.
  - 17 Boris Kavalerchik, 'Once again about the T-3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192-5.
  - 18 Joshua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 1937-1953* (Stanford, Calif., 2004), 51-5.
  - 19 Ibid., 64-73.
  - 20 USSBS, Pacific Theater,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Over-All Economic Effects Division', Dec. 1946, p. 221.
  - 21 Ibid., pp. 220-22.
  - 22 Tetsuji Okazaki, 'The supplier network and aircraft production in wartime Jap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4 (2011), 974-9, 984-5.
  - 23 Akira Hara, 'Wartime controls', in 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55* (Oxford, 1999), 273-4.
  - 24 Miwa, *Japan's Economic Planning*, 422-3, 426-7; Masayasu Miyazaki and Osamu Itō,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war years',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289-92.
  - 25 Bernd Martin, 'Japans Kriegswirtschaft 1941-1945', in Friedrich Forstmei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s.),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1939-1945* (Düsseldorf, 1977), 274-8; Jerome Cohen, *Japan's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 (Minneapolis, Minn., 1949), 219; Irving B. Holley, *Buying Aircraft: Material Procurement for the Army Air Forces* (Washington, DC, 1964), 560.
  - 26 Maury Klein, *A Call to Arms: Mobilizing America for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13), 252-4.
  - 27 S. R. Lieberman,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USSR: the wartim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in Susan Linz (ed.),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 (Totowa, NJ, 1985), 60-61.
  - 28 F. Kagan, 'The evacuation of Soviet industry in the wake of Barbarossa: a key to Soviet victory',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History*, 8 (1995), 389-406; G. A. Kumanev, '

- The Soviet economy and the 1941 evacuation', in Joseph Wieczynski (ed.), *Operation Barbarossa: The German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June 22 1941* (Salt Lake City, Utah, 1992), 161-81.
- 29 Lennart Samuelson,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s to 1950s* (Basingstoke, 2011), 196-204.
  - 30 Mark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the defeated victor', in idem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285-6; Mark Harrison, *Accounting for War: Soviet Production, Employment and the Defence Burden 1940-1945* (Cambridge, 1996), 81-5, 101.
  - 31 Hugh Rockoff, *America's Economic Way of War* (Cambridge, 2012), 183-8; Theodore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Leviathan',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175-7, 188.
  - 32 Alan Clive, *State of War: Michigan in World War II* (Ann Arbor, Mich., 1979), 25.
  - 33 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Volume VI*, 339.
  - 34 好的例子見Jacob Meulen, *The Politics of Aircraft: Building an American Military Industry* (Lawrence, Kans, 1991), 182-220.
  - 35 Allen Nevins and Frank Hill, *Ford: Decline and Rebirth 1933-1961* (New York, 1961), 226; Francis Walton, *Miracle of World War II: How American Industry Made Victory Possible* (New York, 1956), 559; Clive, *State of War*, 22.
  - 36 *U. S. Navy at War: 1941-1945. Official Reports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by Fleet Admiral Ernest J. King* (Washington, DC, 1946), 252-84.
  - 37 Kevin Starr, *Embattled Dreams: California in War and Peace 1940-1950* (New York, 2002), 145-9; Frederic Lane, *Ships for Victory: A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under the U.S. Maritime Commission in World War II* (Baltimore, Md, 1951), 53-4, 224ff.; Walton, *Miracle of World War II*, 79; David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9), 225-8.
  - 38 Hermione Giffard, *Making Jet Engines in World War II: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Ill., 2016), 37-41.
  - 39 Steven Zaloga, *Armored Thunderbolt: The U.S. Army Sherman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2008), 43-5, 289-90; David Johnson, *Fast Tanks and Heavy Bombers: Innovation in the U.S. Army 1917-1945* (Ithaca, NY, 1998), 189-97.
  - 40 Overl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259-61; USSBS, 'Overall Report: Euro

pean Theater', Sept. 1945, 31.

- 41 IWM, Speer Collection, FD 5445/45, OKW Kriegswirtschaftlicher Lagebericht, 1 Dec. 1939; EDS, Mi 14/521 (part 1), Heereswaffenamt, 'Munitionslieferung im Weltkrieg'; BA-MA, Wi I F 5.412, 'Aktenvermerk über Besprechung am 11 Dez. 1939 im Reichskanzlei'.
- 42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54, 對史佩爾的審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
- 43 關於勞工，見 IWM, FD 3056/49, 'Statistical Material on the German Manpower Position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9-1944', 31 July 1945, Table 7. 一九三九年，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八點六，一九四〇年是百分六十二點三，一九四一年是百分之六十八點八，一九四二年是百分之七十點四。這些數字在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布。
- 44 NARA, RG 243, entry 32, USSBS Interrogation of Dr Karl Hettlage, 16 June 1945, p. 9.
- 45 Hugh Trevor-Roper (ed.), *Hitler's Table Talk 1941-44* (London, 1973), 633.
- 46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8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istry and the Army Armaments Office', Oct. 1945. 史佩爾認為，參謀本部「對於科技與經濟事務一竅不通」。
- 47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90 I, 對紹爾的審訊，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頁4。
- 48 Lutz Budrass,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Düsseldorf, 1998), 742-6; Rolf-Dieter Müller, 'Speers Rüstungspolitik im totalen Krieg: Zum Beitrag der modernen Militärgeschichte im Diskurs mit de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Militärgeschichtliche Zeitschrift*, 59 (2000), 356-62.
- 49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90 IV, 'Rationalization of the Munitions Industry', p. 44.
- 50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85 II, p. 4. (粗體字為原文所加。)
- 51 Lotte Zumpe, *Wirtschaft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Band I, 1933 bis 1945* (Berlin, 1980), 341-2; Müller, 'Speers Rüstungspolitik', 367-71.
- 52 Müller, 'Speers Rüstungspolitik', 373-7.
- 53 Dieter Eichholt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Band II: Teil II: 1941-1943* (Munich, 1999), 314-15; IWM, Speer Collection, Box 368, Report 90 V, 'Rationalization in the Components Industry', p. 34.

- 54 IWM, EDS, Mi 14/133, Oberkommando des Heeres, 'Studie über die Rüstung 1944', 25 Jan. 1944.
- 55 IWM, EDS AL/1746, Saur interrogation, 10 Aug. 1945, p. 6; 也可見Daniel Uziel, *Arming the Luftwaffe: The German Aviation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Jefferson, NC, 2012), 85-90.
- 56 Lutz Budrass, Jonas Scherner and Jochen Streb, 'Fixed-price contracts, learning, and outsourcing: explaining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output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 (2010), 124.
- 57 Eichholt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Band II*, 265. 這是根據帝國統計局建立的官方指數所估計的數字。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估計在同一時期，德國金屬加工產業的人均產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調查團的數字出自 'Industrial Sales,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Prewar Area of Germany 1939-1944', 15 Mar. 1946, pp. 21-2, 65. 也可見Adam Tooze, 'No room for miracles: German output in World War II reassessed', *Geschichte & Gesellschaft*, 31 (2005), 50-53.
- 58 Willi Boelcke, 'Stimulation und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der deutschen Luftrüstungsindustrie während der Aufrüstungs- und Kriegsphase', in Horst Boog (ed.), *Luftkriegsfüh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Herford, 1993), 103-4.
- 59 Hermione Giffard, 'Engines of desperation: jet engines, production and new weapons in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822-5, 830-37.
- 60 Uziel, *Arming the Luftwaffe*, 259-61. 關於研究社群的孤立問題，見Helmut Trischler, 'Die Luftfahrtforschung im Dritten Reich: Organisation, Steuerung und Effizienz im Zeichen von Aufrüstung und Krieg', in Boog (ed.), *Luftkriegsführung*, 225-6.
- 61 W. Averell Harriman and Eli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5* (London, 1945), 90-91.
- 62 David Reynolds and Vladimir Pechatnov (eds.), *The Kremlin Letters: Stalin's Wartime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New Haven, Conn., 2018), 62-3, Stalin to Roosevelt, 7 Nov. 1941.
- 63 Charles Marshall, 'The Lend-Lease oper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5 (1943), 187.
- 64 德國的數字出自IWM, Reich Air Ministry records, FD 3731/45, Deliveries to neutrals and allies, May 1943-Feb. 1944; 美國的數字出自Office of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Statistics: Lend-Lease', 15 Dec. 1952, 33.
- 65 IWM, FD 3731/45, Position of deliveries to neutrals and allies, 18 June 1943, 18 Au



- g. 1943; Berthold Puchert, 'Deutschlands Aussenhandel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Dietrich Eichholtz (ed.), *Krieg und Wirtschaft: Studien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9-1945* (Berlin, 1999), 277; Rotem Kowner, 'When economics, strategy and racial ideology meet: interAxis connections in the wartim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2017), 231-4, 235-6.
- 66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515-16.
- 67 數字出自Combined Intelligence Objectives Sub-Committee, 'German Activities in the French Aircraft Industry', 1946, Appendix 4, pp. 79-80.
- 68 Jochen Vollert, *Panzerkampfwagen T34747 (r): The Soviet T-34 Tank as Beutepanzer and Panzerattrappe in German Wehrmacht Service 1941-45* (Erlangen, 2013), 16, 33-4; 美國的數字出自Office of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p. 25.
- 69 Mark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 2000), 29-30; Matthew Jone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ar, 1942-44* (London, 1996), 6, 11-13.
- 70 Ted Morgan, *FDR: A Biography* (New York, 1985), 579; Klein, *A Call to Arms*, 134-5.
- 71 Warren Kimball (ed.), *Churchill &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ume 1, Alliance Emerging* (London, 1984), 102-9, 邱吉爾給羅斯福的電報，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
- 72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40-42.
- 73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74-5.
- 74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164, 169-70.
- 75 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The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London, 1986), 331-2, entry for 11 Jan. 1941.
- 76 Andrew Johnstone, *Against Immediate Evil: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Four Freedom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Ithaca, NY, 2014), 116-21; Morgan, *FDR*, 580-81.
- 77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45-6.
- 78 Hans Aufricht, 'Presidential power to regulate commerce and LendLease trans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6 (1944), 66-7, 71.

- 79 Richard Overy, 'Co-operation: trade, aid and technology', in Kimball, Reynolds and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213-14.
- 80 Gavin Bailey, "'An opium smoker's dream": the 4000-bomber plan and Anglo-American aircraft diplomacy at the Atlantic Conference, 1941', *Journal of Transatlantic Studies*, 11 (2013), 303;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50. 關於英國的讓步，見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2 vols. (New York, 1948), ii, 1151-3.
- 81 William Grieve,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1941-1942: Lend-Lease Logistics, Politics and the Tangles of Wartime Cooperation* (Jefferson, NC, 2014), 155-7.
- 82 J. Garry Clifford and Robert Ferrell, 'Roosevelt at the Rubicon: the great convoy debate of 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12-17.
- 83 Kevin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Anglo-American Logistics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96), 67-9.
- 84 Elliott Roosevelt (ed.),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ume Three, 1928-1945* (London, 1952), 366, letter to Senator Josiah Bailey, 13 May 1941.
- 85 Fred Israel (ed.), *The War Diary of Breckinridge Long: Selections from the Years 1939-1944* (Lincoln, Nebr., 1966), 208.
- 86 Johnstone, *Against Immediate Evil*, 156-7.
- 8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1, 1, pp. 769-70 and 771-2, 與蘇聯大使對話的備忘錄，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史坦哈特給赫爾的信，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 88 Richard Leighton and Robert Coakley, *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0-1943* (Washington, DC, 1955), 98-102; FRUS, 1941, 1, pp. 815-16, Sumner Welles to Ouman sky, 2 Aug. 1941.
- 89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What Britain Has Done, 1939-1945*, 9 May 1945 (reissued, London, 2007), 98-9.
- 90 Aufricht, 'Presidential power', 74.
- 91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6-8.
- 92 轉引自Edward Stettinius in his wartime diary, *The Diaries of Edward R. Stettinius, Jr., 1943-1946* (New York, 1975), 61, entry for 19 Apr. 1943.

- 93 H. Duncan Hall, *North American Supply* (London, 1955), 432;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Britain's Part in Lend-Lease and Mutual Aid', Apr. 1944, 3-4, 15-16.
- 94 Hector Mackenzie, 'Transatlantic generosity: Canada's "Billion Dollar Gif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4 (2012), 293-308.
- 95 Alexander Lovelace, 'Amnesia: how Russian history has viewed LendLeas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 (2014), 593; 'second fronts' in Alexander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 (London, 1964); H. Van Tuyl, *Feeding the Bear: American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New York, 1989), 156-61.
- 96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25-34.
- 97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Britain's Part', 6-8; Marshall, 'The Lend-Lease operation', 184-5.
- 98 David Zimmerman, 'The Tizard 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War in History*, 2 (1995), 268-70.
- 99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4* (New York, 1984), 4-5, 16-32; Donald Avery, 'Atomic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rivalry among the Allies: the Anglo-Canadian Montreal laboratory and the Manhattan Project, 1943-1946', *War in History*, 2 (1995), 281-3, 288.
- 100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61-7.
- 101 Ibid., 177-83.
- 102 Arnold Hague, *The Allied Convoy System 1939-1945* (London, 2000), 187.
- 103 V. F.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deliveries through "lendleas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0 (1997), 154.
- 104 Ibid., 155; Zaloga, *Soviet Lend-Lease Tanks*, 43.
- 105 British War Office, *Paiforce: The Official Story of the Persia and Iraq Command 1941-1946* (London, 1948), 97-105.
- 106 Ashley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Iran and Iraq* (New Haven, Conn., 2018), 297-307, 348-9.
- 107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156-65.
- 108 Griev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32-3, 135-8.
- 109 Ibid., 151-5; Edward Stettinius, *LendLease: Weapon for Victory* (London, 1944), 166-70.
- 110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11), 271.

- 111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109, 115, 125.
- 112 Bailey, “‘An opium smoker’s dream’”, 294-8.
- 113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33-4.
- 114 Alexander Hill, ‘British Lend-Lease aid to the Soviet war effort, June 1941-June 1942’,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1 (2007), 787-97; Zaloga, *Soviet LendLease Tanks*, 10-11, 26-7, 31-2.
- 115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109; Robert Coakley and Richard Leighton, *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3-1945* (Washington, DC, 1968), 679.
- 116 John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The Story of American Efforts at War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London, 1947), 84.
- 117 G. C. Herring, ‘LendLease to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4-194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1969), 93-114.
- 118 Lovelace, ‘Amnesia’, 595-6.
- 119 Boris Sokolov, ‘LendLease in Soviet military efforts, 1941-19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7 (1994), 567-8; Jerrold Schecter and Vyacheslav Luchkov (eds.),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New York, 1990), 84.
- 120 Denis Havlat, ‘Western aid for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orld War II: Part I’,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0 (2017), 314-16; Zaloga, *Soviet LendLease Tanks*, 30.
- 121 Van Tuyll, *Feeding the Bear*, 156-7; Joan Beaumont, *Comrades in Arms: British Aid to Russia, 1941-1945* (London, 1980), 210-12.
- 122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169-72.
- 123 Alexander Hill, ‘The bear’s new wheels (and tracks): US-armored and other vehicles and Soviet military effectivenes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5 (2012), 214-17.
- 124 H. G. Davie, ‘The influence of railway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Russo-German War 1941-19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0 (2017), 341-3.
- 125 Sokolov, ‘Lend-Lease’, 570-81.
- 126 Havlat, ‘Western aid’, 297-8.
- 127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122-3.
- 128 Neville Wylie, ‘Loot, gold and tradi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s financial warfare strategy 1939-194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 (2005), 299-328.



- 129 Edward Ericson, *Feeding the German Eagle: 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 1933-1941* (Westport, Conn., 1999), 195-6.
- 130 見Dietrich Eichholtz, *Krieg um Öl: Ein Erdölimperium als deutsches Kriegsziel (1938-1943)* (Leipzig, 2006), 90-100.
- 131 USSBS, Report 109, Oil Division Final Report, 25 Aug. 1945, 18-19.
- 132 Walth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Munich, 1965), 46, Weisung Nr. 9 'Richtlini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gegen die feindliche Wirtschaft', 29 Nov. 1939.
- 133 Ibid., 118-19, Weisung Nr. 23 'Richtlini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gegen die englische Wehrwirtschaft', 6 Feb. 1941.
- 134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9.
- 135 Sönke Neitzel, *Der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über dem Atlantik und der Nordsee 1939-1945* (Bonn, 1995), 49-50.
- 136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285, Report on a conference between the C.inC. Navy and the Fuehrer, 15 June 1942.
- 137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249;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07-8; Edward von der Porten, *The German Navy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69), 174-8; Stephen Roskill, *The War at Sea 1939-1945*, 4 vols. (London, 1954-61), i, 500, 603.
- 138 BAMA, RL2 IV/7, Otto Bechtle lecture 'Grossangriffe bei Nacht gegen Lebenszentren Englands, 12.8.1940-26.6.1941'.
- 139 TsAMO, Moscow, Fond 500/725168/110, Luftwaffe Operations Staff, report on British targets, 14 Jan. 1941.
- 140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79;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77-8.
- 141 Overy, *The Bombing War*, 113-14.
- 142 AHB Translations, vol. 5, VII/92, 'German Aircraft Losses (West), Jan-Dec 1941.
- 143 Neitzel,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125.
- 144 David White, *Bitter Ocean: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39-1945* (New York, 2006), 297-8.
- 145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20.
- 146 Marc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Stroud, 2005), 85-9; Michael Hadley, *U-Boats against Canada: German Submarines in Canadian Waters* (Montreal, 1985), 52-5.

- 147 Hadley, *UBoats against Canada*, 112-13.
- 148 Christopher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Oxford, 2013), 259-79.
- 149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16;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85-9; Jürgen Rohwer, *The Critical Convoy Battles of March 1943* (Annapolis, Md, 1977), 36; Patrick Beesly, *Very Special Intelligence: The Story of the Admiralty's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re 1939-1945* (London, 1977), 182.
- 150 Karl Dönitz, *Memoirs: Ten Years and Twenty Days* (London, 1959), 253, 315.
- 151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257.
- 152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334, 海軍總部與元首會議紀要，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 153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251-3.
- 154 Edward Miller,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d, 1991), 21-8.
- 155 Ibid., 344, 348-50.
- 156 Conrad Crane, *American Airpower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Bombs, Cities, Civilians and Oil* (Lawrence, Kans, 2016), 30.
- 157 TNA, AIR 9/8, 'Note upon the Memorandum of the Chief of the Naval Staff', May 1928.
- 158 William Medlicott, *The Economic Blockade: Volume I* (London, 1952), 13-16.
- 159 Richard Hammond, 'British policy on total maritime warfare and the anti-shipping campaign in the Mediterranean 1940-194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6 (2013), 792-4.
- 160 TNA, AIR 14/429, 'Air Ministry Instructions and Notes on the Rules to be Observed by the Royal Air Force in War', 17 Aug. 1939; AIR 41/5, J. M. Spaight,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Air 1939-1945', p. 7.
- 161 Joel Hayward, 'Air power, ethics and civilian immunit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Global War Studies*, 7 (2010), 127-9; Peter Gray, 'The gloves will have to come off: a reappraisal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AF Bombe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Air Power Review*, 13 (2010), 13-14, 25-6.
- 162 Clay Blair, *Silent Victory: 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Philadelphia, Pa, 1975), 106.
- 163 Hammond, 'British policy on total maritime warfare', 796-7.
- 164 Jack Greene and Alessandro Massignani, *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940-*

- 1943 (London, 1998), 266-7; Hammond, 'British policy on total maritime warfare', 803.
- 165 Marc'Antonio Bragadin, *The Italian Navy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57), 245-9.
- 166 Ibid., 364-5; Hammond, 'British policy on total maritime warfare', 807. 軸心國在地中海的損失數字有好幾種估計結果。英國海軍部認為戰爭期間擊沉了一千五百四十四艘船，總計四百二十萬噸。見Robert Ehlers, *The Mediterranean Air War: Airpower and Alli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5), 403.
- 167 這是Martin van Creveld,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Cambridge, 1977), 198-200做出的結論。
- 168 Bragadin, *Italian Navy*, 356. 一九四一年是八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噸，一九四二年則是五萬六千兩百零九噸。
- 169 Vera Zamagni, 'Italy: how to win the war and lose the pea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88
- 170 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 *Statistiche storiche dell'Italia 1861-1975* (Rome, 1976), 117.
- 171 Hammond, 'British policy on total maritime warfare', 808; Christina Goulter, *Forgotten Offensive: Royal Air Force Coastal Command's AntiShipping Campaign, 1940-1945* (Abingdon, 2004), 296-8, 353.
- 172 Charles Webster and Noble Frankland, *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 Volume IV* (London, 1961), 99-102, 109.
- 173 引自Edward Westermann, *Flak: German Anti-Aircraft Defences, 1914-1945* (Lawrence, Kans, 2001), 90.
- 174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iv, 205, 'Report by Mr. Butt to Bomber Command, 18 August 1941'; Randall Wakelam, *The Science of Bombing: Operational Research in RAF Bomber Command* (Toronto, 2009), 42-6.
- 175 CCAC, Bufton Papers, 3/48, Review of the present strategical air offensive, 5 Apr. 1941, App. C, p. 2.
- 176 TNA, AIR 40/1814, memorandum by O. Lawrence (MEW), 9 May 1941.
- 177 Richard Overy, "The weak link"? The perception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by RAF Bomber Command, 1940-1945', *Labour History Review*, 77 (2012), 25-7.
- 178 RAF Museum, Hendon, Harris Papers, Misc. Box A, Folder 4, 'One Hundred Towns of Leading Economic Importance in the German War Effort', n.d.

- 179 Haywood Hansell, *The Air Plan that Defeated Hitler* (Atlanta, Ga, 1972), 81-3, 298-307.
- 180 Stephen McFarland and Wesley Newton 'The American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in World War II', in R. Cargill Hall (ed.), *Case Studies in Strategic Bombardment* (Washington, DC, 1998), 188-9.
- 181 Crane, *American Airpower Strategy*, 32-3.
- 182 LC, Spaatz Papers, Box 67, 'Plan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mbined Bomber Offensive. Annex: Prospect for Ending War by Air Attack against German Morale', 5 Mar. 1944, p. 1.
- 183 Friedhelm Golücke, *Schweinfurt und der strategische Luftkrieg* (Paderborn, 1980), 134, 356-7; Richard Davis, *Bombing the European Axis Powers: A Historical Digest of the Combined Bomber Offensive, 1939-1945* (Maxwell, Ala, 2006), 158-61.
- 184 Richard Davis, *Carl A. Spaatz and the Air War in Europe* (Washington, DC, 1993), 322-6, 370-79; Williamson Murray, *Luftwaffe: Strategy for Defeat 1933-1945* (London, 1985), 215.
- 185 Overy, *The Bombing War*, 370-71.
- 186 USSBS, Oil Division Final Report, 17-26, figs. 49, 60.
- 187 Alfred Mierzejewski,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War Economy: Allied Air Power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Railway* (Chapel Hill, NC, 1988), 191-3; AHB, German translations, vol. VII/23, 'Some Effects of the Allied Air Offensive on German Economic Life', 7 Dec. 1944, pp. 1-2 and vol. VII/38, Albert Speer to Wilhelm Keitel (OKW), 'Report on the Effects of Allied Air Activity against the Ruhr', 7 Nov. 1944.
- 188 LC, Spaatz Papers, Box 68, USSTAF HQ, 第九航空軍對戈林的審訊,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
- 189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iv, 469-70, 494, Appendix 49 (iii) and 49 (xxii); Rolf Wagenfüh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im Kriege 1939-1945* (Berlin, 1963), 178-81.
- 190 USSBS, Overall Report (European Theater), 25-6, 37-8, 73-4; USSBS, Oil Division Final Report, Fig. 7.
- 191 Sebastian Cox (ed.),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British Bombing Survey Unit* (London, 1998), 94-7, 129-34, 154.
- 192 UEA, Zuckerman Archive, SZ/BBSU/103, Nicholas Kaldor typescript, 'The Nature of Strategic Bombing', pp. 4-6; Kaldor typescript, 'Capacity of German Industry', pp.



. 2-5.

- 193 LC, Spaatz Papers, Box 68, Galbraith memorandum, 'Preliminary Appraisal of Achievement of the Strategic Bombing of Germany', p. 2.
- 194 Werner Wolf, *Luftangriffe auf die deutsche Industrie, 1942-45* (Munich, 1985), 60, 74.
- 195 BAB, R3102/10031, Reichsministerium für 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Vorläufige Zusammenstellung des Arbeiterstundenausfalls durch Feindeinwirkung', 4 Jan. 1945.
- 196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iv, 494-5, 501-2; Cox (ed.), *The Strategic Air War*, 97.
- 197 Miwa, *Japan's Economic Planning*, 240; Akira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41-3.
- 198 Miyazaki and Itō,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war years',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290-91; Theodore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49), 523.
- 199 Hara, 'Wartime controls', in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271, 277; *idem*, 'Japan: guns before rice', 245.
- 200 Blair, *Silent Victory*, 118-19, 361.
- 201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Two-Ocean Wa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oston, Mass., 1963), 494-9; Blair, *Silent Victory*, 552.
- 202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215-17.
- 203 USSBS, Pacific Theater,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35-42; Blair, *Silent Victory*, 816. 完整的描述見Phillips O'Brien, *How the War Was Won* (Cambridge, 2015), pp. 432-44.
- 204 Michael Sturma, 'Atrocities, conscience, and unrestricted warfare: US submarin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16 (2009), 455-6; Hara, 'Wartime controls', 277.
- 205 Thomas Searle,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 the firebombing of Tokyo in March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 (2002), 108-12.
- 206 William Ralph, 'Improvised destruction: Arnold, LeMay, and the firebombing of Japan', *War in History*, 13 (2006), 502-3.
- 207 Searle,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 119-21.
- 208 Conrad Crane, 'Evolution of U.S. strategic bombing of urban areas', *Historian*, 50 (1

- 987), 36-7.
- 209 Ralph, 'Improvised destruction', 521-2.
- 210 USSBS, Pacific Theater,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205.
- 211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453;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245; USSBS, Pacific Theater,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180-81.
- 212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523;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245; Barrett Tillman, *Whirlwind: The Air War against Japan 1942-1945* (New York, 2010), 194-9.
- 213 UEA, Zuckerman Archive, SZ/BBSU/3, 雷霆演習的粗略筆記，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至十六日。
- 214 TNA, AIR 20/2025, Casualties of RAF, Dominion and Allied Personnel at RAF Post ing Disposal, 31 May 1947; AIR 22/203, War Room Manual of Bomber Command Operations 1939-1945, p. 9; US figures in Davis, *Carl A. Spaatz*, App 4, 9.
- 215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07;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523.
- 216 Roscoe, *United States Submarine Operations*, 493; Blair, *Silent Victory*, 877.

## 第七章 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

- 1 Dennis Wheatley, *Total War: A Paper* (London, 1941), 17.
- 2 Ibid., 18, 20.
- 3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 44-9.
- 4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Oxford, 1954), 469. 這段文字譯自《三國同盟條約》德文版。原文是用英文寫成，寫的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適當的地方」而非德文的「每個民族都應取得其應得的空間」。德文版使用「空間」一詞，使得新秩序明顯具有領土的性質。
- 5 Eric Johnson and KarlHeinz Reuband, *What We Knew: Terror, Mass Murder and Everyday Life in Germany* (London, 2005), 106. 也可見Nick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 (London, 2015), 15-17.
- 6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46-50.
- 7 Peter Duus, 'Nagai Ryutaro and the "White Peril", 1905-194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1971), 41-4.

- 8 Sidney Paish, '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i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53-5, 57-8.
- 9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1986), 205-6.
- 10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36, 141-3.
- 11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Letters and Notes* (London, 1973), 227, 307, notes for speeches 1919/20.
- 12 André Mineau, 'Himmler's ethic of duty: a moral approach to the Holocaust and to Germany's impending defeat', *The European Legacy*, 12 (2007), 60; Alon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The Nazi Imagination from Persecution to Genocide* (New Haven, Conn., 2014), 152-3.
- 13 Randall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in Nazi propa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1 (2005), 37-9;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153-5.
- 14 Heinrich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A History of the West, 1914-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87-91.
- 15 Randall Bytwerk, 'Believing in "inner truth":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and Nazi propaganda 1933-1945',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9 (2005), 214, 221-2.
- 16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2006), 61-2.
- 17 Ibid., 64-5.
- 18 Tobias Jersak, 'Die Interaktion von Kriegsverlauf und Judenvernichtung: ein Blick auf Hitlers Strategie im Spätsommer 1941',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8 (1999), 311-74;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42-3; Herf, *The Jewish Enemy*, 110.
- 19 Helmut Sündermann, *Tagesparolen: Deutsche Presseweisungen 1939-1945. Hitlers Propaganda und Kriegführung* (Leoni am Starnberger See, 1973), 203-4.
- 20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194.
- 21 Sündermann, *Tagesparolen*, 255, press directive of 13 Aug. 1943.
- 22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51, 引自 *Sprechabenddienst* (evening discussion service) circular for Sept./Oct. 1944.

- 23 François Genoud (ed.),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February-April 1945* (London, 1961), 33, 51-2, 76, entries for 1-4 Feb., 13 Feb., 18 Feb. 1945.
- 24 NARA, RG 238 Jackson Papers, Box 3, translation of letter from Ley to attorney Dr Pflücker, 24 Oct. 1945 (not sent).
- 25 Mineau, 'Himmler's ethic of duty', 63, 出自一九四四年對德國反情報局（Abwehr）軍官的演講：「鐵一般的理由是，我們必須避免錯誤地感情用事，才能打贏這場以種族延續為賭注的戰爭。」亦可見Claudia Koonz, *The Nazi Conscience* (Cambridge, Mass., 2003), 254, 265;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Holocaust: basis and objective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 in Martina Steber and Bernhard Gotto (eds.), *Visions of Community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14), 219-23.
- 26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49.
- 27 Gao Bei, *Shanghai Sanctu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I* (Oxford, 2013), 20-25, 93-4, 104-7, 116-25.
- 28 Amedeo Guerrazzi, 'Die ideologischen Ursprünge der Judenverfolgung in Italien', in Lutz Klinkhammer and Amedeo Guerrazzi (eds.), *Die 'Achse' im Krieg: Politik, Ideologie und Kriegfü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2010), 437-42.
- 29 Simon Levis Sullam, 'The Italian executioners: revisiting the role of Italians in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3-8.
- 30 Joseph Stalin, *The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ew York, 1942), 30,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的演說。
- 31 Oleg Budnitskii,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nd Soviet society: defeatism 1941-42', *Kritika*, 15 (2014), 794.
- 32 R. Buhite and 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Norman, Okla, 1992), 198, talk of 9 Dec. 1941.
- 33 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1946), 416.
- 34 Stalin,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30; Susan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Patriotism and War Propagand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Iraq* (New York, 2009), 87.
- 35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Speeches of Generalissimo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London, 1944), 32-3,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向中國人民的致詞。
- 36 Martin Gilbert, *Finest Hour: Winston S. Churchill, 1939-1941* (London, 1983), 329-30.



- 37 Keith Robbins, 'Britain, 1940 and "Christian Civilisation"', in Derek Beales and Geoffrey Best (eds.),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Churches: Essays in Honour of Owen Chadwick* (Cambridge, 1985), 285, 294.
- 38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17.
- 39 Wheatley, *Total War*, 33, 54.
- 40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88.
- 41 關於那個時代的焦慮，見Richard Overly, *The Morbid Ag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London, 2009); Roxanne Panchasi, *Future Tense: The Culture of Anticipation i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thaca, NY, 2009).
- 42 Harold Nicolson, *Why Britain is at War* (London, 1939), 135-6, 140.
- 43 Jacques Maritain, *De la justice politique: Notes sur la présente guerre* (Paris, 1940), 23; Hugh Dalton, *Hitler's War: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40), 102.
- 44 Robbins, 'Britain, 1940 and "Christian Civilisation"', 279, 288-91; Maritain, *De la justice politique*, ch. 3, 'Le renouvellement moral'.
- 45 Friends House, London, Foley Papers, MS 448 2/2, 'An Appeal Addressed to All Christians', 8 Feb. 1945
- 46 Nicolson, *Why Britain is at War*, 132-3.
- 47 University Labour Federation, 'How we can end the War', Pamphlet No. 5, 1940, 4-5.
- 48 Penny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NY, 1997), 31 (引自the American newspaper Courier ).
- 49 James Sparrow, *Warfare State: World War II Americans and the Age of Big Government* (New York, 2013), 44-5; Robert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Forging American Obligation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2004), 40-46.
- 50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42-5.
- 51 H. V. Morton, *Atlantic Meeting* (London, 1943), 126-7, 149-51.
- 52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26.
- 53 Gerhard Weinberg, *Visions of Victory: The Hopes of Eight World War II Leaders* (Cambridge, 2005), 86-9;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11), 186.
- 54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217, broadcast of 23 Feb. 1942.

- 55 Stephen Wertheim, 'Instrumental inter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0-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4 (2019), 266-80.
- 56 Michaela Moore, *Know Your Enemy: The American Debate on Nazism, 1933-1945* (New York, 2010), 119.
- 57 Richard Overy, *Interrogations: The Nazi Elite in Allied Hands* (London, 2001), 6-8.
- 58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Briand-Kellogg Pact of Paris: Articles of Interpretation as Adopted by the Budapest Conference 1934* (London, 1934), 1-2, 7-10.
- 59 Howard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The Twentieth-century Experience* (Lawrence, Kans, 1999), pp. 85-7.
- 60 Genoud (ed.),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108, entry for 2 Apr. 1945.
- 61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46.
- 62 David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Diplomacy & Statecraft*, 26 (2015), 464.
- 63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244-5, entry for 12 Dec. 1939.
- 64 Ibid., 258-9, entry for 13 Mar. 1940.
- 65 Elliott Roosevelt (ed.),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ume Three, 1928-1945* (London, 1952), 290, Roosevelt to Lincoln MacVeagh, 1 Dec. 1939.
- 66 George Sirgiovanni, *An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AntiCommun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NJ, 1990), 33-4, 36; David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FDR's embassy Moscow and US-Sovi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 (2011), 306-7.
- 67 Roosevelt (ed.), *Roosevelt Letters*, 292-3, letter from Roosevelt to William Allen White, 14 Dec. 1939.
- 68 James Harris, 'Encircled by enemies: Stalin's percept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1918-1941',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1 (2008), 534-43.
- 69 Fridrikh Firsov, Harvey Klehr and John Haynes, *Secret Cables of the Comintern 1933-1943* (New Haven, Conn., 2014), 140-41, 175. 70. Ibid., 153-7, 164.
- 70 Ibid., 153-7, 164.
- 71 *Daily Worker*, 21 Jan. 1941, 4.
- 72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368, entry for 27 June 1941.
- 73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3-5;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277-8, broadcast of 24 Dec. 1943.

- 74 Firsov, Klehr and Haynes, *Secret Cables of the Comintern*, 184-5.
- 75 關於合作的希望，見Martin Folly, *Churchill, Whitehall,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0-1945* (Basingstoke, 2000), 78-9, 165-6.
- 76 TNA, FO 800/868, Desmond Morton to Lord Swinton, 11 Nov. 1941; Morton to Robert Bruce Lockhart, 15 Nov. 1941.
- 77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3-5; Frank Warren, *Noble Abstractions: American Liberal Intellectuals and World War II* (Columbus, Ohio, 1999), 181-4.
- 78 'Britain, Russia and Peac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USSR, 4-5 Nov. 1944, 14-15.
- 79 Gorodetsky (ed.), *Maisky Diaries*, 411, 436, 475, entries for 15 Feb., 24 June 1942, 5 Feb. 1943.
- 80 'Britain, Russia and Peace', 3-4.
- 81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49-56.
- 82 Daniel Lomas, 'Labour ministers, intelligence and domestic anti-communism 1945-1951',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12 (2013), 119; Christopher Andrew, *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The Authorized History of MI5* (London, 2009), 273-81.
- 83 Gorodetsky (ed.), *Maisky Diaries*, 509-10.
- 84 Andrew Thorpe, *Parties at War: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Second World War Britain* (Oxford, 2009), 39-40.
- 85 John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The Story of American Efforts at War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London, 1947), 319.
- 86 Jonathan Haslam, *Russia's Cold War: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the Wall* (New Haven, Conn., 2011), 23-32;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1939-1945',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 *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49-59.
- 87 John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2005), 24.
- 88 Warren, *Noble Abstractions*, 172-4.
- 89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58, 85-6;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318-24.
- 90 NARA, RG 238, Box 32, 譯自'Secret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German-Soviet Pact of 23.8.39';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303.

- 91 Arkady Vaksberg, *The Prosecutor and the Prey: Vyshinsky and the 1930s Show Trials* (London, 1990), 259; S. Mironenko, 'La 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sur le procès de Nuremberg dans les archives d'état de la federation russe', in Anna Wiewiorka (ed.), *Les procès de Nuremberg et de Tokyo* (Paris, 1996), 65-6.
- 92 關於蘇聯危害人類的罪行，最近出現了兩個傑出的說明，見Golfo Alexopoulos, *Illness and Inhumanity in Stalin's Gulag* (New Haven, Conn., 2017) and Jörg Baberowski, *Scorched Earth: Stalin's Reign of Terror* (New Haven, Conn., 2016), esp. chs. 5-6.
- 93 Achim Kilian, *Einzuweisen zur völligen Isolierung. NKWD-Speziallager Mühlberg/Eibe 1945-1948* (Leipzig, 1993), 7.
- 94 Andrew Stone, "'The differences were only in the details": the moral equivalency of Stalinism and Nazism in Anatoli Bakanichev's *Twelve Years Behind Barbed Wire*', *Kritika*, 13 (2012), 123, 134.
- 95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462-3.
- 96 David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A. Philip Randolph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World War II Era* (New York, 2014), 86-9.
- 97 Ronald Takaki, *Double Victory: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0), 6.
- 98 Thomas Sugrue, 'Hillburn, Hattiesburg and Hitler: wartime activists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in Kevin Kruse and Stephen Tuck (eds.), *Fog 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2012), 91.
- 99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89.
- 100 Sugrue, 'Hillburn, Hattiesburg and Hitler', 91-2.
- 101 Ibid., 93-4;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xx-xxi, 112.
- 102 Julian Zelizer, 'Confronting the roadblock: Congress, Civil Rights, and World War II', in Kruse and Tuck (eds.), *Fog of War*, 38-40.
- 103 Daniel Kryder, *Divided Arsenal: Race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uring World War II* (Oxford, 2000), 208-10, 248-9.
- 104 Takaki, *Double Victory*, 28-9.
- 105 Chris Dixon,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Cambridge, 2018), 68.
- 106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112.
- 107 Takaki, *Double Victory*, 53.



- 108 Kryder, *Divided Arsenal*, 3.
- 109 Ibid, 229-32;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121-2;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2017), 520.
- 110 Kryder, *Divided Arsenal*, 208-10; Takaki, *Double Victory*, 43-4.
- 111 Kenneth Janken, 'From colonial liberation to Cold War liberalism: Walter White, the NAACP, and foreign affairs, 1941-1955',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 (1998), 1076-8.
- 112 Ibid., 1079;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2-5
- 113 Elizabeth Borgwardt, 'Race, righ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t the U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a contested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Kruse and Tuck (eds.), *Fog of War*, 188-90, 192-6;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81-2.
- 114 Janken, 'From colonial liberation', 1082;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457-9.
- 115 J. B. Schechtman, 'The USSR, Zionism and Israel',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1978), 118; Nora Levin, *Paradox of Survival: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2 vols. (London, 1990), i, 275-6.
- 116 Ben -Cion Pinchuk, *Shtetl Jews under Soviet Rule: Eastern Poland on the Eve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0), 39, 55, 129-31.
- 117 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Oxford, 1979), 7, 11.
- 118 Ibid., 18-20; Louise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Jewish Refugees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2000), 140.
- 119 Takaki, *Double Victory*, 195; Joseph Bendersky, 'Diss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the 1941 American debate over anti-Semitis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4 (2010), 89.
- 120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46-7; Takaki, *Double Victory*, 195-6.
- 121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305.
- 122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52.
- 123 Leah Garrett, *X-Troop: The Secret Jewish Commandos who Helped Defeat the Nazis* (London, 2021), 26-41.
- 124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54-76.
- 125 Michael Fleming, 'Intelligence from Poland on Chelmno: British responses', *Holocaust Studies*, 21 (2015), 172-4, 176-7; Jan Láníček, 'Governments-in-exile and the Je

- ws during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olocaust Studies*, 18 (2012), 73-5.
- 126 Fleming, 'Intelligence from Poland', 174-5.
- 127 David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5* (New York, 1984), 43-5; Zohar Segev,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during the Holocaust: Between Activism and Restraint* (Berlin, 2017), 23-6.
- 128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207-8.
- 129 Wyman,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73-5.
- 130 Leonid Smilovitskii, 'Antisemitism in the Soviet partisan movement 1941-1945: the case of Beloruss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0 (2006), 708-9; Jeffrey Herf, 'The Nazi extermination camps and the ally to the East: could the Red Army and Air Force have stopped or slowed the Final Solution?', *Kritika*, 4 (2003), 915-16; Alexander Gogun, 'Indifference, suspicion, and exploitation: Soviet units behind the front lines of the Wehrmacht and Holocaust in Ukraine, 1941-4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381-2.
- 131 Lániček, 'Governments-in-exile', 76.
- 132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205-6, 218;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183, 188.
- 133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190-203; Shlomo Aronson, *Hitler, the Allies and the Jews* (New York, 2004), 85-100; Takaki, *Double Victory*, 205-6.
- 134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304.
- 135 Segev,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26-30.
- 136 Laurel Leff, *Buried by the Times: The Holocaust and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New York, 2005), 330-41.
- 137 Bendersky, 'Diss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89-96; Takaki, *Double Victory*, 189-91.
- 138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34, 351.
- 139 Segev,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41.
- 140 Lániček, 'Governments-in-exile', 81-5;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295-302.
- 141 Rainer Schulze, 'The *Heimschaffungsaktion* of 1942-3: Turkey, Spain and Portugal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German offer of repatriation of their Jewish citizens', *Holocaust Studies*, 18 (2012), 54-8.
- 142 Overy, *Interrogations*, 48-9, 178-9.

- 143 Bendersky, 'Diss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108-9;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448-55.
- 144 Kenneth Rose, *Myth and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8), 1-7.
- 145 Parliamentary Peace Aims Group, 'Towards a Total Peace: A Restatemen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1943, 4.
- 146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12,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18 Feb. 1942.
- 147 Sonya Rose, *Which People's War?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Wartime Britain 1939-1945* (Oxford, 2003), 286-9.
- 148 Frank Bajohr and Michael Wildt (eds.), *Volksgemeinschaft: Neue Forschungen zur Gesell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Main, 2009), 7-9;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king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 in Steber and Gotto (eds.), *Visions of Community*, 240-53.
- 149 Michael David Fox, 'The people's war: ordinary people and regime strategies in a world of extremes', *Slavic Review*, 75 (2016), 552; Anika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An Oral History of Nazi Genocide in Belorussia* (New York, 2015), 140.
- 150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199, broadcast of 9 Dec. 1941.
- 151 Luigi Petrella, *Staging the Fascist War: The Ministry of Popular Culture and Italian Propaganda on the Home Front, 1938-1943* (Bern, 2016), 142-3; Romano Canosa, *I servizi segreti del Duce: I persecutori e le vittime* (Milan, 2000), 387-93.
- 152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40,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22 Oct. 1942.
- 153 關於蔣介石的號召面臨的問題，見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London, 2013), 177-82;關於通敵見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Stanford, Calif., 2001), 3-12;關於共產黨的動員，見Lifeng Li, 'Rur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 (2015), 97-104.
- 154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46,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31 Oct. 1942.
- 155 Bajohr and Wildt (eds.), *Volksgemeinschaft*, 7.
- 156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Lawrence, Kans, 2015), 13-14.

- 157 Sparrow, *Warfare State*, 72-3;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8-9.
- 158 William Tuttle, 'Daddy's Gone to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Children* (New York, 1993), 115-16, 118, 121-3.
- 159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66-70, 87.
- 160 Sparrow, *Warfare State*, 65.
- 161 Ian 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Home Front Morale and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79), endpapers.
- 162 Budnitskii,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771-81;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Oxford, 2017), 21, 29-31. 叛逃人數沒有精確的數字，二十萬人代表可能的上限。
- 163 Hans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8-1945: Band I* (Herrsching, 1984), 11-16, 20; David Welch, 'Nazi propaganda and the Volksgemeinschaft: constructing a people's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2004), 215.
- 164 Mimmo Franzinelli, *I tentacoli dell'Ovra: agenti, collaboratori e vittime della polizia politica fascista* (Turin, 1999), 386-8; Canosa, *I servizi segreti*, 380-85.
- 165 Amir Weiner, 'Getting to know you: the Soviet surveillance system 1939-1957', *Kritika*, 13 (2012), 5-8.
- 166 Sparrow, *Warfare State*, 43.
- 167 Ibid., 69;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93-6, 103.
- 168 Neil Wynn, 'The "good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postwar American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1 (1996), 467-70; Sparrow, *Warfare State*, 67-8, 87-8;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49-50, 69-70.
- 169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Home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Britain's Finest Hour, May to September 1940* (London, 2011), xi-xii.
- 170 James Hinton, *The Mass Observers: A History, 1937-1949* (Oxford, 2013), 166-7
- 171 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256-7, 260; Addison and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xiii-xiv; Hinton, *Mass Observers*, 179-80.
- 172 John Hilvert, *Blue Pencil Warriors: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 (St Lucia, Qld, 1984), 220-22.
- 173 Petrella, *Staging the Fascist War*, 136.
- 174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lif., 1994), 181-5.



- 175 Peter Fritzsche, *An Iron Wind: Europe under Hitler* (New York, 2016), 10-13.
- 176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Band I*, 25.
- 177 Petrella, *Staging the Fascist War*, 136-8.
- 178 Budnitskii,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791.
- 179 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80-84.
- 180 Sparrow, *Warfare State*, 86-8.
- 181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Essays on History,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3), 129.
- 182 Sparrow, *Warfare State*, 45.
- 183 Rose, *Myth and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64.
- 184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194, 224.
- 185 Frank Bajohr and Dieter Pohl, *Der Holocaust als offene Geheimnis: Die Deutschen, die NS-Führung und die Alliierten* (Munich, 2006), 35-6, 56-7; Herf, *The Jewish Enemy*, 114-22.
- 186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43-4; Bytwerk, 'Believing in "inner truth"', 215.
- 187 Schmiechen Ackerman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king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 249.
- 188 Peter Longerich, '*Davon haben wir nichts gewusst!*':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1933-1945* (Munich, 2006), 317-21, 326-7;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53-4.
- 189 見Edele, *Stalin's Defectors*, 169-74;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65-71.
- 190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8-9, 40-50.
- 191 José Harris, 'Great Britain: the people's war',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244-51;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115-17.
- 192 Lisa Kirschenbaum, "'Our city, our hearths, our families": local loyalties and private life in Soviet World War II propaganda', *Slavic Review*, 59 (2000), 825-30.
- 193 LC, Eaker Papers, Box I:30, MAAF Intelligence Section, 'What is the German saying?' [n.d. but March 1945], entry (g).
- 194 Timothy Stewart 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and

- male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Gender & History*, 19 (2007), 533; Barbara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New York, 1973), 142-3.
- 195 Rennie Smith, *Peace verboden* (London, 1943), 45-8.
- 196 Norman Ingram,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acifism in France 1919-1939* (Oxford, 1991), 134-9. 關於國際反侵略大會 (in French the *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 見Overy, *The Morbid Age*, 257-9.
- 197 H. Runham Brown, *The 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1936 [?]), 1-5.
- 198 Storm Jameson (ed.), *Challenge to Death* (London, 1935), p. xii. 關於「和平投票」, 見Martin Caedel, 'The first referendum: the Peace Ballot 1934-35',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5 (1980), 818-29.
- 199 Overy, *The Morbid Age*, 243-50; D. C. Lukowitz, 'British pacifists and appeasement: the Peace Pledge U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 (1974), 116-17.
- 200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126-33.
- 201 Gerald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The American Church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pel Hill, NC, 1997), 18-19.
- 202 Ibid., 133-4; Scott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and World War II', in Piehler and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60-61.
- 203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138-9.
- 204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9 Volume: War and Neutrality* (New York, 1941), 300, 'President Opens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April 30 1939'; Marco Duranti, 'Utopia, nostalgia, and world war at the 1939-40 New York World's Fai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2006), 663.
- 205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51, col. 298, 3 Sept. 1939.
- 206 Graham Jackman, "'Ich kann nicht zwei Herren dienen":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and Nazi "Militärjustiz"',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64 (2011), 205.
- 207 Peter Brock, *Against the Draft: Essays on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from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oronto, 2006), 329-31, 340.
- 208 Tobias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British pacif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7 (2015), 701.
- 209 Mona Siegel, *The Moral Disarmament of France: Education, Pacifism and Patriotism 1914-1940* (Cambridge, 2004), 192-201.

- 210 Carrie Foster, *The Women and the Warriors: The U. S. Section of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1915-1946* (Syracuse, NY, 1995), 263-4, 284-5.
- 211 TNA, MEPO 3/3113, 國會辯論摘錄,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與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MEPO 3/2111, 莫里斯 (Stuart Morris) 的審判檔案。
- 212 Neil Stammers, *Civil Liberties in Britain during the 2nd World War* (London, 1989), 93-4; Lukowitz, 'British pacifists and appeasement', 115-28.
- 213 Martin Caedel, *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 (Oxford, 1980), 299; Vera Brittain, *One Voice: Pacifist Writings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5), 39, 'Functions of a Minority'.
- 214 Peter Brock and Nigel Young, *Pacif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yracuse, NY, 1999), 165.
- 215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19.
- 216 Ray Abrams, 'The Churches and the clergy in World War II',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56 (1948), 111-13.
- 217 John Middleton Murry, *The Necessity of Pacifism* (London, 1937), 106;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rchiv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Papers, 21AW/2/C/46, 'Report of a deputation of Pacifist Clergy to the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and York', 11 June 1940.
- 218 Overy, *The Morbid Age*, 242-3.
- 219 George Bell, *Christianity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40), 78-81.
- 220 Stephen Parker, 'Reinvigorating Christian Britain: the spiritual issues of the war,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hop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om Lawson and Stephen Parker (eds.), *God and War: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Arme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arnham, 2012), 63.
- 221 Donald 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3 (1981), 19-25.
- 222 Thomas Brodie, 'Between "national community" and "milieu": German Catholics at war 1939-1945',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26 (2017), 428-32.
- 223 Jouni Tilli, "'Deus Vult!': the idea of crusading in Finnish clerical war rhetoric", *War in History*, 24 (2017), 369-75.
- 224 Roger Rees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patriotic" support for the Stalinist regime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War & Society*, 33 (2014), 134-5.

- 225 Jan Bank with Lieve Grevers, *Churches and Relig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6), 506.
- 226 Rees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44-5.
- 227 關於這個段落，見John Mitsuru Oe, 'Church and state in Japan in World War II', *Anglican and Episcopal History*, 59 (1990), 202-6.
- 228 Bell, *Christianity and World Order*, 98-100.
- 229 Frank Coppa, 'Pope Pius XII: from the diplomacy of impartiality to the silence of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55 (2013), 298-9; Gerard Noel, *Pius XII: The Hound of Hitler* (London, 2008), 3-4.
- 230 Bank and Grevers, *Churches and Religion*, 483-94.
- 231 Coppa, 'Pope Pius XII', 300.
- 232 Brock, *Against the Draft*, 350-52; Anna Halle, 'The German Quakers and the Third Reich', *German History*, 11 (1993), 222-6.
- 233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701-2; Richard Overy, 'Pacifism and the Blitz, 1940-1941', *Past & Present*, no. 219 (2013), 217-18.
- 234 W. Edward Orser, 'World War II and the pacifist controversy in the major Protestant Churches', *American Studies*, 14 (1973), 7-10;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35-6.
- 235 Orser, 'World War II and the pacifist controversy', 12-18.
- 236 Gabriele Yonan, 'Spiritual resistance of Christian conviction in Nazi Germany: the case of the Jehovah's Witnesse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41 (1999), 308-9, 315-16; Stewart 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32.
- 237 Thomas Kehoe, 'The Reich Military Court and its values: Wehrmacht treatment of Jehovah's Witness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Holocaust & Genocide Studies*, 33 (2019), 351-8; Yonan, 'Spiritual resistance', 309; Jackman, "'Ich kann nicht zwei Herren dienen'", 189, 193.
- 238 Oe, 'Church and state in Japan', 210.
- 239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186-7.
- 240 Denis Hayes, 'Liberty in the War', pamphlet published by *Peace News*, Sept. 1943, 5-6.
- 241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267; Stewart 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32;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710.
- 242 Brock, *Against the Draft*, 329-30.



- 243 Jackman, “‘Ich kann nicht zwei Herren dienen’”, 189-93, 197-8.
- 244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699.
- 245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Stanley Jevons Papers, I IV/103, Note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outh-East Tribunal (n.d. but Sept.-Oct. 1941);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709.
- 246 Brock and Young, *Pacif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58-9; 引文出自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694.
- 247 Denis Hayes, *Challenge of Conscience: The Story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of 1939-1949* (London, 1949), 210.
- 248 Andrew Rigby, ‘Pacifist communities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eace & Change*, 15 (1990), 108-13.
- 249 Rachel Barker, *Conscience, Government and War: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in Britain, 1939-45* (London, 1982), 58; Overy, ‘Pacifism and the Blitz’, 222-3.
- 250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1312.
- 251 Scott Bennett, “‘Free American political prisoners’: pacifist activism and civil liberties, 1945-4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 (2003), 424; Stewart 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7-8.
- 252 Stewart 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2.
- 253 Ibid., 522-6.
- 254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267.
- 255 Nicholas Krehbiel, *General Lewis B. Hershey and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Columbia, Miss., 2011), 5-6, 97.
- 256 Ibid., 260, 265-6; Stewart 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1.
- 257 Krehbiel, *General Lewis B. Hershey*, 112-16.
- 258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151-2;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264, 272-3, 275-7; Bennett, “‘Free American political prisoners’”, 414-15.
- 259 Bennett, “‘Free American political prisoners’”, 413-14, 423-30.

## 第八章 民防與敵後抵抗

- 1 Raymond Daniell, *Civilians Must Fight* (New York, 1941), 4-5.
- 2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New York, 2017), 177; 關於英國民防的統計數字，見 Fred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 Okla, 1958), 163-4.
- 3 Alexander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Ukrainian Partisan Forces on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2016), 155-7.
- 4 Margaret Anagnostopoulou, 'From heroines to hyenas: women partisans during the Greek civil war',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0 (2001), 491。出自作者對退役游擊隊員的訪談。
- 5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Maxwell, Ala, 2019), 14-24; 也可見 Thomas Hippler, *Bombing the People: Giulio Douhe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ir Power Strategy, 1884-1939* (Cambridge, 2013), ch. 4.
- 6 關於這些說法，見 John Konvitz, 'Représentations urbaines et bombardements stratégiques', *Annales*, 44 (1989), 823-47; Susan Grayzel, "'A promise of terror to come": air pow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ities in British imagination and experience, 1908-39', in Stefan Goebel and Derek Keene (eds.), *Cities into Battlefields: Metropolitan Scenarios, Experiences and Commemorations of Total War* (Farnham, 2011), 47-62.
- 7 Ian Patterson, *Guernica and Total War* (London, 2007), 110.
- 8 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War: Its Nature, Cause and Cure* (London, 1923), 12-13.
- 9 Franco Manaresi, 'La protezione antiaerea', in Cristina Bersani and Valeria Monaco (eds.), *Delenda Bononia: immagini dei bombardamenti 1943-1945* (Bologna, 1995), 29-30.
- 10 Foreword to Stephen Spender, *Citizens in War - and After* (London, 1945), 5.
- 11 Terence O'Brien, *Civil Defence* (London, 1955), 690, Appendix X. 關於性別角色，見 Lucy Noakes, "'Serve to save": gender, citizenship and civil defence in Britain 1937-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7 (2012), 748-9.
- 12 Matthew Dallek, *Defenseless Under the Night: The Roosevelt Years and the Origins of Homeland Security* (New York, 2016), 248-9.
- 13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15-17.
- 14 BAB, R 1501/823, Luftschutzgesetz, 7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 31 Aug. 1943.

- 15 Bernd Lemke, *Luftschutz in Grossbritannien und Deutschland 1923 bis 1939* (Munich, 2005), 254-6.
- 16 O'Brien, *Civil Defence*, chs. 3-5; Lemke, *Luftschutz*, 342-62.
- 17 TNA, HO 186/602, Statistics on Civil Defence Personnel, Summary of all Services, 30 June 1940, 14 Nov. 1940; HO 187/1156, historical survey, 'Manpower in the National Fire Service'; Shane Ewen, 'Preparing the British fire service for war: local government, nationalisation and evolutionary reform, 1935-41',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20 (2006), 216-19; Charles Graves, *Women in Green: The Story of the W. V. S.* (London, 1948), 14-20.
- 18 O'Brien, *Civil Defence*, 548-58, 690.
- 19 Claudia Baldoli and Andrew Knapp, *Forgotten Blitzes: France and Italy under Allied Air Attack, 1940-1945* (London, 2012), 51-5, 92-3;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l'air, Vincennes, Paris, 3D/44/Dossier 1, 'Formations et effectifs réels, Défense Passive', 15 Jan. 1944.
- 20 Nicola della Volpe, *Difesa del territorio e protezione antiaerea (1915-1943)* (Rome, 1986), 194-203, doc. 17 'Istruzione sulla protezione antiaerea'.
- 21 Ibid., 46-8; Baldoli and Knapp, *Forgotten Blitzes*, 54.
- 22 Larry B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2 'We Cannot Delay'* (Baltimore, Md, 1986), 607-8, Radio broadcast on the Citizens' Defense Corps, 11 Nov. 1941.
- 23 Dallek, *Defenseless Under the Night*, 223-5.
- 24 NARA, RG107, Lovett Papers, Box 139, James Landis, 'We're Not Safe from Air Raids', *Civilian Front*, 15 May 1943.
- 25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Bernal Papers, Add 8287, Box 58/2, E.P.S. Bulletin No. 1, March 1942.
- 26 Tetsuo Maeda, 'Strategic bombing of Chongqing by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nd Naval Forces', in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Young (eds.),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New York, 2009), 141.
- 27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Kans, 2015), 28.
- 28 RAF Museum, Hendon, Bottomley Papers, AC 71/2/31, Address to the Thirty Club by Richard Peck, 8 Mar. 1944, p. 8. 關於針對工業城市進行無差別轟炸的討論，見 Richard Overy, "'The weak link'? The perception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by R

- AF Bomber Command, 1940-1945', *Labour History Review*, 77 (2012), 24-31.
- 29 TNA, AIR 14/783, 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 空軍參謀備忘錄: 無差別攻擊的目標是「摧毀工人的住房、殺死技術工人與癱瘓公共設施」。
  - 30 Overy, *The Bombing War*, 328-30.
  - 31 B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2*, 678, report of press conference, 15 Nov. 1941.
  - 32 Thomas Searle,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 the firebombing of Tokyo in March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 (2002), 116-19.
  - 33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2013), 191-2; Maeda, 'Strategic bombing of Chongqing', 146-9.
  - 34 Overy, *The Bombing War*, 99-105.
  - 35 Edward Glover,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Courage* (London, 1940), 35, 63.
  - 36 TNA, HO 186/608, Report of the Regional Commissioner South, 14 Dec. 1940; Ministry of Food report, 'Brief Visit to Southampton, December 3 1940', 5 Dec. 1940.
  - 37 Dietmar Süß, 'Wartime societies and shelter polit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and Britain', in Claudia Baldoli, Andrew Knapp and Richard Overy (eds.), *Bombing, States and Peopl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1945* (London, 2011), 31-3;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Zuckerman Archive, OEMU/59/13, draft report 'Shelter Habits', Table B, Table C.
  - 38 Kevin Hewitt, 'Place annihilation: area bombing and the fate of urban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3 (1983), 263.
  - 39 TNA, AIR/20/7287, 'Secret Report by the Police President of Hamburg on the Heavy Raids on Hamburg July/August 1943', 1 Dec. 1943, pp. 22-3, 67-8, 87-99.
  - 40 Hans Rumpf, *The Bombing of Germany* (London, 1957), 186-7; Andreas Linhardt, *Feuerwehr im Luftschutz 1926-1945: Die Umstrukturierung des öffentlichen Feuerlöschwesens in Deutschland unter Gesichtspunkten des zivilen Luftschutzes* (Brunswick, 2002), 171-82.
  - 41 Iklé,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67-8.
  - 42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02, 引自一九四五年五月寄的信。也可見Aaron Moore, *Bombing the City: Civilian Accounts of the Air War in Britain and Japan 1939-1945* (Cambridge, 2018), 112-14.
  - 43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1, 6, 69.
  - 44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 *China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Chongqing, 1941), 1



74-5.

- 45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1, 69, 200.
- 46 Ibid., 2, 9-11.
- 47 統計數字出處如下:France, Jean Charles Focquier, *La stratégie de la destruction: Bombardements allies en France, 1944* (Paris, 2017), 9-10; China,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89.
- 48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231-2.
- 49 Bernard Donoughue and G. W. Jones, *Herbert Morrison: Portrait of a Politician* (London, 2001), 316-18.
- 50 Edna Tow, 'The great bombing of Chongqing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2011), 269-70, 277-8.
- 51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 *China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179.
- 52 CCAC, CHAR 9/182B, Notes for a speech to civil defence workers, County Hall, London, 12 July 1940, pp. 4-5.
- 53 Matthew Cobb, *The Resistance: The French Fight against the Nazis* (New York, 2009), 39-40.
- 54 Tom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Fascists, Guerrillas and the Allies* (London, 2008), 67-8; Cobb, *The Resistance*, 163-4.
- 55 關於中國的例子，見Poshek Fu, 'Resistance in collaboration: Chinese cinema in occupied Shanghai, 1940-1943', in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Stanford, Calif., 2002), 180, 193.
- 56 Robert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A New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London, 2015), 70-71, 143-4.
- 57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lif., 1994), 221-30.
- 58 Cobb, *The Resistance*, 223-4.
- 59 Gaj Tri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Yugoslav partisans in the Belgrade operation 194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 (2016), 256, 270; Yang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in north China', in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325; John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1*

- 940-1944 (London, 1982), 153.
- 60 Shmuel Krakowski, *The War of the Doomed: Jewish Armed Resistance in Poland 1942-1944* (New York, 1984), 5.
  - 61 Svetozar Vukmanović, *How and Wh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of Greece Met with Defeat* (London, 1985), 41, 毛澤東轉引自 *The Strateg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 62 L. S.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EAM): a study i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 (1952), 43.
  - 63 Cobb, *The Resistance*, 60-63.
  - 64 Olivier Wieviorka and Jack Tebinka, 'Resisters: from everyday life to counter state', in Robert Gildea, Olivier Wieviorka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2006), 158-9.
  - 65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45-8.
  - 66 Philippe Buton,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à la Libération* (Paris, 1993), 269.
  - 67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323-5; Daoxuan Huang,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st cadr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0 (2016), 138.
  - 68 Julia Ebbinghaus, 'Les journaux clandestins rédigés par les femmes: une résistance spécifique', in Mechthild Gilzmer, Christine Levisse-Touzé and Stefan Martens, *Les femmes dans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Paris, 2003), 141-4, 148-50; Jean-Marie Guillon, 'Les manifestations de ménagères: protestation populaire et résistance féminine spécifique', *ibid.*, 115-20.
  - 69 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5* (Oxford, 2001), 491-4.
  - 70 Barbara Jancar, 'Women in the Yugoslav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an overview',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4 (1981), 150, 155-6.
  - 71 Jomane Alano, 'Armed with the yellow mimosa: women's defence and assistance groups in Italy 1943-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2003), 615, 618-20.
  - 72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131.
  - 73 Alano, 'Armed with the yellow mimosa', 616.
  - 74 Anagnostopoulou, 'From heroines to hyenas', 481-2.
  - 75 Jelena Batinić, *Women and Yugoslav Partisans: 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Resistance* (Cambridge, 2015), 128-9, 143-8, 156-7; Jancar, 'Women in the Yugoslav National

- Liberation Army', 155-6, 161.
- 76 Cobb, *The Resistance*, 185.
  - 77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45-50; Dominique Eudes, *The Kapetanios: Partisans and Civil War in Greece, 1943-1949* (London, 1972), 22-3.
  - 78 Spyros Tsoutsoumpis, *A History of the Greek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chester, 2016), 226.
  - 79 Anika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An Oral History of Nazi Genocide in Belorussia* (New York, 2015), 191-2.
  - 80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139-41;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309-10.
  - 81 Eudes, *The Kapetanios*, 22.
  - 82 Tri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271.
  - 83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389-90.
  - 84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319-20.
  - 85 Peter Seybolt, 'The war within a war: a case study of a count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Barrett and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221.
  - 86 Ben Hillier, 'The Huk rebellion and the Philippines radical tradition', in Donny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327.
  - 87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New Haven, Conn., 1993), 289-90, 318-20.
  - 88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109.
  - 89 Hans Heinrich Nolte, 'Partisan war in Belorussia, 1941-1945', in Roger Chickering, Stig Förster and Bernd Greiner (eds.), *A World at Total War: Glob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ruc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05), 268-70, 271-3.
  - 90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85-90, 122;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42-3; John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2005), 7-8.
  - 91 Stevan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 (London, 2008), 114-15.

- 92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146-9.
- 93 Lifeng Li, 'Rur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 (2015), 97-101.
- 94 Eudes, *The Kapetanios*, 5-6, 13-14.
- 95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45-8.
- 96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265-79.
- 97 Tsoutsoumpis, *History of the Greek Resistance*, 8-9, 214-18.
- 98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6.
- 99 André Gerolymatos, *A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Greece, 1943-1949* (New Haven, Conn., 2016), 287-8.
- 100 John Newman, *Yugoslavia in the Shadow of War* (Cambridge, 2015), 241-61.
- 101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Cambridge, Mass., 2014), 178-83;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115-17, 124-32.
- 102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183, 212;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142-5.
- 103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106.
- 104 Blaž Torkar, 'The Yugoslav armed forces in exile', in Vít Smetana and Kathleen Geaney (eds.), *Exile in London: The Experience of Czechoslovakia and the Other Occupied Nations 1939-1945* (Prague, 2017), 117-20.
- 105 Gaj Trifković, 'The key to the Balkans: the battle for Serbia 194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544-9.
- 106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10.
- 107 Jared McBride, 'Peasants into perpetrators: the OUN-UPA and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Volhynia, 1943-1944', *Slavic Review*, 75 (2016), 630-31, 636-7.
- 108 Seybolt, 'The war within a war', 205-15.
- 109 Li, 'Rural mobilization', 98-9.
- 110 Geraldien von Künzel, 'Resistance, reprisals, reactions', in Gildea, Wiewiorka and Warring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179-81.
- 111 Mark Kilion, 'The Netherlands 1940-1945: war of liberation', in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147-8.
- 112 Seybolt, 'The war within a war', 219-20.



- 113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187-8; Wieviorka and Tebinka, 'Resisters', 169.
- 114 Cobb, *The Resistance*, 163.
- 115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1945: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London, 1960), 351-2.
- 116 Cobb, *The Resistance*, 183-4.
- 117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45-6.
- 118 Ibid., 56-9.
- 119 Nolte, 'Partisan war in Belorussia', 274-5.
- 120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xv-xvi; A. A. Maslov, 'Concerning the role of partisan warfare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1920s and 1930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9 (1996), 892-3.
- 121 Tri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261;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81-2.
- 122 Anita Prazmowska, 'The Polish undergrou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tudy in political disunity during occupation',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43 (2013), 465-7, 472-4.
- 123 Tadeusz Bór-Komorowski, 'Le mouvement de Varsovie',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287.
- 124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85-6, 395.
- 125 Ibid., 390-92, 396-7.
- 126 Bór-Komorowski, 'Le mouvement de Varsovie', 288-9.
- 127 Alexandra Richie, *Warsaw 1944: The Fateful Uprising* (London, 2013), 176-80.
- 128 Kazik (Simha Rotem), *Memoirs of a Warsaw Ghetto Fighter* (New Haven, Conn., 1994), 119, 122.
- 129 Ewa Stanćzyk, 'Heroes, victims, role models: representing the child soldiers of the Warsaw uprising', *Slavic Review*, 74 (2015), 740;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402, 424-5.
- 130 David Glantz, 'Stalin's strategic intentions 1941-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 (2014), 687-91; Alexander Statiev, *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Cambridge, 2010), 120-22.
- 131 Valentin Berezhkov, *History in the Making: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Diplomacy* (Moscow, 1983), 357-8; David Reynolds and Vladimir Pechatnov (eds.), *The Kremlin L*

- etters: *Stalin's Wartime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New Haven, Conn., 2018), 459, Stalin to Churchill 16 Aug. 1944.
- 132 TNA, AIR 8/1169, Despatches from MAAF on Dropping Operations to Warsaw [n.d.]; Norman Davies,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 2003), 310-11; Kocanski, *The Eagle Unbowed*, 408-11.
- 133 Richie, *Warsaw 1944*, 610, 617.
- 134 Statiev,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122.
- 135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8-9.
- 136 Dongill Kim, 'Stalin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old War History*, 10 (2010), 186-91.
- 137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81-2.
- 138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11-12, 16-18, 19-21.
- 139 Tommaso Piffer, 'Stalin, the Western Allies and Soviet policy towards the Yugoslav partisan movement 194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4 (2019), 424-37.
- 140 Glantz, 'Stalin's strategic intentions', 690, Directive of 5 Sept. 1944.
- 141 Tre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254-5, 276-7.
- 142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236.
- 143 Michael Foot, *SOE: Th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1940-46* (London, 1984), 20-21.
- 144 Olivier Wieviorka, *The Resistance in Western Europe 1940-1945* (New York, 2019), 27.
- 145 TNA, FO 898/457, 'Annual Dissemination of Leaflets by Aircraft and Balloon 1939-1945'.
- 146 Richard Overy, 'Bruce Lockhart, British political warfare and occupied Europe', in Smetana and Geaney (eds.), *Exile in London*, 2014.
- 147 TNA, FO 898/338, PWE 'Special Directive on Food and Agriculture', 1 Aug. 1942; PWE memorandum 'The Peasant in Western Europe', 5 Apr. 1943; Major Baker to Ritchie Calder (PWE), 'The Peasant Revolt', 13 Feb. 1942.
- 148 TNA, FO 898/340, Patrick Gordon Walker, 'Harnessing the Trojan Horse', 31 Mar. 1944; SHAEF Political Warfare Division, 'Propaganda to Germany: The Final Phase', 4 July 1944.
- 149 TNA, FO 800/879, Dr Jan Kraus to Lockhart, 10 Nov. 1942; FO 898/420, 'Suggeste

- d E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British 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12 July 1945.
- 150 Ian Dear, *Sabotage and Subversion: The SOE and OSS at War* (London, 1996), 12-13.
- 151 Ibid., 12-14.
- 152 Foot, *SOE*, 171.
- 153 Peter Wilkinson, *Foreign Fields: The Story of an SOE Operative* (London, 1997), 148.
- 154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297-8, 352.
- 155 Gerolymatos, *A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138-41.
- 156 Mark Seaman, "'The most difficult country": som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n British support for clandestine operations in Czechoslovak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Smetana and Geaney (eds.), *Exile in London*, 131-2; David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SOE and Italy 1943-45* (London, 2011), 225.
- 157 Michael Foot, *SOE in France* (London, 1966), 473-4.
- 158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223.
- 159 Olivier Wieviorka,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1940-1945* (Paris, 2013), 498-9.
- 160 Gabriella Gribaudi, *Guerra Totale: Tra bombe alleate e violenze naziste: Napoli e il fronte meridionale 1940-44* (Turin, 2005), 197.
- 161 Ibid., 197-8;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37-8.
- 162 Santo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in Italia* (Turin, 2006), 121-3.
- 163 Max Corvo, *OSS Italy 1942-1945* (New York, 1990), 215.
- 164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52-3.
- 165 Tommaso Piffer, *Gli Alleati e la Resistenza italiana* (Bologna, 2010), 177-81;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226;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89-2.
- 166 Corvo, *OSS Italy*, 227;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13-14.
- 167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14, 123-5, 139.
- 168 Corvo, *OSS Italy*, 228.
- 169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217;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37-9.
- 170 Claudio Pavone, *A Civil War: 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sistance* (London, 2013), 603-4.
- 171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60-61.

- 172 Piffer, *Gli Alleati e la Resistenza*, 227-8.
- 173 Pavone, *A Civil War*, 609-10.
- 174 Dear, *Sabotage and Subversion*, 155, 182-3.
- 175 Georges Ribeill, 'Aux prises avec les voies ferrées: bombarder ou saboter? Un dilemme revisité', in Michèle Battesti and Patrick Facon (eds.), *Les bombardements alliés sur la France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stratégies, bilans matériels et humains* (Vincennes, 2009), 162; CCAC, BUFT 3/51, SHAEF report 'The Effect of the Overlord Plan to Disrupt Enemy Rail Communications', pp. 1-2.
- 176 Wieviorka,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504-5.
- 177 Buton,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104-5.
- 178 Thomas Laub, *After the Fall: German Policy in Occupied France 1940-1944* (Oxford, 2010), 277-80提到一九四四年報復政策的細節。
- 179 Wieviorka,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507, 522-3; Buton,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91-2.
- 180 Raymond Aubrac, *The French Resistance, 1940-1944* (Paris, 1997), 35-7;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386-8.
- 181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394-5.
- 182 Jean Guéhenno, *Diary of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Collaboration, Resistance, and Daily Life in Occupied Paris* (Oxford, 2014), 270, entry for 21 Aug. 1944.
- 183 Jean-François Muracciole,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Paris, 1993), 119-20;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395-401.
- 184 Philibert de Loisy, *1944, les FFI deviennent soldats: L'amalgame: De la résistance à l'armée régulière* (Paris, 2014), 187-9, 192-3, 258-9.
- 185 Richard Barry, 'Statement by U.K. representatives',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351.
- 186 Maria Pasini, *Brescia 1945* (Brescia, 2015), 40-41.
- 187 Nechama Tec, *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 (New York, 1993), 81-2.
- 188 Léon Nisand, *De l'étoile jaune à la Résistance armée: Combat pour la dignité humaine, 1942-1944* (Besançon, 2006), 21.
- 189 Renée Poznanski, 'Geopolitics of Jewish resistance in Franc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256-7; *idem*, 'Reflections on Jewish resistance and Jewish resisters in France', *Jewish Social Studies*, 2 (1995), 129, 134-5.



- 190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32-4; Zvi Bar-On, 'On the position of the Jewish partisan in the Soviet partisan movement',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210-11.
- 191 Christian Gerlach,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ambridge, 2016), 407, 409-10.
- 192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03; 關於白俄羅斯，見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21-5.
- 193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19-21; Janey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in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113-18.
- 194 Philip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to Nazism: its various forms and aspects',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8-9.
- 195 Rachel Einwohner, 'Opportunity, honor and action in the Warsaw Ghetto 194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2003), 665.
- 196 Ibid., 661.
- 197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63-5.
- 198 Gustavo Corni, *Hitler's Ghettos: Voices from a Beleaguered Society 1939-1944* (London, 2002), 306-7.
- 199 Ibid., 293-7.
- 200 James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Moral Uses of Violence and Will* (Basingstoke, 2004), 21-2;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196-7.
- 201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201-2; Corni, *Hitler's Ghettos*, 303.
- 202 Eric Sterling, 'The ultimate sacrifice: the death of resistance hero Yitzhak Wittenber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Partisan Organisation', in Ruby Rohrlich (ed.), *Resisting the Holocaust* (Oxford, 1998), 59-62.
- 203 Ibid., 63; Einwohner, 'Opportunity, honor and action', 660.
- 204 Suzanne Weber, 'Shedding city life: survival mechanisms of forest fugitives during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Studies*, 18 (2002), 2;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0-11.
- 205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3, 14. Glass從猶太游擊隊的生還者取得證言，顯示很多人加入游擊隊就是為了復仇。
- 206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64-5;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80.
- 207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80-81; Tec, *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 81-2;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191;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9-10.

- 208 Tec, *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 73;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3-16.
- 209 Weber, 'Shedding city life', 5-14, 21-2.
- 210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2-13; Weber, 'Shedding city life', 23-4.
- 211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3, 93; Bar-On, 'On the position of the Jewish partisan', 235-6.
- 212 Amir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a lot to kill for':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in George Kassimeris (e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London, 2006), 119.
- 213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102; Saul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London, 2007), 525.
- 214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229-30.
- 215 Poznanski, 'Geopolitics of Jewish resistance', 250, 254-8.
- 216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104; Rohrich (ed.), *Resisting the Holocaust*, 2.
- 217 Frediano Sessi, *Auschwitz: Storia e memorie* (Venice, 2020), 316.
- 218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57-9.
- 219 詳細的描述見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63-8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20-24.
- 220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09-10.
- 221 Kazik, *Memoirs of a Warsaw Ghetto Fighter*, 34.
- 222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211-13;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101-2;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204; Corni, *Hitler's Ghettos*, 317-20.

## 第九章 戰時情緒與心理

- 1 *Last Letters from Stalingrad*, trs. Anthony Powell (London, 1956), 61-3.
- 2 Ibid., v-vii.
- 3 Ibid., 24-5.
- 4 引自Pat Jalland, *Death in War and Peace: A History of Loss and Grief in England 1914-1970* (Oxford, 2010), 172-3.
- 5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London, 2017), 135-6, 對Olga O melchenko進行的訪談。

- 6 David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the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of close combat', in Michael Evans and Alan Ryan (eds.), *The Human Face of Warfare: Killing, Fear and Chaos in Battle* (London, 2000), 10. 今日，精神科醫生與神經科醫生都同意，被殺的危險與殺人是戰場上主要的「壓力來源」。
- 7 Thomas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World War II and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in David Cantor and Edmund Ramsden (eds.), *Stress, Shock and Adapt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chester, NY, 2014), 123.
- 8 Ann-Marie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Australian psychiatric casualt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 Society*, 15 (1997), 65-6.
- 9 Emma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War, the Body and British Army Recruits 1939-1945* (Manchester, 2014), 156;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4-5; Walter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5* (New York, 1982), 162.
- 10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7; Paul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Soviet military psychiatry during World War II -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6 (2003), 92; Paul Wanke, 'American military psychiatry and its role among ground forces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3 (1999), 127-33.
- 11 Robert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58), 175-6, 278; Terry Copp and Bill McAndrew, *Battle Exhaustion: Soldiers and Psychiatrists in the Canadian Army* (Montreal, 1990), 126.
- 12 Frederick McGuire, *Psychology Awake! 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900-1988* (Washington, DC, 1990), 99-100
- 13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94認為可以比較美軍士兵精神創傷的比例，因此一千八百三十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三名紅軍，有精神創傷的應該有一百萬零七千五百八十五人。比較少的數字，見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2005), 232. 真實的數字顯然更高，因為許多例子沒有診斷出來，而且許多人在確診前就被殺或被俘。
- 14 Peter Riedesser and Axel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Militärpsychiatrie* (Frankfurt/Main, 1996), 146-7, 168; Klaus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ürzburg, 2000), 35-7.
- 15 Paolo Giovannini, *La psichiatria di guerra: Dal fascismo a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Milan, 2015), 73-6.
- 16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63; Copp and McAndrew, *Battle Exhaustion*, 135; Roger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The Red Army's Military Effecti*

- venes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1), 238-9.
- 17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73-5.
  - 18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Oxford, 2017), 30-31, 111.
  - 19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Kans, 2015), 159.
  - 20 美軍數字出自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Two* (London, 2004), 108; 英軍數字出自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Appendix B, 273; 德軍數字出自Dieter Knippschild, “Für mich ist der Krieg aus”: Deserteure i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n Norbert Haase and Gerhard Paul (eds.), *Die anderen Soldaten: Wehrkraftzersetzung, Gehorsamsverweigerung und Fahnenflu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Main, 1995), 123, 126-31; 關於義大利，見Mimmo Franzinelli, *Disertori: Una storia mai raccontata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Milan, 2016), 133-49.
  - 21 Jonathan Fennell, ‘Courage and cowardice in the North African campaign: the Eighth Army and defeat in the summer of 1942’, *War in History*, 20 (2013), 102-5.
  - 22 關於義大利，見Albert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American Military Medicin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4), 149-50; Copp and McAndrew, *Battle Exhaustion*, 50-51. 關於印度防線，見B. L. Raina, *World War II: Medical Services: India* (New Delhi, 1990), 40-41.
  - 23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127.
  - 24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51; G. Kurt Piehler, ‘Veterans tell their stories and why historians and others listened’, in G.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228-9; Rebecca Plant, ‘Preventing the inevitable: John Appel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iatric casualties in the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in Frank Biess and Daniel Gross (eds.), *Science and Emotions after 1945* (Chicago, Ill., 2014), 212-17.
  - 25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20.
  - 26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7-8; Edgar Jones, ‘LMF: the use of psychiatric stigma in the Royal Air For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0 (2006), 449;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51;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72-3; Plant, ‘Preventing the inevitable’, 222.
  - 27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感危機，見Michael Roper, *The Secret Battle: Emotional*



*Survival in the Great War* (Manchester, 2009), 247-50, 260-65.

- 28 關於德國對「彈震症」態度的轉變，見Jason Crouthamel, “Hysterische Männer?” Traumatisierte Veterane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ihr Kampf um Anerkennung in m “Dritten Reich”, in Babette Quinkert, Philipp Rauh and Ulrike Winkler (eds.), *Krieg und Psychiatrie: 1914-1950* (Göttingen, 2010), 29-34. 關於美國的論點，見Mart in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Medicine, Psychiatry and American Culture 1945-1970* (New Brunswick, NJ, 2013), 20-27,關於英國的論點，見Harold Merskey, ‘After shell-shock: aspects of hysteria since 1922’, in Hugh Freeman and German Berrios (eds.), *150 Years of British Psychiatry: Volume II: The Aftermath* (London, 1996), 89-92.
- 29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58.
- 30 Paul Wanke, *Russian/Soviet Military Psychiatry 1904-1945* (London, 2005), 91-2.
- 31 Wanke, ‘American military psychiatry’, 132.
- 32 Gerald Grob,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US amerikanische Psychiatrie’, in Quinkert, Rauh and Winkler (eds.), *Krieg und Psychiatrie*, 153;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39; McGuire, *Psychology Aweigh!*, 35-41.
- 33 Edgar Jones and Simon Wessely, *Shell Shock to PTSD: Military Psychiatry from 1900 to the Gulf War* (Hove, 2005), 70-71, 76; Ben Shephard, *A War of Nerves: Soldiers and Psychiatrists, 1914-1994* (London, 2000), 195.
- 34 Jones, ‘LMF’, 440, 445; Sydney Brandon, ‘LMF in Bomber Command 1939-1945: diagnosis or denouement?’, in Freeman and Berrios (eds.), *150 Years of British Psychiatry*, 119-20.
- 35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80-81.
- 36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21.
- 37 Geoffrey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Göring Institute* (New Brunswick, NJ, 1997), 308-16;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41-5;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35-8.
- 38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92-7.
- 39 Janice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Hayao Toraio and psychiatric studies of the crimes of soldiers’, *War in History*, 23 (2016), 82-6.
- 40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5.
- 41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123-4 (引文出自Merrill Moore and J.

- L. Henderson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作品) ;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53-8;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5; Ellen Herman, *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 (Berkeley, Calif., 1995), 86-8. 關於同性戀, 見Naoko Wake, 'The military, psychiatry, and "unfit" soldiers, 1939-1942',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2 (2007), 473-90.
- 42 McGuire, *Psychology Aweigh!*, 101-2;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7-8.
- 43 Herman,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110-11; Shephard, *War of Nerves*, 235.
- 44 R. D.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 on Citizen and Soldier* (New York, 1942), 166-72; Shephard, *War of Nerves*, 187-9.
- 45 Crouthamel, "'Hysterische Männer?'", 30-34; Manfred Messerschmidt, *Was damals Recht war...NS-Militär und Strafrecht im Vernichtungskrieg* (Essen, 1996), 102-6.
- 46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03-5, 115-17;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17-20, 22-3.
- 47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38-9.
- 48 Jones, 'LMF', 439-44; Brandon, 'LMF in Bomber Command', 119-23. 關於精神疾病與轟炸機機組人員的充分描述, 見Mark Wells, *Courage and Air Warfare: The Allied Aircrew Experi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5), 60-89.
- 49 Allan English, 'A predisposition to cowardice? Aviation psych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Lack of Moral Fibre"', *War & Society*, 13 (1995), 23.
- 50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5-72.
- 51 John McManus, *The Deadly Brotherhood: The American Combat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8), 193.
- 52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9-10, 13-15;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130-32.
- 53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55-6;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309-12;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45-6.
- 54 Hans Pols, 'Die Militäroperation in Tunesien 1942/43 und die Neuorientierung des US-amerikanischen Militärpsychiatrie', in Quinkert, Rauh and Winkler (eds.), *Krieg und Psychiatrie*, 133-8.
- 55 Edgar Jones and Simon Wessely, "'Forward psychiatry" in the military: its origin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 (2003), 413-15; Mark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British Military Medicin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200

- 4), 171-3.
- 56 Raina, *World War II: Medical Services*, 41.
- 57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35-7.
- 58 Catherine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trauma and shell-shock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 (2000), 43-7.
- 59 Merridale, *Ivan's War*, 232;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37.
- 60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 32-3, 191-4; Edgar Jones and Stephen Ironside, 'Battle exhaustion: the dilemma of psychiatric casualties in Normandy, June-August 1944', *Historical Journal*, 53 (2010), 112-13.
- 61 Pols, 'Die Militäroperation in Tunisien', 135-7.
- 62 Giovannini, *La psichiatria di Guerra*, 74-6.
- 63 Ibid., 137-9.
- 64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68-70; Jones and Wessely, "Forward psychiatry", 411-15.
- 65 Jones and Ironside, 'Battle exhaustion', 114.
- 66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49-50; Pols, 'Die Militäroperation in Tunisien', 140-42;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114.
- 67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55-6.
- 68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47-53, 73-85;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18-23, 140-43, 153-6.
- 69 Aaron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2013), 94, 95, 127.
- 70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177.
- 71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 166.
- 72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67.
- 73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7.
- 74 Merridale, *Ivan's War*, 282.
- 75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82-3, 90-91.
- 76 德國戰俘談論軍隊美德的錄音對話，見Sönke Neitzel and Harald Welzer, *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 (Frankfurt/Main, 2011), 299-307.
- 77 Franzinelli, *Disertori*, 115-16.
- 78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61-5, 173-5.

- 79 Ibid., 171.
- 80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47-50;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09, 115-16, 163-6.
- 81 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96-9.
- 82 Knippschild, "Für mich ist der Krieg aus", 123-6.
- 83 Fietje Ausländer, "Zwölf Jahre Zuchthaus! Abzusitzen nach Kriegsende!" Zur Topographie des Strafgefangenenwesens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n Haase and Paul (eds.), *Die anderen Soldaten*, 64; Jürgen Thomas, "Nur das ist für die Truppe Recht, was ihr nützt..." Die Wehrmachtjustiz im Zweiten Weltkrieg, *ibid.*, 48.
- 84 Fennell, 'Courage and cowardice', 100.
- 85 Jones 'LMF', 448; Brandon, 'LMF in Bomber Command', 120-21.
- 86 Alan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 Minded: The British Soldier Goes to War 1939-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251, 256.
- 87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137-8.
- 88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49-50; Bernd Bonwetsch, 'Stalin, 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203-6;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rinceton, NJ, 1968), 246-9.
- 89 Arne Zoepf, *Wehrmach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Ideologie: Der NS Führungsoffizier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Main, 1988), 35-9.
- 90 Jürgen Förster, 'Ludendorff and Hitler in perspective: the battle for the German soldier's mind 1917-1944', *War in History*, 10 (2003), 329-31.
- 91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56-8.
- 92 Günther Koschorrek, *Blood Red Snow: The Memoirs of a German Soldier on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2002), 275-6.
- 93 *Last Letters from Stalingrad*, 27, letter 12.
- 94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69-72; Michael Snape, 'War, religion and revival: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and Canadian arm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Calum Brown and Michael Snape (eds.), *Secularisation in a Christian World: Essays in Honour of Hugh McLeod* (Farnham, 2010), 146.
- 95 Piehler, 'Veterans tell their stories', in Piehler and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26.



- 96 Moore, *Writing War*, 112-13, 120.
- 97 Edward Glover,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Courage* (London, 1940), 82, 86.
- 98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200-202.
- 99 Fennell, 'Courage and cowardice', 110-11.
- 100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69-70.
- 101 Irving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New York, 1951), 129-31.
- 102 Helen Fei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National Responses and Jewish Victimization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79). 關於小情感社群，也可見Barbara Rosenwein,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Passions in Context*, 1 (2010), 10-19.
- 103 William Wharton, *Shrapnel* (London, 2012), 155.
- 104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164-7.
- 105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323-4.
- 106 Simon Wessely, 'Twentieth century theories on combat motivation and breakdow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2006), 277-9.
- 107 Thomas Kühn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radeship: Hitler's Soldiers, Male Bonding and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2017), 107-11.
- 108 Richard Overl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351-2.
- 109 見S.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the US Army and looting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1 (2014), 33-54.
- 110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63;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53-4.
- 111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92-3; Merridale, *Ivan's War*, 271, 288-9.
- 112 Peipei Qiu,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New York, 2013), 21-34;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124-35.
- 113 Hester Vaizey, *Surviving Hitler's War: Family Life in Germany 1939-1948* (Basingstoke, 2010), 65; Ann Pfau, 'Allotment Annies and other wayward wives: wartime concerns about female disloyalt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turned veteran', in Piehler and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00-105.
- 114 Michael Snape, *God and Uncle Sam: Religion and America's Armed Forces in World War II* (Woodbridge, Suffolk, 2015), 349, 358-9;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72-4. 關於空軍人員，見Simon MacKenzie, 'Beating the odds: superstition an

- d human agency in RAF Bomber Command 1942-1945', *War in History*, 22 (2015), 382-400.
- 115 Snape, 'War, religion and revival', 138.
- 116 詳細內容見 *ibid.*, 138-49;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73-5.
- 117 Snape, *God and Uncle Sam*, 327, 332-3, 343.
- 118 James Sparrow, *Warfare State: World War II Americans and the Age of Big Government* (New York, 2011), 65-7;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52.
- 119 關於歐洲轟炸戰的詳細描述，見 Overy, *The Bombing War*, *passim*. 關於對日空戰，見 Kenneth Werrell, *Blankets of Fire: U. S. Bombers over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6); Barrett Tillman, *Whirlwind: The Air War against Japan 1942-1945* (New York, 2010).
- 120 Edward Glover, *War, Sadism and Pacifism: Further Essays on Group Psychology and War* (London, 1947), 161-6; Edgar Jones et al., 'Civilian mora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esponses to air raids re-examine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7 (2004), 463-79; Shephard, *War of Nerves*, 178-9.
- 121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2; Dietmar Süß, *Death from the Skies: How the British and Germans Survived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Oxford, 2014), 344-6.
- 122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 107-8;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2.
- 123 UEA, Zuckerman Archive, OEMU/57/3, draft report, 'Hull' (n.d. but Nov. 1941).
- 124 E. Stengel, 'Air raid phobia',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20 (1944-46), 135-43.
- 125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8-9.
- 126 *Ibid.*, 59-60, 73-7.
- 127 Shephard, *War of Nerves*, 181-2.
- 128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8; M. I. Dunsdon, 'A psychologist's contribution to air raid problems', *Mental Health (London)*, 2 (1941), 40-41; E. P. Vernon,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ir raid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941), 457-76.
- 129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03-4, 106-8.
- 130 *Ibid.*, 88-91;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 126-7.
- 131 UEA, Zuckerman Archive, OEMU/57/5, Hull report, Appendix II, Case Histories.

- 132 James Stern, *The Hidden Damage* (London, 1990), first published 1947.
- 133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47-8.
- 134 Overy, *The Bombing War*, 462-3.
- 135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3-14, 17-34.
- 136 見Mark Connelly, *We Can Take It! Britain and the Mem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low, 2004).
- 137 關於德國，見J. W. 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 (Bloomington, Ind., 1990); Neil Gregor, 'A Schicksalsgemeinschaft? Allied bombing, civilian morale, and social dissolution in Nuremberg, 1942-1945', *Historical Journal*, 43 (2000), 1051-70;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05-6, 163-4; 關於蘇聯，見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43-50.
- 138 關於英國，見Jalland, *Death in War and Peace*, 132-7; 關於日本，見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20-21.
- 139 Glover, *Psychology of Fear and Courage*, 62-5.
- 140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312-14.
- 141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10-11.
- 142 George Gallup (ed.), *The Gallup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olls: Great Britain 1937-1975*, 2 vols. (New York, 1976), i, 37, 43.
- 143 Vanessa Chambers, "'Defend us from all perils and dangers of this night": coping with bombing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Claudia Baldoli, Andrew Knapp and Richard Overy (eds.), *Bombing, States and Peopl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1945* (London, 2012), 162-3.
- 144 Claudia Baldoli, 'Religion and bombing in Italy, 1940-1945', *ibid.*, 146-8; Claudia Baldoli and Marco Fincardi, 'Italian society under the bombs: propaganda, experience and legend, 1940-1945', *Historical Journal*, 52 (2009), 1030-32; Alan Perry, 'Pippo: an Italian folklore mystery of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0 (2003), 115-16, 120-23.
- 145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72-4.
- 146 Süß, *Death from the Skies*, 263-6.
- 147 Chambers, "'Defend us from all perils'", 156-7.
- 148 Baldoli, 'Religion and bombing', 139-49; Süß, *Death from the Skies*, 267-8, 271-2.
- 149 Elena Skrabina, *Siege and Survival: The Odyssey of a Leningrader* (Carbondale, Ill., 1971), 39-41, entries for 15 and 26 Nov. 1941.

- 150 Ibid., 24, entry for 5 Sept. 1941.
- 151 Olga Kucherenko, *Little Soldiers: How Soviet Children went to War 1941-1945* (Oxford, 2011), 204-6, 226-7.
- 152 報告與病例的詳細內容見Wanke, *Russian/Soviet Military Psychiatry*, 74-8.
- 153 Ruth Gay, *Safe Among the Germans: Liberated Jews after World War II* (New Haven, Conn., 2002), 44-5; Dan Stone, *The Liberation of the Camps: The End of the Holocaust and its Aftermath* (New Haven, Conn., 2015), 1-26.
- 154 Gay, *Safe Among the Germans*, 74-5.
- 155 Joseph Berger, 'Displaced persons: a human tragedy of World War II', *Social Research*, 14 (1947), 49-50; Ralph Segalman, 'The psychology of Jewish displaced persons', *Jewish Social Service Quarterly*, 23/24 (1947), 361, 364-5.
- 156 Gay, *Safe Among the Germans*, 67-8.
- 157 Daniel Pick, *The Pursuit of the Nazi Mind: Hitler, Hess and the Analysts* (Oxford, 2012).
- 158 Tadeusz Grygier, *Oppression: A Study in Social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London, 1954), xii, 20-23, 27, 42.
- 159 David Boder,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e: I: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 (1954), 4-8.
- 160 Alan Rosen, *The Wonder of Their Voices: The 1946 Holocaust Interviews of David Boder* (Oxford, 2010), 134-5, 183-6. 完整的訪談版本見德文版, David Boder, *Die Toten habe ich nicht befragt*, ed. Julia Faisst, Alan Rosen and Werner Sollors (Heidelberg, 2011), 125-238.
- 161 Rosen, *The Wonder of Their Voices*, 195-8; Boder, *Die Toten habe ich nicht befragt*, 16-17.
- 162 Boder,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e', 4, 16, 42-7.
- 163 Pfau, 'Allotment Annies', 107-9.
- 164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0-22; Erin Redfern, 'The Neurosis of Narr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iatry during World War II',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 2003, 16-25.
- 165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0, 25.
- 166 Axel Schildt, 'Impact of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war on West German society', in Jörg Echternkamp and Stefan Martens (eds.), *Experience and Memory: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New York, 2010), 200-201.



- 167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ss., 2009), 134-5, 202-3.
- 168 Stephen Casey, *When Soldiers Fall: How Americans Have Confronted Combat Losses from World War I to Afghanistan* (New York, 2014), 49-59, 99.

## 第十章 戰爭暴行與戰爭罪

- 1 Joshua Rubenstein and Ilya Altman (eds.), *The Unknown Black Book: The Holocaust in the German-Occupied Soviet Territories* (Bloomington, Ind., 2008), 273-4, testimony recorded by M. Grubian.
- 2 Anika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An Oral History of Nazi Genocide in Belorussia* (Oxford, 2015), 191, 奧肯的證詞。
- 3 Rubenstein and Altman (eds.), *The Unknown Black Book*, 274;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91.
- 4 Howard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perience* (Lawrence, Kans, 1999), 73-4.
- 5 NARA, RG107, McCloy Papers, Box 1,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memorandum, 6 Oct. 1944, Annex A.
- 6 Jürgen Matthäus, 'The lessons of Leipzig: punishing German war criminals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in Jürgen Matthäus and Patricia Heberer (eds.), *Atrocities on Tri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of Prosecuting War Crimes* (Lincoln, Nebr., 2008), 4-8; Alfred de Zayas, *The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1939-1945* (Lincoln, Nebr., 1989), 5-10.
- 7 Joel Hayward, 'Air power, ethics, and civilian immunit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Global War Studies*, 7 (2010), 107-8; Heinz Hanke, *Luftkrieg und Zivilbevölkerung* (Frankfurt/Main, 1991), 71-7.
- 8 William Schabas, *Unimaginable Atrocities: Justice, Politics, and Rights at the War Crimes Tribunals* (Oxford, 2012), 25-32.
- 9 Peter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American Soldi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2), 208.
- 10 Mary Habeck, 'The modern and the primitive: barbarity and warfare on the Eastern Front', in George Kassimeris (e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London, 2006), 91; de Zayas,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118.

- 11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222.
- 12 John McManus, *The Deadly Brotherhood: The American Combat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8), 227-30.
- 13 De Zayas,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107-8.
- 14 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2nd edn (Basingstoke, 2001). 也可見George Kassimeris,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in *idem* (ed.),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1-18.
- 15 Yuki Tanaka, *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Boulder, Colo., 1996), 195-8.
- 16 Aaron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2013), 90, 111.
- 17 Benjamin Uchiyama, *Japan's Carnival War: Mass Culture on the Home Front, 1937-1945* (Cambridge, 2019), 54-64.
- 18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67-9.
- 19 Moore, *Writing War*, 123.
- 20 Meirion Harries and Susie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1868-1945* (London, 1991), 408-9; Tanaka, *Hidden Horrors*, 21-2.
- 21 Moore, *Writing War*, 119.
- 22 Gerald Horne, *Race War: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Japanese Attack o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2004), 71-2.
- 23 Mark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Australian Soldiers and Their Adversar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00), 94-9.
- 24 Raymond Lamont-Brown, *Ships from Hell: Japanese War Crimes on the High Seas* (Stroud, 2002), 68-9.
- 25 Michael Sturma, 'Atrocities, conscience and unrestricted warfare: US submarin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16 (2009), 450-58.
- 26 *Ibid.*, 449-50;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1986), 36.
- 27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78-80, 94-5;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10-11.
- 28 James Weingartner, 'Trophies of war: U. S. troops and the mutilation of Japanese war dead, 1941-194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1 (1992), 56-62; Simon Harrison, 'Skull trophies of the Pacific war: transgressive objects of remembrance', *Journal of th*

- 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2 (2006), 818-28.
- 29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207-10;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80-82; Craig Cameron, 'Race and identity: the culture of combat in the Pacific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7 (2005), 558-9.
  - 30 Tarak Barkawi, *Soldiers of Empire: Indian and British Arm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7), 208-17.
  - 31 Theo Schulte, *Th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in Occupied Russia* (Oxford, 1989), 317-20.
  - 32 Jeff Rutherford,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German Infantry's War 1941-1944* (Cambridge, 2014), 69, 81.
  - 33 Habeck, 'The modern and the primitive', 85; 也可見 Alex Kay, 'A "war in a region beyond state control?" The German-Soviet war 1941-1944', *War in History*, 18 (2011), 111-12.
  - 34 Felix Römer, 'The Wehrmacht in the war of ideologies', in Alex Kay, Jeff Rutherford and David Stahel (eds.),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Total War, Genocide, and Radicalization* (New York, 2012), 74-5, 81.
  - 35 Sönke Neitzel and Harald Welzer, *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 (Frankfurt/Main, 2011), 135-7; Rutherford,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86-90; Bartov, *Eastern Front 1941-1945*, 110.
  - 36 Amaon Sella,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in Soviet Warfare* (London, 1992), 100-102.
  - 37 Günther Koschorrek, *Blood Red Snow: The Memoirs of a German Soldier on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2002), 275.
  - 38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2005), 110-14.
  - 39 De Zayas,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88.
  - 40 Maria Giusti, *I prigionieri italiani in Russia* (Bologna, 2014), 132.
  - 41 Felicia Yap,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 internees of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7 (2012), 317;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84.
  - 42 Niall Ferguson, 'Prisoner taking and prisoner killing: the dynamic of defeat, surrender and barbarit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 in Kassimeris (ed.),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142.
  - 43 關於蘇聯的數字，我要感謝James Bacque提供我Prison Department of the Sovie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編纂的'war prisoners of the former European armies 1941-1945', 28 Apr. 1956的數字。也可見 *Russkii Arkhiv 13: Nemetskii Voennoplennyye*

- v SSSR (Moscow, 1999), Part 1, 9. 關於日本戰俘，見 S. I. Kuznetsov,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in Soviet camp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8 (1995), 612-29. 關於蘇聯戰俘，見 Alfred Streim, *Sowjetische Gefangene in Hitlers Vernichtungskrieg: Berichte und Dokumente* (Heidelberg, 1982), 175; Christian Streit, 'Die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n in den deutschen Lagern', in D. Dahmann and Gerhard Hirschfeld (eds.), *Lager, Zwangsarbeit, Vertreibung und Deportationen* (Essen, 1999), 403-4.
- 44 Giusti, *I prigionieri italiani*, 133.
  - 45 Eri Hotta,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New York, 2013), 93.
  - 46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63.
  - 47 Yap,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 internees', 323-4; Tanaka, *Hidden Horrors*, 16-18.
  - 48 Tanaka, *Hidden Horrors*, 26-7.
  - 49 Habeck, 'The modern and the primitive', 87.
  - 50 Christian Hartmann, 'Massensterbung oder Massenvernichtung?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n im "Unternehmen Barbarossa"',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9 (2001), 105; Merridale, *Ivan's War*, 122-3; Bartov, *Eastern Front 1941-1945*, 111-12.
  - 51 Christian Streit,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 (Bonn, 1978), 128.
  - 52 Stefan Karner, *Im Archipel GUPVI: Kriegsgefangenschaft und Internierung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56* (Vienna, 1995), 90-94; *Russkii Arkhiv* 13, Part 2, 69, 76, 159-60; Giusti, *I prigionieri italiani*, 127.
  - 53 Karner, *Im Archipel GUPVI*, 94104.
  - 54 Giusti, *I prigionieri italiani*, 100-102, 110-11, 125-9.
  - 55 Seth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the US army and looting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1 (2014), 35-6.
  - 56 Neville Wylie, 'Loot, gold, and tradi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s financial warfare strategy, 1939-194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 (2009), 301-2;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15-16.
  - 57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35-6.
  - 58 Rutherford,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07-8.
  - 59 Zygmunt Klukowski, *Diary of the Years of Occupation 1939-1944* (Urbana, Ill., 199



- 3), 28-30, 47, entries for 20, 23 Sept., 30 Oct. 1939.
- 60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New Haven, Conn., 1993), 23-4.
- 61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64;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411.
- 62 Rutherford,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05-10.
- 63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33, 46-7.
- 64 William Wharton, *Shrapnel* (London, 2012), 182-3.
- 65 Amir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a lot to kill for":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in Kassimeris (ed.),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102-5.
- 66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45-6.
- 67 Gianluca Fulveti and Paolo Pezzino (eds.), *Zone di Guerra, Geografie di Sangue: L'atlante delle stragi naziste e fasciste in Italia (1943-1945)* (Bologna, 2016), 96-122.
- 68 Massimo Storch, *Anche contro donne e bambini: Stragi naziste e fasciste nella terra dei fratelli Cervi* (Reggio Emilia, 2016), 11-12.
- 69 Peter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s on anti-partisan warfare in France 1943-194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1 (2008), 797-9, 818-19.
- 70 Alastair McLauchlan,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n Okinawa: guilt on both sides',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13 (2014), 364-77.
- 71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2003), 284;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119-21.
- 72 Wendy Lower, *Nazi Empire 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NC, 2005), 19-29 討論德國東方占領區的殖民性格。關於德國在東方與西方做法上的不同，見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s', 797-8, 802-3.
- 73 Patrick Bernhard, 'Behind the battle lines: Italian atrocitie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Arabs, Berbers and Jews in North Africa in World War II',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6 (2012), 425-32.
- 74 Patrick Bernhard, 'Die "Kolonialachse". Der NS-Staat und Italienisch-Afrika 1935 bis 1943', in Lutz Klinkhammer and Amedeo Guerrazzi (eds.), *Der 'Achse' im Krieg: Politik, Ideologie und Kriegfü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2010), 164-8. 關於義大利陸軍暴行的一般研究，見 Gianni Oliva, *'Si Ammazza Troppo Poco': I crimini di guerra italiani 1940-43* (Milan, 2006).
- 75 Alex Kay, 'Transition to genocide, July 1941: Einsatzkommando 9 and the annihilation

on of Soviet Jewry',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7 (2013), 411-13; *idem*, 'A "war in a region beyond state control?"', 112-15.

- 76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283-4.
- 77 Tanaka, *Hidden Horrors*, 186-92;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405.
- 78 Henning Pieper, 'The German approach to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7 (2015), 631-6; Alexander Prusin, 'A community of violence: structure, participation, and motiv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1 (2007), 5-9.
- 79 Storchi, *Anche contro donne e bambini*, 29; Ben Shepherd, 'With the Devil in Titoland: a Wehrmacht anti-partisan division in Bosnia-Herzegovina, 1943', *War in History*, 16 (2009), 84; Edward Westermann, "'Ordinary men" or "ideological soldiers"? Police Battalion 310 in Russia, 1942', *German Studies Review*, 21 (1998), 57.
- 80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 806; Shepherd, 'With the Devil in Titoland', 84-5.
- 81 Storchi, *Anche contro donne e bambini*, 23;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 798.
- 82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91-2;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117-21.
- 83 Giovanni Pesce, *And No Quarter: An Italian Partisan in World War II* (Athens, Ohio, 1972), 211.
- 84 *Ibid.*, 176.
- 85 Merridale, *Ivan's War*, 269.
- 86 TNA, AIR 41/5 J. M. Spaigh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Air 1939-1945', 1946, p. 1-15.
- 87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47-9; Peter Gray, 'The gloves will have to come off: a reappraisal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AF bombe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Air Power Review*, 13 (2010), 15-16.
- 88 Ronald Schaffer, 'American military ethics in World War II: the bombing of German civilia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7 (1980), 321.
- 89 Charles Webster and Noble Frankland, *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4 vols. (London, 1961), iv, 258-60. 也可見Richard Overy. "'Why we bomb you": liberal war-making and moral relativism in the RAF bomber offensive, 1940-45', in Alan Cromartie (ed.), *Liberal Wars: Anglo-American Strategy, Ideology, and Practice* (London, 2015), 25-9.

- 90 TNA, AIR 14/1812, Operational Research report, 14 Sept. 1943.
- 91 TNA, AIR 14/1813, minute from A. G. Dickens for Arthur Harris, 23 Feb. 1945 (Harris marginal notes).
- 92 Thomas Earle,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 the firebombing of Tokyo in March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 (2002), 117-21.
- 93 Conrad Crane, ‘Evolution of U. S. strategic bombing of urban areas’, *Historian*, 50 (1987), 37.
- 94 Cameron, ‘Race and identity’, 564.
- 95 Tsuyoshi Hasegawa, ‘Were the atomic bombs justified?’, in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Young (eds.),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New York, 2009), 118-19.
- 96 Crane, ‘Evolution of U. S. strategic bombing’, 36.
- 97 Richard Overly, ‘The Nuremberg Trials: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aking’, in Philippe Sands (ed.), *From Nuremberg to The Hagu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2003), 10-11.
- 98 關於殖民地暴力與種族滅絕，見最近的Michelle Gordon, ‘Colonial violence and holocaust studies’, *Holocaust Studies*, 21 (2015), 273-6; Tom Lawson,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reading and writing colonial genocide in the shadow of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Studies*, 20 (2014), 129-56.
- 99 Horne, *Race War*, 266, 270.
- 100 Peter Duus, ‘Nagai Ryūtarū and the “White Peril”, 1905-194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1971), 41-7.
- 101 Ronald Takaki, *Double Victory: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World War II* (Boston, Mass., 2001), 148.
- 102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02;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218-19.
- 103 Harrison, ‘Skull trophies of the Pacific war’, 818-21.
- 104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85-7.
- 105 Raffael Scheck, “‘They are just savages’: German massacres of black soldiers from the French army, 194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7 (2005), 325-40.
- 106 見Mikhail Tyaglyy, ‘Were the “Chingené”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Nazi policy toward the Crimean Roma, 1941-19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3 (2009), 26-40. 關於東方羅姆人的命運，見Johannes Enstad, *Soviet Russians under Nazi Occupation: Fragile Loyalt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8), 66-70; Brenda Lutz, ‘

- Gypsies as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9 (1995), 346-59.
- 107 Thomas Kühne, 'Male bonding and shame culture: Hitler's soldiers and the moral basis of genocidal warfare', in Olaf Jensen and Claus-Christian Szejmman (eds.), *Ordinary People as Mass Murderers: Perpetrato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2008), 69-71.
- 108 Jürgen 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Himmler's men in the summer of 1941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occupied Soviet territorie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1 (2007), 219-20.
- 109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75-6; Kay, 'Transition to genocide', 422; 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223.
- 110 Sara Bender, 'Not only in Jedwabne: accounts of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Jewish shtetlach in north-eastern Poland in the summer of 1941', *Holocaust Studies*, 19 (2013), 2-3, 14, 19-20, 24-5.
- 111 Leonid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Nazi-occupied Beloruss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0 (2006), 388.
- 112 Simon Geissbühler, "'He spoke Yiddish like a Jew": neighbours' contribution to the mass killing of Jews in Northern Bukovina and Bessarabia, July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8 (2014), 430-36; *idem*, 'The rape of Jewish women and girls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the Romanian offensive in the East, July 1941', *Holocaust Studies*, 19 (2013), 59-65.
- 113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2-4; Eric Haberer, 'The German police and genocide in Belorussia, 1941-1944: part I: police deployment and Nazi genocidal directive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3 (2001), 19-20.
- 114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1.
- 115 Kühne, 'Male bonding and shame culture', 57-8, 70; 有趣的案例研究, 見Peter Lieb, 'Täter aus Überzeugung? Oberst Carl von Andrian und die Judenmorde der 707 Infanteriedivision 1941/42',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0 (2002), 523-4, 536-8.
- 116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78-81.
- 117 Andrej Angrick, 'The men of Einsatzgruppe D: an inside view of a state-sanctioned killing unit in the "Third Reich"', in Jensen and Szejmman (eds.), *Ordinary People as Mass Murderers*, 84.



- 118 Dick de Mild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erpetrators of Genocide in the Reflection of Their Post-War Prosecution in West Germany* (The Hague, 1996), 2.
- 119 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228-9.
- 120 Waitman Beorn, 'Negotiating murder: a Panzer signal compan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of Peregruznoe 1942',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3 (2009), 185-95.
- 121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London, 1992), 141-2.
- 122 Jürgen Matthäus, 'Die Beteiligung der Ordnungspolizei am Holocaust', in Wolf Kaiser (ed.), *Täter im Vernichtungskrieg: Der Überfall auf die Sowjetunion und der Völkermord an den Juden* (Berlin, 2002), 168-76.
- 123 Stephen Fritz,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Ky, 2011), 374.
- 124 見Westermann, "'Ordinary men" or "ideological soldiers"?', 43-8. 第三〇一警察營當中，每個連約有百分之三十八到五十的人是納粹黨員。
- 125 現在已經有許多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侵害社會心理學研究。見 Richard Overy, '“Ordinary me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istorians, social psychologists and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0 (2014), 513-38; Arthur Mill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New York, 2004), ch. 9.
- 126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4-5.
- 127 Edward Westermann, 'Stone-cold killers or drunk with murder? Alcohol and atrocity during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0 (2016), 4-7.
- 128 Ilya Ehrenburg and Vasily Grossman, *The Complete Black Book of Russian Jewry*, ed. David Patterson (New Brunswick, NJ, 2002), 382; de Zayas,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189; Peipei Qiu with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New York, 2013), 22.
- 129 Gloria Gaggioli,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96 (2014), 506, 512-13.
- 130 Nomi Levenkron, 'Death and the maidens: "prostitution", rape, and sexual slaver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Sonja Hedgepeth and Rochelle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Waltham, Mass., 2010), 15-17.
- 131 Tanaka, *Hidden Horrors*, 96-7; 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in Peter Duu

- 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Princeton, NJ, 1996), 310.
- 132 Nicole Bogu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brothel in memory', *Holocaust Studies*, 22 (2016), 208.
- 133 Annette Timm, 'Sex with a purpose: prostitution, venereal disease, and militarized masculinity in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1 (2002), 225-7; Janice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Hayao Teraoka and psychiatric studies of the crimes of soldiers', *War in History*, 23 (2016), 96.
- 134 Regina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sexual violence by German soldiers during the war of annihil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41-45', in Raphaëlle Branche and Fabrice Virgili (eds.), *Rape in Wartime* (Basingstoke, 2017), 35, 40-42.
- 135 Emma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War, the Body and British Army Recruits 1939-45* (Manchester, 2014), 124-35; Mark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British Military Medicin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2004), 98-104.
- 136 Raffaello Pannacci, 'Sex, military brothels and gender violence during the Italian campaign in the USSR, 1941-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5 (2020), 79-86.
- 137 Timm, 'Sex with a purpose', 237-50; Levenkron, 'Death and the maidens', 19-20; Helene Sinnreich, 'The rape of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in Hedgepeth and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110-15; Jeffrey Burds, 'Sexual violence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 1939-1945', *Politics & Society*, 37 (2009), 37-41.
- 138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1, 9-11, 37-8;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311-12.
- 139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312; Tanaka, *Hidden Horrors*, 98-9; Michael Seth,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Lanham, Md, 2016), 81-2.
- 140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30-38, 48. 這段刺刀的故事是由在戰爭後期屯駐在華北的第十四師團的一名退伍軍人講述的。
- 141 Brigitte Halbmayr, 'Sexuali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Nazi "racial" persecution', in Hedgepeth and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33-5;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37-8.
- 142 Wharton, *Shrapnel*, 189.
- 143 David Snyder, *Sex Crimes under the Wehrmacht* (Lincoln, Nebr., 2007), 137.
- 144 J. Robert Lilly, *Taken by Force: Rape and American GI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 r II (Basingstoke, 2007), 11; Elisabeth Krimmer, 'Philomena's legacy: rap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 *German Quarterly*, 88 (2015), 83-4.
- 145 Miriam Gebhardt, *Crimes Unspoken: The Rape of German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7), 18-22.
- 146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37-8.
- 147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98-9.
- 148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114-15.
- 149 Merridale, *Ivan's War*, 268.
- 150 Alexandra Richie, *Warsaw 1944: The Fateful Uprising* (London, 2013), 283, 302.
- 151 Elisabeth Wood,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c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96 (2014), 472-4.
- 152 James Messerschmidt, 'Review symposium: the forgotten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masculinities and rape in Berlin 1945',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 (2006), 706-9.
- 153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210-12; McLauchlan,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364-5.
- 154 Lilly, *Taken by Force*, 12; Tanaka, *Hidden Horrors*, 101-3; Joanna Bourke, *Rape: 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7), 357-8.
- 155 Robert Kramm, 'Haunted by defeat: imperial sexualities, prostit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8 (2017), 606-7.
- 156 Lilly, *Taken by Force*, 22-3.
- 157 Julie Le Gac, *Vaincre sans gloire: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çais en Italie (novembre 1942-juillet 1944)* (Paris, 2014), 432-46.
- 158 Annette Warring, 'Intimate and sexual relations', in Robert Gildea, Olivier Wieviorka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2006), 113.
- 159 Snyder, *Sex Crimes under the Wehrmacht*, 149, 157-8.
- 160 Birthe Kundrus, 'Forbidden company: dome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rmans and foreigners 1939 to 194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1 (2002), 201-6.
- 161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52;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38-9.
- 162 Snyder, *Sex Crimes under the Wehrmacht*, 138-42;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41-2.
- 163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28-9.

- 164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91.
- 165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New York, 1962), 161.
- 166 Gebhardt, *Crimes Unspoken*, 73-5.
- 167 Krimmer, 'Philomena's legacy', 90-91.
- 168 James Mark, 'Remembering rape: divided social memory of the Red Army in Hungary 1944-1945', *Past & Present*, no. 188 (2005), 133, 140-42.3
- 169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London, 2017), xxxvi.
- 170 Helene Sinnreich, "'And it was something we didn't talk about": rape of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Studies*, 14 (2008), 10-11.
- 171 Anatoly Podolsky, 'The tragic fate of Ukrainian Jewish women under Nazi occupation', in Hedgepeth and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99.
- 172 Levenkron, 'Death and the maidens', 16-19; Sinnreich, 'The rape of Jewish women', 109-15; Zoë Waxman, 'Rape and sexual abuse in hiding', in Hedgepeth and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126-31; Westermann, 'Stone cold killers', 12-13; Burds, 'Sexual violence in Europe', 42-6.
- 173 Podolsky, 'The tragic fate of Ukrainian Jewish women', 102-3; Geissbühler, "'He spoke Yiddish like a Jew'", 430-34.
- 174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220-21.
- 175 Wharton, *Shrapnel*, 252.
- 176 Moore, *Writing War*, 145.
- 177 Neitzel and Welzer, *Soldaten*, 158-9.
- 178 Ehrenburg and Grossman, *The Complete Black Book*, 388-9.
- 179 Christopher Browning, *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ambridge, 2000), 155-6. 關於秩序的心理意義，見Harald Welzer, 'On killing and morality: how normal people become mass murderers', in Jensen and Szejnmann (eds.), *Ordinary People as Mass Murderers*, 173-9.
- 180 Theo Schulte, 'The German soldier in occupied Russia', in Paul Addison and Angus Calder (eds.), *Time to Kill: The Soldier's Experience of War in the West, 1939-1945* (London, 1997), 274-6. 關於殺戮限制遭到翻轉的說法，見Dorothea Frank, *Menschen Töten* (Düsseldorf, 2006), 12.
- 181 Sturma, 'Atrocities, conscience and unrestricted warfare', 458.
- 182 Overy, "'Ordinary me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518-19, 522-3.

- 183 這些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英國廣播公司紀錄片對轟炸機司令部進行的訪談。見Richard Overy, *Bomber Command, 1939-1945* (London, 1997), 特別是頁198-201有訪談的例子。
- 184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06.
- 185 Moore, *Writing War*, 145.
- 186 Hasegawa, 'Were the atomic bombs justified?', 119.
- 187 Andrew Rotter, *Hiroshima: The World's Bomb* (Oxford, 2008), 128, 引自給Samuel Cavert的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 188 Moore, *Writing War*, 245.
- 189 Andrew Clapham, 'Issues of complexity, complicity and complementarity: from the Nuremberg Trials to the daw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Sands, (ed.), *From Nuremberg to The Hague*, 31-3, 40;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73.
- 190 Clapham, 'Issues of complexity', 40-41;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77; Norbert Ehrenfreund, *The Nuremberg Legacy: How the Nazi War Crimes Trials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2007), 115-21.
- 191 Beatrice Trefalt,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n Indochina and the French pursuit of justic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9 (2014), 727-9.
- 192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56-7, 74-6; Cameron, 'Race and identity', 564.
- 193 Beorn, 'Negotiating murder', 199.
- 194 Gaggioli,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s', 512-13, 519-20.
- 195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11.

## 終章 從殖民帝國到民族國家：新全球時代的誕生

- 1 Amanke Okafor, *Nigeria: Why We Fight for Freedom* (London, 1949), 6.
- 2 TNA, KV2/1853, Colonial Office to Special Branch, 22 Sept. 1950; Security Liaison Office to Director General, MI5, 20 Oct. 1950, 'G. N. A. Okafar'; Director General to Security Liaison Office, West Africa, 12 June. 1950.
- 3 Okafor, *Nigeria*, 5, 30, 39.
- 4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



-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73-4.
- 5 TNA, FO 898/413, 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 'Projection of Britain', propaganda to Europe: general policy papers.
  - 6 Jean-Christophe Notin, *La campagne d'Italie 1943-1945: Les victoires oubliées de la France* (Paris, 2002), 692-3; Richard Lamb, *War in Italy 1943-1945: A Brutal Story* (London, 1993), 259-60; David Stafford, *Endgame 1945: Victory, Retribution, Liberation* (London, 2007), 354, 469-70.
  - 7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 2002), 428-33; Saul Kelly, *Cold War in the Deser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talian Colonies, 1945-52* (New York, 2000), 164-7.
  - 8 Antonio Morone, *L'ultima colonia: Come l'Italia è tornata in Africa 1950-1960* (Rome, 2011), 131-3, 176-7, 383; Kelly, *Cold War in the Desert*, 169-71.
  - 9 Ian Connor, *Refugees and Expellees in Post-War Germany* (Manchester, 2007), 8-10 談早期的德國屯墾。
  - 10 Labanca, *Oltremare*, 438-9; Gerard Cohen, *In War's Wake: 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Postwar Order* (New York, 2012), 6.
  - 11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ss., 2009), 1-3, 43-4.
  - 12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1998), 410-11.
  - 13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43-7, 97.
  - 14 Ibid., 47-50.
  - 15 Haruko Cook and Theodore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1992), 413-15, testimony of Iitoyo Shōgo, official in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 16 Connor, *Refugees and Expellees*, 13.
  - 17 Raymond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2), 1-2, 93-6.
  - 18 Ibid., 96.
  - 19 Ibid., 126, 149.
  - 20 Ibid., 124-5, 160-11, 309; Ruth Wittlinger, 'Taboo or tradition? The "Germans-as-victims" them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until the mid-1990s', in Bill Niven (ed.), *Germans as Victims* (Basingstoke, 2006), 70-73.

- 21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170.
- 22 G. Daniel Cohen, 'Between relief and politics: refugee humanitarianism in occupied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3 (2008), 438.
- 23 Jessica Reinisch, "'We shall build anew a powerful nation": UNRRA,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Po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3 (2008), 453-4.
- 24 Mark Wyman, *DPs: 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 1945-1951* (Ithaca, NY, 1998), 39, 46-7.
- 25 Ibid., 17-19, 37, 52. 一九四六年三月，善後救濟總署收容了八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四名流離失所者，一九四八年八月，仍有五十六萬兩千八百四十一名。
- 26 Cohen, 'Between relief and politics', 445, 448-9.
- 27 R. Rummell, *Lethal Politics: Soviet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17* (London, 1996), 194-5;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Oxford, 2017), 139-42.
- 28 Nicolas Bethell, *The Last Secret: Forcible Repatriation to Russia 1944-1947* (London, 1974), 92-118; Keith Lowe,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London, 2012), 252-62.
- 29 Cohen, *In War's Wake*, 26.
- 30 Wyman, *DPs*, 186-90, 194-5, 202-4.
- 31 James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Britain's Struggle with America to Dominate the Middle East* (London, 2018), 22.
- 32 Jessica Pearson, 'Defending the empire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lonial oversight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 (2017), 528-9.
- 33 Jan Eckel, 'Human rights and decolon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and open questions', *Human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ism and Development*, 1 (2010), 114-16.
- 34 Stefanie Wichhart, 'Selling democracy during the second British occupation of Iraq, 194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525-6.
- 35 Eckel, 'Human rights and decolonization', 118; Dane Kennedy, *Decolon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16), 1; W. David McIntyre, *Winding up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Oxford, 2014), 90-91.

- 36 Lanxin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1950* (Armonk, NY, 1995), 38.
- 37 Peter Catterall, 'The plural society: Labour and the Commonwealth idea 1900-1964',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6 (2018), 830; H. Kumarasingham, 'Liberal ideals and the politics of decolonization', *ibid.*, 818. Montgomery citation from 'Tour of Africa November-December 1947', 10 Dec. 1947.
- 38 Kennedy, *Decolonisation*, 34-5.
- 39 Geraldien von Frijtag Drabbe Künzel, "'Germanje': Dutch empire-building in Nazi-occupied Europ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51-3; Bart Luttikhuis and Dirk Moses, 'Mass violence and the end of Dutch colonial empire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4 (2012), 260-61; Kennedy, *Decolonization*, 34-5.
- 40 Mark Mazower, *No Enchanted Palace: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eton, NJ, 2009), 150-51.
- 41 Anne Deighton, 'Entente neo-coloniale? Ernest Bevin and proposals for an Anglo-French Third World Power 1945-1949', *Diplomacy & Statecraft*, 17 (2006), 835-9; Kumarasingham, 'Liberal ideals', 815-16.
- 42 Christopher Prior, "'The community which nobody can define": meanings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late 1940s and 1950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7 (2019), 569-77.
- 43 Harry Mace, 'The Eurafrique initiative, Ernest Bevin and 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Foreign Office 1945-50', *Diplomacy & Statecraft*, 28 (2017), 601-3.
- 44 Deighton, 'Entente neo-coloniale?', 842-5.
- 45 Martin Thomas, *Fight or Flight: Britain, France and Their Roads from Empire* (Oxford, 2014), 86-90.
- 46 Jason Parker, 'Remapping the Cold War in the tropics: race, commun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West Indie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4 (2002), 337-9.
- 47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 Conn., 2006), 318-19.
- 48 Leslie James, 'Playing the Russian game: black radicalism, the press, and Colonial Office attempts to control anti-colonialism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6-50',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3 (2015), 511-17.
- 49 Balázs Szalontai,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Vietnam": the Bao Dai factor and Soviet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1947-1950',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 (2018),

16.

- 50 Eckel, 'Human rights and decolonization', 122, 126.
- 51 Penny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NY, 1997), 45-50; James, 'Playing the Russian game', 509, 512.
- 52 Parker, 'Remapping the Cold War in the tropics', 322-3;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47.
- 53 McIntyre, *Winding up the British Empire*, 24-6.
- 54 Yasmin Khan, *The Great Partition: The Making of India and Pakistan* (New Haven, Conn., 2007), 25.
- 55 Mary Becker, *The All-India Muslim League 1906-1947* (Karachi, 2013), 225-9; Khan, *Great Partition*, 38.
- 56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Wars: The End of Britain's Asian Empire* (London, 2007), 77.
- 57 Ranabir Samaddar, 'Policing a riot-torn city: Kolkata, 16-18 August 194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40-41, 43-5.
- 58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253-7.
- 59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08-9.
- 60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163-5, 173.
- 61 Ibid., 170-71.
- 62 William Frederick, 'The killing of Dutch and Eurasians in Indonesia's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49): a "brief genocid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4 (2012), 362-4.
- 63 Petra Groen, 'Militant response: the Dutch use of military force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1993), 30-32; Luttikhuis and Moses, 'Mass violence', 257-8.
- 64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 2012), 296-7, 301-3.
- 65 Gert Oostindie, Ireen Hoogenboom and Jonathan Verwey, 'The decolonisation war in Indonesia, 1945-1949: war crimes in Dutch veterans' egodocuments', *War in History*, 25 (2018), 254-5, 265-6; Bart Luttikhuis, 'Generating distrust through intelligence work: psychological terror and the Dutch security services in Indonesia', *War in History*, 25 (2018), 154-7.
- 66 Kennedy, *Decolonization*, 53-4;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 2008), 435-6, 450-51.
- 67 Vincent Kuitenbrouwer, 'Beyond the "trauma of decolonization": Dutch cultural diplomacy during the West New Guinea question (1950-1962)',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4 (2016), 306-9, 312-15.
  - 68 Robert Schulzinger,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1997), 16-17.
  - 69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148-9.
  - 70 Ibid., 20;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24-5.
  - 71 François Guillemot, "'Be men!': fighting and dying for the state of Vietnam (1951-54)", *War & Society*, 31 (2012), 188-95.
  - 72 Szalontai,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Vietnam"', 3-4, 26-9.
  - 73 Kennedy, *Decolonization*, 51, 54.
  - 74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355-6.
  - 75 Ibid., 428-32; David French, 'Nasty not nic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and practice, 1945-1967',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3 (2012), 747-8.
  - 76 Bruno Reis, 'The myth of British minimum force in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s during decolonization (1945-1970)',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4 (2011), 246-52; French, 'Nasty not nice', 748-9.
  - 77 Steven Paget, "'A sledgehammer to crack a nut"? Naval gunfire support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8 (2017), 367-70.
  - 78 Keith Hack, 'Everyone lived in fear: Malaya and the British way of counter insurgenc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3 (2012), 671-2;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39-40.
  - 79 French, 'Nasty not nice', 748.
  - 80 Hack, 'Everyone lived in fear', 681, 689-92.
  - 81 Kumarasingham, 'Liberal ideals', 816.
  - 82 Ian Hall,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decolonis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in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ought, 1945-7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 (2011), 47.
  - 83 Pearson, 'Defending the empire', 528-36; Meredith Terretta, "'We had been fooled into thinking that the UN watches over the entire world": human rights, UN Trust Territories, and Africa's decolonisatio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4 (2012), 332-7.
  - 84 Terretta, "'We had been fooled into thinking..."', 338-43.



- 85 Daniel Branch, 'The enemy within: loyalists and the war against Mau Mau in Keny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8 (2007), 298.
- 86 Thomas, *Fight or Flight*, 218-19, 223-6.
- 87 Branch, 'The enemy within', 293-4, 299.
- 88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2014), 176-7.
- 89 David Anderson, 'British abuse and torture in Kenya's counter-insurgency, 1952-1960',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3 (2012), 701-7; French, 'Nasty not nice', 752-6; Thomas, *Fight or Flight*, 232-3.
- 90 Jean-Charles Jauffert, 'The origins of the Algerian war: the reaction of France and its army to the two emergencies of 8 May 1945 and 1 November 1954',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1993), 19-21.
- 91 Thomas, *Fight or Flight*, 288.
- 92 Kennedy, *Decolonization*, 56-7.
- 93 Keith Sutton, 'Population resettlement - traumatic upheavals and the Algeri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5 (1977), 285-9.
- 94 Thomas, *Fight or Flight*, 318-28.
- 95 關於法國，見Frederick Cooper, *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Princeton, NJ, 2014), 5-9.
- 96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 2006), 299-302, 326-7; Aiyaz Husain, *Mapping the End of Empire: American and British Strategic Visions in the Postwar World* (Cambridge, Mass., 2014), 14-15, 135-42; Thomas, *Fight or Flight*, 68-70.
- 97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94-6;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232-3.
- 98 Edward Judge and John Langdon,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Lanham, Md, 2018), 11-12.
- 99 Alexander Shaw, "'Strong, united, and independent":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ranian politics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1945-4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2 (2016), 505-9, 516-17.
- 100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126-30, 134-9.
- 101 Calder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British Intellig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Twilight of Empire* (London, 2013), 288-92.
- 102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07-11.

- 103 Robert Vitalis, 'The "New Deal" in Egypt: 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commercial competition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fall of neocolonialism', *Diplomatic History*, 20 (1996), 212-13, 234.
- 104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24; John Kent, 'The Egyptian bas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Middle East 1945-1954',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1993), 45.
- 105 Kent, 'Egyptian base', 53-60; Judge and Langdon,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78-9.
- 106 Martin Thomas and Richard Toye, *Arguing about Empire: Imperial Rhetoric in Britain and France 1882-1956* (Oxford, 2017), 207-12, 215-27.
- 107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298.
- 108 Husain, *Mapping the End of Empire*, 29.
- 109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24-8, 61;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84-5.
- 110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205-6.
- 111 Stefanie Wichhart, 'The formation of the Arab Leagu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194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4 (2019), 329-31, 336-41.
- 112 Eliezir Tauber, 'The Arab military force in Palestine prior to the invasion of the Arab armi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1 (2016), 951-2, 957-62.
- 113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73-4;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87-8.
- 114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84-8;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17.
- 115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105-6.
- 116 Wyman, *DPs*, 138-9, 155; Cohen, *In War's Wake*, 131-40.
- 117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63-4.
- 118 Ibid., 88-90.
- 119 Tauber, 'The Arab military force in Palestine', 966-77; James Bunyan, 'To what extent did the Jewish Brigade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1 (2015), 40-41;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93-5.
- 120 Wyman, *DPs*, 155.
- 121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213-14.
- 122 Beverley Loke, 'Conceptualizing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negotiations toward a post-war world order', *Diplomacy & Statecraft*,

- 24 (2013), 213-14.
- 123 Robert Bickers,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London, 2017), 230-31; Xiaoy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1996), 153.
- 124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4, 25-6.
- 125 Ibid., 55.
- 126 Ibid., 94-5;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234.
- 127 Debi Unger and Irwin Unger, *George Marshall: A Biography* (New York, 2014), 371.
- 128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9), 339-43.
- 129 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Calif., 2003), 35; Taylor, *Generalissimo*, 343;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375.
- 130 Liu,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282.
- 131 Taylor, *Generalissimo*, 350; Paine, *Wars for Asia*, 239-40.
- 132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47, 150-53.
- 133 Diana Lary, *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 (Cambridge, 2015), 3; Paine, *Wars for Asia*, 226.
- 134 Lifeng Li, 'Rur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 (2015), 103-9.
- 135 Lary, *China's Civil War*, 89-90.
- 136 Bickers, *Out of China*, 264-6.
- 137 Taylor, *Generalissimo*, 381.
- 138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379-81.
- 139 Paine, *Wars for Asia*, 245, 251.
- 140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244-7.
- 141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London, 2013), 4-5.
- 142 Ibid., 6-8.

- 143 Taylor, *Generalissimo*, 400.
- 144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251.
- 145 Donggil Kim, 'Stalin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old War History*, 10 (2010), 186-91.
- 146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2012), 292.
- 147 Dikötter, *Tragedy of Liberation*, 41.
- 148 Roland Burke, *Decolo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hiladelphia, Pa, 2010), 27-8.
- 149 Dane Kennedy,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American empire from a British imperi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Review*, 29 (2007), 83-4. 典型的例子或許是Joshua Freeman, *American Empire: The Rise of a Global Power,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2012).
- 150 Alexander Gogun, 'Conscious movement toward Armageddon: prepar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War in orders of the USSR War Ministry, 1946-195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2019), 257-79.
- 151 McIntyre, *Winding up the British Empire*, 88-9.
- 152 Simon Davis, "'A projected new trusteeship":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n', *Diplomacy & Statecraft*, 17 (2006), 37.
- 153 Neil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Stanford, Calif., 2003), 351-5.
- 154 Parker, 'Remapping the Cold War in the tropics', 319-22, 328-31.
- 155 Daniel Immerwahr,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 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0 (2016), 373-4.
- 156 A. G. Hopkins, 'Globalisation and decolonis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 (2017), 738-9.
- 157 Alexander Statiev, *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Cambridge, 2010), 131.
- 158 Ibid., 117, 125, 133.
- 159 Ibid., 177, 190.
- 160 Commiss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Latvia, *The Hidden and Forbidden History of Latvia under Soviet and Nazi Occupations 1940-1991* (Riga, 2005), 217-18, 251.

- 161 Ibid., 182.
- 162 Roberts, *Stalin's Wars*, 247-8.
- 163 Mark Kramer, 'Stalin, Soviet poli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1941-1948',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 *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70-71.
- 164 Ibid., 280-81; Roberts, *Stalin's Wars*, 314-19.
- 165 Norman Naimark, *Stalin and the Fate of Europe: The Postwar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ss., 2019), 18-25.
- 166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224-5.
- 167 Kennedy, 'Essay and reflection', 98-9.
- 168 Michael Seth,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Lanham, Md, 2016), 105; Ronald Spector, 'After Hiroshima: Allied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fate of Japan's empir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9 (2005), 1132.
- 169 Spector, 'After Hiroshima', 1132-4.
- 170 Seth,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101-5.
- 171 *Basic Facts about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5), 89-90.
- 172 Seth,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120-21.
- 173 Margery Perham, *The Colonial Reckoning: The Reith Lectures* (London, 1963), 13.



# 特別收錄別冊

# 外國媒體與國際學界推薦

無庸置疑的二戰全球史巨著。

——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帖木兒之後》作者

登峰造極之作，匯聚作者畢生心血，改變我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勢必會待在書架上很多年。

—— 理察·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納粹帝國三部曲》作者

歷史學大師奧弗里主張，我們不該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單理解成善良西方民主國家與德義日等邪惡法西斯國家的對抗。他認為二戰起因於舊帝國秩序受到新崛起帝國的挑戰，而其結果就是舊帝國秩序的瓦解與新民族國家的崛起。這一框架幫助奧弗里運用其無以倫比的淵博知識，打造出一部真正的二戰全球史，同時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畢生對二戰深入反思的結晶。必讀之作。

——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戰火中國1937-1952》作者

我們西方人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希特勒的二次大戰，但對數百萬亞洲人來說，那些年的衝突確實跟納粹與猶太人滅絕不大相關。這場戰爭也不是民主對抗獨裁，而是帝國與帝國之間的衝突。奧弗里融入了歐洲以外的歷史經驗，重新講述這場看似熟悉的戰爭。

——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被遺忘的盟友》作者

在時間跨度、內容深度及學術嚴謹度上都不同凡響，在領域廣度及視野清晰度上也令人印象深刻。本書正確地把二戰起點提早到一九三一年的中國。

—— 賽門·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今年是二戰史的豐收年，我們有了奧弗里這部篇幅宏大的著作。他把二戰重新定位成帝國的最後一搏，而不是單純的領土衝突。

—— 齊斯·洛韋（Keith Lowe），《二戰後的野蠻歐陸》作者

在寫出二十幾本相關著作後，奧弗里拓展了規模，真正將二戰視為一場全球戰爭。這一視角帶我們用不同角度理解二戰，認識二戰的本質。

—— 丹尼爾·因莫瓦爾（Daniel Immerwahr），《被隱藏的帝國》作者

二戰應該要被理解成一場橫跨歐亞且環環相扣的全球衝突。如今有許多優秀史家都在拓寬我們對亞洲二戰史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李察·奧弗里。他在新書中主張，軸心國自視為帝國擴張的後進，並且為了取代英法帝國主導的全球秩序而發動戰爭。

—— 蓋瑞·巴斯（Gary J. Bass），《東京大審判》作者

本書以獨特視角挑戰讀者對二戰的各種假設，本人願意給予最高度推薦。

—— 馬克·蒙茲克拉羅斯（Mark Montesclaros），美國陸軍戰爭學

院講師

本書觀點新穎且略帶爭議，認為帝國擴張才是二戰參戰國的原動力與核心，而且不僅適用於軸心國，也包括英法等同盟國。

—— 強納森．克魯格（Jonathan Klug），美國陸軍上校，戰略學者  
暨軍事史家

本書講述一段耳熟能詳的歷史，卻沒有落入陳腔濫調的窠臼。這是一部真正國際性的作品，對歐洲和亞太地區給予同等關注。任何對二戰史感興趣的讀者都應該要有一本。

—— 葛蘭特．霍華德（Grant T. Harward），美國陸軍軍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即使是最熱衷於研究這場戰爭的人，也能從本書中學習到新觀念。

—— 傑瑞．萊納柏格（Jerry D. Lenaburg），資深軍事分析師

由於沒有一場戰爭的後果比二戰更嚴重或更深刻，人們常出於直覺認為這場戰爭的起因肯定同樣深刻。但奧弗里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偶然意外及個人因素的產物。

—— 格佛瑞．羅伯斯（Geoffrey Roberts），愛爾蘭軍事史家

奧弗里是英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研究二戰的重要權威，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解釋這場戰爭。本書匯集了他數十年來的學識及思考，對這場全球戰爭進行了無與倫比的研究，幾乎每一頁都能帶來啟發與見解。

—— 傑洛米．克蘭（Jeremy A. Crang），蘇格蘭軍事史家

為什麼還需要一本新二戰史？本書希望挑戰人們普遍抱持的假設，即認為二戰僅是源於軸心國的侵略野心。書中的數據、資訊與見解令人目不暇給，就算是最專業的讀者也能受益匪淺。

—— 《經濟學人》

本書用最鋒利的手術刀解剖戰爭的每一個層面，無疑是最好的歷史著作。

—— 《紐約時報》

不朽之作，難以想像哪一本書對二戰的研究能比它更全面。

—— 《華爾街日報》

歷史學家往往非常專業化，很少人能像奧弗里一樣，同時精通於外交、經濟、戰爭技藝及戰爭罪行等不同領域。他寫過多本好書，但這本最好，使所有過去關於二戰的著作都黯然失色。

—— 《泰晤士報》

奧弗里的詮釋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二戰的看法。

—— 德國《世界報報》



## 臺灣各界試讀推薦

本書以二戰為中心，同時處理亞、歐兩個戰爭空間，運用巨量資料剖析戰前國際糾葛、戰後罪行審判、戰場上的軍事殺戮、戰場下的強暴屠殺與民間抵抗……厚達三冊的巨著，以多重視角、多元面向告訴讀者：想瞭解歷史，沒有懶人包，只有耐心閱讀與持續反思！

—— 伍碧雯，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二戰結束即將屆滿八十年的此刻，重新探討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為何？李察·奧弗里在本書敘寫上有兩大洞察：首先，拋棄「民主vs.獨裁」的道德文飾，直指二戰根本就是「帝國」之間的衝突；其次，矯正「歐洲中心觀」的視野扭曲。除歐陸之外，戰時或戰後的印太區域也相當關鍵，戰爭對於東、西方的影響都難以磨滅。這兩大洞察引導讀者至全球史的格局，且在人類逐漸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隱憂中，構成批判帝國行徑、突破國界藩籬、跨越文化隔閡等行動的重要基礎。

——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科教師

本書以二戰為題但不限於二戰，透過「帝國」這個有力的解釋框架，詳細鋪陳前因後果，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龐大歷史事件，編織出一幅成彼此相關、充滿意義的圖像。二戰、戰爭、帝國、民族國家在一○八課綱歷史必修、選修課程都是重要主題，與本書疊合度非常高。現今課程強調的區域互動，也與本書全球視野互通。光是將二戰起點設定在一九三一年就極具眼光。二戰雖然如此重要，課堂談法卻容易

陷入窠臼。本書有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深具眼光的解讀，加上譯文流暢好讀，將成為歷史老師備課、進修的重要參考。

—— 蔡蔚群，北一女中歷史科教師

英國軍事史巨擘李察·奧弗里跳脫以往的框架，改以宏觀的歷史角度為經緯，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出現的新帝國主義切入，抽絲剝繭地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各主要交戰國累積幾十年之久的諸多內外部問題，還有各方利益衝突的根源，進而帶領讀者重新看待並思索這場至今依然影響到世界許多地方的全球大戰，並深入探討戰爭在軍事以外各層面的影響。若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比喻成一個人，以往的戰史可說是外表和血肉，而這本書就是骨架和靈魂。

—— 于倉和，資深軍事譯者

我們為什麼要讀二戰歷史？我的答案很簡單：歷史會重演。這場人類歷史迄今最大規模的戰爭，從衝突管理、戰略戰術、人力動員等各個層面，都是遠離戰爭許久、但是身處高度戰爭風險的我們，最好的借鏡。以烏俄戰爭為例，儘管武器科技日新月異，仍然難逃壕溝戰等傳統打法；而與平民相關的人力動員、民防知識，早在二戰就有許多前車之鑑，也有許多難以想像的慘烈後果。本書與其他二戰歷史書籍的差異，在於不只著重於戰略、戰術與戰具，而是更貼近你我的生活，真正從二戰歷史經驗，準備戰爭並且避免戰爭。

—— 相振為，Podcast「軍事相對論」主持人

全球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書汗牛充棟，但本書的分析與解釋令我印象深刻。除了描述戰爭歷史概況之外，本書從人力、記憶、經濟、道

德、平民、情感及法律等面向，分析二次世界大戰各國成敗的重要因素。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烏克蘭戰爭，這些指標仍可作為分析的重要參考。本書詳細的引注更顯示作者的旁徵博引及對自己論述的嚴謹態度。

—— 沈明室，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所長

描繪二戰歷史的相關書籍五花八門，奧弗里的這本書卻能做到在敘述上文字流暢且情節吸引人，在論理上又能提供科學且系統化的證據和具測量性的理論觀點來輔佐，這對一般讀者或者研究者來說，都是難得的瑰寶。尤其現在我們已不能稱為處於無戰的和平盛世，烏俄戰爭或以哈衝突，乃至於臺海之間都可說是深受二戰後安排的影響，要能釐清其中脈絡，本書不得不讀。

—— 廖小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生活在當前臺灣的人，大都不曾經歷過戰爭，但戰爭離我們其實不遠 —— 無論是過去的戰爭，還是未來可能的戰爭。二戰扭轉了歷史的走向，也改變了眾多群體的命運 —— 包括臺灣在內。臺灣不僅要處理過去的戰爭遺緒，更要做好準備，面對日益深刻的戰爭威脅。如何認識戰爭、思考戰爭，是當下共同體成員無法逃避的嚴肅課題。這部不落窠臼的鉅著，將二戰描繪為「領土型帝國的最後一戰」，對於目前依舊處在帝國夾縫中的臺灣，尤其具有啟發意義。除了帶入新的觀點講述二戰歷史，作者更從各個不同的主題與面向，深入探討「戰爭與社會」之間的多重關係與變貌，值得臺灣讀者細讀深思。本書不僅幫助我們重新認識二戰、思考二戰與當前國際局勢的關係，也刺激我們進一步探問：帝國之間的戰爭，真的結束了嗎？還是將以新的組合與樣態，重返全球歷史的舞臺？帝國角力下的臺灣，要如何自處與應對？我們做好準備了

嗎？

—— 汪宏倫，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專文導讀



# 從全球史的視角重新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楊肅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 一

這部《二戰》的原文書名為《鮮血與廢墟》（*Blood and Ruins*），是英國著名二十世紀史家李察·奧弗里（Richard J. Overy）在二〇二一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新著。在這部將近千頁的鉅作中，作者以史詩式的筆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這場人類史上規模最巨大、衝突最暴烈、損傷最慘重、影響最深遠的全球衝突，從全球史的視角，做全面的歷史重建：解析其歷史源起，敘述戰爭的全程，深入支撐這場戰爭的動員機制，詮釋二戰對世局結構的衝擊與影響。

奧弗里教授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先是留在劍橋大學擔任研究員與講師，教授近代史；一九九四年因傑出學術表現，獲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聘任為近代史教授；二〇〇四年，轉任埃克塞特大學歷史系教授。奧弗里教授長期投入二戰史的研究與寫作，著作等身。他在一九八〇年發表第一本關於二戰的專著《空戰：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得到好評。從一九八〇年迄今，奧弗里教授耕耘不懈，已經出版超過二十部二戰的專書。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無論在質或量上，都很驚人，後人應該難以企及，遑論超越。

《鮮血與廢墟》是一部有關二戰史的嶄新宏大敘事，其寫作建立在

奧弗里教授數十年來對二戰的閱讀與研究基礎上面。奧弗里教授個人的專精領域是歐洲戰場，歐洲以外部分，則廣泛蒐集、閱讀其他專家有關北非、中東、東亞、東南亞與太平洋戰場的研究，納入他的敘事、分析架構，予以適當的呈現。此外，一九九〇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檔案逐步開放，史家對蘇聯與東歐各國在二戰中的作為，也有了新的認識與洞察。這部書對歐洲東線戰場遂而有更完整、深入的敘述，對蘇聯人民在這場「衛國戰爭」中的奮戰與其對盟軍擊潰納粹德國的貢獻，做了更適切、合理的詮釋。

## 二

奧弗里教授從幾個核心視角，來重新書寫、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首先，這場國際衝突本質上是一場「帝國戰爭」，根源於十九世紀後期新帝國主義「領土型民族帝國」的興起。這一波民族帝國的領頭羊英國與法國，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殖民競奪中攫取大部分非洲與東南亞，又在一戰後託管原鄂圖曼帝國的中東領地。另一方面，奧弗里教授指出，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義大利和德國，及東亞的日本，先後經歷現代國家重建與工業革命的洗禮，崛起為新興的民族國家，具備強烈民族認同與強大經濟實力。三個新興民族國家自認為領土狹小與資源貧乏，民族「生存空間」不足，而企圖向外擴張。他們意圖仿效英國、法國與荷蘭的先例，建構自己的「領土型民族帝國」，拓展生存空間。

當時，非洲、中東、東南亞等地區已大部分被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舊領土型帝國占有，而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等新興國家只能在這既有格局中，想法開拓新的殖民空間。從一九三〇年代初，日、義、德三國開

始在自己的周邊地區尋找空間，以建立自己的「領土帝國」：首先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滿洲，並染指華北地區，繼而是義大利入侵東北非衣索比亞、北非利比亞與巴爾幹阿爾巴尼亞，最後是納粹德國在中、東歐的擴張，包括併吞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圖謀波蘭與烏克蘭。

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積極拓展民族生存空間、建立民族帝國的野心，踐踏了《凡爾賽條約》建立的國際秩序，更威脅到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舊民族帝國的安全與利益，遂而引起衝突。義大利在東北非與北非的擴張，挑戰了英國與法國的利益；日本控制滿洲，威脅到蘇聯的安全，其對東南亞的野心，也令英國、法國與荷蘭不安；德國在中、東歐的兼併，嚴重危害法國在一戰後在歐洲建構的集體安全體系。在奧弗里教授看來，二戰本質上可說是新、舊兩種領土型民族帝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構成了這本新二戰史的敘事主軸。

其次，從全球衝突視角來看，奧弗里教授主張，二戰不是始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國入侵波蘭，而可往前推到一九三一年在中國策動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瀋陽製造事端，藉故出兵東三省，成立「滿洲國」。這是二戰的先聲。九一八事變後，日軍繼而進入中國華北，不斷施壓中國，意圖將華北中立化與特殊化。中國因軍事實力薄弱，一再忍讓，始終無法遏止日軍的進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對日軍進行反擊，中日兩國正式開戰，東亞的二戰進入主階段。

一九三〇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國，國際聯盟的反應軟弱無力，鼓舞義大利對東北非、北非與巴爾幹的擴張。同時，希特勒則重建德國軍備、撕毀《凡爾賽條約》、向中歐及東歐強勢擴張，而英、法等國際政治主角卻採取「綏靖政策」，一再對希特勒妥協。然而這反而鼓勵希特勒的冒進，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國以優勢軍力對波蘭發動閃擊

戰。希特勒原本預期英國與法國會再度低調如故，任德國侵吞波蘭。不過，這次英法兩國終於承認綏靖政策失敗，為兌現保衛波蘭的承諾，在兩天後相續對德宣戰。這開啟了二戰的歐洲戰場。

二戰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歐洲戰場在五月九日結束，亞洲戰場則在八月十四日終止。這部書有關二戰的主敘述，如多數二戰史敘事一樣，終結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就本書的觀點，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帝國解體，代表了十九世紀後期以來近代領土型民族帝國建構運動的終結。不過，一九四五年八月終結的是日本、義大利、德國這一批新興的領土型民族帝國，英國、法國和荷蘭這些既有的領土型民族帝國仍然苟延存在。無如，二戰觸動一波波強力的反殖民運動，既有領土型民族帝國的殖民地或託管地在戰後紛紛要求獨立，殖民母國雖然做了抗拒，終無法阻攔這波民族獨立浪潮。到一九六〇年代，歐、亞、非的殖民地大都完成獨立建國的願望。本書主張，二十世紀前期民族帝國衝突引發的戰爭與動盪，要到這個時期才真正成為過去。

其三，二戰是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大部分國家人民都被捲入。這一場大戰擴及到三大洲和兩大洋：主戰場是在大部分的歐洲、非洲北部、亞洲的中東、東亞與東南亞，以及北大西洋與西太平洋。在本書的敘事中，奧弗里教授跳脫長期以來二戰史過於偏向歐洲戰場（包含北非），而將「太平洋戰爭做為點綴」的缺點，盡量從「真正的全球衝突」角度來書寫，給予東亞、東南亞、太平洋戰場同等的重視與呈現。此外，本書也參照新的研究進展，對東線戰場與巴爾幹半島的戰事，也有更深入、詳盡的敘事。

從參戰國家與人民來看，二戰的「全球性」就更容易理解。這一點可以從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動員來說明。奧弗里教授指出，二戰是一場「帝國戰爭」，參戰的帝國都盡力動員控制地區的人力、物力與財力，

支撐帝國作戰，這些被動員的控制區，經常是遠離戰場，或與戰爭無直接關係。

最典型的是英國對殖民地的動員。在這次大戰中，英國在四個自治領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南非，總共動員了兩百六十萬人，殖民地印度更動員了兩百七十萬人。這其中，紐西蘭、加拿大與南非都遠離戰場，而澳洲與印度雖受到日軍威脅，但不曾受到入侵。更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國家的參戰。一九四二年，根據奧弗里教授的敘述，拉丁美洲的部隊也要求加入美軍的行列，「希望藉此在戰後秩序取得一席之地」。一九四二年，中美洲的墨西哥與南美洲的巴西陸續對軸心國宣戰。一九四四年，一個巴西師與一個空軍分遣隊到義大利參與對德作戰，而一九四五年，墨西哥也派遣飛行員參與菲律賓空戰。

### 三

二戰是一場完全的「總體戰」（total war），參戰各國均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將「將國家的各個部分與所有活動投入於戰爭」，以確保國家的生存。這種總體戰的概念與實踐，顯然是吸取一戰的動員經驗，並更全面、系統化的執行。

總體戰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套有效率的「總動員」機制。總動員概念可溯源到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七九三年八月，法國革命政權面臨奧地利與普魯士聯軍入侵的威脅時，敲響「祖國危急」的警報，發出「大徵召令」（*levee en masse*）。這實質上就是一個全國動員計畫，號召法國國民：「壯丁須上前線，已婚男性應製作武器和運送補給，女性應縫製營帳、征衣，或當看護，孩童應將舊布製作蹦帶，老者則應到公共場所



去宣傳革命、鼓舞士氣。」不過，法國革命戰爭時的動員僅限於人力的動員，而一戰以後的動員，則涵蓋國家全部人力與資源。

二戰的總體戰機制，奧弗里教授指出，是在一戰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化，成為支撐二戰的重要基礎。這部書的第二部分詳盡、深入地討論維持此一總體戰爭的各種機制，包括：軍事與經濟的動員、戰爭技藝的發展、戰時的經濟治理等。在這方面，這部新二戰史跳脫了傳統戰史寫作偏向前線戰役敘事的窠臼，而加重後方的後勤動員的討論，凸顯其在戰爭中的重要性。這是這部書值得特別推薦的部分。

一戰以來，新科技應用於戰爭，促成武器的創新與戰術的革新。二戰期間，參戰雙方大力投資軍事科技，針對作戰需求開發新武器，以求出奇制勝。這部書用一節來討論「軍事作戰技藝」，介紹重要武器的改良或發明，包括飛機、戰車、潛艦、航空母艦、登陸艦艇、無線電與雷達、密碼術與密碼機等。另一方面，這類武器的運用往往帶動戰術創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結合大規模空中攻擊與地面戰車洪流，迅速擊潰波蘭，成為閃擊戰的典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祕密派遣航空母艦艦隊，利用海軍航空部隊，成功偷襲珍珠港，發揮奇襲效果。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與美國均以空中攻擊打擊、消滅對方艦隊，改寫傳統海戰的戰術。同樣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與美國都結合空中轟炸、艦砲炸射與陸戰隊登陸，發展出兩棲登陸戰。美軍發展的兩棲登陸戰術，後來應用在盟軍登陸北非、入侵義大利與諾曼第登陸戰。

關於二戰的總體戰，奧弗里教授還點出一個有趣的觀察。這次大戰期間，參戰國家都高強度地動員國民參戰，要求國民為國家做無限的犧牲。然而，要求人民做巨大的犧牲，國家必須提出一套有力的論述或說法，說服國民這場戰爭的正義性與參戰的道德性。在這方面，奧弗里教授發現，參戰各國所做的愛國教育或宣傳都十分成功。軸心國的人民大

都認可擴張民族「生存空間」的合理性；同樣，同盟國國民也大都接受，這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獨裁專制的戰爭，參戰是為了保衛自由的生活方式，拯救文明於倒懸。

無論在前線或在後方，本書指出，這種全民動員以進行總體戰的信念，在雙方陣營中，都從未受到嚴重的質疑。「每個交戰國的工人發起的抗爭，規模都十分有限，充分顯示國家有充足的力量讓全國民眾一致支持總體動員的戰略……國家的成功使得二戰期間從未發生像一戰時期與一戰之後的革命騷亂……大規模動員建立在國家與民眾的共同信念上，這也構成了現代戰爭的總體性格。」這也說明了為何到了戰爭末期，德國與日本的軍民，明知戰敗已無可避免，卻仍然奮戰不懈，不願投降，寧為玉碎而不為瓦全。

## 四

綜言之，奧弗里教授從近代帝國競奪的角度，詮釋二戰的歷史意義，視之為近代世界最後一場「帝國戰爭」。經過這場大戰，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建立的領土型民族帝國，無論新、舊，紛紛在戰火下崩解。這是二戰帶來的最明顯地緣政治結果。「戰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全歐洲的殖民帝國毫無例外地崩潰，取而代之的是由民族國家所建立的世界。」奧弗里教授寫道：二戰結束後的殖民地戰爭，「為新領土型帝國主義譜下一段混亂而暴力的終曲」。聯合國的成立，則見證了人類歷史「從全球帝國到民族國家的世界轉變」。之後的世界，則進入了一個「新全球時代」。

# 二戰史給臺灣社會的啟示

張國城（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本書是我讀過的最好二戰史之一。

探討軍事和戰略議題，歷史積累非常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過去八十幾年了，但是作戰的方式、運用的戰術很多對今天的戰爭仍然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包括空權的重要性、裝甲作戰等等。許多人對於戰爭如何進行、軍隊如何運作缺乏觀念。作者對戰爭的所有面向幾乎都做了廣泛又深入的論述（這也是本書篇幅之所以如此巨大的原因），它可以為任何讀者作為很好的一本戰爭和軍事入門參考書。

其次，本書可以協助瞭解二十世紀國際關係演進的動力。沒有帝國的衝突，二次大戰不會發生。作者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認為二次大戰是一場「帝國戰爭」，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作者的分析指出，到了一九〇〇年，除了俄羅斯帝國外，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建立了國會（雖然投票權有限），並以法律管治其公民。對於現存的政治和經濟菁英而言，這些改變導致他們喪失了傳統的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威。在這種快速變化且不可預測的環境下，新興工業強國掀起了新一波的領土型帝國主義，試圖瓜分或支配世界上尚未被現有殖民帝國控制的地區。作者認為只有透過理解這一強大的，為了建設一個「帝國」的驅動力，才能深刻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根源。這個看法，以及作者的詳盡論述，是本書可讀性的一大來源。作者花在敘述戰後演變的功力是本書的另一亮點。戰後對英法殖民帝國的削弱，帶來了殖民地獨立浪潮，新興國家的大量出現，形成了今日世界的面貌——由於戰況太激烈，而使

得「被承認」成為國家的新要件（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項），改變了國際政治，這種脈絡對臺灣讀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對所學是國際關係的筆者來說，「二次大戰是一次大戰的延續」在國外求學期間，是基本的討論基礎。但在中華民國的教育裡，一般來說並不（或很晚）才接受此一事實。過往都將二戰的原因解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當然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是戰爭的原因，但他們為什麼要侵略擴張？反而很少人能夠瞭解。且基於政治因素，日本因素被擴大解釋，對今天兩個中國社會人們的世界觀都有眾所周知的深遠影響。無論如何，這都使我們很可能失去了一次用更為有效的方法，去面對和解析這一段歷史的機會。

本書也挑戰了很多過去的舊觀念，這要拜檔案的解密和作者的治史功力。譬如「綏靖主義」常被認為是英法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政策，而且這一政策鼓勵了希特勒的野心，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作者卻指出，用「綏靖主義」形容英法一九三〇年代的戰略其實是嚴重的誤解。作者認為二十年後冷戰時期常見的兩個詞反而更適合描述一九三〇年代的英法戰略，這兩個詞就是「圍堵」（containment）與「嚇阻」

（deterrence）。而英國重整軍備，作者證明也早於德國。作者還指出同盟國彼此之間其實一直存在著足以破壞和諧的重大歧異與爭論，即使在大敵當前時都如此。這也凸顯了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作者也指出大量的歷史文獻努力想證明情報蒐集（特別是訊號情報）有利於作戰成功，然而實際的能效如何仍有爭議：「.....情報在一層又一層複雜的決策機制中反覆折射，等到真正根據情報做出指示時，早已錯失寶貴的作戰時機，如此一來，即使是最好的情報也無法創造戰果。」這也顛覆了很多過去的論著，類似的例子在書中數不勝數，是筆者對這本巨著手不釋卷的重要原因。

除了書裡的內容之外，本書的架構和寫作方式也值得推薦。作者撇除許多有關二戰的中文著作基於國仇家恨和意識形態的敘述和評論。誠然每位作者都有表達的自由，但若要做知識性的討論和帶給讀者更多的啟發，則一種中立、不帶感情的行文方式對讀者的思考是有很大助益的。作者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傳統觀點認為，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日本軍人就是造成危機的原因，但事實卻正好相反：這些人其實只是深層危機所引發的結果。換言之，如果我們不瞭解推動這段歷史的力量，就無法合理解釋戰爭的起源、經過與結果。」這對海峽兩岸的史觀形成了巨大挑戰，但作者用以支撐這一結論的論述相當完整和全面，非常值得仔細詳讀。

其次，雖然本書是敘述二戰，但對臺灣讀者理解今日臺灣面臨的軍事威脅是非常有幫助的。譬如臺灣的社會無論官方抑或民間，非常刻意地不談臺灣社會遭到中國空襲的可能性。因此臺灣社會的「民防」集中在「民兵」，實際上最能發揮功用的民防是遭到空襲之後的救火、救災與救護，還有在戰爭中維持經濟和社會的基本運作。本書對於二戰中各國如何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優點和缺點有非常詳盡的敘述。

然後對於資源的運用、同盟的維繫，作者指出必須仰賴國家本身具有「總體戰」的意願、能力和準備。「.....集體動員是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唯有具備龐大工業與商業基礎、擁有大量受過技術訓練的勞動力、具有發展健全的科學體制，以及能夠取得適當資源與資金的現代國家，才有能力發動大規模戰爭與供給維持戰爭所需的武器裝備。.....工業化戰爭，仰賴的是大量容易製造與相對廉價的現代武器，如此才能在戰場維持一支龐大的部隊，而且能在連續數年的戰爭中不斷補充武器——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往往已做不到這點，因為當前的武器有著極為昂貴的成本與極其複雜的科技。」所以，在今天更需要在戰爭前就準備好戰爭



所需的武器。此外，作者也告訴我們，二戰給我們的寶貴教訓就是儘管軍事吸取絕大多數的經濟資源，但在軍事需求、財政穩定與適當的人民生活水準之間維持平衡極其重要。這部分特別值得近年來醉心於「城鎮戰」的臺灣社會去瞭解。不是光靠節衣縮食的犧牲精神與愛國心（縱使它可能非常強烈）就能贏得戰爭。作者指出，日本的裕仁天皇最終在八月十日做出投降的決定，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裕仁擔心日本帝國在被美國擊敗之前，就因為饑荒造成的社會動亂而覆滅。這些都值得臺灣讀者反思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局勢。

因此，筆者要非常榮幸地向出版社和譯者致上崇高的敬意，並向臺灣讀者們大力推薦這部巨著。

# 致力於調整二戰敘事下歐亞時差的巨著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先說結論：如果您正在尋找一本關於二戰歷史的書，而且希望單純一本就能提供相當詳盡的歷史細節乃至完整的學術文獻，那本書是不二之選。尤其是如果你希望有一本書能真正解釋為何二戰是真正的「世界」大戰，而不是一場歐洲大國之間的衝突外溢到各大洲，逐步將亞洲與美洲國家捲入，最後以投擲於日本的兩顆原子彈告終的戰爭，那更有理由閱讀本書。因為，這是一本將二戰理解為始於日本侵略東北，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雖形式上結束於日本投降，但戰爭的餘波盪漾到一九六〇年代，及至為數眾多的前殖民地取得獨立國家身份，締造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之新國際秩序為止的巨著。

閱讀本書，讓筆者憶起了在英國就讀高中時第一堂歷史課所學到的一個單字：historiography。此時的中文維基百科將這英文字譯為「史學史」，著眼於歷史學家的書寫來源是否可靠，有無偏見，屬於哪一種學派，採取哪一種道德判斷，書寫內容是否欲以修正人們對事實的理解，乃至關於做為一種事後理解的陳述跟事件當事人的親身經歷是否存在落差等問題，頗為全面。但當時課堂老師提供的解釋則相當乾淨俐落：那指的是歷史如何書寫，由誰書寫，以及寫給誰看的基本問題。歷史的第一堂課，就是要學會將這件事情謹記於心。

對於一個國中歷史考試常不及格的臺灣學生來說，對歷史書寫方法論的提醒，跟後來得知原來學歷史不但不用背年代，入考場還可以攜帶年代表，因為考試重點在於如何從不同觀點來對一個事件做出適當且平

衡的判斷，一樣令人如釋重負，幾乎可說是一種解放。因為那承認了「歷史」敘事其實會有特定的預設觀點，會有特定立場，甚至從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角度來書寫，本身不僅是「方法」上不客觀，更是一個「倫理」的問題——畢竟，那可能涉及了對某一方（無論是個人、民族或國家）親身經歷之根本否定。

《二戰》（*Blood and Ruins*）猶如是以上史學方法論的示範。重講故事，包括主角與人設，並據此來挑戰西方學界對「二戰」長久以來的主流理解，正是這一位以二戰歷史研究著稱的英國歷史學家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撰寫本書的企圖。過去的書寫總是恪守客觀與平衡原則來陳述「敵國」立場的他，這次將東亞人民的實際經驗與集體記憶納入了更廣大的敘述當中，一方面讓試圖以帝國之姿躍上國際舞臺的日本、德國、義大利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共同主角，另一方面則藉此呈現交戰雙方主要國家在軍事、經濟、戰略及道德層面上的各種考量，包括各級人員的計算與失算，甚至是英國首相邱吉爾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各懷鬼胎，因此整體而言並不如戰勝國之後所宣稱的那樣是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那樣正義。

書寫方法與角度之外，貫穿本書的是一個簡單的主張：二戰是一場新舊帝國之爭——舊帝國指的是大英帝國及同樣擁有許多殖民地的法國；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及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則是亟欲挑戰既存世界秩序的新帝國。是故，本質上這是一場「帝國戰爭」。不僅如此，作者也試圖證明，這是史上「最後」一場的帝國主義之戰，因為德、義、日其實想成為英、法那樣擁有殖民地的帝國，而且那是以單一「民族」的命運來考量，以「民族帝國」（nation-empire）為想像的一種帝國主義。換言之，這種野心想成就的是自身做為一個民族的偉大，而非帝國統治下的各民族之共榮！

如此一來，無論本書內容如何鉅細靡遺地書寫故事的共同主角，甚至區分符合傳統定義的國與國「戰爭」、「內戰」，以及人民主動對抗進入了國境之外敵的「平民戰爭」等不同種類的軍事衝突，敘事的主軸並不難掌握。在重新將二戰界定為「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間並正式開啟以民族國家為主的世界秩序之外，作者也從動員方式、人員種類、經濟模式重整、作戰技術和戰略乃至各式新科技的研發及使用，來證明那是史上第一場涉及了真正意義上的「總體戰」（total war）之戰爭，且相信讀者能同意那是唯有能真正壟斷武力使用權的現代國家才能發動及進行的戰爭。

關於總體戰，最引起筆者注意的細節之一是母校倫敦政經學院的參與。多數校友知道學校主建築當年是英國「經濟作戰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的指揮中心，但本書作者則進一步描繪了學校也如何為戰時政府做出了詳盡的全民士氣及心理狀態調查。二戰後流行於美國的行為主義研究，在此時已是英國總體戰的社會科學後盾。認知作戰是總體戰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也從道德角度來對戰爭提出反思，也針對交戰雙方提出的正義之詞來進行了分析與評估。不過，那並不是以「歷史法庭」審判長自居，而是從平民百姓在戰爭當中遭遇了何等苦難及舉國上下如何因為戰爭而犯下程度不一的各種罪行之角度，來進行的一種反省。

至此，相信讀者不難看出本書比起國內學界稱之為「人文」學科著作，更像是一個龐大的跨學科研究，歷史文獻之外也涉及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乃至國際法領域的掌握。社會科學當中的事實描述、因果解釋、意義詮釋、同情理解乃至診斷、批判及處方的提出等許多學者只能堅守其一技藝，不但全都派上了用場，分析的層次從個人到集體，個別國家到國際體系，不一而足。史家之大

者，或許莫過於此。

無論如何，本書為二戰研究樹立了一個典範。挑戰的對象除了二戰傳統敘事之外，也包括了西方「義戰論」（just war theory）傳統當中關於怎樣才能算是一場正義戰爭的六大原則（做為最後手段、正當理由與動機、合法權威、獲勝可能、武力使用必須符合比例、不得攻擊非戰鬥人員）之使用。誠然，置於奧弗里描繪的複雜戰爭圖像底下，基於上述原則的判斷並不總是黑白分明。不意外，關心國際戰爭法的讀者也能從本書當中獲得許多反思。至於本書論點究竟是支持或修正了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及據此斷定美、中這兩個舊新強權「注定一戰」的說法，則眾說紛紜。而試圖想建立一套「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機制的人，當然也不能錯過本書關於人們如何逐步走向戰爭的分析。

最後，筆者也必須指出，雖然本書因為納入東亞的戰爭經歷及集體記憶，不僅為歐美主流史學界填補了一個長達七十多年的空缺，也拉近了西方與非西方世界對二戰的理解，從而讓雙方在歷史分期、實際經驗及政治意義上都減少了肇因於時間維度上的認知差異，或說「時差」，但關於雙方如何捲入戰爭的意識形態尚有以思想史來補足的空間，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此外，將二戰視為最後一場帝國戰爭的說法，或許也早了一些。畢竟，俄烏戰爭對許多人來說是另一場帝國擴張戰爭。美國則更是猶如房間裡的大象，其崛起過程無疑是歷經了帝國主義式擴張，才能從北美十三州發展為今日的強權，且此時是否為進行著新式的帝國主義，也並非沒有商榷餘地。

另一方面，鑑於本書的副標題取自英國作家及國際政治學者伍爾夫（Leonard Woolf，也就是著名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夫婿）關於帝國主義究竟會以和平方式走入墳墓，還是會以流血及廢墟收場，且正文既



以此為開端，也以此為結尾，全書卻並未針對他做為核心成員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及其推動的和平運動進行討論。此外，也隻字未提伍爾夫的著作如何一方面成為國際聯盟的藍圖，另一方面卻對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奠定於此的「民族自決」理念則有所保留。這一點不是想指著作者未寫的部分當做批評，而是意在強調，若想將關於和平推動者的那半個故事說得同樣詳盡與精彩，那恐怕得有另一位奧弗里才能堪當大任。

# 戰爭與性別政治的矛盾交錯

劉文（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戰爭歷史經常充滿宏大的軍事、國族與科技競逐之陽剛敘事，而在《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這本書中，鏡頭不只聚焦於前線的戰場，更涵蓋了後勤的軍事動員。二〇二二年烏俄戰爭開打以來，轉變了人們對於當代戰爭的想像，不僅是在各式傳統與非傳統的侵略模式的混合，也包含了大量的女性軍人從軍至前線作戰。事實上，軍事與性別一直存在孿生且矛盾的交織關係，一方面，女性被視為戰時最脆弱的一群，承受性化暴力的攻擊，另一方面，女性在危機時刻又被捧作為民族與文化的英雄，承擔著國家的榮耀與文化傳承。這兩者分裂的性別與軍事敘事實則都仍含有父權主義的投射，將女性置入於戰爭中的極端角色。若是要瞭解軍事動員與性別政治的交錯發展，《二戰》提供了更全面且平衡的圖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當代無論在地緣政治、軍事科技，以及社會文化上都是無比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外地促成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這個歷史的發展與戰時的人力動員策略有相當大的關係，本書指出，二戰所動員的資源與人力的規模史無前例：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主要參戰國即投入了超過九千萬名男女士兵，若包含全世界的人數，則超過一億二千萬。龐大的前線人力需求也意味著後勤的巨量勞力空缺，從武器、能源、軍用食品與衣物，等等，工廠的龐大人力需求促使父權文化貶低女性能力的各國，開始動員這一塊長期被視為只適合做生殖與養育勞動的人口。

除了蘇聯之外，各國徵召女性入伍至前線作戰的仍屬少數。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史達林格勒會戰中，被認為是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戰事之一，德軍集結兵團攻向了蘇聯治下的史達林格勒，雙方進入激烈的巷戰，為了防鎖德軍的攻勢，蘇聯派出第一獨立婦女志願步槍旅，也運用了大量女性至反空襲的高射砲砲兵，對於主張女性只屬於家務之傳統性別觀點的納粹，蘇聯女兵的形象成為冬日艱困戰事中的另一大衝擊。不過，如本書所述，這種傳統的意識形態在戰爭中也被逐步鬆綁，在二戰的「總體戰」想定下，德國女性被認為應該與男性一樣負起延續種族的責任。德國武裝部隊徵召了大約五十萬名女性擔任國防軍婦女輔助人員，負責處理軍事上之通信、文書，與行政部門的業務。

對於同盟國的民主國家成員，在人力所需的急迫下，也不得不放寬本來前線軍力中的性別限制，她們被派入美國與英國之陸海空部門，卻又面臨各式的歧視與阻撓，比如，有人認為女兵只能被女性軍官指揮，或者女性空軍只被給予老舊或性能不佳的飛機進行目標訓練，甚至服役期間身亡時，因為空軍被視為男人的職業，而在臨終之際都無法取得軍人身份。對女性的不公平處置，並未因為戰時的動員而得到全然的翻轉，而是一種「不得已」下的處置。也因此，當二戰結束，進入漫長的冷戰，美國社會尤其回到更加保守的性別狀態，倡導「男主外，女主內」的核心家庭。而戰後的失落、焦慮，以及不平等，逼出六〇、七〇年代的「女性自覺團體」，集體地上街頭挑戰父權系統的迫害。

女性除了首次擴大規模地出現在前線，二戰的總體戰設定，也產生了當代的「民防」系統。二戰相較於一戰，出現了轟炸機的新型武器，「空襲」不僅是摧毀敵軍軍事能力的戰術，更是一種擾亂民眾心理上的策略。德國對英國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大轟炸，遍及英國的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以倫敦受創最為嚴重，估計有四萬多人民死亡，超

過十萬棟房屋遭到損毀。德軍的戰略，催生出首次由政府制定的完整民防措施，將平民納入戰爭準備的一環，賦予他們保護社區的任務，除了建立社會的韌性，更是透過大規模地動員來將戰災降到最低。英國中央政府在各地建設防空洞，並在「倫敦大轟炸」期間，製作了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繼續前進」（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海報，在當代英國的大街小巷，仍是相當流行，甚至成為一種當下焦慮時代下，象徵倫敦精神的詼諧指標。

《二戰》指出，在像是英國和美國等民主國家，民防通常為志願役，許多民防部隊由女性自願者加入消防隊、緊急救護、空襲警報員，以及防空洞管理員，等等，在各地維持民生並且穩定民心。而相對採取強制役的日本、德國與蘇聯，在二戰時則是出現最大規模的民防組織，徵召平民擔任民防職務，應對空襲、毒氣攻擊，以及轟炸後的緊急救難等等。二戰不只讓前線與後勤的界線進入灰色地帶，更是模糊了軍人與平民的分別，全球程度的人員與資源調度，也讓固有的傳統性別角色暫時鬆動。

自從二〇一四年俄軍入侵克里米亞，並且在二〇二二年全面進攻烏克蘭後，北歐與中東歐的各國也都拉起警報，二戰所帶來巨大的創傷，成為當代的借鏡。冷戰後多數人認為已經終結的戰爭歷史，正以更快速、更複雜的方式進行著。挪威、瑞典，以及丹麥三個民主國家，也在近年內更改兵役制度，增加戰備，甚至相繼將女性納入義務役制度。二戰給我們的課題，即是軍事與性別絕非毫不相干的概念，重要的問題不是該不該納入女性，而是如何給予已經在戰爭中的女性平等對待。

即使人們讚揚勇敢參戰的烏克蘭女兵，國際關係女性主義者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也分析了烏俄戰爭對性別的影響。長期下來由於性別薪資不平等所造成的問題，在戰時不僅被擴大，甚至加劇摧毀

女性與其他弱勢者的社會福利網，而俄羅斯軍隊以性侵作為國族的侵略武器，也讓烏克蘭家中的創傷壓力和家暴狀況劇增。這些長期被放在幕後的性別端倪，都藏在歷史的細節之中。《二戰》給我們的警惕是，我們不能只是歌頌前線女性軍人的勇氣，因為這樣的論述忽略戰爭中所延續的性別不平等，若要追尋真正的性別正義，更需要瞭解戰爭與性別權力運作的矛盾全貌。在面對敵軍不斷加劇的威脅之下，臺灣更是必須在平時建立完善的性別意識與制度，減低不平等所造成的風險，這些準備都將有助於臺灣整體的防禦，成為一個真正具有韌性的社會。



# 審訂者序

揭仲（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

不久前，諾曼第登陸戰八十週年的各種紀念活動，吸引了全世界軍事與歷史愛好者的目光，我也是其中之一。

拜《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與《諾曼第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等成功影視作品之賜，使這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兩棲登陸作戰，在八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家喻戶曉，甚至成為許多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火擴及歐洲、亞洲、中東與大西洋各地，上億人提起武器奔赴前線，最後劇烈改變世界面貌——最鮮明、有時甚至是唯一的印象。

事實上，這種將整場大戰聚焦於歐洲大陸、甚至是歐洲大陸幾場關鍵會戰的情形，並非只存在於影視產業，就連戰史研究與歷史研究等學術領域亦復如此；主要原因不是研究者的偏見或偷懶，而是所涉及的問題太過龐大、要閱讀與吸收的資料雖然已堆積如山、汗牛充棟，但仍舊難以涵蓋這場大戰的主要面貌。

儘管任務如此艱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的近八十年中，還是有極少數學術巨擘成功完成這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替人類留下了以整場大戰為主題的著作；其中最令國人耳熟能詳的，應該就是英國戰略和軍史大師李德哈特（B.H. Liddell Hart）所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李德哈特這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儘管在很多方面都極具價值，例如他所關切的重點不僅只有歐洲大陸與北非，也用相當篇幅來探

討太平洋與亞洲大陸的戰事發展，但對今日有興趣接觸這場大戰歷史的讀者來說，仍然有些美中不足！

首先是李德哈特這套巨著描述的時間，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以致無法對導致這次大戰爆發的前因及序幕——例如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間，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戰事——與這次大戰所造成的各種後果，提供足夠的解釋與說明；其次是受限於成書年代，許多與這次大戰相關的史料，不是仍未出土或完成整理，就是還塵封在許多共產集權國家的政府檔案館中，當然李德哈特也無法運用今日的許多技術，來快速地爬梳、整理大量的資料。

更重要的是，李德哈特在撰寫時，還是以「戰史」為主軸，也就是將焦點置於同盟國與軸心國二大陣營間的軍事衝突上，使隱藏在軍事衝突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脈絡，也就是本書作者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所強調的「推動這段歷史的力量」，就無可避免地遭到簡化、甚至省略。

因此，衛城出版社這套《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就成為國內出版界繼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後，另一部以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主題的重量級譯作。

首先，作者李察．奧弗里成功跳脫以往「同盟國為維護世界和平，挺身對抗軸心國的侵略」此一行之有年、大家也耳熟能詳的觀點，將論述的核心置於「推動這段歷史的力量」，以及這股力量如何導致戰爭爆發，又如何造成各傳統帝國的崩解與現代國家體系誕生，讓讀者能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場扭轉人類命運大戰。

其次，作者擺脫傳統的時間分野，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放在一起，視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的前後

兩階段，讓讀者能對戰爭的起源、過程與結果有更清楚的瞭解。例如作者在書中，就對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與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的戰事，就有相當的陳述，能彌補許多西方同主題著作之不足。

同時，作者強調應該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理解為一起全球性的事件，甚至強調「相較於在歐洲戰場擊敗德國，亞洲的戰事及其結果對戰後世界的影響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使得在作者筆下，歐洲大陸以外的戰場不再只是配角，讓讀者能有藉由閱讀本書，清楚認識這場大戰的全貌。

最後，作者更爬梳、整理這場大戰中，各個面向的大量史料，讓讀者除了傳統帝王將相如何鬥力鬥智的視角，也能接觸到更多、更廣泛、更深刻的角度，對這「最後一場帝國戰爭」史無前例的「總體性」，獲致更深入的瞭解。例如，作者在書中不僅描述這場「總體戰」是如何的進行，也將視角延伸到戰線後方支持總體戰的平民與社會，並探討此一過程所造成的各種影響與後果，與對經歷戰火的人們所帶來的傷害。

這些特點，使這套《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不僅能讓已經飽讀戰史的讀者，能藉由閱讀本書，對這場大戰獲致更全面、更深刻的體會；也適合亟欲理解這場改變人類命運的大戰，卻又對傳統戰史中大量軍事細節與術語感到困擾的讀者。

另外，雖然作者李察．奧弗里謙虛地表示，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衝突部分，已有許多優秀作品做出深刻的探討與詳盡的記載，所以他不做過多的陳述；但實際上，作者在書中對軍事衝突的重要過程，與影響軍事衝突走向的關鍵因素，都有精闢的分析與要言不煩的介紹，也非常適合對戰史有興趣的入門者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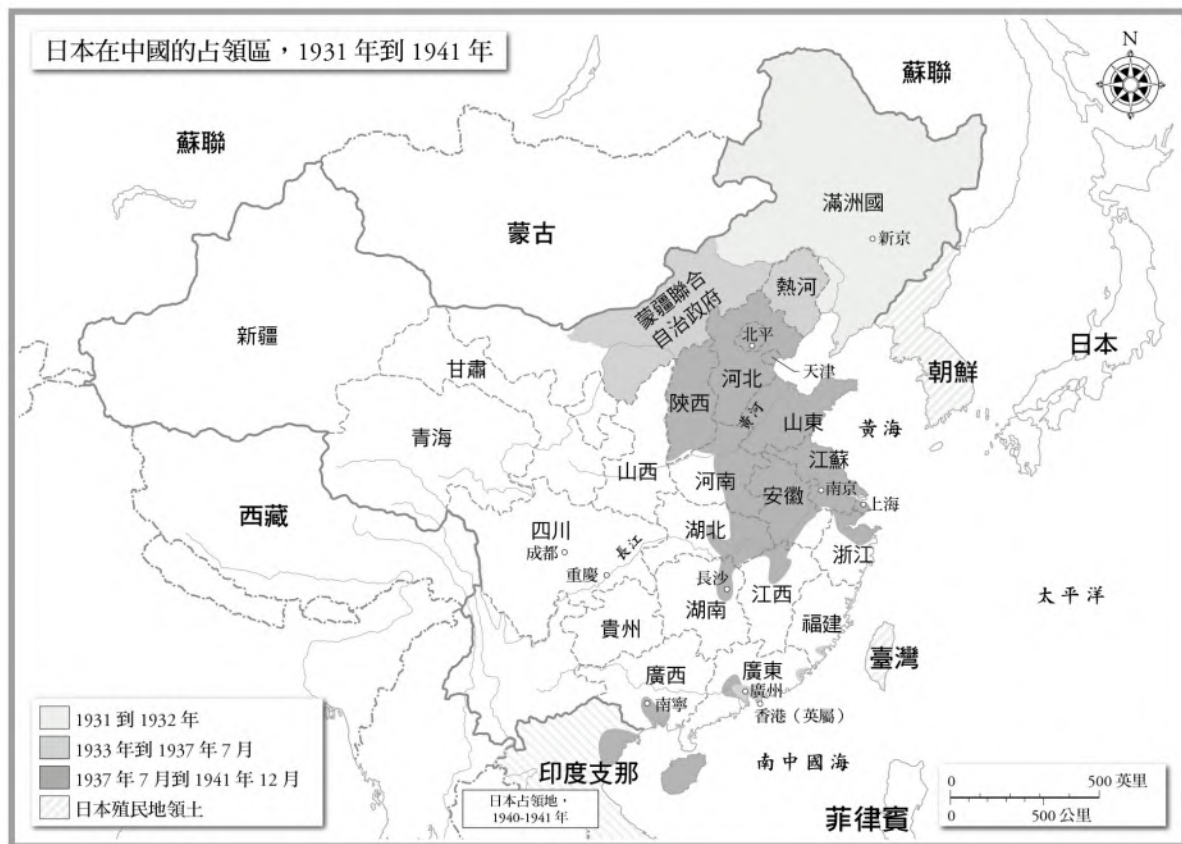
誠如作者李察．奧弗里所言，本書除了是針對二戰時期提出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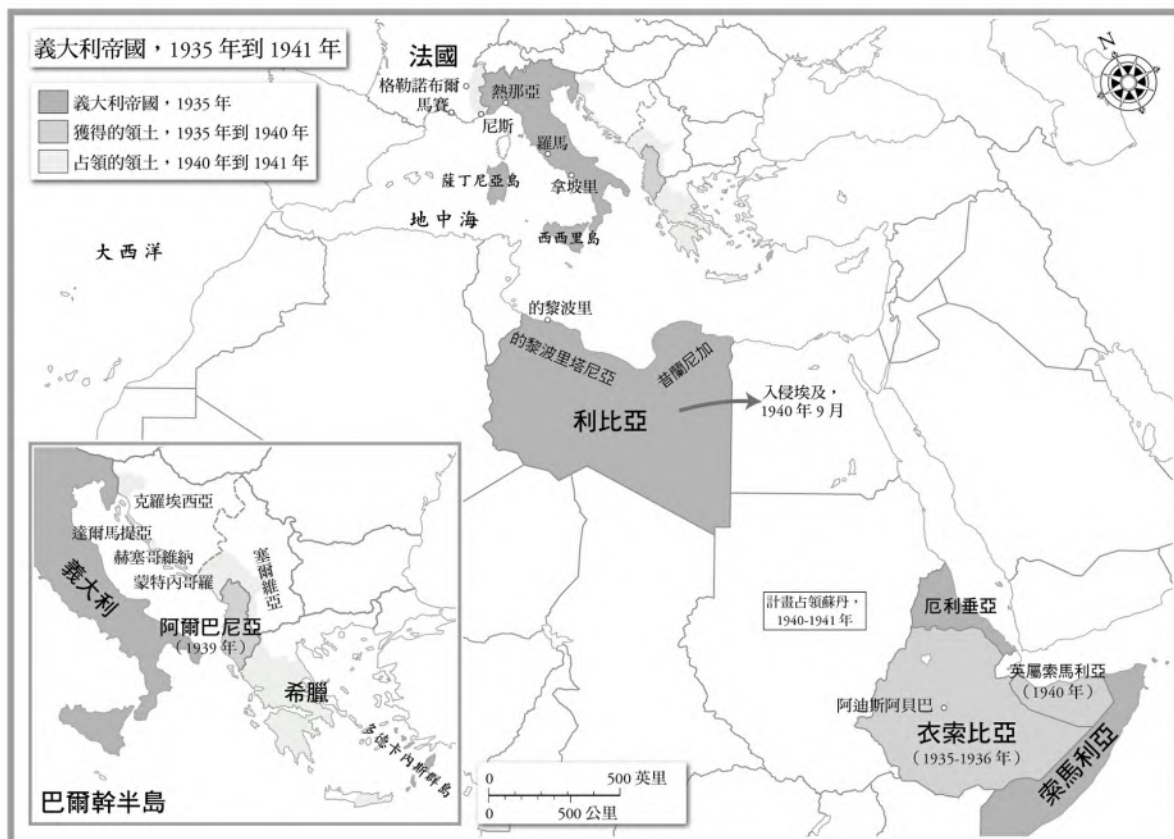
的歷史作品，也是一部關於死亡、恐怖、毀滅與貧困的歷史，所描述的是人類所經歷的「巨大苦難」！乍看之下，雖讓人感到沉重，但瞭解這些苦難的目的，是要從歷史中獲得教訓，讓人類在當前世局看似無窮盡的黑暗隧道中，仍能保持冷靜並獲得勇氣；因為誠如李德哈特所言，歷史顯示「最長的隧道也還是有其終點」，所以只要人類能記取教訓、保持冷靜，然後鼓起勇氣繼續前行，則人類文明的列車一定能從黑暗的隧道中衝出、迎來光明。我相信這套《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也能和許多經典著作一樣，提供人類必要的教訓與指引。

只希望人類在衝出隧道後，仍能繼續記取歷史的教訓，才能實現已故國內戰略研究宗師鈕先鍾教授，在替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的中文版撰寫譯者前言時，於結尾所許下的心願：「但願後冷戰世界所看見的是真正的陽光而不再是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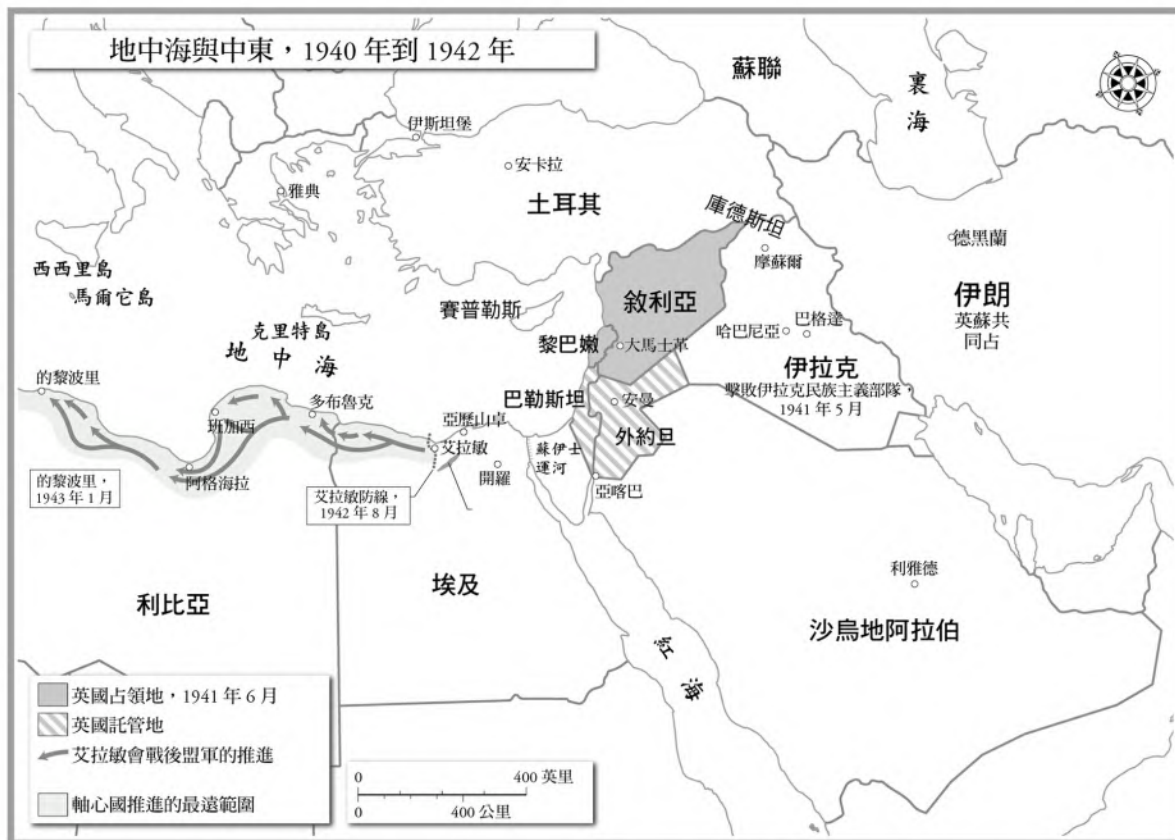
## 地圖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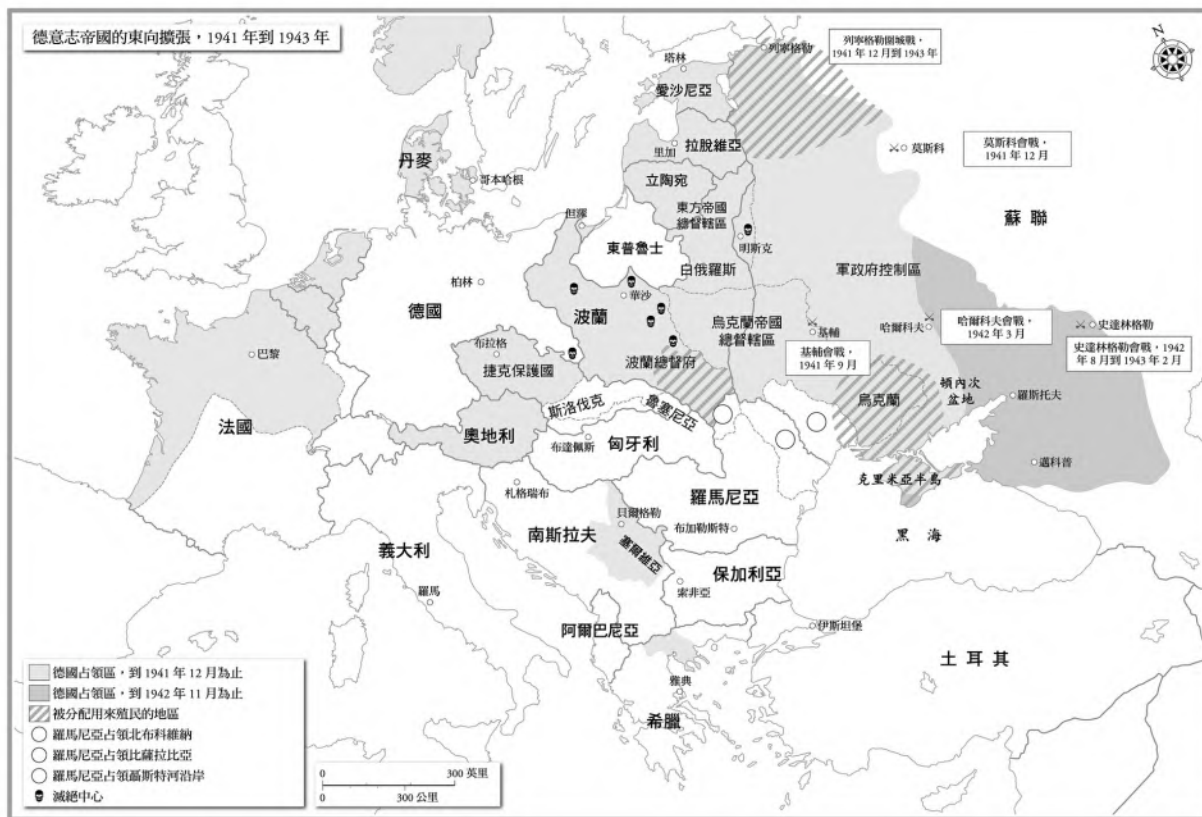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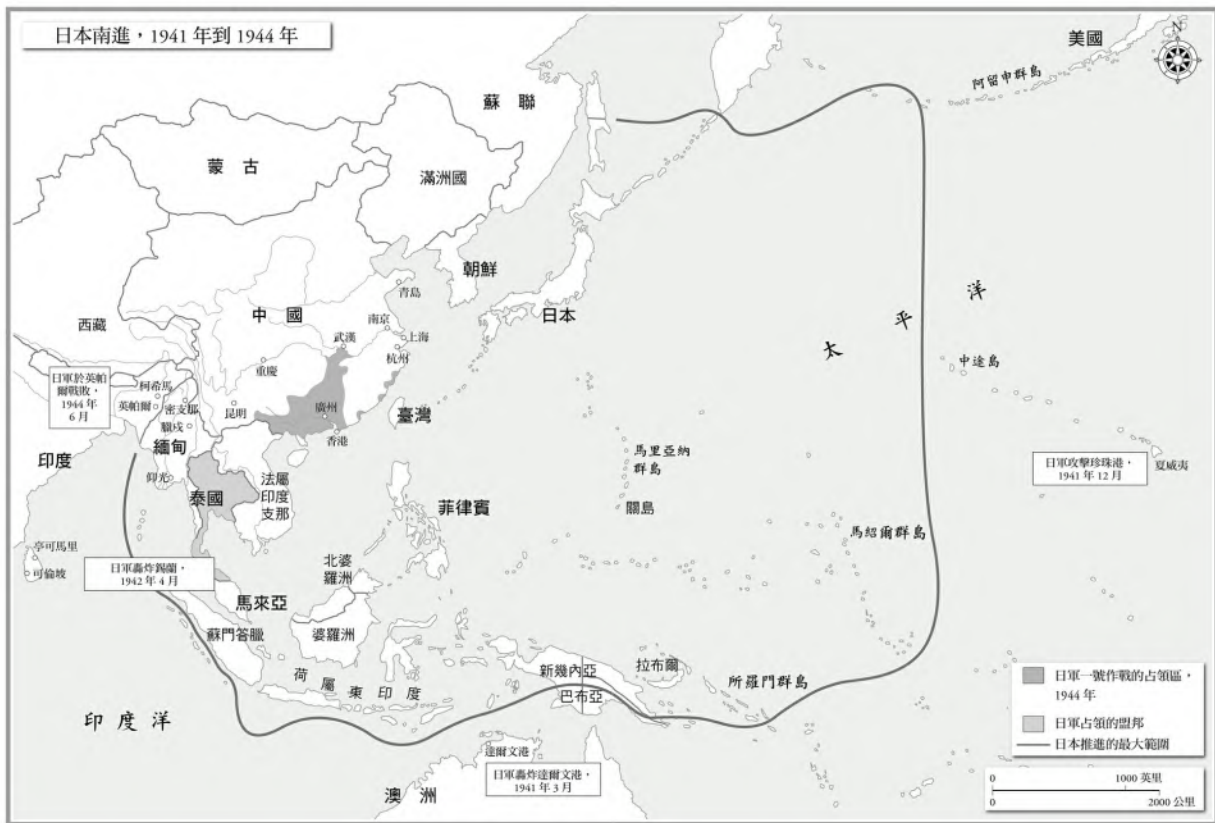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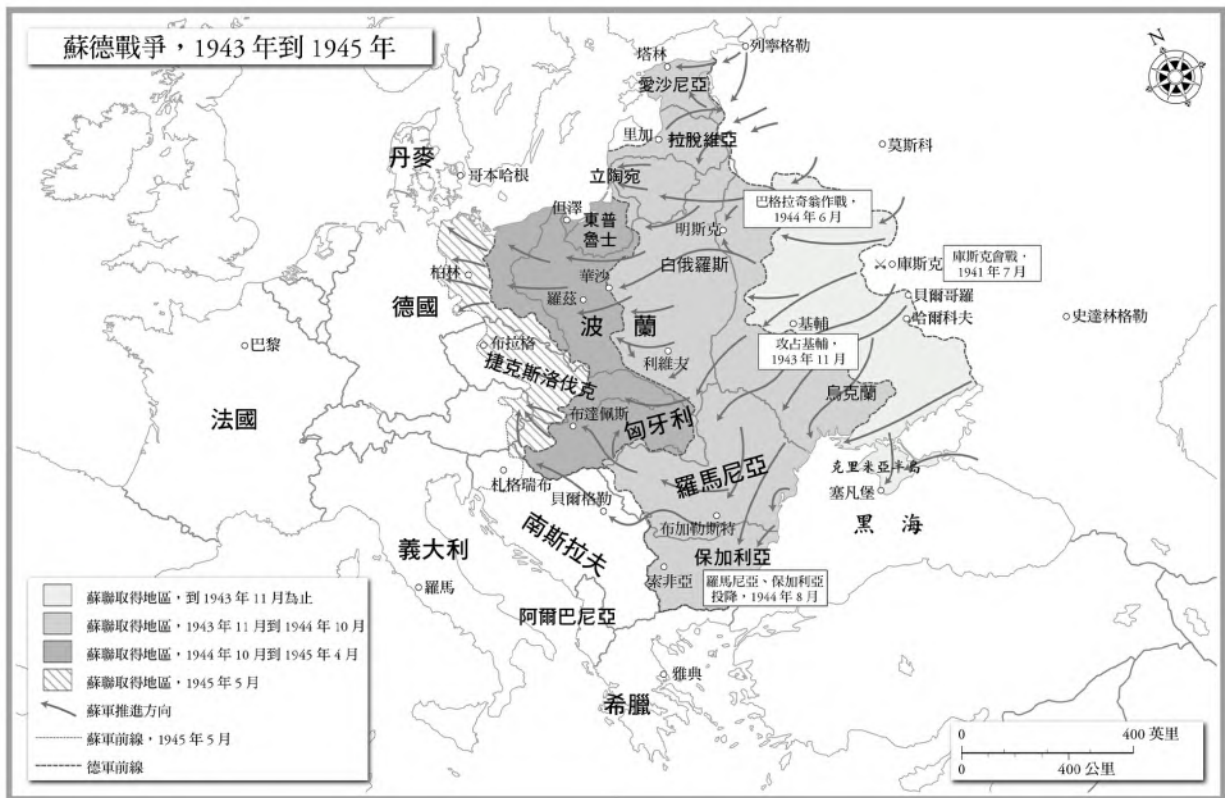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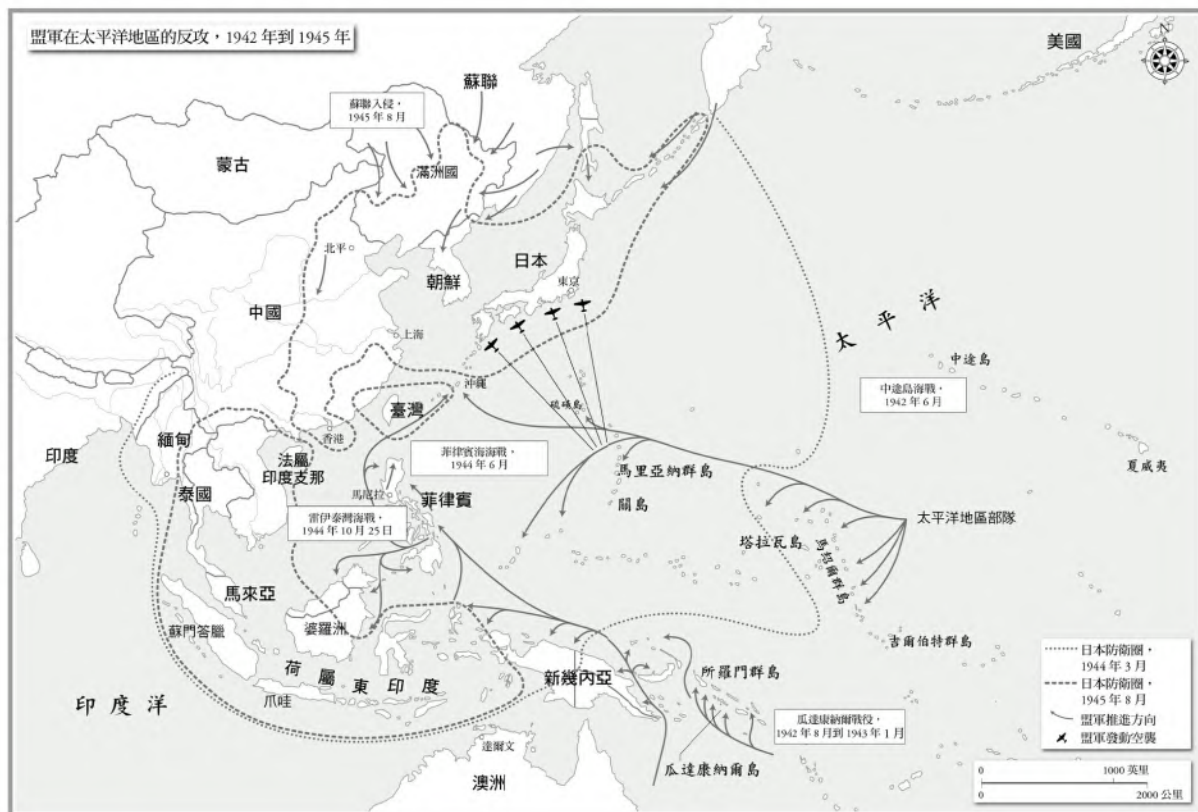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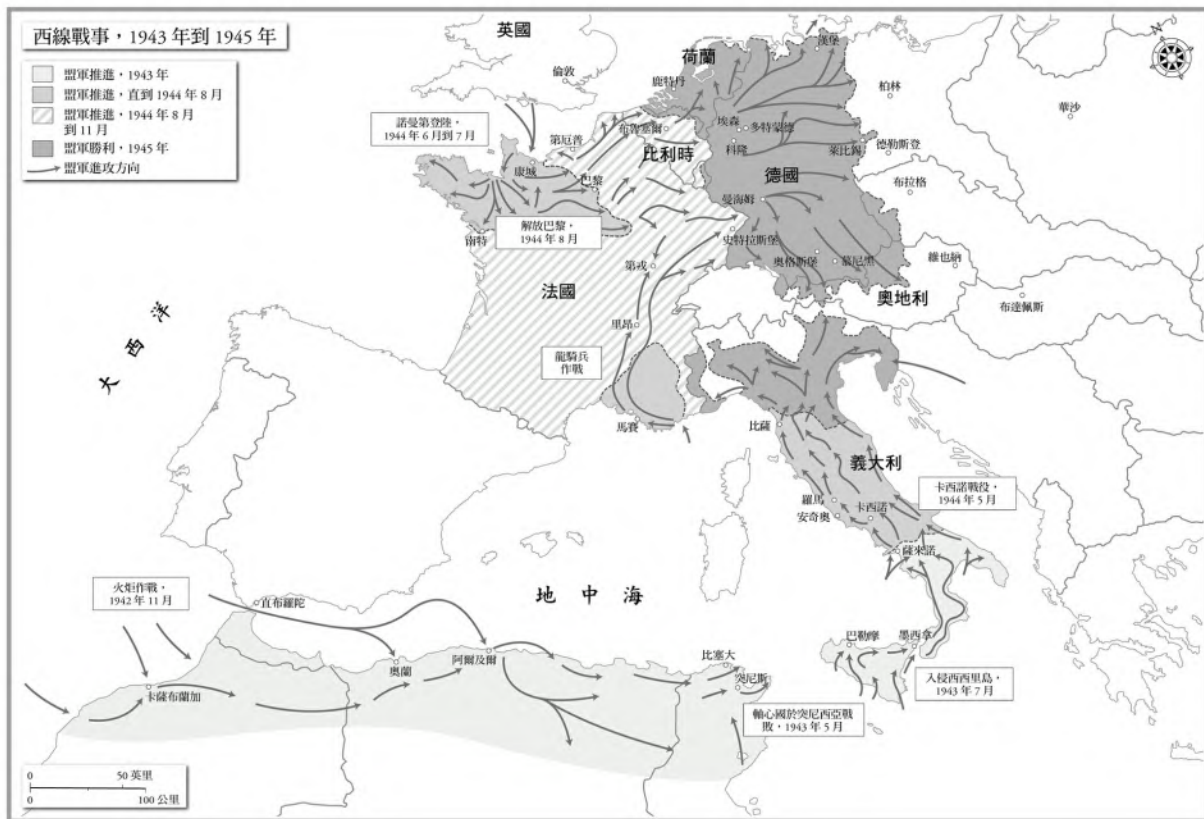












# 中英譯名對照表<sup>[1]</sup>

中文	英文
地名	
巴貝多	Barbados
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巴達維亞	Batavia
巴丹半島	Bataan peninsula
巴統	Batum
巴拉頓湖	Lake Balaton
巴勒摩	Palermo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庫	Baku
巴西亞	Basia Cukier
巴斯通	Bastogne
巴斯拉	Basra
巴爾的摩	Baltimore
巴爾迪亞	Bardia
巴約	Bayeux



伯明罕	Birmingham
伯恩	Bern
伯爾查諾	Bolzano
波布魯斯克	Bobruisk
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波德	Boulder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波塔瓦	Poltava
波里尼	Ponyri
波羅的海	Baltic
波隆那	Bologna
波卡基村	Villers-Bocage
波河流域	Po Valley
波琴	Bochum
波希米亞	Bohemia
波茨坦	Potsdam
波斯	Persia
波耳	Boer
波爾多	Bordeaux

白俄羅斯	Belorussia
帛琉	Palau
博托沙尼	Botoşani
北布科維納	Northern Bukovina
北羅德西亞	Northern Rhodesia
貝達佛姆	Beda Fomm
貝蒂奧島	Betio Island
貝里琉島	Peleliu
貝加莫	Bergamo
貝斯納爾格林	Bethnal Green
貝爾法斯特	Belfast
貝爾哥羅	Belgorod
貝爾格勒	Belgrade
貝爾卡	Berka
貝烏熱茨	Belzec
寶劍	Sword
豹防線	Panther Line
鮑里索夫	Borisov
班加西	Benghazi
旁遮普邦	Punjab

比克島	Biak
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比薩	Pisa
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比塞大	Bizerte
比爾哈凱姆要塞	Bir Hacheim
比亞維斯托克	Bialystok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	Petropavlosk
佛日山脈	Vosges mountains
佛索里	Fossoli
不來梅	Bremen
布亨瓦德	Buchenwald
布達佩斯	Budapest
布拉達	Breda
布拉格堡	Fort Bragg
布拉肯	Brendan Bracken
布勒斯特（法國）	Brest, France
布勒斯勞	Breslau
布萊切利園	Bletchley Park

布雷西亞	Brescia
布里夫	Brive
布里斯班	Brisbane
布里斯托	Bristol
布里安斯克	Briansk
布列塔尼	Brittany
布列斯特（白俄羅斯）	Brest, Belarus
布魯塞爾	Brussels
布洛帝	Brody
布洛涅	Boulogne
布洛涅森林	Bois de Boulogne
布洛克維茨	Brockwitz
布倫納隘口	Brenner Pass
布呂克斯	Brüx
布干維爾島	Bougainville
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布楚拉河	Bzura River
布爾蓋比山脊	Bourguébus Ridge
帕基諾	Pachino
佩列格魯茲內	Peregruznoe

潘特雷里亞島	Pantelleria
蒲隆地	Burundi
樸茨茅斯	Portsmouth
普勒森夏灣	Placentia Bay
普里皮特沼澤	Pripet Marshes
普利茅斯	Plymouth
普羅科羅夫卡	Prokhorovka
普羅旺斯	Provence
普洛什蒂特	Ploesti
普賽爾河	Psel River
摩拉維亞	Moravia
摩鹿加群島	Moluccas islands
摩洛哥	Morocco
摩斯比港	Port Moresby
摩塞爾河	Moselle River
摩蘇爾	Mosul
摩爾多瓦	Moldova
馬堡	Marburg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馬塔潘角	Cape Matapan
馬特魯港	Mersa Matruh
馬內斯防線	Mareth Line
馬里梅	Maleme
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lands
馬洛埃拉普島	Maloelap
馬其頓	Macedonia
馬奇諾防線	Maginot Line
馬加丹	Magadan
馬金島	Makin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馬賽	Marseilles
馬耳美地	Malmédy
馬爾它	Malta
馬伊達內克	Majdanek
模里西斯	Mauritius
莫曼斯克	Murmansk
莫德林要塞	Modlin
莫洛托夫防線	Molotov Line
莫吉廖夫	Mogilev

莫扎伊斯克防線	Mozhaisk Line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莫爾坦	Mortain
墨西拿	Messina
邁科普	Maikop
梅梅爾	Memel
梅德梅納姆	Medmenham
梅拉諾	Merano
梅利托普	Melitopol
繆斯河	Meuse River
曼德勒	Mandalay
曼海姆	Mannheim
芒特一加西庫爾	Mantes-Gassicourt
芒通	Menton
蒙達島	Munda
蒙提梅	Monthermé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蒙圖瓦爾	Montoire
蒙科爾內	Montcornet

孟買	Bombay
米蘭	Milan
米烏斯河	Mius
日托米爾	Zhytomyr
密德蘭	Midlands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密西根州	Michigan
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
密支那	Myitkyina
民答那峨島	Mindanao
民丹島	Bintan
明斯特艾費爾	Münstereifel
穆爾貝爾格	Mühlberg
法比烏斯	Fabius
法萊斯	Falaise
法蘭德斯	Flanders
法蘭克尼亞	Franconia
法魯加	Fallujah
斐濟	Fiji

梵蒂岡	Vatican
芬什港	Finschhafen
弗拉格斯塔夫	Flagstaff
弗里曼圖	Freemantle
弗利	Forlì
弗留利	Friuli
弗倫斯堡	Flensburg
符茲堡	Würzburg
福賈	Foggia
富納富提島	Funafuti
達蘭多	Taranto
達卡	Dakar
達豪	Dachau
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達文特里	Daventry
大溪地	Tahiti
大薩索山	Gran Massif
德勒斯登	Dresden
德朗西	Drancy
德里	Delhi

德維納河	Dvina
德文郡	Devon
地拉那	Tirana
底特律	Detroit
的黎波里	Tripoli
的黎波里塔尼亞	Tripolitania
的里雅斯特	Trieste
戴爾河	Dyle
但澤	Danzig
第南特	Dinant
第戎	Dijon
第厄普	Dieppe
蒂羅爾－福拉爾貝格	Tirol-Vorarlberg
蒂耶爾	Thiers
丁加奴	Trengannu
頓巴斯	Donbas
頓內次克	Donetsk
頓河	Don
杜布諾	Dubno



杜林	Turin
杜塞道夫	Düsseldorf
杜伊斯堡	Duisburg
多佛海峽	Strait of Dover
多布魯克	Tobruk
多姆尼斯塔	Domnista
多德卡內斯群島	Dodecanese islands
多特蒙德	Dortmund
多羅米提山	Dolomite Mountains
多洛	Dolo
多哥	Togo
敦克爾克	Dunkirk
東京	Tonkin
塔拉瓦島	Tarawa
塔林	Tallin
塔干洛格	Taganrog
塔斯基吉	Tuskegee
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特雷熱里群島	Treasury Islands

特魯克環礁	Truk
特隆赫姆	Trondheim
台伯河	Tiber
太陽山	Monte Sole
陶伯河	Tauber River
坦加尼喀	Tanganyika
騰比恩	Tembien
天寧島	Tinian
亭可馬里	Trincomalee
突尼西亞	Tunisia
圖拉吉	Tulagi
圖林根	Thuringia
土拉	Tula
土魯斯	Toulouse
土倫	Toulon
吐瓦魯	Tuvalu
托羅基納角	Cape Torokina
托洛斯基派	Trotskyist
托斯卡尼	Tuscany
托爾高	Torgau

那維克	Narvik
南特	Nantes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拿坡里	Naples
納努梅阿島	Nanumea
納雷夫河	Narew
納爾瓦	Narva
奈美根	Nijmegen
奈塞河	Neisse
尼科普	Nikopol
尼科夏	Nicosia
尼斯	Nice
尼爾施泰因	Nierstein
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Dnepropetrovsk
聶伯河	Dnieper
聶斯特河	Dniester River
聶斯特河沿岸	Transnistria
紐芬蘭	Newfoundland

紐倫堡	Nuremberg
紐華克	Newark
娘子谷	Babi Yar
諾曼第	Normandy
諾門罕	Nomonhan
拉布爾	Rabaul
拉普蘭	Lapland
拉當	Radom
拉多加湖	Lake Ladoga
拉脫維亞	Latvia
拉瓜地亞	La Guardia
拉吉歐	Lazio
拉齊洛夫	Radziłów
拉斯佩齊亞	La Spezia
拉斯敦堡	Rastenburg
拉溫納	Ravenna
臘戍	Lashio
勒熱夫	Rzhev
萊城	Lae
萊茵蘭	Rheinland

雷馬根	Remagen
雷伊泰島	Leyte
蘭佩杜薩島	Lampedusa
蘭茲堡	Landsberg
蘭斯	Reims
黎巴嫩	Lebanon
黎凡特	Levant
里米尼	Rimini
里里河谷	Liri Valley
里奇蒙	Richmond
里加	Riga
里昂	Lyon
里耳	Lille
里亞霍維奇	Liakhovychi
裏海	Caspian Sea
利比亞	Libya
利摩日	Limoges
利迪策	Lidice
利古里亞	Liguria



利哈佛	Le Havre
利雅德	Riyadh
利沃夫	Lvov
利物浦	Liverpool
利維夫	Lviv
列寧格勒	Leningrad
列支敦斯登	Lichtenstein
硫磺島	Iwo Jima
柳季日	Liutezh
盧布林	Lublin
盧布爾雅那	Ljubljana
盧次克	Lutsk
盧安達	Rwanda
盧昂	Rouen
魯塞尼亞	Ruthenia
魯爾	Ruhr
魯爾河	Roer
鹿特丹	Rotterdam
羅夫諾	Rovno

羅得島	Rhodes
羅德西亞	Rhodesias
羅茲	Łódź
羅斯托夫	Rostov
羅亞爾河	Loire
洛里昂	Lorient
洛倫茨	Lorenz
洛錫安	Lothian
倫布拉	Rumbula
倫茨堡	Rendsburg
隆河流域	Rhône Valley
呂北克	Lübeck
戈騰高	Gottengau
哥打巴魯	Kota Bahru
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格拉訥河畔奧拉杜爾	Oradour-sur-Glane
格拉耶沃	Grajewo
格勒諾布爾	Grenoble
格萊維茨	Gleiwitz
格盧博科耶	Glubokoye

格羅茲尼	Grozny
格洛斯特角	Cape Gloucester
蓋塔拉窪地	Qatarra Depression
蓋亞那	Guiana
高加索	Caucasus
岡城	Caen
古比雪夫	Kuibyshev
古拉索	Curaçao
瓜達康納爾島	Guadalcanal
瓜加林島	Kwajalein
弓賓倫	Gumbinnen
貢比涅	Compiègne
哈拉爾省	Harrar
哈爾科夫	Kharkov
喀麥隆	Cameroon
喀拉蚩	Karachi
喀爾巴阡山脈	Carpathian Mountains
卡布里島	Capri
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	Kamianets-Podilsky

卡穆克	Kalmyk
卡地夫	Cardiff
卡塔尼亞	Catania
卡廷	Katyn
卡內里亞地峽	Karelian Isthmus
卡拉布里亞	Calabria
卡拉赤	Kalach
卡利什	Kalisch
卡盧加	Kaluga
卡西比雷	Cassibile
卡西諾山	Cassino massif
卡茲克	Kazik
卡斯特爾	Castres
卡薩	Kassa
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
卡塞塔	Caserta
卡塞爾	Kassel
卡爾斯霍斯特	Karlshorst
柯騰丁半島	Cotentin Peninsula

柯希馬	Kohima
科布林茲	Koblenz
科雷機多島	Corregidor
科羅島	Koro Island
科隆	Cologne
科隆班加拉島	Kolombangara
科西嘉島	Corsica
科索沃	Kosovo
科爾諾	Kolno
科爾察	Koritsa
可倫坡	Colombo
克拉科夫	Cracow
克萊德班克	Clydebank
克萊德河	Clyde
克萊斯托斯	Kleistos
克里特島	Crete
克里維里赫	Krivoi Rog
克林	Klin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克羅伊登	Croydon



開普敦	Cape Town
凱比爾港	Mers el-Kébir
凱法羅尼亞島	Kefalonia
凱撒林隘口	Kasserine Pass
考納斯	Kaunas
考文垂	Coventry
坎城	Cannes
肯特郡	Kent
康斯坦茨湖	Lake Constance
康瓦爾	Cornwall
庫班	Kuban
庫德斯坦	Kurdistan
庫唐斯	Coutances
庫頁島	Sakhalin
庫斯特寧	Küstrin
庫斯克	Kursk
庫爾蘭半島	Courland Peninsual
魁北克	Quebec
孔坡	Cawnpore

荷蘭第亞	Hollandia
黑風洞	Batu Caves
黑海	Black Sea
赫塞哥維納	Herzegovina
赫爾	Hull
赫爾辛基	Helsinki
赫爾松	Kherson
海法	Haifa
海牙	Hague
海烏姆諾	Chelmno
漢堡	Hamburg
漢諾威	Hannover
胡特根森林	Hürtgen Forest
華克德島	Wakde Island
華沙	Warsaw
霍赫林登	Hochlinden
懷茲馬	Vyazma
黃金海岸	Gold Coast
奇德爾	Cheadle

奇切斯特	Chichester
居爾斯	Gurs
基斯卡島	Kiska
幾內亞灣	Gulf of Guinea
吉打	Kedah
吉拉	Gela
吉蘭丹	Kelantan
吉里巴斯	Kiribati
吉爾伯特與埃利斯群島	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
季赫溫	Tikhvin
季亞基夫卡	Diakivka
齊爾河	Chir River
加彭	Gabon
加勒比	Caribbean
加萊	Calais
加朗島	Galang Island
加里波里	Gallipoli
加利西亞	Galicia
加羅林群島	Caroline Islands
加查拉防線	Ain el Gazala

加爾達湖	Lake Garda
加爾各答	Calcutta
加爾格日代	Gargždai
迦納	Ghana
傑德堡	Jedburgh
傑斯納河	Desna
金蘭灣	Cam Ranh Bay
車里雅賓斯克	Cheliabinsk
巨港	Palembang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乞沙比克灣	Chesapeake Bay
切特尼克	Chetnik
切雷諾沃	Chrenovoe
切斯特港	Port Chester
切爾姆斯福德	Chelmsford
千島群島	Kurile islands
千里達	Trinidad
西里伯斯	Celebes
西利西亞	Silesia

西洛高地	Seelow Heights
西格馬林根	Sigmaringen
西西里島	Sicily
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
昔蘭尼加	Cyrenaica
席亞德勒灣	Seeadler Harbour
錫蘭	Ceylon
細第巴拉尼	Sidi Barrani
新不列顛島	New Britain
新赫布里底群島	New Hebrides
新幾內亞	New Guinea
新喬治亞島	New Georgia
新村	New Villages
新斯科細亞省	Nova Scotia
新愛爾蘭島	New Ireland
須耳德河	Scheldt
敘利亞	Syria
雪蘭莪	Selangor
直布羅陀	Gibraltar
查德	Chad



札波羅熱	Zaporizhzhia
札莫希奇	Zamość
札格瑞布	Zagreb
朱諾	Juno
中德運河	Mittelland Canal
中途島	Midway Island
川斯瓦	Transvaal
施戴格森林	Steigerwald
獅子山	Sierra Leone
什利謝利堡	Shlisselburg
什列斯威	Schleswig
史達林諾	Stalino
史達林格勒	Stalingrad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士文福	Schweinfurt
色當	Sedan
色雷斯	Thrace
葉門	Yemen
珊瑚海	Coral Sea

上莫斯泰尼采	Horní Moštěnice
上薩爾斯堡	Obersalzberg
聖貝爾納地諾海峽	San Bernardino Strait
聖納澤爾	St Nazaire
聖路易斯	St Louis
聖羅倫斯灣	Gulf of St Lawrence
聖維特	St Vith
熱那亞	Genoa
熱戈塔	Žegota
柔佛	Johore
讓布魯	Gembloux
左森	Zossen
策森	Zeesen
斯摩稜斯克	Smolensk
斯蒂洛角	Punta Stilo
斯特拉特福	Stratford
斯托羅日內茨	Storojinet
斯萊普頓灘頭	Slapton Sands
斯里蘭卡	Sri Lanka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斯卡帕灣	Scapa Flow
斯堪地那維亞	Scandinavia
斯旺西	Swansea
薩福克	Suffolk
薩丁尼亞島	Sardinia
薩來諾灣	Bay of Salerno
薩洛尼卡	Salonika
薩克森豪森	Sachsenhausen
薩爾區	Saarland
薩沃島	Savo Island
薩瓦河	Sava
塞班島	Saipan
塞凡堡	Sevastopol
塞內加爾	Senegal
塞納河	Seine River
塞爾維亞	Serbia
瑟堡	Cherbourg
賽普勒斯	Cyprus
賽克斯頓	Sikeston

森特維爾	Centerville
桑德蘭	Sunderland
桑多梅日	Sandomierz
桑特諾河	Santerno River
蘇門答臘	Sumatra
蘇台德區	Sudeten
蘇拉威西	Sulawesi
蘇黎世	Zurich
蘇利南	Surinam
蘇利加海峽	Surigao Strait
索比堡	Sobibór
索馬利蘭	Somaliland
索馬利亞	Somalia
索穆河	Somme
索菲亞	Sofia
索維茨基	Sovetsky
所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阿巴丹油田	Abadan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阿曼	Oman
阿姆利則	Amritsar
阿凡齊斯	Avanzis
阿夫蘭士	Avranches
阿得米拉提群島	Admiralty Islands
阿登	Ardennes
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阿圖島	Attu
阿拉莫戈多	Alamogordo
阿拉達姆山	Amba Aradam
阿拉干	Arakan
阿拉斯	Arras
阿勒坡	Aleppo
阿蘭哈法	Alam el Halfa
阿利坎特	Alicante
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lands
阿格里真托	Agrigento
阿格海拉	El Agheila
阿卡迪亞	Arcadia



阿戎頓	Argentan
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阿爾卑斯要塞	Alpenfestung
阿爾班山	Alban Hills
阿爾漢格爾斯克	Archangel
阿爾及爾	Algiers
阿沃拉	Avola
俄亥俄河	Ohio River
厄利垂亞	Eritrea
厄爾布魯士山	Mount Elbrus
埃特納山	Mount Etna
埃納河	Aisne
埃斯科河	Escaut River
埃森	Essen
艾本艾美爾要塞	Fort of Eben-Emael
艾拉敏	El Alamein
艾森波恩山脊	Elsenborn Ridge
愛琴海	Aegean
愛沙尼亞	Estonia

愛奧尼亞群島	Ionian islands
敖得薩	Odessa
奧波揚	Oboyan
奧珀恩	Oppeln
奧馬哈	Omaha
奧得河	Oder River
奧勒爾	Orel
奧蘭	Oran
奧格斯堡	Augsburg
奧可伐特卡	Olkhovatka
奧許維茲－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
奧斯特洛赫	Ostrog
奧斯陸	Oslo
奧爾沙	Orsha
奧瓦羅	Ovaro
歐本漢	Oppenheim
歐帕納山脊	Opana Ridge
歐胡島	Oahu
安曼	Amman

安大略堡	Fort Ontario
安特衛普	Antwerp
安南	Annam
安納托利亞	Anatolia
安哥拉	Angola
安卡拉	Ankara
安恆	Arnhem
安奇奧	Anzio
安汶島	Amboina Island
恩菲特	Enfield
恩尼維托克島	Eniwetok
昂代伊	Hendaye
伊庇魯斯	Epirus
伊洛瓦底江平原	Irrawaddy plain
伊斯特里亞	Istria
伊斯基亞島	Ischia
衣索比亞	Ethiopia
易北河	Elbe River
雅加達	Jakarta

雅爾達	Yalta
亞伯丁試驗場	Aberdeen Proving Ground
亞伯特運河	Albert Canal
亞布盧尼齊亞隘口	Jablonica Pass
亞平寧山脈	Apennines
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亞丁	Aden
亞歷山卓	Alexandria
亞喀巴	Aqaba
亞齊	Aceh
亞速海	Sea of Azov
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尤赫諾夫	Yukhnov
猶他	Utah
巖島工廠	Rock Island Arsenal
因格曼蘭	Ingermanland
印度支那	Indochina
仰光	Rangoon
英帕爾	Imphal
英屬印度	Raj

烏拉山脈	Urals
烏鎮	Houx
沃特傑島	Wotje
沃坦	Wotan
沃羅涅日	Voronezh
瓦萊達奧斯塔	Val d'Aosta
瓦刻藍島	Walcheren
瓦茲河	Oise
瓦爾特蘭	Wartheland
窩瓦河	Volga
渥太華	Ottawa
外喀爾巴阡地區	Transcarpathian
外西凡尼亞	Transylvania
外約旦	Transjordan
威洛蘭恩	Willow Run
威克島	Wake
威塞耳	Wesel
維特斯克	Vitebsk
維拉拉維拉島	Vella Lavella



維隆	Wieluń
維琪	Vichy
維斯杜拉河	Vistula
維爾紐斯	Vilnius
維伊列卡	Vileyka
萬湖	Wannsee
萬塞訥	Vincennes
溫布利	Wembley
溫尼巴	Winneba
人名	
巴貝	Daniel Barbey
巴莫	Ba Maw
巴頓	George Patton
巴多格里奧	Pietro Badoglio
巴特	David BensusanButt
巴奈斯	Gladeon Barnes
巴里	Richard Barry
巴區	Alexander Patch
巴卡尼切夫	Anatoli Bakanichev
巴卡斯	Geoffrey de Barkas

巴克	Herbert Backe
巴克勒	Simon Bolivar Buckner
巴斯蒂安	Max Bastian
巴薩洛繆	William Bartholomew
巴恩斯	Ernest Barnes
伯德爾	David Boder
伯頓	Virgil Bottom
伯恩	Moritz Julius Bonn
伯恩哈迪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伯恩斯	James Byrnes
波普	Arthur Pope
波特爾	Charles Portal
波諾馬連科	Panteleimon Ponomarenko
波克	Fedor von Bock
波文	Edward Bowen
白德甫	Omer Bartov
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白思華	Arthur Percival
博塔伊	Giuseppe Bottai

博諾	Emilio De Bono
博斯達曼	Ahmad Boestamam
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貝佛里奇	William Beveridge
貝當	Philippe Pétain
貝托洛蒂	Odilla Bertolotti
貝奈斯總統	President Beneš
貝拉	Ahmed Ben Bella
貝里夏	Leslie Hore-Belisha
貝林斯基	Hirsch Belinski
貝克	Ludwig Beck
貝斯特	Werner Best
貝爾	Joseph Bell
貝文	Ernest Bevin
包曼	Isaiah Bowman
保盧斯	Friedrich Paulus
鮑曼	Martin Bormann
鮑里斯沙皇	Boris
鮑爾	Hans Bauer

班德拉	Stepan Bandera
班廷克	Victor Cavendish Bentinck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邦托莫	Bung Tomo
邦內	Georges Bonnet
比弗布魯克	Beaverbrook
比雷埃夫斯	Piraeus
比羅	Nicolaus von Below
比哈里．伯斯	Rash Behari Bose
比金	Menachem Begin
比約克倫德	Johannes Björklund
佛萊契	Frank Fletcher
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佛爾斯	Cyril Falls
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畢文	John Bevan
費多羅夫	Oleksii Fedorov
費倫茨	Ferenc Szálasi
費歇爾	Louis Fischer
費雪	Fritz Fischer

費森麥耶	Edmund Veesenmeyer
別爾斯基	Tuvia Bielski
布特	Henry Boot
布特曼	William Butement
布拉斯可維茲	Johannes Blaskowitz
布萊米	Thomas Blamey
布萊德雷	Omar Bradley
布雷里耶	Jules Brérié
布勞齊區	Walther von Brauchitsch
布蘭登貝格	Erich Brandenberger
布朗	H. Runham Brown
布朗寧	Christopher Browning
布魯門提特	Günther Blumentritt
布魯姆	Léon Blum
布魯特	Michel Brut
布羅克	Alan Brooke
布羅克韋	Fenner Brockway
布西	Ernst Busch
布希	Vannevar Bush



帕帕哥斯	Alexandros Papagos
帕彭	Maurice Papon
帕德莫爾	George Padmore
帕爾	Pál Teleki
帕維里奇	Ante Pavelić
派特森	William Patterson
佩勒姆	Margery Perham
佩利	William Pelley
佩克	Richard Peck
佩西	Giovanni Pesce
潘札	Muhamed Pandžić
亨利．梅特蘭．威爾遜	Henry Maitland Wilson
亨利．威爾遜	Henry Wilson
彭克	Albrecht Penck
皮爾森	Karl Pearson
馮克	Walter Funk
普拉斯卡	Sebastiano Visconti Prasca
普萊格	Paul Pleiger
普雷齊奧西	Giovanni Preziosi

普倫德爾	Hans Plendl
普薩羅斯	Demetrios Psarros
摩根	Frederick Morgan
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摩薩台	Mohammad Mosaddeq
馬提尼	Wolfgang Martini
馬里丹	Jacques Maritain
馬利諾夫斯基	Rodion Malinovskii
馬克斯	Erich Marcks
馬肯森	Georg Mackensen
馬切克	Vladko Maček
馬丘克	Stepan Marchyk
馬希爾	Ali Maher
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瑪蒂爾德	Mathilde Dardant
瑪麗	Mary Adams
瑪格麗特	Marguerite Gonnet
瑪莎	Martha Gellhorn
莫德爾	Walter Model
莫里斯	Stuart Morris

莫里森	Herbert Morrison
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
莫洛亞	André Maurois
莫古諾夫	Rodion Morgunov
莫因	Moyne
麥戈文	John McGovern
麥克唐納	Dwight Macdonald
麥克奈爾	Lesley McNair
麥克里希	Archibald MacLeish
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麥肯齊．金	Mackenzie King
麥肯森	Eberhard von Mackensen
麥吉	Charles Madge
麥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麥斯基	Ivan Maisky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邁亞	Hans Mayer
梅塔克薩斯	Ioannis Metaxas
梅里克	Victor Méric

梅希	Giovanni Messe
梅爾克	Otto Merker
毛亨海姆	Gustav von Mauchenheim
繆塞特	Anton Mussert
曼陶菲爾	Hasso von Manteuffel
曼納海姆	Carl Gustaf Mannerheim
曼利	Norman Manley
曼斯坦	Erich von Manstein
蒙巴頓	Louis Mountbatten
蒙布魯姆	Abe Mohnblum
蒙哥馬利	Bernard Montgomery
孟席斯	Robert Menzies
米勒	Eugen Müller
米哈伊	Mihai Antonescu
米哈伊洛維奇	Draža Mihailović
米哈伊國王	King Michael
米恩	A. A. Milne
米爾納	Milner
米爾希	Erhard Milch

日丹諾夫	Andrei Zhdanov
密茲契	Marc Mitscher
穆迪	Harold Moody
穆勒	Heinrich Müller
穆薩維	Ruhullah Musavi
法瑪爾	James Farmer
法魯克國王	King Farouk
法爾肯霍斯特	Nikolaus von Falkenhorst
菲菲伊	Jonathan Fifi'i
菲利普斯	William Phillips
菲舍爾	Hans Fischer
范莫克	Hubertus van Mook
范德格里夫特	Alexander Vandegrift
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
范屠亭	Nikolai Vatutin
范西塔特	Robert Vansittart
弗拉索夫	Andrei Vlasov
弗萊堡	Bernard Freyberg
弗雷奈	Henri Frenay
弗雷施豪爾	Albert De Vleeschauwer



弗雷爾	Aubert Frère
弗蘭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
弗朗克	Hans Frank
弗朗肯內格	Ferdinand von Sammern-Frankenegg
弗里德堡	HansGeorg von Friedeburg
福特	Henry Ford
富勒	J. F. C. Fuller
富赫斯	Klaus Fuchs
達拉第	Édouard Daladier
達朗	François Darlan
達呂格	Kurt Daluege
達尚禮	Georges-Thierry d'Argenlieu
達斯提耶	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
德梅	Döme Sztójny
德勒斯特朗	Charles Delestraint
德維齊	Cesare De Vecchi
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戴克斯	Vivian Dykes
戴斯	Martin Dies

戴爾夏恩	Deir el Shein
戴維斯	Norman Davis
道丁	Hugh Dowding
道爾頓	Hugh Dalton
丹內克	Theodor Dannecker
丹尼爾	Raymond Daniell
丹茲	Henri Dentz
旦札里	Dajjal
鄧普賽	Miles Dempsey
鄧尼茲	Karl Dönitz
提摩盛科	Semyon Timoshenko
狄費爾斯	Jacob Devers
狄特里希	Sepp Dietrich
狄托	Josip Broz Tito
狄更森	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迪勒萬格	Oskar Dirlewanger
迪恩	John Deane
迪爾	John Dill
蒂澤德	Henry Tizard
蒂索	Jozef Tiso

杜波伊斯	W. E. B. Du Bois
杜布里吉	Lee DuBridge
杜勒斯	Allen Dulles
杜立德	James Doolittle
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杜黑	Giulio Douhet
多拉德	John Dollard
多爾曼	Friedrich Dollmann
塔魯克	Luis Taruc
塔西尼	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
塔爾諾波爾	Tarnopol
特博文	Josef Terboven
特曼	Frederick Terman
特納	John Turner
特西耶	Jean Texcier
特斯拉	Nikola Tesla
泰德	Arthur Tedder
坦普爾	William Temple
坦吉	Henri Rol-Tanguy

湯普森	James Thompson
唐納文	William Donovan
滕恰德	Hugh Trenchard
屠納	Richmond Turner
圖哈契夫斯基	Mikhail Tukhachevsky
托馬斯	Georg Thomas
托米斯拉夫二世	Tomislav II
托德	Fritz Todt
內貝	Arthur Nebe
內迪奇	Milan Nedić
內文斯	Allan Nevins
納米爾	Lewis Namier
納瑟	Gamal Abdel Nasser
納瓦爾	Henri Navarre
奈伊	Archibald Nye
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尼米茲	Chester Nimitz
尼古拉．諾維科夫	Nikolai Novikov
尼科爾森	Harold Nicolson

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尼桑	Léon Nisand
尼爾森	Donald Nelson
尼耶雷雷	Julius Nyerere
紐賴特	Konstantin von Neurath
諾蓋	Charles Noguès
諾克斯	Frank Knox
拉貝	Karl Raabe
拉帕德	William Rappard
拉瓜迪亞	Fiorello La Guardia
拉采爾	Friedrich Ratzel
拉恩	Rudolf Rahn
拉伊帕雷	Lala Lajpat Rai
拉瓦爾	Pierre Laval
藍道夫	Randolph
藍道爾	John Randall
藍來訥	Lionel Lamb
勒克萊爾	Philippe Leclerc
萊姆金	Rafael Lemkin
萊特	Lai Tek



萊伊	Robert Ley
賴德爾	Erich Raeder
賴赫勞	von Reichenau
雷巴爾科	Pavel Rybalko
雷姆賽	Bertram Ramsay
雷諾	Paul Reynaud
雷因哈特	Hans Reinhardt
勞雷爾	Jose P. Laurel
勞倫斯	Pethwick-Lawrence
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勞爾	Wendy Lower
蘭迪斯	James Landis
蘭金	Jeannette Rankin
麗莎	Liza Lozinskaya
李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李布	Ritter von Leeb
李馬洛	Trafford Leigh-Mallory
李梅	Curtis LeMay
李海	William Leahy

李希霍芬	von Richthofen
李斯	Oliver Leese
李斯特	Wilhelm List
李維諾夫	Maxim Litvinov
李文森	Solomon Levinson
里格納	Gerhart Riegner
里奇	Neil Ritchie
里希特	Gustav Richter
里斯	J. R. Rees
里文	Abraham Lewin
林德邁	Frederick Lindemann
林里斯戈	Linlithgow
林格布魯姆	Emanuel Ringelblum
盧卡斯	John Lucas
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魯堅科	Roman Rudenko
魯茲	Oswald Lutz
路易斯	Robert Lewis
羅伯遜	Paul Robeson

羅布林	Donald Roebling
羅登科	Igal Roodenko
羅多尼奧	Davide Rodogno
羅特米斯托夫	Pavel Rotmistrov
羅柯索夫斯基	Konstantin Rokossovskii
羅希福特	Joseph Rochefort
羅希林	Hermann Röchling
羅斯柴爾德	Louis Rothschild
羅森堡	Alfred Rosenberg
羅維茨基	Stefan Rowecki
洛帕欽	Anton Lopatin
洛克哈特	Robert Bruce Lockhart
洛克伍德	Charles Lockwood
洛克威爾	Norman Rockwell
洛赫維察	Lokhvitsa
洛澤	Hinrich Lohse
洛斯貝爾格	Bernhard von Lossberg
洛伊德	Lloyd
倫德斯特	Gerd von Rundstedt
倫道夫	A. Philip Randolph

倫格	Wilhelm Runge
隆莫爾	Arthur Longmore
隆美爾	Erwin Rommel
隆戈	Luigi Longo
隆恩	Samuel Breckinridge Long
呂蒂	Risto Ryti
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戈特	William Gott
戈林	Hermann Göring
哥姆雷	Robert Ghormley
哥特瓦爾德	Klement Gottwald
格拉齊亞尼	Rodolfo Graziani
格萊澤爾	Arthur Greiser
格雷西	Douglas Gracey
格蘭迪	Dino Grandi
格里姆	Hans Grimm
格里吉	Tadeusz Grygier
格林伯格	Zalman Grinberg
格林克	Roy Grinker

格魯	Joseph Grew
格洛博克尼克	Odilo Globocnik
格洛弗	Edward Glover
格倫	Reinhard Gehlen
葛尼	Henry Gurney
蓋弗尼茨	Gero von Gaervnitz
蓋拉尼	Rashid Ali alKailani
蓋斯勒	Hans Geisler
蓋爾	Hermann Geyer
蓋瓦姆	Ahmad Qavam
高伯瑞	J. K. Galbraith
高特	John Gort
甘末林	Maurice Gamelin
甘丁	Antonio Gandin
甘耶達	Jomo Kenyatta
根斯	Jacob Gens
古賓斯	Colin Gubbins
古德林	Heinz Guderian
古里昂	David Ben-Gurion



古佐尼	Alfredo Guzzoni
賈桂琳	Jacqueline Cochran
郭德勒	Carl Goerdeler
貴迪	Guido Guidi
哈巴尼亞	Habbaniya
哈達	Muhammad Hatta
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
哈里遜	Tom Harrisson
哈里斯	Arthur Harris
哈里森	Earl Harrison
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哈洛倫	Roy Halloran
哈卡	Emil Hácha
哈爾德	Franz Halder
卡普拉	Frank Capra
卡明斯基	Bronislav Kaminsky
卡姆勒	Hans Kammler
卡姆胡伯	Josef Kammhuber
卡伐里羅	Ugo Cavallero
卡拉漢	Daniel Callaghan

卡羅爾國王	King Carol
卡茲曼	Friedrich Katzmann
卡斯特拉諾	Giuseppe Castellano
卡斯特爾	Ludwig Kastl
卡爾多	Nicholas Kaldor
柯提茨	Dietrich von Choltitz
柯尼希	Marie-Pierre Koenig
柯涅夫	Ivan Konev
柯涅夫	Ivan Konev
柯拉普	André Corap
柯里齊斯	Alexandros Koryzis
柯克	Alex Kirk
柯赫	Erich Koch
柯斯勒	Arthur Koestler
柯爾沃	Max Corvo
柯維爾	Jock Colville
科別列夫	Lev Kopelev
科莫羅夫斯基	Tadeusz Bór-Komorowski
科拉迪尼	Enrico Corradini

科克	Norman Kirk
科切吉娜	Elizaveta Kochergina
科斯莫朗	Cosmo Lang
科威爾	E. M. Cowell
克普納	William Kepner
克努德森	William Knudsen
克拉拉	Clara Petacci
克拉克	Dudley Clarke
克勒克	Mark Clark
克萊斯特	Ewald von Kleist
克雷奇默	Otto Kretschmer
克里普斯	Stafford Cripps
克里斯蒂安十世	Christian X
克魯拉克	Victor Krulak
克魯格	Günther von Kluge
克魯科夫斯基	Zygmunt Klukowski
克魯克	Herman Kruk
克洛德維希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克爾	Walter Kerr
凱特爾	Wilhelm Keitel

凱洛格	Frank Kellogg
凱薩	Henry Kaiser
凱賽林	Albert Kesselring
凱恩克羅斯	Alec Cairncross
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考夫曼	Theodore Kaufman
寇克	Alan Kirk
寇松	Curzon
寇爾納	Paul Körner
坎波斯	Pedro Albizu Campos
坎特里爾	Hadley Cantrill
肯夫	Werner Kempf
庫伯維茨基	Leon Kubowitzki
庫貝	Wilhelm Kube
庫拉拉	Felipa Culala
庫魯格	Walter Krueger
庫格林	Charles Coughlin
庫斯特	Fritz Küster
庫恩霍爾德	Rudolf Kühnhold

庫爾恰托夫	Igor Kurchatov
奎斯林	Vidkun Quisling
昆德魯斯	Birthe Kundrus
何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何洛克斯	Brian Horrocks
賀爾頓	Max Horton
黑利奇	Gotthard Heinrici
赫特林	Konrad Meyer-Hetling
赫拉斯．威爾遜	Horace Wilson
赫魯希切爾	Antoni Chruściel
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赫希	Lewis Hershey
赫斯	Rudolf Hess
赫爾	Cordell Hull
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赫維斯克	Ivan Khvesk
赫維塞克	Mykola Khvesyk
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海爾賽	William Halsey



豪斯霍夫	Karl Haushofer
侯賽尼	Amin al-Husayni
漢基	Maurice Hankey
胡佛	Herbert Hoover
胡普法爾	Theodor Hupfauer
胡塞尼	Jamal al-Husayni
華格納	Eduard Wagner
華西列夫斯基	Aleksandr Vasilevskii
華生瓦特	Robert Watson-Watt
霍佛	Franz Hofer
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
霍普金森	Henry Hopkinson
霍洛舒諾娃	Iryna Khoroshunova
霍洛維茲	Eugene Horowitz
霍奇斯	Courtney Hodges
霍吉	John Hodge
霍斯	Hermann Hoth
霍斯巴赫	Fritz Hossbach
霍恩	Trent Hone
霍爾蒂	Miklós Horthy

霍爾科姆	Thomas Holcomb
霍爾斯特瑙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
懷特	Walter White
懷斯拉比	Rabbi Stephen Wise
懷爾德	Noel Wild
惠特利	Dennis Wheatley
洪齊格	Charles Huntziger
基辛格	Karl Kitzinger
基斯	Roger Keyes
基斯連科	Aleksei Kislenko
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吉羅	Henri Giraud
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齊亞諾	Galeazzo Ciano
加里波底	Italo Gariboldi
加里寧	Mikhail Kalinin
加西亞	Juan Pujol García
夏克伯格	John Shuckburgh
傑克森	Robert Jackson

喬利蒂	Giovanni Giolitti
喬治	Alphonse Georges
喬治．貝爾	George Bell
錢德拉．伯斯	Subhas Chandra Bose
錢農	Henry Channon
金默爾	Husband Kimmel
金開德	Thomas Kinkaid
金恩	Ernest King
京舍	Otto Günsche
切爾	Somerset de Chair
招克爾	Fritz Sauckel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屈希勒	Georg von Kuchler
屈斯考特	Lucian Truscott
瓊蘇爾	MarcelBruno Gensoul
西爾弗曼	Sydney Silverman
希姆萊	Heinrich Himmler
希特勒	Adolf Hitler
希金斯	Andrew Higgins

希維本堡	Geyr von Schweppenburg
霞飛	Adna Chaffee
謝波德	Dick Sheppard
謝娜	Vera Sheina
謝爾蓋	Sergei
休斯頓	John Huston
辛格	Mohan Singh
辛克萊	Archibald Sinclair
查爾斯．馬歇爾	Charles Marshall
札爾茨曼	Isaak Zaltsman
柴茲勒	Kurt Zeitzler
珍．亞當斯	Jane Addams
真納	Muhammad Jinnah
陳納德	Claire Chennault
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朱麗安娜女王	Queen Juliana
朱可夫	Georgii Zhukov
朱安	Alphonse Juin
卓拉科古魯	Georgios Tsolakoglou
垂斯考	Henning von Tresckow

施密特	Carl Schmitt
施利本	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
史巴茲	Carl Spaatz
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史培萊	Hugo Sperrle
史佩爾	Albert Speer
史匹格	John Spiegel
史平浩	Douglas Springhall
史普勞恩斯	Raymond Spruance
史莫茲	Jan Smuts
史密斯	Holland Smith
史密斯牧師	Jay Holmes Smith
史達林	Joseph Stalin
史丹利	Oliver Stanley
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史塔佩爾	Wilhelm Stapel
史塔克	Harold Stark
史特蒂紐斯	Edward Stettinius
史特雷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史特蘭吉威斯	David Strangeways
史特魯普	Jürgen Stroop
史特恩	James Stern
史泰恩哈特	Laurence Steinhardt
史陶芬堡	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erg
史汀生	Henry Stimson
史圖姆普	Karl Stumpp
史圖姆普夫	HansJürgen Stumpff
史林	William Slim
史壯	Kenneth Strong
沙特	Jean-Paul Sartre
沙赫特	Hjalmar Schacht
沙爾莫斯	Hans von Salmuth
紹爾	Karl-Otto Saur
尚穆蘭	Jean Moulin
尚格諾	Jean Guénenno
舒奈爾	Ferdinand Schörner
舒爾茨	Paul Schultz
熱勒維斯基	Erich von dem Bach-Zalewski

頌堪	Plaek Phibunsongkhram
澤爾瓦斯	Napoleon Zervas
祖克曼	Solly Zuckerman
佐林	Shalom Zorin
佐格國王	King Zog
崔可夫	Vasily Chuikov
司徒登	Kurt Student
斯戴格	John Stagg
斯特恩	Abraham Stern
司徒普納格	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
斯圖美	Georg Stumme
斯萊塞	John Slessor
斯卡維齊	Scavizzi
薩布里	Hassan Sabry
薩默維爾	James Somerville
薩羅	Albert Sarraut
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塞西爾	Cecil
瑟曼	Howard Thurman
賽義德	Nuri al-Sa'id

蘇卡諾	Sukarno
蘇茲伯格	Arthur Sulzberger
蘇斯特爾	Jacques Soustelle
蘇斯洛帕羅夫	Ivan Susloparov
索杜	Ubaldo Soddu
索科洛夫	Boris Sokolov
索科洛夫斯基	Vasily Sokolovskii
索斯基斯	Henryk Szoszkies
阿卜杜勒伊拉親王	Prince Abdulillah
阿卜杜赫	Djalal Abdoh
阿布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阿布杜拉國王	King Abdullah
阿布杜勒	Abd al-Ilah
阿佩爾	John Appel
阿梅迪奧	Amadeo of Savoy
阿梅里尼	Quirino Armellini
阿姆斯壯	Edwin Armstrong
阿特拉斯	Icheskel Atlas
阿涅萊維奇	Mordechai Anielewicz

阿諾德	Henry Arnold
阿奇博德	Archibald Arnold
阿齊基韋	Nnamdi Azikiwe
阿傑隆	Charles-Robert Ageron
阿斯卡尼亞諾德	Askania Nord
阿爾寧	HansJürgen von Arnim
厄里	Stephen Early
埃伯斯塔特	Ferdinand Eberstadt
埃普	Franz Ritter von Epp
埃馬努埃萊三世	Vittorio Emanuele III
埃莫里希	Walter Emmerich
埃利希	Hans Ehlich
埃利斯	Earl Ellis
埃爾莫．戴維斯	Elmer Davis
艾米	Amy Johnson
艾德禮	Clement Attlee
艾登	Anthony Eden
艾倫懷特	William Allen White
艾奇遜	Dean Acheson
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愛迪絲．羅傑斯	Edith Rogers
愛蓮娜	Eleanor
愛倫堡	Ilya Ehrenberg
奧蘭多	Vittorio Orlando
奧利芬特	Marcus Oliphant
奧倫朵夫	Otto Ohlendorf
奧卡福	Amanke Okafor
奧肯	Leonid Okon
奧欽列克	Claude Auchinleck
奧什切科夫	Pavel Oshchepkov
奧斯汀	Alfred Godwin-Austen
安布羅西奧	Vittorio Ambrosio
安德魯．康寧漢	Andrew Cunningham
安德森	Kenneth Anderson
安德爾斯	Władysław Anders
安東尼斯古	Ion Antonescu
安東諾夫	Aleksei Antonov
恩比克	Stanley Embick



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
伊德里斯	Idris
伊諾努	Ismet İnönü
伊斯美	Hastings Ismay
伊娃	Eva Braun
依克	Ira Eaker
亞當	Ronald Adam
亞歷山大	Harold Alexander
亞歷山大．諾維科夫	Aleksandr Novikov
亞瑟．康寧漢	Arthur Coningham
耶克爾恩	Friedrich Jeckeln
耶辛	H. B. Jassin
顏里明科	Andrei Yeremenko
英特蘭迪	Telesio Interlandi
英格	William Inge
英夸特	Arthur SeyssInquart
烏曼斯基	Konstantin Oumansky
伍德爾	J. Woodall
伍特	Otto Wuth

伍爾夫	Leonard Woolf
沃頓	William Wharton
沃克	Rhoda Walker
沃森	Hugh Seton-Watson
沃爾夫	Karl Wolff
瓦勒拉	Éamon de Valera
瓦列里安	Valerian Zorin
瓦爾加斯	Jorge Vargas
威廉明娜	Wilhelmina
威斯特林	Raymond Westerling
威斯里切尼	Dieter Wisliceny
威爾基	Wendell Willkie
威爾金森	Peter Wilkinson
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威爾森	Charles Wilson
維比格	Clara Viebig
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維魯希奧蒂斯	Aris Velouchiotis
維辛斯基	Andrei Vyshinsky
維爾納	William Werner

維爾加尼	Orio Vergani
薇拉	Vera Brittain
魏菲爾	Archibald Wavell
魏德邁	Albert Wedemeyer
魏庭霍夫	Heinrich von Vietinghoff-Scheel
魏剛	Maxime Weygand
魏克斯	Maximilian von Weichs
魏茨曼	Chaim Weizmann
魏策爾	Erhard Wetzel
溫珀里斯	Henry Wimperis
溫萊特	Jonathan Wainwright
溫羅德	Gerald Winrod
溫克	Walther Wenck
翁山	Aung Sang
約德爾	Alfred Jodl
約翰．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約安尼迪斯	Yiannis Ioannidis

[1] 編注：此表格按中文注音符號之順序排列。

Beyond 71

世界的啟迪

## 二戰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作 者 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ly）

譯 者 黃煜文

名詞審訂 揭仲

選書責編 洪仕翰

校 對 李鳳珠、魏秋綢

表格協力 鄭司律

行銷總監 陳雅雯

行銷企劃 張偉豪

封面設計 莊謹銘

排 版 宸遠彩藝

出 版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

地 址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3號8樓

電 話 02-22181417

傳 真 02-22180727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刷 呈靖彩藝有限公司

初 版 2024年9月

I S B N 978-626-7376-62-1（全套：平裝）

978-626-7376-56-0（PDF）

978-626-7376-55-3（EPUB）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特別聲明：有關本書中的言論內容，不代表本公司 / 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行承擔。

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by Richard Overy

Copyright © Richard Overy, 2021

First published as BLOOD AND RUINS in 2021 by Allen Lane, an imprint of Penguin Press. Penguin Pres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cropolis, an 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www.qitubk.com](http://www.qitubk.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 永久免費

需要什麼電子書，聯系站長

郵箱地址：[mike2025@foxmail.com](mailto:mike2025@foxmail.com)